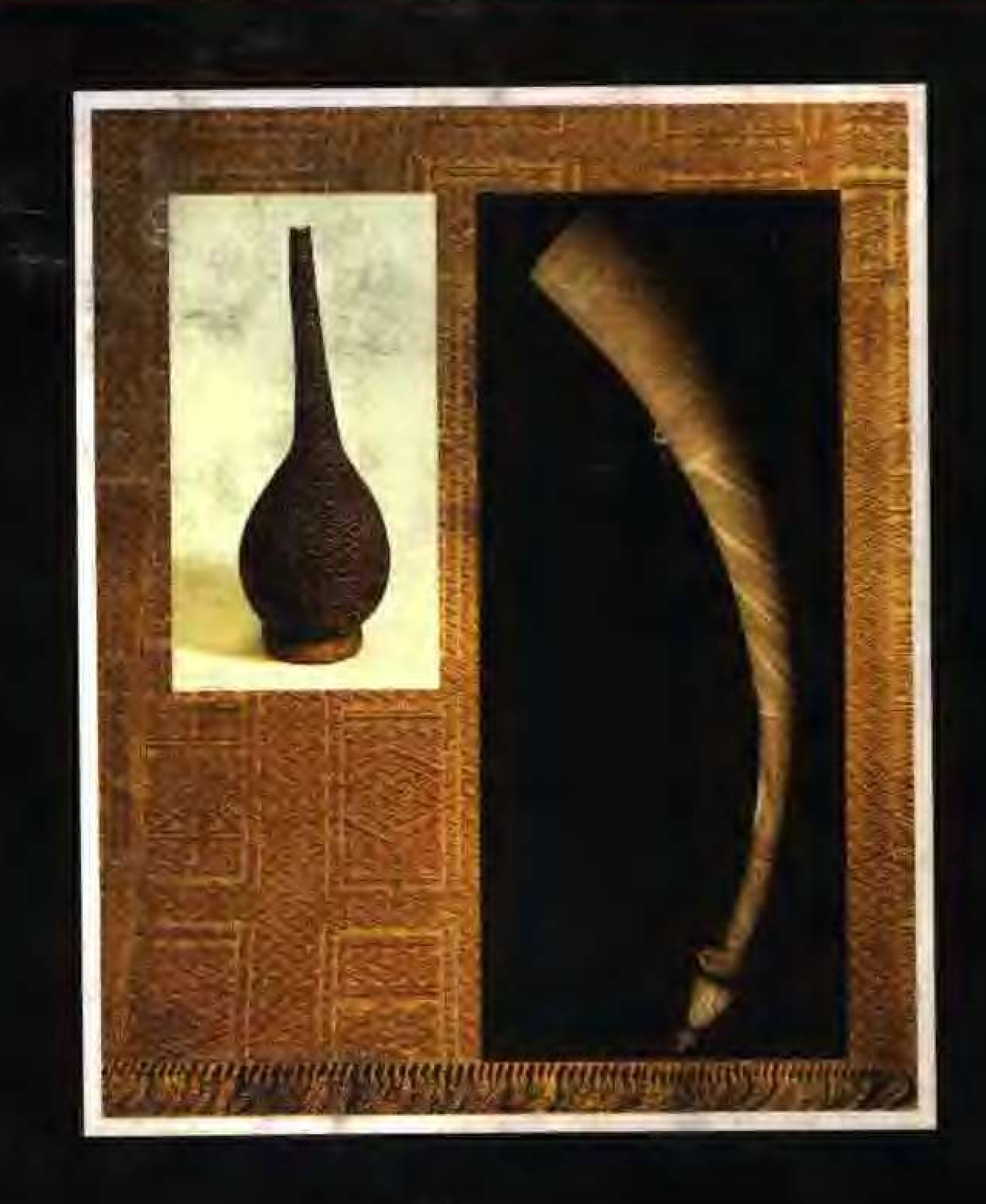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五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主编：B. A. 奥戈特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至八卷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将非洲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布里奥拉等先驱人物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就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还有许多非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摒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互相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材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无偏见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所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实的历史。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统一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拆离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的普遍概念。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非洲通史》对于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关于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五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B.A. 奥戈特　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通史　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肯尼亚)奥戈特主编．李安山等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6
ISBN 7-5001-0431-6

Ⅰ．非…　Ⅱ．①奥…②李…　Ⅲ．非洲-通史　Ⅳ．K4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160 号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1－0311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68002480
邮　　编/100044
责任编辑/臧惠娟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56.25
字　　数/1050(千)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2001 年 8 月第一次

ISBN 7-5001－0431－6/K·54　定价：120.00 元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五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由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李安山教授负责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臧惠娟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向参与本书翻译出版工作但未能属名的许多同志表示感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纪年方法。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表示。

--种方法是以当今时代为基准，即距今的年代，以 + 1950 年为基准年；凡有关 + 1950 年的年代均为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以基督纪元为基准。凡有关基督纪元的年代均以 + 号或 – 号在年代前表示。提及世纪时，以“公元前”或“公元”代替 BC 和 AD。

现举例如下：

(i) 距今 2300 年 = – 350 年

(ii) 公元前 2900 年 = – 2900 年
公元 1800 年 = + 1800 年

(iii) 5 世纪 BC = 公元前 5 世纪
3 世纪 AD = 公元 3 世纪

地　图　图　例

阿散蒂	民族
塔克鲁尔	国家
撒哈拉	地区
阿加迪尔	城镇
尼日尔河	河湖
●	城镇
⊙	城市

其他说明和图例见具体地图。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Addo, M., 16.1
Aeschiman, M., Geneva, © and photo, 20.4
Bahimmi, Dr Al-Saghayar A., Tripoli, 9.11
Barth, H.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1857, ©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London, 2.1, 2.2, 11.1, 11.2, 11.4
Berjonneau, G., ART 135, Boulogne-Billancourt, © and photos, 12.1, 20.1, 20.2, 20.3, 20.7, 28.2
© Bertoni, M., Florence, front cover photo of ivory horn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9.3, 9.4, 9.8
Binger, L. G., *Du Niger au golfe de Guinée par le pays de Kong et le Mossi, 1887–1889*, Hachette, Paris, 1892. ©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London, p. 295, 12.3, p. 47, 12.4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airobi, 25.3, 25.4
British Museum, London, reproduced by courtesy of the Trustees, 18.2
© Collection Musée de l'Homme, Paris, photo D. Ponsard, 9.2, photo D. Destable, 18.3, photo M. Delaplanche, 18.4
© Chrétien, J. P., 26.1, 26.3, 26.4
Cultural Atlas, p. 57, © Spectrum Picture Library, 25.2
Dapper Foundation, Paris, 19.2
Dapper, O.,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Wolfgang, Waesberge, Boom and van Someren, Amsterdam, 1686, © and photos Dapper Foundation, Paris, 14.1, 19.4, 19.5, © and photo National Museum of Angola, Luanda, 19.6
Denham, D., *Narratives of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John Murray, London, 1826, ©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7.3
Dubois, H., Brussels, 12.2, 15.3, 15.4, 15.5, 20.5, 20.6, 27.2
von Duisburg, A., *Im Lande des Chegbu von Bornu*, D. Reimer Verlag, Berlin, 1942, facing p. 81, 17.1
El Fasi, His Excellency M., 8.3
Etnografisch Museum, Antwerp, 18.5
French National Museum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Paris, 9.5
© Frobenius Institute, Frankfurt, 24.6, 24.7
Garrard, T., *Akan Weights and the Gold Trade*, Longman, London, 1980, p. 280, photos courtesy of T. Garrard, 14.3
© Holford, M., 4.2
© The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 London, 4.1, 4.5, 6.1, 23.3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88, © The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7.1
Institut des musées nationaux du Zaïre, 18.6, 19.1
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I.F.A.N. Cheikh Anta Diop), Dakar, photos G. Labitte, 10.5, 10.6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6.3, 6.4, 6.5, 6.9
Janzen, J., *Lemba, 1650–1930*, New York, 1982, courtesy of the Section of Ethnography, Royal Museum of Central Africa, 1980–Tervuren, Belgium, 19.13

Lamb, V., *West African Weaving*, Duckworth, London, 1975, facing pp. 121 and 175, photos A. Lamb, 14.2
Livingstone, D., *Last Journals*, John Murray, London, 1874, ©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vol. I, p. 30, 25.1, vol. I. p. 146, 27.1
© Luigi Pigorini Museum, Rome, photos (left) Pellegrini, (right) Rossini, 13.1, photo Rossini, 13.2
Madagascar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Société d'éditions scientif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902, p. 319, ©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London, 28.1
© The Mansell Collection, London, 6.8, 23.2, 23.4
© The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4.3
Ministry of Cultural Affairs, Morocco, 8.1, 8.4
The Moorland-Spingarn Research Center, Howard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5.1, 5.2, 5.3, 5.4
Muḥammad V Mausoleum, Rabat, courtesy of the Curator, 8.2
Musée universitaire de Kinshasa, Zaire, 19.3
Museum of Malawi, Blantyre, 21.2
Museum Rietberg, Zurich, © and photo Wettstein and Kauf (Von der Heydt Collection), 18.1
King Nana Otuo Siriboe II, 14.4
© Nantet, B., Paris, 26.2
©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nd Oceanic Arts, Paris, photos R. Chuzeville, 9.1, 9.6, 9.7, 9.9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rt, Eliot Elisofon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photo B. Fleischer, 15.1, photos J. Ploskonka, 15.2, 15.6
© National Museum of Angola, Luanda, 19.7, 19.11, photos D. Wade, 19.8, 19.9, 19.10
Palmer, H. R., *Sudanese Memoirs*, Frank Cass, London, 1967 edn., courtes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7.2
Phiri, K. M., 21.1, 21.3, 21.4
Queen Victoria Museum, Harare,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Rijkmuseum voor Volkenkunde, Leiden, 19.12
The Ross-Coomaraswamy Collection, courtesy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MA, 5.5
© P. Marzari, Schio (Italy), 9.10
The Saturday Magazine, 1833, © The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4.4
Topkapi Museum, Istanbul, H1524 p. 271A, © Sonia Halliday Photographs, 6.2
Le tour du monde, Hachette, Paris, 1861, vol. III, © Hachette, Paris p. 21, 10.1. p. 17, 10.2, p. 27, 10.3, vol. III, 10.4 (picture in the public domain)
Travels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into the Interior Parts of Africa, trans. by M. Vaillant, William Lane, London, 1790, vol. II, p. 3, ©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Library, London, 23.1
© Ulmer Museum, Ulm, front cover photos of loincloth and calabash
Vesely, Dr R., 6.6, 6.7
© Werner Forman Archive, London, 11.3, 11.5, 24.1, 24.4, 24.5, Wallace Collection, 16.2, private collection, 16.4, Addis Ababa Museum, 24.2, 24.3
© The Wilberforce Museum, Hull, 1.1, 1.2, 1.3

序　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1974-1987年)

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还有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未能摆脱若干先人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过去欧洲的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的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使人相信，自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使得任何种族集团和民族都不能融合，使沙漠两侧壮大起来的社会集团也不能交流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在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的联系密切。但是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而这些民族和社会是被具有悠久历史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贩卖奴隶和殖民化出现的种族成见，随之又产生了轻视和无知，而这种成见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使他们把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都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广泛使用“白种”和“黑种”这个标签的观念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就不得不起来斗争了，他们既反对经济上的奴役，也反对心理上的奴役。非洲人由于肤色易于辨认，于是变成了商品，在他们身上打戳记，让他们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文化和历史事实的理解必然受到歪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生活和作为其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相当谨慎地——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较为严密、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主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其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八卷集《非洲通史》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

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曾热切地重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历史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民族在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演变过程。

为了进行这一繁重任务，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因为资料的浩繁和文件的零散使得这一任务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第一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69 年，专门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业务工作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着手搜集口头传说，建立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中心，搜集未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材料辑成的，以后分九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非洲和其他各洲的专家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工作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专门用来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不同部分连接起来。1969 年和 1970 年分别在巴黎和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两次国际专家会议，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八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①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 3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职责。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各种资料来源为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强制迁移，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

① 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出版阿拉伯、西班牙、朝鲜、葡萄牙、中文和意大利文版；第一卷还出版了斯瓦希里和豪萨文版；第二卷出版了豪萨文版；第四卷和第七卷出版了阿拉伯、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版。

殖民化和建设国家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有时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的一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显著的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继续大量研究各种专题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② 中正在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还将努力编写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史学家孤立地拼凑成为非洲学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的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特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各种问题和非洲未来的专家以及了解非洲大陆全面情况的专家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教科文组织作出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正义、进步、和平。这就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

② 这套丛书已发表以下 11 部著作：《古埃及人口构成和破解莫罗埃文字》、《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非洲奴隶贸易》、《跨印度洋的历史关系》、《南部非洲史学研究》、《非洲的非殖民化：南部非洲和非洲之角》、《非洲民族名与地名》、《黑非洲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1935 年至今》、《近代非洲史研究方法论》、《非洲的教育进程和史学研究》、《非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利比亚古文物》。

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具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它们热心帮助，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1978－1983年)

B.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份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著作往往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的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能为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300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800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

*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第六届全体会议(布拉柴维尔,1983年)选出了新的主席团，由艾伯特·阿杜·博亨教授代替奥戈特教授出任主席。

交付出版时，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30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此外还尽可能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此外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300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目　录

1 国际贸易之争及其对非洲的影响

M. 马洛维斯特

序　言

1500年的世界地缘政治地图揭示，当时存在着几个主要的、较自治的地区，它们通过贸易或由于冲突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首先，是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远东，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包括马六甲群岛，婆罗州，苏门答腊和印度，这里是世界香料的产地。其次，是中东，这一地区辽阔，包括阿拉伯半岛、萨发维德帝国和随即将北非纳入其中的奥斯曼帝国。然后，是欧洲及其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日尔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拉丁人，他们都局限于各自的疆域之内。最后是非洲，北有地中海海岸线，以及红海和印度洋海岸线，这些地区正日益卷入远东和东方的国际贸易。 1

从1500到1800年，一个新的以大西洋为导向的地缘经济体系得以建立，其三角形的贸易模式连接着欧洲、非洲与美洲。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开放，欧洲，特别是西欧已超越美洲与非洲社会，占优势地位。因此，欧洲在因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与掠夺所产生的资本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欧洲人到非洲和南北美洲领土上的贸易点定居，从而确立了对海外经济的支持。这些活动由于促进了西欧在世界其他地区取得控制权，因而起了长期决定性的作用。

1450到1630年这段时期，在历史学中被认为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和西南欧进行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展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更明显地分化为经济先进的西北部，较不发达的伊比里亚半岛国家虽然不是没有发展，但日益依赖于西部市场的中东部欧洲辽阔地区。

这也是一个向海外扩张的时期，远达大西洋沿岸的辽阔地区，甚至进入太平洋。从16世纪开始，非洲海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区，虽然北非的情况与撒哈拉以南地区有所不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与北非穆斯林国家在地中海盆地的竞争激烈，而奥斯曼帝国也越来越得势。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埃及，后来又征服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逐步建立起对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统治，奥斯曼摄政权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发展。这些对欧洲人的航海活动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南部沿海构成了很大威胁。但在摩洛哥，葡萄牙人设法控制了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远至阿加迪尔(圣克鲁斯的阿格尔角)和萨菲，卡斯蒂利亚人也在特莱姆森和奥兰建立了基地。① 2

① 见本卷第9章。

这些征服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使葡萄牙人得以控制一些早已建立的重要黄金和奴隶贸易路线的终端，这些路线从西部苏丹穿越撒哈拉和马格里布直到地中海。其他重要的纵横路线的终端则在土耳其人控制之下，或奥斯曼政府在非洲——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多少有些自治的代表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对贸易终端的控制是在西非将近一个世纪的扩张之后，从而保证了这个地区的黄金和奴隶等货物（昔日全部运往穆斯林世界）部分为欧洲人所拦截。[②] 欧洲人在非洲的扩张致使马格里布黄金供应减少，对此应进一步调查。调查的结果很可能使人们更能理解摩洛哥于1591年对尼日尔河湾之地的征服。这次征服使得摩洛哥人能够控制从西非到马格里布和埃及的某些黄金和奴隶贸易路线。朱达尔帕夏闻名的征战是16世纪具有突出特点的大征服的一个典型例子。值得补充的是朱达尔帕夏本人是有伊比里亚背景的背叛者，他的军队也主要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些背叛者带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的传统。[③]

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西非和东非海岸会长期置于葡萄牙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之下，这一观点有待确认。葡萄牙对其黑人贸易伙伴也施加一定的文化影响。在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在西非沿海建立了许多贸易站，使沿海居民及其统治者对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发生了持久的兴趣。1481至1482年后，黄金海岸最重要的地方是埃尔米纳堡。其他贸易站也在那个地区建立起来，例如，阿克西姆、沙马和阿克拉。葡萄牙人在建立贸易站时，寻求当地非洲统治者的允准，并通过支付各种款项试图赢得他们的友谊。

3

在东非方法就不同了。葡萄牙人粉碎了索法拉、蒙巴萨及其他沿海城镇的防御，留下警卫队并为葡萄牙王室征税。与此同时，葡萄牙人试图接管沿海及其腹地与印度之间的黄金、象牙和金属贸易。在非洲，各商行代理处和葡萄牙人贸易站的利润是不一样的。16世纪初叶，埃尔米纳、冈比亚河口、塞拉利昂和索法拉的贸易巨额利润，主要来自购买廉价黄金，也来自由腹地供应奴隶的贸易。然而阿尔金这一葡萄牙最老的商站则不断失去其重要性。[④]

与非洲的贸易给葡萄牙带来巨大利润。根据J. 卢西奥·德阿塞韦多的估计，在15世纪80年代皇家获利共计约6000万葡萄牙里尔，在曼努埃尔国王（1491-1521年）统治时期达两亿里尔，到1534年至少有2.795亿里尔。[⑤] 无疑，这一增加不仅得自与印度贸易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也得自与非洲贸易的利润。而且，非洲黄金的大量流入使约翰二世及其继承者有可能稳定其银币，铸造“克鲁扎多”（cruzado，一种高值金币）；更重要的是扩大舰队和国家，以及殖民政权。[⑥] 这一事实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社会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开辟了机会，使贵族和士绅获得许多名利双收的官职。昔日反对从贵族政体到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者因此而被消灭，国家成为更有凝聚力的实体。

与非洲的贸易以及随后与印度的贸易加速了葡萄牙商人阶级的发展，这个阶级即使在

② V. 麦哲伦·戈廷霍（de Magalhães Godinho），1969年，第184、217页。
③ 见本卷第2章。
④ V. 麦哲伦·戈廷霍，1969年，第185-188页。
⑤ V. 麦哲伦·戈廷霍，1978年，第2卷，第51-72页
⑥ M. 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69年，第2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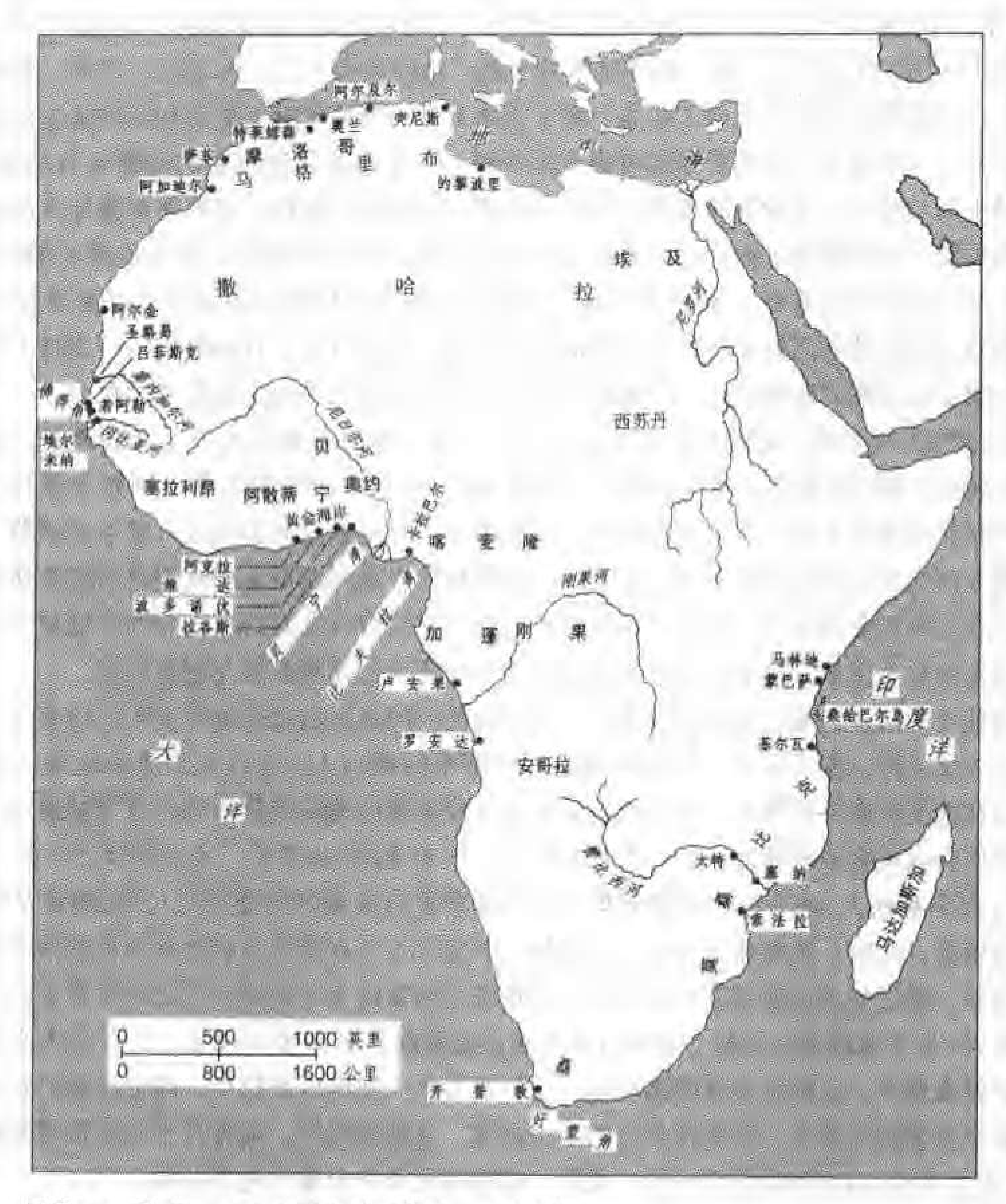


插图 1.1 非洲：16至18世纪欧洲贸易主要联系点

15世纪也是较弱小的。这样，葡萄牙可能被认为，在16世纪初叶，已经进入一条持续的经济和政治扩张之路。然而，其落后和呆滞的社会经济结构终于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海外扩张需要大量财政支出，购买黄金和奴隶有赖于为非洲提供大量的铁、黄铜、铜器和廉价纺织品，以及一些白银、粮食和盐。这些货物葡萄牙都不生产而必须向外国来客购买，或从布鲁日购入，后来则从当时欧洲的主要贸易中心购进。舰队的扩张则有赖于木材和其他森林产品的进口，主要从波罗的海国家运来，它们也供应一些谷类，而自14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缺乏谷物。[7] 这个问题尚未完全调查清楚，但显然从对外贸易中所获的利润会用来购买对非洲的经济交流所必需的外国货。葡萄牙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生产，因为它人口潜力微弱 5

[7] A. 达·西尔瓦·科斯塔·洛博（Da Silva Costa Lobo），1904年，第83页。

(1550年只有140万居民),[8] 而且外国竞争严峻，特别是葡萄牙市场长期受欢迎的工业品。

从15世纪70年代起，欧洲的经济繁荣引起了价格逐步上升。16世纪下半叶，价格升幅巨大，主要影响到农产品与工业品。对于价格上升与葡萄牙海外贸易利润增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作调查，虽然看来这对葡萄牙不利。对非洲或印度贸易的垄断虽有所帮助，但帮助不大。此外，这种垄断也受到完全不同的经济前提所驱使。只有在葡萄牙人能把对其有利可图的条件强加于他们的黑人贸易伙伴时，亦即在低价购入、高价出售的情况下，高支出与海外扩张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利。但是，这就使他们必须去限制或甚至排斥从欧洲，特别是除葡萄牙之外其他国家来到商站的移民。为此目的，有必要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拦阻前往非洲的欧洲对手，这样做花费极高，并证明几乎超出葡萄牙的财力。[9]

到15世纪70年代，葡萄牙和其他国家一样、也与卡斯蒂利亚发生了武装冲突。由于葡萄牙舰队的暂时优势及其外交策略，结果于1481和1493年分别签署了阿尔卡苏瓦什和托德西利亚斯两项条约，将卡斯蒂利亚人逐出西非，并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给予葡萄牙在东南部大西洋的经济和政治扩张的专有权。发现和征服美洲以及总的欧洲政治使卡斯蒂利亚的注意力转离非洲事务。然而，葡萄牙和它在西非沿海以及其后在东非的其他对手之间的关系发展是不同的，特别是由于那些对手是在经济上比葡萄牙更先进的国家。

葡萄牙统治者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不得不为他们的殖民活动在意大利和德国南部金融巨头中寻求支持。意大利人，特别是从佛罗伦萨来的那些人，或在里斯本和安特卫普定居，或在那里有商务代理人，他们投放大量现金或货物由葡萄牙统治者任意支配使用。这些贷款随后以现金或从海外进口的货物来偿付。从15世纪80年代，也可能更早一些，这些银行家中有些人，诸如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基奥尼以及塞尔尼奇等人，已经积极从事与非洲的贸易，并给予葡萄牙王室足够的报酬。葡萄牙王室在布鲁日以及后来在安特卫普的账目揭示，国王与诸如弗雷斯科巴尔迪、阿费塔蒂和富格尔等主要商行之间有着牢固的财政联系。[10] 在扩张的第一阶段，葡萄牙统治者设法垄断从非洲进口黄金，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奴隶贸易，或至少是其间接利润。这项贸易由一项制度来执行，即把昂贵的贸易执照主要发给葡萄牙商人，发给外国人的则少得多。在困难时期，葡萄牙王室经常将其在非洲(除埃尔米纳)的权利给予商人们，执照上标明被允准的贸易区地理范围。

在16世纪20年代中期，葡萄牙在购买黄金中首次遭遇困难，甚至在埃尔米纳地区也有困难。[11] 这可能是由于葡萄牙当时已无力供应非洲沿海足够的货物来稳定黄金的供应。毫无疑问，在埃尔米纳和阿克拉的腹地仍然存在大量黄金资源，但情况却对葡萄牙的欧洲对手，即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有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资本可随意支配。而且，他们用以交换的货物大多在其本国生产，毋需进口。最后，无论法国、英国还是荷兰都还没有因过分发展的控制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行政机构而带来的沉重负担。葡萄牙的机构既花钱又反应迟缓，不足以适应海外贸易多变的特性。从法、英、荷来到非洲的商人有能力供

6

[8] V. 麦哲伦·戈廷霍，1978年，第2卷，第25页。
[9] 同上，第185-203页。
[10] C. 韦尔林顿(Verlinden)，1957年，第624-5页；V. 劳(Rau)，1966年。
[11] M. 马洛维斯特，1969年，第492，500页。

应比葡萄牙人更多的货物，并以更低的价格出售。16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资料证明，虽然葡萄牙人已了解到这一情况，但他们已无力改变。

奴隶贸易

葡萄牙最初对黑非洲感兴趣是由于它的黄金，以往黄金是出口到伊斯兰国家的。然而，葡萄牙人不久就发现了非洲第二种吸引欧洲人的产品，即奴隶。虽然非洲的奴隶制与欧洲人所知道的不同，向阿拉伯国家出口奴隶是非洲大陆大部分地方，特别是苏丹的老传统。这个传统看来对葡萄牙人在 15 和 16 世纪从西非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从塞内冈比亚组织对奴隶的定期购买有所促进。塞内冈比亚长期以来即是马格里布的经济伙伴。葡萄牙人在西非东南部远远深入到内陆，成功地运用了在塞内冈比亚所采用的贸易方法。他们认识到成功全赖于与当地酋长和商人的合作，于是极力使这些人对奴隶贸易感兴趣。葡萄牙人也认识到这种贸易会导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战斗加剧，因为俘虏可立刻成为奴隶贸易的主 7 要对象。葡萄牙人迅即抛弃了他们在道义上对奴隶贸易的反对，也如欧洲许多人相信的那样认为这可以使黑人得到拯救，如果他们留在本土，便会像非基督教徒那样永久地被罚人地狱。

不久对奴隶贸易又提出了另一个论点，即黑人是诺亚之次子含姆的后裔，他们遭到诅咒，因而被惩罚永远做奴隶。⑫ 这种思想意识的动机不应低估。这里还应补充一点，即黑奴在欧洲的出现是在黑海地区的白人奴隶买卖几乎消失之时。从此时起，奴隶即被定为“尼格罗”（Negro），不知还有什么别的称呼可代表黑种人。

整个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叶，“黑货”的主要市场是欧洲，特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大西洋的一些岛屿，如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及后来的圣托马斯岛，虽然运往这些岛屿的奴隶数目因岛屿本身的面积小而受到限制。在马德拉和佛得角群岛，特别是在圣托马斯岛，刺激奴隶贸易的主要因素是岛上引进了甘蔗和棉花的种植。奴隶制在欧洲大陆上不可能大规模发展，因为缺乏经济方面的原因。带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非洲人主要被雇佣做家庭仆役或市镇中的半熟练工匠。农业是欧洲经济的基础，没有证据表明非洲人在农业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据 V. 麦哲伦·戈廷霍估计，1451 至 1505 年之间从阿尔金带人的奴隶人数为 25,000 到 40,000 之间。⑬ 当时从非洲其他地方出口的奴隶还很少，只是出口到穆斯林国家。根据柯廷的估计，欧洲人从非洲带回的奴隶在 1451 到 1600 年之间估计约 274,900 人，其中欧洲和大西洋岛屿的奴隶约 149,000 人，西属美洲约 75,000 人，巴西约 50,000 人。[14]这些数字带有早期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特点，因为此时还是新世界种植业制度大发展的前夕。它们确证了这一论点，即白人发现美洲及美洲的经济发展给奴隶贸易以推动力。而近来则认为奴隶贸易的发展主要是由于西班

---

⑫ 许多葡萄牙作家都有此见解，E. 德朱拉拉（de Zurara），1949 年，第 7、14、25、38 章；J. 德巴洛斯（De Barros）和 I. 德阿霞（De Asia），1937 年，第 80 页。

⑬ V. 麦哲伦·戈廷霍，1962 年，第 193 页。

8 牙殖民地大量缺少劳力，当地人口太少，无法实现西班牙人要求的沉重的生产任务。⑮ 当然，在近代早期，大量奴隶集中在美洲低地具有热带气候的地区。但是，大规模地招募黑人进入安第斯山高地采矿业的任何尝试均未能成功，尽管大批印第安人劳工能在那里生存下来。16 世纪后期，在波托西的开发高峰期，全城总人口约 150,000 人，其中非洲人仅约 5000 人。⑯ 将他们招人采矿业的企图再一次失败。

在美洲的首批非洲人是由征服者从欧洲带来的。他们主要是从塞内冈比亚来的奴隶，可能曾先带到欧洲或是出生在欧洲。他们在美洲被称为拉丁人，因为他们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至少已受到伊比利亚国家文明的部分影响，对他们的看法也不错，这与博扎勒人(bozale)不同，后者是从非洲直接带来的，受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影响。⑰ 16 世纪初期，安的列斯岛对黑人劳动力已有很大需求，随着西班牙征服后领土的扩张，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而卡斯蒂利亚教士和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保护他们的利益，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从欧洲，而主要是从非洲供应黑奴的问题成为美洲新贵族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非洲的葡萄牙人也有很大的问题。在整个 15 世纪，他们购买奴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 16 世纪以及其后时期，能够大量供应奴隶的地区越来越吸引他们。这就是从 16 世纪初期以来葡萄牙人在刚果(它没有金银)实行扩张，以及其后征服安哥拉的基础，后者是由罗安达岛上迅速发展的奴隶贸易为先导。对奴隶的大量需要也影响到圣托马斯岛上的殖民定居者，他们需要奴隶为其耕作种植园，并把奴隶贩卖到西属美洲殖民地，自 16 世纪后期起卖到葡属巴西。巴西黑人人口在 16 世纪后期仅为数千人，但在 17 世纪中增至 400,000/450,000 人，这一增加与甘蔗种植园的发展有关。⑱

征服美洲与黑人劳动力的需求也给卡斯蒂利亚国王造成了很大问题。一方面他必须保证给殖民者供应奴隶，一方面也很清楚，高价的执照制度是王室金库的极大财源。(贩卖9 奴隶的执照由卡斯蒂利亚王室颁发，凡从事进口者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五年内，要给殖民者带来一定数目的奴隶。)由于奴隶的需求增长，执照的价格亦随之持续上升。R. 梅尔来夫认为，王室愿意为大量奴隶发放进口执照，是因为人数愈多收入就愈高，这是正确的。⑲ 第一批获得执照的往往是垄断性的，包括与国王亲近的贵族，如查理五世的大臣戈维内特，于 1518 年获得；也有大资本家，诸如韦尔泽家族、海因里希·埃因格尔和杰罗姆·塞勒，于 1528 年获得，⑳ 这可能是与他们在委内瑞拉的拓殖地与采矿计划有联系。在委内瑞拉早已有非洲人，他们是由金融家征服者以及其他人从住在非洲或欧洲的葡萄人手中作为奴隶买来的。但是，不可避免，潜在的奴隶贩子会试图消除代价高昂的葡萄牙办事处，以及拦截“黑货”的购买和出售。在非洲，那些想要进人这种贸易的人必须克服葡萄

⑮ 见本卷第 4 章。
⑯ J. 沃尔夫(Wolff)，1964 年，第 158-169、172-174 页。
⑰ R. 梅尔来夫(Mellafe)，1975 年，第 14、15、19、21 页。
⑱ F. 毛罗(Mauro)，1960 年，第 179-180 页。
⑲ R. 梅尔来夫，1975 年，第 3 页。
⑳ G. 塞勒(Scelle)，1906 年，第 1 卷，第 122-136 页。

牙人设置的障碍，而在美洲，他们不得不诉诸非法买卖，因为卡斯蒂利亚王室只允许持执照者进口奴隶。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长期缺乏劳动力，所以愿意从走私贩手中购买劳工。奴隶通过非法的港口进入，这对西班牙殖民官员有利，他们从贿赂中可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外国人发现这个系统特别有吸引力，因为支付给他们的往往是黄金和白银，而从西属美洲私人出口金银是官方允准的，只要不超出塞维尔和加的斯，这两地是卡斯蒂利亚殖民统治的强大中心。私人从西班牙出口黄金与白银原则上是禁止的。

这样，一切都似乎有利于增加从非洲出口黑人到美洲，但只有在甘蔗大种植园开始建立之时，这项贸易才真正繁荣。事实很快表明，在西属美洲，随后在巴西，印第安人经受不住种植园的持续苦役，而非洲人却是绝好的种植劳工。在采矿方面，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大，只有圣多明各岛、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某些热带地区的矿区例外。

因此从16世纪初叶起，特别是从1550年起，非洲作为劳动力和一些黄金的供应者，对发展中世界的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但并非情愿的作用。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的地位却越来越不稳定。在摩洛哥，他们受到反对异教徒的萨阿德·谢里夫圣战的严厉打击。1541年，葡萄牙失去阿加迪尔，不久，因财政困难又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的摩洛哥港口。1560年，葡萄牙王室首次破产。一个殖民帝国在维持的同时，又给部分贵族、士绅和一些商人带来巨额利润，而这却毁灭了王室及其金库，并给人民增加了日益沉重的负担。 10

新的欧洲大国的到来

从16世纪20年代起，法国人以及从16世纪50年代起美国人成为葡萄牙在非洲的劲敌。然而，从16世纪后期起，荷兰人甚至更具威胁。起初，只是个别的法国商人，如有名的迪耶普的让·安戈，或私人的贸易公司表现积极。在与非洲的贸易中，法国国王和英国王室均未直接卷入。1531、1537和1539年，弗朗西斯一世甚至试图阻止他的臣民去非洲探险，但未成功。当时正值法国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发生尖锐冲突，他生怕与葡萄牙的关系搞僵。鲁昂、拉罗谢尔和迪耶普的商人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已派船去非洲。1525年，刚果国王捕获了法国的一艘小船，并把它连同船员交给葡萄牙人。[21] 法国的扩张在佛得角和塞内加尔最为强大，法国人经常掠劫满载非洲的黄金或印度的货物而归的葡萄牙船只。其他许多法国港口，如勒阿夫尔和翁弗勒尔，也参与了16世纪期间法国的这一扩张。南特人逐步控制了这一买卖。在16世纪最后的25年中，法国人在塞内冈比亚的地位已很牢固，特别是在戈雷、波图达尔、若阿勒和沃洛夫国的吕非斯克(弗雷斯科河)。法国人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运来纺织品，白酒和金属制品，可能还有火器。火器的进口看来使情况有利于法国人，因为长期以来葡萄牙王室坚决禁止非洲进口火器，而当地统治者则渴望获得武器。法国人收买了大部分的黄金和象牙，以及马拉盖塔胡椒、皮革和棕榈油。奴隶对他

[21] A. 布拉西奥(Brasio)，1952年，第1卷，第138、153页。

们尚不重要。在16世纪中叶，他们是葡萄牙人在胡椒海岸和黄金海岸的危险对手，[22] 显然法国人比葡萄牙人进口的货物多得多。这使葡萄牙人在埃尔米纳地区大伤脑筋，例如，1556年法国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运来很多货物，并以低价卖出，致使埃尔米纳的葡萄牙代理商无法购买黄金。[23] 但这只是个例外，不久葡萄牙的地位即有所改善。在欧洲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的扩张也许有所减弱，但这并未得到进一步确证。有些火器显然是在喀麦隆沿海卖给当地的统治者们了。但法国在塞内加尔的地位最强大，在那里他们往往与"坦戈毛斯"（Tangomãos）合作，后者是从佛得角来的移民，主要是葡-非混血种人。他们把葡萄牙人排挤出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河口港湾。到16世纪末叶又轮到英国人把他们排挤出去。[24]

16世纪英国人在非洲的扩张与法国人相似。最初，继1541年葡萄牙人被排挤出其大部分大西洋港口之后，这些港口即对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只开放。这样英国人与摩洛哥有了活跃的经济联系。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英国贸易公司数次派人探险，他们的报告至今尚存。他们访问了西非海岸，远至贝宁湾，主要收购黄金、皮革和少数奴隶。葡萄牙人的报告揭示，16世纪末，英国人已与黄金海岸的居民有联系，虽然他们似乎对奴隶贸易还没有很大兴趣。[25] 甚至到1623年，理查德·乔布逊在下冈比亚地区还拒绝购买黑奴，虽然葡萄牙人在那里很活跃，并与非洲的商人合作。[26] 关于英国在西非其他地区的扩张情况尚很少知道。然而，到1600年他们在塞内冈比亚两翼的地位都是很强大的，他们赶走了葡萄牙人和法国人。1588年，第一家与几内亚做生意的英国公司主要由伦敦和埃克塞特的商人建立，他们在去冈比亚河口的贸易探险中已很积极。[27]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家公司发展到多大的规模。可能在16世纪末英国人发现抢劫大西洋水域的卡斯蒂利亚人船只比同非洲人做买卖更赚钱。

正是在这时荷兰人在非洲沿海出现。那时他们与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并拒绝接受教皇再次划分大西洋。他们将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葡萄牙作为敌国来对待。商人积聚的巨额资金和他们的强大舰队使得荷兰人有可能在印度洋和非洲进行扩张，其规模是英、法所不曾达到的。一位荷兰学者H.泰尔佩斯特拉认为，到非洲国家的探险最初是由中等商人发起的公司所组织的，他们对资本迅速盈利感到兴趣。然而前往东印度的探险则由大资本家组织，他们往往是从安特卫普来的富裕移民，有能力作较长期的投资。[28]

从1593至1607年，约有200艘船只从荷兰驶往非洲，在1610和1611年每年显然有20艘船远航。在1594和1595年，荷兰人来到戈雷岛。几年后他们到达贝宁角，在那里购人棉纺织品和贝壳，然后拿到黄金海岸交换金银。在1611年荷兰人在黄金海岸的穆里建造

[22] C.A.朱利安(Julien)，1948年，第177页；G.马丁(Martin)，1948年，第4页。
[23] G.马丁，1948年；J.W.布莱克(Blake)，1942年。
[24] L.西尔维拉(Silveira)，1946年，第16、17、35-37、44-46页。
[25] T.S.威兰(Willan)，1959年，第94-97、139页；J.W.布莱克，1942年，第129、133、138、150-155页。
[26] R.乔布逊(Jobson)，1625年，第112页。
[27] 参看注[25]。
[28] H.泰尔佩斯特拉(Terpestra)，1960年，第341、342页。

拿骚港，这是他们在西非海岸的第一个有设防的贸易站。他们还与阿克拉地区发展贸易。[29] 葡萄牙人不是荷兰人的对手,荷兰人能以低价供应大量物品,因为他们有财富和有效的贸易网络。在这方面荷兰人也超过英国人和法国人。荷兰人运到非洲的商品有铁、黄铜、铜和锡器,各种货源的廉价纺织品、白酒、武器、各种装饰品、日常用品,甚至眼镜,受到各种人的欢迎。这些进口(大规模的进口使彼特·德马雷斯在1601—1602年时感到吃惊)[30]致使从内陆到黄金海岸的黄金供应再度增加，这主要对荷兰人有利。他们还把从圣托马斯岛产的糖输人非洲：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主宰了这项贸易，把半成品运到阿姆斯特丹进行精炼。[31]

荷兰人在西非的扩张多少具有一些自发性。1617年，荷兰人在塞内冈比亚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是戈雷岛上的主要力量，在若阿勒、波图达尔和吕菲斯克，他们不仅把葡萄牙人，也把英国人和法国人大部分逐出贸易领域。他们的强大地位维持了50多年。与此同时，他们的船只到达了卢安果、刚果和安哥拉。最初，他们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对奴隶贸易不感兴趣，然而，在16世纪末，欧洲人在非洲的扩张进人一个新阶段，其间，奴隶贸易大幅度增长，从而也成为荷兰人最为重要的贸易。这个阶段开始之时是在埃尔米纳、阿克拉、阿尔达、贝宁和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卡拉巴尔、加蓬和喀麦隆购买奴隶。购买的奴隶被卖到圣托马斯岛(当时由荷兰人占领)的种植园以换取食糖，或运至巴西。荷兰人将塞内加尔河口周围地区的沃洛夫人向外输送，据O. 达珀认为，沃洛夫人体魄强壮，适于种植园的工作。[32] 1641年对安哥拉的征服与荷兰人在巴西需要劳动力密切相关，此后便追随了葡萄牙的模式。[33] 虽然荷兰人于1648年失去了巴西东北部，并被逐出了安哥拉，但这两个地区之间在奴隶贸易基础上的紧密联系却一直延续到19世纪。

13

在这段时期内，东非并未引起欧洲人的兴趣。葡萄牙人统治了索法拉，并在政治上将其他沿海城镇置于其控制之下，但他们还没有深人到内地。沿赞比西河他们最远到达太特和塞纳，他们在那里的市场上购买少量黄金。[34] 至16世纪中叶，腹地向沿海提供的黄金，可能还有其他物品都已减少，尚无证据说明后来有所增加。对索法拉的黄金供应减少，使基尔瓦、蒙巴萨、马林迪等城镇的地位受到影响，这些城镇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在为印度和阿拉伯商人提供黄金和其他物品方面已很活跃。这一衰落也许是由于穆斯林贸易在东非海岸脱节所引起，但似乎也可能是连接港口和腹地的贸易路线上发生了一些政治动荡所造成。[35]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沿海居民试图借助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人的干预来反对葡萄牙人遭到失败。17世纪起伊玛目特(Imāmate)对东非沿海和岛屿的扩张使17世纪

---

[29] K. 拉泰尔班德(Ratelband)，1953年，第XXI-XXV、LXXV、LXXXIII页；P. 德马雷斯(de Marees),1912年。

[30] P. 德马雷斯，1912年，第45、46、51-54页。

[31] K. 拉泰尔班德，1953年，第XCV、CXV、114、118等页。

[32] 同上，第8、10、27-35、40-61页；O. 达珀(Dapper)和A.F.C. 赖德(Ryder)，1965年。

[33] M. 马洛维斯特，1969年，第569页。

[34] J. 卢西奥·德阿塞韦多(Lúcio De Azevedo)，1947年，第189-201页；V. 麦哲伦·戈廷霍，1969年，第253-275页。

[35] V. 麦哲伦·戈廷霍，1962年，第272-273页。

后期产生了一些变化，将葡萄牙的权力仅限于莫桑比克。[36] 然而，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这些变化才变得十分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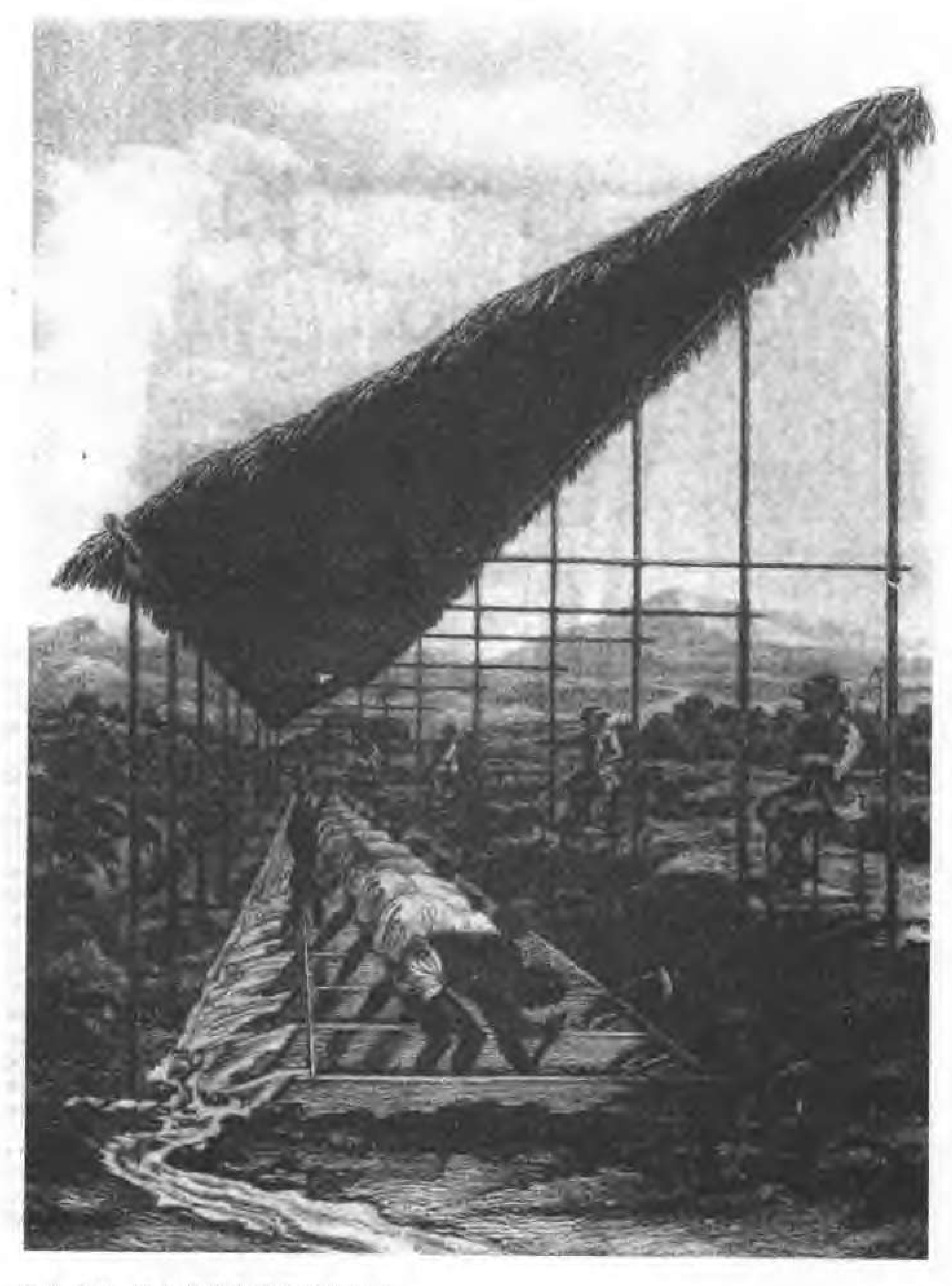
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非洲南端，欧洲扩张的第一个迹象是在17世纪以被称为布尔人的荷兰(和日耳曼)农民殖民地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布尔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资助下定居下来。这一现象在17世纪甚至在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无重要意义。然而，布尔人对桑人施加压力，将其变为奴隶并赶出家园，几乎把他们灭绝，这对非洲人是个危险的预兆。[37]

非洲作为劳动力储备库

据P.D.柯廷估计，在1451年到约1600年间，约有274,900名黑人运往美国。在其后数年中这一数目增加到1,341,100，在18世纪增至600万。根据F.毛罗的估计(也为P.D.柯廷所接受)，在1575至1675年间，约有40万至45万奴隶运到巴西，到18世纪，几乎达到200万。[38] 在整个18世纪，运到英属和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劳工大量增加，对古巴的劳工供应也有增长。上述数字表明欧洲人对非洲的态度有了虽说是逐渐的但却是根本的变化，即非洲不再是黄金的丰富来源，而首要的则是劳动力的储备库，没有这些劳动力，欧洲人在美洲的许多庄园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这个变化在17世纪中叶是显而易见的，到该世纪末则十分突出。甘蔗种植业的迅速发展是黑人劳工需求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这一进程早在15世纪已在马德拉、加那利和佛得角群岛开始，特别是在圣托马斯岛。在16世纪后半期扩展到巴西，并在其东北地区大规模发展。荷兰人的占领不但未妨碍而且激励了这一进程。这一局势直到荷兰人被逐出巴西并将巴西所采用的炼糖技术转让给加勒比地区才有所变化。加勒比地区逐步变为主要由法国人和英国人所统治。因为各岛的激烈竞争，甘蔗种植被推到巴西经济生活中的次要地位。随着巴西中部金矿和钻石矿的开采(以及从19世纪起巴西南部的咖啡生产)，奴隶进口的需求几乎是17世纪的三倍。[39]

在加勒比地区，向英国人和法国人庄园供应的奴隶也大量增加。在英国殖民地，奴隶的进口从17世纪的263,700人增至18世纪的1,401,300人。法国所占岛屿的情况也相类似，圣多明各进口的数量最多——将近799,000名奴隶，大多数是18世纪从非洲直接运来。[40] 古巴也开始了甘蔗种植，在劳动力的需求方面，其结果也相同。荷属苏里南和中美洲及南美洲北端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庄园也吸收了大量黑奴。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和马里兰的水稻种植园为奴隶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将近40万奴隶运进英国殖民地，奴隶人数显著增加。[41] 19世纪棉花种植园的发展，将美国南方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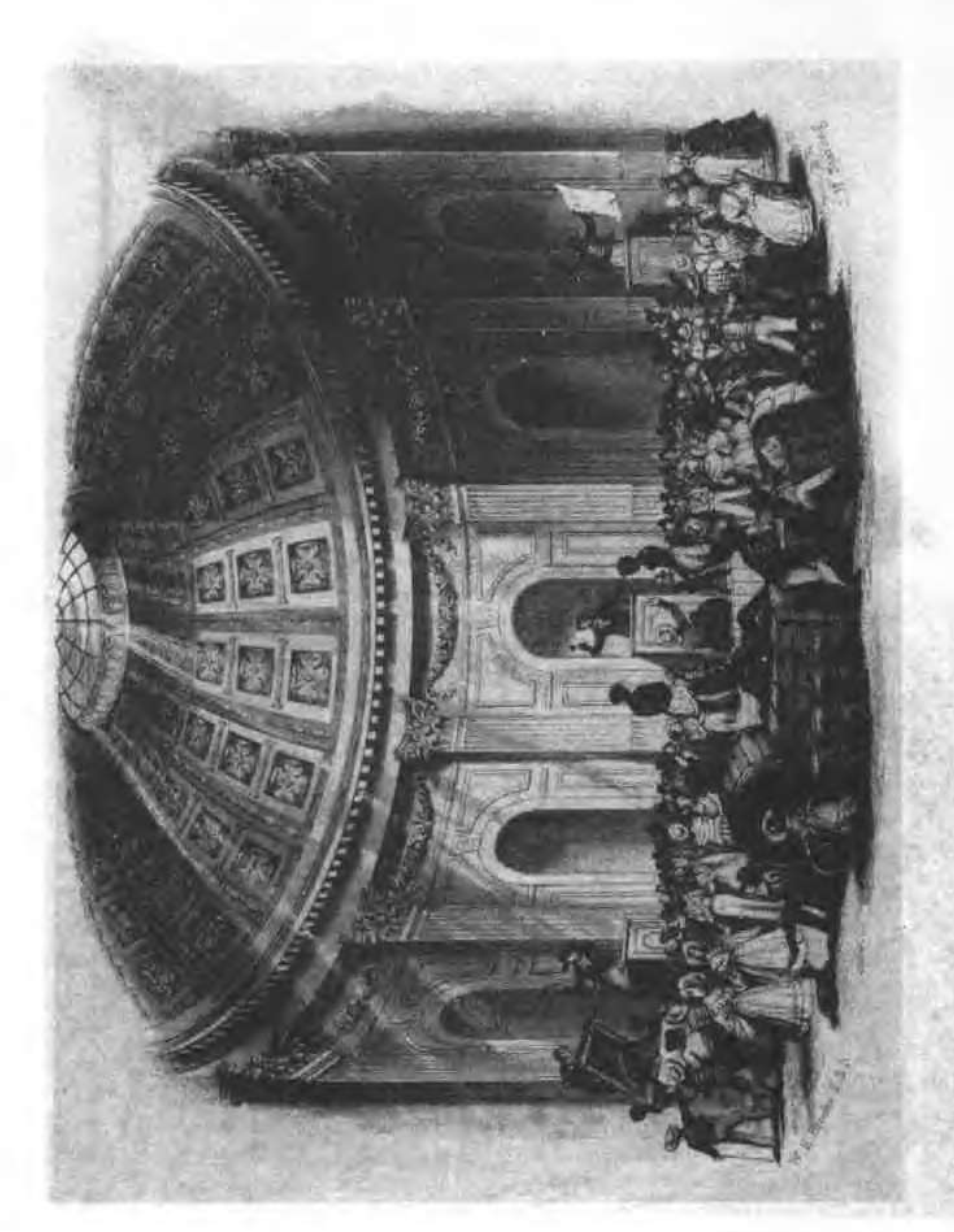
[36] 同上，第273页；R.奥利弗(Oliver)和G.马修(Mathew)，1963年，第1卷，第141、142页。
[37] 见本卷第27章。
[38] P.D.柯廷(Curtin)，1973年，第250页；F.毛罗，1960年，第179、180页。
[39] P.D.柯廷，同上。
[40] 同上。
[41] 同上。



图片 1.1 黑人奴隶在巴西淘洗钻石

变成为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辽阔地区。在殖民地的北方，则以中、小规模的谷物种植为主，很少需要增加进口的奴隶劳动力。

美洲殖民地对黑人劳动力的需求向西欧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而此时正值欧洲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发生之际。在17世纪下半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愈益明显。当时处于权力顶峰的荷兰，开始缓慢地被经济发展迅速的英、法所取代。就白人在非洲扩张的性质和速度而言，从17世纪后期起、英国和法国的势力愈来愈强，而西班牙，甚至荷兰则只能起到边际作用。至于葡萄牙，征服安哥拉的进展使他们得以在奴隶贸易的这个 16



图片 1.2 在美国新奥尔良的罗通达出售庄园、画与奴隶

重要地带保留一个有利的地位。

在17世纪，荷兰、英国、后来的法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均建立了公司，与非洲进行贸易和运送奴隶到美洲。这样，资源就开始集中到这一端。公司在对非洲贸易中得到其政府给予的垄断权，所以能够控制价格。作为交换，他们被责成修建新的堡垒并维修旧堡垒，以保护沿海欧洲人的贸易站。在非洲的欧洲人地位因此得到英、法、荷公司的支撑。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的堡垒大大增加，特别是在黄金海岸及其附近地区。

同时，在非洲的白人内部却相互不和。他们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反映了欧洲大国之间的对抗，这些商人和贸易公司力争获得非洲沿海最方便的贸易站。在战时他们这样做，在各种敌对的欧洲人集团之间，对贸易站的占有经常变换，每个集团都由其政府支持。支持公司的各个政府特别关心美洲基于黑人劳动力的种植园的发展和从奴隶贸易中增加的利润。因此，难以想象这些大国和某些较弱的欧洲国家会自愿离开非洲，即使是瑞典、丹麦和普鲁士也试图卷入非洲事务，但没有多大成功，终于撤退了。

然而，公司的活动并不如预期那样有成果。在英国公司中最初的两家并不积极。1672年建立的皇家非洲公司中有英国国王的股份，尽管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中它控制了大部分非洲西海岸的对外贸易，但也经常遇到困难。该公司的政策遇到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美洲种植园主和英国许多商人的强烈非难。[42] 种植园主抗议由公司强加的高昂的奴隶价格，而 18 那些非公司成员的英国商人也渴望进人非洲沿海盈利高的奴隶贸易。1689年后，这个公司的特权逐渐受到抑制，进人非洲的贸易也让与其他公司。到18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已不复存在。

在英国，一个与非洲进行自由贸易的时代数年前已经开始。利物浦作为被称做“三角贸易”的主要中心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那里的商人势力最强大。贸易经营如下：利物浦商人派船载运英国货物至非洲沿海，以换取奴隶；他们把奴隶运往美洲售与在英、西、葡属殖民地的种植园主；返航时，把殖民地的货品运回英国。[43] 18世纪英国人迫使西、葡与之签订贸易条约，使他们易于进人在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属地。特别是英属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在17和18世纪是大规模强迫安置非洲人的地区，非洲人运到那里先在甘蔗种植园劳动，之后又在棉花、咖啡和其他种植园耕作。[44] 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两地还将奴隶卖给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越来越多的烟草和水稻种植园主，以此换取北美殖民地的谷物和其他产品。

18世纪期间，利物浦商人之所以有可能如很久以前所实现的那样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英国中部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伯明翰的金属和曼彻斯特的纺织业的发展。利物浦商人能够向非洲供应当地十分需要的刀、武器和其他金属货品，以及纺织品，而且比其他国家更经常，更廉价。18世纪期间，英国逐步成为非洲沿海在经济上卷人最多的国家。从塞内加尔到喀麦隆边界都能感受到英国的影响。虽然，1799年英国将它在塞内加

---

[42] D.P. 曼尼克斯(Mannix)，1963年，第29-30页。

[43] D.P. 曼尼克斯，1963年，第69-74页。

[44] O. 帕特森(Patterson)，1967年，第16-29页。

尔的前哨基地丧失给法国，但它在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地位却变得更为强大。英国在黄金海岸的奴隶贸易中也居领导地位，自17世纪中期以来，那里的奴隶贸易已大大增加。在比夫拉湾和贝宁角（包括卡拉巴尔）的贸易非常重要；在18世纪期间，运送的奴隶数目已远远超过130万。从维达、波多诺伏、拉各斯和其他黄金海岸的港口出口的奴隶也大量增加。[45] 这不单是英国人在那里很活跃。虽然法国与荷兰两国的地位较弱（尤其是法国），它 19 们在奴隶海岸——于塞内加尔和喀麦隆以及罗安果地区——也发展了强大的贸易。南特的商人在这一活动中首当其冲。安哥拉是17世纪后期黑人劳动力最重要的来源地，在18世纪后半期，安哥拉仍处于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葡萄牙继续向巴西大规模供应奴隶。

白人尝试在安哥拉定居开始规模并不大。然而，从佛得角到刚果河的沿海一带，欧洲人的扩张保留了它的贸易性质。欧洲人的商站和定居区如1626年建立的圣路易，星罗棋布地分散在沿海，邻近便利的海湾，通常是靠近非洲人密集的居住地。在18世纪即很有名气的埃尔米纳、阿克拉、维达、波多诺伏、巴达格里和新旧卡拉巴尔以及其他地方，是前来的白人与提供奴隶并收取欧洲货品的黑人会面的拓居地。非洲统治者大都为自己保留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优先权，但黑人商贩的作用也很重要。甚至在安哥拉，葡萄牙人很少自己抓过奴隶，而是利用代理人在内地购买或绑架奴隶。

非洲奴隶贸易的地域范围难以确定。赫斯科维茨和哈维茨曾认为，只有沿海地区才遭到蹂躏，现在这种看法被认为是错误的。[46] 无疑，对港口的腹地来说，这一问题极为痛苦，但早在16世纪即有奴隶从其家乡长途跋涉到港口的有关消息流传。在大规模出口非洲人的18世纪，捕捉奴隶者需要深入内地，以便找到最重要的供应者——如阿散蒂和达荷美等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以及来自卡拉巴尔的商贩。他们猎捕的地带必定是在大陆的中心，在他们自己居住地的北面。[47] 一些老的非洲国家，如贝宁和奥约很少卷入。刚果在18世纪进入彻底瓦解时期，它从来不是重要的奴隶供应者。

此时，欧洲人对于在非洲（安哥拉除外）扩张领土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得到奴隶，而且通过他们的商站和许多海湾出售他们的货物，包括朗姆酒和武器。欧洲尚未作好开始征服非洲的准备，主要因为非洲的恶劣气候，欧洲人面对热带疾病也束手无策。因此最先在非洲大陆露面的欧洲人、巴西人和北美洲人尽其所能赢得非洲统治者的友谊，不论他们需要什么物品都慷慨提供。在17和18世纪，欧洲奴隶商贩和作为奴隶供应者的非洲统治 20 者、显赫人物和商贩之间的利益更加一致。值得提及的是，始于18世纪后半期的废除奴隶制运动在英国不仅受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反对，而且也受到大城市商贾的强烈抵制。后来也很清楚的是，阿散蒂和达荷美的国王，无疑还有其他某些非洲统治者，也是明确反对废除奴隶贸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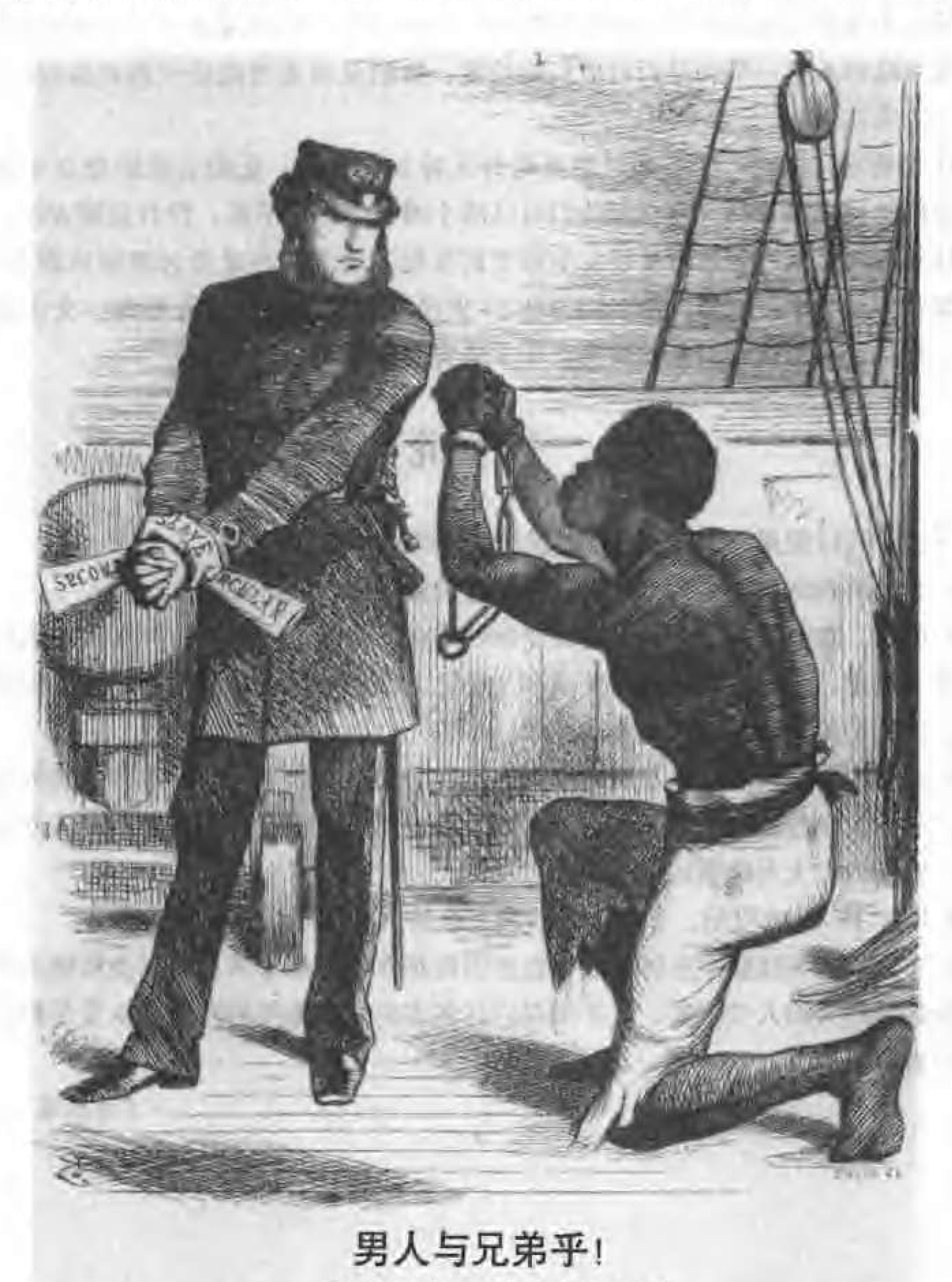
在17和18世纪，欧洲人感兴趣的主要地区是非洲的西海岸，在东部沿海没有多少奴隶贸易，一直到18世纪欧洲奴隶商贩才开始入侵该地区。从东海岸到美洲市场距离遥远，

[45] P.D. 柯廷，1973年，第259、267页。

[46] M.J. 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和A.M. 哈维茨（Harwitz），1964年；

[47] J.D. 费奇（Fage），1969年a。

将非洲人运往新世界，虽说并非不可能，但更为困难。现今莫桑比克的无数居民当时不得不面临横渡大西洋主要是前往巴西的悲惨旅程。据 P.D. 柯廷估计，从中部和东南部非洲带到美洲的奴隶人数在1711年和1810年期间约为810,000人，占进口奴隶总数的24%。[48] 但有关从东部海岸及其腹地来的人数却缺乏资料。法国人在占领留尼汪和毛里求



图片 1.3 政治漫画"男人与兄弟乎!!"

[48] P.D. 柯廷，1973年，表7.2。

斯岛后输出了少量黑奴。在东非，伊玛目(Imām)的臣民将奴隶出口至阿拉伯国家，这在18世纪有所增加。当这一活动中心从阿曼转移到桑给巴尔时，其结果对东部和中部非洲的居民来说是悲惨的。但阿拉伯捕捉奴隶者的破坏性劫掠看来主要发生在19世纪。

在北非，欧洲人只是在18世纪才终止了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海盗活动，最后失去了其收人的基本来源。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上层统治者当时深深卷人了这种海盗式远征，如果能发现欧洲人这一举动是否对他们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当地居民的政策有什么影响，那将是令人关注的。

1591年的尼日尔河远征看来对摩洛哥并无持久的影响。征服者迅即独立于他们的宗主国，他们的后裔阿尔马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小国，但为时不长，没有证据表明，在摩洛哥与尼日尔河湾地区之间的贸易曾发生重要的变化。奴隶和小量黄金继续从西苏丹出口。然而，奴隶贸易看来是相当大的，因为在17世纪末，摩洛哥的素丹拥有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22

结　论

以下也许可以说是从16世纪到18世纪非洲的对外接触情况：

（1）非洲的西海岸和腹地是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最多的区域。

（2）最初，欧洲人关注的只是购买非洲的黄金，但从16世纪50年代起奴隶贸易日益重要。有了奴隶，欧洲人得以促进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奴隶贸易也加速了欧洲，特别是英国以及非洲的资本积累。

（3）欧洲人在非洲的扩张是原始殖民地性质的，主要限于贸易。双方之间的交换是不平衡的，欧洲人出售廉价物品，换取大量奴隶劳动力。这样，虽然当时欧洲人并未试图征服非洲，但是他们大大地破坏了非洲人口状况。

（4）早在16和17世纪，非洲作为欧洲工业品市场的作用也许被低估了。

（5）非洲从这些接触中有所收益，包括引进新作物，如玉米、木薯类植物及木薯。但这绝不能弥补巨大的人口损失，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人被劫持到海外异乡受尽种植园中强迫苦役的折磨。

（计德容　译）

2 16至18世纪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P. 迪亚尼

主要由于人口和生态等国内因素以及奴隶贸易、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资本主义等外部因素的冲击，非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在1500和1800年之间持续转变。本章将讨论这些转变和出现的新结构。从这一分析来看，认为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非洲的结构或体制是没有时间性的观点，显然是一个历史性神话，毫无实质意义。 23

新的社会结构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和新结构是社会方面的。在宗教领域中，欧洲和中东的哲学和宗教开始冲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新的地区成为政治力量。宗教问题已成为文明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由于不同宗教对世界有各自的看法，以前往往忽视了这类冲突。

在此时期内，基督教在东非沿海地区取得的进展皆因葡萄牙教士孔萨罗·达西尔维拉神父被暗杀而丧失殆尽，他于1560年曾试图将姆韦尼·姆塔帕·恩戈马置于基督教和葡萄牙的影响之下。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埃塞俄比亚取得进展，征服了艾哈迈德·格兰(1531—1535年)，[①] 同时还征服了博尔诺(博尔努)的马伊(mai)，以及位于撒哈拉和西部苏丹的桑海的“阿斯基亚”(askiya)。

从俘虏制到奴隶社会的转变

24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大部分地区，黑非洲的“琼雅”(jonya)制被欧洲和中东的奴隶所有制所取代。

“琼雅”(来自曼德语jon，意为“俘虏”)主要存在于西部苏丹和尼日尔-乍得地区。“琼雅”(瓦阿洛语称Jaam，富尔富尔德语称Maccuba，豪萨语称Bayi)均从属于某一世系，不可转让，他们拥有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在该制度盛行的社会中，琼雅属于统治阶级的社会

① 参见本卷第24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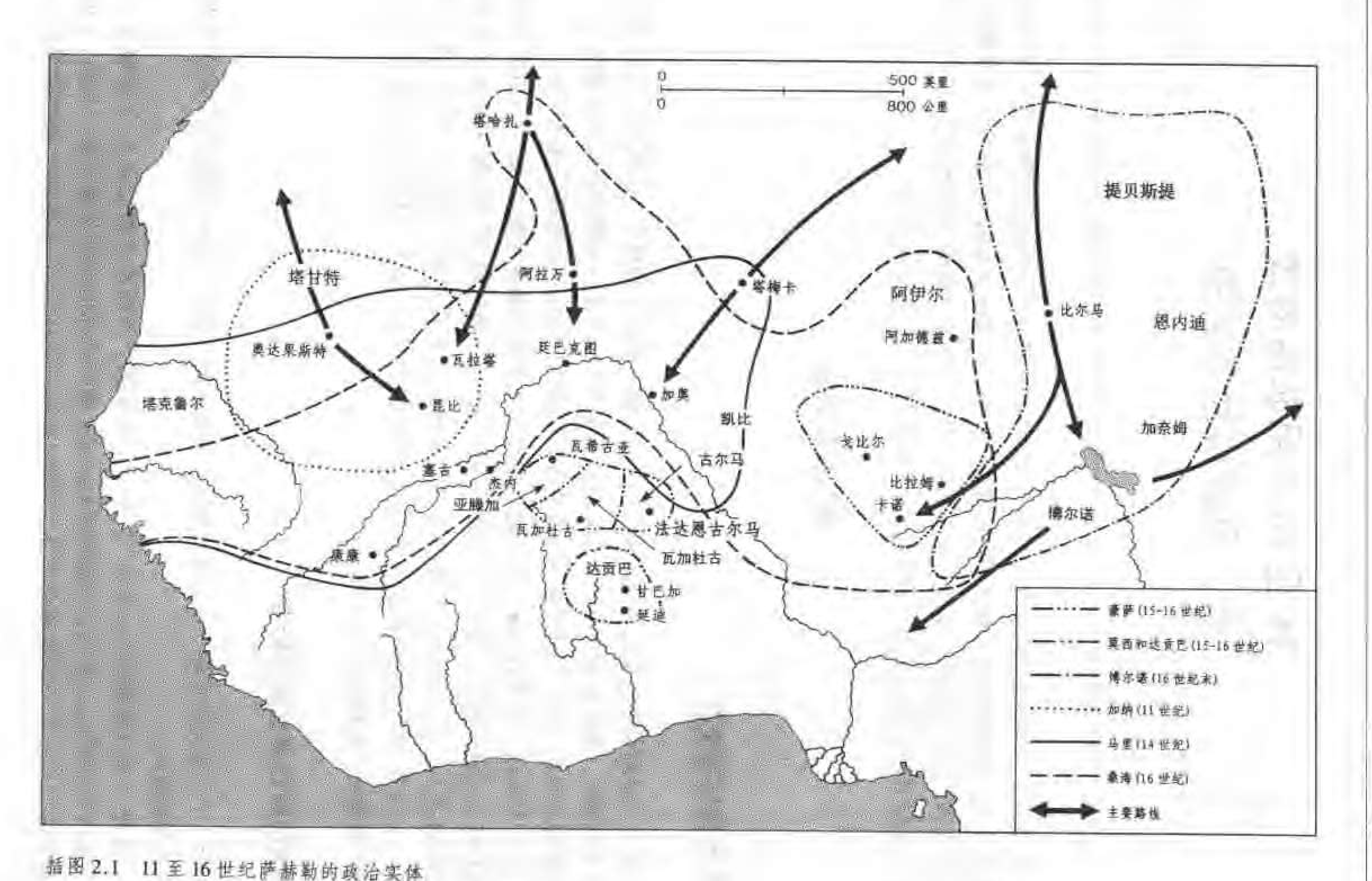


插图 2.1 11至16世纪萨赫勒的政治实体

资料来源：根据达喀尔大学地理系 P. 恩迪亚叶绘制的地图改编。

政治类别，因此，在国家统治权及其政治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同时又是一个阶级，琼雅在加纳、塔克鲁尔、马里、加奈姆-博尔诺、阿散蒂、约鲁巴和姆塔帕等国家和帝国中发挥了重大和新奇的作用。② 王室奴隶的精英，如曼德人的“琼蒂吉”(jon tigi)、塔克鲁尔“贾阿米布尔”(jaami buur)的“法尔巴”(farba)和豪萨“萨尔金巴伊”(sarkin bayi)都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主要统治阶级。他们行使某些权力，发财致富，甚至可以自己拥有奴隶，如曼德人的“琼比里琼”(jombiri jon)和达荷美的俘虏之奴。③

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的奴隶制以其古老的形式和其后于18世纪在非洲获得的西方殖民地形式，开始了以奴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奴隶作为动产或商品，可买卖和继承，自己几乎毫无权利。有时他们构成社会劳动力的主体，如雅典制和中世纪阿拉伯与哥伦布之后的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的奴隶制。因其影响引发的冲突不断地折磨着非洲大陆，直至20世纪。

日益不稳定和连年战争在人口方面促进了16世纪琼雅制的兴起，直至琼雅制开始与奴隶所有制和新的上层社会结构中殖民地形式的奴隶制在地理上相互重叠为止。在引进伊斯兰制度的地方，如桑海和豪萨地区以及东非城镇，这两种制度经常混淆。

随着穆斯林国家或酋长国的建立，穆斯林法律和传统在这个地区得到确立。这些国家逐步通过圣战和1725年前后在富塔贾隆的卡拉莫克霍·桑比古的革命，以及1775年在富塔托罗的苏莱曼拜尔的革命接管了西部苏丹。同时，奴隶所有制逐步取代了琼雅制。19世纪初，奥斯曼·丹·福迪奥创建的索科托哈里发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撒哈拉的尼格罗-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及其被撒哈拉阿拉伯的哈桑“卡比拉”(kabila)的征服，又使这一进程更进一步，逐渐将半封建的“哈雷廷”(ḥarāṭin)④(以好战的贵族与被征服的定居民族为特点)或多或少转变成奴隶所有制。然而，在西部苏丹或尼日尔-乍得地区的传统贵族中，琼雅制得以幸存下来，很少或未曾受到穆斯林的影响。在殖民征服之前，在沃洛夫、塞里尔、豪萨、加奈姆布和约鲁巴各国中，琼雅继续行使一些权力。塞古帝国及其“富尔巴琼”(Furba jon)使人联想起“曼萨”(mansa)与他们的“通琼”(tong jon)。在殖民征服之前，卡约尔、锡英和亚滕加诸国大都由武士或俘虏阶级的管理层精英所控制。 26

封建结构的扩展

第三种变化是封建结构在非洲的农业文明中以纯正的或畸形的形式扩展。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制度，不仅需要有关对封建主的效忠、臣属或宗主权的各种联系，而且还特别需要投机的机会和从生产资料中获取利润。至

② “马卡莫斯”(Macarmos)是姆韦尼·姆塔帕周围的一些奴隶帮，相当于苏丹的王家俘虏(furba jon, tonjon 或 jaami buur)。

③ 关于非洲社会的奴隶制研究已发表若干主要著作，如，S. 迈尔斯(Miers)与I. 科佩托夫(Kopytoff)，1977年。该著作揭示了“奴隶制”一词可应用的有关体制的广泛范围，并试图在非洲本土范围内界定“奴隶制”。还可参阅C. 梅阿苏(Meillassoux)，1975年；P.E. 洛夫乔伊(Lovejoy)，1981年；A.G.B. 费希尔(Fisher)和H.G. 费希尔(Fisher)，1970年。

④ 原指农奴。

于这一权利是否基于土地所有、领土控制或对人、事物或某些生产资料的控制都是无关紧要的。支配欧洲和中东思想的财产、政府体制和政治与社会经济结构是西方和东方的封建主义特色，这些都对以农业文明为主的非洲产生影响。凡在有土地持有权或对一领土有控制权而导致关税、税赋、地租、分成制、租佃耕种、领薪农工和土地出租的地方，其影响都能看到。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欧洲和中东的结构不同，特别是与其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在生产资料中没有投机性，由于历史和生态条件的缘故，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阶级社会和国家中也是没有的。在伊斯兰法律或西方鼓励的梅洛(mailo)土地制(该制度于1900年引入乌干达一种租佃制)引进以前，土地在黑非洲不是一项收入来源。那种具有使用和转让物品甚至人(即奴隶)的权利的欧洲式所有制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些分配到或转手一块土地或者一块狩猎、捕鱼或采集食物的场所的人是在使用权的基础上劳作的，使用权既无法投机赚钱，也无出售的可能性。因此，撒哈拉以南的农业社会产生了“拉马那”制(Lamana)，一种排除了土地出租、租佃耕种和收获分成的土地持有制，即使国家课税，当局和酋长也是对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收税。黑非洲独特的生产方式需要把全部产品用于消费，人民为自己所需而生产，毋需控制生产资料。

27

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混杂的、非同一性的社会，这已被那些受先入为主的历史观念所蒙蔽的学者们颇为拙劣地描写过。因此从16到18世纪的非洲社会含有被贬低的封建主义与拉马那制混合的边际区。在那些为交换而生产的地方，封建主义占优势，为消费而生产的拉马那制度则遭到破坏或修改。

在埃及，土耳其的贝伊管辖(beylik或beylic)制有助于加强封建制和封建化。奥斯曼政权在埃及接管了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本身已经建立了保护关系或领主关系。像欧洲中世纪那样，这些乡村贵族由奥贾克(odjak,即土耳其堡垒和驻军)保护。根据等级制，本地大酋长统治“卡尔什”(carsh,民族地区)和“德瓦尔”(dwar,帐篷营)。他们使“卡姆斯”(khames,奴仆、农奴)和小社群服从于他们，就像马赫增的情况一样。在萨赫勒和毛里塔尼亚的撒哈拉地区，宗教家庭和“朱阿德”(djuad,武士酋长)借口宗教兄弟会或以征服之权接管小社群的邦联，并使之臣服。在南部奥兰，谢赫奥拉德·西迪强迫昌巴游牧民交纳贡赋，他则保证效忠他们。哈桑武士们对塞内加尔河之北的“哈雷廷”和马拉布特(marabout)家族建立了同样的效忠义务——“沃马”[5](worma)，并在哈尔-普拉伦人中征收粮食税(muud al-hūrum)。

在马格里布，主要的土耳其和当地的显贵们经常由贝伊赠予大庄园，他们在佃耕、出租或分成制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如在埃及，贝伊的职权控制了最新的经济活动，垄断了制造业、碾磨厂、军火厂、造币厂、建筑场地和海上掠夺的资源。此外还控制了谷类、油料、盐和纺织品贸易，以及贸易路线(商队的终点与海港)和对外贸易。手工匠行会和商人行会也在其监督之下。商人中产阶级则充做奥斯曼政权的中间人。

在其他北非地区和埃塞俄比亚北部，封建制度发展不同，因为生态条件使有些地方的

⑤ “沃马”将忠诚或效忠的思想引进塔克鲁尔语言，在那里这种义务是不存在的。

土地所有制不那么集中。马格里布贝伊的大庄园伸展甚广，产生了广泛的“阿则尔”(azel,分封采邑)，这是伍一制分益的“哈马萨特”(khammāsat,租佃耕种)。在地区一级，其模式属“米尔克”(milk,由家庭持有的土地)和卡尔什(carsh,社区或集团持有的土地)土地制的一种，但总是在投机性的封建上层建筑范围内。

28

在埃及和其他北非地区,在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几个世纪已为过渡到封建制度即马木路克的伊克塔(iktā)制度奠定了基础。在希腊和罗马的占领下，这些地区成为帝国政权的粮仓，在奴隶劳工和受尽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的帮助下，帝国政权在那里发展了公田(ager publicus)和移民垦殖制。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在外界的影响下过渡到封建制度的。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出现了一个拥有土地的中上阶层，他们创建庄园。此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贵族们破坏了两个世系的后裔平均继承遗产的原则，因此在他们之中创立了跨代的“家族”。他们还要求财产，如这些土地上的牲畜和产品。该地区的经济基于耕种农业，绝大多数新生贵族能够把所获得的庄园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政治职位也逐渐集中于这个集团，因此，就任公职成为积累财富的关键。其后果是，埃塞俄比亚北部在积累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出现扩大阶级分化的明显倾向。⑥

这种半封建的形势，由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北部扩展到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克特马”(Ketema,驻军城镇)，由一位“涅夫坦尼亚”(neftenia,拥有土地的精英)向“加夏”(gasha,占领的土地)殖民。为拥有土地的精英而在土地上劳动的“加巴尔”(gabar,农民)就像“法拉”(fallāh,复数为 fallāhīn)一样，类似农奴，或至少是纳贡者或贵族庇护下的平民，作为收获分成者或佃农，有义务分别交纳“加比尔”(gabir)或“西索”(siso)。

在大湖区，特别是其南部地区，包括现今坦桑尼亚西部、布隆迪、卢旺达大部分地区和扎伊尔东北部的乌维拉，庇护制度构成了半封建的纽带，以协调放牧者和农耕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放牧者和农耕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前者供应牲畜，后者作为受益者，其本人和他的家庭及后代要为供应者和他的后嗣服务。这些契约在各个社会有所不同，并逐年改变。⑦在塔克鲁尔，“舍尔加”(surga)或“达格”(dag)可根据其自己的利益，自愿决定从属于一名富翁或有权势的政治领袖。这种半封建结构的现象显然不能归诸于外来影响，而需从内部发展来作出解释。

促成采用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主要因素是，随着阿斯基亚来到西部苏丹，穆斯林酋长国的扩展；伊斯兰化博尔诺的马伊帝国的扩张；以及由于改变宗教信仰和圣战的结果,引进了古兰经法律。在桑海,阿斯基亚保留了部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像那 29 些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移民拓殖的埃塞俄比亚贵族一样，他们把许多革新引入所征服的地带。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仿照马木路克的方式分配土地使用权：他们在从非穆斯林手中取得的“卡拉吉”(kharādj)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伊克塔”(iḳṭā‘,采邑)，并将关税、税收和应交付国家的费用的用益权，而不是农奴、不得转让的土地或其财产给予他们所宠爱的人。编年史(ta'rīkhs)里充满了这类细节的描述。

⑥ 见本卷第24章，并参阅A.霍本(Hoben)，1975年。

⑦ E.姆沃罗哈(Mworoha)，1977年，第3和4章，并参阅本卷第26章。

在酋长国中，采用了圣战的穆斯林法律，这样更牢固地移植了欧洲和中东的封建、半封建或纳贡制的社会经济结构。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的“艾尔梅米亚”(almamia)和索科托哈里发只是抄袭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琼雷第”(jom leydi,地主)、“琼勒里”(jom lewre)、“琼杰姆贝里”(jom jamberre)和“琼雅恩戈”(jom jayngol,他们享有富塔土地的用益权)[8] 逐步被吸收，进入封建型的社会经济结构，而不是效忠的封建形式。

在酋长国引进了封建型的土地投机买卖的情况下，新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恩卓第”(njoldi,归属地主的象征性付款[9])、“科恩戈”(kawngal,渔场)、“雅尔”(yial,猎场)、“霍雷科桑姆”(hore kosam,放牧场)和“戈比”(gobbi,矿区)均转变为缴付给执政者的年税，且是在国家监督下征收。甚至收税人的职位也可交付一定费用而成为可谈判转让的，这个制度的大部分官职都是如此。分成制、租佃耕种和土地出租成为规则。在伊斯兰化地区，因被征服或因新的法律制度而被剥夺土地的无地农民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塞里尔人的“雷弗雷克”(reforekk,农奴)，塔克鲁尔人的“桑巴雷姆鲁”(samba remoru)、“巴阿多罗”(baadolo)和“纳维塔恩”(navetaan)，以及豪萨的“塔拉卡瓦”(talakawa)纷纷出现，他们就相当于地中海和撒哈拉地区的“卡姆斯”、“哈雷廷”、“法拉”和“加巴”(gabas)。“雷第斯胡贾”(leydis hujja,富尔富尔德人的土地契约)引进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持有制。“恩卓第”是土地的年租，“科提古”(cootigu)是佃农、收获分成者和半佃农应缴的费用。东部穆斯林土地控制制度出现在国家所有的“贝提马阿尔”(bayti maal)或“雷提马阿尔”(leydi maal)和“雷提加南第”(leydi janandi)的形式中，“哈布斯”(ḥabūs)则属于宗教社团。然而，土地只部分地属于马格里布式的采邑所有。在有些情况中，可找到马赫增的免税方式。[10] 在“雷提乌鲁姆”(leydi urum)的形式下，由沃马(worma,忠诚契约)的方式，再加上“穆德胡鲁姆”(muud al-hūrum)或“穆达尔霍马(muudul horma)税表示效忠。

从16世纪以后，各种不同背景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融合。结果出现了新的社会秩序——酋长式的或占统治地位的政府，[11] 在此政府中封建结构被叠加在非洲的“拉马那”(lamana)土地所有制上。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影响了“曼萨亚”(mansaya)国家的形式：在逐渐伊斯兰化的西部苏丹和尼日利亚，埃米尔的东方穆斯林体制取而代之，或置于其上。在几内亚湾和中非与东非，曼尼-刚果和姆韦尼-姆塔帕中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基督教封建君主体制的影响日益明显。

---

⑧ “琼勒里”——第一个占有和开垦土地的人；“琼杰姆贝里”——有权用斧子开垦土地的人；“琼雅恩戈”——有权用烧荒的办法开垦土地的人。

⑨ 这些税收各种各样(谷物、猎物的腿肉、蜂蜜酒、鸡、山羊等)，原本主要具有礼仪上的重要意义，意即作为对当地“土地神灵”的祭品。物品在拥有时交付，有时是在收获季节，最常见的是在葬礼和接任“拉曼”(地区酋长，Laman)或第一个占用土地者的继位典礼上交付。

⑩ 马赫增的“卡比拉”(kabila)被准予免税，其土地在中央政权控制之下。为报答这种归顺，马赫增酋长向邻近的“卡比拉”征收“雷阿”(raia)税。

⑪ 占统治地位或酋长的政权之说在此是表示在黑非洲与伊斯兰教接触后出现的混合的社会形式；参看P.迪亚尼(Diagne)，1967年。

建筑与艺术的发展

最后，也有一些重要的建筑与艺术的发展。那些在尼罗河谷、马格里布、苏丹和沿海地区建造城镇，建造了约鲁巴宫殿和今日称之为津巴布韦废墟的大建筑物、东非沿海的房屋、宫殿与清真寺，以及在豪萨城市周围建立“塔塔”（tata）的人们，他们既是建筑师、石匠、装饰家，又是城市的规划者。那些圆形或金字塔式的黏土或石筑的坚固小屋和层叠的“乔拉”（Jolla）房屋，与马拉喀什的库土比亚、加奥的阿斯基亚墓和开罗的哈里发墓具有同样的建筑传统。在早期，十分强调良好的建筑，如在奥达果斯特、昆比、基尔瓦、杰内和阿克苏姆所看到的废墟。16世纪之后，建筑继续新的发展，或许主要在西部苏丹和尼日利亚，但是北非和尼罗河谷的城镇却随着他们昔日繁荣的败落而衰退。然而，在西非坚持传统的阿斯基亚们，一如他们同时代的摩洛哥人阿布尔-阿巴斯·曼苏尔，都是伟大的建筑者。

索尼·阿里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恢复了沿尼日尔河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在摩洛哥，曼苏尔执政期间恰逢修建了为时不长但却风行一时的大公共建筑物。然而萨赫勒和伊斯兰世界的建筑传统日益向南扩展。苏丹的建筑风格，以桑科尔和杰内的清真寺为其样板，从16世纪开始传播。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在自己的基础上建造了滕迪尔马，并创造了西迪·叶海亚清真寺。在这种情况下，石匠、装饰匠逐渐形成大团体，他们在西部苏丹和马格里布发展成兄弟会并产生了社会等级地位。

在埃塞俄比亚，贡德尔时期（约1632-1750年）的宫廷促进了新建筑风格的发展。在贡德尔城和其他城镇，皇帝的家室建起了巨大而美丽的宫殿、城堡、教堂和图书馆，其内部装饰精致。[12] 在东非讲斯瓦希里语的沿海地区，建筑方面的主要变化发生在约1700-1850年间，引进了新的模式和基本图案，房屋设计新颖，技艺精湛，石膏雕刻精美。建筑的发展伴随着有关领域的多产，诸如木雕，特别是门的雕刻与家具制作。[13]

31

新经济结构

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新经济结构主要是取代了行会或社团制度的生产上的等级制度，主要在北非和东非的劫掠性经济和主要在中非和西非的贸易站或货栈经济。

行会经济与等级行会社会

中世纪城市文明通过工艺、制造和工业过程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但在16世纪发展是不平衡的，根据各地区和社会类别，在各种不同的社会范畴内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例如，西部苏丹、尼日尔-乍得地区和撒哈拉的文明，在多少有些封闭的、天生就是

⑫ 参阅本卷第24章。

⑬ J. de V. 艾伦（Allen），1974年，另参看P.S. 加莱克（Garlake），1966年。

等级制的基础上发展了工艺、制造业和工业活动。随着塔克鲁尔和撒哈拉文明的影响日增，等级制度遂定型，这在南部塞内加尔、曼德人境内和豪萨地区的文明中最显而易见。塔克鲁尔人的等级制及其成员迁移到卡约尔、乔洛夫、锡英和萨卢姆。曼德人的“尼阿曼卡拉”（Nyamankala，即等级制）早已使铁匠的地位得到提高，直到圣战将塔克鲁尔人带到该地区。例如，苏马古罗·坎特在曼萨王朝和马里国崛起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他原本是一名铁匠。冶金工人在丰人和约鲁巴人中极受尊敬，但那里也因塔克鲁尔和撒哈拉移民的冲击而打乱了昔日的秩序。在桑海，阿斯基亚统治的社会已经发展了等级制度，且形成阶层，并在思想意识上扎下根。

在18世纪末，托罗多人的革命由于加深了阶级分化，在塔克鲁尔更加重视等级制。塞贝的农民和塞贝尔贝的渔民，甚至布鲁尔富尔贝的游牧民逐渐地被贬低。他们被视为不能与“贝南加图贝”（benangatoobe），包括“沙基贝”（sakkeeb，皮匠）、“瓦伊尔贝”（wayilbe，

32 铁匠），或“戈罗”（gawlo，歌舞艺人）等同，且常常从上层阶级“南加图贝”（nangatoobe）中分离出来。托罗多的马拉布特精英愈来愈把战败的“塞多”（ceddo，武士酋长）和丹尼扬克贵族以及除了有条件出任高级官职的马拉布特世系之外的每一个人都视为下层阶级。在撒哈拉的尼格罗-柏柏尔人社会中，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划分逐步在等级制中发挥作用。

在发展行会或行业组织过程中，最后一个突出的方面是有关国家控制的问题。在地中海文明中，在一系列诸如纺织、造船、军工、精炼和外贸的活动中，其趋势是走向国家垄断。黑非洲国家则很少行使这种控制，即使在扩大军火与武器工业方面。[14] 此阶段的一个特点是：农村居民的多才多艺与城里人的明显专业化形成对照。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劳动分工以及行业与行会的扩散发展很少。农民、渔民、牧民和狩猎者依然是多面手，每人根据需要可兼做多种行业，诸如铁匠、编篮工、石匠、伐木工、木匠、织布工或鞋匠。有时妇女或特定年龄组的人专做某一类工作，主要是特种行业，如金属加工、木工和皮革制作，这些活动亦卷人等级制的发展。

在西部苏丹和大西洋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中，国家工业也得到发展，有了制造武器，甚至制造行驶于江河与海洋的军舰的兵工厂。

战争频繁有时对金属加工业给予新的推动力。在16世纪，索尼·阿里重组桑海的兵工厂，制订了作坊的年生产指标。埃及冶金技术熟练，生产了大马士革钢。许多社区从事于铁、铜、金、银的制作。在埃及和北非，贵重金属工业的黄金由努比亚的瓦迪阿拉加、索法拉和西部苏丹供应。在等级基础上组成的曼德人铁匠，将他们的技术出口到由于大西洋贸易而蓬勃兴起的新城镇。苏丹的铁匠“加拉沙”（garassa）、“特格”（tëgg）和马博（maabo）制作犁、斧、剑、矛、箭头和家用工具，他们的技术日臻完善。及至18世纪末，已开始修理枪支。正是在这个部门吸收新技术最快。从事金银制作的匠人刺激了马格里布、埃及和西部苏丹城镇的市场（sūk）贸易。柏柏尔和沃洛夫珠宝匠以他们的黄金珠宝镂丝作品而闻名。东北部和斯瓦希里沿海，特别是桑给巴尔和基尔瓦，早已开始铸造金币，

34 并向南迁移至尼基。斯瓦希里也制作美丽的珠宝和其他金银物品。瓷器已上升为工业，陶

[14] 黑非洲大规模发展国家军火工业主要发生在19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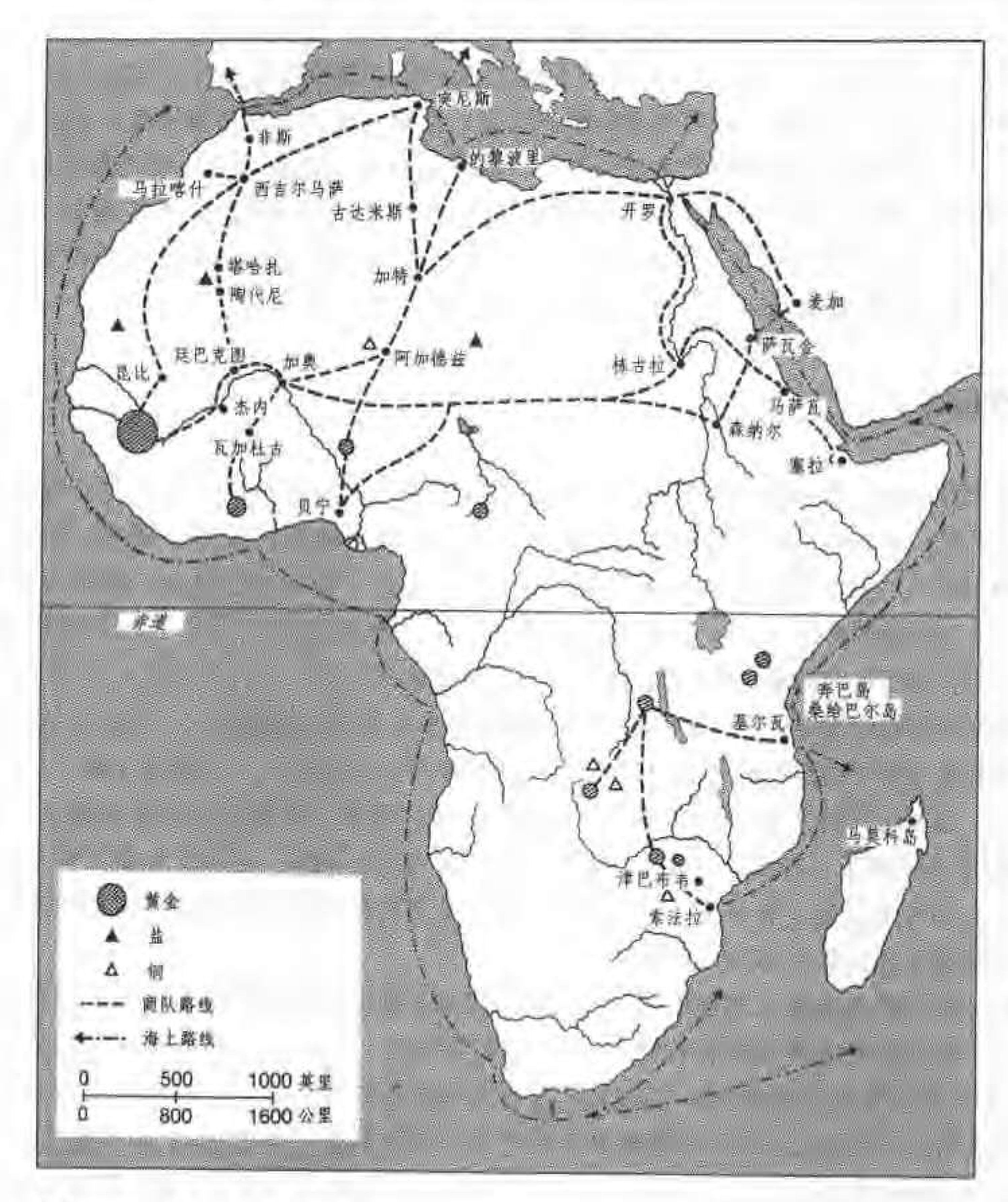


插图 2.2 16 世纪非洲贸易路线

资料来源：根据达喀尔大学地理系 P. 恩迪亚叶绘制的地图改编。

器与编制篮筐一样，依然是女性的保留项目。玻璃工业继续发展，传播到整个约鲁巴国、努佩、豪萨地区、埃及和马格里布。在赞比西河南部地区的绍纳人中，采矿技术已十分先进，开采金和铜的工业支撑着本地区的经济，直到 18 世纪。[15]

皮革制作在尼日利亚最兴旺，那里的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从卡诺、扎里亚和阿贝歇等新中心来的鞋类与皮革制品互相竞争；拉穆群岛上的锡尤大量出口，到 1700 年锡尤已成为一主要的皮革制品中心。从 16 至 18 世纪，编制篮筐和织地毯业在尼日尔-乍得地区的工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撒马尔罕的影响下，纸张取代了纸莎草纸，造纸主要

[15] D.N. 比奇(Beach)，1980 年 a，第 26-30 页。

在埃及得到发展。[16] 苏丹也并不落后，逐步开始出版手稿，在加奈姆出版《古兰经》，销售到整个穆斯林世界。[17] 食品工业于中世纪时已在北部城镇和西部苏丹的城镇发展，与此联系的行业也在尼日利亚各城市建立起来。北非，特别是埃及，在种植甘蔗和炼糖方面已专业化。榨橄榄油、棕榈油和花生油与屠宰，烘制面包以及杂货行业一般仍属家庭工业。在纺织领域，种植棉花和织布于16世纪时已在津巴布韦高原和赞比西河谷确立。[18] 斯瓦希里诸城邦也以纺织品闻名：例如，帕特生产优质丝，[19] 也种植棉花及纺纱织布。在中非，刚果的酒椰纤维布从15世纪至19世纪一直享有声誉。

劫掠性经济

16世纪之前，长途贸易在非洲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由此提高了生产力，导致城市文明的兴起，并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牢固联系，从而缓慢地使农村发生了转变。然而、在1500和1800年之间，随着港口和市场城镇的衰落，引进了劫掠性经济这一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主义造成的后果，它从1600年开始便既是暴力的又是破坏性的。曾因中世纪横跨
35 撒哈拉的贸易而致富的港口和市场城镇自1592年明显开始衰落，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基督教国王开始驱逐定居在马格里布、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大批犹太人和穆斯林侨民。

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的帕尔马，于1495年攻克坦纳里夫，接着于1496年夺取梅利利亚。1505年西班牙在马尔斯卡比尔确立其地位，同年，葡萄牙占领阿加迪尔，接着于1508年占领萨菲。1509年红衣主教希梅内斯夺取奥兰，同年，西班牙控制了阿尔及尔，接着于1510年又控制了布日伊；突尼斯的台利、舍尔舍勒和阿尔及尔都要向西班牙进贡。1513年葡萄牙的权势扩展到艾宰穆尔。

36 此时阿拉伯-柏柏尔人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已感到不得不反对欧洲人的侵略，在奥斯曼帝国旗帜下航行的土耳其海盗船有助于恢复力量的均势。1514年，巴尔巴罗萨兄弟之一，阿布·优素福和他的兄弟赫亚尔·丁收复了吉杰利和阿尔及尔，再度征服的成果得到巩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又一次处在奥斯曼君权之下，至少名义上如此直到19世纪，尽管西班牙查理五世对其进行过讨伐(他于1541年在阿尔及尔失败)。1551年锡南帕夏以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名义占领的黎波里，接着于1574年占领突尼斯。16世纪中期，摩洛哥得力于谢里夫王朝的创始者巴努萨阿德人的圣战，从葡萄牙人那里重新收复阿加迪尔、萨非和艾宰穆尔，维护了其独立地位。在马赫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盟友阿布尔-阿巴斯·曼苏尔，击溃了一支20,000人的葡萄牙军队。

尽管北非国家与欧洲大国不断冲突，它们继续保持着自由，但其进步在16世纪因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而受到损害。因此，马格里布与北非的港口主要靠海上劫掠以及贡赋与关税为生，而不是靠贸易或新的行业。这些国家的主要活动受劫掠性经济的逻辑所支配。

[16] G. 纳赫蒂加尔(Nachtigal)，1881年。
[17] G. 纳赫蒂加尔，1876年。
[18] D.N. 比奇，1980年a，第30-32页。
[19] G.S.P. 弗里曼-格林维尔(Freeman-Grenville)，1962年b，第142页。



图片2.1 (左)卡诺地区制作的苏丹皮凉鞋。类似的货物大量出口至北非



图片2.2 (右)廷巴克图地区生产的皮包

在为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中的军人上层分子发财致富方面，土耳其海盗代替了中世纪的商人阶级。塞拉(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各港口受到私掠船舰队的保护，这些舰队于17世纪在地中海享有其黄金时代。

在1558年，有35艘单层平板大帆船和25艘双桅帆船自阿尔及尔港口出发从事海上劫掠，那时阿尔及尔是一个仅20,000人口的城市。然而，它的经济状况却很糟。1580年阿尔及尔遭受饥荒，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它对人们仍有吸引力，及至18世纪，人口已有10万，其中25,000为基督教奴隶。16世纪的黎波里人口为40,000，包括3500土耳其人，35,000阿拉伯-柏柏尔人和2000基督教徒。它的海盗船蹂躏地中海这一反欧斗争的现场，整个18世纪地中海西部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奥斯曼帝国摄政政府几乎经常与这个或那个欧洲大国交战，对抗与签约交替进行。在此情况下，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人阶级肯定一无所获。

摩洛哥对西部苏丹桑海的征伐应置于这一背景去理解，正如黑非洲穆斯林社会进行圣战那样，是受马格里布的影响，而反对大西洋沿岸的货栈经济。摩洛哥统治者阿布尔·阿巴斯·曼苏尔曾打败过葡萄牙，他于1591年力图征服桑海，以求重开黄金和奴隶路线。

1593年他攻克廷巴克图，使之有可能带1200奴隶穿越撒哈拉。朱达尔帕夏的冒险行动只是加速了这项贸易的衰落，使西部苏丹这个即使不是最强也是最大的帝国于16世纪灭亡。

37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埃及较多地避开了撒哈拉贸易衰落的后果，并保持了其传统的横跨撒哈拉的路线。在埃及和的黎波里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以联盟和传送军火的方式大力支持加奈姆-博尔诺，从而保持了对其本身的供应至关重要的南北贸易的流通，一直持续到19世纪。

然而，这一地区的各个社会没有逃脱全面的衰落。已构成这些社会一部分的东方文明正在衰败。其封建结构并没有促进在地中海、印度洋或内陆的尼日尔-乍得地区和西部苏丹等受其影响的地区的发展。

劫掠性经济(地中海的海上劫掠是其组成部分)致使地中海南部的经济和技术增长停顿。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对这个地区及其腹地的停滞和不发达也起了作用。地中海非洲的衰落意味着在中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地理中起突出作用的整个辅助体系的衰落。

尼罗河流域和东非的所有国家，以及尼日尔-乍得地区和西部苏丹诸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影响。如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第28章所揭示，在西印度洋，1680至1720年间被称做“海盗时期”。凡与新的欧洲霸权国有直接联系的国家完全被劫掠性经济所破坏，虽然其衰落也是由于它们无力使日益受落后东方影响的社会经济结构恢复生气。这些国家也因无力迅速建立权力关系而受到阻碍，这种权力关系或许可使之不致受该时期不平等贸易差额这一特征的影响。

乡村的衰落：农民中的贫困和不安全感

劫掠性经济使城乡之间贸易停滞，因而影响了两者间的关系。城乡的活动和产品一直是互补性的。城镇打破了仅供自身食用的农业的封闭圈，加强了劳动分工，其中包含了新社会的种子。城镇为科技发展和贸易与特种工艺及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城镇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并代表了进步的前沿。城镇引发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消费模式。到那时为止，城市的手工艺和工业刺激了大规模的农业、畜牧业、渔业和狩猎及其辅助行业的发展。

38 由于城镇的存在，人们才开始以工业规模种植甘蔗和棉花，并种植染料植物，如茜草、靛青、藏红花和散沫花，以及提取香水的植物，水力装置、道路和提供羊毛、乳制品与肉类的畜牧业的发展也全仰赖于城镇。

然而，16世纪给那里带来了破坏和危机。城市人口减少致使农村经济衰败，农民普遍贫穷。大片可耕地又成为杂草丛生之地。因日益不安，乡民进入森林深处避难，与城市高消费文化隔绝。他们越来越退到家庭或村庄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为消费而生产。马格里布和埃及的农民生产橄榄油与谷类自用，并饲养家畜。大西洋沿岸的农民制作棕榈油，种植木薯和薯类，并学会种植香蕉和玉米。萨凡纳地区的农牧民仓里装满大米、小米和“直长马唐”(fonio)，自制树脂黄油果(karite)、落花生和棕榈混合油。产品交换和易货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

这种庄稼人的生活又遭奴隶贸易破坏，农民人口不断外流，因为当敌对贵族之间的战

争不能再提供足够的俘虏时，其差额就以搜捕奴隶来弥补，致使乡村荒芜，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由于体格健壮的男子被捕捉，村庄的经济随之衰退：人们逃离传统的居住区，在有些地区，人们不断逃离，回复到狩猎和食物采集的流动经济，许多人迁入接近森林的萨凡纳地区。

甚至生产方法也倒退了。发明、需要复杂技术与充足的资料三者之间的牢固联系是众所周知的；非洲乡村一般没有现成的资源，这加重了技术倒退或停滞。

尚武的贵族耗尽了境内大量的人力，特别是在黑非洲，是对农村地区人口的毁灭。上层统治阶级放弃了农耕，代之以依靠劫掠，利用自由人和他们所俘获的奴隶为其服务。

农民供养这些游手好闲的上层人士的负担越来越重，特别是在骚乱的西部苏丹和尼日尔-乍得地区，那里的旱地耕作和粗放的流动农业为人们提供食物已日益困难。"巴阿多罗"(baadolo)、"桑巴雷姆鲁"(塔克鲁尔的贫农)和"塔拉卡瓦"(talakawa,豪萨地区和尼日尔-乍得地区的贫苦农牧民)构成了萨凡纳地区的农民大众。他们像埃及的"法拉"，埃塞俄比亚的"加巴尔"以及撒哈拉和马格里布的"哈雷廷"和"卡姆斯"那样过着艰苦的生活。

随着对农民施加财政上的压力，农村和城市上层人士增加了对非洲农民的压迫。根据土耳其的穆斯林法律，在非伊斯兰化(daru khurudj)的地区增加课税。规定穆斯林不仅要缴纳"扎卡特"(zakāt,唯一对穆斯林收缴的税)，也要付土地税(kharādj)。通过收获分成和租佃还增加了土地的投机买卖。 39

由于本地收税权中的黑市在穆斯林国家已趋普遍，上层人士强加于农民和农村工匠的税收加重。掠夺财富和俘虏与奴役广大农民达到了极严重的程度。除应缴付给塔克鲁尔贵族政治首领的税(galag)外，还要加上"穆雅尔"(moyal,直译意为掠夺)，这使上层人士有权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侵吞财富。

在这种形势下，圣战的领导人和基督教救世主运动发现容易争取农民的大力支持。宗教人士许诺可实现平等并结束一切动乱。他们指明传统的贵族和欧洲人是破坏因素和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原因。

从17世纪起，农民的政治作用增加了。源于乡村衰退的农民叛乱像宗教革命那样横扫大陆，为抵抗殖民征服铺平了道路。这不是俘虏和奴隶的叛乱，而是人口最多的受剥削最沉重的阶级即小农的叛乱。在塞内加尔富塔地区的托罗多人的革命受到无地的贫农"桑巴雷姆鲁"(samba remoru)的支持，这是一次既反对摩尔人的"卡比拉"强加的"穆达尔霍尔姆"(muudul horma)税，又反对由伊斯兰化的丹尼扬克贵族引进的东方穆斯林沉重的税收制度的叛乱。农村经济的衰退与崩溃在性质和范围上并不总是一样的，经济僵化与传统商业城市及其统治阶级的不发达是成正比的。

尼罗河与印度洋诸国

劫掠性经济对尼罗河与印度洋各国的冲击也同样是灾难性的。东非海港自11世纪以来以其贸易活动而闻名。虽然在幅员和影响上不如西部苏丹和北非城市那么重要，但他们在与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和地中海国家的接触中，形成了真正的城市商业文明的框

架。[20] 葡萄牙的入侵使这个城市商业复合体开始逐步毁灭。到 1502 年，葡萄牙开始破坏性占领，同年，葡萄牙将基尔瓦和桑给巴尔置于进贡赋税的地位。1505 年，弗朗西斯科·爱尔梅达洗劫基尔瓦和蒙巴萨，接着在基尔瓦修建圣地亚哥堡。他禁止这些城镇之间的一

40 切贸易，商人们离此而去马林迪和科摩罗。拉穆和帕特被占领，混乱瓦解的进程由此开始。

除罗安达和莫桑比克之外，由葡萄牙，以及之后由德、英、法建起的驻地没有一个如西部苏丹的中等城市那么大，甚至不如 10 至 16 世纪的斯瓦希里和东非诸海港那么重要。

货栈或贸易站经济

当劫掠性经济在沿地中海、尼罗河和印度洋地区广泛展开之时，货栈或贸易站经济成为大西洋边缘地区的结构。贸易货栈并不关心创造性经营。新的滨海货栈城镇在成为商业文明中心之前都是堡垒——暴力和掠夺的发生地。

在几内亚和赤道沿海，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建立了货栈经济，他们掠夺的比收购的还多。在经济上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给予：他们甚至勒索贡赋，用以交换的货物很少来自他们本身的商业。除了一些酒和铁条外，葡萄牙货物都是进口的。他们用当地的和地区产品来交换黄金、奴隶、皮革、树胶、象牙、琥珀、黄灵猫香、贝壳、棉花和盐。在几内亚湾，葡萄牙人从阿肯人那里购进货物，再到尼日利亚沿海或刚果和安哥拉出售。在塞内冈比亚，他们居住在贸易站，成为当地成功的商人。在 17 世纪，当欧洲工业开始生产纺织品和五金制品时，城镇中的通货紧缩更趋恶化。

货站并未对当地的繁荣有所促进。1800 年前，阿尔布雷达、卡谢尔、佛得角的圣地亚哥、埃尔米纳、克图、卡拉巴尔和圣萨尔瓦多是最重要的货站，没有一个货站的居民达到 5000 人。货栈经济的主要方面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在贸易高峰时，这些货站既非联合经营当地工艺产品的贸易中心，也非大部分当地人民进行商业或企业活动的市场。总之，奴隶贸易站是减少人口的工具。各种统计对于出口奴隶的数目或在非洲奴隶贸易中牺牲者的数目并不统一，人数从 2500 万到两亿不等。[21]

然而，贸易站经济对世界繁荣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是相当大的。在开采美洲矿藏之后，贸易站为世界提供了很大部分的金银，而且开发美洲大陆的劳动大军来自贸易站。总之，

41 它们使世界贸易继续发展下去。它们是工业、金融、欧洲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源泉。以法国为例，它是 18 世纪的一个主要强国，其贸易额在 1716 年合计为 1 亿英镑，到 1789 年增至 4 亿英镑。同年，它的贸易顺差分别为 3600 万和 5700 万英镑。1774 年，单是西印度共计有价值 1.26 亿英镑的物品出口至法国，在 1788 年其价值为 1.85 亿英镑。在同一时期内，贸易站进口到塞内冈比亚全境的货物不超过 500 万英镑。[22]

更有甚者，劫掠性经济是在单方面投机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一般的假设相反，在 18

⑳ 参阅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18 章。
㉑ 参阅本卷第 4 章。
㉒ 见 P.D. 柯廷（Curtin），1969 年。

世纪中期之前没有真正平等的三向贸易。开始从事货栈贸易的欧洲航海者，特别是葡萄牙人，如已注意到的那样，没有任何投入。欧洲产品总量很少。在18和19世纪与当地产品相竞争的铁、铜、纺织品、五金制品在16和17世纪时毫无重要性可言。葡萄牙人主要是中间人。他们购入盐、贝壳、塞内冈比亚裹腰布和东非沿海当地或印度的纺织品，并以此来交换黄金、树胶、奴隶和其他出口至美洲和欧洲的货物。他们从本地商人那里夺走了这项贸易。

这样，当欧洲航海者在经济网络中获得立足点时，他们使非洲内部之间的正常贸易停顿，并从货栈的经营中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中间人垄断地位。非洲人不再在圣路易和波坦迪克，大拉乌和埃尔米纳，安哥拉和刚果或索法拉和基尔瓦之间进行贸易。“庞佩洛”(Pombeiros)、“兰萨多”(Lançados)和“坦戈毛斯”(tangomaos,中间人)使商人阶级的角色为他们所独占。大宗生意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垄断商行控制。住在贸易站或住在内地的葡萄牙中间人在他们的市场和集市(felras)的基础上，组织贸易网络，并以武力来保卫。

自16世纪以后，其他海上强国利用了葡萄牙人的这个网络。控制垄断的唯一障碍是非洲政府有能力时进行反对，以及欧洲人在进入内地奴隶贸易点时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这是一个以几内亚沿海“兰萨多斯”、中间人和奴隶贩子为一方和以各公司为另一方的冲突时期，前者要求拥有向圣地亚哥和戈雷提出请愿的自主权。关于贸易的具体信息，从葡萄牙人的时候起直到荷兰、法国、英国人到来之前，在货栈堡垒和季节性贸易站中均可得到。这是一段暴力和持续争斗的史话，在欧洲、奥斯曼和阿曼海上强国反对当地统治者顽强抵抗的斗争中，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站被摧毁、重建和转手，这些强国都因当地统治者要征收应付款和各种税(duties或curva[23])，对此有交付的，也有拒付的。 42

除生意上的风险外，货栈经济有一个主要特点：它无助于商人阶级的兴起，不可能在沿海创立与长途贸易相媲美的成就，因为长途贸易是在城乡一体化和工艺、制造业和工业的成长基础上繁荣发展起来的。在贸易站，除欧洲商人外，大部分是“拉普托”(Laptos，本地人翻译)。1582年，圣地亚哥和福古的15,000居民中有13,400为奴隶，1600人是控制经济的欧洲人。在19世纪之前，[24]大西洋贸易站除了卢安果沿海外，没有像基尔瓦、摩加迪沙、蒙巴萨和地中海港口那种经营奴隶买卖的本地奴隶贩子。

最后，促使欧洲革命的技术革新并无多少影响。欧洲工商业的竞争使非洲经济深受其害，自18世纪以后，欧洲商人因破坏传统网络而毁坏了当地的手工艺和沿海的工业。他们把港口逼入困境，使沿海与内陆之间的联系瘫痪。这样，兼并沿海地区的欧洲国家甚至在殖民征服之前即已划分成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并决定了这些地区18世纪时的发展和政治地理。从摩洛哥扩张进入桑海，到西部苏丹改变命运的自相残杀的战争，非洲政治舞台上的动荡大都源于欧洲霸权国家在16世纪开始进行的这一破坏瓦解过程。

[23] Curva是在葡人控制区的税，duty是英语区中的税。

[24] 见P.迪亚尼，1976年。

新的政治结构

在12到16世纪这段时期，非洲政治舞台已经达到均势和稳定。在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地区构成了在阿拉伯-奥斯曼帝国君权之内的小系统，摩洛哥、伊弗里基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是其中的--个地区。埃及自成--实体。尼罗河地区包括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向南与大湖区域的布尼奥罗-基塔拉人的国家、斯瓦希里城邦国家和赞比西河南部相联，这一地区在16世纪后期由姆塔帕国统治。南部非洲尚无国家结构。在中非，有一个系统是由刚果和蒂奥两国主宰的，另一个系统由卢巴国控制。但在森林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国家结构。西部苏丹和尼日尔-乍得地区是毗邻，其边界不断改变。两者都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有联系。

43 政治地图的发展反映了外界的压力及其反响。使政治舞台陷入大混乱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动摇了现存的疆界和力量均势。新的国家出现了：既有那些武装最好的国家，如加奈姆-博尔诺，也有拥有多数出海口的国家，如塞内冈比亚的卡约尔、几内亚的达荷美、中部非洲的安哥拉和赞比西河南部的昌加米腊。

非洲国家本身的特性改变了。以前没有统治者或君主，一直住着农民、游牧民和猎人的广大地区被征服，并转变为中央集权结构的国家。班图非洲的村落结构，还有卡比尔人或撒哈拉柏柏尔人的村落结构，被马格里布的马赫增，专制的黑非洲“曼赛亚”(mansaya)或“法林亚”(farinya)[㉕]，以及奥斯曼帝国贝伊管辖区的封建主义或穆斯林酋长国所取代。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从氏族族长与族群首领和“拉曼”(laman，地区酋长)手中转入“曼赛亚”政体的政治贵族、拥有土地的贵族(neftenia)和马格里布贝伊管辖区以及苏丹国与苏丹酋长国的手中，甚至转人被其王子、伯爵、宫廷内侍所包围、身着欧式服装的“曼尼”(mani，即基督教化的班图国王)的手中。

自16世纪以后，政治生活日益集中于沿海地区、掠捕对方商船的港口和贸易站周围。贵族们对其征收什一税。非洲各国政府有征牧外贸税的税收部门。地中海的“阿尔凯德”(alcaids，首领)在戈雷、波图达尔、圣萨尔瓦多、索法拉和基尔瓦称为“艾尔凯提”(alkaati)，“艾尔凯里”(alkaali)，或干脆也称为“阿尔凯德”。当时签订了许多条约试图使这一税收制度形成法律。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签订了许多贸易协议，并与欧洲人，甚至美洲人签署了历时短暂的友好条约。1780年，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因阿兰尤兹条约而告结束，此条约重新限定了双方的边界，并使其贸易关系形成法规。约在同时，阿尔及利亚正与美国作战，迫使美国付给海盗赎金，为同样的理由美国也付给摩洛哥10,000美元。从1796年起，除了为释放一些国民需支付642,000美元外，美国每年要付给的黎波里83,000美元，1797年还付给阿尔及尔21,000美元。

㉕ “法林亚”(Farinya)一词来自“法里”(Fari)和“法老”(Pharaoh)，意为索宁克人、曼德人等氏族的统治者。曼德人的“曼赛亚”(mansaya)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其主要统治阶级为多头政体，由世俗人或僧侣，自由人或奴隶，等级制度或行会成员，贵族或平民的杰出人物组成。此政体由控制政府机构者对贸易和产品征税来提供经费，并不是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使其有权分享所创造的剩余财富的土地贵族或业主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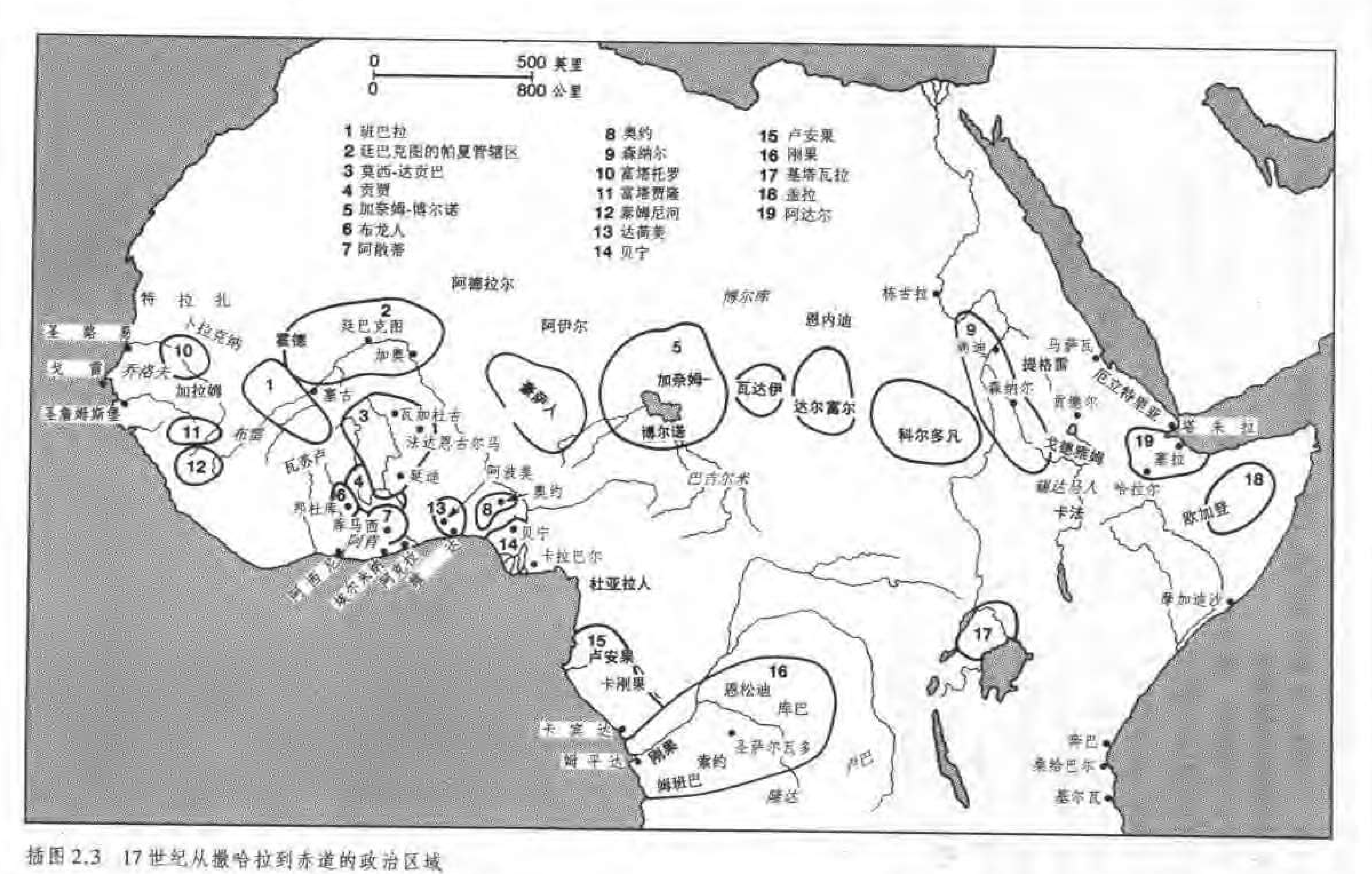


插图 2.3 17 世纪从撒哈拉到赤道的政治区域

资料来源：根据达喀尔大学地理系 P. 恩迪亚叶绘制的地图改编。

18世纪末，在塞内冈比亚的圣路易，贵族们共同分享50,000英镑——殖民地预算45的十分之一，其收入来自对外贸易。16世纪，葡萄牙人要求索法拉、基尔瓦和蒙巴萨的斯瓦希里港口必须交纳贡赋。

非洲人进行战争、摧毁贸易商站(如16世纪莫桑比克的津巴人)并禁止贸易(塞内冈比亚、安哥拉和刚果经常发生)，以劝服欧洲强国及其商人重新开始付税。但是这些多少可说是正规的收人来源却成了整个大陆贵族和统治阶级中发生战争的原因。

政治实体主要是在那些已经取得均势的地区，其发展与国内环境有关。政治实体的大小与其边界和政府的稳定性各不相同。有些直到殖民征服时仍无变化，有些是邦联国，有些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或酋长国，管辖范围有限。有时它们是一个氏族，或一个独立的“拉马那”(lamana)，其中最先占有者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

因此，由劫掠性经济和货栈经济带来的不稳定，为16至18世纪的国家和经济奠定了模式，这些国家和经济结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基础已失去秩序和凝聚力。

(计德容 译)

3 非洲的人口流动和新的社会-政治形式的出现

J. 范西纳

人口流动的性质

非洲前殖民时期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和大部分亚洲历史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人口流动，**46** 特别是农民的流动。在热带和亚热带土壤上耕作的非洲农民，比欧洲或亚洲农民的流动性更大。欧洲和亚洲农民从事集约农业，年复一年地更新同一块土地的肥力。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这种耕作方法则行不通，农业必须是粗放的，每年从一块田地转移到另一块田地。其结果是人口并不束缚在限定的小块土地上，而是比其他地方更富流动性。牧人亦是如此，虽然他们应付环境的技能堪与亚洲人，特别是中亚人所采用的技能媲美，也与欧洲的季节性迁移牲畜至合适的放牧地相类似。然而，人口流动在任何研究或重现非洲历史的过程中是应予考虑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它对社会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都必须认真予以评估。①

本卷列出了许多迁徙的证据，从南非开普的布尔人有组织的迁移，到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再到乌班吉的恩格班迪人，② 中非的贾加人，尼日尔河湾的图阿雷格人，塞拉利昂的马内人和整个西非的富尔贝人，以及马达加斯加的全部人口。看起来在1500年到1800年间没有人停留在同一地方，到16世纪后期，葡萄牙的报道者们已经在推测从西非、中非和东非来的马内人、贾加人、津巴人和奥罗莫人的迁徙都是有关联的。③葡萄牙人说，迁徙是由一大群流浪者造成的。他们认为移民与安居乐业、生活有规律是对 **47** 立的：他们是未开化者，而不是文明人。直到1963年，这种成见的痕迹仍留存在特里弗·罗珀身上，他将非洲历史作为“未开化部落的无意义的大变动”而不予考虑。④ 虽然这种陈规之见在16世纪形成，但关于人口流动的讨论可以放在这部历史的任何一卷中。我们

---

① 有关非洲人口流动的参考书目与非洲历史本身的参考书目相一致，本章中大部分情况可参阅本卷其他各章，进一步研究可查阅其参考书目。

② H. 伯森斯(Burssens)，1958年，第43页。

③ 迟至1883年，A. 梅伦斯基(Merensky)仍然发表此种观点。他把奥罗莫人迁徙与贾加人、富尔贝人和津巴人的流动(但未包括马内人的流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声称津巴人对林波波河以南的东南部讲班图语的移民负有责任！作为一名德兰士瓦省的传教士，他的推论反映了南非布尔人的要求。这一类资料留给人们的印象是16世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动荡。但这个印象是虚假的，是资料拼凑的产物，以迎合对世界的主观看法。对这一史学传统的批判，可参阅J.C. 米勒(Miller)，1973年，第122-126页。

④ T. 罗珀(Roper)，1963年。

将看到，就全洲范围而言，1500到1800年期间的人口流动不会比其他时期更具特色。

对非洲大部分历史的理解直到近年一直是一部“不断迁徙的传奇”,[5] 与大日耳曼民族侵略的史学相类似，那次侵略摧毁了罗马帝国，并因此而留下诸如“汪达尔人”或“匈奴人”的称号。除了贬低之外，这一概念还把一切人口流动降低到与迁移等同，充其量是大规模迁徙，这种观点彻底混淆了对不同事例中所发生的情况的理解。

“迁徙”意指人口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定居。在动物学上，迁徙也指动物的季节性流动，但是讲人的时候，正确的用词是“季节性移动”。关于词典上的定义就谈这么多。迁徙是一个概念，表达人、空间与时间的一种关系，意指在这个关系中的交替变换。我们是在这种泛指的意义上谈论人口流动，而不是在谈迁徙本身。因此，这些原因必然与空间的组织有关，或是因为人与资源的比率改变了，例如，由于人口过剩或气候造成的大灾难；或是因为人在相当大的规模上重新组织空间及其资源。国家和贸易网络便是非洲最突出的大规模空间组织。

正如欧洲人强调迁徙那样，非洲人在他们的口头传说中也是如此。许多人推究宇宙的起源并讲述创始人与居民都来自别的地方，即发源地。也有一种与之相对的固定说法，认为人是从土壤中冒出来的，因而人是土地的拥有者。但正是第一种概念给外国学者已持有的先人之见火上加油，他们设想，连续不断的侵略使各族人民彼此推来推去，就像台球桌上的球一样。随着每次征服，一个新的难民(restvolker)浪潮便被输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庇护所，或者他们自己也去打扰其他的居民。拉策尔将仅仅迁徙就能说明文化和社会相似性这个概念纳入现代人类学的基础。后来，德国文化(kulturkreise)学派把文化看做是原始状态的文化层次的混合体，是无数次迁徙的结果。通过弗罗本纽斯和鲍曼，这些思想得以进入非洲研究。

48

但是，尽管有关于迁徙的一切证据，普遍认为非洲人是在永远移动的看法是不成立的。在一篇关键性的文章里，海尔用文献证明从塞内加尔到喀麦隆所有沿海地区语言的显著“稳定性”,[6] 这种稳定性于1500年后在非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农业社会中都能看到。现在的诱惑是将一切迁徙作为臆造的事物而不予考虑，并否认千真万确的个人和集团两者的流动——因为语言或文化的稳定性并不必需是非流动性的。

就像“迁徙”的概念一样，“稳定性”这一概念在此范畴内包含人、空间与时间，以及强调缺乏变化。但是两种概念都是一般化的，即对过去发生的真实事态的粗略概括，而将其特殊性略去。它们也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足够大的地区内，如白尼罗河东面和北面的地区，杰人的迁徙[7] 成为了一种稳定性，即一个民族对土地及其气候需求的全然适应。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一个村庄移位10公里就能成为一次迁徙。在时间方面也是一样。当人们渡过许多世纪之后，漫长的岁月被充做一个单元，当迁徙出现时，较小的、临时性的单元是不会显示出的。班图人的迁徙可能延续了2000年，即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迁徙这

[5] P.E.H.海尔(Hair)，1967年。

[6] P.E.H.海尔，1967年。

[7] J.E.兰菲尔(Lamphear)，1976年。

个标签可以被应用之前，需要移动的人数从个人到社群各不相同。在本文中，迁徙一词将总是应用于社群的流动，至少是村庄的规模。

因此，要了解历史的记载，我们必须首先针对正常状态：人民在谋生中的惯常流动。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较好地了解不惯常的和不正常的流动，并讨论由此而确实发生的人口流动的不同过程。然后我们可再转向关于这种不惯常流动所幸存的各类证据，并以1500至1800年期间非洲主要流动的概述作为结论，以下几章的讨论也是如此展开。

流动性和土地利用

由于存在四种利用环境生产食物的主要方式：狩猎采集、饲养家畜、农业和渔业，因此就有与这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惯常流动的四个主要模式。因为它们是正常的、经常性的和不导致社群的空间移位，它们不能称为人口流动，更不能说是迁徙了。

狩猎者和采集者在一个区域内四处流动，只要人口密度适应于生活方式的要求，这个区域是颇为稳定的。他们组织成营地，需要有一个区域而且必须在这个区域内经常转移营地，从伊图里俾格米人[⑧]和博茨瓦纳的昆-桑人[⑨]那里得知，通常是每两周转移一次。这对于他们既要跟踪猎物又要找到簇生而合宜的植物性食物是必须的。他们的流动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同。在森林中，采集蜂蜜的季节时，这一点最为明显。而在附近的卡拉哈里沙漠，哺乳动物流向或离开水坑以及果树结果对年度的流动起着决定作用。尽管流动性高，但这些人口有时能长期保持稳定，反复地利用他们的区域。 49

牧人也是流动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牲畜需要水、草和盐，而是否能获得这些物品又取决于季节。例如，在撒哈拉，游牧民在一年中的干旱季节通常居住在靠近沙漠的边缘或主要的绿洲；当雨季来临时，他们便进入沙漠，范围既深又广。[⑩]他们的流动称为季节性迁移，他们年复一年经常遵循同一路线。在一些人口极少，特别是降雨不规则的地区，如北部费赞，虽然牧人每年并不遵循同一路线，但从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季节性迁移模式仍是有规律的。[⑪]这样的流动对牧养骆驼者来说，例如西撒哈拉的雷格巴特人，可能距离很远；而对于放牧不同牲畜的游牧民，根据骆驼、山羊、牛、绵羊的不同需求，经常意味着复杂的相互流动。因此，图阿雷格人和富尔贝人的放牧区在萨赫勒是重叠的。苏丹的牧牛者(巴卡拉人，Bakkāra)的放牧区与更北面牧养骆驼的人，如卡巴比什人的放牧区也是重叠的。此外，游牧民也种一点庄稼，并在有狩猎者与采集者的地方同他们交换食物，如18世纪南非迁徙的布尔人那样。否则，他们就依靠农民所生产的植物性食品，因此在他们的放牧区边缘必须要有农业聚居区。这样，空间被不同的互补性集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⑧ C.M. 特恩布尔(Turnbull)，1961年，1966年；P. 谢贝斯塔(Schebesta)，1952年；R.B. 李(Lee)，1968年和1979年。另见L. 德梅斯(Demesse)，1978年，1980年；M. 萨林斯(Sahlins)，1972年，说明这种生活方式相对安全而且富足，这一事实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后果。

⑨ 教科文组织，1963年，以及E.E. 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年。

⑩ 同上。

⑪ A. 柯尼耶(Cauneille)，1957年。

利用了，每个集团在同一区域内自行流动。然而，放牧比狩猎和采集更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短期内的变化。在最近的干旱中，狩猎兼采集的桑人不需要大量变更他们在区域内的流动，但邻近的茨瓦纳农民和牲畜饲养者却遭受了饥荒。有证据说明，有些集团，如邻近卡拉哈里的科伊牧人，在这种时候就会变成狩猎兼采集者(桑人)。但是，虽然牧养牲畜对降雨的变化很敏感，而干旱对畜牧业的影响较小，不像对农业的影响那么剧烈，特别是对谷物的影响尤为严重。

农民也是流动的，因为他们逐地迁移。土壤肥力是以休闲更新的方法得到恢复，因此每年都要开垦新的田地以使肥力耗尽的土壤得到休息。每当田地离家太远时村庄就要搬迁。在近代，村庄平均每十年迁移一次，有些周期短至五年或长至20年。既可灌溉而且每年又有肥沃的淤泥沉积的好地方很少。古代埃及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从这种实践中发展了绿洲农业。这些农民不需要逐地迁移，人口颇为稳定。除埃及和几内亚西部沿海的水稻种植地带之外，在非洲永久性的田地是极少的，因为集约施肥的方法通常不能有效地发展。

大多数村庄需要流动，但它们的流动或多或少是在一个稳定的地区中循环，而且人口密度要低。在约1600年引进木薯作为主食之前，流动性也许更大，而且流动性和流动的方向不单是依据土壤的状况。在许多情况下，包括中非所有的热带雨林村落，农民同样依靠设陷阱捕兽和狩猎，也搞一些采集。这说明，如同加蓬的恩扎比人那样，在选择下一次迁移的村址时，既要考虑农民的需要，也要考虑设陷阱捕兽的需求。[⑫] 由此产生了复杂的流动模式，但流动总是在同一地区内。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雨量不足或过多均能毁坏当年的收成。此外，准时降雨很关键，即使靠近雨水充沛的赤道也会有灾情。在刚果靠近黑角的卢安果，不是害怕缺雨而是在于下雨的时间不合适。种植之后无雨是个灾难，而延续不断地降雨又会妨碍播种。“正常”年份是比较少的。在赞比亚大约每五年农民必会碰上旱灾，[⑬] 他们必须每年储粮以作准备。干旱的频率在靠近沙漠的地区较高，但任何地方都是不可忽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连续两年干旱便会缺粮，连续三年干旱即意味着饥荒，尽管还有其他采集食物的活动，但在人口密度太高的地方食物迅即告罄。

总之，对于农民，犹如对于牧人或采集者，在人口密度上是有限制的，根据环境，或微观环境而有不同的最佳密度。土壤、雨量、地势和食物的增补来源都必需考虑在内，犹如要考虑现有的技术和食物的分享或其他分配方面的安排一样。在技术改变的条件下，土地对农民的比率可以变化而不会有剧烈的影响。除此之外，内向或外向流动是用以调整人口密度对土地的机制，反过来也一样。彻底控制人口则是另一机制。

渔民在固定的地方生活，他们的居住区很少变动。然而河流季节性的水位改变也迫使他们远行，有时行程数百公里，如在扎伊尔河或开赛河上，他们住在河口沙洲的帐篷里，而把家人留在故乡。这种模式以扎伊尔河、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流域最为典型，并提供了

⑫ G. 杜普雷(Dupré)，1982年。
⑬ J. 阿伦(Allan)，1965年。

迁徙或流动的模式。沿海或大湖边的稳定性最大。因为他们有船，渔民有廉价的水上交通工具，而这使他们许多人成为商人，在不同的陆地集团之间起中介作用。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很容易把自己和财物搬迁到遥远的地方。这样，最不需要搬迁的渔民也像狩猎兼采集者或牧人那样，充分作好搬迁准备，而且搬起来更加容易。

以上，我们只是考虑了有关惯常流动的主要因素。在共生现象更为发达或经济复杂的地方，选择地区的模式和要求也就更加复杂。设想一下，靠近刚果河河湾的农业村庄给渔民和狩猎兼采集者提供了农产品，同时又依靠他们来提供肉、鱼、陶器，也许还有其他产品。猎人与农民两者的流动需要协调，不能到离渔村的固定地点太远的地方。此外，由于社群流动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显然允许人们为除了利用土地的要求以外的其他原因搬迁。高死亡率、纠纷或防御上的需要容易导致作出搬迁的决定，特别是在农业人口中，他们不像牧民，并不依靠每年关键的几个星期前往季节性迁移的固定集中点。此种便利农民与狩猎兼采集者共有之，尽管他们缺少牧人和渔民的交通工具。

除了集体流动之外，通常有许多个人的流动。妇女经常嫁到外村，儿子与母亲的亲族同住，奴隶、当铺老板、商人、朝圣者、有名气的医师、猎人，甚至其他不多的专门人员经常到处奔波。非洲的个体流动至少与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个体流动相等，关于原始状态的民族集团的陈旧观念与终年游荡的观念一样不真实。

虽然以下几节只论述一个社群在一种不惯常的方式下的流动，但必须强调的是，个人惯常与不惯常流动之间的分界却颇为含糊，尽管所造成的人口移动可以十分引人注目。1660年之后奴隶的出售可以看做是个人流动的惯常事件。然而，对美洲的奴隶贸易则肯定是非洲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尽管贩奴并将奴隶运往北非和北非之外，可能要比大西洋奴隶贸易小十倍以上，但除了也许是最大规模的迁徙之外，这在非洲大陆内仍然比其他任何人口流动更为重要。 52

城市化也代表人口流动，到1300年，津巴布韦城[14]的人口可能已有10,000。假若如此，这是一次吸收了100个村庄的内部迁徙的产物。当津巴布韦因其土壤耗竭，不能再维持作为永久的居住区时，便不得不把它废弃，[15]居民分散到各个村落，这代表着一次同等重要的人口流动。[16]但除了城市化和奴隶贸易之外，很少有证据说明这种个人甚至家庭的小型流动，只有当计算人口密度成为可能时才能了解更多情况，因为它们每隔十年或每个地区都有变化。但是这种流动确实存在，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忘记单是个体流动就能增加或减少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常常被看做是自然增长的结果，但人口移人看来确是起了作用，外迁则使人口减少。

---

[14] D.N. 比奇(Beach)，1980年a。

[15] P.S. 加莱克(Garlake)，1973年；D.N. 比奇，1980年。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说明通过农业轮作和在天然牧场放牧的办法，对居住区的形式加以制约。

[16] 关于大规模个体流动导致在一个地带重新安排人口的一个鲜明事例，是马里的早期城市杰内-杰诺，它的形成始于约公元前200年，特别是公元250年之后，而它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衰落，正值距它约三公里之遥的杰内城的兴起。较小的卫星居住区曾与杰内-杰诺一道成长，但略落后一段时间，并于公元1400年在该城被废弃之前即衰落。杰内-杰诺和杰内城的整个领地戏剧性地展示了在这一小部分空间个体流动的影响。参见R.J. 麦金托什(McIntosh)和S. 基奇-麦金托什(Keech-McIntosh)，1982年。

非惯常人口流动的过程

社群非惯常的人口流动可分成两大类——漂流和迁徙。漂流是渐进而缓慢的运动，是流动和食物生产的惯常模式延伸到新的地区。突然的移动指明显地背离惯常流动和生产活动，称做迁徙。漂流通常不需要抛弃原来的居住区，虽然最终也许会抛弃。另一方面，迁徙通常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地区。漂流和迁徙两者都包含几个不同的过程。当漂流扩大了一个集团所持有的领地时称为扩张；当漂流停止并产生新的不同的居住区时则称移民社群。53 当迁徙涉及整个民族在大规模的基础上发生时可称做大规模迁徙。当迁徙只涉及人口的一部分，通常是武士们闹事时则称之为团伙迁徙；精英迁徙是涉及一些小集团有时甚至是个人的迁徙，他们的迁移导致接纳社会发生极为重要的变化。精英迁徙几乎可说是个体流动，但这里必须把它包括进去，因为它的影响，它的频率与要求使其成为迁徙的一个形式。

卷入这些移动的人数、移动的持续期、旅程的距离和触发的动机——包括推出因素（诱发或迫使人们外移的因素）和拉入因素（吸引人们移入的因素）——以及它们的影响，这些特征确定了一次移动的意义和重大程度。这些问题在所研究的各个事例中都应予以考虑。但这些指数不能用做分类的基础，因为它们的含义太易变。例如，旅行的距离本身是无意义的，比如在撒哈拉沙漠中行走几百公里也许只相当于一个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中的不足50公里。动机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如旱灾，也许包括，也许不包括。推出和拉入因素的混合异常多变，使每个事例都有可能成为它自己的一种类型。数字经常得不到，用做类型学的标准通常太不可靠。下面根据流动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前因后果，将五种类型的迁徙特点逐一进行描述。

扩张

扩张的发生数不胜数，因为大多数非洲居民的自然流动及其特性与其原居住社会的普遍生活方式不同。当漂流主要向一个方向而不以随意或循环的模式发生时，轮耕制就成为扩张。迁徙的单位是村庄，但是在一个社区中，所有的村庄或大多数村庄向同一方向流动时则导致扩张。迁徙的距离通常很短，往往不超出10到20公里。流动的频率低，最多每10年或更多的年份才发生一次。因此流动的时间也许很长，而且人口似乎总是稳定的，即使在扩张进程中也很稳定。

在森林中，芒戈人从赤道周围地区，即扎伊尔河大河湾向南的扩张从1500年以前很久就已开始，而且于1900年在西面的扎伊尔河和在东面的洛马米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在进展。其目标看来是开赛河下游和桑库鲁河河谷富有吸引力的环境，而且再往东的森林边缘比较富饶。其结果是从赤道和南纬一度周围人口较稠密的核心地向南到河谷及其两54 侧造成了一次人口流动。[17]

---

[17] J. 范西纳(Vansina)，1981年。

这样的流动很容易加快，或增加每次流动的旅程，或增加移动的次数，比如每两三年一次。于是，扩张便成为有意识的和对特殊目标的反应，经常是拉入因素或吸引力的反应。例如，加蓬/刚果的恩扎比人，在仅仅半个世纪中，从大奥戈韦河湾之东他们的国土向西南迁移，目的是接近贸易路线，并通过这些路线获取财富，以及开采新的矿物资源。[18]芳人仅仅在20年之中就从科莫埃河上游涌入加蓬港湾，在随后40年中又以略逊于狂热的速度继续向奥戈韦三角洲行进。村庄仍然每隔数年搬迁一次，40公里的长距离也并非少见。对芳人的流动已从流动过程方面进行了充分研究。没有理由必须放弃通常的生活方式。当一个村庄搬迁时，通常绕过其他芳人的村庄而前往远方之地。整个扩张活动交替前进，全部在单一的环境中发生，由猎人在其惯常巡回的路线上进行侦察。[19]

牧民的扩张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最通常的方式是年轻的一代成员离开其长辈的季节性迁移地的中心或集中点，带着牲口迁移到新的放牧地。因为这种地区只有在雨量对农耕太稀少或不可靠的地方才可找到，牧人通常受环境的可变因素的制约。例如，马赛人最初就是以这个方式扩张，直到所有合适的土地被占用完。整个过程从约1600年持续到约1800年。[20]一个有充分文献佐证的事例就是南非布尔人的有组织的迁移，他们在欧洲殖民地的第二代移民，约从1680年后，在靠近开普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即使人口是稀少的，第一批牧民尚抱怨人口过密。因为土地干旱，需要大面积土地来放牧畜群。到1700年，如果一个家庭能看到邻居烟囱中冒出的烟，那末这个家庭就会感到拥挤。于是年轻的一代就会带着部分牲口赶上牛车，冒险离家远行。在大约1780年以前，这种扩张一直是进入主要由其他饲养牲畜者(科伊人集团)所占领的土地，而科伊人可能被赶走。但后来布尔人移民来到了紧靠由科萨农民和牧民所拥有的水源极为充沛的土地上。[21]

在有些事例中，季节性迁移的路线是很长的，包含一个以上的中心或集中点。利比亚的奥拉德-苏莱曼人在靠近地中海的锡尔特地区与利比亚南部的费赞绿洲之间随着季节而来回移动。1842年，他们在靠近的黎波里处遭受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后，被迫放弃了锡尔特集中点。他们在沿通往博尔诺的商队路线上，在费赞之南建立了一个新的集中点。最初他们的集中点是博尔库，后来迁至加奈姆，尽管因他们入侵图阿雷格人的领土而遭到后者的坚决抵抗。及至1850年，他们到达乍得湖，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败之后，到1870年便统治了费赞和乍得之间的整个地区。[22]这次流动涉及到武装团伙和战斗，因此易于把它看做是团伙迁徙的一个事例。但整个过程与其他牧民的迁徙过程明显相似，包括以轮换季节性迁移两端集中点中的一个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地。 55

甚至狩猎兼采集者也有漂流活动。这也许可用来解释巴卡猎人在喀麦隆东部的存在。

---

[18] C.杜普雷，1982年，第25-39页。

[19] P.亚历山大(Alexandre)，1965年，第532页。他的关于芳人迁徙的大部分观点是错误的：参见C.钱伯林(Chamberlin)，1977年，第23-80页。

[20] T.T.斯皮尔(Spear)，1981年，第63-66页。

[21] L.富歇(Fouché)，1963年，第134-136页。

[22] D.D.科德尔(Cordell)，1972年和E.罗西(Rossi)，1968年。

这些俾格米人讲乌班吉语，但他们都住在乌班吉农民居住区的西面。这种情况以一次大规模迁徙无法解释，只有从靠近上桑加河的地区向其猎区西面逐渐扩展最能说明问题。[23]

大的扩张流动是人口再分布的特征。这些流动经常预示对以往以粗放方式开发的地区的殖民化。在非洲历史上，最深刻和持续最长的趋势之一是数目越来越多的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把环境塑造成越来越适合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受环境的决定和限制。这样，在尼日尔西部森林中，讲比尼语的各族人民的扩张大约始于公元开始之时，可能直到1200年前后当贝宁城开始发展时才停顿。[24]虽然关于伊格博人在尼日尔河下游之东的扩张缺乏资料，但直到1800年扩张还在大力进行(伊格博-乌库人)，其结果使这一地区从一片自然森林彻底地转变成为人类驯化的森林，并伴之以人口高密度的形成。在讲比尼语者的事例中，农民以新的方式开发利用现有环境，对环境更加适应。在伊格博人的事例中，农民破坏了原始环境。所以，从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扩张是自然的。当非洲人口扩大时，总的影响是各地的人口密度增加。把这样的流动归咎于人口过密只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概念是指像南非的迁徙布尔人(trekboere)的感觉，而实际上人口的密度是很低的。人口过密是对运用现有开发方法对土地施加压力的一种相对的衡量。改变技术亦如人口控制或向国外移民一样，对此可予以缓解。

56 扩张流动在非洲肯定从早期即已发生，首先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后来是已发展了对土地较精耕细作技术的居民。在有些事例中，涉及到由于气候变化而资源长期恶化，最突出的例子是撒哈拉变干燥。毛里塔尼亚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由于这一现象农民如何被迫南迁，这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700年加纳王国兴起的期间。[25]

较快的扩张，诸如芳人、恩扎比人或奥拉德-苏莱曼人的扩张则是由于其他原因。在前两个例子中，贸易路线和中心的吸引力提供了目标或拉人因素。在最后这个例子中，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失败是一个推出因素，而得知通往乍得的贸易路线为旅行提供了方向。

没有一个事例是发生突然性灾难，诸如饥荒或流行病而成为农民扩张的原因。在极端危机的条件下，他们平常的生活方式难以维持。当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崩溃而发生流动时，即是大规模的迁徙，而不是通常有秩序的扩张，然而这样的事例看来为数极少。

扩张并不一定意味着新来者将本地人赶走，经常是发生人口混合并出现新的社会，或者如芳人的例子，本地人采纳了外来移民的文化。新的混合可产生新的社会和文化。于是，芒戈人向南漂流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新社会，包括后来著名的库巴。[26]在另一些事例中，本地人慢慢地被取代，例如当东南部讲班图语的人在遇到桑族猎人或科伊族牧人时也许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虽然此中也有吸收的迹象。一地居民被另一地居民驱逐，另一地居民又将第三地居民撵走，而第三地居民又去征服或获得别处的新土地，这种“台球效应”看来几乎从未发生过。假若人口密度通常被包含在内，那末扩张产生的难民极少。

---

[23] J.M.C. 托马斯(Thomas)，1979年。
[24] P.J. 达林(Darling)，1979年。
[25] J. 德维兹(Devisse)，1982年，第171-173页。
[26] J. 范西纳，1978年。

移民社群

当漂流停顿，并导致外来人口的新居住区与其原有居住区相脱离时，就出现了移民社群。所有的移民社群大都与贸易或朝圣相关。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富尔贝牧人，他们分散在整个西非一片片适宜的土地上。这样的地区是生态“龛”，因其他人认为其资源收益甚少而未被占领。因此，本地人并不反对富尔贝人的占领。事实上最好把这个事例看做是普遍扩张的另一个例子，与肯尼亚北部和坦桑尼亚的图尔卡纳人、南迪人或马赛人等族群的类似例子无大差别。[27]

最典型的移民社群是从贸易中产生。在非洲之角沿海地区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和阿拉 57 伯人的居住区、欧洲人的堡垒和开普敦的殖民地核心都是移民社群，是由海外来的商人创建的。水上运输者和渔民的事例也很多。在回顾的这段时期中，博班吉人即是一例。从乌班吉河口一个大村庄来的居民在沿扎伊尔河至开赛河口的整个路途中，开始建立了贸易站和来后第一代居住区。他们与其他人混合，获得众多的从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集团，称为博班吉人，这一切都发生在约1750至1850年之间。[28]在东海岸，斯瓦希里社会和文化以类似的方式发展，并从索马里和肯尼亚沿海边境扩展，远至南方莫桑比克近海的伊博岛和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东北部的一些中世纪居住区可能归属于他们。[29]但移民社群也可沿陆路出现。曼德商人从上尼日尔到塞内加尔沿海建立了贾汉卡人移民社群，并从上尼日尔到阿贾沿海建立了乔奥拉人(迪奥拉人)居住区。讲莫西语的雅尔塞商人在莫西各国组织了驿站和贸易中心网络。

有些移民社群是由于每年至麦加朝圣而形成的。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以个体或小团体为主。当由于某种理由使他们不能继续行进时，他们就定居下来。这就是19世纪苏丹的塔克鲁里人居住区的由来。塔克鲁里人来自西非，他们留在苏丹，并聚集在自己的居住区内，如同经常从栋古拉地区来的商人(djallāba)一样，沿贸易路线建立他们自己的居住区或定居点。在巴卡的大多数马拉布丁·比尔巴拉卡人(marabtin bilbaraka)是朝圣者的后裔，他们通常是北非人。

移民社群通过贸易或因位于朝圣的路线上通常与他们原来的中心保持联系。在有些事例中这种联系是间接的，或不再与原来的中心保持联系。例如，到15世纪，索法拉的居民易于与基尔瓦保持联系，而与再往北的城市联系则比较困难，与拉摩群岛或位于斯瓦希里中心地带的巴琼群岛也不再有专门的联系。这不过是不断分裂的结果，与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一个迦太基殖民地(不是太尔人的殖民地)塞尔尼的事例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欧洲人的移民社群也有由贸易来重新定位的趋势。这样，开普敦的文化是以巴塔维亚为中心的东印度荷兰帝国的文化，而不是荷兰的文化；莫桑比克有几个世纪直接隶属于果阿，而

[27] 见本卷第27章。

[28] R. 哈姆斯(Harms)，1981年。

[29]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18章。

安哥拉于 1648 年后几乎成为巴西的附属地。

移民社群的形成是高度能见的人口流动。它们是远距离通讯的标志，它们在贸易路线 58 发展之时昌盛起来，虽然有的在1500年前很早便已开始，但大部分已知的事例均属于1500年以后的时期，并证明在更多的方面人对空间的控制。在人们妥善安顿下来而且他们的经济开始互通有无或与非洲之外的世界开始交换货物的地方，便会出现移民社群。他们的存在是人类努力去开拓空间的一个成功标志。

大规模迁徙

当全体人民——男、女、儿童——离开他们的家园，带着全部财物，长途跋涉一年或一年以上，这就构成了真正的大规模迁徙。这种大的人口动荡是与巨大的灾难相联系的。卷人的人数可以很多。据说约有 80,000 汪达尔人在面临其后方被西班牙的西哥特人进一步击败时，受一位不幸的拜占廷总督的邀请，于 429 年进入非洲。然而，他们的流动仅仅是当时发生在欧洲的各种人口大规模重新组合的一部分。[30] 从 1052 年开始，由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对北非的最大入侵，据推测是与在阿拉伯半岛反复出现的干旱有联系。他们人数众多，迁徙一直继续到约 1500 年进入毛里塔尼亚时为止。这次迁徙和与之有联系的阿拉伯人在苏丹而后在乍得的漂流，改变了整个北部非洲的文化地图，使之完全阿拉伯化了。[31] 真正的大规模迁徙是戏剧性的。它们产生巨大后果，所以毫不奇怪次数很少。在 1500 到 1800 年期间，奥罗莫人的大规模迁徙和扩张以及伴随他们的属于其他文化社团的流动是非洲唯一完全成熟的大规模迁徙。震撼非洲的有名的恩古尼人的迁徙，从开普到尼安扎，是 19 世纪唯一的例子。

大规模迁徙提出了很多问题。必须获取有关迁徙地的情报，还要给移民提供食品，因为他们不能以惯常的方法为生。行军途中通常要求有一个不同于以往所存在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许多事例中，社会是围绕军事编组组成的。随后移民经常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式，以及适应新的环境。这个过程经常导致劫掠和抢夺，甚至牧人带着他们的牲口迁移时也是如此。在途中相遇的大批人员合并在一起称为"滚雪球"，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这样的一些社会也已完全或部分地被破坏。这个过程也通常是阵发的，它导致大规模的战斗，产生难民并引起附属性的迁徙或迅速扩张。总之，这类人口流动是灾难性的，并导致 59 在辽阔的地区上人对空间的戏剧性的新关系和适应性。那末无怪乎，虽然初期的流动可以相当快，但直到安置好最后的难民，整个过程可以花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奥罗莫人的大动荡可能始于 16 世纪 30 年代，但直到 1700 年前后才恢复到正常状态。然而，与由漂流造成的大扩张相比，这一时段仍是短促的。

显然，这幅图像最适用于发生的极端情况。早先当文献资料不足时，经常难于分清大规模迁徙与快速而大规模的扩展，特别是游牧民的扩展。因此，卢奥人的扩张经过许多世

[30] C. 库尔图瓦(Courtois)，1955 年。

[31]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3 卷，第 4、5、15 和 16 章。

纪和经历了许多不同的环境，经常被理解为是一次大规模迁徙。它涉及整个人口，造成了许多附属性的流动，并扰乱了一大片地区，主要在白尼罗河之东。在扩张的大部分期间，伴随的还有在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的其他集团类似的大规模流动。但时段是很长的，也许是500年，而且不管是什么证据[32]都指向漂流而不是指向大规模迁徙，因为人们通常与畜群一起迁移，并停下来种植庄稼。部分奥罗莫人的流动也显示出这种特性。这些例子表明大规模迁徙与大规模扩张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明确的，而且在这种时期漂流也会发生。但归根到底，根据一大群人在行进中的生产能力和军事化结构这两个方面，仍有极明确的区别。其过程是不相一致的。

漂流和大规模迁徙可混合在一起。因此，卢奥人的流动大多是扩张，但18世纪肯尼亚卢奥人突然爆发的流动可被看做是一次大规模的迁徙，那时他们侵占了人口众多的地区并用武力控制新的地区。与此相反，奥罗莫人的流动是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开始的，但在后来的阶段中，即1700年前后，特别是之后变成了一次扩张。

大规模迁徙是灾难性的动荡。通常是由于同等灾难性的原因，往往是气候的突然变化，如干旱与随之而来的饥荒和流行性疾病。然而，有时情况并非如此。例如汪达尔人的迁徙并非由于自然灾害，虽然它与其他迁徙以及与罗马帝国的消亡有联系。相对的人口过剩是作为巴努希拉尔人、奥罗莫人和“姆菲卡尼”（mfecane）迁徙的一个原因提出来的，但至今在这方面已没有什么证据。现有的这种证据出自把所有大规模迁徙都归诸于在人口与资源比例方面一次突然出现的不利变化之后的人口过剩。这也许是一种谬论，只要此过程确实构成在一些地区重新分布人口，那末其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迁徙的初始点上的压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奥罗莫人的心脏地带是否存在人口压力，这是基督教和穆斯林王国双方的共同破坏才激发了奥罗莫人洪流的方向，即使不是洪流本身。[33]至于姆菲卡尼，考古学家正企图说明心脏地带人口上升。就其本身而言这不是个充分理由，需要与军事领导人的兴起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这方面是有证据的，并与看来似乎是津巴布韦的先驱流动有联系。[34]人口压力也许大量地包含在所有的事例中，因为在大规模迁徙中有着如此众多的移民，但将此作为完整的解释则是不充分的。 60

团伙迁徙

团伙迁徙总是武装的，包括的人较少，大多数是男青年，只构成人口的一部分。它的后果尽管蔚为壮观，却不如大规模迁徙那么严重，也不如大规模的漂流那样持久。对武士团伙来说，其通常的进程是在有或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奋力出击，攻而胜之。在津巴人的事例中，桑托斯谈到一个小“克拉尔”的庄主，具有雄心勃勃的人类荣誉感，他“决定

[32] 见本卷第26章。
[33] 见本卷第24章。
[34]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6卷，第4、5、7和9章，以及第5卷第22章，另见D.N.比奇，1980年a，第320页。

为此目的最好是带领一支武装部队出国去破坏、抢劫和吃…"[35]在贾加人的事例中，也许不曾有过一个领导人。在蒂奥科西人的事例中，团伙是由雇佣军组成的。[36]在有些事例中，例如，贾加人与津巴人，团伙在失败后最终解散，在另一些事例中，诸如马内人、蒂奥科西人和因班加拉人，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些酋邦或一个王国。

因为团伙迁移的规模小，即使它所造成的破坏可以是巨大的，但所造成的动荡比大规模迁徙为小，激起的次要迁徙和滚雪球现象也较少，并且比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其他任何过程所花的时间均少。在大多数事例中，拉的因素比推的因素强大，即使在有的事例中，诸如科拉纳人和戈纳夸人向奥兰治河和卡勒登河的流动，[37]推的因素，也即是布尔人有组织迁徙的扩张，至少是同等强大的。这样的流动有时是国家形成的产物，诸如来自马拉维的津巴人和与阿散蒂有关的蒂奥科西人，或是对贸易扩大的一个反应，因移民希望从贸易扩大中获利，如贾加人的情况。由于家乡发生突然干旱或其他灾难等因素而造成的人口过剩也许再度被卷入，例如因班加拉人的情况，但迄今在这些事例中没有一个具有确实的证据。在讨论这类团伙迁徙中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它们是否是一次较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的问题。这样，恩德贝勒人入侵津巴布韦和科卢洛人入侵赞比亚[38]其本身都是团伙迁徙，但它们也形成姆菲卡尼的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迄今尚未完全弄清究竟贾加人和因班加拉人团伙是否是独立的，如所有的作者现在认为的那样，抑或它们只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迁徙的一部分。

因班加拉人的事例是一个有教益的例子。在宽果河附近形成一些团伙，可能是由正在扩大的隆达国中的内部变化所产生。他们与奥文本杜人和姆本杜人政体边缘的原居民混合在一起。多年来他们作为葡萄牙人的盟友为所欲为，征服安哥拉并在那里开辟一个国家，然后于1620年在宽果河附近葡萄牙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把原先的居民赶走，一直迁徙或漂流远至开赛河。在首批因班加拉人团伙原先居住的地方不曾有过相对的人口过剩，人口流动也没有改变在宽扎河和开赛河之间地区的人与土地的比例。但确是产生了一个国家，称为卡桑杰王国，它成为通往罗安达的路途中处理从非洲内陆来的奴隶的第一个转口货栈。所以，因班加拉人的事例只能称做一次从社会政治结构和贸易上重新组织空间，仅此而已。[39]

精英迁徙

精英迁徙是有关创建国家的口头传说中最爱谈论的题目。第一位国王是外国人，经常是一个猎人；他来自别的地方，独自一人或与几个同伴一起来；其所涉及的人口流动并不具重要性，而其社会-文化后果却是惊人的。例如在马拉维，马拉维国的建立归功于菲里

[35] M.D.D. 纽伊特(Newitt)，1982年，第156页。
[36] 见本卷第12和14章。
[37] 见本卷第23章。
[38] 参看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6卷，第5章。
[39] J.C. 米勒，1976年；J. 范西纳，1966年a。

氏族，据说他们的祖先是远从沙巴的卢巴国来的。在北方，一系列有亲族关系的精英，恩古卢贝人，在那里建立了王国和一些酋邦。[40]

这些故事中有些也许确是虚构的，只不过表明老一套的观念，说一位国王必须是外国人，因为国王的身分是与百姓有别的，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他出身之处必须既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有威望的地方，又是离开他们自己的文明最遥远的地方。但有些传说则是颇有根据的。库巴人的故事讲述了一名逃离本国名叫希阿姆·阿·姆布尔·阿·恩贡的布匈人，如何从西方过来，并在一些敌对的酋邦中组成了一个王国，这至少反映了西方对库巴人的影响。它表明了从西方来的语言影响进入了库巴地区，然后又从宫廷向外辐射，这支持了文化统治的概念。[41]然而，这样的影响未必会因一个人的移居而获得，当然也不会从一个 **62** 返回家乡的流放者那里得到。

在对人口流动的研究中，这种很少人甚至一个人的精英流动是不重要的。但是为研究社会-文化结构的形成，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它们能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它们并不改变空间内人与资源的比例，但它们根据一个新颖的等级制度对资源作了新的分配，重组由居民所占有的空间。在第 2 章中对这些情节作了广泛的讨论。

为人口流动提供文献证明

为非洲的人口流动提供文献证明的主要来源是口头的、语言的、考古和文字方面的。但用于此目的时则都呈现困难。过去有时利用不当，曾造成虚假的迁徙。因此，在概述 1500 至 1800 年间主要人口流动之前，先谈论一下文献资料。

口头文学不能记录下长期的扩张，因为日常生活极少受其干扰，而流动又如此缓慢，以致难以令人注意。所以，如果一个传说声称整个人口经过一个被描述为扩张的过程而从某一地过来，这是不足信的。没有一个口头传说能包含一次大规模迁徙，因为事件的规模太大。所以，传说所谈论的是大规模迁徙的插曲，并倾向于将它们同团伙迁徙混淆起来。后者限于局部，但同样是壮观的，并有详细的记载。一个移民社群的扩张经常只有部分被记载下来，因为例如，定居点 A 只知道它是从定居点 B 建立的，而定居点 B 只知道它是从定居点 C 建立的等等。精英流动能记载得很完整，例如，关于芒贝图人统治家族的流动在他们的王国建立之前就已讲述了近两个世纪。[42]

但传说是意识形态，它们反映宇宙哲学。如果研究者不把这点考虑进去，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宇宙论把一切起源都定在一个地点，那末它显然要求各种迁徙都是从那个地点迁移到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地区。如果它包括一个天堂，那么它必须记录下离开这个天堂的流动。例如，库巴人声称他们来自下游，发源于海洋；芳人和科莫人则声称他们的发源点与他们所知道的河流的最上游或最下游之点有关系。而且，所有这些民族都把他们的

[40] 见本卷第 21 章。
[41] J. 范西纳，1978 年，第 59-65 页和 187 页。
[42] C. 凯姆(Keim)，1979 年；伯特兰上校(Col. Bertrand)。

发源地说成是在河流的上游或下游，因此，一切流动只能以这种基本方位来讲述。关于他
63 们的发源地的传说，除了那些论述整个集团或精英的最后流动，并涉及已知和公认的附近地点者外，作为历史都是虚假的。[43]

思想意识也要对诸如外国的猎人成为国王等有关起源的主题负责，此种主题从尼日尔河下游的伊加拉人到南部萨凡纳诸王国和那些大湖区域的王国，一直到坦桑尼亚的桑巴王国或介于坦噶尼喀湖和鲁夸湖之间的菲帕国都可找到。这是老一套，就像尼罗河至大西洋之间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传说，外国骑士杀死蛇解救人民，其实就是圣乔治传奇的变体。不应硬把它当做是一次精英流动，而应看做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44]然而，因为由一个外国人或一个小集团来建立一个国家是可能的，因此应以其他方法来逐一检验这些传说。当然对这些陈述的精确象征性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必须予以研究。例如，我们拒绝接受关于卢旺达的国王们是从天而降这个概念，但是从语言线索的基础上把他们与恩科勒人的王子们联系起来是可以的。同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关于布隆迪的第一位国王是外国人出身的概念，即是说粗野的恩塔尔是从旷野中来的。也许恩塔尔是外国人，但传说不能帮助我们去决定他究竟是否是外国人。[45]

在解释传说时经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把局部当做全局。关于坎巴人、梅鲁人和肯尼亚的吉古尤人起源的传说，可能其中都有些真实成分。但是，其中似乎都把一小部分人的故事上升为全部人的故事。[46]这种情况在芒贝图人起源问题上竟然达到如此程度，他们的王国约于1800年建立后，其创建人制订并强行实施一个新的家谱，王国的名称采用的也许就是这个人的一个祖先的名字。

总的来说，在传说中强调起源，甚至对氏族、世系、村庄或家族的历史也大量地采用固定的说法，使之颇易于辨认口头传说的可疑部分，并确定传说是否能够对这种问题提供文献证明以及可提供证明的程度。

语言学的利用是很普遍的，但这只能更加困难，因为历史上的解释经常是可选择的。一般规则是当说两种语言的人混合在一起时，居多数的人最终将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少数
64 人。所以大规模的扩张或大规模迁徙导致扩张或迁徙者的语言传播。与此相反，当涉及移民社群或团伙迁徙，人数少的新来者与人数较多的土著人接触时，那末新来者的语言就消失。大多数显而易见的例外并非是例外。在移民社群中，新来者密集的居住区因与他们原先的家乡接触而保存了他们的语言，甚至讲两种语言也是很普遍的。团伙移民维持一个关闭的社区也能保存他们的语言，如蒂奥科西人或塞拉利昂的门德人的情况。与此相反，因班加拉人的原始核心则失去了自己的语言。

但确有真正的例外。在这些事例中，少数人的语言因有其特殊声望，甚至能取代多数

---

[43] J. 范西纳，1978年，第34-40页；C. 钱伯林，1977年，第26-34页。注意静水与芳人沿流动水定向之间的关系。

[44] J.S. 波士顿(Boston)，1969年；S. 费尔曼(Feierman)，1974年，第70-90页；J.R. 威利斯(Willis)，1981年，第10-44页；T.O. 里费(Reefe)，1981年，第23-40页；E. 姆沃罗哈(Mworoha)，1977年，第96-105页。

[45] J.P. 克雷蒂安(Chrétien)，1981年a。

[46] B.A. 奥戈特(Ogot)，1976年b，第106-261页；G. 默留基(Muriuki)，1974年；J.A. 法迪曼(Fadiman)，1973年；K. 杰克逊(Jackson)，1978年。

人的语言。例如，恩德贝勒人和科卢洛人于征服后即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生存下来。他们的声望较少地出自征服本身，而更多地来自此后不久他们的语言迅即形成了书面文字并在学校中传授。否则恩德贝勒和科卢洛两种语言都会被多数人的语言——绍纳语和卢伊语——所吸收，就像英国宫廷中的法语在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终于彻底地让位于英语。

语言学证据的第二项基本规则是：在有接触的情况中，被废除的语言总留有痕迹。这种痕迹在外来词的形式、表达方式(按相应外国词语直译而得的仿造词语)、句法的选择、形态学和专名学(人名与地名)方面，总能予以研究，对接触的具体特点提供文献依据。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科伊人和桑人对东南部非洲的班图语言的影响；被称为博班吉语的移民社群语言的地位基本上是一种北方语言，具有很重的刚果语的影响(语言区 H)；以及在斯瓦希里语中的外来成分。[47]

人们甚至能对人口流动的各种不同的过程加以区别。移民社群最容易被察觉，因为长期多种语言的大量影响，有时还创造了混合语。南非荷兰语即是一种混合语，因为在其形态上，甚至句法上已有大量的变化，这可由一系列源出于马来语，葡萄牙语、班图语和科伊语或桑语的词来证实。博班吉语相当于有密切关系的各种班图语之间的一种混合语，带有典型简化了的语法和多种来源的词汇。扩张的特点是外来词很少，除非所包含的各种人口的数目很均等。在主要的地名和一些外来词中可找到被吸收语言的迹象。此情况可以下述事实将其与大规模迁徙明确地区分开，即语言所分布的区域大于直接受影响的地区是与假定的遗传联系一致的。例如，反对芳人及其有关的邻人曾有大规模迁徙的一个论点是说他们的语言区(A70)很符合 A 语言区的其他各组。同时，有证据说明有些干扰源出于 A70 区 的语言将A80区的语言分裂成两个不等的区这一事实。大规模迁徙，如奥罗莫人，将他们的语言强加于看起来分布很不规则的区域中，但经常仍处于一个语言区中，或处于有些外来语的区域中。该语言区与遗传关系不很符合。由于滚雪球的影响可以发现相当多外来词。在混合语言中往往包含两种以上的语言。这一情况使我们可以说明下面一点，比如兰吉人流动的事例，他们的语言是卢奥语，带有卡拉莫语的影响，可能不是由于大规模迁徙造成的，因为该语言的组成只有两个来源。[48]它基本上是卢奥语，这一事实也表明卢奥人占多数，这点在口头传说中没有指明。形成紧密集团的团伙迁徙在其最后前进时，也许将他们的语言留在后面，或在途中在几种语言中留下痕迹。如果人数少，而所涉及的语言关系密切，则不会遗留明显的痕迹，贾加人和津巴人即属此种情况，与马内人、因班加拉人和其他民族的情况相反。

65

但主要的困难是，除非运用“词与物”(Worter und Sache)的方法对外来词进行广泛的研究，否则很容易将它们归因于其他的原因，诸如贸易联系，一种官方的国家语言，一个统治家族(如库巴人的事例)，或是一种有威望的宗教语言。在非洲很少从事详情的研究，尽管人们所承认的艰巨的研究结果可能具有启示性。在这个领域中亟需组织大规模的研

[47] R. 安蒂拉(Antila)，1972 年；T. 拜农(Bynon)，1977 年；W.P. 莱曼(Lehmann)，1962 年；A. 梅耶(Meillet)，1925 年。

[48] J. 托什(Tosh)，1978 年，第 17-34 页。

究。

对于假设中的扩张或迁徙，考古学一直是提供证据的主要来源。在不同的地方寻找到相似或一致的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物品)或相一致的风俗(如埋葬在瓮中)，经常被解释为迁徙或其他人口流动的标志。其理论依据是这些文物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装饰和制造的模式看来不像是独立发明的，肯定是传流而来。在诸如埋葬和陶器等问题上认为传流是由迁徙所致。然而，在考古学的理论上，已从迁徙论退出，[49]且承认独立发明要比所想象的发生得更多，并承认这些物品还可以其他许多方法传流。

然而，在许多事例中看来已涉及到人口流动。例如，假定在一系列的遗址中陶器的式样突然中断，并引进了新的统一的式样，在此情况下就难于避免这一推论。关于在1000年前后从东南部非洲到津巴布韦的一次扩张或迁徙的假设即是基于这样的证据之上。这个假设中的流动称为"库塔马"(Kutama)，在考古学上已尽可能地提供了文献证明。[50]但可以想象，虽然没有充分根据，陶器的新式样就像时新款式那样不胫而走。

66 遗憾的是，还有许多更无把握的事例。当一代接一代的陶器分成各种式样时，其中有许多是过渡型的，不仅式样的数目不清楚，而且认为是由入境的移民带来新式样的推论也是没有根据的。显然这是分析的产物，而非基于资料本身。这种错误在津巴布韦遗址和其他地方都曾出现过。

有些作者仍然用人种论的分布作为迁徙的根据。这一方法曾一度时髦过，但现在引起全面怀疑。从芳人存在石弓就争辩说他们必定起源于乌班吉，因为那里其他居民也使用石弓，并说这是迁徙引起的，这种争辩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寻找帽子、冶炼炉或军帽盔的相似点来论证喀麦隆的贝蒂人源出于北方，也是没有根据的。[51]这种东西没有人口流动也能扩散，相似点可以是偶然性的，在许多事例中很可能是独立发明的。人种论上的相似点如没有语言上的论证，即使显示出传流也是无用的，由人口流动而造成的传流有待证明。

把确凿的资料整理成全面的假设也能导致错误。最有名的一个事例就是所谓的芳人迁徙。芳人、布卢人和恩图穆人都被认为是来自北方，他们一起横渡萨纳加河，布卢人也可能是单独渡河，他们为了躲避攻击者进入了对他们来说完全新的环境：雨林带。[52]但这是各种传说的综合，并不一致，而且大部分是宇宙论的表达方式。除了科莫埃河、恩坦河和伊温多河的源头外，没有发现芳人其他早期家乡的证据。他们约在1840年后迁移，不是作为大规模迁徙，而是一次迅速的扩张。[53]而且这次流动与假设中的布卢人、贝蒂人和恩图穆人的流动无关。

最困难的一个事例是贾加人的迁徙，这是一次团伙迁徙，最初于1591年根据一个葡萄牙人的陈述报道的，此人在这项迁徙事件之后到达，于1583年离去。这个事件发生在

[49] W.Y.亚当斯(Adams)等人，1978年。
[50] T.N.赫夫曼(Huffman)，1978年。
[51] P.拉比尔特-托尔拉(Laburthe-Tolra)，1981年，第61-65页。
[52] P.亚历山大，1965年，是企图作全面概述的最后一位作者。另见H.恩戈阿(Ngoa)，1981年。
[53] C.钱伯林，1978年。

1568年。不同的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辩论。有些人现在确信从来没有过贾加人。最极端的意见认为这次迁徙是葡萄牙人捏造的，目的是为了干涉刚果王国的王位继承纠纷。[54]其他作者则不予同意，并坚持认为肯定有一些移民于1568年进入刚果，即使大部分贾加人是造反的刚果农民。[55]实情我们也许永远不得而知。

1500-1800年主要的人口流动

67

在这个时期内，非洲大陆只有一个部分经历了较大的人口再分配和随之而来的新社会和新文化的创立。这就是非洲之角地区，位于阿贝或上青尼罗河之南，包括现在的索马里和肯尼亚北部大部分地区，以及白尼罗河之东，尼安扎湖之北和索巴特河之南的地方。这一地区明显地涉及到好几次流动。最为壮观的是奥罗莫人于1535年前后进入埃塞俄比亚。其他的奥罗莫人集团向南迁徙或扩张远至塔纳河，甚至到达沿海城市的腹地。1500年之后，索马里人的扩张流动大规模发生。由于缺乏研究，情况鲜为人知，部分原因是由艾哈迈德·格兰领导的反对埃塞俄比亚的穆斯林酋邦的巨大斗争变幻莫测，从而使人口流动黯然失色。及至1700年，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已在奥罗莫人控制之下，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影响在西南部已消失，索马里人和奥罗莫人在通往塔纳河的途中互争好地，较少的稳定人口被赶出欣格韦亚，即索马里-肯尼亚近海边境正北面的一个地区。这些集团，即未来的米吉-肯达各族人民，在“卡亚”（Kaya）定居下来，这是位于肯尼亚主要港口城市后面防卫坚固的一些大的住地。[56]。

再向西，人口流动开始早得多，也许在1000年前后，其时被称为“卢奥人迁徙”的流动是沿白尼罗河开始的。在尼罗河之东没有关于更早期的可靠资料。然而，这点是清楚的，即它包括了为数众多的集团，大多是所谓的卡拉莫琼人集团和在他们东面的图尔卡纳人，以及南部尼洛特人，诸如南迪人以及马赛人。所有这些人除卢奥人集团之外，都像奥罗莫人和索马里人那样主要是游牧民族。他们全都企图开拓“空白”地区，即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比先前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更加深入。[57] 在很大程度上环境决定了竞争场地。卢奥人集团需要灌溉良好的地区，卡拉莫琼人比南部尼洛特人或马赛人需要降雨量更多的地区，而后者又比放牧骆驼者——索马里人和一些南部奥罗莫人集团需要更湿润的地区。奥罗莫人在他们的家乡是养牛的，但却表现出有可能获得一项新技术（此处指骆驼），为此他们占领了新的地区。但这是个例外。大体上，每个集团开发特定环境中的资源有其自己的战略，在其防卫上有自己的组织（通常以年龄划分级别），并竭尽全力争取占领最大限度的土地。然而，少数几个事例表明，在其后的扩张期间，在用相似的方法开发环境的各族人民之间发生了武装斗争。这种情况发生在18世纪，当时肯尼亚卢奥人从其邻族抢来土地，还有在马赛人的国家中，不同的马赛集团于19世纪时开始为争夺土地而彼此争斗。显然，

68

[54] F. 伯丁克（Bontinck），1980年；J.C. 米勒，1973年和1978年。
[55] J.K. 桑顿（Thornton），1978年；A. 威尔逊（Wilson），1979年。
[56] 见本卷第24和25章；另见T.T. 斯皮尔，1978年。
[57] 见本卷第26和27章。

这里涉及到人口压力的问题。

这些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对边缘土地进行拓殖的史话，至少到18世纪为止如此。靠近尼罗河的最湿润的地带最先被同时饲养牲口的农民所占据，之后他们为保卫土地而反对一切外来者。后到的集团寻求扩大其场地，当他们的人数增加时往往反对竞争。整个流动可与非洲大陆上其他地方的形势相比，相形之下证明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是多么稳定。所有其他主要区域都曾被采用适宜于这片土地和当时其人口水平的技术的人口所占领和居住。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人们已制服了空间：这里斗争仍在继续。

有人曾提到在这些人口流动中干旱起了主要作用。[58]可以想象，这是更加干燥的环境伴之以假设中的从1450年到1750年的“小冰川期”的产物，也是指西部萨赫勒的干旱环境。在那里，桑海王国的崩溃和由摩洛哥人徒有虚名的取代，[59]导致了图阿雷格人在尼日尔河湾之南相当大的扩张，甚至导致图阿雷格-富尔贝人的冲突。但这些流动与东北部非洲的流动相比则是很局部的。即使摩尔人的前进，或退到南方的戈比尔-豪萨人从靠近阿伊尔地带的撤退，虽然有可能是环境干旱的后果，但这仍然是一次文化和民族边界线的有条不紊的流动和与之一道发生的气候边界线转移的主要证据。空间仍在控制之下。由巴努希拉尔、巴努苏莱姆和其他在苏丹和乍得的阿拉伯人引发的大流动已结束。土地被拓殖，甚至1600年至1750年的恶劣条件也没有中断大规模移民拓居的整个模式。所以从他们本身来看，干旱未必能说明东北部的全面人口流动，强大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崩溃也不像是其唯一原因。我们必须从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例如，在奥罗莫人的心脏地带，也可能在尼洛特人一边的埃塞俄比亚南部高地)和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乌干达北部与肯尼亚北部，以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两国干燥的东非大裂谷)之间的根本压力来考虑问题。及至1700年所有这些地带都被新的集团所占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允许有较高密度的人口。

在别处这种性质的人口流动发生的规模都较小。在非洲最南部，布尔人有组织的迁移将原居住在卡罗草原上的牧民赶走或杀掉，并殖民于这个草原。与此同时在纳米比亚，赫雷罗人和纳米布人在有损于原先的桑人和达马人的情况下逐步扩张。卡拉哈里的边缘就像乌干达北部和肯尼亚北部的干燥地区那样已为移民居住。然而在东南部，一个主要的不平衡区域建立起来。在东南部非洲，人口对其资源基础而言为数太多。也许最先的征兆是通加人从北方流入津巴布韦东南部、在津巴布韦本土上的抢劫者团伙迁徙，以及来自北方较好地区的移民结束了对津巴布韦南部的“填充”。[60]下一个大动荡是1800年之后在那里开始的。

69

大规模但缓慢的漂流是人口密度适应于土地的一种标志，这种漂流在中非雨林带和现今中非共和国的萨凡纳地区同时发生。在靠近赤道的人口较稠密的中心之南的一些芒戈族集团的漂流曾被提到过。外来的移民导致下开赛以北的一些强大的酋邦和库巴王国的发展。再往东，在一些萨凡纳地区人口密度也低，一些讲芒戈语的人在那里定居。在扎伊尔

[58] 见本卷第26章。
[59] 见本卷第11和16章。
[60] 见本卷第23章。

河和乌班吉河之间逐步建立了一些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但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像恩格班迪人这样一个民族从乌班吉河谷向南漂流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到了18世纪有人口相对过剩的迹象，1750年后一个新的民族赞德人诞生了。他们以迅速漂流进行扩张，在尼罗河之西创建了一代代的酋邦。在中非共和国和喀麦隆的草原上，也发生了农民缓慢漂流的移动，主要是格巴亚人和班达人。但是关于这个地区的文献证明仍嫌不足。[61]在中非雨林的西部由于漂流而经常发生移民，从姆巴姆河与萨纳加河汇合处移人更南面或西面人口密度较低的地方，而东赤道几内亚的一个较小的人口稠密中心则将移民送往北部地区。[62]

由于流动人口不断地适应相对不同的人口密度，可以指出，每个地方都有较小的漂流，甚至在西非或北非也是如此，正如在论述每一区域的各章中明显提到这种流动。但与大规模迁徙相比较，这一进程的秩序是重要的，因为有秩序和缓慢的进程是真正稳定的标志。

在较小的流动中，那些围绕国家的形成或崩溃所发生的流动为数最多。在西非，1520年乔洛夫国的解体也许没有包含在这些流动中，但是马里帝国的缓慢崩溃曾导致从富塔贾隆来的索索(苏苏)人、巴加人和纳卢人的漂流，并导致马内人的团伙迁徙，当他们横冲直撞地穿过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部分地域之后,导致新的酋邦和新的文化在那里出现。曼德人就是其主要结果之一。莫西诸国的发展也许与多贡人向北流动有关，他们在邦贾加拉定居。而再往南，曼德人的军队建立了贡加国。新兴国家阿散蒂导致靠近沃尔特河的阿夸穆人一次小迁移，更重要的是导致由鲍勒人和阿格尼人集团在东南部一次较大的扩张。[63]最终定居在多哥北部的蒂奥科西人的战争团伙，由来自阿散蒂的人组成，也有曼德人，卷人了为一个莫西王国的雇佣军作战。 70

在中非，少数几次这样的流动为人所知。首先是隆达帝国的扩张，然后是宽果河上的雅卡王国的扩张，导致了武装团伙的流动。在隆达南部的几次流动和创建卡曾贝王国的那次流动是最闻名的。但是，在宽果河和开赛河之间靠近南纬5度的一群居民，也许在1800年之前已经开始流动，这是雅卡和隆达两王国劫掠的结果，但也可能是因为较有规律的降雨和更好的地形吸引了人们。[64]在马拉维，武装团伙引人注目地兴起是作为在1600年前后创建马拉维和隆达两王国的副产品而出现的。[65]来自这个地区的津巴人首先劫掠了莫桑比克北部和基尔瓦的腹地。据说他们(但他们是同一团伙么?)曾蹂躏北至马林迪和更北面的沿海地带。至少有另一个团伙定居在津巴布韦高地，但后来被消灭。在津巴布韦本土扩张的小规模流动和劫掠不能肯定是与国家的扩张和收缩有联系，除了很少的几个事例，诸如马尼卡人向荒芜的因扬加高地扩张和从昌加米腊国的三次较小的出征。这里其他的小规模流动与在南面较为空旷地方的殖民有着更多的联系。马达加斯加或许是个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些人口流动与王国和酋邦的兴起有关系。马鲁塞拉纳人的流动，受其他集团的吸引，

---

[61] 见本卷第18章。

[62] D. 伯明翰(Birmingham)和P. 马丁(Martin)，1983年；P. 伯纳姆(Burnham)，1975和1980年，第10-39页。

[63] 见本卷第10、11、12、13、14和15章，另见C.H. 佩罗(Perrot)，1981年。

[64] 见本卷第19和20章。

[65] 见本卷第21和22章，另见D.N. 比奇，1980年a。

也有其他集团从他们的路途中逃跑，这一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及至1500年，岛上的人口仍很流动，还未有效地安顿下来，并非所有的土地都已在人类控制之下。到1800年，这些地区大都已组成各式各样的国家。空间已被制服。而与非洲其他部分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就是在制服的过程中国家的形成特别突出。[66]

在大陆上类似的发展局限于中部坦桑尼亚的一些地区、整个南部坦桑尼亚和北部莫桑比克。在这里贝纳人、桑古人、赫赫人、马夸人、隆杜人、尧人的王国和酋邦的兴起以及71 一些尼扬韦齐人政体的进一步巩固，同样提供了稳定的框架。[67]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撒哈拉以南贸易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新的移民社群的创建或加强了较老的移民社群，也导致了其他一些通常是短距离的人口流动。从西到东，以贾汉卡人、乔奥拉人、雅尔塞人、豪萨人、乔奥拉人、博班吉人、维利人、洪加安人、比萨人、尧人和斯瓦希里人的移民社群最为闻名。此外还须加上欧洲人的移民社群，其中法国人在塞内加尔沿海，葡萄牙人在罗安达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代理人兰萨多(lançados)、庞佩洛(pombeiros)和普拉佐(prazo)的人员，以及在开普省的荷兰人在此期间对非洲的影响最大。当贸易路线变得更忙碌，组织得更好和更长时，许多欧洲人和非洲人的移民社群都卷入了奴隶贸易。住在这种主要贸易路线附近的各族人民，有时移近贸易路线居住，有时则逃离它们。伊策基里人向离他们以前的地区不远的海岸扩张，以便处于前往贝宁的海路上。埃菲克人从阿罗丘库附近迁至克罗斯河上的旧卡拉巴尔，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主要港口。[68]杜亚拉人于18世纪为了同样的原因下至武里河。在加蓬，许多人缓慢地漂流到奥戈韦三角洲出口以参与更多的贸易。另一方面，有些人逃离这些地区来到恩古涅河。[69] 宽果河和开赛河之间的居民似乎已迁离贸易路线和附近的抢劫者，而在赞比亚的本巴人则迁到靠近19世纪发展的贸易路线。许多津巴布韦人看来已迁离葡萄牙定期集市在南方殖民时期所制造的动荡。但在任何特定时间内的所有这些活动确都是小规模的。它们也只不过代表为贸易或社会-政治控制而对新的大规模空间组织的强有力的调整。贸易路线上或附近地区以及北部非洲的新政治中心也发生了类似的流动。

结　论

非洲的大部分空间在1500年之前很久已被制服，到那时已没有完全未被利用的地区。在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居住密度很低，扩张的过程足以解决对土地的压力问题。主要的例外是从非洲之角到赞比西河的东部非洲，不包括大湖区域，但包括马达加斯加在内。这个地区的北半部曾发生过大规模迁徙，即由扩张中的牧民改换以往的居住模式而进行的很活72 跃的漂流。东南半部和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农业较为突出，社会改组和随之出现的一个王国和酋邦的网络，为居住区更大的稳定和更集约地利用土地提供了手段。

[66] 见本卷第28章。
[67] 见本卷第27章。
[68] 见本卷第15章。
[69] 见本卷第18章。

干旱和灾难不足以解释这个地区北部新发生的大规模迁徙和活跃的扩张，因为在西非和北非的撒哈拉沙漠边缘也遭受干旱，却未发生迁徙或迅速扩张。那里的反应是较缓慢的漂流。

在这几个世纪中，非洲人口不可能有显著的增加，因为很容易受这些机制的控制。只有在零星的地方，我们看到在土地利用方面出现相当集约的技术，因此也就允许有较稠密的人口。下卡萨芒斯、伊格博乡村和喀麦隆草原及其“引种”的植物，在大湖区域沿西部裂谷的山脉及其灌溉系统和/或香蕉的集约种植，小的地块如库库亚高原及其新颖的施肥形式，或是上赞比西河谷利用河水泛滥，这一切在西部和中部非洲仍属例外。在北部非洲，包括埃及在内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绿洲的集约农业到这个时期已有几千年之久。在此我们无法谈论为什么人口增长不多的原因，但我们至少必须指明从非洲大陆移民国外的大流动，特别是作为横渡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果，即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大陆受这一贸易影响的一些地区，西非和中非，与东非相比也颇为稳定，而且奴隶贸易并未引起大规模的动荡(人口大量地迁移至新地点)，虽然小的流动因此而发生。

在东非以外，集团流动大多受国家的兴亡和贸易网络的延伸所影响。尽管在西非萨赫勒的一些较大国家崩溃了，但1800年由国家控制的地区在整个大陆所占的比例高于1500年，并且围绕每个新兴国家的边缘都有一些动荡。

及至1500年，长途贸易路线和移民社群在西非和北非存在的年代已久，甚至在中非也存在一些。在17和18世纪中，当各海岸之间的路线沟通时，这种路线网络随之发展。由于经营贸易的需要，移民社群到处发展。这种贸易网络扩大了资源开发的规模，正如国家比酋邦或村庄联盟能组织更大的领土。长途路线使非洲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并把非洲大陆拉入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等级森严的空间组织。自1500年以后，这越来越意味着一个由欧洲占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

必须把这三个世纪看做是一个更长时期演变的一部分。与前500年相比，人口较前大为稳定，社区对空间的控制更为明显。然而在19世纪，一次重大的动荡仍将震撼东部和南部非洲，当时南部非洲的人口增长因缺少技术革命而导致姆菲卡尼，否则是可以防止的。但是大陆的其他部分未经历这种不稳定，很明显，非洲大部分地区在1500年之前很久已取得对空间的控制。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和现有的技术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局面，其中，错综复杂的文化上的精心创造和诸如标志社会复杂性的城市化盛及一时。 73

但是，正如本章也展示的，我们对人口的流动仍知之甚少。历史人口学和技术史在非洲刚刚起步。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我们特别需要以更精炼的分析去取代“迁徙”的空洞概念。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将一个基本的主题载入非洲历史。这是一个进展缓慢的主题：由其居民接连不断地移殖开拓非洲。

(计德容　译)

4 世界历史中的非洲：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与大西洋经济秩序的出现

J.E. 英尼科里

引　言

74

早在古代，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奴隶也许就已经沿地中海地区被三三两两地贩卖，而成批的奴隶从黑非洲向外部世界的输出则大约始于9世纪。① 这种奴隶贸易主要在沿地中海地区(包括欧洲南部)、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进行。虽然这类从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持续了几个世纪，到20世纪早期，每年输出的人数都不太多。不过，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的航行之后，欧洲人开始了对新大陆的探险活动，在原先的贸易之上又增加了从非洲贩卖奴隶的贸易活动。因年输出量增加，规模更加扩大。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从16世纪持续到19世纪中叶的穿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两种贸易同时进行了差不多四个世纪，将数百万奴隶贩卖出非洲。奴隶贸易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从未得到正确的阐述。

必须指出，奴隶贸易并不局限于非洲。事实上，自罗马帝国以来的动产奴隶制度和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活动早已为世人所知。只要查阅一下历史记录就可以很容易看出，世界任何种族都曾在某一时期将自己的成员卖到远方作奴隶。有一则故事说，在6世纪晚期，说服英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团与在罗马市场上贩卖英国儿童的事件有关，这些儿童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部落经常性内争的牺牲品，在争斗中双方均将抓获的人作为奴隶出售。② 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数百年来，东欧和中欧的民族集团(尤其是斯拉夫人，奴隶〔Slave〕

75

一词即从这一民族名称衍生而来)曾向中东和北非提供过奴隶。

然而，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从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尤其是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很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单纯从贸易规模看，其涉及的世界地理范围和贸易的经济情况——在提供奴隶的规模、使用奴隶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以及从奴隶劳动所得产品为中心的贸易方面——所有这些均使非洲的奴隶贸易有别于其他的奴隶贸易。

确定从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是困难的，它同时又与理解并解释当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历史渊源密切联系在一起。围绕世界经济秩序问题的争论源自多种因素。第一，不同范式的严酷苛刻制约了学者们的思想方法；第二，政治影响渗入了学术见

---

① R.A. 奥斯丁(Austen)，1979年；R. 莫尼(Mauny)，1971年。

② 故事的内容是，一位罗马修士看到一些英国儿童正在罗马市场上被贩卖，他为英国人不是基督徒而难过。这位修士就是后来的格列高利一世教皇，他于公元596年命令一支修士团到英国规劝英国人信奉基督教。见T. 凯尔恩斯(Cairns)，1971年，第50页。

解；第三，很多学者掌握的信息并不确切。一些知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看法可以引以为证。

诺贝尔奖获得者，黑人经济学家 W. 阿瑟·刘易斯在分析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根源时认为："第三世界对 19 世纪前半期发生的工业革命所做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③已故的比尔·沃伦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发展对第三世界经济的影响时宣称：

> 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欠发达的变化过程产生于现时代，尤其是从西方影响其他各洲大陆以来这一时期。证据支持如下相反的论点：发展的进程至少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就已发生，与早期任何阶段相比都大大加快了速度；而这正是西方影响的直接结果……④

此外，最近从政治角度著书的发展经济学家 P.T. 鲍尔认为：

> 接受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贫穷负有责任这一反复强调的断言反映并增强了西方的犯罪感。这会使意识形态更富侵略性的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外交上削弱西方国家。而西方在资源贫乏和没有实际力量的国家面前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地位。然而，这一断言可以被证明是缺乏根据的。它之所以容易被接受，是因为西方国家公众很少了解关于第三世界的第一手知识，而且有一种普遍的负罪感。西方从未过得这样好，也从未对此感到这样不安。⑤

76

虽然多数人的立场并非如此，但这一问题在文学中很容易找到支持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有上述三个因素的痕迹。不过，所引证的三种观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非洲奴隶贸易和新大陆奴隶制度的明显忽视。这似乎是在对当代世界经济秩序历史根源的现存研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可能做出的解释是，历史学家们未曾同时从全球的角度来表明非洲奴隶贸易的作用。

本章试图对 16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秩序演变情况下非洲奴隶贸易所产生的后果做一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当今时代国际经济问题。为此目的，经济秩序可以被界定为几个国家间一种单纯的经济关系体系，它同时通过贸易网络机制向这些国家指派任务并发放酬劳。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关系体系的发展要求体系内每个成员国或次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逐渐形成，从而使通过市场力量完全维持该体系的运作成为可能。一旦如此发展起来，任何体系的重要变化只能由体系内偶尔可能发生的一国或多国政权变化等蓄意的政治行动引起。

本章认为，将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的辽阔地域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秩序于 19 世纪在大西洋地区出现。这一经济秩序所包括的地区有西欧、北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秩序的结构方式是：西欧和之后的北美洲是其核心地区，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形成边缘地区，而且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大西洋经济秩序于19和20世纪扩

---

③ W.A. 刘易斯(Lewis)，1978 年，第 6 页。
④ R. 沃伦(Warren)，1980 年，第 113 页。
⑤ P.T. 鲍尔(Bauer)，1981 年，第 6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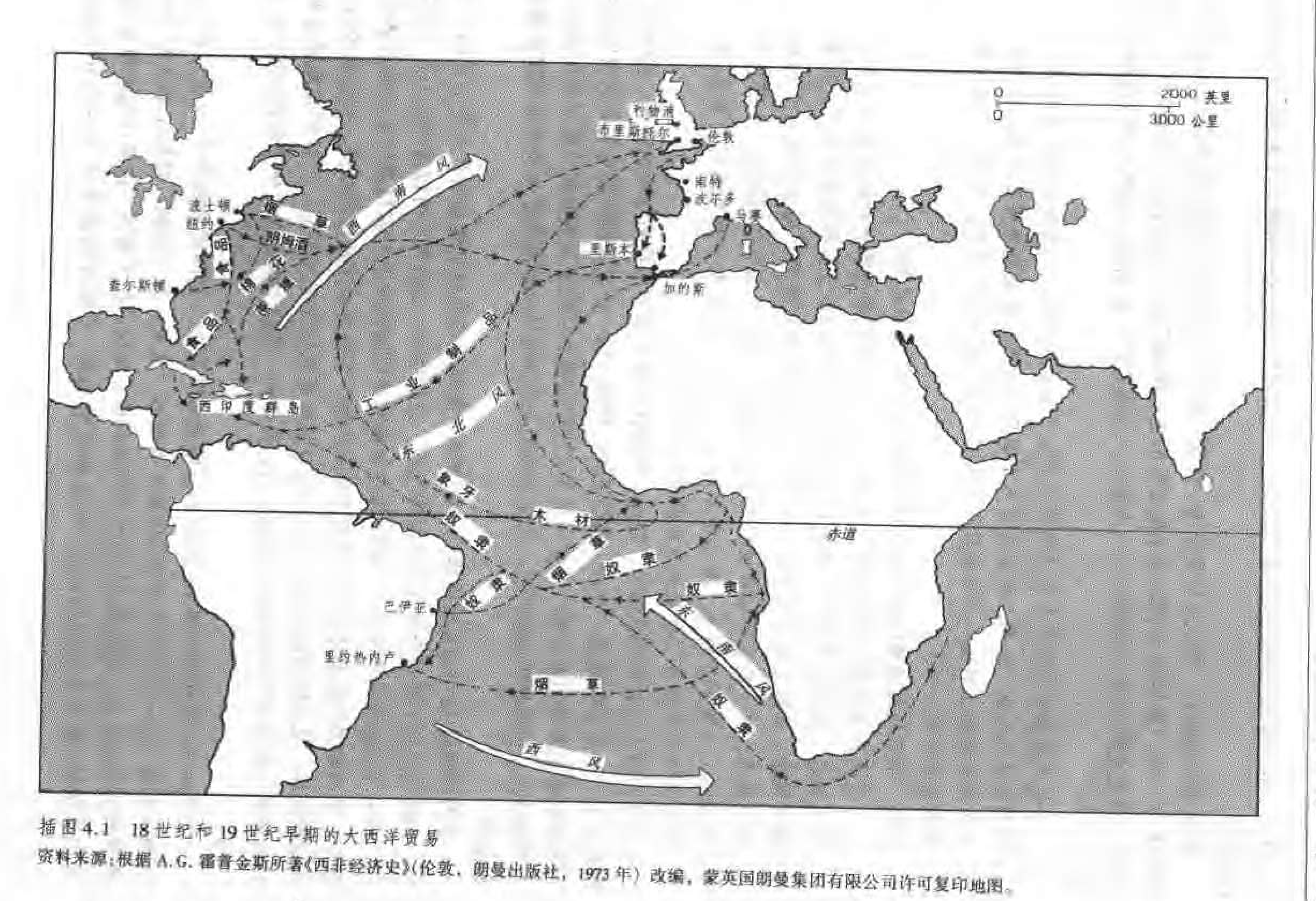


插图4.1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大西洋贸易

资料来源：根据A.G.霍普金斯所著《西非经济史》(伦敦，朗曼出版社，1973年) 改编，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许可复印地图。

大，将亚洲和欧洲其余地区吸收进来，产生了20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迄今为止，这一秩序多多少少经历了一些小变化。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自那时以来，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地位一直持续未变，甚至在更大的经济秩序中亦是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仅使核心地区增加了一两个区域，而边缘地区却大为增加。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非洲奴隶贸易是19世纪大西洋经济秩序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为展开这一主题，主要是尽力说明非洲奴隶贸易和新大陆奴隶制度在西欧(特别以英国为例)和北美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这两者于19世纪中期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非洲依附性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而且本章涉及的地区广大，因而不可能在较小地区的水平上给予详细的描述，只能集中分析大的问题。 **78**

方 法 论

在对社会的各种研究中，使学者之间交流困难、分歧加深的关键因素是他们的概念结构不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同样的社会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围绕欠发达和依附性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做出解释，就像上面引证的观点部分反映的那样。对于所述讨论中的分歧，关键在于，是否因分析的目的不同对社会变化亦应有所区别。就这一点而言，学者们的实践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概念结构。一种不加区别的观点认为，所有社会变革均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特别对那些赞成依附性和欠发达学术传统的学者来说，社会变革的内容是不同的：社会变革的两重性泾渭分明，一种会带来经济发展，而另一种带来的则是欠发达和依附性。然而两种都是变革，因此均能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

考虑到导致世界经济形成目前状况的历史进程，这种关于社会变革无区别的观点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千百年来任何社会都在发生社会变革。如果所有的社会变革最终均能导致经济的发展，那么，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均应是发达的经济。然而，无论根据“经济发展”一词的任何定义，今天也只有少数国家属于经济发达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如果也想拥有发达的经济，则仍需采取严厉措施，例如像斯大林统治的俄国和中国所采取的措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达到目前的状况所经历的并非是一种发展过程。后来的历史过程成了某些分析家所谓的欠发达和依附性过程，其特征从分析上看与发展过程是有区别的。

要探讨欠发达和依附性的传统问题需要做进一步详细的阐述。社会变革需要不断建立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有些混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会使经济得到发展，但另外一些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产生发展结构的社会变革过程应被看做是发展的过程，而导致最终产生只有通过激烈的政治行动才能消除的发展障碍的结构，这种社会变革则应被认定是欠发达和依附性的过程，因此，通过分析，可以区分三种型式的经济：不发达经济、发达经济和欠发达经济。 **79**

为了理解本章所分析的内容，应当对这三个词进行界定。发达经济应指内部结构和部

门间联系紧密、并以先进技术和能维持自我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后盾的经济。[⑥] 欠发达和依附性经济应指因以前国际关系的特点造成的内部结构使其结构上和部门间脱节的经济，这种国际关系使得在内部发展先进技术以及结构与部门间的紧密联系若非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并造成使经济发展和紧缩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局面。[⑦]

最后，不发达经济是指既不具有发达经济、又没有欠发达经济结构的经济，这种经济仍可自由地根据出现的机遇轻易地沿着两个方向中任何一个方向前进。[⑧]

80 因此，要了解产生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的全球性影响，我们就应当观察这个过程在不同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这样，就有可能确定哪一种结构适合于发达经济或欠发达经济和依附性经济。要做到这一点，欠发达和依附性的传统提供的假设特别有用：在重商主义时代，[⑨] 那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核心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转型的同时，又使成为边缘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延伸。[⑩]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核心国家的发展导致边缘地区产生欠发达和依附性结构。本章即围绕这一假设展开，其目的是运用历史资料来检验这一假设。

非洲奴隶贸易的数量

要对非洲奴隶贸易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做出公正的评价，重要的是应对几个世纪以来奴隶贸易的数量做出理智的、接近真实的评估。在这方面，对奴隶贸易比较重要的环节，即跨越大西洋的贸易，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些进展主要是菲利普·柯廷于 1969 年发表的一些估计数字。[⑪] 自那以后，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估计数的各部分进行了研究，并公布了研究的详细成果。表 4.1 将新近研究成果中的估计数字与柯廷数据的有关部分进行了比较。[⑫]

---

⑥ 这里说的结构性联系是指矿业、资本货物工业和消费品工业之间的联系。部门间的联系是指下述部门：矿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商业。所谓的发达经济，是指工业内部的各部门必须十分发达而且相互联系，经济的各个部门必须高度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自我发展并消除依附性。

⑦ 应将完全依附于外部环境的状况与世界贸易体系中各种经济间的相互依赖区别开来。正如多斯桑托斯写道："当一些国家能够通过自我推动得以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由于其所处的依赖性的地位、仅能受主导国家的扩展影响而随之发展时，在两种或更多的经济之间，或在这些经济与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才会成为一种依附性的关系……" T.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73 年，第 76 页。

⑧ 不应将这种类型的经济与欠发达经济相混淆。R. 沃伦(1980 年，第 169 页)的下述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他说："没有理由放弃欠发达就是不发达这种观点，如果根据相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来衡量的话。" 即使从字面上的意思看，当欠发达这个词表示被阻碍从而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才更有意义。这种状况与不发达或欠发达隐含的自然落后状况是不一样的。

⑨ 1500-1800 年这一时期通常被看做是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西欧各国为在当时不断扩展的世界贸易中利益独占、争夺霸权而斗争。

⑩ 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包括原始共产主义、古代、奴隶和封建的生产方式。还存在另外一些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问题的争论，见 J.G. 泰勒(Taylor)，1979 年。

⑪ P.D. 柯廷，(Curtin)，1969 年。

⑫ J.E. 英尼科里(Inikori)，1976 年；P.D. 柯廷、R. 安斯蒂(Anstey)和 J.E. 英尼科里，1976 年。

表 4.1 1976 年以来对大西洋奴隶贸易数量的估计

作 者	估计的组成部分	估计的奴隶数字	柯廷对该组成部分的估计	差额比例
J.E. 英尼科里	英国从非洲出口的奴隶 1701—1808 年	3，699，572	2，480，000[a]	49.2
C.A. 帕尔默	西班牙的奴隶进口 1521—1595 年	73，000	51，300[b]	42.3
E. 维拉·维拉尔	西班牙的奴隶进口 1595—1640 年	268，664	132，600[c]	102.6
小 L.B. 鲁特	西班牙的奴隶进口 1500—1810 年	1，500，000	925，100[d]	62.1
D. 埃尔蒂斯，1977 年	跨越大西洋的非洲奴隶输出 1821—1843 年	1，485，000	1，104，950[f]	34.4
D. 埃尔蒂斯，1979 年	巴西的奴隶输入 1821—1843 年	829，100	637，000[e]	30
D. 埃尔蒂斯，1981 年	穿越大西洋的奴隶输出 1844—1867 年	634，700	539，384[g]	17.7
R. 斯坦	法国的奴隶输出 1713—1792 年/1793 年	1，140，257	939，100[h]	21.4

a. J.E. 英尼科里，1976 年；P.D. 柯廷，1969 年，表 41，第 142 页。

b. J.E. 英尼科里，1976 年；P.D. 柯廷，1969 年，表 5，第 25 页。

c. P.D. 柯廷，1969 年，表 5，第 25 页。

d. P.D. 柯廷，1969 年，表 77，第 268 页。

e. P.D. 柯廷，1969 年，表 67（第 234 页）和表 80（第 280 页）。

f. P.D. 柯廷，1969 年，表 67（第 234 页）和表 80（第 280 页）。

g. P.D. 柯廷，1969 年，表 67（第 234 页）和表 80（第 2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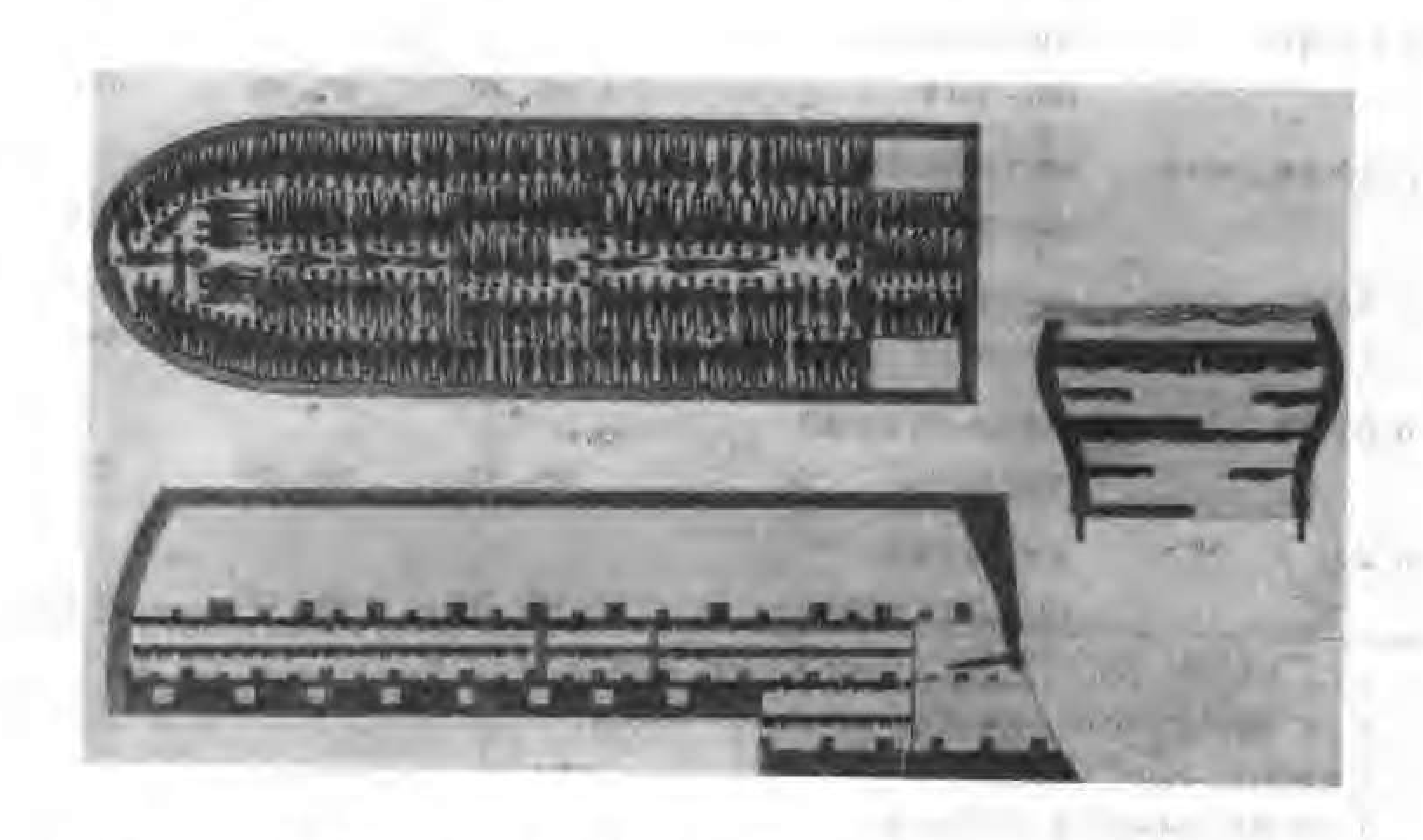
h. P.D. 柯廷，1969 年，表 49，第 170 页。

资料来源：J.E. 英尼科里，1976 年；C.A. 帕尔默（Palmer），1976 年，第 2-28 页；E. 维拉·维拉尔（Vila Vilar），1977 年 b，第 206-209 页；小 L.B. 鲁特（Rout），1976 年；D. 埃尔蒂斯（Eltis），1977 年、1979 年、1981 年；R. 斯坦（Stein），1978 年；P.D. 柯廷，1969 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1976 年以来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柯廷的数字太低了。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很多方面还有待于仔细研究。戴维·埃尔蒂斯对 1821-1824 年巴西奴隶进口所进行的详细研究工作也可以推及到 18、17 和 16 世纪巴西的奴隶进口。英国在 16 和 17 世纪出口的奴隶数量及其他很多有关地区也有待进行认真研究。当研究工作完成后，才有可

82 能得到完全由专家们认真研究而得出的全球性数据。然而，自1976年以后从研究成果中得出的估计数字清楚地描绘出一幅奴隶贸易的图景，可以构成对整个奴隶贸易活动做出合理推论的基础。这些估计数的主要一点是将贸易活动重要的几个世纪全部包括在内。这些数字特别表明，应对柯廷的16和17世纪的估计数字大幅度向上调整修正，[13]对那一时期仍需做更仔细的研究。

1976年以来的研究所显示的进行修正的方式和数量表明，对柯廷的整体数字做提高40%修正，会使估计数更接近于大西洋贸易的真实数量。用这一方法对柯廷的世界奴隶贸易大约1100万人的总数做一修正，总人数为大约1540万人。[14]



图片 4.1 欧洲奴隶船的平面图和横断面图

83 由于资料不全，关于跨越撒哈拉、红海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的现存估计数缺乏依据。但是，关于这部分奴隶贸易有两项估计达到适当的可信程度。这是雷蒙·莫尼[15]和拉尔夫·奥斯丁提出的估计数。[16]据莫尼计算，在1400-1900年期间共为1000万人。另一方面，奥斯

⑬ 见表4.1提供的估计数字。

⑭ 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对最近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令人惊愕的解释。他不是对研究得出的修正方式进行研究并做出统计上的参照，而是从中进行可疑的选择，将他选取的数字与未经修正的柯廷的数字混合(占总数很大比例)，由此得出他所谓的"新的估计数字"。洛夫乔伊声称，这个"新的估计数字"可以确证柯廷原来估计数字的精确性。见P.E. 洛夫乔伊，1982年。且不说洛夫乔伊选择数字的判断错误，他的"估计数字"中最奇特的是他使用柯廷原来的数据来证明柯廷估计数字的精确性。这是一种误导，特别是因为自1976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表明，柯廷的关于1700年前的数字需要大幅度向上调整修正，而这正是洛夫乔伊大量引用的数字。我认为，洛夫乔伊的方法于事无补。如果在必需的研究尚无结论之前需要在各项研究工作之中使用总体数字，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上的参照。

⑮ R. 莫尼，1971年。

⑯ R.A. 奥斯丁，1979年。

丁的统计为1500-1890年期间约685.6万人。后一数字估计跨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为395.6万人，跨越红海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为290万人。一般来说，奥斯丁的估计更可靠一些，因而比莫尼提出的数字更加可取。这样，把两方面的奴隶贸易合在一起，在1500到1890年间，从黑非洲输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共约2200万人。

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时代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转型

当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加勒比地区时，西欧的经济按照规定尚属不发达。赖以生存的农业和个体手工制造业，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很大，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制造业仍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农民业余从事制造业，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产品直接供生产者所消费。社会和政治结构仍处在由超经济的强制实行决定社会产品分配的阶段。

但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约三个世纪里，西欧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构变化。在中世纪，西欧的人口增长及其在地区上的重新布局刺激了地区间和国家间的贸易，使之得到相当大的发展，从而在一些国家内部引发了体制上的重要变化。[17]西欧国家内部或各国之间用于市场交换的生产得到发展，而赖以生存的生产则开始削弱。为了提高利用效率，在土地和劳动力组织方面有了重大发展，特别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的变化更大。与此同时，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些变化也随之而来。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到1492年间的所有 84 这些变化很重要，它为西欧经济适应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出现的大西洋体系所带来的机遇提供了条件。

虽然西欧所有的经济在中世纪后期均经历着变化，但各国之间的差别很大。尤其是由于羊毛贸易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双重效果使英国的发展更为突出。[18]

总之，为了正确地理解16至19世纪发生的变化，关于大西洋体系出现之前几个世纪的西欧发展情况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在整个西欧地区经济活动商业化增加，从而使市场力量的运作得到提高。这说明大西洋体系的影响与该地区所有经济直接或间接相联十分便捷。第二，西欧不同国家在体制变革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利用大西洋体系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提供机遇的进一步差异，说明了16至19世纪期间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分析不断发展的大西洋体系对西欧经济产生的影响时，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1500至1650年和1650至1820年。

在1500至1650年这个时期，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达到可以使市场力量充分保证单一经济体系的运作，而该体系又能向其成员国分工和酬劳的程度。结果，西欧

[17] 有关这些变化的令人兴奋的讨论，见D.C.诺思(North)和R.P.托马斯(Thomas)，1970年和1973年；D.C.诺思，1981年；R.S.洛佩斯(Lopez)，1976年；D.B.格里格(Grigg)，1980年。同时请参阅由R.布伦纳(Brenner)挑起的辩论，1976年；J.P.库珀(Copper)，1978年；M.M.波斯坦(Postan)和J.哈彻(Hatcher)，1978年；P.克罗特(Croot)和D.帕克(Parker)，1978年；H.旺德(Wunder)，1978年；E.勒·R.拉杜里(Ladurie)，1978年；G.博伊斯(Bois)，1978年；R.布伦纳，1982年。

[18] J.E.英尼科里，1984年。

国家便利用其军事优势在该地区攫取另一些经济体和社会的资源。由于这一原因，西欧前哥伦布时期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延续相同的模式，即国际商品贸易主要在欧洲内部进行，而西欧从大西洋其他地区获取的资源，或是支付甚少，或是白取。

在这一时期，从大西洋其他地区输往西欧的最重要的资源是白银和黄金。白银和黄金主要来自西班牙人占领的美洲地区(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由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兴起，来自西非的黄金贸易已经衰败。从新大陆输入的白银和黄金又经西班牙输往整个西欧地区。表4.2所示为西班牙从1503至1650年间进口的数量。

表4.2 1503-1650年西班牙从美洲输入的金银数量

时 期	银(盎司)	金(盎司)
1503—1510年		175,133
1511—1520年		322,859
1521—1530年	5,256	172,453
1531—1540年	3,040,373	510,268
1541—1550年	6,263,639	880,323
1551—1560年	10,692,168	1,503,361
1561—1570年	33,258,031	406,740
1571—1580年	39,456,766	332,595
1581—1590年	74,181,368	426,881
1591—1600年	95,507,751	686,107
1601—1610年	78,082,734	414,959
1611—1620年	77,328,761	312,383
1621—1630年	75,673,829	137,214
1631—1640年	49,268,753	43,739
1641—1650年	37,264,124	54,639

资料来源：C.M.西波拉(Cipolla)，1976年，第210页，依据E.J.汉密尔顿(Hamilton)，1934年，第42页。

注：走私的数额很大，官方数字仅表明全部进口数量。

85 当进口的金银流通起来，成为交易的中介物之后，经济活动的商业化过程在全西欧地区加快了速度。流通货币数量迅速增加和人口增长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欧洲历史上所熟知的16世纪价格革命。这一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对西欧早期，尤其是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⑲

美洲金银的进口同样刺激了欧洲国际贸易的增长。法律规定，只有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国家的船只被允许出人于西属美洲装运货物。在整个欧洲，贸易仅限于两个港口——加的

⑲ E.J.汉米尔顿(Hamiltow)，1929年；J.D.古尔德(Gould)，1964年。

斯和塞维利亚进行。另外，还禁止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生产自己所需的工业制品。可是，殖民地丰富的矿产鼓励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依靠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各种商品，以满足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人的需要。甚至连加的斯和塞维利亚与西属美洲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通过各种秘密协议所控制。⑳



图片 4.2 1474-1504 年带有斐迪南和伊萨贝拉头像的西班牙货币。这种货币曾广为流通

这样，西班牙成了16世纪西欧进行大规模国际贸易的中心。由荷兰、法国和英国控制的这一贸易为美洲金银流入西欧主要国家打通了渠道，加速了欧洲的转型进程。从西属美洲地区运抵西班牙的金银几个月后便运离西班牙，以致有人说："西班牙养牛，欧洲其他国家喝奶。"㉑ 这种情况从 17 世纪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 **86**

从 1650 到 1820 年，大西洋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形成达到高潮，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开始依赖于大西洋体系。只有通过对西欧 17 世纪发生的总危机历史背景的观察，才能充分肯定大西洋体系对西欧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

与进口美洲金银日益增加和人口增长相联系的西欧 16 世纪经济的发展，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减弱而停滞。进口美洲金银的活动于 16 世纪 90 年代达到高潮，随后开始减少。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减缓了，这是因为欧洲社会调节其人口变化以适应经济机遇水平。 **87** 由于实行近似经济战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使形势趋于恶化，17 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实行这种经济政策，尤其是法国。为了保护国内工业，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高关税壁

⑳ A. 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8 年；J.O. 麦克拉克伦(McLachlan)，1940 年。

㉑ A. 克里斯特洛，1948 年。

垒，使西欧的经济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并导致了一场总危机。西欧各国间的国际贸易陷入崩溃。[22]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停止了，另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逆转过程。最糟糕的是意大利，竟从“欧洲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变为一个典型和落后的农业国”。[23]

17世纪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清楚地表明，要使西欧地区资本主义转型过程得以完成，西欧需要获得比欧洲单独所能提供的更大的经济机遇。就像霍布斯鲍姆教授所指出的那样，“17世纪的危机不能从任何狭义的技术和组织角度用工业革命装备不适这样的理由去解释。”[24]也不能用缺乏资本这样的理由去解释。霍布斯鲍姆说道：“16世纪的意大利人很可能控制着最多的资本积累，但很明显出现了投资失误。他们大搞建筑，将流动资本变成固定资本，而且胡乱地向外放款……”但是，意大利人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其道理的。

> 如果他们把大量资本用于非生产部门，那可能是因为在这一“资本主义部门”的范围内已没有更大余地可不断进行任意规模的投资。(17世纪的荷兰人通过增加家庭财产和收藏艺术品的方法使同样的资本过剩现象得以缓解……)[25]

由此可见，产生危机的理由是西欧当时缺少经济机遇。接下来的问题是，只要西欧的发展事实上依赖其内部的经济机遇，那么该地区充分进行资本主义转型的机会极少或根本没有机会。

从1650到1820年在大西洋地区非欧洲国家中发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和挑战，从而在总体上完全改变了西欧的经济形势，特别是那些更易于利用这些机遇的欧洲国家。在新大陆，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农业种植园的发展。特别是因为巴西在18世纪开始大规模生产黄金，贵金属的生产仍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这一时期新大陆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大规模种植园农业的出现。在北美大陆，主要的生产作物是烟草和棉花，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主要产品则是甘蔗。新经济活动的规模不断发展，要求新大陆接受更多的移民。

88

大量的贸易是通过以下方式组织的，即向非洲和美洲运输货物、从非洲向美洲运输奴隶、从美洲向西欧运输农产品和贵金属。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西欧从美洲合法进口的蔗糖每年至少为151,658吨，在18世纪60年代每年则至少为193,005吨。[26]由于西欧殖民地宗主国限制美洲殖民地进出口贸易，它们控制美洲商品在欧洲的销售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影响欧洲内部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27]这种情况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法国和荷兰。举例说明，英国外贸的官方数额(包括进出口)从1663至1669年每年平均850万英镑，增加到1772至1774年每年平均2840万英镑，而在1797至1798年间则达到5570万英

---

[22] R.戴维斯(Davis)，1969年，第2和第3章。
[23] E.J.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54年，第36页。
[24] 同上，第42页。
[25] 同上，第42-43页。
[26] R.谢里登(Sheridan)，1970年，表1，第22页。
[27] R.戴维斯，1969年，第2章和第3章；R.戴维斯，1967年。

镑。[28]这一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几乎全部是由于大西洋经济体系扩张的结果。法国和荷兰的情况相差无几。英国集中于新大陆产品的再出口在 1772 至 1774 年占其出口总额的 37.1%，而 1787 年法国的该项数据为 33.2%。[29]一位法国经济历史学家所说并非言之无物：

> 18 世纪真正可以被称做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大西洋时期。对外贸易，主要是同美洲的贸易是整个经济最活跃的部门(例如，法国的殖民地贸易在 1716 年至 1787 年间增长了 10 倍)，而且海外的需求又刺激了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并大大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由于海上运输优于陆上运输，18 世纪的欧洲经济是围绕一些大的海港建立起来的，最繁荣的海港是那些在不断增长的殖民地贸易中占最大份额的海港，例如波尔多和南特；这两个港口城市不仅有各自的工业，而且其内地工业经由河道可将产品由港口输出。[30]

与扩张中的大西洋体系相联的不断增加的经济机遇，为经历了17世纪衰败之后的整个西欧增加了就业机会，并刺激了人口的增长。[31]由此大大促进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国内市场的增长，加之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所产生的需求压力，导致西欧 18 和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发明和技术革新的热潮。因此，1650 至 1820 年间大西洋地区商品生产、贸易、金融和航运方面的惊人发展为西欧经济提供了所需的机遇，使之克服了 17 世纪的危机，摆脱了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束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首先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是英国。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解放了生产力并提供了经验教训，有助于其他西欧国家迅速完成这一过程，而这些国家均已从积极方面(直接或间接)分享了由大西洋体系的扩张而带来的机遇。 89

1783 年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大陆的那部分地区，虽然从 17 世纪直到 1776 年作为殖民地在重要的政治因素束缚下活动，但也在某些重要方面而从这一早期的大西洋体系扩张中分享到利益。在哥伦布到达美洲时，这一地区的经济很可能属于大西洋地区最不发达的范畴。其人口密度在这一时期也是新大陆最低的，在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也丝毫不能与南美洲的古老文明相比。在被欧洲殖民者殖民几十年之后，这一地区仍然是以生存型经济活动为主。18 和 19 世纪市场生产机遇增加，直接与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大西洋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32]

表 4.3 和表 4.4 所示为这一地区在宣布独立并形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前卷入大西洋体系的情况。

---

[28] 1663-1669 年和 1772-1774 年的情况，见 R. 戴维斯，1969 年，第 92、119、120 页。1797-1798 年的情况，见 P. 迪恩(Deane)和 W.A. 科尔(Cole)，1967 年，表 13，第 44 页。1797-1798 年的数字指大不列颠，其他数字指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数字均包括全部进口、国内商品的出口和再出口。18 世纪的数字是以 1697 至 1700 年不变价格计算。

[29] P. 克里特(Kriedte)，1983 年，表 39 和表 40，第 124 页、128 页。

[30] F. 克鲁泽(Crouzet)，1964 年。

[31] 现在可以证实，18 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是由于早些时候增加了与外国人的婚姻。而这又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所造成的。详情见 J.E. 英尼科里，1984 年。这一分析的依据是 E.A. 里格利(Wrigley)1983 年和 D.N. 莱文(Levine)1977 年提供的史料。

[32] 见 J.F. 谢泼德(Shepherd)和 G.M. 沃尔顿(Walton)，1972 年。

90

表 4.3 英属北美的商品和无形输出收入总额(英镑)1768-1772 年

地 区	1768 年	1769 年	1770 年	1771 年	1772 年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1,658,000	1,852,000	1,818,000	2,113,000	2,135,000
所有西印度群岛国家	979,000	1,131,000	1,272,000	1,287,000	1,498,000
南欧和产酒岛屿	520,000	805,000	741,000	721,000	762,000
非洲	16,000	30,000	25,000	18,000	34,000
总计	3,173,000	3,818,000	3,856,000	4,139,000	4,429,000

表 4.4 英属北美的进口总额(英镑)1768-1772 年

地 区	1768 年	1769 年	1770 年	1771 年	1772 年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	2,908,000	2,151,000	3,112,000	5,382,000	4,135,000
所有西印度群岛国家	524,000	767,000	792,000	676,000	939,000
南欧和产酒岛屿	81,000	85,000	80,000	69,000	88,000
非洲	56,000	189,000	85,000	104,000	265,000
总额	3,569,000	3,192,000	4,069,000	6,231,000	5,427,000

资料来源：J.F. 谢泼德和 G.M. 沃尔顿，1972 年。

注：无形输出主要为航运收入。

平均来说，英属北美的大西洋年贸易总额在此期间为 840 万英镑(进口加商品和无形输出)。1770 年的人口为 220 万，[33]该地区大西洋贸易的人均贸易额为 3.8 英镑。卷入大西洋体系的这一规模刺激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和用于市场交换的生产，同时也促进了专业分工，提高了人均收入并增加了向该地区的移民比率。

当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大西洋体系的影响下逐渐从生存经济活动向市场生产过渡时，包括南部、中部和北部(主要是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三种经济制度的区别也变得明显起来。自然资源加之可以得到廉价的非洲奴隶劳动力，促使南方殖民地得以发展农业种植园，首先是生产稻米和烟草，随后是棉花。中部殖民地则主要是利用家庭劳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在北部殖民地地区，农业自然资源相对贫瘠，但却有利于造船业的深水良港和森林资源，促使该地区贸易和航运业早期专业化的发展。[34]

91

这样，南方实际上生产了所有的向欧洲出口的种植园产品，而北方则进行了大量的无形输出——航运、商务服务、保险等等。与此同时，中部殖民地则生产了供出口的粮食和部

---

[33] J. 波特(Potter)，1965 年，表 Ia，第 638 页。

[34] 见 D.C. 诺思，1961 年。

分无形输出。南方的生产依赖非洲的奴隶劳动，而当地产品的市场则主要是欧洲。对于中部和北部殖民地来说，伴随奴隶种植园发展而来的加勒比地区的经济调整，导致加勒比地区(英属和非英属)和北美的劳动分工，这使加勒比地区成了中部殖民地的粮食和北部殖民地的运输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一个广大的市场。这样，北美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无论是生产过程，还是市场方面，与美洲的奴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35]

在殖民时期，英属北美大规模卷入大西洋体系，结果在南部、中部和北部殖民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中部和北部地区，自由的白人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财富分散，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在南方，农业种植园主要靠非洲奴隶的劳动，致使人口中奴隶占很大比例，财富集中，收入极不平等。1790 年美国有奴隶 697,000 入，其中 642,000 入在南方，占南方各州人口总数的 36%。[36]虽然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结构鼓励本地大众消费品市场发展，但南方的经济结构却限制这种国内市场的发展并鼓励从国外进口奢侈品。这样，中部和北部殖民虽打下了自给自足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南方殖民地在殖民时期却形成一种依赖性的经济结构。 92

在获得独立之后，南方各州的经济继续依赖于非洲奴隶的劳动。1790 至 1860 年间，南方各州棉花生产的显著扩大也全部依赖于黑人奴隶的劳动。[37]因此，殖民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南方保持下来，甚至在 19 世纪棉花生产发展的新地区也是如此。1850 年，南方新、老地区的总人口为 8,983,000 人，其中 3,117,000 人是奴隶，占人口的 34.7%。[38]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仍然差距甚大，依附性的结构进一步得到加强。

但是，独立以后，政治上独立了的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逐渐将南方对西欧的依附转变为对北方各州的依附。东北部各州的船主和商人得到政府的保护，接收了南方的棉花运往

---

[35] 南部殖民地的经济在生产上与奴隶制度紧密相联，而中部和北部殖民地的经济在市场方面与新大陆的奴隶制度息息相关，因为加勒比地区奴隶种植园经济结构为该时期中部和北部殖民地创立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粮食和商业服务市场。下述主要商品和服务业(1768—1772 年间年平均数字)出口收入数额说明了殖民时期北美出口贸易的结构：

单位：英镑

烟草 766,000

航运收入 610,000

面包和面粉 410,000

大米 312,000

鱼 287,000

靛蓝 117,000

当时上述六种商品占英属北美出口总收入的 64.4%。烟草和大米是来自南方殖民地奴隶种植园的产品。面包和面粉产自中部殖民地的家庭农场，而鱼和航运收入则主要来自北方殖民地(数字摘自 J.F. 谢泼德和 G.M. 沃尔顿，1972 年，第 258 页。)进口主要是制成品，主要来自英格兰，而英格兰仅吸收殖民地出口很小一部分。烟草几乎全部进入英格兰和苏格兰，不过，每年一半以上再出口到欧洲大陆。

[36] J. 波特，1965 年，表 2，第 641 页。

[37] 南方各州的棉花生产从 1790 年的 4000 包(每包 500 磅)增加到 1860 年的 3,841,416 包。在 1850 年，出口产品约占总产量的 76.5%。根据 H.U. 福克纳(Faulkner)，1924 年，第 201-202 页。

[38] J. 波特，1965 年，表 11，第 680 页。

欧洲，并将欧洲的制成品进口给南方种植园主和其奴隶们。[39]与此同时，南方棉花生产的发展使食品市场得以发展，后者又刺激了西部商品粮食的生产和向西部领土移民的潮流。93 这种以南方奴隶种植园为中心的地区专业化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又促进了在东北部地区由政府控制进口措施培育的进口替代品工业化的发展。因此，直到1860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工业化首先是建立在南方奴隶种植园的基础之上：美国借助于殖民时期在中部和北部殖民地发展起来的有利的经济结构，适时利用其政治独立，操纵大西洋地区各种力量，使其利于自己的经济。[40]南方各州依附性的结构从而成为北部和西部各州资本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欠发达结构的演变

根据我们的定义，在哥伦布到达这一地区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是不发达的。总体水平不发达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人口、地理环境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

1492年整个美洲人口的大概规模一直是多次辩论的题目。估计数字低至850万人，高的可达1.12亿人。[41]不过，伯克利大学新近的研究指出，较为可信的人口数字在5000万到1亿人之间。[42]与美洲辽阔的地理范围相比，甚至最高的估计数字也不为多。此外，人口主要集中在大约三个地区——中美洲，包括阿兹特克人和马雅人的王国；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加勒比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是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43]新大陆的其余地区人口密度极低。据认为，那里的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公里十人，这一数字适用于拉丁美洲被征服之前90%以上的地区。[44]

哥伦布到达之前美洲广大地区的低人口密度对贸易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分工产生了不利 94 影响。可是，那些人口高密度地区也是分散的，并因茂密的森林、高山和深谷与人口稀少的地区隔离开来。这使地区间的联系很困难，并限制了美洲地区内部贸易的发展。在这种

[39] 1789年7月4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凡由美国建造和美国船主的船只运输的进口商品关税可打九折。1789年7月20日的另一项法令规定，对于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凡美国建造和美国船主的船只每个吨位征收六美分关税，外国建造和外国船主的船只每个吨位征收30美分关税。这两项法令刺激了美国东北部各州的造船业和船舶拥有业的发展。从事外贸的注册轮船吨位从1789年的123,893吨增加到1810年的981,000吨。同一时期，美国进口商品由美国船只运输的比例从17.5%增长到93%，而美国船只对出口商品的运输比例则从30%增长到90%。到1862年，美国从事外贸的注册轮船吨位为2,496,894吨，这一时期美国出口大约75%来自南方，棉花约占60%，烟草、大米和精制食糖占其余15%。(有关所有这些数字，见H.U. 福克纳，1924年，第201、202、218、219、228和233页。)直接或间接从南方出口所得收入和东北部船主及商人的外贸收入为1790至1860年的美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见D.C. 诺思，1961年。

[40] 关于西欧和北美的详情，见J.E. 英尼科里，1979年和1981年。

[41] B. 基恩(Keen)和M. 沃瑟曼(Wasserman)，1980年，第30-31页。

[42] 关于伯克利大学的估计数字，见W. 博拉(Borah)和S.F. 库克(Cook)，1963年；还可参阅S.F. 库克和W. 博拉，1971-1974年。关于新近的综合资料，见W.M. 迪纳万(Denevan)，1976年。

[43] 根据西印度群岛和西班牙有关方面的记载并使用先进的统计方法，W. 博拉和S.F. 库克推算中墨西哥在被征服前的人口为1880万到2630万之间，W. 博拉和S.F. 库克，1967年，第205页。据库克和博拉估计，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居民人数1492年约在700万到800万之间(B. 基恩和M. 沃瑟曼，1980年，第30页)。库克和博拉的估计新近受到不少批评，被认为过高。

[44] A. 莫里斯(Morris)，1981年，第52页。

情况下，海上贸易很可能会成为把贸易疆界从海岸推进到内地的重要因素，就像北美在18、19世纪的情况一样。但是，直到1492年前由于美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隔绝，上述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由于美洲的隔绝，使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商业价值很少，对当地人口及贸易的发展贡献很小，或毫无贡献。

结果，当1492年中、南美洲的古老文明在文化方面的发展达到高水平时，那里的经济却基本上未得到发展。他们需要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以使他们的自然资源产生经济价值，促进人口增长和扩散、刺激美洲内部贸易的发展并启动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

与上述要求相反，随着1492年欧洲人到达之后而产生的贸易机遇是在导致欠发达而非发达的经济结构形成的条件下到来的。首先，西欧国家强有力地控制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自然资源。印第安人受到侮辱，陷入混乱。再加上随欧洲人而来的劳动力的需求和未见过的疾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处的印第安人急剧减少。16世纪中墨西哥的人口灾难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欧洲人征服之前，这一地区的人口估计为1880万到2630万，1548年跌至630万，1580年跌至190万。到1605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又跌到大约110万人。㊺。

整个印第安人口事实上的被消灭导致两个重要的后果。第一，在16至19世纪同欧洲和北美海上贸易商品生产的惊人发展，只有在输入了大批非洲奴隶劳动力之后才有可能。第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农田均被欧洲殖民者所占，他们将这些土地改为大块的地



图片4.3 黑人奴隶在巴西的一个咖啡种植园劳动，约1870年

㊺ W. 博拉和S.F. 库克，1967年，第204页。

产，被称做“拉西恩德”（laciende 或 lazenda）。后文将说明，上述两个情况提供了刺激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转型的贸易机会，与此同时却将欠发达状况和依附性带给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95 16 和17世纪向西属美洲进行的非法奴隶输入的规模巨大，要想对这一时期非洲奴隶劳动在西属美洲贵金属生产方面的贡献进行量化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46]不过。1796 年由 96 教会人士在西属美洲做的调查报告表明，非洲人在墨西哥有678,842人，在秘鲁有539,628人。[47]

虽然无人能证实这一调查的准确性，但这些数字表明非洲奴隶劳动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殖民地经济中至关重要。在巴西，16 和 17 世纪食糖的出口生产全部依赖非洲奴隶的劳动。当 18 世纪巴西黄金生产大发展吸引众多欧洲商人和矿业资本家来到这个国家时，实际生产依然依赖于非洲奴隶的劳动。这一点通过 18 世纪和 19 世纪巴西人口的民族构成可得到证实。1798 年，在总人口 3,250,000 人中，非洲人为 1,988,000 人，其中，奴隶为 1,582,000 人。1872 年，总人口 990 万人中，大约有 580 万非洲人，其中 1,582,000 人为奴隶。[48]这样，1798 年非洲人占巴西总人口的 61.2%，1872 年则占 58%。奴隶集中在出产黄金和向欧洲、北美出口的农产品生产地区。例如，1873 年，巴西的奴隶为 1,566,416 人，其中 1,233,210 人(占 79.2%)集中在以下六个生产出口产品的省份：巴伊亚、伯南布哥、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奥格兰德。[49]奴隶最集中的地区在米纳斯吉拉斯这个产金的省份，共有奴隶 351,254 人。

在加勒比各岛屿，1650 年后，非洲人在出口生产方面占据的重要地位在其人口的民族构成的演变中得到反映。17 世纪中期以前，自给自足的生产在岛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出口产品的生产则是少量的。从 17 世纪后半叶开始，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劳动力及农业种植园的发展使出口生产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而自给自足的生产则明显下降。这样，1660 年巴巴多斯、牙买加和背风群岛的人口组成为 33,000 名白人和 22,500 名非洲奴隶，而到 1713 年，白人为 32,000 人，非洲奴隶则为 130,000 人。[50]这表明，奴隶从 1660 年占总人口的40.5%增长到1713年的80.2%。与此相同，在法属西印度群岛，1678-1681年马提

---

[46] E. 维拉·维拉尔(Vila Vilar)收集的史料表明非法奴隶输入的规模：“卡塔赫纳的副行政长官 D. 费尔南多·德萨里亚可以证实，从 1516 年到 1619 年，交纳关税的仅有 4816 名黑人奴隶，而实际上从 1619 年 5 月到 1620 年 12 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有 6000 名黑人进入该地区。他争辩说，那些装有 15、25、37 和 45 ‘件’ 的船上实际运载着 200、300、400 个奴隶。监察员麦地那·罗萨尔斯证明说，对商人来说，申报关税的 ‘件’ 数大大少于实际运输的物品是常有的事。他还证实，一艘申报了 68 件的船装载了 440 件；另一艘申报了 45 件的船装载着 200 件；第三艘申报了 65 件的船装载着 260 件；他坚决认为从 1620 年 6 月 10 日到 1621 年 7 月 18 日的一年里，共有 6443 ‘件’ 奴隶进入卡塔赫纳港。圣玛尔塔的司库胡安·德奥洛兹科 1631 年写给国王的信中说，每条到达的船都装载着 400 ‘件’ 黑人，尽管仅交纳 100 ‘件’ 的关税；而圣多明各法庭庭长 D. 马尔丹·德萨沃德拉证明说，1637 年到达卡塔赫纳的奴隶运输船均登记载有 150 ‘件’，而实际数目为 300 ‘件’。” E. 维拉·维拉尔，1977 年*，第 272-273 页；还请参阅 C.A. 帕尔默(Palmer)，1976 年；小 L.B. 鲁特(Rout Jr.)，1976 年，第 61-66 页。

[47] J.E. 英尼科里，1976 年，第 204 页。

[48] T.W. 梅里克(Merrick)和 D.H. 格雷厄姆(Graham)，1979 年，表Ⅲ，2，第 29 页。1798 年，印第安人为252,000 人，1872 年为 386,955 人。欧洲人在这两年分别为 1,010,000 人和 3,787,289 人。

[49] R.B. 托波林(Toplin)，1972 年，附录，第 288-289 页。

[50] 根据 R.S. 邓恩(Dunn)的数字计算得出，1972 年，第 312 页。

尼克和圣多明各的人口组成为：白人6786人，非洲奴隶7397人，[51]但到1780年，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总人口为514,849人，白人仅为63,682人，非洲奴隶为437,738人，而黑人自由人为13,429人。[52]这样，在法属西印度群岛，非洲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7世纪晚期的约52%增至1780年的88%。 97

正是由于这种向拉丁美洲、加勒比岛屿和北美南方领土大规模迁移非洲劳动力，才使得16至19世纪期间大西洋地区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得到显著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北美提供了刺激性机遇和挑战，使这些地区得以在此压力下完成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不过，这同一历史过程却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带来欠发达和依附性的结构。

由于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奴隶，因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多数人的收人极少，不能成为市场的正常成员。结果，对大众消费品来说，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缺乏不断增长的大众国内市场以鼓励资金投人用以发展国内消费的工业生产，而从矿产业和种植园农业中获取的利润用于购买从欧洲进口制成品，或者到欧洲投资和消费。这种情况由于殖民时期限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工业的殖民地法律而变得更为严重。这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共同为西欧的制造商，尤其是英国制造商提供了具有刺激性的市场，这些英国制造商不仅供应英属殖民地，也直接或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将商品供应给西属和葡属美洲地区。[53] 例如1714至1773年，英国向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出口总额官方价值为4340万英镑(实际上全是制成品)。同一时期，英属西印度群岛向英国出口商品的官方价值为1.013亿英镑。[54]上述数据说明新大陆市场对英国制造商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以奴隶劳动种植园为特点的殖民地返还资财的规模。[55]

由于矿业和农业部门与西欧的经济而后又与美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致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要的工业部门均得不到发展，经济脱节。随着这种发展出现了与进口和出口紧密相连的既得经济利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矿业大亨和大地主们认为他们的利益仅与进出口业联系在一起。在16至18世纪这一普遍形势下形成的商业阶级也卷入进出口贸易之中。与种植园和奴隶经济相关的财产与收人的这种极不平衡的分配，确保了不会再有另外的集团能在经济和政治势力方面与上述三大集团(矿业主、大地主和商人)相抗衡。这样，即使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19世纪均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它们的国家政策仍继续有利于供出口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制成品的进口。19世纪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革命进 99

[51] R. 谢里登，1970年，第35和49页。

[52] E. 威廉斯(Williams)，1970年，第153页。

[53] A. 克里斯特洛，1948年；J.O. 麦克拉克伦，1940年；H.E.S. 费希尔(Fisher)，1963年。

[54] E. 威廉斯，1970年，第151页。

[55] 新大陆奴隶种植园经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生产地区的生产水平超过消费水平。英属北美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1714至1773年，南方殖民地的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奴隶种植园向英国出口商品总额的官方数字为4660万英镑，而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非奴隶殖民地)向英国出口的货物仅有720万英镑。但三个奴隶种植园殖民地在同一时期从英国的进口额仅为2680万英镑，而三个非奴隶殖民地从英国的进口额则为3790万英镑。(E. 威廉斯，1970年，第151页。)这样，商品生产主要在奴隶种植园土地上进行，而消费活动则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的非奴隶领地。英属北美的非奴隶领地的购买力主要来自其粮食销售、运输业和向加勒比地区奴隶种植园和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奴隶种植园提供服务。



图片 4.4 黑人奴隶在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里砍收甘蔗，约 1833 年

一步助长了此种倾向。受大西洋体系滋养的工业革命导致对粮食和各种原料需求的激增。同一时期，工业革命使制成品的成本急剧下降，大西洋地区的销售价格低廉，使得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生产制成品以供国内消费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在19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发达和依附性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由此牢固地确立。

为非洲依附性结构打下基础

克里斯托弗·里格利写道：

> ……这个结论是人们未曾料到的，即新近的考古研究有力地证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大量人口移居并非始于最初的农业或制铁业开始之时，而仅仅始于1000年或不足1000年以前，班图人非洲称之为"后铁器时代"的初期。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就会出现全新的观点。现在可以认为，在与欧洲人最初接触时期，人口已在迅速增长……"[56]

100

现有的一些间接证据有力地证实了上述结论。非洲当地材料都提到这一千年前半期总的人口流动。这些资料常常将此归因于政治原因，但人口流动肯定与旧居留地不断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有关，迫使一些群体向无人定居或人口稀少的地区移居。[57]在非洲的历史上，14和15世纪还经常作为一个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生产组织和技术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被提及，而16世纪之后则是一个长期稳定而停滞的时期。[58]同样，前几个世纪人口迅速增长应是引起这些变化的重要因素。

历史资料由此显示出，15世纪后期欧洲人到来之时，非洲的社会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变过程。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这一时期，一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演变已达到一个高水平。[59]但是，15世纪后期这一进程经历的相对来说较短的这段时期表明，那时的非洲经济

101

---

[56] C. 里格利(Wrigley)，1981年，第18页。根据塞斯坦·肖的计算，非洲人口在公元前10,000年时为200万，在公元前3000年时为500万(T. 肖(shaw)，1981年，第589页)。波斯南斯基进一步认为，公元1000年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不足1000万"。(M. 波斯南斯基(Posnansky)，1981年，第727页)。公元1500年时，肖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得出结论，认为西非地区的人口约为2000万。(T. 肖，1977年，第108页)。将这些数字放到一起来看，很明显，在公元1000年到1500年间，西非地区的人口增长很快。确实如此，因为，假如我们断定公元1000年时，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约1/3居住在西非，那么，西非的人口就从公元1000年时的约300万增加到1500年时的约2000万人。

[57] J. 范西纳(Vansina)说，1600年前大多数非洲雨林地区的人口迁移都是从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移动(J. 范西纳，1981年，第758页)。另外，戴克记述的15和16世纪向尼日尔河三角洲移民的情况也说明人口是从稠密地区向稀少地区流动——从贝宁向三角洲地区流动(K.O. 戴克(Dike)，1956年，第22-25页)。还请参阅第3章的内容。

[58] 对于塞内冈比亚，柯廷说，在经历了前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17至19世纪在农业技术方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P.D. 柯廷，1975年，第13-15页)。还请参阅M. 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66年，以及A.C. 霍普金斯(1966年)和马洛维斯特之间的那场辩论。内维尔·奇蒂克也谈到14和15世纪在东非海岸地区是一个最繁荣的时期(H.N. 奇蒂克(Chittick)，1977年，第209页)。在东非内地，这一进程似乎开始得稍晚一些，就像尤诺马和韦伯斯特所说的那样："1500年到1800年间，这一地区(东非内地)曾发生过大批的移民运动。人口稀少地区有了居民，人们创建了更大的社会，一些新的国家也得以建立。"(A.C. 尤诺马(Unomah)和J.B. 韦伯斯特(Webster)，1976年，第272页)。

[59] 可参阅T. 肖，1970年。诺思罗普说："作为一个整体，伊格博-乌库废墟是某种技术和艺术性高度发达的手工艺工业的证据。伊格博-乌库的发掘物比其他的证据更早、更丰富，且没有背离尼日利亚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总趋向。这类手工业是某种经济的发展高峰，然而伊格博-乌库对其基本情况提供的信息很少。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很明显，这样的专业人员及其主顾生活的社会，剩余农产品足以供养他们。"(D. 诺思罗普(Northrup)，1978年，第20页)。

社会结构基本上仍属于我们所说的不发达状态。与有效的农业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人口总数仍然很少。这相对较少的人口分散居住在辽阔的非洲大陆上，群体之间被遥远的距离和不利的地形隔离开来。[60]在黑非洲、地中海及中东(这里曾是许多世纪国际贸易的中心)之间出现的大片沙漠地带影响了黑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减少到仅限于那些价值很高，而运输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黄金和奴隶。以上两个因素限制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机制的进步和仍占压倒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样，不断扩大的人口仍需几个世纪的发展以提高人口与农田的比例，使之足以促进社会的分化，并使经济和政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以大批商品——农业、工业、矿产等为基础的更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也需要有内部因素与之相互作用，才能促成结构性转变的进程。

自15世纪下半叶起非洲和西欧之间建立了海上贸易，仿佛首先为黑非洲提供了所需的使经济和社会能快速转变的机会。黄金贸易发展了。农产品贸易，如胡椒，也起步了。当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参与将非洲纺织品带往非洲海岸各地出售时，对非洲纺织物制造者又带来了某种刺激。[61]

102 不过，这些早期的发展是短命的。1492年后，美洲的丰富资源已为西欧唾手可得，作



图片4.5 一艘欧洲贩奴船正在装运奴隶

[60] 在东非，相对繁荣的海岸城市直到18世纪才被引人与东非内地的经常性贸易往来之中。就像罗兰·奥利弗所说的那样："海岸和内地的这种奇怪的脱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在狭窄的海岸平原后面，地面升高，变成辽阔的中央高原，台地一块接一块，长满耐旱的灌木荆棘，难以居住，也难以穿越……至少在铁器时代，已进人人口稠密和较大规模的社会时期的人类发展的核心地区是次大陆的中心地带，距海岸约1300公里或更远的地方。" R. 奥利弗，1977年b，第621-622页。还请参阅A.C. 尤诺马和J.B. 韦伯斯特，1976年，第272页。

[61] 对这些早期的发展，请参阅J.W. 布莱克(Blake)，1977年，和A.F.C. 赖德(Ryder)，1969年。

为征服(和欧洲征服者带来的疾病)的后果，印第安人实际上已被消灭，非洲在大西洋经济体系演变中的作用改变了。为了提供内部必需的条件以利于非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完成结构性转变，非洲需要有足够的人口，但这人口却被大规模地转移到了美洲，在那里用于发展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贸易。一个大约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大规模人口转移使非洲商品生产的发展停滞，对内部贸易和出口贸易均产生影响，在非洲大陆打下了依附性结构的基础。

强制性移民极其严重的影响首先是终止了当地持续的人口增长，并使大陆上大片地区人口的直接下降。本章前面曾写道，在1500年到1890年间，估计有2200万人从黑非洲输往世界其他地区，其中1540万人穿越大西洋，690万人穿越撒哈拉、红海和印度洋。[62]这些实际的人口输出数字应恰当地予以说明，并将它们与这一时期黑非洲的人口发展情况联系起来。

应当考证的主要问题是这些人口输出对黑非洲人口繁殖能力减少的程度。这需要对被输出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做出分析，因为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决定了繁殖能力减少的程度。 **103**

在穿越撒哈拉和红海的贸易中，年轻、有魅力的女性占多数，因为主要是满足那里人纳妾的需要。一般认为，在这类贸易中，女性与男性的比率为2:1。这一观点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资料基础之上。不过，19世纪在埃及进行的有关黑人奴隶的普查资料证实了上述情况，资料表明，男女奴隶之比约为1:3。[63]

对穿越大西洋的人口输出来说，最近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表明了在17、18、19世纪输入新大陆不同地区的404,705名非洲人的性别比率。[64]这一数字约相当于输往美洲的非洲人总估计人数的3%。这个例证的规模和时空的分布颇具代表性，对刚果-安哥拉地区尤其如此，因为来自这一地区的人口超过总数的50%。但是，东非在这个例证中没有得到丝毫的反映，尽管可以假定东非的比率情况应与西非这一范围相似。总的说来，这一例证表明女性占404,705名奴隶的32.9%。

对大西洋贸易资料的研究透露出一个重要情况，即根据来源地区的情况性别比率变化的一致性。通过作者对43,096名奴隶的实例进行的分析[65]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见表4.5)。这一实例表明的地区性变化在1781-1789年(见表4.6)输往西印度群岛的55，855名奴隶的例子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66]

从这两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贝宁湾到比夫拉湾的尼日利亚地区，输出女性奴隶的比例最高，从占总输出人口的2/5到1/2。不过，其他主要的输出人口地区，刚果-安

[62] 参阅本章第52-54页。

[63] G. 贝尔(Baer)，1967年。

[64] 这些数字来自：J.E. 英尼科里，1982年，第724页(129,570名奴隶)；H.S. 克莱因(Klein)，1978年，表3，第730页(55,855名奴隶)；H.S. 克莱因，1975页，表9，第784页(181,909名奴隶，大多数来自安哥拉)；J. 麦特斯(Mettas)，1978年，由P. 曼宁(Manning)所引证，1981年，(12,697名奴隶)；D. 诺思罗普，1978年，附录D，第3350-339页(24,502名奴隶)；K.D. 帕特森，1975年，第80页(172名奴隶)。

[65] J.E. 英尼科里，1982年，表2，第23页。这一实例涉及的年代从1764年到1788年，与输入到牙买加的奴隶有关。

[66] H.S. 克莱因，1978年，表3，第30页。

哥拉地区，定期输出了高于平均比率的男性奴隶。因此，在上述实例中，刚果-安哥拉地区超出比率有可能对从404，705名奴隶中计算的家庭比例产生降低的影响。输出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性变化在微观地区水平上对评估输出人口的影响极为重要。

104

表4.5 1764-1788年非洲不同地区奴隶的性别比

非洲地区	百分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冈比亚	72.1	27.9
向风海岸	65.7	34.3
黄金海岸	66.8	33.2
维达	57.8	42.2
贝宁	49.96	50.04
邦尼	56.5	43.5
卡拉巴尔	58.8	41.2
加蓬	68.8	31.2
安哥拉	68.2	31.8

资料来源：J.E.英尼科里，1982年，表2，第23页。

表4.6 1781-1798年在西印度群岛登陆来自不同地区的奴隶性别比

非洲地区	登陆奴隶人数	百分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塞内冈比亚	190	67.5	32.5
塞拉利昂	5544	64.9	35.1
向风海岸	3420	70.6	29.4
黄金海岸	2721	64.4	35.6
贝宁湾	315	54.5	45.5
比夫拉湾	18218	56.9	43.1
刚果—安哥拉	12168	69.9	30.1
不明地区	13279	65.3	34.7

资料来源：H.S.克莱因，1978年，表3，第30页。

上面的分析资料表明，对整个黑非洲来说，每年输出的女性数字已具有一定规模，从而急剧削弱了地区人口的繁殖力。考虑到输往美洲途中损失的额外人口——在俘获和最后输出之间这段时间的死亡造成的损失，由于与为输出而捕捉俘虏相联系的战争、饥荒而造成的死亡加上输往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女性)的690万人口一起，这些证据有力地表明，至少从1650年到1850年，黑非洲的人口呈绝对下降趋势。

人口全面减少的情况在各地区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当上面表明的有关性别比例随地区变化的情况与输出人口总数的地区分配情况一起考虑时，就能在微观地区一级就其对人口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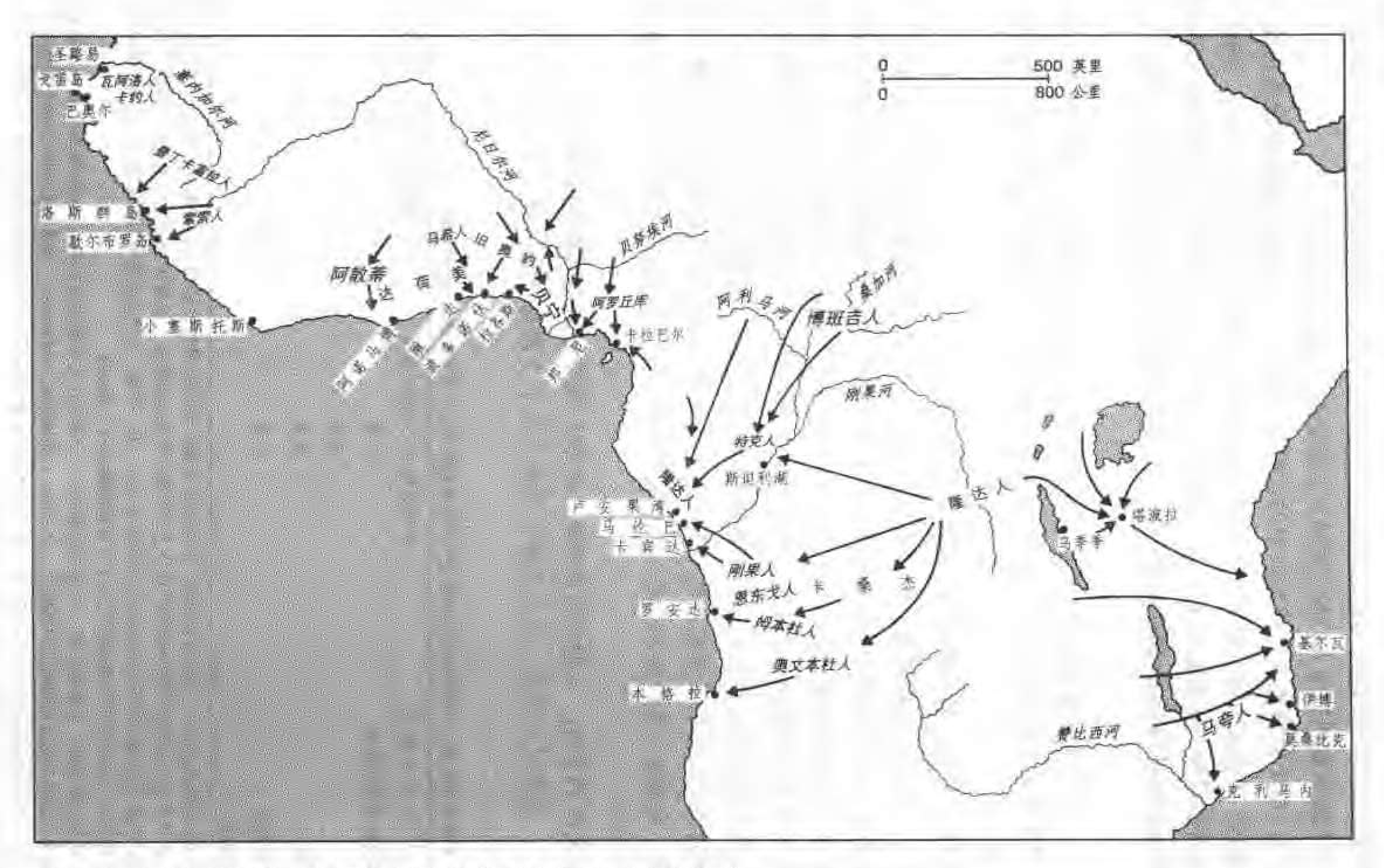


插图 4.2 18和19世纪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的来源（仿照 J.E. 英尼科里图）

的影响做出正确的评估。[67]在这方面对证据的研究表明，那些通过贝宁湾、比夫拉湾和刚果-安哥拉地区提供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必然深受人口减少之害。[68]

还有，由于使输出人口成为奴隶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其他暴力形式完成的，因而奴隶输出贸易对于非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时一些观察者的看法可被引用来说明这一点。1679年，荷兰在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的西印度公司总经理赫尔曼·阿布拉姆斯曾报告说，自从奴隶输出贸易的加快并随之引进了火枪之后：

> 整个海岸地区都进入了某种战争状态。这起始于1658年，随后变得日益严重起来，以至于如今再也没有一条道可以使用，再也没有一个商人能通过这里。[69]

大约1730年，另一名荷兰公司的官员报告说：

> 首先应该观察到，非洲的这一地区从很早以前便被称为"黄金海岸"，这是因为公司和荷兰私人船只某一时期在这里购买了大量黄金，而现在这一地区几乎成了奴隶海岸；欧洲人不断运来的枪支和火药引起了这些地区国王们、亲王们和酋长们之间可怕的战争，他们将俘虏变成奴隶；这些奴隶立即以不断增长的价格卖给欧洲人，这反过来又刺激人们之间的仇恨，渴望获取又多又容易到手的利润使他们忘记了劳动，而专心于制造各种借口互相攻击或恢复老的纷争。结果，在海岸一带的黑人中间，除了奴隶贸易之外，现在已很少还有别的贸易存在……[70]

107

后来在18世纪，一位非洲观察者，奥劳达·埃奎亚诺用同样的语调写道：

> 就我记忆所及，这些战事似乎都是某个小国或小地区闯入另一国家和地

[67] 根据现有证据，下表可暂时提供通过大西洋贸易输出人口总数的地区分布情况：

非洲分地区	18世纪输出人口的百分比	19世纪输出人口的百分比
塞内冈比亚到黄金海岸	24.8	10.3
贝宁湾	23.2	17.5
比夫拉湾	14.8	12.9
西部中非地区	37.5	48
东、南非地区		11.4

表中的百分比依据的是P.E.洛夫乔伊(1982年)总结的证据。洛夫乔伊的方法和总的数据肯定有误，但部分证据还是有用的，而依据这些证据估算的分布情况百分比可以暂时作为近似数据。虽然在18世纪东非已向印度洋岛屿输出相当多的人口，但直到19世纪才向大西洋地区大量输出人口。另一方面，在考虑奴隶贸易对东非人口产生的影响时，应注意东非大陆在19世纪向奔巴岛和桑给巴尔丁香种植园输送的大量奴隶。

[68] 证据不断增加，若解释正确，可有力地表明，贝宁湾和比夫拉湾输出的很大一部分奴隶来自从尼日利亚东部边界直到现今加纳东部边界的西非中部地带。这一地区，特别是尼日利亚地区，对穿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贸易主要涉及女性。由于通过上述海湾地区的奴隶贸易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女性，似乎可以肯定，19世纪及以后该地区人口呈低密度的情况是因奴隶贸易造成的。

[69] 赫尔曼·阿布拉姆斯(Heerman Abramsz)1679年11月23日向十人会议提交的报告，见A.范丹兹格(Van Dantzig)，1978年，第17页。十人会议是公司在荷兰的管理机构。

[70] 1730年2月7日举行的泽兰商会董事会议记录附件，见A.范丹兹格，1978年，第240页。

区，以抓获俘虏和获取战利品。战事也可能是将我提到的欧洲商品带到我们中间的那些商人引起的。这种抓获奴隶的方式在非洲很常见；我相信，以这种方式和绑架的方式抓获的奴隶比其他任何方式抓获得都多。[71]

从大批类似证据中提取的这些观察记录表明，这一时期在奴隶输出贸易与非洲发生的频繁战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事实上是奴隶输出贸易直接或间接刺激了经常发生的战争，扭曲了非洲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72]

一个重要的畸变是非洲社会中军事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成了有极大政治影响的势力，以致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非洲国家均由他们决定国家政策的方向。一个巨大的俘虏出口市场的存在意味着，军事贵族将战争更多地视为抓获俘虏以供出售的来源，而不是作为夺取更多领土的手段，而这些领土可以有效地并入更大的国家以便利用其自然和人力资源来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样做对这些国家的最终规模及其内部的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国家的范围很有限，从未达到真正的政治稳定，而且因内部原因或可怕的敌人刚刚引出麻烦，顷刻间便会瓦解。 108

军事贵族的存在以及与普遍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刺激了一些非洲社会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奴隶输出贸易的结构影响下，首先是穿越撒哈拉和红海的奴隶贸易，进而是规模大得多的穿越大西洋的贸易，使非洲过去存在的多种个人依附形式变成了或多或少适合西方特点的奴隶制度。占非洲社会很大比例的人口均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并直接或间接与奴隶输出贸易有关联的人即商人或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这种结构形成之后，在相对可耕地而言人口比例极低的情况下，19 世纪消除了奴隶输出需求之后而来的“合法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非洲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73]

超过三个世纪的这一历史进程产生的全面后果影响了必然改变非洲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使之偏离发展的轨道，走向欠发达和依附性的道路。直到 16 世纪一直不断增长的人口停止增长，导致非洲贸易的发展、内部市场及市场机构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停滞。整个大陆人口密度普遍较低，而像西非中部地带等广大地区几乎无人居住，阻碍了用于市场交换的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非洲广大地区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了进一步阻碍内部市场和市场生产发展的影响。而且，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众多方面妨碍了与欧洲发展商品贸易，而这种贸易本可以刺激内部贸易和市场生产发展。[74]因此，自给的粮食生产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一直在非洲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实际上排除了农业资本积累，因而，使国内市场需要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成为不可能。W.阿瑟·刘易斯曾明确地指示，非洲生产者从世界市场上为他们的初级产品收到的时价是由国内市 110

[71] 见 P.D. 柯廷，1967 年，第 77 页。埃奎亚诺提及的欧洲商品此处包括火枪、火药、帽子和念珠。埃奎亚诺的描述意味着这些商品是由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的阿罗人商贩带到他的家乡去的。

[72] 有关细节请参阅 J.E. 英尼科里，1982 年。

[73] 详情请参阅 J.E. 英尼科里，1982 年，尤其还有 C. 梅阿苏(Meillassoux)，1982 年；以及 P.E. 洛夫乔伊，1983 年；S. 迈尔斯(Miers)和 I. 科佩托夫(Kopytoff)，1977 年；P. 曼宁，1981 年。

[74] 这一问题有关细节，请看 J.E. 英尼科里，1983 年；还请参阅 J.E. 英尼科里，1982 年，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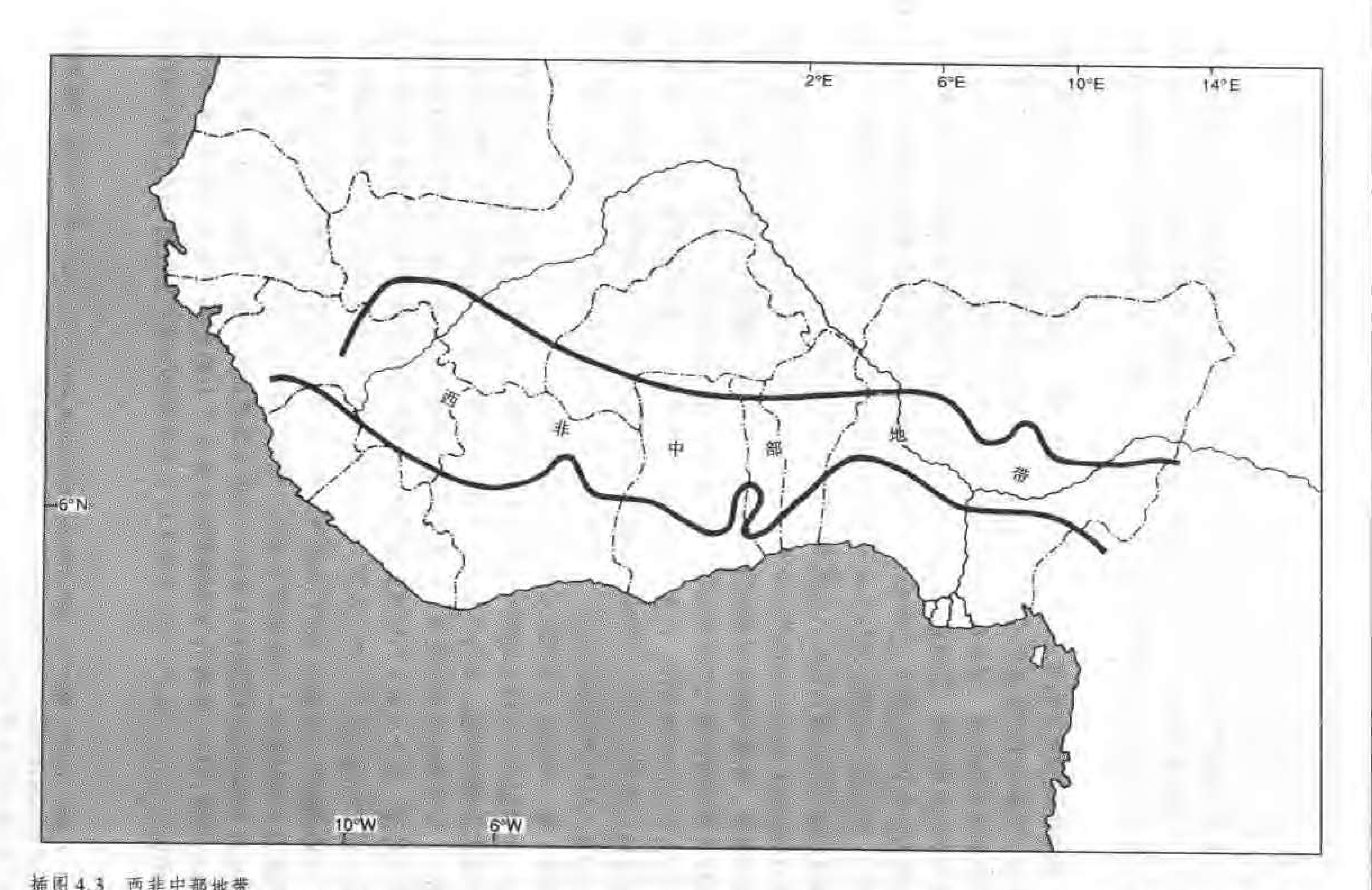


插图 4.3 西非中部地带

资料来源：根据 M.B. 格利弗和 H.P. 怀特的"西中的地带：环境实况还是地理学家的杜撰?"（《地理综论》，LIX，1969 年，第 124 页）改编。蒙美国地理学会允许刊印地图。

场上非洲粮食赢利的低水平所决定的，而这种低水平又是粮食生产者的低生产率所决定的。[75]看来阿瑟·刘易斯所不了解的是，非洲粮食生产者低生产率的根源可从17世纪起追溯三个多世纪，这种情况在20世纪由于殖民主义的经济影响而进一步恶化。

低水平的分工和规模有限的国内市场不利于制造业超越手工劳动阶段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还进一步受到用以交换奴隶的毫无控制的欧洲和东方制成品进口的不利影响。这样，在19世纪中期奴隶输出贸易结束时，由于内部市场有限，加之非资本化的农业和工业部门，而且小范围的国家由商人和武士控制并建立在依赖奴隶生产方式生存基础之上，使非洲经济的基础牢牢建立在依赖大西洋地区经济之上，向它出售初级产品，从而得到制成品和服务。这一完整的体系由开始于19世纪后期的殖民统治所完成。

结　论

从上述证据和分析可总结出以下结论。在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大西洋地区的经济按照定义全部属于不发达经济。西欧与非洲以及美洲一样，那里的制造业尚处于手工业阶段，且是农业的一部分，而农业则是占压倒优势的部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地均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地区的经济不能在市场力量控制的单一系统之下有效地运行。于是，一开始，西欧不得不利用其海上和军事上的优势。到了19世纪中期，大西洋地区的经济拉开了距离，用机械装备的工业集中在大西洋的边缘地区——欧洲西北部和美国的东北部——而大西洋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却为初级产品的生产所主导：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商品粮食生产和种植园农业；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农业；拉丁美洲地区的矿业、大规模增长的牲畜饲养业和种植园农业；非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和业余收集供出口的土特产品(奴隶输出已经终止)。大西洋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变得如此有组织，使由市场力量控制的一个单一的经济体系得以出现。只有一个或几个成员国采取坚决的政治行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已经十分坚固的结构和国际(及地区间的)分工。如果没有这种行动，这一形势肯定会自身永存下去，因为处于优越地位的大西洋边缘地区会进一步利用这种形势为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服务。

111

我们列举的这些历史证据和分析均表明了最终从非洲奴隶输出之中衍生出的这些发展情况。从证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西洋地区商品生产和贸易的惊人扩展，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和19世纪发生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同样的生产和贸易的扩展为后来19世纪西北欧发生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是通过奴隶输出获取的非洲奴隶的劳动，才使大西洋地区

[75] 就像阿瑟·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尼日利亚的农夫会像澳大利亚的农夫照看他们的羊一样勤劳而又聪明地照看他们的花生，但得到的回报却大不一样。用中世纪的语言来说，公道的价格应是同等的劳动获得同等的报酬。但是，市场价格付给尼日利亚人的花生为每英亩700镑，而付给澳大利亚人的羊毛为每英亩1600镑，这不是因他们能力上的差别，也不是因花生或羊毛生产率边际效用的不同，而是因为这分别是他们的亲属在其家庭农场中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这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之所以指责现今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即贸易的因素条件是建立在机会成本的市场力量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同工同酬的公正原则基础之上。"1978年，第19页。

在这一时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当这一扩展刺激了自由工资劳动的增长并使其成为西北欧和美国东北部地区主要的劳动形式时，在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地方，奴隶生产方式也得到发展。尤其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方各州，奴隶生产方式的扩大为不平等发展提供了条件，使西北欧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9世纪机械化的工业之所以集中在大西洋边缘地区是由于广大市场的存在为之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市场则是由于该地区不平衡的发展对制造业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证据支持这样的推测，在西北欧和美国东北部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同时，又在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内部各州巩固和进一步扩大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19世纪在大西洋地区出现的经济秩序造就的条件出发，用机械化的工业装备起来 112 的大西洋边缘地区对亚洲、太平洋地区及欧洲其他地区发动了一场经济和政治攻势，这场攻势最终导致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重要的是应当指出，在16至19世纪大西洋经济秩序形成的时期，西欧尚未与亚洲建立起以欧洲产品交换亚洲产品的牢固的贸易关系。几个世纪以来，西欧不得不依靠美洲的金、银来维持其与亚洲的贸易联系，以得到所需的商品，亚洲人则认为这比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更为合算。这一点从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亚洲出口的构成情况中得到证实(见表4.7)。[76]西欧在同一时期从亚洲进口的大部分商品都被作为再出口商品运到了非洲和美洲。

表4.7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

时　期	出口总额(用英镑计算的十年平均值)	贵金属所占百分比	时　期	出口总额(用英镑计算的十年平均值)	贵金属所占百分比
1661-1670	133,464	67.0	1721-1730	650,008	83.6
1691-1700	332,613	71.4	1751-1760	988,588	65.7

资料来源：P. 克里特，1980-1983年，表25，第84页。

不管怎样，在19世纪，当亚洲人发现难以抵挡来自西欧和北美的机械化工业产品时，西欧和北美已能将亚洲的经济牢固地纳入大西洋经济秩序之中。英国和北美机器生产的纺织品大量涌入亚洲，迫使该地区只有投入到原料生产中去，以满足新工业不断增长的需求。就这样，在殖民统治的帮助下，大西洋经济秩序又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可以有根据地说，20世纪世界经济秩序最初是建立在非洲人的血汗基础之上的。正当非洲需要增长人口和发展与外界的商品贸易，以便发展生产和改变其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时，非洲的人口却在一段时期为了上述目的被大量转移到美洲，使非洲后来所有的发展都停滞了。因此，非洲作为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主要地区进入了20世纪。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殖民统治在使非洲处于世界主要地区中的这一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后面一个主题则超出了本章的内容。

（杨荣甲　译）

---

[76] P. 克里特，1980-1983年，表25，第84页。

5 流落于新旧世界的非洲人

J.E. 哈里斯

欧洲和美洲

113

有关非洲人最初到达伊比利亚或欧洲其他地方的年代已很难考证。然而，撒哈拉以南和以北的一些非洲人很可能是在古代大规模的跨撒哈拉贸易期间进人伊比利亚的。

非洲人还跟随穆斯林在711年向伊比利亚开战，随后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数百年的战争中，非洲人或作为战士参与战斗或作为奴隶提供服务。确实，早在13世纪摩尔人商人就在葡萄牙北部的吉马朗伊什的市场上出售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人。①

当葡萄牙于1415年占领休达时，一场欧洲人向非洲内陆的持久渗透开始了。到1435年，葡萄牙人已到达塞内加尔，1483年时已进人刚果。从1441年起，非洲人被带到里斯本，这是导致现代奴隶贸易中强迫非洲人移民的先例。确实，在1450到1500年间，估计葡萄牙人每年进口700到900名非洲奴隶。到17世纪初，在葡萄牙及其马德拉群岛估计有大约10万名奴隶。1468年，葡萄牙王室对塞内加尔河南部的奴隶贸易实行了著名的"阿西恩托"(asiento,垄断权)。

非洲奴隶人数大量增加必须合法化，尼古拉五世(1454年)和卡利西斯三世(1456年)发布的罗马教皇训令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他们将葡萄牙对非洲的扩张定义为传播基督教的一次十字军远征。随后，基督教徒将非洲人变为奴隶的行为被看做是有利于当地"异教徒"的。这种论点受到了《圣经》中有关含姆的神话的进一步支持，据说他的后裔受到诅咒并屈身于奴隶之位。这种《圣经》的和教会方面的力量为早期的关于非洲人生性"野蛮"和"下贱"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黑人奴隶工作在矿山、农场和建筑工地，他们做家务或当兵、卫士、信使、码头装卸工、工厂劳工和小妾。甚至不是奴隶的黑人做的也是最低下最艰苦的工作。② 114

出售和使用奴隶基本上是城市现象，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劳动力的进口发生在港口城镇。主要的城区有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加的斯、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以及葡萄牙的里斯本。都市生活为奴隶出逃提供了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还使奴隶有机会赎买他们的自由。因

① A. 路特拉尔(Luttrall)，1964年，第64页。

② J. 沃尔文(Walvin)，1972年，第10-12、32-47和115-152页。

此，这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自由的”黑人们也主要聚集于都市，在那里他们通过反映黑人所关心的事物的一些习俗来寻求培育一种共同体精神。宗教兄弟会的成立，在巴塞罗那大约是1455年，在巴伦西亚是1472年，在塞维利亚是1475年。这些组织发起了各种娱乐活动，节日庆祝和社会活动；他们聚敛钱财为其他奴隶赎买自由；他们为黑人买墓地，而这些墓地通常必须与其他墓地分开。[③]

一些自由的黑人在西班牙社会出了名。克里斯托瓦·德门尼西斯成了多明我会一位杰出的修道士；胡安·德帕莱加和塞瓦斯蒂安·戈麦斯两位都是画家；列奥那多·奥特兹成为一位律师。在1475年，胡安·德瓦拉杜利德被任命为塞维利亚黑人事务督察。然而，更杰出的是胡安·拉蒂诺，他是一位黑人学者，分别于1546年和1556年获得格拉纳达大学的两个学位；他还在该校教书，尽管显然没有正式的学院任命。[④]

虽然尼古拉·奥万杜于1502年作为第一位西班牙驻伊斯帕尼奥拉的总督，在就职时有非洲人作为侍从，而且皮埃尔·巴托罗缪·多拉斯·卡萨斯和其他人曾要求增加非洲奴隶的供应，但在1518年以前官方一直没有对美洲的奴隶贸易政策。1518年，葡萄牙的查尔斯一世正式宣布了《对黑人的垄断权》，由此加剧了对非洲奴隶的争夺。

葡萄牙尽管在1580年到1640年之间是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它在1600年通过从西班牙获得一项向西班牙殖民地提供非洲奴隶的合同而建立了对奴隶贸易的实际垄断。荷兰在1640年获得合同；法国则在1701年；而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之后，垄断权以“阿西恩托”的形式到了英国之手。英国因此而成为最大的奴隶贸易国。

虽然英国人具有向其他地区供应奴隶的垄断权，但在英国本土的非洲人数量也在增加。在威廉·霍金斯于1530年航行到西非之后，航船不断地将非洲奴隶带到英国。到1556年，伊丽莎白一世看到英国的“黑色摩尔人”太多，认为应将他们送回非洲。特别是从18世纪起，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探家时带着非洲人做家奴和保镖。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贩奴船的船长们也是如此。确实，拥有黑人奴仆成为一种显赫的标志。逐渐地，这种地位象征被广泛接受，人们认为这种仆人是廉价劳动力，报纸也为“尼格罗”大作广告。

115

非洲人大多被带到都市地区，在这些地方他们便于逃进拥挤的人群、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与反对奴隶制的自由人发展密切的关系。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其他地方的报纸不仅作奴隶广告，而且还要求归还逃奴。随着对奴隶需求的增长，绑架也在增多。在英国，猎奴者具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们精于追踪不受社会及其法律所保护的非洲人。非洲人经常被欧洲人根据肤色而从人群中挑出和认领，在许多情况下被奴隶主根据烙在他们身上的印记而认出。肤色使非洲人在欧洲像在非洲一样成为奴役的目标；而这种白人控制黑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将非洲人非人化的过程就是这样一直通行到18世纪。[⑤]

非洲人在英国的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想知道他们的地位。一些英国人感到皈依基督教会

③ L.B.鲁特(Rout)，1976年，第15-16页。
④ 同上，第18页；V.B.斯普拉特林(Spratlin)，1938年。
⑤ F.O.夏隆(Shyllon)，1974年，第5-10页。

带来自由和文明人的权利。格兰维尔·夏普是为消除奴隶制而战斗的英国人之一。从1767年非洲人乔纳森·斯特朗的案子开始时起，夏普就支持非洲奴隶的事业，援救非洲人并为他们的自由与法庭作斗争。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772年詹姆斯·萨默塞特的案子，他是一名逃奴，后被抓回。伦敦的非洲人社会密切关注着案子的进展，因为他们知道其结果对他们所有人都具有意义。

曼斯菲尔德勋爵主管此案，事实上他并没有消除奴隶制，但是他确实裁定奴隶主迫使奴隶伴其出国是不合法的——这一判决标志着英国的奴隶制开始动摇。

那时，据估计有大约15,000名非洲人居住在英国，其中一些人过着流浪者一样的贫困生活。⑥

从15世纪起，非洲人在法国的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这一时期法国水手频繁往来于西非沿岸各地；特别是佛得角群岛和塞内加尔河。许多人将非洲人带到法国，最初是作为他们航海的证据，后来则是为了出售。到1595年，葡萄牙的船长阿尔瓦雷斯·阿尔梅达注意到许多在非洲的非洲人讲法语并到过法国。

将非洲人作为奴隶的活动确曾发生在法国，但很明显其发展初始并非是意愿中的事。确实，皇家法院于1571年宣布："法国是自由之母，决不容许任何人受奴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些非洲人成了奴隶，而其他仍然自由的人也处于敌对的社会环境之中。一些观察家注意到非洲人曾在法国的一些城市中出现，如安茹、里昂、奥尔良、南特和巴黎。他们被当做奴仆、矿工，甚至作为贵族的意仆；有些人还被用于展示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还有一些成为士兵，如参加萨克斯志愿军团，该军团是由来自几内亚、刚果和马达加斯加的黑人所组成。在18世纪，他们在几次欧洲战斗中赢得赞扬。⑦ **116**

然而，法国军队中最杰出的黑人是亚历山大·杜马，他生于19世纪，是一位法国人和他的非洲情妇所生。杜马家族的后代在军事和艺术领域建立了声望。但大部分在法国的非洲人都是家奴，生活上不像他们的奴隶兄弟们那样悲惨。

从17世纪末起，来法国的非洲人数量大增，而在18世纪，皇家政策允许法国在美洲的奴隶主把他们的奴隶带到法国。因此，在法国黑人更是司空见惯了。

有关非洲人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的报道很少。然而，一些非洲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使节和朝圣者，在中世纪后期访问过欧洲，到15世纪，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僧人和其他非洲人，包括一些奴隶曾住在威尼斯、梵蒂冈和邻近的城市。⑧

威尼斯人既是奴隶贩子也是奴隶主。尽管大部分奴隶似乎是欧洲和亚洲血统，但有一些是非洲人。确实，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黑海交通受到限制之后，非洲奴隶的贸易增加了。大部分奴隶似乎来源于埃及港口，这点表明他们的原籍包括苏丹的尼罗河流域。⑨

文献记载太少，不足以说明非洲人在威尼斯和邻近地区的生活。某些报告认为他们被吸收进当地的家庭，因此到18世纪后期他们几乎上已不存在了。还有关于他们的地位，

⑥ 同上，第17-23页和141-164页。

⑦ I.B.凯克(Kake)，1948年，第73-85页。

⑧ T.塔姆拉特(Tamrat)，1977年；W.L.汉斯伯利(Hansberry)，1965年。

⑨ R.史密斯(Smith)，1979年。

事实是非自由人被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因此非洲奴隶和奴仆可能在这方面遭到损害。然而，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奴隶受到法律的保护。所有的奴隶必须接受洗礼，这也许有望给他们以更宽大的待遇。[10]无论如何，奴隶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对其身心所受的限制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图片 5.1 托马斯·亚历山大·杜马将军，1762-1806 年

117 有关非洲人散落异国他乡的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跨越大西洋直到美洲。[11]15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人口交易主要是加勒比地区和中南美洲的现象，因为葡萄牙人在巴西、荷兰人在圭亚那发展了种植业。16 世纪时这种交易与非洲人参加美洲的开发正好重合。在开发墨西哥期间，有30位非洲人陪伴着巴尔博厄，据报道其中一位在那里种植并收获了第一批小麦；还有 200 人陪阿尔瓦拉多去了基多，此外，有一些人参加了皮萨罗在秘鲁的开发。或许最著名的是埃斯特万尼哥，他在西班牙开发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地
118 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洲人参加了法国人在加拿大的探险，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参加了

---

⑩ 同上，第 53 和 57 页。

⑪ 建议参考的材料包括：J.E. 英尼科里(Inikori)，1982 年和 P.D. 柯廷(Curtin)，1969 年。

耶稣会传教团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征服。[12]

1619年,一艘荷兰船带着20名"黑奴"到詹姆斯顿作为契约雇工,由此引发了对黑人劳动力的需求并导致各种行动以约束非洲人的自由并限制他们当工人的选择权。在1660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正式建立奴隶制时,这种行动达到了顶峰,到该世纪末,非洲人被法律归属为动产奴的地位,即可由他们的主人随意处置的财产,而无需考虑非洲人也是人,并且没有受国家遏制的可能性。这种奴隶制是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并且被欧洲人的信念和观点所强化,由于肤色和体形的不同,他们认为非洲人生来是下贱的。[13]

与此同时,英国和西班牙为控制加勒比地区而战。1627年,英国占领了巴巴多斯,于1655年占领了牙买加。蔗糖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在此后40多年那里的劳动力几乎增加了十倍,大量奴隶从黄金海岸、安哥拉、刚果、尼日利亚、达荷美进口,到1690年代还从马达加斯加进口奴隶。

英国和法国到17世纪下半叶加强了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动产奴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发展得较早,为北美提供了样板。此外,加勒比地区被作为非洲奴隶"适应水土的""中转"站。但由于相当多适应了水土的非洲人也知道加勒比地区的条件并在某些情况下卷入密谋和反叛活动,他们还为北美的奴隶进行反抗提供了榜样。

奴隶反叛是奴隶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最高阶段,在黑奴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通常密谋和反叛也更加频繁和激烈。例如在英属圭亚那,奴隶人数最多时约占整个人口的90%;牙买加、巴西和圣多明各(海地)也有如此大量集中的黑人;连古巴也不落后。然而,在美国,黑人只在两个州占有多数: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

除了圣多明各,美洲最大的黑人反叛发生在牙买加和圭亚那。第一次是1725年在牙买加的马龙人战争,当时大批奴隶逃进山区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社会。1739年,英国被迫与来自黄金海岸的科卓船长签署条约,他同意送回逃奴以换取自治权并免除税赋。

圭亚那(包括埃塞奎博、伯比斯和德梅拉拉地区)在18世纪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反叛,1823年是最大的一次。1740年代,黑人的反抗导致荷兰与科罗门特的领导人阿多依签署了友好条约。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曾开始一项计划,要消灭所有的欧洲人,但这仅限于小地区内。到该世纪中期,又一个科罗门特人领导的团体进行了另一次接管殖民地的尝试,但未成功。但18世纪60年代特别值得注意,它以当时科菲组织的非洲人和克里奥耳人的"大暴动"(1763-1764年)为标志,一些分析家把此次暴动看做是圣多明各反叛的序曲。墨西哥的非洲奴隶在16和17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叛,目的在于组织非洲人社会,而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马龙人,秘鲁的黑人和背风及向风群岛、古巴及其他地区的奴隶们也进行了同样的努力。[14] 120

[12] R.W.洛根(Logan),1940年;J.W.约翰逊(Johnson),1941年。

[13] 美国论述黑人的唯一最权威的资料来源是J.H.富兰克林(Franklin),1967年。

[14] R.普赖斯(Price),1973年;R.巴斯蒂德(Bastide),1971年;A.D.拉拉(Lala),1978年;R.梅尔莱夫(Mellafe),1964年;C.F.吉洛特(Guillot),1961年;G.A.贝尔特伦(Beltran),1958年;M.A.塞格尼斯(Saignes),1967年;F.B.菲古罗(Figueroa),1961年;J.J.乌里贝(Uribe),1963年;F.奥尔蒂斯(Ortiz),1916年;E.V.戈维亚(Goveia),1965年;教科文组织,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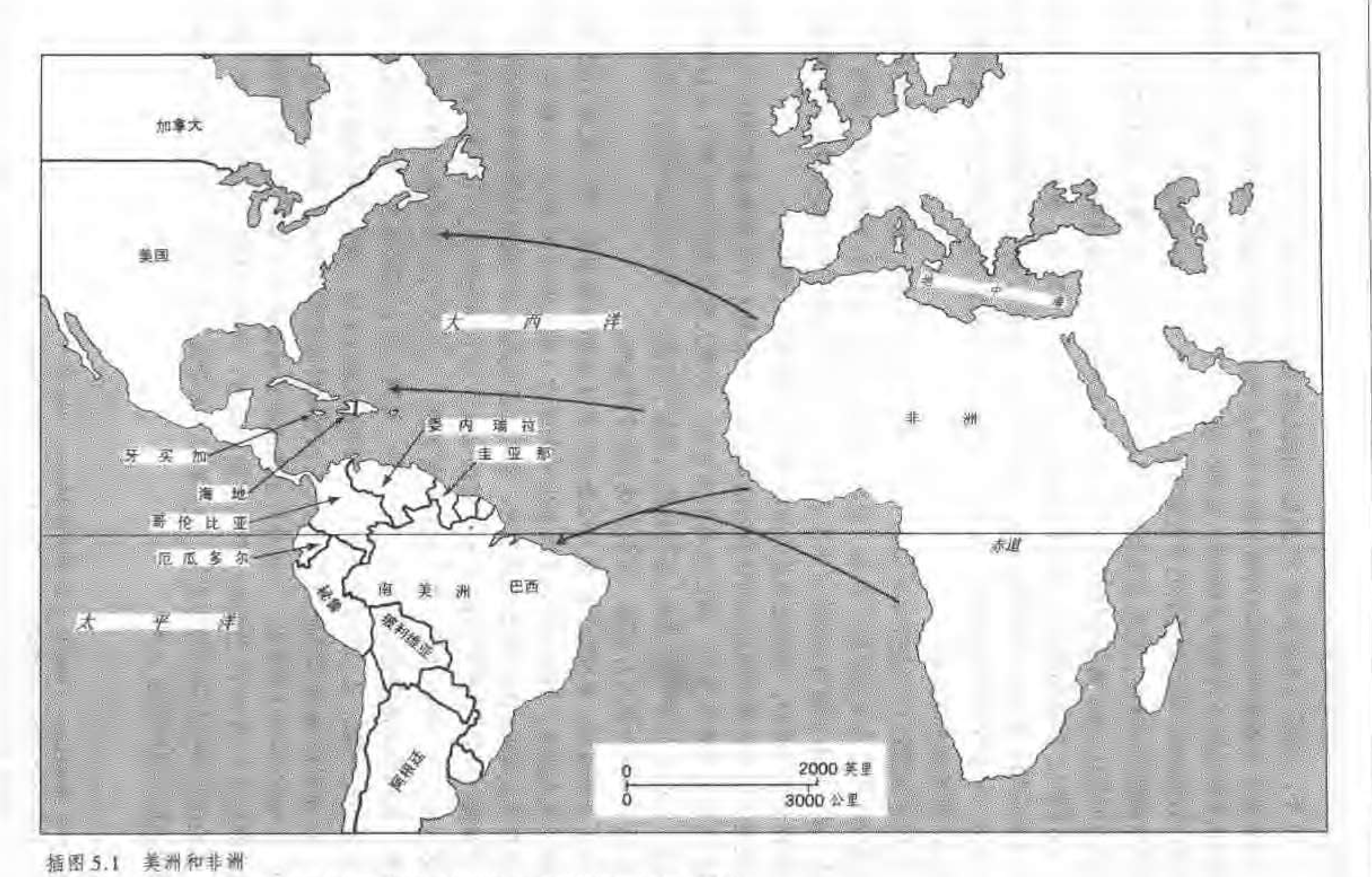


插图 5.1　美洲和非洲

资料来源：根据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地质地理系杜拉尔·C. 戈斯瓦米博士的地图改编。

在巴西，非洲人的武装斗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早于圣多明各时代。小规模的反叛一直是巴西奴隶史的组成部分，但正是帕尔马里斯国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1605到1695年，建立了一个自治的非洲人社会，估计有两万名来自刚果-安哥拉地区的班图人血统的居民。他们模仿家乡的社会并反抗荷兰和葡萄牙人，直到1695年最终屈服。[15]

这些争取自由的斗争表现了在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流落他乡的非洲人的新生的民族主义。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复仇或逃进深山，还为了建立一些非洲人有政治控制权的地区，能够保卫自己，防御敌人。非洲的宗教，如“奥比”(obeah)和伏敦(vodum)，是进行组织工作的重要工具。伊斯兰教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巴伊亚，它促使豪萨人和约鲁巴人团结一致。[16]

在同一时期内，北美洲也发生了非洲人筹划的许多大的密谋活动和几起重大暴乱。[17]大多数种植园都远离适于暴动的地区，如牙买加的山区或圭亚那的森林。但是在一些南方殖民地有相当数量的奴隶选择了逃到印第安人或其他人群中生活的道路，如逃到佛罗里达的塞米诺尔印第安人那里，此后逃奴们又和他们一起袭击了邻近的种植园。在18世纪初，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当以非洲人终身奴隶化代替契约奴隶制的形势一明朗，暴乱随之发生，当南北卡罗来纳用在加勒比地区发展起来的奴隶规则来进行大面积种植园生产时也是如此。 **121**

1730年，在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三个殖民地发现了奴隶们参加的谋反。他们是由以前曾参加过西部非洲反叛活动的非洲人领导的。次年，在罗得岛海岸停泊的一艘贩奴船发生了哗变，四年之后，“海豚号”贩奴船上一群奴隶和奴隶贩子同归于尽。此时期最严重的叛乱于1739年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当时科卓在牙买加的山区击败英国军队。这次叛乱称做“卡图暴乱”。[18]

在北美殖民地，非洲人不足三千，白人大约相当于其六倍，而且这里没有种殖园，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1712年由一位黄金海岸的非洲人领导的一群人试图烧毁纽约城。1723年，在波士顿也有一次类似的企图。1741年，发生了最广为人知的事件——另一次烧毁纽约城的企图，对事件的细节至今仍有争论。在《独立宣言》签署之前两年，波士顿发生了另一次恐慌。具有意义的是北美出现的第一轮密谋活动和反叛往往是由刚被贩进并仍在为反对被奴役而战的非洲人领导的。到1772年，在北美洲的几处殖民地有人建议将所有的自由黑人驱逐到非洲或西印度群岛。自由黑人被认为是抵抗运动的教唆者。[19]在革命活动之后，对被捕者实施了绞刑和类似的残酷手段。在北美洲有加勒比地区没有的某些安全阀。例如，在特别靠北的地方有逃跑的可能性。在北方和南方以及在加拿大也有欧洲人团

[15] C. 摩拉(Moura)，1959年和1972年；L. 卢纳(Luna)，1968年；S.B. 施瓦茨(Schwartz)，1970和1977年；R.K. 肯特(Kent)，1965年；E.D. 吉诺维斯(Genovese)，1979年；D.H. 波特(Porter)，1970年，第37-40页。

[16] E. 埃格纳斯(Ignace)，1970年。

[17] H. 阿普特克(Aptheker)，1943年；E.D. 吉诺维斯，1979年。

[18] 同上。

[19] 同上。

体——特别是教友派教徒——他们呼吁反对奴隶制并乐于救助逃亡者。然而，除了这点，1700 到 1750 年期间许多北美的非洲人似乎已经受了加勒比地区马龙人暴乱的影响。

在 1750 年到 1775 年之间，影响非洲人的事件在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走向高潮。伴随着英国控制的建立，英国反奴隶制运动在发展。这在 1772 年导致了著名的《曼斯菲尔德勋爵裁决》，这一裁决使将人当做奴隶的行为在不列颠群岛成为非法。在美洲殖民地一场白人运动开展起来，其目的是要摆脱英国的政治权力。它造成了一场关于黑人是否也应享有自由的哲学辩论。

1776年，北美殖民地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宣言》。然而，殖民地的许多非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实现自己的自由，因此，对他们当中识字的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来说，加入到欧洲人之中来表达他们争取自由的权利是自然的。一些非洲人与白人并肩战斗反对英国。事实上，1770 年在反对英国的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是克里斯珀斯·阿图克斯。这是美洲独立战争的序曲。在此期间，有几位非洲人拿起了武器，他们的非洲名字永垂史册。有些人成了逃兵，英国人给予了他们自由。[20]

122

在法属圣多明各(到目前为止仍有相当多的黑白混血人)，一群有色志愿人员在乔治亚的萨凡纳帮助殖民者打击英国人。在北美，争取自由的斗争开始了；但它的性质特别，是美国的欧洲人寻求从英国那里得到自由，而与此同时，非洲人则要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双方获得自由并与这两个集团进行斗争。

流落到美洲的非洲人是欧洲大国所控制的世界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强大的经济和知识力量正在这里重组政治和社会结构。一些人对这种力量有所理解，正是由于他们在欧洲体制中的存在与行动才对欧洲的决定造成某些影响。他们确实意见分歧。一些人相信拯救存在于与欧洲人价值观和目标同化；但另一些人却献身于他们的非洲人事业，并准备冒生命危险反抗和抵制欧洲人的压迫。

拯救的方法之一就是塞拉利昂试验，这是遵从 1772 年曼斯菲尔德勋爵的法院裁决，即主人不能强迫其奴隶从英国迁出。这项裁决，以及那些因与英国人并肩战斗反对美国独立而获得自由的非洲人的流人，致使伦敦出现一个相当大的黑人社会。废奴主义者由此追求的理想是，使自由的黑人重新定居于非洲，希望在那里以自由劳动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能传播基督教，发展一种西方式的经济和为废除奴隶贸易发挥作用。就这样，在 1787 年，400 多名被解放的非洲人从英国送出，到塞拉利昂定居。这是第一次将非洲释奴成批地返回的实践。

第一次由非洲人自我资助为此目的而组织的活动或许发生在美国，系由保罗·科菲领导的。科菲对塞拉利昂试验的潜在意义印象深刻，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将想要回到非洲的黑人团结起来；他还想与非洲发展贸易。科菲的想法和努力除了在 1814 年使 38 名非洲人重返非洲外，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效果，然而，他的榜样鼓舞了未来几代人。[21]

123

当在美国的欧洲人团结起来并建立机构以表达他们的文化和独立之时，非洲人的幻想

---

[20] B. 夸尔斯(Quarles)，1961 年，是这一题目的最好的资料来源。

[21] H.N. 舍伍德(Sherwood)，1923 年。

破灭和挫折感因种族骄傲而强化，他们也建立了若干机构。他们开始称自己为“非洲人”——这是具有意义的一步，因为大部分人是在孩提时代被绑架的，很少作为非洲人种的身份来接受教育和生活。黑人法典禁止他们讲非洲的语言或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而家庭经常在贩奴时被拆散。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1787 年美国卫理公会一位非洲人牧师理查德·艾伦因抗议在一所他们一直在那里做礼拜的白人教堂将他与其他人分开的企图，他分离出去组建了具有宗教和社会目的的“自由非洲人社会”。美国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开始模仿此类行动，有时为他们自己的志愿协会使用同样的名称。与此同时，波士顿一位巴巴多斯出生的传道者兼商人普林斯·霍尔试图为一个自由黑人分会获取一份许可证，此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一些英国士兵介绍曾加人共济会。白人共济会会员拒绝了他，他又向苏格兰人权利共济会提出申请，他们同意了那份许可证并授权由他组织黑人分会，担任大长老。这是黑人中间第一个西方式的兄弟会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非洲人在非洲从事秘密社团组织活动的一种继续。这些活动为 19 世纪成为美洲黑人的两个最强大的机构形式——社团和宗教组织——奠定了基础，这种机构在民族的范围内将黑人团结在一起。[22]

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出现于 1787 年，不是由黑人建立而是由想帮助黑人的白人建立的。该机构称做“纽约自由非洲人学校”，由“解放社”开办，有 40 名学生。

虽然非洲人的标签代表了黑人决心以其家乡的传统和文化来认同自己，但这些组织也是西方价值观的载体，例如要节俭、清教徒神学、通过努力工作和教育来获得个人的地位、关心不幸的人和为社会服务。这正是乔治·列莱等人的动机，他在 18 世纪后期在美国和牙买加建立了浸礼会。非洲人在后来关心其他地方的非洲人时运用了这些思想。在美国黑人中的这种创新有助于在未来年代里为在美国、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社会认同的发展提供基础。

这一时期非洲血统的美国人的领袖大都是自学成才或仅接受过几年的正规教育。然而，有些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菲利斯·惠特利，大约 1753 年生于非洲，成了一位著名的诗人。古斯塔夫斯·瓦萨，1745年生于贝宁，先被带到美国，后又到英国，是反奴隶制运 **125** 动的积极分子，著有重要著作：《欧洛达赫·埃奎阿诺，或古斯塔夫斯·瓦萨一生趣事叙述》，该书谴责了奴隶制。本杰明·班耐克，有时称“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编纂了一本年鉴，还承担了界定和规划华盛顿特区的任务。[23]

在欧洲的非洲人也参与了为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斗争。安东·阿莫曾在哈雷大学和沃尔登伯格大学读书，之后回去帮助他在黄金海岸的非洲伙伴们。[24]同样地，黄金海岸的菲利 **126** 普·奎科和雅可彼斯·卡皮丁也曾在欧洲学习后返回家乡工作。奥托巴赫·卡古阿诺后来写了《关于罪恶的奴隶贸易和人类交易的思想和情感》，他因 1772 年曼斯菲尔德裁决而获得自由。伊格内修斯·桑卓死后发表的信件证明他也是海外非洲人的重要代言人。此外，一

㉒ 见 A. 希尔(Hill)和 M. 基尔逊(Kilson)，1969 年。

㉓ 班耐克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大脑的能力与肤色无关的新的证明”。见 J.H. 富兰克林，1967 年，第 157 页。

㉔ A.G. 阿莫(Arn)，1968 年。

些非洲使者也活跃于欧洲，其中包括来自刚果、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和黄金海岸的代表。[25] 在欧洲，像在美国一样，非洲的抗议者找到了一些白人同盟者，例如建在巴黎的“黑人之友协会”。



图片 5.2 菲利斯·惠特利，18 世纪的奴仆成了一位杰出的诗人

[25] W. 罗德尼(Rodney)，1975 年；W.L. 汉斯伯利，1965 年。

然而，正是在美洲，争取自由的斗争最先达到惊人的国际化程度。美洲各地都有小部分黑人获得自由，个别人从未做过奴隶，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无力影响总的国家政策，但他们满怀兴趣注视着世界发展对黑人的影响。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以及黑奴都深受圣多明各岛(海地)发生的事件的影响。

在美利坚合众国实行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禁止奴隶制的宪法仅仅两年之后，法国爆发了一场革命，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震撼了法国在圣多明各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在这块盛产蔗糖的繁荣的殖民地上，50 万奴隶和 2.4 万有色自由人生活在大约 3.2 万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这些法国人以富有和残暴地对待奴隶而闻名。那些自由的非洲人，其中包括几位奴隶拥有者，认真看待法国革命的口号，要求与白人享有充分的平等。此后，于 1791 年，大批黑人在一位不识字的农场黑奴布克曼的领导下行动起来，他用伏都教仪式和非洲式的秘密誓约将其追随者团结起来，反对他们的主人。巴黎的革命政府派去一支军队恢复秩序。正是在这个阶段，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出现在舞台上——有文化的基督教徒、赶马车的奴隶、父亲为非洲人而本人生来飘落异国的图森，他名叫路维杜尔(开局



图片 5.3 本杰明·班耐克，一位黑人自由民，后成为极受尊重的数学家、发明家和华盛顿特区设计者

人）。[25]

图森号召采取游击行动以支持他的弱小军队，并且借助于黄热病在五年之内打败了拿破仑的侵略军。他使海地恢复了秩序与繁荣，他的军事能力、管理技巧、仁慈和政治家风度得到全世界的赞扬。他的声望迅速传播，通过黑人水手传到美国黑人那里。这些水手在向黑人社会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片 5.4 海地的图森·路维杜尔

127 非洲人解放运动在海地的成功使美国白人感到恐惧，害怕美国黑人也会通过暴力来寻求自由。他们通过了更加严格的立法，加强了警察保安并采取步骤限制黑人在国内流动及防止黑人移民，特别是从海地移民。另一方面，美国的非洲人受到他们在海地的兄弟们取得的成就的鼓舞。海地和图森·路维杜尔就这样成为象征，鼓舞着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地区的黑人们去争取带有独立可能性的自由。

19 世纪在美国以一次重要的谋反为开端，加布里埃尔·普罗瑟，一位黑人传道者，组织并领导了 1000 多名奴隶进军去反对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其目的是要赢得自由。但因走漏了消息，给总督以时间得以召集军队恢复秩序。许多非洲人被捕并被杀，包括普罗瑟，

[25] C.L.R. 詹姆斯(James)，1963 年；P.M. 方丹(Fontaine)，1970 年。

但与海地榜样的联系及其精神仍在。

到19世纪初，在美洲和欧洲的非洲人已处在一个新时期的边缘。尽管欧洲和美国关于 **128** 黑奴和自由黑人的法律应用不同，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欧洲或美国的制度都不把黑人作为平等的和真正自由的人来接受，尽管有若干关于黑人角色更大灵活性的例子。例如，非洲人确实学习读书和写字，即使法律禁止这样做；出现了通婚现象，虽然大多数人表示反感；国内和国际的旅行促进了网络的发展。流落异国的非洲人知道他们是海外的贱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地位被剥夺是由于他们的非洲人身份和遗产。因此，他们努力组织社会机构，包括策划谋反，来赎回黑人和他们的遗产。这种心理上的团结盛行起来，并确实成为黑人中的力量源泉，在19和20世纪的泛非运动中达到顶峰。

然而，飘落异国的非洲人不能摆脱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目标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对自己和其他人的看法反映了欧美文化几个世纪的灌输，而他们的非洲遗产的记忆，尽管是强烈和具有决定性的，却由于年代已久并远居他乡而模糊了。在欧洲和美洲，飘落异国的非洲人就这样成了土著非洲人和欧美人之间的文化中间人。

亚 洲

非洲人被迫移民到欧洲和美洲在世界历史上是相当近的一页，而亚洲的黑奴贸易构成的一章却久远得多，而且延续不断。约著于公元50年的《红海环航记》，谈到从非洲之角抓来的奴隶，毫无理由认为这是奴隶贸易的第一个例子。

红海两岸各族人民的互相混合似乎在史前时期就有其根源。但从7世纪和伊斯兰教诞生起，一种文化的结合席卷了整个印度洋-红海地区。东非的几个沿海城镇成为伊斯兰化，穆斯林对贸易的控制日益增加，包括奴隶贸易。9世纪期间僧祇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反叛表明，这种贸易活动在亚洲部分地区已经变得相当重要。虽然僧祇人被消灭了，但他们的起义加速了阿拔斯哈里发的崩溃，而H. 德尚称之为“一个包括了数百名黑人奴隶劳动的伟大的热带建筑计划的第一个样板”——在伊拉克南部建设水坝也因之而失败。稍早一点，在8世纪，中国皇帝的朝廷里曾出现过两位黑人奴隶；而在12世纪，一些广东人曾使 **129** 用非洲奴隶工。[27] 原始资料还使我们了解到东非人的贸易延绵不断：马苏迪在11世纪，伊德利斯在12世纪对此都有所记载；而伊本·巴图塔在14世纪提到基尔瓦的繁荣也与奴隶贸易有关。

遗憾的是，对地中海北部沿岸客居的非洲人的历史，学者们的调查研究还远远不够。在土耳其及其邻国，对几百年来从的黎波里和班加西来的奴隶的主要集散地和内陆交通的过渡带特别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这种贸易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1696年在君士坦丁

---

[27] 教科文组织，1979和1980年；C.M. 威尔伯(Wilbur)，1967年，第93页；E. 布列什耐德(Bretschneider)，1871年，第13-22页。关于本书讨论的这一时期之前散居在阿拉伯和亚洲的非洲人问题最新讨论情况，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3卷，第2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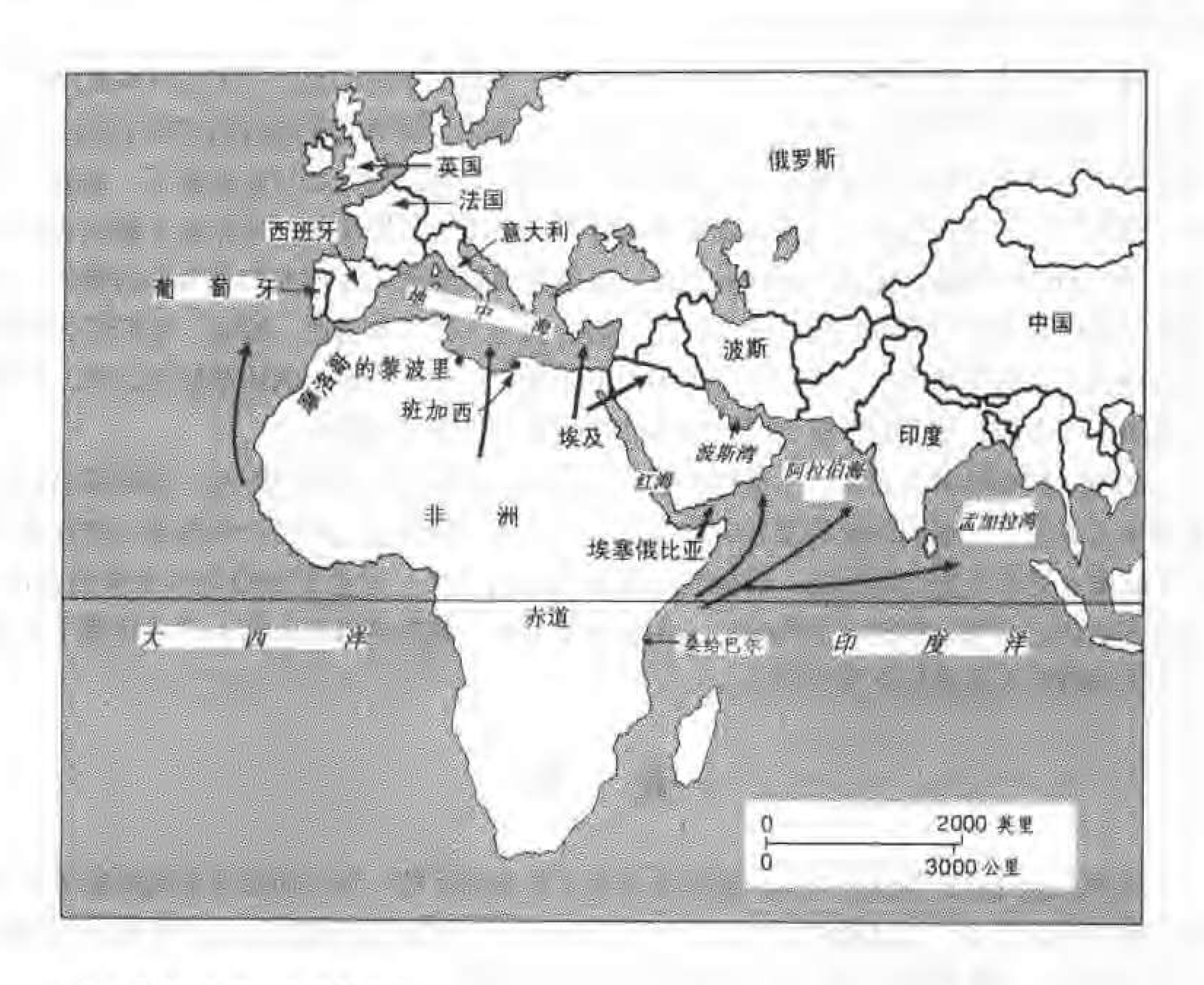


插图 5.2　非洲、欧洲和亚洲

资料来源：根据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地质地理系杜拉尔·C. 戈斯瓦米博士的地图改编。

堡曾为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购买了几个非洲男孩儿。其中一位是艾布拉姆·彼德罗维奇·甘尼鲍，他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曾祖父。甘尼鲍看来是生于埃塞俄比亚，在那儿被土耳其人抓走。究竟有多少非洲奴隶经由土耳其到达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没人知道，但数量可能不多。这一情况以及在 18 世纪最初 25 年俄罗斯取消了奴隶制这一事实，或许是非洲人后来在这里成为奴仆而非奴隶的原因。[23]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文献，但黑人奴隶制及其附带的各种限制，在俄国似乎并没有发展起来。

大部分进口到亚洲的奴隶都是儿童，女童的数量最多。奴隶们通常是从东非的港口运到阿拉伯红海穆哈港，从那里许多人或步行或再乘船前往荷台达、吉达、麦加和其他阿拉伯的集散地。另外一些人换船到波斯湾各港口，如沙加、舒穆斯卡、阿巴斯港、伦格港、巴林、布什尔、科威特和巴士拉。印度各港口经常有来自穆哈或波斯湾的船只停靠，尽管某些货物直接来自东部非洲。印度港口包括孟买、果阿、苏拉特、加里加尔、本地治里、

[23] 普希金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他的非洲遗传，以示纪念。见 D. 马加尔沙克(Magarshack)，1969 年，第 12-17 页；A. 佩里(Perry)，1923 年；B. 莫扎列夫斯基(Modzalevskii)，1907 年；N. 马列瓦诺夫(Malevanov)，1974 年；B. 库兹洛夫(Kozlov)，1970 年；A. 布莱克利(Blakeley)，1976 年。

加尔各答以及库奇、古吉拉特各地、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印度洋上的几处岛屿。[29]

在阿拉伯半岛，阿曼在中东的海军和商业战略中拥有关键地位，因此在阿拉伯人中率先卷入奴隶贸易。其首都马斯喀特控制着通往波斯湾的通道，大量非洲奴隶由此被运走。阿曼的阿拉伯人分别于1784年和1785年占领了东部非洲的港口基尔瓦和桑给巴尔，并且从那时起声称对沿岸的几个城镇拥有主权。阿曼的素丹于18世纪后期获得对桑给巴尔和东 130 非沿岸部分地区的控制之后，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用以收获该地区阿拉伯人拥有的种植园的丁香和椰子。[30]

从古代起，在也门和哈达拉毛就有来自黑非洲的人。他们好像大都来自埃塞俄比亚，在业丁似乎被看做“不可接触者”。在阿拉伯南部其他几个地区，非洲来的黑奴服务于地方素丹的军队中，当妾和家奴、阉人、船员和码头工，或在盐场及甘蔗和枣椰种植园做管理员和农工。[31]

非洲人还在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定居。荷兰人在东非和马达加斯加挑选奴隶并将他们带到印度尼西亚；法国人和英国人把东非人作为奴隶安置在马斯克林群岛的波旁岛(留尼汪)和毛里求斯。确实，据一位观察家记录，从1670年到1810年大约有16万奴隶从马达加斯加、东非沿岸、西非和印度运抵马斯克林群岛。1808年波旁岛的奴隶人口估计有53,726人， 131 大部分来自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32] 19世纪，马斯克林群岛的非洲居民随着奴隶贸易的扩张而增加。甚至在此之前，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克里奥耳人社会，其影响后来在19和20世纪发挥出来。此外，还有一些非洲人随着商人和从麦加返回的穆斯林朝圣者来到马来诸国。[33]

南亚的非洲奴隶远比亚洲其他地方的奴隶多。[34] 这也许是由于强大的穆斯林控制着繁荣的印度西海岸，而且印度人在东非定居使这一地区与非洲的贸易时间更长，获利更多。不管怎样，至少到13世纪非洲奴隶在印度都是很重要的。例如，德里素丹王国的君主，拉齐亚女王，很喜欢一个名叫贾拉鲁德-乌德-丁·雅库特的“哈布什”[35]（非洲人)奴隶，她任命他担任王室养马师。另一位非洲人，马立克·萨瓦尔，是德里素丹穆罕默德的一个奴隶，于1389年成为副素丹。[36]

15世纪后半叶，非洲人出现在北印度的另外一个部分，孟加拉。非洲人从加尔各答地区沿岸、达卡地区和几个岛屿地区移民到那里。孟加拉的统治者，鲁肯-乌德-丁-巴尔巴克(1459—1474年)曾将忠实的非洲人晋升到负有军事和行政职责的位置上。在国王的大约

---

[29] J.E.哈里斯(Harris)，1977年，第264-268页。

[30] 详见本卷第25章。

[31] R.B.萨金特(Serjeant)，1967年，第67和287页；J.E.哈里斯，1971年，第39-41页。

[32] 教科文组织，1979年。

[33] R.马克斯韦尔(Maxwell)，1932年。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领域。

[34] 今日南亚的广阔地区当时尚未统一，包含有不同的种族和政治实体，后来出现的最大的国家是印度，它包括了本节所讨论的大部分地区，这里采用的即是这一名称。

[35] “哈布什”(Habshi)和“希迪”(Siddi)两词可以互用，指在亚洲的非洲人。有关这一主题的通史，见：J.E.哈里斯，1971年。

[36] R.C.马琼姆达尔(Majumdar)，1951年，第186-187页、188页和698-702页；以及《剑桥印度史》，1937年，第3卷，第251-252页。

8000名非洲奴隶士兵中，有几位非洲人高级将领。

巴尔巴克死后，一个动乱时期随之出现。1486年，朝廷卫队的太监司令沙赫加达，领导一群非洲人政变成功，并使用了巴尔巴克·沙赫的头衔。然而，他随后被另外一个忠于前统治者的非洲人阿米尔-乌-埃莫纳·马里赫·安迪尔(英迪尔汗)所杀。英迪尔汗成为赛福德-丁-菲鲁兹并统治了三年时间。他死后由纳斯尔-乌德-丁·穆罕默德继任。他是一位未成年者，身份不详。但他的摄政者，哈贝什汗，是一个非洲人。后来1490年，一位非洲人卫士西迪·巴德尔，带着一支据说包括5000名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3万人的军队攫取了王位，称为哈姆斯-乌德-丁·阿布·纳斯尔·穆扎法尔·沙赫。当他于1493年去世时，非洲 **132** 人被撤职并被赶出王国；但他们在短短的统治时期内留下了自己的标记。[37]

在古吉拉特，非洲人至少从13世纪起便服务于军队，而且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据报导，1576年，古吉拉特政府曾称赞过400名奴隶，他们都是“印度酋长和阿比西尼亚人的孩子”。[38] 有些人是在1527年穆斯林阿拉伯人侵略埃塞俄比亚期间被俘奴隶的后裔。另外一些人于1531年被穆斯塔法·本·巴赫拉姆带到古吉拉特，他是一位土耳其司令官，曾帮助穆斯林印度人保卫自己反对葡萄牙。[39] 据报道，1537年时，艾哈迈达巴德已有多达5000名非洲人在政府工作。[40] 这些早期的非洲人似乎成了一个中心，从这里非洲人迁移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41]

在16世纪期间，几位非洲人在古吉拉特表现突出。雅库特·萨比特·汗·哈布什(乌鲁夫汗)、赫亚拉特汗和朱加尔汗成为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埃卡蒂亚尔-乌-莫克组织了一个约有两万人的武装，包括阿富汗人、拉杰普特人、古吉拉特人和非洲人，向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尔的部队挑战。尽管被打败，埃卡蒂亚尔却赢得了阿克巴尔和古吉拉特人的尊重。一位前非洲奴隶，谢赫·塞伊德·哈布什·素丹尼，作为一名战士在朱加尔汗的军队中服役。他退休后买了地，到麦加去朝圣，并开放其土地，每日为数百名穷人提供饭食。他还建了一座图书馆，吸引了许多学者。[42]

1573年，塞伊德(萨伊德)在艾哈迈达巴德建了一座清真寺，关于此建筑的铭文中写道：“为了安拉，他建了这座清真寺，建设者萨伊德。”西迪·萨伊德清真寺，如众所周知，设计很简单，拱形屋顶和漂亮的拱形孔窗，带有精美的窗花格和花形式样。一位著名的印度和东方建筑权威人士詹姆斯·弗格森是这样评论这座清真寺的：

> 要超越这种技巧是困难的，状似植物的造形以传统方式恰到好处地达到目的要求……，但也许最高超的技巧显示在遍布于整个表面的均匀格式中。在阿格拉和德里有一些用贵重的大理石做的精美的窗花格样品，但没有一个比得上

---

[37] 同上，第214和215页。

[38] K.K.巴苏(Basu)，1932年。

[39] M.S.康米撒利亚特(Commissariat)，1957年，第2卷，第470页。

[40] 哈吉吉·达比尔(Hadjdj al-Dabir)，无出版日期，第407和447页。

[41] 有关卡奇的人物(包括非洲人在内)注释和图像见B.N.高斯瓦米(Goswamy)和A.L.巴拉佩塞奥拉(Ballapeceola)，1978年。

[42] 同上，第471页、508-524页、441-443页和448页；E.D.罗斯(Ross)，1921年，第2卷，第640-643页。

这个。[43]

弗格森和一位同事写道： 133

它可能比任何经设计的其他建筑物细部，即使是由希腊中世纪最好的建筑师设计的作品，都更像一件天成之作。[44]

M.S. 康米撒利亚特写道：

这座可爱的世界著名的清真寺是古吉拉特穆斯林建筑最伟大的创造时期最后的高贵样品。[45]

另一位非洲人，西迪·巴希尔在艾哈迈达巴德建了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它很独特，有两个震动的尖塔，每个塔有三层。当一个塔尖震动时，会传到另一个塔尖。据报导，这种样式，在当时是一个创新。

离古吉拉特不远是金吉拉岛，该岛在古代时期是西北印度繁荣的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它包括今日的孟买和贡根海岸。根据传说，金吉拉的"希迪人"(Siddis)是非洲人后裔，他们于1489年从古吉拉特到达这里。当时一位为艾哈迈德讷格尔"尼赞姆"(国王)服务的埃塞俄比亚人化装成商人，带着300箱商品来到该岛。商品包括"希迪"战士，他们受命占领了该岛，任命他们中的一位做国王，为希迪"纳瓦布"(国王)的王朝奠定了基础。然而，大多数金吉拉的非洲人或许可追根溯源到东非奴隶贸易。[46]

从大约16世纪30年代起，葡萄牙人扩展了其对印度西海岸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特别是进口许多奴隶的贡根海岸。每次进口的奴隶数量很小，约六至十名，但进口的时间却一直延续到大约1740年，那时葡萄牙的制海权受到了法国和英国的严重挑战。大部分奴隶来自莫桑比克，尽管葡萄牙人1670年在第乌打败马斯喀特阿拉伯人时也抓了非洲奴隶。奴隶一般被葡萄牙人用于商业、农业、家务或其他体力劳动。某些人被训练成牧师和教师为宗教学校工作，特别是在果阿，那里已成为葡萄牙在东非和亚洲的殖民地总部。

在此期间，金吉拉保持了自治，到17世纪，"希迪人"已成为该岛主要的土地拥有者，并结成最大的穆斯林团体。一个由主要的"希迪人"领导者组成的长者委员会挑选作为国家和宗教首领的"纳瓦布"。他可以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任命和解除政府和宗教官员。从这种政治基础出发，金吉拉"希迪人"将其权力扩展到全岛及印度沿海地区。他们作为 134 水手控制了西北海岸，并于1616年成为马利克·阿姆巴尔的重要同盟，他是印度中部的一位"哈布什"国王，那里称为德干。两家的军队与莫卧儿人战斗了多年。金吉拉"希迪人"的作用及意义在印度学者K.M.潘尼卡的评论中有所反映，他称他们的海军活动导致莫卧儿人建立一支印度舰队。印度军事史学家贾杜纳斯·萨卡尔先生写道："金吉拉的阿比西尼亚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47]

---

[43] J. 弗格森(Fergusson)，1876年。

[44] J. 弗格森和T. 霍普(Hope)，1866年，第86-87页。

[45] M.S. 康米撒利亚特，1957年，第505页。

[46] J.E. 哈里斯，1971年，第80-87页，讨论金吉拉的历史。

[47] K.M. 潘尼卡(Panikkar)，1945年，第8页；J. 萨卡尔(Sarkar)，1919年，第4卷，第237-238页。



图片 5.5 马利克·阿姆巴尔，17世纪印度的一位非洲国王

由于“希迪人”对印度的贡根海岸的控制，17世纪期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多次努力将他们列人同盟者之列。然而，“希迪人”在本地区继续行使独立权力，后来还与荷兰人进行谈判。直至1759年，英国人才遏制住“希迪人”的权力，直到19世纪，金吉拉才屈从于英国的直接控制。

金吉拉的“希迪人”在印度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他们究竟如何能对土著集团行使如此权力尚不完全清楚，无疑，他们的穆斯林宗教和海上军事技巧是主要因素。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小小的非洲移民集团对大不列颠、葡萄牙和荷兰的政策与行动，以及当地的印度人国家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

非洲人还沿着马拉巴尔海岸的部分地区定居。在印度南部的科钦和喀拉拉的犹太黑人是非洲奴隶的后裔，他们在17和18世纪沿着马拉巴尔海岸定居，大多数成为体力劳动者并与当地居民和其他犹太人通婚。[48] 葡萄牙人应对非洲奴隶沿马拉巴尔海岸部分地区，特别是果阿周围定居负有责任，果阿在16世纪成为其总部之一。在16和17世纪，在果阿和锡兰以及澳门，黑奴充做士兵。[49]

意大利学者兼旅行家佩特罗·德拉·瓦勒报道说，从西非和东非来的黑人(几内亚人和莫桑比克人)是运往葡萄牙领土的部分货物。[50] 在葡萄牙人管辖的印度地区，黑奴从事几种体力劳动，包括用大水罐运水。奴隶还为葡萄牙人做挑夫及护卫，而非洲女人通常被留做情妇。

在印度的另一个地方德干，曾有一位非洲人维护他的权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马利克·阿姆巴尔是一位埃塞俄比亚人，他是最终到达印度之前在埃塞俄比亚、希贾兹、穆哈和巴格达被卖为奴的。阿姆巴尔在艾哈迈德讷格尔生活多年，那里有数千名非洲人，阿姆巴尔征募了1000人做他的卫士。

136

阿姆巴尔的伟大源于这种事实，即他成了艾哈迈德讷格尔国王的一支庞大军队的司令，并多次抵御莫卧儿人的进攻，在其有生之年防止了莫卧儿皇帝对德干的征服。他对艾哈迈德讷格尔周围地区统治了25年(1602—1626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建立了城镇，修筑了水渠和灌溉系统，发展了与亚洲和欧洲人的贸易，将学者和诗人吸引到他的朝廷，并在德干，促成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的建设。[51]

马利克·阿姆巴尔的活动确认了重要的两点：第一，在印度历史中个别非洲人发挥了具有影响的作用；第二，非洲人尽力赢得各种印度人的支持和尊重，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

结　论

非洲人的历史受到因大陆间奴隶贸易所产生的观念的影响太多，因此有必要特别强调非洲人出于自我意愿作为商人、牧师、水手、冒险家等进行的大陆间的迁移。对这种早期

---

[48] A.M. 佩斯卡特罗(Pescatello)，1972年。
[49] C.R. 博克瑟(Boxer)，1969年。
[50] E. 格雷(Grey)，1892年，第50-51页。
[51] J.E. 哈里斯，1971年，第91-98页。

自由黑人到海外的现象亟需进行研究，以便提供一个更完整和更现实的对世界文明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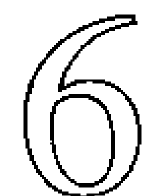
然而，正是大陆间的奴隶贸易首先建立了一个黑人到处存在的世界。[52] 正是这种贸易的本质及其结果，特别是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促使非洲人组织争取自由的斗争。多年来，这一斗争引起全世界对拯救非洲和解放黑人的共同关注。这一进程开始于现代初期，到1800年海地的图森·路维杜尔作为黑人自由的国际象征出现时，显示出国际基础的真正迹象。尽管有殖民统治，这一进程还是继续下来，并且可能确实是流落海外的非洲人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

（时永明 译）

---

[52] 见本卷第4章。

奥斯曼征服埃及



R. 维塞利

16世纪非洲和阿拉伯半岛许多地方的历史是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历史,奥斯曼是在 137 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建立的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强国，它在16世纪的一百年间接连征服了西亚和北非大部分阿拉伯国家。

1516年叙利亚和埃及的马木路克素丹王国在奥斯曼军队的进攻下崩溃了。奥斯曼与埃及的关系自15世纪80年代以来就很紧张。但1514年，在素丹谢里姆一世第一次率军攻打在他国境以东迅速扩大的强国波斯取得胜利之后，埃及的统治者终于决定采取抗击奥斯曼威胁的坚定立场。谢里姆以武力相报。两年以后，在他进行第二次波斯战争之时，他决心一举粉碎马木路克-萨非王朝(叙利亚王朝)联盟。

1516年8月24日奥斯曼军队在哈巴卜以北的马尔吉达比克平原上的交战中击溃了马木路克军队。奥斯曼之所以取得胜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军队占有技术优势，但哈巴卜的代理摄政埃米尔卡伊尔贝伊和他的军队在关键时刻倒向奥斯曼也起了很大作用。谢里姆战胜之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攻占了大马士革，随即占领了整个叙利亚和西奈沙漠以南的巴勒斯坦，使叙利亚成为奥斯曼帝国东部边陲和埃及之间的一个缓冲国。①

然而，埃及的一些新领导人似乎急于收复他们的叙利亚失地，而谢里姆则最终被他的顾问和在哈巴卜投向他的几位马木路克埃米尔所说服，以征服埃及来圆满结束他进行的战争。他继续向南进军，在向开罗挺进的途中遇到一些小的抵抗，于1517年1月23日在雷达尼亚的一次短暂的交战中击溃了由马木路克最后一位素丹图曼贝伊率领的马木路克军队，最终结束了马木路克素丹的统治。

军事优势虽然是奥斯曼战胜马木路克军队的最明显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两个国家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别。奥斯曼人在欧洲和在小亚细亚控制的是经济先进地区。他们拥有各种矿藏和原料，他们的生产集中在靠国际贸易联系的中心城市，而国 138 际贸易又给该帝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而马木路克诸国家几乎没有矿产资源，几乎全部依赖农业和国际转运贸易，其收益尤其是因为它的主要部分——东方香料贸易——已经被葡萄牙人所夺走而急剧下降。从非洲其他各地输入的贵重金属也在减少。马木路克多年来曾试图采取使用内部经济储备、没收土地和增加税收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所有这些办法反而加强了本地居民对外来的马木路克剥削者的憎恨并寄希望于该政权的彻底垮台。

① 见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阿里(Aḥmad b. al-Hādjdj Abū'l-ʿAlī)，1622年，第143页及以后诸页。

谢里姆于1516年在马尔吉达比克的胜利对西亚和北非产生了意义重大的结果。它决定了埃及马木路克素丹政权的命运，使波斯免除了奥斯曼的再次入侵，使叙利亚免遭即将灭亡的厄运，有了一个得以增强力量的稳定时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日后则成为奥斯曼人的永久性威胁。征服埃及也使奥斯曼改变政策，需要设法控制地中海的通道和促使帝国去征服北非的其他阿拉伯诸国。

新征服的原马木路克领土包括经济、政治和战略上许多极为重要的地区。埃及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有集约农业、众多的人口和红海的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迫使埃及的新统治者负有继续在印度洋与葡萄牙争夺霸权的战斗任务。此外，奥斯曼素丹的威望，由于他们和先前的马木路克素丹一样实际已成为伊斯兰教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以及亚非朝觐道路的保卫者而大大提高。

谢里姆在1517年9月离开埃及之前，任命马木路克的背叛者卡伊尔贝伊担任已划作一个行政单位的埃及省的首脑。卡伊尔贝伊的统治经历了奥斯曼在新获领土上走向全面控制的时期。他受命管理原先整个马木路克埃及，虽然他能施行的权力有限。他的统治地位与其说是一位省行政长官，不如说是素丹的一个臣属，即使他的委任在形式上一再重申，以致他的任职一直延续到他于1522年去世时为止。他保留了马木路克的指挥官之王(Mōlik al-umarā)的称号并按照马木路克的礼仪领导他的朝廷。他周围任用的都是愿为新政权效力的原马木路克显贵，新政权不仅委派他们担任财政方面的要职，而且还让他



图片6.1 素丹谢里姆一世，埃及的征服者

们担负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任。此外，一些旧行政管理办法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所有行政人员几乎都没有撤换。司法组织仍继续以四位大法官制度为基础，他们各代表 139 一个法学派。

谢里姆允许卡伊尔贝伊按照他自己的主张处理该省的收人。由卡伊尔贝伊定期送往奥斯曼的权力中心伊斯坦布尔的赠物与其说是必须上缴国库的物品，不如说是从他自己的资财中支付以表示他个人对素丹的谢意的礼物。

卡伊尔贝伊努力控制该新省的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也是为了遏制马木路克显贵们的权力——他废除了"伊克塔"(iḳṭāʿ,当时存在的封邑保有权)并把它们归人国家财产，由省财库给原占有者发放固定的薪金。他还修改了捐赠财产的规定。这些措施使制造更加精确和更加详细的土地登记册成为可能，从而使他能够完成他所承担的为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供应粮食的任务。

可是卡伊尔贝伊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谢里姆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便进一步加强奥 140 斯曼帝国的控制，一旦需要，便可立即挫败马木路克重新掌权的任何图谋。这支军队包括步兵支队(土耳其近卫军和阿扎卜军)和两个骑兵支队(土芬克吉军和戈努尔卢军)。土耳其近卫军担负守卫开罗城堡这一最重要任务，因为那是行政中心和省督及财库的所在地。阿扎卜军则守卫通向开罗的所有通道，他们驻守在一些小要塞中，以防游牧民的偷袭。两个骑兵支队是供卡伊尔贝伊逐步将他的统治深入到全省之用。然而这些军队纪律很差，为了控制他们，卡伊尔贝伊组建了他自己的骑兵队，从新旧马木路克中招募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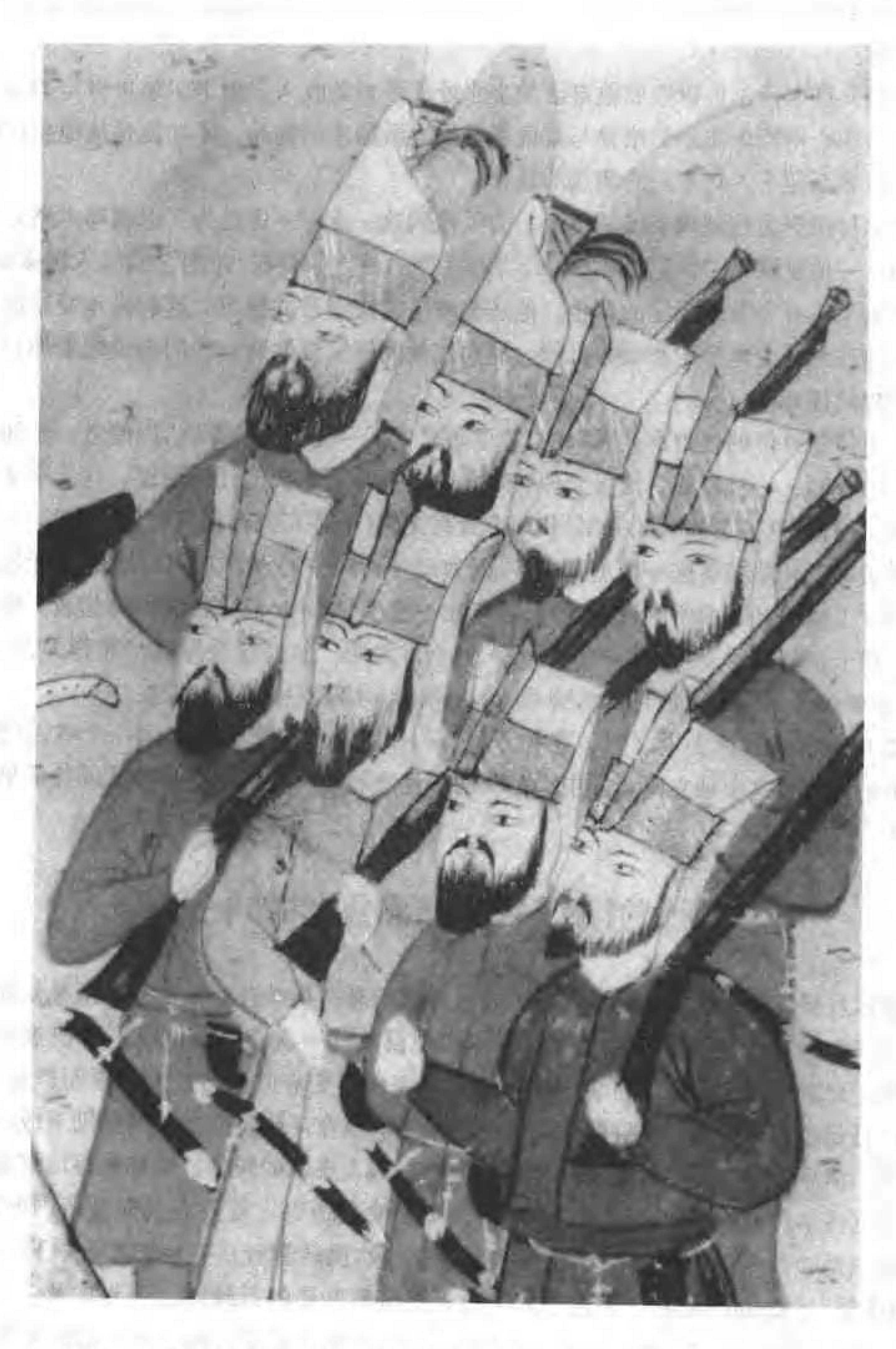
1522 年卡伊尔贝伊去世之时，兼并开罗——在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始终都是这个独立国家的中心——的过程进展顺利，对于即将完成的伟业事事都是好兆头。

奥斯曼的行政管理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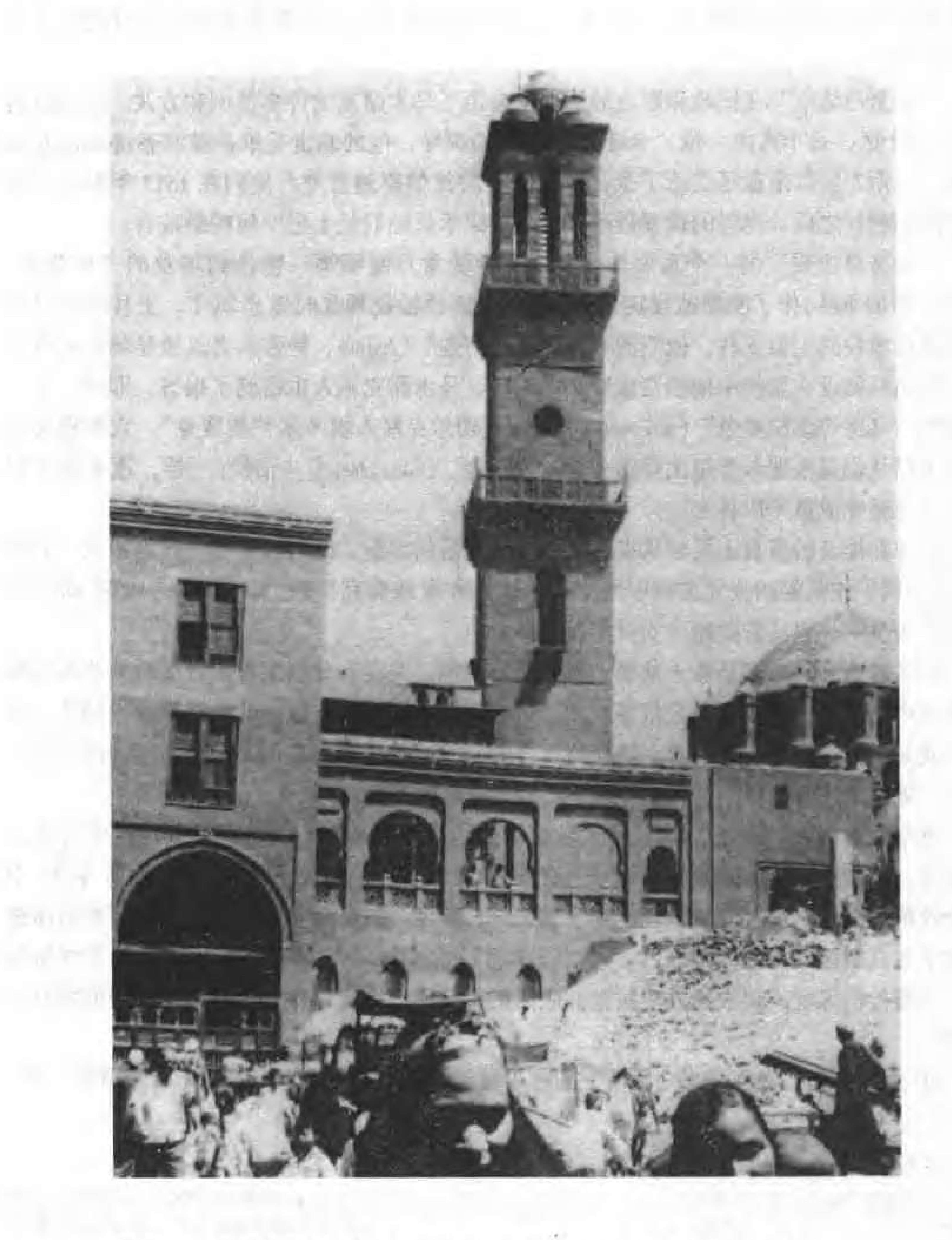
卡伊尔贝伊死后，反对奥斯曼霸权的叛乱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第一次叛乱是新时期之初两位马木路克地方行政官员反抗第一位代理摄政的一次小心尝试，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然而，1524 年的第二次叛乱由于受到新任代理摄政艾哈迈德帕夏的怂恿而严重得多，他声称自己是埃及的素丹，并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他在某阿拉伯团体的帮助下成功地占领了开罗，但后来因一开始曾支持过他的一些贝都因人头领的叛变，最终被逐出该城。[②]

但是这些事件提醒了伊斯坦布尔政府必须更加明确地界定埃及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的做法是颁布一项旨在调整埃及的政治、军事、民政和经济生活的法令，即所谓的"卡努恩法规"(Ḳānūn Nāme)。该法令的实质是要将奥斯曼的行政制度引人埃及。按照这一制度，埃及的统治者"瓦利"(wālī,代理摄政)始终保持帕夏头衔，可以拥有其他省份的代理摄政享受不到的和使人联想到伊斯坦布尔朝廷习惯的某些特权。将原素丹的开罗城堡给他作为他的所在地。他一周要召开四次由军事指挥官、财政和司法行政长官、港口总

② 通常都把艾哈迈德帕夏的叛乱与萨非王朝的反奥斯曼计划联系在一起，因该计划也包含在埃及搞颠覆活动。



图片 6.2　一幅 16 世纪土耳其袖珍画中所描绘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



图片 6.3 阿克森库尔清真寺(747/1346-748/1347 年)中土耳其近卫军司令(约 1062/1652 年)易卜拉欣墓葬室的瓷面外观

项"哈兹奈"或"哈济奈"(hazne,hazine,库存)定期交送是代理摄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16世纪该项收入的送交很有规律，其总额好几次超过预定数400,000盾(gulden)的若干倍。[⑧] 还要扣除一笔款项专门用来为素丹的膳房购买农产品。埃及还要履行它对麦加和麦地那应尽的义务。[⑨]

"卡努恩法规"还使向个人占用地收税合法化，它们被当做"伊尔提扎姆"看待。起初这条新规定仅适用于农业占地，但在16世纪，随着"奥贾克"及其军官的权力日益增大和奥斯曼统治代理人权力的不断削弱，扩及到了其他占用地。军官们，甚至连许多正规士兵，逐渐接管了占用地范围之内的一切管理职位，而这些收税人员慢慢地降为小吏，对征税或财务政策的其他方面不再起作用。

这一过程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关系的变化。到16世纪末，国内政治权力的两个层面的力量已经定型。一个是由伊斯坦布尔指派和由代理摄政领导的政府执行官员，另一个是奥贾克及其军官，以及各桑贾克贝伊与他们的马木路克随从。这一力量虽是非正式的，但它拥有受其控制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从16世纪后期起，它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奥斯曼在东北非的影响

145

在整个16世纪，埃及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政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其地理位置，它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形成一条天然纽带，依靠这条商道，将东方的货物经由红海和埃及运送到欧洲。[⑩] 在谢里姆征服埃及之时，也就是1517年，东方贸易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因此，奥斯曼人在征服埃及之后便面临迫使葡萄牙人退出印度洋或至少阻止他们渗透到红海的任务。

古吉拉特邦的统治者向素丹苏莱曼请求帮助抗击侵占第乌港的葡萄牙人，这给奥斯曼插手印度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埃及代理摄政苏莱曼帕夏受命负责这次作战。1538年，在进军第乌的途中他攻占了也门的亚丁，在那里建立了奥斯曼政府。虽然他想要将葡萄牙人逐出第乌的计划失败了，但他在回师途中于上埃及的库沙伊尔港登陆，在抵达阿斯旺之后，继续沿尼罗河向南直奔北努比亚，在那里将一些阿拉伯部落群赶出了河流地区，最终到达瓦迪哈勒法。他在萨伊岛上建造了一个要塞，成为奥斯曼埃及最南端的一个据点。

确保上埃及的安全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在豪瓦拉谢赫的控制之下，在16世纪中期有必要通过远征在那里重建奥斯曼霸权。这支远征军由也门代理摄政奥兹德米尔帕夏率领，他再次占领了伊卜里姆、阿斯旺和萨伊岛，并让波斯尼亚军队防守它们。他们建立了

⑧ 相当于1600万银帕拉(para)。

⑨ 原马木路克素丹规定给麦加和麦地那的捐赠全部得到承认，此外，奥斯曼素丹还立了一些新的捐赠项目。埃及经常送往希贾兹的不仅有大量现金，而且还有不少自然产品，特别是玉米。除此之外，从特别捐赠中为天房(麦加供黑石的穆斯林圣堂)造一顶盖。

⑩ 16世纪60年代，横穿苏伊士地峡开掘一条运河的计划已在考虑之中，它是由首相迈赫默德帕夏索科鲁提出来的，然而该建议后来被遗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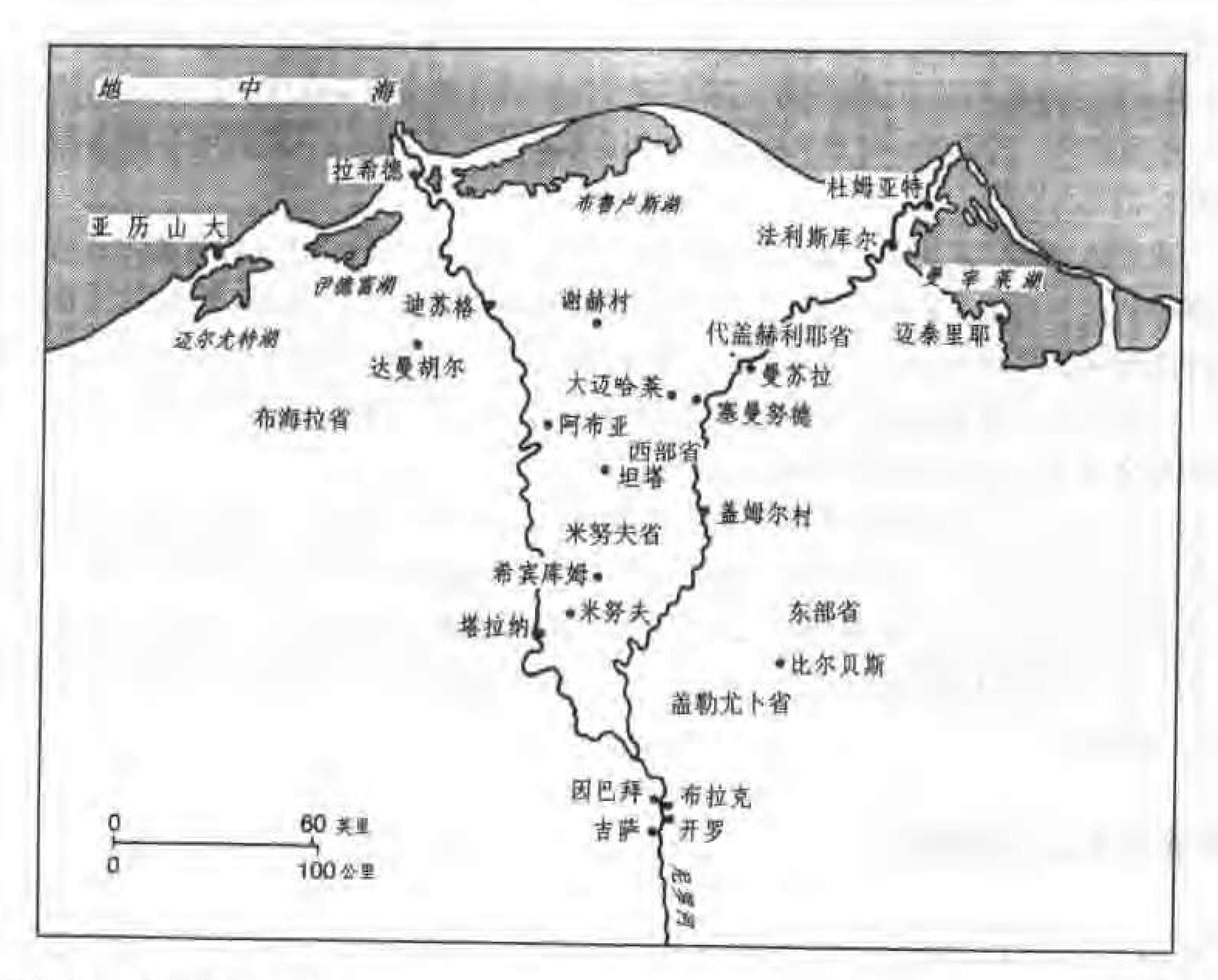


插图 6.1 下埃及(三角洲)

资料来源：根据阿卜德·拉希姆·阿卜德·拉赫曼与三木亘合著《奥斯曼时期埃及与德川家康时期日本的村庄——一个比较研究》改编，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第 u (ii)页(地图的刊印得到东京庆应大学三木亘教授的许可)。

由卡希夫领导的名为柏柏尔斯坦的新行省，卡希夫直接从属于开罗的代理摄政。

1557 年，奥兹德米尔帕夏夺取了红海海边的马萨瓦以及与亚丁相对的城镇塞拉(泽拉、扎尔哈)，并征服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统治的部分内陆。马萨瓦成了奥斯曼在非洲的一个新行省哈贝什的省会，该省在奥斯曼保卫红海防备葡萄牙人方面以及在保障与也门和东非南部海岸的贸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葡萄牙人原已将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排挤出印度洋贸易，所以在红海开辟这些阵地对保持过境贸易意义重大，当时这一贸易在国际开发的压力下，正由东方的香料改变为咖啡豆。因为咖啡已成了一种受欢迎的新物品，埃及的过境贸易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每年继续给国库带来可观的收入。

146 埃及和哈贝什两省的建立是奥斯曼在东北非最大的影响。自1517年至16世纪80年代奥斯曼在埃及的权力达到顶峰。伊斯坦布尔衰落的征兆尚未出现，相反，它的权力甚至还在继续加强。例如，1575 年南方城镇吉尔贾以南的一些地区联合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于1583 年建立了上埃及省，由一位来自开罗的官员取代了这些身为行政长官的豪瓦拉首领。

按照传统，上埃及在尼罗河流域诸国的政治组织中占有特殊地位。它的政治生活、社会制度、民族、宗教和地理等方面都与埃及其他地区不同。因为有此明显区别，这里常常

成为反当局运动的庇护所。[11] 其政治重要性因其经济重要性而有所增强，而其经济重要性，除其他因素外，是以它控制了尼罗河的商道和航运为基础的。奥斯曼人给予它在埃及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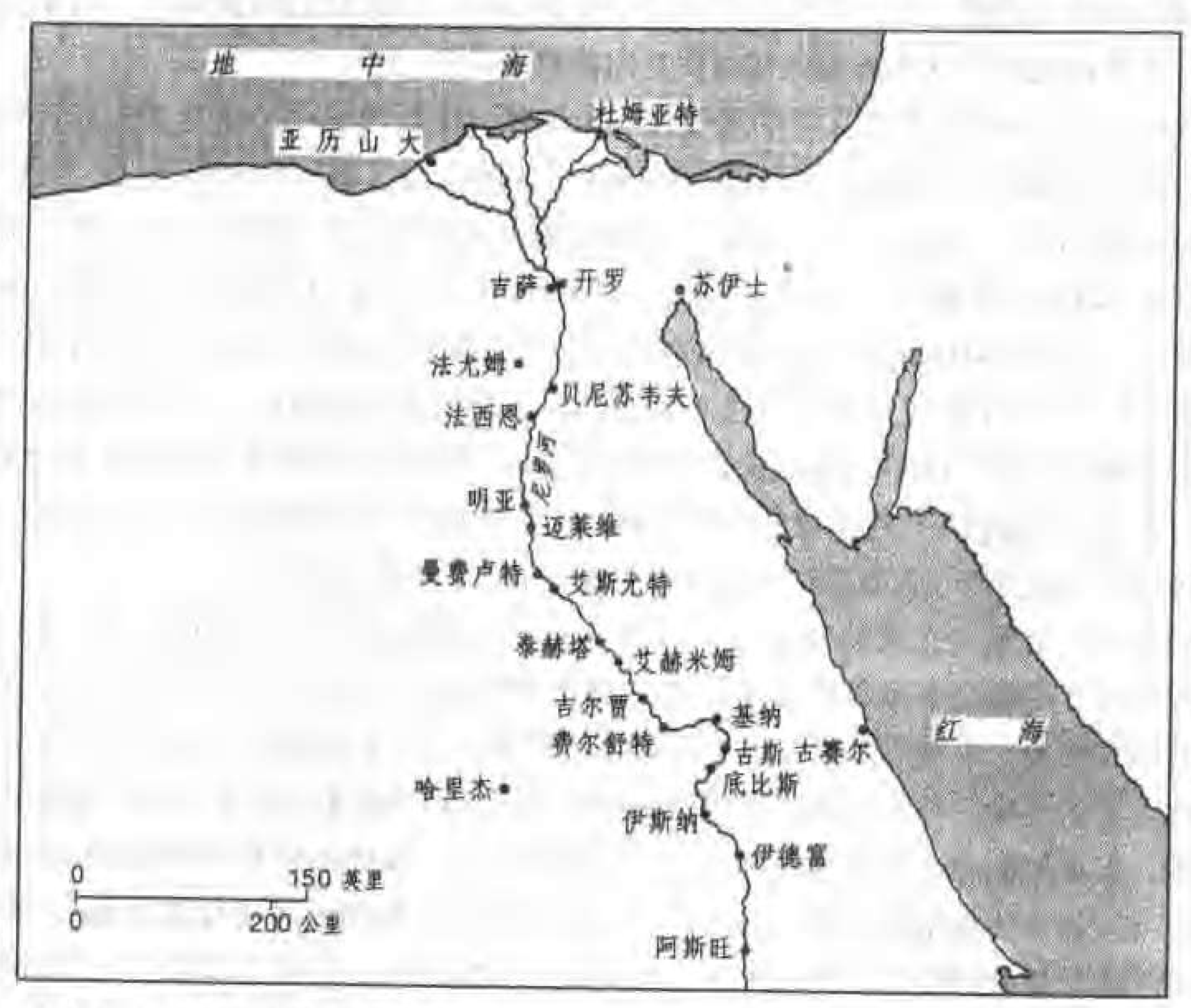


图 6.2 中埃及与上埃及（萨伊德）

资料来源：参阅插图 6.1。

省内的特殊地位，表现出对这片重要领土的兴趣和关注。

上埃及的行政长官和全埃及的行政长官一样，具有瓦利(代理摄政)的称号，在行政级别上与省行政长官相比，居第二位。该官职由具有桑贾克贝伊官阶的官员担任。下面的财政和行政机构按下埃及实行的制度组成。行政长官的政治重要性和忠诚也因其手中军队的人数之多而特别受到重视。

内部军事冲突

1524 年平定了艾哈迈德帕夏的叛乱之后开始的内部和平时期持续了约 60 年。16 世纪 80 年代，由于依赖于奥斯曼帝国总的社会经济状况，埃及开始出现经济困难的初兆。这些兆头很快在军队统治阶层各派之间引发起猛烈的冲突。

在1598与1609年间发生了几起叛乱，为首的是经济衰弱的土耳其非正规骑兵部队

[11] 上埃及次省面积也很大，17 世纪时，进一步扩大。1640 年阿拉伯卡比拉被逐出拜赫奈萨地区，1694 年逐出艾斯尤特和阿非斯地区，1698 年逐出阿斯旺、曼费卢特和明亚一带。

148 (spahi),他们受到近期物价飞涨的打击最重。他们的叛乱起着削弱代理摄政地位的作用,当时代理摄政只能利用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忠诚的奥贾克之间的对立来实现他们对伊斯坦布尔应尽的职责,同时,在一方反对另一方中平衡局势,以维持省内的和平。由于这些叛乱,土耳其非正规骑兵从此被排除在奥贾克内部权力斗争之外。

此后数年中,24位桑贾克贝伊的重要性不断加强,他们形成一个相当于先前素丹政权中的最高埃米尔集团。由于他们身份高,都担任重要的政治官职。在17世纪20年代以前,他们一般都被任命为"塞达尔"(Serdar),即埃及境内或境外的军事指挥员。此外,他们还被委派指挥"埃米尔卡兹纳"(Amīr al-Khazna,即往伊斯坦布尔护送埃及库银的部队)和"埃米尔哈吉吉"(Amīr al-Ḥadidj,即为赴麦加朝圣商队提供保护的军队)。有一位桑贾克贝伊还被任命为上埃及行政长官。他们作为德夫特达尔,还控制着省的财政。17世纪初从他们中遴选"卡伊姆-马卡姆"(Kā'im Makam,代理副摄政)时,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充分显示出来。他们通过巧妙地利用代理摄政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加强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这地位是他们作为赋税征收者取得对大片农业占地的控制逐渐建立起来的。

他们第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政变是于1631年撤了穆萨帕夏的代理摄政之职,他们以副代理摄政里德万贝伊法卡里替代了他,这位副代理摄政是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来的。尽管穆萨帕夏一再提出抗议,但土耳其政府仍顺从了他们的意愿,从而开创了以后数年中多次重复的先例。即使穆萨帕夏的撤换似乎是因某位凯塔斯贝伊被刺身亡和财产遭没收引起的,但贝伊们和各奥贾克的真正动机却更深一层:穆萨帕夏开始削减他们的薪俸。

1517年允许军方收取保护费(himāye)——保证被征服的城镇居民免遭洗劫的保护金。甚至开罗的居民也必须交付。然而几年中该类收费不断上升,后来干脆成了士兵们剥削城市居民以达到发财致富的手段。穆萨帕夏试图去除强加在城镇居民头上的非法税收,结果导致他下台。商人和手艺人也和奥贾克一样享有敲诈勒索性质的特权,所以他们容许奥贾克重新增强力量。奥贾克此时对伊斯坦布尔政府来说已强大到无法驾驭的程度。

取代穆萨帕夏的里德万贝伊法卡里担任代理摄政一直到他于1656年去世时为止。他149 同时也是法卡里亚的领导人,这是由贝伊及其马木路克随从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与法卡里亚相对立的是卡西米亚,它也是由贝伊及其随从所组成,也在游牧民和城镇居民中寻求支持。支持法卡里亚的土耳其近卫军和支持卡西米亚的阿扎卜军也卷入了这两个集团的斗争,由于这一切,到了17世纪末埃及社会完全分裂。

里德万贝伊获得素丹任命他为保护朝觐商队的军队终身司令的命令,以此巩固他的地位,而他的南方同盟者阿里贝伊获得了素丹任命他为上埃及终身代理摄政的命令。法卡里亚随着其两位高级人物在省的统治集团中地位的稳固,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到17世纪中期,开罗已为他们所统治。但是在里德万贝伊死后,法卡里亚中的高层职位被一些年轻人夺取,由于他们的轻率,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随之党派分化瓦解。

1660年,在将法卡里亚逐出开罗之后,卡西米亚因得到代理摄政的支持,成功地获得了上埃及代理摄政以及该省代理副摄政的职位,但为时不长。卡西米亚还未及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的领导人艾哈迈德贝伊鲍斯纳吉于1662年由代理摄政亲自下令被暗杀。

这些事件证明土耳其政府竭力恢复它在埃及的权威。1661年已为其成功提供了可靠

保证，当时它设法在七个奥贾克中撤消所有非军事人员，为了弥补物价飞涨引起的财政亏空，从他们的封地中提高穆尔塔津姆 20% 的缴款。即使这些措施不得人心，但伊斯坦布尔朝廷仍继续采取措施。到 1670 年，代理摄政卡拉·易卜拉欣帕夏奉命在军队的帮助下实行财政改革。他对预算作了重大调整，并与各有关派别进行了四年深入细致的协商，使财库金额增加一倍，达到 3000 万帕拉。（某些重要的封地仍为奥贾克占有，卡拉·易卜拉欣帕夏不得不于 1672 年予以确认。）

这些改革的原则成了从那时起直到 1798 年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据。但是成功是暂时的，财库的金额很快再次下降。削弱奥贾克经济影响——它们的财源包括合法的占用地和非法的掠夺地两个方面——的决定下得太晚。1672 年，使当时存在的占用封地合法化大大巩固了土耳其近卫军和阿扎卜军的地位，因为他们控制了最有利可图的占用地⑫，而这有损加 150 乌舍军和穆特非尔里卡军的利益。这样做还促使当时已容许随便改变封地占用的开放制度变成引起激烈争议的封闭制度。

17 世纪上半叶帕夏地位的削弱和 17 世纪 60 年代贝伊党派的失势使奥贾克得以夺取那些建立在剥削城镇居民基础上的封地。⑬ 贝伊们已无法插手对城市居民的剥削，只能继续剥削农村百姓，从农业的占用地获取收益。

在 1670 至 1750 年间，政治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各奥贾克相互竞争，但它们也为党派关系所产生的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一些地区支持法卡里亚，另一些地区支持卡西米亚，两派之间的对抗已经渗透到了为最终完全控制而争取其支持的那些奥贾克之中。最有争论的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主要因素：封地的占用和可能的再分配、非法从奥贾克成员的经济活动中索取的收益和非法向从属于奥贾克的商人和手艺人收取的保护费。⑭

争斗最激烈的奥贾克是控制着获利最丰的封地的土耳其近卫军。近 20 年斗争的主角是巴绍达巴希·库丘克·迈赫默德。迈赫默德因反对另一些土耳其近卫军高级军官而于 1680 年被逐出埃及。后来回来参加了“戈努尔卢延”奥贾克，他在该奥贾克中赢得了阿迦的支持，阿迦介绍他加入法卡里亚。法卡里亚的领导人易卜拉欣贝伊帮助他将土耳其近卫军奥贾克中的一些卡西米亚指挥官清除出去，自 1692 年起由他统领该奥贾克。不久他迫使所有七支奥贾克中的高级军官都赞同他废除某些保护费和其他一切非法收费的决定，所有这些非法收费都是土耳其近卫军和阿扎卜军向亚历山大、拉希德和布拉克等港口的海关索要的。库丘克·迈赫默德在代理摄政的帮助下有能力将这些新决定付诸实施。采取这一 151

⑫ 土耳其近卫军控制着除作为代理摄政封地之一的苏伊士以外的所有港口的海关收益。阿扎卜军控制着各产粮区和布拉克与旧开罗的各登陆地的收益及娱乐税。

⑬ 由于奥贾克自己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他们常与那些已允许加入其行列的商人和手艺人会面而增加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于是引发了他们想正式占有土地和开辟非法财源的野心。他们的被保护者主要是富裕的咖啡商，他们关系和睦，据此奥贾克主张收取保护费以及从死去的被保护者的财产中收取 10%。奥贾克的新成员，即商人和手艺人并非都是受损失者，因为奥贾克成员资格保证了他们的保护和剥削特权，这些特权将他们带入与奥贾克紧密相联的有影响的集团中来。

⑭ 这些惯例也违反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和被看做“马扎利姆”（mazālim，陋习）而受到批评，伊斯坦布尔朝廷欲将其废除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麻烦。剥削的主要负担由民众承受，而民众的境况由于歉收、通货膨胀、饥荒和各种流行病而日益恶化。在 17 世纪后期的 1678、1687 和 1695 三年普遍发生的暴动与政治领导有关。

步骤——它虽受人民欢迎，但在穆斯塔法·卡兹多格卢领导的土耳其近卫军中树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再次发生1678年由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玉米价格上涨所引起的暴乱。

1694年夏季，土耳其近卫军内部的紧张状态已经达到了危险点。与此同时，尼罗河的一次低水位泛滥引起了玉米价格的暴涨。库丘克·迈赫默德一如既往采取措施阻止可能出现的投机倒把，办法是稳定谷物价格和严禁谷物销售的中间倒手。这样他就使控制粮食储备的土耳其近卫军和阿扎卜军联合起来，最后竟然要合谋暗杀库丘克·迈赫默德。各奥贾克再次获得了失去的封地和规定粮价的自由。后来主要农产品价格节节上升，引起了1695年的饥馑和次年的瘟疫流行。1697年因水源充沛才结束了这一系列的危机。

自1688年起，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形势更加恶化，到1692年，局势危机四伏。省行政当局试图弥补财政赤字，从"伊尔提扎姆"中增加4%的缴款。但是伊斯坦布尔要求库银应以值钱的货币上缴，这是为奥贾克所强烈反对的一个做法，因为当时各奥贾克亦如其统属下的商人依附者一样，正从货币贬值中获得巨大利益。正是这一反对立场阻挠了财政专家亚西夫·亚胡迪于1697年试图进行财务改革和税制变革的计划。⑮

由于18世纪初从奥斯曼帝国其他各地流入大量不值钱货币而引发的涨价新浪潮给土耳其近卫军提供了从阿扎卜军手中夺取垄断玉米贸易的机会。这又一次证明主要问题是各奥贾克都不愿放弃保护费。后来相互妥协，才打破僵局，虽然回避主要问题，但能为奥贾克所接受。双方决定有饰纹的钱币只能按金属的实际重量使用，并铸造"非达迪瓦尼"(fidda dīwānī,纯银币)予以代替。公布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禁止向基督教国家出口咖啡。这项造币法令虽然减慢了帕拉下跌的速度，但收取保护费这一实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各奥贾克之间的紧张关系非但没有改变，另一个政治危机已经露出苗头。

危机终于在1710年爆发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向各基督教国家输出咖啡。为满足欧洲咖啡需求的不断增长，咖啡出口急剧扩大，造成价格猛涨。咖啡批发商以及他们的保护主土耳其近卫军所获的利益使其他各奥贾克都相形见绌。保护费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但对其解决办法的商讨却是在土耳其近卫军已分成法卡里亚和卡西米亚之后。这分裂导致了奥贾克内部的一场空前猛烈的冲突，贝伊们也都卷入其中。

152

主要的鼓动者是巴绍达巴希·伊弗朗吉·艾哈迈德，他赞同土耳其近卫军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他虽有法卡里亚作后盾，但卡西米亚却于1707年将他逐出奥贾克。到1709年，由于土耳其近卫军孤立地反对其他奥贾克的统一战线，局势变得高度紧张。此时，仍受法卡里亚支持的伊弗朗吉·艾哈迈德又被请回土耳其近卫军奥贾克，那些应为1707年驱逐他负责的卡西米亚军官反被驱逐出去。法卡里亚的地位此时已经稳定，伊弗朗吉·艾哈迈德政策的拥护者团结起来了。但伊斯坦布尔发来的命令给土耳其近卫军重大打击。对当前问题阐明官方政策的命令是：立即终止一切陈规陋习以及军人和非军人之间的保护关系。此外，造币厂要从土耳其近卫军军营迁往新建筑中去。

到1710年末，由于领导法卡里亚的两个贝伊阿尤布和凯塔斯之间的关系破裂，危机

⑮ 建议的改革措施包括：货币加盖印章，对库存咖啡征税10%，对咖啡焙制业实行国家专营，给纺织品加检验印记及征收房屋和商店税。

进一步严重，后者转向卡西米亚一边，这一行动导致被逐军官返回奥贾克。于是脆弱的权力平衡又被打乱，危机发展成为贝伊们也完全参加的武装冲突。法卡里亚领导人阿尤布贝伊和上埃及代理摄政马哈茂德贝伊卡比尔支持伊弗朗吉·艾哈迈德，而对手们则在卡西米亚领导人艾瓦兹贝伊、易卜拉欣·萨纳卜、迈赫默德贝伊库塔米什和前法卡里亚成员凯塔斯贝伊的推动下联合起来。对城堡围攻两个月之后土耳其近卫军的抵抗终于在1711年6月失败，法卡里亚的贝伊们逃离埃及，伊弗朗吉·艾哈迈德被处决。

经过1711年的事件和前20年的斗争，土耳其近卫军和其他奥贾克的影响减弱了。阵地彻底让给了贝伊和他们的马木路克随从。自17世纪中叶起，各桑贾克贝伊以及奥斯曼统治阶层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马木路克随从队伍。到1700年，恢复自由的奴隶和许多家族，如卡兹多格卢、库塔米什、巴尔夫和朱尔夫等家族的马木路克逐渐取得官职并获得大量封地。在1711年之后的约20年间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贝伊们重新登上埃及政治舞台的中心。

尽管经济和政治危机已处于后期，但埃及的奥贾克统治经历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农产品因在埃及货物中有了交易、所以数量增加，从中获得的利益仅次于过境贸易的获利。尤其是咖啡的收益为全面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伴随着经济的良性发展出现了人口的高速度增长，从而导致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城镇工商业的扩大。开罗的人口增加到30万，超过了14世纪初25万的最高记录。 **153**

货币贬值是始终存在的问题，而奥斯曼在欧洲的连连败北使之更加严重。但撇开这一点不说，埃及未受欧洲战场变化的影响，甚至贸易仍照常进行，奥贾克的参战已无关重要。在和平环境下奥贾克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长期驻守在埃及的士兵大都通过婚姻开始与当地民众相融合，只有他们的军人身份以及某些特权和义务才使他们有别于城镇居民。但是他们的纪律在和平时期松弛了，他们的军人性质也自然退化。

权力之争在1711年之后继续在各政治集团之间及其内部两个层面上进行。1714年领导卡西米亚的首领凯塔斯贝伊被他的下属杀害，他们以此夺得了“里亚沙”（riyāsa，领导地位）。但是他们中的易卜拉欣贝伊阿尤布·萨纳卜不久就亡故了，因此艾瓦兹贝伊之子伊斯马尤贝伊成了该派的唯一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地位很快就垮了。阿尤布·萨纳卜的马木路克结成一个反对组织，名为萨纳卜派，该派与法卡里亚的贝伊们合作将伊斯梅尔贝伊和卡西米亚的一个小派系艾瓦兹派一同驱逐了出去。萨纳卜派的领导人很快就和法卡里亚的领导人德胡·法卡尔携手结成双人统治。这种新的联手相当于一种政治妥协，但受到新经济危机的牵制，这次危机是因萨纳卜派前领导人迈赫默德贝伊切尔凯西的下台引发的。迈赫默德贝伊切尔凯西和其他几位前任一样试图迫使奥贾克减轻税赋并废除他们的非法勒索以缓解紧张局势。起初奥贾克方面似乎愿意妥协，但听到商人和豪瓦拉阿拉伯人成员要被驱逐，便立刻大怒，迈赫默德贝伊切尔凯西也就惨遭杀害。

贝伊之间的残酷争斗在1720年之后为代理摄政加强其权力提供了机会。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参加了各种混战，甚至支持暗杀伊斯马尤贝伊和迈赫默德贝伊切尔凯西的行动。在1729年卡西米亚垮台以后，诸代理摄政继续干涉法卡里亚，现在该派的三个领导人是：迈赫默德贝伊库特卢穆什、土耳其近卫军卡赫亚乌斯曼(欧斯曼)和阿扎卜军卡赫亚尤素福。

到了1736年，这几位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为代理摄政巴基尔帕夏试图将奥贾克的合法

和非法收入均归人国库提供了机会。当他遇到抗拒时，便将这三位代表全都暗杀了。土耳154 其政府虽不赞成这一举措，但为了国家利益它禁止转让奥贾克封地。埃及军事阶层的新领导以乌斯曼贝伊德胡·法卡尔和土耳其近卫军卡赫亚易卜拉欣·卡兹多格卢为代表，并得到各奥贾克的支持，拒绝服从命令。反对派得到“乌里玛”即宗教兄弟会(‘ulamā’，单数为‘ālim)代表的援助。

在易卜拉欣·卡兹多格卢当上土耳其近卫军及奥贾克的统领之后，作为法卡里亚一个强大派别的卡兹多格卢派原来一直居于幕后，现在登上了前台。其领导人虽不属于桑贾克贝伊中人，但该集团在经过暗杀并未失去其领导人，而仍保持相对完整。自1743年起，在易卜拉欣卡赫亚迫使乌斯曼贝伊逃亡国外之后，他就成为军人阶层的唯一领导人，卡兹多格卢派也成了唯一的统治派别，而且一直维持到1798年。

在乌斯曼贝伊去国之后，易卜拉欣卡赫亚将军队与阿扎卜军的卡赫亚、法卡里亚一个较小派系朱尔夫派的首领里德万相联合。由埃及力量最大的两支军队结成的双人统治自1744年起相安无事地统治了十年。双方都没有取得桑贾克贝伊身份，但都任命了自己的三个马木路克进入贝伊行列。当里德万卡赫亚沉醉于大兴土木之际，他的同伴易卜拉欣卡赫亚将埃及变成了他个人的领地：他占有了最富的物质资源，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马木路克随从队，使自己大发其财。

尽管这双人统治从表面上看是稳固的，但军事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却已出现了行将就木的征兆。[15]

在双人统治下，奥贾克的集体权力被集中在两个专制君主身上的个人权力所替代。只是因有良好的经济——稳定的物价和稳定的通货——才使内部和平得以保持。当易卜拉欣卜赫亚于1754年去世之后，潜在的不安宁便立刻暴露出来。里德万卡赫亚是第一个牺牲者，他在土耳其近卫军的一次叛乱中丧生，这次叛乱是因他个人主张增加另一种咖啡税引起的。奥贾克起来造反是为捍卫他们已经受到很大侵蚀的特权，但也是对马木路克权力的扩大表示不满。此时的马木路克就像贝伊和奥贾克军官一样，都享有政治和经济实权。奥贾克的政治权力的下降与他们在18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济条件下降有直接关系，而经济条件下降的原因在于某些获利封地的丧失和其他一些收入来源，特别是香料和咖啡贸易收入的减少，这两项贸易受到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挑战。双人统治造成的155 商人贫困也有损奥贾克的利益。1760年以后，奥贾克的权力进一步削弱，这是因为奥贾克已退化成为马木路克随从的后备军，而随从队的成员则准许持有军官身份。

文化发展

至高无上的马木路克素丹王国的灭亡和埃及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维拉亚”

[15] 在传统的剥削制度范围内，奥贾克给与他们的被保护者只有统治阶层才能享有的某些特权。但双人统治的剥削并没有给与这样的补偿。剥削行为由于没收财产、强迫借贷，特别是针对商人的其他一些严厉措施而变得更加恶劣。掠夺来的钱财竟公然在两个统治者之间平分。

(wilāya,行省)导致了重大的文化变化，清楚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的重新组合。教育也受到影响，因为阿拉伯语已起着文化表达手段的作用。

马木路克素丹王国倒台之后，开罗已不再是自 1261 年起一直担当的逊尼派世界的精神中心。它的上升地位由于有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和以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为首的许多学校而得到加强，有许多求学者从伊斯兰世界各地来此求学。他们到开罗来学习，到开罗众多的“马德拉萨”(Madrasa,古兰经学院)讲课，或作为国家行政官员到开罗工作，那里的政治威望和经济繁荣使首都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爱资哈尔大学在 1517 年以后虽仍不失为阿拉伯各国学子前往求学的一所声誉很高的学府，但那些希望取得公职的学生慢慢地不得不去伊斯坦布尔的学校求学，因为这些学校专门培养在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各部门供职的毕业生。这些学校的教师职位相当诱人，往往可找到通向高官厚禄的道路。中央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城市就是这样取代了 1517 年以前，甚至在奥斯曼的阿拉伯臣民眼中一直认为绝对属于开罗的地位。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入奥斯曼帝国加速了作为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中介者的阿拉伯语的衰落，因为在帝国的国家、文化生活中奥斯曼土耳其语已占据领导地位。此时，新波斯语书籍和土耳其语书籍已大量出版，通过这些语言表达伊斯兰宗教文化。某些阿拉伯国家由于丧失了政治独立，所以不再将阿拉伯语作为国家行政用语，同时也减少了在书本中的使用。宗教和法律题目以外的书籍，包括科学书籍都是由统治阶层人士生产和消费，他们都不谙阿拉伯语，而能看懂土耳其语或波斯语。与阿拉伯文化和文学不同，波斯文化经历了 15 世纪至 18 世纪的伟大创造时期。

与奥斯曼帝国所属各阿拉伯省一样，埃及文化在奥斯曼土耳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强大压力下逐渐融合到伊斯兰文明的奥斯曼土耳其的新变种中去。然而它仍保留了自己一定的特性，正是这一特性成为19与20世纪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起点和调节器。16、17和18世 **156** 纪的阿拉伯和埃及文学仍保留了这一特性，虽然这种文学在官方的文学活动中已退居次要地位。通常将这段时间说成是阿拉伯文学最衰落的时期，这时虽没有在古典风格中产生什么新东西，但却提出了文学创作的新方向。阿拉伯语书籍的读者都是城镇中的中等阶层，如较下层的“乌里玛”、教士知识分子、商人和手艺人等，他们的母语是阿拉伯语。改变了的新方向产生出了语言和风格都很通俗的文学。

这一倾向在诗歌中最为明显。当伊斯兰教托钵僧修士会已遍及各地，苏菲派泛神论神秘主义诗歌深受欢迎和最为流行，在伊本·法里德的影响下，集中于颂扬先知穆罕默德，对他的赞美在“马乌利德”(mawlid,关于穆罕默德的散文传说故事)中也有歌颂。[17]

讽刺作品这时期也已传入，最有名的是希尔比尼的《摇动农民的脑袋》(Hazz al-kuhūf)(1787 年)，作者在运用对虚构的乡村诗人阿布·萨杜夫·伊本·乌贾伊尔(魏比姆之父,卡尔夫之子)的一首讽刺诗作注解的形式讥讽农民的呆头傻脑和粗鲁无礼以及“乌里玛”的心胸狭窄和态度傲慢。该作品的语言是埃及乡下人说的阿拉伯语。在他的一篇诗作《卡西德·阿布·

---

[17] 穆罕默德·伊本·里德万·苏尤提(死于 1766 年)是这类通俗诗歌中某一首的作者。阿伊萨·巴乌尼亚和医生阿卜德·拉赫曼·胡梅迪(死于 1587 年)的作品(由于他们的修辞特点)都不够通俗。

萨杜夫》中，他叙述了农民深受行政当局和亲属们的剥削以及给予他们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另一位诗人是哈桑·巴德里·希贾齐(死于1719年)，他除了一本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外，还写了一本寓意很深的独立的讽刺诗集，评论了许多著名事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

除了这种面向广大群众的诗歌(其中一位作者名为阿卜杜拉·舒卜拉维，他还是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死于1758年，他写有一本篇幅不大的爱情诗和四季诗集以及一首赞扬穆罕默德和其他几位杰出人物的颂歌)，还出现了一些带有自高自大怪僻倾向的形式主义诗篇。这类诗在埃及的代表是阿卜杜拉·伊德卡维(死于1770年)，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尤素福·希夫纳维(死于1764年)一样，还写有论述艺术的文章。

另一部作品，描写谢里姆一世征服埃及的小说，丰富了叙事体民间散文。它叙述了最后一位马木路克素丹图曼贝伊抗击外国入侵的英雄故事。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艾哈迈德·伊本·宗布尔，他写出了构成这部小说主题基础的上述事件的简明历史。

157 然而，科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与此相反，它继续衰落，具体表现在对认识过程缺乏独创精神，只是停留在对昔日颇具权威的著作做毫无意义的解释。奥斯曼思想家企图使社会与之相吻合的伊斯兰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和允许批判分析的干扰。注释和注解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虽然多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并不能表现社会的客观形象。[18]

在这方面，编纂历史有较大的可能性，但在埃及，这项工作由于缺乏赞助者和关心史学研究的人而困难重重。伊本·伊亚斯的著作，虽然在1552年结束，但被认为是马木路克历史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该时期出版的著作，质量都很低，尤其是它们的编纂方法。只有少数几册可以算做是史料编排较好和有一定篇幅的编年史。[19] 通常，这些作品只是有关素丹、代理摄政和大法官的干巴巴的年表或作者生活年代之前的埃及历史概要。[20] 此外对于某些事件也有一些详细论文，往往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21] 还有若干用韵文或口语写的历史小册子。[22] 伊本·伊亚斯编的马木路克末代编年史覆盖的是奥斯曼时代的初期，贾巴尔提的编年史叙述了18世纪后几十年的历史，这是19世纪这类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部，也是封建时期这类著作中用阿拉伯语写的最后一部书。

单纯的注释，虽枯燥乏味，但却产生出了由穆罕默德·穆尔塔达·扎比迪(死于1791年)撰写的一部有意义的书，即多卷本词典《Tādj al-arūs》，它对费鲁扎巴迪的《Al-ķāmūs》作注释。卡法吉(死于1659年)是一部杰出人物传记集的作者，他对语文学也作了探讨。

最受人喜爱的一类作品是关于赴麦加和麦地那朝觐路线的论文以及描写朝觐目的地和杰出人物特别是学者和谢赫圣徒墓地的文章。

作为虔诚教徒一种内心表示的对圣徒的崇拜是和伊斯兰教托钵僧诸教派的迅速发展和158 对神秘主义者的兴趣相联系的，这两者从16世纪起在埃及广泛传播。艾哈迈德·巴达维(死

[18] 针对该时期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实用法律方面的问题，编写出版了一批小型论文集，此外还有若干简明手册，往往具有教科书的特点。

[19] 例如，覆盖1517至1737年这一历史阶段的艾哈迈德·切列比的编年史。

[20] 这类著作中，典型的是萨基、马尔伊·伊本·尤素福和萨尔卡维的作品。

[21] 其中最佳的一篇是萨里希写的《桑贾克贝伊们的冲突》，叙述1660年法卡里亚贝伊的叛乱。

[22] 如加姆里用韵文写的一本书和用口语写的德尔米尔德什编年史。

于1276年)建立的一个教派艾哈迈德修上会最孚众望，他在坦塔的坟墓是特殊礼拜的中心。该教派的许多支系遍及各地，特别是：拜尤姆、萨拉维和欣纳维等派系。在有影响的各教派中值得一提的是卡迪里派、里法派和纳克什班德派，而易卜拉欣派、德米尔达什派、巴克尔派和其他许多教派都不太重要。伊斯兰教托钵僧诸派全都受纳基卜·阿什拉夫(先知后代的一位代表)，也就是出自巴克尔家族的谢赫，该家族的始祖是最早的哈里发阿布·巴克尔。伊斯兰教托钵僧诸教派与某些社会阶层包括若干社会团体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有各自的行业代表。诸教派的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坚固组织使其领导人具有可以影响公众生活的重大政治权力。这些教派还有文化上的重要性。它们为教育人民作出了贡献，方法是通过其成员的笔头文学，主要是诗歌为媒介的宗教文化与人民相接触。这种接触反过来又激发起了对文学和自主创作的兴趣。神秘主义诗歌是由许多作者培育出来的，他们中有巴克尔家族中的明星阿卜杜拉·萨拉维、艾哈迈德·达尔迪尔和其他人，他们在自己的诗篇、论文和对其同事的讲话中往往不遵守伊斯兰教教条。

埃及在整个18世纪并没有体会到印刷术的好处，虽然从1729年起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书籍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印刷出版。用手抄写依旧是增加文学著作的唯一途径。

开罗和埃及其他一些城市至今仍因有奥斯曼时期建造的许多建筑物遗址而生辉。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里建有几所专供宗教和教育所用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都是由某些人规定作为建筑之用的遗赠款项建造的，这些遗赠者中有的是代理摄政、奥贾克高级军官和贝伊，有的甚至是奥斯曼素丹或王朝的其他成员。和部分以捐赠为物质基础的世俗屋宇一样，这些建筑物虽带有若干埃及的地方特色，但与输入的奥斯曼成分不成比例。这可以从总的建筑构思上，通常则是从建筑的装饰上看出，如采用大理石灰墁和彩窗，[23] 输入成分大多以"马纳拉"(manāra，中央大圆屋顶)、镶贴彩釉瓷砖的墙壁和绘有花卉的天花板和 **159** 墙板为代表。[24] 现存遗址也证实本国建筑原则上也保持着传统布局。[25] 虽然时髦的奥斯曼成分在内装修方面，特别是在镶贴彩釉瓷砖方面占有较大位置，但按照传统使用木料 **160** 和大理石一般也很普遍。这些住宅的规模和舒适程度都证明城镇富有居民住房建筑式样的先进，这是对埃及社会内部进步变化和对作为未来资产阶级核心的商人的重要性的明证。这些变化发生在埃及，但与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发展相一致，虽然与欧洲的对等国家以及叙利亚相比，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些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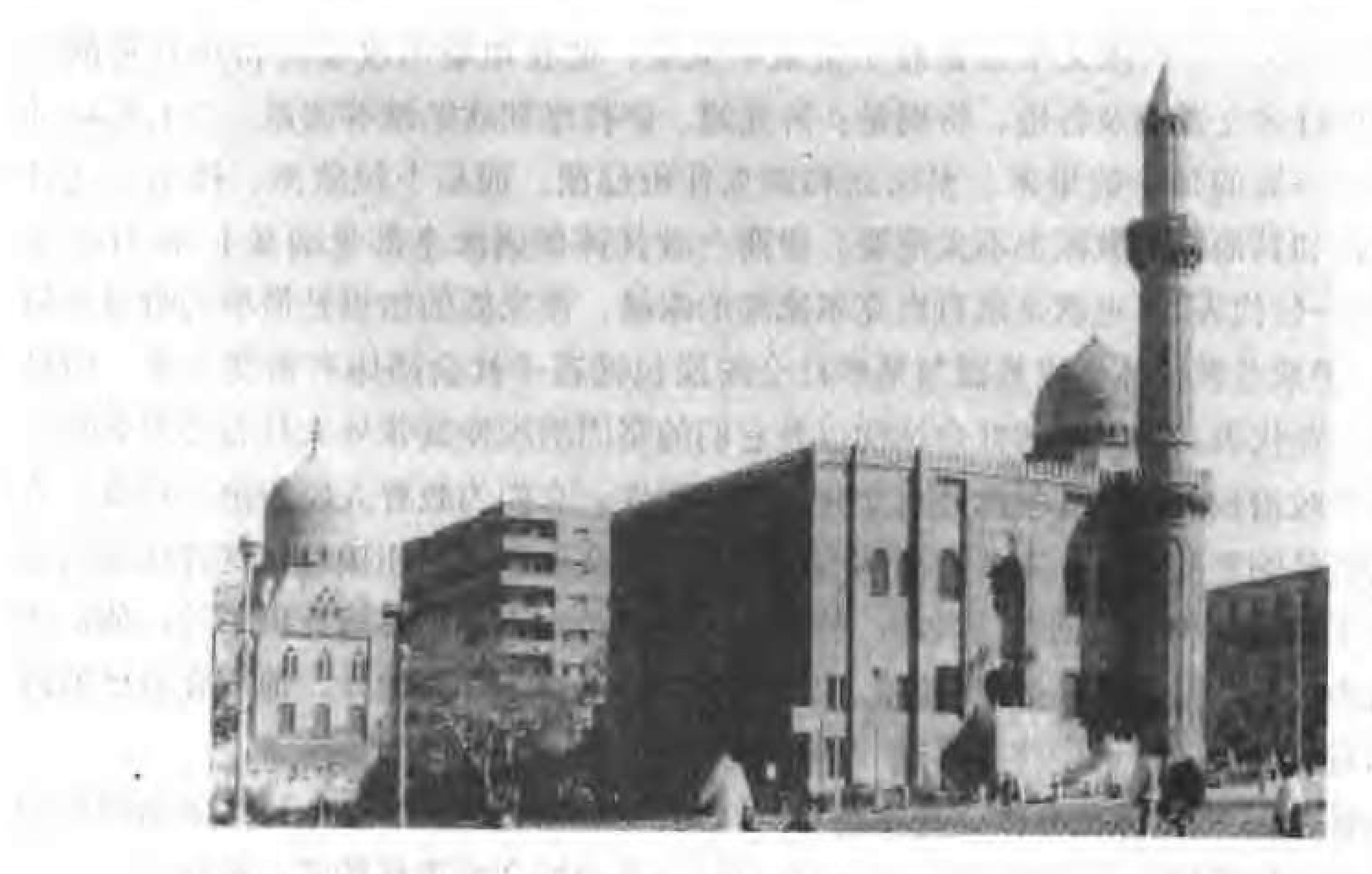
经济衰退和争取独立

易卜拉欣贝伊和里德万卡赫亚去世之后，在卡兹多格卢派内部爆发了残酷的战斗。在一段时期内，一批贝伊，他们全都是易卜拉欣先前的马木路克，轮流担任首领。其中一位侯 赛因贝伊萨本吉，荣获了1756年授予他的谢赫巴拉德的头衔，这是过去不常用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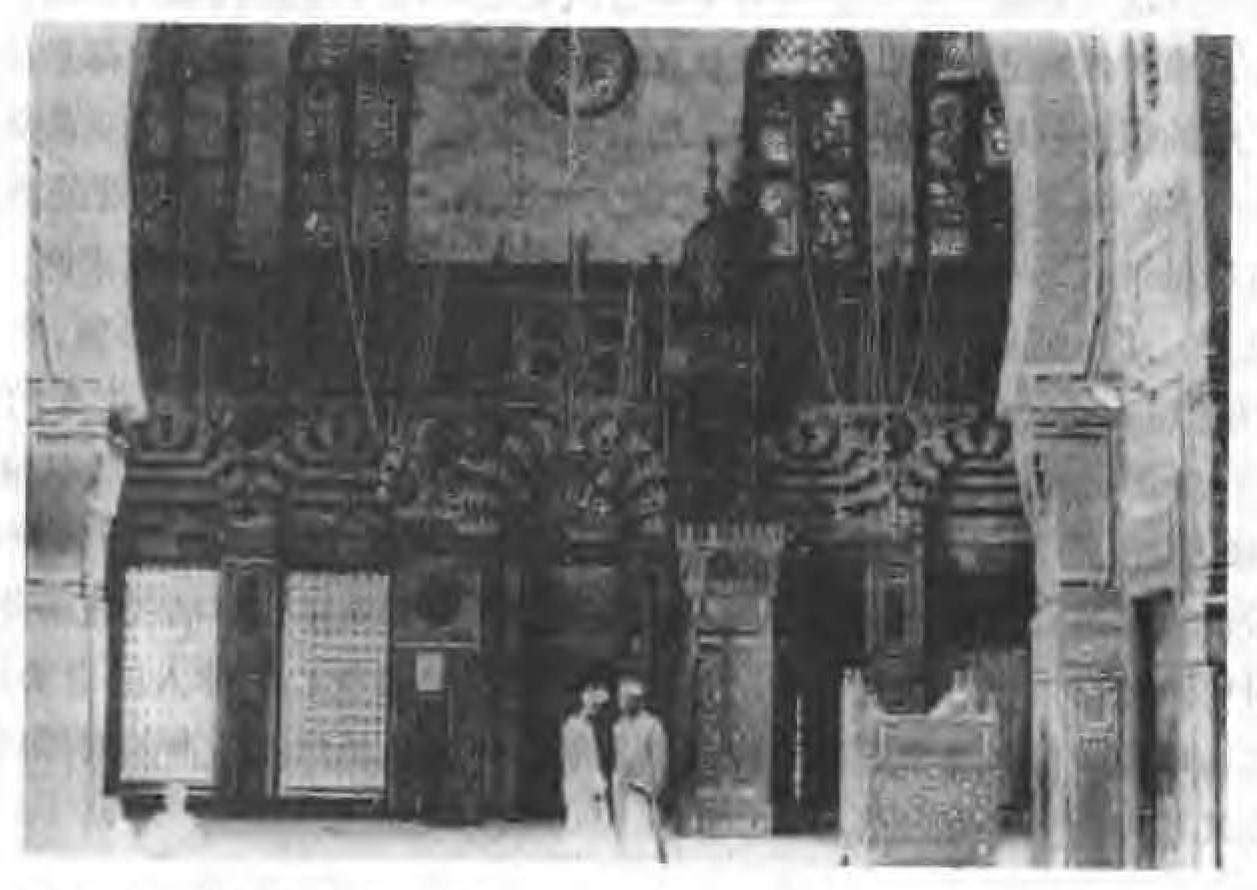
㉓ 地方特色在布尔俗尼清真寺(建于1611年)表现的程度最高。

㉔ 最著名的清真寺是开罗城堡内的苏莱曼帕夏清真寺(1538年)、位于布拉克的锡南帕夏清真寺(1571年)和马立克·萨菲清真寺(1610年)。重要的综合型建筑的代表是穆罕默德贝伊阿布·达哈卜清真寺(1774年)。

㉕ 例如扎伊纳卜·卡图恩(1713年)、贾马努丁·达哈比(1637年)和西哈伊米(1648-1796年)的住宅。



图片 6.4　马哈茂德帕夏清真寺，975/1568 年



图片 6.5　艾哈迈德·布尔岱尼清真寺的大厅，1025/1616-1038/162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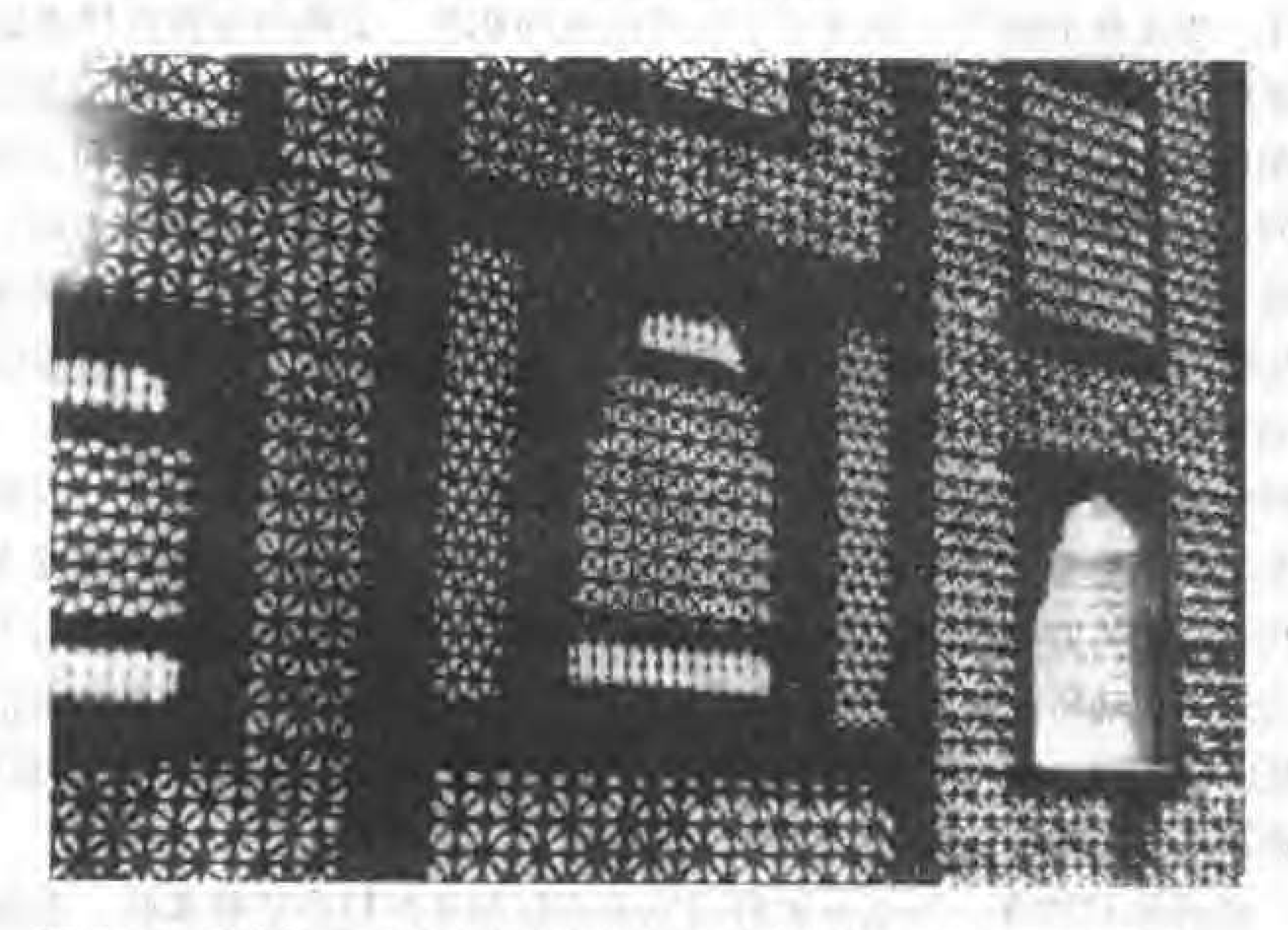
头衔。[25]

谢赫巴拉德阿里贝伊加兹扎维于 1757 年赶走了侯赛因贝伊，于是遭到以有影响的土耳其近卫军卡赫亚阿卜德·拉赫曼为首的集团的反对。阿卜德·拉赫曼热衷于在公开事件的幕后保持他的有影响的地位，所以决心由他认为是亲信的贝伊即阿里贝伊替代加兹扎维，而阿里也以“吉恩”（al-Djinn，魔鬼）闻名。1760 年，加兹扎维正在麦加，阿卜德·拉赫曼强迫诸贝伊接受他的亲信为新的谢赫巴拉德。

[25] 这一非正式头衔的第一位获得者似乎是迈赫默德贝伊切尔凯西。它仅表示埃及贝伊中的最显赫者。



图片 6.6 贾马努丁·达哈比住宅的主室，1047/1637 年



图片 6.7 贾马努丁·达哈比住宅的木制屏饰(马奇拉比亚)，1047/1637 年

阿里贝伊很快证明他野心勃勃且精力旺盛。他稳固了在埃及的地位之后，[27] 通过他在土耳其政府中的联系，成功地使伊斯坦布尔相信他是唯一能使埃及恢复正常的人。

正当阿里贝伊加强他的权力之时，埃及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些紧张。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日增，已高达数千万帕拉。1761 年伊斯坦布尔政府决定对埃及进行军事

[27] 阿里贝伊为了抵消卡兹多格卢派中其他人的影响，提升易卜拉欣卡赫亚的马木路克成员伊斯梅尔和他自己随从中的两个马木路克成员穆罕默德贝伊阿布尔-达哈卜和艾哈迈德·鲍斯纳克为桑贾克贝伊，后者后来以“贾扎尔”(al-Djazzār，屠夫)闻名。他同时还除掉了一批年事较高的领导人，如曾领导卡兹多格卢派的土耳其近卫军卡赫亚阿卜德·拉赫曼和剩下的唯一一位卡西米亚领导人萨利赫贝伊。

干预。但是在1763年，阿里贝伊利用埃方的紧张不安和朝廷的忧虑，以保证消除财政赤字为条件，获得了伊斯坦布尔的财政援助，此外，土耳其政府还答应他可以保留他所没收

161 的敌对者的一切财产。他承诺弥补过去十年总数为9100万帕拉的财政赤字，并将出售没收封地所得的5000万帕拉上缴朝廷。[28]

162 他对地主的压制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促使萨利赫贝伊组成由他领导的反对派。1765年萨利赫前往上埃及与谢赫胡马姆会师，胡马姆实际上是豪瓦拉阿拉伯人的独立领导人，他们庇护了许多阿里贝伊的敌人。

由于阿里贝伊已认识到上埃及这一集团的潜在威胁，所以他策划了一个反对它的运动。但是这支远征军的率领者侯赛因贝伊卡什卡什(他是易卜拉欣从前的马木路克)利用交给他的兵力与开罗反对派分子合作迫使阿里贝伊逃往叙利亚。但是一年以后，阿里贝伊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回到埃及，与上埃及的萨利赫贝伊重新言归于好，并于1768年将侯赛因贝伊卡什卡什和哈利勒贝伊驱逐出境，二人在他不在埃及期间成为埃及的双人统治者。

当阿里贝伊履行了他向土耳其政府许下的填补赤字亏空的诺言之后，他的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也是在1768年，他免去了代理摄政的职务，由他亲自担任代理摄政和副代理摄政双重职位。阿里贝伊欲集代理摄政——埃及行政的名义首脑——和谢赫巴拉德——首要的政治权力于一身，他的努力于1769年在他免去自己刚任命的新瓦利之时再次显露出来。然而，尽管阿里贝伊是埃及的统治者，他屈从于素丹则完全是形式上的，他并未做到自称为独立元首的地步。但是他篡夺了铸币权，他的名字载入了星期五祈祷文。他还试图利用一切资源致力于加强其政治和经济权力，采取的做法是支援军队和发展农业和商业。他还和重要的欧洲国家开展商业会谈。

他巧妙地假装为素丹效力，但他的勃勃雄心[29]于1770年又炽热起来。当时他的官职使他有权参与麦加哈希米泰埃米尔的王朝斗争。埃及直接干预解决问题的做法和以一位埃及贝伊替代吉达的奥斯曼代理摄政，这是阿里贝伊对抗素丹在希贾兹的最高权力的一个明确胜利。为这次成功所鼓舞，阿里贝伊开始产生了统一国土的想法。在他的统治下，但在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将一度构成马木路克素丹王国的几个地区，即埃及、希贾兹(受哈希姆卡塔迪泰诸侯王朝统治)和叙利亚统一起来。

同年，也就是1770年，阿里贝伊看到他统治叙利亚的机会已经来临。奥斯曼帝国对俄罗斯作战失败，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切什梅被俄罗斯舰队击溃，事实上排除了对他进行反击的可能，尤其因为大马士革的代理摄政当时正受到阿卡和加利利的反叛行政长官谢赫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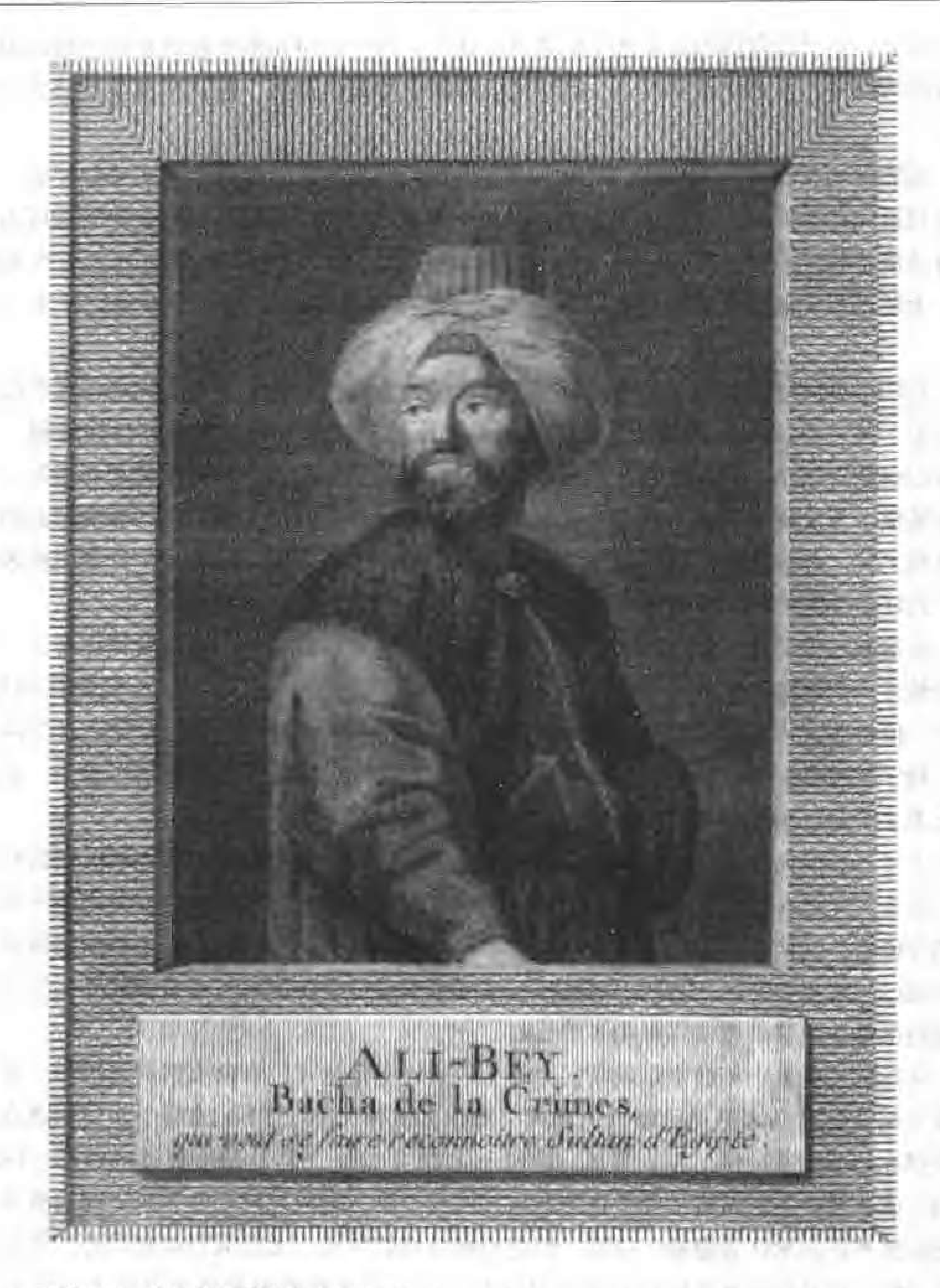
164 希尔·乌玛尔的威胁。此外，为了得到对他分散活动的支持和必要时的援助，阿里贝伊与俄罗斯驻东部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们取得了联系。

尽管阿里贝伊派往支援联军谢赫扎希尔·乌玛尔部队的司令伊斯梅尔贝伊起初有些举

---

[28] 没收的封地或原主已死的封地重新分配给各封臣，条件是缴纳“胡尔万”(hulwān)，这是一种特别税，一般为八倍于该封地的年收人。

[29] 他的绰号是布卢特·卡潘(Bulut Kapan，捕云者)。



图片 6.8 埃及的代理摄政阿里·贝伊

棋不定，在穆罕默德贝伊阿布尔-达哈卜后续部队的增援下，他击败了伊斯坦布尔军队并占领了大马士革。然而，或许是由于害怕土耳其政府报复，或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准备如果穆罕默德贝伊废黜阿里贝伊即任命他为埃及统治者，所以两位贝伊都向素丹保证效忠，并带领自己的部队回到开罗。1772 年初穆罕默德贝伊被迫到上埃及避难，在那里加入到豪瓦里阿拉伯人和卡西米亚的支持者中。在讨伐南方反叛者的远征军连同其指挥官伊斯梅尔贝伊一起倒向对方之后，阿里贝伊的力量彻底瓦解。1772 年春忠于阿里贝伊的军队被击

败，阿里贝伊只得向他的对手穆罕默德贝伊让位。阿里贝伊在他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同盟者的帮助下企图再次重掌权力，但对他的有限支持很快消散，他自己也在被俘之后很快死去。

虽然为埃及的过去所激动，阿里贝伊一生经历的某些特点却预示了未来的发展。这些特点包括他在除掉对手时的冷酷无情，特别是他在阿拉伯半岛和在叙利亚的所做所为、他私自动用国家经济资源并在中央政府中加强他的政治独立自主。他的成功之所以寿命短促，无疑是由于他的社会和政治野心太大且受马木路克家族的制约，而他们并非一贯效忠。

在阿里贝伊时代，不少征兆都产生于持久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强烈程度虽变化不定，但一直延续到19世纪。阿里贝伊对农业的关注是因他急需增加封建地租。他的严厉的税制首先影响到农村地区，无疑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被驱赶到城镇，但他们在城镇中无法谋生，因为那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同样受须预先缴纳的高额税和高额遗产转让税之苦。普遍贫困是残酷剥削社会各阶层的必然结果，这在以后的年月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接连不断的瘟疫又使之明显加剧。

新谢赫巴拉德认真履行职责，而他的效忠使土耳其政府对他们在埃及终于有了一个亲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满怀希望。穆罕默德贝伊于1775年送交了超过1.3亿帕拉的年金。同年，他按照素丹的命令派出一支讨伐谢赫扎希尔·乌玛尔的远征军。但是在攻打阿卡之时，穆罕默德贝伊去世，埃及在叙利亚的战事就此结束。埃及军队撤离所占领土，贝伊们从此失去了对叙利亚的兴趣，将他们的活动局限在埃及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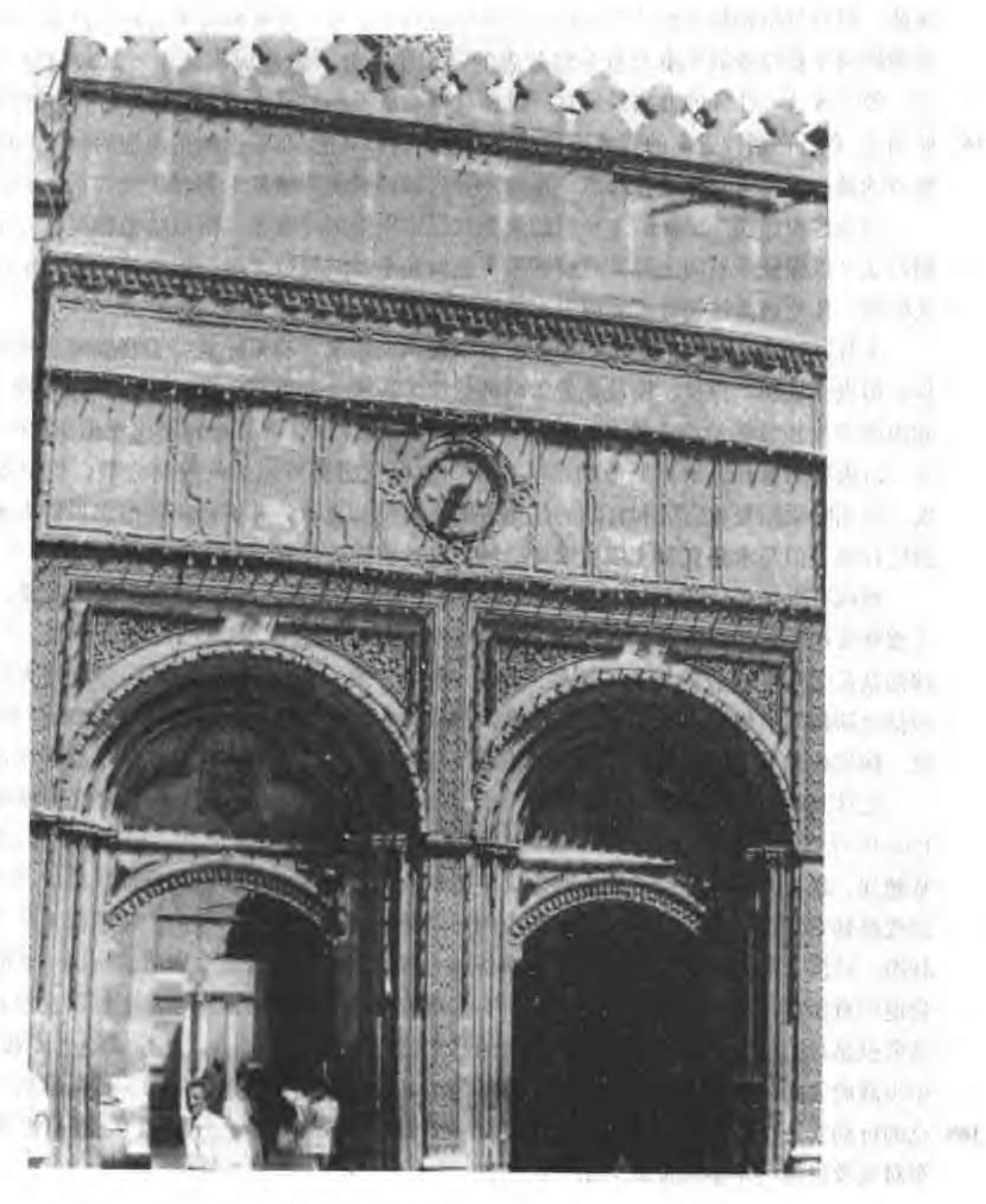
166 土耳其政府抓住每一个机会干预穆罕默德去世后发生在马木路克贵族成员间的权力之争。它支持任何一个贵族，只要他保证给土耳其政府送去从新的封地持有者那里征得的绝大部分税款，交换条件是取得没收战败对手财产的权利。这一态度反映了封地制度的作用与目的的一个重大变化，表明土耳其政府已无意直接过问埃及事务而只满足于利用马木路克的内部争斗从该省搜括尽可能多的钱财。

在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主角是三位卡兹多格卢派贝伊，即易卜拉欣卡赫亚的前马木路克伊斯梅尔和穆罕默德贝伊阿布尔-达哈卜的两个前马木路克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斗争的第一阶段于1778年告终，是年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两人成功地迫使伊斯梅尔及其追随者离开埃及。第二阶段是两个胜利者之间的战斗。易卜拉欣虽被正式承认为谢赫巴拉德，但受到穆拉德的掣肘，无法完全控制局势。他们之间的对立使土耳其政府有可能玩弄和操纵这两个敌手以达到获取最高限度的上缴年金的目的。但土耳其政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而两位领导人没收的钱财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明确留给某些官职的封地，而这些官职是他们不能据有的。[30]

1778年之后，他们逐渐获得了对全省行政的控制，占有了它的资源以用于个人的目的，特别是用来支付他们相互作战的费用。易卜拉欣并没有履行他作为谢赫巴拉德应尽的

---

[30] 例如，苏伊士海关的收入，以前是留给代理摄政的"伊尔提扎姆"，1779年被没收，该项收入主要是进口咖啡的关税。



图片 6.9 穆罕默德贝伊阿布·达哈卜清真寺，1188/1774 年

义务，即如果有的话，向伊斯坦布尔缴纳规定数额中的很小一部分，在 1784 年，也就是一直延续到 1792 年的一场经济危机的开初，此时两个敌手取得了和解并同意两人共同统治该省。土耳其政府已感觉出它在埃及的利益岌岌可危，因为双人统治似乎不愿填补最后五年的财政亏空。

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决心通过军事干预恢复对埃及的直接控制。1786 年 7 月奥斯曼远征部队在哈桑帕夏的指挥下在亚历山大港和拉希德登陆。他们在进军中击溃了马木路克

军队，但穆拉德和易卜拉欣带领残兵败将撤退到上埃及。哈桑恢复素丹权威的第一项任务是粉碎两个篡权者的军事力量并将效忠的马木路克分子塑造成服从土耳其政府要求的工具。他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是另立一批新贝伊和从不同的马木路克家族中任命新的卫戍部队司令。素丹在精神方面的权威则是通过许多布告提高的，布告强调指出他的制度与两个反叛者的暴政相比更具伊斯兰特点。素丹还答应减轻捐税和恢复卡努恩法规的正义原则。

167

因为这次惩罚性远征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定期给国库缴款，所以哈桑帕夏制订了若干财政法令以保证该省向土耳其政府和希贾兹的几个圣城履行义务。但是他的这些文件尚未实施前，他便被派往别处去完成另一项军事使命。

土耳其政府在埃及的军事干预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哈桑帕夏原想制服两个反叛的贝伊，但没有成功。相反，埃及被分为两部分成为被接受的现实：由素丹代表管理的下埃及和由两个反叛者统治的上埃及，特别是在两个反叛者暂时被驱逐到努比亚但于 1787 年恢复了对由奥斯曼和忠于奥斯曼的军队占领的上埃及所有各地区的控制之后，更是既定事实。虽则哈桑帕夏在官级和官职的任免方面作了某些更改，并任命伊斯梅尔贝伊为新的谢赫巴拉德，但马木路克制度依然未变，所有这些前提致使老问题重新出现。

继穆罕默德贝伊阿布尔-达哈卜去世后出现的政治危机，由于农业歉收、饥荒、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等经济和社会困难，从 1783 年起更为复杂。多风波的政治气氛、行政管理的杂乱无章和税收的压力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但 1791 年的一场非同寻常的大瘟疫使包括伊斯梅尔贝伊在内的大批忠诚的贝伊都成为它的牺牲品，从而使当时的政治形势简单化。穆拉德和易卜拉欣因而得以于该年夏天毫无阻挡地进入开罗，并控制了整个埃及。

土耳其政府承认了他们的统治，条件是他们必须履行正常的义务。两位新领导人于 1792 年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应缴总额和交付办法。但该协议的遵守非常勉强，送去的数额总是不足。两位贝伊重掌权力意味着在哈桑帕夏远征之前埃及所经受的残酷勒索制度的复辟，它给国家造成的后果甚至更具灾难性。因为十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经济上的管理不善以及资源和储备被大肆掠夺已使埃及完全崩溃，所以一切阻止总衰退的意图都注定要失败，即使几乎所有被税务部门榨取去的钱财事实上都留在埃及。经济危机是政治压迫的反映，一小撮高贵的马木路克贝伊及其随从以此控制绝大多数人民。中央政府无力除掉他们，埃及社会在当时也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但是取代马木路克的行动实际上已为期不远。1798年夏，一个没有料到的原因——拿破仑·波拿巴统率法军对埃及沿海的军事远征成为第一次冲击。

168

结　论

自 1517 年马木路克素丹王国灭亡至 1798 年法国远征这一时期，埃及的发展主要是由它的内在动力所决定，同时也因为当时它构成其一部分的奥斯曼帝国。但是埃及与该帝国的欧洲地区不同，它受到中心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小，其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开始孕育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阶段。因此，在社会方面还没跨越通常称之为

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的晚期。[31]

但是，将埃及合并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收获，这无疑增强了它的经济能量和政治实力。然而中央政府和埃及省之间的关系始终起伏不定，于是造成二者之间持久的紧张气氛。和其他各省一样，首先，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磨擦的根源。但先进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甚至造成了更经常和更猛烈的社会矛盾，这些与政治、经济危机结合起来导致不断出现的分权努力。其目的不外乎是企图控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构，而不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8世纪末年埃及分离势力的增长在奥斯曼帝国各阿拉伯国家中并不是孤立现象。的黎波里塔尼亚、伊拉克和叙利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若干个或多或少独立的国家，其中有些是其统治者的世袭之地。

然而，埃及分离势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某些方面的特点也和在19和20世纪时的发展一样。这些特点包括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境内的埃及贝伊的活动(迈赫默德·阿里扩张政策的第一步)以及贝伊们包括迈赫默德·阿里的反抗，目的都是要从一个几乎是独立的统治者的身上除去屈从于奥斯曼素丹的残痕。

哈桑帕夏1787年的远征预示了拿破仑·波拿巴的远征及其对臣民的影响。它也暴露了马木路克政权的军事虚弱，这一弱点拿破仑的远征使之暴露无遗。而且，奥斯曼的远征，作为企图消灭分离势力和加强该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一次努力，似乎成了奥斯曼在19世纪多次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重大先例。 **169**

埃及对境外领土越来越大的兴趣、它与外国政府代表的接触以及它要和其他地区建立贸易关系的努力都表明它已打破长达数世纪的孤立状态而开始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发展。它慢慢从孤立状态摆脱出来，在法国对东地中海殖民扩张时最终完全摆脱。由于东方问题麻烦越来越多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埃及成为对世界政治具有较大重要性的国家。

(吕和声　译)

[31] 作者知道一些学者所论述的西亚和北非诸国的封建制度的特殊性(请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中 iktāʿ 词条)。

7 苏丹，1500-1800 年

Y. F. 哈桑和 B. A. 奥戈特

170

引 言

本章论述的时期是以苏丹① 境内外的人口流动为特点。在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之初，② 处于先进地位的北方穆斯林阿拉伯人经过长期缓慢而大量的渗入，致使在较大的泛伊斯兰世界中基督教努比亚人和其他一些民族逐渐被同化。文化和种族的同化过程是一个双向过程：它一方面使大量的苏丹人出现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阿拉伯移民的地方化。

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对南部苏丹的影响微不足道。来自南方的尼洛特人的扩张主义力量阻止了阿拉伯人的南下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尼洛特人特别是希卢克人和吉恩人(丁卡人)直到该时期末一直对北方的几个穆斯林国家构成威胁。

因此本章将主要阐述萨凡纳地区的两个穆斯林国(丰吉和富尔两素丹国)的建立和扩张、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当时同样处于不同语言和文化集团融合过程中的非穆斯林非洲社会的相互作用。

本章还将试图说明伊斯兰国家的扩张是这一时期苏丹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在这时期向南的扩张中由于受河流(苏德、加扎勒和阿拉伯等河)的阻171 挡而中止，于是在所谓的南苏丹和北苏丹之间形成了一条文化边界。这条文化边界的存在使我们对苏丹近代史的解释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南苏丹的观点，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上尼罗河的丰吉人和后来加扎勒河地区的富尔人结成的劫掠集团实行侵略和经济剥削。而根据北苏丹的观点，直到最近一直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是穆斯林而且常常是阿拉伯移民，即所谓的来自北方或东方的“聪明的异乡人”带来的。因此北苏丹的国家形成是根据这一观点加以解释的，而不是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及其社会和文化结构作历史的分析。

到了 20 世纪，“北方人”被说成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南方人”则被说成是非洲人(或黑人)和“异教徒”(或“万物有灵论者”)。于是这条边界在宗教和种族关系中界限日益分明。这一观念又被人类学家和殖民当局的许多书籍大加渲染。这种有意制造的种族关系

① 这里所说的苏丹是指中世纪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以及当时的丰吉和富尔两个伊斯兰素丹国，在本章中大体相当于现代的苏丹共和国。正式将苏丹作为一个政治或行政实体的名称与 1821-1885 年的土耳其-埃及政体有关。

② 参看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16 章。

以及在边界两侧发展起来的种种偏见往往把两个地区描绘成彼此隔绝的种族和宗教实体，两者间极少或根本没有交往。

历史现实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首先，两地区之间的这一“边界”经常变动——而且并非总是向南或向西移动。例如，大约在 17 世纪中至 1861 年占领上尼罗河的希卢克人曾将边界向北推移到伊莱斯。他们从这一地区对丰吉素丹国和努巴山区进行袭击。

其次，这一边界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它还是一条绵延数百公里的宽阔地带——例如在上尼罗河地区。西段地区也是如此。富尔素丹国劫掠者、“贾拉巴”（djallāba,商人）和巴卡拉阿拉伯人眼中的边界在 1800 年之前是一片广阔的领土。[③] 而且，边界以内的文化、种族和社会状况一直在变化，居民按照政治和经济情况逐步变成阿拉伯人、富尔人、丰吉人、希卢克人、纳阿斯人(努埃尔人)或吉恩人。努巴和贝贾地方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到来预示着社会变革和种族融合，这一过程在本章叙述的时期内仍在这一宽阔的边界上进行。

第三，在北方诸穆斯林素丹国境内，种族变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现象。首先，阿拉伯化过程——包括阿拉伯人和大量的土著苏丹人在内——与其说具有种族内涵，还不如说是具有文化内涵。尽管有少数例外，阿拉伯人这一名称几乎已逐渐失去其种族意义。居住在两地区之间边界内的巴卡拉阿拉伯人就是一例。此外，当地各异族居民都说邦戈-巴吉尔米语，该语族包括卡拉语、宾加语、古拉语、[④] 南达语和费罗格语。到 18 世纪，各素丹国分成若干酋邦，大多是多元社会。而且，这些素丹国的社会结构由于奴隶制因素而更加复杂。从南方地区带来的许多奴隶成了素丹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奴隶则在他们所处的新社会中完全被同化。再则，奴隶贸易以及如象牙和鸵鸟毛等另一种边界贸易不仅将苏丹的两大地区连接起来，而且还将整个苏丹和边界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 **172**

最后，主要由于移民、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人口在这一时期已固定成为苏丹现在的人口。除了来自中部和西部比拉德苏丹(Bilādal-Sūdān)的西部人(如塔克鲁尔人和富尔贝人)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拉萨伊达人以外，苏丹在 19 或 20 世纪再也没有出现新的种族集团，大量的人口迁徙事实上在 1800 年之前就已完成。

阿卜杜拉比国

15 世纪下半叶，由阿卜杜拉(绰号贾玛——采集者)领导的阿拉伯卡比拉联盟成功地征服了阿勒瓦王国。[⑤] 与普遍的观点相反，征服索巴并不是丰吉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事业，而是由阿拉伯人单独完成的。征服索巴表明阿拉伯人的影响占优势，它标志着阿拉伯人在东比拉德苏丹的地位开始上升。[⑥]

阿卜杜拉·贾玛和他的后代阿卜杜拉比人在尼罗河主流索巴以北的凯里实行新政权的管理。索巴因此而丧失了它的重要性，当 1523 年犹太旅行家达乌迪·鲁贝尼路经该地时已

---

③ R.S. 奥弗伊(O'Fahey)，1980 年，第 137-139 页。
④ 关于这一语族，请见 A.N. 塔克(Tucker)和 M.A. 布赖恩(Bryan)，1966 年，第 10-19 页。
⑤ 详情见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16 章，第 406-407 页。
⑥ P.M. 霍尔特(Holt)，1960 年；Y.F. 哈桑(Hassan)，1972 年，第 23-26 页。

成为废墟。[7] 选择凯里或许是由于易于与布塔纳阿拉伯人沟通而决定的，因为布塔纳阿拉伯人的支持对阿卜杜拉比人至关重要。此外，凯里还控制着尼罗河流域以及河西岸的各种活动，特别是贸易活动。

新国家的范围不易确定。阿卜杜拉比的统治似乎延伸到了北贾齐拉的阿拉伯人，即尼罗河东面的布塔纳人，也可能延伸到某些贝贾人。分散在尚迪和埃及边境之间地区似乎参 173 与攻打索巴的阿拉伯化的头领仍然忠于阿拉伯联盟的盟主。他们之间的确切关系并不清楚；但后来，阿卜杜拉比人作为霸主有权批准新头领的任命。

阿卜杜拉比国的独立存在并没有延续到足以发展起自己的制度。到16世纪初，它遇到了可怕的敌人——丰吉人，他们是向青尼罗河下游迁移的牧牛人。这两股游牧民力量可能是在争夺贾齐拉北部的牧场中发生了冲突。丰吉人于1504年在阿尔巴吉打败了阿卜杜拉比人，他们的国王降到了臣属的地位。[8] 阿卜杜拉比人作为附庸，继续统治丰吉素丹国的北部直到1820年土耳其-埃及出兵将其征服为止。

丰吉素丹国

丰吉人是放牛的游牧民，由于他们的祖籍遥远，产生了许多矛盾的假设。他们的王国在苏丹的传说中称做素丹纳扎尔卡(al-Sultana al-Zarka,黑人素丹王国)。[9] 1522-1523年访问过他们的达乌迪·鲁贝尼说他们的君主是一位统治着黑、白国民[10] ——分别指土著居民和阿拉伯居民——的黑肤色穆斯林。当詹姆斯·布鲁斯这位苏格兰旅行家访问森纳尔时记载说，丰吉人的祖先是希卢克入侵者，他们来自上游白尼罗河。[11] 然而有一些苏丹传说，可能来源于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始祖是取道埃塞俄比亚而来的倭马亚王朝的难民。他和当地一位公主结了婚，由此继承了她的统治权。他在苏丹传说中被说成是带来新习俗的“有福之人”。[12]

丰吉王朝从何时开始自称是倭马亚王朝的后裔现在还不清楚。根据鲁贝尼的说法，至少战败阿卜杜拉比的国王乌玛拉·敦库斯是个穆斯林。可能是由于对其行使盟主权的新穆斯林社会的影响以及与埃及的商业和文化往来，丰吉人很快就伊斯兰化了。[13] 丰吉人与伊斯兰社会边缘的其他一些皈依者一样，也倾向于将自己与阿拉伯人联系起来，因而就承认了一位阿拉伯人祖先。他们这么做是希望提高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威望并增强他们对其属下的阿拉伯臣民的精神权威。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伊本(之子)·代夫·阿拉在提到有些权贵 174 时称他们是“丰吉人之王”和“阿拉伯人之王”(也就是阿卜杜拉比人的国王和贾阿利英

---

[7] S. 希勒尔森(Hillelson)，1933年，第60页。
[8] J. 布鲁斯(Bruce)，1805年，第3卷，第370-372页；第7卷，第96页。
[9] “扎尔卡”在苏丹的阿拉伯语口语中表示黑色之意。
[10] S. 希勒尔森，1933年，第55-60页。
[11] J. 布鲁斯，1805年，第3卷，第96页。
[12] Y.F. 哈桑，1965年。
[13] P.M. 霍尔特，1961年，第20页；J.L. 斯波尔丁(Spaulding)，1972年。

人的国王)，暗示在这两个族体之间存在着人种差别。[14]

丰吉人一方面维护他们对阿卜杜拉比领土的宗主权，一方面从已成为其政府所在地的森纳尔统治着他们的领地。阿卜杜拉比谢赫(首领)在先前的领地上保持着实际上的自治，同时也成了丰吉人的封臣并有着丰吉君主赐给其主要臣属的“曼吉尔”(Māndjil)或“曼朱卢克”(Māndjuluk)的称号。但是，从一开始起就显露出丰吉人及其附庸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

在16世纪中期之后不久接掌权力的谢赫阿杰布一世企图摆脱丰吉人的控制而向他们挑战，后击败丰吉人，并将其驱逐到埃塞俄比亚。丰吉人在达金(1568/9-1585/6年)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原先的地位，但承认阿杰布一世有权在他的领地内任命法官。达金改组王国和建立新法规的政策显然打破了两方之间的微妙平衡，并迫使阿杰布公开起来造反。在索巴以北数英里远的卡尔科吉，一支丰吉军队使阿卜杜拉比人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并于1611/12年将阿杰布一世杀死。他的部族避难于栋古拉。后经有影响的宗教界要人谢赫伊德里斯·瓦德·阿克巴尔从中斡旋，丰吉人和阿卜杜拉比人取得了和解。[15] 除了移交给丰吉的阿尔巴吉以外，一切恢复原状：阿杰布的后代以瓦德阿杰布的称号直接统治向北远至哈贾尔阿沙尔的地区，其中包括绝大多数游牧部落并间接统治尼罗河流域直到奥斯曼努比亚边境第三大瀑布地区内的各酋邦。和议的结果使这一素丹国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然而，大约于17世纪中，舍基亚人酋长向阿卜杜拉比的盟主地位提出挑战，并宣称该国从丰吉素丹国中独立出来。[16] 175

丰吉素丹国的扩张

丰吉国的权力已扩展到原属于阿卜杜拉比的下努比亚，1517年征服埃及的奥斯曼人对此似乎颇有疑虑。虽然已有边界冲突的报告，但奥斯曼人并不急于掀起争端，直到大素丹苏莱曼(1520-1566年)朝代的开始。奥斯曼人为阻止葡萄牙人对红海的威胁，派出一支海上远征队到印度洋与之对抗，并决定征服葡萄牙的同盟国埃塞俄比亚。在海上远征的返航途中，奥兹德米尔接到命令要他除掉努比亚境内的“难以管束的”丰吉人，因为两派人已在那里交战。奥兹德米尔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个边境要塞——伊卜里姆和迪尔。他在第二大瀑布和第三大瀑布之间的萨伊建造了一座要塞，后成为奥斯曼埃及的南部边界线。后来被称为柏柏尔斯坦(柏柏尔人或努比亚人的国土)的这个奥斯曼新省由波斯尼亚士兵组成一支卫戍部队驻守在阿斯旺、伊卜里姆和萨伊等地的要塞，从此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17]

---

[14] Y.F.哈桑，1965年；伊本·代夫·阿拉·穆罕默德·阿卜德·努尔(Ibn Dayf Allah Muhammad ʻAbd Nur)，1973年，第61、90页。

[15] 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尔-阿里(Ahmad b. al-Hādjdj Abū' l -ʻAli)，1961年，第8-9页；伊本·代夫·阿拉·穆罕默德·阿卜德·努尔，1973年，第63、227、296页。

[16] Y.F.哈桑，1972年，第63-75页。

[17] G.奥尔汉卢(Orhanlu)，1974年，第1-2页、21-22页；P.M.霍尔特，1961年。

奥兹德米尔帕夏在1554年11月从也门总督职位上告退下来之后，曾多次拜访这位素丹，两人在会谈中讨论了埃及、也门和哈贝西斯坦的事务。[18] 稍后他受命征服哈贝西斯坦。在埃及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之后，远征队出发顺尼罗河而上。到了阿斯旺，奥兹德米尔无法控制纪律松弛的军队，不得不取消这次战役。应该知道，这次远征是针对丰吉斯坦(丰吉人之地)，而不是针对哈贝西斯坦的。后来在1577年，有一位苏莱曼帕夏奉命担负征服丰吉斯坦的任务。但是这次战役始终未能实现。[19] 埃及的边界大约在1622年阿卜杜拉比和奥斯曼之间的几次交战之后最终定在汉尼克。汉尼克线位于第三大瀑布和穆舒之间，穆舒是丰吉人北部边界界桩之地。[20]

奥斯曼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由称做“卡希夫”的官员负责。这一官职后来由居住在迪尔的第一位卡希夫的家族世袭。同样，原波斯尼亚士兵的后代与当地人通婚，仍充当奥斯曼在该地区要塞的卫戍部队。

奥兹德米尔在建立奥斯曼基地以对抗葡萄牙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方面也有很大功劳：名义上从属于马木路克埃及的萨瓦金转而承认了奥斯曼的宗主权，马萨瓦于1557年被兼并。从此两个港口之间的狭长海岸就成了哈贝斯省。由有桑贾克头衔的总督为司令的一支奥斯曼卫戍部队就驻扎在萨瓦金。在葡萄牙人的威胁过去之后，萨瓦金成了丰吉素丹国商业输出的主要口岸。这位奥斯曼总督和丰吉人之间的关系起初并不友好，有时甚至恶化以至发生军事冲突。根据奥斯曼的资料，丰吉人(说贝贾人或许更确切)于1571年进攻萨瓦金，将它围困达三个月之久。但由于双方扩大商贸交往，出现了较为友好的气氛。萨瓦金的重**177** 要地位上升，直到20世纪初一直没有受到挑战。阿拉伯化的贝贾族人，即哈达里巴人，曾一度统治阿伊达布地区，在贸易方面起着领先作用。后来奥斯曼人从哈达里巴人中选择本地的统治者，并称之为埃米尔。[21]

到17世纪初，丰吉人似乎已巩固了他们在森纳尔的地位，他们的直接控制从阿尔巴吉延伸到法祖格利，这里可能是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北端。丰吉人的权力向西越过贾齐拉人地区进入科尔多凡，是从素丹阿卜德·卡德尔的扩张开始的。大约于1554年他打败了萨卡迪人和莫亚山的头领。两位头领在保证信奉伊斯兰教并同意缴纳年贡之后，官位才得到确认。[22] 在白尼罗河地区，尼洛特各族的压力日益增大，有损于森纳尔，这一情况显然是引起丰吉人和希卢克人直接对抗的原因，因为希卢克人久居白尼罗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素丹巴迪二世阿布·迪肯(1644/5-1718年)的统治正值该素丹国的黄金时代，他在白尼罗河流域的阿莱斯设置了一支丰吉卫戍部队，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阿莱斯的行政由丰吉王朝的一名成员执掌，他的官衔仅次于阿卜杜拉比首脑。丰吉人从这一战略要地既可监视河对岸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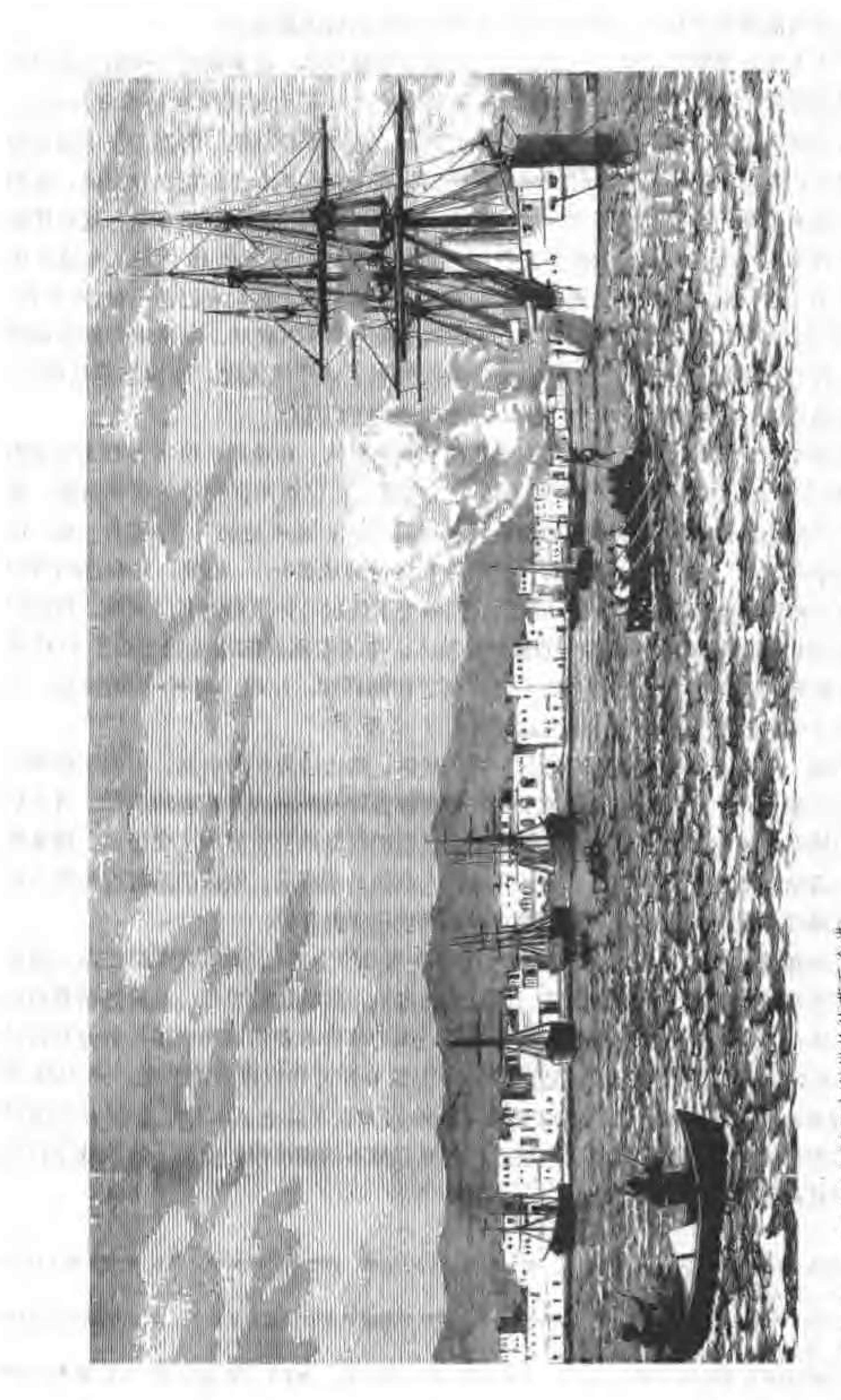
[18] 奥斯曼的资料使用哈贝西斯坦或阿比西尼亚这一名称包括埃及以南远至东非的桑给巴尔岛或莫桑比克。见G.奥尔汉卢，1974年，第21页。

[19] 同上，第34-35、77页。

[20] P.M.霍尔特，1961年，第24页。

[21] G.奥尔汉卢，1974年，第76页。

[22] J.布鲁斯，1805年，第4卷，第368页。



图片 7.1 一幅 19 世纪版画中所描绘的萨瓦金港

一切活动，也可监视希卢克人，而希卢克人似乎已与他们结成联盟。㉓

后来丰吉人深入到努巴山脉，这里是主要的奴隶搜捕地区。这里新建的伊斯兰化的塔卡利王国被迫降到了从属地位。㉔ 丰吉人同时还将其宗主权扩大到代尔和科尔多凡山区，这些地区后来成为他们与穆萨巴特人激烈竞争的舞台。从非穆斯林的"努巴山"中捕获的大量俘虏收容在森纳尔周围的许多村子中。俘虏们组成一支保护素丹的奴隶警卫队。他们的数量由于后来不断的追捕和购买而大增。建立一支从属于统治者的奴隶军队，这在伊斯兰的史册中并非前所未有：阿拔斯哈里发穆坦西姆首先采用，后来在18世纪达尔富尔的素丹也曾采用。这一做法受到传统武士即丰吉贵族的严重关注，他们在巴迪三世(红色者，1692-1716年)统治时期发动叛乱以示抗议。虽然素丹制止了这次暴动，但丰吉贵族还是维护了他们的权力并废黜了他的儿子翁萨三世，指控他私生活荒淫无度。这标志着乌玛拉·敦库斯世系的告终。王子努尔于1720年继承了翁萨三世的王位。

178

尽管受到丰吉贵族的干预，国家仍继续依赖于奴隶军队。在最后一位丰吉君主巴迪四世阿布·苏鲁克(1721-1762年)的统治时期再次陷入危机。在巴迪四世统治的前半时期，他将国家事务全部交给他的大臣多卡去处理，被看成是"公正和成功的"。待多卡一死，巴迪将"阿赫尔乌苏尔"(ahl al-usūl,具有古老门第和身份的成员)一一流放，并在他的努巴奴隶军和富尔难民的支持下实行专横的统治。巴迪为了摆脱心怀敌意的名门贵族，将他们派去反击侵犯科罗尔凡境内丰吉领土的穆萨巴特人。丰吉军队在初次受挫之后于1747年在司令穆罕默德·阿布·利凯里克的指挥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阿布·利凯里克一直担任科尔多凡境内的丰吉军司令，作为总督统治了14年。㉕

在这期间，丰吉人和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两次战争，均由边界纠纷引起，但两次结果均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双方关系的记录中有许多积极合作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例子。对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来说，森纳尔长期以来就是他们联系外部世界的主要出口。埃塞俄比亚人通过森纳尔从埃及获得新任主教，并与商人交换日用商品。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寻找他们通向祭司王约翰之地埃塞俄比亚的道路。

第一次埃塞俄比亚战争是17世纪初爆发的。在素丹阿卜德·卡迪尔被废黜之后，埃塞俄比亚皇帝苏塞尼奥斯准予他政治避难，而且还任命他为切勒加的总督，该地控制着边境贸易商队的活动。当时统治丰吉的素丹感到忧虑，因为尽管苏森约斯和巴迪一世曾互送过一次礼物，但两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边境屡屡发生军事冲突和奴隶搜捕活动。到1618和1619年，边境冲突不断升级，已有使用少量滑膛枪的大量军队卷入其中。两国君主坐镇各自的首都指挥战争，这一事实表明这次战争对双方都不构成可怕的威胁。这次战争以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告终。㉖

㉓ 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尔-阿里，1961年，第9-10页；Y.F. 哈桑，1972年，第68页；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1974年，第61-63页。

㉔ 关于当时丰吉和塔卡利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意见。较早的附庸关系之说新近受到了J. 埃瓦尔德(Ewald)的挑战。1983年，第10页。

㉕ 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尔-阿里，1961年，第9-10页；P.M. 霍尔特，1961年，第20-22页；Y.F. 哈桑，1972年，第71-77页。

㉖ W. 阿雷盖(Aregay)和S.H. 塞拉西(Sellassie)，1971年，第4卷，第65-66页。

第二次埃塞俄比亚战争是为反对卡拉巴特-丁德拉地区征收贡税而以边境偷袭的形式开始的。1744 年 3 月，伊雅苏二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埃塞俄比亚军前去抗击森纳尔。双方军队在丁德拉河两岸对阵，埃塞俄比亚人在大战中被击溃，皇帝差一点阵亡。丰吉的大捷应归功于穆萨巴特王子卡米斯·朱恩库尔以及追随他在森纳尔避难的一些人。森纳尔和贡德尔之间的关系虽然多年来一直很紧张，但商路却始终畅通。巴迪四世和他的臣民怀着宗 **179** 教热情庆祝丰吉大捷。这一胜利在伊斯坦布尔也引起反响，据说奥斯曼哈里发“为这次伊斯兰教的胜利感到高兴。”[27]

伊斯兰教的发展

丰吉-阿卜杜拉比素丹国的建立为该国提供了统一和稳定的良策，即单个的穆斯林学者带来伊斯兰教学识并介绍苏非派神秘主义，有利于促进伊斯兰教的推广。他们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并鼓励在该国居住。在此之前伊斯兰教义的传播是由两种人，即商人以及主要是游牧族阿拉伯人完成的。前一种人的联络长达九个多世纪，他们起着伊斯兰教宣传者的作用：商业活动与宗教皈依相结合历来是伊斯兰教社会边缘地带常见的现象。第二种人，虽然并不熟悉伊斯兰教教义，也不易受宗教热情的冲动，主要是通过与当地的苏丹人通婚来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伊斯兰化的出现。[28] 这两种人的努力往往得到单个教师的协助。

丰吉的早期是伊斯兰教师数量增长的时期，他们中有些来自埃及、希贾兹、也门和马格里布。但大多数是苏丹人，其中有些人曾在开罗和其他圣地学习。苏丹第一位穆斯林学者马哈茂德·阿拉基于 16 世纪中从开罗回国途中在白尼罗河流域建了 17 所学校。大约于 1570 年，加拉姆·阿拉·伊本·阿伊德的一个后代易卜拉欣·布拉德·伊本·贾比尔引进了马立克学派两个教本的学说，即阿布·扎伊德·凯拉瓦尼编写的《Risāla》和哈利勒·伊本·伊萨克编写的《Mukhtasar》。这两本书有助于建立马立克学派礼拜式的统治地位。其优势由于来自当时马立克学派占主导地位的马格里布和西部比拉德苏丹的文化影响而得以保持。

最早一批受训的穆斯林学者主要讲授沙里亚（sharī'a，穆斯林法）以及该法的施行。传授正统教义和使宗教博大精深在一个幅员辽阔、孤立而落后的国家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在正统伊斯兰教尚未扎根之前，先传入一种较为大众化但不太严格的伊斯兰教。

大多数苏非塔里卡（ṣūfi tarīḳa，教派）都是来自希贾兹。其中最早的也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是以巴格达的阿卜德·卡德尔·吉拉尼（1077-1166 年）命名的卡德尔教派。该教派是由巴格达的塔吉·丁·巴哈里引进的，他于1577年应苏丹一位商人朝圣者之邀从麦加来到苏丹。**180** 他在贾齐拉居住了七年，在这期间他介绍了许多知名的苏丹人（包括谢赫阿杰布一世在内）加入卡德尔教派。

另一个是萨迪尔教派，这是由哈马德·伊本·穆罕默德·马吉杜卜（1693-1776 年）引入

---

[27] 同上，第 67-68 页；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尔-阿里，1961 年，第 22 页。

[28] J.S. 特里明厄姆（Trimingham），1949 年，第 82 页。

的，他是贾阿利英卡比拉成员之一，曾在希贾兹学习。该教派在当地开始被称为马吉杜卜教派，它和马贾迪卜部族后来发展为一个民族神权政治国家，其位置在阿特巴拉河汇合处以南地区。这一教派在这里的世俗和神灵事务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当苏非派教义传入丰吉王国时，它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已处于低潮，被某些异端行为所染而不再是加深宗教信仰的手段。由于缺乏正当的宗教教育，人们自然会相信"巴拉卡"(baraka，赐福或仁慈)来自在人与神之间起调解作用的圣者。他们还相信，这种神秘能力或神秘功能可以由这些圣者的后代继承或能在他死后由他显示。这一观念导致对圣徒的过分崇拜。苏非派教师逐渐具有授予土地和豁免税收之权，有的则获得了像伊德里斯·瓦德·阿克巴尔和马贾迪卜人所具有的重大政治影响。他们比法学家更受统治者及其臣民的敬重。

然而，到17世纪，这两个功能已无法区分。法学家认识到其对手获得的令人欣喜的地位，因而倾向于将教授法律与苏非派领导地位相结合。这一发展清楚地反映在当地的习惯法中，这里的"法基"(fakī)这一名称(阿拉伯语"法学家"fakīh 的讹误；复数为 fukahā')是不加区别地使用于法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身上。

由于他们创建的许多宗教中心以及他们发挥的巨大政治影响，法基们为民族不纯和易于变化的丰吉社会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因素。他们讲授伊斯兰教条，因而给国家提供了统一的因素，他们享有效忠的美名，因而使人们对伊斯兰教更加忠诚。他们的传教热情并不局限于丰吉王国，而是扩散到远至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和博尔诺等地。确实，一些有名的苏丹法学家从贾齐拉和博尔诺之间的地区吸引了许多学生。[29]

伊斯兰教以同样的方式在科尔多凡和新建立的富尔素丹国发展。达尔富尔首先受到来自马格里布和中部比拉德苏丹以及其次逐渐受到来自丰吉王国伊斯兰潮流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加奈姆也感受得到，该地早在11世纪之前就在整个地区发挥巨大的影响。[30]

181

贸易和国家

丰吉和富尔两个素丹国的领土上几条纵横交错的长途贸易商路，将这两个国家与埃及和红海联接起来。这些商路在加强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丰吉和富尔的两位素丹和苏丹地区的大多数国王一样，对受他们保护的长途商路享有既得利益。奴隶、黄金、鸵鸟毛和其他用来换取优质棉纺织品、珠宝、武器和奢侈品的某些非洲产品的交易是互为补充的。素丹们除了他们在海关关卡征收的关税外，还需要相当多的奢侈品来维持他们的威望和奖赏他们忠实的支持者。

对外贸易是沿着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主轴线进行的。第一条主轴线将博尔诺-瓦达伊和森纳尔联接在一起，中间经过达尔富尔的主要商业中心科拜和科尔多凡。它从森纳尔直接通向科兹拉贾卜和萨瓦金，或经过尚迪前往。这条线路除了商业往来外，还有助于穆斯林朝圣者穿过所谓的"苏丹大道"。

---

[29] 例如，卡达尔有1500个来自塔克鲁尔的学生，阿尔巴卜-哈欣有1000个来自贾齐拉和博尔诺地区的学生。
[30] Y.F.哈桑，1971年；伊本·代夫·穆罕默德·阿卜德·努尔，1973年，第3-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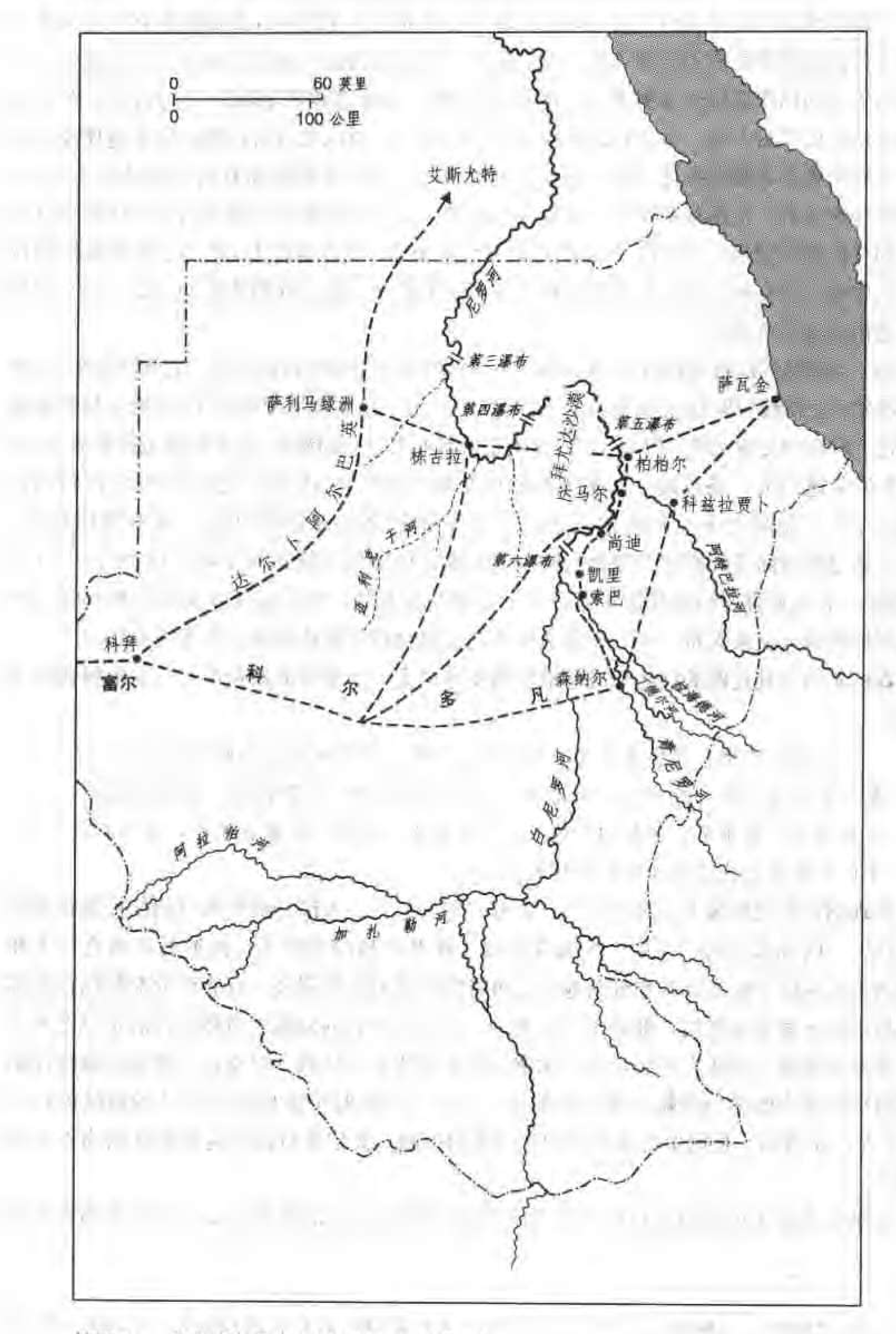


插图 7.1 苏丹的贸易路线(仿照 Y.F. 哈桑图)

东苏丹通过“苏丹大道”接受来自西苏丹和北非的文化影响。非洲穆斯林学者发展了与尼罗河流域和希贾兹的牢固关系，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出发点可能是达尔富尔，该地也从乍得湖以西诸国引来朝圣者。到19世纪初，这条道路在远到西边的富塔托罗的整个苏丹地区已广为人知。由于它路程较短，花费较少，所以无力负担随商队取道埃及沙漠旅行费用的朝圣者都选择这条路。朝圣者大都步行，沿途受到穆斯林居民的施舍和保护。虽然有些朝圣者，包括某些学者，定居在东苏丹，但不要将他们与西非的某些民族如富尔贝人的移民潮所混淆，后者已于19世纪初在达尔富尔(和其他地方)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村社。这些朝圣者在旅行途中似乎都大量从事买卖毛驴、书籍和其他货物的活动。书写护符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之一。

第二条道路的起点为森纳尔，商队固定一年两次从这里出发前往埃及。它途经凯里(后来改经哈尔法亚特穆拉伊)直接跨越拜尤达沙漠(或从另一地点顺尼罗河而下)经栋古拉和萨利马到达上埃及的艾斯尤特。但是，由于18世纪舍基亚人引起的混乱，这条标准道路被放弃，改走沿东岸前进的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起自森纳尔经尚迪、达马尔，越过阿特巴拉河到达柏柏尔，然后在阿巴卜达阿拉伯人的保护之下越过努比亚沙漠到达上埃及的伊斯纳。

183

这条尼罗河路线在萨利马绿洲与富尔通向埃及的贸易干线达尔卜阿尔巴英(四十日之路)相接。它从科拜开始通往富尔最后一个边境点苏韦尼，然后越过沙漠经萨利马绿洲和哈尔贾绿洲进入艾斯尤特。另一条商道往西北方向经费赞前往的黎波里和突尼斯。[31]

森纳尔由于其辽阔的腹地和战略地位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克鲁姆普神父写道：

> 在整个非洲，仅就摩尔人之地而言，森纳尔可以说是最大的商业城市。不断有商队从开罗、栋古拉、努比亚、以及跨越红海，从努比亚、埃塞俄比亚、达尔富尔、博尔诺、费赞和其他一些王国前来。这是一个自由城市，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无论信仰如何均和睦相处。[32]

到森纳尔来的外国人大都是商人，也有一些手艺人。大部分的贸易可能都控制在苏丹“贾拉巴”(Djallāba，商人)手中。作为森纳尔与埃及贸易的中间人，尚迪的达纳克拉人和贾阿利英人获得了经商经验和到新地区从事冒险活动的足够资金。有胆识的贾拉巴在富尔的贸易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达尔富尔一些贸易中心的发展。虽然苏丹的贾拉巴和来自上埃及的其他一些商人都是经营长途贸易的主要资金提供者，但对这一贸易的最终控制及其组织和安全似乎仍依赖于各王国的素丹。素丹们有时也派出他们自己的商队前往开罗。[33] 在达尔富尔，长途贸易或多或少受国家的控制。富尔素丹国因这些商队而为外部世界所知。

森纳尔商业上的优越地位因丰吉-富尔在整个科尔多凡的竞争以及希卢克人的袭击造

---

[31] R.S.奥弗伊和J.L.斯波尔丁，1970年，第6、9页；P.M.霍尔特，1961年，第12-14页；Y.F.哈桑，尚未发表以及1977年；U.纳克尔(Naqar)，1972年，第92-113页。

[32] T.克鲁姆普(Krump)，1710年。

[33] R.S.奥弗伊和J.L.斯波尔丁，1974年，第68页。

成科拜(欧拜伊德)-森纳尔道路不安宁而受到影响。因此，那里的贸易改道向北进入尚迪。[34] 布鲁斯于 1773 年访问尚迪，当时它是在萨达卜·贾阿利英人自治的一个大商业中心。[35] 到 19 世纪初，尚迪在商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布克哈特所说，它是继森纳尔之后努比亚商队的大汇合点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富尔的交易市场。[36]

在东部，萨瓦金的哈达里巴人在红海与尼罗河之间的长途贸易中也很活跃。他们从尚迪购进非洲产品和奴隶，然后在萨瓦金换取印度货物，萨瓦金是仅次于开罗和马萨瓦的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37] 184

往尼罗河下游贩卖奴隶的活动自古就有。在阿拉伯人和努比亚人订立了巴克特条约之后就由阿拉伯人继续这项活动。依据该条约，一年要送去 400 名努比亚奴隶，这时阿拉伯世界开始将他们当做家仆使用。他们善于射箭的作战本领使他们得以在奴隶军队中服役。埃及的图伦王朝(868-935 年)、伊赫什德王朝(935-969 年)和法蒂玛王朝(969-1171 年)都曾大量搜寻黑奴以补充他们的兵源。

长此以往，对黑奴的需求日益增大。然而，由于努比亚人口稀少，无法满足伊斯兰世界的这一需求，于是，阿拉伯商人须开发努比亚西南的其他来源。正是由于阿拉伯人(泛指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臣民)的介入，奴隶贸易受到进一步的鼓励，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且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末年。起初奴隶都是努比亚人和贝贾人，后来随着需求的增长又从科尔多凡、达尔富尔，最后从加扎勒河、博尔诺-瓦达伊以及邻近的中部比拉德苏丹一些地方获取奴隶。在尚迪出售的奴隶到 18 世纪末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和从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博尔诺以及达尔西拉捉来的努巴人。

奴隶是通过征服、绑架或购买获得的，阿拉伯商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但大多数阿拉伯商人似乎并不参与最初捕捉奴隶的活动(19 世纪时期除外)，而主要依靠非洲的供应者或经纪人。阿拉伯商人和非洲供应者双方都充分利用了有助于他们从事这项活动的古代习俗和制度。阿拉伯商人大多满足于用他们兜售的货物换取奴隶。

对黑奴用于军事目的的客观需求在阿尤布王朝时代(1172-1251 年)缩小了，阿尤布人当时遣散了黑人军队而改用白人奴隶。马木路克(1251-1517 年)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在他们统治时期，军队几乎全部由白奴补充。

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新建的丰吉和富尔两个素丹国，仍可见到对黑奴士兵的需求，因为那里的军队全都以黑奴为核心。到了 19 世纪，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为他们的现代化军队招募黑奴，这些黑奴士兵多半是从苏丹购买的。虽然穆罕默德·阿里最终放弃了原想建立一支纯黑人军队的计划，但苏丹士兵在整个 19 世纪在埃及军队中仍占相当大一部分。 185

[34] J.L. 伯克哈特(Burckhardt)，1819 年，第 321-322 页。
[35] J. 布鲁斯，1805 年。
[36] J.L. 伯克哈特，1819 年，第 321-322 页。
[37] 对这一问题更详细的探讨，见 Y.F. 哈桑，尚未发表和 1977 年；R.S. 奥弗伊，1970 年；J.L. 斯波尔丁，1971 年，第 150 页和 T. 沃尔兹(Walz)，19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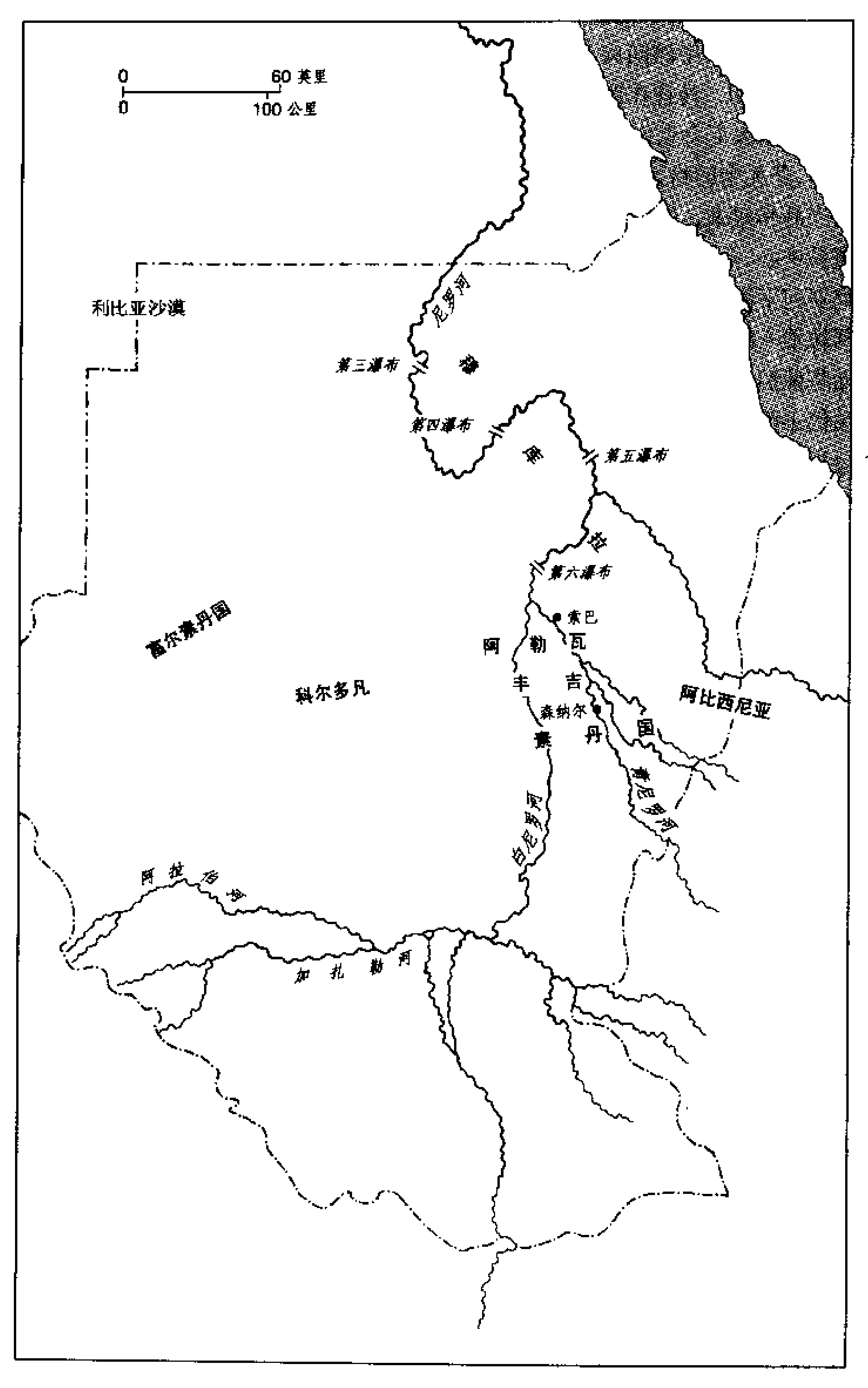


插图 7.2 苏丹的王国和素丹国(仿照 Y.F. 哈桑图)

丰吉素丹国的衰落

森纳尔作为最主要的商业中心，随着政治的衰退也明显败落了。在森纳尔由于巴迪四世加强了压制手段，曾随同阿布·利凯里克前往科尔多凡而家属又受苦最深的丰吉贵族成员劝说这位将军废黜素丹。阿尤布·利凯里克率领他的军队进入森纳尔，废黜了巴迪，于1762年让他的儿子纳西尔登上了素丹王位。阿布·利凯里克反叛成功是该素丹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谢赫穆罕默德·阿布·利凯里克和他的那些称为“瓦齐尔”（wazirs）的继承者都成了世袭统治者或摄政者，直到王国垮台。丰吉素丹无非是哈马吉摄政者手中的傀儡。权力的转移可以用丰吉编年史家的话予以概括：巴迪“……是最后一位掌权的国王，真正的君主政权随他的倒台而告终。在他之后，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权力均转到了哈马吉人手中。”㊳

“哈马吉”是苏丹阿拉伯人用来称呼贾齐拉某些古老民族的。他们虽被认为是属于贾阿利血统，但既不是丰吉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在阿布·利凯里克领导下，哈马吉霸权的出现，体现了已经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复苏。㊴

1776/1777 年阿布·利凯里克刚一去世，各丰吉国王便立即开始与诸省督，特别是阿卜杜拉比人一起，策划驱逐他们的摄政。阿布·利凯里克的后代由于内部的权力之争而处于不利地位。确实，丰吉素丹国的最后 50 年各派之间互相倾轧，充满了阴谋、叛乱和内战。

在北部，阿卜杜拉比头领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也减弱了：尚迪的萨达卜人和达马尔的马贾迪卜人实际上已成为自治的民族。在栋古拉地区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的舍基亚人武士受到埃及马木路克的骚扰。1811 年，他们逃避穆罕默德·阿里的屠杀，在栋古拉乌尔迪建立了一个营地，与舍基亚人作战。在西部，受到富尔素丹国骚扰的丰吉人最后被逐出科尔多凡。当土耳其-埃及军队于 1821 年进攻森纳尔时，该素丹国已过于软弱，再也无力抵抗。

富尔素丹国

187

富尔素丹国是比拉德苏丹萨凡纳地区繁荣的伊斯兰王国之一。它位于东比拉德苏丹的西部边缘。西去是瓦达伊素丹国，在这两国之间有一些半独立的小王国，它们分别归顺两个素丹国。东面为科尔多凡平原，将富尔素丹国和丰吉王国分隔开，这一地区引起两国的争执，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利益。那里的穆萨巴特人是富尔素丹的亲戚，他们也与敌对国家相争，并企图加强对科尔多凡的控制。北面的利比亚沙漠和南面的阿拉伯河形成国家的天然边界。富尔素丹国的摇篮马拉山俯视着中央地区，这里是几条商路的汇合点。这些商道促进了经济繁荣、文化影响和人口迁徙。

富尔素丹国的早期历史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模糊不清。根据口头传说，富尔国经过两

㊳ J.L. 伯克哈特，1819 年，第 310 页。

㊴ 艾哈迈德·哈吉吉·阿布尔-阿里，1961 年，第 21 页。R.S. 奥弗伊和 J.L. 斯波尔丁，1974 年，第 94 页。

代本地人王朝——达乔人和通朱尔人——的统治已居领先地位。达乔王国在13和14世纪兴旺发达。在失去对商业的控制之后，他们在15世纪初被通朱尔人所取代。通朱尔人先建立了对中央地区的统治，后来逐渐控制了达尔富尔和瓦达伊的部分地区。[40] 可能是在通朱尔人统治时期(约1400-1600年)，这里首先受到伊斯兰教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与穆斯林世界的商业往来以及阿拉伯移民对该地区的逐渐渗透。[41] 但是，这地区是在17世纪初建立了富尔素丹国之后才正式开始伊斯兰化的。

富尔素丹国的名称来源于居住在马拉山周围的苏丹当地民族——富尔族人，他们可能与加扎勒河以西的民族有渊源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从高山基地迁移到萨凡纳地区来的。

R.S. 奥弗伊认为，富尔素丹国的兴起和苏丹地区其他的伊斯兰王国一样，是长途贸易的产物。他将它的建立与跨越"四十日之路"贸易的扩大联系在一起。[42] 许多学者则注意到贸易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之间的联系；就富尔素丹国来说，贸易是其国家发展和加强与其邻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凯拉素丹国大约于1640至1874年间繁荣兴起，1898年再度复兴，但最终于1916年并入英埃苏丹。苏莱曼·索朗顿古可能是该王朝(约1640-1660年)的建立者。他被认为是将通朱尔人驱逐出去的胜利者，还说他并吞了马拉山周围地区。他在这些战役中曾得到包括哈巴尼亚人、马利亚人、里扎伊卡特人和米萨伊里亚人等放牧骆驼和牛群的游牧民在内的阿拉伯部落的帮助。

188

由苏莱曼·索朗顿古开始执行的扩张、巩固政策为他的后继者艾哈迈德·布克尔·穆萨(约1682-1722年)所继续，他向北及西北推进，并吞了达尔基姆尔这一战略国家。这一扩张政策使凯拉王朝和扎加瓦人有了接触，当时扎加瓦人的领土已是瓦达伊和达尔富尔两国素丹相互冲突的根源。凯拉人通过联姻和采取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办法巩固了他们在达尔扎加瓦的地位。争夺边境控制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凯拉王朝，瓦达伊继续缴纳贡金，但它以前是缴付给通朱尔国王的。但素丹亚库卜放弃这一贡金，并入侵达尔富尔，一直深入到卡卜卡比亚这一重要商业中心。布克尔经过两年的备战，从开罗获得冷兵器和火器，最后将入侵者赶出国土。[43]

达尔富尔的政治史直到18世纪末主要是凯拉王朝两派间的斗争：各素丹企图集中自身的权力，而诸王子则想加强作为整体的王朝权力。斗争是素丹布克尔引发的，他希望素丹国由他的几个儿子依次执掌。他的孩子不少于一百人，其中五人登上了富尔王位。他的第一继承人穆罕默德·达乌拉开始时对他的弟兄们实行清除的手段，或将他们放逐到马拉山中，并指定他的儿子穆萨为继承人。但是，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由穆萨的弟弟乌玛尔·莱尔取代穆萨。穆萨为了报复起而反抗他的父亲。乌玛尔·莱尔接掌权力之后，他与他的叔父们即布克尔诸子之间的敌对状态增强了。苏莱曼·伊本·艾哈迈德·布克尔到穆萨巴

---

[40] Y.F. 哈桑，1972年，第72-82页。
[41] 同上，第82-85页；P.M. 霍尔特，1961年；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1974年，第121页。
[42] R.S. 奥弗伊，1971年，第87页。
[43] 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1974年，第126-8页；Y.F. 哈桑，1972年，第86-88页。

特人那里寻求避难，穆萨巴特人在夺取凯拉王位失败之后迁移到科尔多凡。苏莱曼谋取穆萨巴特人和瓦达伊素丹支持的打算落空了。但是他的行动诱发了乌玛尔·莱尔大约于 18 世纪中人侵瓦达伊。经过激战瓦达伊素丹穆罕默德·贾乌达战胜了富尔军队并活捉了素丹。

冲突一直继续到第六位素丹阿布尔-卡西姆·艾哈迈德·布克尔统治时期。阿布尔-卡西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转而反对他的弟兄，他宁愿招募奴隶军而不按传统征召本民族士兵。这位素丹"重用奴隶并给予他们大量财富和荣誉完全疏远了本国的自由民"。[44]

阿布尔-卡西姆因依靠奴隶军队遭到许多拥有传统封号的人的反对。这造成了丰吉王国巴迪四世统治时期产生过的那种紧张状态。 189

在阿布尔-卡西姆与瓦达伊人作战时，传统军事头领和民族军队弃他而去，战场上只剩下他和他的奴隶军队。他战败之后元气大伤。富尔的旧贵族和传统军人拥戴穆罕默德·台拉卜·伊本·艾哈迈德·布克尔为新素丹。穆罕默德·台拉卜仿照前任的做法，创建了一支称为"库尔克瓦"(kurkwā,富尔的持矛士兵)的常备奴隶军。努巴山区的图龙吉人和达尔塔马的达丁人奴隶以及其他奴隶都收编在其中。库尔克瓦军中一名奴隶名叫穆罕默德·库拉，他原是个阉人，后成为台拉卜宫廷侍从队的一名队长。他还获得特殊荣誉成为阿布谢赫，这一职位掌有很大权限。[45]

台拉卜向西进攻其强敌瓦达伊素丹失败之后，与他订立了一个为期百年的条约。后来他转而进攻东部的穆萨巴特人，他们已于 1761-1762 年在阿布·利凯里克撤退之后恢复了权力。扩张方向的转变或许可以有别的解释，如台拉卜想要遏止穆萨巴特人打算在科尔多凡建立强国的企图和意欲控制南科尔多凡堪称奴隶和黄金之源的商道。丰吉王国许多有胆识的贾拉巴和宗教教师的到来以及与埃及商业交往的增加也可能影响素丹改变方向。他的迫切目的或许是将他的弟兄们和其他一些富尔旧贵族赶出达尔富尔，以便为他的儿子伊萨克继承王位扫清道路。台拉卜率领一支庞大军队前去攻打科尔多凡素丹哈希姆。哈希姆的军队背离其主，哈希姆到丰吉王国寻求避难；而科尔多凡在土耳其-埃及征服以前一直掌握在富尔人手中。台拉卜死于巴拉。

随后在伊萨克的支持者及其叔父，即艾哈迈德·布克尔诸子之间发生了王位之争。穆罕默德·库拉赢得了第二派对阿卜德·拉赫曼，即艾哈迈德·布克尔幼子的支持。阿卜德·拉赫曼是一个虔诚好学的青年，他既无种族的亲属关系，又无来自国内新生势力的支持。在内战中阿卜德·拉赫曼成了胜利者。这位新素丹为了报答穆罕默德·库拉，授予他阿布谢赫之职——官位仅次于素丹。穆罕默德·库拉作为首领，是该国大约 1790 至 1804 年最强有力的人。[46]

阿卜德·拉赫曼于1741-1742年在马拉山以东的科尔坦达尔提建造了一座新"法希尔"(fāshir,王家住地)，以纪念他的胜利。在这之前富尔素丹没有固定的都城。法希尔作为永久性都城的发展以及阿卜德·拉赫曼统治时期集权力量和伊斯兰化势力的加强，表明凯拉素丹国已发展到顶峰。他的统治特点是通过贸易和前来的宗教教师，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190

---

[44] G. 纳赫蒂加尔(Nachtigal)，1971 年，第 4 卷，第 285 页。

[45] R.S. 奥弗伊和 J.L. 斯波尔丁，1974 年，第 129-137、171-175 页；Y.F. 哈桑，1972 年，第 87-88 页。

[46] P.M. 霍尔特，1961 年，第 26-28 页；R.S. 奥弗伊和 J.L. 斯波尔丁，1974 年，第 134-140 页；Y.F. 哈桑，1972 年，第 91 页。

国家由于沿"四十日之路"的贸易而繁荣昌盛。于 1793-1796 年访问过达尔富尔的 G.W. 布朗对这位国王的作用描述如下：

> 国王是该国最大的商人，他不仅每次派往埃及的商队都装载了他大量的货物，而且还让他的奴隶和仆从到苏丹的邻国去经营埃及货物生意，为他牟利。[47]

各素丹均购买武器、盔甲和各种奢侈品犒赏他们的忠实部下和同伙，利用贸易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贾阿利英人和达纳克拉人的渗入刺激了贸易与宗教的发展。奥斯曼素丹赠给阿卜德·拉赫曼以"拉希德"(al-Rashīd，正直者)的尊称，他也给以回赠。在法军征服埃及的 1799 年他还与波拿巴通过信。

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在达尔富尔要比丰吉王国缓慢得多。早期的伊斯兰化趋向到了 18 世纪才加快了速度。苏莱曼·索朗顿占把伊斯兰教当做宫廷宗教引入，并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活动。有些达尔富尔宗教家庭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在苏莱曼统治时期到这一素丹国定居的。但非洲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在凯拉宫廷中曾一度与伊斯兰教相并存。[48] 伊斯兰教得到艾哈迈德·布克尔进一步的鼓励，他建立了清真寺和学校；穆罕默德·台拉卜则从埃及和突尼斯得到许多宗教书籍。阿卜德·拉赫曼·拉希德本身是一位穆斯林学者，他鼓励别国的法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到他的国土上定居。其中有一位突尼斯阿拉伯人，名叫乌玛尔·突尼西(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承了他的事业)，他对达尔富尔的记述是达尔富尔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49] 其他一些学者则来自埃及、希贾兹、尼洛特人苏丹和西比拉德苏丹。从最后这一地区来的马立克·富塔维出身于宗教家庭，他是阿卜德·拉赫曼即位之前的教师。后来他当上了素丹穆罕默德·法德尔的大臣。因为按照习惯，执法权掌握在素丹和拥有传统封号者手中，所以任命伊兹兹·丁·贾米为"大卡迪"(沙里亚法庭首席法官)，这可能是一种顾问性质的职位。

191

为了吸引人们前来定居，素丹给他们的争取对象如宗教教师提供他们在丰吉王国也同样享受的"哈库拉"(hakura，免税)优惠的土地；有些神职人员接受了担任调解人的角色。[50]

到 18 世纪末，这位素丹和他的没有种族派别的亲信在发展对外贸易和接受伊斯兰教制度治理国家方面显然已经历了很长的路程。这段进程有助于改变国家种族结构，并削弱原来存在的古老宗教活动。一个由商人、法学家和神秘主义者组成的新阶层的出现也推动了这一改变。然而，凯拉王朝虽与一支古代的阿拉伯人有血缘关系，但其根基还是在富尔人中。虽然阿拉伯语在外交和贸易上使用，但富尔语仍然是宫廷语言。

阿卜德·拉赫曼在 1801-1802 年去世时，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法德尔在穆罕默德·库拉的帮助下继承了王位。新素丹很快与他的总理大臣穆罕默德·库拉失和，并将其处死。穆罕

---

[47] G.W. 布朗(Browne)，1799 年，第 301 页。
[48] Y.F. 哈桑，1972 年，第 90-91 页。
[49] 突尼西(al-Tunisi)，1965 年。
[50] Y.F. 哈桑，1971 年，第 83-85 页；R.S. 奥弗伊，1971 年，第 87-9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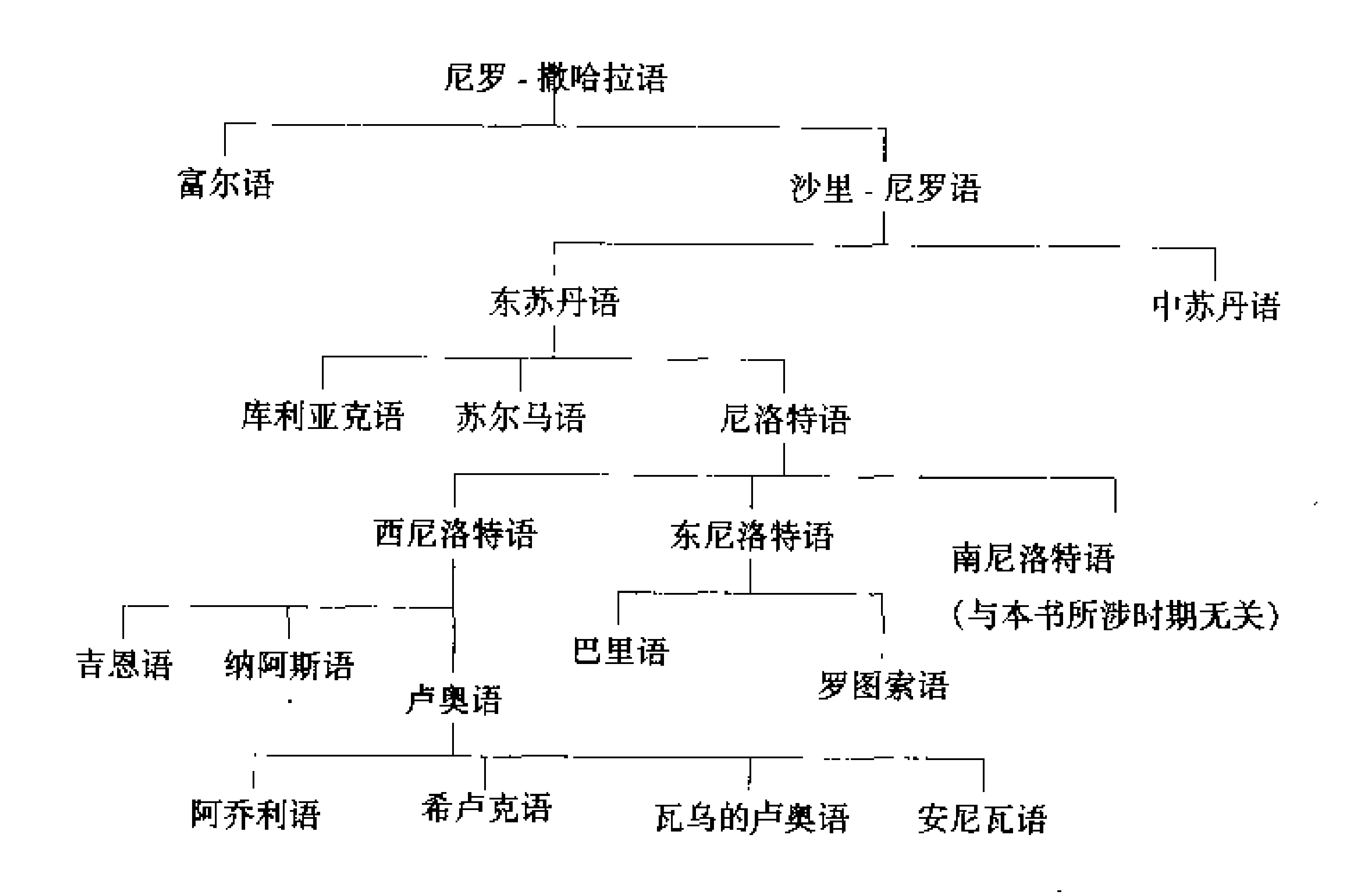
默德·法德尔统治了 40 年，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开始走向衰落。[51]

南部苏丹

尽管一些知名学者如 W. 霍夫梅、D. 韦斯特曼、C.G. 塞利格曼、E. 埃文斯-普里查德以及他的许多学生写了一些主要的人类学著作，F.M. 邓也有关于吉恩人、纳阿斯人、安尼瓦人、希卢克人和阿赞德人的论述，但对南部苏丹的历史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考古学研究(集中于北苏丹)和语言史的研究也是如此。[52]

但是，从这些有限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一个主要的轮廓。例如，从语言资料中逐渐清楚，所说的尼洛特文化以及中苏丹文化起源于南部苏丹。[53] 根据现有的资料也可证明南部苏丹历史上的大多数语群均属于下页所示格林伯格的尼罗-撒哈拉语族。

南部苏丹和北部乌干达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的可能都是说中苏丹语的居民，这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一千年的后几十年，也就是在东部和西部说尼洛特语的民族开始移民来此之时。确实，我们现时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主题是南部苏丹先前说中苏丹语居民的逐渐尼洛特语化。今天该地区居住的大都是尼洛特人，只有居住在白尼罗河以西的莫鲁人和马迪人 **192** 才使我们记起从前这里曾有过说中苏丹语的人。



[51] R.S. 奥弗伊和 J.L. 斯波尔丁，1974 年，第 162-164 页、167 页；Y.F. 哈桑，1972 年，第 95-96 页；R.S. 奥弗伊，1970 年，第 3、9 页。

[52] 对我们缺乏了解的程度的评价，见 J. 麦克(Mack)和 P. 罗伯肖(Robertshaw)，1982 年。

[53] C. 埃雷特(Ehret)，1982 年。

罗兰·奥利弗试图通过综合该地区早期历史铁器时代的考古证据，以证实这一语言图。[54] 他设想两个铁器文化中心，一个在苏丹-埃塞俄比亚边境沼泽地以东，另一个在尼罗河-刚果河流域含有铁矿石的高原。这两个文化——前者属于尼洛特人，后者属于班图人——被中苏丹文化隔离开。在尼洛特人南迁到班图人地区时，以前一直是单独发展的两个铁器时代文化在这里汇合了。结果在班图人中出现了铁器时代的精放畜牧业，他认为，这只能是因尼洛特人而促成的。

关于苏丹，奥利弗查明了尼洛特人中的两个铁器时代时期。首先是早期铁器时代，它和班图人的晚期铁器时代的时间相吻合。在西赤道和加扎勒河两省，这一时期被认为与铁器时代从事畜牧的卢埃尔人时间一致，他们饲养无峰牛并建造人工土丘以防雨季时住地被洪水淹没。J.M. 斯塔布斯、C.C.T. 莫里森、S. 桑坦德里亚和 G. 林哈德认为卢埃尔人可能是北方说卢奥语人的一个先行队。他们的陶器大都朴实无华或有纤维状旋轮线的装饰。

后来即尼洛特人的晚期或新铁器时代，也就是本章所探讨的时代。文化融合由早期向后期转变，其时间似乎与在加扎勒河两岸瘤牛的出现，特别是吉恩人牲畜季节性转移的充分发展的时间一致。瘤牛可能是在栋古拉王国灭亡之后随巴卡拉阿拉伯人南下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次 13 和 14 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北苏丹和中苏丹不仅与西尼洛特人迁移的时间相同，而且它还引发了后者的迁徙。[55]

因此东西尼洛特人向南和向东的迅速扩展可能与精养牲畜的推广有关，而牲畜的精养可能是由于传入瘤牛和谷物种植所致。这样给在较干旱地区生产粮食提供了手段，从而使尼洛特人得以占据许多说班图语的人当时一直避而不去的地域。

希卢克王国

在南部苏丹，希卢克人是北卢奥族群中最大的一族，其余则是加扎勒河的卢奥人和横跨苏丹-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安尼瓦人。他们最早的定居点离马拉卡勒不远，那是他们在自己的头领尼叶康(约 1490-1517 年)率领下战败原先的居民丰吉人并将其逐出之后居住下来的。该地区南面是通加，北面是穆奥莫，很快成为希卢克人的中心地带。这里地处尼罗河和索巴特河汇合处并控制着诺湖，肯定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说卢奥语的这一小群体融合了包括丰吉人和努巴人成分的其他族群。正是这些反映不同文化和不同经济传统的成分在历史的熔炉中融合成为从 17 世纪下半叶起称之为希卢克人的民族。

在民族形成的百年中，希卢克人建立了畜牧和谷物种植的混合经济。人口基本上是定居的：代表吉恩人和纳阿斯人生活特征的季节性迁移已逐渐消失。希卢克人居住在从穆奥莫到通加绵延一百英里的河西岸连成一串的村子里。

---

[54] R. 奥利弗(Oliver)，1982 年。也见 J. 麦克和 P. 罗伯肖书中他的章节，1982 年。
[55] D.W. 科恩，1973 年；I. 赫尔贝克(Hrbek)，1977 年，第 78-8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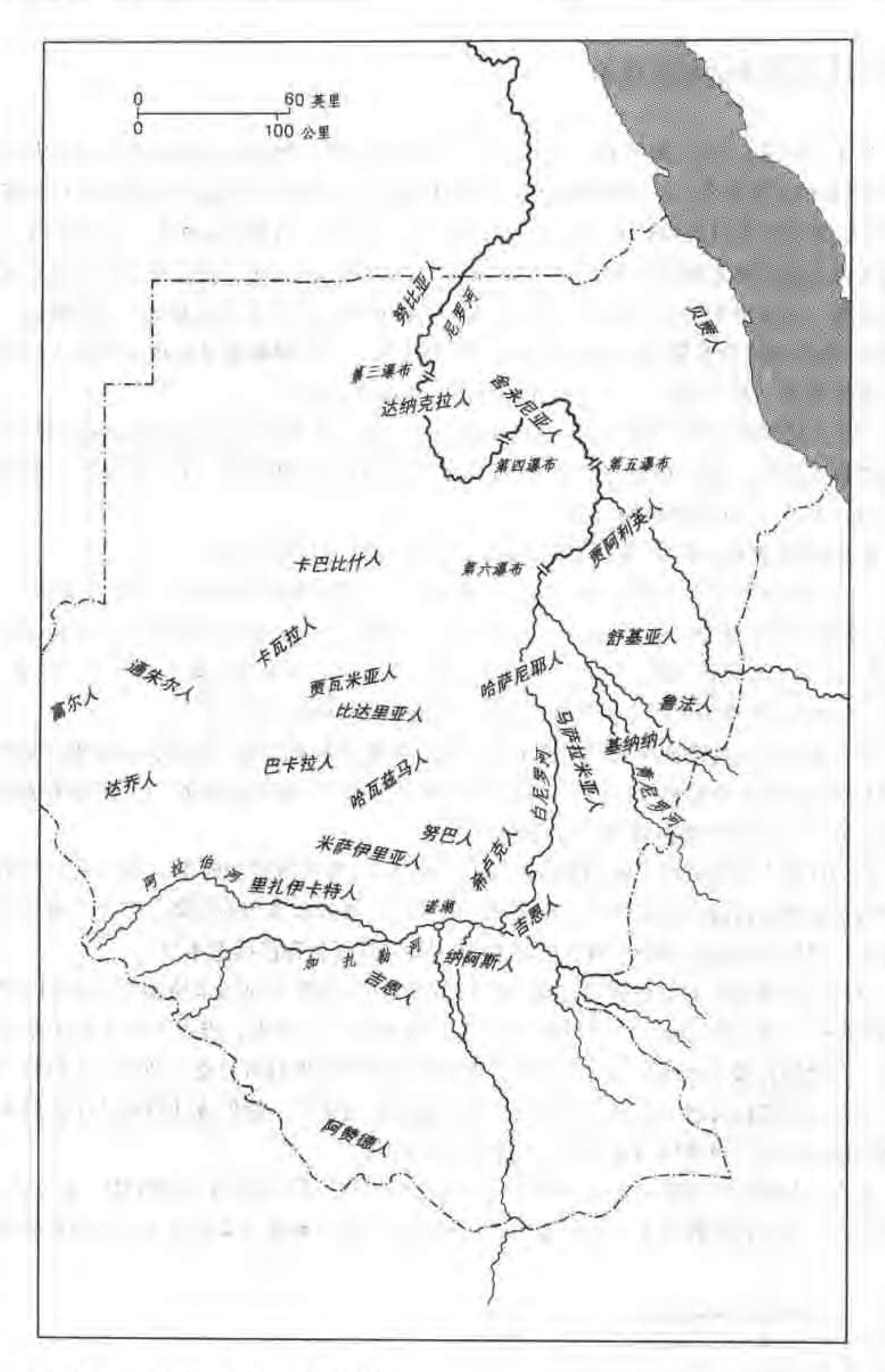


插图 7.3 苏丹各民族(仿照 Y.F. 哈桑图)

195 边界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

到17世纪初，这一地区人口之多已超过其承载能力。对这方土地的强大压力甚至到了19世纪仍未见改变，G. 施魏因富特认为这是当时为外界所知包括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在内的非洲部分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56] 希卢克人开始向两个边界地区扩张。他们向北企图控制从穆奥莫到阿莱斯长约300英里的白尼罗河，这里岛屿密布，到处是长有含羞草属植物的密林。这里虽不适宜于农耕，但却为希卢克的边民提供了丰富的猎物、鱼和蜂蜜。从奥达克·奥科洛统治时期(约1600-1635年)到1861年，一些穆斯林民族将希卢克人统治的这一地区称为“塞卢克河”，那里的居民称之为“希卢克河”。

第二个边界地区位于尼罗河和努巴山区之间。关于该地区希卢克-努巴人活动的许多传说资料都说明，它在19世纪下半叶被巴卡拉阿拉伯人征服以前，无论对努巴人还是对希卢克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边疆地区。

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在他们的《苏丹王国》一书中写道：

> 14和15世纪是傍河苏丹的一个转变时期，是它对受周围国家影响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时期，是它与两个入侵族体——阿拉伯人和说尼洛特语的人，特别是希卢克人相协调的时期。努比亚早在16世纪的统一可以看做是努比亚人对入侵者的抵抗和对侵略势力所造成的新的经济、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57]

希卢克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必须置于这一更广阔的背景来认识。他们将北部和西部两个边界看做是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地区，因为它们提供了如P. 默瑟所说的“一种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58] 这两个地区还吸收了过剩人口。

我们从希卢克传说中了解到在雷斯(国王)奥达克·奥科洛统治时期，他们为了控制白尼罗河贸易曾支持过达尔富尔与丰吉素丹国的斗争。随着塔卡利的投降，丰吉人和希卢克人便在白尼罗河畔相互对峙，双方经过30年交战之后显然都已疲惫不堪。

196 但是这暂时的和平很快被另一说吉伊语的民族[59] 吉恩人的到来所破坏，他们大约从1630年起侵入到丰吉人的这一南部地区。[60] 在17和18两个世纪中，吉恩人扩张到了南部贾齐拉，并慢慢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他们在那里的出现对希卢克人和丰吉人都是个威胁。这两支力量把吉恩人看做共同敌人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他们成功地防止了吉恩人向北或向西的扩张，迫使他们往东流向埃塞俄比亚边境。

丰吉人和希卢克人的反吉恩人联盟只是希卢克人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群体，如丰吉人、贾拉巴人、巴卡拉阿拉伯人、阿拉伯海盗、欧洲商人和马赫迪主义者建立一系列社会经济

---

[56] G. 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h)，1873年，第85页。

[57] 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1974年，第15页。

[58] P. 默瑟(Mercer)，1971年，第414页。

[59] 说吉伊语的民族指西部说尼洛特语的人，包括说卢奥语的人以及吉恩人和纳阿斯人。他们都用“吉伊”表示“民族”，因此有了这一名称。

[60] R.S. 奥弗伊和J.L. 斯波尔丁，1974年，第61-63页。

相互依赖关系的开端，目的无非是要剥削吉恩人。它说明这类社会经济联盟尚未接受种族或民族的思想，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希卢克人一再与上述群体结盟以剥削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说吉伊语的族体。南部苏丹的种族思想是后马赫迪时期的现象。关心社会经济依赖方式发展的历史学家应当研究上埃及各种不同族体——希卢克人、富尔人、丰吉人、努巴人、阿拉伯人、吉恩人和纳阿斯人——之间的关系，以便正确理解边界如何经常变动以及各种不同族体如何结合成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

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

17 世纪下半叶在希卢克地区出现了大大影响当地社会经济进程的政治发展。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不同民族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观念，在雷斯的领导下建立了比较集中的行政管理形式。这一发展的主要结果是王室逐渐开始垄断经济资源以及地方和长途贸易。

在希卢克历史中有三人与这一发展相联系：希卢克历史上多位有权力的妇女之一阿布德霍克，她是一位女王，是雷斯卜沃斯的女儿；她的异母兄弟德霍科斯；图戈，即德霍科斯的儿子雷斯德霍科斯(约 1670-约 1690 年)，他由于组织了顺尼罗河而下和向西进入努巴山的成功袭击而为人们所纪念。可能由于 1684 年的大饥荒(阿拉伯语为乌姆拉哈姆)才不得不使许多希卢克人往北逃生，在塞卢克河劫掠或定居。大饥荒和希卢克人致使位于阿莱斯 197 和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汇合处之间的 17 所宗教学校荒废。[61] 德霍科斯的袭击队满载掠获物而归。他们还带回许多俘虏。这些俘虏大多来自卡卡以东地区，被安置在阿萨孔，组成雷斯德霍科斯的部分贴身卫队。

雷斯德霍科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功和雷斯权力的集中有很大关系。巩固的过程则是由他的儿子和王位继承者图戈(约 1690-约 1710 年)完成的，他建立了法绍达村，并使它成为雷斯的永久住地。从前，每个希卢克雷斯都是在其出生的村子实行统治，死后就埋葬在那里。希卢克雷斯精心安排的即位仪式也是图戈规定下来的。他的声望迅速在王国内外传开。在政治上实行集权的速度和在希卢克社会中发展社会等级制度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到 18 世纪初丰吉帝国已如上所述在逐渐分化瓦解。随着白尼罗河流域丰吉人权力的衰落，希卢克人的权力则相应提高。到 1772 年詹姆斯·布鲁斯来到森纳尔时，他毫不怀疑希卢克人已实际控制着阿莱斯。[62] 他继而推测希卢克人的袭击顺流而下一直远到两条尼罗河的汇合处。这一推测后来为布龙-罗里特所证实，他坚持认为现在的喀土穆在 1780 年以前曾是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希卢克于该年袭击了这一城镇，(将其毁灭)并屠杀了那里所有的居民。[63]

18 世纪的最后 20 年是丰吉素丹国彻底崩溃的阶段。这更加有助于希卢克加强对白尼

[61] 伊本·代夫·阿拉·穆罕默德·阿卜德·努尔，1973 年，第 95、344 页；P. 默瑟，1971 年，第 410 页。
[62] J. 布鲁斯，1805 年，第 6 卷，第 390 页。
[63] C.E.J. 沃克利(Walkley)，1935 年，第 227 页。

罗河地区的控制。英国旅行家乔治·威廉·布朗曾在达尔富尔停留四年(1793-1796年)。他写了一本叙述该地区商业活动的书，书中说希卢克人完全控制了阿莱斯的河流，他们为往来于森纳尔和奥贝德之间的商队提供重要的渡河服务。[64]

希卢克国力的衰落

在雷斯尼阿克瓦阿的统治时期(约1780-1820年)，这里发生了吉恩人，或许是他们中的鲁因格人和恩戈克人，越过索巴河的大迁徙。这意味着在一个半世纪中完全由希卢克人统治的南自诺湖北到阿莱斯的白尼罗河地区，从此，开始与其他说吉伊语的民族共同享198 有。但结果尚不仅于此。在尼阿克瓦阿去世后一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军队侵入苏丹，结束了丰吉人的政府，建立了土耳其-埃及的统治，其目的是为埃及的利益剥削苏丹。与白尼罗河的统治力量希卢克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希卢克人坚持抵抗，但他们的防线自1821年起节节向南撤退，一直到阿拉伯人入侵和土耳其-埃及的统治之日为止。

希卢克人为了统治白尼罗河必须控制各条水路。这种控制自然要依赖于他们的独木舟或水上力量。他们拥有许多船只，而且又都是划桨能手。在袭击或军事远征中，由三四十条独木舟组成一个个船队一起航行。因此他们是这一地区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再次引用默瑟的话，"……在建立土耳其白尼罗河船厂以前，希卢克人的独木舟在这一地区是首屈一指，甚至无人可与之相匹敌。"[65] 但土耳其-埃及政府的船厂于1826年在曼贾拉建成之后，希卢克人在白尼罗河上的水师优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加扎勒河的民族

加扎勒河以南和从梅什拉雷克、伦拜克一线以西以及现在的苏丹、扎伊尔和乌干达三国边界的汇合点之间居住着属于两大语族的人，即说乌班吉(尼日尔-刚果)语和中苏丹(撒哈拉-尼罗河)语的民族。说这些语言的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在这里定居。确实，中苏丹语似乎于公元前数千年在靠近阿拉伯河或在瓦乌地域以内的努巴地区就已开始发展。[66] 这里的居民都是种植谷物的农民，但也饲养牲畜和狩猎，这地区只有沿着河道的地方才有人居住。图库伊山(北纬5°19,东经30°27)地区早在约180-220年，就属于他们所有。[67] 据了解，1800年以前从胡夫拉纳哈斯附近地区到南面的热带雨林边缘以及从阿伯特湖起的上尼罗河下游两岸就已有说这些语言的人了。

说乌班吉语的人是从西边(中非共和国)来到这里的，他们大都定居在说中苏丹语者地区以西或夹在他们的一些村社之中，这显然是因为这一地区人口密度较低。乌班吉人都是

[64] W.G.布朗，1799年，第452-453页。
[65] P.默瑟，1971年，第412页。
[66] C.埃雷特，1974年，第86页；N.戴维(David)，1982年，第80-81页。
[67] N.戴维，1982年，第81-82页。

农民，他们的经济起初以种植薯蓣属作物为基础，但后来改为兼种谷物和香蕉以适应环境。他们并不饲养牲畜，这表明他们对于财富，包括对新娘的看法，与说中苏丹语的人大不相 **199** 同。[68]

我们对于这些人在 1800 年以前的情况知之甚少，因为 19 世纪的发展使他们的村社解体。到 1800 年，来自达尔富尔的奴隶搜捕者已在胡夫拉纳哈斯以南的达尔费尔蒂特和达尔班达积极活动，赞德人继续南下征服这些民族的行动也已开始。赞德人将受他们蹂躏的民族予以同化，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北面，由于说班达语的人和其他民族为了逃避奴隶搜捕者的袭击，发生了大规模往中非共和国的迁移。F. 桑坦德里亚[69] 的调查还表明了口头传说极少提到那里的早期历史的另一个原因：该地区没有大的政治实体。仅此即可能解释赞德人的征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这也意味着，氏族的传说，即分散居住在各居民点、小村子有时是大村庄的一些小社团起领导作用的家族的传说，其历史并不遥远。找不出关于 1800 年以前任何一个事件的叙述性传说。仅有的可进一步追溯的家系是邦戈氏族的三个家谱[70]，其中酋长家系的奠基世代起始于 1650 与 1705 年之间。这仅仅说明这些人当时在那里，在 18 世纪时在瓦乌-通季地区，同时也说明这些邦戈族的社会组织规模虽小于邻近的尼洛特人族体，但略大于那里的其他族体。邦戈人的一个传说还表明集权化遭到抵制。有几个邦戈族的群体追随英雄恩戈利抗击来犯的阿赞德人。但“敌对的几个头领”在他刚击退阿赞德人时便谋杀了他！[71]

总而言之，本章所述这一时期，达尔富尔于 1800 年以前开始对达尔费尔蒂特实行非正式控制，并向胡夫拉纳哈斯附近地区的居民索要铜制贡品，同时某些阿拉伯人或富尔人家族已成为拉加地区一些小族体的领袖。显然还需要对整个地区作更多的研究。关于 1880 年以前的生活方式、交换和贸易以及最后的人口流动的资料或许还能收集得到。

（吕和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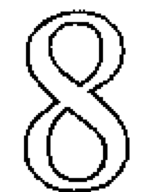
---

[68] D.E. 萨克森(Saxon)，1982 年；N. 戴维，1982 年，第 88-91 页；L. 布奎奥克思(Bouquiaux)和 L. 海曼(Hyman)，1980 年，第 807-822 页。

[69] F. 桑坦德里亚(Santandrea)，1964 年和 1981 年。

[70] F. 桑坦德里亚，1964 年，第 136-138 页。

[71] 同上，第 132 页。



摩 洛 哥

M. 埃尔·法西

200 在第4卷中提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对北非，特别是对摩洛哥曾发动进攻。从葡萄牙人征服休达的1415年起，他们逐渐占领了大西洋沿岸的许多重要地方，以此作为深入摩洛哥腹地的基地。

所有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起顽强的抵抗和收复被葡萄牙人所占城镇的迫切愿望。许多扎维亚谢赫(zāwiya Shaykh)[①] 和宗教兄弟会积极鼓励这种精神，以利巩固自己的权力，并训练民众与入侵者作战，他们把入侵者看做新宗教战争的挑起者。

阿布·阿卜德·阿拉也称卡伊姆·阿姆尔·阿拉(即奉上天之命出现)所领导的德拉的一些谢里夫也自愿担负起与异教徒作战的任务，并将他们从盘踞的要塞赶出去。1511年，卡伊姆·阿姆尔·阿拉称号的宣布标志着萨阿德王朝的开端。斗争延续了约40年，既反对葡萄牙人，也反对瓦塔斯王朝国王。

在南摩洛哥的葡萄牙人受到很大威胁，只能躲在要塞所在的区域之内。结果，葡萄牙人的殖民化进程放慢。谢里夫们和许多宗教领袖(欧洲史学家称其为"马拉布特"，marabout)，即"伊斯兰教隐士"，把他们的进攻矛头指向葡萄牙人的要塞，交战中常常发生血战。

葡萄牙人还受到北面塞拉战士的威胁，他们不断骚扰艾缓拉(阿西拉)和葡萄牙人所占领的其他一些城镇(presidios)，后来他们终于被赶出位于塞布河河口的马穆拉(现称马赫迪耶)。

南方的萨阿德新王朝和瓦塔斯-马林旧王朝在这一时期的斗争对摩洛哥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它削弱了双方的力量，阻碍了他们光复葡萄牙人所占的一切据点。幸而瓦塔斯素丹 201 艾哈迈德和谢里夫艾哈迈德·阿拉吉于1527年塔德莱一场决定性大战之后订立了一项条约，规定苏斯和马拉喀什归萨阿德王朝，而其余国土仍属于这位素丹，非斯依然作为国都。

这些条款给摩洛哥带来20年的和平，萨阿德人抓住这一时机加强和组织力量，集中于抵抗葡萄牙人的斗争。

在这一关键时刻发生了一起重要事件。苏斯总督谢里夫穆罕默德·马赫迪在他的土地上扩大甘蔗种植[②] 并发展蔗糖贸易。但葡萄牙人垄断着阿加迪尔港的出口，因为该港口

---

① 扎维亚系文化和宗教中心；当宗教信仰的捍卫者为其加强防御和配备人员时，称为"里巴特"(ribāt)。

② 大家知道甘蔗生产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前期，摩洛哥是主要输出国。见D. 德·托里斯(de Torres)，1667年，第35章；以及新近著作，P. 贝尔蒂尔(Berthier)，1966年。贝尔蒂尔先生的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曾受到作者所在部的鼓励，是这方面的佳作。

仍为他们所占领。因此萨阿德素丹决定收复阿加迪尔(葡人称其为圣德鲁斯阿奎尔角)。穆罕默德·谢赫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足以对付葡萄牙人并把他们驱逐出阿加迪尔。在炮兵的支援下，他开始围攻葡萄牙人的这一港口。六个月之后，这位素丹终于攻破了防线。

阿加迪尔的攻克在葡萄牙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葡萄牙人立刻撤出了萨菲和艾宰穆尔两城镇(1542年)，但继续控制着马扎甘(杰迪代)，因为那里易于防守。

谢里夫们作为圣战的胜利者、穆罕默德·谢赫作为民族解放英雄凯旋而归，穆罕默德因此在全国赢得很高的威望。他已能对瓦塔斯王朝再次展开斗争和企图重新征服摩洛哥北部，而那里根据塔德拉条约仍由(瓦塔斯王朝)统治。

穆罕默德将与之作对的兄弟艾哈迈德·阿拉吉驱逐到塔菲拉勒特去之后，成了萨阿德的唯一领袖并能放开手脚去最终结束瓦塔斯王朝。他开始夺取非斯，如将其占领，就能夺取摩洛哥的最高权力。

新旧两王朝之间的斗争拉锯式地进行了约十年，穆罕默德·谢赫于1554年9月13日终于进入非斯。但这位素丹最关心的是来自阿尔及尔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在他看来，摩洛哥唯一真正的危险来自奥斯曼帝国，该帝国征服了东西阿拉伯各国，这一命运对于有着传统独立感的摩洛哥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为了捍卫国家不受土耳其人的侵略，他决心以武力迫使奥斯曼人离开非洲。萨阿德素丹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阿卜杜拉和阿卜德·拉赫曼于1550年攻克了特莱姆森，但那里的土耳其人迅速做出反应。阿尔及尔帕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由改变了宗教信仰的哈桑·科尔萨(史学家将皈依伊斯兰教并为马格里布诸国服务的欧洲人称为“叛徒”)指挥。这支军队被派去抗击摩洛哥军队。摩军战败，特莱姆森重新被 203 土耳其人占领(1552年)。

穆罕默德·谢赫为了实现征服阿尔及尔的宏愿，便试图与西班牙结盟。他与西班牙的奥兰总督阿尔考德特伯爵安排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发动对阿尔及尔的远征。素丹雇佣2000名西班牙骑兵参加这次由摩洛哥人领导的战争。土耳其人听到备战的风声，于是萨拉赫·拉伊斯向土耳其政府要钱并要求支援，以便进攻当时被西班牙占领的奥兰。正在这时萨拉赫·拉伊斯死了，就由哈桑·科尔萨率兵攻打奥兰。然而，原本要从海上封锁西班牙人要塞的土耳其舰队被召回与当时正威胁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基督教舰队作战。素丹这时去掉了一个危险的敌手，故而能完全致力于征服阿尔及尔。他先是围困继而占领了特莱姆森。

964/1557年，素丹穆罕默德·谢赫被他卫队的一名军官刺杀，该军官是受奥斯曼政府收买的。

但是这一戏剧性结局丝毫没有影响萨阿德人的决心，他们誓将所有外国占领者统统赶出摩洛哥，并防止任何外国政府新的入侵，即使像奥斯曼帝国这样的穆斯林国家也不例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奥斯曼帝国早已将它的统治伸向所有阿拉伯国家。换句话说，在其父死后被一致同意并宣布为新哈里发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继续贯彻他的先人定下的政策。他被取名为加利卜·比拉(靠神的力量取胜者)。

新素丹虽然没有为他的父亲被谋杀而报仇，但他觉得有能力进攻葡萄牙人，将他们赶出马扎甘。他开始重建军队，获得了最新式的武器，并在扎维亚和兄弟会首领们的帮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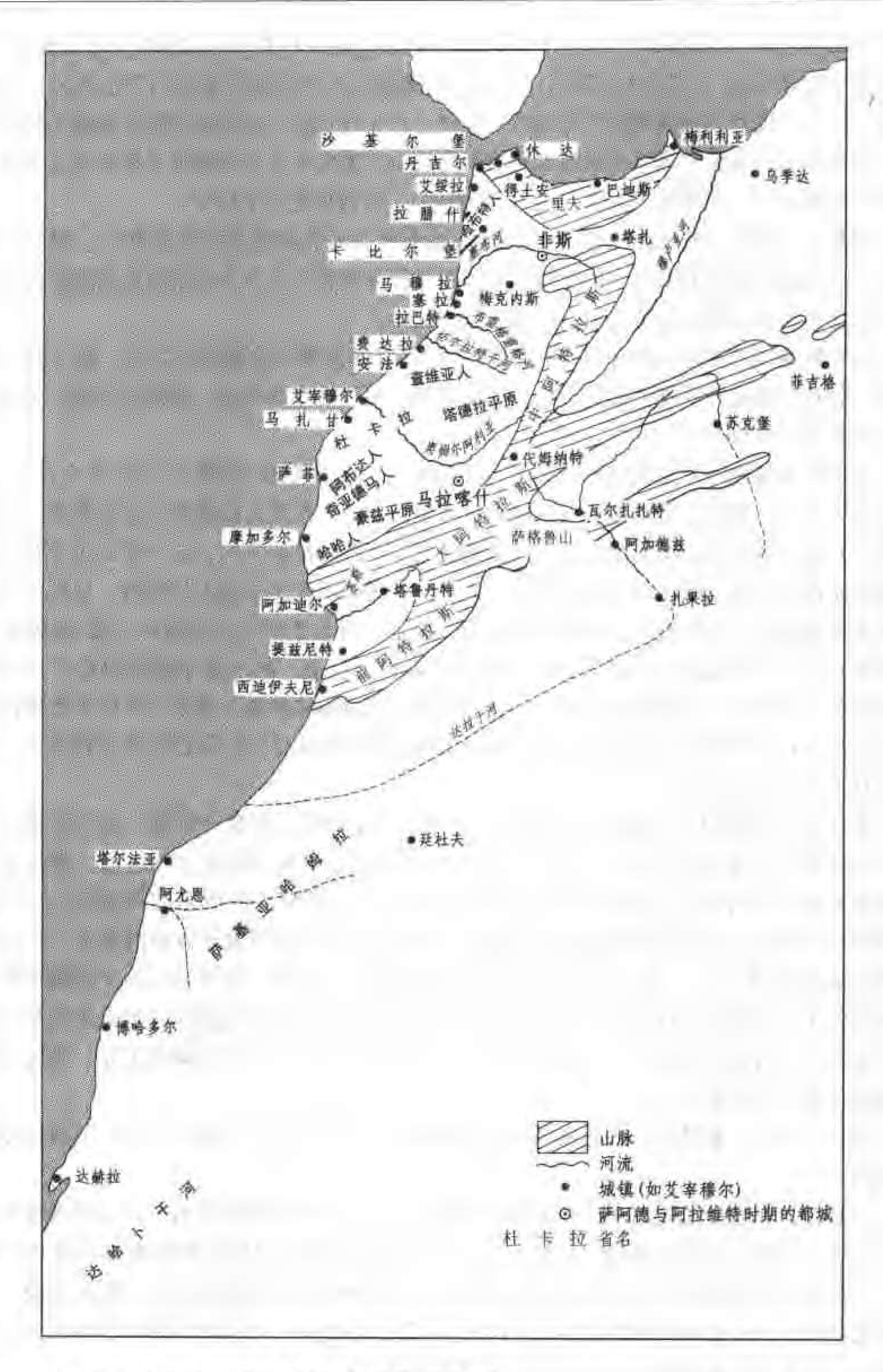


插图 8.1 16 和 17 世纪的摩洛哥(仿照 M. 法西图)

组织了一次心理大战。特别是西迪·艾哈迈杜·穆萨发动了所有的卡比拉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和葡萄牙人，而穆萨在苏斯有很大影响，他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整个摩洛哥都以圣洁闻名。因此，当加利卜·比拉感到他已有足够的力量围攻马扎甘（当时称布里扎，后来称杰迪代）时，他做好种种准备，调集了一支庞大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并配以高效的武器，其中包括24门大炮，其中十门是重型炮，包括有名的“梅蒙”（幸运护符）。

解救马扎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向葡萄牙人表明他们必须认真对付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政权。至于素丹，他认为葡萄牙人对摩洛哥腹地的威胁已经被遏制，所以他转而发展王国，使其繁荣昌盛。他鼓励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法国的贸易。例如，有一文件显示，1570年鲁昂的商人们和摩洛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他们可以与该国，主要是萨菲、塔鲁丹特和马拉喀什等城镇通商。[3] **204**

在建筑方面，加利卜·比拉以萨阿德王朝的一名大建筑师闻名。他建造了马拉喀什大清真寺，并修复了阿尔莫哈德清真寺，该清真寺位于今日阿加迪尔的卡斯巴。总之，历代王朝传下来的摩洛哥艺术如今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莫雷·阿卜杜拉·加利卜·比拉的统治基本上是和平与繁荣的。他于1574年，即在他担任素丹17年之后平静地死去。

王位的继承比较困难。按照祖传的规定，家族中最年长的男子有优先于新故国王的长子继承王位的权利，然而加利卜·比拉的儿子穆罕默德违反祖规被立为素丹，这给摩洛哥造成了一个骚乱时期，幸而为时很短，以三王之战的胜利告终。

新素丹虽定称号为穆塔瓦基勒，但他仍主要以描述性称呼马斯卢卡为人所知。

莫雷·阿卜德·马立克是萨阿德诸亲王和马斯卢卡的叔父中最年长者，他认为王位本该是他的。当加利卜·比拉之子宣布为非斯素丹后，他先逃往西吉尔马萨，后逃往阿尔及尔，最后到君士坦丁堡避难。他加入了奥斯曼军队，并参与了土耳其人征服突尼斯的军事行动，在作战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因此，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得知哈里发准备帮助他夺取祖传的王位。穆拉德命令阿尔及尔瓦利哈吉·阿里向萨阿德亲王提供一支小型武装力量。这支军队抵达摩洛哥时并未遇到抵抗，因为人民都站在他一边。穆塔瓦基勒被他的军队所抛弃，不得不出逃，听任莫雷·阿卜德·马立克于1576年3月31日进入非斯，他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

穆塔瓦基勒向南逃亡。他虽受到素丹的追踪，并在拉巴特和费达拉之间的切尔拉特干河地区被打败，但却再次逃脱，并设法夺回马拉喀什。非斯副素丹莫雷·艾哈迈德是素丹的弟弟，奉命将他赶出马拉喀什并将他俘虏。前一项任务及时完成了，但穆塔瓦基勒又最后一次得以逃脱。他朝北而去，请求贝莱斯-德拉戈梅拉总督准其在他的城镇中避难。这一请求呈交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国王准许总督收容这位逃亡者，但条件是他只能由十名家族成员陪同。

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刚一卸下穆塔瓦基勒这一包袱——至少暂时如此，便开始重建

③ H. 德卡斯特里斯（de Castries），1905-1936年，第1卷，第303页。

205 国家，充实国库，改造军队，并让自己的兄弟莫雷·艾哈迈德担任非斯的哈里发。

他发现国库空虚，只能靠开征新税以扭转形势，但他觉得这将会破坏而不是充实国库。因此他想出了比较有效的办法，不会在财政上拖累臣民。他扩充海军，建造新船，修复或更新旧船。这一举措刺激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并增加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他的政策是成功的，在各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成功还应归功于莫雷·阿卜德·马立克个人的人品，欧洲人很尊重他。外国作者对他有许多美誉之词。特别是法国作家和诗人阿格里帕·奥比涅，他对这位国王有过一些言过其实的描写，比如他曾说这位萨阿德素丹"懂得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美尼亚语和斯拉夫语。他还是一位卓越的阿拉伯语诗人"。

三 王 之 战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葡萄牙在16世纪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大片领土。在被废黜的萨阿德素丹穆塔瓦基勒出逃到贝莱斯-德拉戈梅拉避难之时，该帝国由年轻的国王唐·塞巴斯蒂昂统治，他从童年时代就梦想征服摩洛哥，将它作为征服整个马格里布的基地，最后推进到东方，将基督的墓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穆塔瓦基勒请求西班牙国王帮助他恢复王位，但国王拒绝接纳他，也不支持他的冒险行径。后来他与唐·塞巴斯蒂昂联系。这位葡萄牙国王立刻抓住机会，不顾众人的劝告，决定进行他梦寐以求的远征，他将这位持不同政见的摩洛哥人的到来看做是改变反对者意见的关键因素。在葡萄牙，因极端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公众舆论是热烈的，特别是在教士中，他们都赞同这位年轻国王所准备的不顾后果的远征。

当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得知有关备战工作之后，曾劝告葡萄牙的这位年轻国王不要鲁莽行事。这并不是他怀疑自己得胜的可能性和勇气，因为他得到他的人民，特别是贾祖利宗教运动领袖阿布尔-马哈辛·优素福·法西[④] 的支持。但他热切希望保护他的人民和国家免遭战争灾祸并为争取和平而努力，他决定说服国王唐·塞巴斯蒂昂放弃他的远征。因此他给国王写去一封在外交史上独一无二的信件，这不仅是指信件的实质内容，而且也指

206 信中真诚、智慧和渴望和平的感人语气。法国档案馆保存着该文件的意大利语译文，收录在亨利·德卡斯特里斯伯爵的《摩洛哥未曾发表的历史资料》中。其主要内容如下：

> 您准备进行的，也就是到我的国家来与我作战，是非正义的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因为我并未对您不恭，也未对您怀有恶意，更未曾加害于您。不知您为何要剥夺我的权利而将其给与他人以换取他在我有生之年都不能兑现的空头保证呢？您要将我逐出我的王国，为此您即使付出了您所有的一切和您的国家所控制的一切，但您仍无法实现您的愿望。不要以为我作此言是出于胆怯。相反，要知道，如若您对这些劝告置之不理，终将使自己身败名裂。
>
> 我随时准备亲自与您会晤以达成协议，地点凭您选择。我做这一切的目的

④ 沙蒂利贾祖利派的酋长是本章作者的十一世宗祖。

仅在于使您不致身败名裂。在此我再补充一句，我愿与您一同站到您的法庭面前，而法庭是绝不会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并将其非法和无理地给与另一个人的。我预先接受该法庭的审判……

上天可为我所说的一切作证！您还需知道，据我了解，您身边某些大臣对您的进言会使您招致灭顶之灾。⑤

这封信充分表现出素丹莫雷·阿卜德·马立克的责任心和热爱和平的崇高思想，也显示了他的外交技巧。他一方面以他的责任感真诚地对待唐·塞巴斯蒂昂，一方面又以他的警告表明真正的侵略者和在地中海地区制造麻烦的正是这位年轻的葡萄牙国王。

然而，唐·塞巴斯蒂昂仍继续准备战争。

莫雷·阿卜德·马立克理解唐·塞巴斯蒂昂的心理和性格，摩洛哥史学家的叙述中提到另一个例子。他们写道，莫雷·阿卜德·马立克知道这位葡萄牙国王认为自己尽善尽美，不仅具有骑士风度，而且英勇无畏并富于最高尚的情感，所以当他得知他在艾缨拉(阿西拉)登陆时给他去信如下：

攻打在自己家园过着和平生活的赤手空拳的平民，不等对手到来就开始较量，这并不表明骑士风度和高尚的气概。因此，您若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请您就地等待我的到来。

唐·塞巴斯蒂昂收到信后，他的近臣，特别是穆罕默德·马斯卢克，都劝说他不要等待，207 他们认为这是个诡计；相反，他应该迅即发起进攻，首先占领拉腊什(艾里什)，然后占领卡比尔堡。但是唐·塞巴斯蒂昂高傲的自尊心使他不愿让他的名誉蒙受耻辱。他决定不离开艾缨拉，在那里停留了19天，直到开战的前夕。

欧洲的文献中没有提到这封信。⑥ 另一方面，却可看出唐·塞巴斯蒂昂对于沿海岸还是从陆上围攻拉腊什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在艾缨拉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这两个方案。以马斯卢克为首的与会大多数成员主张经由海上进攻，但国王宁愿从陆上进军，以便能显示他的英勇和军事才能，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萨阿德的军队从马拉喀什向北行进，一路上大量的志愿者不断加人进来。另外，素丹命令他的兄弟，即非斯的哈里发，带领非斯和非斯地区的分遣队，特别是国都的青年弓箭手组成的精锐部队(里马)以及卡比尔堡贾祖利扎维亚的信徒，在他之前先期到达卡比尔堡。

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决定将指挥所设在卡比尔堡，是因为该城靠近葡萄牙国王将要发起进攻的葡萄牙属地。而且这是阿布尔-马哈辛·优素福·法西领导的贾祖利运动的中心，他本人住在那里，他的扎维亚也在那里。⑦

在萨阿德军队抵达卡比尔堡时，莫雷·艾哈迈德和非斯的年轻弓箭手精锐部队已在那里待命。莫雷·阿卜德·马立克责成他们当唐·塞巴斯蒂昂一渡过马哈津干河(这次战役以此

⑤ H. 德卡斯特里斯，1905-1936年，第1卷，第383-387页。

⑥ 只有摩洛哥史学家对此有所评论。

⑦ 关于这位伟人的详情见纳尔西里《Al-Istiķsa》，载于H. 德卡斯特里斯，1905-1936年，第5卷，第131、134、135、138页和E. 莱维-普罗旺索尔(Lévi-Provençal)，1922年，第240-247页和J. 伯克(Berque)，1982年，第137-145页。



插图 8.2 1578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4 日唐·塞巴斯蒂安向“三王之役”发生地马哈津干河进展图（仿照 M. 法西图）

河命名），立刻摧毁河上的桥梁，以防止葡萄牙人战败后从这里逃往海上。此项命令于1578年8月3日至4日的夜晚执行完毕。

次日展开了“三王之战”，这次战役堪称人类史上，特别是摩洛哥和伊斯兰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阿拉伯史学家称其为马哈津干河战役，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史学家则称其为阿尔卡萨基维尔(卡比尔堡)战役。

交战之日

209

唐·塞巴斯蒂昂精心调集了一支当时最大的军队(基地在丹吉尔)，直趋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司令部所在地卡比尔堡。

伊斯兰纪元986年5月11日(公元1578年8月4日)星期一清晨，双方营垒均做好交战准备。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数百年来冲突的高潮，冲突始于西班牙，后发展到摩洛哥。这是唐·塞巴斯蒂昂从童年时代起就已盼望的日子，在他看来这是他征服世界迈出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对穆斯林来说，这是数以千计的殉教者为捍卫他们的正义事业而牺牲的日子。

对阵的两军准备进攻，双方采用各自的战术。基督教徒军队在战场列成方阵，前面是军团队伍，日耳曼部队排在右翼，西班牙和意大利部队排在左翼。骑兵在左右两侧行进，数量少于步兵。此外还有“被废黜者”穆罕默德的少量支持者(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人数约300到600人)。

摩洛哥军队部署成月牙形，素丹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在军中的一张担架上指挥作战。他从马拉喀什来的途中染病，虽然病情恶化以致不能行动，但他的头脑却很清楚和灵敏。月牙阵的两个尖端布置的是骑兵，中间为步兵和炮兵。

早祷之后，雇佣兵迅速冲向穆斯林军队的左翼，由于出其不意，士兵们乱作一团。素丹阿卜德·马立克看到他的军队快要被冲散，从担架上一跃而起，拔出佩剑冲上前去。素丹的行动给士兵们带来新的勇气，但不幸的是，他力尽气绝，但临死前他指示他的仆从封锁他死亡的消息，因为战争才刚开始。

战争激烈进行，双方死伤惨重，穆斯林军队向前推进，基督教徒节节后退，最后不得不逃离战场向桥头奔去。他们看到桥已被破坏，便纷纷跳入河中努力游向对岸，但却被急流冲走或淹没。

然而唐·塞巴斯蒂昂仍是昂首挺立，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但他的勇气挽救不了他：他和他的数千名士兵和忠仆一起倒在了战场上。“被废黜者”穆罕默德试图逃跑，跳进河中淹死了。他的尸体后被找到，交给了艾哈迈德·曼苏尔，他在胜利后当上国王(因此被称为曼苏尔,即得胜者)。

双方死亡人数并不清楚,但被杀死的穆斯林有数千之多。至于葡萄牙人及其同盟军几乎无一逃脱，因为未被淹死和交战中幸存的差不多都被俘了。据传说大约有14,000名基督教徒被俘。 210

就唐·塞巴斯蒂昂遗体的赎金问题举行了谈判，尸体已先于一切送到了非斯。但曼苏

尔过于高傲，不接受任何建议，特别是战俘的赎金，尤其是贵族血统战俘的赎金。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数额，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绰号“达哈比”(al-Dhahabī 意为金者即由此而来)。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的黄金多于征服苏丹后拿回的数量。曼苏尔不同意收受不幸的国王遗体的赎金。因此他决定在谈判期间通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继承了他的未曾娶妻的侄子的王位)说，他愿意归还国王的遗体，无需任何付款。

三王之战的影响

这次大战不仅对伊斯兰教和摩洛哥，而且也对欧洲和葡萄牙留下了长达数百年的重大影响。胜利给萨阿德王朝带来新的生气，给摩洛哥带来和平以及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的繁荣。葡萄牙为其数千名战俘所付的赎金也使萨阿德王朝大大富裕起来，它的名声传向世界。

关于经济发展，有一情况特别值得注意，暂时处于衰退之中的蔗糖业(尽管摩洛哥是世界主要蔗糖输出国)再次繁荣起来。

各种工业和手工业的情况也都如此。特别是建筑业[⑧]，在萨阿德王朝和新生的富裕中



图片 8.1 1960 年奇恰瓦糖厂出土的圆锥形糖块模子

⑧ 建筑业在瓦塔斯王朝衰弱之后曾在一段时间内陷于停滞状态。

产阶级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建筑物十分精美，现在，特别是在马拉喀什，仍可见到一些有名建筑便是证明。摩洛哥人恢复了稳定，也恢复了他们高尚的情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艺术、诗歌和文学作品，例如阿卜德·阿齐兹·菲什塔里和马卡里·伊本·卡迪的作品。

三王之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在穆斯林世界，特别是海湾诸国的影响大大下降。战争彻底结束了十字军对东方国家的威胁。这实际上是此类战争的最后一次，并且消除了那些怀有十字军思想的人的企图。萨阿德的胜利也加强了奥斯曼帝国的力量，欧洲人的看法是对的，他们认为摩洛哥的这次胜利是所有穆斯林人的胜 211 利，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穆斯林的团结一致。

另一方面，胜利的结果使奥斯曼人放弃了征服摩洛哥的想法，使摩洛哥成为唯一不受土耳其影响的国家。因此，阿拉伯语在摩洛哥保持了它的纯正和真实性，而且继续使用了几个世纪。摩洛哥的书信文献以及国王内阁各部颁布的法令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未受外国的影响。因此，萨阿德和阿拉维特王朝（直到莫雷·哈桑一世统治）时期的文本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和摩洛哥的阿尔莫拉维德、阿尔莫哈德及马林王朝的辉煌年代写就的。 212

我们详细讲述了三王之战，这是因为它尤其对摩洛哥有着内在的重要意义。莱维-普罗旺索尔教授说得好：

> 任何人都不应批评摩洛哥历史学家特别强调这一著名的战斗以及给予它的重要地位，因为它当之无愧……现在我们能够证明，被俘的葡萄牙贵族的赎金构成素丹阿布尔-阿巴斯·曼苏尔的巨大财富，甚至超出征服苏丹所得（这使他获得“达哈比”即“金者”绰号）。所有的欧洲国家在财政陷入困境时都曾试图向摩洛哥商请贷款。舒尔法帝国甚至实行结盟政策，“如果阿卜德·马立克还活着，完全有可能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加入到欧洲民族协约之中。”⑨

16世纪萨阿德王朝的扩张

曼苏尔统治了25年，全心致力于巩固萨阿德王朝的统治，尽一切可能发展他的王国，并与当时一些大国建立经济关系。

马哈津干河之战胜利之后，他开始解放仍在欧洲人手中的城市：艾绥拉（艾西拉）、丹吉尔、休达和马扎甘。他成功地将外国占领者逐出艾绥拉（1589年），但丹吉尔直到下个世纪才被阿拉维特素丹莫雷·伊斯梅尔光复，马扎甘（杰迪代）则被他的孙子穆罕默德三世光复：休达转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之手，因为他继承了葡萄牙王国。它连同梅利利亚和其他三个城镇直至今日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曼苏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使他鼓起勇气，超越摩洛哥的传统边界，恢复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代的地位，并以此统一伊斯兰教。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借口，他作战的真正动机是对外扩张，这是所有大国由来已久的愿望。因此，如果人们牢记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拿

⑨ E. 莱维-普罗旺索尔，1922年，第107页，注①。

破仑，以及在他们前后的历史中都曾产生过许多征服者，就应避免按现代的思想观念去评价历史事件。

然而，摩洛哥人反对曼苏尔远征苏丹，这种态度在当时非同寻常，足以使摩洛哥增光。曼苏尔在出征前召开战争会议，解释他的计划。H. 泰拉斯在其所著摩洛哥史中写道，214 “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对这次远征，因为风险太大，尤其因为这意味着对其他穆斯林宣战”。[10] “乌里玛”（Ulama）作为人民的真正代表也持这一观点，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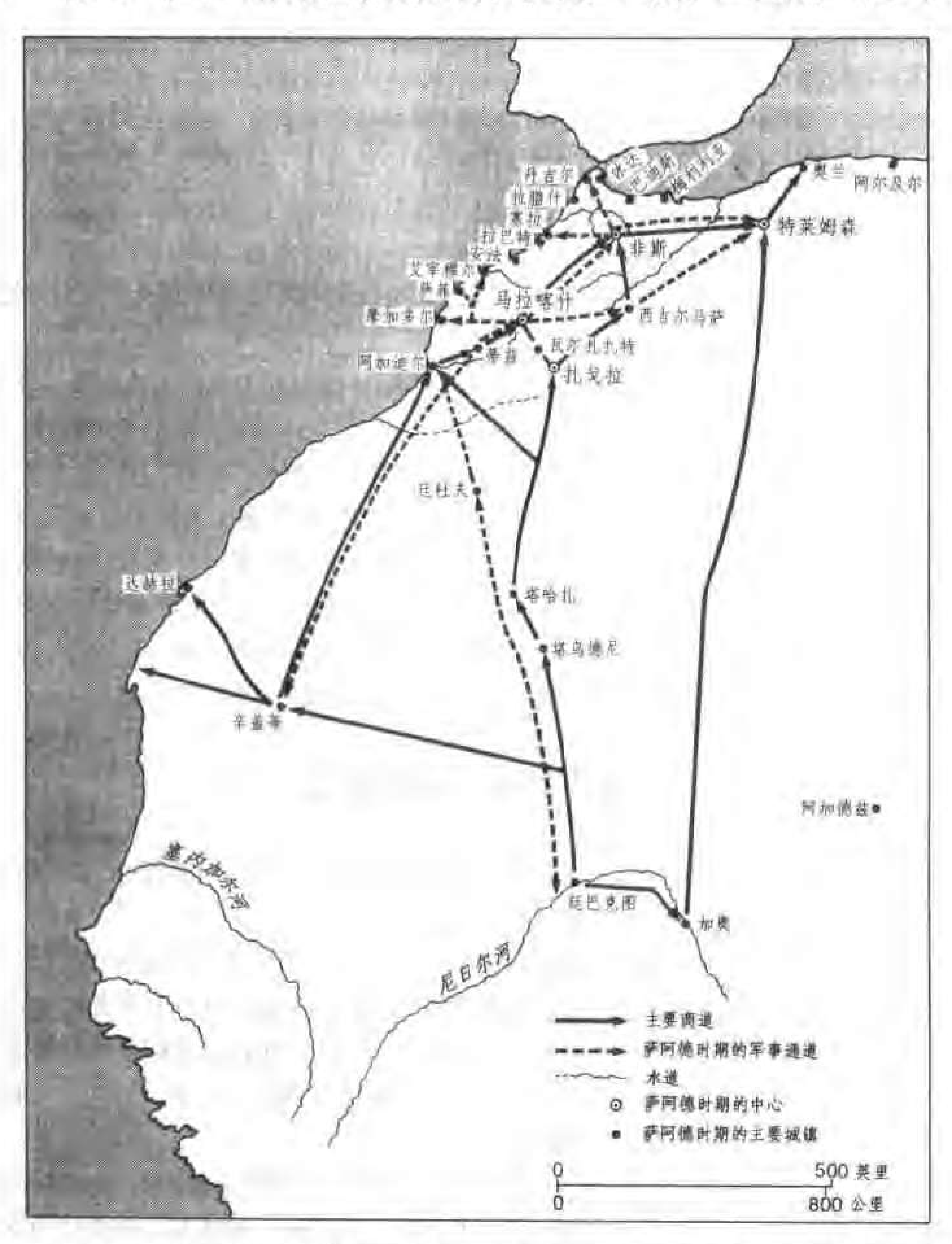


插图 8.3　“金素丹”艾哈迈德·曼苏尔的帝国（1578－1603 年）（仿照 M. 法西图）

[10] H. 泰拉斯（Terrasse），1945-1950 年，第 2 卷，第 203 页。

他们的观点是有价值的。

但是曼苏尔对这一忠告置之不理，单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发动摩洛哥历史学家所称的"苏丹远征"。我们认为不必详述这一事件，因为对于摩洛哥这段历史无论是阿拉伯语的还是欧洲语的著作全都有详细的论述，但一些突出事实应当提及。[11]

曼苏尔将摩洛哥建成一个兴盛、统一和令人羡慕的国家之后，于1603年去世。随之摩洛哥出现了一个不稳定时期。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统治者死后，其继承者之间会发生权力之争，并无休止地互相残杀。曼苏尔死后，他的儿孙们使摩洛哥血战不止，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局势造成在萨阿德家族成员之外出现了好几个争权者。

全国各地的宗教兄弟会教友以爱国的名义奋起要求和平，并与西班牙及葡萄牙人作战，因他们利用末代萨阿德家族的虚弱封锁了摩洛哥的海岸。

为反对早期现代殖民者而战的所有领导人中，最有名和最真诚的是塞拉的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阿雅希。他作为一名战争领导人，有人爱戴，有人畏惧。他将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斯城暂时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尽管他取得许多成功，但绝不谋取最高权力，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圣徒；他于1051/1641年被他的敌手即拉巴特的摩里斯科人暗杀。

1046/1636-1637年，在阿特拉斯山脉中部地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位以学识渊博和圣洁而享有声望的谢赫的孙子起义并宣称自己是全摩洛哥的素丹。这位权力谋取者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马哈茂德·伊本·阿布·巴克尔·达拉尔。他的祖父在阿特拉斯中部地区建立了一个扎维亚，后来被第二位阿拉维特国王拉希蒂·伊本·谢里夫所捣毁，其地界今天几乎已无人知晓。这里几乎成为与非斯卡拉维因大学同样有声望的伊斯兰教研究中心。伊斯兰纪元11世纪(公元17世纪)的几个伊斯兰学界名人都到过迪拉扎维亚。

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的儿子步其父后尘，继续经管扎维亚精神与学术方面的事务，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去世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父业。

自从曼苏尔于1012/1603年去世后，他的十个子孙争权夺利长达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时期中，有两个国王统治20余年，但多次被其弟兄和侄子的胜利所中断，然而他们的权力都得而复失——更不必说扎维亚首领中的这些争权者和其他一些冒险者了。其余一 **215** 些作乱造反夺取王位者给末代萨阿德家族在北方和南方的生活造成了困难。在属于卡德尔·盖兰的丹吉尔地区，穆罕默德·阿雅希的一个门徒要求继续对葡萄牙人进行由伊斯兰伟大战士发动的战争。这些事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有谋求摩洛哥王位者都力图把自己说成是国家统一的救星和稳定政府的斗士。

加奈特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游牧民)的一支，他们被法蒂玛王朝逐出开罗之后不断入侵马格里布，沿途破坏房屋、森林和各种设施。伊斯兰纪元6世纪(公元12世纪)阿尔莫哈德王朝的雅库布·曼苏尔将他们带到摩洛哥。阿尔莫哈德王朝、马林王朝和萨阿德王朝在摩洛哥内外的战争中将他们充当雇佣兵。最后，他们将大西洋沿岸富饶平原上的居民赶

[11] H. 泰拉斯，1945-1950年，第2卷，第202－205页；也见纳西里(al-Nāsiri)，1954-1956年，载于H. 德卡斯特里斯，1905-1936年，第5卷，第195-198和209-218页；科萨克·德夏夫雷比尔(Cossac de Chavrebière)，1931年，第330-334页。参见本卷第11章。

到阿特拉斯中部山区并在那里定居，直到现在。他们才是真正使摩洛哥阿拉伯化的民族。

1069/1658-1659年，在阿布·阿巴斯·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谢赫·伊本·扎伊丹统治时期，什巴奈特人的一名首领阿卜德·卡里姆·伊本·阿布·巴克尔·什巴尼，也叫卡鲁姆·哈吉吉，在马拉喀什起来反对人称莫雷·阿巴斯的素丹艾哈迈德(虽然素丹的母亲是什巴奈特人)。她劝说他接近他的舅舅并争取他们。当卡鲁姆·哈吉吉将素丹艾哈迈德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便将他弄死，自立为素丹并占据了马拉喀什王宫。他的统治延续了约十年，对人民敲诈勒索，横行不法，暴虐无道，特别是在南方，贫穷已是司空见惯。连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都为他对国家的种种罪行所触怒，想要除掉这个暴君。接近他的人中有一人在宫中对他突然袭击，将一支长矛向他投去，他被当场刺死。他的儿子阿布·巴克尔·伊本·阿卜德·卜里姆即位为素丹，他统治了一段时间，在阿拉维特素丹莫雷·拉希蒂到达马拉喀什40天前去世。

阿拉维特王朝早期几位素丹

在曼苏尔去世后以鲜血染红国家的所有王位谋求者和自称是摩洛哥统一者的企图都没有得逞。建立一个强大、持久和仁慈的政府的光荣使命自然落到了阿拉维特人的谢里夫王朝肩上，他们统治摩洛哥长达三个半世纪之久。该王朝的寿命之长应归功于各位阿拉维特素丹都遵守如下的政治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完整；忠实于穆斯林文明的高尚思想；注重发展各级教育。

216 这意味着阿拉维特人的主旨与除马林王朝外的所有前王朝均不同，他们并非全力支持宗教事业。他们的目标是纯政治的，也就是说要维持国家统一，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和传播知识。

然而，首要的问题是要知道阿拉维特族的起源。他们是具有先知穆罕默德血统的家族，这已由摩洛哥许多大学者作了科学的论证：他的侄子阿拉比·法西、伊斯兰谢赫阿卜德·卡德尔、伊玛目尤西等人在《Kitāb al-Istiksā》一书中都曾提到。[12]

该家族的后代组成一个宗教贵族政权，在塔非拉勒特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哈桑的曾孙莫雷·阿里·谢里夫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他有九个儿子，其中之一的莫雷·谢里夫前往塔非拉勒特居住，他的名望遍及整个摩洛哥南方。由于摩洛哥各地局势不稳，促使非拉利人立他为素丹。这时，正如我们所知，摩洛哥是分裂的：迪拉维亚人占领了非斯和阿特拉斯山区中部；伊本·哈苏恩统治着苏斯和阿特拉斯高原；卡德尔·盖兰蹂躏着西北部；其他一些冒险者与匪徒则利用当时的不稳定局势掠夺城镇和村庄。

在塔非拉勒特，一个家族占领着塔布萨姆特要塞，与阿拉维特的谢里夫相对抗。一方得到迪拉维亚人的支持，另一方则得到阿布·哈苏恩的支持，双方进行着战斗。莫雷·谢里夫被俘并遭阿布·哈苏恩囚禁，但他的儿子莫雷·马哈茂德将父亲救了回来。父亲让位给他，他于1050/1640年登基为摩洛哥国王。这就是阿拉维特王朝的开始。"阿拉维特"一

[12] 纳西里，1954-1956年，第7卷，第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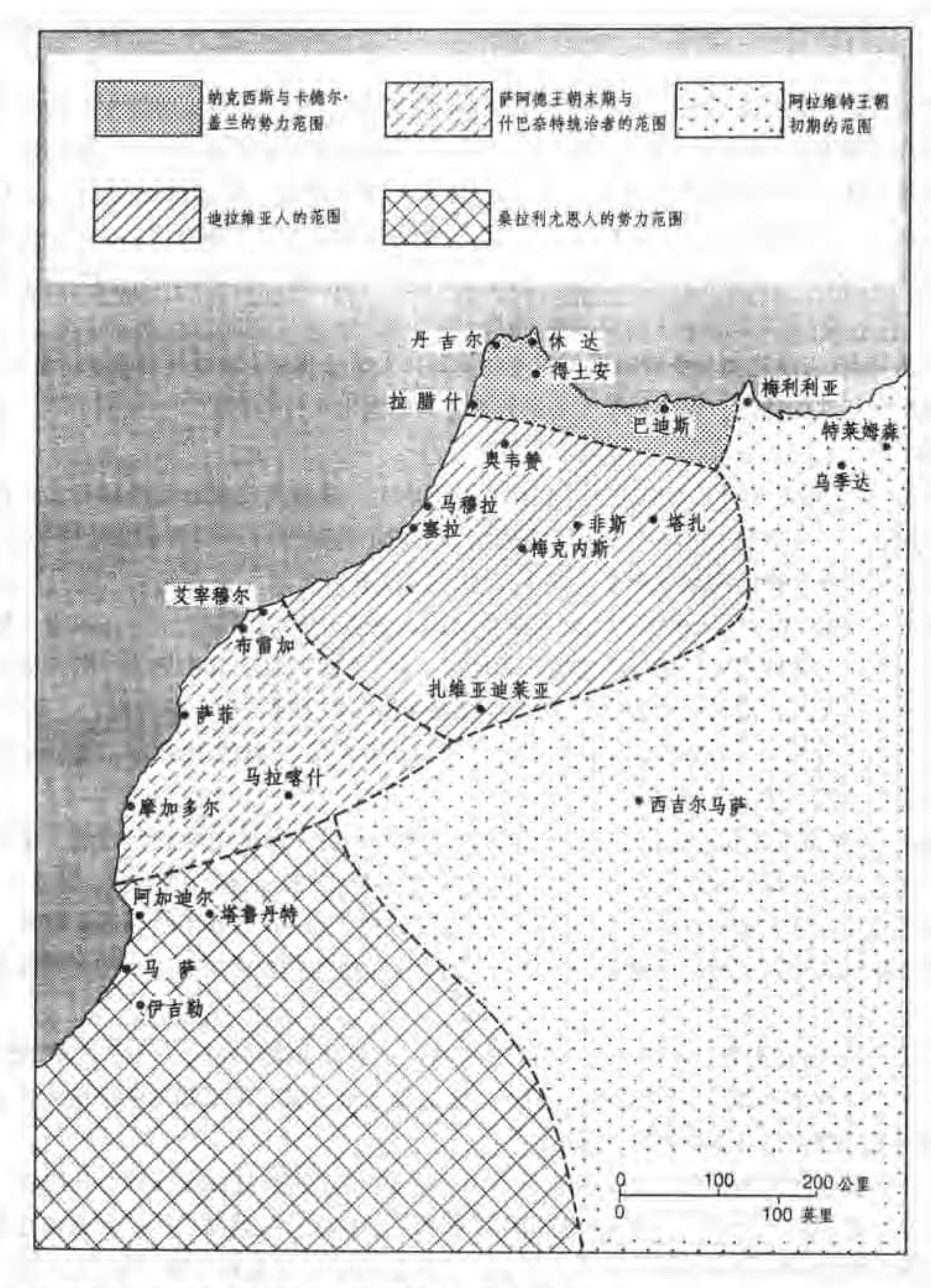


插图 8.4 17 世纪早期摩洛哥北部的领地(仿照 M. 法西图)

词[13] 源于其祖先马拉喀什莫雷·阿里·谢里夫的名字。该王朝也称哈萨尼或菲拉利王朝，源于塔菲拉勒特，即旧西吉尔马萨。

莫雷·马哈茂德未得到他的兄长莫雷·拉希蒂的承认，于是离开了塔菲拉勒特。他开始

[13] 通常所说的“阿拉维”一词表示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的所有后代。但是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与哈里发阿里毫无关系。

在各城镇和南北方的“卡比拉”(kabīla)中漫游，他去了托德加山谷、代姆纳特、迪拉扎维亚和非斯。

他的兄长召集一支军队，向阿布·哈苏恩占据的达拉进发。他与后者多次交战，最后将他驱逐出该地区。他随即向迪拉的扎维亚进军，对迪拉维亚人发动进攻，但被打败。他决定围攻非斯。这次他取得了成功，于1060/1650年攻占该地。但是在40天之后，他不得不弃城而去，目的是不让士兵遭受失败。他想在非斯定居的打算落空之后，便转向摩洛哥东部。他占领了乌吉达城并向特莱姆森进军。阿尔及利亚的整个西部都在他的军队的围困之中。

218

后来莫雷·马哈茂德与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人达成协议，他返回乌吉达。莫雷·拉希蒂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达到登上其家族刚建的摩洛哥王位的目的。他来到塔扎，在那里定居下来。

莫雷·拉希蒂现在除了名望以外，又有了可使他实行赢得统治权计划的钱和人。他答应他的同伙，一旦他登上摩洛哥王位，将确定一个象征性的节日，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节日的形式是在卡拉维因大学推举一名大学生，给他戴上王冠，充当托尔巴素丹(Tolba，大学生之王)两个星期，庆祝活动均由大学生组织在法兹干河两岸举行。[14] 在征服了整个塔扎地区之后，他便自立为素丹。他的兄弟莫雷·马哈茂德听说后前来见他，制止他的行为。双方发生交战，但没打多久，莫雷·马哈茂德便被一颗子弹击中，倒地身亡。莫雷·拉希蒂为他致哀追悼——但应承认这正中他的下怀。此事发生于1075/1664年。这一年是摩洛哥征服行动的开始。

莫雷·拉希蒂首先开始征服塔扎。随即进攻塔非拉勒特，即他的家族诞生地，他的亡弟的一个儿子举兵反抗他的伯父。当这位反叛者得知莫雷·拉希蒂已经到来，便逃走了，因此新素丹得以和平进人他的出生城镇。风云变换，他于1076/1666年胜利进入非斯。攻克首都非斯标志着阿拉维特王朝最终的建立，因为一个政府在摩洛哥如若不占领非斯是难以持久的。

莫雷·拉希蒂首先着手组阁。他发钱给乌里玛，让他们当枢密顾问。他请学者哈姆敦·马兹瓦尔出任首都卡迪。这些措施使他赢得了法希斯人的忠诚，大家知道法希斯人若不判明初来者是否值得信任是难以接受他的。

他用了两年时间抚慰整个摩洛哥北部，1078/1668年末他准备降服迪拉的扎维亚，当时它虽然已经衰弱，但仍不失为阿特拉斯山中部唯一的权威。拉希蒂的军队到达法扎兹平原时与穆罕默德·哈吉吉·迪拉伊的军队相遇，后者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莫雷·拉希蒂率领部队进入扎维亚，他以人道精神对待其主，收复过程没有流一滴血。他命令上了年纪的迪拉伊迁往非斯，与家人同住。此事发生在1079/1668年1月。

219

取得了这次胜利之后，莫雷·拉希蒂唯一要做的是粉碎摩洛哥南部仅存的一些孤立地区的抵抗力量。伊斯兰纪元1079年2月/1668年7月，他决定将马拉喀什从什巴奈特人手中

[14] 这个大学生传统从莫雷·拉希蒂时代起一直延续至近代，后来停止了。在独立早期我担任教育部长和全摩洛哥大学校长时曾予以恢复，之后又再次废除。

解放出来。他成功地占领了该地，俘虏了阿布·巴克尔·伊本·卡鲁姆·哈吉吉·萨巴尼及其家族的某些成员，并将他们处死。

苏斯地区幸存的地方势力是桑拉利尤恩人国家，该国的创建者于 1070/1659 年亡故，由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继位。1081/1670 年莫雷·拉希蒂围攻塔鲁丹特城，攻占之后立即向桑拉利尤恩人的国都伊吉勒要塞进攻。他攻占了要塞，杀死了这一伊斯兰教隐士家族的成员及其主要支持者。他的这一胜利平定了整个摩洛哥，最终建立了阿拉维特王朝政权。

一年半之后，即 1082/1671 年，莫雷·拉希蒂在一次骑马事故中身亡。

对末代萨阿德和阿拉维特王朝初始的这段叙述主要涉及一些历史事件，因为当时的内乱、不安全和政府的不安定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只有在莫雷·拉希蒂的统治之下摩洛哥才重新恢复了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成就。莫雷·拉希蒂非常尊重学者和文人。他自己曾到卡拉维因大学学习。

莫雷·拉希蒂建立了非斯最大的"马德拉萨"(madrasa,学院)。这就是谦虚地称之为"切尔拉廷马德拉萨"的学院,[15] 得名于它所在的街名。他还在马拉喀什建立了另一所马德拉萨。在他的许多业绩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负责建造了非斯以东 15 公里的塞布河大桥。

在经济方面,他给商人大批贷款以帮助他们发展商业,从而给整个国民带来繁荣。他下令改革铸币,将穆祖纳的面值由 48 个法尔降为 24 个法尔。各种形状的青铜货币重新冲压改成圆形。至于村社的工作,他最关心的是水的问题,特别是沙漠地区水的问题;因此他在摩洛哥东部,特别是在长途贸易商队和赴麦加的朝圣队伍都要路经的达拉让人挖了许多水井。

总之，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莫雷·拉希蒂的统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在长期内乱和贫困之后带来持续的和平与繁荣兴旺。

莫雷·伊斯梅尔的统治

220

莫雷·伊斯梅尔的历史充满了杰出的成就。这位统治者完成了他的两个兄长所开始的艰巨任务——将摩洛哥一如其过去的强盛时代一样统一在一位君主的统治之下。正是他,加强了其两位兄长奠定的基础,打下了摩洛哥国的基石,从而使摩洛哥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他还保证要将伊斯兰法推行到摩洛哥各地,以使国家成为既是宗教也是政治的统一体。

他极为关心与伊斯兰教和皈依伊斯兰教有关的事务，甚至关心如法国路易十四和英国詹姆斯二世等欧洲国王，他曾致函请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他严格遵守伊斯兰法的戒律，过着有节制的生活，一生中从不饮酒。基督教史学家把他说成是残酷、狂暴、专制易怒及嗜睹流血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虚构的。他们之所以对他如此描述，是因为相信了欧洲囚犯述说的故事，这些囚犯自然按当时的方式，遭到报复性暴力行为的待遇。这些欧洲囚犯，当他们获释回到自己的国家，往往夸大他们所受的折磨，致使欧洲人都相信莫雷·伊斯梅尔的狂暴和残酷。

此外，素丹还向欧洲国家首都派出大使：伊本·哈杜前往伦敦，哈吉吉·穆罕默德·塔

[15] 在我任卡拉维因大学校长时,我正式将它重新命名为"拉希蒂马德拉萨"。

米姆轮流到马黎和凡尔赛。欧洲国家的代表团也前来寻求友谊。他和英法两国国王保持着私人关系，并介入两国的事务。他在那里派有谍报人员，他可以清楚地了解两国发生的情况。他对政治十分敏锐，例如他说："西班牙国王是个孩子，他听天由命管理他的国家；英国国王没有行动自由；奥地利国王不得不讨好重要的选举人。法国国王是唯一真正统治国家的君王"。他在此说的是路易十四，他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一个国君。

这就是在其兄长莫雷·拉希蒂去世后登上摩洛哥王位的统治者。他即位的日期是 1082



图片 8.2 素丹莫雷·伊斯梅尔

年12月16日(1672年4月16日)星期三。

各城镇和卡比拉的显要都前来向他宣誓效忠，来自马拉喀什的那些人则除外。这是因为他的侄子艾哈迈德·伊本·穆赫里兹得知他的叔父莫雷·拉希蒂去世的消息后，急忙来到该城请求当地居民立他为素丹。他得到许多追随者的支持，特别是苏斯人中的追随者。莫雷·伊斯梅尔的唯一选择便是将这一威胁消灭在萌芽之中。

他登基后不几天便出兵攻打他的侄子以及与他相勾结的豪兹的卡比拉。他将其击败后进入马拉喀什，宽恕居民没有立刻向他宣誓效忠，原谅他们参与他侄子的谋反。他的侄子失败后逃跑，但再次密谋，驱使非斯人起来造反并立他为素丹，这一次他取得了成功。 222

莫雷·伊斯梅尔得悉这次动乱的详情之后，决定首先对付他的侄子。他进军攻打，迫使他再次出逃到撒哈拉沙漠。随之他向非斯挺进，围困该城直到投降。但后来他决定以梅克内斯为国都。在返回该城后，他下令建造王宫、房屋、垣墙、马厩、仓库和其他一些大建筑物。他有不少设计精美的花园和水池，使这座城市堪与凡尔赛(法王路易十四在他放弃巴黎时曾定它为国都)相媲美。在梅克内斯，建筑工程进行了数年之久。

艾哈迈德·伊本·穆赫里兹在南北两个都城夺取权力的图谋失败之后，企图第三次与其叔父对抗。他二次进入马拉喀什，在1085/1674-1675年占领该城，并在那里加强防御，他的叔父赶来包围了他。围困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最后伊本·穆赫里兹第三次逃到苏斯。莫雷·伊斯梅尔即刻开进马拉喀什，这次他命令他的军队严惩该城支持伊本·穆赫里兹的人。

莫雷·伊斯梅尔统治时期，家族内部发生了他三个弟兄莫雷·哈兰、莫雷·哈希姆和莫雷·艾哈迈德反叛的政治事件。这次叛乱发生于1089/1678-1679年9月末。叛乱者在行动中得到艾特阿塔卡比拉的承认和支持。素丹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他们进攻，双方部队在萨格鲁山遭遇。莫雷·伊斯梅尔获胜，他的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敢精神。三弟兄在失败后逃进撒哈拉沙漠。

伊本·穆赫里兹避难于苏斯，后历尽艰辛。而他的叔父此时则忙于国内和外交事务，放松了对他的注意。1096/1684-1685年莫雷·伊斯梅尔得知他的兄弟哈兰与他的侄子伊本·穆赫里兹会师，攻占了塔鲁丹特。素丹率领一支大军予以回击，他围困了塔鲁丹特。伊本·穆赫里兹在围攻时被杀，从此结束了这位谋反者的冒险生涯，他曾使莫雷·伊斯梅尔焦虑不安了14年。至于莫雷·哈兰，他仍被围困在塔鲁丹特。在国王的军队攻占塔鲁丹特时，哈兰逃进撒哈拉。

莫雷·伊斯梅尔收复欧洲人所占摩洛哥城镇的战斗 223

在阿拉维特王朝之前，摩洛哥为游说者和基督教徒所分裂，并受到其他各民族的垂涎；正如我们所知，反叛和内乱使它成为多事之国，萨阿德的最后几位统治者对此负有责任。莫雷·马哈茂德及其后他的兄弟莫雷·拉希蒂自然要竭尽全力来结束这一局面，将摩洛哥统一在一个王位和一个国王之下，他们的弟弟伟大的莫雷·伊斯梅尔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在巩固了两位前任的成就之后，伊斯梅尔担负起清除基督教殖民化最后完成统一摩洛哥大业的重任。

夺回马赫迪耶

当时称做马穆拉的马赫迪耶港是摩洛哥最大的海港之一，各民族的海盗都想占领。该海港当时受安达卢西亚人居住的城镇塞拉管辖，摩洛哥的船队就是从这里驶出与西班牙人和其他敌人作战。西班牙人利用曼苏尔诸子之争削弱了摩洛哥的时机，于1023/1614年占领了马赫迪耶，并一直控制到莫雷·伊斯梅尔决心从他们手中夺回为止。他出兵进攻该城，将其包围并切断了水源，最后于1092/1681年攻占了该城，俘虏了那里所有的西班牙人。

夺回丹吉尔

丹吉尔是英国的一个国王与葡萄牙公主结婚之后归英国统治的。莫雷·拉希蒂早就想使该城回归摩洛哥但未能如愿便去世了。由于该城的重要性，伊斯梅尔竭尽全力解救它，为达此目的，他派一位大将军阿里·伊本·阿卜杜拉·里菲前去围攻该城。关于英国人撤出丹吉尔的原因，摩洛哥人和欧洲人有不同的说法。虽然双方都同意英国人在破坏了城楼和城防工事后未作抵抗就撤出了该城，但摩洛哥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人这么做是因为阿里·里菲将军对他们实行了严密的围困。欧洲历史学家却认为撤退的原因在于国内的政治：英国政府和议会担心皈依了天主教的约克公爵会夺取丹吉尔作为他打击查理二世和夺得权力的军事基地。因此英国君主下令达特茅斯勋爵撤出丹吉尔。

224 然而，也承认这次撤退另有原因，那就是英国人认识到要抵抗摩洛哥的进攻确有困难。经验告诉我们，欧洲人一般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侵占的每一寸摩洛哥国土的，除非受到打击不得不这么做。

不管怎么说，摩洛哥军队在阿里·伊本·阿卜杜拉·里菲将军的率领下于1095年3月/1684年2月进入丹吉尔。这位将军立刻着手重建英国人毁坏的一切，并修复英国人驻扎和逃跑时破坏的清真寺、墙垣、塔楼等各种建筑。

夺回拉腊什

对于摩洛哥的穆斯林来说，失去拉腊什是最大的灾难之一，该城并没有被西班牙人强占，而是摩洛哥的一个国王将其割让以换取对他重新掌权的支持。在萨阿德王朝曼苏尔的儿孙争夺王位时，欧洲人企图利用这一形势，侵占当时的重要战略中心拉腊什。穆罕默德·谢赫逃往欧洲，请求外国国王给予军事援助以对付他的两个弟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得知后举行了商谈，最后谋求摩洛哥王位者同意割让拉腊什给西班牙国王；作为回报，国王帮助他重登王位。买卖拍板成交，穆罕默德·谢赫返回非斯，西班牙人则于1019/1610年占领拉腊什。西班牙统治拉腊什长达80余年，直到莫雷·伊斯梅尔征讨。这位伟大国王投入大量军队进攻该城，将城中的西班牙人围困了五个多月。围困者与被围困者进行猛烈的战斗，摩洛哥人终于取得辉煌的胜利。收复拉腊什的日期是1101年元月18日/1689年11月1日星期三，这给摩洛哥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其程度与当年丧失它时的悲痛心情不相上下。

夺回艾绥拉

艾绥拉港是在巴努瓦塔斯人统治之初落入葡萄牙人之手的，在早期的萨阿德国王将其收复之后，又被葡萄牙人再次夺走。几经易手，它最后归属于西班牙。在伊本·哈杜将军完成了拉腊什战役之后，素丹命令他进军并围困艾绥拉。被围困的居民因疲惫不堪，请求让他们活命；经素丹批准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他们怕有意外，当夜乘船逃跑了。摩洛哥人于1102/1691年进入艾绥拉。

莫雷·伊斯梅尔的军队

225

瓦达亚民兵

摩洛哥国王历来从他们自己部族的卡比拉或结盟的卡比拉中招募军队。例如，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依靠的是桑哈贾卡比拉(拉姆图纳、拉姆塔等)，而阿尔莫哈德王朝得到的是马斯穆达卡比拉的支持。这情况一直延续到萨阿德王朝，他们从贝都因阿拉伯人的卡比拉中征募士兵，贝都因阿拉伯人曾定居国家南方，在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曼苏尔时代被带进摩洛哥。萨阿德王朝从这些卡比拉中招募了一支称为“瓦达亚民兵”的军队。瓦达亚民兵随着萨阿德王朝的衰落已经消失。当莫雷·伊斯梅尔停留在马拉喀什时，忽然想到重新召集他们组成军队以支持他的统治。这些新兵穿上制服后，并往新国都梅克内斯。他们与什巴奈特人和齐拉拉人合编在一起。

新兵的人数逐渐增加，莫雷·伊斯梅尔将他们一分为二：一部分派往非斯，另一部分驻扎在梅克内斯的利雅得。

巴瓦基尔民兵

莫雷·伊斯梅尔久久思考着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使民族强大、稳定和令人敬畏。最后，他认为这取决于其军事力量。他同时认识到一个民族的衰落，原因在于军队和军队首领声望过高。因此，他决定建立一支由奴隶组成的民兵。这些人自然会服从命令，而这是良好纪律所必备的先决条件，他们既然受了主人的恩惠自然会服从主人。

莫雷·伊斯梅尔是在组建前面提到的瓦达亚民兵时，想到这一解决办法的。一位马赫增人的秘书名为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阿利利什，[⑯] 他的父亲也是给萨阿德王朝的曼苏尔当秘书的。“国王有一支奴隶民兵，”他对莫雷·伊斯梅尔说，“我手中有我父亲记录的名册。”他把名册拿给伊斯梅尔看，并告诉他在马拉喀什还有许多这类奴隶，他能召集他们并重造名册，使他们服军役。莫雷·伊斯梅尔就让他去办这事，并给地区的卡比拉首领写

⑯ 纳西里，1954-1956年，第4卷，第26页所说与此不同，认为该人名叫乌玛尔·伊本·卡西姆，而我却掌握着他代表维齐尔·雅赫马迪写的亲笔信，签名是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在莫雷·伊斯梅尔给我们的祖先伊斯兰谢赫·西迪·马哈茂德·伊本·卡迪尔·法西的信中对此人用的也是同一姓名。杜阿·乌西夫-里巴蒂提到他时也用这一姓名。

信要他们提供帮助。阿利利什开始按名册追踪这些奴隶，终于将他们一一征召入伍。他圆226满完成了新兵征召任务——完全符合预期的目的，这些卡比拉中一个黑人也没有留下，无论是奴隶，半奴隶还是自由民。这一措施引起舆论大哗，特别是精通伊斯兰法的乌里玛，因为伊斯兰法禁止征用自由民。这问题造成了国王和非斯的乌里玛之间长时间的争论，他们互通大量信件，其中一部分现在仍可见到。这就是有名的莫雷·伊斯梅尔致伊斯兰谢赫·阿布·苏乌德·法西的信函。[17]

说到莫雷·伊斯梅尔，我必须对他作一个总的评价。假如他真如欧洲人所认为的是个残酷、暴虐的野蛮人，那么一个在信仰和法律方面都坚定不移的学者是不会支持他的。但莫雷·伊斯梅尔深信在这件事上他是完全依照伊斯兰法行事的，并认为此举是他能为摩洛哥和伊斯兰教所做的最有益的事情。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阿利利什在将自由民降为奴隶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减轻了他的责任，使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阿利利什声称，他们或者至少他们的父辈在萨阿德王朝时代都曾经是奴隶。此外，莫雷·伊斯梅尔得到了较为随和的乌里玛的同意，如其中的一位学者给伊斯兰谢赫·法西写了一封未注明日期，也未署名的信，信中特别提到：

> 为什么您不在您的信［致莫雷·伊斯梅尔的信］中说：陛下，由于神的恩典而无往不胜并受神的正确引导采取所有行动，特别是在将这些人降为奴隶以前征召入伍和对伊斯兰法采取谨慎态度，这问题已作了通盘考虑，既已得出了所有正当理由，就不必再做什么了。现在一切都掌握在陛下之手——愿神使他无往而不胜！——他是按照我们大家和当代其他乌里玛指出的方向行事的；为了良心的清白，为了我们和所有的穆斯林，愿神永远保佑他！他有大量论及这一问题的文件，可以说服那些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者。这么说就是说真话。这就是您应该做的，不必害怕触犯神与人的法律。我希望在您致陛下——愿上天保佑他！——的信函中多加抚慰，使他感到满意。我尊重您才给您提此忠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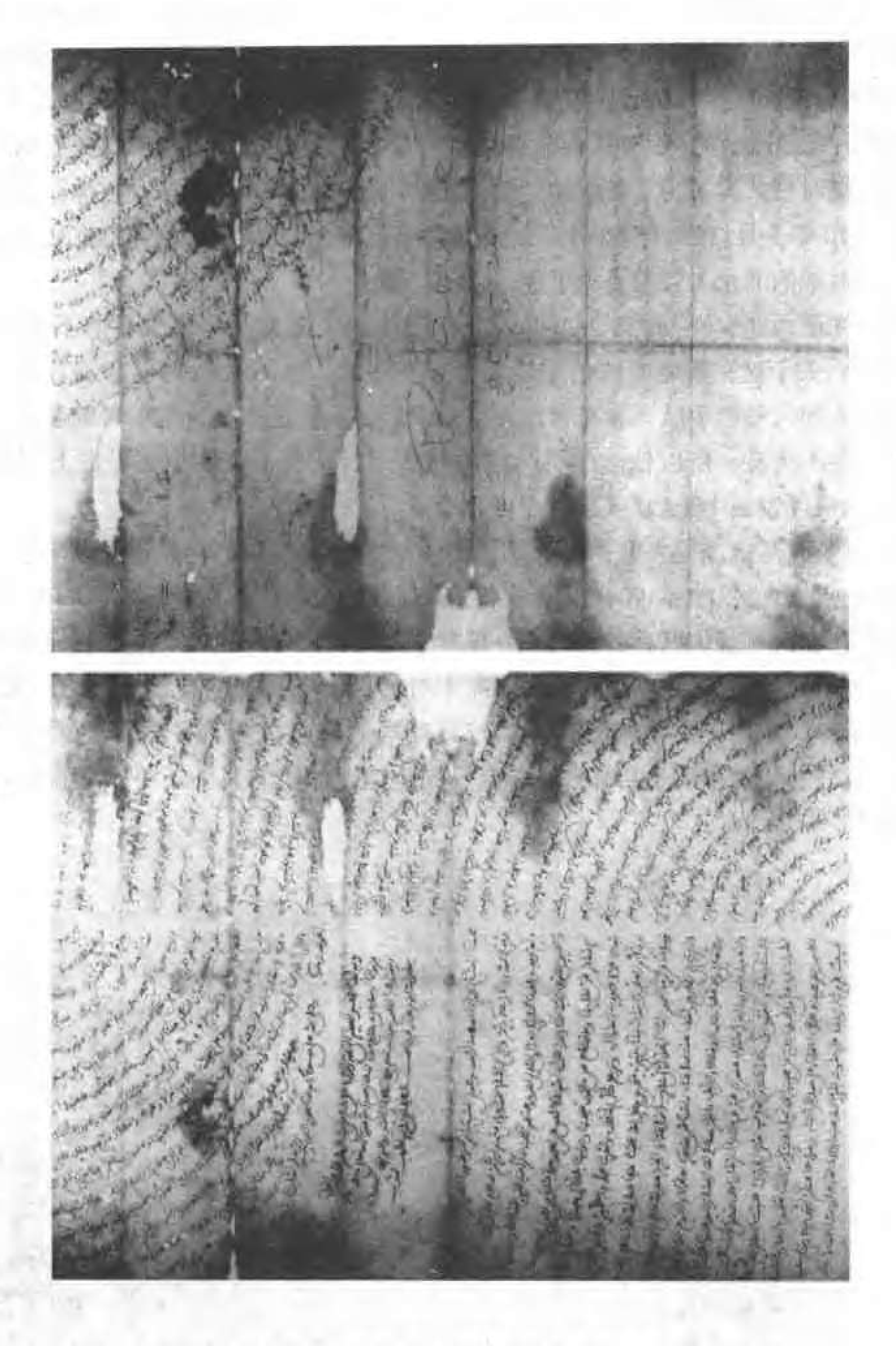
素丹和乌里玛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西迪·马哈茂德·伊本·阿卜德·卡迪尔·法西于1116/1704-1705年去世时为止，而开始的时间肯定是11世纪最后十年。其中保存下来的最早一封信写于1104年11月28日/1693年7月。国王在信中要求西迪·228马哈茂德仔细研究阿利利什关于将自由民降为奴隶所提出的理由，说明这一做法是否符合伊斯兰法，而他是否赞同。这位学者的回答无疑是直率的，或者曾暗示法律不容许将自由民降为奴隶。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苦恼的素丹写去一信，《al-Istiksā》的作者在书中曾提到此信[18]

> 同年(1108/1698-1697年)同月(11月)，非斯的卡迪和乌里玛收到素丹的来信，指责他们不该不同意将登记在册的自由民降为奴隶。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君王在信中赞扬了非斯人民，严厉批评乌里玛，并命令遣散该城的卡迪和公证人。

---

⑰ 纳西里，1954-1956年，第4卷，第42页，开罗版。

⑱ 这封信从历史、社会、法律和宗教的观点看均十分重要，本章作者已将此信连同文件的照相复制品在1962年为纪念莫雷·伊斯梅尔掌权三百周年出版的《Hesperis-Tamuda》杂志专刊上发表。



图片 8.3 第 12 号信件，素丹莫雷·伊斯梅·伊斯梅尔与伊斯兰谢赫西迪·穆罕默德·法西的部分通信

《al-Istiksā》中提到的第一封信为我的家族所收藏。信中涉及许多反复提到的问题，概括如下：素丹认为有必要组建一支军队，保卫伊斯兰领土。在这封长信中，他阐述了自己关于建立奴隶军队的观点，并请收信人转达给乌里玛，并请他们答复。我们现仅有西迪·马哈茂德的一封回信，他在信中最后说："对于不能证明是奴隶的人，学者们一致认为是自由的，将其据为己有或通过出卖及其他手段将其转让是绝对不合法的，因为人生来是自由的"。

在这关键时刻，国王为了使伊斯兰谢赫相信组建巴瓦基尔军队的必要性，他采用如下办法：于1110年5月/1698年12月写信请他亲眼目睹他已让编入民兵队的奴隶全部获得了自由，他对他们的永久管辖是为了保卫伊斯兰领土。

我们不知道西迪·马哈茂德是如何回答的，但是我们在这位学者去世前不久(1115年7月/1703年秋)关于这一问题的通信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虽不是与此事直接有关，但提到了征召非斯人加入弓箭手队。看来素丹在后一个问题上曾征求过这位学者的意见，但得到的答复可能并不满意。所以他趁此机会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该信全文可在上面提到的莫雷·伊斯梅尔信件收藏中见到。

次年，西迪·马哈茂德去世，莫雷·伊斯梅尔继续请求非斯的乌里玛予以同意。这桩公案几经反复，直至1120/1708-1709年，国王终于强迫他们通过了奴隶花名册(Dīwān al-'Abīd)。

229

这就是建立巴瓦基尔民兵的历史——虽然十分简要，但却是以一些珍贵而重要的文件为基础。这支民兵队起初在这个统一的国家中对维护和平和安全有很大帮助。莫雷·伊斯梅尔在从与阿尔及利亚的接壤处到撒哈拉最南端的摩洛哥所有各地都建了堡垒和要塞(kasaba)。驻守这些堡垒的士兵都携带眷属一同生活，他们的儿子还要接受特殊训练。对此还需要进一步介绍。



图片8.4 瓦尔扎扎特省斯库拉的瓦拉德-达乌德-艾特-哈姆即曼苏尔城堡，可能建于18世纪

莫雷·伊斯梅尔依靠这支强大的民兵队伍使摩洛哥恢复了国力以及在当时几个大国中的声望，它们因此开始害怕它。有了这支民兵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能够维护摩洛哥的安全，使人民感到自信与心理的平静。

莫雷·伊斯梅尔任命其子担任摩洛哥各地总督

这一选择也给莫雷·伊斯梅尔造成巨大的困难，关键是这位国君有许多孩子：在他去世时共有500男孩和500女孩。他无法使他们都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一开始就采取经过惨痛的经验之后才最终决定的解决办法。 230

1111/1699-1700年，他将几个省分配给他的几个儿子：派莫雷·艾哈迈德(绰号为“达哈比”)带3000黑人士兵前往塔德莱；莫雷·阿卜德·马立克率1000骑兵前往达拉；穆罕默德·阿勒姆带3000人前往苏斯；莫雷·马穆恩·卡比尔前往西吉尔马萨。卡比尔带500骑兵在蒂济米建立了根据地，但两年后就死去了，由莫雷·尤素福于1113/1701-1702年前去接替。莫雷·扎伊丹被派往摩洛哥东部，发动对土耳其人的远征，有一次甚至进入了穆阿斯凯尔，洗劫了埃米尔乌斯曼贝伊的王宫。他的父亲因与奥斯曼哈里发签有盟约，便将他撤了职，由莫雷·哈菲德替代。

莫雷·伊斯梅尔的不少年长的儿子因没有获得总督职务而感到受了伤害。有几个人企图以武力夺取若干省份，如莫雷·阿布·纳斯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攻打他的兄弟莫雷·阿卜德·马立克，取胜后夺得达拉。战败的王子夺路而逃。素丹派他的儿子莫雷·谢里夫从阿布·纳斯尔手中收复达拉省，并将这一地区分配给他而不是阿卜德·马立克，因为阿卜德·马立克已证明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在这一事件的同时，莫雷·穆罕默德·阿勒姆在苏斯起义，自立为素丹，并向马拉喀什进军，在经过围困之后占领该城。莫雷·伊斯梅尔派他儿子莫雷·扎伊丹向他反攻，与叛逆者作战达两年之久。莫雷·伊斯梅尔看到了他在有生之年这一试验带来的不幸后果，儿子们争吵不休，有些竟然要求获得王位，他便将所有年届青春期的儿子全部送往塔菲拉勒特。他将每个儿子安置在一所房子里，大都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棕榈树和一块耕地，以及一定数量的奴隶帮助他们干活儿。这位国君这么做是明智的，因为他的儿子太多，不可能全部留在梅克内斯或摩洛哥的其他城镇过王子生活。他将儿子全部送往西吉尔马萨后，解决了这一问题。1130/1717-1718年，他撤了所有儿子的职，只留下莫雷·艾哈迈德·达哈比担任塔德莱的总督，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也就是在他连续任职的20年中，在他的省里从未发生过直接反对他的或由他煽动反对他父亲的叛乱。

采取这一措施之后，国家获得了和平与宁静，莫雷·伊斯梅尔的建设性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是人所共见的。摩洛哥人因感到充分的安全，开始从事贸易和农业，帮助发展国家财富。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在这一时期，由于严厉打击犯罪者及其同谋，已不再有盗贼和拦路抢劫者。由于绝大多数居民掌握的手段，出现了极有利和轻松的环境。 231

莫雷·伊斯梅尔在位57年。摩洛哥或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在他以前或在他之后没有一个国王统治国家如此之久，只有穆斯坦西尔·乌贝迪一人除外，他于7岁登基，统治到67

岁。他死于1139年7月28日/1727年3月21日星期六。

莫雷·伊斯梅尔的后继者

莫雷·伊斯梅尔去世之后，发生了必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众多儿子在他在世时就为他们的父亲授予的地方政府而战，如今则开始为争夺国家政府而反叛。数十年中，谋求王位者无人建立起强大而持久的政府。其中第一个是莫雷·阿卜杜拉，他登上王位不久便被废黜。

为维持秩序和保障和平而建立的巴瓦基尔民兵起了致关重要的作用。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到拥有近卫军的奥斯曼人，历代穆斯林王朝的类似制度对于这些王朝和受其统治之苦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灾难。

到18世纪末，西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大王，即穆罕默德三世登上摩洛哥王位。他恢复了秩序，加强了君主制度的权力，使摩洛哥成为一个受各国尊重的国家。

他首先关心的是发展贸易，为此他着手实行各港口的现代化，特别是摩加多尔港，将其改名为索维拉(意为"小墙",按另一词源则是"小计划",即在工人中流传的港口建造计划)。他与一些欧洲国家订立了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于1757年与丹麦签订的有关萨菲港的协议。

穆罕默德三世的改革扩展到其他一些领域。[19] 他特别关心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草拟了关于教学大纲、教科书、讲授科目等改革方案。

关于宗教，他相信伊斯兰教的原始纯洁性，这种纯洁性可以抵制所谓的伊斯兰教隐士教义，他还崇拜圣徒并恳求他们为了人类的利益向神说情。然而，这种原教旨主义倾向仍受到遏制，因为在18世纪后期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要求进行比穆罕默德三世希望见到的更为彻底的改革。这一时期，他与麦加的谢里夫索鲁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索鲁尔为妻。因瓦哈比人与麦加谢里夫为敌，穆罕默德三世希望避免实行与瓦哈比人思想一致的改革。但兄弟会的力量在他和他的儿子莫雷·苏莱曼的统治时期已大大下降。

232

至于外交关系，穆罕默德三世在他整个统治时期不断与外国缔结协议。他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向路易十四提议废除奴隶制度；在奥斯曼与俄罗斯帝国的冲突中支持奥斯曼帝国。1767年他将葡萄牙人驱逐出马扎甘，[20] 但在准备围攻休达时突然去世。

总之，穆罕默德三世的统治可以说对国家以及阿拉维特王朝的权威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他热爱和平，平生仅出征一次，那就是解放马扎甘，他总是通过协商和对话解决所有的内部和外交争端。总的说，这种慎重和务实的政策对摩洛哥人民来说是有益的，他们在18世纪下半叶享受到全面的繁荣和充分的安全。

(吕和声　译)

[19] 纳西里，1954-1956年，第4卷，关于穆罕默德三世统治一章。

[20] 与通常意见相反，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的这座大西洋沿岸城镇的名称不是来源于外国。它是一个柏柏尔卡比拉，巴努马兹加瓦人的名称，他们居住在马扎甘附近。由于相同原因，阿尔及尔城也曾用这名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称其为"贾祖巴尼马兹加瓦"。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奥斯曼人及其继承者

M.H. 谢里夫

16世纪初的特征是出现了一次深刻的危机，结束了马格里布旧的国家结构以及该地区 233 往日的均势。由于奥斯曼人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及谢里夫对摩洛哥撒哈拉诸省的干预，结束了动乱时期，建立起新的秩序，新秩序的建立在某些国家要比另一些国家时间长，但它终于给马格里布带来了一定的稳定，而且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预示殖民统治已经来临的结构危机出现为止。

这一危机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奥斯曼人是如何在16世纪帮助建立国家稳定的呢？他们与其统治的社会相异的程度有多大，他们与被征服国融合的程度又有多大？有一点很清楚，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不同于突尼斯，突尼斯的情况也不同于的黎波里，至于不同的程度则难以测定。还有一点也很清楚，18世纪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除了17世纪的特点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而17世纪则是以试验和多变为特征的。

16世纪的危机和奥斯曼人在马格里布采取的解决办法

这次危机影响到整个阿拉伯世界。这是一次经济危机，表现为货币经济衰退，有利于转向自给自足的经济。其起因部分在于主要的贸易运输路线有了变更。这也是一次社会和政治危机，由于起统一作用的各种社会因素，如各种政治和军事势力、大商人所组织的各种会社以及“乌里玛”(伊斯兰学者)阶级日益衰弱而逐渐形成。这也是一次产生重大变化的文化危机，随之出现了对过去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风俗习惯和兴趣爱好的病态的怀旧情感。这一多方面的危机发生在特别危险的时刻，因为欧洲这个竞争世界在经济上(通过一些重大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兴起)、政治上(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和文化 234 上(通过文艺复兴改变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艺术技巧)正逐渐在苏醒。

只有处于穆斯林世界边缘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可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这一时代，他们采用了某些现代技术和思想，包括火器以及高效的军事和行政组织。这虽是有限的(它并未使穆斯林社会产生重要的内部变化)，但奥斯曼人对该时代的挑战所作出的反应，对于完全处于衰落之中和面临外部威胁的一些社会和国家来说，如15世纪初马格里布诸国，仍不失为一条出路。

马格里布的危机

马格里布于“中世纪”[①] 末处于危机状态，遭受着人口减少、经济与社会混乱以及无法挽救的政治软弱之苦。

其根本原因许多是结构方面造成的。第一，使人惊恐的沙漠不断逼近，每当出现持续干旱，马格里布的许多地区很快被沙漠吞食，在中世纪末土地曾长期撂荒。第二，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和社会方式：阿拉伯人“加巴伊尔”(gaba'il，群落)；与阿拉伯人同化的群落；柏柏尔人的山地村社、定居的农业居民和城镇居民。第三，对社会起统一作用的成分，不论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很容易起变化，第四，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缺乏进步。

以往常常将马格里布在中世纪末的衰落归咎于希拉利亚游牧民，[②] 但这种指责现在已被排除——至少那种绝对的和带偏见的说法已不复存在。[③] 然而，由于他们的活动和组织，由于他们分裂成相互对立或结成联盟(永远是单独的)的各个部分，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尚武的道德准绳(他们的“高尚的不合常规”——雅克·伯克语)，阿拉伯人“加巴伊尔”(或与阿拉伯人同化的群落)成为马格里布的薄弱部分即中央政府的一个弱点。每当旱灾或政治危机削弱了中央权力时，这些群落便立刻抓住机会拿起武器来恢复他们的谋生手段或参与总的夺权斗争。

235　与欧洲一样，14和15世纪多次发生瘟疫和灾荒，马格里布各民族人口总数降至300万到600万。结果，生产萎缩，不断受到沙漠侵蚀威胁的许多农田，耕作遭到破坏，人口稀少地区的安全条件恶化。与此同时，从1503至1505年美洲的财富流进塞维利亚，使东半球的货币储备大大贬值，先帮助原主人伊比利亚人建立统治，后又帮助夺取者为西半球经济服务，特别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④]

从11和12世纪起逐渐出现的衰落，使马格里布各城市受到影响(贸易大道沿途或沿海一些城镇除外，13世纪也曾一度中断)，到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影响越加严重。商业活动瘫痪，交易停滞，食物短缺，贫困现象随处可见。利奥·阿非利加纳斯将他在城市以及定居居民的耕作地区所见的贫困现象一律归因于沉重的征税——如今有时仍毫无道理地压在有纳税义务的居民身上——和游牧民的劫掠。

游牧民确实不受国家的约束，并将他们的控制和游牧生活方式推向大部分国土。他们趁人口减少和农耕处于低水平造成的空隙，靠暴力手段生存，即向较弱的居民强要大量食物。定居者耕种的地区由于游牧民的侵袭而逐渐缩小。甚至在种植谷物的一块块耕地四周筑起高墙防护。利奥·阿非利加纳斯在突尼斯周围见此情景之后说：“试想将一小块地圈在

---

① “中世纪”这一名称若应用于穆斯林历史，是不适合的，但我们按欧洲历史编纂中普遍公认的惯例借用而来。我们还可以说，15世纪末不仅是欧洲，而且也是其他文明国家的真正转折点。随着火器的使用、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出现，新时代才真正开始。

② 指来自上埃及的阿拉伯人群落，他们从11世纪中期侵入马格里布，聚居在内地的平原上，他们对原有居民予以征服，或者让其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③ J.P. 庞塞特(Poncet)，1967年。

④ I.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年。

墙内，即使精心照料，不辞辛劳，又能获得多少粮食呢！一年的收成甚至不足半年食用！"[5]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特莱姆森的扎扬王朝(巴努阿卜德·瓦迪王朝)和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一些多元世俗国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日渐衰落。贸易活动混乱，应纳税货物减少，致使他们财力缩小。本来就勉强维持的军队和官僚政治，如今变得更加不能胜任。此外，一些贫穷的国君给予强大的武士群以土地或税收方面的"伊克塔"(ikṭā,特许权)，造成严重后果。不少远离权力中心的城市很快变成自治城市(哈夫斯王国的黎波里、布日伊、君士坦丁)，一些大的联盟在其所在地区占了绝对优势。比拉德马赫增(国家管辖的国土)逐渐成为素丹住地附近一片有限的区域，此外便是一些效忠国家但离得较远的小块地区。人们 **236** 普遍感到不安全，哈夫斯王朝素丹不得不于16世纪40年代初亲自拿起武器几乎就在他住地的墙下抗击游牧民的侵袭以保卫黎民百姓。[6]

扎扬王朝对特莱姆森的统治以及哈夫斯王朝对突尼斯和东马格里布的统治分别从15世纪后期和1530年起受到严重动摇，因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在这些殖民地已站稳脚跟。

外国对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的干涉

出现政治真空或马格里布放松抵抗可能是促使外国干涉的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征服者自身的需要或图谋。他们的主动性从当时的宗教热情可见一斑：西班牙人的十字军精神，他们刚刚收复失地；奥斯曼人则是结合"加兹"(g͟hāzī,征服)的理想[7] 保卫达尔伊斯兰(Dār al-Islām)。此外，马格里布的沿海要塞对这两个主角来说在战略上至关重要，既可以保护他们各自的属地不受对方(彼此都可能获得宗教少数民族的援助，穆斯林能得到安达卢西亚人的援助，基督教徒能得到巴尔干人的援助)的袭击，也可以作为发起攻击的基地。[8] 有意义的是，西班牙在马格里布地区的进攻始于1505年，在第一次获得美洲的贵重金属(1503-1504年)之后，[9] 他们因此得以推行强有力的扩张政策。

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的西班牙人

从1505至1574年，西班牙几代国王屡次试图确保马格里布沿海地区一些据点的安全。一些重大的远征包括：佩德罗·纳瓦罗1505-1511年对奥兰、布日伊和的黎波里的远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35-1541年对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远征，以及奥地利唐约翰的远征，唐约翰于1573年(他在勒班陀大败土耳其舰队两年之后)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了突尼斯。然而收益是有限的，因为要征服马格里布的腹地并使当地居民改变宗教信仰很快证明是不可能的。西班牙人只好满足于占领几座城市(1509-1708年和1732-1792年占领奥兰；

---

⑤ 利奥·阿非利加纳斯(Leo Africanus)，1956年，第2卷，第383页。

⑥ 伊本·阿比·迪纳尔(Ibn Abī Dīnār)，1967年，第169页。

⑦ A. 特米尼(Temini)1978年；K.R. 萨赫利(Sahli)，1977年。

⑧ F. 布鲁戴尔(Braudel)，1928年和1935年。

⑨ H. 肖努和P. 肖努(Chaunu)，1955年，第8卷(2)，第14页及其后诸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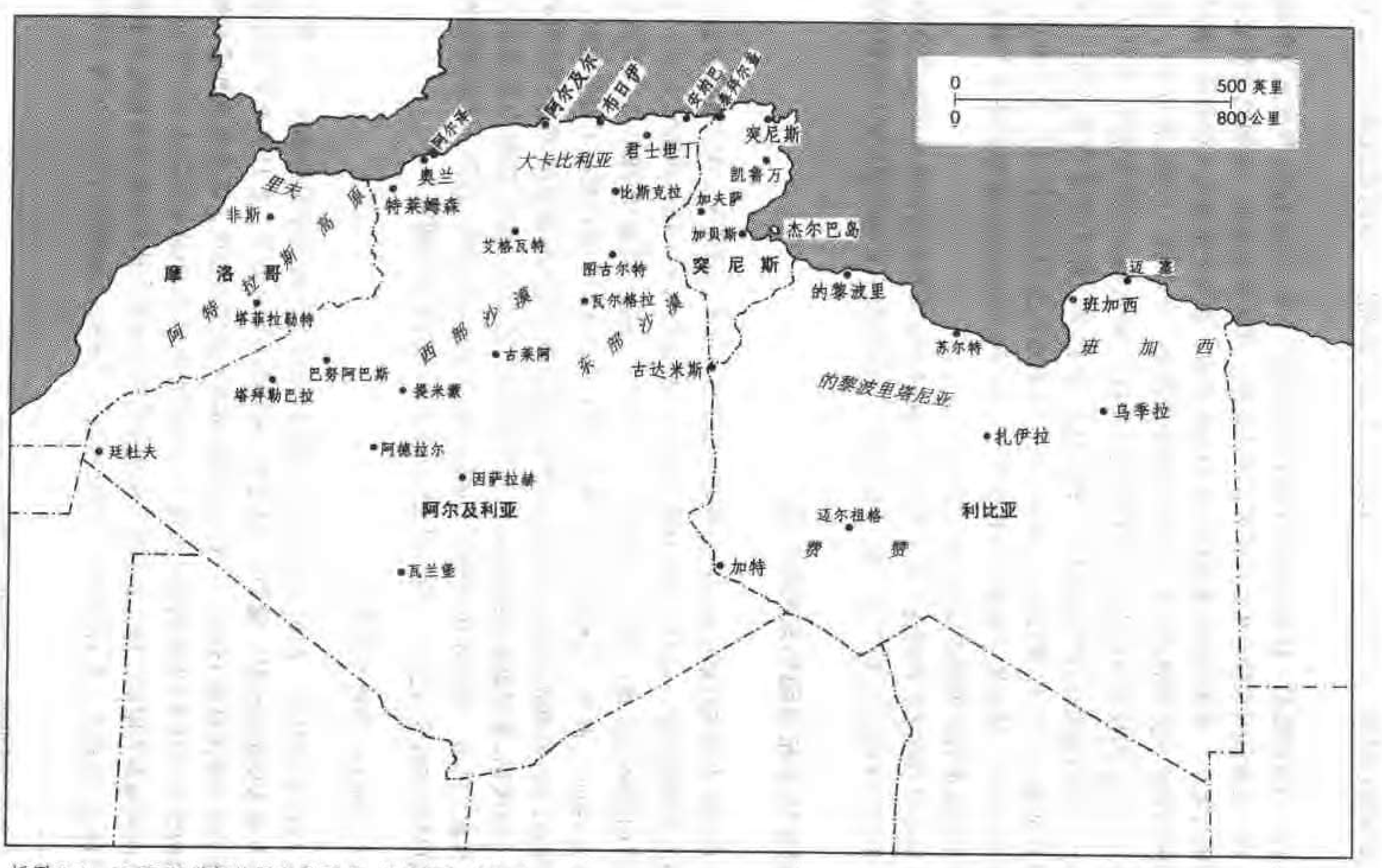


插图 9.1 16至18世纪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

1510-1551年占领的黎波里)，并在非洲土地上建立若干强大的要塞，如通向阿尔及尔的佩尼翁(1511-1529年)及位于突尼斯外港的古莱特(1535-1574年)。占领古莱特，目的是牢牢控制该城，而主要是守卫西西里海峡的南部海岸。

要贯彻这种有限占领的政策，必须经常寻求当地同盟者和受保护者的支持。其中最著名 238 的是哈夫斯王朝几位素丹，他们从1535年起一直在巧妙地与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开展拉锯式的斗争。哈夫斯王朝末代素丹穆罕默德(1573-1574年)甚至同意与首都的基督教徒首领分享突尼斯的权力。特莱姆森扎扬王朝末代素丹也和哈夫斯王朝一样与西班牙人订立了时断时续的同盟，直到首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他们最终于1551至1554年被取消统治权。伊比利亚人并不轻视与较小的首领结盟，如大约于1550年统治凯鲁万和突尼斯中部的萨比亚人，或奥兰地区的巴努阿米尔人和巴努拉希德人。

但总的说，由于存在着宗教和文化的障碍，在西班牙人和本地首领之间不可能有持续的缓和。正如所预料的，穆斯林土耳其人趁机利用了这一点。

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的战斗

最早在马格里布对基督教徒开战的土耳其人是拉伊斯海盗。最初，他们是自己采取主动行动，虽然曾取得当地统治者的同意和当地居民的帮助，巴巴罗萨两兄弟阿鲁吉(或乌鲁吉)和凯鲁丁(或基德尔)大约从1500至1519年的情况便是实例。大概在那时，也就是阿鲁吉失败而死后，凯鲁丁求助于奥斯曼素丹并承认了他的统治权，由此产生了马格里布的“伊亚拉”(iyāla,摄政政权)。

依仗土耳其近卫军和伊斯坦布尔提供的武器，凯鲁丁和他的继承者，特别是萨拉赫·拉伊斯(1552-1556年)和“西方奥贾克”中最强大的“贝勒贝”(beylerbey)，即基利吉或伊尔吉·阿里(1568-1587年)，逐渐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东伊弗里基亚大约有40年的时间(1534-1574年)成了西班牙和土耳其双方长期斗争的场所，哈夫斯王朝的国君和当地首领，如凯鲁万的萨比亚人都积极干预，虽然并不总是对他们有利，而一些著名的海盗，如托尔盖特(或德拉盖特)大约在该世纪中期到1565年刚离开马耳他便去世时止，则赢得了声望。土耳其人征服东马格里布的几个主要阶段是1551年攻克的黎波里，1557年攻克凯鲁万，1558年攻克杰尔巴以及后来在1569年和1574年两度攻占突尼斯。此后，两个主角，西班牙人和奥斯曼人都被召唤到别的战场上去了，稳定的形势有利于土耳其人，他们一直保持了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统治者的地位，只是飞地奥兰、凯比尔港和泰拜尔盖小岛除外。

奥斯曼人摄政国家的组织

远离中心的军事边陲地区，即被称为“西方奥贾克”的新非洲省份，始终没有完全并入奥斯曼的政治和军事体系。没有定期缴纳贡金，没有受伊斯坦布尔直接管理的行政机构， 239 也没有具欧洲特点的制度，如引入北非的“提马尔”(timār,封地)制。在全能的基利吉于1587年去世后，起初在一个军阀即阿尔及尔的贝勒贝统治之下的三个马格里布摄政国分开了。

每个省都由伊斯坦布尔指定的一位帕夏执政，并由“迪万”(dīwān,土耳其高级军官

议事会)协助工作。约数千人的土耳其近卫军负责保卫领土，维持基本秩序，积极参与征税和“政府”运转。因此，近卫军从一开始就是新政权的主要力量，其成员在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作为主人定居下来。来自希腊岛、阿尔巴尼亚或附近的欧洲国家如意大利、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海盗都与土耳其近卫军相勾结。他们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虽然虔诚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与近卫军士兵一样，也被认为是土耳其人，并被列入征服者的社会等级而享有特权。

马赫增(政府)执行各种简单职能。它征收税金以支付现行战争的开支并维持国内的征服者军队；它维持秩序和执掌司法，至少在有从属的定居者居住的城镇中如此；它还处理邮政业务。由少数“库贾”(khudja,抄写员)和会计，几位高层政治人物(包括帕夏)，宗教人士(包括卡迪或地方官)，主要还有各级军人，共同执行许多任务。最后，马赫增还须从本地居民中征募辅助人员：军人如卡比尔人，或为土耳其人服务的当地骑手；文职人员如阿拉伯语抄写员、各种顾问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和“拉扎姆”(lazzām,税款包收人)。

在其他方面，社会仍受当地本来机构的管理，但又不时受新主人的干预。例如，当地村社依然存在，村民仍旧服从谢赫(选举产生的头领)的指挥，遵守自己的“乌尔夫”(ʿurf,习惯)。宗教机构也依然存在，它们照旧执行司法(和平受到严重干扰或牵涉到土耳其人时除外)，继续负责公众的礼拜、教育和慈善工作。

新的奥斯曼人组织，虽然还很脆弱和不够完善，但仍给马格里布带来了它所最需要的东西——适应现代世界的手段。它引进了一支使用火器而又训练有素的军队、一个相对集中的行政组织以及武装劫掠商船以获得在地中海通用的钱币。新政权一般为城市所接受，因为城市直接面对基督教徒的袭击，在农村恢复自治之后有窒息的危险。它同样也为教士们所接受，特别是“乌里玛”，因为他们赞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最后，还有一些人，包括重要的城市居民、农村的头面人物和整个马赫增(团体)纷纷为其工作。他们这样做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自行选择和因袭传统。与土耳其人对立的全部是从11世纪初就享受到自由的农村居民，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和作战组织，而新主人对他们仅意味着严厉的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土耳其人必须进行长期战争以征服远离城镇的有利地区，并在那里建立“马哈拉”(mahʾalla,武装营地)，通过这些营地向居民征税，保持最低限度的秩序。他们也变得善于利用“萨夫”(saff,复数为sufuf,联盟)挑拨离间，从中取利。假如不能单靠武装力量来控制地区的权力，那么外交手腕就和高压统治一样的重要。

17世纪的马格里布：寻求平衡

奥斯曼人的这段插曲在17世纪马格里布社会只引起了很小的变化，马格里布逐渐从16世纪的危机中复苏。马格里布的一些沿海城市，或许还有它的定居人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发展。然而它对时疫、饥荒和内战的严重危机仍很敏感，这些灾难依然不时在威胁着它。土耳其人统治阶级这时已经历了某些内部变化，一些新成员加入进来，或多或少已在马格里布扎下了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利益、眼界和特征方面出现分歧，对立派别之间长期和复杂的敌对状态在整个17世纪更加严重。外交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与

母亲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以及与北非伊斯兰教诸国的关系，这些国家掠捕商船，1600 至 1650 年是其黄金时代。各摄政国因其不同路线的政治发展，使分歧进一步扩大。

17 世纪奥斯曼人的马格里布社会

奥斯曼人统治的北非包括如下几个社会经济群体：城市，市郊农民，一年有一至三个月季节性迁徙的半定居农民，远离故土(watan,瓦坛)的游牧牧羊人，沙漠深处的游牧养驼人和绿洲定居者。主要的城市阶层包括显要的教士和商人、工人、"库卢格利"（kulughli，与当地人联姻的奥斯曼人移民的富裕后代)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民政官员。

农村居民均隶属于各"卡比拉",[10]即同属一个父系血统的村社。家系图可以证明各较 241 小群体为何和如何委托选举出的谢赫进行管理，若干较小卡比拉的头领组成非正式的议事会协助谢赫工作。在卡比拉之上有"萨夫"——卡比拉之间结成的联盟。这些都是出现于单一生态区或由不同生态和不同经济领域结成的群体(如放牧骆驼者、放牧羊群者、半定居农民和城市集团)中的固定不变的联合。某些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在长时期中逐渐产生了权力集中的领导，如图阿雷格大公国(阿门诺卡尔 amenokal 领导的群体)。某些卡比拉是通过参加共同神庙或忠实于共同的"图卢克"（turuḳ,兄弟会)联合起来的。

因此，历史学家不应将农民看做是在反对或屈从奥斯曼人问题上反复无常的大小集团的混合体。相反，这些农民是生态变化和"萨夫"组合变动的有机体，各集团是反抗还是合作由萨夫支配。萨夫的存在同时意味着一种政治关系的体制在对马格里布的大部分地区起着作用。都市政治仅是这一更大范围之内的很小部分。与马赫增相结盟或受其统治的一些大的集团与"西巴"（sība,异己分子集团)相对立。

领土不断稳定，骚乱随之减少——至少在马格里布水源充足的地区，以及新近得到加强的马赫增和萨夫体制，使 17 世纪与前几个世纪有了明显的区别。

虽然大部分乡村说阿拉伯语，但仍保留着大量说柏柏尔语的村社，往往仍属于伊巴迪特教派。他们占据了一些隐蔽地区，如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奈富塞山、欧拉斯(奥雷斯)、马格里布中部的大卡比利亚等山区和阿特拉及里夫西部的山区。柏柏尔人村社不同于阿拉伯人村社，他们继续与奥斯曼人对抗，而且取得成功。他们将这归功于其躲避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精心设计的防御体系。他们的有效抵抗使其得以保持各种不同形式的柏柏尔文化。柏柏尔人村社对奥斯曼人新政权依然持不信任态度。他们始终保持柏柏尔人的特点，而且大都保持了自治地位，例如，他们都拒不缴税。当他们无力保持自治时，便开始阿拉伯化了。然而，某些人口过剩的柏柏尔人地区，如卡比利亚，变成了为阿尔及尔或突尼斯征募正规军(著名的兹瓦瓦军)的地区，或许还是提供季节性佣工和乡村货郎的中心(19 世纪的劳动力迁移无疑在那之前就已存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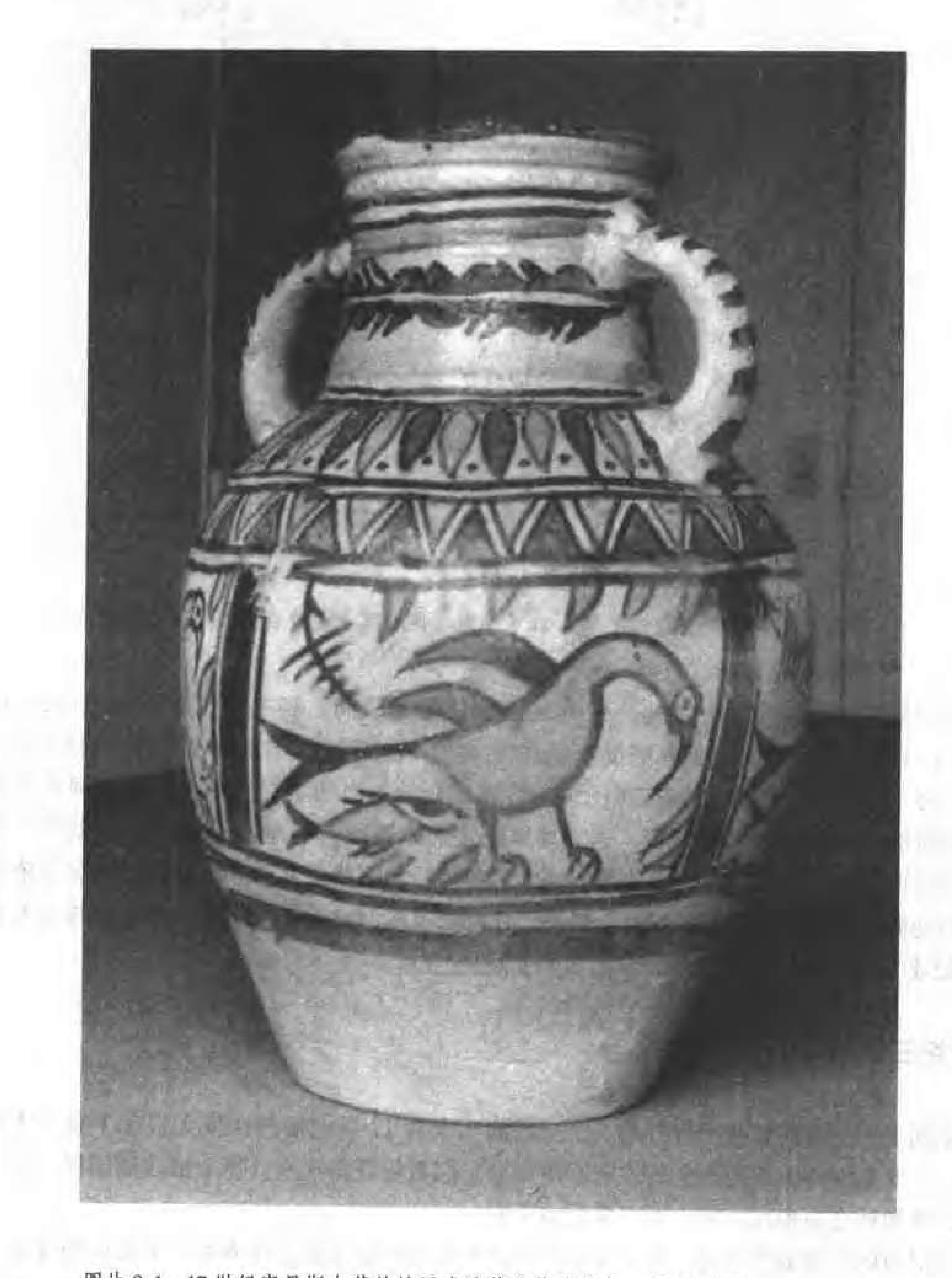
[10] "卡比拉"（ḳabīla,复数为ḳabā'il)："维持父系亲属关系的大群体，其成员自称是'同一祖先的子孙'，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一片放牧区'"（《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第 4 卷，第 334-335 页）。在《非洲通史》中该词的复数写作 ḳabīlas。

242 农村地区(例如,突尼斯的萨赫勒)、南方的绿洲、受城市控制的产麦区(突尼斯的汉希尔(hanshīr)和阿尔及利亚的赫奥什(h'aoush,地区)和城镇的平坦地区(如阿尔及尔的萨赫勒和的黎波里的曼希亚)存在着与山区完全不同的社会。其成员过着定居生活。他们与外界有一定的贸易联系,有得到确认或有明确规定的"米尔克"(milk,土地所有权),并受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一切使人觉得那里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心态和举止更接近于城镇居民,而不是贝都因人。无所不在的父系亲属关系总是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同时存在,如在大范围的谷物生产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卡马"(khammā,伍一分成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些专门行业,包括各种手艺人和宗教及行政管理人员,城市的价值观,如对权力的服从,比在山区容易传播,主要是宗教法规的成文法影响力也比较大。一些明显是结构上的特性肯定在17世纪(18世纪更甚)得到加强,同时,安全方面也有适度而真正的进步,城市社会得到巩固,其影响有所扩大。最后,与欧洲商业国家建立了关系。这些关系必然会刺激谷物输出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特别是靠伍一分成的农民种植谷物的大庄园。

绿洲远离大海和中央政权,同时维护着黑非洲和东方的长途贸易。绿洲中的社会团结统一,产生出地位稳固的寡头统治或地方王朝,如费赞的法希斯王朝。

城市的声望虽不及阿拉伯人或东部穆斯林城市高,然而这些城市使整个马格里布都感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其中包括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都市,也包括如凯鲁丁、君士坦丁和特莱姆森等以前的殖民城市。有悠久历史传统或受新发现激发的贸易和各种手工业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呈现出新的活力。例如突尼斯的红毛线织的无边帽(Chechia)行业,是1609年以后被赶出西班牙的穆斯林或摩尔人发展起来的,再如精美的纺织行业在马格里布许多城镇开始兴盛。贸易,特别是在沿海城镇,起先是靠在海上捕掠商船获得各种货品和金钱,后来,从17世纪后期开始由于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商业建立了联系而得到发展的"伊尔姆"('Ilm,宗教知识)在16世纪的危机之后渐渐复兴,原因在于城市的物质条件比较繁荣,"瓦克夫"(wakf,宗教基金)数量随之增加。这一复兴也受到新的土耳其当局的鼓励,他们首先保护属于本宗教习俗的哈乃斐教派的学者,但也保护当地原来的马立克教派,其中世俗原因可能大于宗教原因(因为他们希望使他们这外来的而且主要是军人的政权合法化)。

244 在政治和社会等级制度中处于顶端的是统治阶级。从理论上讲,统治阶级虽然单纯由土耳其军人组成,但也可包括其他人。首先是对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开放,无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一律被称为土耳其人,如弗朗西斯、英格里兹、库尔苏(科西嘉人)、萨尔杜(撒丁人)或其他一些难以称为源于突雷尼语族的名字。或许17世纪上半叶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因为此时他们引进了欧洲的现代技术,特别是军事和航海技术。他们(尤其是一些海盗船船长)不仅在这些方面,而且也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起着积极的作用(有些人甚至担任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德伊"的高位,即土耳其军队最高首领)。在这两个摄政国,土耳其人很快将先前自己的职位和特权给了他们与当地妇女所生的孩子(库卢格利,他们将其看做是土耳其人)。阿尔及尔的土耳其人是排外主义者,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引发了库卢格利人的激烈反抗,后被镇压下去,大约在1630至1680年间,出现了对他们的总排斥。



图片9.1 17世纪突尼斯卡莱林地区盛油等液体的陶瓶，高45公分



图片 9.2 突尼斯制造的埃及式 11 弦琵琶，卵形琴盘由胶合木料制成，上嵌珠母，高 81 公分

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某些当地人逐渐被任命为顾问、秘书、税款包收人(ḳa'ids-lazzām)，甚至担任在当地征募辅助军队的指挥官，在阿尔及尔则不得任用当地居民。总之，在 17 世纪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统治阶级已开始与当地上层人物交往，而阿尔及尔的统治阶级却仍保持外来者身份。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当地名流的力量相对强大。突尼斯的上层人士由于历史传统和他们的各种活动而坚强有力。的黎波里的名流依仗大规模的撒哈拉贸易也有很大势力。然而，在阿尔及尔，这一新城几乎完全是土耳其人在 16 世纪建立起来的，那里的社会名流尚未立足。

245

17 世纪三摄政国的政治制度

原则上作为奥斯曼帝国行省的三个摄政制国家从 17 世纪初已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母亲城，主要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软弱不是因为它们希望获得独立。每个摄政制国家由于其统治阶级和社会的构成不同，所以发展也不同。

突尼斯的发展最为迅速。地区军队的高级军官虽很快在迪万中剥夺了突尼斯帕夏的一切实权，但仍被当做对奥斯曼效忠的象征保留下来。然而，到了 1591 年，这些高级军官不得不将他们在迪万中的位置让给土耳其近卫军的代表，由此建立的军事民主并没有维持多久。到了 1598 年，土耳其人唯一首领德伊(军队司令)建立起独裁政权，企图平衡土耳其特权阶级和本地显贵的利益。大约在 1630 年，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当权者，即地方军队的“贝伊”即司令。一位叫穆拉德的热那亚马木路克(mamlūk，获解放者)担任此职，他

不惜损害大联盟的利益去征服内地，直至后来独立。这位贝伊依靠国内资源和由他支配的民军——部分为土耳其人，部分为本地人，通过与当地显贵结盟，逐渐巩固了地位，从而将权力集中在他的家族(穆拉德王朝)手中。他采取一种真正的君主统治政策，与国家的传统以及当地显贵的利益相协调。最后，他战胜了对手德伊，主要是在 1673 年的武装冲突中。但是穆拉德王朝的胜利维持时间很短。由于 17 世纪末出现危机，实现统一最有效的工具——土耳其民军日益衰弱，敌对的贝伊们自相残杀，阿尔及尔要阴谋进行干预，最后，民军一名高级军官亲土耳其人的反应，终于使这半国家性质的君主制初次实验在 1702 年告终。

在的黎波里虽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但时间稍微延后一些。1603-1604 年同样任命了一位德伊，大约在 1630-1672 年间也采取了类似于突尼斯穆拉德王朝的那种政策。那里的贝伊是杰出的，特别是在穆拉德·马尔蒂(1679-1686 年)时代，而在库卢格利贝伊艾哈迈德·卡拉曼利于 1711 年取得最后胜利时达到高潮。然而，向着更适合于国家君主政体迈进的这一步在的黎波里受到各种因素的抵制或阻碍。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试图在该国恢复实权而不合时宜地横加干预(约 1610 和 1689 年)；贝都因人联盟(马哈米德人、塔尔胡纳人等联盟)享有无限权力，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的统治当局由于无法摧毁它们而不得不小心对待；东部省份班加西和南部省份费赞一再失而复得实行自治；最后则是本国资源贫乏。真正的权力取决于土耳其人与市民势力(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商队贸易和手工业已十分强大)、海上利益与陆地利益、城镇与大卡比拉以及中央与各省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之中存在着权力的不稳定。 **246**

阿尔及尔当局维护它作为土耳其一个军事省份的原有性质的时间最长。当地的帕夏将某些特权一直保留到 1659 年，此后“阿加”(āgha,民军的高级军官)迪万夺取了权力。但为时不长，因为一个先是代表海盗船长后又代表土耳其近卫军的德伊于 1671 年夺取了权力。然而，他的权力并不稳固，他必须面对军人的情绪、部族的各种冲突和当时形势下的种种意外。从 1671 年到 1710 年，不少于 11 位德伊担任过这一最高职位。他们大都被谋反的土耳其近卫军推翻或杀死。阿尔及尔政权因此可说是一个军事政权，该政权虽在 17 世纪变得比较民主，但只是对土耳其人特权阶级有利，因为当时还没有像突尼斯甚至的黎波里一样代表当地市民势力能影响政治制度的强大集团。然而，甚至阿尔及尔当局也将其权力集中在德伊身上，虽然他们直到 18 世纪后期才开始真正压倒土耳其特权阶级的平等主义或贵族倾向。

摄政政权，不管是否排斥当地领导人，全都是亲伊斯坦布尔的。他们对待当地社区的政策极为严厉。该政策主要是以使用军队为基础，目的在于对臣民施加压力，逼其发挥作用，或进行反抗。但是从 17 世纪起统治阶级开始利用某些地方力量——联盟集团或农村头人——来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至少在突尼斯是如此。但总的说来，对抗关系随处可见。因此始终存在贝都因人反抗的动向，他们对任何觊觎王位者都给以明显自发的支持，而马格里布政权一直不稳定。

因此他们若要生存，更不用说要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只有依靠外部财力。

247 外部收入：掠捕商船和贸易

某些有关殖民地的历史研究错误地将马格里布的近代史等同于海盗行为的掠捕商船史。但是掠捕商船不同于海盗行为，尤如陆地战争不同于盗匪活动一样，只关系到马格里布很小一部分人，而在17世纪下半叶他们必须与强大的欧洲大国及其同盟者的商业利益作斗争。那么掠捕商船的行为和这种贸易的真正地位究竟是什么呢？

17世纪马格里布掠捕商船的活动

掠捕商船的活动是16世纪奥斯曼人抗击基督教敌人的伟大斗争的遗产。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在地中海订立和约之后，西部几个奥斯曼行省获得了行动自由，掠捕商船便成为土耳其人在马格里布摄政的特权。马格里布诸国及其国内显贵都继续组织掠捕商船的活动或加以严密控制。掠捕活动须遵守一定规则，即使在行动中常常由于贸然行事和暴力行为而发生违规的情况。掠捕商船这种活动主要是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或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为个人利益所为，始终由奥斯曼人统治阶级的某个派系所垄断。造船使用的许多材料和大部分技术都来自外界。因此，尽管掠捕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利润，并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但在马格里布的生活中，即使不是无法相容，也始终是一种次要活动。它的目标和意图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圣战，有助于使土耳其人的征服和摄政的权力合法化，可从奴隶赎金和捕获的基督教徒的船只中取得巨大的利润；对于参与掠捕的船员和海盗、分享其巨额利润的国家以及与这一特殊交易间接有关的海盗船港口的全体居民都是一项极为有利可图的活动；最后，还会使从事这项活动的国家由于可能对欧洲列强的贸易造成损失而提心吊胆。

掠捕活动的重要性由于时期不同而明显不同。它作为各摄政国的一支独立力量大约始于16世纪80年代。随着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地中海地区的繁荣，这一活动获得很大利益。毫无疑问，由于17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的战争，掠捕商船的活动达到了顶峰。诸摄政国(在荷、英等国出于私利的帮助之下)采用巡视船和伯松艇改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得以建立起强大的舰队。大约在1610-1630年间、估计阿尔及尔拥有约80艘船，突尼斯拥有30至40艘各种规模的战船。[1] 17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各国舰队火力的增强和几个基督教大248 国商业的发展，马格里布的掠捕活动日趋衰落。从17世纪80年代起，法国和英国强迫各摄政国尊重它们的船只和贸易，因此掠捕活动只能以一些基督教小国为对象，而且还要经大249 国的暗中同意或私下鼓励，因为这些大国将此看做消除运气欠佳的对手，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竞争的手段。从此以后，马格里布的掠捕船只有在诸如欧洲国家发生战争(特别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那些战争)的特殊情况下才能重新获得行动自由——而且也是暂时的。

---

① P. 格朗尚(Grandchamp)，1937年。



图片 9.3 阿尔及尔城市与港口风光，18 世纪法国版画家 F.A. 阿韦林制作



图片 9.4 的黎波里城市与港口风光，18 世纪法国版画家 F.A. 阿韦林制作

17 世纪欧洲与马格里布贸易的发展

现在来探讨发生掠捕活动的这一世纪中的贸易发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实上掠捕商船的活动从未完全阻止和平交往，况且，这一活动在 17 世纪下半叶已开始逐渐消亡。这一变化首先似乎应归功于欧洲大国的影响，那里重商主义已占上风，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马格里布的权力当局。这些国家，就其本身而言，分成军事派（在阿尔及尔占优势）和平民派，平民派赞成开展贸易，他们主要在突尼斯胜过他们的对手（在

17世纪的后30年)。与欧洲的贸易联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得以加强，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且对新的贸易伙伴有利。

传统的转口贸易已大大衰落，但有些转口贸易例外：如经由的黎波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路线(金属和盐等欧洲货物在这里换取金沙、奴隶、驼鸟毛和番泻叶)和经由阿尔及利亚及突尼斯的绿洲、的黎波里和埃及的摩洛哥南方至麦加之间历史悠久和浩浩荡荡的朝圣商队。除此之外，就是海上贸易，欧洲国家由于他们在数量和价格上均占有优势，所以都加强海上贸易。



图片9.5　17世纪后期或18世纪阿尔及利亚的绣花头巾，用麦斯林纱、自然丝和金银线织成。长302公分

至于出口货物，马格里布农村的产品输往欧洲的数量比以往更多，特别是谷物，西欧南方各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和弥补财政不足，马格里布诸国一直将重担压在农产品的贸易上，采用的办法是，征收某些农产品，如谷物；将收购某些农产品的合同转让给税款包收人(典型的例子是皮革的收购和输出，里窝那犹太人于17世纪末在突尼斯对此获得了垄断权)；对农产品的输出课以重税。出口许可证(teskere)是最常用的一种征税形式。主要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口如突尼斯产的红毛线帽的手工产品、精美的纺织品和经过加工的皮革等则居次要地位。

至于进口货物，除了照例专供少数名流所用的奢侈品以外，还包括用以控制内地的武器(尽管有官方禁令)、货币、纸张以及当地匠人所用的某些物品(供织红毛毯用的羊毛和染料，它们在17世纪末基本上是突尼斯有价值的主要进口品)。

250

毫无疑问，这种贸易关系的受益者是欧洲各国及其商人以及靠了他们的首创精神建立起这纽带的运输业者。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海军大远征，其目的是减少海上的掠捕活动，使欧洲贸易更加便利，同时保证基督教臣民的安全，降低进口税率(对英国后对法国降至3%)以及允许对某一国家的货物规定特定税金和特定条件。这就是不平等条约政策的开始。

251

奇怪的是，这些条约大都被马格里布当局所接受，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对欧洲军事力量的恐惧，而且也是出于私利，因为他们除了可以获得欧洲产品和用以控制内地的武器外，还可以从海上贸易中取得可观的收益。此外，少数社会集团也从中受益。他们包括与欧洲贸易有关的税款包收人(如经营皮革的里窝那犹太人)、零售商、依靠基督教徒获得原料和销售成品(欧洲人负责将其运往地中海东部诸国及某些岛屿)的红地毯编织者，可能还有某些物品的生产者(如突尼斯萨赫勒地区的橄榄

种植者和种植谷物的大庄园主）。

17 世纪末所出现的种种倾向到了 18 世纪仍然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加强。

18 世纪：成就抑或暂息

历史学家历来把奥斯曼人统治的 18 世纪看做是危机或加速衰落的时期。这一说法对于摄政国家或西部的桑贾克来说，真实性究竟如何？

18 世纪的马格里布社会

与 17 世纪不同，马格里布在 18 世纪没有经历任何重大变化。生产资料、社会结构、各种制度、行为规范和生活习惯全都未变。然而，仍能看到某些进步，即使仅局限于某些地区或某些集团，例如一些大庄园扩大种植谷物，安达卢西亚人居民点首先引种的珍贵的仙人果种植面积向外大大扩展。虽然存在着许多有利的迹象，但对生产手段或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还很不够。

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特性（如父系社会和分立的社群）和新近才有的某些特点（如输入的统治阶级和城镇中的民族等级制）全部保留下来。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公益事业或随着与欧洲贸易的增长而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当地某些上层家族的地位得到巩固，如村社首领、某些宗教机构（如扎维亚和以掌权者而闻名并受到尊敬的兄弟会）、省政府行政部门或包括各种可出租职位在内的可购买职位的部门。众所周知，在阿尔及利亚贝



图片 9.6　18 世纪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亚（阿基尔-阿里的卡比拉）的婚礼箱，用雪松木、黄铜和铁制成，长 198 公分

伊领地存在着库卢格利家族地位上升的情况，如君士坦丁的古尔利和奥兰的布-什拉吉姆。在巴克和布什纳克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家族也很有名，他们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阿尔及利亚与欧洲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突尼斯，大规模的“利兹玛”（lizma,各省和252 海关等的包出税收)使某些家族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巴努阿亚德和贾卢利等家族后来给国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人才。这些家族和名气稍小的一些家族给突尼斯国带来很大的稳定，超过其他地方。

18世纪的突尼斯国

18世纪，突尼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其平原面向大海)和历史上的原因(城市上层人物有权有势及悠久的君主制传统)是马格里布最稳固和最为一体化的国家。

然而，突尼斯仍是一个受伊斯坦布尔指派的总督(veli)控制的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土耳其人特权阶级始终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居支配地位，政权始终依靠土耳其近卫军维持，用铁腕统治广大居民。但是，土耳其人的统治权因为突尼斯的贝伊享有充分的自治而日益民族化。奥斯曼人统治阶级也包括库卢格利(土耳其人与当地妇女的混血后代)在内，他们已253 完全与当地的社会融合，越来越容易受当地显贵的影响。土耳其近卫军仅限于起军事作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而同时，其军事影响已被国内其他部队，如“阿瓦瓦”（awāwa)、“阿拉伯人”非正规骑兵(spahi)和山地骑兵等部队所抵消。最后，军队政策的作用由于贝伊的实际行动而受到削弱，贝伊们都和当地上层人士，特别是宗教领袖订立联盟，而且以各种手段和各种有利条件将其争取到王朝一边。因此，18世纪的突尼斯政权是双重性的，这可以从它的起源(外国的军事征服)和它逐渐适应于当地的上层社会来解释。这一双重性很容易解释该政权的困难和后来在18世纪的成功。

一个名为侯赛因·阿里的库卢格利于1705年趁阿尔及尔的土耳其军队入侵突尼斯农村之际自立为贝伊，并率军抵抗入侵者。后来他利用取得的胜利消除异己，并建立了一个为时甚久的半君主制政权。他将土耳其人限制在单纯执行军事任务范围以内，并使他们的代表帕夏和德伊只是一种名誉的称号(尽管这是使奥斯曼人的统治权具有形式所必需)，从而赢得了库卢格利、安达卢西亚人和当地显贵的支持，并实现了相对先进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可以用低价购买各种农产品(mushtarā)，其中有些出售给欧洲商人。“这位贝伊对贸易的控制如此之牢，以致可以说他是国家的唯一的经销商”，法国驻突尼斯领事圣热尔韦大约于1730年不无夸张地这样写道[12]。

但是，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企图实行中央集权，但农村社会则主要是分散性的；一方面将土耳其人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但仍处于奥斯曼一个省的摄政地位；一方面是维持生计的经济，但贝伊辖区却卷入扩大的贸易之中。到了1728年，贝伊的侄子阿里·巴沙反叛。国家很快分裂成追随贝伊侄子的巴沙派和忠于在位贝伊的胡萨尼亚或侯赛因派。这场危机一直延续到1762年。阿里·巴沙一方先取胜(1735-1756年)，后来侯赛因·阿里的儿子

[12] 圣热尔韦(de Saint-Gervais)，1736年。

们赢得胜利。阿尔及尔部队侵入突尼斯，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又支持另一派，特别是在1735和1756年，不时有人造反直到1762年。

从那时起至1815年后，在阿里贝伊(1759-1782年)和哈马迪帕夏摄政时期又恢复了和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尽管从1784至1785年发生了严重的瘟疫，1777至1778年以及1804年又发生饥荒，这些灾难似乎仅仅是使国家财力与人口数量之间重新达到一种并不稳定的平衡。来自外界的收入明显增加，原因在于到大约1790年为止，与欧洲的贸易



图片9.7　18世纪突尼斯卡莱林地区的陶瓷嵌板，用于内室墙壁装饰，高151公分

往来得到了加强，在拿破仑战争(1792-1814年)期间欧洲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最后，海255 盗利用这些战争大力恢复他们的活动。这使国家有可能减轻税收或至少不再加重负担，从而缓解了政治矛盾。此外，贝伊奉行与显贵结盟的政策，无论他们观点如何。从1762年起至1815年，未出现重大动乱，贝伊在突尼斯(1784-1992年)、的黎波里(1793-1794年)和主要在阿尔及尔(1807)的外交胜利是他成功的证明。于1756年建立的阿尔及尔对突尼斯的统治由于这一军事胜利而告终。

突尼斯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享有的均势和成功在1815年以后随着欧洲人在新形势下再度实行扩张而结束，这给欧洲以外的所有各国带来了不利。预示殖民帝国主义的新纪元从此开始。

18世纪的阿尔及尔摄政国

如前所述，阿尔及尔摄政国保留外来军政统治的时间比马格里布其他两摄政国长，但依然经历了某些变化。

掠捕商船的活动虽已大大减少，但有选择地针对某些基督教国家，如西班牙的掠捕依然存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意大利半岛某些国家，如威尼斯，都愿向阿尔及尔贡献钱财以保障他们商船的安全。尽管有掠捕商船之事，但与法英等商业大国的贸易却依然在发展。这些国家对收购谷物特别感兴趣，先是从东面收购，经由靠近安纳巴位于拉凯勒的



图片 9.8 19世纪法国平版画中所描绘的君士坦丁城

“法国防御据点”地区收购，后来由从西面收购经由阿尔泽，在1792年它被该摄政国收复之后改由奥兰收购。

收入的另一个外部来源是对邻国的战争，这为阿尔及尔的统治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突出的是，在1735和1756年为支持觊觎王位者而干预突尼斯的行动使之获得了大量掠夺物，而且突尼斯从1756年至约1807年暗中缴纳贡奉。

在国内，各种税收仍按传统方式继续由武装远征队(mah'alla)强行征收。这些税赋都是为了土耳其人排外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征收的。库卢格利，即土耳其人与当地妇女所生的混血后代，被排斥在军界和高层官员之外，这项政策始终遭到反对。发生了无数次卡比尔人的暴动，包括1767-1771年的那一次，其结果不得不大大减轻税收。尤为严重的是由宗教兄弟会领导的奥兰的民众起义以及19世纪初由了解民众反土耳其人情绪的当地封建领主领导的君士坦丁起义。君士坦丁起义表明，只要土耳其近卫军表示出软弱的迹象，当地头人们的势力就会复活。

土耳其近卫军的腐败实际上并不像突尼斯和的黎波里那样是一场悲剧，在阿尔及尔则 256 是久已预料到的。从17世纪后期起，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已为唯一的首领即德伊所独占。到了18世纪德伊日益得到少数土耳其显要的支持，他就是从这些人中被挑造出来的。这



图片9.9 18世纪阿尔及利亚的锥形银头饰，高15公分

样，对于土耳其近卫军和奥斯曼人“拉伊斯”(ra'is)来说十分珍贵的军队民主渐渐受到腐蚀。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于是变得更加巩固和有效。从1671至1710年取得权力的十一位德伊中，只有一位一直在位直到他寿终正寝，而从1710至1789年登上高位的九位德伊有七位均为自然亡故。穆罕默德·奥斯曼的统治尤其长(1766-1791年)，给阿尔及利亚国带来真正的稳定。

在外省变化尤为明显，因为君士坦丁、提泰里和西边的几位贝伊，连同少数听从他们支配的土耳其近卫军，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当地的显要和首领。甚至出现了混血的库卢格利贝伊，他们和当地一些名门贵族(君士坦丁的基利家族和西部的布-什拉吉姆家族或穆罕默德·奥斯曼·卡比尔家族)有血缘关系。总而言之，各省的贝伊都较好地融合于当地农村，比在阿尔及尔更平民化，由此更清楚地显示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也在沿着与突尼斯甚至与的黎波里相同的路线变化。

257

这些变化在国都姗姗来迟。德伊阿里·科贾于1817年末在库卢格利和兹瓦瓦人的支持下，大批消灭土耳其近卫军及其残余力量，从而永远消除了土耳其人的军事作用，这与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上一世纪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此时本来可以期望阿尔及利亚的政权更加迅速地实现民族化，但1830年法国的军事征服却使之完全停止，也许这一民族化进程开始得太迟，而且条件不利，因为广大居民与其领导者之间的分歧已成事实。

258

18世纪的黎波里的摄政

18世纪初，与突尼斯一样，1711年，一名叫艾哈迈德·卡拉曼利的库卢格利军官在的黎波里夺取了权力并建立了一个贝伊王朝，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835年。该家族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艾哈迈德(1711-1745年)、阿里(1754-1793年)和尤素福(1794-1832年)长时间的统治。其次，在库卢格利与城市大家族之间存在着多种联盟。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贝伊辖区来自外部的收入增加。这些收入中包括掠捕商船的收入，掠捕活动在1711年之后曾一度复活，后来从1794-1805年又再次兴起。直接收入是捕获的船只和俘虏的赎金，间接收入则包括欧洲许多国家为保障其商船的安全而缴纳的贡奉。此外还包括由的黎波里多次远征才得以控制的费赞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远途商贸的收入以及与里窝那和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进行的地中海贸易的收入。地中海贸易可能对的黎波里一些城镇贸易集团的势力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犹太人殖民地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黎波里摄政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许多严重困难。第一，曾发生多次自然灾害，其中包括1767-1768年的饥馑和1785年的严重瘟疫。国家的财力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在国家的高需求(因为它已生活在现代世界之中)与居民所能作出的微薄贡献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

第二，绝大多数居民都已参加到了其成员动摇不定的两大联盟之中。奥斯曼人如果得不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持是很难实行其统治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持续不断，而的黎波里统治者的对立面往往被打上叛逆的烙印。一旦觊觎王位的敌手在相互对抗的联盟中得到支持，内战便会立即爆发，1791-1793年的内战便是如此，它使卡拉曼利家族中的各派成员

互相对立。

第三，伊斯坦布尔不放弃它想在奥斯曼统治的马格里布地区中的薄弱部分——的黎波里获得实权的意图。例如，1793年，一个名为阿里·布尔古尔的土耳其军官，乘一次内战之机来到的黎波里，将卡拉曼利族人驱逐了出去。他对突尼斯境内的杰尔巴采用同一手法，但遭到突尼斯贝伊的反击。贝伊将他赶出的黎波里并于1794年卡拉曼利家族将相争的成员之一恢复为贝伊。在尤素福·卡拉曼利的统治下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他成功地阻止了美利坚合众国于早期想要推翻他的一次图谋。但是后来他被迫接受英、法提出的禁止掠捕商船和保护货币的条约，由此而失去了巨大的财源，这是跨越撒哈拉的商贸活动所无法补偿的。



图片 9.10 利比亚的撒哈拉城市古达米斯一条街道的部分街景



图片 9.11 利比亚古达米斯旧城一幢住宅的起居室内部装饰

高税收招致了乡村的强烈反对，生活水准的下降引起的黎波里的不满。王朝终于失
259 去了信任。此外，尤素福还对于他与奈富塞山人民和苏尔特及费赞的奥拉德·苏莱曼人领导的萨夫的关系做了错误的估计，因此失去了他在农村的权力基地。对法英两国驻的黎波里
260 领事势力的扩大也出现了不满，因他们在的黎波里干预利比亚人的事务。

因此当1835年5月一支奥斯曼军队在的黎波里登陆时受到了热情接待，土耳其政府再次对利比亚进行直接控制。

该摄政国的最后难题是基督教徒要求减少掠捕商船的活动并将对他们有利的贸易条件强加于的黎波里。打击掠捕商船活动的最著名战争是从1801-1805年由美利坚合众国发动的，当时它刚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然而，战争以相互妥协而结束。但1815年以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那时欧洲人已能单方面将他们的条件强加于的黎波里。他们消灭了掠捕商船活动并使该国按他们的条件向他们的贸易开放。他们后来以各种理由，甚至毫无理由要求的黎波里政府给与赔偿：法国于1830年要求支付80万法郎，理由是他们的领事受到了侮辱，英国则要求支付不少于20万皮阿斯特的赔偿，理由是其领事的儿子受到了侮辱。由于国家财源枯竭，的黎波里已完全瘫痪。再加上它无力平定种种叛乱，的黎波里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可怜牺牲品，奥斯曼人于1835年在那里重新恢复了长期的统治。

结　论

马格里布地区在16世纪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不能适应火器、权力集中的君主制和富足的美洲这一时代。奥斯曼人提供给中部和东部马格里布诸国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建立现代的军事和行政管理制度，保证对外防御以及为集体生存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内部秩序。但是，奥斯曼人在行使这些职责时却对其臣民实行铁腕统治，只要有可能，就不顾一切地剥削他们的资源，从而导致当地社会停滞不前。这样，奥斯曼统治的马格里布使国家与现代的居支配地位和实行剥削的统治阶级相重叠，尽管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之间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有着程度上的不同。

“西方奥贾克”从伊斯坦布尔(始终没有放弃对母亲城官方的效忠)迅速获得独立的同时，逐渐分离成为具有对抗性的独立国家。1600与1800年期间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两个政权之间发生了十次战争。17与18世纪各国沿着不同的路线(或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奥斯曼人统治阶级已开始容纳库卢格利和当地显贵，但阿尔及尔
261 的奥斯曼人却仍然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因此，当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在18世纪出现半民族化的君主制度时，阿尔及尔仍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受征服与外来影响巨大的政权的支配之下。尽管如此，在阿尔及利亚摄政国已能感觉到上层统治者与当地居民日益结合以及君主体制更加集中的总的趋向。但这一情况首先出现在外省，从1817年起才在首都见到。三个摄政国的这种独自和彼此不同的发展(后来因其殖民地环境的差异而进一步强化)决定了马格里布至今仍分为几个单独的国家。

奥斯曼马格里布的历史也是由它与基督教欧洲的关系所决定的。欧洲是提供给马格里布诸国及其统治阶级对当地民众实施霸权所需的许多现代化工具的来源，如：火器和现代

化军队、纸张、货币、贵重金属，最后是带来了新技术和新观念的人。因此欧洲对于马格里布的统治阶级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战争关系(掠捕商船活动)，这种关系最初由奥斯曼军队主要为其自身利益建立。后来开始了主要是商业上的和平关系，这种关系则是由几个商业大国所强加并为统治阶级中的文职人员及地方同盟者自愿接受。这种关系首先有利于欧洲资本主义，其次是对马格里布诸国及其当地伙伴有利——但这只是在1815年以前他们尚能反对他们的欧洲对手，保卫自己的利益和观点时才有这种可能。这一年是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即欧洲排外的统治时期开始的标志。

(吕和声 译)

10 16至18世纪的塞内冈比亚：沃洛夫人、塞雷尔人和“图库洛尔人”的发展

B. 巴里

262

引　言

塞内冈比亚地区包括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流域，处于撒哈拉地区和森林地带之间，距尼日尔河湾有一段距离。15世纪以前，该地区一直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由于葡萄牙人的到来，该地区的大西洋沿岸得以开放，这使塞内冈比亚作为欧洲人进行经济和政治统治渗透的途径及西部苏丹产品的销售路径在政治地缘方面的重要性大为增加。

除了各种不同的地区性特点和该地区人口的多样性之外——该地区有沃洛夫人、富尔贝人、曼德(曼丁卡)人、塞雷尔人、图库洛尔人、乔奥拉(迪奥拉、乔拉)人、纳卢人、巴加人和滕达人，整个塞内冈比亚地区有着共同的命运，这命运与汇集于西非之角、来自苏丹、撒哈拉和森林地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这种一致性自15世纪始由于受到在所有塞内冈比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西洋贸易的影响而得到增强。

从15世纪始，葡萄牙人在黄金、象牙、皮革和奴隶方面进行的贸易将贸易道路从内地转移到海岸地区，而在16世纪，这种贸易加速了乔洛夫邦联的崩溃和丹尼扬克王国在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及卡布(加布)王国在南部河流地区的兴起。

在17世纪，海岸地区被划分为荷兰、法国、英国和葡萄牙各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在发展，在整个18世纪，奴隶贸易一直是大西洋贸易的支柱。大西洋奴隶贸易导致一个暴力时代和好战、专断的“塞多”(ceddo,军阀)制度的产生，如卡约尔和巴奥尔的“达梅尔-廷”(Damel-Teen,统治者)、拉特·苏卡贝·法尔和富塔托罗的“萨蒂吉”(Satigi,统治者)、桑巴·热拉亚·杰吉的统治。面对塞多的暴力，伊斯兰教成了抵御贵族专横统治的唯一堡垒。17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信徒们拿起武器参加了“马拉布特”(Marabout)战争，他们虽然遭受失败，却于18世纪在邦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地区引发了三次革命。穆斯林神权反对塞多制度的斗争成了那个时代深受大西洋贸易之害的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时代特点。

263

葡萄牙人的垄断和16世纪政治地图的重新划分

在非洲的西端，塞内冈比亚是最为明显的向西方开放的非洲海岸地区。这一地区长期

以来是苏丹和撒哈拉的属地，在15世纪由于在该地区进行经营活动的葡萄牙人的到来，开始处于大西洋势力的影响之下。葡萄牙人的黄金、象牙、香料贸易和不久即开始的奴隶贸易使贸易路线转向了大西洋。自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船队对当地商队的最初的胜利，使这一地区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在重新绘制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政治地图方面则更是如此。

葡萄牙人的贸易

塞内冈比亚作为马里的属地，不久之后沿着冈比亚河即被曼德-朱拉(迪奥拉)人所统治，后者通过马里、尼亚尼、尼马米和坎托拉的驿站将尼日尔河湾地区与来自森林地区的柯拉果、铁器和靛蓝的贸易联结在一起。曼德人征服者就这样在冈比亚河以南建立了卡布王国，鉴于锡英和萨卢姆地区的盖洛瓦王朝也源于卡布王国，因此可以说卡布王国以马里的名义统治了塞内冈比亚的所有南部和部分北部地区。①

不过在14世纪，由于1360年苏莱曼曼萨的去世产生的继任人危机使得乔洛夫邦联得以建立，该邦联的统治者恩贾贾安·恩贾埃将其统治扩大到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之间整个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不过，乔洛夫人的霸权很快被削弱，最后在16世纪因考利·汤吉拉率领军队的人侵而瓦解。后者15世纪同大批富尔贝人一起离开了马里的萨赫勒地区，来到富塔贾隆高原居住。1490年，考利或他儿子的众多同伴向北挺进，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建立了富塔托罗的丹尼扬克王朝。在行进的路上，他们削弱了冈比亚一些小国的势力，尽管遇到比法达人的抵抗，仍然彻底打破了塞内冈比亚地区政治力量的平衡。②

丹尼扬克王朝的出现与最先到非洲海岸进行探险活动的欧洲人——葡萄牙人的到来发生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大约于1445年来到阿尔金，他们的目的是将苏丹和塞内冈比亚的贸易转向大西洋，而这种贸易传统上是穿越撒哈拉到达非洲北部。不过，虽然他们努力向内地推进，但是1488年他们想在塞内加尔河畔建立一个城堡的企图却失败了，该河的航行受到费卢瀑布的阻碍，加之马里在冈比亚地区有效的存在，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势力限制在海岸地区。 265

葡萄牙人将佛得角群岛分离出来，又以沿海贸易的方式参与沿海岸和在塞内加尔河及冈比亚河河口地区的贸易活动。他们牢固地在南部河流地区和对塞内冈比亚地区间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的冈比亚地区立足。葡萄牙人从事的黄金、象牙、生皮、香料和奴隶贸易与此地从事的柯拉果、盐、棉布、铁器、靛蓝等古老的地区间贸易交织在一起。更为有利的是，葡萄牙人很快就深入到乌里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那是联接冈比亚，向北通往上塞内加尔，向东通向尼日尔河湾地区商队出发的起点。马里正走向衰落，不得不将其黄金市场转向大西洋。

如今在乌里和坎托拉地区集市上消失了的苏丹地区的黄金贸易在葡萄牙人从事的贸易活动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在使班布克和布雷地区脱离尼日尔河湾地区及撒哈拉地区而成

① Y. 珀森(Person)，1974年a，第7页。

② J. 布莱格(Boulègue)，1968年，第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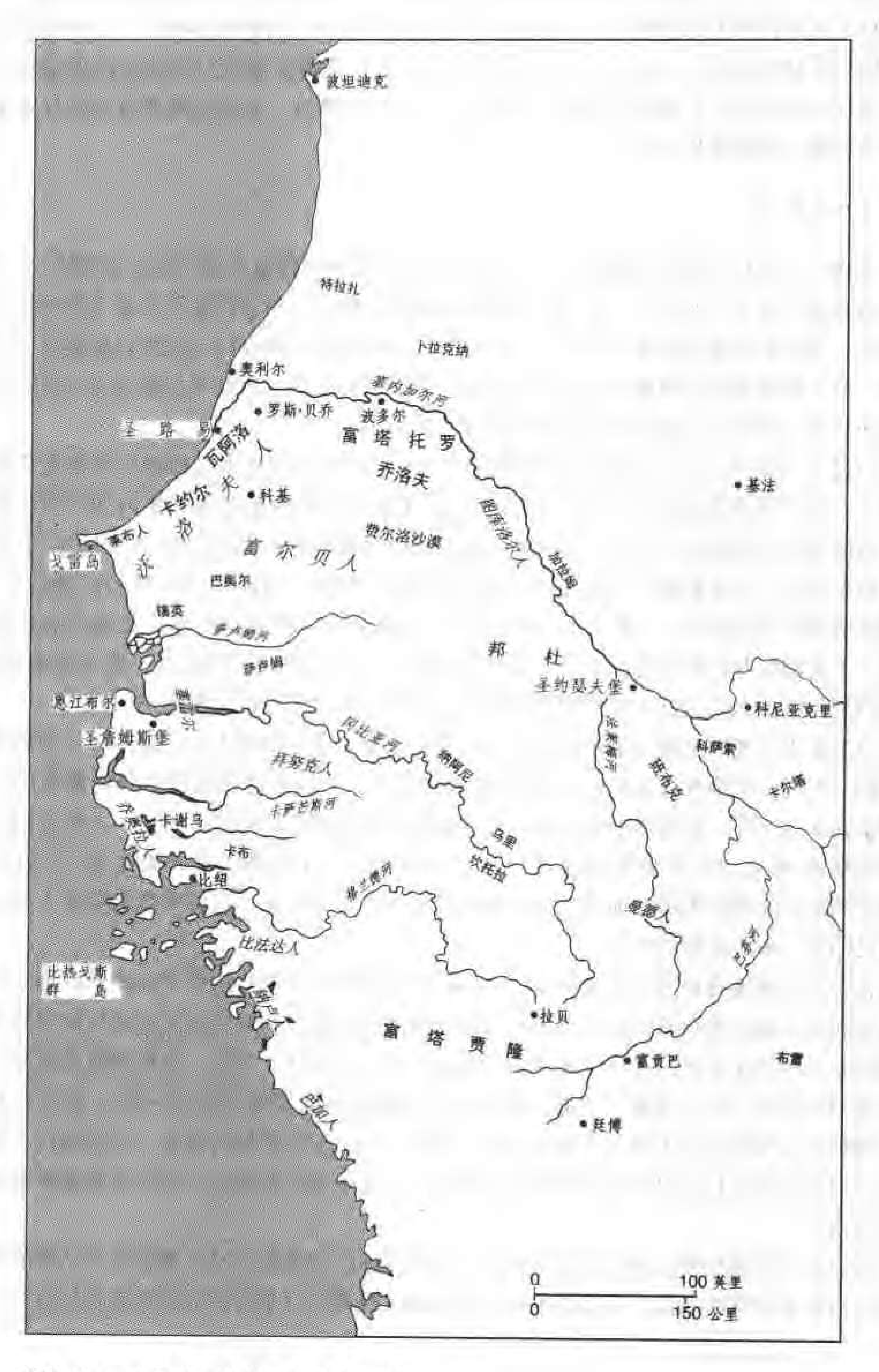


插图 10.1 16至18世纪的塞内冈比亚地区

为塞内冈比亚地区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皮革贸易由于来自欧洲的强烈需求于1660年达到顶点，共计为15万张生皮，是塞内冈比亚地区仅次于黄金占第二位的出口贸易商品。还有象牙、蜡和最重要的奴隶贸易，而对奴隶贸易来说，塞内冈比亚作为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中间站，是16世纪越洋将奴隶运往欧洲首要和主要的奴隶来源地。由于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开放及后来新大陆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奴隶贸易变得格外重要。据沃尔特·罗德尼估计，在1562到1640年间，每年至少从南部河流地区输出5000名奴隶。一开始，葡萄牙人用马匹交换当地的奴隶，并在佛得角群岛发展种植园经济，开始生产食糖、棉花和靛蓝，并接管了塞内冈比亚地区间的贸易。[3] 非-葡混血人“兰萨多斯”(Lançados)或“坦戈毛斯”(Tangomaos)逐渐以欧洲人和塞内冈比亚之间贸易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自居，16世纪后半期塞内冈比亚地区经受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尤其是在该地区政治地图得到重新划分。

16世纪后半期塞内冈比亚地区国家政治地图的重新划分

16世纪葡萄牙人进行的贸易活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已经在南部河流地区引发了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加速了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乔洛夫邦联的瓦解。

危机首先发生在南部河流地区——塞内冈比亚地区间贸易的关键地区，因为那里的贸易活动早已为葡萄牙人所控制。 **266**

危机很早就在卡萨芒斯河和卡谢乌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这一地区当时已有不少佛得角群岛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居住在这里的拜努克人和卡桑加人是纺织和印染能手，很快就成了来自佛得角群岛的棉花的主要买主。拜努克人变得富裕起来，因为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正是当地欧洲居民和贩奴船所需要的。拜努克人的有利地位引发了与兰萨多斯，即非-葡混血人的冲突，后者来到卡桑加的坦巴曼萨寻求援助。一方是布干多和比尚戈尔的拜努克人，另一方是受葡萄牙人的利益所挑起的卡桑加诸国，两者的敌对关系直到1590年前后卡萨的坦巴曼萨死后才告结束。[4]

从一开始，以奴隶贸易为主的葡萄牙人商贸活动就以一种较为持久的方式打乱了南部河流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曼德人是大规模掳掠奴隶的能手，他们巩固了控制着冈比亚河和富塔贾隆之间地区的卡布王国的权力。卡布王国利用考利·汤吉拉军队穿越拜努克人、帕佩尔人、卡桑加人和比法达人居住区造成的破坏，将自己的统治强加给南部河流大部分地区人民的头上，并从海运贸易中捞取好处。

同样，比热戈斯群岛上的居民也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大陆上掳掠奴隶的活动中去。当妇女们专心耕作、捕鱼和盖房子时，男人们则去造“阿尔马迪斯”(almadies)，这是一种著名的船只，他们用这种船组成真正的舰队，使他们得以在南部河流地区制造恐怖。这样，南部河流地区混居在一起的民族——拜努克人、乔拉人、帕佩尔人、巴兰特人、纳卢人、兰杜马人和巴加人，就成了海外奴隶贸易的第一批受害者。离群索居的倾向，特别是

③ W.罗德尼(Rodney)，1970年b，第153-161页。

④ G.E.布鲁克斯(Brooks)，1980年，第19页。

乔拉人的这种倾向，在这片大自然赐予的隐蔽所一般的红树林地区因此变得有增无减。然而，在滕达人地区，位于富塔贾隆高原和南部河流地区之间的少数民族群体巴萨里人、科尼亚吉人和巴迪亚兰克人成了奴隶贸易的主要受害者。⑤

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于是很早便降临到南部河流地区，一些沿海地区民族更倾向于离群索居，这有利于卡布王国在大陆上的统治。南部河流地区宗族国家向着君主制演进的政治进程受到来自相邻民族的压力和掳掠奴隶活动产生的暴力的阻碍，对这种暴力的反应是防卫和采取孤立主义。这种阻碍几乎一直持续到19世纪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

267

在马里帝国最终瓦解之后，卡布王国成了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卡布是个军事强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控制着拜努克人和比法达人的贸易网络，并沿着冈比亚河攻占了曼德人的一些小公国。卡布王国的法里姆人一直是这一地区最积极的奴隶掳掠者。马内人和萨纳人在坎萨拉建立了纳安科王朝，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从开始就体现了塞多统治的象征，这种统治在海外奴隶贸易时期一直主导着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政治生活。来自卡布的盖洛瓦王朝对锡英和萨卢姆的征服，证明了该王国的强大。

16 和 17 世纪是卡布王国的全盛时期，该王国在整个南部河流地区取代了马里帝国的位置，而且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初富塔贾隆进行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时为止，这场革命使卡布王国向内地扩张的活动突然受阻。不过，卡布王朝的扩张与海外奴隶贸易的发展同期进行，尤其是与欧洲人控制南部河流地区贸易的时间相吻合。对塞内冈比亚地区至关重要的南部河流地区地区间贸易的主动权从当地人手中转移到了葡萄牙人手中，后者打人沿海岸进行的古老的北南贸易网中，使比法达人、拜努克人，尤其是曼德人和比热戈斯群岛人仅仅作为奴隶掳掠者或大西洋与内地贸易的代理人。

同样，位于冈比亚河和塞内加尔河之间的北塞内冈比亚地区在 17 世纪下半叶也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政治地图的重新划分。

被考利·汤吉拉大规模人侵搅得摇摇欲坠的乔洛夫邦联，此时在葡萄牙人贸易的影响下已完全崩溃。葡萄牙人贸易有利于沿海省份，却加速了塞内冈比亚的解体。这样，阿马里·恩戈内在丹吉战胜了布尔巴·乔洛夫后，宣布位于塞内加尔河口的瓦阿洛沿海省和位于西南部的巴奥尔的独立，将乔洛夫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内陆。乔洛夫的地盘因而大大缩小，失去了与重要的大西洋贸易的直接联系，同时北部的穿越撒哈拉贸易也被富塔托罗的丹尼扬克王国切断。⑥

乔洛夫的瓦解伴随着数次战役，这些战役成了军阀暴力时期开始的一个标志。塞多君主制不仅给塞内冈比亚地区国家间带来了暴力，还使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充满了暴力。这一发展进程还给锡英和萨卢姆王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这两个国家最终在 16 世纪都摆脱了乔洛夫帝国的统治。

268

在乔洛夫邦联瓦解之后，卡约尔的"达梅尔"(Damel)阿马里·恩戈内首先想扩大自己

⑤ W. 罗德尼，1970 年 b，第 110 页。

⑥ J. 布莱格，1968 年，第 212 页。

的统治，将巴奥尔和瓦阿洛的一部分，即与大西洋贸易有联系的塞内加尔河口地区兼并过来。他取得“达梅尔-廷”的头衔，在卡约尔王国和巴奥尔王国之间多次建立了短期的联盟。卡约尔的每位达梅尔都想成为巴奥尔的“廷”（Teen），反之亦然。但是，卡约尔和巴奥尔之间的争斗很快就阻止达梅尔，使之不能达到统一乔洛夫邦联前省份的目的。这一失败还为富塔托罗的丹尼扬克王国的兴起扫清了道梅。

被欧洲人描绘为“大富尔”的萨蒂吉利用乔洛夫邦联瓦解的机会，在塞内冈比亚北部大部分地区扩大自己的统治。丹尼扬克王朝于17世纪初在桑巴·拉穆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富塔托罗因占领着塞内加尔河口地区和马里及毛里塔尼亚在萨赫勒的部分地区，现在有了双倍的优越条件可以控制穿越撒哈拉的苏丹地区贸易和欧洲人的沿海贸易。⑦

17世纪塞内冈比亚海岸地区被瓜分和穆斯林的反应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对非洲海岸的垄断权逐渐受到一批批先后到来的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成功的挑战。这些新的欧洲列强开始在非洲海岸立足并开始了对非洲的包围。

欧洲列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强行在塞内冈比亚立足，沿海岸线在阿尔金、圣路易、戈雷岛、圣詹姆斯堡、卡谢乌和比绍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贸易驿站像堡垒一样保护着这里。

这些贸易驿站主要作为奴隶的集散地为贸易服务，奴隶贸易从17世纪中期开始成为欧洲列强在非洲海岸的主要活动。大量的奴隶贸易及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和掳掠奴隶的活动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结果给当地的国家关系带来暴力，使国家走向军事化，使好战的伊斯兰教信徒更加先进。这样，在17世纪末，塞内冈比亚成了马拉布特领导的大规模运动的舞台，他们反对海外奴隶贸易给该地区带来的恶果，试图统一塞内加尔河谷地区的国家。

贸易驿站与瓜分海岸地区

269

伴随重新划分政治地图而来的是国家间暴力的复发和海外奴隶贸易的发展，奴隶贸易加速了塞内冈比亚的政治瓦解。同时，上述事件与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到来密切相关，他们在塞内冈比亚海岸地区的存在于17世纪后半期得到巩固，而葡萄牙人则失去了垄断地位。大西洋奴隶贸易随着新大陆制糖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殖民重商主义的奠基石，并通过在海岸地区建立堡垒式的贸易驿站，使塞内冈比亚被瓜分成各国的势力范围。

1621年，荷兰人占据了戈雷岛，法国人随后于1659年占据了面对塞内加尔河口的圣路易，英国人则于1651年在冈比亚河口建立了圣詹姆斯堡。这样，葡萄牙人逐渐从塞内

⑦ J.布莱格，1968年，第244页。

冈比亚北部地区被赶走，除他们在佛得角群岛建立的永久性基地外仅剩下卡谢乌和比绍两地。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将其南部河流地区富裕的市场与新的欧洲列强共同分享。无论如何，沿海岸线建成的一系列堡垒式贸易驿站，彻底完成了塞内冈比亚海上贸易的转向。

位于塞内加尔河口的圣路易堡使法国人得以控制每年2月到5月间瓦阿洛沙漠地区沿河各商站和富塔托罗的考克及特瑞尔鲁日地区的全部贸易活动。17世纪末在加牙加修建的约瑟夫堡确立了法国人从河口到通往苏丹门户的河流上游的整个塞内加尔河谷地区的垄断地位。于是，法国企图通过将毛里塔尼亚海岸的阿尔金角和波坦迪克的贸易和以尼日尔河湾为中心的苏丹地区贸易吸引到沿河各商站，从而使塞内加尔河湾成为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主要的贸易水路。⑧

沿"小海岸"贸易居垄断地位的戈雷岛最先被荷兰人占领，之后在1629和1645年被葡萄牙人占领，1667年又被英国人占据，最后于1677年落入法国人手中。这样，从戈雷岛出发，法国人在吕菲斯克商站与卡约尔进行贸易，在波图达尔商站与巴奥尔进行贸易，最后，在若阿勒亚尔的商站与锡英进行贸易。戈雷岛的法国人还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在阿尔布雷达的商站向南伸向冈比亚，通过比绍和卡谢乌伸向南部河流地区。在那里，法国人遇到葡萄牙人的竞争，特别是遇到英国人的阻挡，后者已牢固地立足于冈比亚。最初由英国人建立的圣詹姆斯堡通过在朱富尔和滨坦的商站和远至巴拉昆达瀑布以及乌里地区的苏图库和法塔坦达的商站控制了沿冈比亚河的所有贸易。



图片10.1 位于塞内加尔河河口的圣路易，E. 德贝拉尔德仿照努沃的作品绘制

270 冈比亚河全年可以通航，给沿岸的曼德人的公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而每个公国也就成了英国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中途停靠的商站。这样，英国人在征服北方和南部河流地区的"小海岸"的过程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而把争夺河流上游危险地区贸易的活动留给了法国人。冈比亚在吸引苏丹贸易方面有很多方便条件，这也是以前马里帝国殖民该地区的原因。葡萄牙人被赶出北部地区之后，退守到南部河流地区，他们在比绍和卡谢乌建立了贸

⑧ B. 巴里(Barry)，1972年，第111-126页。

易驿站。虽然葡萄牙经济上在欧洲已不再能与英国、法国和荷兰相抗衡，但从佛得角群岛来的兰萨多斯人仍维持了葡萄牙在当地的存在。

这样，塞内冈比亚临海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其中不少建在沿海的群岛上，其主要作用是将塞内冈比亚地区的贸易引向海岸。这些永久性的建筑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之不受其他欧洲列强的侵犯，二是阻止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国家联合起来与欧洲贸易的垄断地位进行斗争。

随葡萄人之后，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塞内冈比亚的大规模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仅有黄金海岸地区)，是与殖民重商主义的出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这股聚敛货币和财富的狂热又刺激了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列强投入到争夺非洲、亚洲和新大陆市场的活动之中。[⑨]

各欧洲列强除了在非洲海岸建立堡垒式的贸易驿站之外，还建立了特许贸易公司，其目的是垄断海外贸易。这些公司活动的范围经常超出塞内冈比亚地区之外，其中包括1625年建 271 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1665年建立的法国西印度公司和最后于1672年建立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这些公司得益于君主制国家的支持，象征着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并反映了这些列强为争夺市场而进行竞争的新的精神。

这些特许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使在经济上已败给资产阶级的贵族专心从事海外贸易，而不会失去社会地位。因此，欧洲内部的争斗在塞内冈比亚引起反应，这里的贸易驿战也因当地或宗主国的力量变化而时常更换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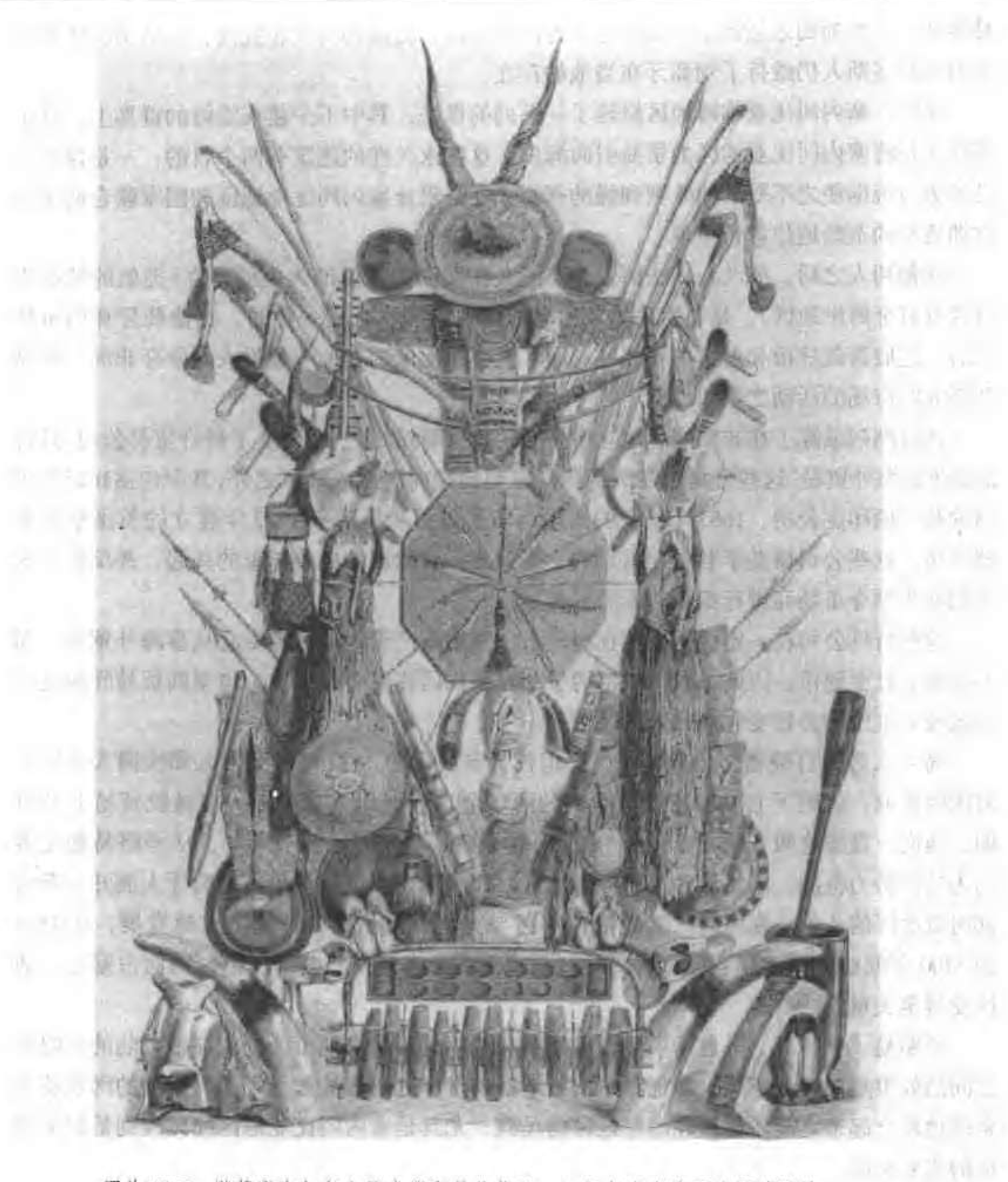
荷兰人最先打破葡萄牙人的垄断，但他们自己也于1677年被英国人和法国人逐出了塞内冈比亚，仅剩下毛里塔尼亚海岸上的阿尔金角和波坦迪克两地。在橡胶贸易上升时期，他们一直将这两个地方维持到18世纪前半期。塞内冈比亚被划分，从圣路易到戈雷岛为法国势力范围，冈比亚为英国势力范围，而法国人和英国人还与葡萄牙人展开争夺南部河流地区的斗争。塞内冈比亚最接近欧洲与美洲，由于种植园经济迅速发展，在1651到1700年间法属和英属西印度群岛地区对奴隶的需求量是过去的三倍，因而占据这一地区变得至关重要。[⑩]

圣路易、戈雷岛、圣詹姆斯堡、卡谢乌和比绍成了从内地市场到前往新大陆的运奴船之间的奴隶集散地。不过，在尼日尔河湾地区到海岸之间掳掠和“寄存”奴隶的网络还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之前，居住在海岸地区的民族，尤其是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民族则是奴隶供应的主要来源。

塞内冈比亚最靠近欧洲和美洲，而且当时几内亚湾和安哥拉地区的大奴隶市场尚未打开，由此说明在16和17世纪奴隶贸易的早期塞内冈比亚占据重要地位。看来明显的是，P. 柯廷低估了该地区在奴隶贸易中占据的重要性，尽管缺乏确凿的统计资料，他还是认为1640年后该地区在奴隶贸易中的比例不足10%。[⑪] 塞内冈比亚在奴隶贸易中所占据的

---

⑨ P.D. 柯廷(Curtin)，1975年，第105-109页。
⑩ P.D. 柯廷，1975年，第102页。
⑪ 同上。



图片 10.2 缴获塞内加尔人的武器和其他物品，J. 佩尔高克绘于法国殖民地展览会

重要性并不神秘，正如 1682 年勒麦尔统计的数字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黑人用以交换棉织品、铜、锡、铁、白兰地和少数玻璃制品。这种贸易的利润为 800%。生皮、象牙和树胶被运往法国，而奴隶则被运往法属美洲岛屿，让他们在甘蔗种植园中劳动。身强力壮的奴隶每人可卖10法郎，转手可能会卖到高达 100 埃居。用四五瓶白兰地酒常常就能换一名相当不错的奴隶。由于

273

船运费用昂贵，买一名奴隶比其运费便宜。[12]

当然不可能据此对塞内冈比亚的奴隶输出情况做出数量上的估计，但是，大西洋贸易对该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欧洲人与塞内冈比亚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贸易关系亦应引起重视。而且，通过存在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可以证明奴隶贸易的规模，这危机成为圣路易建成要塞几年之后在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发生的由马拉布特领导的大规模运动的根源所在。

马拉布特战争

在葡萄牙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下，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国家于16世纪经过重新组合之后，在17世纪前半期经历了尖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危机特别表现在塞内冈比亚的北部地区，并与海外加速进行的奴隶贸易及作为整体的大西洋贸易紧密相联。

由摩尔人马拉布特纳西尔·丁以伊斯兰的名义领导的马拉布特运动，对欧洲人来到塞内冈比亚而带来的危机早有认识。[13] 在纯洁伊斯兰教的掩护下，马拉布特运动首先始于今天毛里塔尼亚的南部地区，自法国人于1659年建立圣路易从而加速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解体之后，当地的柏柏尔人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经济危机。

圣路易岛因其位于塞内加尔河口，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逐渐将河谷地区的贸易引向大西洋方向，从而破坏了自古以来在查马马的游牧民族柏柏尔人和河流两岸定居的农业民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圣路易对贸易的垄断不仅使摩尔人失去了数百年来生产用以与北非地区进行贸易的产品的奴隶劳动力，而且失去了河谷地区生产的粮食，这些粮食过去一直是用于补给塞内加尔河流域北萨赫勒地区国家的。海岸奴隶转运站的增加使粮食贸易转向贸易驿站，以满足出发之前长时间等待和前往新大陆过程中奴隶运输船的需要。经济危机加深了源于阿拉伯人的哈桑尼亚武士、巴努马格法尔人和源于柏柏尔人的桑哈贾马拉布特之间的敌对关系。 274

柏柏尔人的社会被夹在向南运动的哈桑尼亚阿拉伯武士和实行垄断的圣路易之间，圣路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塞内加尔河谷地区的贸易。纳西尔·丁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掀起一场宗教运动，占领了对萨赫勒经济至关重要的塞内加尔河谷地区，以便拯救柏柏尔人社会，使之不致分裂瓦解。哈桑尼亚武士和柏柏尔马拉布特之间的斗争因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各王国发动圣战而更加扩大。在其家乡地区，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旨在通过结束哈桑尼亚武士的专断统治并建立穆斯林的神权统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管理政治和社会生活。

河谷地区的王国进行圣战主要基于经济和宗教两方面的考虑，以便控制粮食和奴隶贸易并使当地人民皈依伊斯兰教和纯洁伊斯兰教的活动。1677年，在瓦阿洛、富塔托罗、卡约尔和乔洛夫进行的圣战获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17世纪后半期大西洋奴

[12] P. 勒麦尔(Lemaire)，1695年，第68页。

[13] B. 巴里，1972年，第135-159页。我曾仔细研究过这场马拉布特运动。

隶贸易的增长使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形势恶化。大规模掳掠奴隶产生的恶果成了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所宣扬的教义的主要内容。

这一清教主义，基本可说是改良主义的运动一开始就反对海外奴隶贸易，并强烈谴责当地实行专制的国王参与掳掠奴隶的活动。⑭ 不能因为缺乏数据就可以完全否认大西洋奴隶贸易所产生的灾难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⑮

无论怎样，从一开始，马拉布特领导的运动就首先是一场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反击逐渐对贸易实行垄断的圣路易商站的斗争。这场运动不仅针对圣路易在塞内加尔河谷地区贸易的垄断权，更为重要的，也是针对不断的海外奴隶贸易。

反对海外奴隶贸易并不意味着取消国内的奴隶制或小规模的奴隶买卖，这种在穿越撒哈拉贸易机制中发展起来的奴隶制从未像大西洋贸易那样引发出深刻的危机。伊斯兰教作为掀起马拉布特运动的借口而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原本仅是王宫中少数商人和朝臣们信奉的宗教，一下子变成了反对贵族阶层专断统治和产生恶劣后果的大西洋贸易的人民抵抗运动。

在当地穆斯林的默许和人民的支持下，马拉布特运动没有遇到很大抵抗，在富塔托罗、瓦阿洛、卡约尔和乔洛夫连续扫除了当地的贵族统治。上述四个王国垮台后，纳西尔·丁以拥护其事业的宗教首领取代了下台的贵族。尚博诺称这些宗教首领为“布尔·朱里”（Burr Jullit,大祈祷师）。这标志着在纳西尔·丁的政治及精神权威的影响下，穆斯林神权政治在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取得胜利，但马拉布特运动推翻的各个王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富塔托罗，虽然缺乏详尽的资料，但是在推翻“萨蒂吉”的统治过程中，群众大规模参与及激烈的斗争，证明马拉布特很快取得了胜利。在瓦阿洛，“布拉克”（brak）法拉·昆巴·姆博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被马拉布特在富塔托罗乡村招募的新兵所推翻。“布拉克”法拉·昆巴战死，马拉布特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任命一位傀儡“布拉克”耶里姆·科德，他是王室成员，接受了纳西尔·丁提出的建立神权制度的条件。⑯

在卡约尔，口头传说对马拉布特运动的胜利有详细的描述，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

⑭ 尚博诺是这些事件的重要见证人，他曾明确说明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产生的原因。纳西尔·丁作为真主忠实的仆人，负有使命“训诫国王，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要他们更好和更经常地祈祷，只要三四个妻子为好，摆脱身边的巫师，歌手和陪乐者，最后还告诫他们，真主不希望看到他们掠夺自己的臣民，更不希望他们杀害和奴役自己的臣民。”他还说，“真主不允许国王掠夺、杀害或奴役自己的臣民；他们反而应保护臣民不受敌人的侵犯，人民非为国王而存在，而国王是为人民而生的。”直到最近，通过伊斯梅尔·哈麦特出版的关于柏柏尔人起源的史书，人们才对这场马拉布特运动有关毛里塔尼亚的部分有了了解。尚博诺当时对这场运动的描述由 C.I.A. 里奇出版，进一步阐明了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发生的这场革命的真实规模。请参阅 C.I.A. 里奇（Ritchie），1968 年，第 338 和 339 页。

⑮ 在尚博诺之后到过此地的旅行者一致认为，这场“杜伯南”或称马拉布特运动成功的原因在于海外奴隶贸易产生的影响。勒麦尔 1682 年曾谈到，“布拉克”在自己国家因极小的罪过即将人沦为奴隶，并明确指出，马拉布特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向瓦阿洛的居民保证“为他们向专制的国王们报仇”。加比于 1689 年在拉古尔伯于当年讲话之后也同样讲道：“国王没有权力迫使其人民纳贡。他们的全部收入来自奴隶和牛。他们经常借口百姓说他们的坏话或有偷窃、杀人之事发生，便劫掠百姓。因国王奴役人民，人们的物品和自由没有安全保障，因此国内发生革命。”所有这些见证人的报告都不能阻止菲力普·柯廷无视我们对这场马拉布特运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分析：请参阅 P.D. 柯廷，1975 年，第 50 页。

⑯ B. 巴里，1972 年，第 137-142 页。我们对瓦阿洛运动的分析由于对卡约尔事件令人遗憾的混乱而被歪曲。

益于贵族阶层内部的政治危机。这里的马拉布特运动由“柯萨蒂”(Xaadi)领导，拥护“林吉”(Linger)雅辛·布布的事业，后者被新的“达梅尔”(Damel)戴斯·马拉姆·恩加尔古免职，并以自己的母亲取代了她。雅辛·布布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携带部分“加尔米”(garmi,统治阶层)及其随从。她与马拉布特恩贾依·萨尔结了婚，后者杀死了达梅尔戴斯·马拉姆·恩加尔古，并扶植起另一位有政治野心并皈依伊斯兰教的统治者马法里·吉。不 276 过，马法里很快因不遵守《古兰经》的宗旨而被马拉布特恩贾依·萨尔杀掉。萨尔宣布自己是纳西尔·丁领导的“杜伯南”运动的副统帅。马法里的被害导致马拉布特运动内部的分裂，而加尔米自从丧失了卡约尔的王位之后，便求助于萨卢姆“布尔”(Buur)马克修雷贾·乔乔·朱夫进行干预。[17]

但是1674年，纳西尔·丁在毛里塔尼亚与哈桑尼亚武士的战斗中丧生，加速了马拉布特运动的瓦解，也使塞内加尔河沿岸国家的总督领地矛盾丛生。这给了在圣路易的法国人以可乘之机，他们进行直接干预，支持富塔托罗、瓦阿洛、卡约尔和乔洛夫已经垮台的贵族东山再起。法国人的贸易活动在1677年马拉布特运动彻底失败之前已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他们之所以作出上述反应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他们想阻止在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出现一个牢固的政治集团，因为这样在伊斯兰教的掩护下可能会强制规定他们的贸易条件。再者，他们想恢复对新大陆种植园的繁荣至关重要的奴隶贸易并极力维持欧、非、美洲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因此，圣路易的法国人给予已垮台的贵族以军事和财政援助，帮助他们重新夺取政权。[18]

尽管尚博诺提供了清晰的证据，菲力普·柯廷却以“使非洲历史非殖民化”为借口，试图否认欧洲人的出现与他孤立地进行研究的塞内冈比亚社会演变之间存在任何关系[19]。法国人出于自身的利益，才在瓦阿洛“布拉克”后面支持耶里姆·科德，后者立即背离了富塔托罗、乔洛夫和卡约尔的马拉布特运动。这样，到1677年，马拉布特运动几乎被摧毁，277 老的贵族阶层夺回了以前的特权。这第一次反对海外奴隶贸易和当地专制政权的人民抵抗运动对塞内冈比亚诸王国的发展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

在毛里塔尼亚马拉布特运动的发源地，柏柏尔人马拉布特的失败确保了哈桑尼亚武士政治权力的恢复，他们建立了特拉扎和卜拉克纳酋邦。18世纪，这两个酋邦利用橡胶贸易发展的机会加入到有利可图的大西洋贸易之中，并对塞内加尔河左岸地区国家一直保持着军事压力。马拉布特战争——欧洲人的记述称为“杜伯南”运动，柏柏尔人编年史称为

[17] L.G.科尔文(Colvin)，1974年，第587-589页；M.迪乌夫(Diouf)，1980年，第122-123页。

[18] 事件的见证人尚博诺还明确地记述了圣路易商站的法国人参与了扑灭马拉布特运动的活动。在1674年5月至6月20日的第一次战役中，德穆琴得到瓦阿洛酋长们的支持，于1674年7月初再次逆流而上60里格，“利用原来的船员另加一些小船，船队比第一次航行时更大，使聚集到一起的当地黑人感到很害怕……当这支舰队于一个半月后顺流而下回来时，他们于8月到达的地方，一片烟火和娱乐活动，一个黑人稻草人被烧掉”。C.I.A.里奇，1968年，第345、346页。

[19] 这是菲力普·柯廷关于塞内冈比亚的这部否则可说证据充分的著作的主要缺点。我从不想否认非洲社会的内在活力，但我断定自15世纪往后，非洲社会的演变越来越受到欧洲人存在的决定性影响。欧洲人的存在将非洲纳入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体系，由此开始了非洲依附关系的进程，这一进程通过外国资本与非洲统治阶级的联盟一直持续至今。这一历史事实不可能以“使非洲历史非殖民化”为借口而予以否认，除非想永远保持非洲的依附关系。就此题目，请参阅P.D.柯廷对B.巴里的评论，1972年(P.D.柯廷,1973年b)。

“舒尔布巴”——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比11世纪在该地开始的阿尔莫拉维德运动持续的时间还长。

阿尔莫拉维德运动致力于征服北方，而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则转向南方。阿尔莫拉维德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查马马柏柏尔人坚定不移追随面向塞内加尔河谷的大西洋贸易的永久印记。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特拉扎和卜拉克纳酋邦卷人到塞内加尔河谷各国大规模的战争之中，而兹维亚马拉布特们则不断与塞内冈比亚王国内马拉布特控制区加强联系，加人伊斯兰运动反对当地军事政权的斗争。到17世纪末，查马马成了塞内冈比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长期的马拉布特战争使整个地区不断发生饥荒，更为严重的是对穆斯林实行镇压。因此，使圣路易商站和得胜的贵族阶层获利的奴隶贸易明显增加。由于从大西洋贸易中唯一获利的非洲贵族阶层的合谋，导致马拉布特运动的失败，从而确保圣路易的贸易继续发展。圣路易的法国人最终成功地阻止了本可控制其在塞内加尔河沿岸地区贸易条件的大的政治集团的形成。

由谁来进行奴隶贸易的问题不断引发内战和各王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导致更为迅速的政治解体。火器已被普遍使用，各王国均由独裁政府和军政府掌权，塞多或王室的战俘们成了贵族统治阶层专横统治的工具。但是在圣路易的胜利加剧了贵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278 而人民越来越转向伊斯兰教这一反对整个塞内冈比亚地区统治政权的核心力量。

从这时起，很多马拉布特家族开始离开海岸和塞内加尔河谷地区而到内地去避难，尤其前往邦杜和富塔贾隆地区，努力巩固穆斯林社团的自治。18世纪初，在邦杜和富塔贾隆地区发生的穆斯林革命标志着战斗的伊斯兰反对海外奴隶贸易所取得的胜利。在整个18世纪，即海外奴隶贸易的鼎盛时期，穆斯林神权和塞多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成了塞内冈比亚历史中的主导因素。

海外奴隶贸易的影响：18世纪塞多的统治和穆斯林革命

在整个18世纪，大西洋贸易，主要是奴隶贸易，加剧了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暴力活动频仍，塞多贵族阶层加强武力，变得更加好战，通过王室奴隶们的支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统治。穆斯林社团反对贵族的专横统治，在各王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地盘，并在邦达、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地区组织革命活动。

塞多统治的加强和政治危机

卡约尔、巴奥尔和瓦阿洛的沃洛夫人王国及锡英和萨卢姆的塞雷尔人王国经历了同样的加强君主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过程。

在拉特·苏卡贝·法尔统治时期，卡约尔是塞内冈比亚地区从塞多政权转向专制制度和军阀统治的突出例证。拉特·苏卡贝·法尔(1695-1720年)通常被称为篡位者，他利用卡约

尔的动乱，将巴奥尔和卡约尔两个王位置于达梅尔-廷的称号之下。他强制实行王室对奴隶贸易的垄断并购置火器，通过除掉多洛贝和盖洛瓦的王族支系、满足其母亲热吉家族的利益，加强了他的君主制统治。他还宠信世袭官职的亲属中的支持者，通过众多联姻结成巨大的亲信网络，这是其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

拉特·苏卡贝实行了彻底的机构改革，以便将马拉布特纳入其政治体制之中。他任命"塞兰·兰博"（Serin Lamb,新职务担任者），以吸引马拉布特中的年轻派系。塞兰·兰博均出于"加尔米"(garmi)或"多米·布尔"(doomi Buur)，他们成了负责保卫边界的中央政府 279 的代表，并很快采纳了塞多统治阶层的军事手段。与此相反，"塞兰·贾克"（Serin Jakk)拒绝同塞多统治者作任何妥协，他们仍专心于宗教活动，继续关注遭受塞多贵族阶层抢劫的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20]

但是，中央权力的加强，尤其是热吉母系宗亲势力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国人的贸易利益，因为拉特·苏卡贝·法尔作为卡约尔和巴奥尔的首领可以决定戈雷岛商站和律菲斯克及波杜达尔代理商行的定价。此外，拉特·苏卡贝支持同所有欧洲国家进行自由贸易。1701年，他逮捕了塞内加尔公司总经理安德烈·布鲁埃，试图牺牲英国人在冈比亚的利益，在这一地区强行建立法国的贸易垄断地位。[21]

拉特·苏卡贝的统治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它标志着在沃洛夫人和塞雷尔人王国开始出现军事首领。他利用手腕在解决内部政治纠纷时将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意志强加于人，因为他掌握着王国武器进口的垄断权。但是他一死，法国人就利用继承危机，阻止卡约尔和巴奥尔统一在一个首领的统治之下，1736年马依萨·滕沃吉统治时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卡约尔统治者和巴奥尔统治者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成了为奴隶贸易提供奴隶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向统治着海岸地区沃洛夫人王国这些新的军事首领供应武器的主要理由。[22]

瓦阿洛是另一个发生政治和社会危机的突出的例子。危机是因圣路易的法国人不断干预三个王室家族——特杰克(蒂迪耶克)家族、洛加家族和乔斯家族继承权所造成的。当时因树胶贸易增长带来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干预。从18世纪初开始，由于受到欧洲纺织工业的刺激，特拉扎和卜拉克纳酋邦的摩尔人所垄断的树胶贸易不仅帮助解决了17世纪后期的经济危机，而且对塞内加尔河谷地区的所有王国均形成了压力。瓦阿洛、卡约尔、乔洛夫和富塔托罗等地均成了法国人为垄断利益而把树胶贸易引向塞内加尔河沿岸商站的最后受害者。他们的理由是要与毛里塔尼亚海岸阿尔金角和波坦迪克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代理商行进行激烈的竞争。这一竞争引发了1717到1727年间第一次树胶战争，其持久的后 280 果特别对瓦阿洛王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3]

1723年，里戈迪埃尔远征企图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毛里塔尼亚的代理商行，失败后，

[20] 拉特·苏卡贝·法尔特别令人关注的改革是由露西·科尔文提出后由马马杜·迪乌夫和阿卜杜拉耶·巴哈·迪奥普详细叙述：L.G.科尔文，1974年，第587-597页；M.迪乌夫，1980年，第124-130页；A.B.迪奥普，1981年，第167和226页。

[21] J.布莱格，1968年，第171-193页。

[22] C.贝克尔(Becker)和V.马丁(Martin)，1975年。

[23] A.德拉古尔(Delcourt)，1952年，第240页。



图片 10.3 一位沃洛夫酋长在其住所内，E. 德贝拉尔德写生

圣路易的负责长官布卢埃转而试探与“贝西奥”，罗斯贝乔的首领“坎加姆”（Kangam,省首领）马里科修里结盟。结盟的目的是引诱特拉扎的埃米尔阿里昌多拉将阿尔金角交还法国人，并作为一支平衡力量，以削弱瓦阿洛的布拉克和卡约尔的达梅尔对圣路易商站表现出的敌意。1724 年，马里科修里在圣路易的支持下，反抗瓦阿洛的布拉克耶里姆·姆巴尼克。这次分裂的企图是圣路易的法国人政策造成的明显结果，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塞内冈比亚地区的王国中挑起分裂活动。[24]

此外，由于在圣路易和阿里昌多拉之间调解失败，马里科修里失去了公司对他的支持。紧接着，他被耶里姆·姆巴尼克打败。到 1734 年，耶里姆·姆巴尼克拥有骑兵 200 至 300 人，步兵 3000 人，其中一半人持火器，他自然也就成了该地区最强大的国王之一。这 **281** 使他的继承人,他的两个兄弟,恩贾格·阿拉姆·巴卡尔(1733-1757年),尤其是纳阿塔戈(1756-1766 年)，对其邻国，特别是卡约尔实行霸权政策，当时的卡约尔正遇到饥荒并处于七年的内战之中。两兄弟宣称河口三角洲地区的所有领土归其所有，并试图将圣路易上交达梅尔的所有钱物均予以没收。

瓦阿洛推行的公开霸权政策被英国人废除。英国人因不断受到布拉克纳阿塔戈·阿拉姆的骚扰，于 1758 年后占领了圣路易。当时，纳阿塔戈已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意志强加于圣路易，因为他控制着圣路易在塞内加尔河地区的贸易。作为塞内加尔河口的“看门人”，纳阿塔戈·阿拉姆不断要求增加其所得款项和奴隶的价格。1764 年，纳阿塔戈·阿拉姆两次封锁了圣路易的贸易并禁止通过瓦阿洛向上游航行。英国人采取了行动，他们支持卡约尔的达梅尔马科杜·昆巴·贾阿林，后者到 1765 年 8 月为止从瓦阿洛夺回了以前属于他的

[24] B. 巴里，1972 年，第 186-189 页。

大部分领土。

英国总督奥哈拉最初想在大陆建一城堡以保护圣路易的贸易，后来他乘纳阿塔戈·阿拉姆之死摧毁了瓦阿洛政权。奥哈拉关心的主要是在该地区掳掠更多的奴隶以发展他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他向占据了整个塞内加尔河地区的摩尔人提供武器。1775年，仅在瓦阿洛王国，英国人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掠走了8000名奴隶。在圣路易的大街上，奴隶过剩的情况举目可见，当时一名奴隶仅相当一块布的价钱。㉕

这一巨大的人力损失恰逢一场长达29年的内战开始，在这场内战中，两个王室家族，洛加和乔斯均试图夺回自18世纪早期一直由特杰克家族垄断的权力。(阿拉姆·巴卡尔和纳阿塔戈·阿拉姆两兄弟继承瓦阿洛王位,标志着特杰克母系家族战胜了乔斯和洛加母系家族,这与导致热吉家族在卡约尔实现垄断权的过程相同)

不过，瓦阿洛立即感到来自特拉扎摩尔人的压力，后者因树胶贸易已变得越来越强大。摩尔人经常干预当地继承权之争，这种斗争完全毁掉了王国的统治，使王国的政权不能推行独立的政策，并失去了产生像拉特·苏卡贝·法尔那样的军事强人的内部动力。

塞雷尔人的锡英和萨卢姆两个王国经历了同沃洛夫人王国同样的发展过程。不过锡英王国的历史表明，它的疆域不大，而当时普遍存在的暴力形势使之不得不封闭自己以免受外部的影响,而且不得不经营粗放的农业以维持自己的凝聚力。尽管如此,布尔(Buur)锡 283 英还是建立了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以便控制中央政府对每个村庄任命的"萨克斯-萨克斯"(Sax-Sax)。反之，萨卢姆的发展则不同，因其疆域较大，居民见多识广，而最重要的是因其占据着萨卢姆河上有利的商业地位。含盐丰富的浅盐湖为布尔提供了重要的收益，使他能参与奴隶贸易活动，并确保萨卢姆向冈比亚地区扩张。㉖

富塔托罗自考利·汤吉拉以来处于丹尼扬克统治之下。由于自封的王位继承人争斗不断，暴力活动频仍和大量使用火器，富塔托罗也经历了与沃洛夫人王国一样的发展过程。这种地方性的政治危机为摩尔人和圣路易进行经常性的干预打通了道路，圣路易最关心的是满足其对奴隶和树胶的需求。

起初，由于对萨蒂吉继承人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常会引起权位争夺者之间的战争，更不用说由"塞博"(sebbe,单数即塞多,ceddo)军事首领们制造的多次篡夺权力的现象。在这种暴力的形势下，布巴卡尔·西尔于1716年向摩洛哥人求援，这给后者干预富塔托罗的事务提供了机会。此后，富塔托罗不得不向摩洛哥人交纳粮食税(muudul horma)。㉗另外，富塔托罗直接参与了特拉扎的埃米尔阿里昌多拉和卜拉克纳之间的斗争。这是摩洛哥利用其称做"奥尔曼"的军队不断干预从瓦阿洛到加牙加之间的塞内加尔河谷地区事务的开始。

1720年，阿里昌多拉被废黜，并被其强大的北方邻居乌莱德德林人赶走，他向摩洛哥素丹寻求帮助。正当阿里昌多拉想在今天毛里塔尼亚的南部地区结束卜拉克纳的霸权

㉕ B. 巴里，1972年，第208-210页。

㉖ M.A. 克莱因(Klein)，1968年，第26-29页。

㉗ O. 凯恩(Kane)，1974年，第245页。



图片 10.4 瓦阿洛的武士们

时，沙里夫却想确保其对摩洛哥南面的摩尔人酋邦的主权得到承认。但是，根据圣罗伯特的说法，有5000之众的奥尔曼军队后来完全独立行动，将塞内加尔河沿岸所有国家卷人血雨腥风之中。奥尔曼军队最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与特拉扎结盟，另一部则与卜拉克纳联合起来。阿里昌多拉于1722年被卜拉克纳部击败，他与贝西奥马里科修里逃到瓦阿洛避难。从这时起，奥尔曼军队在18世纪前半期多次对富塔托罗地区的权力继承危机进行干预。这样，在1721年5月到1724年12月之间，布巴卡尔·西尔和巴布·穆萨在萨蒂吉王

位上换来换去，致使局势十分混乱，直到根据传奇所说的1725年，桑巴·热拉亚·杰吉在盖迪的奥尔曼军队和圣约瑟夫堡的指挥官支持下夺取了政权。[28]

桑巴·热拉亚·杰吉(1725-1731年)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强人。他喜欢冒险，英勇无畏和带有传奇色彩的业迹始终为富塔托罗云游歌手所传唱。“未称王的小桑巴”——未登王位却 284 以武力揽权——和他的名马“乌姆拉图姆”、名枪“布布洛瓦克”(“布布”意为无需上子弹)，说明了富塔托罗政治生活中的暴力。桑巴·热拉亚·杰吉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他的塞博(sebbe)军队用火器武装，每当打仗时候敲起战鼓(bawdi peyya yiyan)、唱起战歌(dadde yiyan)，在位时共进行过45次战役。[29]

歌颂桑巴·热拉亚·杰吉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富塔托罗传唱，在阿马杜·莱和阿马杜·阿贝尔·赛出版的两个版本中有精彩的描述。[30] 以桑巴·热拉亚·杰吉传奇故事为题材的塞多史诗一直在战歌“古姆巴拉”(Gumbala)中由塞博传唱。这是一首颂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的战歌，是塞多作为武士，直面人生、面对死亡的史诗般的颂歌，它表达了对祖先、对自己所属阶层道德精神的忠诚。“古姆巴拉”中最感人的是描写暴力和死亡、歌颂神奇和马背生活的那些诗句。“古姆巴拉”是叙述死亡的诗歌，是歌颂武士、歌颂他的战马、火枪、长矛的颂歌：

就是这个人，他说……
借助我母亲的祈祷，
借助我父亲的祈祷，
主啊，请不要让我羞愧地死去，
请不要让我在床上，
看着孩子们的眼泪，
听着老人们的哭声死去。[31]

同样，“兰吉”(Lenngi)是鼓励人们藐视死亡和保持荣誉的英雄赞歌，由塞博的妻子们在结婚和行割礼时歌唱。唱这些歌是一种心灵的交融，重申未来的配偶属于塞博阶层，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持之以恒坚持的价值观念。[32] 遗憾的是，桑巴·热拉亚·杰吉的传奇故事出自真实的历史背景，即由海外奴隶贸易带来的暴力现象占据着历史舞台，这样才会彻底弄清，为什么那时会出现由塞多的道德准则而产生的这类军事强人。富塔托罗常年的动荡形势有两个原因。摩洛哥借助其奥尔曼军队打算控制摩尔人的酋邦，因为后者借助树胶和奴隶贸易直接与大西洋贸易网相联。同时，法国人占据着圣路易，而人们在从河口到上游的整个塞内加尔河谷地区均能感到他们的存在，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从这一地区获取尽可能多的奴隶。这些外来因素形成了富塔托罗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形势，丹尼扬克军事 285 贵族经常向萨蒂吉的权力发起挑战，不是请求摩尔人和其奥尔曼盟友的帮助，就是请求法

[28] 同上，第246页。
[29] O.凯恩，1970年b。
[30] A.莱(Ly)，1977年；A.A.赛(Sy)，1979年。
[31] A.A.赛，1979年，第365-367页。
[32] 同上，第438-439页。

国人帮助。就这样，桑巴·热拉亚·杰吉起先与摩尔人结盟，后来又向圣路易的法国人寻求帮助，以求摆脱摩洛哥人的奴役。1725年，他用100个奴隶和在乔沃尔的首都修建港口为条件换取火枪、弹药和火炮。1725年，他努力保护法国人的利益，反对摩尔人的劫掠。可能正是因为与法国人结盟，使他从1725到1731年得以连续统治，尽管两个对手布布·穆萨和孔科·布布·穆萨不时提出权力要求。[33]

不过，法国人远离其基地圣路易，难以彻底制止摩尔人“让尼格里蒂亚全俯首称臣”造成的压力[34]。不过，法国人最终利用一些派别为了桑巴·热拉亚·杰吉的利益，使孔科·布布·穆萨(加牙加“通卡”(Tunka)的盟友)屈服，他们的盟友再一次逃往邦杜。桑巴的军队由一支奥尔曼部队组成，是圣安东用2000捆货物交换招募来的，他在1738至1741年间重新从孔科·布布·穆萨手里夺回了政权。但是，桑巴始终摆脱不了奥尔曼军队及其摩尔人盟友的控制。他曾劝说法国人在乔沃尔建一城堡，以抵制奥尔曼和摩尔人对他的控制，但未能成功。不久以后，桑巴不明不白地死去。根据口头传说，他死得悲壮，完成了一个勇敢的塞多武士的理想——他死于他的妻子之手，他第二次逃到邦杜时他的妻子被敌人收买后背叛了他：

> “你将拉罗(Lalo)放入我的饭中，就是那天我们谈话之后。我知道我吃了这饭将会死去，但我仍将饭吃掉。没有人会说我害怕死亡。面对死亡我绝不畏缩，但是面对耻辱我会后退。”[35]

不管怎样，桑巴·热拉亚·杰吉，这位因战争而大伤元气的富塔托罗圣战的传奇英雄是怎样死的并不重要。1752年，新的萨蒂吉苏贝·恩贾依在加拉姆掌权，不久被得到科萨索人和奥尔曼军队支持并劫掠了邦杜的牙耶·霍拉及其武士们赶走。萨蒂吉不断更换，富塔托罗陷入危机，而这仅对控制着国家的摩尔人有利，此时的富塔托罗已具备了促使1776年穆斯林革命得以成功的一切必要条件。[36]

286　加牙加位于上游，自17世纪末起也被纳入大西洋贸易网中，这对处于塞内冈比亚三种不同生态地区——海岸、萨凡纳和萨赫勒——汇合地上的索宁卡商人十分有利。尽管索宁卡人贸易颇具活力，主要为尼日尔河湾诸国提供食盐和欧洲商品，为西部塞内冈比亚地区提供棉织品，但加牙加同样经历了由海外奴隶贸易和奥尔曼人侵而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始于马克萨纳的纳阿姆“通卡”与其表兄弟坦布卡纳的马克桑大约1700年在卡马拉省的争斗，此后于1730年因格伟和卡马拉之战得以蔓延和持续。西阿布的穆萨·贾贝通卡被免职后，冲突爆发。穆萨·贾贝被马克萨纳的布卡里·塞特取代，后者宣布自己是加牙加邦联的首领。

---

[33] O. 凯恩，1974年，第246-247页。

[34] 同上，第248页。

[35] O. 凯恩，1970年b，第924页。

[36] “富拉人的国家照例也提供了类似的说法。仍然是摩尔人的牺牲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注意到那里发生的革命，因为革命对国家的形势并未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向正好在那儿的一个人交了款。今天，这事很快发生了。”见Col.C6-16，“塞内加尔高级会议来信”，1752年7月25日。

“富拉人国家又换了国王。这就是关于这个国家我们不得不说出的几乎所有情况，因为全部权力实际上已落入摩尔人之手，哪个国王执政已无区别。”见Col.C6-14，“塞内加尔高级会议来信”，1753年6月20日。

这种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导致1744至1745年间多次内战。内战最终破坏了索宁卡人邦联的统一，同时为与卡尔塔的班巴拉结盟的科萨索人于1750年人侵该地铺平了道路。虽然科萨松克侵略者被赶走，但是格维和卡马拉却因不断的争斗而削弱了力量，对加牙加邦联的未来造成了长期的损害。[37]

对于穆斯林革命在富塔贾隆取得胜利之前主宰南部塞内冈比亚地区的卡布王国的发展情况知道的很少。不过，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的卡布政权是建立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的，而奴隶贸易曾使南科王国的军事色彩大为增加。大约在1738年，卡布王国的曼萨仅向葡萄牙人一年便提供约600名奴隶，在卡布人控制的南部河流地区，每年输出数千名奴隶。卡布王国因此而加强了对海岸省份的控制，同时向其内陆相邻的巴贾兰克人、富拉昆达人、科尼亚吉人和巴萨里人进攻。巴拉姆曼萨大约死于1705年，在他的统治下，卡布可能处于其南科贵族领导的鼎盛时期。但是长期的战争状态加强了“科林”（khorin，省的军事首领）和以喝酒（dolo）闻名的索宁克武士的地位。19世纪发生的政治危机同样得到证实，萨马、巴卡纳、吉马拉三个王室家族的纷争是旨在向王国强加单一的中央权力而造成多次内战的根源所在。在19世纪记述这种形势的资料较多，后来富塔贾隆和邦达领导的圣战和反对索宁克人的卡布国家内部的穆斯林革命因此局势而取得成功[38]。 **287**

18世纪的穆斯林革命

17世纪后半期由纳西尔·丁领导的马拉布特运动在军事上失败之后，伊斯兰反对塞多统治的地下活动得到传播，海外奴隶贸易在整个塞内冈比亚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由强大的军事贵族控制的国家里，穆斯林社团在其有影响的马拉布特家族的影响下，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政治和社会的自治。但是，整个塞内冈比亚地区的穆斯林社团通过超越国界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日益结合到一起，他们在经过战争和宣布进行圣战的地方开始建立新的国家或者夺取政权。

在17世纪末，马立克·赛在邦杜建立了穆斯林神权统治，紧接着18世纪初，富塔贾隆地区在卡拉莫科·阿尔法的领导下爆发了穆斯林革命。这次革命在塞内冈比亚边界地区取得胜利，此后直到18世纪后半期有一段间歇。接着由苏莱曼·拜尔领导的托罗多马拉布特社团在丹尼扬克王朝的大本营富塔托罗取得胜利。这三次胜利证明了塞内冈比亚马拉布特运动的持续和团结精神。此后，塞内冈比亚的历史主线转向穆斯林神权统治与塞多统治者之间的斗争。

邦杜的穆斯林革命

纳西尔·丁失败后，对马拉布特的镇压促使众多的穆斯林从富塔托罗逃往邦杜。在邦杜，马立克·赛大约于1690年在塞内冈比亚边界一带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神权国家。马立

[37] A. 巴西里(Bathily)，1975年。
[38] M. 麦恩(Mane)，1978年，第128页。

克·赛无疑继续发展了马拉布特运动，使之成为在卡约尔的皮尔或科基受过宗教教育的穆斯林首领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穆斯林首领与柏柏尔人的扎维亚均有密切的联系。

马立克·赛出生在波多尔附近的苏尤马。在完成其宗教教育之后，曾漫游塞内冈比亚地区，最后得到西阿布的通卡批准，在加牙加的边界一带定居。通卡根据乔努人的习惯给予马立克·赛一块土地，但是，他们两人的联盟关系因邦杜处于冈比亚贸易通道终点站的战略位置而很快破裂。[39] 马立克·赛搬到巴贾兰克人、科尼亚吉人、巴萨里人、贾克桑克人、索宁克人和来自富塔托罗的许多富尔贝人居住的多民族地区，并利用加牙加虚弱的形势宣布发动圣战。由于他在宗教界的威望，而且在穆斯林信徒帮助下建立起军事组织，他们大都是马拉布特运动失败后从富塔托罗来到这里，使他得以建立邦杜神权国家。[40]

288

马立克·赛向贾克桑克马拉布特提供支持，后者的商业利益经常受到加牙加军事贵族劫掠的威胁。因此，穆斯林团体要确保自己对法莱梅的控制，该地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和农业上的价值使其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了西西贝王朝权力的基础。[41] 马利克·赛接着采用了“阿尔马米”（Almamy)这个头衔，这是富尔富尔德语称“伊玛目”头衔，纳西尔·丁以前曾采用“伊玛目”头衔。

菲力普·柯廷清楚地阐述了在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和邦杜革命之间存在宗教和家族的紧密联系。虽然马立克·赛没有直接参与马拉布特战争，但他却是个积极的追随者，完成了马拉布特团体的某些政治和宗教目标。[42]

现在尚无解释第一次穆斯林革命成功原因的资料。但是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趋势，穆斯林社团为躲避塞多统治的镇压，在远离海岸的塞内冈比亚边境地带站稳了脚跟。这样，邦杜的命运就与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和穆斯林社团联系在一起，这两地正好位于邦杜的两侧。邦杜处于联接尼日尔河湾地区与冈比亚商站的商路上，位置优越，它在西西贝王朝时期损害加牙加的利益，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地位。[43]

富塔贾隆的穆斯林革命

在邦杜的穆斯林革命成功几年之后，富塔贾隆也爆发了革命，其背景与上一场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富塔贾隆山区是一个天然屏障，几个世纪来一直是贾隆克人、索索人和富尔贝人避难之地，在16和17世纪曾经受剧烈的变化。考利·汤吉拉的人侵，尤其是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对这里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同时苏丹地区的人口迅速向森林和海岸地区流动，致使大量人口从富塔贾隆高原穿过。此外，这里主要的交叉路口经济上的复苏均靠大批牧牛居民的存在，他们是富尔贝族牧民，因富塔贾隆高原肥美的草场于15世纪后大批涌人此地。

289

此时被纳入大西洋贸易中的富塔贾隆成了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的舞台，这场变

---

[39] A. 巴西里，1975年，第57-59页。
[40] P.D. 柯廷，1971年，第20-22页。
[41] A. 巴西里，1975年，第58页。
[42] P.D. 柯廷，1971年，第58页。
[43] S. 迪亚尼(Diagne)，1975年，第1页。

革在18世纪初引发了穆斯林革命。沃尔特·罗德尼对最终导致由马拉布特团体建立富塔贾隆神权国家的1725年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做了极好的说明。他指出，现在把这场革命仅仅看做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富尔贝人与其主人和剥削者贾隆克人之间的斗争过于简单化。

在17世纪时，富尔贝人很可能是该地区最富有和最强大的社会集团。这是三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为了寻找新草场，从邦杜、富塔托罗、马西纳和萨赫勒地区来的富尔贝人大量增加。第二，大西洋贸易的发展促使牛和生皮贸易大发展，因此加强了养牛的富尔贝人的经济地位。第三，战斗的伊斯兰精神，作为建立经济、政治和社会新秩序的思想应运而生。[64]

很明显，像在邦杜一样，富塔贾隆的穆斯林革命是海外奴隶贸易给该地区带来暴力和动乱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富塔贾隆穆斯林革命的领导者不仅来自马西纳，有的也来自塞内加尔河谷地区，与纳西尔·丁领导的马拉布特运动有过直接的联系。

菲力普·柯廷和列夫齐昂均清楚指出了富塔托罗、邦杜和富塔贾隆一些马拉布特家族之间存在的宗教、政治和婚姻联系。[65]通过法莱梅河将塞内加尔河谷与富塔贾隆高原联接起来的道路是塞内冈比亚地区居民历史永久的特点，19世纪谢赫乌玛尔的旅行就是很好



图片10.5 富塔贾隆的富尔贝妇女

的说明。邦杜成了联系17世纪末富塔托罗失败了的马拉布特运动和18世纪初富塔贾隆取得胜利的穆斯林革命的桥梁，该地区的富尔贝人、曼德人和贾克桑克人均参加了后面的这场革命。在卡布这个强大国家大规模掳掠奴隶的情况下，富塔贾隆出现了马拉布特团体取得胜利的穆斯林革命，其革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穆斯林社会的安全。

这场穆斯林革命并不完全是一场富尔贝牧民与定居的贾隆克农民之间的战争。口头传说清楚地表明这场革命具有多民族特色。革命最初由12位富尔贝人马拉布特和10位曼德人马拉布特领导，其祖先肯定是贾克桑克人。运动遭到卡富首领们的反对，他们是贾隆克人，同样也遭到非穆斯林富尔贝人的反对，他们是生活在丛林里的牧牛人。穆斯林富尔贝人想废除牛税，他们与生活和贸易方式总与伊斯兰习俗联系在一起的曼德-朱乌拉人或贾克桑克人必然联合起来，在小小的贾隆克人的酋长领地组成广泛的政治集团，因贾隆克酋邦面对海外奴隶贸易的形势已无法确保人民的安全。

290

穆斯林革命当然不是居无定所的游牧居民所做之事，而是在富塔贾隆高原避难所定居的背景各不相同的穆斯林的事业。马拉布特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巴芬河上著名的贾克萨巴的贾克桑克人教育中心上过学，他们因富尔贝人的大量加入而得到巩固。

291

这些富尔贝人在逐渐定居的环境中，以牛为财富，谋取利润。海岸地区的牛和生皮贸易的发展，使富尔贝人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而伊斯兰教又给他们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武器。

马拉布特团体在反对各地贾隆克人贵族统治者的圣战取得胜利之后，穆斯林的首领们在易卜拉希马·桑贝古的领导下建立了富塔贾隆邦联。人称卡拉莫科·阿尔法的桑贝古是廷博的巴里家族塞迪扬克后裔的首领，并持有阿尔马米的头衔。邦联分为九个“迪乌”（Di-



图片10.6 富塔贾隆的拉贝老清真寺

we,单数为Diwal,省)，首领称"阿尔法"(Alfa)，是从领导吉哈德(djihad,圣战)的首领中任命产生的。领土的划分最初是以穆斯林革命中每位首领解放的地区而定。卡拉莫科，是身为阿尔马米和富塔贾隆邦联的首脑，首先是首都廷博的阿尔法。从一开始阿尔马米就坐镇廷博，他的权力因授予各省(拉贝、布里亚、廷比、凯巴利、考拉德、科因、富贡巴和弗德哈吉)广泛的自治权和在宗教首都富贡巴设立相当于议会的元老院而受到限制。[46]

富塔贾隆的穆斯林神权统治是马拉布特团体与保卫其政治主权的贾隆克人的卡富国首领们之间一系列军事战役之后的结果。但是,在确保马拉布特团体取得胜利的著名的塔兰桑 292 战役之后，圣战仍在继续，其目的是试图使富塔贾隆高原的非穆斯林居民皈依伊斯兰教。为此，穆斯林信徒遭到数百年来在这一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富尔贝人的反抗，他们对伊斯兰教采取敌视态度，把伊斯兰教看做是分权和进行政治、经济控制的同义词。反抗来自后来成为最底层的生活在丛林中的富尔贝人，他们受到占统治地位的马拉布特阶层的剥削。这一事实证明把穆斯林革命解释为富尔贝人入侵并奴役当地贾隆克人这种肤浅的、单从种族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敌对关系长久持续，以及神权统治的巩固工作缓慢的原因，因此不得不在18世纪整个上半叶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以取代贾隆克人卡富国的政治制度。[47]

约1751年，卡拉莫科·阿尔法去世，阿尔马米的职权转移到易卜拉希马·索里手中，人称索里·马奥多(伟大的索里)。军队首领听从圣战宗教首领的指挥，他们以发动圣战为名在富塔贾隆实行对邻国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成了为满足贵族统治阶层的国内需要，尤其是海岸地区海外奴隶贸易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掳掠奴隶的主要借口。

同达荷美王国或阿散蒂邦联一样，富塔贾隆的发展若脱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奴隶贸易的总背景便难以理解。这些王国原本是在反抗掳掠奴隶恶果的斗争中形成的，而后来又参与到这种贸易之中，他们或是为了保卫自己，反对周围的邻国，或者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专营此业。于是，伊斯兰教在很多人那里变成了维护和巩固贵族统治阶层的一种思想。

索里·马奥多得到了索里马纳的贾隆克人王国首领的支持，投入到一系列针对邻国的战争之中，以获取奴隶和战利品。但联盟于1762年被桑卡兰的国王孔德·布拉马打败，他于1762年在索里马纳背叛后，占领了廷博。索里·马奥多动员全国的力量将孔德·布拉马的军队阻挡在富贡巴的大门以外，直到1776年才最终消除了敌方的威胁。桑卡兰的失败开始了富塔贾隆对廷博以东索里马纳的长期统治。索里·马奥多经过长期努力巩固了政权。他于1791年去世，维护了军方对宗教界首领的权力。

索里·马奥多之死引发了政治混乱,因为他的儿子萨杜在1797年/1798年被首任阿尔 293 马米卡拉莫科之子阿卜杜拉耶·巴德姆巴的支持者杀死。肯定从这时起，开始了由阿尔法家族，即卡拉莫科·阿尔法的后人和索里家族，即易卜拉希马·索里的后人轮流执政的制度。这种双首领制度是向塞多王国政体倒退，那时也有两三个王室家族同时存在，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它使负责保证"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教规)受到尊重的元老院

---

[46] T.迪亚罗(Diallo)，1972年，第28页。

[47] N.列夫齐昂(Levtzion)，1975年，第208页。

能够控制阿尔马米的权力，也使各省的首领能够巩固其自治。

虽然从一开始就存在政治制度上这种弱点，富塔贾隆王国在殖民统治时期之前一直能够保持独立，甚至扩展了自己的领土。但是，新政权逐渐失去了马拉布特团体的革命特色，一旦它在富塔贾隆高原上变得安全了，便开始改变，军事的和宗教的贵族阶层积极投入海外奴隶贸易。像别的地方一样，奴隶贸易为国家垄断，国家监管贸易路线并组织商队到海岸地区进行贸易。当欧洲人放弃黄金、象牙和生皮一类商品而热衷于奴隶贸易时，占统治地位的海外奴隶贸易成了 18 世纪的主要特征。托马斯·温特博特姆于 1794 年访问了廷博，他对海外奴隶贸易的动力作了清楚的解释，即这种贸易促使阿尔马米进行战争以便掳掠更多的奴隶，将奴隶作为与欧洲商品进行贸易的唯一物品。[48]

在这种形势下，圣战失去了它的宗教色彩，而伊斯兰教则成了在富塔贾隆边界地区的异教徒中掳掠奴隶的借口。只有用奴隶才能交换欧洲商品这一事实说明新政权对非穆斯林人的压迫。他们中很多人被捉，不是被运送到海岸地区卖掉，便是被关在“兰德”(runde,奴隶村)中。兰德是整个 18 世纪富塔贾隆新政权的一个最典型的机构[49]，因为发展国内的奴隶制度不仅可以满足政治和宗教贵族阶层对食品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奴隶船只对粮食的需要。位于班巴拉人诸国和海岸之间的富塔贾隆既参与了掳掠奴隶的活动，又购买奴隶以便进行国内生产，他们还将多余的奴隶在海岸地区出售，以便买回欧洲人的商品和游牧人民需要的食盐。这种贸易在 18 和 19 世纪期间曾将为数众多的奴隶从不同地区——包括班巴拉人、基西人、贾隆克人、富尔贝人、巴萨里人和科尼亚吉人的地区带到富塔贾隆。

只有在海外奴隶贸易的背景下方可解释的大量奴隶的存在，使人对富塔贾隆地区的内部发展产生了误解。对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来说，富塔贾隆的历史不过就是富尔贝人大规模入侵的结果，他们奴役贾隆克居民，从而引发了两个部族间的激烈冲突。不过，十分清楚的是，主导富塔贾隆国内发展的是一个将伊斯兰教作为权力思想基础的正在形成的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在这个根据沙里亚统治的新社会里，非穆斯林受到歧视，处于受奴役的境地，而穆斯林则享有自由人的一切权利。占统治地位的富尔富尔德语言和文化不会掩盖国内发展的真正活力，而建立在穆斯林思想基础上的明显的社会阶层的存在则是国内发展的特点。

除了“林贝”(rimbe,单数为 dimo,自由人)和“马库贝”(maccube,奴隶)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之外，在自由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还存在反映这种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的等级制度。在林贝中间，处在最高层的是“拉斯·利”(las li,持剑、长矛、书、笔的贵族)。他们是发动圣战并垄断全部权力的大马拉布特家族的后代。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和宗教阶层，还有大群受其保护的附庸和随从，他们剥削集中在奴隶村中的大批奴隶的劳动。

在这一阶层之下是数量很大的自由人，他们的状况和地位取决于他们同受过教育的、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马拉布特阶层的关系。自由人中处于最下层的是生活在丛林中的富尔

[48] T.M. 温特博特姆(Winterbottom)，1803 年。

[49] W. 罗德尼，1968 年，第 280-282 页。

贝人，他们是圣战之后慢慢皈依伊斯兰教的富尔贝人的后代。他们基本上没有奴隶，自己耕种土地，而贵族则视农活儿为不洁净的工作。牛是他们唯一的财富，他们必须向马拉布特政治统治阶级交纳各种税款和服劳役。然而，与大西洋奴隶贸易紧密相关的国内奴隶制的发展，是18世纪塞内冈比亚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在富塔贾隆和南部河流地区将奴隶集中到奴隶村的做法规模之大，以致在18世纪末多次发生奴隶起义。

实行国内奴隶制无疑构成了富塔贾隆文化革命的基础，当地马拉布特和政治统治阶级摆脱了农业劳动，致力于教学工作。据1794年访问过廷博的温特博特姆记载，新政权在国内建立了很多古兰经学校。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沙里亚为基础，禁止买卖穆斯林，使富塔贾隆避免了混乱和人口减少。[50]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富塔贾隆自然资源相对缺乏，但人口却过于稠密。于是，这一神权国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穆斯林统治阶级确保了其自身利益，维护了穆斯林社团的安全和统一。尽管具有其局限性，穆斯林革命之后还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马拉布特很快将《古兰经》翻译成富尔富尔德语，方便了对群众的宗教教育。这场文化革命无疑是塞尔诺·桑巴·蒙贝亚积极促成的。他在其著名的著作《永恒的幸福之源》中发出了用富尔富尔德语作为工具对人民进行宗教教育的宣言：

295

> 我用富尔富尔德语引述权威的教诲，
> 　使你们更易理解。
> 你们听到教诲，就要接受教诲。
> 对每个人来说，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能
> 　领悟权威的说教。
> 很多富拉尼人不能真正理解
> 　阿拉伯语教诲而感到彷徨。
> 做礼拜时彷徨不定，
> 　说不通，行不明。
> 要寻找光明，从彷徨中解脱出来，
> 　那就用富尔富尔德语朗读
> 　一个普通人所写的这些字句。[51]

结果不仅产生了富尔富尔德语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带来了民众进一步的伊斯兰化。这样，在中世纪这些城市的伊斯兰教，如在廷巴克图和杰内，通过富塔贾隆的穆斯林革命，变成了一种民众的宗教，对后来在整个西非形成一系列神权统治国家起了先导作用。就此而言，富塔贾隆在18世纪塞内冈比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穆斯林革命中构成了其长链上的第三个环节。

富塔托罗的穆斯林革命

伊斯兰教在邦杜和富塔贾隆取得成功之后，于18世纪后半期通过托罗多马拉布特团

---

[50] T.M. 温特博特姆，1803年，第8页。
[51] A.I. 索(Sow)，1971年，第43页。

体的努力又在富塔托罗取得胜利。比起邦杜和富塔贾隆，托罗多运动与17世纪晚期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之间有着更明确的联系，因为这一职业运动，就其形式和基本目标而言是纳西尔·丁革命的直接继续。同时，通过与摩尔人的扎维亚紧密合作，托罗多运动也从邦杜和富塔贾隆18世纪初的圣战中受到很大启发。此外，托罗多马拉布特团体的领导者，苏莱曼·拜尔和阿卜德·卡德尔过去均是卡约尔的皮尔和科基学校的学生，这些学校与毛里296 塔尼亚的达依马尼的扎维亚关系密切。纳西尔·丁运动的精神继承者后来转移到富塔贾隆或邦杜以巩固其信仰，希望以后在富塔托罗建立神权统治。在富塔托罗，丹尼扬克政权的潜在危机有助于促成托罗多革命的胜利。

由于圣路易与富塔托罗联系密切，欧洲人的因素对伊斯兰教取得成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有明显的影响，邦杜和富塔贾隆没有这种情况。看来很明显，18世纪中期在三角洲地区的瓦阿洛发生的危机在塞内加尔河谷中部地区的富塔托罗也同样存在，这是由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以及卜拉克纳和特拉扎两个酋邦邻近的缘故。

约在1716年，由布巴卡尔·西尔引起的继承人危机延续了整个18世纪，富塔托罗因此而陷入动荡和内战之中。18世纪后半期，新的英国总督奥哈拉恢复了海外奴隶贸易，形势更加恶化。奥哈拉为卜拉克纳和特拉扎的摩尔人占据富塔托罗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托罗多的革命不仅对抗已无力保证国家安定的丹尼扬克政权，同时也反抗卜拉克纳的统治和将穆斯林贩卖为奴的活动。托罗多宗教团体在苏莱曼·拜尔的领导下很快在姆博亚取得了对乌拉德·阿卜杜拉的军事胜利，从而结束了每年向摩尔人纳粮交贡(muudul horma)。托罗多宗教团体在富塔托罗中部地区建立了政权，从而结束了几个世纪以来丹尼扬克王朝的统治，并于1776年7月禁止英国人与加拉姆的一切贸易活动，以对抗奥哈拉1775年掳掠奴隶的蹂躏活动。[52]

托罗多取得胜利之时恰逢其著名领导人苏莱曼·拜尔去世。他的继承人是阿卜德·卡德尔·坎，他因宗教学识而当选，以巩固新生的神权统治。阿卜德·卡德尔一经当选为阿尔马米，采纳了富塔贾隆的不少宗教礼仪活动，同时也保留了丹尼扬克王国一些传统——向托罗多宗教团体倒戈的一些酋长仍可保留自己的领地。他还通过“阿贝”三家族，即博塞阿贝、依尔阿贝和赫比阿贝巩固托罗多有势力的大家族对中部富塔托罗大部分地区的权利，同时对“贝依蒂”(bayti,闲置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阿卜德·卡德尔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阿贝家族的限制，该家族占据了“贾高德”(Jaggorde,选举人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其中最有名的是林迪奥的阿克、统治博西阿的阿里·顿杜家族以及阿里·西迪·依尔阿贝家族和阿里·马马杜家族。尽管如此，阿卜德·卡德尔仍然巩固了新政权，并将其宗教影响扩大到富塔托罗边界以外的地方，他的成功给已在沃洛夫和塞雷尔人的国家里建立了强有力的独立聚居区的穆斯林社团带来了要求变革的强烈的愿望。富塔托罗的榜样使瓦阿洛、乔洛297 夫、卡约尔和巴奥尔内部穆斯林改革派与塞多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许多农民移居到富塔托罗以寻求安全，因为那里的新制度禁止将穆斯林买卖为奴。除此之外，阿卜德·卡德尔提倡在每个村庄进行宗教教育，并各自建立一所清真寺，由伊玛目负责确保人

[52] O. 凯恩，1973年，第622页。

们在这一新的神权国家中遵从《古兰经》。

托罗多政权在富塔托罗的地位日益稳固，因此于1786年开始征服特拉扎，阿卜德·卡德尔想像对待卜拉克纳一样，让特拉扎也臣服于他的统治并上税纳贡。在卜拉克纳的帮助下，他打败了特拉扎，特拉扎的埃米尔埃利·柯里在一次战斗中被杀，达依马尼摩尔人扎维亚的信徒穆克塔尔·乌尔德·布纳在“卡西达”(kasīda)中庆祝阿卜德·卡德尔的胜利，正如一个世纪前纳西尔·丁所设想的那样，这象征着伊斯兰反抗封锁商路的哈桑尼亚武士取得的胜利。阿卜德·卡德尔把自己看做是纳西尔·丁忠实信徒的导师和合法继承人。他的雄心壮志是迫使瓦阿洛、乔洛夫和卡约尔的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规，并将其统治一直伸向河流上游地区。

但是在1790年，卡约尔的新任达梅尔阿马利·恩戈恩·恩德拉拒绝像其前任那样臣服于富塔托罗，在恩江布尔省残酷镇压穆斯林独立聚居区改革派企图独立的所有活动。他杀死了阿卜德·卡德尔派来的代表塔波西尔·哈马迪·伊卜拉，包括科基的马拉布特之子在内的幸存者请求阿尔马米拯救伊斯兰的事业。这促使阿卜德·卡德尔组织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近三万人之众的远征军前往卡约尔殖民地。

但是，远征军在本戈依遭到惨败，阿马利·恩戈恩巧妙地利用焦土政策取得胜利。很多富坦克人被卖作奴隶，阿卜德·卡德尔也成了卡约尔的俘虏，后来被释放才回到富塔托罗。阿马利·恩戈恩确信此后不会再有人侵活动。口头传说记下了阿马利·恩戈恩宽宏大度的品格，他坚定地捍卫了塞多统治国家的世俗性质，反对阿卜德·卡德尔试图通过圣战强行建立改变宗教信仰的神权国家。[53] 但罗杰男爵认为，塞多集团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阿马利·恩戈恩在反对阿卜德·卡德尔的斗争中得到了在圣路易和戈雷岛奴隶贩子们的帮助。[54] 奴隶贩子之所以提供支持是因为阿卜德·卡德尔反对贩卖穆斯林为奴，而且1787到1790年间在富塔托罗和圣路易之间曾多次发生冲突，船只不得开往上游地区，对该岛的小米供应也中断了。[55] 298

在本戈依失利以后，阿卜德·卡德尔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富塔托罗反对他的势力来自依尔阿贝的阿里·西迪和博西阿的阿里·顿杜，两人都是贾高德选举人议会中有势力的成员。托罗多有势力的蒂尔诺莫勒家族反对阿卜德·卡德尔严格的教规，强迫阿尔马米离开首都回家乡科比洛，而后，两位不识字的权贵阿里·西迪和阿里·顿杜硬充做中央政府与富塔托罗东、西部两者之间的专门联系人。

在内部权力斗争发生的同时，富塔托罗和圣路易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在发展。1801至1803年间，圣路易通过河流进行的贸易活动中断了。圣路易不仅拒绝交纳经常性的税款，还派出12条船进行惩罚性的远征。他们在西部富塔托罗地区烧毁了十几个村庄，并抓走600名俘虏，其中大部分人属于托罗多统治阶层。1805年，富塔托罗采取了报复行动。由于商业活动的中止损害了双方的利益，1806年，富塔托罗接受了一项新的协议，确认了

---

[53] D.鲁滨逊(Robinson)，1975年，第201-208页。
[54] L.G.科尔文，1974年，第601页；R.科莱多尔男爵(Kelodor)，1829年，第129页。
[55] D.鲁滨逊，1975年，第202页。

1785年协议的有效性。

阿卜德·卡德尔已有几年没有获得增强其日益受到争议的权力所需的火器和货物，于是他开始对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远征，以牺牲邦杜马拉布特的利益为代价，平定阿尔马米寨加的劫掠。他处死了塞加，任命了自己的候选人哈马迪·帕特，结果促使不成功、但受民众欢迎的邦杜首领哈马迪·艾萨塔与卡尔塔的国王结成了联盟。

圣路易不断增长的敌意和选举人议会内部日益增强的反对势力阻止了阿卜德·卡德尔去破坏卡尔塔和邦杜的联盟。实际上，卡德尔很快便被选举人议会废黜了。此后，他与加牙加和科萨索人结成联盟。但1807年在托罗多宗教团体第二代的默许下，邦杜和卡尔塔的联合力量将其杀死。他的死为选举人议会的胜利扫清了道路，他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任命一位忠实于他们事业的阿尔马米，并在各自的酋长领地保持高度的自治权。[56]

如同邦杜和富塔贾隆一样，最初由学者组成的马拉布特团体让位于由缺乏宗教知识的武士贵族阶层控制的政体，如同塞多统治的王国。卷入激烈竞争的世袭家族垄断了权力，形成一个与1776年的革命理想毫不相关的新的托罗多专制制度。不论怎样，与塞内冈比亚北部地区一直控制着沃洛夫人和塞雷尔人王国的塞多政权相对照，穆斯林革命对富塔托罗的国家和社会确是牢固地打上了伊斯兰的印记。

阿卜德·卡德尔强行将伊斯兰教作为沃洛夫王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活动虽然失败了，但

299 在很大程度上却因当地马拉布特团体的迅速发展而得到补偿。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开始从内部向塞多的暴力活动进行挑战。尤其是在卡约尔，由于阿卜德·卡德尔在本戈依的失败，导致大批穆斯林离开恩江布尔省而来到佛得角半岛，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贾尔·乔普领导的神权。来自佛得角半岛的穆斯林流亡者鼓动莱布人抵制达梅尔统治的“艾尔卡提”(Alkaati)的苛捐杂税和卡约尔的分离主义运动。经过几年的抵抗活动，马拉布特团体赢得了独立，独立解决了最初的领土问题并确保了伊斯兰在卡约尔王国的胜利。[57]

结　论

从16世纪到18世纪，塞内冈比亚地区的演变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受到大西洋贸易的影响，这正是黑非洲依附于欧洲强权这一过程的开始。从16世纪后半期起，不涉及领土占领的易货贸易(黄金、象牙、树胶、牛皮和奴隶)使贸易路线由内地转向海岸地区。在这一时期，乔洛夫邦联瓦解了，形成了瓦阿洛、卡约尔、巴奥尔、锡英和萨卢姆王国，而丹尼扬克王国则成了塞内加尔河谷地区的统治者。在南部河流地区，葡萄牙人的贸易摧毁了拜努克人、比法达人、纳卢人和巴加人的地区间贸易并为从马里帝国的衰落中脱颖而出的卡布军事政权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17世纪，由于奴隶贸易在海外贸易中居主导地位，致使海岸地区迅速划分为势力范围，并建立起堡垒式贸易站。同时也导致塞多政体暴力色彩的进一步加强，由此引起敌

[56] 同上，第209-214页。
[57] M.迪乌夫，1980年，第134-139页。

视军事贵族阶层的马拉布特运动的广泛开展。纳西尔·丁领导的运动(1673-1677年)失败之后，战斗的伊斯兰的信徒在邦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组织起来。

然而在18世纪末，神权国家已逐渐失去了革命色彩，而此时的欧洲正在考虑取消奴隶贸易，因为这一活动在金融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日益降低。欧洲开始将塞内冈比亚作为向欧洲中心提供工业原料的直接边缘地区纳入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深受奴隶制时代带来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害的塞内冈比亚仍无力抵御19世纪下半期欧洲对其进行的军事征服。

（杨荣甲 译）

11 桑海帝国的终结

M. 阿比特博尔

桑海帝国的崩溃

300 摩洛哥人入侵的原因

莫雷·艾哈迈德·曼苏尔于1578年在马哈津干河战役之后被推上权力宝座，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登上萨阿德王位。战胜葡萄牙人使他成了伟大的伊斯兰教捍卫者之一，对方用金钱赎回他抓到的基督徒俘虏更使他成了世界舞台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作为哈里发、伊玛目和忠实信徒的君王，他的志向是使所有穆斯林都具有“唯一同样的思维方式”，并使圣战的传统得以复活。于是，他计划出售塔加扎产的撒哈拉食盐，用所获钱款补充国库(Bayt al-Māl)，并将征服桑海时俘获的奴隶安排到海军工作，最终用于袭击异教徒。

而曼苏尔更深一层的动机则是从苏丹获取黄金和奴隶，这是不难理解的。①

奴隶的使用主要在摩洛哥南部糖业部门，那里的设施在前几十年曾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② 而对于黄金来说，自桑海帝国在尼日尔河湾地区兴起以来，其供应量迅速下降。曼苏尔的前辈曾两次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第一次是1537至1547年间曾袭击瓦赞；第二次是301 1556至1557年间占领了塔加扎。但是很明显，由于不愿破坏对黑非洲的食盐供应，曼苏尔的祖父马赫迪就分享税收的问题与桑海的“阿斯基亚”(Askiya，国王)达乌特达成了协议。③

但是，对摩洛哥与苏丹的贸易仍然存在威胁：葡萄牙人于1565年曾试图通过塞内加尔到达廷巴克图；④ 尤其是土耳其人，他们的某些行动表明，他们旨在将其供应线扩展到马格里布南部。后者的例证是，1552年萨拉赫·拉伊斯远征至瓦尔格拉；1557年贾法尔帕

---

① 关于摩洛哥与苏丹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有详实记载的历史阶段的主要资料有：苏丹方面：萨迪(al-Sa 'di)，1964年；M. 卡蒂(Ka'ti)，1913-1914年；O. 胡达斯(Houdas)，1966年。摩洛哥方面：菲什塔里(al-Fishtali)，1964年；斯拉威(al-Slawi)，1936年；瓦夫拉尼(al-Wafrani)，1888-1889年。欧洲方面：H. 德卡斯特里斯(de Castries)，1923年，他叙述了一位不知名的西班牙人对摩洛哥人入侵情况的详细记述。

② P. 贝尔蒂尔(Berthier)，1966年。

③ 萨迪，1964年，第163-164页；菲什塔里，1964年，第55页。

④ 特克塞拉·达莫塔(Teixeira da Mota)，1969年。

夏占领了费赞；1578-1579年哈桑·维内齐亚诺远征到图瓦特。[5]

由于桑海人在塔加扎·吉兹兰(陶代尼)发展了新的采盐矿点，使萨阿德王朝从塔加扎获利的希望落空。[6]

1582年，曼苏尔占领了图瓦特和古拉拉的沙漠绿洲。他们将占领此地公开说成是为“脱离了王室管辖的”地区恢复秩序的一项措施。但其真正的意图是征服苏丹，以便在奥斯曼帝国非洲领地的南侧建立一个大帝国。[7]

1583年，博尔诺的国王马伊伊德里斯·阿拉沃马为曼苏尔实现其野心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由于担心土耳其人从费赞向其领土内推进，马伊伊德里斯请曼苏尔提供武器以便在“苏丹的边界地区”打击非穆斯林集团。曼苏尔从博尔诺国王那里得到一份匆忙起草并签署的“贝耶”(bay‘a,效忠文书)后，答应了他的要求。[8]

第二年，一支摩洛哥远征军向塞内加尔方向挺进，来到接近大西洋的萨赫勒地区，但后来被迫撤回，原因不明。[9]

曼苏尔于1586年就要下达进攻桑海帝国的命令，但由于行动中遇到困难将命令推迟了五年。他利用这段间歇时期训练和装备军队，搜集关于阿斯基亚帝国的各种情报，并劝说他的领导阶层——商人、乌里玛和军官——相信他的正确计划。

通迪比和桑海崩溃的原因

1590年10月30日，一支由三四千士兵和数百后备军组成的摩洛哥军队在朱达尔帕夏率领下从马拉喀什出发。部队穿过大阿特拉斯山，进入达拉山谷，到达克塔瓦，然后开进了撒哈拉。在60天的强行军之后，部队于1591年3月1日，到达尼日尔河岸，11天后到达通迪比，距桑海的首都加奥仅约50公里。

303

虽然阿斯基亚的伊萨克二世直到最后时刻才动员他的军队，但他迎战入侵者的军队却十分强大。尽管如此，面对摩洛哥人的火枪，桑海军队经过一天英勇的抵抗之后，于1591年3月12日被打败。[10] 最后一个伟大的萨赫勒帝国，由于其统治者专注于内部纷争，没有认识到摩洛哥人的巨大威胁，就这样崩溃了。

1529年伟大的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哈吉吉垮台以后，加奥的王宫成了争夺王位者残酷斗争的舞台，并很快发展成叛乱威胁着帝国的崩溃。在摩洛哥人入侵前五年，桑海帝国因总部设在廷巴克图的“巴拉马”(Balama)萨杜克的叛乱几乎被一分为二。伊萨克二世镇压了叛乱，但在摩洛哥人入侵以前将全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所剩时间已经很少。[11]

---

⑤ E. 罗西(Rossi)，1936年，第74-75页；A.G.P. 马丁(Martin)，1908年，第119-123页。

⑥ 菲什塔里，1964年，第55页。

⑦ 同上，第36-40页。

⑧ 同上，第61-63页；A. 纳西里(Nasiri)，1954年。

⑨ 菲什塔里，1964年，第60-61页；E. 法格南(Fagnan)，1924年，第415-416页；萨迪，1964年，第194页。

⑩ 菲什塔里，1964年，第64-71页；瓦夫拉尼，1888-1889年，第160-162页；M. 卡蒂，1913-1914年，第263-275页；萨迪，1964年，第194页。

⑪ M. 卡蒂，1913-1914年，第230-239页，第246-254页；萨迪，1964年，第197-2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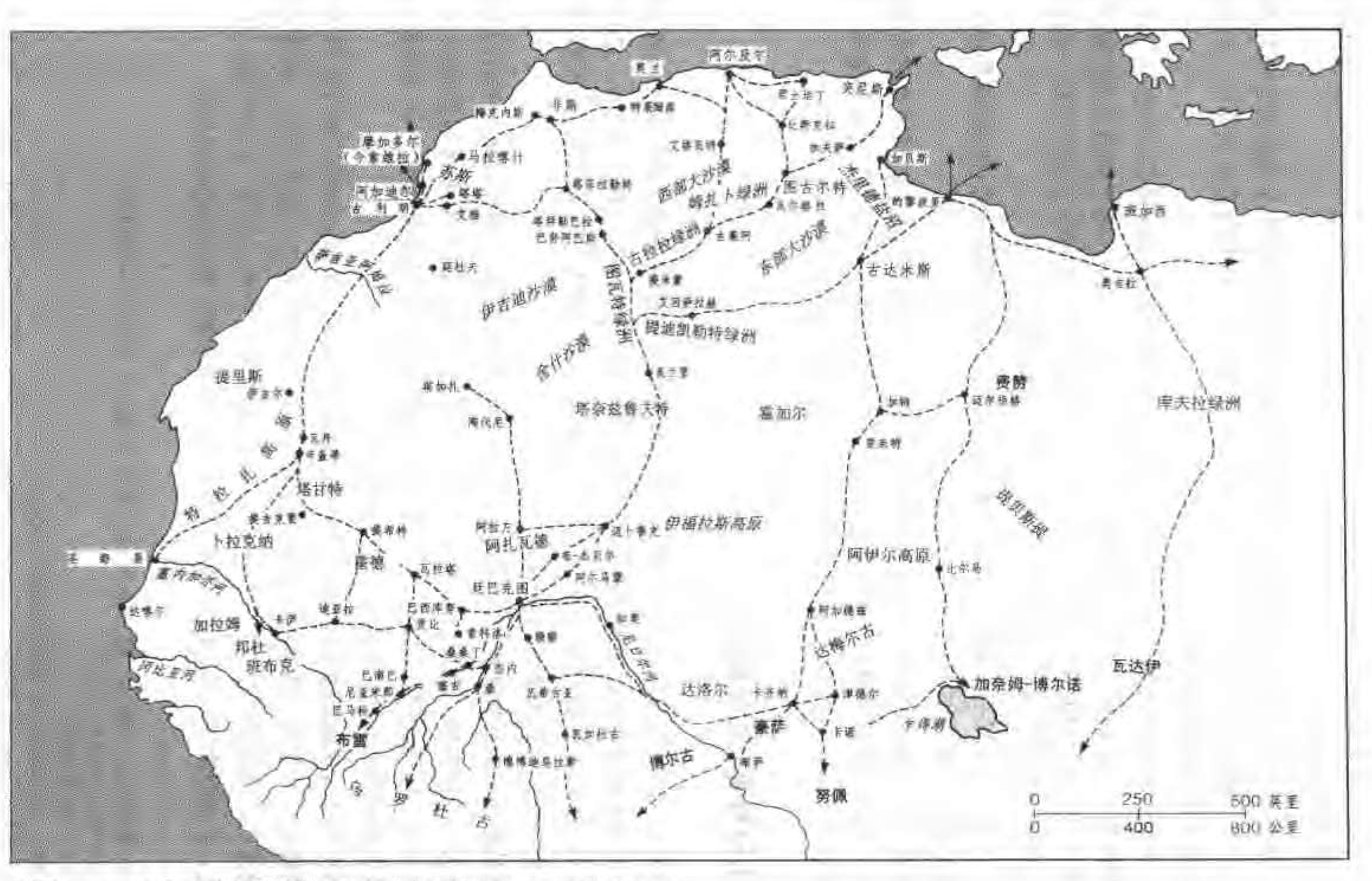


插图 11.1　16 至 18 世纪穿越撒哈拉的路线图(仿照 M. 阿比特博尔图)

在经济上，桑海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葡萄牙人海岸贸易的不利影响。在登迪、博尔古和莫西人国家——帝国奴隶的传统来源地——军事上的失利，加之1585年塔加扎失守，更加重了因经济倒退带来的社会后果。瘟疫、旱灾、粮食短缺等自然灾害接踵而来，更使帝国的形势雪上加霜。⑫

在最后时期，由桑尼·阿里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开创的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却缺乏曾对该地区以前的伟大国家——加纳和马里的统一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民族和社会文化基础。桑海未能将其不同的民族凝聚到一起。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大帝统治时期尤其不统一，他更接近廷巴克图阿拉伯-柏柏尔人的价值观，而不是加奥和库克耶的传统价值观，对此他生来就很陌生。虽然加奥是政治首都，但无论加奥还是桑海均不构成帝国的驱动力，帝国的重心反倒位于征服而来的土地上的廷巴克图和杰内。

摩洛哥帕夏管辖区的建立

为了追击桑海残余部队，朱达尔帕夏挺进到加奥。此时的加奥已是一座空城。伊萨克二世虽然仍控制着尼日尔河流域地区，但已无力发动反攻。他开始与朱达尔谈判撤回摩洛哥的条件。朱达尔对加奥可悲的状况感到失望，他知道他的士兵身体状况不佳，于是准备接受伊萨克的建议。但是曼苏尔不答应，他立即召回朱达尔，并任命一位在摩洛哥军中排名第二的军官马哈茂德·扎昆接替他。扎昆的命令很简单，即征服全部苏丹地区，并摧毁苏丹的各路部队。这些部队正在利用混乱局势试图填补由于桑海军队的溃败而留下的势力空白。⑬ 304

马哈茂德帕夏立即开始摧毁桑海的政权。他占领了库克耶的传统首都，将伊萨克二世赶出国，后在古尔曼什人中死去。他还为伊萨克指定的继任人穆罕默德-加奥设下致命的圈套，努力清除了桑海军队在登迪的最后抵抗活动(1592年-1594年)。⑭

在消除了桑海帝国的威胁之后，扎昆回到廷巴克图，摧毁那里受教育阶层的政治势力。几十名"乌里玛"被处死或被流放到摩洛哥。其中包括著名的艾哈迈德·巴巴，他的名声"从苏斯地区传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城"。⑮

扎昆于1594年死于邦贾加拉由桑海抵抗者组织的一次伏击中，未能完成对杰内周围地区的占领⑯。这一任务落到朱达尔身上，但很快证明这是难以完成的，因为他遇到了富尔贝人(富拉尼人)、班巴拉人和曼德人(马林克人)的猛烈抵抗，他们临时团结到马哈茂德曼萨的周围。进行了一些难决胜负的小型战斗之后，占领杰内的摩洛哥人和当地人达成了某种妥协，当地人"尽管只是在文字上"，接受了摩洛哥的占领。⑰

⑫ M.卡蒂，1913-1914年，第164页，174页和230页；萨迪，1964年，第151-182页和195页。

⑬ 萨迪，1964年，第220-221页；菲什塔里，1964年，第170-171页；H.德卡斯特里斯，1923年，第473页。

⑭ 萨迪，1964年，第230-234页；M.卡蒂，1913-1914年，第275-276页和287-295页；菲什塔里，1964年，第83-87页。

⑮ M.卡蒂，1913-1914年，第300-308页；萨迪，1964年，第258-266页；瓦夫拉尼，1888-1889年，第170页。

⑯ 萨迪，1964年，第268页。

⑰ 菲什塔里，1964年，第94页；萨迪，1964年，第273-27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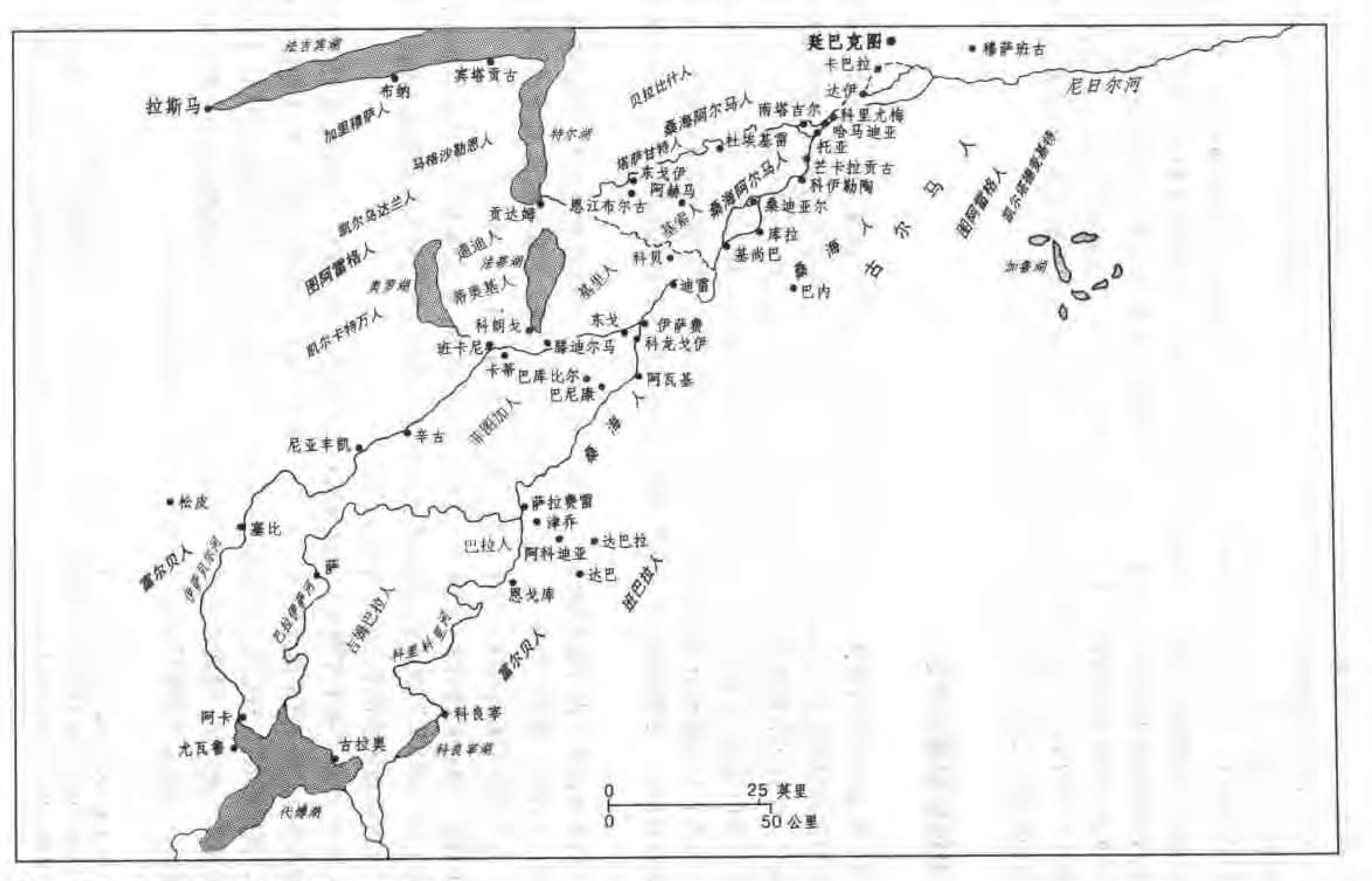


插图 11.2　廷巴克图地区(仿照阿比特博尔图)

曼苏尔的军队被迫限于占领河上的一些港口，他们建立了“卡萨巴”(kasaba,永久要塞)。这些港口包括杰内、万迪亚卡、库比、孔纳、塞比、滕迪尔马、伊萨费、卡巴拉、廷巴克图、班巴、布雷姆、加奥和库克耶,[18] 很明显，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些地方大都位于杰内到廷巴克图这段河路上。在尼日尔河两岸的帕夏管辖区中心，广大地区几乎没有受到摩洛哥人的影响。

帕夏不想改变桑海帝国留下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当地若任命酋长，须得到帕夏的认可。帕夏主持任命大城市中卡迪和伊玛目以及富尔贝人和图阿雷格人的“阿尔多”(ardo)和“阿门诺卡尔”(amenokal)的授职仪式。在这方面，摩洛哥的代表们所做的就像他们之前的阿斯基亚王朝一样，很少干预对候选人的挑选。

摩洛哥人的驻地并非闭关自守,它们既不是孤立的飞地,也不是堡垒。曼苏尔懂得实行 306 绥靖政策后如果不进行殖民，不将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迁移至此并长期扎根，他的征服的成果是不会持久的。

于是，吉什人从苏斯移居到苏丹地区，哈哈人、马基尔人和朱桑人也来到这里，他们不断在摩洛哥境内制造混乱，曼苏尔急于摆脱掉。从1599年之后，同朱达尔帕夏一同征战到此的基督徒出身的军团士兵被送回家乡摩洛哥。[19]

18世纪末之前苏丹地区的政治

尼日尔河湾各族人民在后帝国时期的情况：一般特点

由于桑海帝国的崩溃和大批民族和社会势力的涌入，如图阿雷格人、富尔贝人、摩尔人等(他们从前远离农耕地区和城市中心)，造成不稳定和不安全，在这种形势下，政权对于那些可以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统治者而言唾手可得。

在整个尼日尔萨赫勒地区，典型的政治首领首先是一位武士，他的唯一合法性是他的武器授予他的权利。这类首领在领土方面一般野心不大。过去那些堂堂的国家被各种王国和公国所取代，而这些国家常常只是一个民族集团、一个氏族、一座城市，甚或仅仅是一系列大村子。[20]

17和18世纪的政治首领与他们刚刚过世的先人不同，他们受地方传统的影响，而非伊斯兰学者宣讲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影响，很少是某种宇宙模式或宗教模式的中心人物。

过去曾对苏丹地区帝国的建立起过突出作用的伊斯兰教，暂时并未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但是它在草原的跑道上仍继续长征，通过朱乌拉(迪奥拉、万加拉)商人达到远方，这些商人同时也并不反对为分散在从萨赫勒到森林地带贸易路线上的非穆斯林王国和酋邦服务。

---

⑱ 摩洛哥人后来又在贡达姆和阿拉万建立了两个要塞。

⑲ 菲什塔里，1964年，第93页和第113-115页。作为这种迁移的后果，摩洛哥士兵的后裔一点不像某些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那种典型样子(可能是由于他们原本是基督徒或“叛教者”的缘故)，他们说西班牙语而不说阿拉伯语。

⑳ M. 阿比特博尔(Abitbol)，1979年。

307 廷巴克图、杰内和阿尔马人

1618年以后，摩洛哥停止任命帕夏管辖区的长官，也不再派驻增援部队，曼苏尔部队最后残留人员及其后裔阿尔马人不得不听从命运的摆布。他们使自己成为廷巴克图的合法主人，并一直坚持到19世纪初。

虽然帕夏的军事力量减少了，但他的国家仍然能坚持存在下去，而且几乎毫不变化一直坚持到谢胡·阿赫马杜时代。在富尔贝人的马西纳帝国建立之前，尼日尔河湾的军事力量实际上能够消灭摩洛哥老牌殖民地的残余势力。首先是塞古的班巴拉人，他们不仅约束自己不将其统治扩大到廷巴克图，而且还避免进入杰内。再就是图阿雷格人的凯尔奥里米登邦联，主要是凯尔塔德麦基特人，尽管他们于1737年彻底战胜了阿尔马人，但从未想要夺取廷巴克图的政权。同样，有影响的僧侣集团昆塔人，也仅限于通过其阿扎瓦特扎维亚在阿尔马人和其游牧部族的敌人之间起调解作用。昆塔人在富尔贝人于1825-1826年征服廷巴克图的前夕才进入廷巴克图。

最初，在帕夏管辖区似乎不存在管理任命各种官职的专门条例，对帕夏的任命也是如此。但自17世纪中期以来，当第一代本地出生的阿尔马人掌握政权以后，开始形成了权力转移的规定，其基础是所有阿尔马人从属的三大师团轮流担任长官。轮到哪个师，就由那个师选出一名候选人，经军队其他部分认可后即担负起帕夏的职务。如果推举的候选人未被认可，那么就轮到另一个师推举候选人，直到所有人均认可为止。[21]

这一制度肯定会产生两个结果。首先，经常会出现帕夏职位的空缺期，而且候选人要得到三个师一致同意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次，帕夏的在位期通常很短，因为只要有一名“军队长官”不再支持他，就不得不辞职。[22]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便不可避免地再次当选。多次掌权致使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过大，由此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与众不同的大家族或大家系。于是形成一个“统治阶级”，当地编年史称之为“首领阶级”。[23]

308 在1646到1825年间，廷巴克图共任命过145名帕夏，其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塔扎尔基尼、穆巴拉克·达里和扎里三个家族。扎里家族还出现过一位曼苏尔·马苏德·扎里帕夏，他在1716年武力夺取政权，将所有反对者流放，并在廷巴克图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1719年，当地人民对扎里的暴行忍无可忍，举行起义，将帕夏及其“来加”（legha，亲信）赶出城去，恢复了以前阿尔马的政治制度，但依然是长期不稳定，各师之间内部冲突不断，帕夏之职时而长时间空缺。[24]

1766年，阿尔马选举巴-哈杜·阿布·巴克尔·达里为帕夏，他因功绩卓著担任此职达八年多。他于1775年去世后，廷巴克图有18年没有帕夏。但即使帕夏之职此次长期空缺也未造成阿尔马组织机构的最后消亡，1794年，当时已变成民族集团的三大师团，又达成

[21] O. 胡达斯，1966年，第21页、50-51页和136-137页。
[22] 帕夏在被任命当天即被迫辞职的情况并不罕见。
[23] O. 胡达斯，1966年。
[24] O. 胡达斯，1966年，第70-85页。

协议选出穆斯塔法·塔扎尔基尼担任新的帕夏，并恢复了以前帕夏管辖区的所有官职。[25]

在他的继任人阿布·巴克尔·艾哈迈德·达里的统治下，帕夏成为世袭的职位。这位帕夏于1815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奥斯曼继承了他的职位。卡伊德·奥斯曼是廷巴克图最后一任帕夏。[26]

17世纪末，由于军事力量的衰败及中央政府长期不稳定，帕夏管辖区开始分裂，形成各自围绕加奥、班巴、廷巴克图和杰内等驻地或多或少拥有自治权力的若干单位。每一驻地虽然继续承认远离他们的廷巴克图的官方权力，但也独立地选举自己的首领。帕夏除了在出现严重的外来威胁时召见他们，平时很少干预各驻地的事务。

杰内的驻地像其他驻地一样保持其独立性，在整个18世纪末曾受到塞古的班巴拉人的骚扰。1754年，在据推测的“比通”(Biton,军事长官)马马里·库里巴里死亡之前不久，一支班巴拉人的军队进人戈莫蒂戈，距杰内约十公里，但并未进攻杰内。[27]

阿尔马政权在我们谈及的这一时期始终未受到干扰，杰内的“卡伊德”(ḳāʿid,军事长官,总司令)一直由当地的阿尔马贵族推举产生，除非廷巴克图拥有特别有魄力的帕夏。1767年3月，巴-哈杜帕夏自己任命了一位杰内的新长官卡伊德阿尔法·马西克，后继人是卡伊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谢里夫直到1772年去世一直担任此职。[28]

廷巴克图和杰内的贸易及政治联系从未中断，1773年，两位信使被派往杰内，宣告巴- 310 哈杜帕夏的死讯。[29] 1785-1786年，廷巴克图的两位卡伊德率军到达杰内，惩罚逃到那里避难的一帮强盗。[30] 1794年，廷巴克图得到杰内长官卡伊德阿布·巴克尔·赛义德去世的通报。第二年，廷巴克图的帕夏要求杰内卡伊德的继任人和商人们为廷巴克图补充所需的贝币。[31]

但在1796年，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在塞古被告知，杰内正式属于班巴拉王国，虽然实际上它由“摩尔人”统治。[32]

这是否说明，班巴拉对杰内起着保护国的作用？可得到的当地一些资料难以支持这种假设，并倾向于肯定勒内·卡耶的看法，即1818-1819年马西纳的富尔贝人征服杰内之前，杰内实际上是一个“单独的和独立的”地区。[33]

登迪时期的桑海

桑海人被赶出加奥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又失去两位国王和几十名帝国皇室成员，但

[25] 请参阅《廷巴克图编年史》，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f.25-6及32r。

[26] 同上，f.34.，B. 德梅济埃尔(de Mézières)，1912年，第36-37页；R. 卡耶(Caillié)，1828年，第2卷，第306-308页。

[27] 法兰西学院，吉龙古尔文库，Ms 2405，ff.7及13。

[28]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26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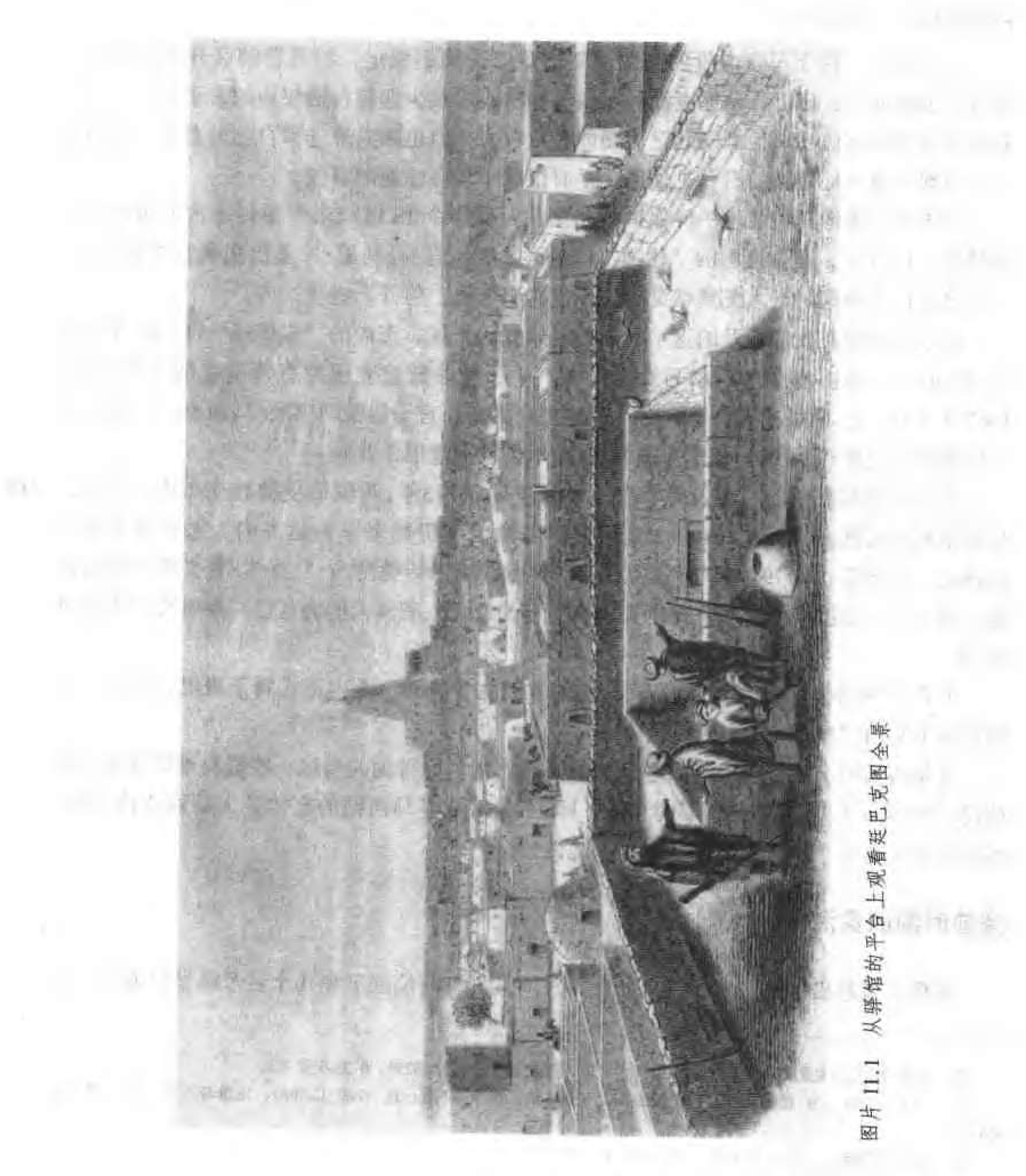
[29]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26v。

[30] 同上，f.30r和v。

[31] 同上，f.32r和v。

[32] M. 帕克(Park)，1808年，第301页。

[33] R. 卡耶，1828年，第2卷，第206页。



图片 11.1 从驿馆的平台上观看廷巴克图全景

在阿斯基亚·努赫的领导下设法阻止了摩洛哥人向登迪推进。数次激战均告失败，他们开始改变战术，利用埋伏，在凯比人[34] 的帮助下，成功地挡住了扎昆部队的进攻。但在扎昆死于邦贾加拉之后，他的继任人曼苏尔·阿卜德·拉赫曼帕夏(1595-1596年)却使桑海人为取得的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努赫战败，被迫离开落入摩洛哥人之手的部分民众，退到了登迪，于1599年被他的兄弟们废黜。摩洛哥人为桑海任命了一位受他们控制的阿斯基亚。[35]

在登迪的桑海人逐渐恢复了“异教”并分裂成几个王国，不过在17世纪中期以前它一直保持统一。

1630年，他们与摩洛哥人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摩洛哥人开始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并在其权力继承的争执中充当裁决者的角色。例如在1639年，马苏德·扎里帕夏带军进入登迪的首都卢拉米，目的是要立一位新的国王。[36]

摩洛哥人的军队刚一离开，新的国王即被废黜，但是登迪的桑海人并未乘机做出恢复自己权力的尝试。由于它已经分成了若干无足轻重的小的政治单位，因此在该地区已不再是主要的政治势力。尽管存在利普塔科和阿伊尔的游牧民族富尔贝人和图阿雷格人的强大压力，但直到19世纪初，他们一直维护了自己的自由。 312

塞古和卡尔塔的班巴拉人诸王国

在桑海西进失败和1599年马里的曼萨战败以后，尼日尔河流域的班巴拉农民便处于富尔贝人和阿尔马人人侵的威胁之下。

班巴拉人有自己的宗教，他们分成若干“卡富”(Kafu)，其马尔卡和穆斯林首领均理智地与杰内和廷巴克图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向一些传统的狩猎者团体和善战的氏族寻求保护，例如萨马克人，他们很快学会了摩洛哥人的作战方法。[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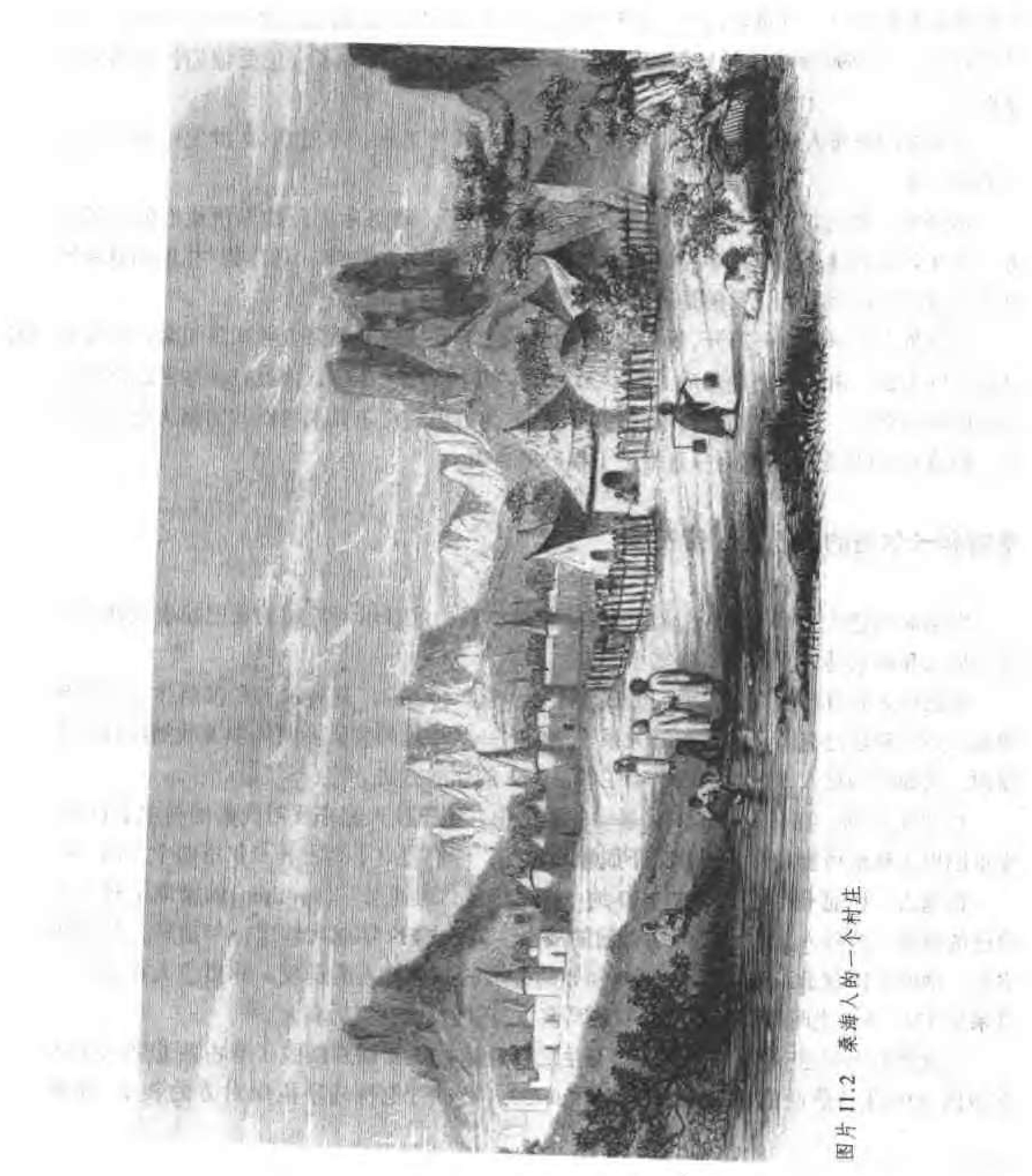
17世纪中期，在一次很像农民暴动的运动中，班巴拉人起来反对他们的马尔卡首领。库里巴里氏族很可能是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他们建立了塞古和卡尔塔两个王国。[38]

在塞古，比通·库里巴里(约1710-约1755年)在“通迪昂”(ton-dyon)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些人主要是战俘或以前的战俘。但在1739年或大约这一年前后，他刚刚立足，他的王国就遭到法马甘·瓦塔拉领导的孔国的乔奥拉人的进攻。乔奥拉人在塞古一直呆到1745年，当时他们听到孔国的法马塞古·瓦塔拉的死讯后离开。[39]

力量衰弱的比通·库里巴里利用其有生之年开始巩固王国并摆脱了塞古西北部木尔迪亚地区他的姓马萨西的表兄弟们的竞争。1753-1754年，他将战争推向对方的领土，摧毁

---

[34] 请参阅A. 加努恩(Gamn)，1964年，第127-132页，摩洛哥素丹向凯比国王去信威胁。
[35] 萨迪，1964年，第270页。
[36] 同上，第394-395页，399-400页和423页。
[37] 萨迪，1964年，第276页。
[38] 同上，第406-420页。还可参阅C. 蒙泰尔(Monteil)，1924年；L. 托克西埃(Tauxier)，1942年。
[39] O. 胡达斯，1966年，第112-113页。



图片 11.2 桑海人的一个村庄

了他们的首都森桑纳，并俘获了他们的首领富拉科罗，后者被带到塞古处死。此后，马萨西人在塞巴马纳(1754-约1758年)率领下离开这里到卡尔塔施行其统治。[40]

库里巴里死后，塞古王国经历了长时期的无政府状态，直到约1766年，恩戈洛·迪亚拉执政后才建立起新的朝代。在恢复了王国的统一之后，恩戈洛·迪亚拉在马西纳和富拉杜古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抗击莫西人和亚滕加人的国家。他与阿扎瓦特昆塔人及其首领谢赫穆克塔尔(1729-1811年)关系极好，这使恩戈洛·迪亚拉在对待廷巴克图方面十分谨慎。 313

他的儿子蒙宗(约1789-1808年)继承王位，他是塞古王国真正的组织者。像他以前的比通·库里巴里一样，他不得不面对马萨西的挑战，马萨西人自1754年以来将其权力范围扩大到金吉和贝勒杜古之间的广大地区。1792年，马萨西人还占领了尼日尔河的尼亚米纳，切断了塞古一条主要的供给路线。蒙宗予以严厉的回击。解放了尼亚米纳之后，他又回到卡尔塔，洗劫了首都盖木，马萨西国王德塞科罗被迫逃到吉迪马卡。接着，他又攻击了尼奥罗地区的奥拉德姆巴克摩尔人，因为摩尔人在他抗击卡尔塔的战争中拒绝提供帮助。回到塞古之后，他仿效他父亲的做法，将征服的土地作为酋长领地封给他的儿子们，并给他们每人配备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41]

蒙宗死于1808年。三年之后，谢赫穆克塔尔在距廷巴克图不远的地方去世。这两位首领的相继去世是尼日尔河湾地区在谢胡·阿赫马杜统治之前一直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因为富尔贝人和图阿雷格人在这两位首领之后便失去了控制。

富尔贝人和图阿雷格人

桑海帝国崩溃的主要后果之一是造成了社会的解体。自17世纪初以来，这一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撒哈拉游牧民族不可阻挡地向尼日尔河谷和廷巴克图以南的湖泊地区推进。

富尔贝人在马西纳取得了完全的优势。他们对来自廷巴克图和杰内的摩洛哥人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同时加速向西部的富塔贾隆地区和东部的利普塔科人和豪萨人的国家移居。但他们遭到恩戈洛和蒙宗的班巴拉人军队的攻击，在18世纪下半期不得不接受塞古的统治。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库纳里人开始了定居和伊斯兰化的缓慢过程。

在摩洛哥人占领的同时，还发生了阿德拉尔的图阿雷格人——凯尔塔德麦基特人和凯尔奥里米登人的扩张。凯尔塔德麦基特人直到17世纪末一直处于隐蔽地位，而凯尔奥里米登人则倾其全力对尼日尔河谷东部地区施加压力，尤其是加奥和登迪之间。

他们成了廷巴克图的灾祸，切断了廷巴克图与其外港卡巴拉的联系，干预阿尔马首领之间的冲突，并沿着河岸劫掠务农的村庄。18世纪，在经常取胜的图阿雷格人与屡战屡败力量衰弱的阿尔马人之间不断发生对抗和冲突。

---

[40] 参阅P. 马蒂(Marty)，1927年，第367-369页。
[41] C. 蒙泰尔，1924年，第66-90页和110-116页。

314 1737年5月,在廷巴克图东南约20公里处,阿门诺卡尔奥格莫尔·阿拉德在托亚大败阿尔马军，使之受到重创。300到350人被杀，其中包括在位的帕夏。[42] 尽管如此，其他图阿雷格人集团的首领们，包括凯尔奥里米登人，仍不断到廷巴克图来接受帕夏对他们的任命。[43]

1770年，塔德麦基特人包围了廷巴克图，一群阿尔马人杀害了他们的阿门诺卡尔哈巴蒂特之后，人们开始忍受饥饿。[44] 该城因昆塔的谢赫穆克塔尔·卡比尔的干预而得救。他调解了巴-哈杜帕夏与哈巴蒂特的继承人阿门诺卡尔哈米尤克之间的矛盾。1771年8月双方达成协议，其中规定阿尔马人须以马匹和砂金对图阿雷格人提供担保。[45]

但图阿雷格人撕毁了条约，谢赫又取消了对哈米尤克的道义支持，再一次树敌，致使塔德麦基特人分成敌对两派，廷吉里吉夫派和伊里加纳滕派。与此同时，他赢得了奥里米登人及其首领阿马·阿戈·谢赫的信任，这位首领利用塔德麦基特人的不和试图将其统治扩大到廷巴克图地区的撒哈拉游牧居民。于是，奥里米登人成了昆塔的主要支柱，而昆塔因阿尔马势力不断衰弱，成功地填补了后者留下的政治真空，并减少了混乱造成的影响。但在马西纳的富尔贝人帝国建立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强行获得廷巴克图的任何政治权利，也未清除阿尔马人权力的残余势力。凯尔奥里米登人强有力的阿门诺卡尔卡瓦·阿马在1796年7月，仍根据老习俗前来廷巴克图接受阿布·巴克尔帕夏对他的任命。[46]

西苏丹及外部世界

尽管曼苏尔死后摩洛哥逐渐撤出苏丹地区，但廷巴克图的帕夏仍始终如一忠实于萨阿德王朝后期的素丹王。他们每周都以马拉喀什君主的名义吟诵星期五的“呼图白”(khutba，清真寺的讲道)，马拉喀什的君主们也不厌其烦，向廷巴克图帕夏以及加奥和杰内驻地长官们宣布登基。

1659年，当萨阿德王朝最后一任君主被暗杀后，将帕夏与王朝联系在一起的“贝耶”
315 (效忠誓言)立即失效。1660年,“从库克耶到比纳的整个塔克鲁尔地区”,人们已经停止以莫雷·艾哈迈德·曼苏尔子孙的名义吟诵“呼图白”，这是可以理解的。[47] 但是十年后，当阿拉维特王朝在摩洛哥掌权之后，阿尔马人又恢复了对摩洛哥王位的忠诚，先是效忠莫雷·拉希蒂，后又效忠于莫雷·伊斯梅尔。[48]

与萨阿德王朝不同的是，阿拉维特王朝对尼日利亚的萨赫勒地区很少注意。他们的政策针对的是毛里塔尼亚而不是苏丹地区。正当欧洲人为得到阿尔金角以及阿拉伯树胶的贸易而争战不休时，莫雷·伊斯梅尔则通过支持特拉扎的埃米尔，坚定地在毛里塔尼亚建立

---

[42] O. 胡达斯，1966年，第168-178页。

[43] 同上，第253页。

[44]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f.26v-27v。

[45] 同上，f.28v；请参阅巴黎国立图书馆，Ms 5334，《Kitab al-Tara'if》，谢赫穆克塔尔之子著。

[46] 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32r；法兰西学院，吉龙古尔文库，Ms 2406，第75篇(塔里克·菲图加)。

[47] O. 胡达斯，1966年，第145页。

[48] 同上，第185页；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6399，ff.214-18。

了自己的政权，甚至不时派一些正规部队前往塞内加尔河流域。这些人是奥尔曼人，他们对塞内加尔流域实行恐怖统治直至18世纪20年代。[49] 他们控制着富塔托罗地区，根据他们的需要任命或废黜萨蒂吉(satigi,首领)，并对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的居民施加强大的压力。他们在该地区抓获的战俘用做扩充摩洛哥素丹建立的著名的黑人军队"阿比德"('Abid)。阿比德军的突袭活动给邦杜、班布克地区，尤其是加拉姆地区带来了灾难，他们多次威胁到圣约瑟夫堡法国人贸易站的安全。

尽管如此，阿尔马人一如既往仍对阿拉维特的国王表示某种尊敬。据英国作家J.G.杰克逊说，廷巴克图的帕夏管辖区仍继续对莫雷·伊斯梅尔的继承人表示效忠。[50]

西迪·穆罕默德素丹上台后(1757-1790年)，摩洛哥对苏丹地区的政策有了新的开端，其基础是恢复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像萨阿德最后几位国王一样，阿拉维特素丹在与欧洲国家政府通信时，一直把自己当做是"加奥和几内亚的君主"。这看来有些夸耀，而且没有值得高度信赖的英国领事J.马特拉的证明材料，他曾于1786到1806年在摩洛哥任职。[51]

再者，他那样称呼自己在富尔贝人进行圣战的前夜似乎还是符合苏丹对廷巴克图的地位所采取的立场。这至少是努赫·塔希尔的文章所示意的，他是马西纳的一位学者，是谢胡·阿赫马杜最亲近的助手之一。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曾宣布最后一位伊斯兰哈里发谢胡·阿赫马杜的降临。通知的对象是"阿尔卜和马拉喀什的素丹及其附属国廷巴克图、阿拉万、布-杰贝哈、陶代尼及苏斯全境和图瓦特"。[52]

如此分类可能并无事实依据。但是廷巴克图的政治演变，虽然反映的是尼日尔河两岸前摩洛哥领土的内部自治，在许多方面仍可以同17和18世纪柏柏尔人摄政时期的演变相比较，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主权始终举足轻重，虽然现在已名存实亡。 316

经济及社会发展

自然灾害与人类环境

到1700年代末期，西苏丹地区已不再是1591年曼苏尔所说的富饶和繁荣的国度了。

17世纪初灾害不断：旱灾、粮荒、流行病和饥荒，庄稼无收，人口骤减，并加剧了游牧民族和定居者的紧张关系。自1639年起，灾害的缓解期日益缩短，危机时间更长，更严重。就在这一年，尼日尔河湾的谷仓杰内地区发生了饥荒。连续四年的饥荒从中部三角洲地区一直扩大到整个尼日尔河湾地区。由此而造成的灾难很可能是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源，这一运动带来的是塞古班巴拉人王国的兴起。[53]

18世纪只有少数年份没有发生危机。1711至1718年，发生了最初的七年粮食短缺危

[49] 参阅A.德拉古尔(Delcourt)，1952年；B.巴里(Barry)，1972年。
[50] J.G.杰克逊(Jackson)，1811年，第296页。
[51] 巴黎国家档案馆，外交事务档案，B_1，831；R.哈莱特(Hallet)，1964年，第81页。
[52] 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f.74-78。
[53] 萨迪，1964年，第339页。



图片 11.3 班巴拉人在扮演农业之神诞生仪式中使用的蒂伊瓦拉羚羊头饰

机。而后从 1738 年始，西部苏丹地区又经受了最严重的一次饥荒，此次饥荒涉及到整个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大部分地区。[54]

1741 年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灾害极其严重，发生了“人吃死动物和死人”的情况。这一时期，战争和小规模的冲突频仍，使苏丹地区的人民之间相互敌对。[55] 1744 年以后，

[54] O. 胡达斯，1966 年，第 14、63、102、105 和 191-192 页；P. 马蒂，1927 年，第 562 和 565 页。
[55] O. 胡达斯，1966 年，第 116-119 页。

荒情开始缓解，但瘟疫每隔数年即流行，如1748-1749年、1762-1766年，尤其是1786-1796年始终肆虐流行。[56]

结果，尼日尔河湾地区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当地的人民和自然景观均受到百般蹂躏，伤痕累累。

廷巴克图、大湖与尼日尔河之间的地区是各氏族的汇聚地。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的民族汇聚在这里，游牧和农业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共存。但由于好的草地牧场往往也是适于耕作的土地，因此人们经常发生冲突，而且这一地区还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能够控制游牧民或农业居民互相侵占土地，致使冲突日益严重。 318

于是，炎热季节就成了整个地区混乱和不安定的时期。廷巴克图东部和南部的凯尔塔德麦基特人与贝拉比什人、凯尔马戈沙伦人、凯尔卡特万人、加里穆萨人和其他祖先为毛里塔尼亚阿克累的“贝丹”(baydan,游牧民)比较接近，他们向拉斯马和马西纳北部迁移，经常与富尔贝人为争夺季节性的贫脊牧场而争斗。

每当热季结束、第一场雨将农民又引回土地上时，冲突最为激烈，游牧民若迟迟不撤离牧场或发生任何混乱都会对农业收成造成严重的威胁。

当地的生产及地区性贸易

在靠近沙漠的地区，农业逐渐衰落。但在有些地方，为发展农业而占领土地的情况却日益增多，如班巴拉人向巴拉迁移，马西纳富尔贝人开始定居，一些图阿雷格人或图阿雷格化了的居民(凯尔安塔萨尔人)也在廷巴克图周围地区定居下来。

此外，由于尼日尔河具有交通便利、传统贸易网络发达等有利条件，因而地区间的贸易可以帮助减轻自然灾害的后果。

杰内当地粮食生产得到周围桑地区产品的补充，其中包括花生、猴面包树果、非洲酪脂树产品、蜂蜜、干洋葱、多香果、豆类和马唐。此外还有棉花、靛蓝、制肥皂的山扁豆、羊毛、蜡、本杜古的铁，当然还有森林地区的两种主要输入品：柯拉果和黄金。[57]

船只离开杰内前往廷巴克图，可在库巴卡停靠，在该地附近——18世纪是在索法拉，孔国的乔奥拉人建立了一个养马中心。[58] 尼日尔河和巴尼河的交汇处是伊萨卡(后称莫普提)，那里有食品和手工业品的大市场。[59]

过了代博湖，尼日尔河分成两条主要的支流，伊萨巴河向西，巴拉伊萨河则向东而去。在萨拉费雷建立之前，巴拉伊萨河的主要定居点一直是萨。廷巴克图地区最大的农耕地区靠近泰莱湖、奥罗湖和法蒂湖，以及沿回水地区。摩洛哥人来到之后，小麦种植才在苏丹地区流传开来，因为只有大城市中的阿尔马人和北非商人吃面包。[60] 生产的经济作物

---

[56]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259，ff.24r-v；26r-v，31v-32v。

[57] R. 卡耶，1828年，第2卷，第210-217页；C. 蒙泰尔，1977年版，第11-14页。

[58] 同上，第236页；萨迪，1964年，第303和488-489页。

[59] 同上，第239-240页；萨迪，1964年，第303页。

[60] O. 胡达斯，1966年，第117页。

319 中有烟草和阿拉伯树胶，都是在贡达姆和法吉宾湖周围大量收集而来。[61]

在廷巴克图的商业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众多的手工业者：制盐者、纺织工、裁缝、制革工、鞋匠、金银匠、陶器匠、农具和武器制作工匠。每一种手艺均出自某一民族垄断的专业作坊，例如，所有的印染工都是桑桑丁人，而阿尔马人则垄断了制鞋业。[62]

尼日尔河谷东部地区自桑海帝国时期以来一直饱受苦难：加奥瓦解之后，该地区始终处于贸易网络之外，又因长期的旱灾和水土流失，大部分人成了游牧民。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和大西洋贸易

尽管16世纪末尼日尔河湾地区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但该地区的贸易却有着地理、经济和社会的坚实基础，虽经过摩洛哥人的征服和欧洲人在海岸地区发展贸易长久仍历久不衰。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克服了由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中央权力的削弱而带来的所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一直是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广大地区主要的经济活动。16世纪以来该地区经历的无情变化并非贸易量方面，而是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可能性有关的经济意义。

路线

1591年以后，从达拉到塔加扎再到廷巴克图的道路成了在萨阿德王朝的摩洛哥与西苏丹地区之间的王家贸易路线。军队运输队和素丹手下人组织和监管的商队均使用这条路线。曼苏尔死后引发的动乱首先使这条路线受到影响。商人逐渐疏远了达拉和塔加扎而转向苏斯和塔菲拉勒特，那里当地的宗教首领起着有利的作用。这样，在摩洛哥人征服之后不到50年，道路网络又恢复到中世纪时期的状况。影响着萨赫勒-苏丹这部分路线的变化是最为持久的变化。

大西洋路线 大西洋路线在撒哈拉的那部分正好是古老的特里克兰图尼路线，该路线于17世纪20年代恢复并得到阿拉维特王朝的加强。

在莫雷·伊斯梅尔统治时期，从特戈达乌斯特和古利明来的商队曾穿越马基尔人的土地，而马基尔人因多方面原因决心与谢里夫王朝同舟共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朱坎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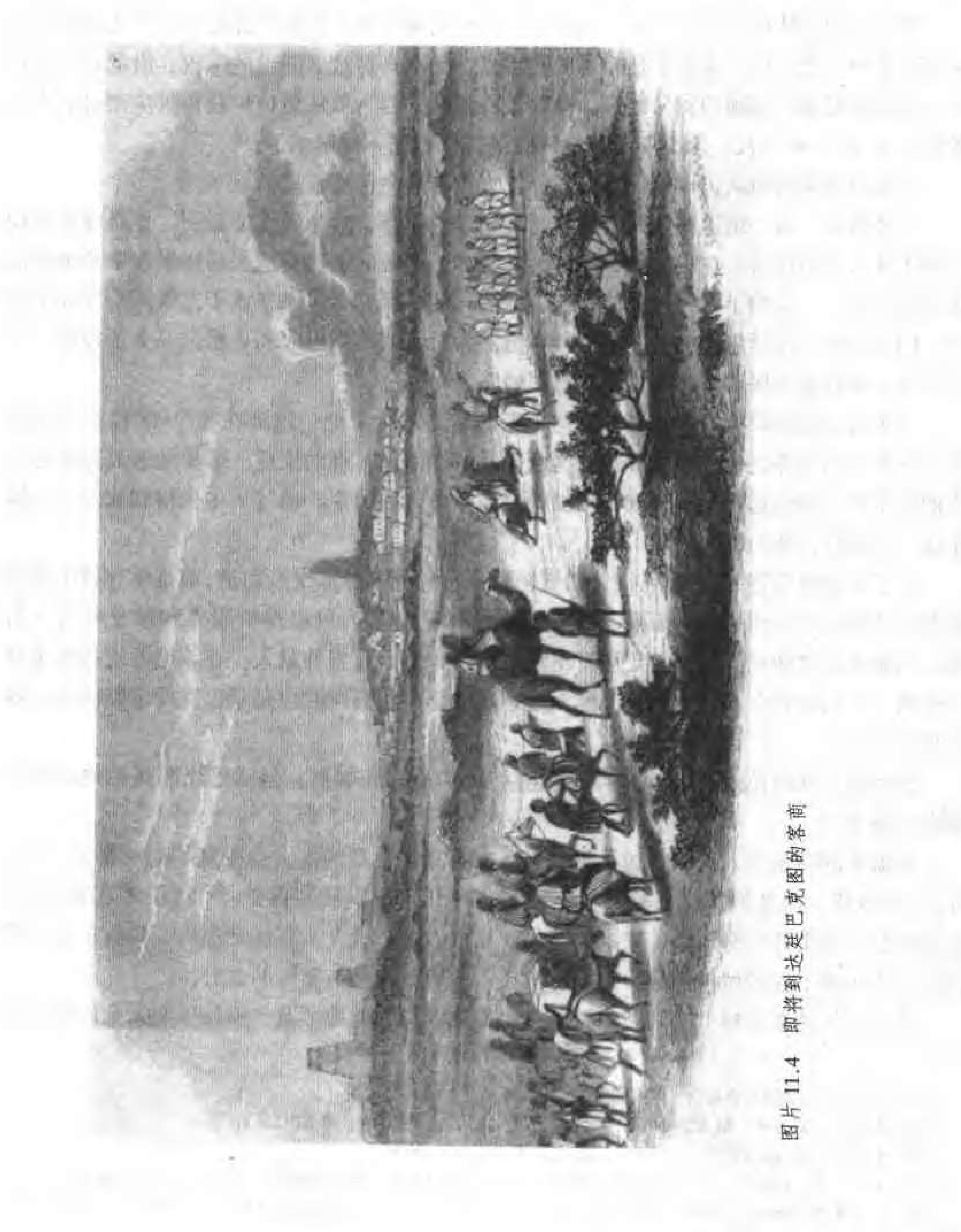
321 人，他们是从摩洛哥南部到毛里塔尼亚高原所有商队的主人。[63]

此外，由于卡德尔和提贾尼等教派的宗教信条在撒哈拉西部地区的传播，大大加强了摩洛哥南部宗教中心与撒哈拉南部宗教中心人员和思想的交流。阿卡、廷杜夫、斯马拉、辛盖蒂和布特里米特既是卡德尔教派闻名的宗教中心，又是重要的贸易驿站。从辛盖蒂或瓦丹来的商队通过特拉扎地区到达塞内加尔的圣路易堡，通过卜拉克纳地区到达加拉姆，通过前往提希特和瓦拉塔的达尔的道路到达霍德。在加拉姆，尽管有法国人的圣约瑟夫

[61] R. 卡耶，1828年，第314-321页。

[62] A. 迪普伊-雅库巴(Dupuis-Yacouba)，1921年，第25-28页、38-39页、61-63页和79-80页。

[63] P. 马蒂，1910-1911年，第3卷，第97-98页和132-134页。



图片 11.4 即将到达廷巴克图的客商

堡，摩尔人的贸易活动完全占据着支配地位。[64] 从霍德出发，有几条路径通过金吉的迪亚拉、贡布、巴西库努和索科洛的贸易驿站向南直达班巴拉人的卡尔塔和塞古王国。[65]

摩尔人的商队可以直达塞古、巴南巴，甚至尼亚米纳，但是大部分班巴拉人的贸易活动是在桑桑丁进行的。桑桑丁是船运的转运点，独木舟穿过索图巴的急流，沿尼日尔河而上；同时也是塞古王国的贸易港口。桑桑丁逐渐减少因为要从撒哈拉获得供应而对杰内的依赖，18世纪90年代，桑桑丁的贸易网已像首都巴尼一样繁忙了。[66]

从瓦拉塔来的商队仍通过拉斯马和廷巴克图与杰内保持直接的联系。[67]

东部路线 这一组道路开始于摩洛哥的塔菲拉勒特，穿越图瓦特绿洲，也是摩洛哥朝圣的大队人马的通道。在提米蒙，从图瓦特到苏丹地区的道路与通往马格里布中部地区的道路相联接：一条始于古莱阿前往姆扎卜绿洲、艾格瓦特，另一条始于古莱阿前往瓦尔格拉、图古尔特、托泽尔和加夫萨，这两条道路为游牧居民尚巴人和乌格拉马人所控制，他们的唯一职业就是保护商队和为商队指引道路。[68]

在更南边的因萨拉赫，是通往古达米斯的道路的交汇处，该地在整个18世纪是的黎波里与突尼斯争夺之地，亦是苏丹地区的商品运往两国首都的渠道。那里的客商也是廷巴克图最富的，他们通过加特绿洲和阿加德兹与豪萨人的国家、通过迈尔祖格和比尔马与博尔诺一直保持长期的联系。[69]

322 过了提迪凯勒特绿洲之后，商队沿着阿赫奈特的西部边缘继续前进，艰难地穿越了塔奈兹鲁夫特地区之后到达阿北瓦特和昆达人的营地。昆达人可以提供服务和信息并为人祈福，当游牧民之间或游牧民与定居者出现争执时，他们充当仲裁人，在该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他人最好的保证，他们同时也是廷巴克图道路的最有效的保护者。[70]

有些商队从阿拉万和布-杰贝哈出发直接到达班巴和加奥，但廷巴克图是沿途最吸引商队的城市。[71]

向城里的阿尔马人首领赠送礼品之后，来自马格里布的商人会受到“迪阿蒂吉”(di-atigui)的款待，向他们提供运输工具，如果需要，还提供武装保护。[72] 对很多客商而言，旅途在廷巴克图并没有结束，来自北非的商品将由同一批人一直运到杰内。只有杰内上游地区才会出现不同的贸易网络，其中乔奥拉人的贸易网是最重要的成分。

朱乌拉人的贸易网 有两条重要的路线将杰内与森林地区及产柯拉果和黄金的地区连

[64] 参阅圣约瑟夫堡长官通信，国家档案馆，殖民地档案，C6。

[65] M. 帕克，1799年，第303-304页；A. 戈尔贝里(Golberry)，1802年，第287-288页。

[66] M. 帕克，第303-304页；R. 卡耶，1828年，第2卷，第380页。

[67] O. 胡达斯，1966年，第21-25页和102-104页；H. 巴思(Barth)，1857-1585年，第5卷，第481-482页。

[68] E. 卡莱特(Carrette)，1844年，第91页；A. 多马斯-尚塞尔(Daumas-Chancel)，1848年，第111-116页；H. 迪韦里埃(Duveyrier)，1859年，第6-7页、16-17页和19-24页。

[69] L. 德塔西(de Tassy)，1757年，第2卷，第180-182页；R. 哈莱特，1964年，第82-84页；E. 卡莱特，1844年，第143页。

[70]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334, f.79r；P. 马蒂，1920-1921年，第1卷，第27页和第49-51页。

[71] H. 巴思，1857-1858年，第457-458页。

[72] O. 胡达斯，1966年，第138页和203页。

接起来。第一条路沿着布雷或乌洛杜古方向向西南伸延，到达柯拉果产区的边缘。第二条路向东南方向伸延，向着孔人和阿散蒂人的地区延伸。[73]

孔国将洛比和黄金海岸的柯拉果和黄金供应杰内。两种产品均由从陶代尼向布纳贩卖盐块的朱乌拉商人所携带。他们还携带棉制品和在库马西附近市场上购买的欧洲商品。[74]

与这一条商路平行的另一条路线是莫西人的一支雅尔塞人在廷巴克图和阿散蒂人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该路线沿着杰内和内河三角洲地区前行，并经过顿察、科良宰、阿瓦基和迪雷，或通过瓦希古亚、邦贾加拉、孔纳和科良宰继续向前延伸。

除了莫西人这些贸易路线之外，在廷巴克图和豪萨人国家之间似乎还有一小部分贸易活动沿着河流直到昂松戈、达洛尔和莫里进行。这是朝圣者的道路，他们到达卡诺之后，又北上，到达费赞，继而通过奥吉拉和锡瓦到达埃及。[75]

摩洛哥人向苏丹西部地区的出口商品极其丰富。有当地产品，从粮食和宗教书籍到丝绸、衣服和烟草，均是从梅克内斯来的，也有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商品(香料和丝绸)和来自欧洲的商品(纺织品、食糖、咖啡、茶叶、玻璃器皿和火器)。 323

在马格里布中部地区，苏丹的贸易是图瓦特、姆扎卜、苏夫和贾里特诸省的主要活动来源。它包括品种广泛的商品，从卡诺的靛蓝织物和"图尔克迪"(turkedi)到产自阿散蒂的柯拉果；在拥有很多黑人居民的马格里布整个南部地区广泛食用柯拉果。[76]

这种种类繁多、持续不断的贸易是很赚钱的。[77] 其经济意义与该时代贸易活动的整体相比较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它还传播了文明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

贸易商品

食盐在马格里布地区与萨赫勒及苏丹地区人民之间的贸易中只占很少的份额。自17世纪初以来，尽管在塔加扎和陶代尼有摩洛哥人的"卡伊德"，[78] 但尼日尔河沿岸城镇仍以不同的方式和独自的路线接近撒哈拉地区的食盐产地：摩尔人和图阿雷格人的"阿扎莱"(azalai)。因此，对来自北方的商队来说，重要的是使他们出口到苏丹地区的商品多样化。另外，苏丹地区除了其传统的出口物品黄金、奴隶和象牙外，也需要一定数量的纺织品和珠宝等制成品。这类产品的需求比例上升，而黄金和奴隶的输出却在下降或停滞。[79]

---

[73] R. 卡耶，1828年，第2卷，第99-103页；L.G. 班热(Binger)，1892年，第2卷，第141-142页。

[74] L.G. 班热，1892年，第1卷，第316-317页和第373-374页。据说红色棉织品来自库马西，20世纪中期在廷巴克图家喻户晓：O. 胡达斯，1966年，第96页。

[75] 巴黎国立图书馆，阿拉伯文库，Ms 5713，ff.30-1。

[76] R. 莱塞尔(Leselle)，1957年；L. 瓦兰西(Valensi)1967年。

[77] 主要参阅：G. 朗普里耶尔(Lemprière)，1891年，第290页；J. 格拉伯格(Gråberg)，1834年，第146页；L. 戈达尔(Godard)，1859年，第117-120页；普拉克斯(Prax)，1845年。

[78] 据说，摩洛哥的卡伊德在陶代尼一直住到法国人征服前夕。请参阅关于阿拉万地区的皮雄(Pichon)报告，塞内加尔国家档案馆，达喀尔，1G254。

[79] R. 卡耶，1828年，第2卷，第383-384页；普拉克斯，1845年，第344页。

虽然该地区出口的黄金数量无法与摩洛哥人征服之后从苏丹地区带走的数量相比，但黄金仍是所有从苏丹地区返回的商队所载的部分商品。17世纪末，在莫雷·伊斯梅尔组建了他的“阿比德”(Abid)军队之后，奴隶的输出有了明显的增长，而在18世纪后半期，阿拉伯树胶则在苏丹地区对摩洛哥的出口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摩加多尔港口的开放为苏丹地区的商队提供了一个新的出海口，除上述商品外，还销售大量的驼鸟毛和象牙。

324

文化与宗教的发展

19世纪圣战前夕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

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经常被说成是一个衰败和在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时期。但是，如果这意味着是伊斯兰文化的衰败和退化，则这种论点需要重新修正。通过穿越撒哈拉的持续不断的贸易活动，通过扎维亚、兄弟会和马拉布特团体，通过有高度组织的朱乌拉人贸易网络，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尼日尔河流域的各族人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

正像勒内·卡耶在19世纪初观察到的那样，廷巴克图和杰内的所有居民都能使用阿拉伯语读书和写字。这一有力的交流方式得以广泛传播的最好证明是，这一地区的历史学家可随时查阅丰富的文字资料。廷巴克图著名的编年史“塔里克”(ta'rīkh)全部写于17至19世纪这段时期。

伊斯兰教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仅存在于城市之中。伊斯兰教也不再是仅仅通过住在城市里的乌里玛进行传播，在组织上不再仅与某个社会集团、商人们相联系，也并非仅与某一种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了。

伊斯兰教传播到整个国家，影响到班巴拉农民和富尔贝牧民。伊斯兰教新的传播者是柏柏尔人或苏丹的马拉布特团体，他们把学习和传播穆罕默德的教诲当做自己主要的工作。

马拉布特团体(zuwaya或insilime)的出现是民族-社会阶层化的最惊人的现象之一，于17世纪下半期发生在撒哈拉南部边缘地区。在发生了我们至今知之甚少的人口剧变和武装斗争之后，从塞内加尔到阿伊尔高原的游牧人社会分裂成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武士”集团和神职人员集团，后者享有崇高的宗教威望，投身于学习和实践伊斯兰法规和神秘主义的神学之中。

他们的扎维亚吸引了不少学生，同样也吸引了寻求保护的商人。谨慎地设置在贸易路线上的很多这样的兄弟会中心后来都成了重要的商队驿站。阿拉万和布-杰贝哈(廷巴克图以北)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均由凯尔苏克马拉布特团体所建，后来被昆塔人移置到自己的领土上。另外还有迈卜鲁克和马蒙，及前面提到的凯尔苏克营地，在18世纪谢赫穆克塔尔统治时期，成了昆塔势力范围之内两个最重要的中心。

沙漠地区的谢赫们使城里的乌里玛黯然失色，成了18和19世纪大部分圣战鼓动者

的精神首领。在1775年圣战之前，富塔托罗的阿卜德·卡德尔埃米尔是与辛盖蒂的艾特达伊 325 曼人一起开始其学习生活的。奥斯曼·丹·福迪奥在阿伊尔高原的艾特阿瓦里人兄弟会中遇见他的老师吉布里尔·伊本·乌玛尔。昆塔人对谢胡·阿赫马杜的影响是尽人皆知的，就像辛盖蒂的伊达乌阿里人对哈吉吉·乌玛尔·托尔的影响那样。



图片 11.5 廷巴克图的一座清真寺

马拉布特的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是阿尔莫拉维德传统的继续，它的战斗性与苏丹地区城市和朱乌拉人中心以宽容的多宗教调和为特征的“黑人伊斯兰”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通过与像卡德尔教派(在苏丹地区的主要代表是昆塔人)那样普遍的兄弟会和宗教团体联合，马拉布特的伊斯兰教不仅向其追随者提供了宗教，而且还为其提供了超越民族或氏族等传统认同类别的社会网络。

苏丹地区传统的伊斯兰教与政权和首领们关系密切，而圣战之前马拉布特的伊斯兰教 326 则将其影响侧重于下层，方法是通过兄弟会和牧民们的联合行动，他们在 19 世纪准备对整个萨赫勒地区进行宗教征服。这是一种号召的力量，一种争取社会和政治解放的力量，因为它吸引了富塔托罗正在与丹尼扬克王朝政权进行斗争的图库洛尔人。它也吸引了马西纳的富尔贝人，他们正进行摆脱班巴拉人和“阿尔多”(ardo)束缚的斗争，同样，富尔贝人和豪萨地区的农民正为反对在戈比尔、卡诺、卡齐纳等地建立王国霸权而斗争。

(杨荣甲 译)

12 从尼日尔河到沃尔特河

M. 伊扎德和 J. 基-泽博

327 随着摩洛哥人的入侵，加奥帝国于1591年被推翻，尼日尔河湾顶部地区政治权力的基本结构随之分崩离析。由此造成的重大政治真空开始逐渐由其他强国所填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受到被推翻的帝国中心散发的离心力和其周边地区发挥的整合力的影响，权力变为地区化了。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河上游地区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四极格局：塞古和卡尔塔的班巴拉人诸王国、莫西人诸王国、孔和格韦里科诸王国和古尔曼西巴人诸王国。这四极格局是在诸多民族失去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形成的。据说，这一时期的权力"部族化"主要是在奴隶贸易的影响下发生的，奴隶贸易构成了当时的经济背景，即使对远在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河腹地的各国来说也是如此。[①] 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此后的事实表明，非洲各王国是按地理区划而建立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多样化的性质。换句话说，马里和加奥帝国的传统继续保持了下来，只是规模缩小，手段有所改变，而且环境日益受到形成新政治结构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冲突的支配。此外，某些社会经济和宗教因素对这一改组过程有过影响，但这些都不能说是"部族性"的。到18世纪末，这些因素导致了最初的裂痕，预示着19世纪的大动荡。

329 民族、酋邦和王国

16至19世纪塞古和卡尔塔地区班巴拉人诸王国

政治演变

班巴拉人[②] 诸王国的起源虽然不算古老，但是由于口头传说和编年史种类繁多而变得模糊。由欧洲旅行者、军官和行政官员在加奥帝国垮台前后所搜集和汇编的口头传说及非洲传统主义者编纂的资料现已见诸文字，也都众说纷纭。有关各王国统治者的承继次序及其执政时间，意见经常不一致。[③]

---

① 班巴拉人在贩奴者的名单上出现，他们在17世纪突然兴起，很可能也与当时捕获奴隶活动有关。

② 班巴拉人自称班马诺(Bamanaw)，但我们在本文仍采用目前他们名称的官方拼法。

③ 这方面观点相近的著作有：A. 拉芬奈尔(Raffenel)，1846年和L. 托克西埃(Tauxier)，1942年；M. 德拉福斯(Delafosse)，1912年和1913年和C. 蒙泰尔(Monteil)，1924年。我们在历史编年方面采用前面两人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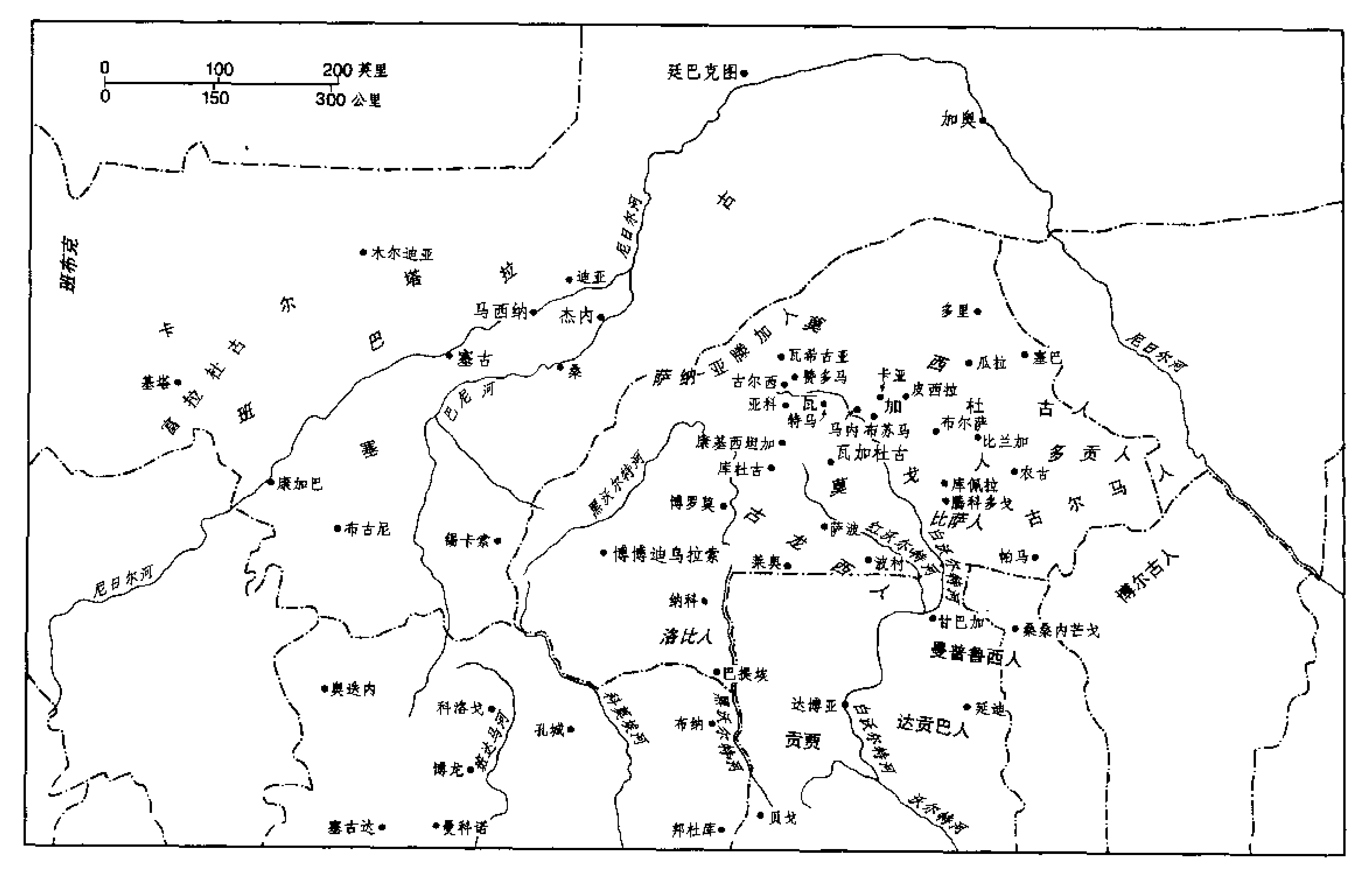


插图 12.1 16 至 18 世纪的尼日尔河-沃尔特河地区

但是这篇研究文章更加关注的是当时产生和造就伟大人物的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而不是这些伟人的行动。本文在简单扼要地讨论历史事件之后，将主要探讨16至19世纪推动这些民族发展的种种组织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对于班巴拉人诸王国那些开拓性的历史人物的看法。托克西埃的著作曾断言："归根结底，班巴拉人本身从来没有建立王国的能力。塞古和卡尔塔地区的国王都来自富尔贝人，而锡卡索和孔国国王则是曼德-朱乌拉人。至于普通的班巴拉人都是真正的黑人，素质相当低劣。但他们作为工人和农民还是不错的。"④ 由于班巴拉语是曼德语的一支，而且各民族很早就已开始混杂，尽管班巴拉人和富尔贝人之间有着许多生物学的联系和政治上的联盟（和战争），例如，击退马里末代皇帝曼萨马根（1645年）的进犯和进攻孔国，我们今天的主要兴趣显然不在这里。⑤ 班巴拉人的起源肯定已无法查考，但是传说中反映的当时的迁徙可能说明他们早已是尼日尔河湾的居民。在班巴拉人之前居住在那里的还有博佐人，这点几乎可以肯定无疑。他们也同索宁克人、索索人、马林克人、富尔贝人以及其他民族混居。拉芬奈尔曾提到一则描述居住在多龙土地上的民族起源的神话，说多龙离塞古同离月亮一样遥远。因此，它不可能指的是西南方附近瓦苏卢的多龙。事实上，在库里巴里人（库鲁巴里人）和凯塔人或者杜尔人之间存在的玩笑关系（sanankunya）证明班巴拉人和马林克人⑥ 之间存在悠久的关系，他们操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的方言。

330

不管从哪一种情况看，班巴拉历代王朝中有关命名的祖先移民的故事中都包含了渡河的主题，这在非洲的许多传说故事中屡见不鲜。两位名叫巴拉曼戈罗和尼安戈罗的兄弟被敌人穷追不舍，到河边（可能是鲍勒河或者尼日尔河）却找不到独木舟渡河，但在最后时刻巧遇巨大的"姆波利奥"（m'polio 鲇鱼）而终于得救。⑦

这个关于班巴拉人起源传说中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们同索宁克人（也称马尔卡人）的迅速联合，有时出于选择，但经常是被迫的。索宁克人是定居已有数百年之久的商人，有时也贩卖奴隶，但无意当兵，不过班巴拉族新来的居民几乎把当兵视为职业。两兄弟之一巴拉曼戈罗在尼日尔河右岸塞古国的布亚尔人处寻求避难。塞古布亚尔人属索宁克人，他们给了他一个管区，虽说是单独的地盘，但允许新来的班巴拉人保卫整个塞古王国。与此同时，另一位兄弟尼安戈罗渡河后在拜柯修筑了一座城堡（tata）。马尔卡人在攻城失败后，最终定居下来，同新来的班巴拉人建立了和平与相互补充的关系，直到朱乌拉人从多龙带来的俘虏争得自由，并成为尼安戈罗部队强大的增援力量。这就是班巴拉人（无疑是渐进的）从难民地位变为其东道主的保护者，而最终成为主人的运动。在大多数有关班巴拉人

④ L. 托克西埃，1942年，第8页。

⑤ L. 托克西埃在谈到体质人类学时进一步写道："夸特雷弗吉斯（Quatrefages）和汉梅（Hamy）在第359页推断说，居住在尼日尔河谷上游的曼丁哥人［曼德人］和班巴拉黑人，看来属于豪萨族和苏丹族。苏丹族是低劣的黑人，即真正的黑人，豪萨族则是一种优等黑人，或者说是同埃塞俄比亚人或含米特人的混血种。"（1942年，第16页）。

⑥ 见R. 佩奇亚德（Pageard），1957年。有些作者解释这些人在马里的曼萨时代地位低下是由于他们拒不接受马里的权力和穆斯林宗教，因此他们被叫做巴马纳（Ban mâ na）意思是"拒绝主子"。

⑦ 渡河不用独木舟的事实被说成是库里巴里人（库鲁巴里人）（库鲁，kulu，意为独木舟，巴里，bali，是没有的意思）祖先名的来源；但是也有别的词源说法。



图片 12.1 索宁克人的跪姿两性人木制小雕像，一副献祭的神态。高 29 公分

政权的描述中，这一过程说得一清二楚。

这段历史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尼日尔河中游的重要战略地位。尼日尔河湾在此处伸入沙漠的最深处，是直插非洲北部的通道。在400年时间里，尼日尔河中游西岸地区的统一，使政治权力发生两极分化。权力是难以与别人分享的。这就是塞古和卡尔塔两个姊妹王国不断相互进攻的原因。这些征战把远及塞内加尔河和北部上沃尔特河一带的各个民族都调动起来了。

要将历史上知名的第一批领袖同班巴拉王朝最早两位传说中的祖先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关于塞古国，据我们所知，按几位作者的说法，巴拉曼戈罗的后裔之一卡拉迪安·库里巴里是经由丹法萨里和索马传下来的马马里·库里巴里的曾祖父。[⑧] 在口头传说中未曾涉及的卡拉迪安被描述成为在17世纪几乎恢复了马里的伟大地位，从摩洛哥人的手中重新征服了廷巴克图。[⑨]

332

根据尼奥罗的传说，与此同时，在尼日尔河左岸的卡尔塔，尼安戈罗的儿子森桑(约1635年)在木尔迪亚附近建立了森桑纳国。他的儿子马萨(约1666年)是一位闻名的农夫，子女很多。他不把几十个女儿嫁给王子，因为他无法将他们争取过来，而是将女儿嫁给了穷人，条件是他们必须和他住在一起并且信奉他的事业。他定期发动的征战也吸引来许多冒险家，而来投奔者也得首先证明自己是种田能手之后才能为他所接纳。[⑩] 马萨的儿子贝内法利(约1710-1745年)继续奉行同样的政策，并且还巧妙地把家庭农耕生活同残酷的军事征伐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拓展了马萨西王国的权力范围。

富拉科罗继承其兄长贝内法利的王位，未能避开马萨西同塞古国王之间最初的严重冲突。塞古国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的领土包括尼日尔河谷及其主要的支流，人口较多，而且生产者也更加多样化，包括班巴拉人农民和武士、索宁克人和朱乌拉人商人、富尔贝人和摩尔人牧民，以及索莫诺人和博佐人渔民和运输人员。塞古的权力被马萨西人这一优等复合体所抵消，尤其是在塞古人改朝换代之后，马萨西人自称有更纯正的贵族血统。

可是，富拉科罗不得不同精明能干的塞古统治者马马里·库里巴里(1712-1755年)相对抗。马马里是塞古王国真正的奠基人巴拉曼戈罗的曾孙。马马里的母亲会酿造“多罗”(dolo,小米啤酒)和蜂蜜酒。马马里的体格强壮，很快成为由同时行割礼的男孩组织“通”(ton)的头领，他因此得名比通，或称蒂贯通。同龄男友一起打猎、耕种，一起喝酒嬉耍，由此造就了马马里这样一位社会领袖，后来又成为政治领袖，但他不属于塞古王国的老人统治体制和宗教制度。[⑪] 此事在“通”内外带来冲突：内部冲突是由于马马里决定要垄断每星期一举行的聚会以及来宾带来的贡品，而过去这是由大家分享。但主要冲突还在于马马里与索宁克商人之间，年轻的索宁克商人首领卡萨姆在一系列争执之后终于被杀害。[⑫]

---

⑧ C. 蒙泰尔，1924年，第21页；L.C. 班热(Binger)，1892年，第2卷，第386页。

⑨ L. 托克西埃，1942年，第63页

⑩ 马萨以他自己的名字为朝代命名。马萨西的意思是“马萨的儿子”，但也作“国王的后裔”讲。

⑪ 班巴拉国家在“通”这种社会机构的基础上的形成过程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⑫ 例如，卡萨姆曾提议用牲口来清算罚款，目的在于将“通”纳入动产领域，在该领域里索宁克人必然会名列前茅。

长老们担心马马里的权力日益扩大，马马里为了争取年轻人，消灭了东库纳和巴南科罗的 333 长老，冲破了老人统治的传统。

当这些村庄的成年人请求他援助时，马马里抓住机遇首先反抗愿以瓦塔拉的黄金换取为其服务的孔国，后来又向马萨西人发动进攻，他用在国外取得的成功巩固国内的成就。

马马里只能通过与马西纳富尔贝人的联合击退孔国第一次干涉（约1725年），当时马西纳富尔贝人正在富拉杜古（基塔周围上巴科伊的土地）逐渐定居的过程中。据说塞古·瓦塔拉甚至进攻了马林克人的领土，遭到塞古的班巴拉人和富拉杜古的富尔贝人的夹击。孔国的第二次进攻由于前来助战的泰罗索莫诺人使用蜂群对付孔国的骑兵从而将其击退。[13] 在桑解围并赶走塞努福人之后，塞古的统治者减轻了对孔国人民的苛捐杂税。

当时统治卡尔塔的是富拉科罗。[14] 他正在围困木尔迪亚城。木尔迪亚人遂向马马里求援，这正中马马里的下怀。马马里乘机进行干涉，击败并俘获了富拉科罗。富拉科罗后死于狱中。马萨西人再次西进。人称比通的马马里·库里巴里征服了包括贝勒杜古在内的班巴拉全部领土。马西纳和杰内也被纳入其统治之下，并命令杰内的一名建筑师在那里修建宫殿。最后，在1751年马马里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正走向衰落的马里的都城尼亚尼，马里的统治者马萨·马干·凯塔向他纳贡。在比通的舰队和骑兵清除了图阿雷格人对尼日尔河湾的苛捐杂税后，廷巴克图的帕夏们也不得不向马马里纳贡。可是，比通的继承者中再也没有出现形象高大的统治者。

第一位继承人是他的儿子登科罗（1755-1757年）。他高傲自大，杀人成性。他篡夺了象征王权的金斧，但不久即被军事首脑们处决。随后的统治者执政时间平均不超过三年。只有恩戈洛·迪亚拉（1766-1790年）的统治时间较长，使他有可能提出自己的大政方针。但是，他必须消灭南科罗巴·恩赞古，然后说服军事首脑们对魔物宣誓，证明马马里曾亲自指定他为统治者。恩戈洛平息了业已成为雇佣兵的“通-迪昂”（ton-dyon）首领们的骚乱，恢复了真正的王权。他放弃了塞古-科罗，在尼日尔河上游的塞古-西-科罗一带定居下来，赋予他的王权以具体的形式。他同比通一样，也在杰内和廷巴克图为自己修建了宫殿。正是 334 恩戈洛加强了班巴拉人对廷巴克图和马西纳两地的控制。他用班巴拉人军事首脑监视当地摩洛哥人后裔（阿尔马人）的文职官员。他发动反对富尔贝人首领西拉·马坎·叶罗的战斗，甚至使他远至多贡人的国土。许多富尔贝人只好移民到瓦萨鲁和加纳杜古。[15] 他年迈时还出征亚滕加，但失败了。他在塞古建立了新的王朝，后死于返回的征途上。

恩戈洛之后，内部冲突再度爆发，只有蒙森·迪亚拉（1792-1808年）在从桑到廷巴克图、从多贡人的土地到卡尔塔行使塞古的权力。[16]

但卡尔塔国尚未灭亡。在富拉科罗之后（他在马马里统治时期死于牢中），卡尔塔国通过掠夺战争，并以牺牲贝勒杜古、班布克和卡森克等国为代价得以恢复元气。然后，在德

[13] L. 托克西埃，1942年，第74页。应该指出，朱乌拉人也常常养蜂以备战时使用。

[14] 在坦莫拉（Tammoura）和蒙泰伊记载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但是，罗伯特·阿诺（Robert Arnaud）和亚当（Adam）提到了此事。据说富拉科罗还勾引了马马里的一个女儿芭莎娜。见L. 托克西埃，1942年，第75页。

[15] L. 托克西埃，1942年，第96页，引自L.G. 班热，1892年。

[16] C. 蒙泰尔，1924年，第89页。

尼巴·博(1758-1761年)之后，一位伟大的武士西拉·博·库里巴里(1761-1880年)在盖木修建了王宫。当恩戈洛·迪亚拉占领了北部和东部地区时，他夺取了巴库努的半壁江山。他掠夺了富拉杜古的马林克人的重镇基塔，并利用迪亚瓦拉人两个氏族萨戈内人和达博拉人之间的争斗，撵走了达博拉人，达博拉人逃到邦杜或塞古去避难。萨戈内人虽则获得自由，免除了纳贡，但必须在战时提供一队武士。

班巴拉诸王国的社会政治组织

在班巴拉人形成国家和建设适于统治分布广泛的社会集团的各种制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他们提出新的方式，将班巴拉人的传统习惯与大规模的多民族王国生活中固有的必要内容协调起来。看来没有什么是从外部借鉴而来的。最发人深思的方面在于，他们从平常的“通”的活动开始，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机器。虽然这样的演变进程并不是非洲历史所独一无二的，但这里的优点在于，它以令人瞩目的微小模型，向人们显示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氏族向帝国”的过渡。[17]

在塞古王国

起源于马马里·库里巴里领导的“弗拉-恩-通”(fla-n-ton,同龄人协会)。弗拉-恩-通(或称“通”)是由同时举行割礼仪式的年轻人组成的协会。[18] 从理论上说，相继的晋升是按青年、成年和老年三个年龄段组织实施的。

335 “通-登”(ton-den,协会成员)选举产生“通-蒂贵”(ton-tigui,头领),他可以是家庭俘虏,也可以是贵族子弟。弗拉-恩-通的首要特点是所有会员，不论其社会出身，绝对平等。这一特点同盛行的氏族制或者长老等级制形成对照。

协会的其他领导人还有：承担解决纠纷和保障执行规章制度的负责人、会议的召集人——因为会议的决定由他宣布，因此又称“通-杰利”(ton-djeli,通的格里奥,griot)，以及头领的代言人“通-马萨”(ton-masa,首领)。通的宗旨在于相互帮助和分享资源以便参加社会活动。

如上所述，马马里·库里巴里加强他的组织，既是为了对付其对手卡萨姆领导的青年索宁克组织的夺权企图，也是为了对付反对他实行通计划的长老们。长老们首先以“法亚”(faaya,父亲)的身份而后又提出农场工作的要求来反对马马里。马马里杀了东库纳和巴南科罗的长老们，立即扫除了长老们的权威，并以通-登的“法”(faa,父亲)取而代之。当领导人的成就日益扩大时，其他协会成员都来参加最早的组织，其中有破产的债务人、获得宽恕的罪犯、违誓逃脱的犯人以及年轻的冒险家。这些人以“通迪昂”(ton-dyon,意为通的俘虏)的身份被接纳。但是，杀了长老后，马马里召集通-登会议，并无情地剃掉他们的头发，把他们变成通-迪昂的模样。[19] 据传说，马马里当时发表重要讲话说：“我们今

[17] C.蒙泰尔，1924年，第290页及以后诸页。

[18] 事实上，弗拉-恩-通把相继行割礼的三个不同年龄段的成员都组织在一起。

[19] 从前额到后颈留三簇头发。

后不能再一起吃通的花生，不能一起喝通的啤酒。现在，我是上帝之子!”据说，当时就有人高呼：“今天的通(比通)太残暴啦!”马马里就这样得了个比通的绰号。

当大批新会员入会时，这个协会基本上成了班巴拉的国家军队，不再是弗拉-恩-通(同龄人)的组织了。他们成了“福罗巴-迪昂”(foroba-dyon,大公地的俘虏)或者是“富鲁巴-迪昂”(furuba-dyon,大联邦的俘虏)。他们中的首批通-迪昂构成统治国家的贵族。这种权力结构由于采取了下列措施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让通-迪昂参加马马里担任大头领的教派；派遣通-迪昂部队去控制自己的亲属；不从通-迪昂而是从其家奴中间选拔通-马萨(头人)。最后，规定富罗巴-迪昂身份终生不变，他们的子女也生下来就是福罗巴-迪昂且终生不变。

这一过程体现了权力的抽象化、人格化和积累，更确切地说，是围绕政治-军事机器的领袖实行武装，最终导致“法马”(faama,享受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领主)这一称号的出现。[20] 这一制度的严重矛盾之一在于它同族长的地位混淆在一起。通过纳贡、掠夺和战利 **336** 品积累起来的财产原先都归“福罗巴”(foroba,公共金库)所有，并用于为整个社团谋利益。可是，时隔不久，这种虚构的社会概念再也掩盖不了国家的财产被私有化的实质。集体宣誓(当选后某一时刻所进行的对通-蒂贵本人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宣誓)最终被恩戈洛·迪亚拉变成强加于选民头上的单方面宣誓。从此以后，法马有权任意控制国家的财产，特别用来奖赏最勇猛的军事领导人，以钱财去“缀补他们衣服上撕破的地方”。统治者事实上得到参议会的协助。参议会由40名议员组成，他们包括武士和神职人员。这些贵族要到尼日尔河一个岛上举行秘密仪式，对他宣誓效忠，在授职仪式后还要宣誓效忠。

另一个严重的矛盾是，马马里的继承者们企图把福罗巴-迪昂变成束缚在农场里的国家农奴。这种措施在武士中触发了严重的抵抗。最后，有些军事头领企图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但遭到中央政府的严厉报复。

但是，除马马里·库里巴里和恩戈洛·迪亚拉等强有力人物的统治时期外，弗拉-恩-通的平均主义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从未完全消失。正是这一精神，使通-迪昂会议废除了马马里的儿子及继承人登科罗，“以更换种子”。最初，通-迪昂有时用拒绝动员和不服从进军命令等方式迫使法马听从他们的意见。最后，尽管在一段长时期里，通-迪昂每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会员大会继续举行，但他们最终“不再起审议甚至咨询的作用了，除非发生了严重的情况”。[21] 军事领导人会议逐渐取代了会员大会，可是随着王国的扩大，有些成员离开了塞古使会议遭到削弱，由此加速了走向法马的独裁，而此时对法马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贴身随从人员。尽管如此，法马为了重新激起部队对他的献身精神，每年至少还召开一次全体会员大会，进行效忠宣誓、宗教仪式以及接纳年轻的会员。

---

[20] 因此，马马里·库里巴里既是“法”(faa,族长)，也是“法马”(掌握权力和权威的人)。参见C.蒙泰尔，1924年，第303页。这是曼德人典型的头衔，后来传给了包括萨摩利在内的朱乌拉人历代君主。

[21] C.蒙泰尔，1924年，第309页。

塞古的军队

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王家的标志包括弓、箭筒和金斧，这是国家活动的明确象征。根据口头传说，塞古军队在攻城时使用撞墙槌和云梯，并用燃烧着的箭放火焚烧，这都是法马的功绩。军队的基层单位称“森”（sên,足），若干森组成“波罗”（bolo,臂）。军队的战斗阵势是这样排列的：中锋称“迪西”（disi,胸），是由“索法”[22]（sofa,马夫）兵团组成的主体兵力。中锋的右翼称“吉尼-恩-波罗”（kini-n-bolo,右臂），左翼称“努马-恩-波罗”（numa-n-bolo,左臂），两侧翼部队由福罗巴-迪昂组成，由通-迪昂充任军官。迪西后面是一支后备军，由“通-科罗-波罗”（ton-koro-bolo)组成，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通-迪昂。法马独自任命“凯来蒂贵”（keletigui,战时领袖或远征军首领）。

除了这支正规军外，还有盟邦的志愿部队。这些部队的装备也可由法马提供，或者由对统治者有契约义务者提供。

武器包括斧(首领使用的斧用贵重金属打制)、箭、长矛和枪。首批旧式大口径短枪似乎是从孔国传入的。鼓在战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塔巴拉”(tabala)大鼓是统治者用来宣布战争的,“冬奴巴”(dunuba)鼓打击时需要技巧,能向很远的地方传递信息。军中还使用号角和木琴。

负责战前全军鼓动工作的称“格里奥”（griot），他必须保证将士们在出征前夕有投入战斗的勇气，比如，要将领们宣誓英勇作战等等。

军队是不同民族的人们交往的主要场合，它包括来自不同社会、民族和地域背景的人士，过去的俘虏可以指挥贵族；一位富尔贝人可能是班巴拉部队的领队。于是，年轻人被吸引到军队中来，他们相信只要不战死，就能很快发财。战利品是这样分配的：四分之一归国王，四分之一归宗教领袖，四分之一归提供渡河运输的索莫诺人，其余四分之一留给部队。“总督”指挥下的士兵还可以获得个人掠夺来的战利品。

领土的全面组织，同大多数非洲王国一样，形成一个同心圆——从原始核心沿尼日尔河即从首都塞古-科罗到基兰戈，再到多年兼并的领土，或沿河从康加巴到延巴克图。塞古国王从事国家活动的这一主要地区有一个令人回想往事的名称“图-达加”（too-daga,“图”罐）。[23] 长子在管理这一地区的事务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随着国王年岁的增长，长子的作用日益加大，以便准备担负起将来的责任。由于国家财产和个人财富日益混淆，历代国王的长子一般得到充裕的供给，住宅沿尼日尔河道分布。外围地区则几乎都分封给当地头人或者塞古国委任的总督们。

在军队和王国的组织上,两个民族——索莫诺人和富尔贝人受到重用。尼日尔河是王国的命脉，在鱼类供应、民事运输和军事后勤补给上都至关重要。福罗巴-迪昂支持的索莫

㉒ 索法在理论上是马夫，但实际上不一定担任此职，他们是法马的家人。有时法马为了博得“年轻人”的忠诚，亲自主持标志进入成年的割礼仪式，确保他自己的某些儿子也参加。

㉓ “图”是班巴拉人的主食小米糊。

诺渔夫因此应征入伍，以捐税的形式为国家军队提供运输和鱼类。据了解，这一社会集团因国王的特殊保护而得到好处，他们可以在技术上和仪式上自由组织其专职工作。

富尔贝人通过“福罗巴-富劳”（foroba-fulaw，富尔贝人的公职官员）制度享受同样的自由权利，在福罗巴-富劳中只有少数人属于富尔贝族。他们是自由人，也得到福罗巴-迪昂的支持，从事公共畜牧业。他们的儿子，同索莫诺人一样，可以继承父辈的地位。除这两个群体外，还有许多福罗巴-迪昂根据塞古统治者的需要耕种农田。

在卡尔塔王国

卡尔塔的马萨西王国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同塞古王国相类似，不过更加专制独裁。国王加冕时，某些仪礼赋有特别的意义。通-迪昂的首领接管了国王家族的管理权，没收了已故国王的妻子们的首饰珠宝，存入王家金库。联盟的卡西·科纳里家族的一位成员负责将新当选的统治者引到羊皮上就坐，为他戴上红帽子、金戒指和银制护身符。然后，向他发表讲话，回顾先王的政治纲领以及王族对他的期望。通-迪昂首领拜倒在地，以军队的名义宣誓效忠和臣服。对马萨西人而言，王家继承不成问题，因为他们通过各省总督和军队首领牢牢地控制了国家。此外，国王直接指挥的索法军团，组织严密，足以使通-迪昂首领不敢产生叛乱的念头。通-迪昂的最高首领是统治者一手培植起来的，所有掌权人士、军团和氏族的盟友都是崇尚该氏族保护神的兄弟会成员。

简而言之，马萨西氏族看来比塞古氏族更加单一，因为马萨西没有同早已存在的当地体制相混杂。马萨西氏族是在马萨西家族首创下自由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而马萨西家族始终谨慎地将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24]

中沃尔特高原：16至19世纪的莫西[25]人诸王国 339

起源[26]

在这一时期，沃尔特高原上最重要的发展无疑是莫西人诸王国的建立，其中最早的王国可以追溯到公元12世纪。正如大多数作者所假设的，纳·格贝瓦和纳·内德加是莫西传说中的同一人物。莫西人诸王朝是通过纳阿巴·拉瓦和纳阿巴·威德劳戈(纳·内德加之女燕南加的儿子)的儿子纳阿巴·宗格拉纳而同曼普鲁西纳农巴和达贡巴各王国相联系的。莫西王国政治机构的形成过程始于纳巴·伍布里(他在1495年前后成了后来的瓦加杜古王国的首脑)[27]和纳阿巴·亚德加(纳阿巴·伍布里的同族孙子，1540年前后建立了亚滕加王国)。莫西王国的政治结构经历了200年的发展史。

---

[24] C. 蒙泰尔，1924年，第330页。作者称这一结构类似卡索的结构。

[25] 莫西(Moose或Mossi)的单数为莫加(Moaga)，国家称莫戈，语言为莫雷。瓦加杜古在莫雷语里应作沃戈多戈。但是，根据目前的拼法，我们仍用瓦加杜古。

[26] 关于起源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9章。

[27] 同上。

由纳·格贝瓦的后裔建立的三个王国(曼普鲁西、纳农巴和达贡巴)中，只有达贡巴王国在纳·涅格塞(1460-1500年)统治时发挥过重大作用。[28] 从16世纪初[29] 到17世纪中叶，他的继承人鲜为人知，看来主要是由于内乱。可是到16世纪下半叶，有位曼德头人(Naaba，纳阿巴)创立了贡贾王国。[30]

17世纪下半叶，贡贾的几位国王从首都亚格布姆出发，多次进行征伐，其中有一次成功，即拉塔-贾克巴(1622/1623至1666/1667年)领导的对达贡巴的战争。达贡巴的纳·达里塞古阵亡，贡贾夺取了产盐中心达博亚。可是到1713年，当皈依伊斯兰教的纳·赞几纳统治时，顶住了贡贾新的进犯，并在吐奴马(吐马)战役中击溃了贡贾军队。贡贾的侵略从此结束，实现了和平。拉塔-贾克巴统治的贡贾也曾蹂躏纳农巴王国。

可是大约1740年在达贡巴，一位新指定的纳·加尔巴同一位争取王位未成的王子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继承权争夺战争。1744年，阿散蒂的统治者奥博库·瓦里乘达贡巴国内骚乱之机向延迪发起征伐，支持反对新国君的派别。纳·加尔巴被俘，在答应每年向库马西贡奉两千名俘虏之后才获得释放。即使有东贡贾承担一部分，两千俘虏也是个巨大的负担。[31] 这项条约影响了达贡巴国的前途，迫使它不断地寻找俘虏的新来源。从政治和军事上组织较差的民族中掠取俘虏成了达贡巴武士的主要任务，他们为此目的而招募雇佣兵。到18世纪末，阿散蒂的势力远及莫戈的边界，达贡巴成为阿散蒂扩张势力的渠道。

340

瓦加杜古王国

据了解，公元1500至1800年间，在莫戈王国的中部和南部有纳阿巴·伍布里的23位继承人。当时“纳纳姆斯”(Nanamse，王子们)牢固控制的领土远达亚科和古尔西地区，因而对纳阿巴·拉瓦的遗产提出要求，后者的影响延伸到白沃尔特河谷的大部地区。[32] 在瓦加杜古(沃戈多戈)旧居民区建立了莫西政府的纳阿巴·宁奈姆多之子纳阿巴·库姆杜梅[33]在其执政初期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王位之争。纳阿巴·库姆杜梅同另一候选人纳阿巴·亚迪加争夺王位。亚迪加被否决后仍得其大姐帕布丽[34] 的支持。帕布丽为亚迪加窃取了纳阿巴·伍布里的王冠。纳阿巴·亚迪加凭借这一王权合法性的标志向古尔西进军，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前教师爷纳阿巴·斯威达之后，征服了古尔西，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块国土为亚滕加(源自Yadega-tenga，意为亚迪加之地)。[35]

纳阿巴·库姆杜梅把亚科和特马两地分封给他的儿子。这两地后来都成了独立的酋邦。

---

[28] 关于曼普鲁西、纳农巴和达贡巴三王国，见H.A.布莱尔(Blair)和A.邓肯-约翰斯通(Duncan-Johnstone)，1932年；S.J.艾尔-史密斯(Eyre-Smith)，1933年和E.F.塔马克洛(Tamakloe)，1931年，第193页。

[29] 见N.列夫齐昂(Levtzion)，1964年c。

[30] 参见J.古迪(Goody)，1967年a。

[31] 见本卷第14章，第420页。

[32]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9章。

[33] 见M.伊扎尔德(Izard)，1970年，第1卷，第150-170页。

[34] 在宣布老国王去世到新国王继位之间有个空位期，由旧王的长女执掌过渡权，称纳博科(napoko)，帕布丽即是一位纳博科。

[35] 大概从纳阿巴·库姆杜梅执政以后，纳阿巴·伍布里的后裔开始使用莫戈-纳阿巴(Mogho-Naaba，莫西国的纳阿巴)这一称号，意在确立他们对全部领土的主权，尽管那时亚迪加已宣布分离。

莫西人在其业已占领或者提出了领土要求的地方所建立的组织仍然是松散的。国王为忠诚可疑的王子们拨出土地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他既在政治上占有地盘，同时使王位继承人感到高兴。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周围的若干酋邦事实上变成了王国或者独立的公国。由于在血统和领土上离王族家系越来越远，初始忠心的诸王朝变得不如以前。

国王的其他儿子被分封到马内、康基西坦加(因纳阿巴·康吉斯而得名)和布苏马。他的 341 继承人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他们北进的目的看来是在他们同亚滕加之间构筑一道保护性屏障。

16世纪末，纳阿巴·库达把王宫迁到萨博内，此事表明国家机器仍不发达。他也把他的儿子们分封到其他地方，如拉勒、佐尔戈和里奇亚姆。

18世纪富尔贝人篡位者纳阿巴·莫蒂巴(1729-1737年)[36]执政以前，瓦加杜古几乎是无人知晓的。据说他好战，但这是他抵抗莫西王子们联合进攻所必不可少的。又据说他死于中毒，他和他的后裔的名字也被人从宫廷的正式家谱中删掉了。

纳阿巴·瓦尔加(1737-1744年)的统治是短暂的，但是他采取了许多巩固君主政体的新行动。[37] 连年征战也许是为了重新恢复瓦加杜古对亚科、马内和塔坦加(里奇亚姆)等地区酋邦的控制，塔坦加几乎已经获得独立，而且那里的酋长纳阿巴·曼兹还是个扩张主义者。但纳阿巴·瓦尔加是位伟大的立法者，根据亚姆巴·廷德雷贝奥戈的记载，他建立了在分封头人的仪式上宣布"扎皮尤亚"(zabyuya)的仪礼。在此场合，他宣布三项箴言：第一对伟大的选民表示谢意；第二提出新酋长的计划，常常带有对其敌手谨慎的警告；第三说明头人的性格。纳巴·瓦尔加也组织王家宫廷，把仆人分为两类，一类为莫西人，另一类是俘虏，每一组均包括"索朗丹巴"(sorondamba,年轻仆人)和"比尔波斯"(bilbalse,成年仆人)。此外，有些任务交给太监执行。纳巴·瓦尔加也使宫廷里的"波格斯尤里"(pogsyure,或称 napogsyure)制度化，那是一种使妇女资本化并将她们配给王家仆人去生儿育女的制度。将进贡得来的或者招募来的女孩嫁给仆人，生下的头胎，如果是男孩就在宫里服役，如果是女孩就参加"纳波格斯尤里"制度的分配。

在刑法方面，纳巴·瓦尔加可能制定了阉割的刑罚。在海关法方面，据说他制定了前殖民时期的国家关税法，不过有关细节不详。简而言之，在亚滕加和莫戈的中部和南部，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前叶，莫西王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得到最后的确立。在纳阿巴·宗布 342 里的持久而和平的统治(1744-约1784年)和首次扩大了穆斯林影响的纳阿巴·科姆(1784-约1791年)之后，纳阿巴·萨加(1791-1796年)的统治出现了内部冲突，成为19世纪动乱的先声。[38]

---

[36] 这个名字可能是穆斯林教名莫迪博的讹误。这次篡位无疑使人们对17世纪的黑暗情况有所了解，说明这一时期必定是多灾多难的。

[37] 见Y.廷德雷贝奥戈(Tiendrebeogo)，1964年，第25-32页，也许这位国王并非作者所描述的是一切开创行动的策划人，因为他比书中所述更加富于争议。

[38] L.弗罗本纽斯(Frobenius)，1911-1913和1924年。

莫戈中部的小王国

对莫戈南部的小王国和酋邦知之甚少，尽管宗左·卡瓦达提供了相当多的情况。对问题颇多的坦库达戈(腾科多戈)王国，也是如此。[39]

可是，在东部和东北部有三个王国引人瞩目：布尔萨、布苏马[40]和塔坦加。塔坦加在 17 世纪支配着这一地区，布苏马则在 18 世纪支配这个地区。布尔萨公国很可能早在 16 世纪之初即已存在，当时纳阿巴·伍布里的儿子和“库里塔”(kurita)[41]纳阿巴·纳曼迪登基做了国君。

布苏马王国逐一兼并了 17 世纪初仍散布在这一地区的酋邦。具体地说，18 世纪初吸收了卢达地区的纳姆坦加，然后兼并了皮西拉酋邦，最后是卡亚地区的萨尔马坦加。但是，决定布苏马前途的是 18 世纪后半叶，当时纳阿巴·库达的一个儿子所建立的邻国塔坦加的一个令人生畏、野心勃勃的武士纳巴·曼兹继承了王位。但在 17 世纪末，布苏马的纳阿巴·鲁波在米叶和萨罗戈的帮助下在战斗中消灭了可怕的曼兹。他的儿子维马只得逃到遥远的里奇亚姆的深山里避难。在 19 世纪，更多的国土沦丧于亚滕加。

亚滕加[42]

前面已叙述了纳阿巴·亚迪加从瓦加杜古被流放的经过。他的继承人控制着有限的地区，在整个 16 世纪将王宫从古尔西和拉戈逐渐向北迁移。可是，北部被纳阿巴·拉瓦的后裔统治的赞多马王国所占据。纳阿巴·兰布维加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恰恰在于粉碎纳阿巴·拉瓦的遗产，与此同时，在东面，他将前鲁罗姆的库龙巴人各酋邦纳入自己的版图。[43]

343

17 世纪后期和 18 世纪初，纳阿巴·兰布维加的后裔试图采取诸如在给王子们的保留地建立莫西酋邦、在鲁罗姆移民、遏制马西纳和杰尔戈吉的富尔贝人以及在莫戈维持内部领土现状等措施，使王国已经相当大的疆域进一步扩大。[44] 这样一来，到 18 世纪中叶，为了控制布苏-达里格马和涅斯加诸小酋邦而同亚科[45]开始了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初。纳阿巴·纳巴西里却事业未竟身先亡。

---

[39] 见 J. 卡瓦达(Kawada)，1979 年。坦库达戈意为“老山”。因此目前的官方拼法腾科多戈并非常说的那样出自 teng kudgo 一词，其意为“旧土地”。

[40] 关于布苏马和布尔萨以及马内和特马，见 G. 切龙(Cheron)，1924 年；和 M. 伊扎尔德，1970 年，第 2 卷，第 230-252 页。

[41] “库里塔”是国王死后在人间的代表，意为“执政的死者”，选自已故国王儿子中不可能继承王位者。一旦人选便不可继承王位，被放逐到离王宫很远的地方，不得会见其父的继承人。

[42] 见 L. 托克西埃，1917 年；M. 伊扎尔德，1970 年、1980 年和 1981 年，第 2 卷，第 275-381 页。

[43] 库龙巴人(莫雷文称富尔斯，Fulse)占据从古尔马北部至亚滕加的辽阔地域；据说他们建立的鲁罗姆王国包括今天的杰尔戈吉(吉波地区)部分地区。国王住在曼高，头衔为阿约(Ayo)或称鲁罗姆阿约(Lurum'ayo)或鲁伦约(Lurum'yo)

[44] 因此，亚滕加东南部的齐坦加(首都建在蒂卡里的纳阿巴)被认为是亚滕加的科姆贝里(kombere)。科姆贝里(复数为 kombemba)是地区头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首先是任命地方头人之权。实际上，齐坦加是独立于亚滕加的。

[45] D. 纳坎纳博(Nacanabo)，1982 年。

纳阿巴·坎戈

纳阿巴·纳巴西里之子纳阿巴·皮约(1754年)死后其弟纳阿巴·坎戈继位。皮约也许是亚滕加引进第一批枪支的国君。坎戈一继位就面临以纳阿巴·沃波戈为首的王子们的暴力反抗。他被迫让位并带领少数亲信流亡在外。他先到孔国，然后前往塞古国。他在那里取得库里巴里的支持而夺回了王位。1757年，坎戈率领一支由班巴拉枪手和布瓦巴及萨莫弓箭手组成的雇佣军返回亚滕加。但是，当他在一些因经济上重要、政治上多元化而著名的地方住过之后，他不再是刚回国时那样的亲王了。他奉行的政策表明了这一变化。在击败纳阿巴·沃波戈并将其放逐之后，纳阿巴·坎戈以一个惊人的举措开始了他的统治：他拒绝进行“林古”(ringu,加冕登基)旅行，只有这一仪式才能给予亚滕加的统治者以“里马”(rima,国王)的身份，而他在任命时只是纳阿巴(酋长)。[46] 他拒绝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仪式标志着与过去果断地决裂。

他还于大约1780年在离原来的王宫比西基不远的地方瓦希古亚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这是一座新城，环绕着一座用马里风格建造的大宫殿。他把往昔被流放时的同伴们接来同住。他破天荒第一次把首都建成一个专事政治活动的天下，居住在那里的只有代表国家 344 机器的人士和王家成员，他们既可以是俘虏也可以是自由民。在此以前，王室所在地都在普通的村庄里。这里，他再一次表现了冲破旧习俗的明确决心，统治权力的组织全靠自己，不靠别人赐予。他加强了对王室服务人员的组织，使权力更加集中。[47] 新首都的名称瓦希古亚本身也表明了整个纲领：“来吧，低下你的头臣服吧！”这一要求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向全体王室成员及王室的“纳科姆布斯”(nakombse,王室血统的王子)发出的，他们到那时为止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支持过篡权者沃波戈，而现在必须通过王室侍从的行动压制下去。这标志着莫西君主制度内部实力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但是，直到殖民统治之前，亲王们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力量对比在亲王和宫廷之间危险地左右摇摆。宫廷权力机构进行了改组。乌拉的战争首领被任命为第一任军队司令官，他的官职被纳入宫廷的库尔苏斯·霍诺鲁姆(cursus honorum)之中，从而结束了军队司令官的世袭制度。使这一职务变为对作战勇猛的武士个人业绩的一种奖励。

为了恢复动荡年代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纳阿巴·坎戈无情地镇压了盗匪，窃贼和杀人犯被活活烧死。来自塞古的班巴拉雇佣兵曾用于反对亚科，后被指控搞动乱，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不守纪律的首领们遭到严厉的惩罚。有时他们慷慨解囊也遭惩罚，因为身居高位这样做被认为是企图同国王的生活方式进行攀比。

屠杀班巴拉雇佣兵是否招致了塞古国对亚滕加发动讨伐呢？在莫西的传说中，没有提到这样的远征，但是在班巴拉的传说中谈到了这件事。[48] 不管怎样说，有意在政府制度中给王家俘虏以特殊地位的纳阿巴·坎戈需要更多的俘虏。这些王家俘虏许多是从战争中抓

---

[46] 里马和林古两字的词首都带有动词词干 ri，意为“吸收或吃未经咀嚼的食物”。

[47] 见M.伊扎尔德，1975年。

[48] 见M.伊扎尔德，1970年，第2卷，第320-328页。

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在袭击冈多平原的多冈人村庄以及东部和东北部库龙巴人的村庄时抓获的。

纳阿巴·坎戈对亚科的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上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没有采取后继行动；在19世纪初，敌对行动再次发生。

1787年，纳阿巴·坎戈逝世，安葬在他的首都，而不是在王家墓地。由于他的残酷统治，他的死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解脱。亲王们对他十分不满，以致把死去国王的独生女儿活活扼杀。但是宫廷里的贵族们仍然效忠于国王，并成功地提名国王的终生伴侣之一纳阿巴·萨加(1797-1803年)继承王位。

345 莫戈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所谓莫西人诸王国，并不是各国都由单一的莫西族组成，而是指被称为莫西人的武士以征服手段在白沃尔特流域所建立起来的多样化社会和政治组织。这种征服不是用骑兵一次次的席卷之势进行横扫的既原始又浪漫的征服，而是莫西农民缓慢地定居、渗透和互相通婚[49] 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征服肯定更具决定性。但是，他们每一次占据一个地区，都以莫西的社会和政治模式进行组织。严格地说，莫西人是莫西各王国政权的保持者，他们相互承认都是父系祖先纳阿巴·威德劳戈的后裔。就亚滕加来说，那里的人口在19世纪末包括三个有明显区别的社会：莫西人社会、西尔米加人(富尔贝人)社会和西尔米-莫西人社会。只有莫西人社会作为王国的人口组成被置于国王亚滕加-纳巴的管辖之下。富尔贝人或称西尔米人则是客居身份。根据定居合同，亚滕加为他们在北部保留了一狭长地带。富尔贝人自17世纪以来就定居在亚滕加，并建立了永久性村庄供牲畜季节性放牧之用。在这些永久性的定居点里居住着"里迈贝"(rimaibe,被迫在土地上耕作的俘虏)。若说西尔米-莫西社会群体也许会引起误导。这些矮小的定居牧民，在亚滕加的东南部为数不少，肯定属于单独一类。他们的复合名称西尔米-莫西，提醒人们他们是富尔贝(西尔米人)男子同莫西女子通婚(这是禁止的)生下的后代。他们是18世纪从特马过来的，在莫西人村庄边缘的土地上建造小屋定居下来。他们不属莫西政府管理，而在遥远的王国东部的托迪阿姆的富尔贝人政治宗教中心的保护之下。

但是莫西人社会本身又是什么样的呢？其内部分裂是同莫西人自己划分等级的办法有联系的。他们把"纳阿巴"(酋长)、"纳比斯"(naabiise,单数为"纳比加",nabiiga,酋长之子)同"纳科姆布斯"(nakombse,单数为"纳科姆布加",nakombga,未成为酋长的亲王的儿子或后裔)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基于酋长继承权的法规条文的,即只有酋长的儿子能够成为酋长。由于这条规定，"纳科姆布加"是没有希望执掌"纳阿姆"(naam,权力)的，因此，严格地说，除少数酋长和他们的儿子外，所有其他自称为威德劳戈后裔的莫西人都可看做是纳科姆布斯。这一规定产生了对纳科姆布加地位的狭义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把纳科姆布斯阶级同"塔尔斯"(talse,平民)阶级区别开来。这样一来，在亚滕加，只有第12代亚滕加-纳阿巴的男性直系后裔才是纳科姆布斯，其他莫西人除酋长和酋长之子以外都被看做塔尔斯平民百

347

[49] 也许可以回忆一下，瓦加杜古的第一位国王伍布里本人就是一位莫西王子同一位当地女孩结婚后所生。



图片 12.2 莫西人纪念女性祖先的木制小雕像，神态自然。高 47 公分

姓。王家纳科姆布斯(王族世系)本身也被划分为五支，通常每一支包括一代王子。显然，很早以来王族世系就固定保持为五代，每一代新人的出现都要把最早的一代排出王家世系，使之成为塔尔斯平民成员。这一制度还与下述情况有关：当王国的村庄数目有限时，新国王则需要使自己的儿子获得村庄头人之职，因此，原来村里的地方王朝不断被新头人所取代。

当他们保持村庄头人的地位时，"纳科姆布斯"成为低于头人一级的当权人物。还有其他两种实权人物："塔索布纳姆巴"(tasob namba，作战首领)和国王的家庭侍从。作战首

领是从亚滕加立国以前最早一代男系“纳科姆布斯”后裔和亚滕加立国之后前两代王朝后裔中任命的。作战争首领不一定要承担军事任务，他们是旧时的贵族世家，而当地掌权的纳科姆布斯则总是由一新贵来充任。在纳阿巴·坎戈统治时期宫廷侍从，不管是自由民还是俘虏出身都是凭统治者个人的喜好而被派出担任地方头人的。这种做法背离了认为权力地位与侍从职位互不相容的传统观念，其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中央政府这样的意图：针对东面的富尔贝人建立一个莫西人的前沿殖民地。在宫廷内部职务设置方面，国王周围的最高政治机构同各地方头人周围的政治设置相似。首领有三位重要的官员辅佐：“多戈-纳阿巴”（Togo-Naaba）是首领的发言人，负责庆典礼仪事务；“巴鲁姆-纳阿巴”（Balum-Naaba）负责供应和内政；“维朗加-纳阿巴”（Weranga-Naaba）负责管理马匹。这些人是首领的“内索姆巴”（Nesomba，亲信），非莫西人、“纳科姆布斯”以及铁匠等种姓的人不得担任这些职务。

王宫里也有同样的高核心，不过属于第四种高位：“宾-纳阿巴”（Bin-Naaba）或称“拉萨姆-纳阿巴”（Rasam-Naaba），是王家俘虏的头领，每人管辖一大组侍从。[50] 这样一来王族世系的成员也深深地卷人了王位的争夺，而不可能为国王服务。最后，权力体制的侍有者实际上被分成利益对立的两个小集团：国王借以实行统治的作战首领和官廷侍从与国王对其实行统治的纳科姆布斯。这一分野深人莫西人之中，因为这些出身低微的人占据着国家的高位同时又是选择新莫戈-纳阿巴的伟大选民，有时还能在领土上发号施令。内部冲突总是伴随着各莫西王国的历史。每当权力转手之时，几乎都会在贵族与国王的大臣们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大臣们是从地位低微者中选拔的，但他们有权从符合条件者中选择最合适的人当国王。一般来说，争夺王位主要是在执政的君主的弟弟们和他的儿子之间展开的。

348

同王室俘虏所属的政府世界相对应的是土地的世界。在理论上，人民或者说土地的儿子是本地人的后裔，铁匠则不在其列。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仅负责祭祀土地的仪式。这些仪式旨在祈求土地肥沃、岁岁丰收、国泰民安以及本地人的地位永远不变。这样，纳阿巴酋长的形象同“坦索巴”（tengsoba，土地祭司）的形象相对照，后者是神权的持有者。这种二元性对神界宇宙观念的反映是通过神王纳阿巴·文德（Naaba Weude）和土后纳巴加·坦加（Napaga Tenga）来体现的，虽然神王文德没有祭台，也无礼仪崇拜。

对于土地之民这一类别的人的定义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已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正宗莫西人被当地人所同化并利用这一身份成为土地的祭司。在亚滕加的土地祭司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莫西人出身，虽然有些莫西人变成了铁匠和亚尔塞人。

除了土地祭司，还有“布戈”（bugo，丰产祭司），其复数为“布古巴”（buguba），他们有自己的祭坛“蒂多”（tiido）。身居这一职位者看来是多贡人出身，这一职务也向纳科姆布斯和铁匠开放。

---

[50] 在瓦加杜古的王宫里，在莫戈-纳阿巴的身边有政治发言人威迪-纳阿巴（Widi-Naaba）、军务官员贡加-纳阿巴（Gounga-Naaba），拉哈勒-纳阿巴（Larhle-Naaba）兼管军务和礼仪活动，巴鲁姆-纳阿巴（Balum-Naaba）和卡姆索戈-纳阿巴（Kamsaogo-Naaba）主管后宫的太监。还有塔索巴（Tasoba）是作战首领。

政治的世界和土地的世界通过一年一度的国王为中心的大祭仪式统一在单一的体制里，国王和执掌权力者、土地祭司和丰产祭司都参加这一活动。亚滕加莫西人(如库龙巴人一样)使用阳历，全年又按阴历分月。阴历年和阳历年之间的误差用每三年增加一个月的办法弥补。在新年“菲利加”(filiiga,感恩节)之后是“纳普苏姆”(napusum,向国王致意)庆典，这一庆典分三场，分别由宫廷侍从、作战首领和纳科姆布斯单独向国王表示效忠并献上礼物。新年大致是在冬至前后开始。新年后的第二个月至第六个月之间加一个大庆周期，称为“贝加”(bega)，国王和全国的尊贵者们为祈求来年而用牺牲祭神。贝加欢宴在雨季开始时结束。到了收获季节，庆祝活动再度开始，有两场初收庆典，一场为作战首领，另一场为丰产祭司举办的。

这种极为复杂的政治兼宗教体制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凝聚力。这一社会由各种起源不同 349 的集团组成，其中最大的集团通常保留着国家成立以前的若干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由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层次形成的。社会划分为四大功能集团，即掌权人、土地所有者、铁匠和手工艺者以及商人，而库龙巴人或称富尔塞人则有所差异。亚滕加的莫西人很可能是从库龙巴人那里吸取了有关铁匠的想法，他们同其他莫戈人不同，是内部通婚的。

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所有各民族集团均以两种方式分野：作为莫西人后裔的集团和本地人集团。

在这个父系血统和夫家地域意义上的复合社会里,莫西语“布杜”(budu)意指从广义和最古老的意义到狭义上的作为族外婚参照单位的任何后裔集团。一般理解的是指后一种意义。因此,社会由若干“布杜”构成,例如王家纳科姆巴斯集团。每个布杜有自己的历史,用自己祖先的名字和墓地与其他布杜相区别。每个布杜都有“布德-卡斯玛”(bud-kasma,族长)、“基姆斯罗戈”(kiims'rogo,宗祠)以及族长和宗祠的所在地，以及一个或多个(通常并非专有)“森达”(sonda,集合名称或格言,单数为 sondre),即被用做父姓的关键词。

地域上的父系只存在于分支的第一级“萨卡”(saka,部分)。萨卡下分“伊耶”(yiiya,家庭,单数为 yiiri)。生产和消费单位划分为“扎克西”(zakse,小单位,单数为 saka)。扎克西今天已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单位。在大家庭公有土地上劳作有利于“伊里-卡斯玛”(yi-ir-kasma,家长)。当大家庭的贮存品用尽时，便重新分配家长的储存物资。

同一世系的各个分支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因此分别属于若干村庄。换句话说，一个莫西人的村庄[51] 里住有若干世系的部分成员，而同一世系的家庭成员也分住在若干村庄里，当地最大的世系单位为分支部分(萨卡)。

古尔马人和博尔古人

尼日尔河的古尔马人地区,即河湾顺流而下的右岸地区,其历史长期来鲜为人知。可是 350 由于沃尔特历史学家乔治斯·马迪加在古尔马领土北部所作研究，最近情况有所变化。因

[51] 最近，对用“村庄”一词来表示莫西人最大的聚居单位是否合适讨论很多。尽管不像沃尔特西部那样由各部分人搭配而成为村庄“群体”，然而从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必然联系而言，仍是重要的实体，仅仅因为各行政单位的交叉形成地方头人，而土地祭司则是土地控制单位的代表。

此，现在有可能提供一些关于古尔马的情况，虽然仍不完整，但在科学上至少还是站得住脚的。

多贡人(古尔马语称库姆贝蒂巴人)是北古尔马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随之而来的是今天称为廷旦巴人(土地之民)，[52] 他们是从现在称为莫亚加的地区迁移而来但属于莫亚加以前的人口集团，以及从南部来的沃巴人。北古尔马还居住着库龙巴人。南方的古尔曼斯巴人称北方人为柯里马人，这可能是从库龙巴人一词转变而来。对南古尔马我们仍知之甚少，有人认为那里过去的居民中有一些廷旦巴人和沃巴人。沃巴人在被古尔曼斯巴人以及立即在那里建国的诸民族击溃和部分同化之前肯定曾占有大片土地。因此，古尔马的沃巴人和博尔古(今贝宁的北部)的瓦巴人是同一个集团。

在这一早期人口的次结构之上，强加进一个外来强权，即本巴人或称布里希姆巴人，单数为布里希马，后来形成了古尔曼西巴人诸国。关于早期的古尔曼斯历史，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编年史框架，但是乔治斯·马迪加提出了两大假设：第一，曼普鲁西人的祖先在布里希姆巴到来之前曾经路过古尔马；第二，前几个古尔曼斯朝代和前几个莫西朝代属于同一年代。这意味着古尔马作为国家的历史很可能始于 15 世纪，最早在 14 世纪末。古尔曼斯诸国的诞生是同名叫贾巴的神话历史人物相联系的。他似乎不像莫西人历史中的纳阿巴·威德劳戈是位游击队领袖，他的力量来自魔术而不是军事指挥才能。莫西人提到的纳·巴瓦的后裔和贾巴的后裔之间的联系(莫西人称贾巴为贾巴·洛姆波，但是贾巴和洛姆波很可能是两个人，洛姆波是贾巴的儿子)似乎可以肯定不过是莫戈-纳阿巴的宫廷后来想出来的重新组合，旨在殖民时期里为古尔曼斯和莫西两个国家的实际合并寻找根据而已。情况也可能是恰恰相反，旧日酋邦或国家的殖民行政组织给了莫戈-纳阿巴以某种绝对的杰出地位，也许使某些人认为有了历史的基础。所有的证据表明，从朝代起源的观点看，莫西人和古尔曼西巴人的霸业必须单独对待。

布里希姆巴人来自何处，是有疑问的。正如在西非中部组织成为国家的其他地区的人一样，我们发现提到古尔马的地方都说征服者来自博尔诺。但事实上，目前还无法知道是哪里好战的移民导致了古尔曼斯帝国的诞生。至少我们知道最早的古尔曼斯的政治中心在洛姆波坦古或桑班坦古，位于农古(法达恩古尔马)的东南。从洛姆波坦古，布里希姆巴人进入了帕马南部的库爪邦古。布里希马人第二阶段入侵所残留的废墟表明那是古都的遗迹，是最早的古尔曼斯政治结构的遗迹。这里必定是征服者发兵的集中地，从而导致现在的各个朝代。值得注意的是，布里希马人在当时并不是这一地区各王国的唯一奠基人。贾克潘古王朝是贝尔巴人建立的，戈布南古王朝是豪萨人建立的。还有一些王朝的奠基人来自莫西与古尔曼斯交界处的延加，目前那里的酋长同纳阿巴·威德劳戈的后裔有血缘关系。延加的古尔曼斯王朝包括包里古王朝、科明-延加王朝、苏图戈王朝、卡姆向戈王朝、多格坦加王朝和尤坦加王朝。

布里希姆巴人的扩张贯穿 16 和 17 世纪，而 18 世纪中叶古尔曼斯权力达到极点。在那个时期，古尔曼斯巴人控制着辽阔的土地(虽然人口稀少)，其领土南达曼普鲁西王国和

351

[52] 参看 Y.G. 马迪加(Madiega)，1982 年。

博尔古，东到托罗迪和桑海帝国的最后王朝，北抵库龙巴人、桑海人和富尔贝人居住的萨赫勒地区，西及图古里、布尔萨、库佩拉和坦库达戈等莫西人诸酋邦。后来成为利普塔科人(多里地区)和雅加人(塞巴地区)的富尔贝人诸酋邦，在当时处于古尔曼斯的统治之下，直到19世纪初富尔贝人把古尔曼西巴人驱向南面。

在18世纪中叶，北古尔马的领土上主要是比兰加和瓜拉两大王国，外加皮亚拉、旁甘迪尼和科恩等三个新建立的小国。古尔曼斯帝国从布里希姆巴人大约在16世纪中叶已经达到的农古东北面的韦人的村庄迅速向北扩展。结果出现了分布很散的地区性和地方酋邦，精明的酋长们后来联合建成一些王国。

由于乔治斯·马迪加的研究，使我们现在知道了古尔马北部地区的历史，但是对古尔马中部和南部地区仍然是情况不明。因此，要对古尔马的历史形成过程提出全面的看法则更加困难。在南部，我们知道共有11个王国。其中农古国尤为重要，这是由于国王农巴多(农古的酋长)的重要地位。[53] 农古国是在18世纪中期由一位贾巴的后裔延达布里创建的。那个时期，南部古尔马被蒂奥科西人所蹂躏，蒂奥科西人是曼德人的雇佣兵，属于瓦塔拉集团(他们出现在孔国和博博迪乌拉索)。原先蒂奥科西人在为曼普鲁西国王效忠时由一位贡贾的头人统率。他们首先在现今的多哥北部定居下来，然后继续充当雇佣兵向古尔曼斯巴各王国发动远征。这样，帕马的头人在反对库爪邦古的头人中寻求蒂奥科西人的支持。农古的统治者延达布里很快当上了王国联盟的首领，着手将蒂奥科西人赶出古尔马。帕马、马卡考利、包里古、博图诸王正如布尔萨、库佩拉和坦库达戈的莫西人统治者一样都联合在延达布里的周围。蒂奥科西在其敌人的重重压力下，撤退到自己的首都桑桑内芒戈城，联盟军对该城进行了围攻。[54] 当时得胜的延达布里是否乘机加强了他对联盟的权威地位仍是个悬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农巴多在18世纪成了古尔马部分地区的盟主，他对自己领土以外地区的权威更多地是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乔治斯·马迪加写道："农巴多把权力直接置于农戈之上……他也对'巴提巴'(batieba,地区统治者或酋长)的'迪马'(diema,地区王国或酋邦)实行遥控，这些巴提巴并非洛姆波的后裔。洛姆波的后裔建立的诸王朝把农巴多视为世系的'尼克佩罗'(nikpelo,最老的成员)。"在上引的文献中，洛姆波被看做贾巴的儿子。[55] 就这样农巴多逐渐发展成为古尔马的主要君主，与此同时，农巴多的王宫所在地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要城镇，这主要由于豪萨人在该城经济上的作用。(他们把农古叫做罗卓或法达恩古尔马)。至于农巴多与古尔曼斯巴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迄今还难以解释清楚。看来那里不曾有过古尔曼斯的邦联，农巴多的真正权力在领土方面是有限的，正如别的统治者一样，其实有些人比他更加强大。但是农巴多获得了与众不同的道义和礼仪上的威望，致使他后来被认为是洛姆波因此也就是洛姆波的"父亲"贾巴的直接继承者。其他因素则是豪萨人的商业：农古是东-西骆驼队重要的交通中心。

352

---

[53] 巴多(bado)相当于莫雷语的纳阿巴(naaba)。

[54] 参见R.科纳万(Cornevin)，1964年和D.雷伊-赫尔曼(Rey-Hulman)，1975年。我们也参照了Y.G.马迪加的叙述(1978年)。

[55] 见本卷第350页：贾巴·洛姆波在莫西人(无疑是后来)的传说中是一个人，在古尔曼斯传说中却变成了两个人，贾巴和他的儿子洛姆波。

博尔古[56]的势力远及古尔马的东南面。它的历史有些混乱，包括若干个类似国家的实体。最早的一个显然是布萨，瓦桑加里的武士们就是从那里出发从事扩张的。酋长们也声称诸王朝发源于博尔诺。瓦桑加里的军事贵族把自己的统治权强加于当地的人民，他们早就在那里定居，有些人在古尔曼斯之前就在那里居住，在16和17世纪时吸收了在加纳北部和豪萨兰之间做生意的曼德集团(布萨是一种南部曼德语)。布萨在16世纪达到全盛353 时期，然后走向衰落。其他王国如尼基等多少可说是布萨王国的旁系。18世纪时，尼基和努佩王国发生战争。从尼基国派生出凯亚马、帕拉库、库安迪和坎迪等小国。博尔古诸国也偶尔称做巴里巴列国，因该地区某个当地主要民族面得名。

非集权制民族

给这些民族这样的称呼，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称谓。[57]这些民族在上沃尔特盆地定居，而且很早以前就在那里或者其他地方存在。[58]虽然这些民族同集中统一的社会不同，他们在政治舞台或者重大事件中不居主导地位，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他们的贡献，特别是他们构成了那里人口的基础，外来人口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融合而繁衍的。前来征服的民族并不是排山倒海般将当地人统统消灭。例如莫西人就是由若干酋长联合起来的各种民族混合的产物。国王显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严格地按照习俗管理。在这一扩张的过程中，莫西农民的稳步前进无疑比骑兵分队的建立更为重要。由于互相通婚和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早先存在的人类结构的缓慢渗透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现象。

生物学意义上的贡献是如此重要，以致于J. 迪洛布森写道，莫加(复数为莫西)一词本意即为混血。[59]对于一些作者[60]提到的很早以前存在的纽纽塞人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人种上的混杂如此之多以致于亚滕加人把莫戈中部的莫西人当做古龙西人，而瓦加杜古这一称呼是专指古龙西人的邻邦库杜古的莫西人面言的。亚滕加人自己也受到尼日尔河湾的曼德人的人种影响。由于纳阿巴·坎戈曾求援于塞古的军队，曼德人对亚滕加的历史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曼德人早就通过同商人、专业人员，甚至同重要的雅354 尔塞人的祖先们杂居而与亚滕加人混杂。[61]可能正是人种混杂成为莫西人与萨莫人(萨纳人)玩笑关系(rakire)的来历。在文化和经济方面，正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如在大湖地区，本地民族所做的贡献往往被贬低甚至被抹煞。我们看到了在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多贡人(尤其是土地祭司)和库龙巴人对亚滕加王朝统治的体制如何做出贡献的。只要通过农耕仪式的运作和通常是本地人的土地祭司的服务，他们对每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仍具有强烈的

[56] 参看M. 伊扎尔德，1975年。

[57] 决不能称之为“无国家社会”或“无首领社会”。“非集权制民族”的说法也会因为提法消极而受到批评，而且它只涉及政治权力这一点。此外，这类民族也可以变成集权的(如班巴拉人)。

[58]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9章。

[59] 见A.D. 迪洛布森(Delobson)，1929年。作者的确补充说，这一不同的意见是贵族对百姓的描述，但是根据传说(见亚姆巴·廷德雷贝奥戈)，瓦加杜古的开国君王伍布里的母亲就是一位本地妇女。

[60] 同上；R. 佩奇亚德(Pageard)，1969年。

[61] 本章第361页。

影响。但在最高的政治级别上，后来成了瓦加杜古纳阿巴[62]的当地头人的后裔在确定莫戈-纳阿巴的王位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奴隶制度，通常是以牺牲本地人特别是古龙西人和富尔塞人[63]的利益为代价，并随几内亚海岸奴隶贸易的出现而不断升级，其影响远及阿散蒂帝国及其北部的附庸国。

此外，本地的民族，不管是属于曼德文化或者属于沃尔特文化，都是欢迎同外族交流的，但是绝不接受统治。这一战略直到殖民统治时期一直十分成功。纳阿巴·库姆杜梅在早期出征博罗莫的途中逝世，他当时很可能是试图把红、黑沃尔特河之间的地区纳人莫西人的控制之下。这一宏大计划失败后，除少数限制地区之外，红沃尔特河地区遂成为莫戈国西部的天然边界。

尽管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古龙西人[64]和布瓦巴人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色。古龙西人以波村、莱奥、萨波埃和雷普为主要中心，范围直到今日的加纳。他们以家庭集团为单位独自居住在设计得颇具特色的小屋里，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复杂的政治等级制度。土地祭司或者(化装聚会)常常起着家庭之间联系者的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组织得好一些的机构，设有行政区头人和法庭，还有一名宗教顾问，专事对夸拉(kwara,巫术象征物)的崇拜。

布瓦巴人[65]似乎是在10至15世纪之间形成自己特殊的实体。他们不承认高于村级的任何政治权力机构。多教(Do)也为邻近各村庄的人教者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机会。

在亚滕加附近有北萨莫人[66]，他们的聚居地筑有巨大的粮仓。政治组织包括由数十个村庄组成的相当稳定的邦联，这些村庄环绕着几个相当于“卡富”(kafu,曼德人的行政区)的政治中心。桑的制度是建立在氏族联盟和领土联合的基础之上。氏族联盟有泽博诸酋长与铁匠之间的联合等。在继承王位之前，纳阿巴·库姆杜梅和包括纳阿巴·亚迪加在内的其他亲王曾同萨纳人发生战争。后来纳阿巴·坎戈企图把东北部桑国纳人亚滕加，但失败了。萨纳人坚强的武士和农民们十分珍惜自己的自由，像他们早先在纳阿巴·亚迪加，特别是在纳阿巴·兰布维加统治时期所做的那样，再一次抵抗亚滕加的压力。后来他们在整个19世纪也是这样做的。尤其在最后的时期里，他们的国土变成了亚滕加王子们后撤的基地。他们在当地招募雇佣兵到瓦希古亚扶植或颠覆那里的国王。至于比萨，他们同萨纳人有亲缘关系，但因氏族争执与其分手，基地设在莫戈的东南部。他们的抵抗也很出色，尽管双方有文化交流并在18世纪末期交纳俘虏作为贡物。但是，他们在殖民统治以前，似乎在不断扩大。 355

在现今布基纳法索的西南部几乎荒无人烟，虽然布瓦巴人的狩猎范围远及布古里巴

---

[62] 瓦加杜古(沃戈多戈)从狭义上说是本地头人居住的区域。

[63] 富尔塞人或称库龙巴人；见第343页。

[64] 事实上没有自称古龙西(莫雷语单数为，Gurunga)的民族，而是称努努马人、勒拉人、西沙拉人、科人、卡塞纳人等等。

[65] 见J. 凯普伦(Capron)，1973年。布瓦巴人同博博人在文化上有联系，但在语言上没有联系。见A. 勒莫尔(Le Moal)，1976年。

[66] 萨莫人的名称来源于曼德语萨莫戈。但该民族自称为萨纳人(单数为San)。

河。在1730年前后，库兰戈人扩张到这个地区，十年后普瓦人(普古利人)获得布瓦巴人的许可在此地定居。此后50年内，继多罗贝人和甘人在纳科定居之后，德扬人、洛比人和维勒人先后在此落户，最后是比里福尔人，他们占据了洛比人放弃的巴帝地区。

孔和格韦里科

自从10世纪至15世纪苏丹诸帝国统治时期以来，称做万加拉人的朱乌拉商人一直在沿着通向森林的道路上旅行，那里发现了黄金和柯拉果(因此得名沃罗杜古)。但是从16世纪以后沿着几内亚湾产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奴隶和军火贸易。仅这一个事件就足以说明朱乌拉人的各群体——现在是商人、士兵、穆斯林传教士——为什么不断地向南进，进人了萨凡纳草原地区。那里的新体制急需的商品交易日益增加。朱乌拉人帮助建立了贝戈大贸易中心。这一贝戈商道不久即同从阿西尼经亚卡索到博博和巴马科穿过今天的科特迪瓦的一条商道连接起来。当迪奥曼德人在中西部定居下来时，瓦塔拉人则把博隆和曼科诺变356 成了大贸易中心。在16世纪末，出现了贡贾王国。17世纪末，贝戈被摧毁之后，朱乌拉难民撤退到布龙阿布龙王国，建立了邦杜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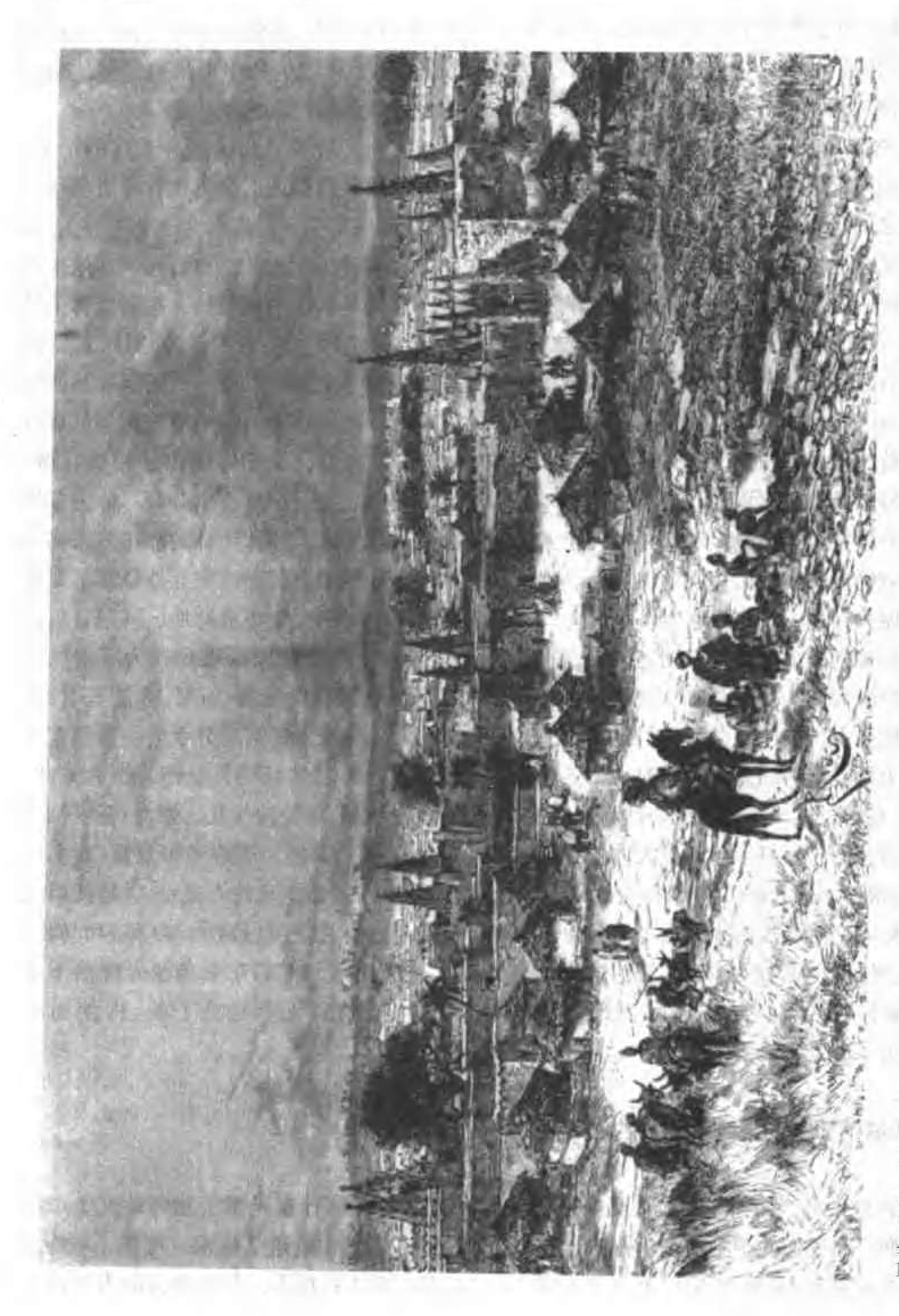
17世纪以后，有许多重要的情况给予朱乌拉人的活动以有力的推动。首先是加奥帝国的崩溃。第二是阿散蒂帝国的建立，它成了供应黄金、军火、食盐和制成品的主要中心。第三，沃尔特大草原诸社会的存在，同毗邻地区的社会相比那里的人口十分稠密，又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因此能够提供沿海地区所需要的奴隶、牲口和黄金。这样就容易理解达贡巴为什么要在洛罗人国土上按照自己的模式组建的布纳库兰戈[67] 王国。这是由亲王们管理，在军事区划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他们开采了洛比的金矿，可能是同布龙王国竞相开采的，因此在17和18世纪导致了流血冲突。

征服了南库兰戈以后，阿肯族的布龙人又与布纳为控制沿科莫埃河的北部通道而发生争执。由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坦恩·达特(17世纪)和库索诺(18世纪初)权力的巩固，将朱乌拉人吸引到邦杜库。但鲍勒人不久就决定封锁班达马河而同北方人做生意。被向西驱赶的朱乌拉人则要打通科莫埃河通向巴沙姆的道路，绕道前往恩齐马和芳蒂兰的城堡商站去。

在这一大的氛围下，新的移民点在朱乌拉人的带动下建立起来，并同时具有商业、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性质。18世纪中叶，从塞古下来的武装集团迪亚拉索巴人扫除了塞努福人，在奥迭内建立了一个曼德人(纳法纳人)王国。

塞努福人属沃尔特语系。他们在科罗戈、塞盖拉、奥迭内和孔国一带按氏族定居下来。马里的崩溃为他们向北扩张创造了机会，致使其领土远达锡卡索和布古尼。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班巴拉语。向南他们进入了布瓦凯地区，在那里他们被融人鲍勒人集团。在东方他们形成了孤立的各个集团，诸如纳法纳人，在被布龙人控制之前，是贝戈的淘金者。帕拉卡人后来臣属于孔国。塞努福人是极好的农民，他们耕种紧凑的村庄周围的土地，效益很高。他们讲究平等和独立思考。只有一个大型的社会机构——波朗。这个机构既有宗教

[67] 库兰戈即"不怕死的人"。



图片 12.3 孔城的全貌

358 色彩,也有助于调节社会等级制度。塞努福人也有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从很早起就一直在创作黑非洲的象征派风格的杰作。塞努福人到19世纪才着手建立少数中央集权王国。例如克内杜古(锡卡索)的特拉奥雷王朝,这方面他们也许是效法曼德人的做法。

在18世纪初,曼德人在一系列朱乌拉人定居点之外又增添了孔城这个著名的中心。这一地区如果不是组织起来的话似乎早已被蒂福人所占领,蒂福人迄今仍在管理自努穆达至孔城之间的一系列村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里,后来成为瓦塔拉人的凯塔和库里巴里曼德人征服了本地人。其中的一人塞古·瓦塔拉在18世纪初消灭了其他朱乌拉人集团,并依靠强大的军队统治了纳法纳和孔城,这支军队是由朱乌拉人军官指挥下的塞努福人组成。这支军事力量使瓦塔拉能够征服西上沃尔特,远至达菲纳(黑沃尔特河湾)。随后,孔城军队征服了图尔卡国和福罗纳,摧毁了锡卡索地区以及米尼安卡和马西纳的部分地区,远达同巴尼河上的杰内隔岸相望的索法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次远征最终是如何被比通·库里巴里所击退的。1740年塞古·瓦塔拉死后,这个帝国由于幅员辽阔、多种民族以及缺乏牢固的政府体系而陷人深刻的混乱之中。最后终于发生分裂,分为非穆斯林的乔奥拉人特权阶级和塞努福武士索洪吉,脱离了作为商人和穆斯林的萨拉马朱乌拉人。孔城确曾一度成为伟大的伊斯兰学术中心。但是它控制杰内的图谋明显地暴露了瓦塔拉人的庞大计划:首先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最大限度的距离内控制将森林地区同尼日尔河湾联系起来的商道。在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之后,朱乌拉集团退缩到较为有限的目标。其中最大胆的行动是建立格韦里科王国。[68] 在斯耶(博博迪乌拉索)周围,[69] 法马甘·瓦塔拉仿照孔王国在巴尼芬河(尼日尔河支流)、科莫埃河和黑沃尔特河的分水岭一带建立王国。因为科莫埃河和黑沃尔特河中下游流经产金区,而且科莫埃河经贝尼到达杰内地区,法马甘·瓦塔拉这一决定的战略性和他拒绝臣服于孔城的他的年轻的侄儿,塞古·瓦塔拉的儿子们的意向已一目了然。他大体上完全而永久性地攫取了蒂福、达芳和布瓦姆(布瓦巴国)。在博博,他征服了博博朱乌拉人,并同其结为盟友。博博朱乌拉人是11世纪前后在博博芬格人之后从杰内来到这里的。他的继承者凯雷·马萨·瓦塔拉(1742-1749年)和马甘·欧勒·瓦塔拉(1749-1809年)只能勉强遏制住各族人民的反叛,他们在朱乌拉人统治下不

359 断受到镇压(如1754年对布瓦大城镇桑城的镇压)。这一统治首先是经济上的,即使当时似乎是为了改变宗教信仰。

从尼日尔河到沃尔特河流域的经济生活

18世纪中叶当博博朱乌拉人到来之时,据J.B.基特加估计正是黑沃尔特地区生产黄金的盛期。移民们几乎独占了对普拉金矿的开采,并在采掘中改进了技术。可是,基特加假设早先的采金人(从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已经是曼德朱乌拉人,却被普拉的古龙西人

---

[68] 格韦里科在朱乌拉语中意为“在长舞台的尽头”。

[69] 见N.列夫齐昂,1971年;E.伯纳斯(Bernus),1960年;和D.特拉奥雷(Traoré),1937年。《贡贾编年史》是文中报道的事件的可靠史料基础,关于此书,参见J.古迪,1967年;和N.列夫齐昂,1971年。

认为是莫西人。[70]

最繁忙的商人和商道在尼日尔河和沃尔特河流域中间地区的西半部和北半部。即使在莫西王国和非中央集权的民族如古龙西人中间，他们的经济也高于自给自足的基础，但在17和18世纪那里逐渐发展了舶来品的贸易网，越来越多的专业商人经营此业。

莫西国处于在肥力耗尽的土地上播种小米的近乎单一的种植地区，降雨量不正常。十年里平均有两年歉收和两年颗粒不收。在亚滕加，缺粮乃至饥荒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纳阿巴·扎纳统治时期和19世纪30年代。[71] 除小米以外，主要粮食和农作物包括玉米(淡季作物)、花生、豇豆、蚕豆、芝麻及某些野薄荷。手工业的主要作物棉花看来早已在那里栽培。自莫西历史之初，穆斯林雅尔塞人就开始了纺织，棉布是主要由他们经营的南北商队所运载的商品。专事印染的马拉斯人(桑海人)使用了蓝靛。人们采集许多野生植物，有野薄荷和缺粮时的代用食物，主要是“奈雷”（nere)，其果实有多种用途，以及可榨食油的酪脂树果。

在鲁罗姆的前莫西时代(直到15和16世纪)，库龙巴人中间已有马拉斯人，他们在撒哈拉贩运食盐。包括亚滕加在内的北部莫西诸国的形成对长途贸易商队有双重影响：第一，马拉斯人为雅尔塞人所取代；第二，雅尔塞人除在撒哈拉贩盐外，还做柯拉果生意。柯拉果是他们从阿散蒂的北缘买来的。纳阿巴·坎戈的统治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例如瓦希古亚附近的玉巴村就是在那时繁荣起来的。 361

在18世纪，雅尔塞人和马拉斯人一起建立了庞大的商人定居点。马拉斯人无法再继续保持他们独立的贸易体系，因为库龙巴人丧失了独立，甚至他们的特性在国王逐渐地被莫西人(亚滕加)和富尔贝人(杰尔戈吉)控制之后也消失了。王国的大市场，如玉巴和古尔西，成了食盐和柯拉果长途贸易商队的终点站。亚滕加的雅尔塞人是充满活力的商人集团，他们不但出现在廷巴克图(食盐贸易商队的始发地)，也在巴尼河流域及马西纳各地可见。纳阿巴·坎戈对塞古的政策也许旨在让这些雅尔塞人在同亚滕加接壤的各国定居下来。因为在莫西国，这些审慎的雅尔塞商人与当地人共生，同首领们相互妥协。作为对某些特权(赦免权、免服兵役和武装护卫权)的回报，他们答应不鼓励搞颠覆、优先卖货物给纳阿巴、通过适当的仪式向他祝福和提供支持，甚至在某些场合充当情报员。[72]

商人的结账单位为贝壳，在驼队贸易和日常贸易中还使用其他单位，特别是用肘尺丈量棉布。在贝壳、棉布、盐块、奴隶和马匹之间还有各种等价体系。

除了把棉布业和长途贸易结合起来的雅尔塞人以外，还有一些铁匠从事重金属加工和金属冶炼，以及制陶业(妇女从事)和向缺少铁矿的中部莫戈的出口贸易。亚滕加是西非中部金属加工的重要地区之一。制成品(制造武器和农具的铁条)贸易给铁匠带来丰厚的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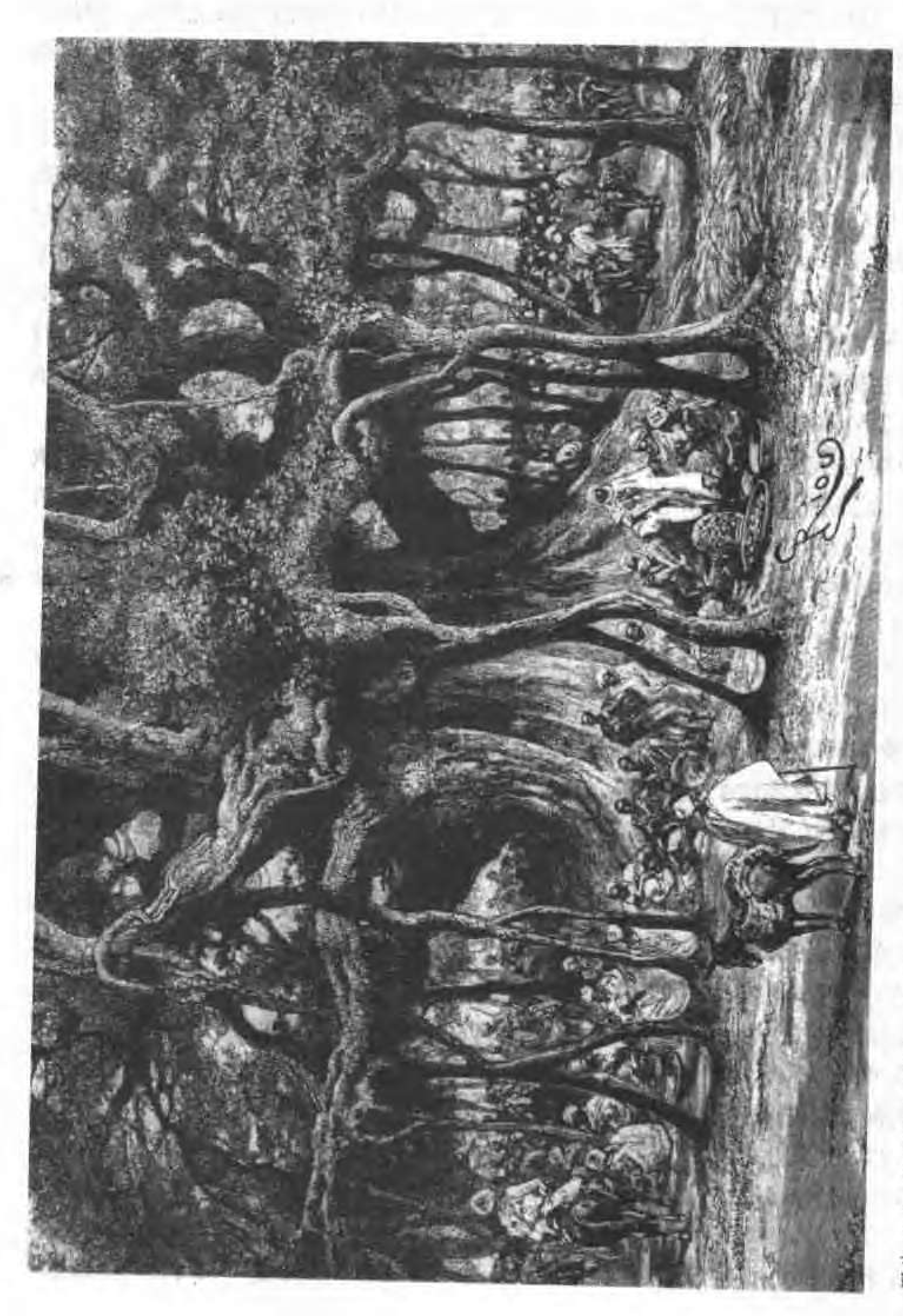
瓦布古亚地点的选定肯定隐含着经济动机。弗罗本纽斯[73] 报道过一则传说，其大意

[70] 见J.B.基特加(Kietegha)，1983年，第158页。

[71] 有关莫戈饥荒的确切年代清单尚待编汇。

[72] A.考安达(Kouanda)，1984年，第248页。

[73] L.弗罗本纽斯，1924年，第281页。



图片 12.4 集市商人聚集在一棵榕树树荫之下

是，纳阿巴·坎戈有意把他的国都建成一个食盐交易站。也可能在纳阿巴·坎戈统治时期组建了市场总管的团队，成员由俘虏充任，其任务是向进口货征收赋税。在此之前，纳阿巴·宗布里曾在瓦加杜古王国成立过市场总管兵团，成员是王家俘虏，负责向摆摊的商品征税。当然，其目的在于为宫廷提供额外收人，但也试图削减地方首领收税的权力，因为他们对待商人往往十分严厉。

这一时期黑非洲沿岸各地几乎都处于奴隶贸易的高潮，必须时刻记住的是，在贸易流通机制中引进的可怕逻辑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内涵，从那时起，军火、奴隶和政治权力都被当做同一个问题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提到当时最伟大的君主：马萨西人、塞古国的执政者、亚滕加的纳阿巴·坎戈、孔城和博博的瓦塔拉人，更不必说达贡巴和阿散蒂的统治者了。地方首领为了参与政治游戏，自觉不自觉地加人到奴隶贸易之中，并充当东道主的角色，从而使君王们的奴隶贸易活动更加扩大和火爆起来。 362

在班巴拉人的体制中，我们看到了俘虏的地位在本地被制度化的过程。他们利用业已存在的通-登(协会成员)制度制造出通-迪昂(通的俘虏)制度。虽然这是马马里·库里巴里的主意，但是也因为它已在流传中并且几百年来在社会惯例中早已形成。

对于福罗巴-迪昂(王室奴隶)采取了进一步的步骤。这些人是由法马组织起来并加以界定的战俘连队。他们的命运，通常当做战争产生的商品予以出卖，在班巴拉称做“桑迪昂”(san'dyon,贸易奴隶)。被某个社群购买后，如果是女的，一旦生下孩子就可取得“沃罗索”(woloso,在房子里降生)的地位；而作为男子，一旦他的主子对他有了足够的信任也能取得同样的地位。之后，沃罗索在子女继承了他的地位并向主子交纳了年度赔偿金之后，可取得迪昂戈龙(dyon goron)的地位。在取得了沃罗索的地位之后，奴隶就变成种姓成员，不能再将他出卖。他还取得了继承权，可把财产传给子女。这样他的生活条件，如果不是地位的话，将优于突然之间变成俘虏的贫苦自由人。在18世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许多人显然以接受一个保护者和主子的权力而渡过一生，正如欧洲的中世纪盛期一般。确实，沃罗索的状况永远地传给了他的后代，尽管在王宫里所发生的那样，少数种姓阶层的人有可能晋升到最高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崇高地位使任何普通人不可能再提他们从前的种姓地位，但是在社会集体思想深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抹掉而将继续存在下去。[74]

就这样，伟大的国王恩戈洛·迪亚拉家族无法抹去其祖先当过奴隶的记忆，并招致卡尔塔的马萨西人的奚落。可是恩戈洛的情况表明，对于最聪明的俘虏来说，大门并没有关闭。从理论上讲，他们的主子有权任意处置他们，但实际上，他们通过某些受宠者的斡旋，能够影响最高当局的决定。[75] 在严格的莫西制度下，一个人从生到死保持一种地位，不存在转换和冲破的可能性，[76] 即使如此，也有一种阉人，卡姆索戈-纳阿巴(Kamsaogo-Naaba)承担着沉重的责任。确实，其他阉人为此被卖到费赞、北非和近东。[77] 363

---

[74] 参看A.拉芬奈尔，1846年，第1卷，第371页。

[75] 见C.蒙泰尔，1924年，第301页。

[76] 国王不能解除或者降低贵族的等级。国王要解除一名头人的职务时就给他一枝毒箭，意思是要他自杀，如头人不从，就要发生一场战争。

[77] 见Y.廷德雷贝奥戈，1964年。

伊斯兰教和传统的非洲宗教

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无论在殖民主义者征服非洲之前还是之后，[78] 班巴拉人和莫西人构成了阻止伊斯兰教在西非发展的强大障碍。这是简单化的说法，需加修正。自从公元8世纪以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伊斯兰教就在流行了。从加纳帝国到加奥帝国的伟大帝国里，伊斯兰教的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即使在那些地区也存在障碍和抵制。迟至18世纪，离开马西纳迁移到沃尔特地区的东北部的杰尔古贝人和费鲁贝富尔贝人往往是传统宗教的信徒。[79]

在公元8世纪至19世纪这一千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通过商人、祈祷首领、甚至暴力手段等种种渠道在整个地区不断渗透和传播，而且避开各种障碍，并根据多民族形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尤其当他们有所抵抗时。可是，西非腹地的民族对伊斯兰教，后来对基督教的看法则不同于这些宗教的信徒对非洲大陆传统宗教的看法。班巴拉人则从一开始就对伊斯兰教采取了调和态度，而伊斯兰教的出现使他们更加强调其最高神灵玛阿·恩加拉——以各种特殊祭礼崇拜的诸神的主宰。实际上作为最高祭司的塞古和卡尔塔的国王们以这种方式吸收了伊斯兰教之后，认为在坚持信奉自己的崇拜物和巫师的同时，他们通过马拉布特向玛阿·恩加拉的代理者求教并无障碍。国王认为巫师调动了宇宙的无形能量，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愿望物质化了。巫师为其祈求物“命名”因而将其创造出来。[80]

虽然库里巴里人包括他们的最高首领实行传统仪式，但他们也参加穆斯林宗教节日活动，至少他们要在场，并向萨拉科尔的马拉布特们赠送大量的礼物。据拉芬奈尔记述，塔巴斯基节(tabaski,献祭)恰逢马萨西氏族召开大会，大会期间，如同科摩人和马康戈巴人一样要举行秘密仪式，宣誓效忠。但这些班巴拉人尽其所能重复穆斯林祈祷会上司仪者的手势，有些人还宰羊作牺牲。这种宗教融合是非洲黑人的宗教精神特点之一，后来在巴364西、海地和古巴发展成为非洲-美洲式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在此情况下，如果祈求神灵未能得到明确而满意的答复，他们便寻求马拉布特的干预，这种干预得到马马里·库里巴里以及通马萨、恩戈洛和其他人的虔诚欢迎。此外，比通还向杰内的马拉布特支付“扎卡特”(zakat)并奉养了40名神学者，包括卡迈特，他们虽是穆斯林但也是“法罗”(faro,尼日尔河的河神)的祭司。当杀人成性的登科罗遭截击并被通马萨杀死之时，他当时正准备沐浴，身后跟着手提“萨塔拉”(satala,水壶)的忠诚的铁匠。

巫师兼铁匠也毫不困难地采纳了穆斯林的泥土占卜术。[81] 阿里·巴卡里在廷巴克图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继承人向贝凯家族的谢赫学会了阿拉伯文，不久后他同全家人都遭到了谋杀，这也是事实。不过导致这次谋杀的原因在于他想禁止饮用“多罗”(dolo,小米啤酒)

---

[78] C. 蒙泰尔，1924年，第23页及随后诸页。

[79] 见I.P. 迪亚罗(Diallo)、1981年。

[80]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8章。

[81] 描述神灵的用词之一“顾问”为杜尔恩达拉(turndala,通过泥沙)，来源于阿拉伯语al-tareb,意为土地。其他用词完全是苏丹语——布古里达拉(buguridala)源自布古里(buguri,尘土)，凯凯达拉(kyekyedala)源自凯凯(kyekye,沙子)。

和膜拜神灵或祖先。事实上情况远不能肯定，因为实施这次谋杀的野心勃勃的通马萨不久后又杀害了马马里的小儿子迪昂·科洛。

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教给班巴拉人带来了多妻、离婚、拒付债务及奴隶制等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对于班巴拉人自己的制度并未构成系统的挑战。此外，马拉布特所做所为并不使班巴拉新入教者反感。这样，在苏丹西部也许是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中心之一的迪亚，[82] 传教通常要适应当地的习俗，给予巫术充分的重视。[83] 在班巴拉人中，马拉布特人数最多的是马尔卡人、博佐人和索莫诺人。他们自称是摩尔人和富尔贝人伊斯兰教大师的后裔，通过他们而归属于这个或者那个兄弟会。事实上有些民族如多索宁克人、马尔卡人、富尔贝人和托罗贝人等很早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早就享有宗教宽容精神，后来成为范例和催化剂。博佐人和索莫诺渔夫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传统同早期塞古的库里巴里氏族有联系。

简而言之，这种互相容忍的精神对双方都大有益处，它有利于穆斯林领袖同政府交往，也便于使用内在的渠道争取这些民族信奉《古兰经》。但它也有利于巩固君主的权力，因为国王们面对国内民族和社会的多样性的苦恼，无力应付宗教上的分歧。由此，

> 异教徒根据自己的观念利用伊斯兰教，使之苏丹化。在伊斯兰教和异教两极之间存在着无数中间状态，使它们相互联系，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观察它们，时而像是苏丹人伊斯兰化了，时而也像是伊斯兰教苏丹化了。[84]

365

这就是塞古·阿赫马杜·巴雷和哈吉吉·乌玛尔发动不同的圣战(djihād)以前尼日尔河湾地带的状况。在莫西国，穆斯林对瓦加杜古王宫开始产生影响或许在纳阿巴·宗布里(约1744—约1784年)的儿子纳阿巴·科姆统治时期。

同伊斯兰教越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扩张的历史进程所得出的结论相反，沃尔特河的伊斯兰教并不是从北方渗透的结果。与此相反，亚滕加直到殖民时期对伊斯兰教一直是封闭的。尽管(或许是由于)那里存在着富尔贝人和雅尔塞商人这两个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最近的研究表明，伊斯兰教扩大到沃尔特盆地是在朱乌拉商人和武士之后，沿沃尔特地区的西部南北一线和黑沃尔特河谷进行的。而博博迪乌拉索镇则是穆斯林改宗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萨诺戈人的马尔卡"达分"(dafing,氏族)是通过其知识分子和马拉布特进行的最积极的传播者之一。

贡贾的奠基人是穆斯林曼德人。伊斯兰教从贡贾国进入达贡巴国。列夫齐昂认为穆斯林在达贡巴人中间渗透的时间在17世纪中期，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将王国都城从延迪达巴里向东迁徙到现在的延迪。[85] 这些地区的贸易中心很快变成了宗教中心，突出地表现在"马拉姆"(malam,穆斯林学者)的汇萃。巡回传教士们跟随贩运柯拉果的长途贸易商队进入白沃尔特河盆地。第一位被说服皈依伊斯兰教的达贡巴国王是纳·赞金纳，他统治的时间在18世纪初。有可能由于国王的皈依结束了达贡巴同贡贾国的持久和平。

---

[82] 迪亚位于马西纳的尼日尔河左岸。
[83] P. 马蒂(Marty)，1920-1921年，第4卷。
[84] C. 蒙泰尔，1924年，第332页。
[85] 见N. 列夫齐昂，1968年，第194-203页。

大致也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教渗透到曼普鲁西国。主要的市场甘巴加很快变成穆斯林中心。这样，伊斯兰教在18世纪末从南面来到莫戈，正值纳阿巴·宗布里统治时期。瓦加杜古的统治者的母亲是位穆斯林，因此，伊斯兰教对他来说是熟悉的。虽然他没有皈依，但他每天做祷告，并对穆斯林包括改变宗教信仰者表示同情。在纳阿巴·杜鲁古(1796-1825年)统治时期，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莫戈-纳阿巴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在瓦加杜古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该镇的伊玛目还在王宫担任高位。早期的莫西国伊斯兰教同当时流行于曼普鲁西和达贡巴王国的伊斯兰教一样，都是贵族的伊斯兰教。对于莫戈-纳阿巴366和其他酋长以及高贵者来说，实际信奉伊斯兰教同尊奉传统宗教是不矛盾的。可是，他们无意将新教强加于他们的臣民。纳阿巴·杜鲁古虽然是深信不疑的穆斯林，但看来却害怕伊斯兰教过快地在他的王国取得进展。他调走了长子，未来的纳阿巴·萨瓦多戈并免去科姆比西里头人的职务，因为两人都是狂热的穆斯林，热衷于在随从者中宣传改教，做得可能有些过头。由此可见，在班巴拉王国，正如莫戈王国一样，虽然决定对伊斯兰教采取容忍态度，但传统的宗教依然存在，而且在寻求妥协的同时保持着警惕。当时，在其他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孔和格韦里科帝国，另一个古尔曼斯王国，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明显不同。在孔国，正如在博博朱乌拉人中间一样，伊斯兰教既是人生活的理由，也是生活的方式。他们的政策和富于战斗性的信仰预示着他们，特别是萨摩利在19世纪发动的圣战和征伐。与此相反，古尔曼西巴人则坚定地维护对传统宗教的信仰。

结　论

对于尼日尔河湾和上沃尔特河流域的国家来说，16至18世纪无疑是国家形成的时期。

根据当地流传的古代传说，朱乌拉、莫西、古尔曼斯巴和班巴拉诸国都是由若干民族联合而成的国家。即使居主导地位的民族集团要求享有某种特权，其本身也是这些集团混杂的产物并来源于此。因此，这些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这里也出现过相当复杂的政治机构，但却很脆弱，主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文字形式的行政管理。

此外，这些国家还由于内部矛盾而遭到破坏。首先是权力下放招致严重的问题。瓦加杜古的纳阿巴·库姆杜梅为了安抚落选的酋长候选人，使他们不至于生事，为他们安排另外的职务而导致王朝权力地理上的分散。他几乎没有想到他的继承人纳阿巴·瓦尔加后来会对那些酋长的后裔发动战争。同样，比通·库里巴里所任命的某些“伙伴”会变成难以驾驭的总督。这一政治上的困难又与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因为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的亲王们把敌意指向农民，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

这些初期的矛盾掩盖了同样危险的另一矛盾，即由平民组成的王室随从与受一系列措施制约的王亲国戚之间形成对立。制约王亲国戚的措施中最突出的便是瓦希古亚的纳阿367巴·坎戈的政策。班巴拉人的情况则是，迅速变为国家使得氏族、政治协会通和领土国家三者所代表的相互竞争的力量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朗化。这种利益上的冲突只有在具有异乎寻常的君主的领导之下才能减少。

宗教问题决不能低估。确实，在19世纪以前，莫西人和班巴拉人的国家成功地同穆斯林集团(索宁克人、朱乌拉人、雅尔塞人等)维持暂时的妥协，其基础是容忍、宗教融合和互相服务，结果加强了统治阶级之间的合作。雅尔塞人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该地区的穆斯林往往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商人。但是，在莫西人和班巴拉人国家为一方，与孔帝国和古尔曼斯巴诸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异值得重视。在孔国、博博和克内杜古，激进的穆斯林模式占了上风。可是，在莫戈的雅尔塞人和塞古及卡尔塔的索宁克人却选择了回避政治的道路，雅尔塞人甚至在初期就回避改变宗教信仰问题，因为传统宗教仍得到官方的庇护。但是这仅仅是延缓时间的问题，因为力量对比还远未突破。最极端的例子是古尔曼斯巴人。他们在19世纪初利普塔科人圣战之后，从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政权猛然转向臣服于穆斯林富尔贝人。

然而，这个地区国家的形成虽然符合总的经济状况，但却因此最终为这种政治实验带来厄运。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和大西洋海岸之间的所有国家日益落人欧洲人的控制之下。欧洲人的讨价还价政策，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安排了商业的循环线路、结构和贸易条件，以致原先建立起来的供求模式逐渐遭到破坏。在这一经济链中，每个统治者都企图控制自己的地区，那些用于取得和保持权力的商品(马匹、武器和俘虏)其相对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这些过程的背后，奴隶贸易的阴影开始出现，而那些生活在非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民族只得消极旁观，别无选择余地。

沿海岸的非洲统治者面对欧洲人，只能在屈服或者战争之间作出选择。与此相比，内陆国家则还有一段延缓时期，它们还在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事实上，它们已处在日益依赖外部世界的过程之中。他们的命运也早已注定。由于这一缘故，地区的霸主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建立编年史学家在述及以前的帝国时所提到的可提供稳定和秩序的法律上的国家。可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证明人民有能力以其非洲式方法建立自己的国家。

(叶正佳　译)

13 上几内亚海岸的国家和文化

C. 翁吉

前　言

368　从卡萨芒斯到科特迪瓦共和国，是一片海岸和森林的广阔地区，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这一地区远比史学家通常称之为上几内亚的地区要大得多。[①] 本章对该地区在 1500 年到 1800 年之间的发展状况做一概述。

社会

与国家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苏丹大民族集团相比，这一地区的特点主要是以很多小的社会文化单位所构成，基础是家族、氏族和村庄。

几内亚地区各国居民的特点是分成许多族体。从卡萨芒斯河到塔诺河，从北部的萨凡纳草原到南部海岸，从富塔贾隆高原到几内亚山脊，从西部海岸到南部海岸，共有 100 多个族体和次族体。

族体的多样化导致多种不同语言的存在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每个族体均使用与相邻的族体不同的语言，有自己的特性。有时，一种民族语言还有多种不同的方言，这使本民族内部的相互沟通受到限制。这样，每个民族都有其突出的特点。例如，乔奥拉人又分为弗卢普人(费卢普人)、巴约特人、布利斯-基亚纳拉人、卡萨人和弗尼人。在科特迪瓦，北方的韦人(法科布里人)和中部的韦人(杜埃库人)与南方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尼德鲁人(图莱普勒人)很难沟通，而巴加人又分成巴加-西特穆人、巴加-弗雷人和巴加-卡基萨人。[②] 369

尽管由于不断迁移导致族体和语言的多样化，但也存在较大的语言实体。卡萨芒斯和塔诺河地区有三大语族及其语支和分支地区。在曼德语族内部，南曼德语分支占主要地位，而北曼德语仅以曼德口语的形式存在于冈比亚、卡萨芒斯、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在曼德语族以南，从卡萨芒斯河口到利比里亚海岸沿线为西大西洋语族，他

---

① 西大西洋海岸地区(几内亚)分为上几内亚(从塞内加尔河到帕尔马斯角)这和下几内亚(从帕尔马斯角到比夫拉湾的尼日尔河三角洲)。W. 罗德尼使用“上几内亚”一词是指冈比亚河和芒特角之间的海岸地区。虽然从严格的人类学角度看，科特迪瓦的西部地区属于上几内亚地区，但是按历史学家界定，该国不属于上几内亚。

② 关于乔奥拉人的情况，见 C. 罗切(Roche)，1976 年，第 28-46 页；关于韦人和巴加人，见 D.T. 尼昂(Niane)和 C. 翁吉(Wondji)。

们也分为南北两个语支，但这两个语支不如上述语族那么同一，显示出多样性的内部特征。最后，这一地区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克瓦语族，包括克鲁-贝特语和阿肯语，他们与西大西洋语族相同，具有更多的差异性。③

历史综合概括的困难

追寻15至19世纪从卡萨芒斯河到科特迪瓦西非海岸地区国家的发展情况，对非洲史学者来说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这不仅涉及民族和社会，其中不少新近已变成国家，其民族历史正在重新建构，还要了解领土情况，而这些领土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并不都属于大的政治实体，因而其历史对史学家来说提出许多方法论方面的难题。

困难首先与其资料有关。15世纪以后，由于贸易的发展，源于欧洲人著作的资料在数量和准确性上大为提高，提供了有关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材料。就像欧洲国家的商业利润一样，这些材料对各时期和地区的记述也是参差不齐。有关塞内冈比亚、河流海岸地区和从黄金海岸到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记述颇丰，但对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的记述则很少。在15世纪之前甚至16世纪，对有些地区几乎没有文字记载。虽然这些材料带有欧洲人的偏见，符合欧洲民族的看法并属于当时的想法，但仍然为海岸地区勾划了一幅图景，包括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政府体制和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过，对海岸地区的描述 **371** 多于内地，在19世纪传教团到内地活动之前，没有关于内地的文字记录。

由于文字资料不足或缺乏，需通过考古发掘、口头传说和其他资料予以补充和充实。虽然在干旱的苏丹-萨赫勒地区考古发掘得到发展，但其范围分布不均，而在湿润的几内亚地区，发掘还处于初始阶段，仅有卡萨芒斯、几内亚-科纳克里、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开展发掘，而这些地区的发掘揭示了2000至3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在曼德人和富尔贝人居住地区，人们对口头传说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另外一些地区则进展不大，因为对当地语言及其方言的了解和对当地社会及文化的必要分析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才能获得成果。此外，根据记载的部分材料，口头传说很少能追溯到17世纪以前。最后，除了曼德语族体之外(由于曼德语的同一性，使重要的、富有成果的核实工作成为可能)，这一地区语言的复杂性和间断性特点，使这里的历史语言学仍处于规划阶段。

同样，要描述这一地区典型的社会、政治分化情况也很困难。研究因殖民地划分而出现的国家的史学家们经常给予苏丹地区的民族更多的篇幅，而对于海岸地区的民族则仅在涉及到苏丹地区民族的发展时才勉强提到。而且，直到今天，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对海岸地区和森林地区每个民族的历史要想做出全面的历史性研究仍不可能。例如，今天我们对几内亚的索索人(属曼德族体)的了解多于对其同胞巴加人的了解，而对科特迪瓦东南沿岸阿尼人(属阿肯族体)的了解多于对其居住在西部泻湖地区的克鲁人同胞的了解。

重商时代欧洲旅行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现代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和近期历史学家的研

③ 参见J.H.格林伯格(Greenberg)，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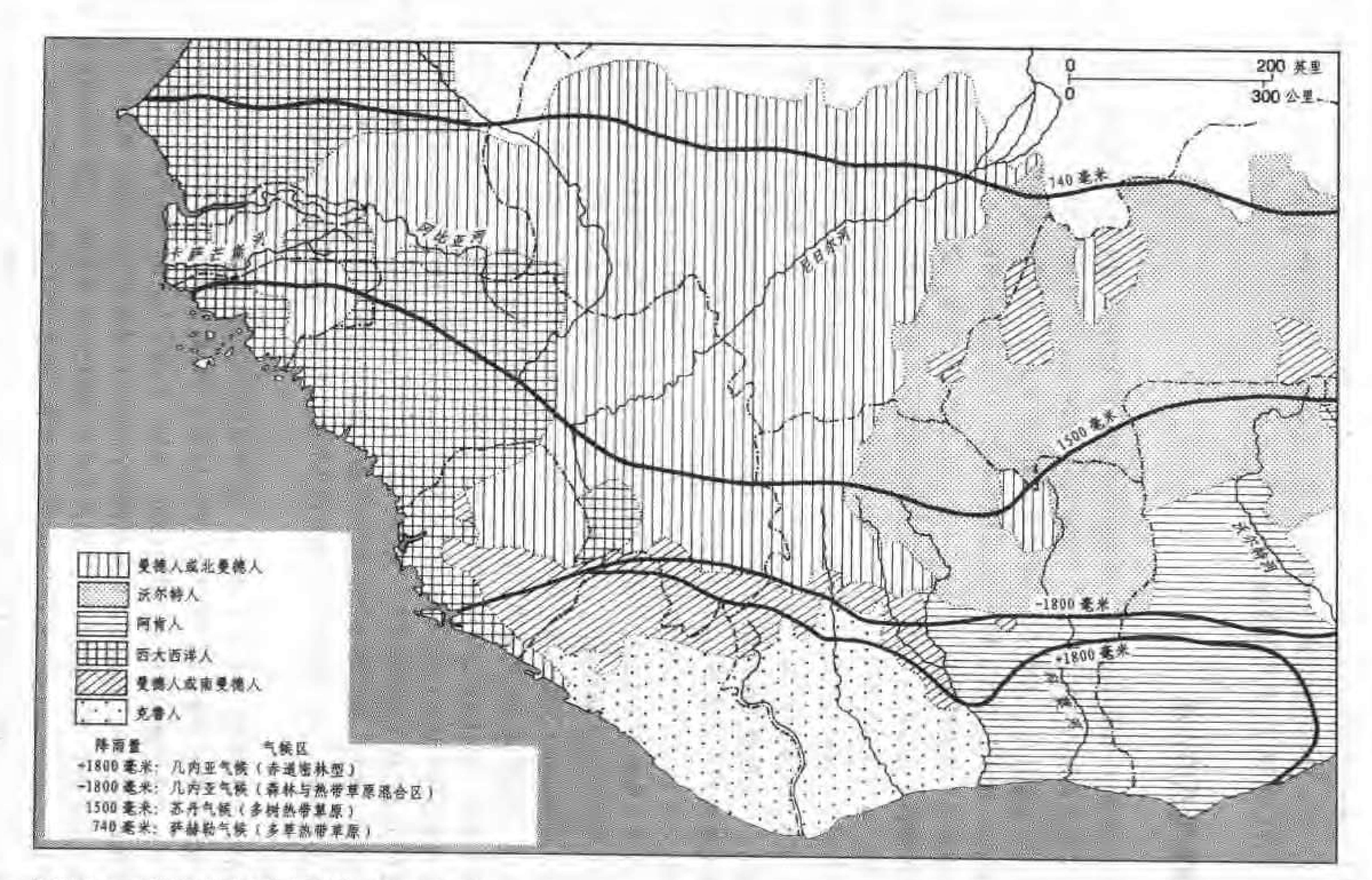


插图 13.1 西非的主要民族集团(仿照 C. 翁吉图)

究成果是否能使我们克服困难并建立起一套编年史的构架仍然存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突然遇到了发展演化的总线路和历史上迁移运动起始点这样一些问题，而要通过支离破碎、各不相同的口头传说提供的叙述是找不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的。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尊重当地各民族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现实，并在不脱离世界历史前进潮流的情况下，重新构筑起最富朝气地区(苏丹)的西非时代的历史构架来。西非海岸在苏丹地区与欧洲贸易的历史困扰之间起着联系作用，自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各处均活跃起来，恢复了生机并适应了新的生活。

人口流动

372

曼德人的流动

在冈比亚河与几内亚及塞拉利昂河之间这一地区，第一批曼德人(马林克人)的足迹从12世纪起向着大西洋通道的方向推进。在冈比亚、卡萨芒斯和几内亚比绍收集到的口头传说中提到了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曼德人的农业居民点，讲到了拜努克人、巴兰特人和其他本地人的农民村庄。在这些分散的族体之内，穆斯林法蒂人和尊崇祖先的萨内人民族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是后来组成卡布(加布)帝国统治家族的初始核心。

这次农民和平迁徙之后，15世纪末由松迪亚塔手下一位退休将军提拉马汉·特拉奥雷率领士兵进行征服性迁移。由于早期移居者的内应，使得对大西洋乔奥拉人、巴兰特人和拜努克人所占领土的征服变得容易了，而征服使马里的地域到达海岸，并控制了从冈比亚到塞拉利昂这一地区。④

对西部扩张传统更深一层的研究表明，曼德人社会内在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可能是其扩张的原因。实行旁系亲属继承——由兄弟继承，直到最上一代最后一名男性死去——使统治者子承父业变得很困难。很多自愿集合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武士和奴隶们便向西部迁移，以便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不少迁徙的集团还因西部边境地区不断增长的贸易及不断增长的财富所吸引。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口的流动描写为仅是包括武士在内的军事征服就会步人歧途。曼德人社会中的另一些人，包括商人、猎人和农民——以及手艺人和奴隶，为了开拓西部的贸易和寻找居住地——也都积极地参与了向西部扩张的活动。这种迁移运动，还深深影响了许多民族和语族，导致了新的混合。

1500年沿海地带和内地的民族

在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旅行者到来之前，海岸和森林地区的定居情况是西非历史上

④ 参见S.M.西索科(Cissoko)，1972年，第1-3页；B.K.西迪贝(Sidibé)，1972年，第5-13页；W.F.加洛韦(Galloway)，1974年。

最不为人知的地区之一。毫无疑问，涉及苏丹帝国和黄金贸易的文字资料是存在的，能向我们提供有关塞内冈比亚、南部河流地区和黄金海岸居民的一些情况，而这仅属于整个地带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而对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其他地区的历史，我们仅能依据葡萄牙旅行者匆忙写成的记录和那些自称“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内地居民有时难以理解的口头传说来推测。

373

位于冈比亚和芒特角之间的南部河流地区 南塞内冈比亚—卡萨芒斯和几内亚比绍 当葡萄牙人到达这里时，就像卡·达-摩斯托和V.费尔南德斯所目睹的那样，这一地区的许多民族早已生活在这里了。[5] 三个主要的集团占据着河门和河流的下游地区，他们是拜努克人或称班洪人(14世纪从东部移居这里的曼德人的一支)；乔奥拉人(于15世纪前从南部卡谢乌河来到这里)和来自东部的巴兰特人，巴兰特人早在15世纪之前就缠上了拜努克人。这些大的集团使海岸和靠近海岸的内地一些没有什么亲缘关系的小集团隶属于自己，如卡桑加人、帕佩尔人、比法达人和比贾戈人。在这些海岸族体之后，在冈比亚和里奥格兰德河之间诸河流的中上游地区，曼德人在12和13世纪从东部而来，驱使其他民族西进到达海岸地区。在曼德人之后，富尔贝人于15世纪也从马西纳来到这里。[6]

几内亚-科纳克里和塞拉利昂 法伊夫和罗德尼对这一地区居民做了叙述。在科诺地区(塞拉利昂)的延吉马的考古发现，并为语言学研究成果所证实，促使C.法伊夫断定，与广泛流传的看法相反，向风海岸地带很早以前，即公元前3000年前至今一直有人居住。最早的居民很可能是塞拉利昂的林巴人，他们占据着斯卡尔西地区，语言与邻近居民不同。之后来到此地的是滕内人和巴加人，他们的语言接近。滕内人来自北方，从塞内加尔移居到富塔贾隆地区。最后来的是基西人和布隆人，这是两个有亲缘关系的集团，他们顺尼日尔河而上，来到该河的发源地。基西人和布隆人汇合在一起，但不久产生了分裂，前者留在内地，而后者移居到海岸地区。[7]

12世纪末期，随着加纳和索索帝国的崩溃，移民的潮流将索索人带到富塔贾隆地区，在此之前，这里已经居住着迪亚隆卡人、巴加人、纳卢人、兰杜马人和蒂亚皮人。随之而来的是各民族之间的混合，最后以向西部迁移而告终。这些民族中的一些小的集团向着海岸及其紧邻地区移动：纳卢人在通博里河和努奈兹河之间的地区定居，巴加人在努奈兹河和孔博尼河之间的地区定居，而兰杜马-蒂亚皮人则在紧靠纳卢人和巴加人的内地定居。滕内人直到16世纪初一直居住在内地，于该世纪末移居到海岸地区。滕达人集团的巴萨里人和科尼亚吉人从冈比亚中部地区来到富塔贾隆，并在富尔贝人到达之前一直在那里直到15世纪。[8] 在15世纪末，由于富尔贝人对索索-迪亚隆卡-巴加人和滕内人施加压力，又引发了一场新的移民运动，使巴加人沿着海岸向南方移居，开始与布隆人接触。在巴加

374

[5] 参见A.达·卡·达-摩斯托(da Cà da Mosto)，1937年。

[6] C.罗切，1976年，第21-66页；W.罗德尼(Rodney)，1970年b，第6-8页；J.理查德-莫拉德，(Richard-Molard)，1949年，第108页。

[7] C.法伊夫(Fyfe)，1964年，第149-165页。

[8] W.罗德尼，1970年b，第1-15页，

人和纳卢人之后，有些孤立的索索-迪亚隆卡人集团试图接近海岸地区。在这些最早的居民中，很多民族属于人们所知的西大西洋语族。

芒特角到班达马河—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西部

这一地区是克鲁人的家乡，克鲁人属克瓦语族。该地区靠近海岸的部分地区是几内亚胡椒(几内亚,“天堂的谷物”或称“傻子”的胡椒)贸易区。该地区的内地属几内亚山脊东部高地的茂密森林地区，与苏丹萨凡纳草原的联系有限。

15世纪后期，欧洲航海家在梅苏拉多角到拉乌角的海岸一带遇到了当地的居民。D.帕切科·佩雷拉和尤斯塔切·德·拉·弗斯对这里的描述曾提到克鲁人、巴萨人和格雷博人。[⑨] 由此我们是否能够得出结论，认为在15世纪早期的克鲁人已经生活在海岸地区了，C.法伊夫注意到克鲁人身上重要的镰状细胞特征，因此他推断，克鲁人曾长期与世隔绝地生活。Y.佩尔松也从克鲁人这一明显特征出发，认为他们早期已居住在海岸森林地带。[⑩] 由于有些作者记述了克鲁人生活在利比里亚东北部高山地区的情况，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在欧洲人于15世纪到这一地区旅行之前，他们已经开始了从内地向海岸地带的移居活动。考古发掘和最近对口头传说的研究也表明，[⑪] 这一地区很久以来就有人居住。在萨桑德拉盆地沉积的河谷地带发现了班达马河西部史前人使用的工具，在班达马河和萨桑德拉诸河流之间地区存在着古老的山洞，这证实了早在中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居住。研究口头传说的史学家A.L.T.戈兹揭示了马格韦人这一古老民族的存在，他们是从北方而来，顺着班达马河而下，一直到达该河的河口地区。这些人是贝特-迪达人的祖先，他们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时期散居在萨桑德拉河和班达马河之间的西部森林区。[⑫]

375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在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科纳克里森林北部的萨凡纳草原地区，即克鲁人的家园，此时也被南方曼德人集团所占据，他们是格尔泽人、马农人、托马人、丹人、古罗人、图拉人和加古人。毫无疑问，在15世纪，他们由于受到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北方曼德人(曼丁哥人)的压力，已经开始向南部森林地区推进。这一由北至南的推进势头肯定将很多小的克鲁人集团驱赶到森林地区边缘靠近海岸一带。

从塞拉利昂到科特迪瓦的人口流动

在16世纪，一些新居民从内地迁移到此地，与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下半叶发现的那些民族混居在一起。他们主要是曼德人，由于马里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被迫沿着通往森林地区和海岸地区的路向南迁移。这次向森林边缘地区的推进不仅是武士们的行动，也是商人活动的结果：

> 由于北方受到阻碍，武士们从萨凡纳草原向南方推进，远至他们的马匹能达到

⑨ D.帕切科·佩雷拉(Pacheco Pereira)，1937年，第99-115页；E.德·拉·弗斯(da la Fosse)，1897年，第180-190页。

⑩ C.法伊夫，1964年，第152-3页；Y.佩尔松(Person)，1970年。

⑪ C.比伦斯(Behrens)，1974年，第19-38页。

⑫ A.L.T.戈兹(Gauze)，1969年和1982年。

的森林走廊的中部地区。他们随着寻找柯拉果的商贩的快速脚步来到这里，是这些商贩远道从塞拉利昂边界、尼日尔河源头到班达马河河岸的西部地区将曼丁哥的语言和文明带到大森林边缘地带。⑬

第一批移居的曼德人是刚果-瓦依人，他们在曼德人卡马拉氏族的率领下于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时从尼日尔河上游地区来到这里。他们来到博波卢，这一地区位于今天利比里亚的西北部，沿着穿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马诺河和莫阿河到达海岸地带。根据霍尔索等人的看法，瓦依人于1500至1550年为了寻找盐和在内地开辟贸易路线而移居到海岸一带。17世纪初，瓦依人占据了上述河流的河口地区，而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科诺人则占据了紧靠海岸的内地。⑭

16世纪中叶，一批曼德人侵者马内-松巴人也从尼日尔河上游地区来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岸。这次迁移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Y. 佩尔松认为这是曼德人向南流动的主流，并说马内人沿着尼日尔河到达库鲁萨，接着又到达科尼扬和利比里亚。1545年，他377 们顺着马诺河和莫阿河最后在芒特角到达海岸地区。从芒特角，他们又沿着海岸向北运动，打垮了塞拉利昂本地居民，并经斯卡尔西侵人富塔贾隆山区。他们后来又被富尔贝人的盟友索索人驱赶，不得不回到海岸地区，占据了从利比里亚到洛斯群岛一带的海岸，逐渐与当地居民混居在一起。

引起这一移民潮的集团的确切组成目前尚不得而知。马内人是什么人？松巴人又是什么人？J.D. 费奇认为马内人就是曼德族的武士，他们可能从克鲁人和西大西洋人那里征召了松巴人和一些附属的帮手。但Y. 佩尔松则认为，马内人是北方曼德人的贵族，他们领导了人侵的活动，利用的是南方曼德族武士，尤其是托马人，托马人可能就是松巴人。不论是什么情况，这一人侵对该地区所有的民族——南方曼德人、克鲁人和西大西洋人，均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及文化上的影响，从摧毁著名的萨佩人王国开始，逐渐建立起由曼德人主宰的新的政治体系社会。这里海岸地区的民族重新组成四个王国，王国又分为酋邦或侯国领地：布隆(从洛斯群岛到塔格林角)；洛科(洛科港周围地区)；布雷(从塞拉利昂海峡到歇尔布罗岛)；歇尔布罗。于是，这些民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逐渐同化、统一起来。马内人在征服时期利用布隆人和滕内人反对林巴人和索索人，又利用富尔贝人和谷物海岸的克鲁人反对基西人和布隆人；之后，马内人又实行了种族间的通婚，将曼德人的影响根植于这一地区。洛科人是滕内人的一支，接受了曼德人的语言；滕内人保持了西大西洋人的文化，但引人了曼德人的酋长。克鲁人仍保持他们的克瓦语，但在政治上也受到影响。曼德人还引进了军事上的革新——新武器、新战术、围攻技术和修筑堡垒，通过进攻和防御演习，增强了海岸地区民族的勇武精神。16世纪末，人侵的民族看来已开始归化，17世纪初，原来的马内人已经完全融人当地民族之中了。⑮

⑬ Y. 佩尔松，1981年，第624页。

⑭ C. 法伊夫，1964年，第159页；S.E. 霍尔索(Holose)，1967年；S.E. 霍尔索，W.L. 德阿塞韦多(d'Azevedo)和盖伊(Gay)，1974年。

⑮ 参见J.D. 费奇(Fage)，1969年b，第37-39页；Y. 佩尔松，1964年；C. 法伊夫，1964年，第158-1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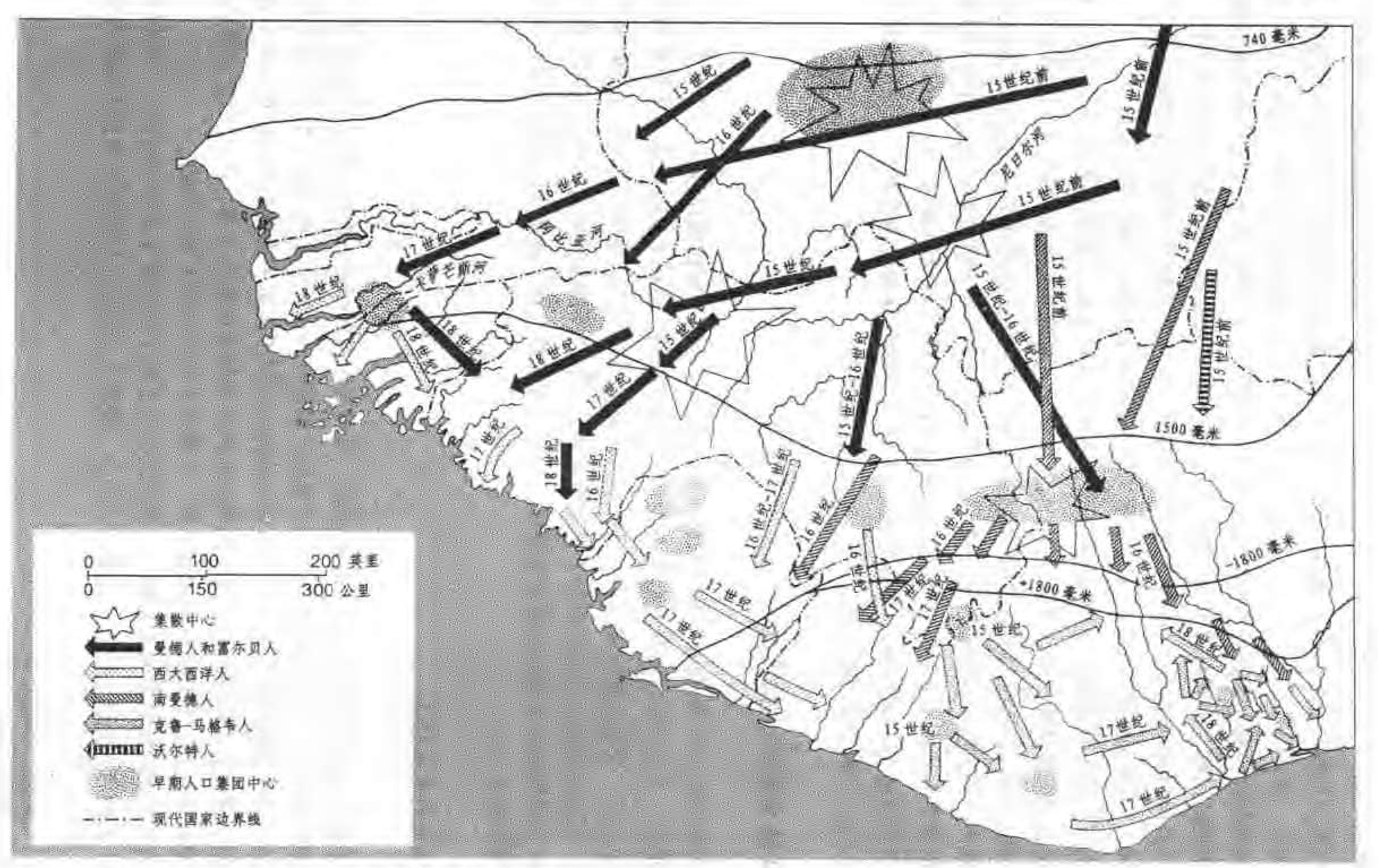


插图 13.2 15至18世纪西非民族迁徙运动(仿照 C. 翁吉图)

在16世纪，南方曼德人的一支，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卡马拉氏族的曼德人(马林克人)向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的西部推进，这一行动不仅造成科诺人和瓦伊人向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岸一带迁移，还使托马人、格尔泽人及其宗族集团(加拉人和马农人)向今天几内亚共和国和利比里亚共和国的森林地区迁移。与此同时，卡马拉氏族的兄弟氏族迪奥曼德人向东部地区迁移，定居在图巴(科特迪瓦)，将丹-图拉人赶走，迫使他们向南方迁移，占据了马恩(也在科特迪瓦)。曼德人继续向东推进，进入沃罗杜古(科特迪瓦的塞盖拉-芒科诺地区)，占据了古罗人的地方，使后者向南和东南方向迁移，到达森林地带。[16]

378

南方曼德人从北到南，从西北到东南方向的推进对克鲁人造成沉重的压力，他们只好朝海岸方向的森林纵深地区迁移。在研究了利比里亚居住的克鲁人之后，C. 比伦斯认为，在16世纪中叶，从北向南的迁移活动已经完成，克鲁人已经离开了利比里亚东北部而到海岸地区一带定居。在科特迪瓦境内，这种迁徙运动似乎发生的要晚一些。例如，图莱普勒的尼德鲁人是属于韦人的一部分，他们原本生活在萨凡纳草原地区，于16世纪中叶被赶到森林地区。[17] 与此同时，泽依里迪达人不得不离开迪沃地区而来到位于今天阿维孔人地区(大拉乌)班达马河河口处。[18]

17和18世纪的人口流动

与前不同，17和18世纪的人口流动影响到所有的海岸和次海岸地区，形成了多方向的迁徙潮。迁徙并不仅是从北向南或从内地向海岸移动，而且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和从西到东流动。受移民潮影响最大的是从利比里亚到塔诺河这一地区。沃伦·L. 德阿塞韦多推测，迁徙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奴隶贸易，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冲突的发生和在民族内部以及民族间军事和贸易联盟的形成。这些发展导致在这一地区不同民族间强有力的文化关系的建立。[19]

从冈比亚到塞拉利昂

卡萨芒斯和几内亚比绍 在17和18世纪，没有新的民族在这一地区出现，但是随着奴隶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曼德人在处于巅峰时期的卡布王国扩张的支持下推进的破坏性突袭活动，这一地区出现了民族融合。对欧洲商品的需求刺激了抢夺奴隶的活动，这反过来又唤起了被攻击民族的反抗。连年战争使任何民族都无法幸免于难，17世纪在卡谢乌河，战争使拜努克人、卡桑加人、帕佩尔人、乔奥拉人和巴兰特人互相为敌。

有些集团显得特别富有侵略性，例如居住在岛屿上的比贾戈人和比法达人，他们常向大陆上的纳卢人和巴兰特人发起进攻。但是，曼德人及臣属于他们的卡桑加人是最先从事

[16] Y. 佩尔松，1964年，第325-328页。
[17] A. 斯沃茨(Swartz)，1971年。
[18] M. 塞古-班巴(Sékou-Bamba)，1978年，第16-18页。
[19] W.L. 德阿塞韦多，1959年和1962年。

抢夺奴隶活动的，他们不断骚扰比贾戈人、乔奥拉人、巴兰特人和拜努克人。为了逃避奴 379 隶贩子的攻击，很多人在海岸的沼泽地带寻找避难场所，而让曼德人控制了通往内地的河流地区。⑳

几内亚-科纳克里和塞拉利昂 大西洋贸易对苏丹地区人民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和18世纪富尔贝人在富塔贾隆的革命带来的伊斯兰教的发展是17和18世纪在该地区形成人口流动的背景因素。

在18世纪前30年，穆斯林富尔贝人发动的圣战推动了蒂亚皮人向海岸一带即今天的几内亚共和国迁移。这使过去的迁移趋势得以继续，如前所述，因为早在15和16世纪，在曼德人和富尔贝人的压力之下，从富塔贾隆来的小族巴加人、纳卢人和兰杜马人占据了海岸地区，正是在这里的努奈兹和彭戈河河口，葡萄牙人与他们相遇。但是，始于1720年到1730年间的富尔贝穆斯林革命将蒂亚皮人永远赶出了他们旧的住地。他们拒绝接受新宗教主人们的权威，在多次激烈的战斗中遭到失败，例如巴加人进行的塔兰桑战役(1725-1730年)，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离开了富塔贾隆高原来到海岸边；兰杜马人离开马里到达上努奈兹盆地；巴加人离开拉贝，占据了位于蓬戈河和斯卡尔西之间的海岸地区。㉑

另一主要的人口流动潮是索索-迪亚隆卡人向海岸地区的迁移。索索人被逐出富塔贾隆，缓慢向已被纳卢人和巴加人占领的海岸地区移动。不过，索索人最大的一次迁徙始于1760年，他们在松巴·图马内的领导下侵入巴加人的地盘并在紧靠卡卢姆半岛的内地建立了图马尼亚酋邦。他们欢迎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迪亚隆卡人的到来，后者也被富尔贝人从富塔贾隆山区赶了出来。在18世纪末，他们控制了从里奥彭戈到塞拉利昂之间的海岸地区。㉒

在富塔贾隆，并非所有的居民均被赶走。例如，住在该地区西北部山地上的滕达人就抵住了富尔贝穆斯林的入侵。科尼亚吉人和巴萨里人对入侵也进行了抵抗，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于16世纪参加了考利·汤吉拉的团伙，但他们逃脱了入侵者的统治。尽管如此，在有些情况下，确实产生了共生现象，巴迪亚兰克人是滕达人和曼德-萨拉科尔人的混合人种，而富尔贝人设法使一些集团伊斯兰化成为后来的滕达-布尼人。㉓

另一批最早迁移至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居民是北方曼德人(曼丁哥人)，他们迫使托 380 马人、格尔泽人和马农人不得不移居到几内亚的森林地区，这就是迁徙到塞拉利昂的那些门德人和迁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那些科贾人。在此，我们必须将曼德人早已进行的从南方到海岸移居的人口流动与因曼德人和富尔贝人进行伊斯兰扩张造成的人口流动区别开来。

除此之外，在17世纪，曼德人从科尼扬出发的不间断的人口流动将托马人(洛马人)、格尔泽人(克佩勒人)和马农人(马尼人)从贝拉以北森林边缘的萨凡纳草原地带(凯鲁阿内

⑳ 参阅W. 罗德尼，1970年b，第1-15页；J. 徐雷-卡纳尔(Suret-Canale)，1976年，第456-511页。

㉑ 参阅梅奥博士，1919年。

㉒ J. 徐雷-卡纳尔，1976年，第504-510页。

㉓ A. 德拉库尔(Delacour)，1912年；F. 德古图里(de Coutouly)，1912年。

和比桑杜古地区)驱赶到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森林地区，而且他们在该世纪内还不断向这一地区渗入。另一支曼德人从东部出发，沿着马内人走过的同一路线进入塞拉利昂，在那里，他们与基西人、布隆人、洛科人和滕内人混合，从而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产生了门德人。[24] 门德人曾长期生活在内地，直到19世纪才到达海岸一带。17世纪20年代，从内地来的另一支曼德人与利比里亚的克鲁人混杂，使科贾人和卡鲁人在从韦尔加角到梅苏拉多角的海岸一带建立了霸权统治。[25]

曼德人的行为像改宗的信徒。他们在从事贸易和伊斯兰教方面都是带头人，他们建立了《古兰经》学校(尤其在贝纳-索索人和库兰科人中)，在18世纪以前，他们作为学者和商人与海岸一带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富塔贾隆伊斯兰革命的兴起，他们与富尔贝人联合起来，迫使索索人、巴加人、布隆人和滕内人改信伊斯兰教或者征服了他们。这样，他们在18世纪占据了麦拉科里，组建了穆斯林曼德人诸酋邦，出现在从马塔贡岛到圣保罗河的海岸一带。但是在18世纪末，当富塔贾隆的阿尔马米(Almamy)试图利用富尔贝-曼德人的宗教联盟将其政权强加到所有地区时，爆发了索索人和西大西洋人的抵抗运动。巴加人、布隆人和滕内人均不承认他的权威，就像洛科港东北部的法拉巴王国的做法一样，该国在一批索索人的领导下曾激烈反对伊斯兰教。不过，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河流域的社会却无法避开富塔贾隆的影响，也无法逃避曼德商人-马拉布特更具体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26]

381 利比里亚到班达马河

17世纪和18世纪有助于这一地区各民族形成的迁徙首先是继15和16世纪从萨凡纳草原到森林和海岸地带这一从北到南人口流动的继续。另外的原因是由于17和18世纪阿肯人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及这一时期在海岸地区生活的各种吸引力和不利因素。其结果造成了不同方向的迁徙：由北往南，由东往西，由南往北，由西往东，而在森林地区，有时甚至是循环式的人口流动。

曼德人和韦人 科贾-卡鲁人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沿岸地区的入侵表明，曼德人的推进在18世纪仍对森林和海岸地区的人民形成压力。北方曼德人(马林克人)不断向南方、东南方向推进，穿越萨桑德拉河，直到班达马河。他们的迁徙又加强了南部曼德人的前进：丹人继续向南-东南方向迁移，穿过科特迪瓦(到达图巴-马恩)，并向南-西南方向(到达科特迪瓦的达纳内和利比里亚的森林地区)；古罗人和加古人则向南-东南方向，朝班达马河

[24] K. 利特尔(Little)，1951年；A.P. 库普(Kup)，1961年b，他认为，门德人是松巴人和马内人武士的后裔，他们的先人于16世纪在瓦伊人迁移之后进入塞拉利昂的内地。

[25] 关于托马人、格尔泽人和马农人，请参阅J. 徐雷-卡纳尔，1970年，第169页及以后诸页；S.S 布埃(Bouet)和L.T. 布埃(Bouet)，1911年。关于门德人、科贾人和卡鲁人，见C. 法伊夫，1965年，第159页和O. 达珀(Dapper)，1686年版，第256页。

[26] 关于伊斯兰教和西大西洋人的情况，请参阅W. 罗德尼，1970年b，第229-239页；C. 法伊夫，1964年，第162-164页；和J. 徐雷-卡纳尔，1976年，第509-510页。

及更远的地方前进(古罗人到达布瓦凯,加古人到达提亚萨累和达布)。㉗

南部曼德人的推进影响了不断向森林地区流动的韦人，尤其是来自科特迪瓦图莱普勒(前往尼德鲁和贝瓦)的韦人。他们于17世纪中期到达森林地区的吉格洛，并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到达卡瓦利河。除阿肯人的推进活动和利比里亚克鲁人社会的重新安置，18世纪又出现了来自西南部(济比亚奥)、东北部(扎拉巴翁)和北部(塞米昂)的其他迁移活动。㉘

马格韦-克鲁人　C. 比伦斯认为，克鲁人于16世纪沿海岸从东到西移居到利比里亚。后来，他们分裂成为巴萨人、克兰人和格雷博人等，17世纪中期与柏科马人和科贾人在芒特角地区进行了一场战斗之后，他们占据了现在的大巴萨州地区。根据比伦斯的看法，卡鲁人的霸权反映出克鲁人决心控制从利比里亚到塞拉利昂全部谷物海岸地区。于是，帕尔马斯角西部大塞斯地区的克鲁人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从格雷博地区到达这里，继过去从北向南迁移之后开始一次从东向西的人口流动。㉙

关于克鲁人定居在科特迪瓦的问题,似乎是一次从北向南的人口迁移之后紧接着又有一次从西向东的人口流动。这样，大贝雷比地区的克鲁人是从利比里亚随着北方戈尔人集团(韦人)的分裂来到科特迪瓦。大多数巴奎人和内约人很可能属于同一迁徙潮，也从西部，从泰-格雷博森林区和卡瓦利河谷地区来到这里。 **382**

这次大迁徙潮使大的马格韦人集团(贝特人、戈迪埃人和迪达人)从西部的卡瓦利河流域迁移到萨桑德拉河流域及更远的班达马河地区。这次迁移直到18世纪末，为萨桑德拉河和班达马河之间的地区补充了新的居民。

政治演变及社会经济变化

海上通道的建立：15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

滨海地带一旦交通和贸易开通，就成了一块磁石，把海岸地区和次海岸地区的民族及来自内地的苏丹商人吸引到这里。海上通道的建立始于15世纪葡萄牙人帆船到达之前，当时曼德人的扩张将中苏丹与从塞内冈比亚到黄金海岸的大西洋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当葡萄牙人到来时，他们发现几内亚的海岸地区已向两个方向开放，内地和非洲大陆之外的地区。

导致建立海上通道的内部因素

在15和16世纪，马里因其农业自然村落的发展及其军事和政治的西扩，建立了曼德

㉗ A. 克雷里西(Clérici)，1963年，第24页。
㉘ A. 斯沃茨，1971年。
㉙ C. 比伦斯，1974年，第19-38页。

人向海岸地区发展商业的条件。从1312年起，乔奥拉人社团将卡萨芒斯河和塞拉利昂之间的海岸地区国家与尼日尔河路线连接起来。冈比亚和卡萨芒斯此时已成了马里的西部省份，它们用自己的农产品(大米和小米)和手工业品(棉布)与内地产的铁及其他金属物品进行交换。康托拉地区的贸易城市管辖这一贸易活动，主要通过水路冈比亚河和卡萨芒斯河进行水路贸易，两河的河口是海岸地区繁忙贸易的连结点。另一种不同的贸易是在南方，从尼日尔河通向森林地区，那里的乔奥拉人用食盐、铜、棉制品和鱼换取柯拉果，有时也换取棕榈油。在15世纪，西北地区的经济向内地发展，基西人和滕内人的国家已受到来自上尼日尔地区(多马和哈马纳)曼德人(马林克人)的影响。[30]

383 塞拉利昂以南，在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之间，虽然蒙罗维亚和大拉乌的名字有时会被提到，但很难指明在这一时期乔奥拉人的贸易路线。但是可以肯定，乔奥拉人是从尼日尔河湾处贩运商品到埃尔米纳，就像15世纪前半叶记载他们在贝戈的情况那样。

曼德人的贸易地区包括道路网和很多市场中继站，为森林边缘地区提供充足的供应，使冲积河谷和大河的销售路线一直延伸到海岸地区。一位葡萄牙人，V. 费尔南多斯曾写道：

> 他们(马林克人)将商品卖到很远的内地，比这一地区其他任何民族走得都远，甚至还通过内地一直到达米纳堡。[31]

外部形势：葡萄牙人的探险

葡萄牙人帆船技术的发展使他们于1434年得以到达博赫阿多尔角，成为15世纪对西非海岸进行探险活动的最早的欧洲人。1443年，他们到达阿尔金岛，1445至1456年到达塞内加尔和冈比亚，1460至1462年到达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从1462至1480年，他们探察了整个几内亚湾，于1469至1470年到达今科特迪瓦所在地，于1470至1471年到达黄金海岸。[32]

从1481年到1560年，西非海岸处于葡萄牙人的影响之下。为了寻找黄金和香料，葡萄牙人作为新兴的海上帝国与曼德人的贸易范围，即自14世纪以来马里扩张所发展起来的地区联系起来。他们非常想得到加拉姆、班布克、洛比和阿散蒂的黄金，有关传说长期以来一直搅得欧洲人心魂不宁，他们也非常想购买欧洲市场上价格昂贵的香料和其他东方产品。

这一时期葡萄牙人的资料，例如几内亚卡萨地区司库的详细注册记录，给我们提供了颇有启示意义的商品清单，除黄金外，均来自西非海岸新发现的地点，征收关税之后，便装上载货的帆船运往里斯本。商品包括大米、硬树脂、灵猫香、棕榈席、棕榈袋和象牙雕刻——主要是勺子、带脚的钵和象牙号角。这后一类物品特别重要，因保存完好的样品今天在三大洲的博物馆里均作为珍品展示，其中最珍贵的一件是歇尔布罗岛的布隆人的杰作，这是海岸地区人民与欧洲人接触之前高水平技能和审美观点的明证。同时，这些是带384 进欧洲、备受赞赏并在西方社会被收藏的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雕刻作品。[33]

---

[30] D.T. 尼昂，1975年a，第67-88页。

[31] D.T. 尼昂引证材料，1975年a，第83页。

[32] R. 莫尼(Mauny)，1970年；A.F.C. 赖德(Ryder)，1964年；A. 特克塞拉·达莫塔(Teixeira da Mota)，1975年。

[33] A.F.C. 赖德，1964年；A. 特克塞拉·达莫塔，1975年。




图片 13.1 16世纪牙雕盐罐，歇尔布罗岛（布隆人），塞拉利昂。高43公分

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在从阿尔金岛到安哥拉的西非海岸一线一直保持海上和贸易上的霸主地位。在上几内亚地区，他们沿河而上，寻找苏丹地区的黄金，尤其顺着冈比亚河、卡萨芒斯河和几内亚比绍的几条河流向上游进发。他们进行贸易而不占领领土。在马里通往大洋的通道上，他们一方面帮助当地改善河流海岸地区与上冈比亚、上塞内加尔和上尼日尔之间的联系。就这样，蕴藏黄金的班布克河流域和布雷河流域逐渐与尼日尔河流域和撒哈拉地区分离开来，这有利于大西洋海岸边缘地区。[34]

386

这样在16世纪，乔奥拉人在几内亚海岸地区的国内贸易路线从西北到东南一直通向了葡萄牙人占领的海岸驻地。苏丹产的黄金和几内亚胡椒一起运抵里斯本，便宜的几内亚胡椒在安特卫普市场上与来自群岛的真正胡椒展开竞争。[35] 这样，曼德人与欧洲人的贸易范围互相连接了起来，而撒哈拉通道开始因商业的目的被取代。

---

[34] B. 巴里（Barry），1981年。
[35] F. 布鲁戴尔（Braudel），1946年。



图片 13.2 16世纪牙雕猎号，歇尔布罗岛(布隆人)，塞拉利昂。高43公分

欧洲人的航行及早期贸易

自1530年以后，葡萄牙人不得不与在几内亚海岸一带活动的法国和英国海盗对抗。他们的霸主地位还受到荷兰人竞争的威胁。身为戈雷岛(1621年)、埃尔米纳(1637年)和阿尔金岛(1638年)之主的荷兰人趁1580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而被削弱之机取得了对几内亚地区的垄断权。16世纪90年代，荷兰船只开始来往于西非海岸。十年之后，荷兰人与

西非的贸易超过了欧洲大多数国家与西非贸易的总和。从 1593 年到 1607 年之间，他们共完成了 200 个航次，此后每年均有 20 个航次。例如 1614 年，荷兰一次就有 36 艘船只停靠在埃尔米纳的海岸，[36] 葡萄牙的海上霸权从此走向末日。

然而在荷兰人建立起自己的海上霸权之后，大西洋沿岸已经变成了进行新型贸易的前沿阵地，必将在 18 世纪成为海上繁忙贸易的舞台。但是，葡萄牙人在 18 世纪又开辟了新的贸易地区并制定了在后来几个世纪一直奏效的贸易战略。

早期社会的形成和"萨佩人王国"

从卡斯芒斯的乔奥拉人到塞拉利昂的滕内人的西大西洋文明的特点，是其对低地及积滞水域这种生态环境适应的产物。这种文明包括沼泽地农业、制盐、稻谷种植以及利用称做"阿尔马迪斯"(almadies)的船进行水路运输和通信工具等方面。乔奥拉人组织成乡村社会，没有奴隶，没有等级制度，但按年龄分为小组和劳动组织，当他们与曼德人接触时，他们已进入铁器发展的时代。W. 罗德尼[37] 不同意对"西大西洋"诸民族使用"原始的"这个字眼，他强调他们具有巧妙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指出他们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根据他们的语言、服饰和习惯推断出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同一性。他们尚未形成原生国家的构架，却有统一的文明和文化。

388

可以想象，水稻种植和萨佩人王国是这种统一的历史性体现。水稻种植是他们独立的发明还是从曼德人那里学来的，这成了 P. 佩里西埃和 B. 戴维逊等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题目。[38]

就社会及政治组织提出的问题比对水稻种植的问题要少，因为作者们显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等级制度、父系世袭制和国家结构均来源于外部制度和机构。这样，在马里帝国向西部扩张带来的曼德人的影响下，海岸地区各民族被纳入受马里皇帝曼迪-曼萨宗主权支配的酋邦和侯国之内。在 15 世纪，葡萄牙人注意到这些"西部省份"(弗尼王国和卡萨王国等)的存在，但是将其存在记述为"萨佩人王国"的南部地区。这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萨佩人王国难道像 D.T. 尼昂认为的那样是包括巴加人、纳卢人、兰杜马人、林巴人和滕内人在内的一个大邦联？或者像 J. 徐雷-卡纳尔推断的那样是在曼德人首领率领下的蒂亚皮-兰杜马-巴加-纳卢人向南方渗透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韦尔加角到圣安娜角的一个王国。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们还很难确定上述两种推断哪个是正确的。[39] 从根本上看，对于传播论者对这一地区社会政治制度和机构所做的解释，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关于父袭制和国家结构的看法。

---

[36] A.F.C. 赖德，1965 年 b，第 217-236 页。

[37] 参见 W. 罗德尼，1970 年 b。

[38] 有讨论，见 P. 佩里西埃(Pélissier)，1966 年，第 42-44 页；B. 戴维逊(Davidson)，1965 年，第 132-135 页。Oryza glaberrima 是产于非洲当地的稻谷，Oryza sativa 或称白稻产于亚洲。

[39] 有关另一次讨论，见 F. 马霍尼(Mahoney)和 H.O. 伊多乌(Idowu)，1965 年，第 141 页；D.T. 尼昂，1975 年 b，第 51 页；J. 徐雷-卡纳尔，1976 年版，第 50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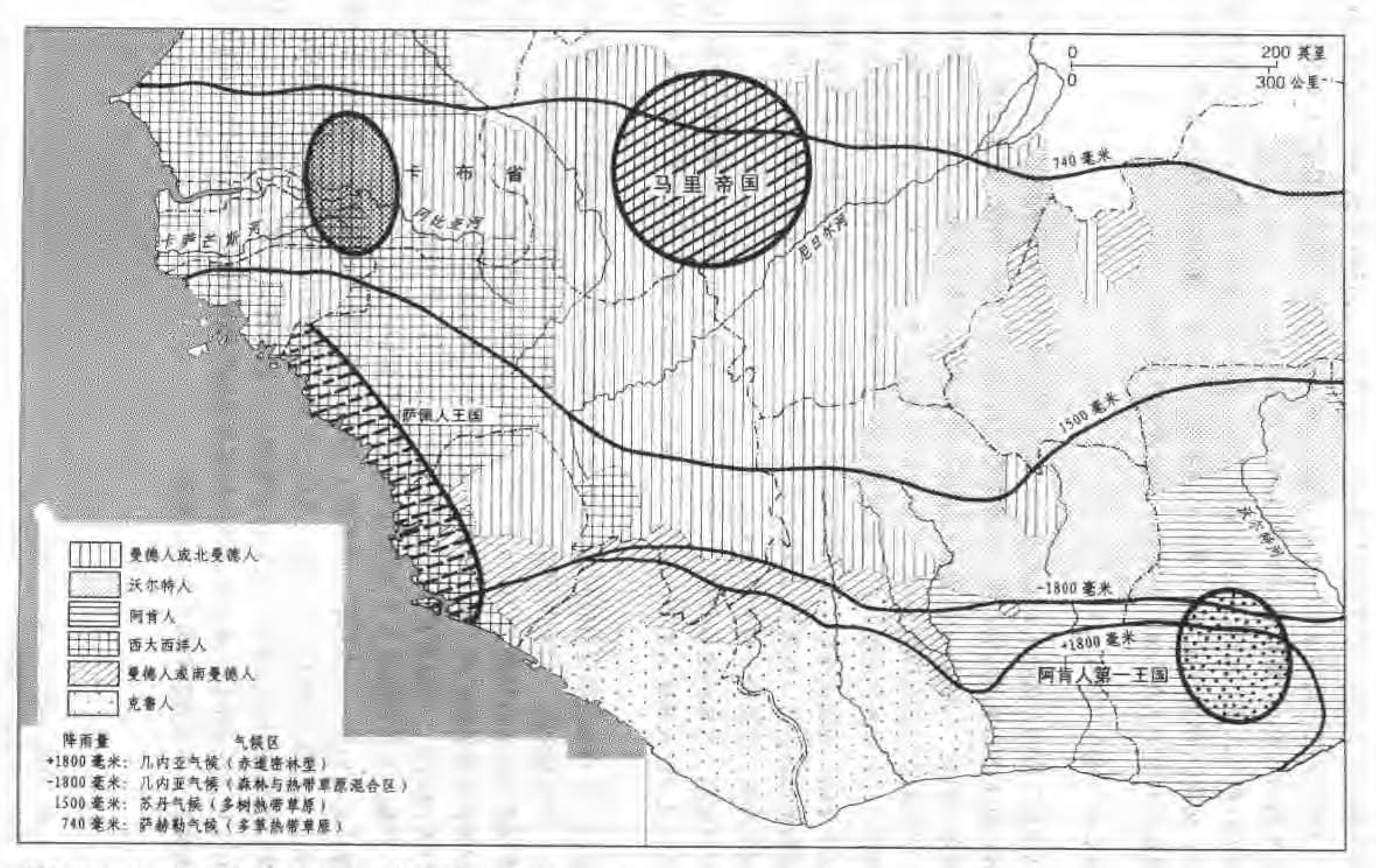


插图 13.3　16 世纪之前西非的主要国家(仿照 C. 翁吉图)

卡布：从解放到霸权的形成(16-18世纪)

当塞内冈比亚南部地区由于曼德人影响的传播而产生酋长和原始王权统治时，16世纪形成的大西洋贸易也促使在马里帝国霸权的废墟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国家。马里通过冈比亚盆地向大西洋的扩张在15世纪导致冈比亚、卡萨芒斯和几内亚比绍等一些小王国建立起政治-军事结构，这些国家形成了曼德人帝国的西部边缘地区。王国的统治者须通过“法里巴/法林”（fariba/farin，中间人）向马里的曼萨(Mansa)纳贡。但到了16世纪，则由热巴河以东卡布省的“法林”收取整个冈比亚地区曼德人酋长交纳的贡赋。

位于中冈比亚、格兰德河和富塔贾隆之间的马里省份卡布控制着经营产于法莱梅和班布克的黄金生意的康托拉的贸易。16世纪时，卡布吞并了上卡萨芒斯以南的桑科拉省，虽然仍附属于马里，但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省份。不过，当古老的马里帝国在桑海帝国攻击 **389** 下被削弱时，大多数西部省份摆脱其统治，法林们各自为王，卡布于1537年也独立称王。

卡布获得解放后，统一了位于冈比亚河、上卡萨芒斯和上热巴之间的地区，并取代了马里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曼萨。卡布还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卡桑加人、巴兰特人、乔奥拉人(费卢普人)和比法达人。卡布的法林“在他们中间就像皇帝一样”，在整个塞内冈比亚南部地区行使权力，并控制着远至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边界的贸易。[40]

大西洋贸易和南部河流地区的民族

葡萄牙商人在面临来自曼德人的竞争和对抗之时，也将“西大西洋人”吸引到他们在海岸一带的基地，并与乔奥拉人、巴兰特人、帕佩尔人和卡桑加人建立了直接接触。

在塞拉利昂，布隆人、滕内人和相邻的一些集团在与葡萄牙人的贸易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布隆人在北方用盐交换马里的黄金，而在海岸地区又用黄金交换葡萄牙人的棉织品、铜铃和各种金属器具。16世纪末，滕内人机敏地从海洋贸易中获取好处，他们到达塞拉利昂的河口地区，并将布隆人一分为二。

在16世纪，上几内亚的河口海岸发生了变化。葡萄牙人不仅建立了许多贸易基地，而且还在河流的中、上游地区建立了大量与曼德人接触的据点。他们与内地的联系因此而加强，而北-南之间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佛得角人直接与塞拉利昂河流区域进行贸易，在路上将棉花卖给拜努克和卡桑加的织工；印染布在卡谢乌和努奈兹之间交易；而手工艺品从海岸地区一直到达斯卡尔西，沿着古老的柯拉果贸易道路流通。[41]

17和18世纪作为西非贸易新的前沿阵地的海岸地区

在打开西非通往世界贸易大门的同时，欧洲人伟大的探险活动将几内亚地区各国推上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发展进程。17、18世纪主要的变化是贸易的发展、人口从内地向海岸地区流动及新型社会的出现。这些变化使苏丹地区逐渐边缘化，而该地区为了自己的生存，**390**

---

[40] S.M.西索科，1972年，第3-8页；D.T.尼昂，1975年b，第49-51页。

[41] W.罗德尼，1970年b，第71-94页。

不得不通过重振通向森林和海洋的道路加入到大西洋贸易的行列中来。

欧洲人贸易的建立和巩固

欧洲贸易在西非海岸的发展有三个特征：通过系统的贸易组织使其最终得以建立，但尚不能说巩固；18世纪其重要性日益加强的奴隶贸易在交易总额中占据从未有过的重要比例；欧洲国家为在西非占据更多的基地展开激烈的竞争。

17世纪，欧洲贸易站住了脚跟，荷兰人的海上势力得到加强，他们通过建立特许公司完善了重商主义的世界组织。从小的商业冒险到成立大规模的组织，荷兰人于1621年创建了西印度公司。特许权赋于荷兰在与美洲和从北回归线到好望角的非洲贸易中享有24年的垄断地位，它有国家在军事上和海上给予的保证，可以在完全安全的条件下继续其商业发展和殖民扩张的活动。公司的支柱是要塞和商行代理处，要塞起保护供应线的作用，商行代理处交换产品。该公司在17世纪前半叶对于荷兰的贸易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海上运输者，荷兰人在欧洲重新分配他们从亚洲、非洲和美洲进口的产品，尤其是大量的黄金和象牙，这给他们带来了高额利润。作为海洋的主宰，荷兰人向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提供奴隶。1641年，这些欧洲国家承认荷兰在整个几内亚海岸地区拥有贸易垄断权。

从1650年到1672年，荷兰的统治地位被削弱。美洲种植园的发展刺激了以糖业为基础的经济并要求提供更多的奴隶劳动力。奴隶贸易因此而大增，又由于西欧国家制造业(主要是火器)的繁荣而获益，欧洲国家日益要求摆脱对荷兰的依赖。于是，法国和英国也像他们的强大对手那样，用有力的武器将自己装备起来，开始了一场反对荷兰霸权的残酷斗争。随之而来的是英法两国特许公司的黄金时期，英国皇家冒险家公司(1660年)和之后的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法国西印度公司(1664年)和后来的几内亚公司(1685年)，以及瑞典、丹麦、葡萄牙及勃兰登堡的公司纷纷成立。

391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仿效荷兰人完善的组织制度，因为单独的商人是难以在西非的贸易中立足的，除非他们是贸易组织的成员或得到国家级公司的支持。只有大公司才能承担建造和维持要塞的费用。从1640到1750年，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不少要塞和贸易站，但是这些要塞和贸易站因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之间战争的胜败而不断变换着主人。上述情况在塞内冈比亚时有发生，在黄金海岸经常发生，而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则没有这种情况。英国与荷兰的战争于1793年结束，双方签订了乌得勒支条约，条约给英国以“阿西恩托”(asiento)的特权。

凭借着要塞的掩护和贸易站的存在，欧洲人继续其在大西洋沿岸的商业开拓。从戈雷岛到塞拉利昂的歇尔布罗岛，贸易得到蓬勃发展。但是，没有一家法国或英国的公司能垄断这里的贸易，因为很多沿岸小岛和近海岛屿都可以成为想与“穆拉托”(mulatto)商人进行交易的船只的停泊地。于是，这一地区的海岸成了与大公司没有关系的各国奴隶贩子的自由狩猎场。在18世纪，这一地区不存在要塞制度；葡萄牙对这一地区提出要求，但其指令仅对卡谢乌贸易站附近地区有效。特许公司并不因谷物海岸或科特迪瓦而感到烦恼，因为几内亚胡椒在世界市场上已不再珍贵，象牙贸易也在衰退，而船只因抛锚困难而无法

靠岸。法国人17世纪末在科特迪瓦东南部的阿西尼修建的一个要塞几年后就放弃了。但到了1700年，由于美洲对奴隶需求的增长，又促进了个体商人在这一地区追逐利润。[42]

苏丹的变化

在欧洲贸易立足的同时，苏丹内地也经受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卡萨芒斯与班达马河之间海岸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苏丹，尤其在曼德人的世界，以奴隶作为商品占主要地位的大西洋贸易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经济方面，苏丹与海岸地区的关系更加重要，随着乔奥拉商人火器交易的扩展，贸易也得到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伊斯兰教的影响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下降，统治阶级分裂为敌对的两派，一派是传统的政治势力，另一派由马拉布特和商人组成。前一派势力依靠的是骑兵和枪支贸易，他们自称为军事贵族；后一派势力支持伊斯兰教向南部国家推进，鼓动政治-宗教革命。前一派势力导致班巴拉人的军事君主政体，而后一派势力导致富尔贝人的伊斯兰革命，他们都试图解决因各帝国瓦解和奴隶贸易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危机。

在大帝国衰败产生了政治分化之后，替代的霸权势力试图(特别是18世纪)将内地的各个地区重新组建起来。在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大富尔帝国于17世纪在桑海帝国的废墟上兴起。但是后来于18世纪下半叶又让位于卡尔塔帝国。沿大西洋海岸，因马里解体而建立的国家于17世纪和18世纪被卡布王国所统一，后又于18世纪和19世纪被富塔贾隆所统一。沿尼日尔河两岸，18世纪初在塞古的班巴拉庇护下，在比通·库里巴里统治下又得以恢复。但是在南方，从上尼日尔地区到班达马河，再向东直到沃尔特-塞努福人居住的地区，乔奥拉人因人多势众和身强力壮而影响大增。在18世纪，乔奥拉人在这里建立了孔帝国，沿着从中尼日尔地区到森林地区和黄金海岸的贸易通道从事贸易活动；而在班达马河以西的地区，他们建起了集市城镇，控制了通向海洋和森林地带生长柯拉果地区的道路。[43] 392

如同7至16世纪横穿撒哈拉的贸易帮助苏丹在萨赫勒地区确立了霸权一样，欧洲贸易的发展促进了17和18世纪海岸和内地政治霸权的诞生。在政治变化的同时，社会-经济变化(对此有多种解释)对居住在通往内地最佳贸易路线终点站的海岸地区人民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北部次海岸地区的霸权：从卡布到富塔贾隆

在17世纪，卡布在从冈比亚到塞拉利昂的南部河流地区以强国的面貌出现。卡布王国组成12个曼德人邦联省，包括富尔贝人独立地区和拜努克、巴兰特和乔奥拉族，由至高无上的曼萨(其王位设在坎萨拉)所统治，他得到由武士和官员构成的贵族集团和常备骑兵团队的支持。王国变成了帝国，控制着冈比亚谷地和几内亚诸河流(卡萨芒斯河、卡谢乌

---

[42] 见J.D.费奇，1969年b，第65-73页。

[43] Y.佩尔松，1981年，第47-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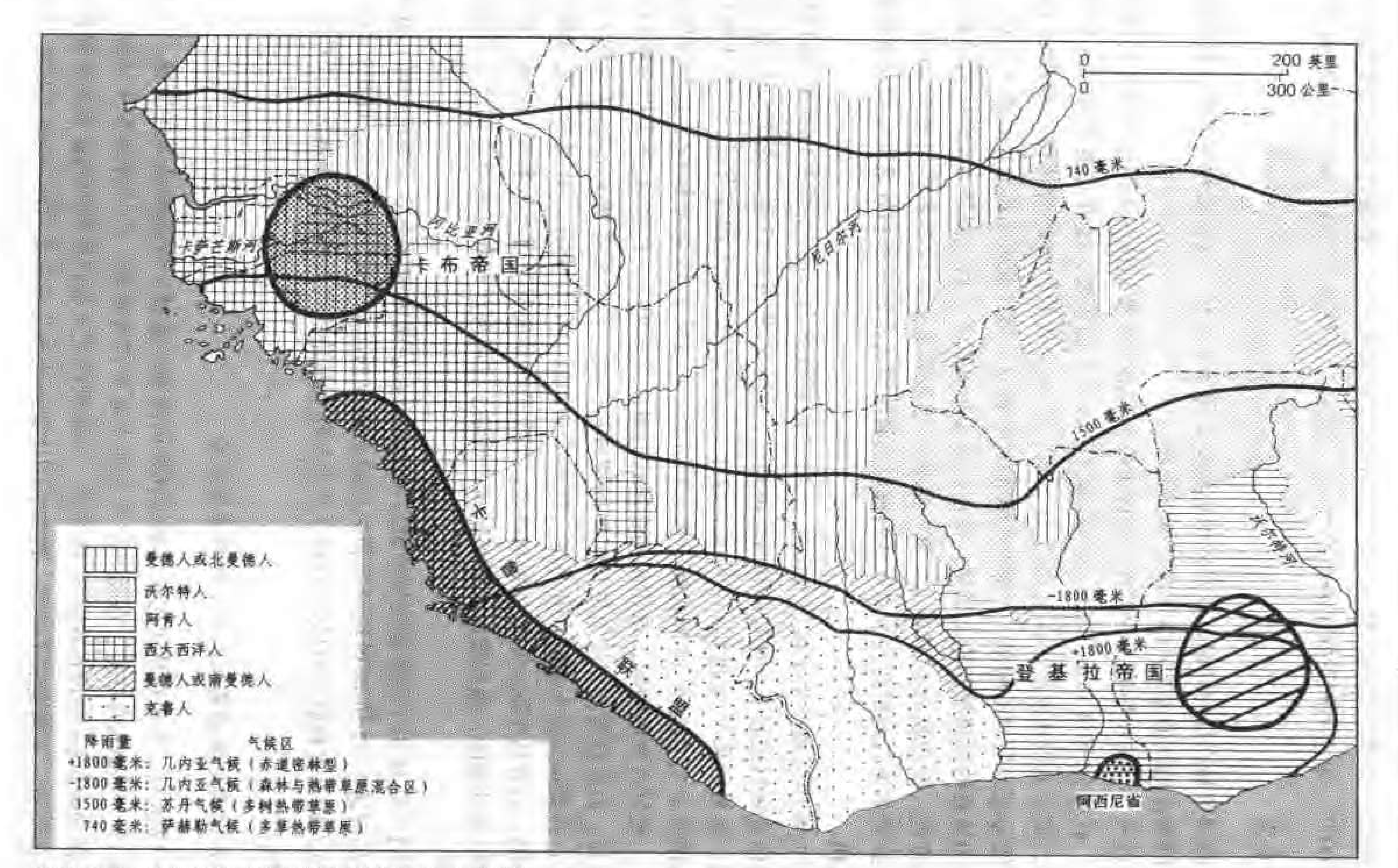


插图 13.4 17 世纪西非的主要国家(仿照 C. 肯吉图)

河和热巴河）的贸易，欧洲人的贸易站就设在那里的卡谢乌、法林、济金绍尔、比绍、热巴、阿尔布雷达和詹姆斯堡。17世纪末，曼萨·比拉姆一年卖出600名奴隶，买进各种商品，并通过他批准的收税员(alcali)收取关税。[44]

在18世纪下半叶，富尔贝穆斯林在富塔贾隆建立了自己的邦联。这一邦联产生于1725-1730年前后震撼了几内亚-苏丹高原的穆斯林革命，之后逐渐成为连结海岸河流地区和内地国家的中心。富塔贾隆位于从上尼日尔地区流向大海的诸河流汇合处，后来成为卡布曼德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断与之战斗，直到卡布王国在19世纪垮台。但在此之前，两大霸权在冈比亚到塞拉利昂之间包括所有的海岸和内陆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已逐渐形成。[45] 394

卡鲁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岸地区的霸权

O. 达珀曾撰写卡鲁的历史。最初在芒特角周围有一个科贾人的王国，后被内地的卡鲁人和弗尔吉亚人征服。塞拉利昂的民族(布隆人、基利加人和卡罗多博人)受到科贾王国的保护，王国任命省长，由省长像总督那样统治着他们。王国还控制着塞斯托斯河、东加拉和梅苏拉多角地区的居民。卡鲁人征服科贾之后，将它划分为两个主要地区：科贾国(Quojabercoma)和瓦依国(Veybercoma)。卡鲁的首领直接控制着北起韦尔加角南到梅苏多拉角的领土。他们是军事首领，率领着用毒箭武装起来的坚强的战士，经常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他们是专制君主，是王国的捍卫者和保护者，而且父子代代相传。他们镇压被征服省份的反叛，击退相邻民族，如多戈人、热贝人和马诺人的进攻，保卫帝国的领土完整。但他们保持了与内地弗尔吉亚人和马诺人的联盟，并与他们建立了臣属关系。

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在莫阿河、马诺河和圣保罗河的上游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很可能源自曼德人，他们处于马诺人的宗主权之下。弗尔吉亚人、卡鲁人、洪多人、加拉人和科贾人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俗，服从同样的秘密社团，被一条日益形成的臣属锁链把他们从靠近海岸的内地与整个这一地区最大的宗主国君王“曼迪-马尼”(Mandi-Mani，马诺人的君主)连结起来。尽管有其军事力量，但卡鲁人仍依靠弗尔吉亚人，而弗尔吉亚人则依靠马诺人。海岸地区的民族来源于内地民族，但他们靠的是从事贸易的良好愿望。[46]

卡鲁霸权的作用就是负责安排海岸和内地之间的贸易。他们主要的经济基础是与欧洲人的贸易，他们作为中间人可以从中赚取很大的利润。他们还将欧洲人的商品零售给他们的臣属，又将其臣属的产物卖给欧洲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使卡鲁人能够维持这样的体制，而卡鲁人的势力范围似乎曾是17世纪和18世纪该地区不可缺少的重商主义奴隶贸易的主要商业范围。 395

---

[44] S.M. 西索科，1972年，第10页。

[45] J. 徐雷-卡纳尔，1976年版，第486-504页；W. 罗德尼，1970年b，第223-239页。

[46] O. 达珀，1686年版，第252-274页。

欧洲贸易与海岸地区充当买办的居民

17世纪和18世纪贸易的发展使海岸地区各民族中形成了一些以中间人面貌出现的商业集团，他们活动于欧洲船只和内地非洲社会之间，如卡萨芒斯、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河流地区的梅斯蒂索混血人(Mestizos)和克里奥尔人(creoles,祖籍在别处但在当地出生的人)。

从葡萄牙兰萨多人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河流地区的梅斯蒂索混血人和克里奥尔人

无论祖先是15和16世纪葡萄牙移民的非-葡混血人，还是17和18世纪英国商人后裔的英-非混血人，穆拉托集团均构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居民。他们对于从冈比亚到塞拉利昂这一海岸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兰萨多人与非-葡混血人　葡萄牙在西非的影响归因于有计划的移民，尤其是自15世纪起在南部河流地区和大西洋岛屿(主要是佛得角)就居住了很多侨民。他们中包括商业冒险者和贸易公司的代理人，被人称做兰萨多(Lançados)。W. 罗德尼将他们定义为被抛(Lançar,抛)到黑人中间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多是葡萄牙人，也有少数希腊人、西班牙人，甚至印度人。他们招募非洲“格鲁米特”(grumetes,后备部队)，不断往返于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卡萨芒斯河和几内亚一些小河的谷地。很多人居住在卡谢乌和热巴地区(现在部分属几内亚比绍)，还有一些人住在塞拉利昂的洛科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他们进入索索人居住地区，遇到了从内地来的曼德商人。

兰萨多人很快建立了非-葡混血人社团。他们在村庄居住，靠近黑人。他们娶非洲人作为妻子和情妇。葡萄牙语很快成了当地仅次于曼德语的通用语。于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尽管葡萄牙本国衰败了，但葡萄牙人在这里仍受到保护。

兰萨多人和他们的后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控制着上几内亚地区的贸易。但是这一社团内部种族的构成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7世纪，移民人数下降，纯葡萄牙人的数目低于穆拉托人，而兰萨多包括越来越多的混血儿童(filhos da terra,当地出生的儿童)，17世纪中叶他们在比法达和洛科港地区逐渐占到人口的多数。梅斯蒂索混血人变得越来越黑，后来便难以与非洲人区分开来。到了18世纪末，非-葡人社团中白人很少，而黑人很多，但仍由梅斯蒂索混血人管理，他们将其主要的社会文化传统不断在社团中传下去。

396

兰萨多人在非洲沿岸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集团。他们讲葡萄牙语，穿欧洲服饰，住带睡廊的粉刷洁白的长方形房子。但不管怎样，他们也接受了一些非洲习惯，如纹身和做民族标记。他们信奉一种被曲解的天主教，虽然佩戴十字架但笃信护身符的作用，而且颂扬基督教圣徒也不禁止对祖先的崇拜。

兰萨多人最先通过友好契约与海岸地区的民族，如卡谢乌的比比亚纳·瓦兹人结合在一起，比比亚纳·瓦兹与帕佩尔人和拜努克人紧密合作，并在法林的曼德人中拥有财产。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因血亲关系而加入到非洲人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例如何塞·洛佩斯·德穆拉，他是塞拉利昂马内人国王的孙子，他经常参与该地区的政治生活，成为18世纪下半叶拥立国王的最重要人物。另一些非洲人已完全欧洲化，如弗朗西斯科·科雷亚，

他是来自热巴的曼德人，能说流利的葡萄牙语，受过高等教育，穿着讲究，完全是欧洲式样。[47]

这个非洲-葡萄牙人集团起了买办阶级的作用，显示出他们的力量。这个阶级的成员不做生产性工作，但是负责向欧洲船只供应商品和从事与当地非洲人的农业活动有关的季节性贸易。他们由此获取高额利润，也因此遭到那些想避开他们的欧洲贸易公司的攻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得依靠欧洲人的船只生活，但有些人已经相当富有而无须再依靠欧洲人。后者中有当时的穆拉托大家族：卡谢乌河和努奈兹河的瓦兹家族；冈比亚的汤姆巴·蒙德兹和安东尼奥·瓦兹家族；蓬戈河和努奈兹河的西特尔·费尔南多家族；及塞拉利昂的何塞·洛佩斯·德穆拉家族。在17世纪，比比亚纳·瓦兹成了卡谢乌地区杰出的家族。比比亚纳住在帕佩尔人的家乡卡谢乌，但她在拜努克人那里也有房子，在法林的曼德人那里还有一幢房子。她有一条两桅渡船，她的兄弟安布罗西奥在卡谢乌，她的侄子弗朗西斯科在努奈兹河从事大的贸易活动。在塞拉利昂与比比亚纳·瓦兹夫人地位相当的人是何塞·洛佩斯·德穆拉先生，他是18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最大的富豪。

在富有的穆拉托商人和贸易公司之间曾多次发生分歧，主要是主张自由和无限制贸易的人与支持贸易管制和垄断者意见不和。中间人不得不与企图避开他们的贸易公司抗争。397 例如从1684年到1685年，比比亚纳·瓦兹与卡谢乌公司的老板何塞·贡萨尔维斯·多利维拉曾因拒绝已交付锚泊费的非葡萄牙船只在该地区进行贸易而发生争执。非-葡商人在比比亚纳·瓦兹的领导下发起请愿反对这一措施并说服了当地的帕佩尔人，后者最终迫使多利维拉允许与英国人进行贸易。

在塞拉利昂，中间人集团通过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欧洲大公司的垄断力图控制海岸地区政治和经济命运的决心，在何塞·洛佩斯·德穆拉同皇家非洲公司的斗争中得到体现。英国公司主要想打破非洲国家统治者与穆拉托人之间的联盟，并结束后者所起的中间人作用。在洛佩斯·德穆拉的领导下，穆拉托人行动起来，与威胁其生存者进行斗争，并摧毁了公司的商行，使其在塞拉利昂再也不能恢复活动。

从英国商人冒险家到塞拉利昂的英国-非洲人

另一个穆拉托集团是塞拉利昂的英国-非洲人，于18世纪在此地形成。到1800年，他们形成了一个大约有12,000人的集团，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塔克家族、罗杰家族、科克尔家族和克里夫兰家族。

塔克、罗杰和考尔克尔(后称科克尔)于17世纪来自英国，最初与英国的公司做贸易。他们娶非洲人为妻，从而进入当地社会，并与当地的统治阶级联系起来。例如，罗杰和科克尔均与歇尔布罗岛的王家结亲。像非洲-葡萄牙人的情况一样，文化上属混血人种的社会集团在此形成。如詹姆斯·克里夫兰，他的母亲是基西族妇女，这使他在波罗秘密会社占有显著的地位。

英-非人的祖先起初作为贸易公司的仆人在商行里做下贱的工作，如仓库保管员、木

[47] 关于非洲—葡萄牙人的详细情况，请参阅W. 罗德尼，1970年b，第200-222页。

工和锁匠。但是，他们很快成为重要的生意上的中间人，并很快发财致富。在1690年前后，塔克家族控制了歇尔布罗岛；在18世纪中期，亨利·塔克成了该岛的主要代表。在18世纪下半叶，詹姆斯·克里夫兰在塞拉利昂占有突出地位。[48]

于是，在17和18世纪，非-葡人和英-非人构成了一个发挥特殊经济作用的社会集团，并形成一个文化阶层，欧洲人和非洲人，白人和黑人共处。他们知道自己的作用，努力在398 白人与黑人中扩大影响。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剥削非洲人，从非洲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润。虽然反对贸易公司的强制垄断，他们多多少少还是充当了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代理人。

从谷物海岸到象牙海岸的贸易和民族

从梅苏拉多角到拉乌角，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人贸易的发展并没在克鲁人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商业集团。虽然这里与苏丹地区的内地联系很少，但还是有建在河口地区的许多村庄，有丰富的物产。英国和荷兰的船只在塞斯托斯河、帕尔马斯角和卡瓦利可以得到马拉古埃塔胡椒，在巴萨、德莱文和圣安德鲁可以得到奴隶，而象牙则到处都可以买到。

这一地区除了象牙财富之外，经济缺乏活力。毫无疑问，这是因马拉古埃塔胡椒危机和当地人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当地人贫穷，更关心得到礼物，而不大关心与欧洲人建立贸易关系。只有一个例外是圣安德鲁河地区，这里的人向欧洲船只提供黄金、奴隶和重量超过100公斤的象牙。这里“和蔼可亲和高贵的”酋长们像夸夸海岸人那样围着一块腰布。

结　论

尽管对这一地区做一历史性的分析概括存在不少困难，但仍然可以看出，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这里的人民还是取得了统一的发展。他们从相对孤立、与世隔绝的状态逐渐加入到自大探险时代以来由欧洲人在大西洋航海所开创的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中。这种一体化伴随着人口从内地向海岸地带的流动，伴随着明显的社会和政治变动，该地区无论何处的人民都在努力从欧洲人贸易为他们提供的机遇中获取好处。

（杨荣甲　译）

---

[48] 同上。

14 下几内亚海岸的国家和文化

A.A.博亨

对于下几内亚沿海各民族来说，1500至1800年这段时间可能是他们历史上最富革命 399 性的时期。该地区通常指从现代的科特迪瓦南部至现代的贝宁之间的地区，或者说从班达马河至莫诺河之间的地区。具体而言，指阿肯人、加人和埃维人三个民族所在的诸河流地区。首先，这些民族完成了从各自的发源地到目前定居点的迁徙，大多数民族和语言集团也完成了目前划分状况的演变过程。其次，这些民族加强了同西部苏丹、撒哈拉和马格里布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上的联系，并且开辟了一条同大西洋彼岸通讯和贸易的崭新渠道，首先是同欧洲，尔后又同美洲。第三，在这一时期，逐渐地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并且演变成为更大的政治实体，或者是王国和帝国。实际上，到了1800年，整个地区几乎被纳入一个帝国，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这个时期是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时期，是形成新的阶级和新的宗教的时期。这四个主题，构成了本章的内容。

移民和新民族-语言集团的演变

口头传说和文献资料都证实，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虽然已有一些民族进入并占据了他们目前生活的地区，但是大多数民族仍聚居在其发祥地。比如说，某些阿肯人已经向南进入沿海地区，即现代科特迪瓦的东南部和加纳的西南部。[①] 但是他们大部分仍居住在发源地即现代的奥芬普腊河流域的阿丹西和阿曼斯地区。在那里，他们按血缘关系划分成八个母系阿丹贝(氏族)，即阿达人、奥苏杜库人、沙伊人、拉人、宁戈人、克波内人、格布格布拉人和克罗博人等氏族。

加-马希人、农瓜人和特马人早就脱离了他们在洛洛尔伏尔山区一带的下沃尔特谷地的氏族亲缘关系，并在他们目前居住的沿海地区北部的阿克拉平原建立了一系列定居点。[②] 400 考古学家奥赞内认为这类定居点中的最后一个阿耶瓦索是在16世纪末建立的。[③]

现代的多哥和加纳的埃维人尚未开始迁徙，但全部集中在他们祖先的第三个家园，即现代多哥的努瓦查或称诺策。他们的前两处家园在塔多和克图。[④]

---

① A.A.博亨(Boahen)，1977年。

② C.C.雷因道夫(Reindorf)，1898年，第6-12页。

③ P.奥赞内(Ozanne)，1962年，第69页。

④ N.L.盖伊博尔(Gayibor)，1977年，第11-15页；H.W.德布鲁纳(Debrunner)，1965年，第3-10页；C.M.K.马马塔赫(Mamattah)，1979年。

公元1500至1800年间，特别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是这些民族分散地进入目前生活地区的最后迁徙阶段。迁徙的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到新发现黄金和柯拉果的产区去寻找机遇；部分社会原因是人口的压力；但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原因，使阿肯人、加-阿丹贝人和埃维人往往以小股氏族和亲缘集团方式四面八方往外迁徙。举例而言，阿肯人在16世纪首先向北和向东进入现在的库马西、曼蓬和阿基姆地区，向南和西南进入现在的瓦萨、伊格维拉、桑威和阿西尼地区。在17世纪，还有更多的阿肯人以不同的氏族集团为单位向北进入现在的阿散蒂、阿散蒂-阿基姆以及夸胡地区，向西北进入库兰戈地区；向西南进入瓦萨-塞赫维地区和科特迪瓦的泻湖地区。1680至1730年间，主要出于政治的原因，阿肯人以特大规模持续地从库马西、安维安维亚和登基拉地区迁入现在的恩齐马、奥温、塞赫维、阿哈福和北部博诺地区以及科特迪瓦的阿尼人和鲍勒人地区。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阿肯人的流动看来已经停止。

在阿肯人迁徙期间，加人继续从内地散入沿海，大致上是对欧洲人在沿海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经济机遇所做出的反应。首先是加-马西人、农瓜人和特马人在16世纪的迁徙，奥苏人和泰希人在17世纪接踵而来。他们的亲属阿丹贝人也在16和17世纪向南和向北散布到阿克拉平原。有些人向东北进入山区成为今日的马尼亚-克罗博人。其他人在17世纪迁徙到沿海地区建立了宁戈、普兰普兰和阿达等聚居区。

埃维人的迁徙最具戏剧性。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主要由于政治原因，特别是为了逃避国王阿戈科利的暴政，埃维人分两路离开了诺策。南路埃维人称为达格博沃人或达齐黑沃人；北路或内地埃维人称德梅沃人或称努梅沃人。[⑤] 南路移民到达沿海，其分支包括安洛人和通古人。北路移民占据了现在南沃尔特的中部和北部，这部分人包括阿索格利人、霍普克人、阿克比尼人和阿乌多姆人。小集团和分支不久又四处寻找别的定居地。这一分裂和扩散的过程贯穿于17和18世纪。这样一来，到1800年时，安洛族已包括了安洛人、阿菲费人、阿维人、泽维人、维塔人、索梅人、克利科人、弗拉乌人(或称阿夫劳人)、多泽人和阿维诺里人；通古族已包括阿加维人、巴克帕人、巴托人、多福人、菲埃维人、福达卓库人、莫菲人、梅法人、索克波人、特夫勒人、多哥梅人、伏罗人和武梅人；阿索格利族已包括霍人、阿科费人、霍卓人、克佩诺人、塔克拉人、阿达克鲁人、阿布蒂亚人、阿戈蒂梅人、阿科维埃费人等。[⑥]

这些民族不仅向四面八方扩散和迁徙，而且也在民族和语言上发生了变异。移居到早先由所谓多哥的残余部或称中央多哥集团和古安人零散居住地区的埃维人和加-阿丹贝人却能保持自己民族和语言的纯洁性。古安人对加人的主要影响在宗教方面。可是，许多阿肯人移居的地方却是人口比较稠密，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体制都不相同。据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葡萄牙文献记载，在班达马河以东的科特迪瓦有七个村庄，在16世纪50年代帕切科·佩雷拉又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有何行业，只知道人口稠密。”[⑦]这些民族

⑤ C.M.K. 马马塔赫，1979年，第121-122页。
⑥ C.M.K. 马马塔赫，1979年，第147和155-158页。
⑦ T.F. 加勒德(Garrard)引语，1980年，第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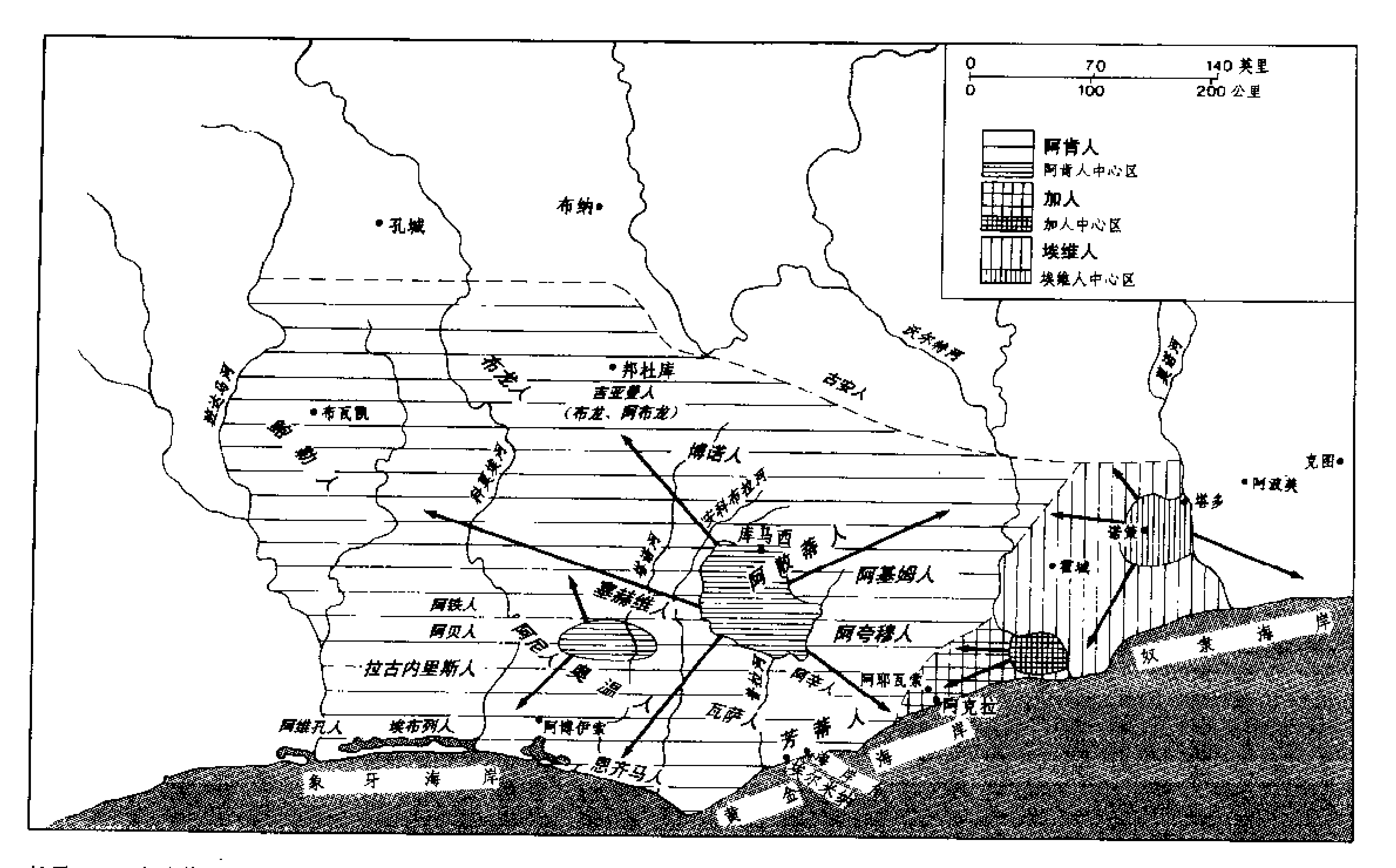


插图 14.1 阿肯族、加族和埃维族(仿照 A.A. 博亨图)

在西边必定是阿迪西人，在东边必定是埃伍蒂雷人、阿格瓦人、康帕人和莫诺人。正是这些集团的混杂和阿肯人的到来产生了姆巴洛人、阿拉迪亚人、埃布列人、埃奥蒂勒人、阿维孔人等，统称拉古内里斯人。与此相仿，后来的阿肯移民同原先的民族混合形成阿尼人、鲍勒人和塞赫维人。因此阿肯被大体上分为东阿肯人和西阿肯人，戴贝特坚持认为，这两部分阿肯人"在语言上并非直接相通"。每一部分阿肯人又主要依政治进一步分割成许多小集团。东阿肯人分为阿散蒂人、阿夸平人、阿基姆人、阿夸穆人、布龙人(阿布龙人)或称吉亚曼人、瓦萨人、夸胡人、芳蒂人、阿辛人、登基拉人和贡瓦人等，他们几乎操同一语言，即特维语。西阿肯人包括阿尼人、鲍勒人、恩齐马人、阿汉塔人、桑威人(阿费马人)、奥温人和塞赫维人，他们操互相能听懂的阿肯方言。

到了16世纪，这些定居在新家园的民族在社会政治机制方面既有相似点也有差异处。加-阿丹贝人和埃维人都按大大小小的父系集团和氏族散居在独立的定居点里。比如说，阿丹贝人分为九个氏族：阿西诺泽人、布拉卡人、克波库人、拉人、莱克波泽人、莱诺泽人、南格拉人、塞波特人和夏洛姆人。每一集团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大神，其祭司就是他们的头人。可是，到了1600年，加-马希人在阿耶瓦索地方建立了王权。

403

阿肯人住在城镇的受国王和王后统治，而住在乡村的由头人统治。每个城镇或村庄由属于八个有母系氏族的家庭组成。这些母系氏族是：埃库纳人(恩齐马人中的阿散伍勒人)、奥约科人(芳蒂人中的阿诺纳人或恩齐马人和阿尼人中的阿隆罗巴人或恩瓦维尔人和芳蒂人中的达佤姆人或德温米纳人)、阿塞尼人、阿戈纳人、布雷托人(芳蒂人中的特维丹人)、阿萨基里人、阿杜阿纳人或阿特维人(芳蒂人中的阿贝拉泽人和恩齐马人中的阿萨曼加马人或阿维人)。[⑧] 每个家族有一位"阿布斯瓦潘宁"(Abusuapanin，头人，首领)，每个氏族也有族长。看来每个家族或氏族都有自己膜拜的一个神或若干神。在每个村庄或者定居点也如此，他们的祭司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在加人和埃维人中间，这些祭司不但是宗教领袖，而且也是政治首领。换句话说，社会已经分化成为阶层，由祭司和国王组成贵族统治阶层，以及平民百姓和为数不多的家庭奴隶。可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由于16-18世纪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而大为改观。

下几内亚的经济变迁

1500到1800年间在下几内亚的内部和外部都发生了同样深刻的经济发展。在内部，业已确立的经济活动在继续进行，并得到大大的扩展。这些经济活动包括采集、农耕、畜牧、狩猎、捕鱼、制盐和金矿采掘。[⑨] 采集业很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黄金海岸，特别是在东阿肯人家园现代的阿散蒂、阿哈福和阿基姆附近的林区采摘野生的柯拉果。柯拉果成了阿肯人同热带草原上和苏丹西部操古尔语、曼德语和豪萨语的民族之间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

---

⑧ A.A.博亨，1966年，第4页。

⑨ K.B.迪克森(Dickson)，1969年，第72-89页。

农耕也变得日益重要，主要作物是大蕉、香蕉、薯类和水稻。在此基础之上，欧洲人还在16和17世纪从亚洲和美洲向几内亚海岸引进了许多新的品种，包括玉米、木薯、各种山药、番茄、洋葱、茄子、鳄梨、红薯、柑桔和花生。[⑩] 小农们迅速引种这些作物使几内亚海岸的农业经济多样化，并必然地加速了人口的增长。

畜牧业包括饲养家禽、绵羊、山羊和猪，还进行捕鱼和狩猎。捕鱼业是埃维人、加人以及沿海各民族如芳蒂人、阿汉塔人、恩齐马人和拉古内里斯人的主要经济活动。各民族均打猎，开始时使用长矛、弓箭和棍棒，后来使用猎枪。 404

这些基本经济活动中有两项即制盐和采金在1500至1800年间变得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食盐都是沿海居民生产的。[⑪] 而淘金则专为内地林区民族所保留，特别是瓦萨地区的阿肯人。这个地区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人记载里称为阿尔卡尼或阿肯尼、阿尔卡尼亚，即现代的阿散蒂、夸胡和阿基姆[⑫] 以及布朗-阿哈福、布朗或吉亚曼和鲍勒。那里也是出产柯拉果的地区。柯拉果是同苏丹北部和西部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黄金是通过两种办法获得的：从河床和干河谷的淤泥中淘选和采用深挖法(nkoron)。淘选法是自古就使用的，而深挖法很可能是13或14世纪由曼德人引进到阿肯人领土的。[⑬]

采金业在许多地区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是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17世纪末产金200万盎司，达到顶峰。[⑭] 在此整个时期里，淘金业都是由阿肯人独家垄断的，所有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企图直接参与的努力均遭到抑制。[⑮]

与此同时，一种日益重要的经济活动发展起来，具体地说就是贸易。奴隶在贸易中作为挑夫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贸易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埃维人、加人和阿肯人之间早已互通贸易：埃维人、加人和芳蒂人生产的鱼和食盐、阿丹贝人的陶器交换内地阿肯人生产的黄金、"特维比"(tweapea,一种咀嚼用的秸梗)、象牙以及铁或其他金属制品。口头传说和欧洲人的记载清楚地说明，这种对内贸易是在本地和地区市场上或在集市上进行的，贸易量和重要性日益增加。对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食盐贸易，博斯曼曾说：

> 黑人因熬盐获得的财富之巨大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他们(芳蒂人)经常如此，或在大部分和平时期如此。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可从这一行业获得巨额财富。所有内地的黑人不得不向索勒人买盐，不难猜想，他们为此要付出昂贵的价钱，……[⑯]

但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加重要。外贸分为两支，早期是同热带草原和苏丹西部进行贸易；第二支是同大西洋彼岸的欧洲随后又同美洲人进行贸易。《卡诺编年史》等阿拉伯文资料、1470-1500年的葡萄牙人记载和口头传说等明白地告诉人们，到1500年时，加人、埃维人和阿肯人已经同北边的古安人和古尔人，同东北面的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以及同 405

⑩ J.P. 默多克(Murdock)，1959年，第21-24页；D.G. 库西(Coursey)，1966年。
⑪ 关于几内亚海岸各种制盐方法的生动描述，请见W. 博斯曼(Bosman)，1967年，第308-309页。
⑫ A.A. 博亨，1973年。
⑬ T.F. 加勒德，1980年，第24-25页；I.G. 威尔克斯(Wilks)，1962年，第166页。
⑭ T.F. 加勒德，1980年，第166页。
⑮ W. 博斯曼，1967年，第80页。
⑯ W. 博斯曼，1967年，第308页。

西北面的尼日尔河湾处的曼德人之间建立了贸易关系，买卖黄金、柯拉果、纺织品、奴隶和食盐。在 1500 至 1800 年之间，这些联系得到了加强，特别是阿肯人在 16 和 17 世纪同曼德人和豪萨人建立了贸易关系。[17] 随着桑海王朝在 15 和 16 世纪的兴起和扩张以及它带来的秩序与和平，阿肯人和曼德人之间的贸易有了大的发展。为了控制这一贸易，乔奥人在尼日尔河湾和南面产金国之间设置了许多贸易站或称歇息中心，诸如博博迪乌拉索、孔城、邦杜库、布纳和贝戈。根据书面记载和考古资料，杰内和贝戈作为 16 世纪西北贸易主要的货物集散中心变得极其富裕了。在这些西北市场上，阿肯人交易的主要商品是黄金、柯拉果，后来又从欧洲进口布匹、毯子、土耳其地毯、条纹和蓝色丝绸、皮革制品、铁器、铜器和食盐。[18]

16 世纪晚期桑海王朝被推翻，动荡接踵而至，原来认为因此破坏了西北贸易商道。但是，现在已证实在 18 世纪贸易并未下降，相反还有所增长。[19] 阿散蒂人的扩张，并在 18 世纪初征服布龙或吉亚曼、班达和博诺，皆着眼于开拓贸易。事实上，这一贸易持续到 19 世纪，在诸如阿泰布布和金坦波的新市场中心继续进行。

阿肯人与豪萨兰和博尔诺之间的贸易也在继续进行。根据曾访问过桑海和豪萨兰的利奥·阿非里加纳斯的目击记，在 16 世纪开始前，这一贸易已经在进行了，而且已有一定的重要性。[20] 特别在 17 和 18 世纪曼普鲁西、达贡巴、纳农巴和莫西的莫勒-达格巴内人诸国和豪萨国家发展起来之后，这一贸易变得更加频繁，数额也更大了。欧洲探险家和旅行家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在豪萨兰的卡诺镇和卡齐纳镇，特别是在黄金海岸北部的东北贸易通道的南方主要货物集散地萨拉加镇发现了当时富裕的状况。这一发现是对当时贸易兴旺发达的再好不过的证明了。

406

在 16 世纪，阿肯人可能曾向豪萨兰出口黄金，但到 18 世纪时停止了，很可能是由于受到欧洲人的强大竞争。可是，从 1500 至 1800 年，阿肯的柯拉果继续是东北方之间贸易的重要货物。柯拉果从豪萨兰和博尔诺转口到撒哈拉和北非伊斯兰教诸国：18 世纪 80 年代卢卡斯在的黎波里遇到一位酋长，后者向他介绍了的黎波里同阿散蒂通商的情况。[21] 柯拉果是由牛、驴、马和奴隶组成的商队运输的。作为交换，阿肯人进口棉布、毛毯、土耳其地毯、罩衣、便鞋及其他皮革制品、泡碱、铜器和红色玻璃念珠。可是，远为重要而且大量的贸易也发展起来了，那是下几内亚同欧美之间跨越大西洋的贸易。它始于葡萄牙人 1471 年在现代的加纳海岸抛下船锚之时。接踵而来的是 16 世纪的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17 世纪的丹麦人、瑞典人和勃兰登堡人。可是，瑞典人和勃兰登堡人分别于 1661 年和 1732 年放弃了几内亚海岸。同西印度群岛的直接贸易始于 1518 年，第一批奴隶是由西班牙船只运送的。同北美大陆的贸易始于 1619 年，当时一艘荷兰人的装有大炮的快速帆

[17] 佐证请见 A.A. 博亨，1977 年。

[18] V. 拉姆(Lamb)，1975 年，第 86-92 页。

[19] E.W. 博维尔(Bovill)，1968 年，第 195 页；J.R. 威利斯(Willis)，1971 年；E.A. 麦克杜格尔(McDougall)，1980 年；C.C. 斯图尔德(Stewart)，1976 年。

[20] 利奥·阿非里加纳斯(Leo Africanus)，1956 年；N. 列夫齐昂(Levtzion)，1968 年，第 14-22 页。

[21] J. 比彻姆(Beecham)，1841 年，第 149-155 页。

船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卸下了第一批西非的奴隶。[22] 这样，到了17世纪中叶，几内亚沿海同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三角贸易完全建立起来。

下几内亚海岸销往欧洲的商品因地区而异，各个世纪之间也不相同。直至17世纪90年代，住在班达马河与安科布拉河之间的阿肯人主要出售象牙，而住在安科布拉河与沃尔特河之间的加人出售的大都是黄金。在整个16世纪，居住在沃尔特河与莫诺河之间的埃维人同欧洲人之间很少有贸易关系。大多数葡萄牙人不愿长途跋涉从阿克拉地区直航到达荷美的维达和尼日利亚的贝宁。[23] 直到1650年以后，荷兰人和丹麦人才到那里活动，主要商品是奴隶。

作为专业化的结果，欧洲商人把下几内亚海岸划分为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可是，直到17世纪末，对欧洲人和非洲人双方来说，黄金是最为重要的商品，也是双方的首要关切所在。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企图在黄金海岸取得立足之地，并在安科布拉河和沃尔特河之间的地段内修建了大量的城堡和碉堡。据劳伦斯说，从塞内加尔到喀麦隆的西非地区修筑的城堡和碉堡多达42座，其中黄金海岸即有32座。但在尼日利亚沿海却一座城堡也没有。[24] 407



图片 14.1　葡萄牙人时代的埃尔米纳的圣乔治堡

可是，从1650至1800年加人和东阿肯人向欧洲的出口贸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记录清楚地表明，黄金海岸15和16世纪从贝宁、圣多美和维达进口奴隶显然是为了在金矿使役。比如，在1529年4月黄金海岸从贝宁进口2060名奴隶，1535年埃尔米纳从圣多美进口80名奴隶。[25] 但是从17世纪中叶以后，黄金海岸的加人和阿肯人开始出口奴隶，而

[22] A.A.博亨，1971年，第315页。另见教科文组织，1979年，第12号文件。
[23] H.W.德布鲁纳。1965年，第21-23页。
[24] A.W.劳伦斯(Lawrence)，1969年，第12-13页。
[25] W.罗德尼(Rodney)，1969年。

且人数增加很快，到1710年奴隶贸易额超出了黄金贸易。1704年，荷兰驻埃尔米纳的代表威廉·德·拉·帕尔马在报告中写道："现在黑人更加注重奴隶贸易而非黄金贸易，因为他们可以多赚钱。"[26] 1726年访问芳蒂沿海的一位英国人威廉·史密斯厌恶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起名黄金海岸。"[27] 这项贸易在整个18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据达阿库说，在1700年以前每年出口5000至6000名奴隶，至18世纪已达6000至7000名奴隶。据柯廷说，18世纪共出口奴隶47.4万人。[28] 柯廷的这一数字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现在达成普遍的共识，认为柯廷低估了西非出口奴隶的人数，尤其是在18世纪，大约少算了7.3%至18.4%。[29] 埃维地区也大批出口奴隶，特别是在1730年阿夸穆人入侵该地区之后。

408

那么，黄金海岸的奴隶贸易为什么到18世纪超过了黄金贸易呢？对于这个问题，答案主要有三：第一，17世纪40年代，甘蔗种植园体制引入加勒比群岛和美洲大陆后，对奴隶的需求大大增加。在17和18世纪，这一需求几乎是无法满足。[30] 第二，由于战争次数大增和1650年以后，火枪的使用日益增加，导致战俘人数大量增加。这些战俘在当地容纳不下，不得不出口。1620至1750年间是奴隶贸易的鼎盛时期，恰巧也是几个帝国兴起和进行扩张的时期。首先是登基拉帝国和阿夸穆帝国，然后是阿散蒂帝国。大多数奴隶都是战俘或者掠夺所得。[31] 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特别是在三个新帝国兴起之后，它们从附庸国获得进贡的奴隶人数增加了。大多数附庸国，特别是阿散蒂帝国的附庸国，都是以奴隶的形式缴纳贡物。在黄金海岸，向欧洲人供应奴隶是同黄金一样为非洲人独家享有。

从17世纪末以后虽然埃维人、加人和东阿肯人出口奴隶已超过出口黄金，但是象牙海岸的西阿肯人在整个17和18世纪仍继续以出口象牙和黄金为主。

下几内亚的进口也在量和质两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主要的进口商品布匹大部分不是欧洲生产的，而是北非伊斯兰教各国、贝宁和象牙海岸生产的。[32] 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生产的服装在早期的葡萄牙文献中，称为"兰本斯"(lanbens)、"哈拉本斯"(hallabens)和"艾尔贾拉瓦依斯"(aljaravais)。葡萄牙人到来前，贝宁的棉布和象牙海岸的夸夸布在黄金海岸畅销，但葡萄牙人来后立刻利用这一需求开始了布匹贸易。向黄金海岸出口贝宁棉布和夸夸布在17世纪肯定还在继续。根据帕切科·佩雷拉提供的货单，其他进口商品还有黄铜手镯、手帕、珊瑚玩具和某种"如同我们珍如宝石一样的红色贝壳、白葡萄酒以及他们称为'科里斯'(Coris)的蓝色珠子。"[33]

409

---

[26] 弗利藏珍集(Furzley Collections)，W.帕尔马致X，1704年8月31日；又见K.Y.达阿库(Daaku)，1970年，第46-47页。

[27] W.史密斯(Smith)，载于T.阿斯特利(Astley)，1745年，第2卷，第138页。

[28] P.D.柯廷(Curtin)，1969年，第221页。

[29] J.E.英尼科里(Inikori)，1976年；P.D.柯廷、R.安斯蒂(Anstey)和J.E.英尼科里，1976年；R.斯坦(Stein)，1978年。另见本卷第3章。

[30] J.E英尼科里，1976年，第4-5页。

[31] P.E.H.海尔(Hair)1965年；P.D.柯廷，1969年。

[32] V.拉姆，1975年，第84-85页。

[33] D.P.佩雷拉(Pereira)，1937年。

到了17世纪，进口货单增添了许多，皮特·德马里斯在17世纪早期的著作中留下了对荷兰人带进的商品的如下叙述：

> 大批用做衣物的浅色麻布，还有大量的喝水和洗衣用的各种尺寸的盆、葬器、取水用的壶、赤铜罐、大罐；制造长矛和砍刀用的铁；大批红、蓝、黄、绿颜色的鲁皮什布匹，以缠腰间挂佩刀和钱袋之用；西班牙哔叽、荷兰刀、大量各种威尼斯珠子；颜料，他们研碎后涂于用树皮制作的绳子上出售；做渔钩用的针、钩子、盛牛奶用的小铜罐。但是需求和使用最多的是麻布、铜器、盆、壶、刀和珊瑚。[34]

这一货单表明，包括纺织品和珠子在内的进口商品主要来自欧洲。这里没有提到火枪，很可能是因为火枪和黑色火药是从17世纪40年代才真正开始使用，英国人和入侵者从那时开始向沿海出售武器。[35] 1658年时，火枪已很走俏，以致于荷兰人作了这样的报道："只有滑膛枪卖得上好价钱"，"当地人在战场上带的枪数以千计。"[36] 1660年，荷兰撤销了对武器出口的禁令并开始大量出口。1673至1704年间，仅皇家非洲公司一家就向西非运去了约6.6万枝火枪和9千余桶黑色火药，其中大部分运往黄金海岸。火枪的出口在18世纪不断增加，一直是黄金海岸需求最大的商品。据英尼科里的记述，1750至1807年间，仅英国一国输向西非的黑色火药总量达49,130,368磅，每年平均为847,075磅。[37]

1750至1807年间，西非输向英国除奴隶以外的商品价值为5,443,682英镑(黄金的价值为90万英镑)，而经英商之手出口的奴隶一项总值即达53,669,184英镑。如果以英国在奴隶贸易中占45%推算，在18世纪后半期西非出口的奴隶总值为131,361,920英镑，每年平均为2,264,861英镑。[38]

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410

从1500至1800年，下几内亚沿海地区经济上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之一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复杂的贸易路线网络。这一贸易网首先把本地区的各族人民相互联接起来，然后又把他们同东北面的莫勒-达格巴内人和豪萨人，同西北而的曼德人以及同撒哈拉以北的北非伊斯兰教诸国和穆斯林世界相联接。最后，这一网络跨越大西洋先是同欧洲，16世纪以后又同美洲联接起来。处在这一贸易网中心的是库马西。

另一影响是主要沿着这些贸易网出现了许多城镇中心，发挥着货物集散地、市场中心和终端的作用。这些城镇包括西北部的孔城、博博迪乌拉索、布纳、贝戈和邦杜库；东北的萨拉加、延迪和桑桑内芒戈以及南部的提亚萨累、萨卡苏、亚卡索、克林贾博、库马

---

[34] P.德马里斯(Marees)，载于S.珀查斯(Purchas)，1905年，第6卷，第281-282页。

[35] R.A.基(Kea)，1971年；K.Y.达阿库，1970年，第148-152页。

[36] F.C.瓦尔肯伯格(Valkenburgh)致XIV的报告，1658年6月。

[37] J.E.英尼科里，1977年。

[38] J.D.费奇(Fage)，1969年；W.罗德尼，19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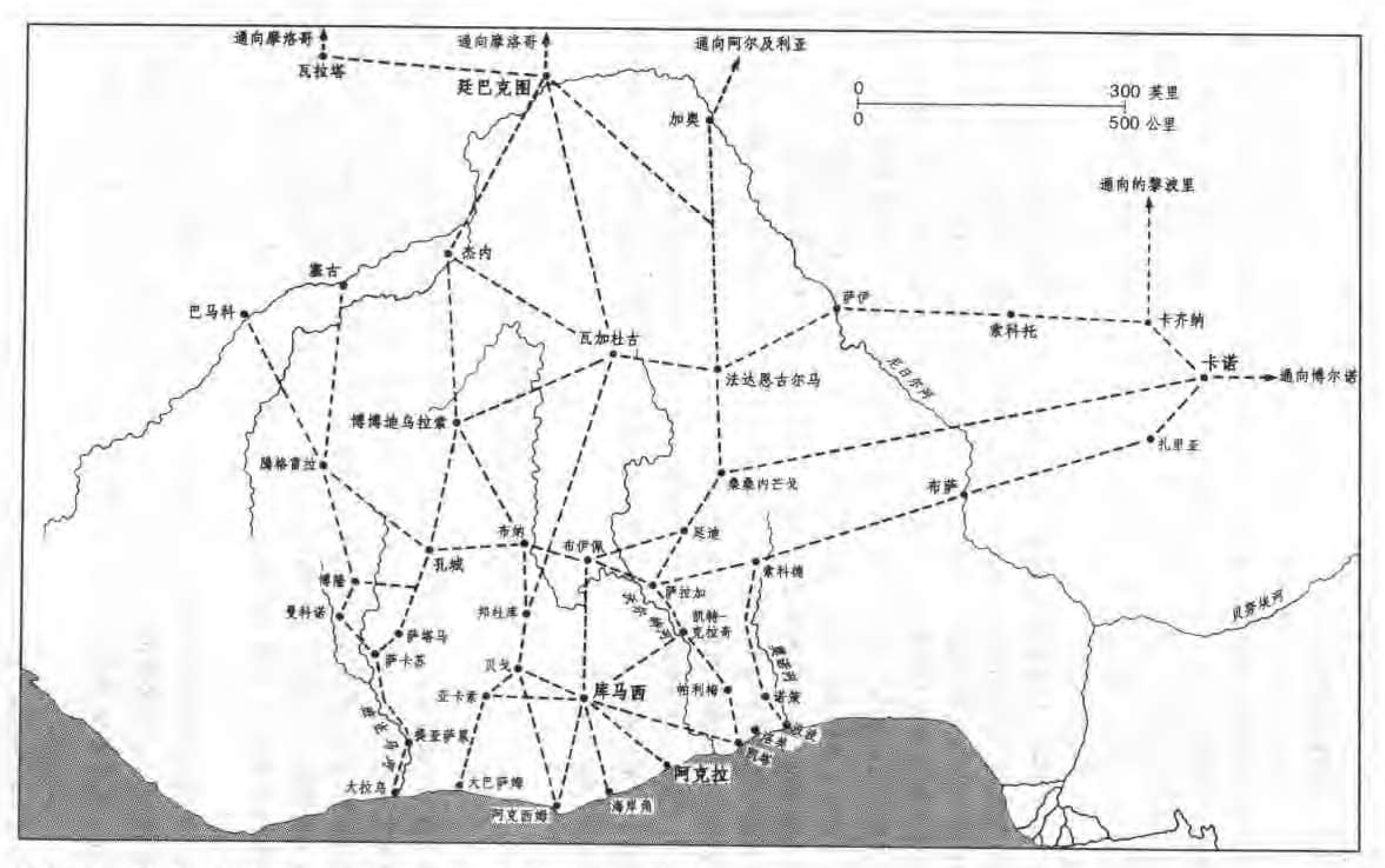


插图 14.2　班达马-沃尔特-莫诺河流域的主要贸易路线(仿照 A.A. 博亨图)

西、凯特-克拉奇以及阿夸穆菲。

欧洲人在沿海地区的存在加速了那里的城镇发展，而这一发展是以牺牲紧邻的内地从前的首府城市为代价的。到 1800 年，这些城镇脱离了内地而发展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这样，穆里脱离了阿塞布，海岸角脱离了费图，埃尔米纳脱离了阿瓜福，阿诺马博脱离了曼凯西姆。

这一新贸易网络的另一影响是，使下几内亚沿海的经济同西欧、美洲以及曼德人-豪萨人-穆斯林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后一种联系最终减弱了，可是同欧美的联系却得到加强。

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下几内亚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遭到破坏，或者说得不到健全的发展。一切贸易中最具破坏性、骇人听闻的和不人道的奴隶贸易稳步地取代了自然产品的贸易。此外，奴隶贸易剥夺了这一地区的劳动力以及一些有技术的手工业者、工匠和艺术家。欧洲人输出的商品不是有利于促进埃维人、阿肯人和加人当时业已存在的工业和创造力，而只是出口廉价的大众消费品从而扼杀了现有工业或者严重地阻碍了现有工业的增长。简而言之，从1500年至1800年，下几内亚地区的经济虽有增长但无发展。此外，既然进出口贸易都控制在欧洲人手中，大部分利润自然归他们所有。这是欠发达过程的根源所在，20 世纪废除奴隶贸易和在非洲建立殖民主义，使非洲的欠发达问题更趋恶化。

下几内亚沿海地区的政治变革

412

1500 至 1800 年间的政治变革比经济变革更加激烈

到 1500 年时，国家的形成过程已经开始，沿着海岸和北部热带草原一带出现了许多国家。葡萄牙人到达这里时发现，除了热带草原地带的曼普鲁西、达贡巴、纳农巴和瓦加杜古等莫勒-达格巴内人诸国家和博诺的阿肯人国家外，在沿海还存在着阿汉塔、夏马·阿瓜福、费图、阿塞布、阿戈纳和阿克拉。[39] 15 世纪下半叶，第一个阿肯王国博诺出现之后，这一国家形成过程的势头继续加强，并通过同曼德人和以贝戈为中心的阿肯人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而达到顶峰。[40]

在 16 世纪，拉巴迪人和奥苏人参加到阿克拉平原上的加-马西人、农瓜人和特马人诸国的行列中来，他们建立了许多定居点。在 1300 年以前，加人没有国王，统治他们的是祭司。但是到了 1600 年出现了世俗的王权，这很可能是受到邻邦阿肯人或者阿丹贝人的激发。17 世纪初期，某些加人受欧洲人存在的吸引来到了沿海地区。加-马西人、农瓜人、奥苏杜库人首先启动，接着是拉人，他们在征服农瓜人所得的土地上建立了拉巴迪国，而

---

[39] A.A. 博亨，1966 年和 1977 年。

[40] C.K. 埃法-吉亚姆菲(Effah-Gyamfi)，1978 年。

奥苏则是从奥苏杜库人夺取了土地。加人在沿海地区建立的最后一个侯国是泰希，他们的土地是农瓜人赠送给一群从拉巴迪过来的移民的。可是，所有这些沿海城镇都承认驻在阿亚瓦索的加人"曼泽"(Mantse,国王)的宗主权。在1680年迁都到沿海地区之前，阿亚瓦索一直是王国的首都。

16世纪在阿肯人中间所发生的，看来是在普腊河-奥芬河盆地形成了许多小的社会群体和城邦国家或酋邦。把它们联接起来的不是对共同主权实体的忠诚，而是亲属关系、宗族和氏族关系以及贸易商道方面的联系。可是根据阿丹西的口头传说，大约从1550年以后，某些氏族和城邦国家开始以福梅纳国王阿伍拉迪·巴萨领导的福梅纳和阿克罗凯里为中心走向集权。[41] 这一发展导致阿丹西邦联的建立，但也预示着某些阿肯人将向北和向南迁徙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酋邦国、城邦国和侯国，诸如夸胡、阿基姆-阿布瓦夸、阿基姆-科多库和阿夸穆；更南面的瓦萨-特维福、伊格维拉和阿多姆；以及塔福、森特雷索、卡萨和阿马康，这些地方现在都是库马西市的组成部分。[42]

1580至1630年期间，国家的形成似乎更为迅速。一位荷兰制图家在1629年12月25日绘制的一幅塔诺河至沃尔特河之间黄金海岸南部诸国的地图最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事实。这张地图共标出了38个国家和王国。除大英卡萨和英卡萨-伊格维拉[43] 两国外，其余各国皆可找到，而且至今仍在原来的地方。

413

这些国家都是上述加人和阿肯人移民建立起来的。由于在有限的地域里建立如此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必然是很小的，许多只是城邦国家或者小酋邦。幅员大小虽各不相同，可是它们的组织结构都是类似的，都只有一个统治者，或者是酋长，或者是国王和王后。比如在阿丹西邦联，国家元首在各国的王族之间轮流担任。在每一个国家，国王是从王族成员里选择(阿肯人是根据母系的原则选择)，王族通常是指第一个到达这个地区的家族或者氏族。国王有一家族或氏族首脑议会作为顾问，他只是成员中排位第一者，而不是独裁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灵例如河流、湖泊或者岩石，他们的宗教祭司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1630至大约1670年，在加人和阿肯人地区出现了两大政治事态。首先是1629年的地图所标示的各国的不断巩固和壮大；第二是新国家的出现。根据口头传说，阿夸穆、登基拉、阿克拉或称加、芳蒂、瓦萨和阿多姆等王国大致上都通过和平的手段大大拓展了他们的疆域。例如，加人国家从沿海平原向北扩张，把阿夸平山下的各古安侯国均囊括进来，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阿邦斯市场中心——1629年地图上的A.B.C.——向西则又把阿伍图和森亚的古安侯国纳入其版图之内。在奥凯·阿克威国王(约1640-1677年)统治时期，加人国家的版图和势力达到顶峰。

同期，阿夸穆的阿杜阿纳国也成了强大的王国，占有现在的阿萨曼凯塞、卡迪、恩萨

---

[41] K.Y.达阿库，1969年，第iii页。

[42] K.Y.达阿库，1966年，第10-13页。

[43] 大英卡萨和英卡萨-伊格维拉曾被一些学者如芬和波特说成是塞赫维人诸国。关于这些国家的兴起将在后面讨论。可是，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因为他们的口头传说中并未提到前者也没有说同它们有什么联系。见R.波特(Porter)，1974年，第37页；J.K.芬(Fynn)，1971年，第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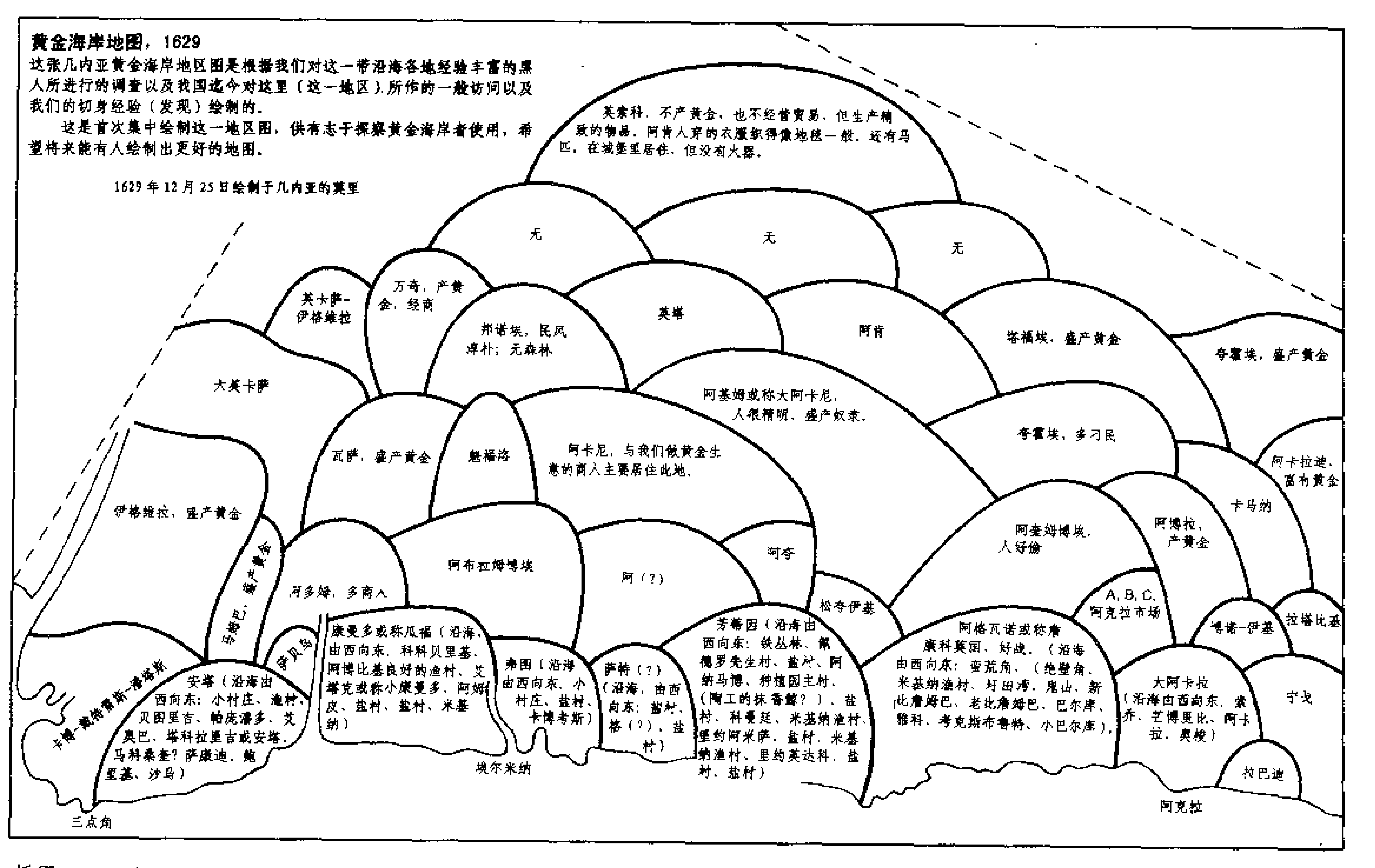


插图 14.3 重新绘制的 1629 年黄金海岸地图

瓦姆和阿夸平等地。在此期间，经过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登基拉从阿丹西邦联分离出来在奥芬河与普拉河的交汇处牢固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44] 在沿海地区，芳蒂向内地扩展其领土。欧洲人记载中常常提到芳蒂同北部的埃奇各族的战争。[45] 瓦萨和阿多姆也在南部和西部进行扩张。

登基拉-阿丹西战争(1650-1670年)和博诺战争大大地加速了向南和向西移民，使他们进入了阿迪西人、埃伍蒂雷人、阿格瓦人、康帕人和拉古内里斯等较古老的民族所居住的 415 森林里。这些新来的集团不但在现瓦萨-阿曼费附近建立了奥温国，以安维安维亚村附近的艾伊尼恩苏为首都[46]，而且还在南部建立了三个塞赫维国家——安惠索、贝克威和威阿乌索，还有阿西尼、阿布里皮奎姆和安科布拉以及一系列沿海城镇。在最富裕的黄金产区之一，在联接北方市场贝戈和邦杜古同沿海的商道上，奥温在17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王国。[47]

向北迁徙的登基拉-阿丹西移民建立了库马西、科科富、德瓦本、恩苏塔及后来的贝夸伊等奥约科人诸国，以及曼庞和阿费加斯等布雷托人国家。这些国家散布在库马西四周50公里之内。再往北，其他人在格宾人、恩科兰人、纳法纳人、芳塔拉人和库兰戈人居民中间建立了吉亚曼人或称阿布龙人的阿杜阿纳人国家。[48]

新国家的组织看来同老国家相类似。比如，塞赫维和奥温国家把先进的阿肯氏族制度和依照母系选举国王的制度凌驾于当时已经存在的以部署在生活区周围的“阿萨孚”(asafo,武士)连队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上。

可是，1570至1600年间发生了一场政治革命，其特点不是新国家的涌现，而是现有国家的集权化。这场革命显然是奥温和登基拉带头进行的(图14.4)在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奥温征服了西边和北边的塞赫维诸国，并向西扩张把象牙海岸的一些城镇如凯特索、亚乌、布拉科和锡卡索等都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49]

同奥温一样，登基拉也从其处于普拉河与奥芬河交汇处的首都阿班基索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在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登基拉的阿戈纳统治者通过一系列英明运动，向北征服了库马西附近的所有阿丹西国家和前阿散蒂国家，向南征服了阿辛和特维福。1686至1690年间，他们也打败了奥温、塞赫维诸国，西南的瓦萨以及沿海王国阿多姆和费图。[50] 到了1690年，登基拉已在黄金海岸的西南部和象牙海岸的一部分地区称雄。[51]

与此同时，阿夸穆在东南地区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从新建的首都尼亚诺斯——在现在的恩沙万附近，向外扩张。阿夸穆的统治者首先向加人王国发动进攻，终于在1681年征服了它。而后挥师向西攻打沿海王国阿戈纳，并于1689年使它屈服。在最后的运动中

---

[44] I.G. 威尔克斯，1957年；K.Y. 达阿库，1970年，第144-161页。
[45] A.A. 博亨，1965年，第175-180年。
[46] H. 戴贝特(Diabati)的私人通讯(1977年)。
[47] K.Y. 达阿库，无出版日期。
[48] E.A. 阿吉曼(Agyeman)，1965年，第36-39页；M.A. 克雷里西(Clerici)，1962年，第27-28页。
[49] K.Y. 达阿库，无出版日期。
[50] 同上，第156-160页。
[51] W. 博斯曼，1967年，第72-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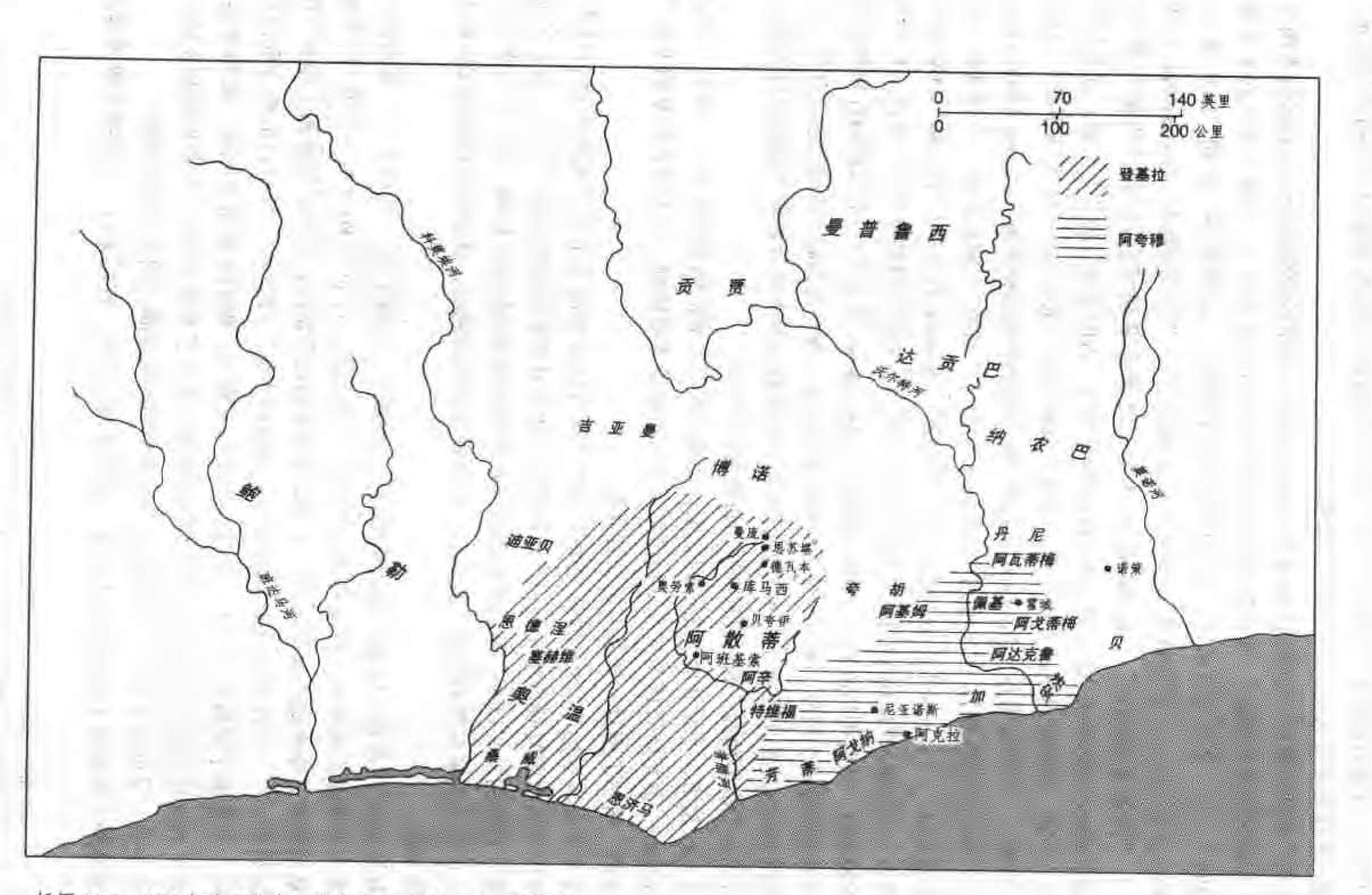


插图 14.4 1700年的下几内亚海岸诸国(仿照 A.A. 博亨图)

(1702-1710 年,)他们征服了东边的阿丹贝人诸国和北边的夸胡,甚至渡过沃尔特河使佩基、417 霍城和克潘杜等埃维人国家也屈服于阿夸穆。[52]

登基拉和阿夸穆对于帝国的管理采用了相似的机制。他们将帝国划分为直辖区和省两大地区。直辖区围绕首都设立,其首脑称"奥曼赫内"(Omanhene,国王),由整个帝国的国王兼任。他的手下设一系列官员或王,他们在宫廷里分别担任一定的职务,诸如"巴塔赫内"(Batahene,贸易大臣)、"萨纳赫内"(Sanaahene,财政大臣)、"吉亚斯赫内"(Gyaasehene,内务大臣)、"阿基亚姆赫内"(Akyeamehene,外交大臣兼首席翻译官)以及"苏曼夸赫内"(Sumankwaahene,宗教事务大臣)等。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帝国又划分成若干个翼,登基拉帝国设立三个翼,阿夸穆帝国设立五个翼。登基拉帝国的三个翼分为:"阿库马蒂拉"(Akumatire,右翼)、"克耶雷姆芬"(Kyeremfem,左翼)和"阿戈纳·阿登顿多姆"(Agona Adontendom,前卫)。[53] 阿夸穆的各翼为:"本库姆"(Benkum,左翼)、"尼法"(Nifa,右翼)、"阿登顿"亦称"克隆蒂拉"(Adonten 或 Krontire,前卫)、"基多姆"(Kyidom,后卫)和"吉亚斯"(Gyaase)。每翼均由一名直辖区内的镇或国或首都本区的王来统率。在和平时期每个王从政治上行使对各翼的控制权,战时则是该翼的"奥萨福赫内"(Osafohene,司令官)。全体翼别首领都是奥曼赫内的顾问委员会成员。省区包括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现在它们成了帝国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家仍然由原先的国王统治,不过他们都处于奥曼赫内本人或者翼别首领的直接控制之下。各国每年都须纳贡,战时得参加所属各翼的战斗行动。

登基拉是第一个发展成为帝国的国家。登基拉设三个翼而阿夸穆设五个,其中三个同登基拉相同,显然阿夸穆是从登基拉借用了新帝国政治军事体制,只不过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增添了两翼,即基多姆和吉亚斯。

许多历史学家把 18 世纪的黄金海岸历史仅仅看成为阿散蒂帝国兴起的历史。但是,黄金海岸的历史要复杂得多。第一,除阿散蒂外还有其他新国家的兴起。第二,曾有奥温的尽管是短暂的复兴以及登基拉和阿夸穆分别被阿基姆和阿散蒂所推翻。第三,芳蒂王国的领土扩张达到最辽阔的程度。最后,才是阿散蒂帝国的崛起,这是公认的该世纪内最为出色的事件。

其他 18 世纪的新兴国家还包括恩济马人、桑威人、恩德涅人、迪亚贝人、莫洛诺人和贝铁人的奥温人或阿尼人国家以及许多鲍勒人的侯国。17 世纪 80 年代,阿莫·阿塞曼被登基拉打败,率奥温人或称阿尼人从安维安维亚渡过塔诺河,征服了阿格瓦人即索希埃人和阿纳布拉人,并在恩齐周围重新建立了他们的王国。1715 年,当他们正努力巩固国家之时,却遭到了阿散蒂的攻击,迫使一些奥温人西迁。他们在征服了阿夸、阿博伊索、418 阿巴库罗和埃库埃博以及此后又征服了埃奥蒂勒后建立了桑威王国。[54] 在他们建都克林贾博之后不久,又征服了阿辛,从而取得了对内地同阿比冯湖之间贸易的控制权。

桑威的北面出现了别的阿尼人国家,恩德涅和迪亚贝,它们是由一支安维安维亚难民

---

[52] I.G. 威尔克斯,1957 年;K.Y. 达阿库,1970 年,第 153-156 页。

[53] J.K. 库马(Kumah),1966 年,第 33-35 页;K.Y. 达阿库,1970 年,第viii页。

[54] H. 戴贝特的私人通讯,1977 年。又见 R.A. 霍罗威茨(Horowitz),1974 年,第 330-379 页;H. 戴贝特,1977 年;M.A. 克雷里西,1962 年,第 27-31 页。

在桑维同时建立的。这些难民向西北[55] 进入了原先由阿格瓦人、阿布雷人和其他拉古内里斯人占据的地区。恩德涅的阿尼人效忠于奥温国直至1715年前后，但有一部分人拒绝接受这点，遂离开这里而建立了贝铁王国。某些阿尼人，即蒙夫维人渡过科莫埃河建立了莫洛诺王国。[56] 这些后起国家之间的关系尚不为人知，但是恩德涅肯定是在阿散蒂的控制之下。佩罗特和格罗斯两人都认为恩德涅是通过威阿乌索的塞赫维国而效忠于"阿散蒂赫内"(Asantehene)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达阿库的观点，即他们是通过库马西的"班塔马赫内"(Bantamahene)为阿散蒂效忠。[57]

在18世纪上半叶，在阿尼人的西北部科莫埃河和班达马河之间也兴起了一批鲍勒人侯国或酋邦。根据关于其奠基人的口头传说，他们显然是分两批从黄金海岸迁徙到这里的。[58] 第一批移民阿兰桂腊鲍勒人是1700年到来的，和阿尼人几乎是同一时期。他们是1700至1701年登基拉被阿散蒂打败之后迁徙来此的。他们在现代的阿格巴的坎顿地区定居下来，其中有些人还从这里西迁，并在古罗人和科罗人中间住了下来。

第二次移民潮的规模更大，阿萨布人是从库马西过来的。1717年在奥塞·图图死后发生了一场夺取继承权的争斗。根据口头传说，这批移民是由他们的王后阿布拉·波库率领的，在他们渡河之前，王后向科莫埃河神祭献了自己的儿子，由此他们得名鲍勒(Baule，婴儿死了)。有些人此去成了安多人，另一些人南下到大莫里埃，在阿铁人和阿贝人中间住下来。其余的移民仍在阿布拉·波库王后的率领下向南渡过班达马河，然后再度向北到达布博瓦凯地区。这批人分为八大家族或者说八大氏族：法富维、恩济普里、艾图、纳纳福威、瓦雷博、萨福威、阿格巴和恩甘。[59] 阿克瓦·邦尼继承了阿布拉·波库王后的权位，看来有能力对鲍勒人、马林克人和占领瓦雷博地区的曼德人确立其权威。可是，阿克瓦·邦尼死后，王国分裂成为许多独立的酋邦。这两批移民很快同古罗人、马林克人、塞努福人和戈利人相混杂而形成了现代的鲍勒民族。 419

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恩济马王国。这个王国是安诺·布莱·阿卡、布阿·克潘义利和阿米赫尔二世兄弟三人将他们统治下的三个国家乔莫罗、阿布里皮奎姆和安科布拉合并而成的。他们运用从欧洲贸易中赚取的财富实现自己的宏图。三兄弟中尤以阿米赫尔二世最为出名，他在18世纪60年代成为极其富有的人。他扩大新王国的版图，并有意识地鼓励外部人去那里定居以增加人口。这个新国家在欧洲文献里被称为阿波罗尼亚，在18世纪始终统治着黄金海岸的西南角。

与此同时，某些较老的国家诸如布龙、塞赫维·威阿乌索、奥温和芳蒂等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势力范围。比如，奥温在17世纪90年代摆脱了登基拉的统治恢复了独立地位。由于阿散蒂与登基拉多次发生战争，大批难民流入奥温，使奥温的力量大大加强，以致于

---

[55] C.H.佩罗特(Perrot)，1970年和1974年。

[56] M.A.克雷里西，1962年，第27-31页。

[57] C.H.佩罗特，1970和1974年，K.Y.达阿库，1971年。

[58] J.P.肖罗(Chaureau)，1979年，第24-25页；M.A.克雷里西，1962年，第28-29页；T.C.魏斯凯尔(Weiskel)，1980年，第5-8页。

[59] M.A.克雷里西，1962年，第28-29页；J.P.肖罗，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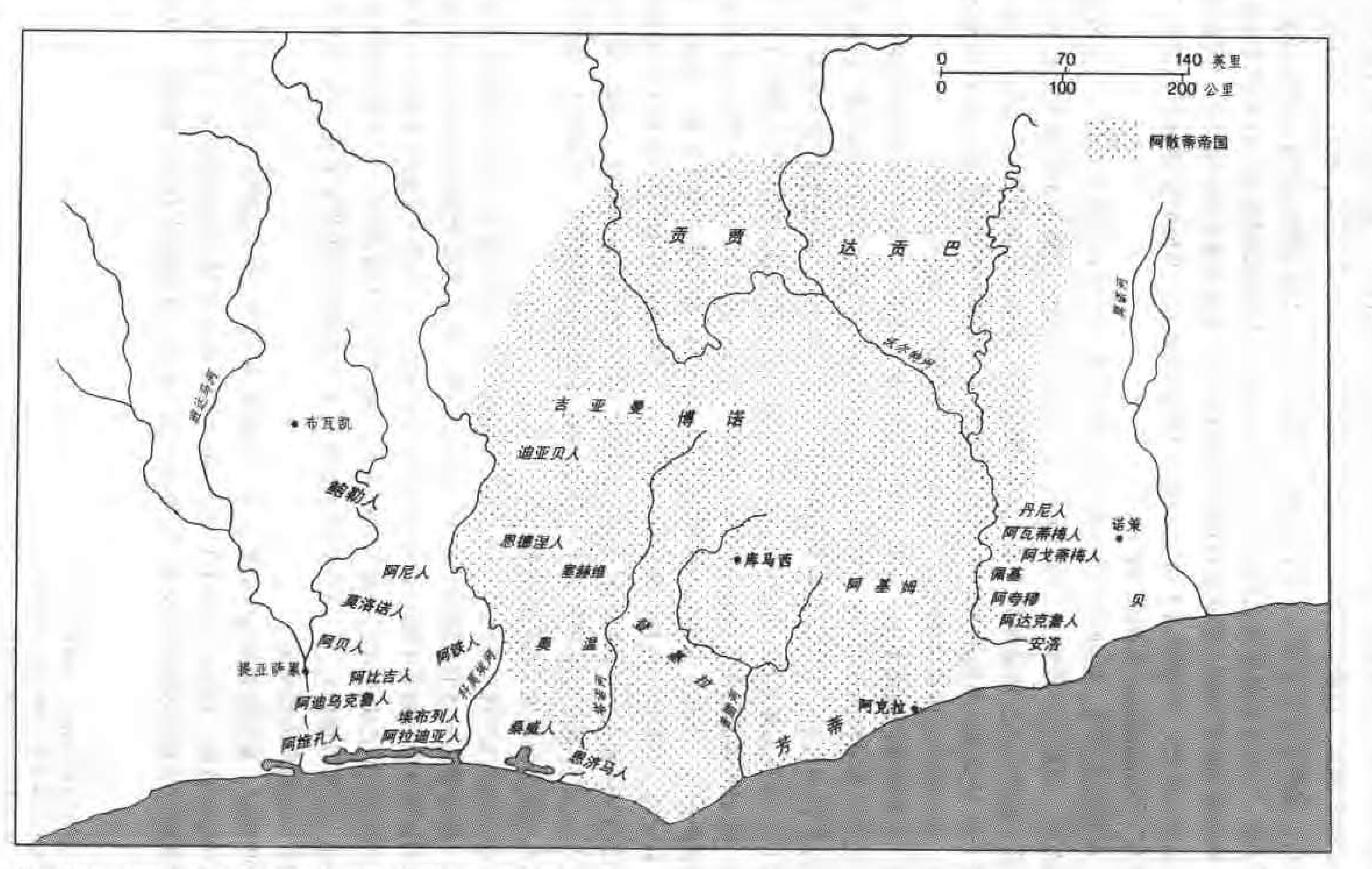


插图 14.5 1750 年的下几内亚海岸诸国(仿照 A.A. 博亨图)

能统治塞赫维诸国，并从1700至1710年起开始征服北面的黄金和象牙产区。到1718至1719年，奥温已发展得十分强大而且坚韧不拔，在埃布里·莫罗统领下向阿散蒂进军，洗劫了首都库马西，带着掠获物和俘虏包括阿散蒂王家的某些成员凯旋而归。[60]

布龙国也在18世纪初向南征服了库兰戈，向北征服了纳法纳的部分地区，其权力向西扩大到科莫埃河，从面支配了从邦杜库到库马西和克林贾博的贸易通道。新的布龙国是独一无二的多民族国家，包括阿肯人、库兰戈人、纳法纳人和曼德人等成分。阿肯人人侵者在政治上居于最高地位，他们保持自己的氏族、母系继承制度、立法体系以及传统宗教的各个方面。但是阿肯人吸收了库兰戈人和纳法纳人的民俗和歌舞，保留了纳法纳人的村级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此外，这三个民族中的某些人还接受了曼德-乔奥拉人引进的伊斯兰教。曼德-乔奥拉人也对王国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1]

也是在1700至1710年之间，阿夸穆帝国的疆域越过了沃尔特河达到了最大的限度。[62] 到1730年，芳蒂国作为部分地对阿夸穆及随后的阿散蒂和阿基姆扩张的反应，也征服了与其毗邻的沿海各国：西面的阿瓜福和费图以及东面的阿戈纳，[63] 控制了从普腊河至加王国之间的沿海地区。

1500至1800年间在科莫埃河与沃尔特河之间中部森林地区发生的政治变革甚至更加具有戏剧性。首先是登基拉帝国经过一系列的战争(1699-1701年)被年轻的阿散蒂联盟所击败并被推翻了。紧接着是登基拉的所有附庸国被一一征服，诸如塞赫维诸国(1701-1702年)、特维福(1712-1713年)、瓦萨(1713年和1726年)。然后，阿散蒂又征服了西南的奥温(1715-1721年)、恩济马(1715年)和恩德涅的阿尼人国家(1715年)，征服了西北的文奇(1711-1714年)、博诺(1723-1724年)、布龙国(1731-1740年)和贡贾(1732年)。[64] 这样，到了1730年，从科莫埃河至沃尔特河的大片地区都已置于阿散蒂的控制之下。 **420**

其次是阿夸穆于1731年被阿基姆-阿布瓦夸及其盟邦加国、科托库和阿戈纳所击败。[65] 阿夸穆的执政者从其传说的家园被赶了出来，渡过沃尔特河在阿夸穆菲建立了现在的首都，面比里姆-丹苏河盆地则被阿基姆-阿布瓦夸所兼并。这样，到1733年时，科莫埃河至沃尔特河之间的地区由阿散蒂、阿基姆和芳蒂三国所分割。

1731至1750年间，中央集权的过程已告完成。阿散蒂在南面征服了阿基姆-科托库、阿基姆-阿布瓦夸(1742年)和加国(1744-1745年)，在沃尔特河北面征服了东贡贾和达贡巴图(1744年)，在东北面征服了克拉克叶和巴萨国(1744-1745年)。[66] 到18世纪中期，阿散蒂帝国的版图西起科莫埃河中游，东至沃尔特河，北面超越沃尔特河，南面濒临大海，只有库马西正南沿海一带仍属于芳蒂国。芳蒂在18世纪始终保持自己的主权。他们运用高

---

[60] K.Y. 达阿库，无出版日期；J.K. 芬，1971年，第43页。

[61] M. 杜雷(Toure)，1974年，第463-478页。

[62] I.G. 威尔克斯，1957年。

[63] A.A. 博亨，1965年，第180-182页。

[64] 关于这些扩张和征服行动的详情，见J.K. 芬，1971年，第40-83页；K.Y. 达阿库，1970年，第173-181页；I.G. 威尔克斯，1975年，第18-29页。

[65] F. 阿多-芬宁(Addo-Fening)，1980年。

[66] I.G. 威尔克斯，1975年，第18-29页；J.K. 芬，1971年，第57-80页。

超的外交手腕，并借助英国人作为强大的后盾，因为英国要阻止阿散蒂对全部沿海的控制。[67]

阿散蒂的结构和政府组织同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相似。它把全国划分为直辖区阿散蒂和省区阿散蒂(阿辛称之为大阿散蒂)。直辖区阿散蒂同登基拉和阿夸穆的市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者国家，而是把库马西周围50公里之内的所有从前各国，包括德瓦本、科科富、贝夸伊、恩苏塔、曼庞、奥芬索、阿苏曼耶、登尼亚西、阿丹西和库马伍都划在里面。他们全都承认库马西国的"奥赫内"(Ohene,国王)为他们的阿散蒂赫内(至高无上的君王)，承认库马西为他们的首都。他们接受金凳子作为阿散蒂国的灵魂、国家统一和生存的神圣象征。他们派遣自己的奥曼赫内(Omanhene)参加联盟和整个帝国的统治机构——阿散蒂曼委员会。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直辖区阿散蒂同阿夸穆一样被划分为五个翼，命名也同阿夸穆一样：班库姆、尼法、阿登顿、基多姆和吉亚斯。每个入盟国家，包括库马西在内，一律采用这样的组织形式。 422

省区阿散蒂或称大阿散蒂，由所有被征服的国家和被阿散蒂降为仆从国或附庸国地位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在阿散蒂曼委员会里没有直接的代表参加，也不能直接拜会阿散蒂赫内。附庸国通过(或者成为)国王或联盟成员国，或通常住在库马西的翼别首领库马西国的"阿达姆弗"(adamfo,附庸国)实现对阿散蒂赫内的服务。这样，克拉克叶和巴萨对库马西的服务通过"德瓦本赫内"(Dwabenhene)，贡贾通过"曼庞赫内"(Mamponghene)，阿泰布布通过库马西的"阿登特赫内"(Adontehene)，登基拉通过库马西的"阿夸穆赫内"(Akwamuhene)去实现。[68] 否则，这些附庸国只要每年进贡和打仗时派人参加，帝国就大致不加过问。为了加强省区行政管理上这种松散的阿达姆弗体制，1760至1800年间在某些省区国家派驻了代表阿散蒂的区级和地区级专员。[69]

1670至1750年间，在下几内亚的森林区和沿海区发生了政治革命。从1629年地图标明的38个国家里，涌现了奥温、登基拉和阿夸穆三大帝国，到1750年又合并成为一个阿散蒂帝国。

这些帝国的崛起和诸小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的原因首先在于，所讨论的这四个国家抱有扩张的动机，并有钱购买武器和弹药。奥温、登基拉、阿夸穆和阿散蒂都是主要的黄金生产国。阿夸穆和阿散蒂还是北部贸易中柯拉果的主要生产国。此外，这些国家地处沿海和热带草原之间，在两个地区间的贸易中扮演了中介国的角色。

这些国家向北和向南扩张就能夺取对主要商道和对其他黄金和柯拉果产区的控制权。欧洲人在沿海的存在是促使这些国家扩张的更为重要的动机。到了17世纪中，同欧洲的贸易已远比同热带草原区的贸易更为有利可图。如果内陆国家扩张到沿海，他们就能直接同欧洲人进行贸易，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对于所有图谋进入沿海地区的国家来说，这一挑战证明是不可抗拒的。奥温的扩张旨在把阿波罗尼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登基拉

---

[67] 详见A.A.博亨，1965年，第182-185页；和1974年。
[68] I.G.威尔克斯，1975年，第39和151页。
[69] A.A.博亨，1965年，第342-344页。

向南扩张到阿汉塔和费图。阿夸穆征服了沿海的阿戈纳和加王国。而阿散蒂最后把它们统统征服并同欧洲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构成直辖区阿散蒂的诸国都抱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动机。如果能找到可替代的统领的话，这些国家都迫切地希望铲除他们残暴的登基拉征服者。登基拉统治的压迫性有阿散蒂以前的口头传说和同时代的欧洲记载佐证。正如荷兰驻埃尔米纳的总管J.范·塞文胡森在 423 1701年所说："登基拉人长期以来十分好斗，为他们过去的胜利而骄傲，令其邻邦不能忍受。"当时的观察家博斯曼也这样说："登基拉被自己的巨大财富和权力弄得飘飘然，变得如此高傲自大，以致于用鄙视的眼光看待所有其他黑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些奴隶而已。于是，登基拉成为大家痛恨的共同目标，每个人都急切地盼望着它的垮台。"⑳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有人出来领导，阿散蒂帝国的奠基人奥塞·图图和奥博库·瓦里恰好提供了这种领导。

三个大帝国兴起的另一原因是那四个扩张主义国家都不受内部事务的干扰。阿基姆和其他沿海各国虽然也并非缺乏钱财和扩张的动机，却由于不享有国内的安定而未能发展成为帝国。在西部的实行扩张主义的登基拉和以后的阿散蒂及东部的阿夸穆的夹缝里求生的阿基姆，在17和18世纪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与此相类似，沿海诸国的内部事务都遭到在沿海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的各种干涉，有时候是它们武装冲突的结果，诸如17世纪90年代的科曼达同荷兰人的战争。欧洲人在17和18世纪所奉行的基本政策自始至终旨在防止任何沿海国家的兴起。可是，内地各国如奥温、登基拉、阿夸穆和阿散蒂在其初始阶段未受欧洲人的干涉，能在同欧洲人遭遇之前充分地巩固他们的权力。

在解答三大帝国兴起的因素时，还有两个因素必须予以考虑：即利用新技术和高质量的领导才能。自从1650年以后，火枪和黑色火药成为最抢手的进口货，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手头都有黄金和其他资源，因此买得起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军火。有了火枪之后，他们的扩张活动明显地大大加速。在传统的战斗中，敌对两军以密集的队形相对阵，使用长矛、剑、斧、刀、弓箭、甚至徒手格斗。在引进火枪之后，战斗采用不同的翼别进行。这一变化导致登基拉发展了三个翼，随后阿夸穆和阿散蒂又发展成为五个翼。这一新的军事编制凌驾于由国王加上氏族和家族首脑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传统政治结构之上。如果没有能干的统治者，这些国家就不可能对他们传统的战争组织和旧式政治组织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奥温国王们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是，口头传说和欧洲人的文献都一致称赞登基拉、阿夸穆和阿散蒂统治者们的勇气、策略和才干。登基拉国王中有维伦比·安佩姆、博阿杜·阿卡富·布伦姆庞和最杰出的博阿·安庞塞姆；阿夸穆国王中有安萨·萨斯克拉库、巴苏阿和阿克沃诺；阿散蒂国王中有奥塞·图图和奥博库·瓦里。㉑ 这些国王 424 通过一系列光辉的、时机上精心安排和协调良好的战役，把他们小小的王国发展成为庞大

⑳ W. 博斯曼，1979年，第74-75页。

㉑ 关于这些统治者所起的具体作用，请见J.K. 芬，1975年；A.A. 博亨，1965年；K.Y. 达阿库，1970年；J.K. 库马，1966年；I.G. 威尔克斯，1957年。

的帝国。

许多历史学家相信，这些庞大帝国的形成是奴隶贸易的产物。比如说，费奇就曾这样分辩说：

> 从总体看，这样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奴隶贸易活动可能推进了一体化，加强和发展了军事和领土的权威，但却削弱了四分五裂的社会。此事究竟是善是恶可能是个微妙的问题；但从历史观点看，这种发展是有其目的的，也许或多或少地是无可避免的。[72]

克勒里克和别的学者也曾说："人们可以说，这些王国(即达荷美和阿散蒂)过去是不存在的，现在却在奴隶贩运之中诞生了。"[73] 这种说法在西非的其他地方也许是符合事实的，但并不符合这个地区的情况。在黄金海岸，奴隶贸易在经济上要到1700至1710年间才具备一定的规模，但是扩张活动却始于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黄金海岸，奴隶贸易是国家形成过程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由。

在塔诺河以西的阿肯地区和沃尔特以东的埃维地区，拉古内里斯人、阿尼人和鲍勒人的家园，却没有在此时发生这样戏剧性的政治变化。1800年的政治状况同50年以前或者100年以前差不多：各个小王国或者酋邦由有共同祖先的各个氏族的家族集团松散地联合组成。

1800年在埃维人的国土上存在许多大小不等各自独立的"达科沃"（dukowo,领土单位,阿默努梅称之为酋邦和最高权力），最小的沃泽只有一个镇，大的安洛包括36个独立乡镇，分布很散而且遥远。[74] 到1900年时，埃维人土地上的达科沃已发展到120个。每个达科沃都由一位"费亚"（fia,国王)统治，费亚是从奠基家族中一两个世袭家系中选举产生。他得到长老会议的协助，每个问题都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费亚下面是达科沃所属各村的头人。每个村庄都属同一血缘，头人是一族之长。在村或镇一级，头人或者长老们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必须让全村或全镇的正常成年男子公开讨论。塔诺-阿达马河流域的西阿肯国和沃尔特河-莫诺河流域的埃维国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有若干原因：第一，外来移民在17和18世纪不断而来，定居点越来越小的分裂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因此，直到1800年，埃维人和西阿肯人尚未完全安居下来以致无力发动扩张战争。第二，这些移民是为了躲避中央集权和他们前统治者的暴虐行为而逃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可能在新的家园再选择同样的社会政治结构。第三，对埃维人来说，他们在建国中本来就缺乏经济动机。正如阿默努梅所说的那样：

425

> 埃维兰缺少经济上的刺激因素，而这是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的必要前提。正是经济上剩余产品的生产提供了走向中央集权化的首要动力。[75]

由于埃维人没有黄金、象牙或者柯拉果，不可能参与早已建立的有利可图的跨大西洋的南北贸易。在17和18世纪，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只有奴隶。这项活动破坏了和平、稳定和

[72] J.D.费奇，1969年。

[73] M.A.克雷里西，1962年，第67页。

[74] D.E.K.阿默努梅(Amenumey)，1969年；C.K.努孔耶(Nukunya)，1969年。

[75] D.E.K.阿默努梅，1969年。

有秩序的政治管理——这些都是政治扩张或集权化的必要条件。

西阿肯人虽然出产黄金、象牙和柯拉果，但通向北方的商道却控制在曼德人、塞努福人、库兰戈人、东阿肯人的手里，特别是在阿散蒂人手里，因此西阿肯人从中得益甚少。他们也没有参与同东北方的豪萨兰和博尔诺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因此，他们没有钱财从事大规模扩张活动。

埃维人和西阿肯人未能实现中央集权的第三个原因是环境方面的因素。[76] 由于许多泻湖把他们同内地隔离开来，欧洲人不能在那里驻留，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往南向沿海扩张的真正经济上的刺激。

第四个原因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邻邦对其政治事务的不断干涉，这样使埃维人和西阿肯人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在18世纪，西阿肯人始终面临塞赫维，尤其是阿散蒂的威胁。同样，从17世纪80年代起，埃维人面临着外来积极的干涉，首先有大、小波波的诸国王，然后有阿夸穆的干涉，到了18世纪，达荷美从东面来干涉，西面则有气势汹汹的阿散蒂的干涉。

下几内亚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1500至1800年间，下几内亚最明显的社会文化变革发生在人口方面。由于从美洲和亚洲引种许多粮食作物新品种，特别是玉米和薯类，下几内亚的人口在16和17世纪有了很大的增长，当时的欧洲人文献记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在18世纪，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还有所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奴隶贸易的结果。正如英尼科里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下几内亚的人口会比今天多得多。[77] **426**

其次，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在1500年，社会的构成包括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如宗教权贵祭司(权力极大)和政治权贵国王和王后、平民百姓以及家庭奴仆。可是，到了1800年，除了加-阿丹贝人和埃维人外，其余各国的政治权贵的地位都超过了宗教权贵。此外，由于经济活动的巨大增长，尤其在金矿开采和长途贩运方面，多次为谋求扩张和支配权而发动的战争，造成了家庭奴隶的增加。这个时候，下几内亚的奴隶已被允许可以占有自己的财产并且同自由民结婚。有些奴隶还承担起负有责任的工作。如果奴隶被主人看做家庭成员的话，甚至还可以继承主人的财产。到了1800年，大多数奴隶被融人社会之中，不公布这类人的出身已经变成一条神圣的法律，在阿肯人中间尤为如此。

此外，由于贸易活动和欧洲人存在的结果，产生了三个不为传统社会所知的新的阶级。这一现象在塔诺河与沃尔特河之间的沿海地区最为显著。他们是工薪阶级、独立的富商与中间豪商阶级，以及一个穆拉托(mulatto)集团。[78] 第一阶级包括被欧洲人雇佣作为石匠、木匠、泥瓦匠、翻译、文书或秘书、黄金掮客、文官、大使以及公共关系官员者。欧

[76] C. 翁吉(Wondji)的私人通信。

[77] J.E. 英尼科里，1979年，第68-71页。

[78] K.P. 达阿库，1970年，第96-143页。

洲人文献里提到了这些人。有些人有文化，充当欧洲人与传统统治者及其百姓之间的中介人。

第二阶级包括非洲人个人或者集团，他们通过自己在耕作或者贸易方面的努力变得极其富有，甚至比传统的统治者的权势更为强大。这个阶级里的著名人士，在黄金海岸有费图的约翰·阿海纳夸和约翰·克莱森、有阿夸穆的阿索马尼、有科曼达的约翰·卡贝斯、有阿汉塔的约翰·孔尼以及阿诺马博的约翰·古兰蒂，在口头传说中又称他为埃诺·拜西·库兰泽。在东象牙海岸出现了科塞希兰格人和埃苏马人，他们在欧洲人同内地的阿维孔人、埃奥蒂勒人、阿布雷人、桑威人、奥温和塞赫维等民族之间充当掮客或中间商。到了1800年，科塞希兰格人已特别富有，且权势盛大。他们在选择世袭的头人方面，能起到关键的作用。[79] 沿海和内地之间的贸易十分兴旺。普通百姓和传统的统治者都能参加其中，而居住在森林里的民族扮演着中间商兼生产者的有利可图的角色。如果不出现工薪集团的话，至少富有的传统统治者和独立的豪商集团肯定已经崛起。不幸的是，无论是欧洲人资料或者口头传说对这个问题都未明言。

427 穆拉托集团是欧洲商人和非洲妇女生下的混血儿。这样的人在下几内亚沿海一带处处可见。虽然博斯曼等同时代人轻蔑地称他们是“私生子……是一帮既不像黑人也不像我们的放荡不羁的恶棍”,[80] 但是其中有些人如吉恩伦多克、博斯曼、巴特、戈登，尤其是理查德·布鲁的后代在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1]

另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欧洲人引进基督教和西方教育以及曼德人和豪萨商人引进了伊斯兰教。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在他们的城堡里，如海岸角、埃尔米纳和阿克拉等地，兴办了小学校。18世纪50年代，广传福音会向海岸角派遣了传教士。此外，某些穆拉托及某些传统的统治者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外求学，其中有些人如克里斯琴·佩德森、斯威恩、卡皮丁和菲利普·奎科等人回国后当上了教师和传教士。因此，到1800年阿克拉和海岸角等沿海城镇出现了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和改信基督教者。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文化的传播甚至比基督教更早。早在14世纪，伊斯兰教沿着北部商道传到加纳的北部，18世纪50年代又传到阿散蒂和鲍勒。到了1800年，库马西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穆斯林聚居区，并开办了一所古兰经学校。据威尔克斯的著作记载，18世纪阿散蒂的最后一位阿散蒂赫内奥塞·克瓦米(1777-1801年)之所以被废黜正是由于他改信了穆斯林的宗教。[82]

可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下几内亚沿海的大多数人民的影响，直到1800年还是很小的，虽然读和写阿拉伯语和欧洲语言的技能已在那里牢固地扎下了根。

据迅速发展的考古发掘证实,[83] 到1800年，在几内亚沿海的社会中，艺术、制陶、手工艺、雕刻(木头、象牙和泥)、纺织、铁匠业、铸造(黄铜、铜和黄金)业发展起来，在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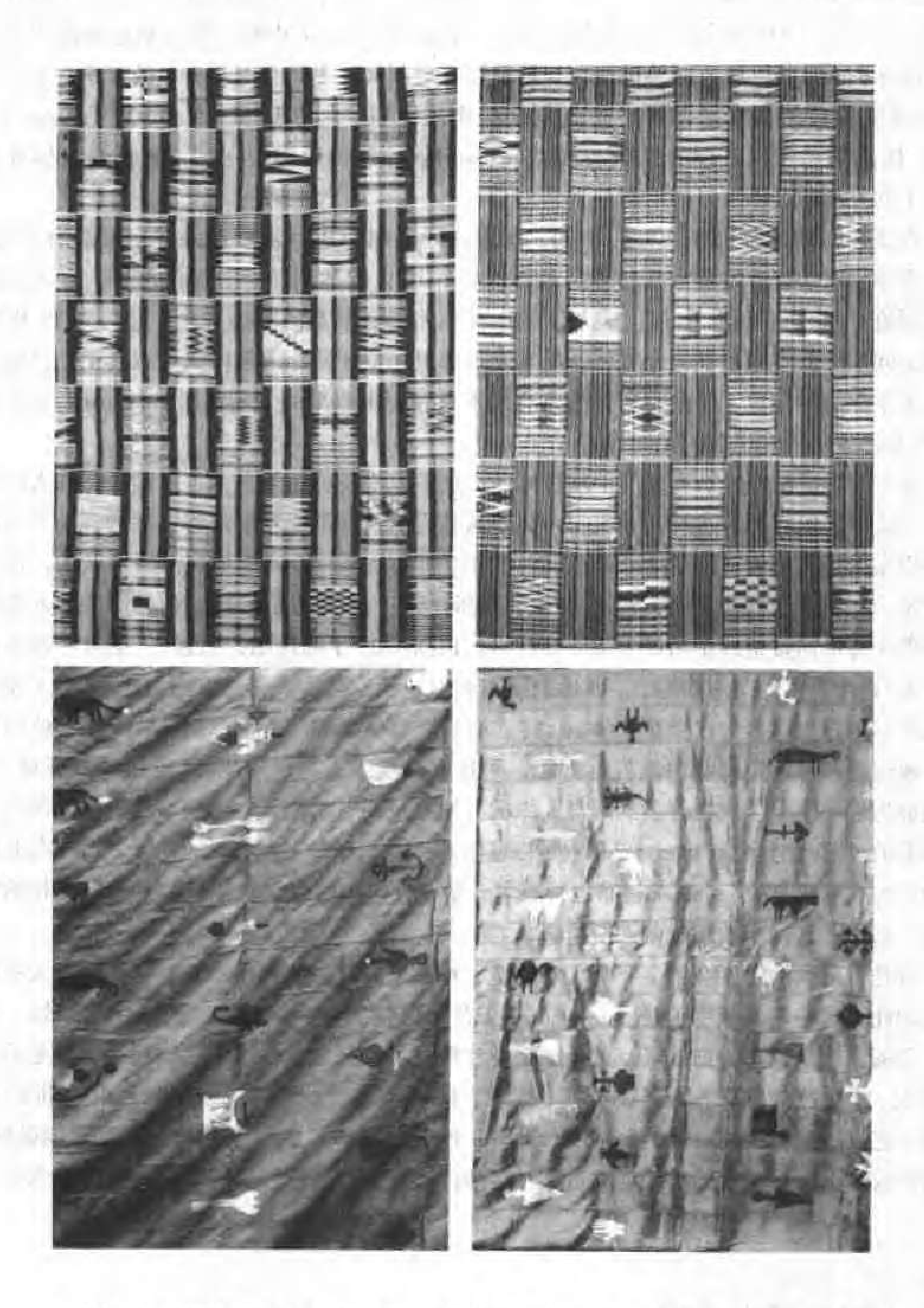
[79] 根据C. 翁吉提供的论文。

[80] W. 博斯曼，1967年，第141-142页。

[81] M.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1969年。

[82] I.G. 威尔克斯，1961年和1966年。

[83] J. 安匡达(Anquandah)，1982年。



图片 14.2 西非纺织品：(上图)坎提布，阿散蒂丝绸 (下图)阿达努多布，埃维丝绸

一行业中的某些集团还实行了专业化分工。与此同样发达的还有音乐、击鼓和舞蹈。

制陶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手工业，比如在加纳，它始于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以后)，[84] 到了1700年已经取得高度的发展，特别在阿丹贝人中间，他们制造的陶器远销象牙海岸的邦杜古。据安匡达的研究，阿散蒂人把制陶业提高到工艺美术的水平，生产出"一些质量最佳的多态形陶器，绘有复杂的图案，如'阿布斯瓦·库鲁瓦'(abusua kuruwa)、氏族陶器和仪礼用的'莫吉莫吉'(mogyemogye)颚骨形陶器——一种把祭酒倒在金凳子上的大酒罐"。[85] 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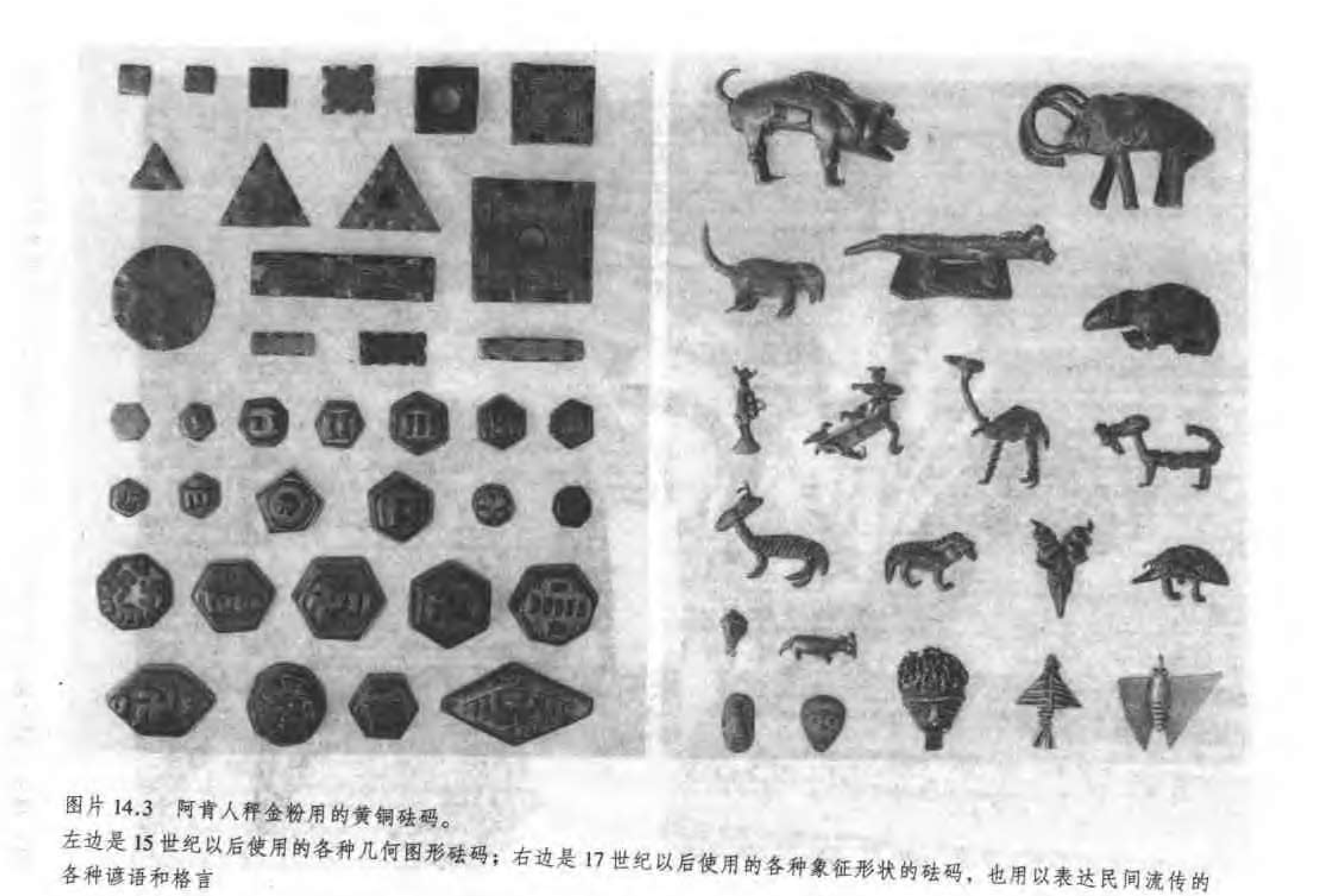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特别在阿肯人中间，木雕、牙雕和泥雕也发展起来。木制品有木凳、鼓、雨伞顶座和官方发言人权杖等。木雕艺术在16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安匡达曾这样写道：当时登基拉的国王"发展了同阿丹西木凳有联系的政治文化思想"。[86] 17和18世纪访问加纳海岸的欧洲人士如博斯曼等发现那里用象牙制作的侧吹喇叭以其工艺之精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有名气的还有用木材和泥土雕刻的"阿夸巴"(akuaba,生育玩偶)以及已故国王和王后的泥塑像。

这个时期，纺织也有所发展。据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称，阿肯人、埃维人和加人已经有了卧式窄面织布机。这种织布机很可能是从苏丹的西部沿尼罗河河谷引进的，而不是从马格里布西部传入的。[87] 我们并不确知这种纺织知识是何时传到森林和沿海地区的，但可以肯定，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在16和17世纪时已经广为流行了。布龙和巴博特二人都曾报道象牙海岸向黄金海岸出口六条纹布的事。根据1629年的地图，恩索科(据查考即现在的贝戈)是个重要的纺织中心，"那里织的布类似地毯，阿肯人普遍穿着"。[88] 织布工还生产毯子，阿肯人称之为"卡萨"(Kassa)、"博莫"(bomo)和"恩萨"(nsaa)。迄今他们仍然珍视这些产品。拉姆明白地告诉大家，阿肯人和埃维人的纺织到18世纪才发展成熟，达到最先进的水平。现在著名的阿肯人织的五颜六色的"坎提"(kente)布和埃维人织的丰富多彩的"阿达努多"(adanudo)布就足以证明那里是织布的发源地(图片14.2)。[89] 布龙地区出产的"阿丁克拉"(adinkra)布也很有名，是一种印有阿肯人的传统图案和象征物的宽幅布。后来，这种布被阿散蒂人所仿造。

可是，最大的发展在于金属加工和铸造，特别是黄金和黄铜的加工。这在阿肯人中间更加如此。这些工匠使用脱蜡(cire-perdue)工艺制作精美的金银饰物，包括宝剑装饰、耳环、手镯、项链以及头饰等等。黄金加工业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后来布龙人、登基拉人，特别是阿散蒂人，吸收了穆斯林工匠的手艺之后，在17和18世纪把这门工艺发展到空前绝后的精美程度。阿肯工匠们也制造了成千上万的黄金和黄铜砝码，有的铸成几何图形，有的采用动物造形。这些产品现已成为欧洲游客十分喜爱的纪念品。 430

---

[84] 同上，第53页。
[85] J. 安匡达，1982年，第40页。
[86] 同上。
[87] J. 拉姆，1975年，第219页。
[88] S. 布龙(Brun)，1624年和J. 巴巴特(Barbot)，1732年。
[89] 同上，第91-99页。



图片 14.3 阿肯人秤金粉用的黄铜砝码。
左边是 15 世纪以后使用的各种几何图形砝码；右边是 17 世纪以后使用的各种象征形状的砝码，也用以表达民间流传的各种谚语和格言



图片 14.4 纳纳·奥托·西里博二世，德瓦本国的奥曼赫内，身披色彩艳丽的坎提布，佩戴着作为国家标志的黄金饰物

这些工艺品也由于被收藏在各国的美术馆里而闻名全球(图片 14.3)。[90] 铸造业，特别是黄铜铸造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铸造了收藏金沙用的精致小盒和盛放非洲酪脂树油脂用的黄铜罐。

随着阿散蒂帝国在 18 世纪的兴起，下几内亚沿海地区的工艺美术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时期。阿散蒂的国王们不但在领土和政治上进行扩张，而且也竭尽全力发展艺术和工艺。在击败了登基拉、特基曼和阿基姆国之后，阿散蒂国王把他们最好的手艺人和金匠收罗起来送到库马西。[91] 正如安匡达所指出的那样："在阿散蒂联盟建立之后，阿散蒂国王们把阿散蒂帝国的全部工艺美术工业都集中到首都库马西周围地区。"[92] 阿威亚建成了制凳中心，在邦维里集中纺织坎提布，在塔福制作陶器，在富米苏阿制造铁器，在克罗福夫罗姆铸铜。此外，阿散蒂赫内还设立了阿帕贾非，把登基拉的金匠和其他手工艺人集中起来专门为他制作王权饰物。他还首创了"阿索姆福"(Asomfo)金凳子。第一位坐上金凳子的是一位登基拉酋长的儿子纳纳·塔比里。[93]

18 世纪阿散蒂帝国的国王们通过培植艺术传统和专业技能的方式，把阿肯人的文化发展推进到绝顶，从而保证了以最精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地位和权势。他们创造了黄金的文化和文明。代表这一文化和文明的正是他们高超的黄金饰物、丰富多彩的坎提布、十分考究的宫廷装饰以及复杂而富有艺术性的黄金衡器。这些工艺品使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访问库马西的欧洲人惊叹不已。[94]

尽管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遭到基督教传教士的嘲弄和谴责，黄金加工艺术在 19 和 20 世纪从未间断。他们，特别是阿散蒂人，仍在继续生产令人神往的金银饰物。

结 论

1500 年至 1800 年确是下几内亚沿岸国家和民族发生剧变的时期。在政治上，完成了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在经济上，奴隶贸易压倒了黄金和象牙的贸易；商业和经济中心从内地向沿海转移；同美洲和欧洲建立了强有力的商业联系，从而使当地的经济融入全球的经济之中。尤为甚者，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出现了各种新的阶级，虽然规模有限，主要局限在沿海地区；开始了文化教育，引入了西方教育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本地文化蓬勃发展，特别是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对于下几内亚沿海的各族人民来说，这几个世纪确是充满活力的时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主权。 433

(叶正佳 译)

---

[90] 对阿肯人金衡器引人入胜的研究，见 T.F. 加勒德，1980 年，第 171-363 页。

[91] 同上，第 198 页。

[92] J. 安匡达，1982 年，第 40 页。

[93] T.F. 加勒德，1980 年，第 299 页。

[94] T.F. 加勒德，1980 年，第 47-48 页；M.D. 麦克劳德(McLeod)，1981 年，第 72-76 页；J. 安匡达，1982 年，第 39-44 页和 100-112 页。

15 丰人和约鲁巴人：尼日尔河三角洲和喀麦隆

E.J. 阿拉瓜

导　言

434 本章涉及的地区西起沃尔特河流域，东至喀麦隆河。大部分地方是热带雨林，同北边多为灌木林的热带草原相联接。西部从尼日利亚边界到沃尔特河也是热带草原。这个地区也可以说是几内亚湾中的贝宁湾至博尼湾(从前称比夫拉湾)的沿海地区。居住在几内亚雨林这一部分和周围热带草原地区的民族包括丰人即现在贝宁共和国的阿贾人，约鲁巴人，这一地区中部的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乔人，这一地区中部的三角洲东北的伊格博人，伊比比奥人以及喀麦隆南部的各民族。

这一地区的所有语言均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绝大多数属于克瓦语族。可是，尼日利亚同喀麦隆接壤地区的埃菲克/伊比比奥语和其他语言以及喀麦隆的各种语言同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班图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一地区的东部，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庞大的班图语言和文化复合体向西非的延伸。这一毗邻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构成了西非同班图非洲之间的一个统一的环节。在克瓦语族中，约鲁巴语和伊格博语从人数(800 万至1 200万人）和地理分布上说是最大的两个。埃多语族也很大，操该语的民族分布从腹地到三角洲及其西部的边缘地区，包括伊索科人和乌尔霍博人以及北部的伊尚人(艾尚人)等。在克瓦语族中，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乔语与伊格博语、埃多语和约鲁巴语相比，最为不同。①

伊乔语同伊格博语、埃多语和约鲁巴语的区别较大，其部分原因是它在长时期内一直是一种隔绝的语言。据格劳托编年史的估计，隔绝期长达 5000 年以上，此事足以说明这436 一地区语言集团的稳定性。举例说，三角洲中部和东部之间的伊乔语内部的方言集团之间相互隔绝时间估计约一两千年。同样，约鲁巴语同其有关的伊加拉语之间隔绝的时间估计为两千年。

当人们评价 15 世纪末欧洲人到达大西洋海岸给该地区所带来的变化时，应该记住本地区悠久历史的延续性。不妨注意一下，沿海地区欧洲人对这一地区发展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同热带草原和腹地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旗鼓相当，只有最近才得以超过。

欧洲人在贝宁湾和博尼湾的重要活动是 16 世纪才开始的。葡萄牙人 1486 年来到贝宁并同奥巴(Oba)建立了关系。他们也同沿海各地建立了商业关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

① K. 威廉森(Williamson)，197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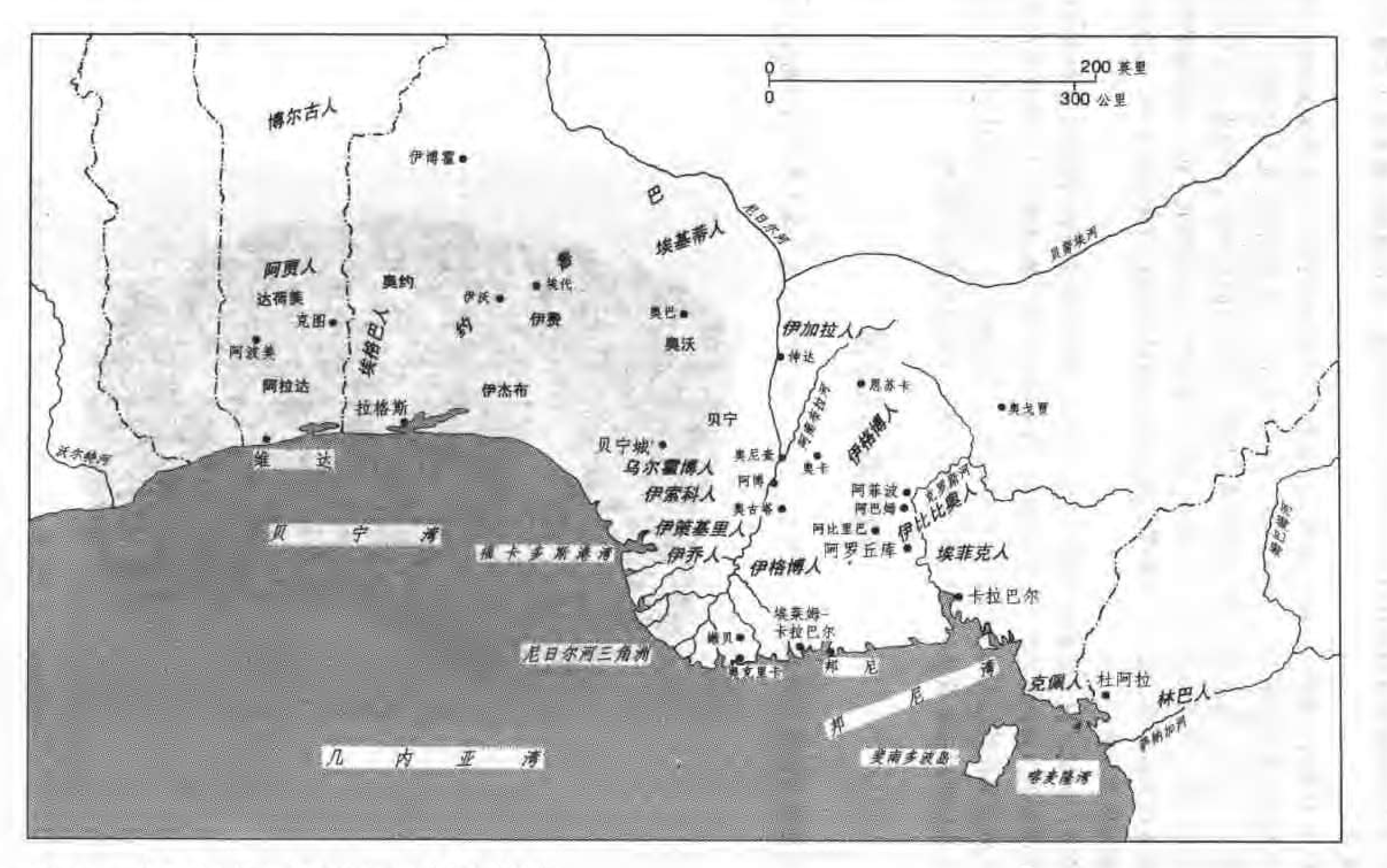


插图 15.1 16 至 18 世纪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和喀麦隆

欧洲人在沿海的活动开始将贸易的方向改变为由北向南，而沿海地区渐渐地成为推动变化的主要源泉。

16至18世纪，欧洲人的活动显然集中在海外奴隶贸易方面。本文所涉及的地区是西非奴隶贸易的主要市场之一。有些国家，如达荷美王国，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都因奴隶贸易得到很大的动力。从尼日尔河三角洲到喀麦隆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也受到奴隶贸易利润的影响。其他社群，尤其是那些以非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则成了掠夺奴隶的牺牲品，变成奴隶的供应来源。每一个社群都受到海外奴隶贸易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造成破坏、人口减少以及变故。

在这一时期，奴隶贸易的主要影响在于这些社群作为在美洲种植园劳作的奴隶的供应来源而吸收进世界经济之中。当地奴隶供应的增加给社群内部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非洲人强迫移民到达美洲也增添了西半球发生变革的新因素。但在有关社群的口头传说中，出现的则是奴隶贸易对当地的世袭家族、集团或者朝代命运的影响。

达荷美的丰人王国

达荷美王国及其周边国家，阿拉达、怀达、波波和贾金等大体上都同沿海贩卖奴隶的



图片 15.1 尼日利亚的贝宁出土的15或16世纪的纪念头像，青铜铸成，以铁镶嵌。高22公分

欧洲商人的活动有关系。也受到东北部的约鲁巴人的奥约王国的影响。根据阿金卓宾[2]对这一地区的研究，19世纪初以前的发展是同奴隶贸易和同奥约人强加自己权势的企图 437 紧密相联的。

这一地区小的社群和国家中的传统机构由于引入了奴隶贸易而遭到削弱，到17世纪末造成政治上的真空。正是在此时刻，达荷美王国的奠基人在现代的贝宁共和国的南部，把包括埃贡人(贡人)、丰人、阿拉达人等阿贾各族人民用新的政治形式组织起来，重新确立了秩序。到1700年，达荷美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在1724至1727年间，达荷美的统治者阿加贾向阿波美周围的古老小国发起了征战。此事挑起奥约人的干预，但无意建 438 立自己的体制。1730年后，达荷美接受了奥约的政治权威，并同意和沿海的欧洲商人合作在奴隶贸易的经济中生活。但是这一研究最后结论认为，正是由于"不充足的奴隶贸易经济"使达荷美的短暂繁荣寿终正寝。1767年前后发生的不景气导致阿加贾王朝1818年的覆灭，和新的盖佐王朝的兴起。

新王朝完全适应于奴隶贸易经济，并把这一经济当做自己的实力基础。新王朝从奥约王国的崩溃和19世纪在约鲁巴地区进行的战争中获得好处。

当时对阿贾人国家来说两大显著影响是约鲁巴人(特别是奥约人)和沿海的奴隶贸易。

阿贾人各社群同东部和东北部的约鲁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深远而悠久的。即使在新近从西部过来的移民中，关于其血统的传统说法也同早先的约鲁巴家园有联系。其他人的传说则是直接来自约鲁巴家园。这种传说不必从17至19世纪的奥约-约鲁巴人的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中衍生出来。在地区内部，确实存在着约鲁巴人血统和文化的国家，而且存在高度的文化亲缘影响。阿贾人诸王国倾向于从克图那边寻找自己的亲缘关系，那是一个从伊勒-伊费迁来的约鲁巴人移民群体。

其次，这些国家大体上是按照类似约鲁巴人的体制组织的。这个地区的"父亲"王国是阿拉达，大约是在1575年建立的，扮演着伊勒-伊费在约鲁巴人家园所扮演的同样角色。达荷美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兼并了所有其他国家，并且按照违反传统的新路子进行组织，结果招来了奥约的干涉。奥约那时的干涉，同一切军事干涉的传统一样，在许多方面是破坏性的。这一干涉削弱了达荷美这一军事强国，但并非一切方面都是消极的。奥约所强加的和平，防止了年轻的达荷美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军事冒险上，也使它能够加强自己的行政管理。奥约人组织的某些方面被吸收了，如开国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特格贝苏引进的"伊拉里"(ilari)制度。正是由于内部制度的稳定，使达荷美得以在19世纪最终摆脱奥约。

关于欧洲人在阿贾国土上推行奴隶贸易的影响的重要因素在于这一地区各国在16世纪开始奴隶贸易时都很衰弱。强者对弱者进行绑架和掠夺总是极具破坏性的，往往使人们脱离农业和工业生产。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破坏，社会的规章制度也被废除。无安全感和残忍的暴力压倒了对权威、老人和家族的尊敬。

欧洲人贸易站之间的竞争也破坏了各国之间的先后次序和传统关系。在17世纪早期， 439

② I.A. 阿金卓宾(Akinjogbin)，1967年，第ix页和1976年。

荷兰人在资深的国家阿拉达的首都阿西姆建立了代理机构。法国人在阿拉达建立基督教传教机构的尝试失败之后，于1671年在维达建立了对立的贸易站。两个王国之间发生了经济竞争，最终破坏了业已削弱的传统关系。正是在这种对正常的社会价值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不安全感和政治及商业竞争的气氛之中，从阿拉达迁来的移民们创立了达荷美王国。

来自阿拉达的持不同政见的移民，1625年前后在欧洲人势力达不到的阿波美定居下来，试图建立动乱时代能够持久的新的政治制度。他们否定把国家当做大家族的传统观念，而把国家比做多孔的罐并以国王作为象征。为了让这个多孔的水罐能够盛水，每个公民必须用一个手指去堵住水罐的洞孔。那么，在此绝对权威的国家里，公民的个性就得服从于国家。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观，它要求全国无保留地效忠于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正是这一观念的不屈不挠的发展使达荷美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使达荷美能在奴隶贸易和奥约人的进攻面前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地把所有周边邻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以上有关达荷美历史的描述，假设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起了主导的作用。但这一假设正在被新近的研究成果所修正。普克特[③]对两个中心概念提出了直接的挑战。第一，认为决定达荷美历史的是奴隶贸易的过程；第二，认为达荷美的经济是陈旧过时的，其对外贸易被王家所垄断，国内交换则是再分配型而非通过开放市场进行的。普克特提出下述新观点取代了这两个陈旧的假设：

（1）在达荷美王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家经营的部分不超过20%，大部分外贸是小商人在经营；

（2）在达荷美经济中，大西洋贸易只占2.5%稍多一点；

（3）即使在对外贸易中，奴隶和火枪也不是主要商品。比如说，巴西的烟草就是比枪枝更为重要的进口商品。

这些看法对修正旧观念和作为将来研究的基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40

约鲁巴人诸王国

尼日利亚西南部约鲁巴人的历史可以做简要概括。

首先，存在把有关起源的口头传说同考古发掘的证据统一起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把伊勒-伊费看做创造的中心和所有约鲁巴人王国的发祥地的传说，按照传统的说法，约鲁巴人的统治者都是在伊费取得饰有珠子的王冠的。当然，伊费也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地方，那里用青铜和赤陶制作的自然主义艺术精品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早就闻名世界。弗罗本纽斯曾以此为证据声称希腊人曾经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了定居点。其次，是奥约的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兴起问题，有些人认为这在约鲁巴人全部国土上是同精神权威伊费的

③ W. 普克特(Peukert)，1978年。见P. 曼宁(Manning)、R.A. 奥斯丁(Austen)和A. 凡·丹兹格(Van Dantzig)的评论，1980年。

奥尼(Oni)并存的。在这一地区的西部和北部，奥约成了约鲁巴权力的旗手。在丰人及其毗邻诸国的事务中奥约享有帝国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奥约也同努佩和博尔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约鲁巴人分别称这两国为塔帕和伊巴里巴。奥约似乎也同豪萨人有关系并通过豪萨人进行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通商。第三，存在其他约鲁巴人的社群和王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属何性质的问题。

伊费在约鲁巴历史中的首要地位是有许多因素作为依据的。伊费的开国元勋奥杜杜瓦被认为是从天堂或者麦加来的，他的子孙被认为是所有其他约鲁巴人国家的奠基人。对于这些传说的最近解释表明，奥杜杜瓦或者说一群移民约在1000年前来到这一地区，但土地已经被别人占领了，那些人根据伊费传说可能是伊格博人。④ 据传说，某些地名说明曾存在过许多微型国家，400左右的神的名称可能代表着统一以前的微型国家的统治者。此外，伊费的向外流动动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所有的王冠都是直接从伊费取得的。



图片15.2 尼日利亚的贝宁出土的奥巴黄铜纪念头像。根据民间传说，在约鲁巴人到来之前，统治贝宁的是神秘的奥吉索王朝，它的最后一位国王因发生暴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伊费的王子奥兰米扬，他是奥杜杜瓦的奥尼的儿子。从那时起，按照习俗的要求，贝宁的奥巴死后要把头砍下，将头颅送往伊费，埋葬在神圣的围墙里(orun oba ado)，同时铸造一个黄铜纪念头像送回贝宁放在王室祖先的祭坛上。到14世纪末，第六代奥巴奥郭拉建议从伊费请一位铸铜匠来贝宁传授技艺。据说奥尼派遣伊格海前往。这位神秘的师傅今天被铸造业行会"伊根·埃罗温"(igun eromwon)敬为开山始祖，并为他造了一座神龛。这一纪念头像两只眼睛上面的竖条纹标明性别，男性为三条，女性为四条。奥巴产生于所谓的中期，即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代表早期特色的垂直的铁的镶嵌物已不见，颈部和下颌被20条珊瑚项链掩住，所呈现的已不再是真实面目。所铸金属较厚，可能是由于铸造技术欠佳，不够精确，但更加实用，可做象牙针插座，按照习俗象牙针一般插入头饰的环形开口处。高23公分

④ A. 奥巴耶米(Obayemi)，1976年。

著名的伊费青铜器起了佐证传说的作用，证明伊费或约鲁巴国同其东面贝宁的埃多王国有关系。但是那些青铜器也把伊费同努佩和尼日尔河周围地区联系起来。人们发现在努佩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与伊费出土的大型青铜器显然十分相似。同样清楚的是，传说中的“麦加”并非指中东的任何地方，也不是指埃及或者麦罗埃，而是指尼日尔河对岸现在约鲁巴北面的地区。此外，伊费艺术已被用来同尼日利亚中部的诺克自然主义艺术进行类比，尽管两种文化存在时间上的差距(诺克文化存在于公元前900年至约公元后200年，而伊费文化的高峰期为约公元900元至1300年)。

441 奥约在约鲁巴各王国中间，不但是杰出的，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些特色是由于奥约靠近努佩和博尔古而形成的。举例说，奥约比别的约鲁巴国家无论在军队还是在社会组织中更加依靠奴隶出身的官员。奥约的武装部队之所以占据优势，也许是由于它从14 442 世纪桑海上升时期同撒哈拉以北地区进行的贸易中和同北部诸国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骑兵和弓箭手的结果。奥约可能从北面进口马匹、钾碱(kanun)、岩盐(obuotoyo)等产品，输出柯拉果、非洲酪脂树油脂和棕榈树产品。[5] 正是由于这些对外联系和处于热带草原的地理位置使奥约能给它和其他共同持有的约鲁巴人的观念进行创新。奥约人一个特有的创新是在其宗教体制中把“桑戈”(Sango，雷电崇拜)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奥约的建立通过传奇式的奠基人奥兰扬(奥兰米扬)同伊费和贝宁相联系。据说，在奥兰扬去奥约之前曾经统治伊费和贝宁。但是，这一带已经有许多其他国家，诸如伊格博米纳地区的伊沃、奥伍和奥巴；伊博洛地区的伊拉；以及奥约科罗、伊科依等国家。奥约最终把其中一些国家变成了附庸国，包括南部的奥伍和东南部的埃代。奥约的向外扩张最后被居住在森林里的伊杰沙人所制止，因为奥约的骑兵无法在林区使用。伊杰布人和埃基蒂人的山国也逃避了受奥约直接统治的命运。东边的贝宁王国是奥约扩张的另一障碍。据一种传说记载，两大国在奥滕镇栽树为界。奥约管辖着通过埃格巴人和埃格巴多人领土到海岸的商道。奥约正是通过这条约鲁巴国土西南部的道路，把它的权力扩大到达荷美。

奥约的权力是在逆境中发展壮大的。在15世纪，奥约的统治者被赶出旧奥约(奥约伊勒或称卡滕加)，曾在博尔古国的库苏并随后在伊博霍避难。无畏的奥约人改组了自己的军队，并且采取了新的军国主义政策。伊科依镇成了埃索(eso)武士们的家园，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了“作战训练”。到16世纪初，奥约重新征服了昔日的疆土并把努佩人赶了回去。奥约和博尔古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破裂了，奥约也试图向博尔古方向进行扩张。

在19世纪以前，奥约未被纳入欧洲人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形成了自己的主要体制，并独立地开始自己的扩张活动。奥约进入达荷美的冒险也许同参与沿海贸易有关。但是根据其他的传说认为，奥约拒绝贩卖奴隶贸易和不同欧洲人接触是因为他们早先就对欧洲人的口是心非有体验。他们派往海边去欢迎自称为朋友的800名使者一去未返。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奥约在19世纪之前从未使用过欧洲人贸易中引人瞩目的东西如火枪等。

---

⑤ I.A.阿金卓宾，1976年，第380页。

在奥约扩张所未能达到的约鲁巴人东边和西边的国土上，有许多小国家如埃基蒂地区的伊加拉。它们倾向于把约鲁巴人的发展同尼日尔河-贝努埃河流域的发展相联系。其他如奥沃人和伊杰布人的国家，看来同贝宁的埃多王国的关系较之同奥约的关系更多。从奥沃 444 考古中发掘的艺术品表明，截至15世纪为止，奥沃雕刻风格已同伊费和贝宁的风格有联系。此外，还有第三种独立的风格，也许是两种众所周知的风格融为一体的典范。



图片15.3 约鲁巴妇女雕像，用于对奥巴塔拉(Obatala)的创造神奥里夏(Orisha)的祭祀。她通常像该神的祭司和信徒一样，身穿白衣，手戴铁镯。此雕像戴有垂饰的白珍珠项链。她手捧大钵准备接受象征和平与安宁的贡物——白色的蜗牛血。这是创造神奥里夏的女性像，其男性像则手持扇子和蝇拂。这个托钵像不应同手托盛柯拉果器皿奥鲁梅耶(Olwmeye)的雕像相混淆，后者大得多，通常为母性跪像，所托器皿有盖。高49公分

445

尼日尔河三角洲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历史是同东至喀麦隆沿海地区和西至拉各斯泻湖及其以远地区的历史相联系的。直到19世纪，即欧洲的舶来品在不同的沿海地点造成破坏以前，商道已横跨本地区的东西南北。约鲁巴兰的伊杰布人地区生产的布已在三角洲的西部销售，看来还往东转销远达三角洲东部的嫩贝。比如说，三角洲西部的伊策基里人王国，从共同的语言看，同伊杰布人有联系，虽然伊策基里人也说他们的统治者来自贝宁王国，其政治制度亦与贝宁的埃多王国的制度相仿。伊策基里人也从他们生活其中的三角洲西部的伊乔人那里汲取了他们的某些文化价值观，并同三角洲的东部各国，特别是与嫩贝进行陶器、食盐和布匹贸易。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西部，伊策基里王国的首府奥代-伊策基里是个政治权力的中心。当葡萄牙人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伊策基里人成了他们同三角洲的主要联系，他们试图在



图片 15.4　尼日利亚的贝宁出土的17世纪青铜面具，可佩在腰间。高9.3公分

那里确立基督教并发展贸易。在福卡多斯河河口还有另一个贸易站。葡萄牙人经过三角洲西部前往乌高登大陆，成为他们同贝宁的埃多王国首都进行联系的基地。在18世纪，有些伊策基里人搬出奥代-伊策基里来到贝宁河河口建立定居点，以占据从事跨大西洋贸易的有利地位。[6] 伊策基里人主要在诸如博比这样的新的中心城镇充当贝宁王国的代理人，并凭借自己的本领成为诸如乌尔霍博人、伊索科人和西部伊格博人等内地民族的出口中介人。

尼日尔河三角洲西部的伊乔人大部分是以松散的无国家的社群形式组织起来的，并倾向于以海盗掠夺方式参与海外贸易。埃斯克拉沃斯湾的格巴拉马杜人和福卡多斯湾的奥古拉加人和伊杜维尼人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都从贸易体系中得到了好处。在这些伊乔人中发现的青铜器以及从梅英人和卡博维人中发现的青铜器都可能说明参与内、外贸易以及同贝宁和其他内陆中心地区交往所带来的富裕。



图片 15.5 尼日利亚的贝宁出土的17世纪青铜饰板，中间的武士身穿有衬垫的珊瑚装，手执矛和剑。两旁是手持盾牌的卫士。三人均戴豹齿项链，胸前挂铃。他们之间有两名矮小的乐手。高39公分

⑥ P.C. 劳埃德(Lloyd)，1963年。

三角洲中部的伊乔人构成了这一集团的心脏地带。口头传说表明从这个地区向三角洲东部、西部以及三角洲周边地区进行移民。从词汇统计学上对伊乔语同约鲁巴的中心地区语言埃多语和伊格博语之间的差距的估计来看，在三角洲建立的第一批定居点迄今已有5000年了。对三角洲东部的嫩贝附近出土的果核所进行的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揭示，446 3000年以前可能已有人类在那里生活。[7] 但是，根据语言学和口头传说的估计，目前生活在三角洲东部的社群在该地区定居距今才1000年。对凯城和塞基里波古(埃沃马)的遗址进行放射性碳测定时间，证实那里在公元800年以前有人居住。

在阿拉瓜教授对口头传说进行研究之后，阿诺齐博士和恩泽旺瓦博士又对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东部进行了考古挖掘，他们为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历史开辟了新的前景。[8] 考古发掘447 表明，那里的最早定居者已经知道利用在咸水三角洲里生长的贝壳类动物，也知道驯养某些动物。从翁约马遗址发现的大量陶器表明，当时已有复杂的经济生活，包括某些农耕活动，虽然大部分农产品是通过贸易从内地取得的。根据口头传说，当地的产品有棕榈果、胡椒和香蕉。考古发掘揭示了当时存在小规模的炼铁工业，也再次发现那里有从内地获取原料和制成品的联系。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各考古点地面上还发现了许多黄铜和青铜制品，但是只在翁约马原地发现一件盘绕物墓葬品。

现时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艺术品几乎全都是表现水神或者祖先的木雕，作为寺庙里的家具或跳舞的假面具使用。考古发掘工作中，从凯城发现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的陶制假面具，在翁约马发现了人像。这些发现在尼日利亚的赤陶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从翁约马发现的人头像中有一头像的面部使人联想起诺克和伊费人赤陶艺术对眼睛的处理。

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及此前的内地、长途贸易在形成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诸国——具体地说就是博尼、埃莱姆-卡拉巴尔(新卡拉巴尔)、奥克里卡和嫩贝等国的过程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根据口头传说，他们的国家缔造人来自早先居住的三角洲中部的淡水区，后来才适应三角洲东部的咸水区生活。这一生活适应过程包括把以捕鱼和耕种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到以捕鱼、煮盐和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在社会和政治上也作了适应性调整，在13世纪前后建立了王权体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加速了这一变革的步伐，18世纪新建立的国家形式现称城市国家或称贸易国家。[9] 从奴隶贸易所得的财富，为“阿曼尼亚马波”(a-manyamabo，国王)及统治权贵们提供了权力基础，形成了一套招募劳工、增加人口和为战斗部队招募士兵的制度。

伊格博兰

伊格博腹地的许多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人类在那里居住的历史比对该文化想象的时间要长。阿菲波的洞穴居住者制作石器工具和陶器已有5000年历史。在恩苏卡地区的遗

⑦ M.A.索旺米(Sowunmi)，1978年。
⑧ E.J.阿拉瓜(Alagoa)，1972年和1976年；F.N.阿诺齐(Anozie)，1976年。
⑨ K.O.戴克(Dike)，1956年；G.L.琼斯(Jones)，1963年。

址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在恩苏卡地区还发现了一个石器加工厂，现在正由尼日利亚大学的阿诺齐博士进行研究。看来已经确证，那里的人们早在3000年以前开始了耕作，他们种植的主要作物是薯类。其他作物还有当地的油棕、“奥克罗”（okro）、“埃古西”（egusi）和某些品种的柯拉果。木薯、水稻、可可、薯、香蕉、大蕉和其他重要的作物品种则是通过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从美洲引进的。木薯是17世纪以前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从三角洲西部向东）落户，历经二三百年之后才进入伊格博兰的部分地区。 448

恩里等地的口头传说把农业的起源寻根究源到他们的开国祖宗。制铁业也是早就建立的。通过对伊格博-乌库地方的考古发掘，这一地区的青铜器艺术也已闻名世界。[10] 其青铜器的来源，据认为是同伊费和贝宁有所不同，但在精美程度和优质上则堪与后者媲美。这些青铜器同恩里的神圣王权及祭祀中心是有关系的。恩里的祭司们对伊格博兰的广大地区行使着权力。他们有权敕封“奥佐”（ozo）和“埃齐”（eze）头衔的官员，并罢免他们不喜欢的官员。“埃齐·恩里”（eze Nri）还控制着“伊费齐奥库”（ifejioku，薯蓣力量）。很可能正是那些四处旅行的恩里祭司们带回来的收人，为青铜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所需财源。

恩里的祭司体制之所以能够在伊格博兰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因为社群是建立在封号制度基础上的小规模的组织。但是，尼日尔河西部和东岸的一些伊格博集团则采用了王权制度。他们是通过同已有类似制度的社群的接触而这样做的。阿博、奥尼查和奥古塔诸王国的“奥比”（obi），显然是从贝宁的“奥巴”（oba）王权制演变而来。这些国家由于在16和17世纪时从接受贝宁影响的地区迁来的移民而发展起来。根据口头传说，这些移民运动发生在贝宁的埃西吉奥巴统治时期（约1517-约1550年）。不妨作这样的推论：贝宁东部的战争或者其他骚乱导致一些人向东迁移，他们按照家乡的模式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实体。

尼日尔河沿岸的其他国家如奥索马里，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北面伊达的伊加拉王国。但是，伊加拉对伊格博兰的影响在阿南布拉河谷的伊格博北部和恩苏卡地区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些。那里有伊加拉袭击该地区的证据，而恩里人则声称他们同伊加拉的祖先是远亲。沿尼日尔河的伊格博诸国是最早参加海外奴隶贸易的。后来又同尼日尔三角洲诸国合作参加了19世纪的棕榈油贸易。伊格博北部的集团同伊加拉和北面的其他集团进行贸易。

伊格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具备了控制比村庄和城镇更大范围的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宗教神使的约束力。各种神使在伊格博兰的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进行过活动。这些神使包括埃切人的卡马鲁、乌木诺哈的伊格维·卡拉、奥卡的阿格巴拉以及阿罗丘库的伊比尼·奥克普比（长究究）。这后两位神使由于其他社群的积极信奉而取得了最广泛的影响。这样，在市场干活儿的、定居在伊格博兰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各地的奥卡铁匠们把阿格巴拉神使的影响广泛地传播出去。但是，阿罗丘库神使取得最大成功的原因还在于阿罗的商人们主要作为奴隶贩子把他的神谕传播到了很远很广的地方。阿罗商业网的发展，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克罗斯河口的卡拉巴尔港贩卖奴隶所致，但他们也到三角洲各国做生意，并在17世纪前后得到迅速发展。阿罗商人在伊格博兰各地建立了定居点和市场，并利用神使的谕示收 449 450

[10] T.肖（Shaw），1970年。

购奴隶。同恩里的祭司制度所不同的是，阿罗人愿意使用暴力，争取阿巴姆人、埃达人、奥哈费人、阿比里巴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武士们的帮助，并同他们分享其掠夺所得。

伊格博兰那些缺乏强大而集中的政治管理的地区在掠夺奴隶和抢劫中受害很可能最深。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各个港口以出口西非的奴隶而居突出的地位，大多数奴隶是从伊格博的内地掠夺取得的。在内部，社群和体制的破坏及不安全感也是相当严重的。



图片 15.6 尼日利亚的贝宁出土的16世纪青铜饰板，表现一位酋长佩戴着标示其权位的装饰：用珊瑚珠编成高项圈的头饰、豹齿项链、手镯和脚镯。他不是奥巴，因为他胸前戴有国王不戴的保护战铃。用豹子头装饰战袍据信是为了吓唬敌人。他身旁是两名武士，一个吹号，一个击双铃，还有一名裸体的仆人手执礼仪宝剑。这三个人虽然近在身旁，但是较小，表示他们不重要。画面上的葡萄牙人，头戴钢饰头盔、长头发、有胡须，身穿纽扣制服，表明装饰板可能是奥巴埃西吉时代的制品。1515年，他在与伊加拉的阿塔(Ata)发生的战争中曾接受葡萄牙人的军事援助。背景上的四叶瓣雕刻图案称为“太阳不会忘记每一天”(owen iba ede ku)，与水神奥洛孔(Olokun)有关。在贝宁的奥巴王宫的各个庭院里，支撑天篷的矩形立柱上这样的饰板数以百计。它们的排列表示着各种复杂的主题。高45.7公分

克罗斯河谷和喀麦隆人

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之间在语言和历史渊源上表现出亲缘关系。大多数语言同班图语有联系，形成了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庞大的班图语向西部非洲西北方向的延伸部分。

克罗斯河流域的最大民族是伊比比奥人。他们在那里定居时间已久，对于他们从外面迁移到此地的任何传说已失去记忆。河谷北部的奥戈贾地区被许多不同的民族所占据。他们有种种从贝努埃河流域北部或者从喀麦隆迁徙而来的传说。在伊比比奥人的某些社群或者同他们有紧密关系的如尼日尔河三角洲东缘的安多尼人和伊贝诺人(伊布诺人)也自称他们祖先的家园在喀麦隆。与此相似，喀麦隆的某些社群，如伊桑吉利人也是源于伊比比奥人。

这一地区的社群大体上是按照很复杂的非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组织起来的。同龄人组织以及秘密会社提供了有效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控制。在伊比比奥人中间，“埃克波”(Ekpo)秘密会社是分布很广的秘密组织之一。但是克罗斯河流域北部和喀麦隆的姆格贝(Mgbe,豹子会社)变成了克罗斯河口的埃菲克国的“埃克佩”(Ekpe)是最有名而且组织最为正规的秘密会社。

埃菲克人同伊比比奥人有密切的关系。克罗斯河西岸的乌鲁安-伊比比奥是他们紧邻的家园。有些传说声称他们从前曾居住在伊博姆，靠近伊格博兰的阿罗丘库。他们由于战争面离开了伊博姆。这场战争涉及阿克帕，他们可能和朱昆人一样，同贝努埃河谷的同名社群有关系。这些同埃菲克国的早期联系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最后于17世纪初在伊科特-埃滕科(小港镇)、奥布通(老镇)和阿塔克帕(公爵镇)定居下来，使那些地方成了该地区的海外奴隶贸易的重要中心。

埃菲克人在克罗斯河下游建立的国家——现称卡拉巴尔——出口伊格博内地的奴隶。451 这些奴隶是通过神使和传教士掠取的，并在阿罗丘库集中起来。在卡拉巴尔出卖的奴隶，大多数是伊比比奥人或者是克罗斯河流域或喀麦隆人毗邻地区各集团的人。

奴隶贸易是使伊比比奥人的秘密会社“埃克波”和埃科伊人的秘密组织“姆格贝”在卡拉巴尔改组成为“埃克佩”的部分原因。“埃克佩”变成为自由贵族分子的一种阶级联合会，用来控制奴隶阶级和穷人。“埃克佩”还强行实施政治和社会的规章制度，索取债款和强行实施命令。在奴隶贸易和横跨大西洋的联系的共同影响下，卡拉巴尔产生了以家系世袭为基础的组织，近似三角洲东部各国的家族。可是，卡拉巴尔把大多数奴隶关在大陆的农场里而与世隔绝，同三角洲各国把奴隶融合在“埃基尼”(Ekine)或“塞基亚普”(Sekiapu)的公开的面具舞会社是有所不同。

喀麦隆海岸最重要的民族是西北班图族的克佩人-姆博科人、杜亚拉人、林巴人和坦加人-雅萨人。那里有许多渔民、农夫和猎人群体。大多数以小村庄为单位组织起来，但到了18世纪，布比人、杜亚拉人和伊苏伍人已组织成较大的政治单位。这些集团或者同奴隶贸易有关系，或者利用了奴隶贸易。这样，喀麦隆河变成了克罗斯河口以外奴隶贸易的小型中心，两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秘密会社也是对社会和政治实行控制的焦点，在杜阿拉人、伊苏伍人和其他邻近的集团里，以膜拜水神为基础的“任古”(Jengu)成为声望最高的秘密会社。

结　论

在15至18世纪，对这一沿海沼泽和雨林地区历史的主要外来影响无疑是海外的奴隶贸易。可是，同久已存在的内部变革因素进行比较，要确切估计奴隶贸易的作用，则是困难的。

在许多口头传说中，奴隶贸易带来了财富和人口，被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活动。对于作为中介人参与活动的沿海各社群来说，他们没有参加猎取奴隶的活动，也没有为奴隶而战，只是从别人手里买进奴隶，再出售给奴隶收购船，也增加了当地的人口。尼日尔河三角洲国家和卡拉巴尔的埃菲克国属于这一类国家。对他们来说，奴隶贸易主要是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因素。在社会变革上是融合和控制奴隶，在政治变革上是通过财富和人力的差异导致实力基础的变化。

达荷美的丰人王国提供了参与奴隶贸易的第二种范例——积极购买奴隶。在伊格博兰，阿罗人和他们的雇佣兵盟友扮演了类似的掠取奴隶的角色。这些社群从奴隶贸易中获得好处，但是牺牲了自己的社会、政治和道义制度的正常发展，这些都在获取奴隶的暴力中遭到了破坏。

452

受到奴隶贸易影响的第三类社群是受害者。大部分奴隶都是从他们中间掠取并到沿海出卖，包括约鲁巴兰、伊格博兰和伊比比奥兰的部分地区。这些社群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大都由于掠夺、抢劫、战争和人类生命价值的普遍下降而遭到破坏。村庄遭捣毁或者拆散，农庄荒芜，人们生活在恐怖之中。

面对这一悲惨的画面，有时也有人分辩说，奴隶贸易使非洲的这些热带地区脱离了孤立状态。从前他们远离欧洲的文化中心，而今天他们已站在启蒙和同世界其他部分相联系的前列。正是奴隶贸易把这些社群带进了国际经济之中。此外，引种玉米、木薯、稻米等粮食作物也可看做对人口平衡问题的调整，使人口能有所增加。这些都是猜测性的假设。对这个地区的非洲人来说，奴隶贸易时代是一场噩梦，最好把它抛入黑暗的记忆深处。

（叶正佳　译）

16 豪萨诸国

D. 拉雅

导　言

453 本章所讨论的地区如今很容易与有关财富的思想相联系。有位作者认为在第四卷中所涉及的经济潜力应加上另外两个因素：第一，豪萨兰作为谷物、皮革和铁的生产者以及黄金和柯拉果的消费者与附近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西非经济一体化方面，有热带大草原上的万加拉人、豪萨人和卡努里人，以及森林中的芳蒂人、比尼人、伊乔人和阿罗丘库人。①

有关该地区在1500至1800年间的发展，可用的文献资料质量参差不齐。关于豪萨诸国的原始资料差异极大。一类文献包括作者亲眼见证的报告、考察和参考书籍，对报告和考察都可以争论。② 除了这些比较容易获得的综合性的出版物之外，还有一些主要由该地区的研究人员撰写的论文，其学术水平参差不齐。③ 第三类包括一些正式研讨会的记录。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各国的专家，讨论的范围包括历史和考古。会议的记录几乎总是公开发表的。④ 最后是一些以英语或豪萨语发表的文章中的直接有关人员的观点。⑤ 以《卡诺编年史》为例，很久以前发表的英文版中的错误在豪萨文版中得到纠正，但仍存有对原始 454 文件的误译，以及印刷错误。这些材料的新版本是很亟需的。无论如何，对它们的讨论更突出了其特殊性质。这些讨论表明了现代研究的活力和严肃性，不断提出的各种疑问保证现有的缺陷会逐步得到改进。

---

①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295-296页；M. 阿达穆(Adamu)，即将出版。

② J. 蒂尔胡(Tilho)，1911年；Y.F. 乌沃伊(Urvoy)，1936年；利奥·阿非利加纳斯(Leo Africanus)，1956年；奥-萨迪(al-Sadi)，1964年；E. 塞拉·德里维埃斯(Sere de Rivieres)，1965年；B. 哈马(Hama)，1966年；H.J. 费希尔(Fisher)，1975、1977年；J.F.A. 阿贾伊(Ajayi)和M. 克劳德(Crowder)，1976年；J. 基-泽博(Ki-Zerbo)，1978年；T.H. 霍季金(Hodgkin)，1979年；O. 伊凯姆(Ikime)，1980年；M. 希斯凯特(Hiskett)，1984年；M. 卡蒂(Kati)，1913-1914年。

③ B. 哈马，1966年、1967年a、1967年b、年1968年、1969年；M. 阿达穆，1968年；M. 奥卡里(Alkali)，1969年；M.H. 皮奥特(Piault)，1970年；A. 萨利福(Salifou)，1971年；G. 尼古拉斯(Nicolas)，1975年；D.M. 哈马尼(Hamani)，1975年；N. 埃查德(Echard)，1975年，第34-97页；M. 卡里穆(Karimou)1977年；G. 纳-达马(Na-Dama)，1977年；M. 阿达穆，1978年；Y.B. 乌斯曼(Usman)，1981年；M. 萨雷(Saley)，1982年。

④ Y.B. 乌斯曼，1979b年；Y.B. 乌斯曼和N. 奥卡里，1983年；B.M. 巴金都(Barkidou)，1983年；M. 阿达穆，即将发表；H.W. 艾尔-哈桑威（EL-Hasanwi），1982年。

⑤ H.R. 帕尔默(Palmer)1967年；M.A. 哈吉(al-Haji)，1968年；A.A. 多卡吉(Dokaji)，1978年；Y.F. 乌沃伊，1978年；R.M. 伊斯特(East)，1979年；关于讨论，见M. 拉斯特(Last)，1983年和即将发表；见M.G. 史密斯(Smith)，1983年。

在上述某些出版物中，或许可以找到有关努佩和夸拉拉法的间接参考资料。目前，在已故的穆萨·伊德里斯[6] 的论文发表之前，要提供关于博尔古的新信息是很困难的。

文献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能将各政治实体都同样详尽地对待：这是研究格局参差不齐的结果，或许也是由于在论述的这段时期内，博尔古、夸拉拉法和努佩起着相当边缘性的作用。

豪萨诸国

政治发展

无论何时研究1500年后的中苏丹，说明西苏丹，即马里和桑海以及加奈姆-博尔努帝国的特殊影响已成为惯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还存在一些疑惑，特别是要与14世纪的历史联系起来。[7] 16世纪以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在阿兹宾的运动开始——正在进行的研究[8] 可望解释为什么阿兹宾在其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如此被人觊觎。对“萨拉昆南·诺马”(sarakunan noma,作物之主)、皇帝、[9] 试验甘蔗作物的加奈姆的“马伊”(mai,国王)，和将偷“卡非”(kafi)的强盗砍头的马里的“曼萨”(Mansa,皇帝)，也存在着一种怀旧之情。确实，战争要在另一种规模上爆发并要成为一种事业，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消耗由生产者的 **455** 劳动所积累起的贮备。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西苏丹和东苏丹更为著名，在中苏丹发生变化之前几乎无人注意。无论如何，中苏丹很快就被结合到将西苏丹各社会和穆斯林世界联合在一起的商业和意识形态体系之中。从其与邻国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其政治的发展，如和卡诺及卡齐纳之间的冲突，以及卷入凯比、赞法拉和戈比尔之中的插曲。

这里采用的编年史框架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除了一些困难和偶尔意见不一致，这种研究提供了对全局形势极富想象的看法。[10] 对下列三个阶段可以作出区别：

(1) 1500年到1620年，诸国实力增强，但在卡诺和卡齐纳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而凯比在豪萨兰西部仍然是主宰力量。关于与其邻国的关系，桑海已被彻底消灭，博尔诺的马伊只能对萨尔金·卡诺穆哈默德·基索奇(1509-1565年)难以称做贵族的行为表示厌恶。

---

⑥ 见J.隆巴德(Lombard)，1965年。O.巴戈多(Bagodo)，1978年；D.M.德勃鲁(Debourou)，1979年。我们对M.伊德里斯的论文抱有很高的期望，特别是因为它已被委托给具有最高声望的专家们；参见M.阿达穆，1979年，注㉓。

⑦ 马里权力扩张的范围包括塔梅卡或者塔凯达：这是伊本恩·赫尔敦提出的论断，但被H.J.费希尔所否定，1977年，第265页。这是萨库拉曼萨在朝圣回途中去世的地方，参见D.兰格(Lange)，1977年，第73页，注⑲(4)。同样，根据伊本·赫尔敦的一位提供信息人所说，扎盖指的是塔克鲁尔。如果这是伊本·巴图塔所指的从塔梅卡向其出口铜的那个国家的名字，它或许应该与桑海、扎加瓦或更简单地说扎盖——比尔宁卡齐纳的原名相一致；参见J.M.库奇(Cuoq)，1975年，第319和343页；M.拉斯特，1983年，第73页。

⑧ D.哈马尼，1975年。

⑨ J.M.库奇，1975年，第209页(加奈姆)，第266-267页(马里)。

⑩ H.R.帕尔默，1967年；M.奥卡里，1969年；G.纳-达马；1977年；D.兰格，1977年；Y.B.乌斯曼，1978年和1981年；I.梅卡索亚(Maikassoua)，1982年。

(2) 1620年到1730年，卡诺逐渐成为哈里发的统治区,[11] 当时，在凯比衰落之后，赞法拉和戈比尔正在巩固地位，而夸拉拉法正进一步加强其进攻能力。

(3) 1730年到1808年，此时期以赞法拉的崩溃和戈比尔达到其权力的顶峰为标志。

与毗邻地区的关系

尽管对豪萨地区与近邻的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其解释仍存在某些争议。

就桑海[12] 来说，过分强调了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统治的重要性。经济和政治问题可以从卡诺的资料来评估，根据那些资料，阿卜杜拉·布尔加(1438-1452年)开辟了格万贾-卡诺-博尔诺路线，当时桑尼斯人正在整顿其帝国的西部。因此，或许可以接受库贝尔的观点，即阿斯基亚“只知道一条”与沿东部路线进行的贸易增长相反的“路”，即通过用军队征服的方式来控制这一地区。他在阿兹宾的运动的主要成果就是凯比在1516年作为 456 一个独立国家出现。桑海随后企图再次控制凯比。[13] 大约在1533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二世本坎·基里埃(1531-1537年)率领军队远征。“坎塔给对手以蒙受羞耻的打击，致使其率全军而逃……王子到达了卡戈，此后，阿斯基亚再也没有率军对坎塔进行远征。”事实上，在阿斯基亚·达乌德(1549-1583年)统治时期，组织了另一次远征，于1553年缔结和平协定结束了这场冲突。坎塔·达乌德(约1589-1613年)为桑海抵抗运动提供庇护和帮助，任凭摩洛哥素丹的威胁，他没有屈服，对他的军事力量充满信心，或许也是想用智谋来对付桑海人，就如他们曾支持第一位坎塔并在他的朝廷由一位高官“古尔马”(Gulma)[14]作代表。

阿兹宾[15] 要为凯比和博尔诺的冲突制造借口。后者大约在1532年征服了阿加德兹，与各种图阿雷格人集团缔结条约并任命一位代表，因此扩大了影响。由于凯比连续不断的袭击，1561年博尔诺受邀援助阿兹宾。他们在苏拉姆取得了最初的胜利，后10万人的博尔诺军队被迫撤出，坎塔在恩古鲁将其击败，而自己却在回途中死于卡齐纳的一个村子里。[16] 之后，在该世纪末，一场王朝危机突然出现在阿兹宾。尤素福被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约1601年)废黜之后，请求坎塔·达乌德的支持。后者希望保持其影响，被迫两次帮助他打败对手，而对手是博尔诺支持的。这种成功制止了马伊对阿兹宾的企图,[17] 在穆罕默德·穆巴拉克(约1653-1687年)统治时期阿兹宾达到顶峰。在1674年，利用戈比尔和豪萨兰东部地区(卡诺和卡齐纳)之间以及赞法拉和凯比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穆罕默德派出

---

[11] M. 拉斯特，1983年，第67-91页。

[12]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2章，第280-290页；L.E. 库贝尔(Kubbel)，1974年，第97页。

[13] 萨迪(Al-Sadi)，1964年；第146-147页，168页；J.O. 亨维克(Hunwick)，1976年，第285页。1590年前的政治情况，见Z. 德拉马尼-伊西夫(Dramani-Issifou)，1982年，第186页、207页、218-219页。对《凯比编年史》所述存在一些保留意见；M. 奥卡里确定坎塔一世在1554年去世，萨迪认为在1561年；本作者选定第一个日期。

[14] M. 奥卡里，1969年，第62-63页。

[15] J.O. 亨维克，1976年，第283-284页；H.J. 费希尔，1977年，第266页，见本卷第17章。

[16] Y.B. 乌斯曼，1981年，第31-32页，见本卷第17章。

[17] M. 奥卡里，1969年，第76页；J.O. 亨维克，1976年，第283页。

了一支由其儿子阿加巴率领的远征军，他征服了阿达尔并因此加速了凯比的衰落。[18] 此后，就交由赞法拉和戈比尔来消除阿兹宾在宽尼地区的影响。1675年，赞法拉的军队设下埋伏并屠杀了约700名克尔-埃威·图阿雷格人。同年，阿兹宾进行复仇，赞法拉在战场上留下上千具尸首。在同一地区进行掠夺的戈比尔，在大约1689年，受到阿兹宾的进攻并被击败。最后,已经成为素丹的阿加巴于1721年向苏拉姆进军,并杀死了坎塔·阿赫马杜。1722年凯比朝廷撤向西部地区。然而，阿兹宾逐渐进入王朝危机和灾难的时期，这就让赞法拉和戈比尔占据了领导地位。

1561年前，博尔诺地位强大，萨尔金·卡诺阿卜杜拉希(1499-1509年)受马伊的攻击而采取屈从的态度，促使侵略者离开。要描绘当时卡诺的政治气候是困难的，唯一可说的是奥瓦太后设法遏制了由达加西煽动的暴乱。达加西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曾经是朝廷里的高官。动乱的原因尚不清楚。萨尔金的继承人穆罕默德·基索奇(1509-1565年)冲向博尔诺的恩古鲁城，命令只可没收马匹和衣物。由于受到袭击，第二年马伊采取主动，进攻卡诺，但再次被迫撤军。[19] 近来，有两位历史学家对此事进行了评论。[20] 进一步仔细考察两个国家的内部形势，可以看出卡诺因与卡齐纳长期斗争刚刚获胜，而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约1497-1519年)则不得不巩固其胜利成果。基索奇所给予的羞辱是当时卡诺力量的标志，那时博尔诺正遭受内部争斗和连年饥荒：对卡诺的第二次进攻似乎发生于伊德里斯·阿拉沃马(1564-1596年)时代之前。

不久，卡诺受到夸拉拉法的不断进攻，1582到1618年间，卡诺人被迫在道拉寻求庇护。1653年卡诺的君主再次被驱走，卡诺人于1671年又一次在道拉避难。根据帕尔默的说法，卡诺和卡齐纳(约1649-1651年)之间签订和平条约是出于对夸拉拉法人的担心。1680年，夸拉拉法人终于被博尔诺打败。[21]

为保证客观真实，叙述处于不同政治发展阶段的各国政治形势时须留有余地，除了他们从掠夺中获得的利润，这些冲突显示了在强大的近邻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

争夺霸权

利奥·阿非利加纳斯将卡诺描绘成一座城市，其“居民由文明的手工艺人和富有的商人组成”。相反，卡齐纳王国被看成是农村并且很穷。应该想到格万贾-卡诺-博尔诺路线在1438到1452年间已经开通。此外，在15世纪，阿加德兹已经取代塔凯达而成为商队的

---

[18] M.奥卡里，1969年，第78-84页；R.A.阿德莱耶(Adeleye)，1976年，第585-586页；D.M.哈马尼，1975年，第91页；G.纳-达马，1977年，第217-225页。

[19] H.R.帕尔默，1967年，第112-113页。英文本和豪萨文本之间存在一点分歧，如果不是印刷错误的话，豪萨文本认为达加西(Dagaci)要去卡格拉(一个村庄)。

[20] Y.B.乌斯曼，1983年，第181-184页；M.拉斯特，1983年，第86-74页。博尔诺的形势，见D.兰格，1977年，第79-81页；本卷第17章。

[21] H.R帕尔默，1967年，第83、116、121-122页。

中心，由此而使卡齐纳成为穿越撒哈拉商队路线的终点站，并成为整个豪萨兰的贸易中心。[22]

根据近来的一篇文章，对那种认为两国间的军事冲突是为了争夺对穿越撒哈拉商路终点站的控制权的说法应重新考虑——对这些战争的性质和规模、它们的政治背景或大体情况都一无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冲突进行重新考察，如果可能的话，说明他们的过程、侵略者的名字以及冲突的地点，还有内外的政治形势。

第一次冲突[23] 爆发于鲁姆法(约 1463-1499 年)统治时期。鲁姆法积累了大量财富，使他在处处是陷阱的反对卡齐纳的战争中成为第一个由宦官保护并委以他们官职的人，尚不知道冲突的原因，但知道考劳、易卜拉欣·苏拉和阿里尤·穆拉比特相继在卡齐纳进行统治。正是由于这些君主，战争持续达 11 年之久而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阿布·巴克尔·卡多(约 1565-1573 年)时代，当时易卜拉欣·巴旦卡里(约 1565-1573 年)统治卡齐纳。卡齐纳人进军到卡诺的大门前，并在萨兰塔扎营，打败卡诺后返回。

为报此仇，穆罕默德·沙西里(约 1573-1582 年)组织了一次讨伐卡齐纳的远征，当时卡齐纳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瓦利(约 1575-1587 年)。战斗发生在坎基亚，离卡齐纳不远。据说，“卡齐纳人胜利了，因为他们的人数超过敌人。”随后，在卡诺爆发了内战，虽然君主免于一死，但却被废黜了。

最初的这三次冲突似乎有充足的政治理由。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对卡诺的进攻失败了；卡齐纳人冲到卡诺的门前，试图获取胜利。可随后，卡诺却冲到离卡齐纳不远的一个地方，将其打败。至少有一份卡齐纳资料[24] 称曾一度处于卡诺的控制之下。

下一次冲突爆发[25] 于卡诺的穆罕默德·扎基(约 1582-1618 年)统治时期。在卡齐纳，**460** 穆罕默德·瓦利(约 1575-1587 年)由苏莱曼(约 1587-1600 年)和乌斯曼·纳伊纳瓦(约 1600-1618 年)继承，至于以后发生的情况有些混乱不清。或许有一次王朝变更，因为编年史并不准确。然而，卡齐纳如此强大，卡诺担心自己会受到攻击。一位作者强调说，卡诺采用了朝廷高官们的建议，在进攻前，出于谨慎而以“科卡纳”(Cokana)和“迪尔基”(Dirki)作为护身法宝。尽管如此谨慎，夸拉拉法人还是侵略并打败了卡诺，使其元气大伤。此后不久，卡诺的穆罕默德·扎基与乌里玛商谈，以很高的价格获得一个法宝。有了适当的保护，卡诺开始进攻卡齐纳的军营，并最终取得胜利。

穆罕默德·纳扎基(约 1618-1623 年)接掌权力后即向卡齐纳提出和平建议。然而，卡齐纳断然拒绝并开始进攻，遭遇战发生在卡拉耶，离卡诺不远，卡齐纳战败。卡诺的“瓦姆贝”(Wambai)坐镇卡拉耶，他从那里发动了对卡齐纳的连续进攻。[26]

---

[22] 利奥·阿非利加纳斯，1956 年，第 2、476-477 页；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09 页；J.o. 亨维克，1976 年，第 276-276 页；R.A. 阿德莱耶，1976 年，第 562-563 页。

[23]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1-112 页，第 115-116 页。阿卜杜拉希·马哈迪最近关于卡诺的论文尚无法查阅。

[24] I. 丹库苏(Dankoussou)，1970 年，第 28 页。

[25]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81 页，116-117 页；I. 丹库苏，1970 年，第 30 页；R.A. 阿德莱耶，1976 年，第 580 页；Y.B. 乌斯曼，1978 年，和 1981 年，第 63 页。

[26] R.A. 阿德莱耶，1976 年，第 581 页；Y.B. 乌斯曼，1981 年，第 3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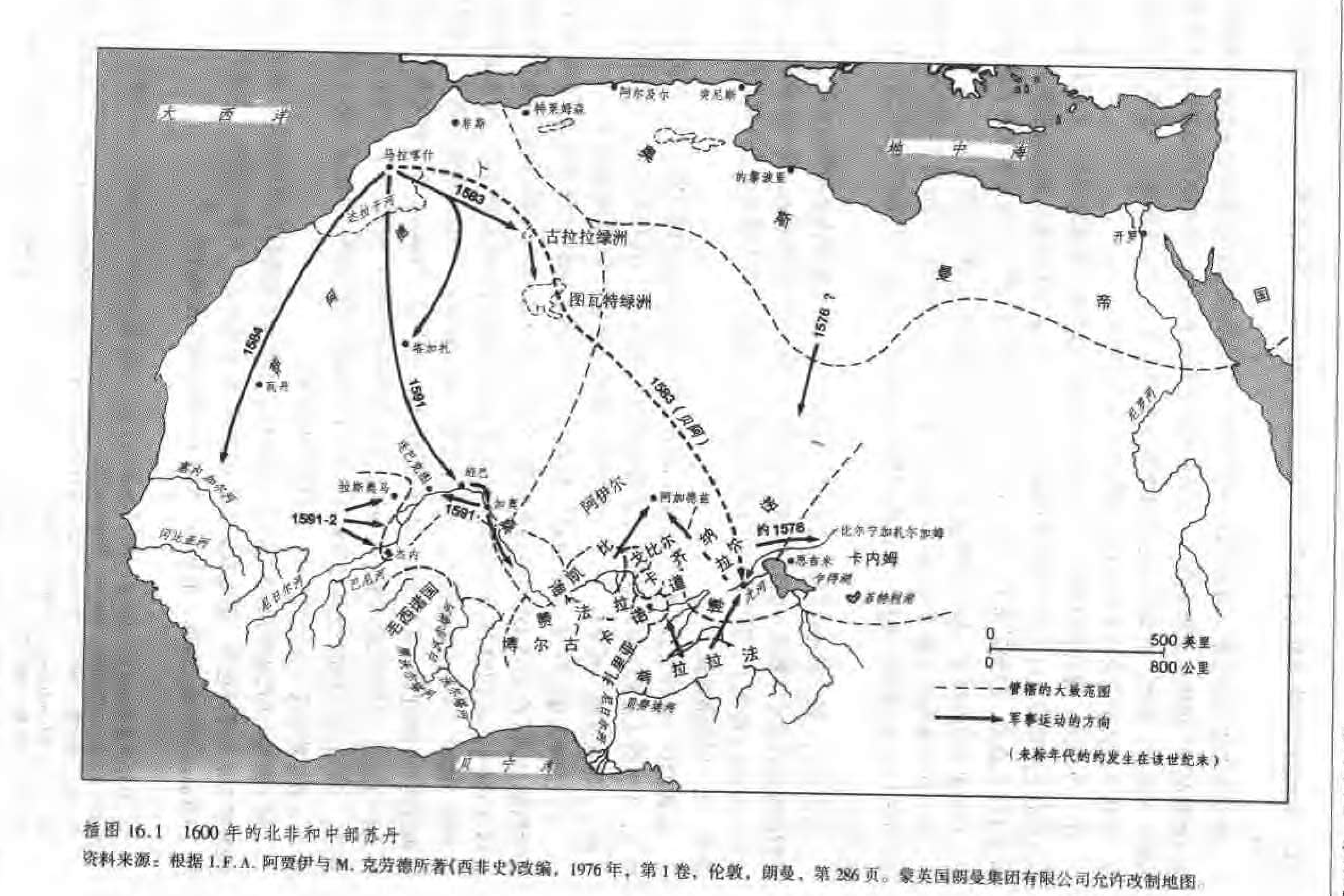


插图 16.1 1600年的北非和中部苏丹

资料来源：根据 I.F.A. 阿贾伊与 M. 克劳德所著《西非史》改编，1976 年，第 1 卷，伦敦，朗曼，第 286 页。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制地图。

在库通比(约 1623-1648 年)统治下，卡诺的贝库·丹·库通比王子保持着对卡齐纳的压力。他用 90 名身披铠甲的骑兵和 600 匹马抢劫了一个城镇。之后，另一场冲突爆发，借口是卡诺派往卡齐纳的一位使者的奴隶在卡齐纳被杀。库通比在杜加扎瓦建立了营寨，长期包围卡齐纳。然后，他组织了第二次远征，但他的军队遭到突袭而被赶跑，他本人则在卡齐纳-卡诺边境的鲁马拉瓦被杀。库通比的继承人哈吉吉在 8 个月之后被废黜，而他的继承人，什卡劳(约 1649-1651 年)，在由乌里玛主持的谈判之后，设法谋求和平。卡齐纳的权力被穆罕默德·瓦利(约 1631-1641 年)、穆罕默德·乌班·亚拉(约 1641-1671 年)和穆罕默德·简·哈佐(约 1671-1684 年)进一步巩固，与卡诺的和平条约没有被破坏。[27]

对东豪萨兰的控制权曾有一场长期的政治争夺战。如上所述，必须考虑博尔诺和夸拉拉法的邻国，而另一有关的因素是西豪萨兰的形势。

插曲

461

直到 16 世纪末，凯比不惧怕任何敌人，甚至是摩洛哥也毫不畏惧。对凯比巩固地位有利的特定因素，一位作者认为是人口的混血种、反对桑海的统治达到极端化、以及军事领导人对保持独立的重视。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凯比侵略了这一地区或者对桑海提出领土要求[28]

确实，是凯比的独立改变了里马盆地的政治地图：东北扎尔马的并入使赞法拉不能掠夺这一地区。[29] 这就引起了在扎尔泰统治下的一系列冲突，扎尔泰是在塔里图(约 1531 年)之后掌权的，他在该世纪中叶领导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进攻，此后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这样就减去了凯比的压力，凯比 1516 年打败了博尔诺从而在豪萨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它迅速成为豪萨世界最可怕的军事大国"。[30] 它与诸国的政治关系的确切性质尚不得而知。某些作者认为大部分国家向坎塔进贡，但有人不同意。例如，赞法拉只有一次受到凯比的攻击，并且没有证据表明赞法拉曾是凯比的附庸。无论如何，两者皆有理由惧怕戈比尔。[31]

戈比尔的首都已从阿兹宾迁到豪萨兰的比尔宁拉勒，位于古尔宾塔尔卡的人口密集和灌溉良好的地区的中心，可能建于 1450 年左右。统治者在那里一直统治到 1600 年，是年图阿雷格发动了一场进攻，这次进攻导致了一次大屠杀。戈比尔人被迫再次流离失所，向

---

[27]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8-119 页；R.A. 阿德莱耶，1976 年，第 581 页。

[28] M. 奥卡里，1969 年，第 58-67 页。

[29] 最近获得的有关赞法拉的情况来自 G. 纳-达马，1977 年；关于赞法拉与凯比的关系，参见第 220-228 页。

[30] D.M. 哈马尼，1975 年，第 83 页。

[31] 关于戈比尔的"萨劳塔"(Sarauta)制度的情况是由伊本·巴图塔提供的，见 J.M. 库奇，1975 年，第 323 页。作者引用一位见证者的话说，君主和他的几名随从埋在一起，此处还有奴隶以及一些名人的 30 个儿女。这件事惊人之处在于该传统的宗教方面，尽管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考古研究无疑将最终确定戈比尔首都的地点。新的情况和 1700 年前的编年史来自梅卡索亚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所期待，特别是由于戈比尔是令研究者极为感兴趣的课题，例如 J.E.G. 萨顿(Sutton)，1979 年，第 192-195 页和 G. 尼古拉即将出版的著作。

着更南边的古尔比马拉迪的库番·库图鲁和希萨陶的方向进发。(希萨陶的最后一位君主[32]穆罕默德·马伊·基希，在那里被卡齐纳的统治者所杀，因卡齐纳的统治者担心其领土受到侵犯并失去对卡齐纳-特萨瓦-阿兹宾路线的控制)。戈比尔人后来挣脱出来，奔向西北并建立了“新的”瓜兰·拉马(约1685-1690年)。乌班·多罗从瓜兰·拉马发动了对凯比的进攻，甚至攻击约鲁巴兰和古尔马，其继承者索巴则攻击阿达尔、凯比和马拉迪。然而他也和赞法拉建立了友好关系，赞法拉将奥卡拉瓦对戈比尔的农民和商人开放。

戈比尔逐渐向南扩张，使政治背景发生了另一种变化。凯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与繁荣，直到“旧的军事贵族……因以金钱为基础的新贵族而黯然失色”。[33] 凯比开始衰落，而赞法拉日益强大起来。在17世纪中叶，赞法拉由若干强硬的君主统治，这些君主得到伊斯兰的支持；从他们与卡齐纳的关系可以判断他们所处的地位，[34] 这种关系一直很好，直到有一天赞法拉的一位王子被穆罕默德·乌班·亚拉(约1641-1671年)所杀。萨尔金·赞法拉·扎乌代打算报复，但朝中的高官们反对，他们认为两国关系良好。然而，扎乌代的死使计划终止。选举团任命其兄弟阿利尤继承其位，成为赞法拉第一位穆斯林君主。他在镇上建立了清真寺，无疑，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卡齐纳的传播。赞法拉此后停止了零星分散的袭击，而将其力量对准凯比的主要城镇。1647年，苏莱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凯比的军队虽拥有6000名士兵和阿达尔分遣队的支持，却被打得飞奔而逃，许多人被俘。同年，凯比失去了阿达尔，从上述可见它是被阿加巴王子夺走的。那是一系列互不相连的打击，而不是阿兹宾、戈比尔和赞法拉的统一行动。[35] 赞法拉成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由骑兵司令雅库布·丹·马祖卢指挥在雅加纳战胜卡诺军队显示它的实力。当时卡诺正处于穆罕默德·谢里夫(约1703-1731年)统治时期。战败之后，穆罕默德·谢里夫围绕许多城镇建立了壁垒。[36]

赞法拉就这样从其在阿兹宾手中遭到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但戈比尔的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在他的统治下(昆巴里，约1731-1743年)，卡诺和戈比尔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戈比尔萨尔金(Sarkin)名叫索巴。每次戈比尔人攻击并战败卡诺人，后者都会在第二年进行复仇。这种转换格局持续了很长时间。”[37] 索巴的继承者易卜拉欣·巴巴里(约1741-1770年)，派代表团前去与哈吉吉·卡比(约1743-1753年)谋求和平，但遭到拒绝。一年后，巴巴里主动出击。“由于巴巴里的魔力”，在杜米的遭遇战对卡诺来说完全成了一场混战，双方的相互屠杀直到卡比死去才告结束。戈比尔很快感到萨尔金·赞法拉对其施加的各种限制的分量。赞法拉对躁动不安的邻国感到担心。起初，戈比尔满足于一次又一次地骚扰敌

[32] I. 梅卡索亚，1982年，第39-45页。J. 蒂尔胡的研究结果(1911年)与Y.B. 乌斯曼，1978年和1981年，认为这些事件一定发生在苏莱曼(约1587-1600年)统治初年至卡齐纳君主乌斯曼·查加拉纳(约1600-1618年)统治结束时期。

[33] D.M. 哈马尼，1975年，第85页。

[34] C. 纳-达马，1977年，第231-234页；Y.B. 乌斯曼，1981年，第30-31页。

[35] M. 奥卡里，1969年，第78-79页；D.M. 哈马尼，1975年，第91页；G. 纳-达马，1977年，第224-225页。

[36] H.R. 帕尔默，1967年，第123页，C. 纳-达马，1977年，第240-245页。

[37] H.R. 帕尔默，1967年，第124-125页。

方，但后来，利用一次王朝危机，它在大约1762年挫败了比尔宁赞法拉。[38]

这种变化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东部，[39] 19世纪即将开始之时，建立了达马加拉姆素丹王国，同时，佐策巴基诸国也在随之而来的分裂到来之前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个标志着博尔诺与豪萨兰相互转变的地区，对政治和文化运动极为敏感。

在西北部，对阿达尔的历史知晓较多。[40] 然而，它与库尔费有什么联系尚不清楚，在有关叙述中，有的认为库尔费与阿达尔有联系，有的则认为与博尔诺有联系，尽管阿雷瓦地点上的接近表明是后一种情况。对这一地区政治权威建立的年代存在很大争议，但可确认有时是博尔诺王朝，有时则是道拉王朝。

根据扎尔马和戈比尔人的传说，[41] 扎尔马(桑海帝国的最东部)最先与豪萨兰建立了联系，当时戈比尔是阿兹宾的一部分。在此时期，凯比、赞法拉和戈比尔都在这一区域打仗。据认为，凯比在1722年被消灭。然而，此前它在扎尔马塔雷具有决定性的政治作用，在那里，它的名字是与身穿“立飞迪”(lifidi,一种缝制的防护衣)的骑兵联在一起的，这种骑兵带来的是恐怖与废墟。

最后，在西部，在尼日尔河的“右”(gurma)岸，一些古尔曼西巴王朝声称发源于中苏丹、博尔诺或豪萨兰，这种说法似乎被考古发掘所证实，至少对沿着豪萨或左岸的地区是如此。[42]

南部由于被凯比、雅乌里、努佩和博尔古所占领，尚不能清楚地判断扎尔马-桑海人民的成长与巩固。在该地区的神话中，最强大的神有“曼达·豪萨考伊”(Manda Hausakoy)，一位来自雅乌里的渔夫兼铁匠，和“东戈”(Dongo)，一位博尔古的猎人，其力量与约鲁巴文化中的“桑戈”(Shango)相同。[43] **465**

无论如何，在1762年赞法拉被打败之后，局势相当平静。卡齐纳除了一次国内危机外，意图要打败戈比尔，而在卡诺，[44] 拜巴·扎基(约1768-1776年)被迫去恐吓他的合作者。

政治和行政组织

尽管出现了规模惊人的军事冲突，但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在惨败之后，凯比和赞法拉

---

[38] G. 纳-达马，1977年，第378-386页。

[39] 关于达马加拉姆，见A. 萨利福，1971年，第31-42页；关于佐策巴基诸国，见M. 萨雷(Saley)，1982年，第24-58页。

[40] 关于阿达尔，见D.M. 哈马尼，1975年，第25-125页与N. 埃查德，1975年，第34-97页；关于阿雷瓦，见M.H. 皮奥特，1970年，第49-124页与M. 卡里穆，1977年。

[41] 关于戈比拉瓦和扎尔马的关系，见B. 哈马，1967年a，1967年b，和1968年；B. 加多(Gado)，1980年；和I. 梅卡索亚，1982年；关于凯比在扎尔马塔雷的影响，见M. 奥卡里，1969年，第90-96页。

[42] 见G.Y. 马迪加(Madiega)，1982年，第30-41页(本巴人的博尔诺起源)和第50-54页(戈布南古和加博王朝)；关于考古资料，见B. 加多，1980年，第35-119页。

[43] 见西非商业公司(SCOA)基金会研讨会，1981年，第45-109页。

[44] H.R. 帕尔默，1967年，第126页；R.A. 阿德莱耶，1976年，第588-593页；Y.B. 乌斯曼，1981年，第92-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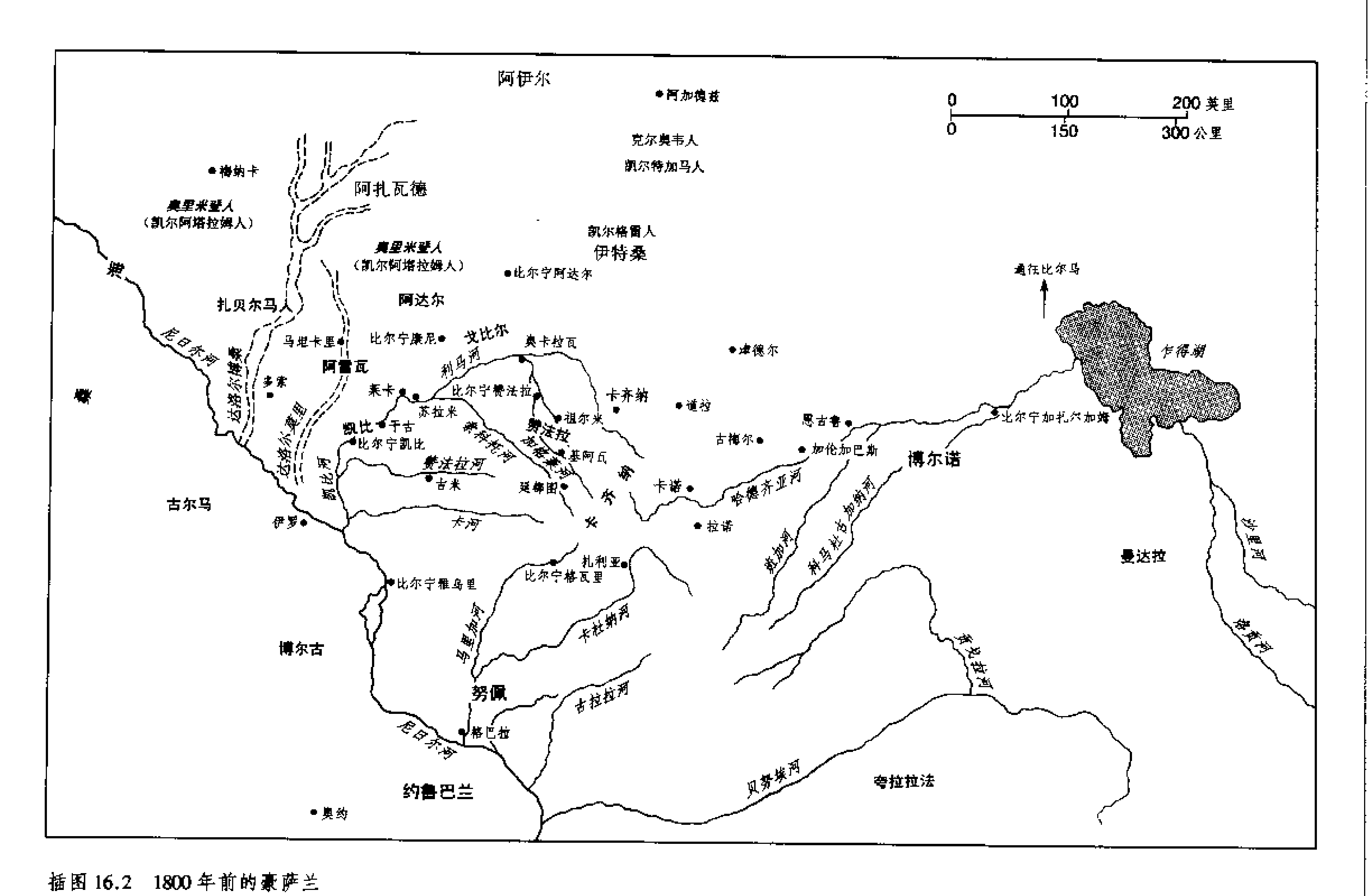


插图 16.2 1800 年前的豪萨兰

资料来源：根据 J.F.A. 阿贾伊与 M. 克劳德所著《西非史》改编，1976 年，第 1 卷，伦敦，朗曼，第 555 页。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制地图。

的君主们进一步收缩领土，以保障自己的权力。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在“萨劳塔”(sarauta)制度在中苏丹引进和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探寻。[45]

萨尔基

国家最重要的是领土(kasa)，首领为“萨尔基”(Sarki)，[46] 其先祖取得了政治权力，在卡诺、卡齐纳和赞法拉，那是从高层祭司手中夺得的，而在凯比则是由一位武士(magaji)升任为萨尔基。

从王子中间任命一位王位继承人是选举团的责任。在卡齐纳，选举团由四名成员组成。[47] 很难说当时凯比是否有这样一个选举团，但后来肯定存在。在赞法拉、戈比尔和卡诺，选举团称为“九人议事会”(Tara)，[48] 后面为国名。各种选举团的名称和职能是不同 **466** 的，但某些任职者可以分类如下：在赞法拉，一位长老，身居古老的、现早已被遗忘的“巴萨斯”(Basace)之职；城市和重要地区的总管，在赞法拉有五名，在戈比尔有七名(比赞法拉多两名代理)；高级政府官员，在赞法拉有三名，戈比尔两名，卡诺九名。他们还包括被驱逐的王朝代表(如卡齐纳的都尔比)和统治王朝的代表(例如戈比尔的乌班多马)。

选出的继承者必须经选举人一致同意。一旦被任命，则将举行加冕和即位仪式。选举团还组成萨尔基委员会，因各种原因，委员会与萨尔基发生冲突，或萨尔基罢免某位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时有发生。[49]

政府

萨尔基通过三组官员来行使其权力：王室成员、公务员、城镇和地区的地方长官。王室成员被委以重任。由于包括不同辈分的人，君主的兄弟和子女通常享有显示其行政地位的头衔。他们所享有的头衔和职务之广，要单列一张表是难以说明的。[50]

君主的姐妹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虽然她们是通过传统的礼拜形式来达此目的。在赞

---

[45] A. 马哈迪(Mahadi)已提出全面概述(即将发表)；另见M. 奥卡里，1969年，第43-62页；G. 纳-达马，1977年，第80-90页；Y.B. 乌斯曼，1981年，第5-19页；N. 珀恰努克(Perchonock)阐述了社会学观点(即将发表)。这一概述使人联想起关于西苏丹问题的文字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见J.M. 库奇，1975年，第99页(加纳的圣林)，第108页(坎达在考-考的膳食)，第122页，(阿米马的魔石)，等等。

[46] 关于此词的意义还在继续讨论；应当说明的是在赞法拉，君主的姐妹拥有“阿萨尔基”(Asarki)的头衔，参见G. 纳-达马，1977年，第345页。

[47] 加拉迪马、考拉、都尔比和延达卡，参见Y.B. 乌斯曼，1981年，第78页。

[48] 在赞法拉为达瑙、巴萨斯、萨尔金·拉菲、萨尔金·图都、萨尔金·巴扎伊、萨尔金·卡亚、马加金·加里、乌班达瓦基和加拉迪马；见G. 纳-达马，1977年，第86-87页。在戈比尔为乌班达瓦基、乌班多马、萨尔金·拉菲·拜巴和卡拉马、萨尔金·图都、拜巴和卡拉马、马加金·库图塔、萨尔金·巴扎伊和萨尔金·卡亚；见I. 梅卡索亚，1982年，第47-48页。关于卡诺，公报发布人给了下列名单：加拉迪马、马代基(马达瓦基?)·瓦姆巴伊、马卡马、萨尔金·达瓦基·麦图塔、萨尔金·D·查卡宁·吉达、萨尔金·巴伊、杰罗马和丹·埃亚；尽管他们都属于贵族，掌握着军政之职，但这种结构是近代才出现的，因为像达加西、巴尔德和桑图拉基等重要人物并没包括进去。

[49] 见后面有关在赞法拉的扎乌代发生的事件。在卡诺，基索奇任命其兄弟达布卡里·丹·埃亚取代巴尔德在九人议事会的位置，参见H.R. 帕尔默，1967年，第112-113页。

[50] 关于乌拉迪，见P.H. 戴维(David)，1969年，第657、665、666页；关于19世纪的达马加拉姆，见A. 萨利福，1971年，第117-133页；关于赞法拉，见G. 纳-达马，1977年，第348页。

法拉，她们被称做“阿萨尔基”（Asarki)或“英纳”（Inna),[51] 戈比尔也用此称呼。卡诺的历史是以受到颂扬的公主的名字为标记的。例如，如果“马达基”（Madaki,太后)奥瓦没有进行有力的干预，阿卜杜拉希(1499-1509年)肯定会被叛乱者驱逐。他的儿子基索奇统治该城时同样受到他的祖母奥瓦太后、他的母亲埃亚·拉米斯和奥瓦的兄弟古利的支持。467 在谢里夫(约1703-1731年)统治时期，卡诺的一位高官让人把从雅乌里得到的乐器带给他，他保存了三个月之后将其送给马达基·乌尔雅马，“因为她享有最高权力，在七个豪萨国中无人可比。”[52]

在可能被称做中央政府的机构中，官员分为以下几类：

(1) 朝廷高官管理宫廷和城市事务。职务和职责的组成各国均不相同，但他们的地位高于所有行政部门。在卡齐纳，最重要的官员有“加拉迪马”（Galadima)，他代表萨尔基，有司库(Ajiya)，礼宾官有(Turaki 和 Shantali)，以及王家马厩总管(Madawaki)。[53] 他们所处的地位就像是萨尔基与地方政府的中间人。在凯比，负责内部安全的是“马加金·加里”（Magajin Gari)、“加拉迪曼·加里”（Galadiman Gari)和“多卡”（Doka)；“马加金·巴贝里”（Magajin Baberi)似乎是负责对外事务，而“梅沙努”（Maishanu)负责收集国家应得的牲畜。[54]

(2) 行业代表则从手艺人中任命，如铁匠、裁缝、染匠、制革工人、石匠、屠夫和猎手。他们负责与各行各业保持联系，特别负责收缴国家税赋。必要时，铁匠和猎手要为军队提供兵力。

(3) 本地居民有其自己的代表。例如，萨尔金·纳亚的村庄和萨尔金·马祖姆的地区即使在戈比尔在希萨陶建都之后仍保留自己的头衔。[55] 卡诺的马古扎瓦人被布加亚(约1385-1390年)命令遣散，但他们被库库纳(约1652-1660年)召集起来。他允许他们在三周之内可尽情享受他们喜爱的体育活动，并向他们赠送大量钱财，承认他们的族长赞科的地位，期望他每年能提供一定量的劳工作为贡赋。[56] 对于某些国家不把本地居民降为农奴或纳贡者的地位，存在疑问。

468 (4)允许为数众多的移民拥有他们自己的代表。在戈比尔，萨尔金·阿兹宾处理与居住在领土范围内的图阿雷格人的关系，萨尔金·富拉尼则负责富尔贝人(居住在戈比尔、赞法拉、卡齐纳和卡诺)，萨尔金·西卢巴瓦负责西卢贝人(居住在卡诺和卡齐纳)。从这种观点来看，关于凯比的富尔贝人的情况是最有启发性的。[57] 在坎塔之下的两头衔(Galoji)和(Magajin Sangeldu)只能授给与牧人有联系的富尔贝人。然而，18世纪设立的“迪科”（Dikko)头衔第一次授予一位普洛人，他的母亲是君主的女儿。

(5) 伊斯兰社群通过其学者(Mallamai)而遍及各地。至于地方政府，或具体而言，领

[51] 见G. 纳-达马，1977年，第345-348页。
[52] H.R. 帕尔默，1967年，第112-113、123页；R.M. 伊斯特，1979年，第38页。
[53] Y.B. 乌斯曼，1981年，第80页。
[54] M. 奥卡里，1969年，第73-107页。
[55] I. 梅卡索亚，1982年，第48页。
[56] H.R. 帕尔默，1967年，第107，120-121页。
[57] M. 奥卡里，1969年，第34-35，113页。

土管理，也分为几类：

(a) 某些城市的统治者的权力是独立于王朝的；如拉诺、加亚、杜茨、卡拉耶(在卡诺)、马斯卡、萨姆里、杜圭(在卡齐纳)；以及祖尔米、基阿瓦、通法菲和巴库拉(在赞法拉)。他们与君主的关系有时比较难处，因为他们最终被贬到臣属的地位。卡诺的诸侯很快起来造反，卡诺的君主达迪(约 1670-1703 年)被迫处死加亚的侯王法林·杜茨。[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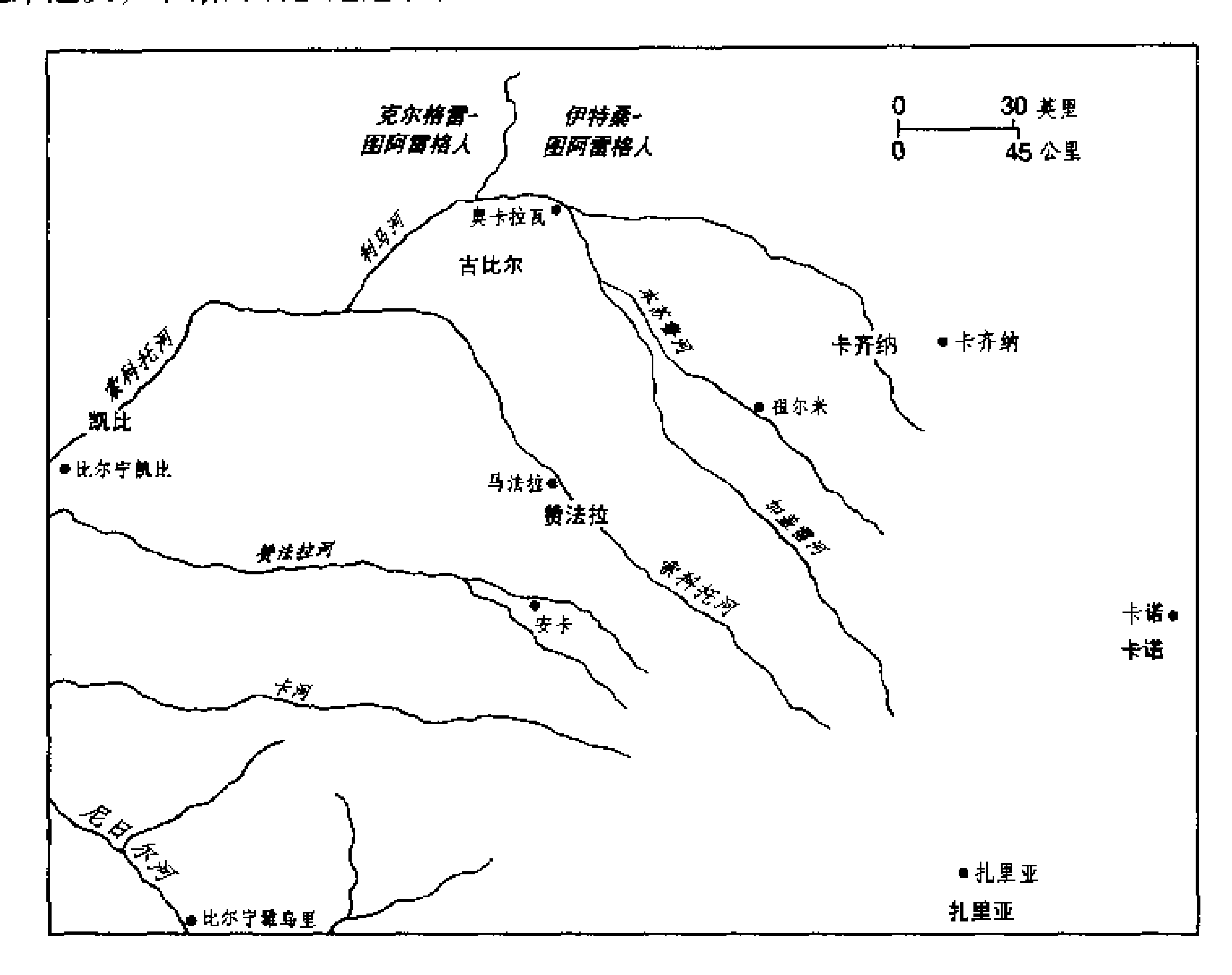


插图 16.3　18 世纪的豪萨诸国

资料来源：根据 P. 洛夫乔伊所著《柯拉果商队：豪萨柯拉果贸易，1700－1900 年》改编，1980 年，第 55 页，扎里亚，阿赫马杜·贝罗大学出版社。

(b) 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统治者是贵族(他们的祖先在成为王朝的同盟者的同时保留了 **469** 自己的权力)，或者是政府官员赞法拉的“达瑙”(Danau)是第一种情况的例证。达瑙这一称呼出自他所居住的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此他可以监视凯比通往南部和西部的道路。[59] 巴扎伊的统治者住在北部，而卡亚的统治者却从北部的卡瓦陶迁移到位于(国土)中央的马拉顿。在凯比，“英纳姆”(Innamme)注视着西面的前线。[60] 在卡齐纳，“马利萨”(Marisa,破坏者)居住在圭瓦，在那里注视着西北部边界。而鲁马的“加塔里”(Gatari,斧子)则留意着东部边界。[61] 在赞法拉后来又出现两个相当奇怪的头衔：“萨尔金·图都”(Sarkin Tudu,山的统治者)控制着领土的东部，和“萨尔金·拉菲”(Sarkin, Rafi,山谷的统治者)统治

---

[58]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22 页。

[59] G. 纳-达马，1977 年，第 86-87 页。

[60] M. 奥卡里，1969 年，第 108 页；最初，这一头衔是授与奴隶出身的贵族的。

[61] Y.B. 乌斯曼，1981 年，第 80 页。

着本苏鲁河和加盖雷河汇合处的村落。这些头衔极可能产生于当地的自然信仰。

(c) 其他的地方长官只不过是政府机器中的齿轮轮牙。移民们保留了地方等级制度，富尔贝人被称做“阿尔多”(ardo)，或者“拉加”(rugga)。

(d) 最后一点，某些头衔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例如在凯比，“科卡纳”(kokani)在宽尼征服之后负责处理与全体居民的关系；“萨布鲁”(saburu)的职位是大约1650年设立的，负责对通向宽尼和阿兹宾的道路提供安全保障，这条路经常遭到赞法拉和戈比尔的劫掠。[62]

所有高官、贵族、平民或奴隶都履行一种非军事性质的职责，除非在必要情况下，他们才成为英勇的战士并组成自己的武装团体。

军事组织

凯比的建立意味着军事领导人在国家事务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63] 坎塔的第一批伙伴来自于国家的统治家族，但随后，参加了独立战争的人们获准派出两个代表，其中之一“昆杜达”(Kunduda)成为了凯比的军事领袖。[64] 在卡齐纳西南部，靠近赞法拉的地方，凯比和卡齐纳阻止了一个以奎安巴尼、比尔宁格瓦利、科里加等为中心的大国的形成。大量的卡齐纳瓦移民表明向着卡齐纳的地区应包括在内，但由于它始终被邻国所觊觎，也只好满足于依靠卡齐纳。[65] **470**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从属地位由于寻求保护以御防邻国，甚至如阿兹宾、博尔诺和夸拉拉法等遥远的国家的侵犯，以及寻求边境和道路安全保障的需要而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导人的数量增多，建立了军阶并提高了效率。最高头衔在各国是不一样的：在凯比是“昆杜达”，在卡齐纳是“考拉”(kaura)，在赞法拉和戈比尔是“乌班达瓦基”(Ubandawaki)，在卡诺好像是“加拉迪马”(Galadima)。

由于武器的改进，改变了战略和战术。在战事动员中，要求各行各业(如猎手和铁匠)提供服务。所用的武器包括剑、长矛、大刀和弓箭；用于防护的盾(在赞法拉是用大羚羊的皮制成)比努佩的盾出现得早。军队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步兵(分成弓箭手和长矛手)和骑兵。凯比还有水上小舰队。[66]

马匹主要来自阿兹宾和博尔诺，得到特殊照料。君主进口马匹并修建马厩，凯比的坎塔就有三处马厩。马匹在军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骑兵头衔的数量和级别上看出来，如乌

---

[62] M. 奥卡里，1969年，第37-74页，108-109页；“科卡纳”的住地不详。

[63] 见J.P. 斯梅尔顿(Smaldone)，1977年，概述。M. 奥卡里，1969年；G. 纳-达马，1977年；Y.B. 乌斯曼，1981年和A. 萨利福，1971年提供关于凯比、赞法拉、卡齐纳和达马加拉姆在19世纪时的资料。

[64]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277-278页。坎塔被马加金·库拉罗、马加金·莱卡、加兰都、马亚罗、莱拉巴和塔夸姆巴(人名)所包围；古尔马(代表桑海方面)和昆杜达(代表夸拉拉法方面)加入了他们，参见M. 奥卡里，1969年，第59、61、72、114页。

[65] Y.B. 乌斯曼，1981年，第83-84页。

[66] M. 奥卡里，1969年，第11页。也许有人要问，伊本·巴图塔在廷巴克图所乘“用一根空树干制成的独木舟”与列奥·阿非利加纳斯在杰内看到的“用半根空树干制成的狭窄小船”之间有什么联系；有理由怀疑桑尼·阿里·伯尔的小舰队用这种小船是否有效，而摩洛哥素丹肯定没让凯比的坎塔将它们送给他。L.E. 库贝尔，1974年，第87页中的问题问得好，豪萨(凯比及努佩)的独木舟(abara)所遍及的范围是否并没有超出廷巴克图地区。

班达瓦基[67] ·马达基/马达瓦基(骑兵司令和/或陆军总司令)和萨尔金·达瓦基(骑兵队将军)。马匹地位的提高也是由于因获得“苏尔克”(sulke,铠甲外套)和制造“立飞迪”(马 471 饰)而带来的改进，并因此而设立了“萨尔金·立飞迪”(重骑兵师将军)和“立飞迪”(重骑兵师总司令)等头衔，都属于军官的最高职衔。

在道达统治时期(1421-1438 年)，来复枪被博尔诺的一位王子带入卡诺，[68] 但是直到三个世纪以后，即昆巴里时代(约 1731-1743 年)，它们才被输入到努佩，拜巴·扎基(约 1768-1776 年)是第一位建立火枪手私人警卫团的君主。博尔诺开始使用来复枪，但桑海通过自己付出的代价已明了它们具有致命的效果，并不想费力在半个世纪后捡回被摩洛哥士兵丢弃的那些枪支(1591 至 1640 年)。[69] 豪萨兰对于自己用钱财便可获得的一种武器似乎故意不予考虑，尽管如前所述，博尔诺也试图阻止它使用武器。桑海和豪萨兰无可吹嘘，它们既不比博尔诺更虔诚地尊重马术，也不比博尔诺和曼德人更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力和参与奴隶交易。

当时所用的战术包括突然袭击、埋伏、直接冲突和包围。频繁的围攻和冲突证明围绕城市加速建设防御工事是正确的。战役之前都经过极为细致的准备，而且通常由博学多才的牧师为军队的胜利进行祈祷。

在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已经加快，战术的改进导致掠夺行为的增加，很难区分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或吞并，还是为了镇压反叛、恫吓和单纯的袭击。作为一个国家，戈比尔不断地被迫为其生存而战斗。由于戈比尔获得了一块相对富饶的土地，而且人口众多，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对其生存的意义值得继续研究。政治、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贵族大肆掠夺，如《卡诺编年史》便明确指出：贵族越来越富有并向君主和学者赠送礼物。在卡诺，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从 1573 到 1768 年)，贵族日益强大，以致于催促国家发动战争，参与阴谋，炫耀其财富及慷慨之举，使君主为此而担心。库库纳迫使马达瓦基·库马骑着由年轻女仆牵着的毛驴游街，而拜巴·扎基总想不断地吓唬他的合作者，并时常羞辱他们。[70]

每个国家的高官人数不一样：戈比尔有22名(13名贵族和9名平民)，卡齐纳有46名 472 (16 名贵族和 30 名平民)。[71]

---

[67] 头衔的意义不应与其有关的职责相混淆，参见 A. 萨利福，1971 年，第 124 页；J.P. 斯梅尔顿，1977 年，第 216-219 页中提供了军事头衔的词汇表。A. 萨利福提到根据它们的品级已知 19 世纪在达马加拉姆有九种马，第 153-154 页。

[68]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09、124、126 页。

[69] 在一次埋伏中，埃伯诺·本麦屠杀了 400 名摩洛哥火枪手，但他显然是把他们的来复枪扔进了河里；M. 卡蒂，1981 年，294-295 页。直到 1640 年，登迪的桑海人有机会收回这些来复枪，但就目前收集到的有关其传说中并未发现这一迹象。

[70]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20、126 页。

[71] J. 蒂尔胡，1911 年，第 519-521 页；A. 萨利福，1971 年，第 117-136 页中提供了一份极为详尽的关于 19 世纪达马加拉姆的很长的名单(超过 50 位任职者)。

财源

豪萨国制订了一种巧妙的制度以控制领土和征收税赋，为管理国家提供必要的财力资源。可以列出四种主要的财源：

税收和关税

税收和关税是最通常的财源。它们包括下列内容：

土地税(kudin kasa)由农民交付。以家庭土地(gandum gida)为计算单位。在卡诺，纳古吉(约1197-1247年)是第一位设立此税的人，他要求农民交付其收人的八分之一。对低地作物及其他作物，如靛蓝属植物和块茎作物也要收税。[72]

专业税(kudin sana'a)由手工艺人和商人交付。在凯比，每位盐工一年要交给坎塔一葫芦盐。[73] 随着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而且作为行会建立的结果，这些赋税成为国家收人的一项重要来源。

关税(kudin hito)对某些特定的人境产品征收。在凯比，除了这种进口关税，从达洛尔福加前往豪萨兰和努佩-格万贾的商队，以及从豪萨兰到格万贾的商队都必须另外付税。此外，运往扎尔马塔雷和阿雷瓦的盐也要交税。

家畜税(jangali)[74]由家畜饲养者，特别是富尔贝人交付。在卡诺，是库通比(约1623-1648年)第一次征收此税：四组人交280头牲口，无疑是根据其畜群的数量交付。并因此而设置了家畜税征收者(Sarkin Shanu)的职位。

在凯比，游牧的富尔贝人支付库丁·哈基放牧税(kudin haki)，而一位被称做“诺诺”(Nono)的高官收集牛奶和黄油上交君主。

473 礼物

地方长官、高官和其他人物向君主奉献“盖苏瓦”(gaisuwa,奉献给上级的礼物)。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利益相关的党派向萨尔基献上贡物，希望能得到好处。礼物的价值要与送礼者的身份相符，而作为交换，君主[75] 一旦有机会必然表明他是满意还是不喜欢。为奉献盖苏瓦，通常的做法恰恰是劫掠钱物。被任命为高官的人也向萨尔基送礼。

战利品

靠掠夺可获得奴隶、马匹、牛和各种物品。物品很快消费一空，而马匹及其用具则可

---

[72] Y.B.乌斯曼，1981年，第83页；H.R.帕尔默，1967年，第101页。

[73] M.奥卡里，1969年，第103-106页。

[74] 作者认为这一名词的构成来自jaba(拿,夺)，含有勒索的意思；其正确写法是jab(u)ngal，janngal。关于卡诺，参见H.R.帕尔默，1967年，第118-120页，123-124页；虽然萨尔金·富拉尼(Sarkin Fullani)是一个世纪之后谢里夫统治时期才首次提到，但并无证据表明该头衔此前不存在。

[75] 纳扎基对瓦姆贝·吉瓦献给他的礼物十分高兴，而他的继承者库通比对萨尔金·德瓦·达瓦基·马加里的表示并不欣赏，参见H.R.帕尔默，1967年，第117-118页。

以增强战斗力。《卡诺编年史》特别提到在 1582 到 1623 年之间马匹的重要性。[76] 在加拉亚地方征服了卡齐纳人之后："卡诺人获得 400 匹马和 60 副马具；被杀和被俘人数不详。"此后不久，瓦姆贝组织了 100 名骑兵，身披铠甲，并带有 1000 匹备用马匹，这肯定对卡齐纳不利。奴隶被卖掉或者与大量王室财产一起进行分配。在这方面卡诺仍是最突出的例子。例如，库通比妒嫉萨尔金·达瓦基·马加里而冒险出击。在回来的路上，他在印达布丢下 500 名奴隶，那是留给他的财产。

其他财源

萨尔基可以通过许多手段来充实自己的国库。当君主饶恕了冒犯者时，几乎每次后者都必须交付感恩税(kudin laifi)。由于有《卡诺编年史》，我们可以了解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设置税赋和其他税收的过程。谢里夫(约 1703-1731 年)设置了七种被认为是苛捐杂税的税赋，其中包括姑娘们的结婚税。他的继承人，昆巴里(约 1731-1743 年)，将卡苏瓦库尔米市场的应付税提得很高，以致于使市场倒闭。次年，他让学者付税，结果是阿拉伯人离走并去了卡齐纳，而被统治者"塔拉卡瓦"(talakawa)则散落于全国各地。

概 述

474

为适应国家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萨劳塔(sarauta)制度得以制订，平民和奴隶如被认为值得高度信任，可以担任最高官职。于是，由王室奴隶，特别是阉人构成了遍布该地区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主要齿轮。

由此导致了"马伊·萨劳塔"(mai sarauta,统治者)和"塔拉卡"(talaka,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愈演愈烈，以致于卡诺的首领昆巴里(约 1731-1743 年)被说成是"爱其谋士，恨其人民"。

虽没有那么严重，城市和地区的统治者也是潜在的对手。由加亚和杜茨煽动起来的频繁的暴动说明在卡诺的历史中君主和臣属之间不断发生摩擦。

政治、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贵族代表了一个统一的集团，它通过从征收掠夺物到几乎是强要政治性礼物等各种剥削方式致富。他们采取一种与其财富相一致的生活方式，衣着讲究，以显示其声望，与此同时，由于其大肆收受贿赂和腐败，情况越来越难以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孕育出一种意识形态，意在否定其贵族血统，虽不能掩盖该制度的压迫性，却通过"伊科"(iko,权力)一词的各种含义迅速传播。

迪亚尼把这种制度描绘为一种寡头政治的君主政体，其特点是君主与寡头政治家之间的相互依存。[77] 然而，乌斯曼批评这种城市国家的观念，认为豪萨兰的主要特点是"大量都市中心的存在，它们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中心，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涌入这些中心并成为卡齐纳人、凯比人和卡诺人，每个中心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和相对于首都和其他中心的某

---

[76]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7、123 页；R.M. 伊斯特，1979 年，第 28 页。

[77] P. 迪亚尼(Diagne)，1967 年，第 244-252 页。

种程度的自治”。[78]

经济关系

为了解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有必要对一些地区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简要论述。

农业和畜牧业

475 从1500到1800年，豪萨兰基本上是农民(manoma)地区。农民利用各种技能，包括施肥和作物轮种以及合伙协作，挖掘农业的潜力。他们的工具与非洲其他地方的一样多，多种多样的锄头可适应各种土壤性质和所需劳作。大部分劳动力来自大家庭(gida)互助组(gayya)。必须提及千人宴(bukin duku)传统，摆千人宴须证明可以收获1000捆谷子或高粱。为此要在技术、物质和心理上做充分准备，成功的候选人将得到“萨尔金·普马”(Sarkin poma，作物之主)的称号。[79]

农民们种植谷子、高粱、水稻、玉米、花生和豆子，还有棉花、靛蓝、散沫花、烟草和洋葱。此外也种非洲酪脂树、罗望子树和“奈雷”(nere)，并且采收蜂蜜。他们也从事捕鱼和狩猎。从香猫身上取麝香(Jibda)用于制造香料。

大量饲养家畜是为了家庭自用。某些仪式用山羊做祭品，通常是割断喉管。驴被用做交通工具，特别是商人。不过豪萨兰吸引了很多富尔贝人、[80] 阿兹宾人和舒瓦阿拉伯人，他们数百年来一直是牧羊人。克尔格雷人、伊特桑人和克尔特加马图阿雷格人向南流动，来到赞法拉的北部和中部，为了在旱季放牧骆驼、山羊和绵羊，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富尔贝人带着牛羊在卡齐纳(卡拉杜瓦河和本苏鲁河的交汇处)、凯比(在古尔宾凯比、达洛尔博索、福加和莫里)和赞法拉(在本苏鲁河、加盖雷河和索科托河灌溉区)等地定居下来。农业和畜牧业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生活因二者的结合而提高，例如在卡齐纳的印加瓦地区。[81]

手工业

476 在利奥·阿非利加纳斯时代，手工艺人所达到的高度的技术标准和多样性就已非常显著。[82] 人们制作铁、木和皮革制品，并从事编筐和制陶工作，同时纺织与印染业也得到极大发展。铁和棉的原材料十分丰富，高标准的要求刺激了高质量产品的生产。手工艺人非

---

[78] Y.B. 乌斯曼，1981年，第53页。

[79] 关于这个传统，见G. 尼古拉斯，1975年，第114-117页、297-299页和G. 纳-达马，1977年，第91-101页。

[80] 有关一些富尔贝人向博尔诺和豪萨兰移居的情况，见M. 伊德里索(Idrissou)，1979年。然而，B. 哈马(Hama, 1968年，第92-96页)认为一些富尔贝人直接来自撒哈拉通过阿扎瓦德移向中苏丹和尼日尔河中游。在英·加尔-泰吉丹·泰森特地区的考古研究发掘出地下的牛骨架；提供的唯一日期是1435年(见F. 帕里斯(Paris)，1984年，第1-75页。)问题就这样遗留下来。

[81] M. 奥卡里，1969年，第34-35、73、113-114页；G. 纳-达马，1977年，第110-120、169-184、197-199页；Y.B. 乌斯曼，1981年，第64-67、73-75页。

[82] Y.B. 乌斯曼，1981年，第472-479页。

常专业化，制革似乎已从制鞋业中脱离出来，而纺纱、织布、印染、缝纫和刺绣成为完全不同的行业。建立了行会制度，每个行会都有一位代表，负责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并处理与国家的关系。[83]

还能发现向集团专业化发展的趋向。在凯比，纺织和印染掌握在凯比人手中，而赞法拉是从卡诺吸引织工和染匠。在凯比和赞法拉，16世纪从马西纳来到这里的佐罗玛瓦[84]专门从事银制饰物和制陶业；在卡诺，由班巴达瓦人从事制陶业。

制成品各种各样。出口品有皮革、凉鞋、马具和鞍子；珠宝饰物被认为是奢侈品，由富人购买，而像短袖束身外衣等衣物和纺织的布匹则以其质量而闻名。豪萨兰也属于生产高质量织品和染品的地区。

贸易

商人(bahaushe)[85]的一套已广为人知，他们与西非贸易网络和热带大草原由万加拉人、朱乌拉人、莫西人和卡努里人组成的国际商人阶级的密切关系怎么说都不过分。然而，由于大量农业剩余产品的存在，加上兴旺的手工业进入市场并提供大量的商品，起点由此形成。

受市场影响的地区大不相同。某些市场是地方性的并保持其社会和经济特点：买卖商品，但交易日的社会生活由于信息交流、游戏等活动而非常活跃。在较高一级，地区性市场是个中心，地方产品被送到这里，进口的日用品在这里分散出去。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市场位于商道上并因此占有特殊地位，例如凯比照顾宽尼，而卡齐纳关照特萨瓦。在赞法拉，北部和东北部的巴杰、法海、比尔宁、赞法拉等市场，供应棉衣、靛蓝、烟草、洋葱和牛，而南部市场——基阿瓦、贾塔、佐胡瓦尔、巴拉戈和其他地方——则有丰富的谷物供应。上凯比向下凯比输送纱、织物和奴隶，下凯比则提供网、渔叉、兽皮和大型独木舟(abara)。[86]

477

479

豪萨兰的发展造成国内贸易的增长，但这并未引起多少注意。然而，由于贸易繁荣，岁人增加了，包括各种税收和商人必须交纳的“盖苏瓦”(gaisuwa)。对外贸易仍掌握在豪萨人手中，一些阿兹宾人、阿拉伯人、卡努里人和万加拉人也参与其中。

对外贸易就意味着要有商队。不管是从卡瓦尔到加奥的“阿扎莱”(azalai)，联接阿兹宾和豪萨兰的“阿亚里”(ayari)，还是往来于卡诺-格万贾路线的“法塔克”(fatake)，这些商队最关心的是确保成功地完成他们的任务。[87] 如前所述，他们向途经的国家交付税款，而这些国家的君主则要负责保护在其领土经过的商队的安全。

---

[83] 最常提到的行会是石匠、铁匠、织工、染工、制桶工、制革工和鞋匠的行会。理发师与屠夫分类不易。凯比的制桶工的代表是由君主任命，称“萨基”(sakke)，这一名称在西苏丹的热带大草原上广为人知。

[84] 这些是贾万贝人(富贝人的一支)，曼德人称之为乔戈拉米人；见P.J.谢伊(Shea)，1983年，第111页。

[85] 见H.J.费希尔，1975年，第84-92页和1977年，第269-287页，特别是M.阿达穆，1978年，和1979年，第60-104页。

[86] G.纳-达马，1977年，第137-142页；M.奥卡里，1969年，第41-42页。

[87] 详见H.J.费希尔，1977年，第267-269页；G.纳-达马，1977年，第149-151页。

在讲述全面形势之前，有几个地区的不同情况⑧应该说明。在赞法拉，“卡尔菲”(Karfi)收缴放牧税收缴人(sarakunan rafi)征收的所有税款。从恩左鲁运来的在乍得湖边收集的盐和泡碱在这里进行市场交易，时间要比从比尔马或达洛尔福加运来的盐早。同样，在豪萨兰享有盛名的来自加扎勒河的“丹巴哈尔”(dan Bahar)种马则作为部队的战马或与当地的马杂交。凯比将盐运往努佩、伊洛林和格万贾，而从那里获得短袖束腰外衣和柯拉果。



图片 16.1 豪萨人的腰布，称做 Goranka da nono，字面意思是“你的葫芦里有奶”



图片 16.2 豪萨男子长袍，具有强烈的伊斯兰影响。由棉布制成，用靛蓝染成蓝色，并用丝线刺绣

⑧ G. 纳-达马，1977 年，第 253-254 页；M. 奥卡里，1969 年，第 4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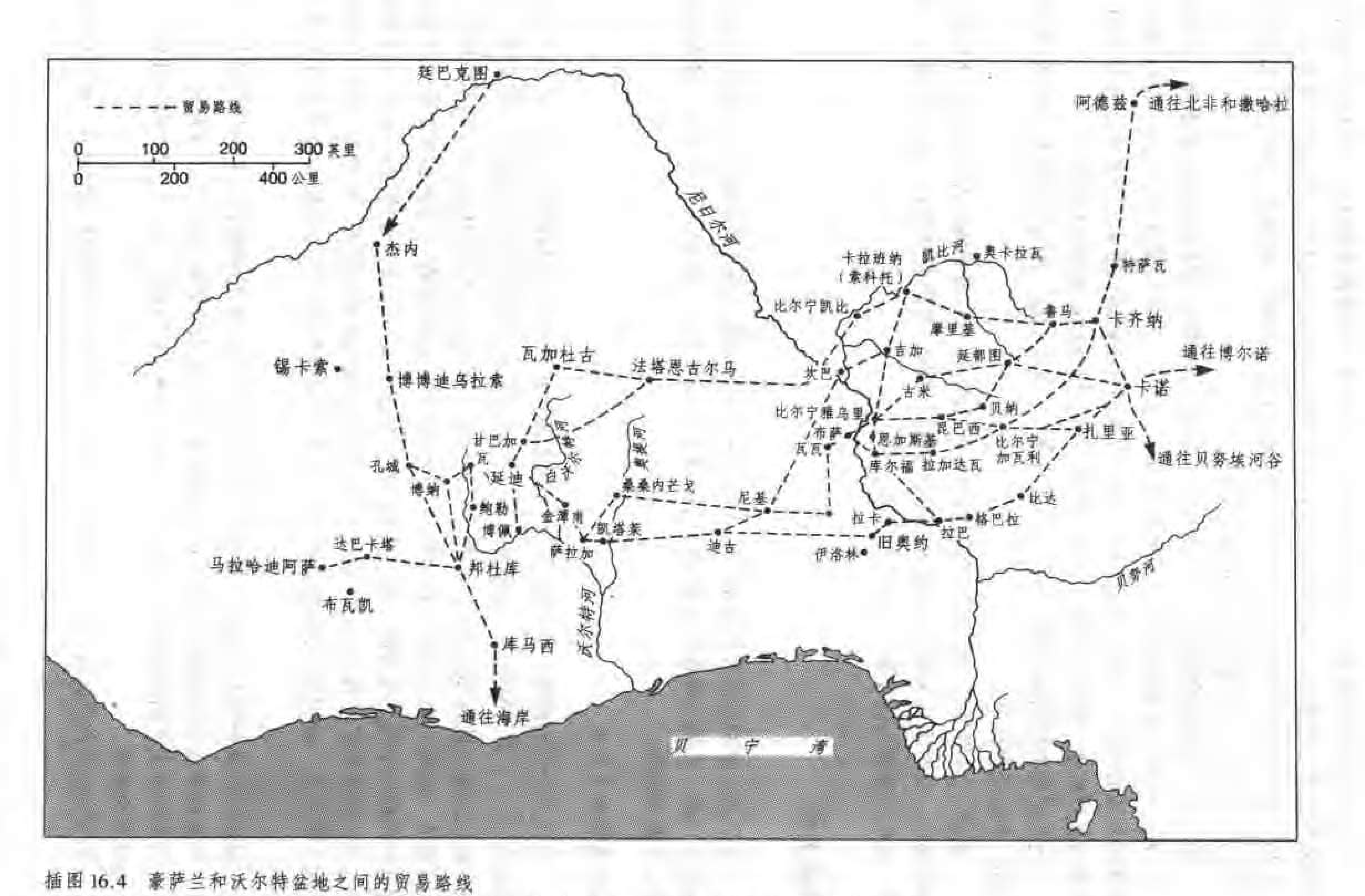


插图 16.4　豪萨兰和沃尔特盆地之间的贸易路线

资料来源：根据 M. 阿达穆所著《西非的豪萨因素》改编，1978 年，第 58 页，扎里亚，阿赫马杜·贝罗大学出版社。

在地区内部和边缘地带有几处国际市场。在北部，阿加德兹和比尔马仍然是与北部非洲联系的纽带；在中部，卡齐纳和卡诺是南北和东西联系的集结点；在南部，扎里亚、比尔宁格瓦利和比尔宁雅乌里使这个网络延伸到约鲁巴、努佩、博尔古、格万贾(和前往雅乌里的廷巴克图)。在豪萨兰流通的商品数量可观。

撒哈拉和阿兹宾将阿拉伯与欧洲的商品运往这些市场，其中包括镜子和纸张，特别是马匹(阿兹宾的丹阿兹宾种马，也叫巴加扎姆)、骆驼、海枣、散沫花、巴尔马盐(balma，因比尔马城而得名）、剑和其他物品。部分盐和剑最终转运到南方。反过来，豪萨兰向这些地方提供奴隶、服装、织物、谷子、兽皮、铁、砂金和格万贾的柯拉果。

博尔诺可提供马匹(丹哈尔或巴哈尔加扎勒)、泡碱和盐，作为交换从格万贾得到金属物品、砂金和柯拉果。

481 豪萨兰向格万贾、博尔古、努佩和约鲁巴出口盐、剑、调味品，兽皮、服装、织物、奴隶和马匹，反过来从努佩(为卡诺)获得各种欧洲商品、当地的铁和锑、奴隶和阉人、步枪，从格万贾输入柯拉果，用于一般消费。

社会关系

尽管进入豪萨兰的移民数量很大，但个体的民族起源不具有社会意义，而宗教联系又如此不可靠，以致于将穆罕默德·奥瓦利的失败归因于亵渎“迪尔基”。[89] 因此，我们应区分三个基本群体。

物质商品的生产者

农民为最大的群体。更加集中利用土地和改进耕作方式(土地仪式更为重要，千人宴最为突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到那时为止，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大家庭。很明显，某些人群已经降为被奴役的地位：例如，马祖马瓦人在戈比尔人来到比尔宁拉勒地区时就失去了独立。此外，马古扎瓦人被布加亚下令驱散后又被库库纳[90] 召集起来之事似乎意味着他们的地位不同，因为他们的族长赞科并不是选举人，而有事必须与萨尔金·马祖姆商量，至少做做样子。凡奎的马古加瓦人是附庸群体因而也是进贡者，但他们与该国的关系不同于萨尔金·卡诺君主与其附庸萨尔金·加亚之间的关系。劳力的最后来源是奴隶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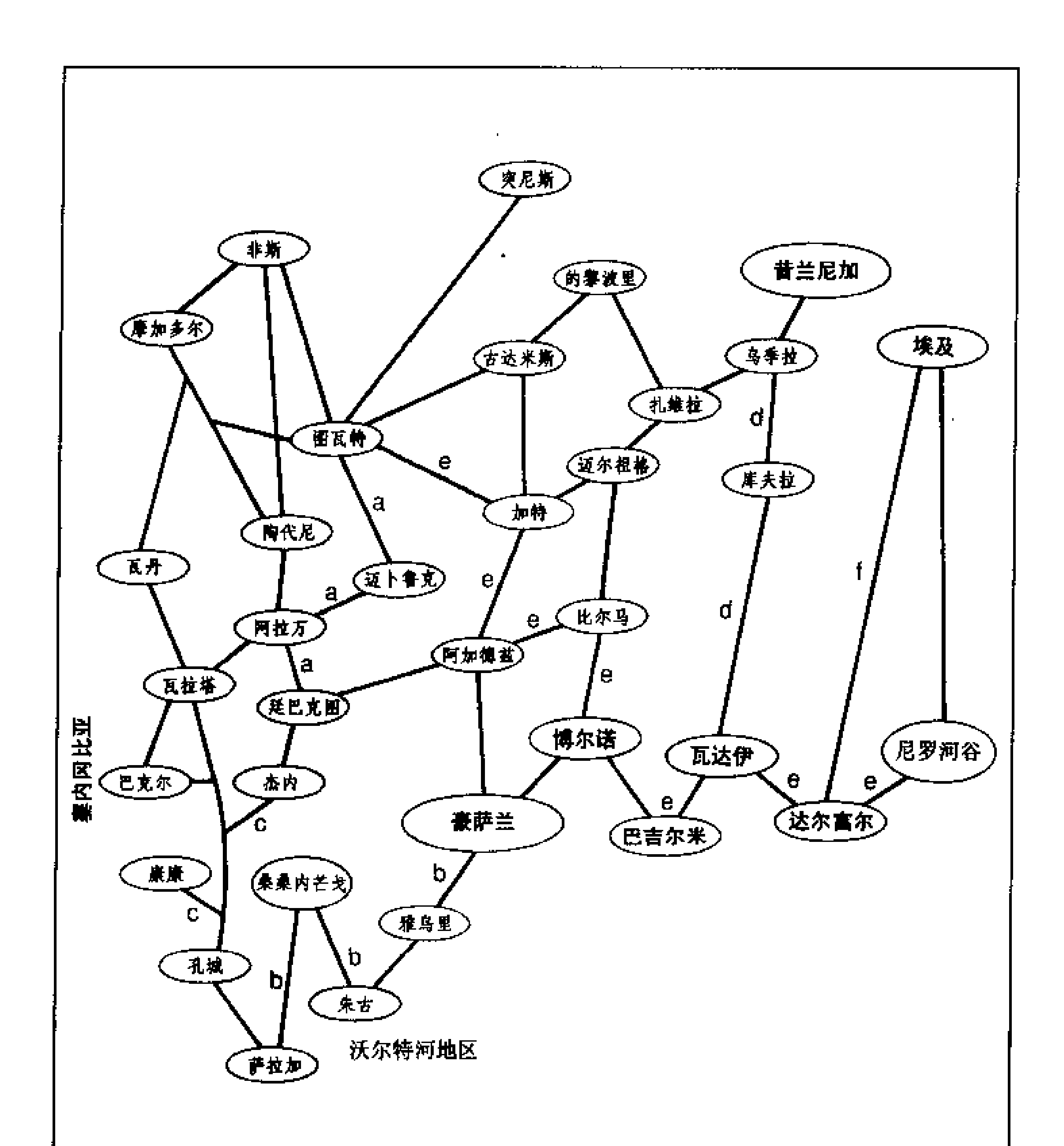
除农民外是各种手工业者。高度的专业化生产出了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高质量产品。此外，许多奴隶在主人的指挥下为了他们的利益(至少首先是如此)从事手工业活动。

大量的牧民开始定居生活，雇用奴隶生产谷物和照看牧群。这一过程加快了他们进入政治社会的步伐。

不管这些生产者是自由人、进贡者还是奴隶，都是这个政治社会的成员，他们与国家

---

[89] H.R.帕尔默，1967年，第127页。
[90] 同上，第107、121页。



路线 a：在 18 世纪连接图瓦特与尼日尔河湾的迈卜鲁克建立之后日渐重要。

路线 b："柯拉果路线"，连接豪萨兰与沃尔特地区。这一路线是在 18 世纪萨拉加作为柯拉果贸易中心出现以后发展起来的。

路线 c：连接康康，建于 17 世纪末，主要用于与尼日尔河湾的杰内经营柯拉果贸易。

路线 d：从昔兰尼加到库夫拉的古道，到 18 世纪末延伸到瓦达伊，并以此与苏丹之路相连。

路线 e：苏丹之路，由东向西连接尼罗河谷与达尔富尔、瓦达伊及巴吉尔米三个大草原王国，再往前经博尔诺和阿伊尔前往摩洛哥。

路线 f：从开罗经努比亚的栋库拉前往达尔富尔。

插图 16.5　西部及中部苏丹与撒哈拉地区主要贸易和商队联系图，约 1215 年

资料来源：根据 M. 希斯凯特所著《西非的伊斯兰教发展》改编，1984 年，第 321 页，伦敦，朗曼。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制。

的关系是有法可依的。根据财富和与国家机器的密切程度，各种区别逐步产生。

482 商人

在 15 世纪，格万贾是通过卡诺与博尔诺联系的。在 16 世纪初期，阿兹宾人将盐带到戈比尔，而格万贾的商人们则前往卡齐纳，卡努里人和阿拉伯人刚开始在那里定居。随后，起源于博尔诺的坎巴里-巴雷巴里人要在长途贸易中为自己定名，但现有的文献并没有以民族群体来划分专业的记载。尽管如此，商人还是分成几个类型，有从事长途贸易(fatauci)的批发商也有组织零售贸易(kasuwanci)的零售商。[91]

由此形成了一群富商(attajirai)，大概包括经营奴隶、马匹、柯拉果和服装的商人。在赞法拉，[92] 贵族阶级和商人利用其奴隶来提高集体家庭农场"干达耶"(gandaye)的价值。关于谷物生产或棉花等工业原材料的信息很少。然而，商人和学者的联系似乎总是很密切。

商人之间的凝聚力主要在于共同利益，甚至是以民族划线的分工也只能在使利益增长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商人向贵族提供奢侈品，但当他们感到赋税过重时会毫不犹豫地迁走。某些阿拉伯人离开卡诺到卡齐纳定居，因为昆巴里在增加税收负担。[93]

在 1500 到 1800 年间，万加拉人和豪萨人的不同分支成功地连接起遍及西部非洲的贸易网络，根据基-泽博[94] 的说法，在主要的城镇形成了中产阶级。商人继续巩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位，同时改进技术并传播有利于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

贵族

统治阶级包括所有拥有政治权力的人(masu sarauta)。它分成几个层次。

萨尔基位于贵族之首，贵族是由王室家族、统治半自治城市和臣属省份的家族，以及各民族特别是阿兹宾人、舒瓦阿拉伯人和富尔贝人的代表。贵族在国家机器中承担各种职务，并趋向于成为通过婚姻关系加强联系的同类人集团。阿卜杜拉·布尔加(1438-1452 年)

483 是卡诺第一位这样做的君主，他娶了萨尔金·杜茨、萨尔金·西拉、萨尔金·卡诺和加拉迪马每人一个女儿。[95]

由萨尔金任命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所有高级官员构成第二层。他们出身于平民或农奴，但是由于身居高位，可以通过接受的特别是抢劫而来的礼物获得财富和人们的尊重。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把持军事要职。[96] 瓦姆贝伊温·吉瓦决定扩建卡诺城以取悦纳扎基(约 1618-1625 年)，他"每天带 1000 盘食物和 50 头牛去工地，直到竣工"，后来被继任的萨尔

---

[91]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09-111 页；M. 阿达穆(即将出版)；和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294 页。

[92] G. 纳-达马，1977 年，第 147-148 页。

[93]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24 页。

[94] J. 基-泽博，1978 年，第 175 页。

[95]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0 页。

[96]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7 页，(卡诺)；D.M. 哈马尼，1975 年，第 85 页(凯比)；G. 纳-达马，1977 年，第 351 页(侵吞公物)。

金罢了官。统治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控制着国家。例如，他们要求穆罕默德·纳扎基反对卡齐纳的权威，但反对由扎乌代策划的对卡齐纳的进攻。当执掌军权的高官变得极为富有而无意管理国事时，凯比开始衰败。

贵族阶级，主要是王子和王室奴隶，没收被统治阶级(talakawa)的财富，特别是在君主表现软弱之时。

社会关系问题看来主要由两种因素决定。早在891年，某些君主出售非洲人以及卡瓦尔和扎维拉参与奴隶贸易的活动就受到雅库比的重视。此外，据说加奈姆的马伊阿尔库(约1023-1067年)"有一天在考虑如何安排他所拥有的大量奴隶，他将300人置于迪尔库，300人置于萨占丁清真寺，还有300人置于扎伊兰。"这些记载看来第一次说明[97]这个地区奴隶的出口和使用。在卡诺，[98]查米阿(约1307-1343年)拒绝了传统宗教的追随者带给他的200名奴隶，但夸拉拉法被迫送给雅基(约1349-1385年)和他的儿子卡内杰基(约1390-1410年)一些奴隶。由于阿卜杜拉·布尔加(1438-1452年)要回去，加拉迪马达乌达请他休息并接替他开始战争："每两个月他送给萨尔金·卡诺1000名奴隶，每天萨尔金·卡诺送给他马匹，衣服和马饰"。到战争结束，他已集聚了21,000名奴隶，将他们分置在21个村子里，都称做"英达博"(indabo)。一位专家[99]近来认为这种发展是一种人口迁移，但事实相反，这是真正的奴隶远征，组织精良，而且有利可图。从英达博(鲁姆法要抓他们的女儿)这一类人的出现可以得到验证，他们不同于马古扎瓦人，需要补充的是英达博 **484** 一词使人想起索宁克人的"德贝"(debe)、富尔富尔德人的"德比利"(debeere)和桑海的"达贝"(dabey,奴隶村)。英达博从事生产和手工业活动，特别是农业。在卡齐纳，查吉罗城是王室之地，留有大量奴隶，甚至连王子也被送往那里。[100]在南方，戈扎基地区的城镇逐步加强与卡诺和扎佐(扎里亚)的关系：在那个地区，种植园的棉花种植实际上要依赖从扎佐进口的奴隶，部分棉花要出口到卡诺。

不论奴隶是商品、仆从、高级政府官员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者，他们在经济和国家的发展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欧洲和东方，奴隶出口必须检查其来源，甚至在大西洋贸易开始夺取其份额之前就是这样。奴隶制一旦从其他各种形式的隶属关系中分离出来，其对地区繁荣的贡献会更加清楚。根据这种观点，在热带大草原的其他地区发现了从俘虏(bawa)的地位转变为家生奴隶(bacucane,曼德语称woloso,桑海语称forso,富尔富尔德语称dimaajo)。研究应集中于这一时期奴隶制的发展，在这时期商业关系简化了社会阶层的划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奴隶的命运并不比"塔拉卡"(talaka)好。[101]

贵族是与称做"塔拉卡瓦"(talakawa)的没有政治权力的自由生产者相对而言的。随

---

[97] J.M.库奇，1975年，第49页；D.兰格(Lange)，1977年，第67页。

[98] H.R.帕尔默，1967年，第103-112页。

[99] M.希斯凯特，1984年；第101-102页。

[100] Y.B.乌斯曼，1981年，第43、49页；P.E.洛夫乔伊(Lovejoy)，1983年，第113页。

[101] 见F.库珀(Cooper)，1979年，另见P.E.洛夫乔伊的参考书目，1983年。L.E.库贝尔，1974年，特别关注桑海帝国，他的想法对于作为整体的热带大草原很重要。"Talaka"出现在许多非洲语言(塔马加奇、卡努里、豪萨、富尔富尔德、桑海、古尔曼西马巴、摩尔等语言)中，应予注意。它或多或少与塔克鲁尔的"badolo"相当。然而，在塔克鲁尔和凯比，两种表达方法强调了农业在草原经济中的地位，"samba remoora"与"Bakabban kumbu"指回到土地上的农民。

着这些社会上有教养的贵族以及商人越来越富有，阶级差别转向经济方面，因为一边(masu arziki 或 attajirai)是富人，另一边(talakawa)则是穷人。王室奴隶(bawan sarki)不再是“塔拉卡”，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因为种族和宗教的差别已不为人所注意，而使那些掌权的人与二等公民开始相互对抗。

文化和宗教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文化上的变化。例如，在物质方面，建筑得到改进，甚至到今天，城市之间仍然在建筑风格上相互竞争。在音乐领域，一些乐器广为流传(例如“卡卡基”kakaki和“阿尔盖塔”algaita)，王室仪典中开始出现管弦乐队。我们应感谢社会上有文化的人们，他们提到献给君主和卡诺其他重要人物的一些赞歌(kirari)。豪萨兰在这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丰富多彩和文化的一致性，这是以豪萨的名义使非洲古贝人最大的媒介语单一化过程的结果。[102]

在 16 世纪初期，伊斯兰化仅限于商人和政界上层人物，他们以此巩固中央的权力。然而，这一时期结束时却是政治贵族与学者之间公开斗争的激化。[103]《卡诺编年史》和《万加拉人编年史》从内部揭示了他们关系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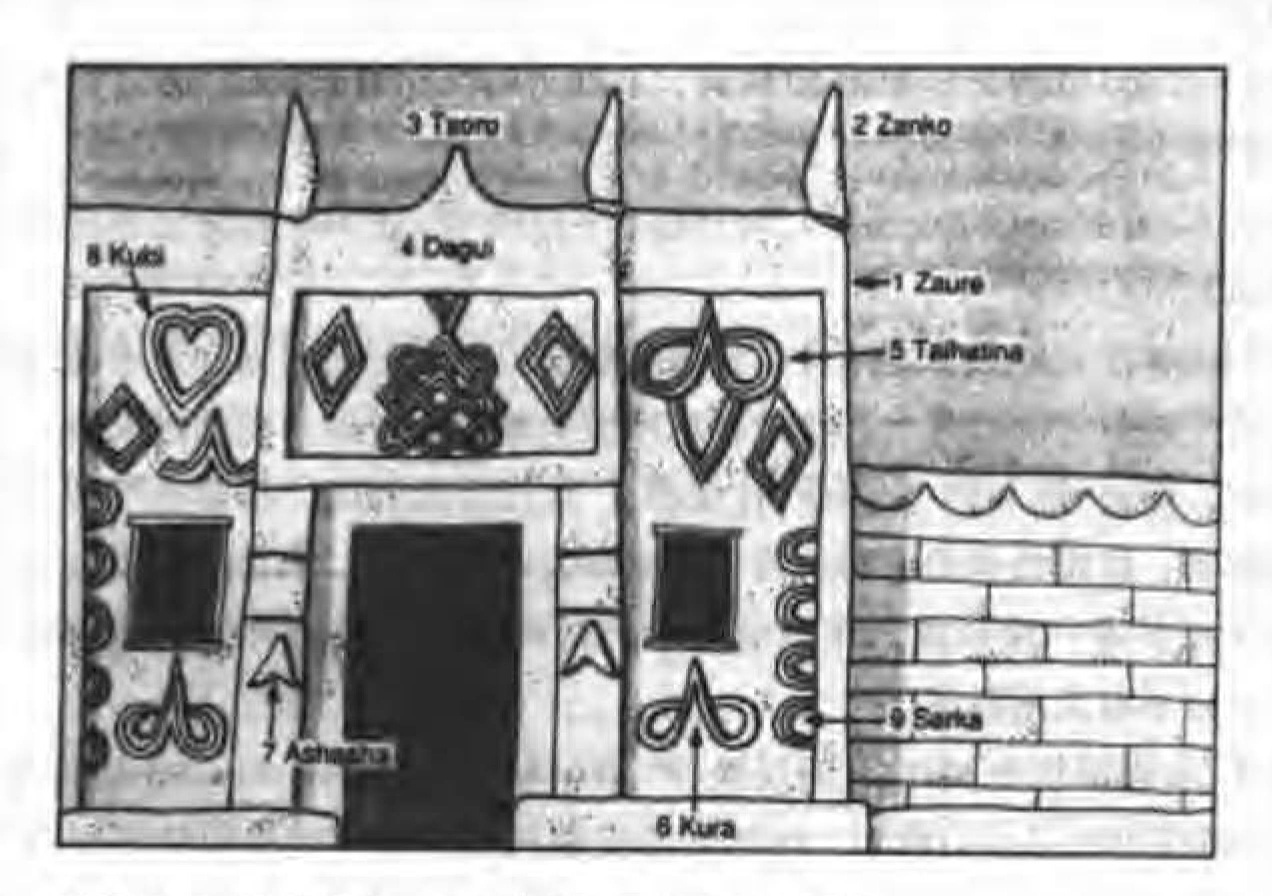
在卡诺，曾有许多学者陆续前来。[104] 在基索奇统治时期(1509-1565 年)，来了几位学者。第一位，谢胡·巴图纳西，带给他《阿沙法》(A<u>sh</u>afa)一书；次年，他收了一位从扎佐来的学生，这位学生成了他的主要信徒。他要求君主为鲁马瓦人建一座清真寺，以为星期五做祈祷之用，这一要求获得恩准。第二位学者丹·瓜兰杜姆，住在了基索奇的继承人阿布·巴克尔·卡多读《阿沙法》一书的地方。第三位，谢胡·阿卜杜萨拉米，介绍了三本书。让王子们学习《古兰经》的阿布·巴克尔成为第一位读其中一本书的人。还有来自博尔诺的三兄弟：老大是谢胡·库尔斯基，他拒绝了卡迪(kadi)的职位后被他兄弟马古米所接受；老三卡比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另外三位，瓦塔萨努、布杜鲁和库杜是后来到的。在阿布·巴克尔·卡多统治期间(约 1565-1573 年)，第二群学者移居卡诺，包括塔马、马拉姆·谢里夫、杰佐和乌利，他们来自巴吉尔米(根据其他史料或许是拉古米)，先在卡齐纳住了一段时间，后在戈迪雅定居，他们的领导人塔马在此结婚。穆罕默德·扎基(约 1582-1618 年)娶了塔马的女儿，并在进攻卡齐纳之前将“科卡纳”(Cokana)和“迪尔基”(Dirki)定为吉祥物。正是因为有学者的原因，卡齐纳人没有洗劫卡诺。然而，卡诺有一天早上却前来进攻，当时正在举行拉马丹(Ramadan)盛宴庆祝活动。卡诺取得了胜利。最后，在 1648 和 1651 年间，学者们经过谈判在卡诺和卡齐纳之间建立了和平。卡诺就这样占据了此时的优势地位并吸引了许多学者，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来自博尔诺。他们随身携带书籍并经常旅行。他们中间的一位，库尔斯基，始终远离权力中心，但另一位，塔马，却成了君王的岳父。

---

[102] 利奥·阿非利加纳斯，1956 年，第 1 卷，第 16 页。

[103] H.J. 费希尔，1975 年，第 92-97 页；R.A. 阿德莱耶，1976 年，第 596-601 页；S.A. 巴罗刚(Balogun)，1980 年；M. 希斯凯特，1984 年，第 68-109 页。

[104]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2-116，120-122 页。



图片 16.3 津德尔的一座比尔尼房屋的正面装饰图

按照津德尔的大工匠丹迪比的解释以及他的侄儿杰夫·马兰姆的记录，这些装饰的含义如下：

1. 门厅(Zaure)
2. 墙角之角(Zanko)，鸡冠，一种妇女发辫的名称。
3. 三角墙顶部(Tsoro)，摔跤者的辫子(其吉祥物附于辫上)，用以吓唬敌人。
4. 三角墙上的主要带状饰(Dagui)，此词指豪萨男子长袍上的刺绣、狮子图案，大有希望的标志。
5. 阿加德兹十字(Talhatina)，这是豪萨铁匠为图阿雷格主人服务时所得宝物，被简·加巴斯解释为多产的象征。
6. 每个窗户下面的标志(Kura)，猎狗，相当于挂水斗的钩子。
7. 剑片(Ashasha)，在大门的两侧，置于称为王子的卫士(Dogari)的柱子上。
8. "库比"(Kubi)纸牌中的符号，丹迪比的个人贡献。
9. 刺绣图案(Sarka)，传统的装饰主题之一(如在道拉用于素丹的宫殿、豪萨人的摇篮)。也称做绳状饰物(Durgusum taguwa)。

在比尔宁卡齐纳，[95] 瓦利·阿布·阿卜杜拉希·马萨尼、马莱姆·布哈里(他拒绝了要他住在首都的邀请)和马莱姆·奥斯曼(他来自博尔诺)等人后裔形成的若干群体是可以区分开 **487** 的。许多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和原籍不同的受过教育的人住在其他城市。这个知识阶层遍布在其人民和领导者都认为自己信仰伊斯兰的土地上，在政府中未占要职。他们明白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而与统治阶级保持距离。

赞法拉[96] 的情况不同，伊斯兰教直到后期才在那里扎下根，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大部分城镇远离主要城市和中苏丹的商队路线。虽然如此，卡努里的学者们可能参与了使君主皈依伊斯兰教的活动。与其他国家不同，安卡的伊玛目有一块真正的领地；伊玛目的住地

[95] Y.B. 乌斯曼，1981 年，第 71-76 页。

[96] G. 纳-达马，1977 年，第 185-187、320-326 页。

是所有那些招致统治者愤怒的人的庇护地和避难所。还为学者们保留了另外三个职位："利马宁·西基"(Limanin Ciki)负责王室家庭的教育，"丹·科多"(Dan Kodo)和"丹杜巴尔"(Dan Dubal)为宗教事务顾问、赞法拉历史记载的管理人，负责为军队的胜利进行祈祷。第一位穆斯林君主大约是在1670年掌权，而拜巴(约1715年)让100名受过教育的社会成员为赞法拉战胜凯比进行祈祷。

在收入上，学者们依赖于贵族的慷慨施舍，贵族给他们以物质上的好处，通常是赠以金钱。然而，对于这些受过教育的社会成员这种客观现实是难以指责的，即使涉及到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谢赫·阿卜德·拉赫曼·扎盖提[107] 为其后裔祈祷，希望他们智慧无穷，以便成为国王的顾问；鲁姆法送给谢赫的两个儿子每人两份财产；住在卡拉耶的瓦姆贝送给第三个儿子哈比布拉希一块领地，作为他给予祝福的报偿。由此可见，至少在卡诺，学者所处的地位可以享有大量财富。

他们的批评态度在《卡诺编年史》中也有所反映。[108] 穆罕默德·谢里夫(约1703-1731年)引进了七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zalunci)措施，包括不断提高税率和对年轻姑娘结婚征税等等。他的继承者昆巴里(约1731-1743年)要让学者纳税；阿拉伯人因此出走前往卡齐纳，那里一片和平与繁荣景象，塔拉卡瓦抛弃了该城。

488 学者经常外出旅行以及图书的引进是该地区知识界觉醒的原因。然而这无疑要归因于学习中心的存在，特别是"阿贾米"(ajami)手稿于16世纪在卡诺和卡齐纳的应用。巴尔巴里[109] 路经卡齐纳后，"马德拉萨"(madrasa)在此成长起来，尽管根据某些说法，"阿贾



图片16.4 一部袖珍豪萨语《古兰经》的装饰页，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高7.5公分

[107] M.A.哈吉，1968年，第11、14页。只有亨维克教授试图查考万加拉人(迪阿赫特人?)，编年者希望抄录其名；参见J.O.亨维克，1976年，第278页。

[108] H.R.帕尔默，1967年，第123-125页。豪萨版本有重大修正。

[109] M.希斯凯特，1984年，第80-83页。

米”的用法在16世纪初可能尚未引进，它是在鲁姆法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学者们用阿拉伯语、富尔富尔德语和豪萨语书写。在1500和1800年间，成为同一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参与实现都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同一运动以及同样的人口迁移和教育及文字传播活动，所有这一切有助于使社会关系日益简化。卡诺、卡齐纳和赞法拉的例子表明学者们的原籍比他们的民族来历更容易确认，在卡诺和赞法拉大多数学者来自东部(博尔诺)；来自西部(广义上的马莱)的学者，在卡齐纳占优势。他们为战争的胜利而祈祷，他们为法律事务提供咨询，他们驳回上诉，他们的建议受到赞赏，因此他们对社会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通过布道(wa'azi)。有几个人值得一提。在赞法拉[110] 著名人物中，已经提到过拉马丹·阿赫马杜(来自费赞)、哈希姆·巴赞法内(谢胡·乌斯曼的教师)和马曼·土库尔·丹·宾塔和穆斯塔法·加万尼，他是卡努里人，在赞法拉旅行期间与乌斯曼就布道时男人和女人同时出现 489 的问题发生争论。

有两位杰出人物的名字与卡齐纳有关。[111] 一位是阿布·阿卜杜拉希·马萨尼·穆罕默德·巴尔纳维·卡西纳维(约1595-1667年)，他出生于卡齐纳，父母是博尔诺人。另一位是穆罕默德·萨巴赫·卡西纳维——称他丹·马里纳更出名——他在大约1650年时极为活跃，被地方传统认为是穆罕默德·卡西纳维。这两位是一次真正的知识界复兴的根基。丹·马里纳在一首赞美马伊阿里的诗中描述了这次复兴。马伊阿里在约1680年打败了夸拉拉法。穆罕默德·卡西纳维也应提到，他死于1741年，他的许多著作流传下来。同样地也应提到穆罕默德·阿卜德·马赫曼·巴尔纳维，他死于1755年，其著作为乌斯曼提供了资料。

然而，毫无疑问，马拉姆·迪布里·丹·乌马鲁在这个群体里是最为引人注意的杰出人物。[112] 这位学者具有广博的知识，他生于阿达尔并死在那里，一生经过几次朝圣。他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苏丹的伊斯兰改革。在阿达尔的图阿雷格人中间失败后，他又去接近豪萨的王子，却引起了他们的敌意。奥斯曼(乌斯曼)和阿卜杜拉希·丹·福迪奥是他的信徒。尽管乌斯曼批评迪布里的某些态度，但他还是把自己看做是迪布里的信徒和继承人。18世纪后半叶以知识分子的大量活动和学者间激烈的辩论为标志，当时以一种简单的形式来反对以“马苏·萨劳塔”为代表的既定制度。

结　论

在圣战爆发的前夕，诸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的混乱特点明显减弱。凯比和赞法拉已被打败，而其他诸国则面对许多难题。在卡诺，和平与稳定不时被萨尔基与政府官员之间两个严重的分歧所影响：后者禁止拜巴·扎基(约1768-1776年)居住在塔凯，而穆哈马杜·奥瓦里(约1781-1807年)拒绝给他们40头牛送给“迪尔基”，反而用斧子将牛杀了。在戈比尔，巴瓦(约1777-1789年)第一次提出对某种玉米征税，同年，该国的几种牲畜饲养者

[110] G.纳-达马，1977年，第252、325页。

[111] I.丹库苏，1970年，第38-52页；Y.B.乌斯曼，1981年，第71-72页和1983年，第199-200页；M.希斯凯特，1984年第81-82页；A.M.卡尼(Kani)，即将出版。

[112] D.M.哈马尼，1975年，第136-141页；A.M.卡尼，即将发表。

在若干情况下必须付税(Jangali)。在 1767 和 1796 年，两次王朝危机使卡齐纳受到震动。490 由于高官的抵制、暴行的增加以及塔拉卡瓦潜在的反对不稳定的危险在整个地区处处可见。政治当局开始了镇压，它不再宽恕学者，而他们是唯一敢于冒险，公开与现存秩序斗争的。[113]

中苏丹的编史工作逐渐开始阶段，几乎完全是对圣战进行辩护，而现在则开始观察此前各个时期发生的变化。

1600 至 1790 年期间明显阻碍经济发展的特点被过分强调。轮子和风磨确实都不曾使用，甚至连来福枪都受到鄙视。然而，远溯到大约 1582 至 1586 年，加奥的“塔克鲁尔人”与“苏丹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后者声称卡诺比加奥更重要，也更伟大。[114] 尽管有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115] 这一地区仍以引人注意的方式发展，而这种发展总是轻易地归因于贸易发展，尽管由于政府以各种形式进行干预，贸易确实增加了。无论如何，在生产和加工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不应被低估。它在该地区赢得了足够的声望，很快便吸引许多欧洲人前来探险——尽管他们将到那里去的原因说成是科学性的，例如去调查尼罗河和尼日尔河的流向。

在政治上，尽管有军事冲突，但在所论述的时期内，这一地区并没有一个国家消失。在其他地区，加纳、马里和桑海分裂了，或许因为它们是帝国。而加奈姆-博尔诺也是一个帝国，它的长治久安值得注意。在两者之间，豪萨兰及其经济上的成功使国家作为一个机构的稳定被降到次要地位。其官僚和压迫性质因卡诺的谢里夫采用的方法而更加突出。其中之一被称为“克瓦罗”(kwaro)。有的作者不知此词的含义。如果其拼写与读音正确，那这是一个废弃的词汇，意思是“用硬币换贝壳”。由于贝壳是在卡诺王朝谢里夫统治时期被引入豪萨兰的，他肯定命令将贝壳投入流通。一位作者将“克瓦罗”误解为——可能是由于印刷错误——收割税，例如在达马加拉姆就要付此税。不论对“克瓦罗”如何解491 释，国家用其进行管理的细节是明显的。穆哈马杜·奥瓦里(约1781-1807年)深谋远虑得到证明，他在宫殿里储藏食物以防动乱和饥荒，虽然，即使是他最终也未能防止饥荒。[116] 然而，国家机器显然是有效的，后来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时永明 译)

---

[113]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26-127 页；R.M. 伊斯特，1979 年，第 42-43 页；G. 纳-达马；1977 年，第 396-402 页；M.A. 哈吉，1979 年；Y.B. 乌斯曼，1981 年，第 84-99 页。

[114] 关于反对变化，见 H.J. 费希尔，1975 年，第 66-67 页；关于卡诺和加奥的讨论，见 M. 卡蒂，1981 年，第 262 页。

[115] 例如，在 1539 至 1564 年、1639 至 1638 年、1697 至 1715 年、1729 至 1750 年之间，见 S. 梅莱伊(Maley)，1981 年，第 57-81 页；P.E. 洛夫乔伊，1983 年，第 69-70 页。

[116]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25 页；R.M. 伊斯特，1979 年，第 37-38 页。

17 加奈姆-博尔诺：与地中海、巴吉尔米和乍得盆地其他国家的关系

B.M. 巴金都*

在13世纪，加奈姆穆斯林国是比拉德苏丹地域最广的国家之一。塞福瓦的"马伊"(国王)控制着从南部的乍得湖东岸到北部的费赞绿洲的广阔地区。然而，他们的扩张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与塞福瓦统治王朝主体相分离的各种半自治单位的群体的出现，阻碍了中央集权化政治的发展。此外，加奈姆主要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也缺乏支持这样一个大体系所需的基础资源。 492

此后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最终导致加奈姆国在14世纪后期崩溃。马伊乌玛尔·埃德利斯(1382-1387年)，率领马格米人集团(王室塞福瓦人为其中一支)及其支持者移民到乍得湖西侧的博尔诺，那里有所需要的资源，而塞福瓦人也已在那里安置了他们的家臣。在塞福瓦人到来之前，那里就有大批个体的加奈姆移民居住，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①

塞福瓦人到博尔诺的主要目的看来是建立强大的地区经济，支持以塞福瓦为主导的组织良好的政治机构。然而，他们在那里的第一个世纪，遇到了许多问题，多次对其生存造成威胁，如连续不断的内战，经常性的王朝危机，来自布拉拉人的定期进攻以及官员拥权自重的问题。②

马伊阿里·加吉和博尔诺哈里发国的建立(约1465-1497年)

国内冲突因阿里·伊本·杜纳马的继位而结束。一般称他为阿里·加吉，他能够在统治王朝 中巩固自己的力量。大约在1471年，布拉拉人入侵劫掠博尔诺，阿里·加吉迎战并击败入侵者，但没有进一步追击。 493

在大约1472年，阿里·加吉在约贝河和加纳河的岔口建立了比尔宁-加扎尔加姆要塞。③ 这里后来发展成塞福瓦的首都，而且在统治博尔诺的整个时期一直是首都。大约与此同时，可能还建了其他几处有设防的定居点。④

---

* 我感谢菲利普·谢伊博士和约翰·拉弗斯，他们读了本文的草稿，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① 有关记述见 B.M. 巴金都(Barkindo)，1971 年。

② 同上书。

③ 《迪万简史》。

④ 阿里的赞歌称"他有高城和长矛"。

在人们的记忆中，阿里·加吉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复兴者，而他又曾试图至少在统治集团消除当时塞福瓦流行的不同信仰的融合。他还竭力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府。遵循先辈的传统并回应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热，阿里的身边聚集着“乌里玛”（穆斯林学者），任何重要决定都要征求他们的建议。其中两位是艾哈迈德·阿卜德·库瓦塔大法官（Kādi al-Kabir）和马斯巴尔马·乌玛尔·乌斯曼“瓦齐尔”（Wazir）和首席伊玛目（Imam）。[⑤]

许多拥权过重的官员被削减权力，特别是北方省的统治者（kaigama，yerima），他们在危机期间随意立废国王。[⑥] 可能是在阿里·加吉统治时期，王室后宫开始分封四个王后和几个王妃，[⑦] 推定继承人（chiroma）或许也是这一时期开始。

1484年前后阿里·加吉朝圣期间，据说阿拔斯王位的要求者阿卜德·阿齐兹·雅库布授与他塔克鲁尔的哈里发之称。[⑧] 从此时起，博尔诺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看做是哈里发，这一称呼开始被许多学者和比拉德苏丹的统治者们所接受。[⑨]

博尔诺哈里发国在扩张中的问题和机遇：1497-1564年

阿里·加吉的儿子和继承人伊德里斯·阿里，绰号卡塔卡尔马比（约1497-1519年）继续执行其父的政策，巩固了现有的政权并试图扩展国土。但后来的50多年中，卡塔卡尔马比和他的继承者们遇到了许多挑战，分散了对扩张主义目标的注意力。

塞福瓦的第一个问题是在阿里·加吉死后布拉拉人重新开始进攻。布拉拉人看来决心要破坏博尔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⑩] 而卡塔卡尔马比继任马伊之后，就不得不面对布拉拉人的进攻。他不仅打败了布拉拉人，而且还胜利地再次进入了前塞福瓦的首都恩吉米，然而却没有再次占领。在与布拉拉人签署条约之后，伊德里斯回到博尔诺。但这是一次短暂的和平，在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时期（1564-1596年）冲突始终不断。

494

塞福瓦国王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乍得盆地和苏丹的其他地方出现了许多国家，这迫使塞福瓦不得不改变或修正其计划，以便对付每个国家。

到16世纪初，在乍得盆地沿博尔诺南部边界出现了许多小王国，其中包括巴杰尔米、曼达拉、科托科人诸国、达尼斯基的北博勒瓦、雅姆塔和马尔吉。[⑪] 这一潜在危险的发展引起国王的注意。某些国家受到进攻并被迫承认塞福瓦某种霸权。但更经常的是，塞福瓦试图与这些新兴国家实现某种和平关系。上述那些国家有与塞福瓦合作的早期记录，国王关注的是利用这些新兴国家建立地区经济体制。大多数国家受到鼓励，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与博尔诺建立常规贸易关系。通过这种联合，新兴国家大量吸收博尔诺文化，也许有益于

⑤ H.R.帕尔默（Palmer），1936年，第21-22和23-28页。
⑥ H.巴思（Barth），1965年，第2卷，第589页。
⑦ H.R.帕尔默，1967年，第158页。
⑧ 《迪万简史》，第5-9页。
⑨ J.E.拉弗斯（Lavers），1971年，第32页。
⑩ B.M.巴金都，1971年。
⑪ 详见B.M.巴金都，1980年，第204-241页。

其迅速发展。[12]

在同一个时期，在豪萨兰也出现了许多国家。卡齐纳和卡诺作为跨撒哈拉路线的终点和东西路线的货物集散地很快发展起来，阿肯人的黄金和柯拉果经此路线运往博尔诺。[13] 在撒哈拉，当阿加德兹发展起来并取代塔凯达成为货物集散地时，跨撒哈拉路线略有改变。

博尔诺必定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豪萨兰和博尔诺之间的新路线由于恩吉津人、贝德人以及布拉拉人的袭击而很快成为旅客不安全的路线。为保卫这条路线肯定花费了大量精力，但只是在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时期问题才有所缓和。贸易路线问题和对沿线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居民点的控制问题可能是导致马伊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与卡诺的两个国王，阿卜杜拉希(约 1499-1509 年)和穆哈默德·基索奇(约 1509-1565 年)，发生冲突的原因。[14]

博尔诺也必须适应跨撒哈拉路线的改变。博尔诺与塔凯达有着长久的关系，但现在肯定想要控制阿加德兹，特别是桑海正日渐强大起来。在 1501 年和 1515 年桑海的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约 1493-1528 年)派军队远征阿加德兹，试图将该地区置于桑海的影响之下。[15] 其结果不得而知，但在大约 1532 年，据说博尔诺派自己的军队远征，征服了该城。[16] 然而，穆罕默德·坎塔领导的凯比的出现使桑海和博尔诺的努力均遭挫折。阿加德兹的问题使塞福瓦的国王们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几乎始终大伤脑筋。 **495**

在比拉德苏丹，1480 至 1520 年期间是伊斯兰化活跃的时期。在东部，丰吉素丹国(约建于 1504 年)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豪萨兰，许多在此时期访问这里的来自马里、北非、埃及和撒哈拉绿洲的学者对此地的伊斯兰化做出了贡献。在遥远的西部，桑海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在他统治时期恰逢该地区出现伊斯兰教热。有趣的是，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在麦加朝圣时(约 1496-1498 年)要求而且也被授与塔克鲁尔的哈里发之称，[17] 就像马伊阿里·加吉十年前的情况一样。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热给博尔诺的国王们提供了机会。塞福瓦的马伊们自 11 世纪起就是伊斯兰教徒，阿里·加吉在阿斯基亚之前约十年就被授与哈里发之称，似乎只有阿斯基亚公开竞争这一头衔，而且博尔诺的统治者历来将有声望的学者聚集在身边，往往使马伊们比其他统治者略胜一筹。由马斯巴尔马·乌玛尔·乌斯曼为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撰写的编年史和后来由伊玛目阿赫马杜·福尔图瓦为伊德里斯·阿拉沃马撰写的编年史看来是试图为马伊们要求哈里发之称辩解。该世纪末桑海的衰落和瓦解最终使博尔诺的要求居先。

博尔诺也在变成一个学习中心，比拉德苏丹和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们纷纷前来访问。[18] 博尔诺国王们的要求被许多学者所接受，这对博尔诺文化在许多国家确立影响起

---

⑬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09 页；P.E. 洛夫乔伊(Lovejoy)，1978 年，第 185-186 页；Y.B. 乌斯曼(Usman)，1981 年，第 16 页。

⑭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113 页。

⑮ J.O. 亨维克(Hunwick)，1971 年，第 221 页。

⑯ 同上。

⑰ J.O. 亨维克，1962 年。肯定是阿斯基亚试图加强其国内地位并向该地区唯一的另一个大国博尔诺挑战。

⑱ J.E. 拉弗斯，1971 年。

到了很大作用。在豪萨兰，穆斯林统治者向博尔诺哈里发定期献礼(豪萨称 gaisuwa 或 tsare)也主要是因此而造成的。[19]

496 从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统治时期起,塞福瓦与控制北非沿岸的当权者之间的外交和商业关系便有所记录。约 1512 年，卡塔卡尔马比派一支外交和贸易使团前往西班牙人地区——西班牙人刚占领的黎波里——以恢复商业关系。无论谁控制这个地区，后来的历代国王都继续保持这种商业关系。[20] 当奥斯曼帝国在马格里布建立其统治时，杜纳马·穆罕默德在约 1555 年派大使与提古尔特帕夏建立了"友好与商业"条约，后来继任的统治者们不断重用这一条约。[21] 博尔诺与位于其朝圣路上的埃及肯定也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虽然资料不全，但可证明存在贸易关系。[22]

卡塔卡尔马比的子孙们面临的依然是布拉拉人侵略问题和新兴国家的问题。还有凯比与博尔诺控制阿加德兹之战(1561 年)，看来是博尔诺输掉了这场战争。

建立强大的地区经济和中央集权政体
与卡努里的出现，约 1564-1577 年

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在伊德里斯·阿里(1564-1596 年,死后绰号阿拉沃马)统治时期博尔诺达到顶盛时期。在他的伊玛目阿赫马杜·伊本·福尔图瓦的一篇颂词中，描述了他统治时期的前 12 年的业绩。[23] 在国内事务上，他被看做是一位军事、行政的改革者和皈依伊斯兰教宣传者，而在外交事务上则是一位老道的外交家，可与当时主要的穆斯林领导人相提并论。

作为国王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其先辈的目标，也就是建立强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他第一次尝试将整个首府省牢固地置于马伊的控制之下。重组主力部队骑兵。另由土耳其枪手组成一支军团，这是在其前任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据说，为便于渡河还建造了更大的船只。正是靠这样一支军队，阿拉沃马发动了远征。

拒绝接受劝说或在压力下屈从的大部分敌对族群受到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投降为止，497 他们包括恩加法塔人、塔拉塔人、杜古尔提人、马亚人、恩吉津人和贝德人。像穆克胡卢姆人这样的被打败之后屈从的族群在保证以谷物进贡之后被允许重返家园。[24] 其他族群，如恩加法塔人，塔拉塔人和杜古尔提人，被认为是难以驯服，赶出首府省。[25]

为代替这些被逐者，其他族群(主要来自加奈姆)被带进定居。阿拉沃马对博尔诺历史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在首府省完成了大规模的人口变更。这种变化以及与战争中所俘女奴或与曼达拉和巴吉尔米等卫星国交换的女奴广泛通婚，为卡努里族群在首府省的扩大与发

[19] H.R. 帕尔默，1967 年，第 9-10 页和 83 页；A. 哈桑(Hassan)和 A.S. 耐比(Naibi)，1952 年。
[20] D. 吉拉德(Girard)，《的黎波里王国编年史》，国家图书馆，巴黎，法兰西手稿(古代史馆藏)12219，12220。
[21] 同上。
[22] 见 J.E. 拉弗斯，1982 年。
[23] A. 伊本·福尔图瓦(ibn Fartūwa)，1862 年。
[24] A. 伊本·福尔图瓦，1862 年，第 238 页。
[25] 同上，第 219 页；杜古尔提人向加奈姆移民。

展作出了贡献。

在博尔诺南部，加麦古等持不同政见的族群被一系列前线要塞(ribāṭ)所包围，与卫星国的统治者们均签有正式协定，要他们参加针对这些持不同政见族群的军事征服活动。㉖

加奈姆问题的最后解决

在首府省大部分地区平定并整合之后，伊德里斯·阿拉沃马将注意力转向加奈姆，要最终解决它对博尔诺的威胁。他制订了三条行动路线：彻底摧毁布拉拉人的军事力量和权力基础；破坏加奈姆国家的经济基础；将尽可能多的族群转移到博尔诺。

阿拉沃马对加奈姆发动了几次远征，布拉拉人遭到失败和连续不断的骚扰。㉗ 其他族群，如支持布拉拉人的卡内尼亚人，也受到无情的进攻，直到力量被削弱。㉘ 在其中一次远征期间，加奈姆的三个物产最为丰富的山谷受到抢劫，一些重要城镇如埃基马、阿加菲和阿戈被破坏，人口被迁移到博尔诺定居。㉙

被带到博尔诺定居的加奈姆族群有图布人、科扬人、库卢人和舒瓦阿拉伯人。库卢人和舒瓦阿拉伯人(均拥有牛群)，在首府省以西沿乍得湖南岸定居。㉚ 鼓励图布人和科扬人在博尔诺地区内并与邻近的豪萨兰和弗姆比纳做生意。㉛ 一些科扬人是赶骆驼的，被军队 **498** 的骆驼运输队雇用。㉜ 许多族群也在湖北定居，布拉拉人曾经由此地进攻博尔诺。其他族群，特别是图布人，在沙漠边缘定居，既出于战略原因，也是为了参与比尔马和穆尼尤的盐业生产和销售。其他族群肯定也出于经济或军事目的而被利用，但尚未发现有关的证据。

到16世纪80年代，阿拉沃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加奈姆国被博尔诺和布拉拉人以共同协定而分割，后者接受了博尔诺某种形式的松散的控制。㉝

内部改革

阿拉沃马似乎于1571年曾到麦加朝圣。㉞ 他回来后试图引进一些改革以使这个国家

㉖ B.M. 巴金都，1980年，第5章。

㉗ H.R. 帕尔默，1967年，第14页，认为这些远征发生在约1571-1575年。

㉘ 同上，第64-66页。

㉙ 同上，第49页。

㉚ 关于库卢人，同上，第49页；关于舒瓦人，见J.C. 泽尔特纳(Zeltner)，1979年，第22页。

㉛ H. 巴思，1965年，第2卷，第31页；G. 纳赫蒂加尔(Nachtigal)，1881年，第2卷，第148页；B.M. 巴金都，1980年，第164、286-290页。

㉜ H.R. 帕尔默，1967年，第55页。

㉝ J.E. 拉弗斯，1980年，第199页。

㉞ H. 巴思，1965年，第596页，认为伊德里斯是在他统治的第九个年头去朝圣的，也就是在1571年。这与H.R. 帕尔默关于加奈姆战争开始的年份相符(见注㉗)。有关年代的确定证实了D. 兰格所著编年史(1977年)的观点，本研究报告使用该编年史。

同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在政府中，他试图将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开，但似乎并未成功。[35] 然而，他确实成功地成立了上诉法院，在那里"学者和伊玛目们在阿米尔·阿里面前就法律和信条的疑点进行辩论"。[36]

据说马伊阿拉沃马用砖建造清真寺，取代了用芦苇造的旧清真寺。许多北非人和其他学者被吸引到他的朝廷来，它因此而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特点。

强大的地区经济的兴起

在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下，数次征服和人口变化，以及他的其他改革，导致了以大约两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首府省为基础的强大的地区经济的出现。在该地区的最东和最西部以及位于两者之间的比尔宁加扎尔加姆周围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商业中心。[37]

499 在东部，布杜马人和卡嫩布人沿乍得湖大规模捕鱼，[38] 而良好的牧地吸引了大量的卡嫩布、舒瓦和富尔贝牧牛人。[39] 定居的卡嫩布人和布杜马人也生产泡碱(kilbu)和盐(manda)。[40]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重要的都市中心在该地区迅速崛起，其中包括芒古诺、考瓦、布尔瓦和恩古尔诺。

在首府省的西部还发现了大量的泡碱矿藏，由曼加人和图布人开发。[41] 在南部，包括恩吉津人和贝德人在内的农业人口大量聚集在一起。这个地区在阿拉沃马及其继承人的各种活动之后，接受了比东部更多的各种移民。这里发展起来的许多都市中心因此而比东部的都市更具世界性。这些中心包括恩古鲁-恩吉莱瓦、马西纳 - 卡布沙里和马甲-卡乌里。

比尔宁加扎尔加姆及其近郊形成了第三个经济中心。它通过穿城而过的东西贸易路线很容易直接与两个地区联系。约贝河和加纳河还可以作为水路，特别是进行鱼类运输，而牛则沿着河岸从东方运往西方。比尔宁加扎尔加姆也是博尔诺-卡瓦尔-的黎波里贸易路线的终点，以及联结本地区与豪萨兰的主要路线的终点。它因此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中枢，有一个大市场和一个外商中心。[42] 在肥沃的灌溉区约贝河谷，集中居住着大量新出现的卡努里族群的居民。除比尔宁加扎尔加姆外，他们还在许多都市中心定居。在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之后，卡努里人开始向南面的加纳河畔和以远以及向北方的加鲁吉米和更远的地方扩散。

博尔诺也曾试图加紧对卫星国的控制。例如，经常从曼达拉得到铁和奴隶，从科托科人和巴吉尔米人那里得到皮革、象牙和奴隶。

㉟ J.E.拉弗斯，1971年，第37页。

㊱ H.R.帕尔默，1936年，第33-36页。埃尔萨米大约170年后称此为"布尔古兰姆"（burguram）；见S.W.库尔勒(Koeile)，1968年，第276页。

㊲ M.N.奥卡里(Alkali)，1983年，第64-69页。

㊳ P.M.雷德蒙(Redmond)，印制之中。

㊴ M.N.奥卡里，1978年，第158页。

㊵ P.E.洛夫乔伊(印制之中)。

㊶ 同上。

㊷ M.S.伊本·伊沙库(ibn Ishāku)，1929年，第544-5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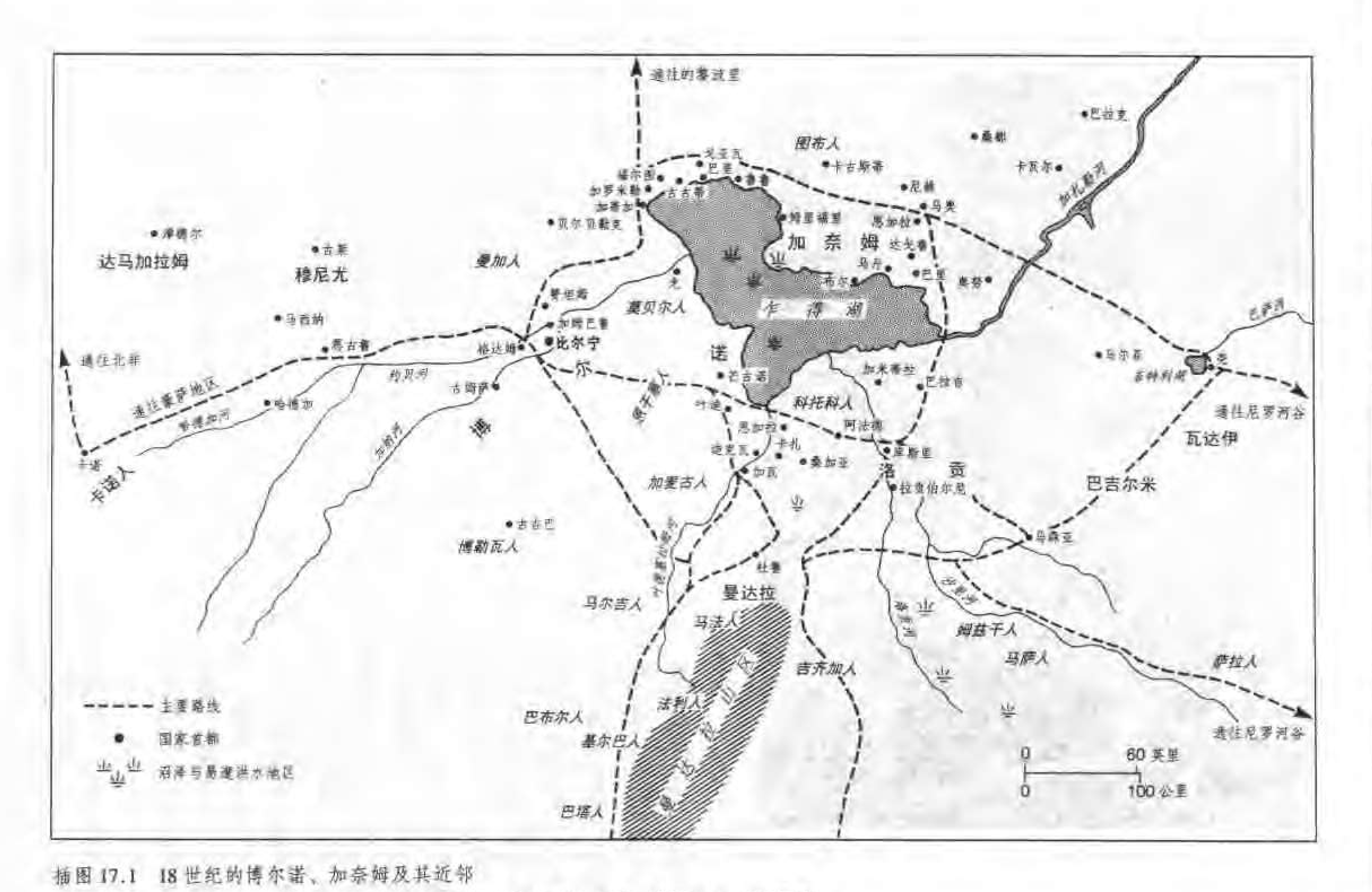


插图 17.1 18 世纪的博尔诺、加奈姆及其近邻

资料来源：根据约翰 F. 安特维所绘地图改编，贝那罗大学地理系，卡诺，仿照 B.M. 巴金都图。



图片 17.1 一位博尔诺织工正在织做衣服用的条状棉布(gabaga)

基础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如制陶、纺织、皮革加工、染色和运输等支撑工业的建立。[43]

泡碱和盐贩卖到大西洋沿岸、豪萨兰沃尔特河地区和北方的阿兹宾和阿德拉尔。在首府省内与曼达拉和豪萨兰以及撒哈拉绿洲进行鱼干贸易。奴隶、阉人、兽皮、象牙、香水、革制品和黄金穿越撒哈拉送往北非和埃及。作为交换，可获得马匹、马饰、军械、黄 **501** 铜、青铜和其他欧洲和北非的产品，回到博尔诺和比拉德苏丹其他地区销售。

从阿拉沃马统治时期开始，乍得盆地周围的各族人民明显地受到塞福瓦的鼓励而参与商业活动。我们已经提到了图布人和科扬人。科托科人和曼达拉人看来已到达卡诺；[44] 来自巴吉尔米的"科姆博里"商人在赞法拉山谷定居；[45] 卡德拉统治下的图布人定居在扎里亚。[46] 重要的是，他们都被认为是博尔诺人，[47] 并且肯定帮助新出现的博尔诺文化在豪萨兰和其他地区的传播。博尔诺是通过其地区经济、对贸易的控制和在伊斯兰教的至尊地位来实现此时对比拉德苏丹事务的控制。

马伊很少干涉贸易活动，而全力提供安全保障，使商路免遭恩吉津人和图阿雷格人等 **502** 的劫掠，并与撒哈拉和北非各国政府达成协议以保证国家和个人的贸易流通。[48] 塞福瓦政府更多地是参与市场组织、鼓励商人经商并获得岁收。在首都和其他主要中心，北非商人

[43] M.N. 奥卡里，1978 年，第 152 页。

[44] 作者不明，1967 年，第 112-114 页。

[45] P.E. 洛夫乔伊，1973 年 b。科姆博里(Komboli)是卡努里化的巴吉尔米语的"umboli"，意为"商人"。

[46] A. 史密斯，1970 年，第 88-89 页。关于卡德拉(Kadella)头衔及其在博尔诺和邻近地区的传播，见 B.M. 巴金都，1980 年，第 179 页。

[47] 阿农(Anon)，1967 年，第 112-114 页。

[48] J.E. 拉弗斯，1980 年，第 206 页。

(Wasili)被视为政府的贵宾。分给他们专门的住地(wasilinam)，并由一位有头衔的官员(Zanna Arjinama)管理其事务。[49] 在市场里，“马拉·卡苏贝”(Mala Kasuube)监督销售并保证主要商业交易的公正和公平。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头领，由其成员任命并得到政府承认。这些都有助于马拉·卡苏贝管理市场和收缴税款。

伊德里斯·阿拉沃马与土耳其和摩洛哥素丹的外交关系

由于一些文件的发现，阿拉沃马与奥斯曼和萨阿德王朝的外交关系受到几位学者的关注。[50] 然而，由于文件只是单方面的，主要是对阿拉沃马的回函，因此，对这些关系的了解仍不完整。然而，证据表明，通常猜想阿拉沃马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武器，是不正确的。

奥斯曼与博尔诺的关系开始于前者到达马格里布之时。从大约 1549 年奥斯曼控制费赞到大约 1570 年，双方关系看来是诚挚的。然而，在大约 1571 年，费赞给奥斯曼的年贡从通常的 1140 密斯卡尔(mithkal)黄金突然增加到 3000 密斯卡尔。[51] 奥斯曼的这种高压手段正好碰上荒年，许多人不得不移居到豪萨兰和博尔诺。奥斯曼在费赞的官员强迫留下的人，其中许多是老人，分担多出的部分。对撒哈拉绿洲的许多要塞发动的几次劫掠性的远征，显然是为了抓捕逃税的人。甚至从豪萨兰和博尔诺来的朝圣者也被拦住被迫交税，而那些在朝圣期间去世的人的财物则被充公。[52]

阿拉沃马肯定是在 1571 年去了麦加，从而获得形势的第一手信息。他当时一定是去

503 卡瓦尔接受加多人的臣服并听取他们的抱怨，因为他们可能是奥斯曼的受害者。[53]

博尔诺对费赞的关注[54] 以及马伊们对朝圣路和商路安全的关注，促使阿拉沃马在大约 1574 年派一六人使团前往伊斯坦布尔，提出三项要求：保障所有在奥斯曼领土上旅行的博尔诺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适当管理最近获取的费赞以南包括古兰在内的所有要塞，否则让与博尔诺；在对付令人烦恼的图阿雷格人和其他国家扰乱地区和平的问题上两国进行合作。似乎没有提到或要求军火。[55]

素丹穆拉徒三世于 1577 年 5 月 5 日复信同意了所有的要求，除了割让古兰的要塞。不过，他允诺今后进行适当管理。[56] 信件送达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埃及总督以及费赞的地方官，通知他们阿拉沃马的要求并命令他们服从。[57] 从此以后，两国继续保持诚挚和良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

此外，认为阿拉沃马在 1583 年前后派使团面见摩洛哥素丹曼苏尔的唯一目的是要求

---

[49] M.N. 奥卡里。1983 年，第 72 页。
[50] 例如，见 B.G. 马丁(Martin)，1972 年和 M.A. 奥哈吉，1983 年。
[51] C. 奥尔汉卢(Orhanlu)，1969 年。感谢约翰·拉弗斯将此文件译成英文。
[52] 同上。
[53] A. 伊本·福尔图瓦，1862 年，第 203 年。
[54] 关于博尔诺对费赞的关注，见 B.G. 马丁，1969 年；J.E. 拉弗斯(印制之中)。
[55] 见穆拉德对伊德里斯的回信草稿的复印件，C. 奥尔汉卢，1969 年和 M.A. 哈吉，1983 年。
[56] C. 奥尔汉卢，1969 年。
[57] 同上。

给予军火，可能也不是事实。

摩洛哥人在1578年在卡比尔堡的胜利被普遍作为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一次意识形态的胜利来庆祝。[58] 庆贺胜利的代表团来自博尔诺和其他所有主要穆斯林国家：阿尔及尔、奥斯曼和桑海。[59] 此外，阿拉沃马肯定对奥斯曼-萨阿德拟议联合出征感到担心。出征的目标可能是撒哈拉绿洲，甚至是苏丹。[60] 作为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阿拉沃马为挫败拟议中的这次冒险，提出博尔诺-摩洛哥组成联合部队对撒哈拉绿洲远征，从而再次陷入某种不安全的状态。根据摩洛哥掌握的史料，这一使团的成果是，作为其要求的代价，阿拉沃马接受了曼苏尔要做当时的哈里发的要求。[61]

与某些作者的观点相反，双方肯定对谈判非常满意。摩洛哥在意识形态上得到苏丹一个主要国家承认曼苏尔的哈里发称号，从而加强他对桑海的要求。[62] 对阿拉沃马来说，如504 果因此而阻止了摩洛哥-奥斯曼联合反对博尔诺或者其利益所在任何的地区的行动，不管行动是真的还是假想的，这个代价都是值得付出的。

对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的后15年所知甚少。他可能是专心于巩固他在博尔诺进行的改革和革新。在他的统治末期，曼达拉和巴吉尔米两国的迅速发展肯定是一个主要问题。曼达拉不仅放弃了它与阿拉沃马早期关于联合远征加米尔古的协定，而且还促使在它与博尔诺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阿拉沃马被迫组织了对曼达拉的几次远征，但大都失败了。在巴吉尔米，虽然阿卜杜拉·卢贝科(约1561-1602年)可能借助博尔诺的支持取得了王位，但他也开始制造事端。在一次抗击阿卜杜拉的战役中，阿拉沃马据传被一个加麦尔古人暗杀。

与某些作者的看法相反，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死并没有导致博尔诺帝国的崩溃。事实上，在他之后的四位继承人统治时期(约1596-1677年)，早期的征服得到了巩固，政府管理机器终于成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卡努里人最终作为一个带有鲜明文化特点的民族集团出现了。[63]

卡努里人的社会和物质文化

卡努里之称可能出现于17世纪初期，[64] 指的是博尔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集团，塞福瓦国王的权力便是以他们为基础。这一族群是由来自加奈姆的马格米移民与博尔诺讲乍得语的人们通婚而产生的，如前所述，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活动加快了其发展，在卡努里族群内部还有许多小族群，但本章的目的不是要进行如此细微的区分。正是通过卡努里文化构成了博尔诺文化的基础，随着卡努里人的外出旅行或其他集团通过政治或经济的控制

[58] D. 雅赫亚(Yahya)，1981年，第105页。
[59] 同上。
[60] 同上，第112页。在1581年，奥斯曼提出奥斯曼-摩洛哥联合计划"以加强他们的地位"。
[61] 同上，第150-151页。雅赫亚对承认伊德里斯对曼苏尔表示"效忠"(baya)持谨慎态度。
[62] 曼苏尔当时正考虑入侵桑海，他最终于1591年采取了行动。
[63] B.M. 巴金都，1980年，第5章。
[64] 最早提到这一名称是穆罕默德·塔希尔易卜拉欣·法拉蒂(死于1776年)写的一首讽刺诗，M. 贝罗(Bello)引用，无出版日期。

或联系，或者通过伊斯兰化而接受卡努里文化而将这种文化传播到首府省之外。

大部分卡努里人住在村中用草席(sugedi)围起的几个圆形小屋里，小屋是木结构的或泥墙搭建，并有锥形草顶。在较大的镇子里，大多数小屋如清真寺由泥墙建造，而有钱人的住房通常围着高高的泥墙。[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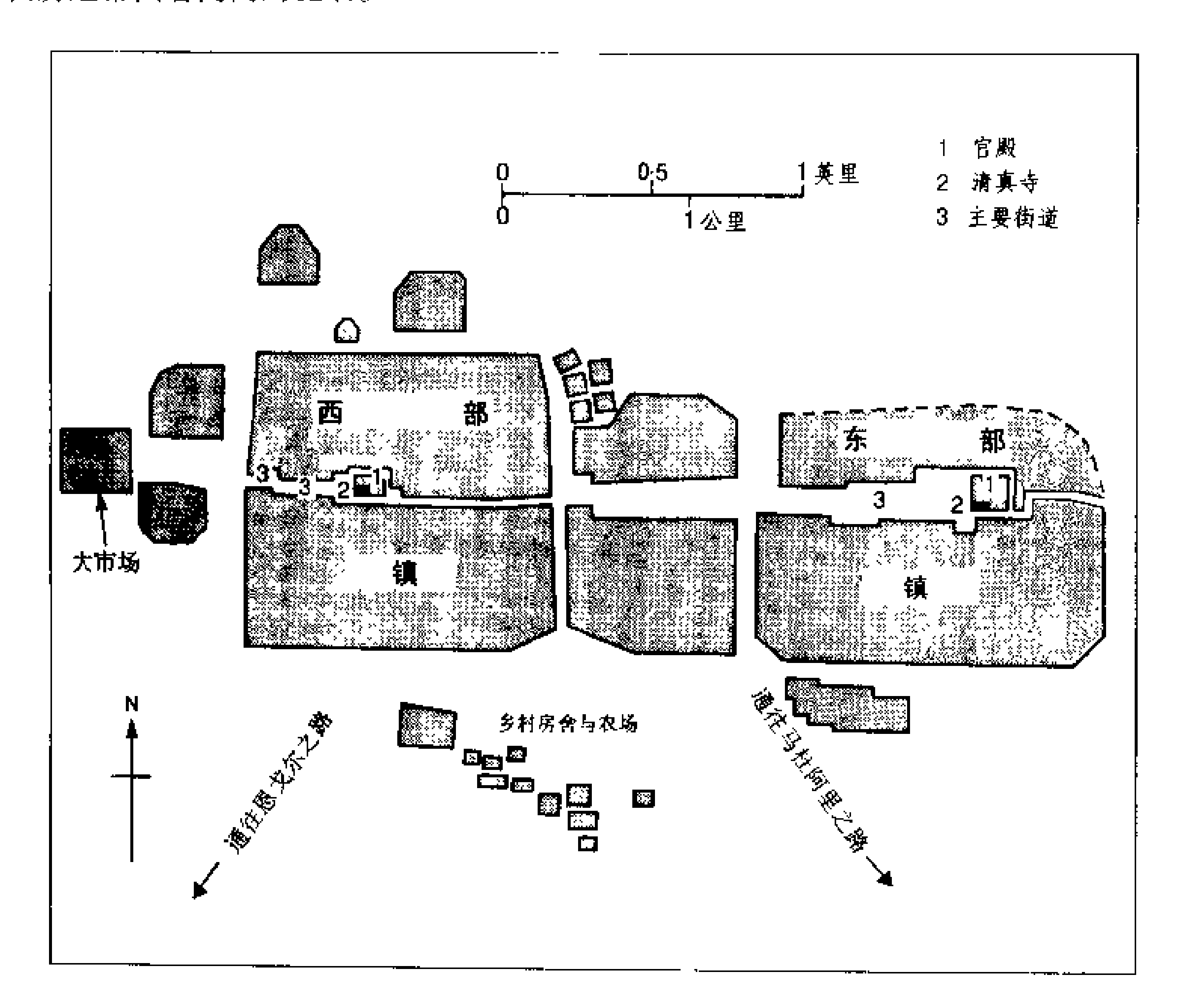


插图 17.2 19 世纪博尔诺首都库卡瓦的平面图，传统的卡努里复合形建筑
资料来源：根据 H. 巴思图改编，1957 年，第 2 卷，第 50－51 页。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编。

大部分卡努里人的城镇和村庄是U字形的。U字的开口处(dandal)是定居点的主要街道。它面朝西并通向城镇统治者的宅邸，旁边是定居点的主要清真寺。 505

在比尔宁加扎尔加姆和一些最重要的城镇，如恩古鲁、马西纳和加姆巴鲁，住房通常是长方形的，带有厚泥墙和平屋顶。比尔宁和加姆巴鲁的王宫、他们的主要清真寺，以及像恩格鲁的“加拉迪马”和马西纳的“马西纳马”等重要官员的豪华住宅，都围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砖墙，[66] 这是卡努里文化的特点之一，它似乎盛行于 16 世纪中到 18 世纪初。[67] 在征服和不安全的时期，这种墙肯定是用来加强保护的。比尔宁加扎尔加姆和其他重要城镇围筑泥墙(gauru)和沟渠(belaga)以加强防卫。 506

[65] A. 冯·杜伊斯伯格(Duisburg)，1942 年，第 92-95 页。
[66] A.D.H. 比瓦尔(Bivar)和 P.C. 欣尼(Shinnit)，1962 年。
[67] H.R. 帕尔默，1936 年，第 253 页，提及由穆罕默德·汉顿(约 1729－1744 年)建造的一座豪华的砖墙建筑。

典型的卡努里人，从其语言和体征可辨认出来。无论男女，两边面颊都有明显的竖直的标记。未婚女子通常梳一种特殊的发式(kela yasku)，而已婚妇女将头发梳成冠状(jurungul)。[68] 妇女都吃柯拉果，牙齿涂烟草花(gorongo 或 fure)，[69] 手脚染散沫花(nalle)，一个鼻孔置一粒珊瑚珠或金属扣。她们通常穿染色的棉布长衣(gimaje)，知名妇女则戴穆斯林头巾(kalaram)。



图片 17.2　加姆巴鲁的马伊夏宫围墙，建于约 1570-1580 年

男人穿不染色或染成蓝色的开身棉布宽松长袍(tobe)，上层人物穿用昂贵的进口布料做的各种长袍。在 18 世纪后期，他们戴使用不便的大号穆斯林头巾，看来是借鉴了 17 世纪奥斯曼的习惯。[70]

507　婚俗也表现出卡努里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如果好好研究，会发现形成这种文化的许多因素：伊斯兰礼仪和马格米人及博尔诺人的习俗。[71] 婚约(nyia)是按伊斯兰礼仪制定的，但婚约前后的仪式却表现出其他文化特点。其中一种称“卡林博巴拉塔”(kalimbo barata)，即新娘的朋友走进灌木丛收采棘刺树(kalimbo)的枝条，用它假装抽打新郎和他最好的朋友。另一个例子是“卡拉巴”(kalaba)，这是婚礼的最后仪式，包括读《古兰经》同时进行某种看来是伊斯兰教以前的入会仪式。[72]

卡努里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它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统治阶级或贵族(kontuowa)和平

[68] D. 德纳姆(Denham)，1826 年，第 2 卷，第 144 页，注释；G. 罗赫夫斯(Rohlfs)，1875 年，第 2 卷，第 7 页；R.E. 埃利森(Ellison)，1936 年，第 529 页；I. 伊马姆(Imam)，1969 年，第 514 页。在博尔诺，发式多次变化，因此早期的发式很难确定。乌斯曼·格达姆，阿米纳与贾金吉·马拉，私人通讯。

[69] 烟草是在 17 世纪引进博尔诺的。这种行为也许从那时开始。

[70] D. 德纳姆，1826 年，第 1 卷，第 230 页对页插图。

[71] R.E. 埃利森，1936 年，第 531-532 页；I. 伊马姆，1969 年，第 515 页。

[72] “卡林博巴拉塔”和“卡拉巴”的部分仪式，据说都是马格米人从所谓的萨奥人那里引进的，他们到达时最先遇到萨奥人并与他们通婚。

民(tala'a)，而这两者本身还有几种等级。不同的说话方式、服饰、家具、建筑和住所表明其所属的阶级和等级身份。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民族、职位、出身、年龄和居住时间。通过获得更多的财富、与统治阶级交往或者获得高级别的职业可提高个人的地位。[73]

注重上下阶层的关系是卡努里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社会下层必须对社会上层人士公开表示尊重。此外，社会下层之人必须登门拜访(nona)其社会之父，并听其差遣。[74] 长者则要对其下属给与报偿，向他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和保护并提高他的社会利益。根据科恩的说法，卡努里人的最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财富便是拥有一大批依赖并从属于他的食客。[75]

如前所述，伊斯兰是卡努里文化的基础之一。伊斯兰教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甚至渗入到卡努里民俗的肌体之中。伊斯兰教的许多专有词汇已经"卡努里化"，致使其原意已被改变。例如，"kasalla"（意为洗任何物品，甚至是动物）便是采用阿拉伯语中的"sallah"（祈祷者）一词。[76]

博尔诺当时是一个学习中心，吸引了来自比拉德·苏丹、北非和中东的大量学生和访问学者。博尔诺专门用卡嫩布语[77] 评论《古兰经》(tafsīr)，以阿拉伯字母书写博尔诺语到17世纪肯定已发展起来。[78] **508**

学者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伊斯兰教办事处的任职者——伊玛目、卡迪、马伊的伊斯兰教和法律顾问，"梅宁基南迪"（mainin kinendi），警察总管兼地方行政官"塔尔巴"（Talba），司库"卡津"（khazin）和瓦齐尔(wazir)。他们是大乌里玛，帮助马伊管理伊斯兰政府，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仅限于几个主要的学者家族。大学者们应该是博学而虔诚的，但由于他们拥有制度化的官衔并因此而与世俗权力相联系，致使他们与朝外的学者们越来越疏远。后者批评他们出于政治上的私利支持宗教变革(bid 'a)和国家传统(ada)。[79]

较为简朴的学者住在远离宫廷和城市的乡村"学者家族"（malamti）里，他们在那里教书和传播宗教。在塞福瓦时期，大多数此类学者得到国王的支持和庇护。国王还赠给许多人"马赫拉姆"（mahram）。[80] 他们帮助伊斯兰教在首府省的乡村地区传播，并传到邻近国家。然而，他们也对塞福瓦的统治第一次提出强烈的批评。

大多数塞福瓦国王试图加强他们的权力，为此，他们不仅庇护乌里玛，还对外表示他们的虔诚，并且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博学之人。这种态度——似乎是企图加强引进伊斯兰教之前的统治者的超自然力，[81] 因为知识使其拥有者具有可获取超自然力的声望，因此被

---

[73] R. 科恩(Cohen)，1970年。

[74] R. 科恩，1965年，第363页。

[75] 同上，第364页。

[76] S.W. 库尔勒，1968年，第114页。详情见J.E. 拉弗斯，1971年。

[77] A.D.H. 比瓦尔和P.L. 欣尼，1960年，第199-205页。

[78] 同上。

[79] M. 贝罗，无出版日期。

[80] "马赫拉姆"是马伊赠给一些学者家族和少数商业集团的免除税收和兵役及享有特权的文书。关于各种"马赫拉姆"的情况，可参见H.R. 帕尔默，1936年和1967年。

[81] 例如，阿里·乌玛尔被认为是博学而虔诚的并拥有超自然力。他曾五次朝觐麦加，在第五次返回时，死于开罗附近。

许多邻近的统治者所采取，他们采用的是博尔诺的宗教和政治结构。[82]

政治组织

马伊是制度化了的王室家族的首领、国家最高首脑和土地的名义拥有者（larde kangema）。他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作为信徒的首领（Amīral-mu'minin），他是穆斯林的首领以及国家和私人事务的最终裁判者。[83]

509

10世纪时被穆哈拉比生动地描绘过的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国王们的神圣标志，[84] 似乎一直保存到伊斯兰时期。国王仍然是大部分时间与人隔离的，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是呆在笼（fanadir）中，人们只能通过中间人与他交谈。[85] 穆斯林学者们看来是以几种方式加强了国王的这种神圣的象征。例如，"埃德拉"（Idara）那位学者声称上帝"使某些人成为国王并使被选作国王的人性格完善……"[86]

在16世纪，伊本·福尔图瓦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穆斯林的信念表示赞同，他说："有素丹的地方，尽管他邪恶，也比没有素丹的地方好。"[87]

马伊是从称为"马伊纳"的合法王子中选出的，他们的父亲是国王。然而，继承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遭到王朝内部其他派别和外部叛逆的纳贡国的反对，为避免在国王空位期出现叛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选出新的国王。然而，负责推定继承人的部门似乎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职能。[88] 从马伊伊德里斯·阿里（约1677-1696年）或更早的时候起，国王们似乎就已经在消除候选人的对手，这可能是从奥斯曼那里学来的。[89]

王室家族机构中的其他成员都从属于国王。其中包括以王后（gumsu）为首的国王四名有头衔的妻子、妃嫔、王子和公主（mairam）。另外还包括王太后（magira）和国王的法定姐妹（magram）。王后负责管理王宫，王太后除拥有国家最大的封地外，还有权准许庇护。法定姐妹通常负责监督御膳的烹制。

国王的妻子一般选自国家重臣的家族，[90] 而公主则嫁给重要的宗教官员和特设职衔拥有者（torwe）。[91] 王子大都住在宫外并受到严格控制，有些被授与封地。王子中最重要的是推定继承人（chiroma）和北部省份督察（yerima），后者通常是一位先王的孙子（maidugu），这意味着他决不会成为国王。

511

国家的最高委员会是"马吉利斯"（majlis），正常情况下由国王主持，由军队和宗教

[82] 曼达拉的例子，见B.M.巴金都，1979年，第44页。
[83] M.N.奥卡里，1985年。
[84] J.F.P.霍普金斯（Hopkins）和N.列夫齐昂，1981年，第171页。
[85] R.科恩，1970年。
[86] 穆哈马杜·延布（Muhammadu Yanbu），见J.F.A.阿贾伊和B.埃卡拉（Ikara），1985年。
[87] A.伊本·福尔图瓦，1862年。
[88] 例如，甚至连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推定继承人（比利）也未能立即继承。
[89] 见B.M.巴金都，1979年，第41-42页。
[90] G.C.莱瑟姆（Lethem），1919年。
[91] J.C.佩特森，1920年。



图片 17.3　19 世纪 20 年代博尔诺的马伊接见德纳姆-克拉珀顿使团

方面的名人组成，据说共有 12 人，但不同的资料来源表明人数各有不同。委员会一般包括前面提到的伊斯兰教顾问以及军队司令官："叶里马"（yerima）、"凯加马"（kaigama）和"加拉迪马"（galadima）。有些资料来源中还包括国王的有权势的奴隶，其中有些是宦官。马伊的朝廷（noguna），由首府的所有名人组成，每日上朝。

所有的城镇、村庄和种族单位都划分为封地（chidi），国家所有主要官员都是封地的所有者（chima）。他们负责在其封地上维持秩序，收缴税赋并为军队征募兵士。所有的封地拥有者，除了加拉迪马之外，都住在首府，由其晚辈封地拥有者（chima gana）代表他们。所有封地的封赏都取决于国王的兴致，他有权没收、减少或重新安排他们的封地。乡村的人民受地方或民族领导人（mbarma）或（bulala）的统治。

塞福瓦的收入包括救济金（zakāt）、过路税（dibalram）、贡品（kultingo）和战利品。所有

参与收缴税赋的人都为自己保留一部分，而主要官员保留大部分，将剩余的作为贡品交给国王。然而，马伊和封地拥有者应该将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作为礼物重新分配给他们的属下，而且要求他们同样地再分给各自的随从。

博尔诺的黄金时期

博尔诺的黄金时期是17世纪，而不是大家所说的16世纪。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征服已经完成并得到巩固，还进行了行政改革以使扩张中的帝国便于管理。正是在乌玛尔伊德里斯统治时期(约1619-1639年)，恩古鲁的“加拉迪马”和加奈姆马奥的“阿利法”(alifa)作为官职得以确立，他们作为半自治的封臣分别管理国家的西端和东端。[92] 沿着沙漠的边缘，在穆尼尤和马西纳(18世纪又在加斯克鲁、图恩比和达马加拉姆)建立起缓冲国作为图阿雷格人进攻首府省的障碍。[93]

此时，阿卜德·卡里姆·詹姆(约1611-1655年)建立了瓦达伊，当时他在博尔诺学习。这无疑带着博尔诺的祝福，因为瓦达伊的出现在一段时期内抑制了巴吉尔米进人博尔诺领土的扩张主义态度。像其他邻国一样，瓦达伊也落入了博尔诺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的势力范围。[94]

512

此时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外交和商业关系进人了一段最活跃的时期。贸易十分活跃，以致于在大约1636年，的黎波里的穆罕默德·萨基兹里(约1633-1649年)给马伊乌玛尔写信说，他们两人应该和费赞的素丹一起将贸易完全垄断，[95] 几年以后发现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冒险。当时与埃及的关系肯定也很好，这是由于贸易的关系，而且因为埃及位于朝圣的路上。可能正是在此时期，玉米、番茄和巴婆果等新作物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埃及引进博尔诺。[96]

到17世纪，特别是到阿里·乌玛尔统治时期(约1639-1677年)，博尔诺已经成为比拉德苏丹的主导大国。它不仅是一个学习和文化中心，而且还是穆尼尤、比尔马和乍得湖周围所有容易开采的盐矿资源的控制者。它与地中海沿岸密切的贸易关系使它控制着地中海输往中苏丹国家的商品的重新分配。[97] 它在国内拥有强大的地方经济。马伊被公认为该地区伊斯兰国家无可争辩的领袖，博尔诺在整个地区被看做是伊斯兰世界的第四个素丹王国。[98] 大多数国家看来已自愿地将它们置于哈里发的保护之下，以便从他的祝福(baraka)中获益并得到所需的商品。正是这种制度的普遍腐朽导致了塞福瓦的衰落和最后的崩溃。

---

[92] A. 贝尼什克(Benisheikh)，1983年，第41页；J.E. 拉弗斯，1980年。

[93] J.E. 拉弗斯，1980年，第203页。

[94] G. 纳赫蒂加尔，1874年，第50页。

[95] D. 吉拉德(Girard)，手稿，12219。

[96] 在卡努里和乍得湖周围及豪萨地区人们所讲的其他许多语言中，有关玉米(Masara 即“埃及的”)和巴婆果(Bambus Massarabe，即“埃及的甜瓜”)等词汇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说法，即这些作物源于埃及。

[97] P.E. 洛夫乔伊，1978年。

[98] M. 卡蒂(Ka'ti)，1913-1914年，第65页。《历史》(Ta'rikh)已经数次编辑，这段历史写的可能是1591到1655年间的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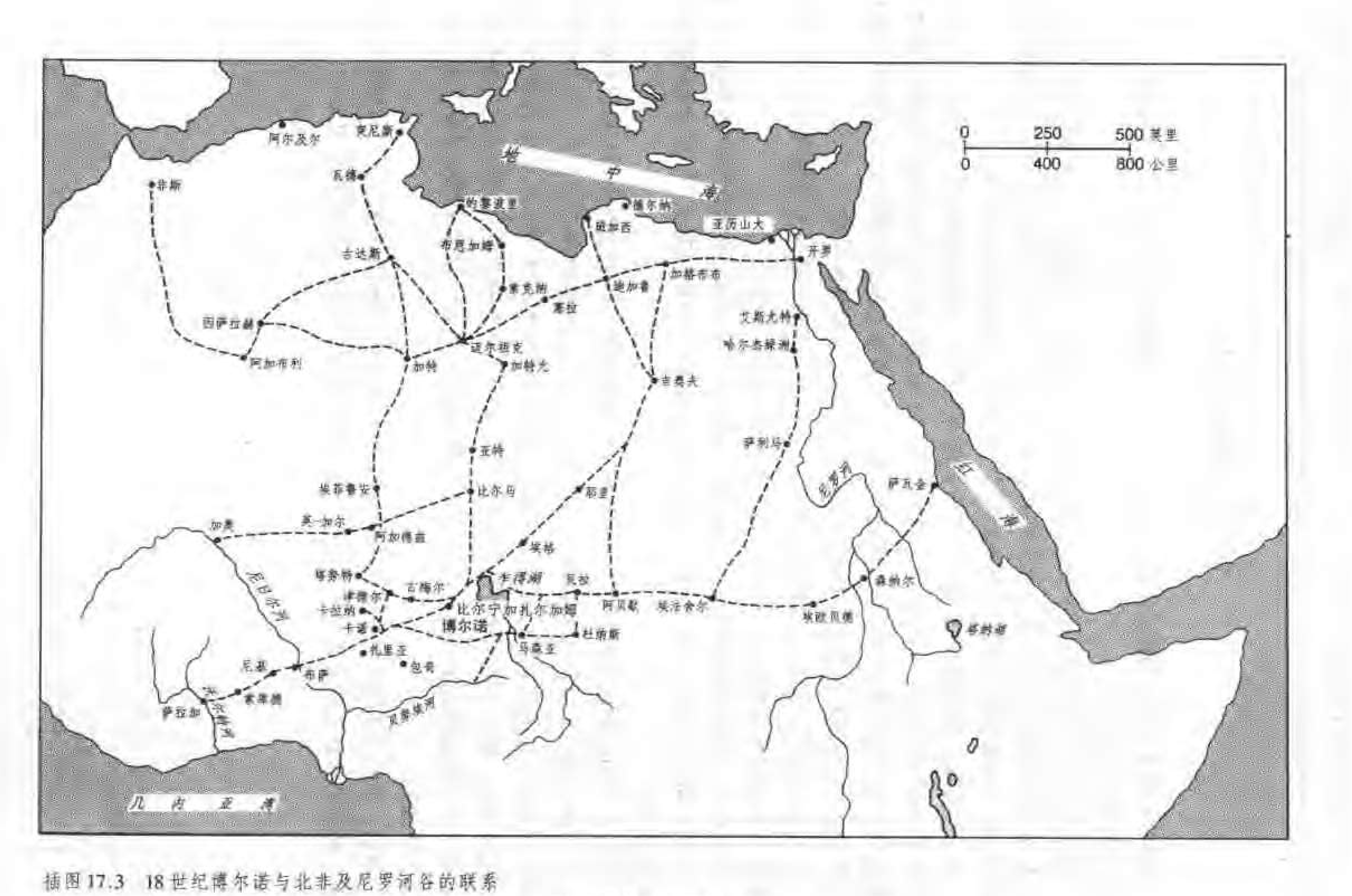


插图17.3 18世纪博尔诺与北非及尼罗河谷的联系

资料来源：根据约翰·F. 安特维所绘地图改编，贝耶罗大学，卡诺，仿B.M.巴金都图

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半叶的国王们试图维系他们继承下来的制度，而且看起来工作出色。口头传说大都认为传统的博尔诺主要建立在存在于18世纪的塞福瓦制度之上。

18世纪后期的危机

在阿里·伊本·杜纳马统治时期(约1742-1792年)，博尔诺进入了一段危机时期，在19世纪的圣战时达到顶点。

在西部博尔诺，贝德人集中袭击前往豪萨地区的商路，而在北方，阿加德兹的图阿雷 513 格人日益增多的袭击导致1759年失去重要的比尔马盐矿，及至后来丢弃了沙漠边缘地带许多城镇。[99] 这促使曼加人向南迁移到豪萨兰、索塞堡基诸国和恩加齐尔省。

在巴吉尔米，穆罕默德·阿敏(约1715-1785年)挣脱了博尔诺的霸权，发动了一系列对博尔诺东部前沿的进攻，同时加乌达(约1747-1795年)统治下的瓦达伊还在继续实施对加扎勒河的扩张主义政策。[100] 这些进攻促使图布人、卡嫩布人和舒瓦阿拉伯人迁移进入加奈姆和首府省，[101] 因此在长期遭受严重饥荒的牧民中引起对牧场的争夺。

在大约1781年，曼达拉人叛乱并在几次交手之后使博尔诺的力量遭到重创。[102] 此后是索塞堡基诸国[103] 的叛乱，以及在大约1786年戈比尔的叛乱。[104]

面对动乱、饥荒和贫瘠的草场，许多富尔贝游牧部落放弃了首府博尔诺而转移到豪萨兰、曼达拉和弗姆比纳。然而，哪里也找不到他们所要的和平与安全，[105] 这是积极参加圣战的部分原因。

朝外学者和普通穆斯林指责这场危机是由于塞福瓦统治者日益腐败和马伊没有能力防止人民中间不同宗教信仰的不断调和。朝廷的学者同样由于默许统治者日甚一日的宗教调和而受到指责。其他学者(如 karabiwa mallam)试图完全摆脱这个他们认为是腐败的社会。当圣战爆发时，豪萨兰的臣属统治者们要求马伊履行他作为哈里发和庇护人的义务提供援助。他不仅不能提供援助，甚至连自己也被圣战者赶出首都，这意味着哈里发失去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尽管圣战确实促使封臣诸国纷纷倒台并结束了塞福瓦的统治，但马伊们建立的制度，特别是在首府博尔诺建立的制度确实一直保存到20世纪，尽管有所改变。

(时永明 译)

---

[99] J.E. 拉弗斯，1980年，第208页。

[100] G. 纳赫蒂加尔，1874年，第100-101页；J.E. 拉弗斯，1980年，第208页。

[101] 阿农，无出版日期。

[102] B.M. 巴金都，1980年，第390-391页。

[103] I. 兰多林(Landorein)，1910-1911年，第427和429页。

[104] A. 伊本·穆斯塔法(ibn Mustafa)，特别是手稿49，第46和76页。

[105] 关于豪萨地区，见Y.B. 乌斯曼，1981年；关于曼达拉，见B.M. 巴金都，1980年，关于弗姆比纳，见A. 萨阿德，1977年。

18 从喀麦隆草原至尼罗河上游

E. 姆博科罗

序　言

非洲这一地区1500至1800年的史料不如其他地区丰富、连贯、准确。这不仅由于一般只注重现状研究而系统研究不够，而且还由于在 19 世纪以前似乎受到极大限制，不可能进行研究。在政治组织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地区，多在 18、19 世纪很晚才形成国家。就等级制程度较低的民族而言，其口头传说似乎提供不了什么资料，而且很少追溯到几代以前，最多不过五六代。而现有资料往往记述的只是某一家系的历史，除了常见的诠释上的问题之外，还提出各种资料的相互联系问题，以及如何使其形成整体概念的问题。因此，根据这类资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是暂时性的，而其他资料又非常匮乏。自 16 世纪以来，少数旅行家对这些同外国人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就有所记载，例如，大西洋沿岸就完全包括在这一地区之内，而靠近穆斯林各地区的北部边境地带，则确实只在 19 世纪才有穆斯林旅行家访问过。此外，考古研究、历史语言学与人种语言学则刚刚在这一地区兴起。 515

此外，没有一种单一的因素可使该地区各部分统一起来。森林确实是该地区主要自然特征，尤其在 16、17、18 世纪，该地区森林覆盖面积肯定大于今天，许多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大草原。人口稀少看来是另一个共同特征，但同现在一样，那时也有许多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尤其是大草原与水路沿线。至于各民族，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与组织形式是极其不同的，这种差异性以及资料信息的必然分布不均，促使我们有必要对该地区进行研究。

北部边境地区

516

该地区的北部，西从喀麦隆中部高原，东至尼罗河，是史料最为缺少的地区。例如，值得注意的是，可供查考的最新编年史料中有关公元 1800 年以前的史实不多。[①] 19 世纪以前，用 E.M. 奇尔弗的话来说，历史学家尚局限于“合理的推测”，而且只能在狭窄的地理范围内推测。人种学和历史学著作，首先把研究局限在民族集团方面，直到最近，才把研究局限在当代国家方面，这种倾向致使地区性综合探讨，不但有困难，而且冒险。因

① 例如见 P. 卡尔克(Kalck)，1980 年与 E.M. 奇尔弗(Chilver)，1981 年。

此，对那些文化上有某些相同之处，或者至少有某种共同命运的小地区加以界定，似乎是明智的。

喀麦隆中部高原

这里草原较肥沃，也许很久以前就有人居住，在16、17世纪人口流动以前已有人定居，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其影响至今仍显而易见。② 关于这种情况，至少有两点可资证明。其一是，其植被过去曾经是茂密的森林，今天则成为长有树木的大草原。草原化(草原化的年代资料尚未建立起来,草原化过程也显得极其复杂)可能是密集的人类社会缓慢进步的行动所引起，是少数移民意外的、野蛮行径所使然，甚至是受气候影响的结果。其二是，无数石器的出现，证实了在铁器制造普及以前定居者所从事的职业，而铁器制造大概于第一个1000年后半期就出现了。但仍无法判明这些古代人是什么人。他们也许就是俾格米狩猎者，因为在姆巴姆河两岸还有他们的少数后裔；他们或许是操原始班图语但尚未发现金属加工的人；或许是几个不同民族因流动而形成的混合体。

从16世纪起，情况才开始明朗化。据传说，人口流动包括多种人群在内：家族或亲属集团；密集而又积极进取的民族集团；还有单独的个人。所有这些证据说明，移民人数不多，其原因是，在控制早已在此定居的各民族(这说明技术上的某种优势)的同时，他们所到之处，放弃了自己的语言，采用了定居地的语言。在政治机构中，可能也是这样。传说还揭示出人口流动的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内部的争斗、为了寻找铁矿与所需木材,以及重新获得土地。而这一切也许都是由于引进玉米、种植油棕榈、发展食盐贸易，以及北方侵略者施加压力所造成的结果。北方的因素，尤其是富尔贝人的侵略，在19世纪是人所共知的，其涉及的时间更早，自18世纪中期起，甚至更早。在巴蒙王恩卓亚的要求与督促下撰写的名著《巴蒙人的历史与习俗》提到某个时期入侵的骑兵，这个时期正相当于18世纪。此外，喀麦隆中部高原居民所操姆布姆语的词汇与句法，许多是从富尔富尔德语(阿达马瓦语的变体)借用来的。因此看来情况是这样，由于富尔贝人将姆布姆人向南方驱赶，姆布姆人便迫使沃特人往南流动，于是引起了芳人与贝蒂人的迁徙。

517

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之间这种不断的碰撞，伴随着各方面的融合与借鉴，成为喀麦隆中部各民族文化具有明显同一性的主要因素。③ 这些民族均操班托伊语或半班图语。他们的政治、社会机构也有许多类似之处。例如，人类社会都由酋邦、甚至王国组成，其首领乃神圣的象征，他们在一位地位显赫的王族女性(太后或王姨)辅佐下，率领一群拥有称号的人，而男性则分属于许多具有宗教与警察职能的社团——秘密社团与/或军事组织。在工艺方面，尤其对铁与铜的加工，也总是不相上下。据认为，金属工匠们都具有神奇的力量，他们在神话与历史传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800年前后完全建立起来的这种同一

② C. 塔尔迪兹(Tardits)，1981年，第14页和第459-484页；T. 伊荣杰塔(Eyongetah)与R. 布雷恩(Brain)，1974年，第34页。

③ T. 伊荣杰塔与R. 布雷恩，1974年，第36－38页；M. 麦克洛(McCulloch)等人，1954年，第11页及以下有关部分。

性，早在若干世纪以前即逐步形成。

在这许许多多民族中，有三个民族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蒂卡尔人，这个民族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在喀麦隆高原有许多民族声称自己或是从蒂卡尔人演化而来，或是深受蒂卡尔人的影响。④ 据说，他们是博尔诺某商人的后裔，这位商人在姆布姆人中定居下来并繁衍了后代。各种传说认为他们起源于喀麦隆东北部(蒂巴蒂、巴尼奥、基米、恩多博)。蒂卡尔人原本是第一批离开自己家园来到高原的姆布姆人的别称，但后来便成为所有姆布姆移民以及被他们征服的各民族的别称。这次大迁徙很可能发生在17世纪，这是由于来自富尔贝人的压力，以及内部纷争和重新要求土地的缘故。当蒂卡尔人到达巴门达人所在地区时，遇到了图穆人，图穆人起初是他们联合的对象，后来则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是他们的胜利却付出了代价，他们采用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和他们的机构，尤其是政治称号与秘密社团。在被征服者中，有几个集团选择了向西和向西北方向迁徙，他们在那 **518** 里建立了几个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如恩索王国。恩索王国某些特点后来传授给了本地区其他王国，如神圣王权，崇拜逝去的君主，严格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保留王室男女成员某些称号与职能，保留一大批宫廷贵族以及每个村庄的男性秘密社团。

巴蒙王国的基础，是与恩索的蒂卡尔人王朝有关的一部分移民建立起来的。⑤ 但这些事件发生的年代难以确定，我们只注意到，在《巴蒙人的历史与习俗》一书中提到，在王国创建者恩恰尔与姆布姆布之前的统治者库图之间共有十位君王，而姆布姆布的统治则是在19世纪上半期。某些传说认为，恩恰尔是从利福姆被赶出来的，另一些传说则认为，他是与几个伙伴自愿迁徙到今巴蒙人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他是一个战胜过大约18个统治者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民族中，有些人已经逃亡，有些被吞并，恩恰尔还在丰班建立了巴蒙人的首都，当时称为姆丰班(从废墟(fom)中建立）与姆班(被征服的前居民)。恩恰尔还设立了王国的政治机构，这些政治机构大都是从蒂卡尔人那里移植过来的。他成立了一个有大批称号拥有者参加的机构，其中包括“孔恩古”(Kom ngu,即王国顾问)，他与这些人共同分享获得的土地；他建立了两个秘密会社，一个叫“恩吉利”(ngiri)，是专为王族组织的，另一个叫“米通古”(mitngu)，参加者是其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包括被征服民族的后代、大的家臣、王国顾问等)。然而，巴蒙人废弃了蒂卡尔语，采用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姆班语。巴蒙人整理的传说完全忽略了恩恰尔之后的九位君主，说他们“依靠恩恰尔双手创下的基业，绵绵长寿，无所事事”。这些统治者并非征服者，因为领土的扩张是19世纪初姆布姆布统治时期才开始。尤其在18世纪，王国除内部相互倾轧外，还面临来自北方的昌巴与富尔贝侵略者的严重威胁。然而，在这个时期可以觉察到某些值得注意的新事物。王室大规模的一夫多妻制的发展，造成王室家族成员剧增，到18世纪末达61人。宫廷贵族人数也大为膨胀，家臣已有27大世系。君主的家臣，大多数从王妃所生儿子中挑选。对其物质与社会的发展情况知之甚少。18世纪末，王国人口大概有1至1.2万，其中少数人因犯罪和欠债而沦为奴隶。经济以农业为主，开放对外贸易，很早以前，巴蒙人就 **519**

④ C. 塔尔迪兹，1980年，第80-89页；T. 伊莱杰塔与R. 布雷恩，1974年，第38-41页。

⑤ 这段历史已由克劳德·塔尔迪兹彻底订正，1980年，第83-126页。

进口盐、铁、串珠、棉织品和铜器。

至于巴米雷克人，其古代史同上述两个族群密不可分。[6] 巴米雷克这个词本身的来源和意义虽然至今仍有争论，但一直被不恰当地用于许多族群(约 100 个酋邦)，这些族群的确拥有共同的文化 ，但并不认为是巴米雷克人。他们均来自北方，来自蒂卡尔人今天所在的地区。他们向南迁徙大概始于 17 世纪，也许与蒂卡尔人的流动以及富尔贝人的压力有关。迁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杰出人物领导下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这些移民占据在今巴蒙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村庄，后来大多数人被巴蒙人赶走，留下来的则被同化了。在巴米雷克人不同的群体中，几乎可以确信，巴伦人是 18 世纪初首先越过农河的，紧跟其后是班登人、巴皮人与巴富散人。这些族群在今天这个地方定居的过程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这些酋邦具有与喀麦隆高原政治社会共同的特点，例如，都有一个首领，都强调议事机构的重要性与社团的作用。他们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频繁的迁徙，这种迁徙看来在很早的年代即已开始，而且与人口的高度增长、财产只由一人继承的世袭制有关，因此其他子嗣不得不从首领那里获得土地，或定居别处。

韦莱河与乌班吉河流域

密切注意新近所作的假设与结论便可看出，对韦莱河与乌班吉河流域的了解，至少对 19 世纪以前这一地区的了解，自从第一批人类学家，尤其是哈特罗、德卡洛尼-博费克特与拉盖开展工作以来，几乎很少有所进展。[7] 当今研究人员经常使用相同的表达法(可能性、据推测所知、暂时性结论)，这些说法表明目前对情况了解的不确定性以及正在研究的现象的极端复杂性(混乱、种族混杂、令人捉摸不定)。

不能否认，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些地区定居的问题。究竟用谁来描述我们所涉及的人类群体，在这点上虽小有分歧，但所有研究一致承认，有三种类型的居民：新石器时代的人、班图人与苏丹人。主要困难看来在于，无法详细说明这些不同民族定居的多变和方式，以及他们之间关系所包含的内容与延续的形式。

520

从传统上说，乌班吉与韦莱地区，被划分为两个小区，这是出于方便，并非有意为之。[8] 乌班吉地区，今天大多数居民属于苏丹民族——班达人、恩格巴卡人与恩格班迪人，他们属东阿达马瓦语族。17 世纪以前，这一地区大概为班图人所占领，他们自认为是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居民手中得来的，这些居民所使用的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保存至今。这些班图人因大多数同化于苏丹各民族，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苏丹各民族大概是 17 世纪或 18 世纪初从达尔富尔与科尔多凡迁徙来的。那些后来组成恩格班迪族群者可能是最先到达这里的，其次是班达人与恩格巴卡人。在今天由赞德人、赞德化的民族以及芒贝图人控制下的韦莱地区，人类群体的继承接续情况看来不同。在 16 世纪或 17 世纪初以前，在韦莱

⑥ T. 伊荣杰塔与 R. 布雷恩，1974 年，第 43-46 页，C. 塔尔迪兹，1981 年。

⑦ A. 德卡洛尼-博费克特(de Calonne-Beaufaict)，1921 年；哈特罗(Hutereau)，1922 年，拉盖(Lagae)，1926 年。

⑧ J. 范西纳(Vansina)，1966 年 b，第 27-52 页；A. 德卡洛尼-博费克特，1921 年，第 135-149 页；E. 德丹皮尔(de Dampierre)，1968 年，第 1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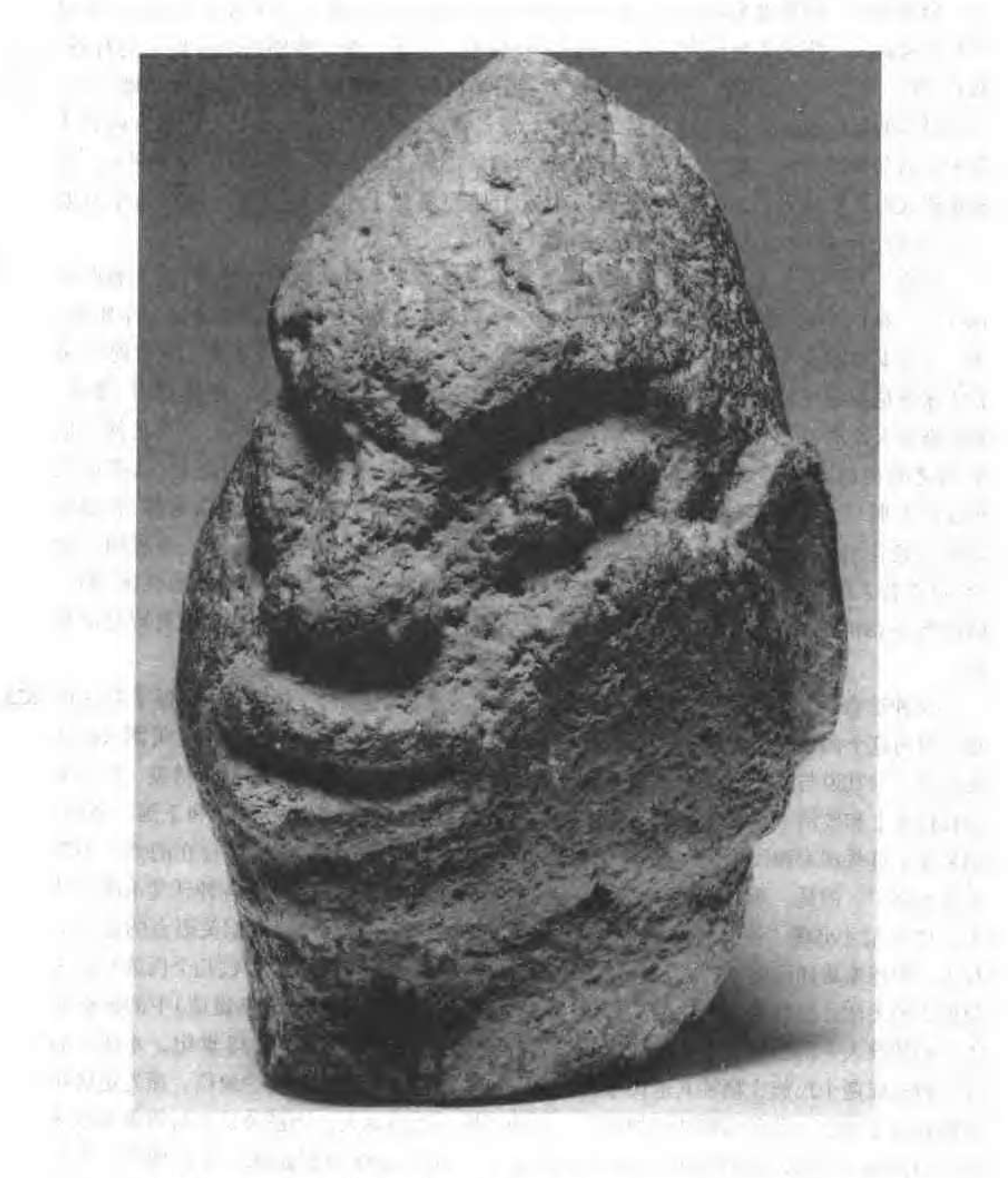
河、姆博穆河、阿鲁维米河流域，大概就有新石器时代的人居住，今天这些人的幸存者据说就是蒙武人、洛戈人与马克雷人。他们身材矮小，以木、骨、特别是经过加工的石斧、碾石、投石为工具。有两个一直被当做侵略者的居民群，就是移到这个居民体基础上的。这些最初的迁徙发生在公元1500至1800年。苏丹各民族的第一次迁徙是沿南北方向直达乌班吉河与姆博穆河，然后从这里沿东西方向扩展。从这些苏丹人中产生了芒贝图人、恩格班迪人以及赞德人。17世纪，班图人沿着上述河流北上也来到这里。就在这个时期——17世纪至18世纪初——民族政治集团应运而生。

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建议，将乌班吉与韦莱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探讨(参看图片18.1)。[9] 他们的论点依据的是语言和民族语言学资料，将定居过程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公元前第一个1000年期间，在一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中，原始的乌班吉人来到尼罗河流域，格巴亚-曼加人定居在西面，班达人定居在中部，恩格巴卡-塞雷-恩格班迪人定居在加扎勒河与白尼罗河之间的三角地带，赞德-恩扎卡拉人在韦莱河与尼罗河之间的南部地带。公元1000年前后，当来自北方的尼洛特人扩张到此时，这些居民仍定居在那里。这一扩张的第一个影响是拆散了恩格巴卡-塞雷-恩格班迪人群体，将恩格班迪人赶往南面乌班吉河与扎伊尔河之间的地区。在这里，他们与俾格米人和班图人会合。尼洛特人的扩张还将赞德-恩扎卡拉人驱赶到西面的韦莱河与姆博穆河灌溉区。第三阶段始于18世纪，这个时期与来自南方的班图人迁徙相应，后者是为逃避奴隶贸易的影响。

这种综合探讨倒是有吸引力的，但有两点保留意见。首先，一提起迁徙，似乎存在困难，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人的大量流动。在人所共知的一些情况中，赞德人与芒贝图人的迁徙过程，与其说与人口统计有关，不如说与政治有关，因为这些人侵者都是精英，他们无论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有突出的管理才能，愿意把当地居民重新组成酋邦和王国。然而，如果鉴于这些国家和民族集团19世纪的历史业已查明，便认为它们早已存在的话，那就大谬不然了。但是，所有传说，尤其是一些主要氏族的系谱表明，由于各种迁徙浪潮的冲击，17世纪才出现“各民族的聚合”（E. 德丹皮尔）：操一种与赞德语相关语言的恩扎卡拉人、操恩格班迪语的巴扎人与操赞德语的姆博穆人。与此同时，有少数几个氏族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恩扎卡拉人中的沃-克帕塔人、邦格班迪人(单数为蒙格班迪)中的班迪亚人、姆博穆人中的巴昆达人与文加拉人。后来情况的发展，大概直到18世纪，才使文加拉与班迪亚两个氏族在牺牲其他氏族的情况下，得以维护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原先定居在姆博穆河支流之一欣科河畔的文加拉人，因为征服了巴昆达人，而被公认为姆博穆河地区唯一的首领。后来，他们又向东向南长途迁徙，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在这期间，他们征服、削弱、同化了那些与其迥然不同的居民群体，或与之结成同盟。他们最善于在政治上把这些组成赞德人社会的居民组织起来，当时的赞德人社会似乎比今天更像是“流离失所的氏族和世系结成的最费解的难题”（E. 德丹皮尔语），而这些氏族和世系由于普遍忠于文加拉贵族统治阶级而得以联合起来。至于班迪亚人，他们的出发地点则是姆博穆河与

523

[9] L. 布奎奥克思（Bouquiaux）与L. 海曼(Hyman)，1980年。



图片 18.1 韦莱河地区的火成凝灰岩头像，年代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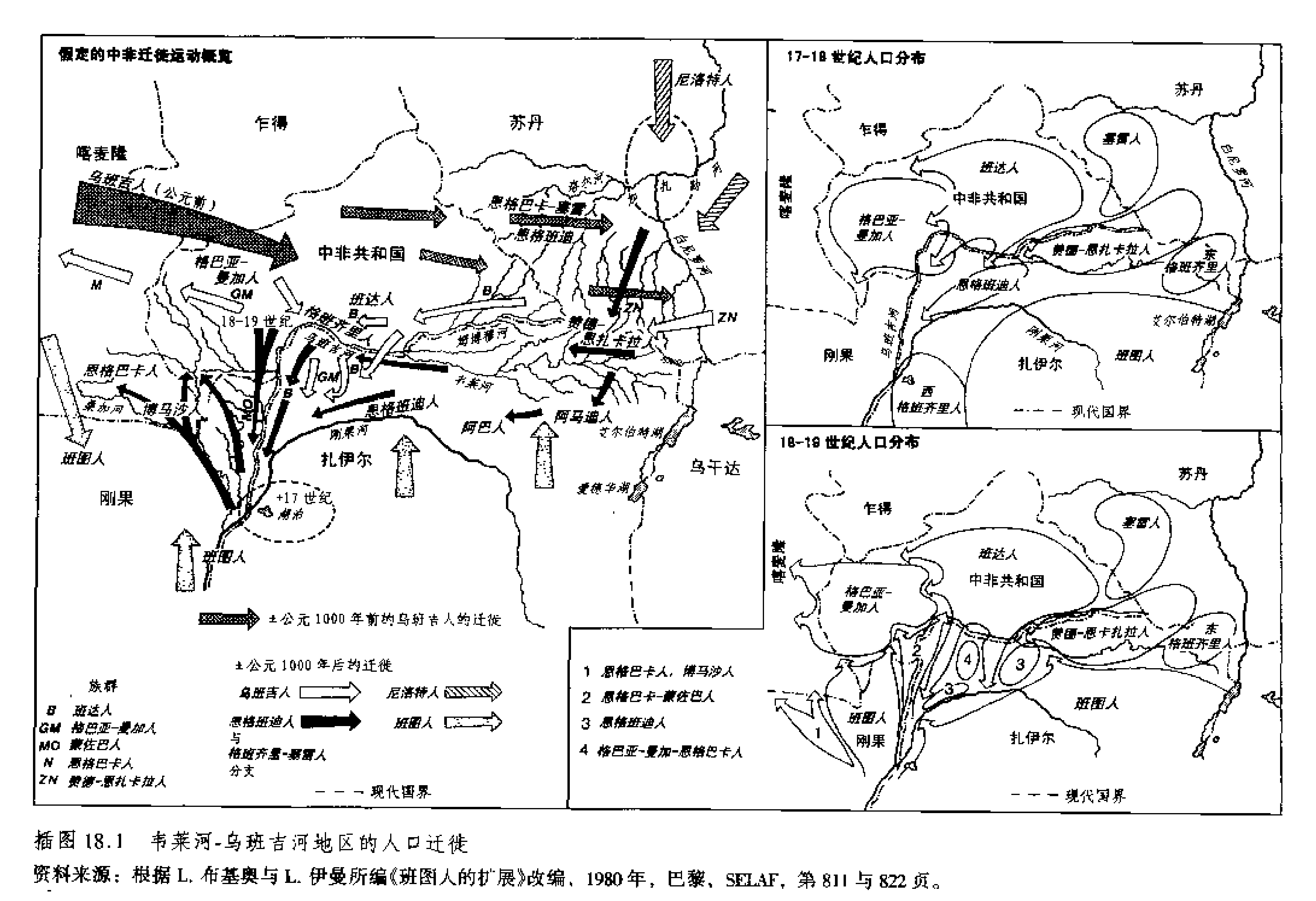


插图 18.1 韦莱河-乌班吉河地区的人口迁徙

资料来源：根据 L. 布基奥与 L. 伊曼所编《班图人的扩展》改编，1980 年，巴黎，SELAF，第 811 与 822 页。

韦莱河交汇的乌班吉河上游地区。18世纪，他们的扩张达到顶点，这是因为恩古木吉人征服了恩扎卡拉人地区，从而有助于将文加拉人向东驱赶。[10]

这些氏族的物质文明程度怎样，很少有人知道；尽管掌握了大量有关19世纪的资料，但使用时必须慎之又慎，这样才能看出此前若干世纪的特点。[11] 然而，贵族统治阶级长期来卓有成效地从事狩猎活动，看来是可信的。在赞德人当中，狩猎仍是一种深受重视的活动，他们从被征服的居民那里学会了耕作技术，不管赞德人的君王们对农业多么重视，田间劳动始终是妇女、平民和奴隶的工作。从事铁器加工可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某些族群 524 中，例如恩格班迪人，铁匠组成严格排外的专业协会。由乌班吉河、韦莱河、姆博穆河、阿鲁维米河及其无数支流形成的巨大河网，为繁忙的贸易奠定了基础。每隔五至七天开放市场一次，其中有工艺品(铁制刀、枪)、食品、动物(鱼、山羊、狗)和奴隶，但以奴隶为主。随着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人从大西洋海岸向内地渗透，这一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沿海社会与大西洋贸易

公元1500至1800年，也是沿海贸易(很快变成奴隶贸易)得以确立并大为发展的时期。沿海边缘地带，在经历由于这种新型贸易而加剧的各种动乱之后，不过是深入内地进行贸易这一长链中的最后一环。到1800年，这一长链一直延伸到蒙戈河上游、喀麦隆草原、奥戈泽上游，并越过刚果河(扎伊尔)到达乌班吉河。

民族

1500年沿海地区居民和社会状况始终不明，引起专家们的不断争论。这个地区位于操班图语各民族故乡的正南面。在几内亚海岸与国家体制兴旺发展的刚果这两个中心之间，其栖居地以及政治、社会、文化机构大概经历过复杂的演变过程，但对这一过程的主要阶段依然毫无所知。关于起源和迁徙的传说也提供不了多少情况，杜亚拉居民及其亲属准确的迁徙路线，只能从桑加河谷追溯，而加蓬的姆蓬圭人、米佐戈人与奥坎德人的唯一被公认的出发地点是伊温多河上游。欧洲航海家与贸易商的著述中，也没有更多的记载。写书的人主要关心的是被访问国家对他们是否有用，是否有利可图，因此，他们所写的书虽然对一些地方命了名，对资源、定居方式也有介绍，但对这些群体的特性却只字不提。然而，他们确实表明整个地区都有人居住，尽管他们未写明定居者。因此，1505年前后帕恰科·佩雷拉所著一书《Esmeraldo de Situ Orbis》曾有记载，“从费南多波出到洛波冈萨维斯角整个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该地区离赤道很近，古人称，此地无人居住，但经验证明，并非如此。”[12] 1591年罗马出版的《刚果王国及其周边地区报道》证实了这一古老定居

---

[10] E.德丹皮尔，1968年，第156-173页；E.E.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71年，第267-278页和第414-435页。

[11] 除参见上述作者著作外，还可参见P.丹尼斯，1961年，第7-20页。

[12] D.P.佩雷拉(Pereira)，1937年。

点的存在："圣托马斯岛人与大陆居民进行贸易，他们经常来往于这些河口。"[13]

这些居民是什么人?就沿海地区本身而言，另有两种资料可供参考。除旅行家的报道 525 之外，特别还有 O. 达珀撰写的《非洲描述……》一书，该书载有一张沿海各民族使用的数字表，从而可以断言，大约在 1660 年，他们肯定都是操班图语的民族。[14] 有了这些一致的文字资料，就有可能确定口头传说中有关几位统治者在位的年代。这样，杜亚拉人历史上第三位君王姆罗贝统治的鼎盛时期大约在 1650 年。这一时间的确定，就使以下情况成为可能：他的祖父姆贝迪开拓该地区的时间在 16 世纪，而杜亚拉人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传说中的姆邦戈开拓该地区的时间则在 16 世纪以前。[15]

这样看来。尽管到 16 世纪初，沿海地区可能有一批班图民族定居，但人们对内地相邻地区的情况仍只能进行推测。因此，在明拉巴人地区与贝蒂人地区，便有六个无编年史料可考的居民群相继建立起来，其中以俾格米人的历史最悠久，其次是狩猎兼采集的民族，如奥拉人，再其次才是各班图族群如马卡人、穆乌姆博人、贝蒂人和巴萨人，这些人直到 19 世纪还在不断迁徙。[16] 再往南，在今日加蓬，情况较为清楚。15 世纪末，葡萄牙人在此河口地带发现了姆蓬圭居民群。这些人早就来到沿海地带，在这里发现了俾格米人，但何时来此不得而知。在姆蓬圭居民群附近，大概早就有阿克勒人与塞克人居住。沿奥戈韦下游地区洛佩斯角与费尔南瓦兹，当时尚无班图人居住，他们在此定居是在同欧洲人发展贸易以后。这里各民族以尼格利罗人为主。只有在加蓬河口地区才有一个组成的国家。据 17 世纪达珀后来的叙述，该国国王号称曼尼·蓬戈(Mani Pong)，曼尼一词来源于刚果，可说明刚果王国政治模式所给予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除非是熟悉刚果的欧洲商人仅仅为了方便而用以指这个君主国。[17] 在遥远的南而，到 1500 年前后，卢安果王国已完全建立起来，因为 16 世纪初所有航海家的记载都提到曼尼·卢安果与姆班扎·卢安果的名字。唯一无法确定且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不了解其基础和内容是什么。有些传说认为，卢安果是从刚果王国演变而来的国家。据说，刚果王国创始人与卢安果第一代君主有关；而另外的传说则认为，卢安果王国是在维利人社会内部变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到15世纪 526 晚期，卢安果与刚果仍保持密切的、也许是臣属的关系，这是可能的。卢安果的影响所及，远至圣凯瑟琳角，甚至洛佩斯角。如同中非许多国家一样，其君主的职责主要在礼仪方面。由一个铁匠家族建立起来的王室机构，是与对火的崇拜分不开的。当举行加冕典礼时，每个"马罗安戈"(Maloanga，国王)点起圣火(ntufia)，圣火永不熄灭，直到国王离开人世。由圣火点燃的火炬，则作为一种仪式传至各省城，然后再传至各世系家族。还有一种有关雨的重要宗教仪式，它是由国王主持的。每年雨季到来时，在首府要举行盛大节日。人们在谢国王保佑之后，祈求国王降雨。在节日庆典即将结束时，国王站立在宝座

[13] F. 德皮加费塔(de Pigafetta)，1591 年。

[14] O. 达珀(Dapper)，1668 年。

[15] E. 阿登纳(Ardener)，1956 年和 1968 年；M. 姆杜贝-穆隆戈(Mdoumbe-Moulongo)，1968 年，H. 恩戈阿(Ngoa)，1969 年。

[16] P. 拉比尔特-托尔拉(Laburthe-Tolra)，1977 年，第 77-413 页。

[17] J.A. 阿瓦洛(Avaro)，1981 年，第 23-30 页和 39-59 页；E. 姆博科罗(M'Bokolo)，1981 年，第 11-28 页；K.D. 帕特森(Patterson)，1975 年，第 1-25 页。

上，横空射出一箭。据目击者报道，"这一天万众欢腾，因为有时会求雨成功。"这个社会最突出的特点确实是其错综复杂的经济。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与多样化手工艺生产相结合，后者包括当做服装和货币使用的棕榈布的制作；象牙、铜与红木的手工制作；以及食盐的生产。这些产品均在国内市场销售，特别行销于首府布阿利，同时也销往王国以外的地方。由于卢安果的维利人酋长与相邻各民族的酋长联合起来形成的贸易网，使贸易有可能扩大到特克人所控制的加蓬港湾、昆尼地区以及马莱博湖。[18] 因此，大西洋贸易并未在本地区建立贸易：它不过向早已建立起的贸易体制注入一种新的力度和赋予一种新的规模罢了。

527

大西洋贸易

对大西洋贸易在非洲这一地区的发展史，至今仍知之甚少，欧洲商人的账簿往往不完





图片 18.2 库巴国王正面和侧面坐像，面前是染睫毛膏板

[18] P.M. 马丁(Martin)，1972 年，第 1-32 页；R. 格雷(Gray)与 D. 伯明翰(Birmingham)，1970 年，第 141-146 页。

整，其中许多未保存下来。17、18世纪，有关中非的许多介绍虽然是作为可靠的原始资料提供的，但它却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不过有些事实是有根据的。

一开始，葡萄牙人垄断了这一贸易，航海家费尔南·多·波与洛普·冈萨维斯分别于1472年与1473年来到福莫萨岛与加蓬。1500年后，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岛定居下来，那里的甘蔗种植园需要奴隶，而且该岛已成为通往美洲的货物集散地，因此，贸易开始扩大。当葡萄人定居普林西比岛与安诺本岛时，那里荒无人烟，后来才从附近沿海地区引进一些奴隶。贸易的规模看来并不大。16世纪末，奴隶起义中，最为重要的是1574年与1586年在圣多美岛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毁灭了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的贸易。1598年后，荷兰人来到这里，在加蓬港湾的武里河口与洛佩斯角建立了杜阿拉新贸易中心，并将葡萄牙人赶出了卢安果。大约1660年，进人了一个新时期，这时期奴隶贸易大为发展，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法国与英国虽已成为本地区主要贸易国，但葡萄牙人、荷兰人、丹麦人仍保持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不但促使奴隶价格稳步上升，而且也使沿海销售点越来越多。

沿海各销售点的贸易规模是不同的，难以精确统计。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因处于几内亚湾的尽头而阻碍了贸易的发展。运载奴隶的船只经常沿"小路"航行，而且必须在大西洋沿岸从塞内冈比亚到卡拉巴尔各奴隶站停留后才能到达喀麦隆、加蓬与卢安果。因此，访问这些地方时往往航行即将结束，大部分货物已安置完毕。另一条路线叫"大路"，船只沿"大路"航行可避开这些中转站，充分地利用风速与海潮，直达洛佩斯角以南，在卢安果或附近港口开展贸易。贩奴船的船长也喜欢来自卢安果及更南面的奴隶，"奴隶贸易之花，性格温和沉静，习惯于听人摆布……总是听天由命"，他们与来自加蓬或喀麦隆的奴隶不同，据说后者对于奴役的耐受性很低。[19] 528

因此出现了以下一些变化。约1750年，喀麦隆沿海一带贸易进人最繁忙的时期，[20]武里港湾，更确切地说是杜阿拉成为主要贸易中心。这主要因为荷兰船只来到这里，不过在1732至1759年，由中堡商业公司派往非洲的153支贸易船队中只有百分之十到达喀麦隆。[21] 然而，荷兰其他公司的船只数量与英国船只数量仍然不得而知。各种迹象表明，有许多船只曾到过这里。杜阿拉是从北方与东北得到供应的；毫无迹象表明，这个时期它与南方有任何贸易关系。往北，蒙戈河通向草原，大约从1750年起，由于昌巴人战争迭起，给草原地带提供了许多奴隶，在东北，则有武里河通向农河-姆巴姆地区。迄今为止，要对奴隶贸易中涉及的奴隶人数作出估计，是要冒风险的。

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某些历史学家不重视奴隶出口，而重视其他产品尤其是象牙出口的作用，而在18世纪，大量象牙为荷兰人所据有。在加蓬河流域，河口地区是主要贸易中心，在雷奥姆比-姆波罗统治时期(约1790至1810年)，洛佩斯角刚刚开始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尽管仍然缺乏统计数字，但从18世纪初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为攫取加蓬河发生冲突的严重性，以及从法国翁弗勒港驶抵该地区的船只数量来衡量，这里的奴隶贸易数

[19] L. 德格兰普吉(Degrandpre)，1801年，引自E. 姆博科罗，1981年，第17页。
[20] E. 阿登纳，1968年，J. 布沙尔(Bouchard)，1952年，第70-104页。
[21] R.A. 奥斯丁(Austen)与K. 雅各布斯(Jacobs)，1974年，第7页。

量还是相当大的。除贩卖奴隶外，克勒人与芳人的狩猎者以及邻近地区的采集者还供应大量象牙、蜡和檀香木。奴隶来自奥戈韦河中游，此地也向洛佩斯角提供奴隶。卢安果的贸易做得最红火。它与奴隶海岸或安哥拉相比较，从事奴隶贸易的时间不长。约1670年，

529 它才开始大规模从事奴隶贸易，但到1780年，便几乎停止了。在17世纪中叶以前，卢安果供应的货物主要是象牙、染料木与棕榈布。在中非，到处收集棕榈布，作为交换的通用商品，每年总有两三只葡萄牙船从罗安达来到这里，将六七千匹布装船运走，以备士兵之用。从卢安果沿海（卢安果、马伦巴、卡宾达）出口的奴隶数量在1639年一年内达100人，在1762至1778年间，每年增至12,500人，而1780至1790年间，每年增至13,000-14,000人。[22] 贩奴船的船长们在账簿中留下了富有价值的依据，那就是欧洲人在卢安果购买奴隶的种族来源。在那些运往国外市场的奴隶中，几乎没有提到卢安果的维利人。其中主要有三种人：马荣贝人，是维利人的近邻；蒙特奎人（马莱博湖畔的特克人）；以及基班奎人（布班吉人与刚果河、乌班吉河区的"河民"）。最后一种人的名称说明，在其鼎盛时期，大西洋贸易已经进入大陆的中心地带。约1780年，卢安果的重要性已让位于洛佩斯角的阿波曼德以及马伦巴与卡宾达，马伦巴与卡宾达分别为前马卢安果两个小属国卡刚果与恩戈约的港口。

综合的动力

在这一小地区内，这种紧张而持久的贸易方式，其影响如何，必须严格而审慎地加以分析。在研究工作中，有一种固有的倾向，那就是强调大西洋贸易的破坏作用。[23] 因出口奴隶或奴隶在战争中被俘以及欧美疾病的侵扰而导致人口的减少，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沃尔特·罗德尼以卢安果为例强调，从欧美大规模进口货物，是技术停滞，使本地金工和纺织业遭受破坏的原因。[24] 而近来研究工作中有一种忽视非洲社会所遭受的重大损失的倾向。因此，对菲利普·柯廷来说，"三次横渡大西洋的迁徙"（非洲向美洲出口奴隶，反过来，又将各种前所未闻的疾病和新的粮食作物引进来）也许已经使两者相互抵消了。[25] 争论至今依然存在。关于上述互换交流，我们在此仅仅强调各种动力的作用，以及影响社会组织、政治机构、人口构成和心态等的长期变化。

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从美洲引进粮食作物：玉米、木薯、落花生、菜豆和烟草。[26] 大

531 约从1600年起，经过两个半世纪，这些作物才取代了原有作物，如香蕉、高粱、小米、番薯，有时候，原有作物完全被放弃。种植这些作物的地区不仅沿海一带，有时沿着贸易通道，有时则不经过贸易通道迅速向内地发展。种植木薯最为成功。1608年，在卢安果沿海一带有人提到木薯，17世纪末，在特克人地区已经开始种植。种植木薯之所以取得如此成

[22] R. 格雷与 D. 伯明翰，1970年，第149页。
[23] R.F.D. 林乔恩(Rinchon)，1929年；W. 罗德尼(Rodney)，1972年。
[24] W. 罗德尼，1972年，第103-123页。
[25] P.D. 柯廷(Curtin)，1969年，第270-271页。
[26] J. 范西纳，1979年。



图片 18.3 芳人男子协会"恩吉尔"会会员所戴面具。会员通过专门入会仪式入会，他们以维持社会秩序，免遭邪恶迷惑为宗旨。高 70 公分

效，有几个因素。它的产量明显高于番薯。它还可以抵御变幻无常的气候和社会动乱，因为它的根两年内埋在土壤中也保持不烂。它是一种多用途的植物，木薯叶可以食用，木薯根适宜采取多种方法加工和保存，方法之一就是制成一种远近闻名的面包(刚果人称 chikwange)，这种面包可以保鲜六个月。18 世纪，沿着刚果河(扎伊尔河)及其支流，整个刚果河流域，普遍种植了木薯。沿海地区玉米的出现有纪录可查的是在 1600 年以前，而玉米取代高粱则无疑更为迟缓，也不那么引人注意。其他作物逐渐被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轮作法

种植。从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来看，正如J. 范西纳所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农业革命"。这些变化说明，在中非农民社会中，蕴藏着技术革新的巨大能量。然而，要说明其效果，还是不容易的。是否如经常强调的那样，由于食物供给更为可靠和更为多样化，是否就能使人们的身体增强抵抗力，并提高人口增长率呢？这一点不能肯定。木薯的营养价值有限，据报道，至少在19世纪，营养不良最严重的是食用木薯最多的蒂奥人与姆博西人。更为普遍的是，由于种植这些作物需要大量开垦土地，容易促使蚊蝇孳生，传染疟疾和黄热病。从社会角度而言，这一农业革命以及贸易本身，有利于建立一种新的劳动分工。男子逐渐将开垦土地、作物栽培和备耕等农活留给妇女和奴隶，自己则专心从事更为赢利的贸易。这种家庭奴隶制及其他形式的隶属关系的发展，乃是这些农业变革的直接结果。

在最靠近海岸的地区，由于直接与对外贸易相联系，其变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在17、18世纪，人口定居已经稳定下来，19世纪即将完成的重新分配的过程刚刚开始。在532 喀麦隆与加蓬，人口流动尤为错综复杂。17世纪，加蓬港湾被新的姆蓬圭部族所占领；18世纪，居住在洛佩斯角的奥龙古人和居住在费尔南瓦兹的恩科米人均来到这里。[27] 18世纪，芳人从近海的桑加河右岸某地开始缓缓扩展。[28] 就政治结构而论，沿海贸易所导致的结果则是相反的。[29] 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洛佩斯角的奥龙古人中，沿海贸易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其王室氏族，阿波利亚或阿龙贝完全垄断了对欧洲人的贸易。这个国家很晚才形成和强盛起来，那时正是雷奥姆比-姆波罗统治时期(约1790-1810年)，奴隶贸易如日中天。而沿海其他地方起作用的则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机制——诸权威中心崩溃，政权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在非洲方面，贸易的组织并非由国家垄断，竞争使一些个人得利，如王子、平民，甚至某些从前当过奴隶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维护其特权并热衷于获取政治权力的新的贵族阶层。在杜阿拉，19世纪，贝拉家族(国王贝尔)与恩干多家族(国王阿克瓦)之间的对抗明朗化，并以最终破裂宣告结束。在加蓬河流域，右岸为阿奎卡扎部族的两个分支所控制，左岸则掌握在阿西加部族与阿冈兰巴部族手中。在卢安果，正是这些新兴者——掮客、商人、商队首领和其他中间商——表现得最为出色。因为他们拥有财产，可以从国王手里买到土地，并拥有由许多身为自由民或奴隶的属民组成的扈从队伍。有人提到在18世纪末，有的平民拥有700属民，为其作战或耕种土地。马卢安果不得不向这些新贵出卖高官厚爵。在杜阿拉、加蓬河流域或卢安果，百姓的处境每况愈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这些上流社会在形容各种隶属关系和不同程度的奴役时使用的词汇是很丰富的。虽然在这个对其研究仍不加重视的地区，集体的心态也经历过巨大变化，但我们决不可匆忙作出结论。因此在18世纪，发明并发展了新的巫术、

---

[27] H. 布赫(Bucher)，1977年，第149-170页；J.A. 阿瓦洛，1981年，第97-146页和175-183页。

[28] P. 亚历山大(Alexandre)与J. 宾奈特(Bynet)，1958年，第13-17页；P. 拉比尔特-托尔拉，1977年，第410-411页。

[29] J.A. 阿瓦洛，1981年，第143-146页；J.R. 布鲁奇(Brutsch)，1950年，第213-216页；P.M. 马丁，1972年，第158-174页；E. 姆博科罗，1981年，第19-28页。

疗法与新的疾病概念，其着重点在个人而不是家族，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不受一切外来的侵袭。[30] 这种发展无疑与很大程度的不安全感有关，卢安果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在这个传统的王国里，任何人都可以向王室法官投诉；他只须通过专门开辟的道路(Nzila zi Nzambi，神路)或(Nzila Ivanga Nzambi，神造之路)上访都城，就能保证他具有完全抵抗疾病的能力。然而，在18世纪，很多传说证实，明目张胆地违反这种免疫法的例子并不少见。



图片18.4 加蓬人踩高跷跳舞时戴的恩古涅式面具，这种面具代表一位美女的灵魂，她死后回到人间像活人一样参加葬礼。高26公分

[30] J.M. 詹曾(Janzen)，1979年；E. 姆博科罗，1983年。

534

刚果河轴心与刚果人的大规模贸易

当地理学家吉勒斯·索特将刚果河(扎伊尔河)说成是一条"起始线"时，他特别强调的是中非这条庄严河流的作用：

> 刚果河不仅因其水路畅通和拥有星罗棋布的
> 岛屿而自成一体，可与各(邻近)地区相媲美，
> 而且对这些地区而言，它还是一种起协调作用，并象征着本地区
> 一体化的因素。它作为一条有严格规定的水路，
> 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间接的影响，则在
> 于它是一条启发人类创造力的伟大的航道。㉛

在殖民统治以前，刚果河是将广阔的刚果盆地各民族聚集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因素。这种作用不仅局限于刚果河本身，即马莱博湖上游刚果河适于航行的地段，它还包括其支流，尤其是右岸的阿利马河、利夸拉河、桑加河与乌班吉河以及左岸的克瓦河、鲁卡河、伊凯伦巴河与卢隆加河。自古以来，形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贸易网，这个贸易网范围不断扩大，情况日益复杂，它塑造了刚果河及其支流两岸大多数人类社会。

古代的交换经济

有许多证据说明，古代存在着一种交换经济。假设传说很少能追溯到15代以上的话，那么应按年代重新划分阶段，重新设想这一地区移民的准确线路，虽然是有困难的。然而，借助语言学、考古学和传说弄清两次大迁徙的情况，则是可能的。第一次也是最早一次迁徙是规模巨大的迁徙，它是操班图语各民族从原居住地进入这一地区的迁徙。这次迁徙看来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的迁徙。按格恩里的分类标准，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属于地区C。今天，有些人所操语言仍然说明，它们与某些尼日尔-喀麦隆语言极其相似：就如同博班吉语与图嫩语及贾瓦拉语相似一样。㉜ 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是沿着水路，特别是沿着桑加河直接从尼日尔-喀麦隆家园迁徙至今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些路线是这个沼泽地带和丛林地区最便捷的路线。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葡萄牙人著作中提到几个民族，其中引人瞩目的如博利亚人、博马人和蒂奥人就定居在他们今天所在的地方。㉝ 除第一次大迁徙外，还有其次发生的若干规模较小的迁徙，而且沿东西方向前进，后逐渐稳定下来，并分裂成若干群体。这样，在这个被利夸拉-马萨卡河及其支流汲干了的"泽国"，各民族都把东面，即该河的对岸当做自己的发源地。㉞

535

㉛ G. 索特(Sautter)，1966年，第231页。

㉜ J.H. 格林伯格(Greenburg)，1963年，第35-38页；J.D. 费奇(Fage)与R.A. 奥利弗(Oliver)，1970年，第131-140页。

㉝ J. 范西纳，1965年，第78、80、81页；1973年b，第439-446页；G. 索特，1966年，第363页。

㉞ G. 索特，1966年，第212页，243-248页。

稍后的若干次迁徙通过在水滨地区、水灾地带甚至于旱地区等互补的生态地区分散人口，无疑有助于为交换经济创造条件，有助于扩大交换经济基础。每当于旱季节，既要务农，又要捕鱼，因这时期也是各河流及其支流水位下降的时期。因此，人们不得不有所选择，凡挑选捕鱼的沿河居民，其收获一向丰厚，他们用捕来的鱼很容易换到食品或本地工业生产的物品。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说法均被考古学所证实。首先令人瞩目的是，扎伊尔-刚果全部著名的文化遗迹层都将在马莱博湖附近发现，因而可以证明，居民人口一直保持很大的密度，人类活动也一直保持多种多样的方式。有两个考古点详细揭示了贸易的问题。首先，在马莱博湖右岸靠近金沙萨的金加布瓦，发掘出几种陶器，其中一种雕饰精美，是在金沙萨地区以及刚果河两岸直到马伊-恩东贝湖的另外几个较小的考古点发现的。这种陶器产生于1450至1650年期间，它有力地证明，在刚果(扎伊尔)河及其支流流域，很早就存在商业关系。在靠近克瓦河与刚果河会合处的另一个考古点马芳巴，则发现许多形状各异的泥管。其中大多数尚未启用。这说明马芳巴可能是一个生产中心，也可能是本地区存放泥管以待分配的仓库。

交易的物品并非只有陶器和泥管。看来，在从事长途贸易中占优势的是两种产品：化装用的非洲紫檀以及从刚果河下游矿床中开采的铜。由于贸易价值低而运费昂贵，将一些产品限于当地贸易，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原料易找、工艺简单的产品，包括食盐、布匹、席子和篮子。[35] 这种贸易早在15世纪以前就很发达，随着大西洋沿岸贸易的扩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大西洋贸易的移植及其后果

536

大西洋贸易的移植可分几个时期。[36] 第一个时期是从15世纪晚期至1560年左右，此时，刚果王国占主导地位。自1529年起，葡萄牙人的文件表明，马莱博湖地区，通过与姆班扎刚果(圣萨尔瓦多)和姆平达相通路线，已经成为奴隶主要供应地区之一。16世纪中期，安齐科斯人(蒂奥人,湖区特克人)为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提供了庞大的奴隶队伍。当时，这些奴隶是与大宗象牙、棕榈布、红木一起，当做货物进行交易的。另一方面，马莱博湖地区则开始收到了“恩赞布”(nzimbu,刚果王国当做货币使用的贝壳)、珠子以及欧洲布匹与烈酒。第二个时期是1560至1750年，这个时期是刚果贸易不景气的时期，尽管这时并未立刻引起马莱特湖及其支流对外贸易的严重衰落。理由是，当刚果遇到来自安哥拉日益激烈的竞争，尤其遇到贾加人所挑起的内部纷争时，这些贾加人却在马莱博湖与沿海之间地带稳住了阵脚，控制了邦古王国、刚果的恩松迪省以及明杜利铜矿。因此，通过刚果连通马莱博湖主海岸的路线虽然变得冷落，但由于马莱博湖-卢安果轴心新机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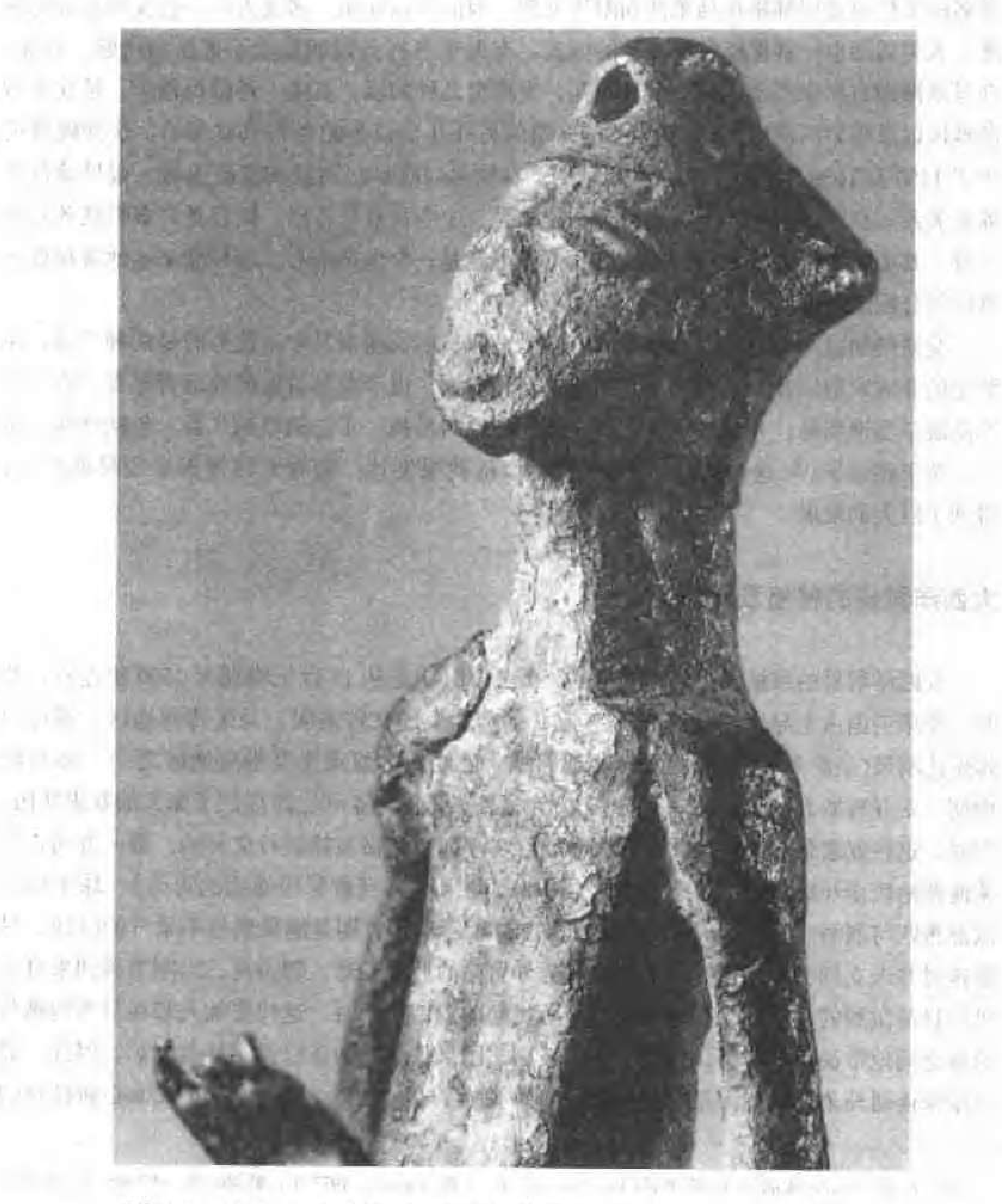
---

[35] P. 德马雷(de Marel)、F. 范诺顿(Van Noten)与D. 卡恩(Cahen)，1977年，第495页、497-498页；哈姆斯(Harms)，1981年，第20-23页。

[36] R. 哈姆斯，1981年，第24-28页。

出现，却使它得到巨大的补偿。第三个时期是从1750至1850年左右，这个时期，刚果河及其支流流域成为美洲的奴隶主要供应地，它与出口处两岸港口卢安果、卡宾达、博马、安布里泽特、安布里什以及罗安达之间，商队来往，形成密集的网络。

通观这三个时期，马莱博湖这个点，从这里，既可把货物通过无法通航的刚果河急流边上的小路运走，又可通过上游水道运走，它还是刚果人长途贸易与大西洋贸易的交汇点。大西洋贸易对地区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易于被了解的机制的基础之上的。



图片18.5 库巴人熟铁雕像，约1515年，高18.7公分

出口贸易涉及高价货物，这样就使得刚果河及其支流的长途运输有利可图。因此，当地销售的产品，即使通过长途运输，也是有利可图的，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地区的专业化。大规模贸易并非如此简单的重叠，而是包括将适应外界与满足当地需要这样两种贸易体制连结起来的复杂的有机整体。然而，每一种贸易体制均建立在特定的产品、章程和结构之上。

大约从1500年开始，从事上述各类贸易的地理区域不断扩大。到1690年左右，马莱博湖与开赛河下游以及阿利马河周围地区建立了永久的贸易关系。一个世纪以后，乌班吉河与这个商业区域完全一体化了。如同这期间所有其他河流及其支流——右岸的阿利马河、利夸拉河与桑加河，左岸的卢隆加河、鲁卡河、姆菲米河、马伊-恩东贝湖、开赛河与宽果河一样。唯一无法确知的是，当时的商业，沿着这些水路最远究竟渗透到什么地方。到19世纪，贸易交往的最前沿看来已达到乌班吉河与韦莱河的交汇处。 538

这些水路的两岸，尤其在水路的交汇处，曾有许多市场，对此，考古学应当能提供完



图片18.6 库巴铁砧。高28公分

539 整的数字。最大的市场自然在最大的交汇处马莱博湖区。18世纪或18世纪以前，这里就有四个市场：左岸的恩塔穆与金沙萨，右岸的姆皮拉与姆弗瓦。19世纪，观察家估计，这四个市场中，每个市场拥有常住人口3000至5000人，此外还须加上过往人口，在贸易旺季，过往人口尤其多。这指的是干旱季节，即四五月至九月，而八月生意最兴隆。一到雨季，生意便下降，但规定销往国外的货物仍照常出口，马莱博湖上游的小市场仍然开放。

由于缺乏统计数字，因此难以对当时的贸易量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有几点是可供参考的。19世纪，标准的独木舟，长15公尺、宽约80至90公分，从18世纪中期以来，大小似乎一样，能载一吨半至三吨重的货物。使用划桨的船只，平均每只货运量约65至90公斤，顺水行驶每日约80公里以上，逆水则只行50公里。19世纪，奴隶贸易停止后，据统计，每天通过马莱博湖的货物至少有1吨，贸易旺季货运量最高达到400吨。[37]

对外贸易体制实际上是以两个项目为基础——奴隶与象牙。1750年以后，奴隶贸易的确很红火，奴隶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卢隆加流域、阿利马河地区、刚果河、克瓦河与马伊-恩东贝湖交汇处的博马地区，乌班吉河流域。例如，从卢隆加流域的奴隶贸易可以看出，这种贸易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在主要市场巴桑库苏周围有许多村庄，那里的奴隶在未卖出以前便在田里耕种。有些奴隶是沿着这条河被贩卖出口的；有些奴隶则溯乌班吉河而上被卖给洛伊人，以换取贩运到马莱博湖与大西洋沿岸市场的象牙。[38] 因此，奴隶这一主要出口项目，在当地也有了用武之地。这就是通过上述农业的变化产生的结果，但也是贸易的需求与社会、政治结构变化所致。这样一来，克瓦河两岸居民往往向博马人购置奴隶，以便让这些奴隶将货物驮运到马莱特湖或从马莱博湖运货物过来。

在蒂奥人中，家庭奴隶制的情况十分普遍，“姆博马”（mboma，博马族群之人）一词竟用来指蠢人或职业低下者。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从事奴役的方式也日益增多。在刚果河流域主要从事贸易的博班吉人中，有“蒙通吉”（montonge，抓获来的奴隶）和“蒙坦巴”（montamba，由亲人出卖的奴隶）之分，从这种区别可以看出，奴隶贸易使社会道德价值受

540 到严重影响。在这个地区，奴隶贸易被当做一种奢侈享受，因为它仅仅有利于极少数族长、村长与博班吉人中间商，奴隶贸易也被视为可耻，因为在贸易谈判中，使用的不是“奴隶”，而是以委婉的口气称他们为“狗”。

另一个出口项目象牙，16世纪时就出现在葡萄牙人的教科书中，他们将此看做最能赚钱的行业。当地很早就用象牙做手镯、发夹，而且与铜一样，还能当做珠宝饰物和装饰品，在当地贸易中，它的价值似乎很低。

在丛林地带，尤其在桑加河流域，在卢隆加河及其两支流洛波里河与马林加河沿岸一带，有无数象群出没。矮小的俾格米人几乎垄断了大象的狩猎权，但由于猎杀动物的权利网错综复杂，致使狩猎者本人获利不大。在利库巴人中，首领们必须获得一对象牙，狩猎者只能分到象肉；在蒂奥与姆博西人中，首领们有权分得磨过的一只象牙；另外，在蒂奥

[37] J. 范西纳，1977年，第255-258页。

[38] R. 哈姆斯，1981年，第30-31页。

人中，还把剩余的象牙分成三份，狩猎者、地主与政治首领各得一份。直到18世纪晚期，当奴隶按值论价成为贸易的主体时，象牙的猎取和分成仍然采取上述办法。只是到1830年以后，这两项贸易之间的关系才颠倒过来。从沿海交换得来的货物，开始时仅限于食盐、罗安达的贝壳、布匹和珠子，到17世纪中期，由于引进金属物品，特别是刀和镜子而拓宽了范围。18世纪，滑膛枪、黑色火药、铜器、锡器、含酒精的饮料急剧增加。

这些东西是怎样在刚果河流域流通的，则鲜为人知。看来，妨碍公平分配的正是这种贸易体制——各地方物价不同而且根据各自不同的爱好。直到1750年左右，贸易仍然被分割成几部分，族群各自控制着这条河及其支流的某一部分。这种体制助长了对某些高价货物如镜子、瓷器的垄断。这些货物的流通速度如何，也一直是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斯坦利估计，1880年左右，一件欧洲商品从沿海地区流通到乌班吉，平均需要五年时间。

本地使用的货物，如同对外贸易一样，也在这一地区，也许范围稍大的地区进行贸易。因此，奥戈泽河上游周围地区生产的铁器，通过库库亚和蒂奥的中间商流通到这一河区。个人或集团经常同时从事两种贸易。在开赛及其属国人中，18世纪以来，努努人与恩通巴人生产的陶器、食盐和甘蔗酒销往刚果河市场，象牙和橡胶则销往沿海一带。同样，本地区主要中间商博班吉人也生产各种商品，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的手工艺品。

当地贸易主要包括两类货物。占有庞大市场优势的是食品，这是因为从18世纪以来，**541** 外部的需求量大，而且不断扩大，致使许多村庄专门从事贸易。在马莱博湖周围地区，在阿利马、利夸拉-马萨卡河和桑加河流域，在再也无法自食其力的森林地带的贸易中心，情况尤其如此。

妇女种植、加工的木薯，是最畅销的项目之一。油棕榈可加工成各种有用的商品，如家用油，卖出所得由油棕榈树主、爬树砍树干者和从树干上取油的妇女三家分成；棕榈酒专由男子酿造。食盐是另一重要大项。无论姆博西地区的岩盐还是植物盐，大都是水路西岸居民生产的。这些民族依靠发达的技术还提供各种鱼类。此外，还有烟草与各种土产酒。

手工艺品在贸易中也占有地位。这是行家的手艺：在农业人口中，妇女种田，男子专做手工艺品；然而，在渔村，捕鱼是男子份内的事，妇女则可无拘无束地制作手工艺品。最受人欢迎的产品有：专由陆地居民而非沿河居民编织的席子，妇女生产的红紫檀粉，蒂奥人中负有盛名的棕榈布，铁器，大多数村庄采用各种技术制成的雕饰各异的陶器，这些陶器推动了贸易的发展。最后还有大小不一的独木舟，较大的专供贸易使用的有20米或更长一些，而小的则只有3米长，供来往于渔村之间短途使用。[39]

这样看来，这两类贸易是有很大差异的。出口贸易是建立在破坏性经济的基础之上——榨取男人和狩猎，而且很少关注它所依靠的这些财富的补偿，因为它只对极少数人有利。当地贸易是建立在经济生产性的基础之上，若干世纪以来不受干扰，得到发展，对维护和改进村庄的工艺发挥了作用，它的受益者是广大百姓，他们按生产的多少获得利益。

---

[39] G. 索特，1966年，第272-278页；J. 范西纳，1977年，第276-281页；R. 哈姆斯，1981年，第51-69页。

种类繁多的社会

这种时间持续很长的国内贸易，促进了刚果河流域各民族的进一步统一，尽管存在鼓励多样性的障碍。障碍之一就是怎样进行贸易的问题。这是一种被分割的贸易，直到19世纪中期,情况仍然未能改变。刚果河及其支流被划分为各族群的势力范围——例如,克瓦河与姆非米河被萨卡塔人与努努人所控制，阿利马河被利库巴人所控制，乌班吉河下游被洛伊人所控制。18世纪，博班吉人才开始控制刚果-乌班吉河轴心。伙伴之间早就形成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掠夺时有发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组成十只或十只以上大独木舟的商队，每只独木舟配备30至60位桨手。利益冲突经常导致大规模战争，例如，博班吉人与蒂奥人两个族群之间的战争，大多数由贸易所引起，19世纪初，两者才达成持久的协议。在达成一致的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方法问题。于是，从18世纪起，全地区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进行交易——棕榈布、“恩赞布”(nzimbu)、玛瑙贝和铜棒——这些货币在当地一直与使用范围有限的货币相竞争。同样，由于普遍实行信用贷款，致使贸易领域不断得到巩固。贸易赢利的经营法则，还促使通过婚姻，尤其通过兄弟血缘关系建立起广泛联盟的战略关系。这种战略关系使伙伴之间履行许多义务(保护与居留、帮助偿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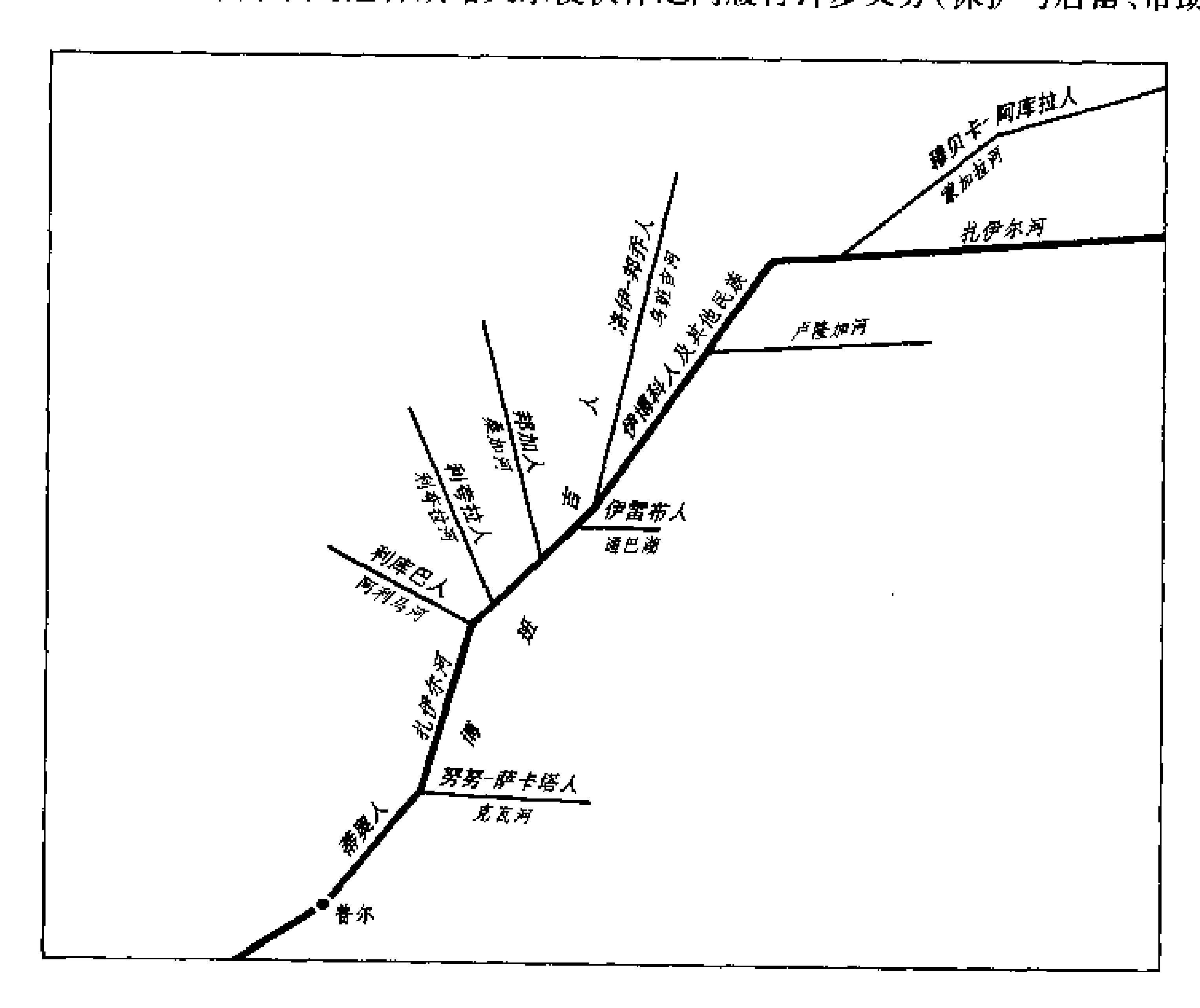


插图 18.2 沿刚果-扎伊尔河轴心居住的各民族及其势力范围

资料来源：根据R. 哈姆斯所著《富饶的河，忧伤的河——1500-1891年奴隶与象牙贸易时期的中扎伊尔河流域》改编，1981年，纽黑文与伦敦：YUP，第76页©耶鲁大学出版社。

债务、军事援助、对丧事的道义和经济援助）。于是，刚果河上的贸易，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他们有了共同的习俗和信仰，推动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语言博班吉语的兴起和垄断。这种共同享有的文明，其形成过程在18世纪得以加速，而达到顶峰则在1850至1880年期间。

这种不断加强的统一性，是与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密不可分的，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与方法的多样性有关，根据这些方法，各民族都投身于刚果人的大规模贸易之中，并力求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并非人人从事贸易。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刚果河流域班图各民族最古老的活动之一——捕鱼业，仍是许多民族集团的基本活动。以捕鱼为业的社会，其特征首先取决于自身地理上的高度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又取决于水平面的变化和渔场的定期流动。人们居住在固定的村庄，还是居住在水位下降时建立、而水位升高时则撤消的捕鱼营地，要视季节而定。各政治、经济单位之间，显然缺乏社会、政治上的和谐一致。村庄仍是基本政治单位，村长的权威，主要表现在礼仪与宗教方面，只能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行使。然而，全村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本村渔民与捕鱼营地渔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以及短期捕鱼队的活动，都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基本经济单位是一支组织松散的捕鱼队，渔队是由一位有威望的渔民与他的亲属以及自愿参加者共同建立起来的。这样一来，村庄赖以建立的家庭基层组织便脱离原有的定位以适应捕鱼的需求。这种制度不仅鼓励了个人主义，而且保证了每个家庭定期获得食品，因为渔民亲属中总有一人会把鱼送回家的。[40]

刚果河流域许多与交换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也由于获得新的经济地位、加强了自身的生产活动，而得到了好处。这种经济上的独特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多蒙戈人群体原先的政治结构仍然存在，而他们的历史却至今鲜为人知。[41]

擅长商业活动的人，其发展各不相同，而博班吉人与蒂奥人在发展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博班吉人从乌班吉河中游或下游长途迁徙至马莱博湖，其详情细节难以推想。据最早殖民当局1885年左右的记载，博班吉人定居刚果河流域不过三四代，就是说，是从19世纪初开始定居的。但另外一些欧洲人的资料提到，18世纪，沿海地带就有许多基班奎人奴隶。弗拉·鲁卡·达·卡尔坦尼赛特所写《刚果日记、1690—1701年》提到，17世纪就有身分不明的移民来到马莱博湖。[42] 可以确信的是，所谓原本以捕鱼为业的社会很快便转而从事贸易了，贸易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唯一基础。从此以后，政治单位与经济单位完全统一起来了。博班吉人社会是建立在富商贸易商行基础上的。这些商行并非是依靠亲戚关系建立的，因为每个商人更需要得到扈从即妇女和奴隶，他在这些人面前比在亲戚面前更有权威，而且这种权威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许多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任何一个活跃在生意场上而又取得成功的人都可以发家致富，而财富是增加扈从的手段，是扩大权势和索取政治头衔的手段，最高的政治头衔“莫孔兹”（mokondzi 酋长）强化了头衔

544

[40] R. 哈姆斯，1981年，第111-125页。

[41] G. 范·戴尔．凯尔肯(Van der Kerken)，1944年；G. 哈尔斯塔特(Hulstaert)，1972年。

[42] G. 索特，1966年，第243-245页；P.M. 马丁，1972年，第124页。

拥有者领导商行的地位，促进了全地区的联合，拥有者可进入负责解决各种贸易问题的议事机构。

蒂奥人处于刚果河贸易网中最大的枢纽和主要卸货点，这是他们独有的幸运。贸易开采使王国的政治结构遭到明显破坏。尽管起源相同，文化相同，但它的权力极为分散。最基层的结构是相对自治的酋邦。酋长主要拥有宗教礼仪方面的特权，但其政治权力有限，无法禁止新移民在其领土上定居，也无法反对臣民出于不满产生严重分歧时最后叛离而去。在下一级，情况也是如此。“奥科”（ôkoo，欧洲人改称“马科科”(makoko)，但意即国王）最重要的是发挥精神的作用。而世俗的权力则由几个高级贵族所掌握，如负责纳贡、掌管行政的“恩加艾利纳”（ngaailiino）和国家首席法官“穆祖”（muidzu）。与酋长地位不同，奥科的地位是不能世袭的。国王是通过贵族在由“恩加艾利纳”主持的11人选民团从王国主要酋长中选出的。在殖民时期以前，这套旧机构的一些基本特征一直保存。最为持久的变化发生在社会层面。首先是，垄断贸易的沿河居民与专门为河区市场从事农业生产木薯和烟草的内地蒂奥人之间不断发生分裂。这种集约的农业劳动需要更多的人力，因而使妇女和奴隶不断增加。在沿河居民中，从贸易中赢利最大的都是酋长，尤其是马莱博湖区的酋长，他们充分利用其特权出售男人和象牙。相反，那些不在马莱博湖定居的酋长与拥有头衔者，例如，定居在北面100余公里处的姆贝的国王，只是不定期地派遣扈从去那里进行贸易。他们拥有政权，但经济权不如沿河居民。

545 博班吉人与蒂奥人的贸易经济，未能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赢利虽大，但未将其投资于生产部门。除买卖奴隶外，不可能购买土地或劳动力。某些生意赚来的钱并非普遍等值的，并不能买到所有货物。钱通过各种方式积攒起来，然后又借出去，但一般是不计利息的。某些货物与某些社会、宗教服务，如罚金、嫁妆等从未归属于货币经济范围之内。

上述中非各民族、各社会情况的介绍，显然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差异，但他们富有创造才能，即使受到约束，也是如此。它还说明，由于知识上留有空白，研究工作者应当紧急行动起来，一方面投入大量财力，进行大规模研究，主要通过考古挖掘与口头传说，搜集新的资料；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对社会结构、文化发展和心态史的研究进行精心设计。

（余崇健 译）

19 刚果王国及其邻邦

J. 范西纳
T. 奥本加(供稿)

序 言

中非西部至赤道森林的南面居住着多个民族，它们多操刚果语各种方言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言。[①] 该地区因其文化具有长期的统一性而紧密地连为一体。这个语言群体覆盖面广，北起加蓬南部，南至本格拉高原，西濒大西洋，东至宽果河流域以远。该地区的东北部与巴泰凯高原为中心的特克地区相毗邻，南端则与本格拉高原的的奥文本杜地区相接。 546

该地区的历史自 1500 年以来便有详细记载，至于 1500 至 1800 年的历史，当代的研究论文据计已达 50 多万篇，远远超过对非洲其他任何面积相当地区的研究。

近百年来，已发行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和导游手册，[②] 而且自 17 世纪起，史学研究逐渐形成学派。[③] 因此，这一章只能作为一个介绍，即使其中最近的文献资料也只能选择使用。

这个地区16和17世纪的历史发展与后来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该地区的大片领地都有人组织管理，各有其政治机构，构成不同的国家。约 1665 年以后，各国领地以更大的规模重新组合，国家的作用相对缩小。组合原则根据经济结构的需要，这是愈演愈烈的奴隶贸易带来的后果。因此在研究该地区前期历史时，我们将首先探讨各王国的历史。当谈及奴隶贸易使得各王国衰微时，我们再专门论述贸易问题。 547

这些地区的潜能是由起伏的地势和降雨量决定的。在干旱期较短的地方，山谷里土地肥沃。干旱期依据其所处的纬度和相距海岸的远近而有所不同，短则两个月，长则六个月。海岸地区干旱期较长。由于该地区的山区特点，人们试图找到更好的栖息地，所以人口分布不均，居民聚居地是一些范围很小的区域或各省中心，但时而也会被沙漠吞没。这一多样性的生境所得天独厚的地区是扎伊尔河(即刚果河)北岸，从海岸至马永贝地区。这

---

① M.A. 布赖恩(Bryan)，1959 年，第 56-62 页；T. 奥本加(Obenga)，1969 年和 1970 年。

② 资料主要来自：A. 布拉西奥(Brasio)，1952-1971 年；T. 法勒西(Filesi)和 E. 德维拉帕迪尔纳(de Villapadierna)，1978 年；L. 贾丁(Jadin)，1961 年和 1975 年；以及 A. 德·A. 费尔内(Felner)、L.M. 约尔登(Jordão)、J. 卡维利尔(Cuvelier)和 F. 邦廷克(Bontinck)等人的著作。文献目录来自 W.G.L. 兰德尔斯(Randles)，1968 年及 J.K. 桑顿(Thornton)，1983 年 b。在以前的作者中，最为重要的包括 G. 卡瓦兹(Cavazzi)，1687 年；O. 德卡多内加(de Cadornega)，1681 年(1940)；O. 达珀(Dapper)，1668 年；L. 德格兰普雷(Degranpre)，1801 年；F. 德皮加费塔(de Pigafetta)，1591 年；A. 普罗亚尔特(Proyart)，1776 年；和 E. 达·西尔瓦·科雷亚(Da Silva Correa)，1782 年？(1937 年)。

③ J.K. 桑顿，1983 年 b，第 xvii-xx 页，提供了最近的史学研究情况。

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铜、铅、铁矿石)，而且是两个最大的沿海国家——刚果王国和卢安果王国的发祥地。

约公元前400年起，操各种西班图语的农夫已在扎伊尔河下游的南北两岸定居，他们生产薯蓣属植物、蔬菜、棕榈仁。从2至5世纪起，操东班图语的东部居民迁入，致使该地区居民增加。新来者种植谷物，在没有萃萃蝇肆虐的地方——特别是在安哥拉，人们还养牛。这些居民迁入之前，约公元100年或更早，铁器制作方法已传到此地。随后，约公元6世纪，香蕉种植技术传入，该地区生产模式更趋合理。④

此后，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复杂，从入海口至扎伊尔河上游的普尔，开始形成酋邦。扎伊尔河下游的北岸地区称为马永贝，得天独厚，地区劳动分工发展程度最高。约在1500年，沿海居民在生产盐和鱼的同时，就已经将延伸至扎伊尔河的罗安果海岸平原变成了一大片生产棕榈油的棕榈林。河湾地区的居民则多为陶工。在内陆，铜和铅的产地由姆博科松戈至明杜利，铁则产于马尼扬加(恩松迪)地区。再往北，接近大森林边缘地带则种植酒椰，并出产大量的织物。最后，在这一地带和更深入森林的地区，红染料木等林产品被用来交换草原产品。这里便是刚果文明的发祥地。特克文明虽起源于高原地区，但它是以生活在大森林边缘及刚果邻近地区的各族群所做的贡献以及扎伊尔河/刚果河中部地区的贡献(至少在政治概念方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特克王国，1507年起的文献中就曾经提及，大概是最古老的王国，至少在17世纪人们都这样认为。⑤

549 刚果王国在扎伊尔河北岸的温古酋邦内逐渐形成。⑥ 当时，众多的酋邦和小王国，甚至一块块小酋邦，布满了扎伊尔河下游南北两岸。尼米·卢肯尼，刚果王国的缔造者，创建了姆班扎刚果城镇，就是现在的圣萨尔瓦多。王国的建立是因与该地首领“卡本加”(Kabunga)以及东部统治因基西河谷姆巴塔地区的一位国王结成同盟，另外还征服了远至海滨的其他地区和因基西河下游山谷的地区。刚果王国创立的具体年代已无从考证，有些作者强调其形成过程较长，通过推论认为其初创阶段约在9世纪。⑦ 另外一些作者则从王国的创立期算起，认为至迟不超过1400年，最早的话则应提前至少一个世纪。⑧

550 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但专家们普遍认为，蒂奥王国的创立也许更早。有些学者认为距温古河不远发展起来的直至河流北部的卢安果王国16世纪时达到鼎盛时期。也有些学者认为，既然1576年以前它还没能引起其宗主国葡萄牙的注意，说明它当时仍不够发达，立国时间也不会太长。刚果南面是恩东戈国，国王称为“恩哥拉”(ngola)，后称“安哥拉”，在1560年前后建国。刚果和卢安果是由大省份构成联合体，相比之下，恩东戈则是许多小酋邦合并而成，因而未能形成像刚果和卢安果王国那样根深蒂固的国家机构。在1520年前后，它还像登博人诸酋邦一样，尽管已与刚果本土分离，但在某些方面仍依靠刚果。

④ J. 范西纳(Vansina)，1984年b。
⑤ O. 达珀，1668年，第219页(德文版，1670年)。
⑥ J. 范西纳，1963年。
⑦ 关于推算，参见M.M. 杜菲尔(Dufeil)，1980年，1981年。
⑧ W.G.L. 兰德尔斯，1968年，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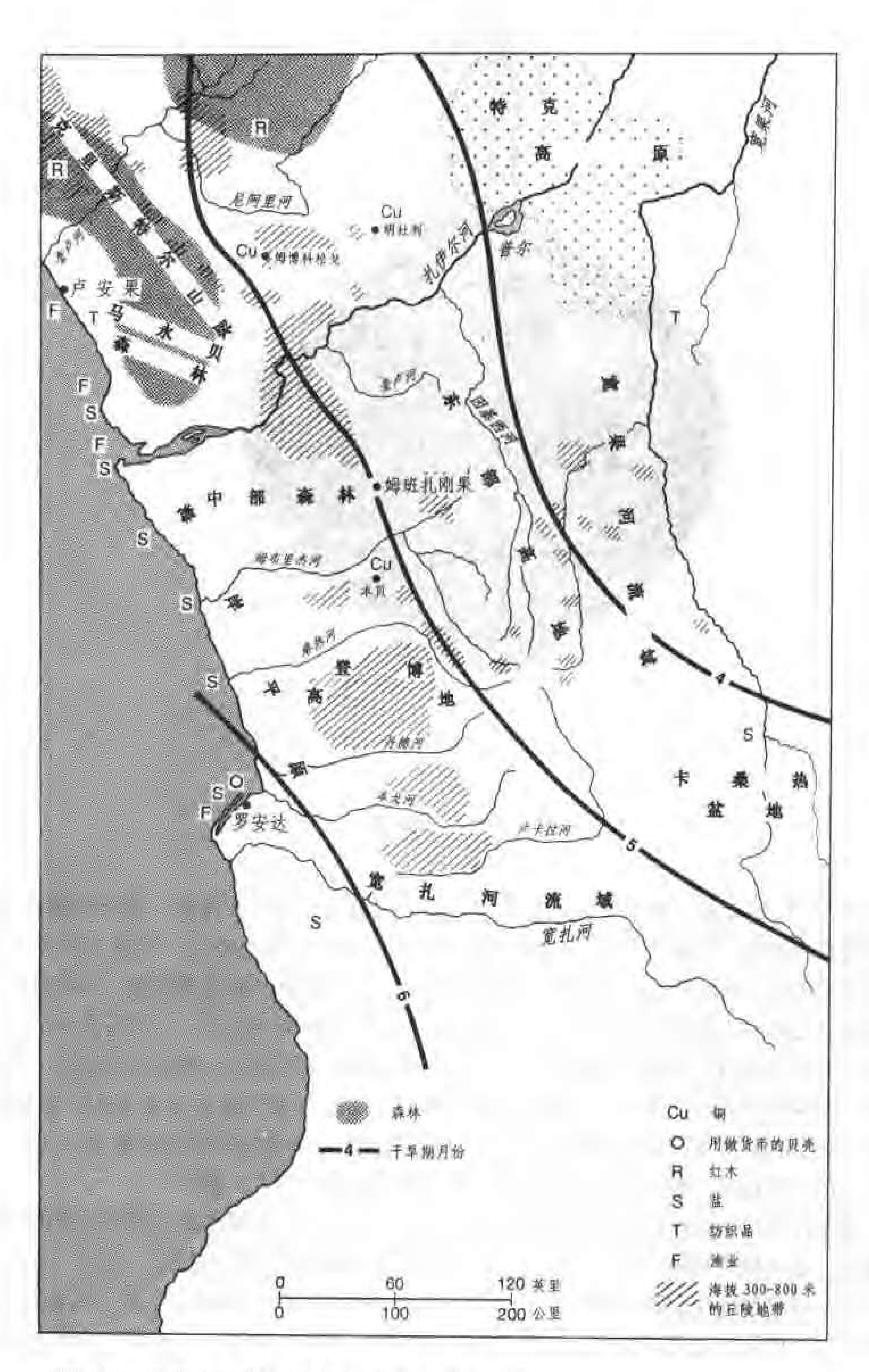


插图 19.1 刚果地形及自然资源图(仿照 J. 范西纳图)



图片 19.1 茱贝人陶器。高 37.5 公分

盟主：刚果

在15至16世纪，刚果单独一个国家，就支配着西非的大片地区，南起本格拉高原，北至巴泰克高原，西临大西洋，东至宽果河流域以远。大约1500年，刚果王国本土疆界顺扎伊尔河岸自河口而上，直到因基西河汇合处，许多地方，如马尼扬加，向该河以远的北部地区延伸。它包括因基西流域、及南端远达洛热河的大片土地。它不断向南扩展，大概到了宽果河流域。它影响着所有政治实体，不时向其索要贡品，蒂奥王国除外。据粗略估计，刚果王国人口众多。大多数学者认为约200万，有位学者认为有400万至800万，而另一位学者则对50万以上的说法不以为然。[9] 其势力范围内其他地区的人口至少与王国本身的人口相当。而蒂奥王国，除普尔外，其他地区肯定人口稀少。

鉴于刚果在该地区历史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在此提供该王国组织结构的概况供参考。它的结构基础分为大城镇——首府姆班扎刚果和乡村两大部分。贵族、牧民和奴隶三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法律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这种差别在语言上也得以体现，与都市生活相联系，表示“文明”、“礼貌”等概念的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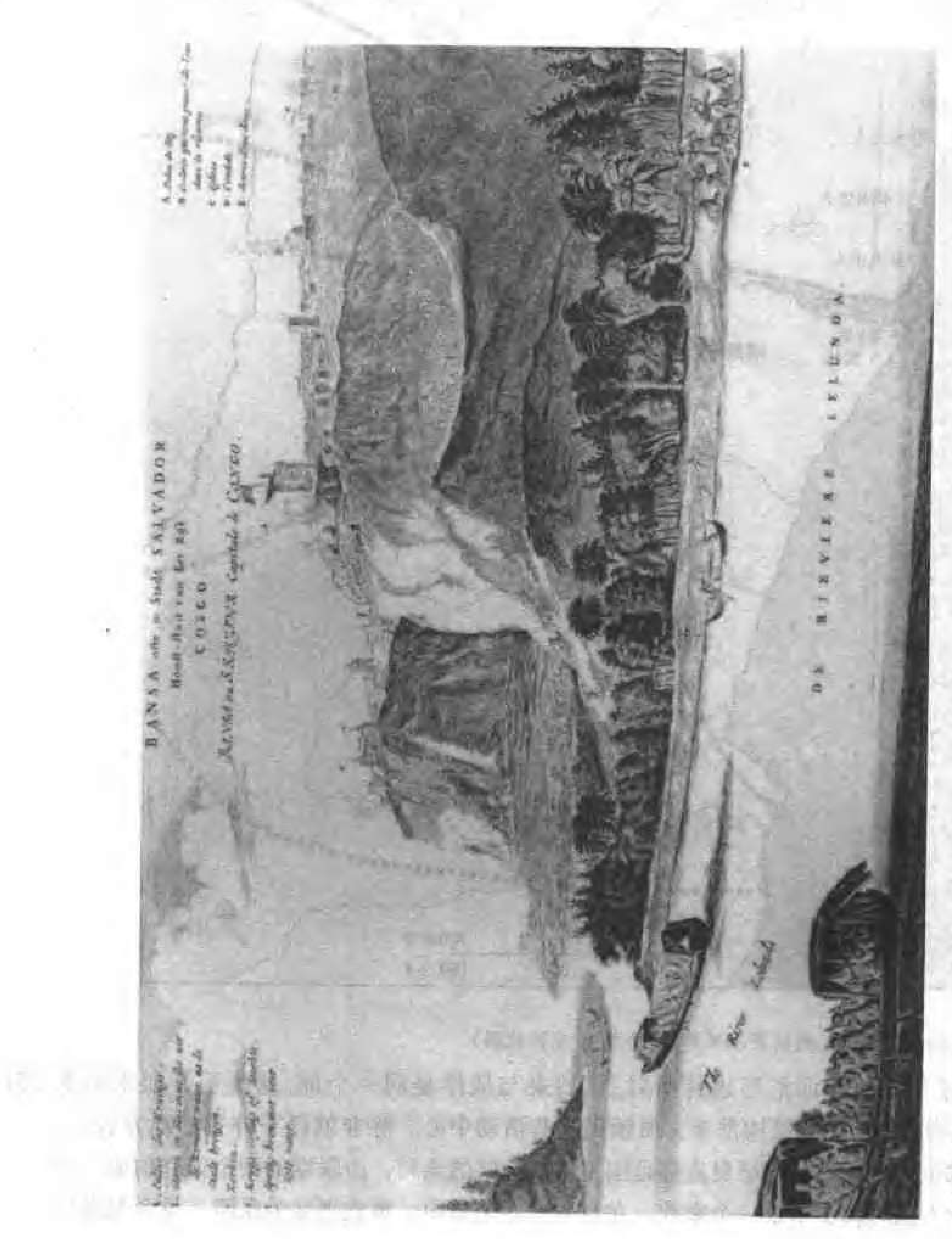
⑨ J.K. 桑顿，W.G.L. 兰德尔斯，1968年，第146-148页。



插图 19.2 16 世纪的刚果及其邻邦(仿照 J. 范西纳图)

与表示乡村"粗俗"的词汇形成鲜明对照。奴隶与战俘是同一个词，这说明了奴隶的来源。[10] 贵族构成了王国的结构框架，城镇则是其活动中心。除非就任于外省的地方长官，贵族一般都生活在城里。上层贵族都是国王或其前辈的亲属，由联姻的两个家庭构成，事实上这些个人同时属于不止一个家族。在与乡村的关系中，贵族则结为联盟。母系关系决 551

⑩ J.K. 桑顿，1983 年 b，第 17、21-22 页；J. 范·温(Van Wing)和 C. 彭德斯(Penders)，1928 年：kifuka (城市性)；kifuka kia ntinu (国王朝廷)；uvata (粗俗)；vata (教化)；evata (村庄)。这部辞典的出版年代为 1650-1652 年，可能是由国王的堂兄弟、教堂牧师罗博雷多编纂。它一直是研究心态的主要资料之一。



图片 19.2 刚果首府——圣萨尔瓦多，即原姆班扎刚果

定土地的获得、住宅使用权和村庄首领地位的继承权。[11] 村庄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与贵族集团相比要弱得多。在刚果，如省政府、高层政府机关或中央税务部门等要职由国王指派近亲担任，王位则选举产生。王室议事会由12名成员构成，其中包括四名妇女，根据A. [553] 希尔顿的看法，她们分别代表国王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氏族集团。[12] 尽管如此，王室议事会仍为继承权而勾心斗角。在一场北方贵族与首府及南方贵族的较量后，恩津加·姆本巴，又称阿丰索一世，终于在 1506 年继承了父亲恩津加·恩库伍的王位。[13]

刚果历代国王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王室成员增长迅速，阿丰索执政 25 年后，他已有 300 孙儿和曾孙，[14] 侄儿和曾侄孙也不会少于此数。国王的主妻必定是姆巴塔省执政官的女儿或姐妹，这个省的政府是从恩萨库·拉乌家族的母系传下来的。姆巴塔省的执政官又与国王的一位近亲联姻，执政官近亲的一个分支，即恩萨库·文达家族出了一位国家最高宗教官员，即姆班扎刚果的曼尼·卡本加，他负责主持首府地区土地神灵的祭祀。这两位来自恩萨库家族的贵族最终使国王登位，这便是刚果王国逐渐建立的一条清楚的线索。

尽管刚果王国是由王室近亲形成的网络统治，却具有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国王任命除姆巴塔省以外的其他各省的执政官，1491 年后，他也不再任命索约的执政官，姆平达王国的港口就位于索约。国王可随意撤销执政官和其他官吏。贵族们失去了世袭的官职便在姆班扎刚果闲居，受到遗忘和冷落。新国王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统治集团进行调整。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另一个因素是国王控制下的货币发行，作为货币的贝壳(Olivancilaria nana)，称为“恩赞布”(nzimbu)，来自于刚果王国控制下的罗安达岛的渔场。王国在军事上也实行中央集权制，在 16 世纪后期，奴隶组成的王室卫队士兵多达 16,000 至 20,000 人，[15] 它是王室唯一的常备力量。对外作战时，农民们即以地方为单位集结起来。每个贵族家庭以其家族头人为中心，各有自己的随从(仆人或奴隶)。王室还接受贵族送交的其他奴 [554] 隶。

王权思想体系，称之为“恩基西”(nkisi)，总的说来源于宗教观念，其中三种崇拜对象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是崇拜祖先，祭拜的圣地在王室公墓；第二是崇拜地方神灵，姆班扎刚果的地方神灵由曼尼·卡本加负责供奉(这一称号的拥有者为指派给诸地方神灵的教士，村庄至国家各级都有)；第三是崇拜王室护符。恩基西概念是基础，基督教后来也采用此词。用以表达“神圣之物”，教堂是“恩基西之堂”，《圣经》是“恩基西之书”，而神父则是“恩基西的恩干加”(nganga)。[16] “恩干加”一词已得到认可，专指宗教专家，特别是

---

⑪ A. 希尔顿(Hilton)，1985 年，提供了一些暗示；J. 范·温和 C. 彭德斯，1928 年，提供了证据：“温古里”(unguri,关系)：“温古里安卡马”(unguri ankama,领主权)，这一头衔直到 1900 年左右还在南部苏库人中间使用；“恩古里”(nguri,母亲)。前缀“u-”表示一种抽象概念，译成“领主权”的表达方式意味着一块领土在大的范围内被看做一种关系，“温古里”意即“母亲原则”。

⑫ A. 希尔顿，1985 年，第 194 页。

⑬ L. 贾丁和 M. 迪科拉多(Dicorato)，1974 年，第 54-64 页。

⑭ 前引书，第 181 页。

⑮ F. 德皮加费塔，1591 年，第 120 页；A. 希尔顿，1985 年，第 196 页(1595 年)。

⑯ F. 邦廷克和 D. 恩登比·恩沙(Ndembe Nsasi)，1978 年：nzo amuquissi (269)，nganga (269)，muquissi mucanda ua u-cua (268)，unganga (271)，uquissi，(神圣)(271)；J. 范·温和 C. 彭德斯，1928 年：mukisi (恶咒,巫术,施毒罪)，ukisi (神圣,神性,神意)和 kia nkisi (神圣的)。

恩基西方面的专家。疾病和灾祸都归咎于恩达基(ndakig巫师),而巫师身份只有"恩干加·恩戈博"(nganga ngombo,预言者)才能识别，有时需借助神判。所用神示，包括司法裁决中使用毒药检验便是源于这一概念，长期猜疑国王是一名巫师，也是源于这一概念。王权是神圣的，国王也称为"至高无上的造物主"(Nzambi mpungu)，各项宫廷法规和礼仪都体现出这种神圣感，授权册封仪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国王通过祝福(tumba)，表示他对王室官员的保护，通过呼风唤雨，庇佑臣民五谷丰登。[17] 从实际和深远意义上说，国王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恩基西"。 555



图片 19.3 恩赞布容器

邻近王国的组织结构尽管不同，思想体系却如出一辙，但它们的中央集权制稍弱。在卢安果，贵族势力没有取代母系派别，他们的凝聚力远不如刚果贵族，[18] 恩东戈的领土结构只有小的酋邦这一级，军事系统的目的在于弥补这种不足。[19]

阿丰索一世成功地实行了刚果历史上最长久的统治，即从1506至1543年，发挥了关

[17] O. 达珀，1668年，第583页；关于"图巴"，参见与奥本加先生的私人通信。

[18] 关于一般情况，见P.M. 马丁(Martin)，1972年，和O. 达珀，1668年，两人提供了关于卢安果的长篇描述。

[19] B. 亨泽(Heintze)描述了该结构，1970年和1977年(关于基萨马人)。

键性的历史作用。他对葡萄牙开放门户，随之实行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并长期坚持宽容地吸收基督教教义。这位教派首领于1491年率先加入基督教，在1506年以前便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传教士的保护人。登上王位后，使天主教在1518至1530年间，在其儿子亨里克的指导下迅速成为国教，亨里克在罗马被封为主教。后来在葡萄牙控制下，他的主教职位旁落。奴隶贸易自1514年开始发展，刚果国王首先效仿葡萄牙国王，试图通过王室垄断贸易实行控制。1526年，他又试图禁止奴隶贸易，这一尝试遭到失败，甚至王室的垄断也受到各方面的破坏，如圣多美的葡萄牙黑人，还有其邻国——海岸地区的卢安果和恩东戈，甚至还有罗安达——刚果王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王利用奴隶、象牙及棕榈织品贸易的收入引进葡萄牙技术人员，特别是传教士。国王去世前，社会和政治生活已发生重大的变革，贵族和平民间的差距扩大，贵族成了有文化的人，他们信奉基督教，并 **556** 参与奴隶贸易，平民则受到残酷的压迫。[20] 刚果王国从普尔及远处进口奴隶以充实王室卫队，加之阿丰索的后代繁衍迅速，王室力量进一步增强。由于国王后代过多，继承权受到影响，继任的国王都是阿丰索三个嫡生女儿的后代。日益增多的后代争权夺利，使王室分裂成敌对的派别。1665年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内战，导致了王国的崩溃。葡萄牙人在首府出现，并与贵族通婚，后出现了葡萄牙黑人这样一支新的政治力量，他们与本国来的葡萄牙人产生分歧，1665年前一直是宫廷内相互对立的派别，并参与了王位继承权的争斗。



图片 19.4 卢安果王国身着猫皮围裙的刚果贵族

1506年前，洲际间的贸易极少，奴隶贸易开始后情况有所改观。按正常标准衡量，

[20] L.贾丁和M.迪科拉多，1974年，第179页："还必须小心，以免贵国大人物虐待平民百姓。"（1529年后期）。

1515至1526年间的奴隶贸易仍处于混乱状态。从那时起，奴隶由两种人构成，即囚犯和557 外国人，所谓外国人主要来自普尔，也有些可能来自宽果河流域。早在1529年以前，位于首都的黑白混血穆拉托人社群即向普尔派出了代理商(pombeiros)，意即蓬博(pombo)的代理商，在刚果语言中蓬博即为普尔人。在这以前，奴隶的来源不得而知，很多是巴泰凯人，但肯定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他们顺流而下被送到普尔。1540年前，奴隶年出口量达4000至5000人，随后则达6000至7000人。[21] 刚果从普尔进口的奴隶肯定极多，因大量奴隶来到姆班扎刚果，入征王家卫队，或者被送到为首府提供粮食的种植园，还有些被送往姆平达港口服劳役，或派给外省贵族当随从。除了这种管理下的奴隶贸易，还有圣多美人进行的一种秘密奴隶贸易，在王国的南北边界地区发展，特别是1526年从贝宁王国出口的贸易结束后。这种秘密交易一般小规模进行，但罗安达却是个例外，因为恩东戈的扩张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奴隶。

葡萄牙人对刚果的矿产资源垂涎已久，早在16世纪，葡萄牙人就相信刚果拥有尚未开发的金矿，并试图攫为己有。然而，刚果国王决心将本贝的铜矿和姆班扎刚果的铁矿开采权紧抓不放，随后的几任国王根本不允许矿产勘探并限制铜矿的出口。1506年前的这些措施更激起了葡萄牙人的占有欲，于是，葡国王禁止将船只卖给刚果，以阻挠其试图依靠本国力量将货物运往圣多美或欧洲。葡萄牙一直控制着贸易，使之成为不平等交易。刚果王室将其税收偿付给葡萄牙技术人员和传教士，并要支付派往葡学习的贵族的部分费用。然而，从一开始，大量的赋税收入就用于进口纺织品、酒类和奢侈品，国王将其进口品赏赐给贵族们，很快，这些就成为贵族竞相炫耀的必需品，阿丰索一世统治结束时，国家赋税收入已经告罄。

阿丰索一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尽管迪奥戈一世试图限制欧洲的文化入侵，但相对说来，刚果的力量已经减弱，特别就恩东戈而言，恩东戈通过与圣多美的秘密交易，国势进一步强盛。1561年，刚果与葡萄牙几乎绝交，随后，1566至1567年间，在与普尔的蒂奥人交战时，两位国王相继去世，引起国内动乱，随着东部贾加人的入侵，刚果王国终于堕入了灾难深渊。

558

三国：1575-1640年

贾加人向王室卫队发起攻击，王室成员仓惶出逃，在扎伊尔河下游的一个岛上避难，许多难民被贾加人抓获为奴卖给圣多美人，刚果国王不得不求助于葡萄牙。葡派出远征军在1571至1573年间帮助收复了失地，这支军队1575至1576年后才撤出。1575年安哥拉葡属殖民地建立，大批葡萄牙人1575年后前往卢安果经商，从此刚果王国失去了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

对刚果入侵者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22] 贾加(刚果语称雅卡)在资料中用做野蛮人的同

---

[21] L.贾丁和M.迪科拉多，1974年，第203页(1536年)；P.E.洛夫乔伊，1983年，第37-38页。

[22] A.希尔顿在一次辩论的最后一篇文章"对贾加人的重新思考"将1963-1981年(!)间D.伯明翰、J.范西纳、J.C.米勒(Miller)、J.K.桑顿、F.邦廷克和A.希尔顿等人的观点集中起来，并认为这些入侵者是宽果人雅卡王国的祖先。

义词，指多少过着半游牧生活的武士群体。最早的贾加人出现在姆巴塔的东部，或普尔南部，并由此进入宽果河流域，他们的入侵肯定与刚果—蒂奥战争有关，也可能与1561年奴隶贸易的中止有一定关系。一般认为，入侵队伍的壮大是由于大量农民不堪忍受贵族的残酷剥削，其目的是分享奴隶贸易中的利益，一旦胜利，他们将会在沿海一带进行奴隶贸易。也有人认为是干旱及随之而来的饥馑使其入侵刚果，但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材料。

保罗·迪亚士·德诺瓦斯在恩东戈宫廷呆了一段时间后，便积极谋划，终于如愿以偿，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即征服并开拓殖民地。这块殖民地后来称为安哥拉，这原本是恩东戈国王的称号。因此，迪亚士1575年来到非洲，次年便创建了罗安达，开始进行奴隶贸易，并极力排挤来自圣多美的葡萄牙黑人社群，这些人也在罗安达从事贩奴交易，他们最终将市场让给了迪亚士，来到恩戈拉的宫廷。1579年，葡王宫再三催促迪亚士履行协议。恩东戈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作为防范措施，将宫廷内的葡萄牙人全部杀掉，由此引发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战争，直至1671年，战争初期，地方联盟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双方不分胜负。在艰难的条件下，葡萄牙人竟然成功地在内地筑起了几个防御性堡垒，并于1612年与姆班加拉人(又称贾加人)结成联盟，这些人是游牧武士结成的团伙。在1600年以前即居住在该地区，以抢劫掠夺为生。靠着这群人，特别是贾加卡桑杰人的帮忙，葡萄牙人在1617至1621年间侵占了恩东戈王国的大片领土，国王逃往东部，联盟 559 军将该地区洗劫一空，致使这个古老王国田地荒芜，奴隶贸易中断，饥荒肆虐，[23] 1622至1623年间双方签订和平协议，恩东戈国王的妹妹恩津加·姆班德出任谈判代表。她在罗安达受过洗礼，教名为安娜，但恩津加此时却成了反葡派的首领。1624年初，国王去世(可能是被谋杀或自杀)，恩津加成了摄政王，1626年成为女王。这时，贾加-桑杰人仍占据着恩东戈最富庶的地区。1626年，战火重燃，这次葡萄牙人既打击恩津加，又打击卡桑杰人，并试图推出一位傀儡国王。最后，卡桑杰人于1626年在宽果河流域站稳脚跟，并于30年代在此建立了因班加拉国。恩津加则征服了马坦巴王国，并以此作为根据地奋力反抗葡伪政权，[24] 趁着该地区战事纷繁，丹麦人占领了罗安达，恩津加与丹麦人结成同盟。

安哥拉殖民地由里斯本指派总督，三年一届，它分为罗安达城和几个要塞，罗安达城由市议事会协同总督管理，军事首领则负责各要塞周围领地的管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管理结构是封建制的，它以臣属协议为法律基础，通过葡萄牙封建领主(amos)与地方首领(soba)与葡萄牙王宫联系起来，后来则通过总督和军事首领将宗主国与殖民地联系起来，国家的税收和代理人的收入来自各封建贡赋，实物或劳力偿付都可以奴隶为替代。直到18世纪引进了人头税，并且领地与葡国王在法律上的臣属关系淡化，旧的税制才被取代。[25]

这时，刚果已逐渐恢复元气。尽管失去了昔日的霸主地位，贵族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但王国仍保持其强盛并向东扩张，但南部领土已经沦丧，特别是1622年，失去了罗安达岛的天然渔场和罗安达城。刚果一支强大的外省军队在本贝被安哥拉人和贾加人的联

---

[23] D.伯明翰，1966年，第30-89页。
[24] B.亨泽，1977年；J.C.米勒，1975年a和1976年，第151-264页。
[25] B.亨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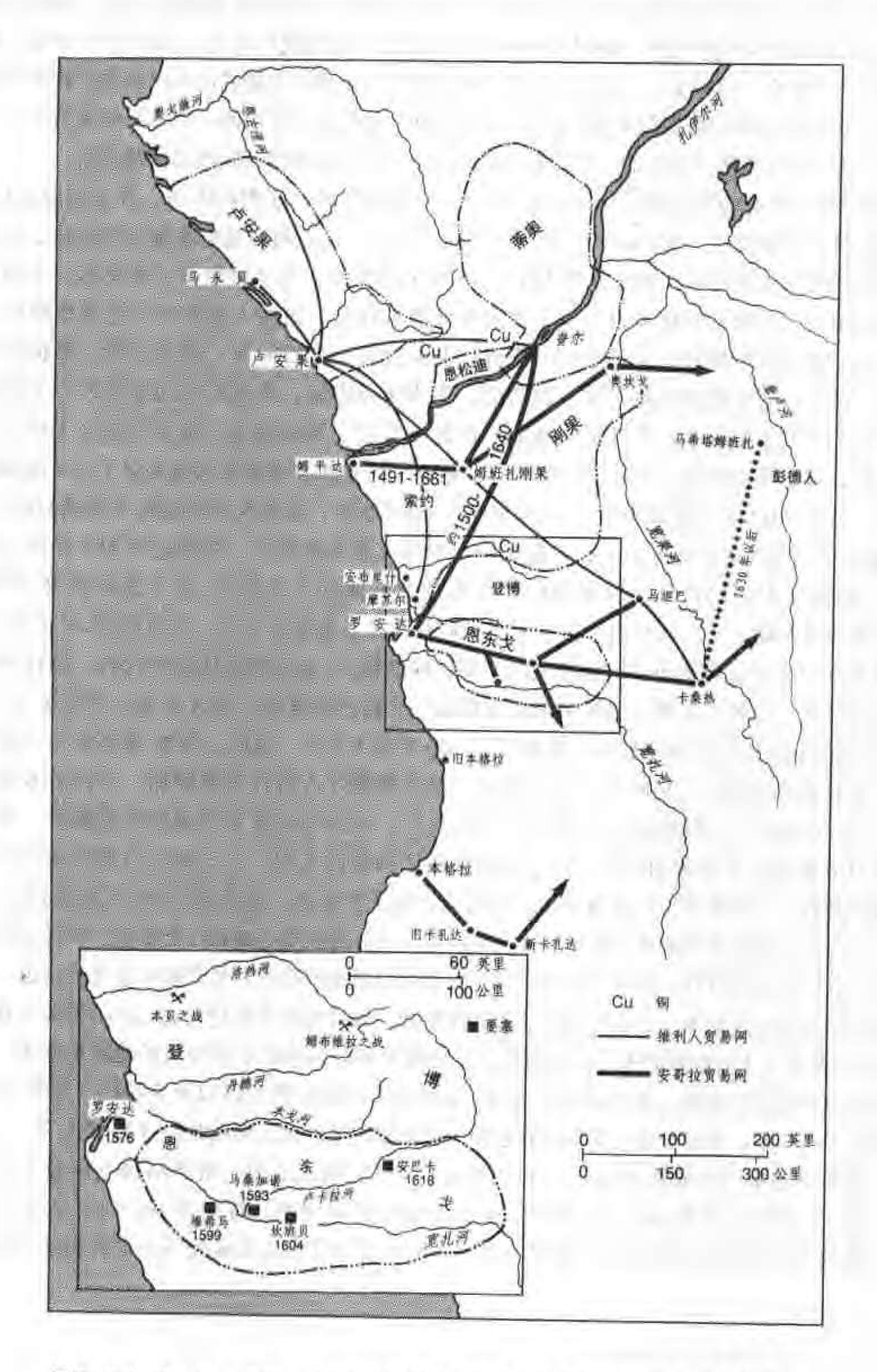


插图 19.3 17世纪各王国及刚果地区的贸易，左下图为恩东戈（仿照 J. 范西纳图）

军击溃，但战争却暂时停止，因为刚果在全国实行总动员，此外，它还与梵蒂冈结成外交同盟，又使葡萄牙与西班牙相互争斗，甚至使这两个国家与荷兰抗衡，这一系列外交手段终于成功地遏制了葡萄牙控制刚果的企图。但刚果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近海省份索约及此处的姆平达港口。1636年后，该省宣告独立，尽管其君主保留了参加选举刚果国王的权利。同年，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家族在竞选中被另一竞争家族击败，众多的选举团成员显得 561 这般无能，以致1641年，加西亚二世在其家族的支持下，尽管没有选举团的认可，还是登上了国王的宝座。[25]

卢安果甚至在1600年以前就已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从费尔南瓦兹咸水湖到黑角南部，也许还包括恩古涅河流域最富饶的地区和尼阿里平原的一部分。贸易所波及的文化影响更为广泛，甚至可追溯到加蓬港湾北部。但对其1700年以前的政治发展状况，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27]

卢安果从事象牙贸易，象牙由俾格米人从外地获得后提供，也从事皮革、红染木和棕榈织品的贸易。相对来说，他们极少出口奴隶。经商者是葡萄牙黑人，他们在贝宁、圣多美、卢安果与罗安达之间的沿海地段进行利润丰厚的贸易，从卢安果运来的棕榈织品在安哥拉变成货币。在1600年，他们便在安哥拉与来自刚果王国东部的商人展开了贸易竞争，[28] 从这时起，荷兰人便频频出现于卢安果和索约，卢安果不像姆平达那样信奉天主



图片19.5 卢安果国王的宫廷，1668年

[25] J.K.桑顿，1983年b，第xiii页；J.范西纳，1965年，第101-104页，107-109页，130-134页和138-142页。
[27] P.M.马丁，1972年，第1-32页；D.恩戈瓦·恩加拉（Ngoie Ngalla），1978年和1982年。
[28] P.M.马丁，1972年，第33-52页。

教，所以给荷兰人提供极好的贸易基地，国王一开始便与之合作。[29] 荷兰船只提供的商品物美价廉。他们买进铜矿，然后将枪枝弹药卖给卢安果人。结果，卢安果沿岸的商人们，即维利人，组织商队深入内地，并以惊人的速度将贸易网铺开。至1626年，他们到达丹德南端，[30] 约1650年，他们已在姆班扎刚果甚至马坦巴和卡桑杰进行商业活动，商队的主要线路是经过恩松迪这个矿产储藏地到达普尔，维利人在恩松迪开采铁矿，可能还有铜矿。而在沿海，他们则延伸至加蓬腹地，甚至远达恩古涅河与奥戈维河的汇合处。

这段时期内，维利人的贸易网与原有的贸易网不但在象牙、织品，而且在奴隶贸易方面都展开了竞争。罗安达的建立使刚果和安哥拉的贸易网受到破坏。罗安达的奴隶出口量比姆平达更大，开始主要是战俘，[31] 每年约12,000至13,000人，1625年，合法的出口总数达11,000人。1618至1640年间略有下降，年出口量略低于10,000人。最初的几年过后，从普尔(并不经过姆班扎刚果)或宽果河畔的奥坎加市场上购得更多的奴隶，[32] 商队越过宽果河，朝奎卢河方向进发。至17世纪30年代，宽果河流域以远的奴隶也从马坦巴和卡桑热(即卡桑杰的首府)陆续来到罗安达。

形势发展对刚果极为不利，刚果首府已不再是货物和奴隶的受托储运地，这里的奴隶贸易仍在继续，但其规模日益缩小。更严峻的是葡萄牙人引入了其他贝壳货币，致使刚果货币严重贬值，至1619年，"恩赞布"已贬值三分之二，税收相应减少三分之二，[33] 国王极力采取补救措施，货币才逐渐恢复原有价值，市场转向罗安达和卢安果给刚果经济带来的损失，国王和贵族们当然首当其冲。

这段时期内，1548至1583年间引进了玉米栽培，1600年以后引进了木薯、烟草，[34] 大概还有豆类、花生及其他美洲植物，除了1600年以前在沿海发现的柑桔类水果外，从1583年便提到猪，[35] 这可能是进口的家畜，猪后来主要在刚果和安哥拉中部饲养。

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在17世纪，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改变了农业，增加了产量，特别是有了木薯这种更适于干旱和战争环境下生长的食物。木薯逐渐与各条商路相联系，因为用它作为奴隶的食物，这样，营养标准普遍提高。欧洲人带来的流行病天花，早在1560年便被提及，后来竟然成了一种周期性的瘟疫。

如上所述，17世纪上半叶该地区经历了营养和保健条件方面的变化，还经历了奴隶贸易的初级阶段，这不可避免地确定了新的人口倾向，其详情尚不得而知。然而，人口减少是

---

[29] 前引书，第42-45页。

[30] B.亨泽；P.M.马丁，1972年，第69-70页。

[31] B.亨泽。

[32] 关于奥坎加，L.贾丁和M.迪科拉多，1974年，第175页，注⑨，认为早在1529年，pumbo的复数即指这一市场。从1584年起，奥坎加作为一个王国后来又作为长途贸易的起点被提到，直到1640年一直经常提到。据悉将近1680年时这一市场以及通往奎卢河的商道被商人遗弃。刚果以及欧洲的影响可能沿这条路远达库巴国土(J.范西纳，1978年，第187-191页。)著名的马希塔姆班扎可能位于这条路上，距离奎卢河不远(科迪·穆宗，Kodi Muzong，1976年，第179-183页)。

[33] J.卡维利尔和L.贾丁，1954年，第306-312页。

[34] J.范西纳，1978年，第11-13页。

[35] B.亨泽，1977年，第773页；A.布拉西奥，1952-1971年，第2卷，第510页。

毫无疑问的，特别是在安哥拉。[36]

走向新秩序：1641-1700年

564

1641年，荷兰攻占了罗安达并强占了安哥拉的大片土地。1648年，一支来自巴西的舰队将荷兰人赶走。[37] 从那以后直至1730年，巴西人完全控制了安哥拉的贸易。30年代后仍部分控制。1641年，加西亚二世登上刚果王位，像恩津加一样，他与荷兰人结成同盟，葡萄牙的复兴使他们面对强大的葡军，不得不妥协。卡桑杰人早已退出战事，签订了和约，并与葡结成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联盟。同时，从1645年起。大批意大利嘉布遣会传教士涌入刚果，促使加西亚二世与葡萄牙达成协议。这些传教士在刚果及后来在安哥拉的使命就是引进400名传教士(差不多是17世纪的总数)，并加速使刚果许多地区的农民皈依基督教，即使是在刚果王国崩溃后。王国崩溃的起因是由于对协议的不满导致安哥拉人入侵刚果，刚果王国的安东尼奥一世宣战后集结了全国的贵族，但在1665年的姆布维拉之战中大败(这是该世纪无可争议的最大战役)，[38] 安东尼奥与许多贵族战死疆场。但另一支葡军1670年却在索约遭到毁灭性打击，以致安哥拉不得不放弃征服刚果的企图。1671年，恩东戈的残余势力被肃清，至1680年，恩津加的马坦巴，卡桑杰以及各酋长占据的宽扎河中游南方各地都被强制实行和平，至此，征服最终完成。

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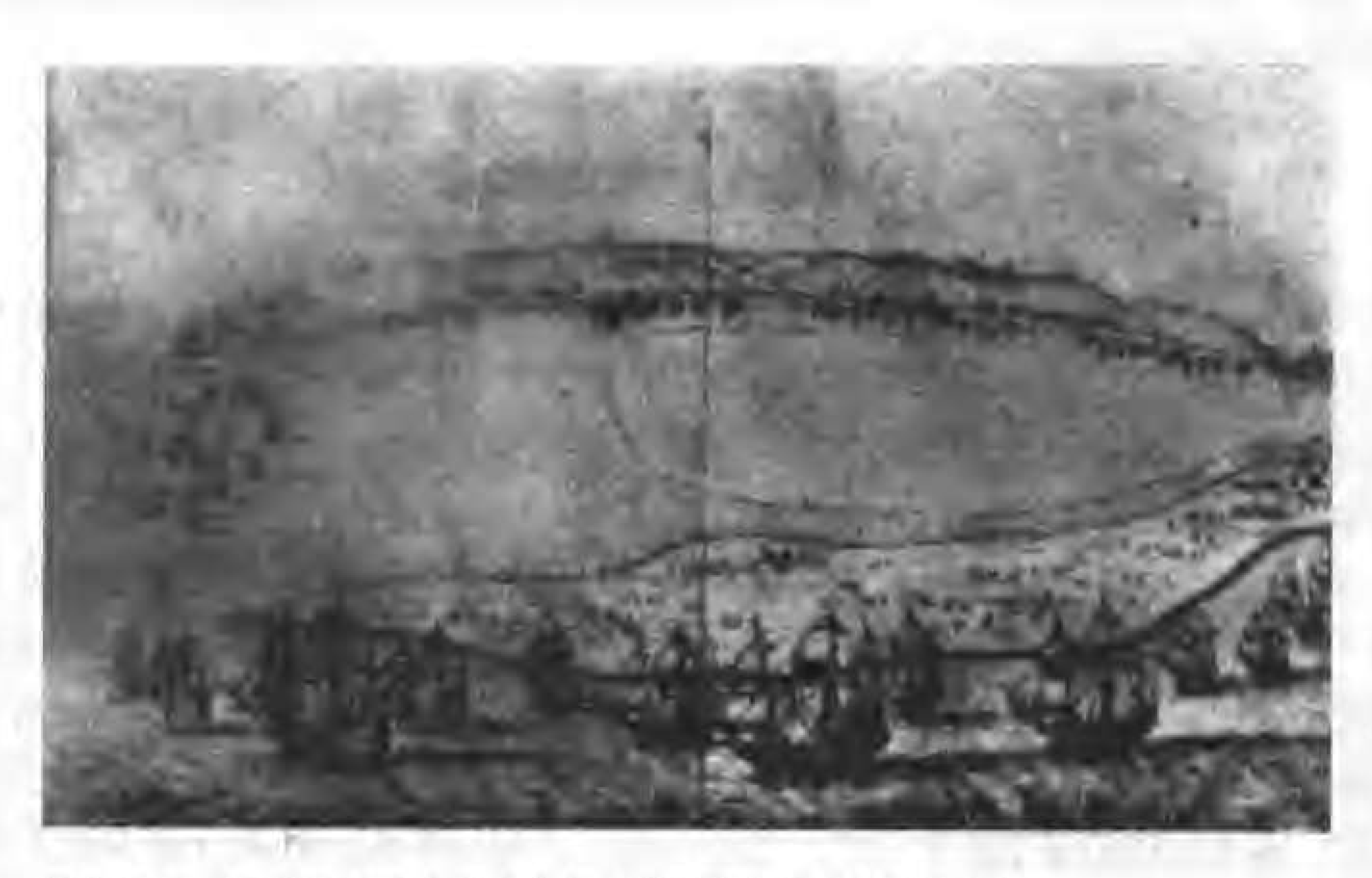
图片19.6 17世纪的罗安达港

刚果王国尚未从姆布维拉战役中恢复，王位继任的争议又在王室家族中引发了一场内讧，这使姆班扎刚果元气大伤并于1666年被毁，1678年被完全遗弃，该城是刚果的政治枢纽，因此一切均陷于崩溃。1709年，当刚果国王独自回到姆班扎刚果时，作为中央集

[36] J.K.桑顿，1981年b，他的模式对我们来说似乎过于乐观(第685页，奴隶中的妇女占四分之一而不是三分之一，小孩除外)，在第713页断定，18世纪人口减少了。

[37] C.R.博克瑟(Boxer)，1952年；A.达·西尔瓦·雷戈(Da Silva Rego)，1948年。

[38] C.R.博克瑟，1960年a；J.K.桑顿，1983年b，第73-83页。



图片19.7 17世纪40年代荷兰占领时期的罗安达圣保罗城和海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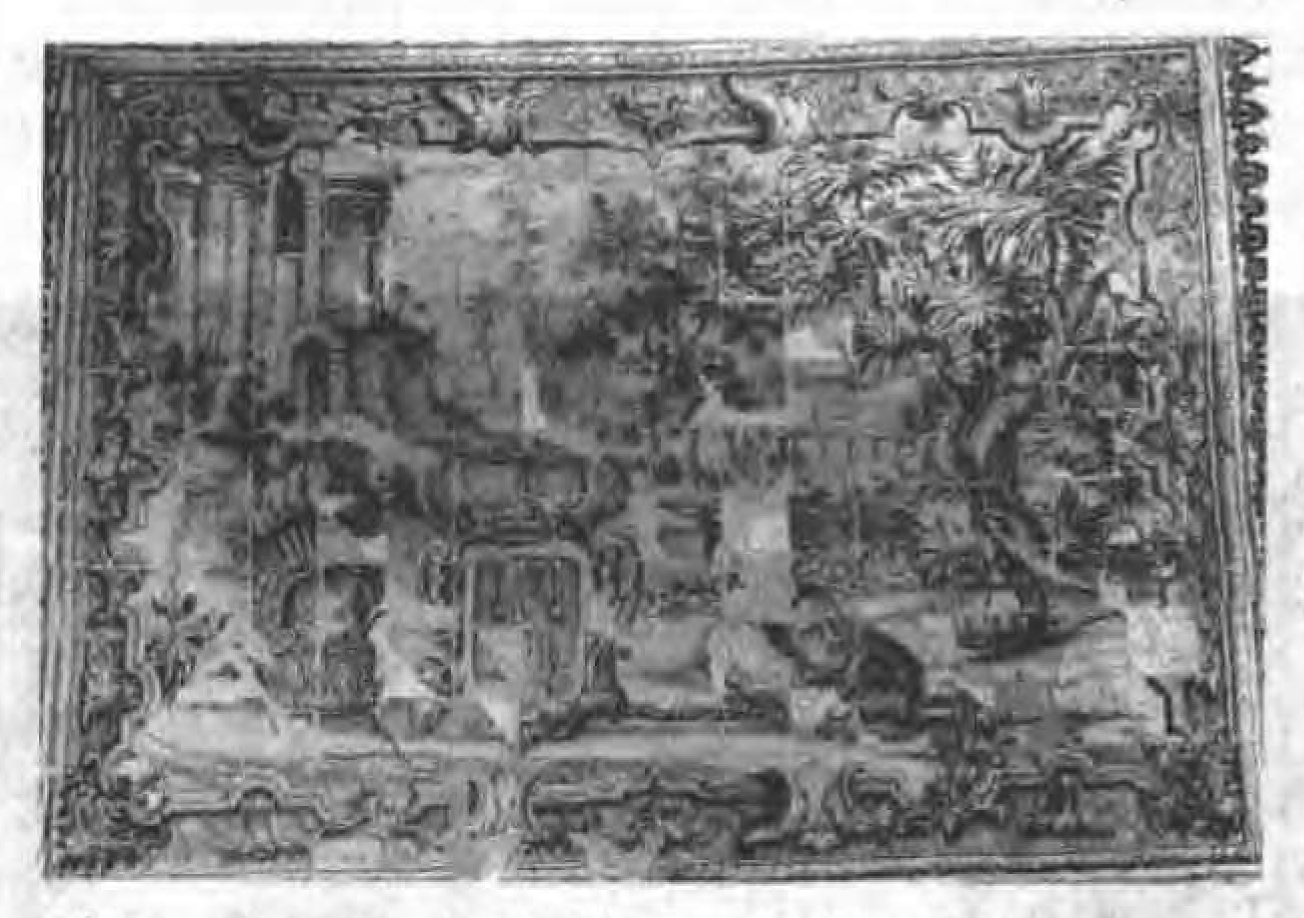
权制实体的王国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小公国及各公国间争权夺地的内部争斗。除索约外，其他各地都处于分裂状态，即使索约也难以统一，不得不放弃一些地区。1666至1678年间，王室贵族陆续逃离姆班扎刚果，使自己逐渐适应乡间的生活，并为争权夺利开始了新的竞争，在此期间和以后的一段时期，相当多的贵族向北越过扎伊尔河，在马永贝地区、扎伊尔河与尼阿里河之间的地区建立小的公国领地。

这场动荡带来的空前浩劫摧毁了社会基础，对这个古老王国的世界观提出了众多的问题，女预言家随之出现。1704年，唐娜·贝阿特里斯·基姆帕·维塔，这位刚果的圣女贞德，开始传播一种经过改造的基督教——安东尼娅教，她抵制白人和外来传教士，规劝那些声称对王位有继承权的贵族停止内讧，恢复王位和姆班扎刚果往日的繁荣。她拥有大批平民追随者(她自己属小贵族阶层)，并成功地劝说一位拥有王位继承权的贵族在姆班扎刚果安顿下来，给他带上了黑色的安东尼娅王冠。1706年，王位的觊觎者佩德罗二世将她抓获，当做异教徒烧死，这场宗教运动在她死后仍持续多年。[39] 佩德罗二世恢复了王国并向姆班扎刚果移民，但历经40年之久的政治变革已成潮流，无法扭转。

尽管刚果再度崛起，这片广袤土地上原有的组织结构却不复存在。现在的结构框架，就像安哥拉一样，是以经济为主，商路的连结靠的是在各地转换运输工具。安哥拉经过1680年前的扩张也出现衰退，各地方行政官和罗安达的“卡马拉”(Camara)都不能继续控制和支配葡萄牙黑人(quimbares 和 ovimbali)，这种人在各种资料中开始提及，也不能控制巴西商人。这块殖民地的控制权逐渐从他们手中失去。而此时卢安果依然强盛，1701年，567 卢安果国王去世。国王一位25岁的妹妹成为摄政王。国家由摄政议事会管理，一年后才选出新国王。[40] 一个以贸易为指导思想的王国，摄政议事会的议员们理所当然是各贸易

[39] A.C. 贡萨维斯(Gonçalves)，1980年。

[40] P.M. 马丁，1972年，第162-163页。



图片 19.8　罗安达的拿撒勒圣母教堂正面的花砖装饰，166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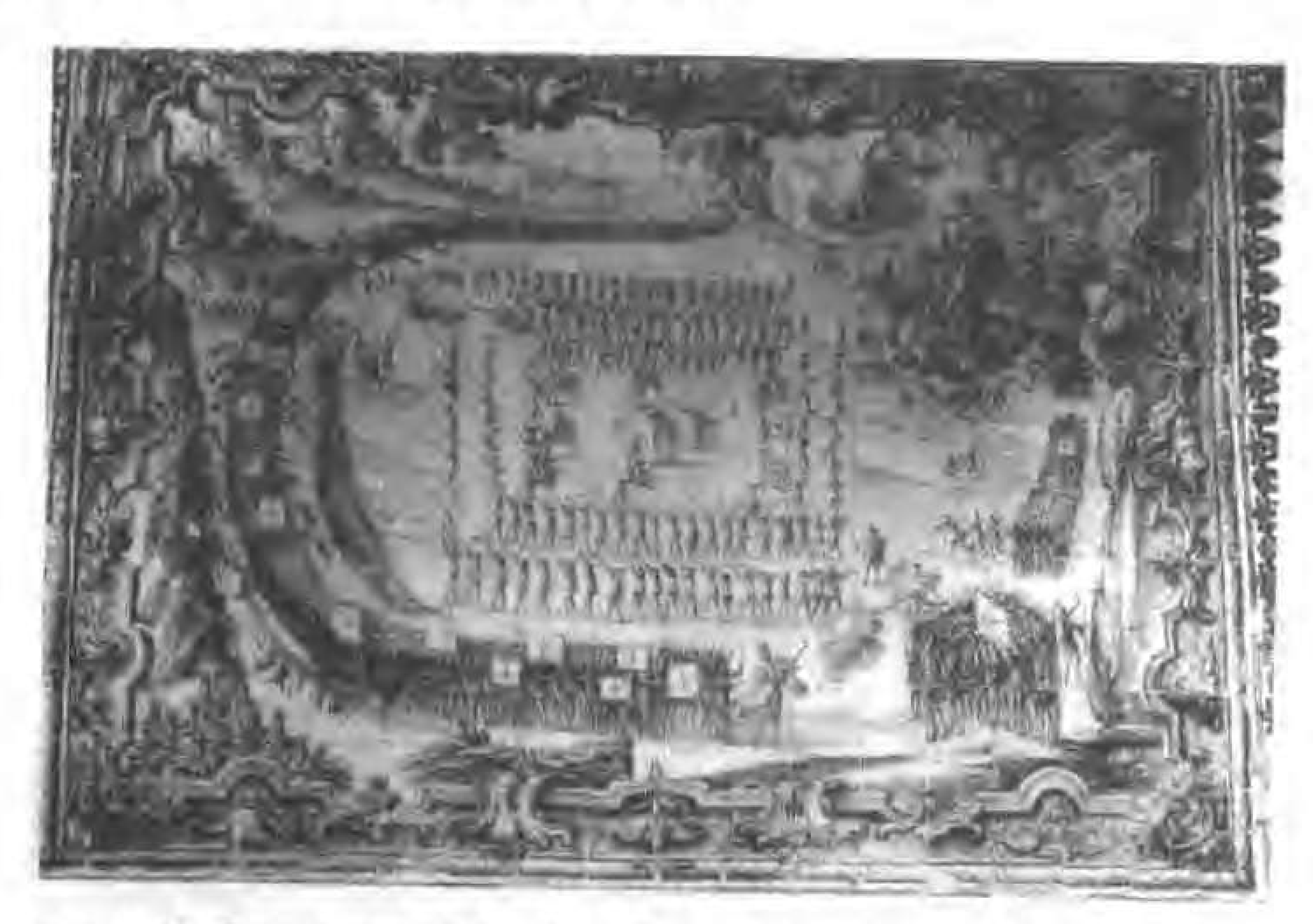


图片 19.9　上图的局部，安东尼奥一世头像，他葬于该教堂内

公司的头面人物。出于王室的宗教声望，它开始重新调整对贸易的管辖权。

在奴隶贸易的边缘地区，各国都在通过贸易的增长加强自己的国力，至少在本国能控制奴隶贸易的时期力争保持贸易稳定。此时，卡桑杰已成为宽果河畔的一大强国，因为它在 1648 年后已控制了日益增长的奴隶贸易，至 1680 年为止，部分奴隶来自遥远的隆达。卡桑杰王国的人口自 1630 年以来就由多种成份构成，而卡桑杰的部分土著人，即彭德人，

不得不迁向宽果河以远地区。[41] 因为担心受到袭击，彭德人向东北方向迁徙，一直来到马希塔姆班扎这个靠近奎卢河的人口中心，然后向东，到达开赛北部，并在此建立了酋邦。[42] 在北方，蒂奥王国站住了脚跟，看来似乎没有大的变化，但也有资料提及这个地区出现过其他王国，其中有些可能是17世纪建立的。[43]



图片 19.10 罗安达拿撒勒圣母教堂的花砖装饰，表现的是姆布维拉战役

荷兰人的征服和复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作为货币媒介的织品和恩赞布贝壳严重贬值，1640年价值12雷拉尔的一块正方形酒椰纤维织品到1649年已跌至5雷拉尔，尽管严重贬值，政府却未能成功地引入铜质货币。后来织品价格有所回升，在索约，1813年一块织品回升至10雷拉尔。我们再看看恩赞布贝壳作为货币的情况，它由1640年的2000雷拉尔一个科弗(cofo,单位)，贬至1649年的1600雷拉尔，内战更加速了它的贬值，1698年仅值800雷拉尔，从这以后，单位价值稳定在1000雷拉尔左右。[44] 这一系列变化不仅由于政治上的发展，也反映出经济上已开始出现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

569

在安哥拉，这种变革表现在巴西人对奴隶贸易方面的战略调整，即巴西人提供资金，船只和欧洲的货物，通过其在罗安达和本格拉的代理人，配合商队组织者——葡萄牙黑人奴隶贩子，进行奴隶贸易，葡萄牙人并非直接投资于安哥拉，只是投资于巴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30年。既然资金匮乏，奴隶贩子迫切需要战争，以获取战俘卖给商人。里斯本的大公司估算他们的利润主要来自货物贸易，并非奴隶贸易。因此，尽量不做奴隶交

---

[41] 科迪·穆宗，1976年，第91-169页。
[42] 前引书，第170-267页。
[43] 包括博马人的“吉里博马”王国；参考E. 苏尔兹曼(Sulzmann)，1983年。
[44] J. 卡维利尔，1946年，第309-3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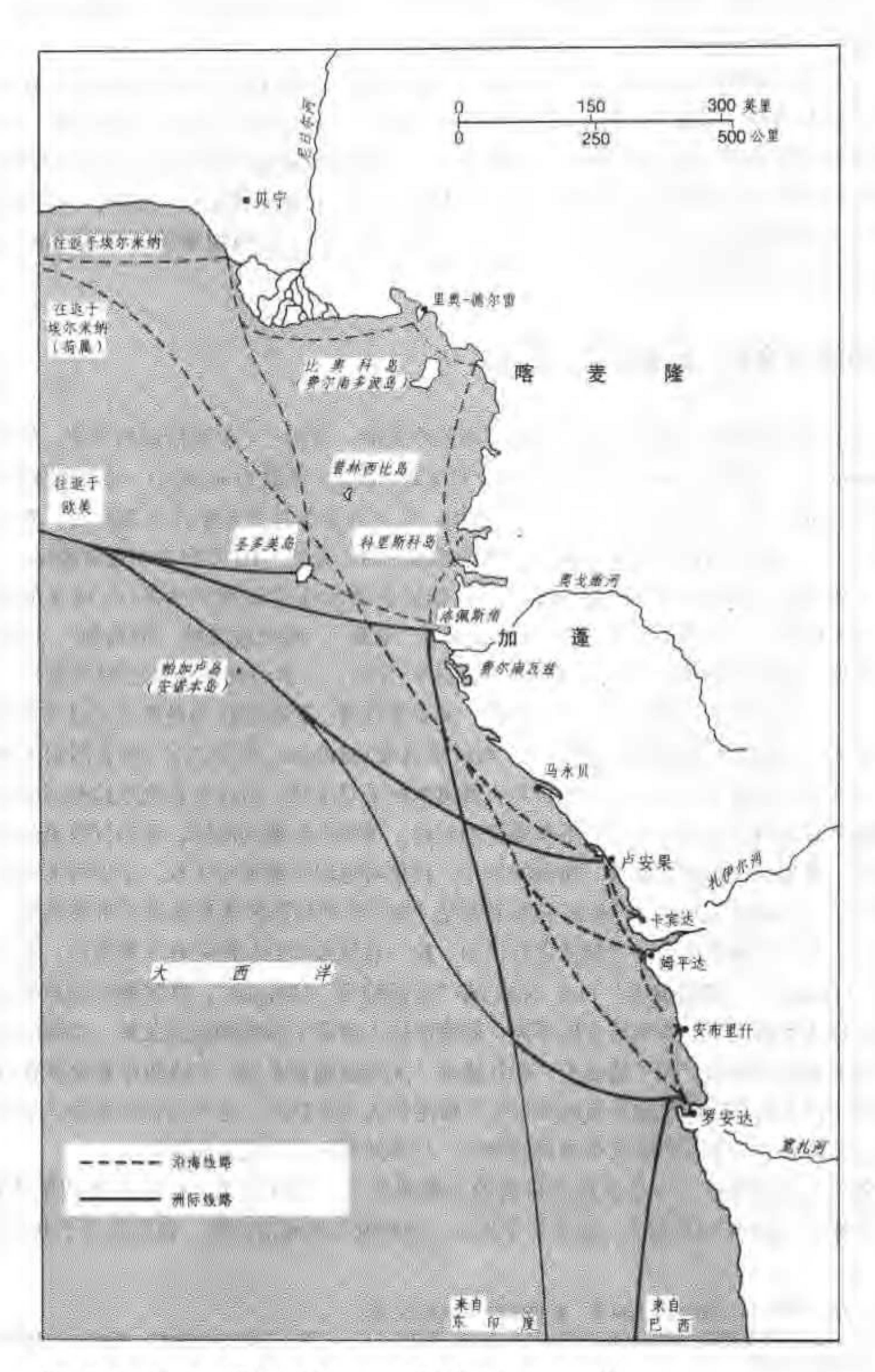


插图 19.4 17、18世纪通往中非的海运线路(仿照 J. 范西纳图)

易。他们进口货物，提供给各地酋长和葡萄牙黑人，这些人不欢迎汇票，所以汇票需转换成巴西的白糖或当地的象牙，[45] 主要市场在巴西。

卢安果沿海的情况则截然不同，西印度殖民地急需大量的奴隶，英法船只1660至1665年频频出现，与荷兰人展开了激烈竞争，因为荷兰也开始了大宗的奴隶贸易，于是，在欧洲筹措资金的各大公司开始从事三角贸易。奴隶贸易最初因刚果的动乱而颇受欢迎，但随后便以购买为主代替了初期的抓捕，维利人的商队在遥远的地区，如普尔、卡桑热等地市场上有规律地成交所得远远大于战俘的来源，这便是大规模奴隶贸易开始时的形势，这种贸易在18世纪达到顶峰。

社会和文化变革：16世纪及17世纪

在此主要谈刚果，我们对它的情况了解最为全面。当初三个社会阶层的划分，即贵族(mwisikongo)，农民(babuta，单数为mubata)和奴隶(babika，单数为mubika)一直持续到1666至1678年间，各个阶层有其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大变革首先发生在贵族阶层，然后发展到乡村。贵族阶层以及表明其身份、地位的相关词汇直到1700年左右才逐渐废除。

570 “埃坎达”(ekanda，词根为kanda)一词，据证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使用，现在的意思为“母系氏族”或“母系世系”。当时的意思是“家庭”，确切地说是“母系的”，同时又是“族群、家族、群体”，总之，指任何社群。[46] 比如，一个村落的全体村民可组成一个“埃坎达”，正如村中可组成一个母系群体，或基督社群。村落被认为是属于通过母系相连的一群人，他们是村落创始人的后代，而村落首领(nkuluntu，意为老者)则是创始人的象征。因为妇女跟随丈夫，儿子们往往不去舅舅的村子里生活，所以在古刚果这些通常很小的村落是靠地域维系在一起。村落首领管理村民，考虑各氏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氏族，或者说，他起着商议、协调的作用。村落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土地神灵由村落“基托米”(kitomi)奉为永存。从意识形态来说，这些权利均属村落奠基者的母系氏族，但实际上，整个村落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这一点从某些会社的存在不难看出，如“基姆巴”(khimba)、“恩佐隆戈”(nzo longo)或“基姆帕西”(kimpasi)，这些组织都是男孩的人会崇拜或医病崇拜，各地区有所不同。婚姻总体上确定了家族和亲属关系，亲属间交叉的婚姻关系极受欢迎，除了给妻子一些礼物外，无需其他彩礼。[47] 当地的母系氏族在村落之间是否建立联系以组成包括贵族和农民各阶层的大氏族社会，这一点仍是个谜，但我们认为没有联系，尽管有婚姻关系形成的网络，村落间实际上是完全隔绝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系氏族和村落的力量减弱了。1525年前，村民受到残酷剥削，他们可能在1568年与贾加人一起举行了反抗。加西亚二世统治时期，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

[45] J.C.卡维利尔，1979年；1984年；和1983年，第134-135页。

[46] 大部分作者往往将已知的19和20世纪的社会组织提前置于这一时期，这是没有理由的。甚至A.希尔顿也未能全部避免这一缺陷。

[47] A.希尔顿，1985年。这一大胆重构是将一系列不重要的迹象证明拼凑在一起，并根据近来的村庄组织进行类推而作出的。它仅仅是一个未与资料产生矛盾的模式。

当时，称为“基姆帕西”（kimpasi）的信徒们极为活跃，他们的目的是摆脱“姆帕西”（mpasi），即摆脱苦难、穷困、折磨、灾难，因为当时人民饱受压迫和自然灾害之苦，村民生活极不安定。贵族却不停地骚扰，他们忙于纳妾，并让其妾所生之子监视村落。农村妇女地位低下，苦难深重，已婚妇女由于失去了地方家族关系的保护，她们的地位与奴隶（即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不相上下。到17世纪时，男人的境况也日趋恶化。有些人只得去贵族家寻找庇护，成为“富库”（fuku，受庇护者），还有些则将自己的孩子（并非外甥）身上 571 打下烙印，以免被奴隶贩子掳去。[48]

双方均为贵族的家族则效仿王室，扩大其影响和势力。他们大肆蓄奴，贵族首领妻妾成群，她们来自小贵族或农村家庭。贵族首领婚前需付给主妻一笔昂贵的彩礼，这样便可确保对未来子女的拥有权。有了这笔彩礼，贵妇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均可提高，这一点与残余的母系思想不谋而合，特别是当最高贵族阶层一旦出现分裂时，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阿丰索一世创建的王室出现分裂时，曾面临三个公主的棘手问题。双方世系家族中年长的妇女被视为家族中的楷模。

实际上，父系后代，即儿子的地位逐渐提高。贸易所得的财产属于儿子，大约1550年以后，他们便不再用父名，而是用葡萄牙姓氏代表自己的家族。然而，可继承的遗产并非想象的那样多，贵族死后或被解职后，利用职权所得的财物，如贡品、罚金、礼品等，都收归国王。据信，这种做法在各领地的贵族中也颇为流行。

1666年后，贵族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在索约，在位的王室逐渐向父系氏族转化，儿子（甚至女奴生下的儿子）备受宠爱，而外甥却不受重视，19世纪整个索约，农村或其他地方，父系思想体系已经确立，另一方面，在刚果，贵族们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城镇，只能在乡村寻找栖身之地，大家族如冰雪消融，1700年前后被新形成的称为“姆维拉”（mvila，氏族）的一些母系氏族集团所取代，政府实行权利分散，并在乡下设立机构。[49]

当奴隶，即最初的战俘，在首府的田间或住宅出现后，奴隶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阶层，可贩卖奴隶与不再被贩卖的家奴之间有了鲜明的区别。附属于贵族家庭的家奴，及其他奴隶群体，如王室奴隶（做卫兵或它用）和布道站奴隶，就成为当地独立的强大团体，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世纪。可贩卖奴隶则被卖到各地，这些不幸者从未组成有凝聚力的团体。17世纪时，家奴的社会流动性大于普通村民，他们是贵族家庭中的一员，所以，572 家奴的解放是很普遍的。女奴的孩子与其贵族父亲在身份等级上平等或基本平等。在村庄里，只有小贵族的妾所生的儿子才有希望提高社会等级。这样，刚果原有的三个阶层缩减为较固定的两个，即从劳动关系中受益的贵族和受压迫的穷人，如同桑顿[50]所证实的，这两个较固定的阶层在生活方式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城市贵族有了文化，惯于炫耀自己尊崇的天主教，他们的住房、衣着、饮食、娱乐各方面与乡下农民有着天壤之别。

安哥拉的社会结构也有着与刚果同样的等级，但安哥拉的贵族没有刚果贵族那样具有

---

[48] A.希尔顿，1985年，第203页（子女）。fuku来自fuka（盖，遮）；mfuka（债）；mfuku（用处，益处）；kifuka（文雅，斯文，即受庇护者的行为举止）。

[49] 姆维拉（mvila）一词在19世纪以前未被人提及。

[50] 关于刚果王国。

凝聚力，葡萄牙人居于社会的最上层。在这里，实际上也是在整个中部非洲，因为葡萄牙黑人作为一个阶层出现而使形势变得复杂，这些黑白混血儿(mulatto)商人在文化和语言上，既是安哥拉或刚果人，又是葡萄牙人。这批人最初出现在圣多美，由葡萄牙人与刚果贵族的混血儿构成。随后，其中一部分离开圣多美，聚居在刚果首府和罗安达，1575 年以后，他们在恩东戈结成团体，但仍有一批留在罗安达。1615 年，又从罗安达迁往本格拉和内陆，靠近各要塞的主要城镇。至 1680 年时，还有两大群体，一群生活在安巴卡城堡附近，另一群创建了旧卡孔达，大约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昆巴里”(quimbares)或“奥温巴利”(ovimbali)之称，特指这一阶层，并一直沿用到后来两个世纪。16 世纪初，他们广泛分布于本格拉高原，这些人既非首领又非奴仆，而是一批经营商队和贸易的游民，他们与非洲酋长们在贸易上协调合作，常通过联姻而成为当地贵族。[51]

宗教史和思想史表面看来带有皈依天主教的特征。在刚果，天主教首先在城市贵族和各省主要城镇中盛行，1645 年，当意大利嘉布遣会传教士深入开展皈依基督教的运动时，教会组织主要存在于葡萄牙人中，这项运动在刚果一直延续到约 1700 年。相当多的人接受洗礼，基督教在此深深扎根，甚至在边远的乡村。在安哥拉，虽然征服者强制当地人信奉天主教，但除了马坦巴以外，天主教并未盛行，尽管卢安果国王 1663 年皈依了天主教，但该教在卢安果也未传播开来。[52]

573 宗教思想和行为在刚果的演变说明了基督教教义影响着这个古老王国并与之共存。A. 希尔顿有资料表明刚果人信奉天国的诸位圣灵，而并非信奉与太阳、月亮相关的神灵，这些概念与中非其他地区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古老的宗教思维方式则又出现在天主教经文中，1624 年的教义问答手册就说明了这一点。[53] 更早的例证便是恶魔(“恩卡迪·安培巴”nkadi ampemba)的概念，[54]“恩卡迪”是祖上一个危险的神灵，“安培巴”则强调祖先的概念。基督教词汇来自于 nkisi、ndoki 和 nganga 等词的范畴，恩基西(nkisi)意思是“神圣、美惠之物”。传教士反对“基托米”(kitomi)和巫术礼仪，并反对祖先崇拜的观点和驱魔治病的社团(如基姆帕西，kimpasi 或马林达，marinda)。但却能容忍“恩干加”(nganga)的医疗活动。嘉布遣会传教士以列队行进和随队祈祷等形式代替了丰产仪式，同时也可进行驱除妖魔的活动。这些古老的宗教信仰及活动在具体细节上各地区有所不同，但除了姆班扎刚果以外，地方特色在天主教中并未有反映。

16 世纪以后，可以说仅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至少在贵族中，融合了基督教和古老宗教的特色，主要在 17 世纪广为传播。这就说明了加西亚二世怎样成了天主教和基托米两种教义的卫道士，甚至被称为“巫师”，[55] 这种新的宗教便是海地伏都教的起源。

17 世纪 30 年代，刚果人第一次试图建一所自己的教堂，[56] 从那时起就有了关于各种

---

[51] J.L. 维卢特(Vellut)，1972 年，第 94-99 页；J.C. 米勒，1983 年，第 132-135 页。

[52] J.K. 桑顿，1983 年 a。

[53] F. 邦廷克和 D. 恩登比·恩沙，1978 年。

[54] E. 洛佩斯于 1583 年提到(ncariampemba)，参见 F. 德皮加费塔，1591 年和 1624 年；F. 邦廷克和 D. 恩登比·恩沙，1978 年，第 269 页；A. 威尔逊，(Wilson)，1978 年。

[55] W.G.L. 兰德尔斯，1968 年，第 110 页。

[56] J. 贾丁，1967 年。

宗教活动的记载。姆班扎刚果第一批兄弟会的出现和嘉布遣会修士的到来引起基姆帕西礼仪的复苏以及基托米在宫廷的影响。在贵族阶层，自阿丰索一世执政时起，祖先祭拜便逐渐被忽视，最终被一种葬礼所取代，这种葬礼的宗教仪式在与兄弟会有联系的教堂内举行。很可能，以往祭拜的祖先也被圣徒所取代。特别是圣佛朗西斯和圣安东尼。后来，由荷兰人引进、但受到刚果国王们竭力抵制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史书上未见记载。

1704年，唐娜·贝阿特里斯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改革并非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她号召全盘非洲化，声称自己直接接受上天的神谕，因此人们将她当做女预言家(munaki)。神圣的家族是来自姆班扎刚果的黑人家族，她使用的象征物在当地颇具召唤力，是与水、土地及当地植物等相关的物体，这些象征物与妇女用于驱魔治病活动中的一些物品相类似，也许宗教改革的观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唐娜·贝阿特里斯试图将那些歪曲启示录的白人传教士赶走，但她还是承认教皇，总之，她的宗教观点比当时流行的宗教更具有调和性。[57] 574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1700年刚果便放弃了天主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教士受殖民主义思想影响，拒不承认带有刚果地方宗教色彩的天主教的存在，如果查阅现代刚果语词典，就会发现同样的宗教词汇，其持续性是非常明显的。

艺术表现文化。在表演艺术方面，如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刚果没有留下任何遗产，[58] 却留下了视觉艺术品，还有有关主题的许多文字说明。这些艺术品的制造是为了反映阶级差别(如服饰艺术品)、[59] 政治概念(徽章、礼仪方面的物品)和宗教概念(基督教艺术、占卜用具、祖先和神灵的雕象及面具等)，这些艺术品由宫廷、天主教堂、村长、村庄崇拜的首领、甚至族长委托制作。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刚果艺术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艺术风格的连续性与充满活力的吸取多种欧洲影响的形式，同出一源，引人注目。比如，1553年前制作的一枚王室徽章(象牙角)的锐角上有十字形几何装饰图案，还有约1650至1800年间的织品，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编制物品、文身花纹、草席等。另外，19世纪雕塑的花纹特色早在16世纪初刚果人的盾形纹章上就有所体现。欧洲艺术的影响还反映在从欧洲引进的石建筑(教堂与宫殿)、权威的象征(佩剑、王冠、旗帜、法衣)，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物品(奖章、上帝的羔羊、雕像、十字架和绘画——一位西班牙画家1650年前在刚果工作过)等方面。刚果艺术的所有特色，特别是雕塑和绘画艺术，历来被认为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实际上，在雕塑和绘画方面，这些断言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事实证明恰好相反。

古代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岩石画——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我们发现，在17世纪极具风格的绘画旁，有一系列象形图案，很明显这来自某种文字，是民间文化的表达形式。字母被用做象征物并已经变形。这种象形图案后来继续使用并与

[57] A.C.贡萨维斯，1980年，L.贾丁，1961年；和卜维利尔，1953年，发表了已知的资料。
[58] T.奥本加，1981年。
[59] 例如，叙事体的浅浮雕和象形图案，在河流以北地区的礼仪剑和陶器盖上可见到。

575 几何装饰图案相结合，这当然是因引进文字而激发出的一种成就。这些绘画还使用了更加多样的具象的传统技法，正如18、19世纪所见的叙事体浅浮雕和壁画。



图片 19.11 前主教邸宅遗址，姆班扎刚果（即圣萨尔瓦多），1548年，摄于1955年

雕刻首先是由许多基督教物品所表现的，主要是十字架和手杖柄，也有圣徒的雕像，它们确实显示了欧洲比率标准的基本原理。但是，从一开始，这些艺术品就带有刚果现实主义的风格，后来，欧洲的雕刻标准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从普通雕刻中就能看出。现在已知最早的这类雕刻品可追溯到1694年。

艺术家们利用不同的材料，包括铜、象牙、木料、石头、陶瓷、纤维、织品等，在不同的物品上进行艺术创作，甚至包括炊具。最初的史书便列举了刚果酒椰纤维的长处，可用以刺绣或镶嵌在丝绒上，甚至在专门从意大利进口的牧师罩袍不足的情况下，也用酒椰纤维织品制作，这些进口货无疑给刚果艺术家们某些启示。旧的宗教中使用的祭拜物是禁止雕刻的。各个时期都有物品被毁弃，特别是在阿丰索一世、加西亚二世以及基姆帕维塔统治时期。然而，这些物品仍受欢迎，并不断更新，比如，在加西亚二世时期就需要基姆帕西。大部分基督教内容的雕刻品都是1700年以前制作的，其中许多现在仍保存完好。

576 另外还有一些受欧洲人影响但颇具创造性的艺术工艺，如铸造佩剑、制作绣有盾形纹章或象征物的旗标等。

在本章所叙述的年代里，刚果的艺术影响向北面和东面扩展，来自加蓬的所谓“白人”面具甚为流行，它实际上源于刚果北方，可能是随卢安果的扩张而传播开来。特别是17世纪，酒椰纤维丝绒的制作技艺沿奥坎果之路传到东部，然后才有“开赛丝绒”和“库巴丝绒”。看来刚果艺术品的某些特色还传到了美洲。[60]

[60] R.F.汤普森(Thompson)和J.科尼特(Cornet)，1982年，第141-210页。

18世纪：北部地区

在18世纪，整个中西部非洲重新组合，贸易网络取代国家，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由于各国一蹶不振，旧的统治阶级也随之衰落，新崛起的商人阶层取而代之或积极参与。我们已知有两大贸易网络，一个由葡萄牙人掌握从安哥拉至巴西，另一个在北部，由欧洲其他强国控制，但北部地区的内陆贸易仍牢牢掌握在非洲人手中。

受到从事三角贸易的公司的资助，北部地区，或者说卢安果海岸地区的贸易格外活跃，例如，荷兰就是以荷兰西印度公司为代表，这家公司的资金来自荷兰、北部德国及波罗的海各国。不同的国家与欧洲公司之间在洲际贸易的每一个阶段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此，竞争才是奴隶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而西印度群岛和北美奴隶需求量增加只是其次。竞争使贸易量扩大，线路拉长，奴隶出口到更远的国家，需求量从1665至1755年稳步上升，1755至1797年左右贸易量陡增并达到高峰，随后，欧洲的战争使得奴隶贸易一度停顿。[61]

最早进行贸易的港口有卢安果，随后则是马伦巴、卡宾达和三角洲的博马。1750年以后，马伦巴作为主要贸易中心取代了卢安果。接近1780年时，卡宾达又成为最繁忙的港口，但1800年以后，它又被博马所取代。欧洲商人在这些港口租赁了货栈，并通过代理商(mercadores)在此以货物交换奴隶，1700年的这些代理商后来则按当地人的称呼，叫做“马富克”(Mafouk)。[62] 代理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货币制度不统一，这就需要在交换价值上达成一致。为此，确定了货物单位“包”，以便与奴隶单位价值相对应，标准的奴隶是成年男子。货包的成份及价值双方预先商定，其构成有三大类：枪枝弹药、织品和各种杂货特别是刀剑及铜盆等金属制品。一俟货包内商品的质量达成协议，便根据标准奴隶的价值与标准货包的价值进行以奴隶换取货物的谈判，只要双方同意，也可以货易货。比如：以织品替代小珠子或镜子，以某种既定质量的织品替代另一种。欧洲人以欧洲货币所购货物的价格进行计算，经纪人则以非洲海岸和内陆的货币为基础进行计算。1700年左右仍在使用的酒椰织品货币在18世纪被进口织品构成的货币所替代。但并非内陆所有地区都使用这种新货币购买商品，比如在卢安果，小珠子是装饰品，但在马尼扬加，却是一种交换媒介，而在普尔则用它作为一种补充货币。除了货款，欧洲商人还需交付贸易税，并向国王和负责贸易的官员呈送礼品。经纪人这一方则通过贩奴获得丰厚佣金，收入则通过长途贸易商队经营者交奴隶主。 578

在18世纪，大约100万奴隶和少量的象牙、铜、蜡出口，[63] 进口货物主要有织品和武器，据统计18世纪下半叶枪枝的年进口量达50,000支，并配备相应的弹药，织品的进口

---

[61] P.D.柯廷，1969年；J.C.米勒，1983年，第146-151页；P.E.洛夫乔伊，1983年，第46-54页。

[62] R.F.D.林乔恩(Rinchon)，1964年，关于具体情况；N.厄林(Uring)，1928年，第26-28页(代理商，第28页)；R.F.D.林乔恩，1929年。

[63] 根据P.D.柯廷(1969年)和P.E.洛夫乔伊(1983年)提供的数据，在1660年与1797年间，有982,000名奴隶装运上船。



图片 19.12 卢安果的恩东戈人面具

量肯定更大。[64]

长途贸易商队由向导引路，他们与商路上各贸易中心的老板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如同伙伴），他们对过境权的谈判非常在行，像普尔这样的内地大市场的交易情况，他们亦了如指掌。商队就由这些向导、部分武装人员和搬运工组成。有时行程很远，可能需要几个

[64] P.M. 马丁，1970年，第153页。与范·奥尔斯敦的计算相比较，这一估算看起来过高，但数字是以每年约增加10万统计的（参见D. 林乔恩，196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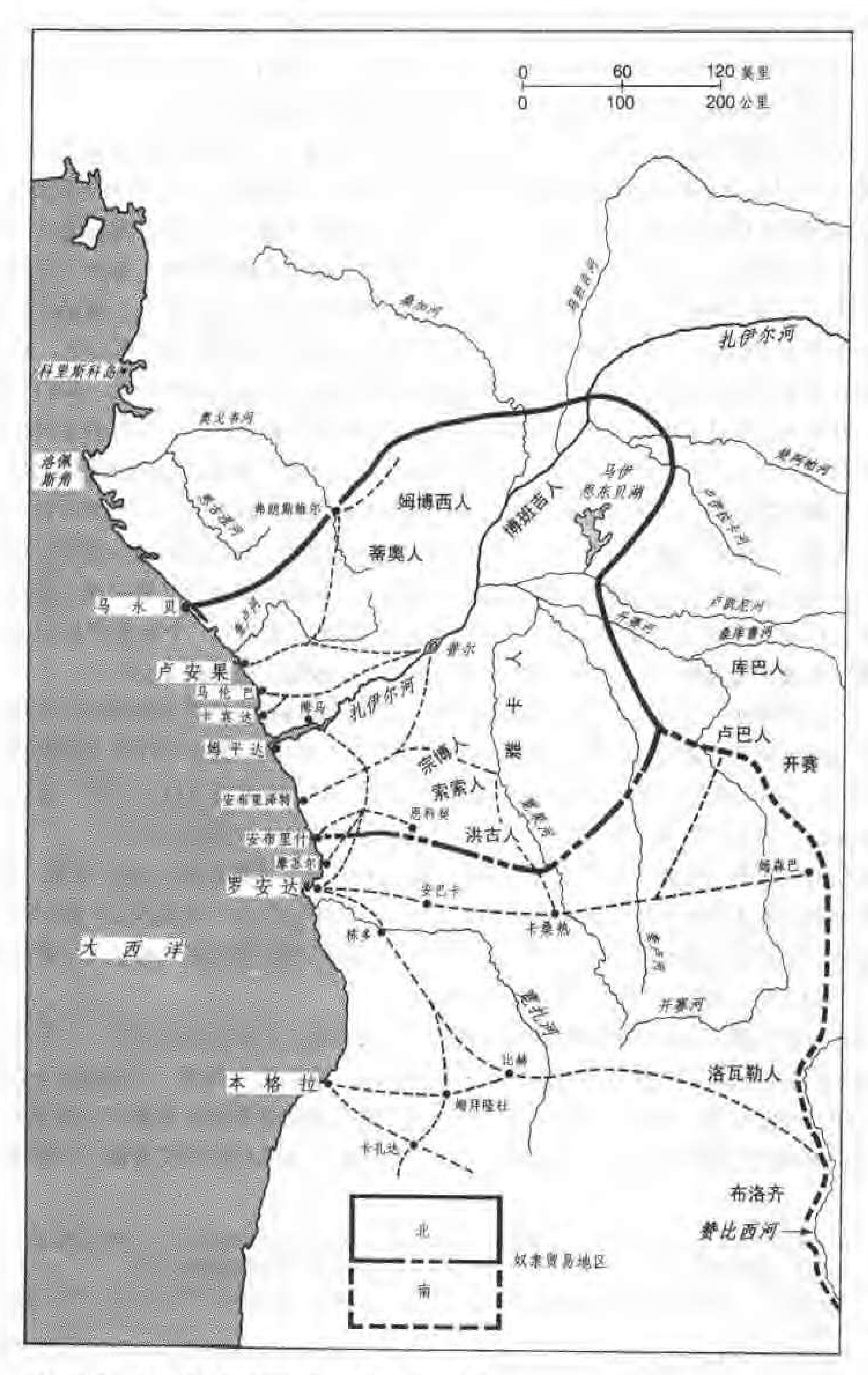


插图 19.5 18世纪中非奴隶贸易（仿照 J. 范西纳图）

月，甚至不得不在旅途中利用整个雨季种植庄稼以充做口粮。他们不仅带有欧洲商品，还有盐、咸鱼或干鱼以及本地制品，比如卢安果的珠宝。一路上，他们还能买一些当地产品，转卖到其他地方，因此，他们进行的是一种以陆路为主的沿海贸易。

主要商路连接普尔和各个港口，沿扎伊尔河及其支流，奴隶被络绎不绝地送来。专业运输业者按民族携手联合，最有名的是博班吉人，他们弃渔从商，18世纪50年代以后，他们的贸易网络从乌班吉河延伸至克瓦河。这些水路运输业者还广泛从事其他货运，因为低单价的重型货物靠水运而获利。因此，扎伊尔河及其支流也就成了陶器、鱼类、草席、食品、啤酒、红染木和其他货物的贸易活跃地区，这些货物由此处卖到彼处，激励了不同地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早在1800年以前，这个奴隶贸易区域已扩展到乌班吉河，楚阿帕河下游和马伊恩东贝湖附近地区。[65] 由于奴隶需求量增加，贸易区继续扩大，我们对卢凯尼河、开赛河下游及奎卢河贸易方面的发展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些河流地区似乎并未受奴隶贸易的多大影响，其原因不得而知。贸易线路有一条分支，即从普尔到刚果河北部，途经现在的弗朗斯维尔，最后抵达姆贝蒂人和姆博西人的国土，这条分支与奥戈韦河上游地区在奴隶贸易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他商队线路越过刚果，直抵宽果河上游的马坦巴和卡桑热。在此，维利人与当地的运输业者竞争激烈，当地的运输业者又数宗博人和索索人最有名。约1750年左右，宽果河流域新崛起的雅卡国首府成为又一个奴隶贸易中心，这里挤满了奴隶，因为雅卡人经常在宽果河以远地区挑起战事，捕获战俘。[66]

与安哥拉相比，北方的奴隶贸易获利极大，这就使安哥拉人将战场推到罗安达和卡桑热，并导致葡萄牙人武力攻打摩苏尔港口(继而攻打安布里什)，攻占了刚果中部的恩科契(1759年)，并于1783年攻占了卡宾达。葡萄牙人最终被当地武装力量支持的一支法国海军中队驱逐。简言之，在卢安果沿岸，以武力阻止此地贸易的发展是徒劳的。

我们对奴隶贸易带来的后果仅有初步的了解，对人口方面的影响还基本不知。100万奴隶可能意味着大约有200万人被迫离开了家园，[67] 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68] 他们来自广泛的地区，很可能主要是古刚果和马永贝地区，我们还不能统计出具体人数。在其他各地，贩奴的主要后果是引起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对于经济后果，我们了解得较清楚。在扎伊尔河北部，广大地区组成了一个各专业化地区组织严密的经济联合体，有的地区生产酒椰织品，有的生产烟草，其他地区各自生产蔗糖、象牙或是食品、铁器、陶器、船只等，这导致了各地区对技术的废弃，以蒂奥人为例，他们发现从毗邻地区进口物品价格更便宜，便放弃了本地区的铁矿冶炼、制船业，还

[65] R.哈姆斯，1981年；E.苏尔兹曼，1983年。奴隶贸易的迹象通过来自韦斯特林山(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生产于18世纪的大口杯而显露出来，这些口杯发现于鲁基河，马伊恩东贝湖的蒙博约河之间。

[66] 关于雅卡人，参见M.普兰夸尔特(Planquaert)，1971年；J.K.桑顿，1981年a，第5和8页；D.伯明翰，1966年，第148-152页。

[67] 将在路上和集中场所的奴隶死亡人数计算在内。J.C.米勒(1979年，第103页，注释9)提供的有关安哥拉的数据表明三分之二的奴隶死于装船以前。这些数字有所夸大，奴隶贸易在安哥拉比在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途死人更多。将出口人数翻一番肯定不夸大，但结果可能仍然少于实际人数。

[68] 参见H.S.克莱因(Klein)，1972年，第914页。这一点可适用于整个奴隶贸易，对19世纪安哥拉和荷兰人的奴隶贸易也适用，儿童的数字(第903-905页)在该地区为百分之五。

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纺织和制陶。联合体经济能稳步增长，主要在于水路运输的发展。

社会及政治影响则意义深远。经营奴隶贸易的经纪人和贵族在卢安果、恩戈约和卡刚果的宫廷里逐渐受到重视，财富所得使其拥有大批扈从，在地位上逐渐取代了与王室相关的贵族，王室权威也随之下降。在卢安果，王室议事会中新崛起的贵族替代了地方官僚贵族，国王只能将贵族官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传统的继承制土崩瓦解，[69] 由地方议员选出了国王并支持存在已久的摄政议事会，因此，在1750年或更早些时候，王室家系已无合法继承人。六大派别争夺王位，但王室基托米最终确立了一位中立国王，只是其权力被极大地削弱。不久，新的王室家系又遭分裂，王权更加衰弱，以致1787年后近200年内，这个国家竟没有任命国王。更糟的是，一些偏远省份，如马荣巴，从1750年起便分离出去。

蒂奥王国也举步维艰。为谋私利而从事贸易的地方大官僚已经暴富，他们鼓吹新的思想观念以使本地区的分离合法化。这种影响力是精神上的，它以一种护符"恩科比"(nkoby)为核心，无需世俗神灵的帮助。大约从1780年起，蒂奥王国就一直为内战所困扰，直至1830年左右才恢复正常，恩科比的观念使一大批新头领地位合法化，从马夸地区，通过特克(库库亚)高原西部，一直延伸到靠近卢安果至普尔通道上的察伊地区，这些新头领控制了以上地区，或将其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中部扎伊尔盆地，奴隶贸易的扩展再次导致小规模的人口迁徙，并激起马伊恩东贝地区和北部以远地区的仇视，在迁徙人口经过的河岸处开始形成一些大的人口中心，并在 582 19世纪成为商业城镇。[70] 在卢安果及普尔之间，特别是在明杜利这个铜矿地区，迁徙来的刚果贵族取代了特克族村民。然而，除了一些小领地，众多独立的村庄沿卢安果-普尔这个轴心迅速出现。这些村庄通过由各村法官组成的市场法庭来协调关系，维护共同市场，"伦巴"(lemba)会社巩固了村庄间的联盟。

在刚果本土，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利用统治者所属的基督神品观念，仍然是维持统治思想的基础，其核心是国王，现在是至高无上的恩基西，以前的布道站由前布道站奴隶管理。各区域不断分裂(刚果综合症)，[71] 有时甚至下至村级。在姆班扎刚果东部，宗博运输业者也采用市场法官制度，或是在几个村庄构成的小领地内，由主要家族轮流执政。同时，大的氏族集团(mvila)出现，以逐渐在此定居的家族为基础，氏族网络成了维系各独立村寨的纽带，形成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环境。

随着这些变革而出现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变革。与氏族集团相关的伟大先祖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墓和教堂越建越大，特别是在姆班扎刚果。附体奴(zombi)[72]的概念开始出现，正如将伟大先祖与圣徒混为一谈。在1700年以前，[73] 显赫人物的葬礼还相当俭朴，但以后，则变得极为奢华。裹尸布已被专用的尸束所替代，这种尸束极大，以致去公墓的路需预先勘测，还要动用马车，将尸体运到墓地，至少在沿海地区是这样。在19世纪，尸束又变

---

[69] P.M.马丁，1970年，F.哈根布切尔·萨克利潘蒂(Hagenbucher Sacripanti)，尽管有些混乱，但提供并确证了一些细节。

[70] J.范西纳，1983年b，第112-113页。

[71] S.布罗德海德(Broadhead)，1971年，1979年与1983年。

[72] N.厄林在1701年已经提到，1928年，第47页。

[73] N.厄林，1928年，第35-36页。

成大木偶状，或是神龛式样。18世纪时尸束上的木质头像或半身像则变成了木质或石质的雕像或陶制纪念像，以示对亡者的敬慕，并在坟上摆放越来越多打碎的进口物品。[74] 博马和马永贝地区是殡葬发展的中心，而扎伊尔河南岸，则以安布里什[75] 的墓葬石碑、石柱最多。

驱魔治病的集体崇拜极为盛行，"伦巴"原是卢安果地区恩基西中的一个，这时在性584 质上有所改变，成了一个保护性的组织，以保护那些能交付昂贵会费的显赫人物。这种人一旦染疾，伦巴的巫师就会来给他治病，若想治愈，患者和他的主妻必须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推崇上层家族间的联盟(联姻，加入伦巴基层组织)；承认入会法官以及各家族首领的合法地位，并间接承认市场法庭的合法性。1700年以后，各种不同形式的伦巴组



图片 19.13 树皮制成的伦巴药箱(nkobi)，盖子上有极具特色的花瓣图案，来自恩戈约。高24公分

[74] R.F. 汤普森和 J. 科尼特，1982年。

[75] 安哥拉博物馆，罗安达，1955年，第137-146号(安布里泽特)，第86-87页。

织相继成立，包括海地的一个，那里的伦巴彼德罗是海地第四个伏都教组织。[76]

基督教在此立足并进一步发展。因本地和外来的牧师奇缺，这便给某些人以捷足先登的机会，如传教士早先的助手，他们的奴隶，以及宫廷中国王的随从。安布里什的浮雕表现出耶稣十字架受难的场景，只是受难时的长矛变成了巨蛇，还有鼓手相伴，这不禁使人想起与奴隶贸易及财富相关的姆本巴或邦巴。宗教内容的雕塑仍保存完好，这些雕塑很可能是索约和姆班扎刚果地区的作品。还有保存完好的象征权威的十字架，这主要是指司法上的权威，是救世主(nkangi)的象征。还有其他的十字形物品，如“桑图”（santu)，或是某些与打猎占卜相关的小饰物，这些饰物也可用来探明一系列厄运的起因。这些便是同一种官方宗教的两个方面。

18世纪的安哥拉

如前所述，北方的奴隶贸易尚未形成时，安哥拉的奴隶贸易就已颇具规模，但与北方相比，以巴西为目的地的安哥拉奴隶贸易体系则是显得支离破碎。[77] 1730年以前，它由以下部分组成：葡萄牙出口商，巴西的经纪人，托运人，罗安达或本格拉的奴隶贩子，葡萄牙黑人组成的商队，以及向市场提供奴隶的非洲王公贵族和商人。单个的公司可拥有其中的几个部分，但几乎没有哪家公司拥有全套人马，即使巴西和葡萄牙的公司也不例外。商人们都试图避开风险，以牟取最大的利润，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奴隶风险，意即奴隶由于营养不良，伤病未能得到及时医治以及受虐待而死亡。总之，死因是未能花费必需的资金提供必需的食品、医疗及合格的看管。从一开始，每一部分都试图将照看以及持有奴隶的责任推卸给处于劣势的部分。葡萄牙和巴西的公司在贸易中处于优势，而托运人，罗安达和本格拉的奴隶贩子以及商队经营者则处于劣势，因此，后者试图降低贩奴费用的成本，**586** 结果导致死亡率增长，J.C.米勒引用[78] 一个估计即被贩的奴隶中一半死于从贩奴市场到上船的码头之间，另外在罗安达等船时也有40%死亡。这些数字有所夸大，其作者是一家庞帕尔公司的雇员，该公司18世纪70年代正与这个体制竞争，但总数目却是可信的。奴隶健康状况及船只的拥挤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海上的死亡人数也有所不同，约占登船总数的10%至15%。[79]

货包——安哥拉人称为“汉佐”（hanzo)，先以赊账的形式提供给商队经营者，这样便将他们与不直接参与经营的隐名合伙人连在一起，隐名合伙人根据自己的货物估算出可兑换的奴隶数。货包内的货物主要有果阿或欧洲的织品、巴西的白兰地、当地的盐、珠子，有时也有一些武器。商队的费用较高(特别是食品和由地方官员在内地招募搬运工的费用)，他们的风险更大(在非洲市场上等候，特别是奴隶逃跑或死亡的风险)，因此很快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完全依靠债权人。大约从1760年起，商队经营者开始将奴隶卖给罗安

[76] J.M.詹曾(Janzen)，1982年。

[77] 特别参见H.S.克莱因，197年；J.C.米勒，1975年b，1979年和1984年。

[78] J.C.米勒，1979年，第103页，注释[90]。

[79] P.E.洛夫乔伊，1983年，第47页(损失为10%至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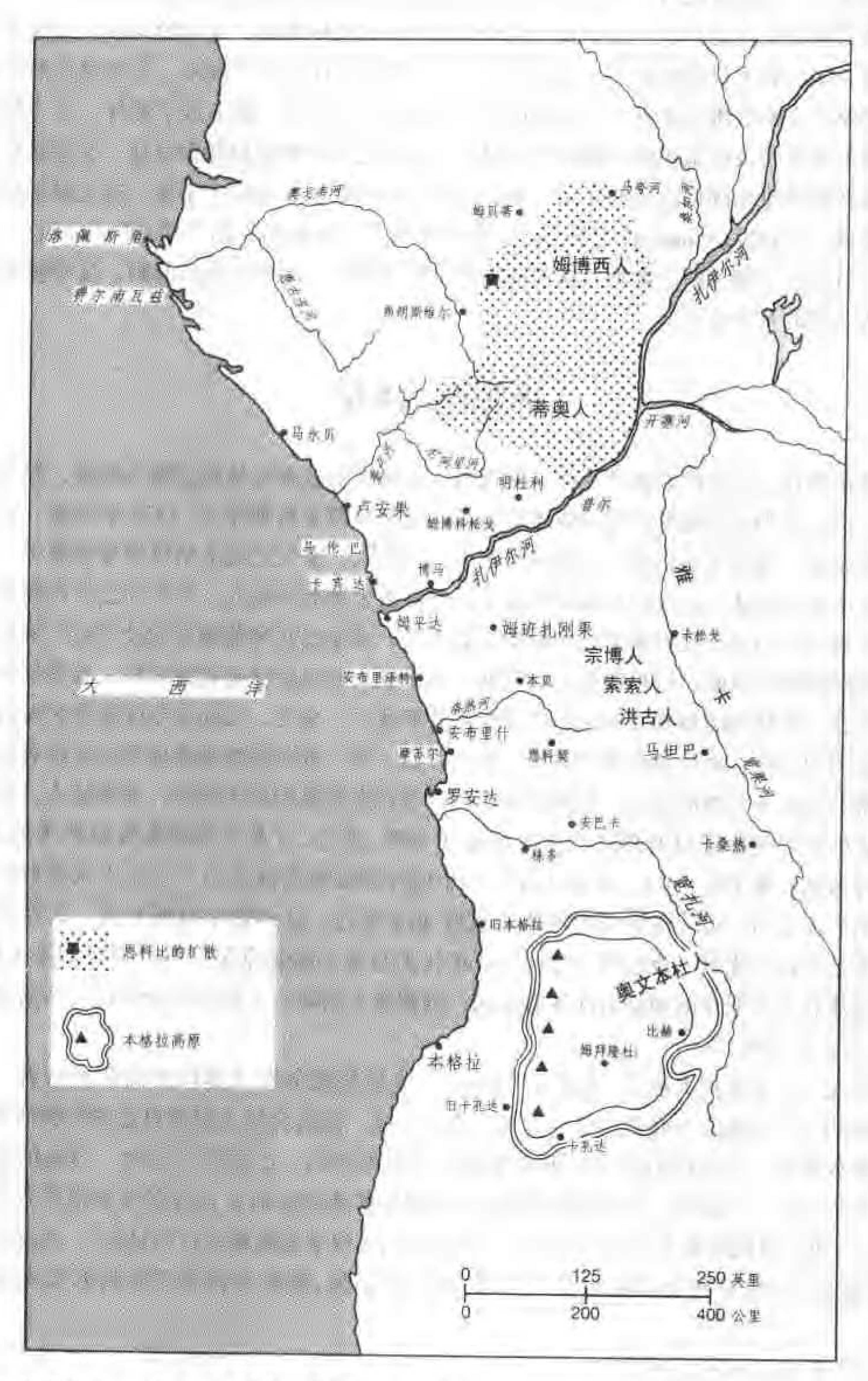


插图 19.6 18 世纪的中西部非洲(仿照 J. 范西纳图)

达或本格拉的商人，试图靠已经到手的货物摆脱所欠债务，这样，隐名合伙人最终被撇在一旁。[80]

1730年后，宗主国葡萄牙的公司又回到罗安达推销物品，巴西人则退守至本格拉。市场竞争致使货物潮水般涌人，这又刺激了奴隶贸易。随船而来的还有贫穷的移民、罪犯和试图靠贩奴特别是经营商队发财的冒险家。葡萄牙黑人与这些新来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竞争。新来乍到的商人受到罗安达高层统治者的全力支持，而葡萄牙黑人则有外省权威人士，还有内陆市场上非洲酋长为之撑腰，他们靠走私将奴隶运去与法、英、荷兰人做生意，以打击新来的商人。他们还向新来的商队经营人提供搬运工、食物、船只和其他物品，但要价极高，直到他们愿意与之共命运，通常是在将隐名合伙人抛弃之后。巴西人与葡萄牙黑人在本格拉不但成功地稳固了地位，而且奴隶出口量上升，至约1690年止。他们的出口量与本格拉的出口量持平。由于有足够的资金和较先进的管理手段，葡萄牙人经营的公司成功地转移了奴隶风险，他们购买的不是奴隶，而是象牙或在巴西付款的票据。[81]

在该世纪末，各地方行政官首先支持巴西人，随后，特别是葡萄牙在马奎斯·德庞帕尔实行改革后，他们又转而对里斯本的大公司表示好感。巴西人的同盟——耶稣会，于1660年被驱逐。弗朗西斯科·英诺森西奥·德索萨·考廷诺(1664-1672年)，[82] 竭尽全力使本国重新取得对安哥拉的控制权，德索萨想要重新获得对内陆各行政职位的控制权，并试图制定内陆市场奴隶贸易法规，使安哥拉经济多样化，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未能如愿。葡萄牙黑人再一次往外移民，主要迁移到本格拉高原。这个地区自1772年起战争频仍，从而加速了姆拜隆杜和比赫两大王国的诞生，特别是后者，成了葡萄牙黑人的避难所，一个新的通往内地的贸易桥头堡在此建立。1794年前，商队已经到达洛齐国的赞比西河上游，他们避开罗安达，将奴隶带至本格拉。罗安达则继续通过卡桑杰王国吸引奴隶贸易。因班加拉人的商队来到东北面，即1755年以前卢巴人居住的开赛中心，他们的主要商路是从卡桑热到隆达帝国的首府姆拉巴。

587

隆达帝国形成于18世纪，连年战乱产生了大量的奴隶，同时作为进贡物品，奴隶从各附属地区流人首都。1750年后，帝国在卢亚普拉河地区建立了卡曾贝王国并与莫桑比克的太特和宗博建立了联系。在这以前，向西部的扩张已推进到宽果河，1740至1760年间，一位头领在此建立了雅卡王国，扩张使数以万计的人在1761至1765年间从洪古逃到宽果。[83] 强大的雅卡王国强占了卡桑杰的宽果河流域下游的大片地区，并向东部地区的奎卢方向扩张。大批的战俘被带回，然后被卖给宗博人、索索人和维利人，同时也卖给因班

[80] E. 达·西尔瓦·科雷亚，1937年；J.C. 米勒，1979年，第90-91页。

[81] J.C. 米勒，1983年，第146-151页。

[82] R. 德尔加多(Delgado)，1948-1955年。

[83] 根据D. 伯明翰(1966年)、P.D. 柯廷(1969年)、H.S. 克莱因(1972年)、P.E. 洛夫乔伊(1983年)提供的数字，1,032,000人成为奴隶。另见J.C. 米勒，1975年b和1979年，在这种情况下，200万肯定估计过低。实际数字可能更接近300万。关于人口统计，见J.K. 桑顿，1980年；1977年a，1977年b和1981年b；他承认(1981年b,第713页)存在人口损失，但他的模式低估了妇女数字(根据他的说法，占四分之一而非三分之一)和儿童数字(根据他的统计，没有儿童装运上船)。这些数字对人口的估算至关重要。

加拉人和路过恩科杰的商队。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征服和掠夺使大量人口逃离雅卡，从宽果河迁移至奎卢河。

在安哥拉，奴隶贸易已占支配地位，尽管德索萨·考廷诺和其他人付出努力，安哥拉却未能发展多种经济，因为它缺乏奴隶贸易以外的资金，这个殖民地经济上一直依靠巴西，1800年前后，88%的总收入来自与巴西合作的奴隶贸易，稍低于5%的总收入则来自于出口到葡萄牙的象牙。

（李金桥 译）



卢巴与隆达的政治制度：形成与发展

恩达维尔·è. 恩泽姆

卢巴的历史，是今扎伊尔共和国沙巴区最早产生、而后扩展到几乎从宽果河至赞比西河 588 南部大片草原的一种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①] 在这一地区，所经历的社会虽有其独特的演变过程，但相互盘根错节，似乎是在同一基本动力推动下形成的。这种模式显然说明，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各民族早就具有联合统一的能力。

卢巴国与隆达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其名称便可看出，这两个名称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民族的差异，不如说是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不同民族的两种政治、文化制度。卢巴的历史既对今日沙巴区的卢巴-尚卡迪人与开赛区的卢巴人(卢巴-卢比兰吉人)有影响，也与松吉耶人、卡尼奥克人、克特人、萨拉姆帕苏人、宾吉人以及卢卢亚人的历史有关。隆达的历史则涉及隆德人族群(狭义的隆达人)，也涉及洛齐人、恩登布人、卢埃纳人、因班加拉人以及其他群体(广义的隆达人)。[②]卢巴语与隆达语的语言划分正说明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格思里将两种语言都归入他确定的 L 地区，但隆达语列入第 50 组，卢巴语则列入第 30 组。这雄辩地说明了两种语言的异同。[③] 589

现普遍认为，在桑加等地对乌彭巴洼地的考古发现带有卢巴祖先的特征。[④] 最晚至 13 世纪，发现了后来在卢巴人中常见的象征统治的标志，以及在卡托塔与桑加形成两个酋邦的物证。然而，卡托塔与桑加均非卢巴王国的直接前身。可信的口头流传的年代不可能早于 1700 年很多。我们只知道，卢巴王国的主体是在许多王国中形成、并在隆达帝国的前身隆德国尚未建立以前扩张而建立起来的。隆德国何时形成，虽然无法根据口头传说断

① 这一政治制度影响了扎伊尔、安哥拉、赞比亚三个中非国家。

② 有全面论述这些民族的文献。包括早期人种学著作：H.A. 迪亚士·德卡尔瓦洛(Dias de Canvalho)，1890 年；C. 范·奥维尔伯格(Van Overbergh)，1908 年；R. 科勒(Colle)，1913 年；E. 维尔霍彭(Verhulpen)，1936 年；L. 范·登·拜旺(Van den Byvang)，1937 年；P. 登诺夫(Denolf)，1954 年；E. 多尔若·德马乔维勒特(Dorjo de Marchovelette)，1950-1951 年；I. 杜斯特斯(Duysters)，1958 年；W.F. 伯顿(Burton)，1956 年。新作大多系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无论是根据本巴人的资料(A.D. 罗伯兹，Robents，1973 年)或卢巴人的资料(T.Q. 里费，Reefe，1977 年；J.C. 约德尔，Yoder，1977 年)，还是隆达人的资料(J.C. 米勒，Miller，1972 年 b；J.I. 维卢特，Vellut，1972 年；W.F. 普鲁特，Pruitt，1974 年；R.E. 谢希特，Schechter，1976 年；J.J. 胡佛，Hoover，1979 年)来考察该地区历史，对视这些文化为一个整体的人又提出了疑问。(S.A. 卢卡斯，Lucas，1968 年；L.D. 赫谢，Heusch，1972 年；B. 克林恩-马瓦尔，Crine-Mavar，1973 年；S.K. 恩杜阿，Ndua，1978 年；R.J. 帕普斯坦，Papstein，1978 年。)

③ M. 格思里(Guthrie)，1948 年，第 54 页，特尔乌伦的语言学家认为，这两个语言不同的群体，晚近尚毗邻而居(A. 库佩斯，Coupez，E. 埃乌拉尔德，Evrand 与 J. 范西纳，Vansina，1976 年)。

④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22 章；J. 范西纳，1984 年 a，第 564-570 页。

定，[⑤] 但至少到1680年，在传说中已提到该国家。这个国家究竟在此之前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并不知道。

卢巴国与隆达国的出现

沙巴与赞比亚、安哥拉接壤的地区为丛林所覆盖，这里土壤贫瘠，干旱季节很长。大部分沃土位于河谷地带，土质从北至南、由东向西变化，而以安哥拉东部尤甚。越往北，干旱险情越小。但在南部半荒芜地区有铜、铁、盐等矿产宝藏，全部位于东南地带。

因此，小块肥沃土地上的居民，无论其是否邻近主要矿物产地，因周围是大片几乎渺无人烟的广袤地区，他们主要从事狩猎，这也不足为奇。在早期地方机构所在地，人口的分布也反映了这种状况：这些机构由若干小酋邦组成，每个酋邦管辖一个居民点。因此，桑加对若干居民点的管辖就成为后来的基刚贾酋邦，而位于上游、即在卢阿拉巴湖区另一端的卡托塔则成为另一个酋邦。在这两个地区，人们以渔业、农业为生。另外，还有许多酋邦，均位于主要河谷地区，其居民大都务农：他们是卡隆德韦人、卡尼奥克人、卡宁青人、恩森加人、姆平明人、早期的隆德人以及赫姆巴人的许多酋邦。

在这些居民群体中，没有离群索居者。他们通过贸易，也可能通过联姻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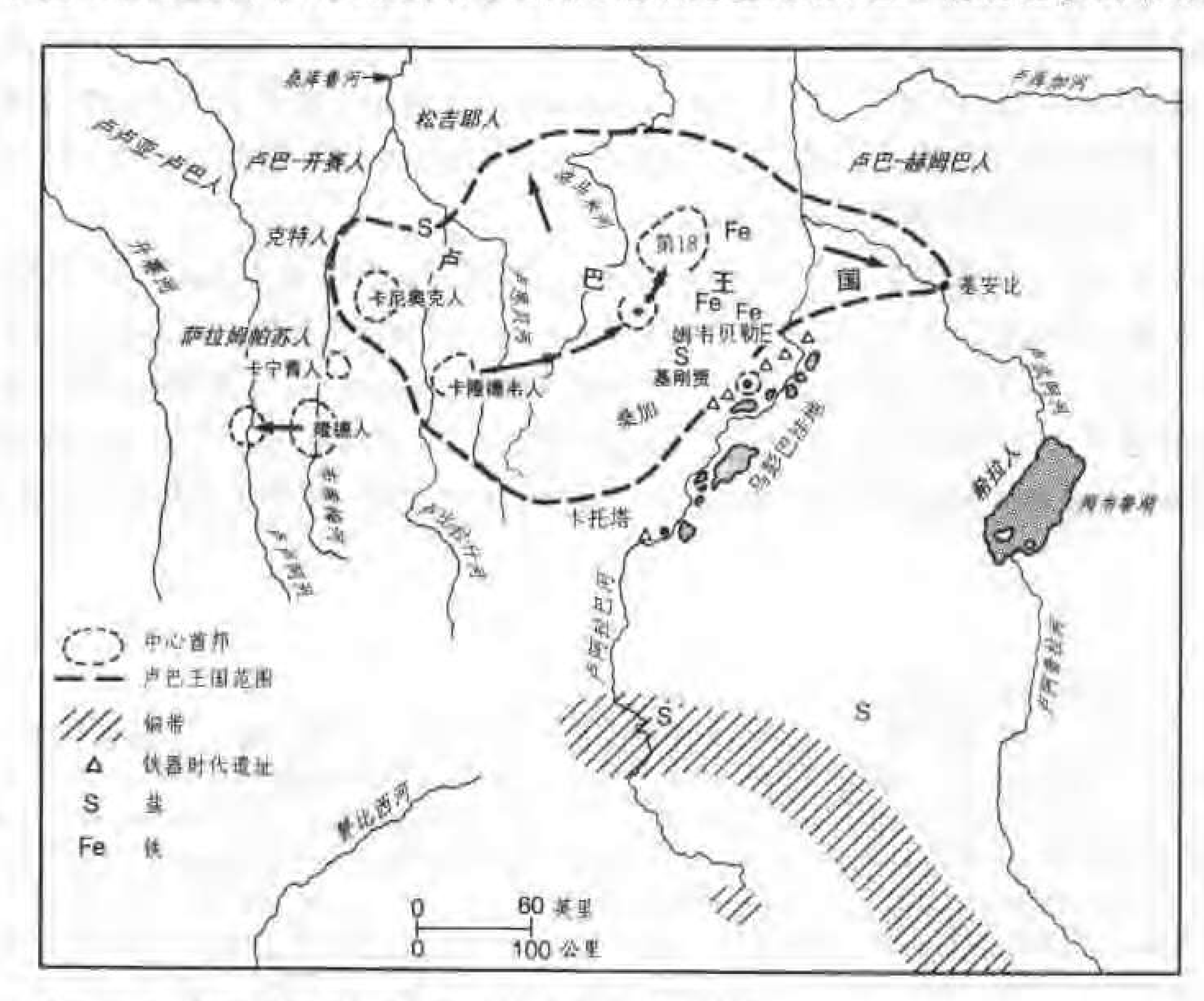


插图 20.1 1700年以前沙巴地区诸国(仿照 J. 范西纳图)

⑤ 此类尝试均认为金古里人是从隆德人国都迁徙至安哥拉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后来对最早始于约1700年的传说的详尽阐述；参考 J.K. 桑顿，1981年a。



图片20.1 扎伊尔的赫姆巴人：整木女像柱座，底部已磨损。请注意其明显的划痕及手镯的质地。高35公分

这里北面有酒椰纤维织品和棕榈油，卢阿拉巴河产鱼，南面有铜和盐，中南地区有红染木(mbafu)油。无法证实，早期东西之间是否也有扩大的贸易往来，除铜之外，其他产品是否 590 通常沿南北轴线流通，最北面达到赤道附近森林边缘地带，南面直达赞比亚中部，至少从1000年起，贸易对货币的产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300年左右，在乌彭巴洼地地区，铜十字成了当时通用的货币。到1500年，这些铜币的重量实现标准化，1600年，铜币形状变小，既便于小额购买，也利于大宗交易。但形状变小也可能说明货币贬值。1700年

以后，铜十字货币消失，到19世纪，一种进口珠子成为新的货币。⑥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成为全卢巴王国主导思想的政治思想发展起来。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bulopwe)，即王权神圣性以及通过秘密社团实行统治。在王国北部边陲，在松吉耶人地区以及东部某些地区，主要通过社团进行统治，而在王国心脏地带，则在两原则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但王权神圣性明显占居上风。

据传说，卢巴王国的前身是由三个氏族在卢恩贝河与卢比拉什河之间联合建立的卡隆德韦小王国。⑦ 国都建在西芬达。其中有一位君主名刚果洛(虹)，他迁徙到离博亚湖不远的平原上。在未来卢巴国中心地带的姆韦贝勒建立了都城。然而，关于刚果洛，别处还有其他各种说法。例如，关于建国的史诗般的记载，生动而细致地叙述了刚果洛是怎样被卡拉拉·伊隆加击败身亡的。猎人伊隆加是东面的外来者，他将自己的都城迁移至蒙扎，该地距离盛产铁矿的地区较近，与浅盐湖相去不远。作为蒙扎的主人，(Mwine Munza)，卡拉拉代表创业者的形象，表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卢巴王。

592

刚果洛不一定真有其人，但有关以前建都的传说，至少是可以相信的。与几乎所有其他酋邦不同的是，卢巴王国的中心不在河谷地带，而是在乌彭巴洼地以北大平原的中心地带。它也许一开始便控制了西面的卡隆德韦人，南面的基刚贾人以及南北主要贸易通道。尽管如此，直到18世纪前夕，它仍是一个很小的王国。

与此同时，再往西，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政治实体。其中最重要的实体恩卡兰尼位于姆布吉马伊河流域，是由图邦(tubung 地主)领导的几个小区联合建立起来的。它们的北方近邻克特人有着与其类似的机构，而在西北方，在语言和物质文化方面与之关系最密切的萨拉姆帕苏人，其组织机构则大不相同。他们按年龄分成不同的组织，并让有势力的人独掌大权，反对政治上继承现有职位，从而也反对贵族政治。

事实上，隆德人的土地并非注定要连成一个帝国。稍北土壤较肥沃的地区，人口更加稠密。他们经营的农业先进得多，他们处在南来北往的贸易通道上，地理位置较好。然而，有一个时期，北方的图邦曾一度统一在隆德人统管的土地上，尽管他们以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为中心只建立了一个酋邦。关于北方图邦的传说，最早是这样说的：有一个酋长名叫恩孔德，他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女儿卢韦吉，也叫卢埃吉，但当她嫁给卢巴宫廷的西宾达·伊隆加(猎人伊隆加)后，为了取宠于丈夫，便放弃了王位。这个猎人的故事，显然也是该地区到处可以听到的老生常谈。⑧ 故事中提到，西宾达·伊隆加按照卢巴人的模式组建了自己的宫廷。但即使如此，传说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学者们发现，从另一方面，隆德人对卢巴人也产生了许多影响。⑨

593

还必须提到这些传说的另外一种情况。根据卡尔瓦洛介绍，在进行武力征服以后，权

⑥ P. 德马雷(de Maret)，1981年，第139-143页。

⑦ 关于传说的评论见 T.Q. 里费，1977年与1981年；关于历史传说的注释，见 H. 沃默斯利(Womersley)，1984年。

⑧ H.A. 迪亚士·德卡尔瓦洛，1890年；P. 波格(Pogge)，1880年，恩孔德对儿子们的诅咒令人想起了挪亚在大树底下的一段故事，这也许是后人虚构的。

⑨ T.Q. 里费，1981年，第75-78页。

力移交给卢韦吉的长子雅沃，即姆万特·雅沃(雅沃王)，只有他的名字后来才成为标志这个新宫廷贵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称号。他去世时，据认为权力已旁落于他的兄弟纳韦吉之手，他的兄弟后来成为这个帝国的真正组织者。然而，据最新资料表明，卢韦吉不能生育。为了后继有人，她给丈夫另外找了一个妻子，名叫卡蒙加，她的儿子是第一继承人。这一情况表明，在姆万特·雅沃的宫廷中，从制度上确立了两个女性担任的高位："斯万·姆隆德"(Swan Murund)或称"斯瓦纳·姆伦达"(Swana Mulunda)，是这个社会母亲的象征，代表卢韦吉所起的永久性作用，她虽然不能生育，但她建立了帝国；而"卢孔凯西"(Rukonkesh)或"鲁孔凯西亚"(Lukonkeshia)则是太后，起着卡蒙加以及所有与卡蒙加处境相同者所起的作用。

更流行的说法是，惯用右手的那位母亲(斯万·姆隆德)，必须与惯用左手的母亲(卢孔凯西)加以区别。因为继承人是后者所生。

这一证据说明，这些不同的机构是在这位卢巴猎人出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这两位贵妇人，一位象征社会的繁殖力，一位则象征生物的繁殖力。其次，王室称号是以酋长称号姆万特为本，再加上第一代君主的名字确定的。

卢巴：1800年以前的内部机构及其发展

有了姆韦纳·蒙扎(蒙扎的主人)，由于受到东面卢阿拉巴河对岸的影响，在平原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兼并了平原以南位于乌彭巴洼地的基刚贾王国以及西面的卡隆德韦王国。在当时或稍后，它进一步向西南扩张，控制了卢武阿河下游地区。

该王国的建立与初步的巩固，引起本地区的骚乱，许多移民离开卢武阿河下游，在姆韦鲁湖西岸，沿卢阿普拉河下游建立了希拉国。[10] 这种说法可能仅指约1750年以前希拉人的统治集团，而非指大多数居民。这些统治者甚至不是从卢巴王国来的，很可能是将此赐予他们作为有名的原籍地，而他们实际上来自卢武阿河下游的基安比。西北面的卡尼奥克人也被在那里组织(或建立)王国的卢巴移民所征服，但到19世纪初，他们已不再归顺卢巴。[11]

据报道，向北迁徙的意义最为重大。随着王国建立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后来王位继承引起的战争与饥荒，卢巴-开赛人诸集团离开沙巴，沿卢比拉什河向北呈扇形进入水源较充足的地区。[12] 据开赛人的亲属群体许多传说认为，迁徙主要是因为饥荒，饥荒不仅使他们离开沙巴，也使他们离开开赛卢比拉什向西迁徙到卢卢阿河。他们指明了人口转移的真正动力。但是，卢巴-开赛人经过一两次迁徙浪潮是不可能全部离开沙巴的。也许每当饥荒袭来，一些南方人便向北方迁徙，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13] 在该地区，人们讲西卢巴语以及近似的语言和方言，这与在沙巴所操基卢巴语全然不同。因此，若干 594

⑩ 姆萨巴奇马(Musambachime)，1976年，第15-32页。

⑪ J.C. 约德尔；1977年；1980年，第88、90页。

⑫ P. 登诺夫，1954年；马比卡·卡兰达(Mabika Kalanda)，1959年，第83页；卡邦戈·姆肯迪(Kabongo Mukendi)，1973年，第48、50页；I.M. 姆波伊(Mpoyi)，1966年，第34-36页。

⑬ 约1750年，卢巴开始与库巴交往，1800年后即迁入(贝纳-库法人)。

世纪以来，开赛中部地区肯定居住着操这种语言的人，正如占据卢比拉什河与卢阿拉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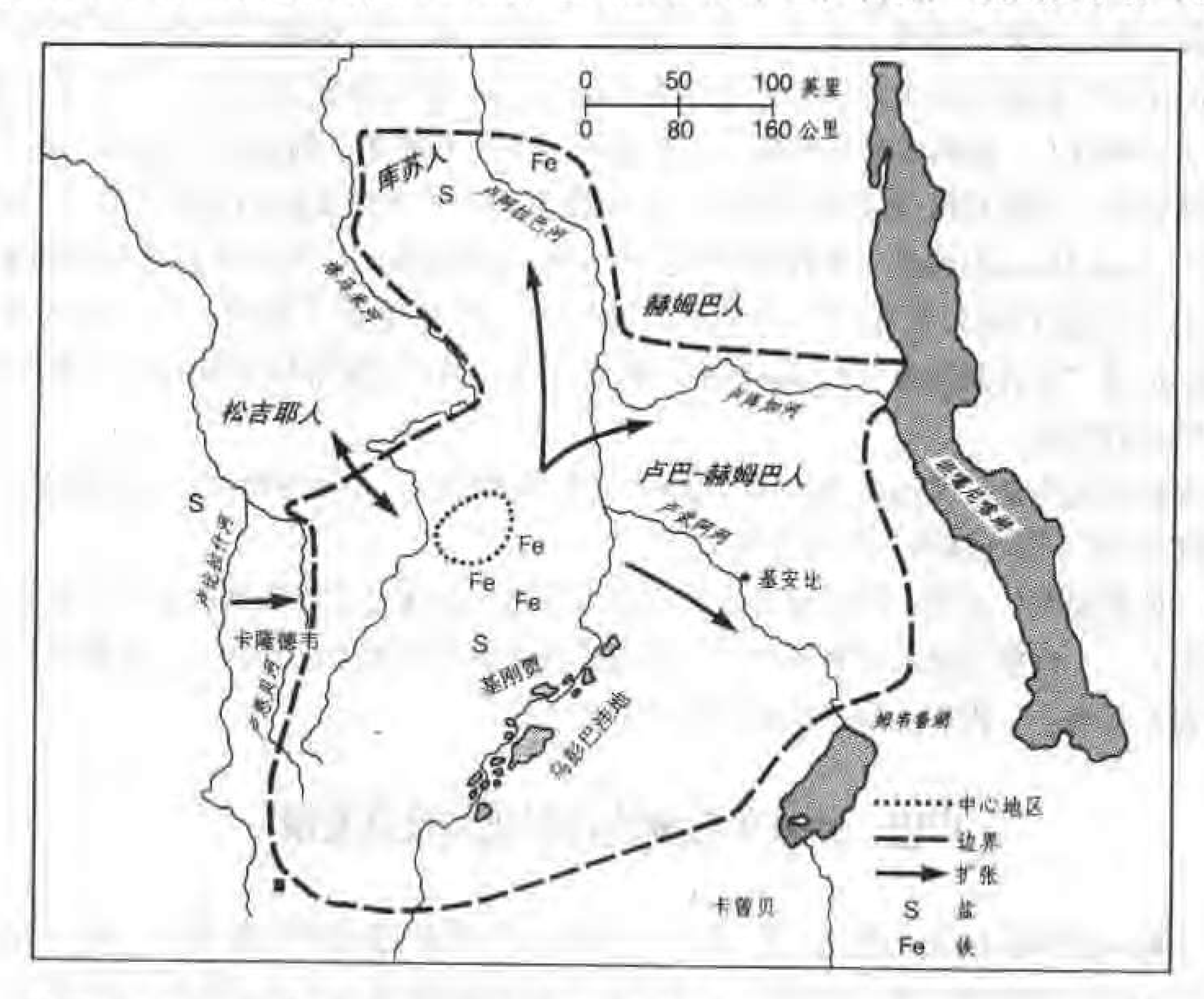


插图 20.2 18、19 世纪的卢巴王国(仿照 J. 范西纳图)

以北地区松吉耶人的语言一样，在卢巴语族中已经形成另一分支。

虽然在南方希拉人和卡尼奥克人地区建立了一种沙巴式卢巴政治制度的变体，但在开595 赛，情况却不同。这里的政治机构或按村及村管土地范围设置，或将较高的官职卖与出价最高者，终身任职或有一定期限，这种制度也在某些松吉耶人中推行。卢巴-开赛人还采用卡尼奥克人的某些标志，并在政治上效仿他们的某些做法。然而，对大多数松吉耶人的统治方式则不同。到 19 世纪 80 年代，松吉耶人生活在大的农业居民点或城镇中，由布基西社团进行管理，取得社团成员资格需交纳高额费用，并接受若干头领以及有爵位的显贵领导，若干世纪以前，大概也是这样。[14] 这一点，与卢巴王国的模式也有区别。

据认为，卢巴国的机构类似金字塔层层叠起。在村一级，户与户之间靠父系维系。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系之间的关系，各区都有一个拥有称号的酋长，他属于某一家族，其权威来自他与当地神灵(vidye)的关系。在村级以上，王国由国都(在有关的各种表达语中被视为最高层)控制，国都的布局结构反映出既有王室住地又有男女封官住宅，并按军用与民用分开。在国都的中心，设有“姆罗普韦”(bulopwe，王室办公处)。对这种布局稍加留意便可发现还设有秘密社团(Bambudye)以辅佐君主进行统治。君主不得属于某个家族或氏族，尽管王位通常是由父亲传给兄弟、再传给儿子的。但卢巴人认为，这是不同

[14] N. 费尔利(Fairley)，1978 年，第 118-160 页。

家族、即母系君主家族在王位上的轮换。因此，君主可超脱于政治冲突之外，然而，由于亲属关系，却与各区许多首领保持联系。他处在金字塔式亲戚关系的顶峰。这就是姆罗普



图片 20.2 扎伊尔中部的库巴：宗教仪式上饮棕榈酒用的人头形酒杯。颈部与把手镶有玛瑙贝，嘴、太阳穴与后脑部分嵌有黄铜。高 18 公分



图片 20.3 扎伊尔南部的卢巴：礼仪手杖柄头，人头状，梳高发式，上有两个相互抱腰的人像。全长 164 公分

韦这个称谓的意义所在，它象征不可分割的、别人无法分享的权力。[15] 举行授权仪式（例如授王权）和授予象征物强调统治者具有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权威，也强调其地位仅仅是任职者，因为他不过是历代君主中的一员。以前的历代君王，现在都是有强大威力的立有神龛的祖先，可通过附属于神龛的妇女作为媒介发表意见。

姆罗普韦周围由家族围绕并有若干有爵位的官员。首先是他的妻室，这些女眷们是使

[15] J. 范·艾维尔米特（Van Avermaet）与 B. 姆布雅（Mbuya），1954 年；S.K. 恩杜阿（Ndua），1978 年；第 337 页；T.Q. 里费，1975 年，第 11 页。



图片 20.4 扎伊尔的卢巴：礼仪上用的武器，把手包铜，成螺旋状，顶端为一人头雕像。装有铁制刀片。长 37 公分

王国得以团结的真正的政治联盟的反映。各位官员负责管理交纳的贡税，贡税的支付方式有无偿劳动(mingilu)，有实物交付(milambu)，如食品以及盐、铁、酒椰纤维织品、篮子等土产，也有在高官(Kugala)授职仪式上赠送礼品。地方政府由“比罗罗”(bilolo，单数为kilolo)掌管，他们每人负责一个地区(Kibwindji)，比罗罗通常由当地人从本区占统治地位的家族中选出，后经宫廷确认。有时比罗罗由宫廷指定，这种情况通常是与君主为至亲。**598**
中央政府负责监督征收贡品，必要时，组建军队强行收缴贡品，并通过全体议事会(tshidie)和朝廷(tshihangu)向君主提出建议。主要官员有“特韦特”(twite)，代表君主处理非宗教事务，“纳班扎”(nabanza)，负责保管王冠、服饰、宝器等物，督导宗教仪式，“卢坎加”(lukanga)，高级法官，“姆瓦纳·姆韦兰巴”(mwana Mwilamba)，军队首领，“姆韦纳·伦杜”(mwine lundu)，负责维护传统习俗，尤指不成文法规执行者，“福姆瓦·潘巴·迪约比”(fumwa pamba diyumbi)，符咒编纂、保管兼王室占卜官员以及“恩达兰巴(ndalamba)负 **599**



图片 20.5 (左)扎伊尔的卢巴：手杖柄，系佩戴珍珠项链的女人像，划痕累累。全长 160 公分



图片 20.6 (右)扎伊尔的卢巴：手杖柄，形状为两手搭肩、划痕累累的女人像。全长 80 公分

责礼仪庆典的太后。[16]

此外，这些官员，也许还有其他官员在拥有无数地方分支机构的“班布杰”(Bambudye)社团的会议上，也要发挥作用。我们无法真正了解这一组织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因为班布杰的内幕一直未被揭示出来。不过班布杰的作用是从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对这个国家，甚至对其君主加以控制，同时不断发扬卢巴人和卢巴国的思想精神。[17]

实际上，各地方宫廷均按国都机构的模式建立，各地方首长都拥有一些随身携带的圣物，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祖先同当地的地方神灵崇拜保持联系，因此，王国总是存在强大的离心力。君主的武士们拥有强制力，是维护国家团结的实际力量。但没有常规军队，因此，依靠班布杰所形成的思想力量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当主要地区心甘情愿支持君主反对内外势力时，才能强行征收重税(许多传说中谈到这一点)。

因此，王国未能迅速扩张领土，并不出人意外。大约在1700年[18]卡迪罗国王执政以前，对疆域知之甚少。当时向北发起了攻占近邻松吉耶人的一些城镇的战役，“但最后卡迪罗失败。接着，便与松吉耶人的一些城镇联合起来，到该世纪末，当继承权出现危机时，才感受到松吉耶人对国事产生的影响。”[19] 实际上，王国的领土已扩张到卢阿拉巴河流域、卢武阿河流域(基安比)以及乌彭巴洼地以南地区。大约从1780至1810年，主要由于继承权危机的发展而停止了扩张。在这次危机期间，卡尼奥克人脱离卢巴的统治，宣告独立，而松吉耶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却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引人布卡桑吉社会便可说明。然而，1800年以后，又继续向东扩张，征服了卢阿拉巴河与坦噶尼喀湖之间的地区，在军事首领的率领下，沿卢阿拉巴河用圣火向北猛攻，直达布利。[20] 关于这次扩张的说法[21] 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勉强把它说成是为了打开贸易通道，获得原料(迄今人们对此几乎毫无所知)还不如承认其内在原因尚不清楚。

隆达：1800年以前的内部机构及其发展

601

18世纪，隆德人王国发展成为隆达帝国。对于这个国家，除知道一些宫廷头衔以及它在军事上比卢巴王国声威更大以外，更早期的机构怎样，则全无所知。然而，对其社会、政治组织原则多少有些了解。

图邦按母系继承，但王室封号与朝臣官职则按双系继承。社会形象的体现是职位的继承与绵延不断的亲属关系。这就是说，第一个拥有职位或头衔的官员几乎与其前辈完全一样。他们可以采用其前辈的姓氏，其妻儿亲属也是如此。其前辈的个性也几乎可以成为他的个性，其结果，永远是割不断的亲属关系。对君主来说，某一封官也许是孙子，另一封

---

[16] J. 范西纳，1965年，第57-58页；K.Y. 通杜(Tundu)，1981年，第83-99页。
[17] T.Q. 里费，1981年，第46-48页。
[18] T.Q. 里费，1981年，第107-124页，第58-59页。
[19] N. 费尔利，1978年。
[20] T.Q. 里费，1981年，第124-128页。
[21] A. 威尔逊，1972年。

官也许是侄子，而地区首领(mwant a ngaand)也许就是叔父。这种制度历经五代不变，因此，并不因年久而废除。

所以，可以设想这个国家是一个由皇帝(Mwant Yav)为首的单一家族进行管理的机构。要使新的酋长们归并，可以通过结亲的方式(例如通过联姻成为女婿)，使他们在这个帝国有一个稳固的职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职位的继承与亲属关系的永久性造就了这种使边远地区有可能归并的机制。而且，为帝国提供的这一家族模式，自然而然地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论代排辈的观念是严格的。[22] 因此，所有“儿子”和“侄子”都要顺从所有“父亲”和“叔父”；所有“孙子”都是“祖父”的支持者。按直系亲属和姻亲关系划分，则对此进了补充。因此，“女婿”受岳父的保护，而“姐妹的儿子”与“母亲的兄弟”也有某种说不明的亲戚关系。

所以，对隆德人来说，这个国家是一个显然扩大了的家族——确实很大，因为这个帝国开始从宽果河延伸到卢阿普拉河那边。但这是一个武士辈出的家族，又是一个依靠奴隶劳动兴旺起来的家族。大约至 1700 年，隆达的征战征服了帝国中心地带周围的居民，并将这些居民收编，然后又上战场。1750 至 1760 年，从宽果河流域的雅卡人至卢阿普拉河流域的卡曾贝之间，建立了一些强大的属国。这些属国位于东西轴线上，即包括沙巴的矿产资源在内，又可通向赞比西河流域的葡萄牙商业中心以及从隆德人至宽果河上因班加拉人的贸易通道。

602

帝国行政管理松散。除核心部分外，帝国周围还有若干边缘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者只是有时向宫廷交纳贡品。[23] 基层地方机构的核心是村镇，村镇由当地头人领导，头人仍由母系继承。头人之上是由国都任命的地区首领(Cilol)。在中央，辅佐君主的是图邦与贵族官员。

为了控制比罗罗，君主设立特别官员(tukwata,单数为 kakwata)，这些官员派一支军事小分队在农村巡逻，强迫比罗罗交纳贡品。此外，还建立了由一位卡曾贝(将军)领导的主要军事机构。在 1700 年以前，将军甚至被派往边远地区领导远征军。对嗜血成性、克敌制胜的武士才授予将军称号。[24] 将军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大权独揽，如该地区一旦被兼并，他或则丧失其地位，或则凭自己的地位而成为统治者，成为君主的“基罗罗”(kilolo)。

都城(mussumba)的布局有如军队夜营，分前线与前卫、侧翼与中心部分。中心部分为王宫，包括姆万特·雅沃(皇帝)、斯万·姆隆德(象征性太后卢韦吉)、卢孔凯西(太后兼王室后勤首领)以及前卫队长(Kalala)和王位继承人兼军队首领斯万·姆罗普韦等高级官员。权力概归皇帝，其称号姆万特·雅沃(毒蛇之王)是指君主与生灵之间的距离，但也指他那种既主张和平、也主张战争，即主张昌盛、也主张破坏的双重性。

比较而言，隆达君主所起的作用，虽然仪式化程度要小得多，但更加专横暴虐。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隆达帝国的扩张是从武士向宽果河迁徙时开始的。但最新研究表明，所

---

[22] 这种模式与尚未组成酋邦的萨拉姆帕苏人的模式显然一样。而后者的同龄人组织和“大人们”也与隆德人的同龄人分组和加封的官职相当。参考 W.F. 普鲁特(Pruitt)，1973 年。

[23] J.L. 维卢特，1972 年，第 70 页。

[24] 这也相当于猎手头领(Sala Mpasu)；W.F. 普鲁特，1973 年。

谓第一次迁徙浪潮的传说，是由于因班加拉人与隆德人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导致后人以讹传讹。[25] 实际上扩张于1700年以前即已开始。第一次扩张是向东南出征到今科卢韦齐附近的卢阿拉巴河的浅盐湖。后来，约1700年，有一部分人分裂出来，在姆索坎坦达与卡隆格沙率领下，往南进入今赞比亚境内，其中一部分人与姆布韦拉土著同化，另一些人向南推进，在恩登布人地区建立了国家。[26] 一些隆达人此前也许参与建立了洛齐王国。历史学家承认隆达人早期对布洛齐的某些影响，但尚缺少有力的证据。1700年以后，当隆达开 603 始向南扩张时，洛齐王国可能早在接受隆达影响以前即已形成。[27]

隆达的将军们从卢阿拉巴河流域的浅盐湖开始，又进行了一次远征，这次出征东向铜矿区远至富饶的卢阿普拉河谷地区。隆达军队击退了卢巴的一次进攻，降服了沙巴的酋长(其中一名叫加丹加)，征服了卢阿普拉流域的希拉国。他们扩大了疆域，至18世纪下半叶，卢阿普拉河流域的卡曾贝便成为一个团结紧密、版图辽阔的王国之首。[28] 他们定居后不久，卡曾贝的隆达人与塞纳、太特的葡萄牙人取得联系。1798至1799年，以德拉塞尔达为首的外交使团访问了这个新兴王国。[29] 卡曾贝的军事实力以及宫廷对当地居民仍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给人印象很深。葡萄牙人的访问，为加强卡曾贝与赞比西河下游的贸易关系开创了一个新时期。由此加强了卡曾贝对姆森巴的自主权，因此，18世纪90年代应正常交纳的贡品，到19世纪30年代，则进一步成为平等交换的礼物了。[30]

隆达另一次向北和向西的扩张，与安哥拉奴隶贸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安哥拉奴隶贸易的交往，最晚是17世纪70年代开始，[31] 163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32] 因班加拉人建立了一种由商队组成的贸易体制，将欧洲的布匹、珠饰、陶器等货物贩运到隆达都城来，而这些东西，则成为贵族的奢侈品以及地位和权力的新的象征。隆达人不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枪支，仍相信大刀(mpok)的作用。[33] 作为回报，开始时，他们向外出口从位于萨拉姆帕苏人、克特人、卡宁青人、甚至卡尼奥克人地区的隆德人中心地带北部与东部俘获的奴隶。后来，凡从北赞比亚和东安哥拉抓获的姆布韦拉俘虏，也成为出口品。与此同时，隆达本土也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量。这些奴隶被安置在都城郊区耕田种地，也在沿乡间大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种植园耕种木薯以及渡口运输，最终则是在从宽果河至恩卡兰尼河、从恩卡兰尼河至卢阿拉巴河之间的荒原地带为商队搬运货物。[34]

在1700年以后不久，隆达人西征，因此，约1750年，在宽果河流域居住着隆达的一 605 些酋长。东安哥拉，即卢埃纳的领土，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几个小

㉕ J.K. 桑顿，1981年a。

㉖ R.E. 谢希特，1980年，第113-124页，1976年。

㉗ 姆登巴·梅因加(Mutumba Mainga)，1973年，第213-214页。

㉘ E. 拉布雷克(Labrecque)，1949年，第27页；M.W. 科隆格韦(Kolungwe)，1974年，第50页。

㉙ J. 范西纳，1965年，第133页。

㉚ J. 范西纳，1966年，第165-174页；F. 德拉塞尔达(de Lacerda)，1944年，第175-261页；A.C.P. 加米托(Gamitto)，1960年，第2卷，第9-130页。

㉛ O. 德卡多内加(de Cadornega)，1940年，第3卷，第219页。

㉜ 也许在1695年以后；参考J.K. 桑顿，1981年a，第6页。

㉝ M.C. 科里亚·雷通(Correia Leitao)，1938年，第25页。

㉞ J.L. 维卢特，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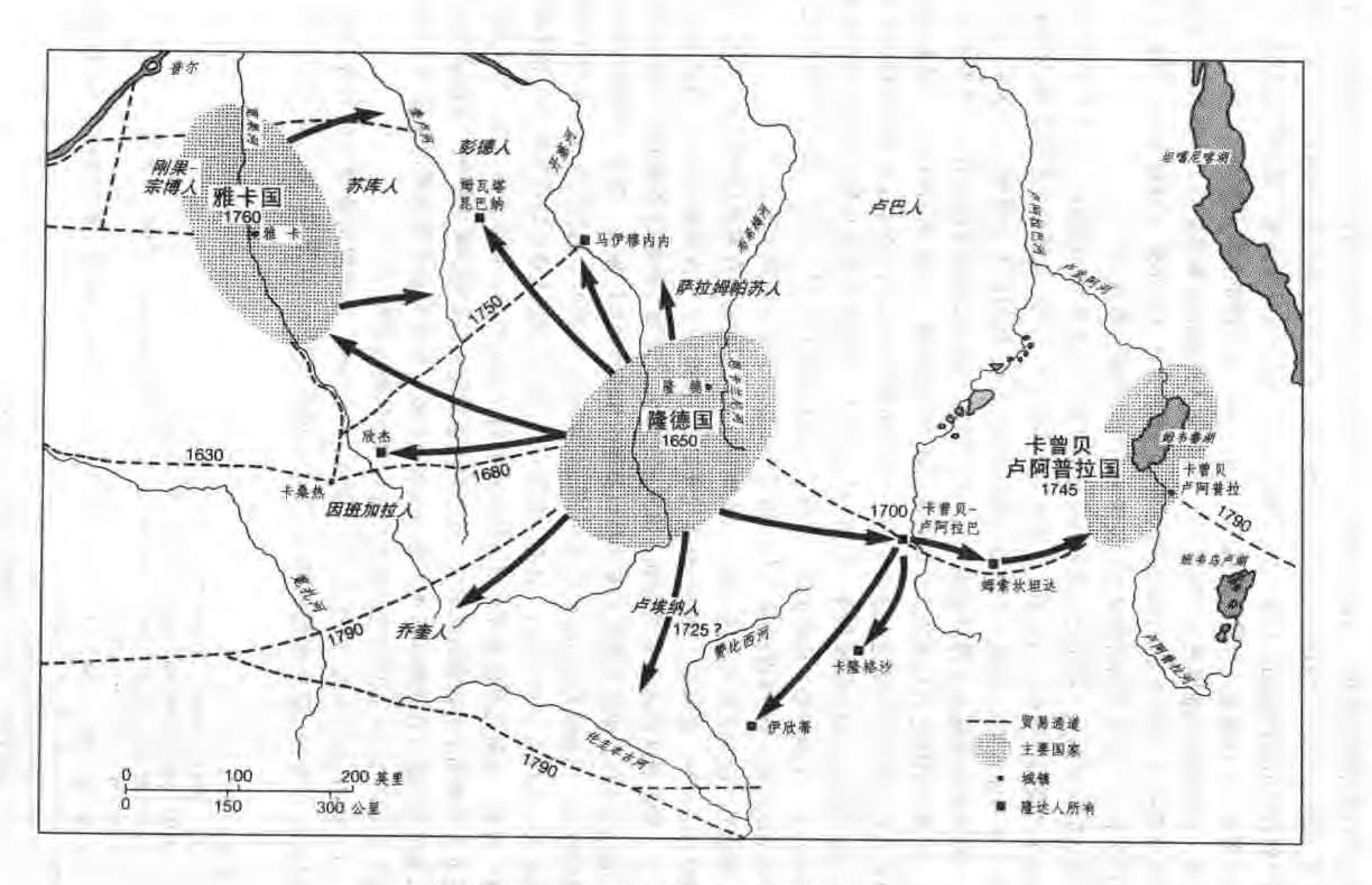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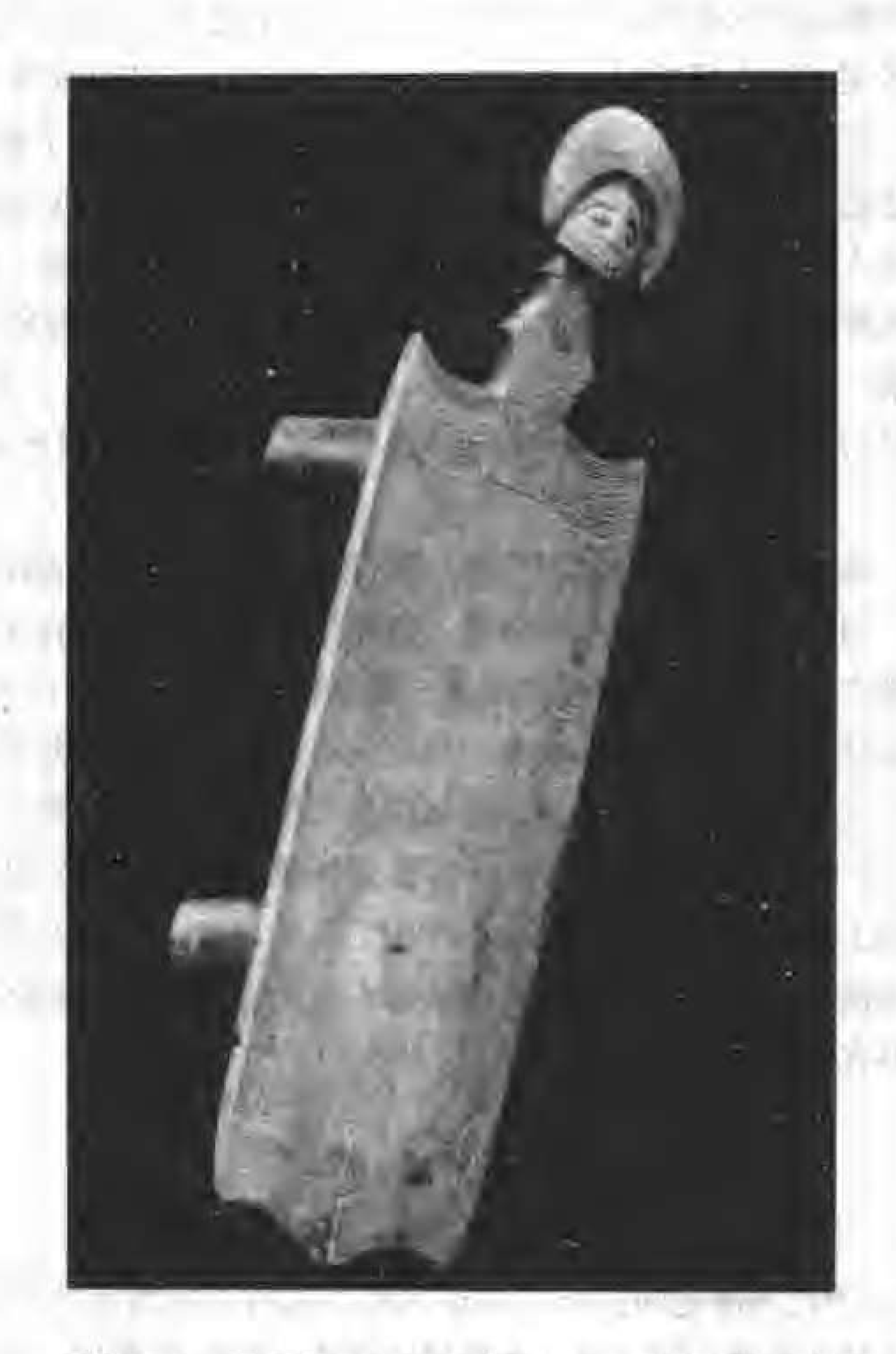


插图20.3　18世纪的隆达帝国(仿照J. 范西纳图)



图片 20.7　安哥拉与扎伊尔的乔奎人：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四脚木床(?)，床头延伸处是佩戴乔奎人典型头饰的人头雕像。上面刻有称为“乌库隆古”的耳环。长 131 公分

国，其中较大的一个国家是西尼阿马领导的。隆达的首领们凌驾于庞大的自治村社之上，这种自治村社是根据很深的母系血缘关系建立的。隆达酋长(mwangana)一开始就成为解决世代纠纷的仲裁人，而当地居民也相信他具有强大的超自然的力量。根据血统判断，这里最初的隆达酋长可追溯到约 1750 年，但如果说直到 1750 年隆达酋长们才在宽果河东岸定居的话，[35] 那么，这一过程肯定早在一代人以前业已开始。在卢埃纳河以西，隆达人还在当时一些社会之上，建立了如乔奎人、米农戈人和松戈人的酋邦。然而，这些酋邦联合欣杰人打败了早已在此建立的一个王国。[36] 后来证明，在这些酋邦中，乔奎人是最重要的。 606

㉟ C.M.N. 怀特(White)，1962 年，第 15-18 页；J.K. 桑顿，1981 年 a，第 5 页和注㉙(欣杰；马隆达)。

㊱ 隆达人传说以及对隆达宫廷晚期(19 世纪)艺术风格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在金属方面，也可能证明是 18 世纪下半叶。从当时乔奎人的雕刻可以看出，它是仿照葡萄牙文艺复兴后的作品，即葡萄牙罗可可的风格。

甚至在 18 世纪，他们作为冶金高手、技术熟练的雕刻师和猎手，也受到帝国的重视。在几乎缺少冶金和雕刻技术的隆达中部地区，[37] 其武器和雕刻就是来自这一地区。

隆达侵略者实行武力征服时，猎捕奴隶。他们构筑了巨大的军事防御营地，周围布满壕沟和栅栏。[38] 在宽果河流域，他们依照类似刚果人的结构建立了雅卡人、苏库人酋邦，在奥坎果也许还建立了其他酋邦。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方，许多居民纷纷外逃，但机构并未遭到破坏。隆达人设立了高一级或同级首领基罗罗取而代之。结果，形成一种复杂的三级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甚至国家在概念上有“土著”和隆达侵略者之分。但雅卡人的首领“基阿姆福”(Kiamfu,来自王室称号 Yav)无法控制全体臣民。在北方，当松德-卢瓦人群体迁至宽果河中游以东建立自己的酋邦时，另一个半独立国即佩伦德人的国家诞生了。[39]

定居以后，雅卡国王便开始向奎卢河一带掠夺土地，以便搜捕奴隶贩卖给安哥拉、刚果和维利商人。因此引起当地较大的骚乱。苏库王国因进行有效的反抗得以复兴，而其他居民则向东北逃亡，到 19 世纪，致使南纬 5 度左右地区人口密度过大。[40]

最后一次远征是从开赛河以西向北，也许是沿着奇卡帕河谷进发的。这次远征建立了两个小国：一个位于开赛河大瀑布处，都城建在马伊姆内内，该城后来成为宽果河商队的主要市场；另一个叫姆瓦塔昆巴纳，位于洛安盖河流域。在这两个地方，隆达人与新近迁徙来的彭德人和土著杂居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制度，与中央隆德的机构相比，其类似之处，较隆达诸国相去更远。这是由于彭德人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以及几近独立的彭德人酋邦继续存在的缘故。[41]

607

结　论

到 1800 年，卢巴与隆达的扩张，使宽果河以东的非洲热带大草原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在整个地区传播共同文化，向各民族灌输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宗教礼仪，以及共同的象征物和标志。从宽果河至卢阿拉巴河一带，发现了隆达人戴的带角帽一类的什物。17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宽果河西岸为人所熟知的某些习俗，例如男孩子的“姆坎达”(mukanda)，起先在彭德人中流传，后来传至隆达，而在北方，则从彭德人传给库巴人。流传如此广泛，这是贸易通道，甚至入侵促成的结果。人口流动，尤其通过联姻出现的人口流动，使人感到震惊。这从流传的名称可以得到证实，因为尽管妇女同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但氏族名称却依母系继承。从宽果河到开赛河，从开赛河到卢阿普拉河，到处都有共同的名称。[42]

---

[37] M.C. 科雷亚·雷通，1938 年，第 25 页；在卡尼奥克人中心地带以及卢巴中心地带，都构筑了这类工事。军事技术在当地得到普及。

[38] 前引书。

[39] M. 普兰夸尔特，1971 年；J.K. 桑顿，1981 年 a。

[40] 雅卡人入侵后，今称姆巴拉人与恩贡戈人的族群均向北迁徙。

[41] 科迪·穆宗(Kodi Muzong)，1976 年，第 268-342 页。

[42] 范西纳，1983 年 a，第 332-333 页，1979 年，第 204-205 页；科迪·穆宗，1976 年，第 136、163 页。

然而，隆达的扩张也使广大地区遭到破坏。对隆达诸国的好战成性和他们大规模掠夺奴隶的事实也不应低估。南宽果与东安哥拉人口之所以稀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此类掠夺的缘故。在宽果河与奎卢河之间第5纬线上人口的密集，确实是掠夺奴隶的结果。这一点，以及从宽果河至卢阿普拉河流域共同的政治文化，仍是当代这一广大地区的遗产。

（余崇健 译）

21 赞比西亚北部-马拉维湖地区

K.M.费里
O.J.M.卡林加
H.H.K.比拉

608 本章所要讨论的地区南濒赞比西河，北部以松圭河和鲁伍马河为界，西抵卢安瓜河，东达印度洋。在该地区南部居统治地位的是操切瓦语的民族及其所辖群体：希雷河下游河谷的曼甘贾人和马拉维湖南端周围的尼扬贾人。在切瓦人以西居住的是恩森加人，以东是操洛洛-马夸-隆韦语者和尧人。北部区域沿马拉维湖西部向南北延伸，南及切瓦-通布卡边缘区域，北至松圭河。该区域流行着三大语族：通布卡语族、恩贡德-尼亚库萨语族和苏夸-兰比亚-尼哈语族。在1500年，南部区域的所有民族和北方的通布卡人同属于"操中班图语的母系族群，他们由西向东，从扎伊尔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在1500年以后的诸世纪中，通布卡人逐渐嬗变为父系相传。恩贡德-尼亚库萨人和苏夸-兰比亚-尼哈人有史以来，一直是父系制。今天这个区域包括赞比亚东部、马拉维的全部以及莫桑比克北部。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中，南部地区在15世纪主要经历了马拉维人的到来及其国家体系的兴起。及至16和17世纪，马拉维人的扩张矛头指向了西边的的恩森加人和东面的洛洛-马夸-隆韦人。在16世纪的北部地区，除在卡龙加平原和福卡高地分别建立了辛博韦人和姆巴勒人两个酋邦外，还组织了一系列自治氏族，然而到16世纪后期，一个移民群体——恩古卢贝人——建立了兰比亚人、恩贡德人、奇丰韦人、苏克瓦人国家，以及一系列尼亚库萨人酋邦。在同一时期，马拉维人扩张到了通布卡-切瓦人边缘地区，导致了坎延达、卡本杜利、卡卢卢玛、楚鲁等一系列统治通布卡人的新切瓦人酋邦的建立，同时也创造了通加民族和语言。在18世纪，南北区域均以象牙贸易为主。南部地区以马拉维国家体制衰落、后继国家的兴起，以及尧人起初作为商人，后来作为国家的创始者并向
610 外扩张为主要特征。在通布卡人中有一支来自尼扬韦齐人国土的移民巴罗沃卡人定居了下来，他们创建了有影响的经济领域，最终成为若干政治实体。然而松圭河南岸较早建立的国家，直至进入19世纪仍然与这些新的商业发展无缘。

在16世纪以前，这个地区经历了铁器时代一系列移民运动，移民中包括了近代班图语居民的最初祖先。考古学在这一问题上发现较多，例如早在公元300年，一些使用铁器、会生产食物而且可能说班图语的居民占据了这一区域。直到11世纪，这些铁器时代的移民才因使用与北部的姆瓦瓦兰波人和姆瓦马萨帕人以及南部的卡佩尼人、恩科佩人和隆韦人相同的陶器，而被辨认出来。[1] 到12世纪，这些早期的陶器传统工艺被诸如马乌

---

① G.Y.姆戈梅祖鲁(Mgomezulu)，1981年，第450-451页；K.R.鲁滨逊(Robinson)，1966年，第183-188页；K.R.鲁滨逊和B.桑德罗斯基(Sandelowsky)，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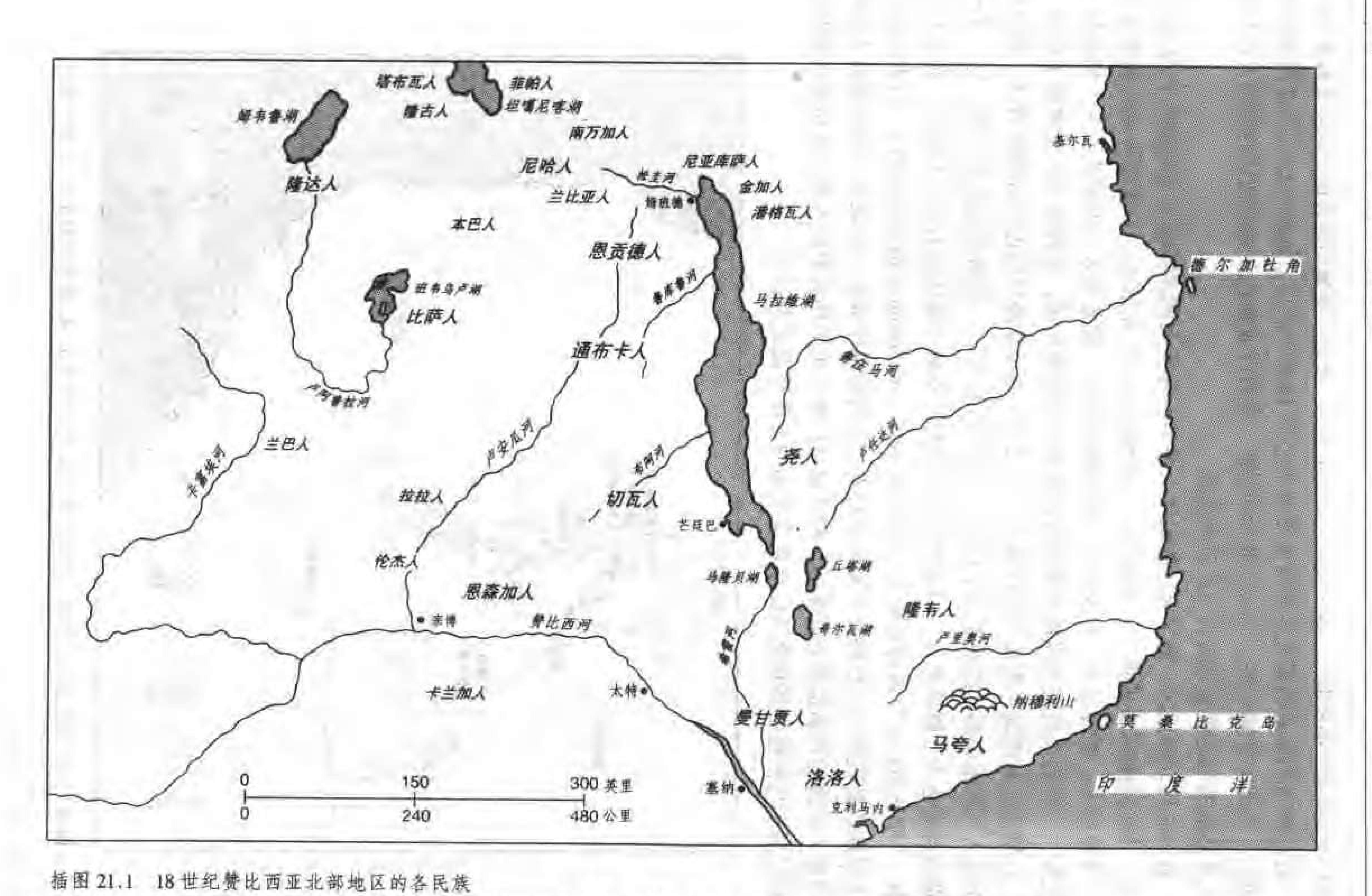


插图 21.1 18 世纪赞比西亚北部地区的各民族

资料来源：根据 A.D. 罗伯茨的《1990 年以前的本巴人历史》改编，伦敦，朗曼，1973 年，第 XXV 页。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编。

祖和卢安瓜等新产品所取代。这一新工艺的引进与第一批近代操班图语者祖先的到来有关。[②]

近代操班图语者的最初定居可能发生在公元1200年以后。新移民以氏族或氏族集团为单位，由北方迁移而来，而一旦抵达移居地，便取代或同化了早期到达的班图人以及班图人抵达前的当地耕地务农者与狩猎采集者。

在马拉维北部地区，最早定居的班图人多半是处于无国度或形成王朝前的状况（地图21.2）。他们包括希克威斯人、奇利马人、西伦布人、辛瓦依人、卡龙加平原的南姆文斯人、奇鲁巴人、姆曾贝人、卢汉加人、尼扬贾格哈人、尼龙戈人、卡尼英吉人、姆通加人等氏族，一些后来的更为强悍的移民试图将他们组建成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取得了成功。

在赞比亚东部的卢安瓜河东岸地区，加丹加人据说是最早的近代班图语居民。他们再往东进入马拉维中部，组成了若干氏族。"原始切瓦人"一词即泛指这类氏族，这一名称特别是与班达人、姆贝韦人，以及津巴人等自称为本地土著居民的氏族有联系。在口传文化中，"原始切瓦人"有时也称为"卡里曼吉拉"（Kalimanjira，道路开拓者），负责清除国土上早期的游牧民——巴特瓦人和卡夫拉人。在马拉维中部的一些地区，原始切瓦人氏族与当地人创造的神话也是有联系的。神话说马拉维人生活环境中的人类以及所有鸟类和动物均起源于马拉维中部和莫桑比克西部之间的卡皮林提瓦山。[③] 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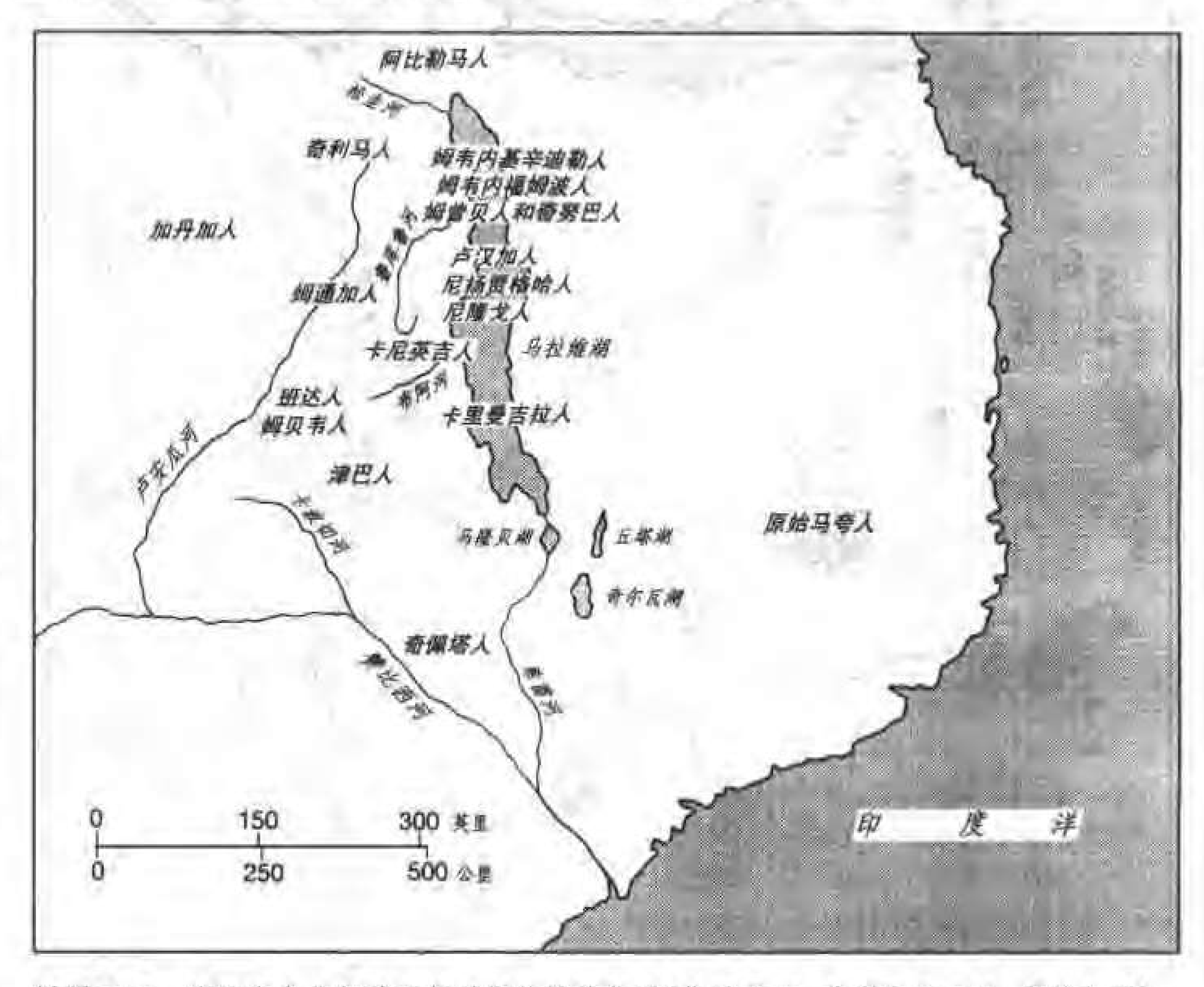


插图21.2　津巴布韦北部前王朝时期的民族集团（仿照K.M. 菲利和O.J.M. 卡林加图）

② G.Y. 姆戈梅祖鲁，1981年，第450-451页。

③ 以下是关于近代操班图语者与这一地区早期居民相互影响的部分主要资料：H.L. 韦尔（Vail）；H.W. 兰沃西（Langworthy），1969年b；K.M. 费里（Phiri），1975年b；和A.J. 威廉-迈尔斯（William-Myers），1978年b。

另一方面，难以确定莫桑比克北部的尧人和洛洛-马夸-隆韦人的起源及其早期构成。他们的口头传说都没有清楚说明他们是如何占据现在的家园的。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是许多世纪前占据的，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确切的起源也就失去了记忆。在 16 世纪初叶，洛洛人就已占据北莫桑比克的西南部地区，而马夸人和其他操隆韦语的群落在莫桑比克岛对面的海岸居住，甚至定居于地处该国中部的内陆腹地的高地上。尧人在马夸人居住区的西北面拥有家园，该家园位于北部的鲁伍马河和南部的卢任达河之间。[4]

据有关记载，在北部地区，最早的近代班图语居民定居于松圭河和南鲁库鲁诸河流域 612 之间地区。他们包括奇提帕和卡龙加平原的希克威斯人、奇利马人、姆韦内基辛迪勒人和姆韦内福姆波人氏族，以及地处卡龙加平原西南多山的福卡人地区的姆曾贝人和奇鲁巴人氏族。据有关他们起源的口头传说称，他们来自马拉维湖东岸，而且可能还与据信在勒温贝人世系定居之前就已在温尼亚库萨居住的比勒马人有一定联系。[5] 然而其后不久，后来者而且多半是更为强大的族群也开始渗透进这一地区。这些族群包括辛布韦人和姆巴勒人，前者占据了卡龙加平原，后者则侵人了福卡人地区。他们也来自北方，其中姆巴勒人声称已从维多利亚湖以南地区移居马拉维湖地区。

姆巴勒人移居波卡高地很可能是 14 世纪的事情。这些新移民是一些有名的炼铁匠，因而容易与土著居民——姆曾贝人和奇鲁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姆巴勒人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取农产品和炼铁所需的煤炭。而另一方面，姆曾贝人和奇鲁巴人则依赖姆巴勒人为他们打制铁器农具和武器。[6] 由此可见，人们似乎在利用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湖之间的走廊作为主要通道，向南方进行大迁徙。其中一些人很可能继续向南迁移而进人马拉维中部或切瓦语地区。

在福卡人和切瓦人中间地带的南部和北部分别居住着操通布卡语的诸氏族。恩卡曼加平原、亨加和卡希图峡谷主要居住着卢汉加人、卡奋利人、恩依龙戈人、姆提卡人以及尼扬贾格哈人等氏族。其中的一些群落向东扩展到了马拉维湖畔，向西则延伸到卢安瓜河峡谷(位于现在赞比亚东部的隆达齐地区)。[7] 现居住在隆达齐地区的恩森加人已经演变成一个“部族”，这归因于与来自东部的通布卡族体和来自西部的卢巴/隆达移民间的相互交流。他们说一种与通布卡语相近的语言，并且与居住在通布卡兰的人们共有相同的氏族名称。在 18 和 19 世纪，他们在东部通布卡人和西部比萨人之间起了桥梁作用。 613

因此大约 1500 年以前，北起松圭河、南至赞比西河之间的整个地区的政治结构，除

④ 在 1975 年以前，由于当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不可能对莫桑比克北部的口头历史进行实地研究。目前形势或许已有所改变，马普托的非洲研究中心正在致力于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近来已系统地收集了关于马拉维的尧人历史传说，参见 K. 拉普凯尼(Lapukeni)、P. 拉西希(Rashid)、N. 库姆温贝(Kumwembe)和 J.B. 韦伯斯特(Webster)，1978 年；K.M. 费里、M. 沃根(Vaughan)和 D. 马库伦尼(Makuluni)，1978 年；R.B. 米索马里(Misomali)、G. 姆孔蒂瓦(Mkondiwa)和 H.K. 比拉(Bhila)，1978 年；Y.B. 阿卜杜拉(Abdallah)，1919 年 a；L.D. 索卡(Soka)，1953 年；和 E.A. 艾尔珀斯(Alpers)，1975 年 a。根据尧人的口头传说，他们起源于鲁伍马河与卢安巴拉河之间的“尧山”附近。根据艾尔帕斯，马夸人从北莫桑比克中部的纳穆利山扩散到北莫桑比克的其他地区。

⑤ 参见 M. 威尔逊(Wilson)，1958 年。关于近代操班图语者迁徙至奇提帕和卡龙加平原的传说概要，参见 O.J.M. 卡林加(Kalinga)，1985 年。

⑥ H.K. 穆西斯卡(Msiska)，1978 年 a 和 1978 年 b。

⑦ H.L. 韦尔，1972 年 b。

若干小块地区，普遍是以未形成国家或小规模政体为特征。不同的族体各自分设两级权力的地方酋长制。政治结构的这种形式围绕着作为地方最高权力者的酋长进行运作。酋长主持若干以血缘为基础的近亲村落，他本人的村落则是家系中的长辈。在其所辖的村落社会中，酋长承担着宗教、司法、军事等事务，因而有权得到其追随者的效忠。

尽管马拉维湖地区在政治上，有时实际上是按照民族和氏族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但这里在社会和宗教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尤其是宗教的联系为不同社交语言群体内及群体之间的凝聚提供了基础。事实上在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宗教行为不仅涉及地方，而且波及整个地区。在地方一级，宗教可在精神和物质上造福于民；而在整个地区，宗教也促进了文化和生态的协调。⑧

对该区域的绝大部分非洲人来说,其宗教活动包括对先辈的崇拜、神灵的拥有、求雨,以及对巫术的控制。例如在操切瓦语的人群中,尼奥秘密会社(图片21.1)是表述族体创造的神话、道德规约等内容并使之戏曲化的一个重要媒介。最为重要的是，尼奥的演出戏剧化地表现了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相互依存，以及切瓦人关于创造的神话。在这些神话里，人、动物和神灵曾经协调地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求雨的宗教仪式是地区范围内宗教活动的主要表现。这些跨度较大的区域有的被供奉给全区公认的上帝和神灵，由祭司和神职人员等上层人士控制。通布卡人和切瓦人对契卡-恩姆贝和奇尚姆非的崇拜分别属于这种类型。

有迹象表明，在母系社会，至少在北起通布卡-切瓦人住区交界、南至赞比西河谷的广大区域内，在诸多宗教崇拜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与重叠现象，神灵的指代方式也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在通布卡人和切瓦人中，认为神以蛇为物质化身。蛇被看成是雄性力量的代表，并有数名神灵妻妾为他服务。为他效力的神职人员被神控制并有特殊的社会用途。肖费里尔斯注意到了赞比西北部不同的求雨仪式在结构上的类似,他推测在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不同类型的崇拜可能属于同一崇拜复合体。⑨ 倘若情况果真如此，宗教则为另外以政治划分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615

16世纪初，马拉维国家体系的出现及其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扩张，极大地改变了1500年以前在切瓦以及南部的相关民族中盛行的松散的政治结构。⑩ 因此，马拉维国家统治了16和17世纪北赞比西亚低地区域的政治历史，正如姆塔帕国家的缔造者在15至16世纪统治南赞比西亚一样。

目前，普遍认为，马拉维人作为移民抵达马拉维湖，他们源于扎伊尔东南部的卢巴地区。在经过跨越赞比亚东北部大高原的迁徙之后，马拉维人由西进入了马拉维中部。抵达马拉维湖南端后，他们很快稳固下来并建立了对原始切瓦人早期居民的统治。在巩固了其统治地位之后，马拉维人开始了其拓疆扩土的战争。他们越过马拉维中南部地区，进入了

⑧ 极力支持这一观点的有T.O. 兰格(Ranger)，1973年，和J.M. 肖费里尔斯(Schoffeleers)，1979年a，第6-23页。

⑨ M.J. 肖费里尔斯，1979年a，第22-23页。另见H.L. 韦尔，1979年，和肖费里尔斯，1979年b。关于尼奥的宗教方面，参见肖费里尔斯，1976年及N.E. 林格伦(Lingren)与M.J. 肖费里尔斯，1978年。

⑩ 关于马拉维人抵达马拉维湖地区的年代，唯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通过对已经发掘的马拉维人占据的地区进行碳14测定，其年代为1420年至1480年，这表明马拉维人于15世纪抵达。参见K.R. 鲁滨逊，1972年，第61-63页，和M.J. 肖费里尔斯，1973年，第48-53页。但是，纽伊特博士认为，马拉维人直至16世纪早期才到达赞比西河下游的北岸地区。参见M.D.D. 纽伊特(Newitt)，1982年，第47-48页。



图片 21.1 乔奎人/马拉维人最敬畏的尼奥秘密会社使用的面具

赞比亚和莫桑比克交界地带。因此，到 17 世纪早期，马拉维人的国家联盟已将赞比亚东部大部分地区、马拉维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及莫桑比克北部地区包括在内。马拉维国家体系后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对这些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历史学家对这一政治轮廓的形成过程还不甚明了。没有人清楚地了解马拉维国家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是哪些因素促进了马拉维国家在这一地区的成长。

一种观点认为，马拉维人作为侵略者进入该地区，他们全副武装象征着领袖的力量，并藉此建立了其对当时还尚未建立国家的土著居民的统治地位。[①] 该理论强调马拉维王权与政治结构的外部起因，因而可能低估了土著人与移民两种意识形态间的相互作用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例如安德鲁·罗伯兹曾指出，尽管侵略与征服在热带非洲一些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还应考虑新的移民是怎样通过引进有用的技术和思想获取政权的。[②] 他认为，在一个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完全不同的社会里，某个集团因为拥有可用以获取自然资源或解决长期冲突与夙怨的思想和技术，那么该集团就完全有可能统治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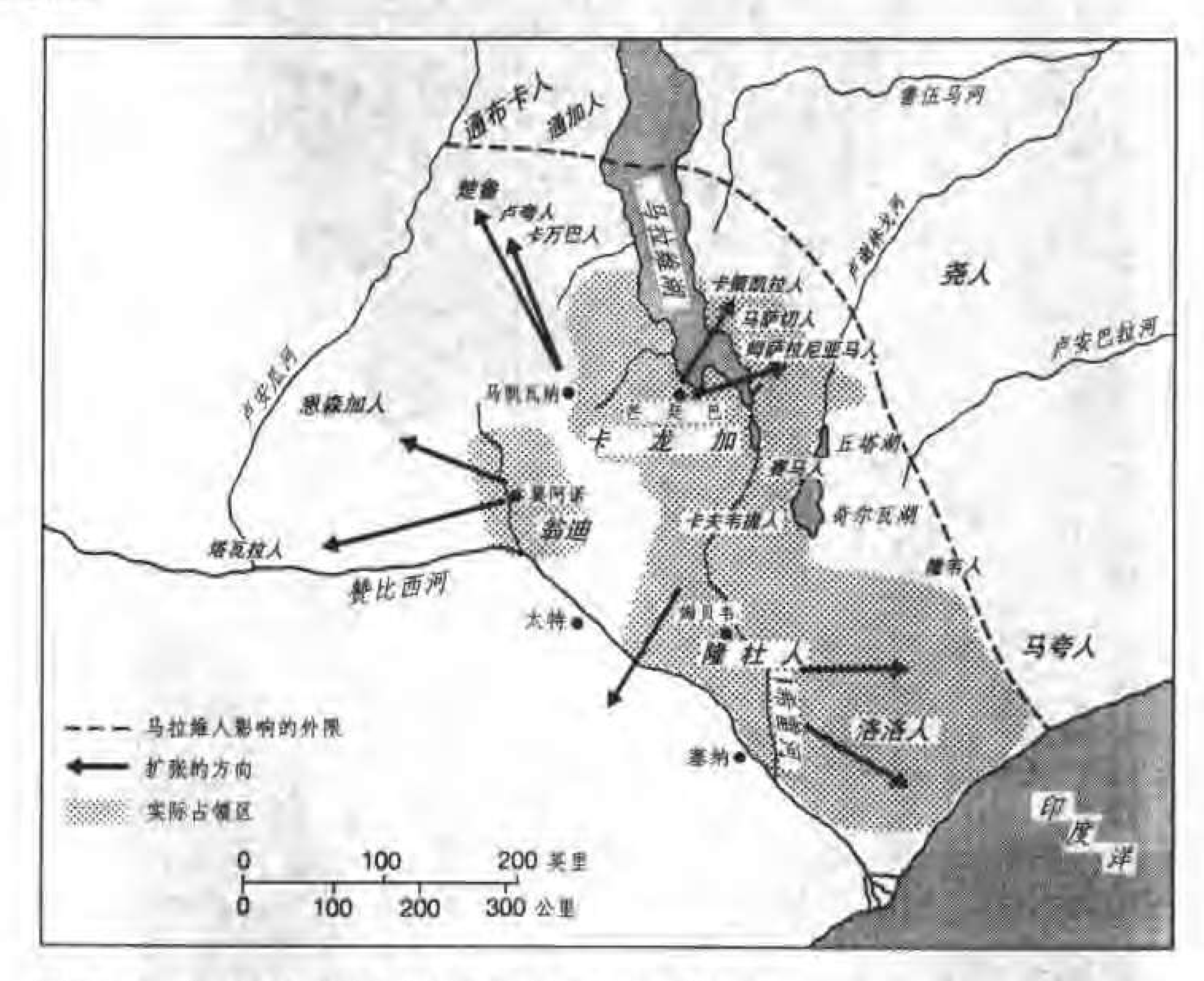


插图 21.3　约 1650 年马拉维人的扩张（仿照 K.M. 菲利图）

① 这一理论首先由 R.A. 汉密尔顿（Hamilton）提出。在仔细研读了切瓦人的口头传说之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在 14 或 15 世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政治变革。新来的称为费里的氏族（主要为入侵者）将长期在此居住但组织松散的当地居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参见 R.A. 汉密尔顿，1955 年 a，第 21 页。此后，这一观点得到几位作者的附和，包括 M.G. 马威克（Marwick），1963 年，第 377-378 页；和 M.J. 肖费里尔斯，1972 年 a，第 96-99 页。

② A.D. 罗伯兹（Roberts），1976 年，第 84 页。

其他一些假设在不同的作者中也很流行，其中有一个假设使我们考虑到人口因素。例如阿格纽提到了地理上的优势——土壤肥沃，雨量充足和食物的来源有保证，这很早就被视为马拉维湖西岸比其东西邻近地区人口更多的原因。不断增长的人口参与了剩余产品的出产，尽管剩余不多，但却为王朝力量的积蓄提供了适当的基础。[13] 617

另一个假设考虑的是贸易因素。15 或 16 世纪马拉维湖南部国家形成是由于在马拉维湖南岸和非洲东海之间经由希雷河-赞比西河系的日益增长的象牙贸易需要一个政权来控制的缘故。换句话说，通过不断地控制贸易的发展，早期卡龙加人(被称为至高无上的马拉维)才有能力积蓄力量。[14]

最后，冲突论假设认为，马拉维人是在外来的马拉维-费里群落和原始切瓦人土著居民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进化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切瓦人口头传说特别指出，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冲突后，一种融洽的关系得以建立。那就是马拉维-费里人侵者扮演这个地区统治者的角色，而原始切瓦-班达人土著居民就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15]。至于说是什么原因使土著人接受了外来移民的统治，可以从马拉维人亲属的组织力量中找到答案。在以后的时期里，正是这种力量成为使各分散的马拉维小群落统一的纽带。

在另一方面，口头传说作为这个地区早期历史中的主要信息来源，在谈及马拉维建国的具体过程时，却言不尽意，只是说在费里王家世系资深首领卡龙加·奇宗兹的领导下，马拉维人在马拉维湖西南部的曼克汉巴和芒廷巴附近建立起他们的第一个王国。卡龙加在芒廷巴或马拉维建立了总部，指定曼克汉巴村(可能在时间上早于马拉维人的到来)为王国的宗教中心。口头传说还提到卡龙加有众多行政官僚辅佐，其中包括军队司令(khombe)、行刑官(mkomba)，以及分地官(mgawi)。另一方面，我们从 17 世纪葡萄牙人的有关文献记载中了解到，芒廷巴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政治中心。据一位观察家 1624 年的记录，当时这里人口密集，在湖区方圆三公里处的居民与来自赞比亚太特的葡萄牙商人间的贸易往来，造就了这一地区的商业繁荣。[16] 618

然而，口头传说却仅仅提供了卡龙加的国家赖以凝聚一体的结构机制的迹象，“莫利拉”(mlira)崇拜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大约在 9 月份，费里王室各家族的首领被邀请到芒廷巴，举行对莫利拉的传统膜拜。莫利拉是指曾带领他们的祖先从北方迁移至此的伟大的卡龙加·钦克霍尔的神灵。这一仪式最后以点燃湖畔南起曼克汉巴，北至齐卢阿河之间距离很长的马林巴灌木而达到高潮。我们认为这种仪式清楚地显示了王室崇拜在马拉维国家内所具有的巨大的凝聚力。与王国的凝聚与整合同等重要的是对被任命官员分配职务的方式。据说卡龙加曾将原始切瓦人家族的首领任命为国家的重要领导成员。班达人是原始切瓦人一个重要氏族，他们成了卡龙加在曼克汉巴神龛的看管人(amatsano)，而孔贝统率下

---

[13] S. 阿格纽(Agnew)，1972 年，第 32-33 页。

[14] 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46-49 页。

[15] M.J. 肖费里尔斯，1973 年，第 47-60 页；K.M. 费里，1975 年 a，第 47-51 页；和 M.J. 肖费里尔斯，1979 年 a，第 147-161 页。

[16] 路易兹·马利亚诺(Luiz Marianno)，1924 年曾在塞纳居住的葡萄牙人。他对“马拉维帝国”状况的观察报告在 J. 巴塔尔哈-雷斯(Batalha-Reis)，1889 年的著作中作了概要介绍。

的穆瓦尔人则带领卡龙加的武士们冲锋陷阵。在这方面，口头传说明显强调了非费里人或非马拉维人氏族领袖对于土地所有权、财富的分配，以及发动战争等问题决策的参与程度。[17]

卡龙加独自决定王国事务的权力或许是在16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王国开始扩张时开始削弱的。这一扩张受到后起的费里家族头人的影响。这些头人从芒廷巴-曼克汉巴被派往邻近的领地。其中姆平下吉拉被派往东面靠近希雷河上游东岸的地区；恩央古向南部开进并占领了希雷河上游西岸的国土；昌加米腊占领了芒廷巴以西地区（即现在的柯克山脉）；乔马在曼克汉巴西北安营扎寨；而钦桑巴则攻占了芒廷巴-曼克汉巴以北的地区。到17世纪时，由卡龙加控制的领土和这些下属首领所控制的领地构成了马拉维国家体系的中心地带。

马拉维国家扩张的另一个方面是卡龙加的宗亲移往马拉维腹地以南或西南部边远地区。这也许是早期卡龙加人一次精心策划的迁移，旨在疏远那些想在芒廷巴争夺王位的王室成员。为此，卡夫韦提和隆杜迁移到希雷河下游谷地并在那里定居。在这两人中，资历较深的卡夫韦提一直控制着整个谷地，后隆杜夺得大部分权力。卡夫韦提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并不长。在1572年遭受一次神秘的打击之后，据说隆杜统治了北起曼韦拉或麦奇逊湍滩，南至赞比西河与希雷河汇合处的大部分谷地。隆杜扩张其势力范围很可能与他和葡萄牙人争夺对塞纳的象牙贸易的控制权有关。这也导致了卡夫韦提人势力的衰落，卡夫韦提人后来发现自己被断了象牙贸易的后路。[18]

619

隆杜在获得了对希雷河下游河谷的支配权之后，又将马拉维的扩张矛头指向洛洛人和马夸人国土。马拉维人在赞比西亚北部地区的扩张进程始于16世纪中期。按照鲁尔斯的历史语言学分析，莫桑比克北部的马拉维人或切瓦人与洛洛人和马夸人的相互影响肯定不迟于约1560年。[19]

马拉维对洛洛-马夸人的扩张和征服首先应归功于隆杜的武士们的狂热。一些东非历史学家将他们与16世纪后期臭名昭著的津巴劫掠者视为一体。[20] 如果他们的说法无误，那么隆杜一定是从希雷河下游谷地以西好斗的居民中征用了一支雇佣军。[21] 多斯·桑托斯认为，津巴人即起源于那一地区。后来他们向塞纳迁移，于1592年在塞纳击垮了葡萄牙人与非洲人的联军。其后，他们横扫莫桑比克北部，并洗劫了基尔瓦和蒙巴萨，直到他们抵达肯尼亚北部海岸的马林迪时才被该城的斯瓦希里居民与塞格朱人（马林迪素丹曾与建立友好关系的一个内地部族）组成的联军所击败。其次，隆杜的武士们成功地向东扩张也

---

[17] I.林登(Linden)，1979年，第188-193页；K.M.费里，1975年a，第52-55页，和S.J.恩萨拉(Nthara)，1948年，第17-24页。

[18] 关于卡夫韦提人和隆杜人在希雷河下游河谷前殖民时期政治中相对地位的概述，参见H.H.K.比拉，1977年。隆杜王国的扩张见J.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01年。另见E.A.艾尔帕斯，1968年，第20-22页，和肖费里尔斯，1968年，第143-159页。

[19] G.T.努尔斯(Nurse)，1977年，第126页。

[20] N.T.哈夫金(Hafkin)，1973年，第10-14页。

[21] 但肖费里尔斯认为津巴人起源于赞比西河南岸，葡萄牙人在塞纳和太特之间进行的殖民扩张战争迫使他们离开了家园。参见M.J.肖费里尔斯，1980年，第15-19页。

归因于洛洛人和马夸人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洛洛人，据说“他们从来不是，而且似乎从未想成为名人或重要人物”。他们的政治制度是零散的。政府的职能由村里的头人在长老会的帮助下组织实施。他们一起决定村里的军事、司法和宗教事务。与洛洛人一样，马夸人的政治制度也是分散的。但在马夸人的政治体制中，隶属于同一氏族的世系有时也在势力最强的氏族头人领导下联合起来。以此为推动以及在葡萄牙人的压力之下，16世纪晚期在沿岸马夸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酋邦政权。[23] **620**

隆杜的士兵征服了洛洛人和马夸人，并将他们兼并为贡国，赞比西河下游的葡萄牙居民称之为“博罗罗”。在这块征服地，马拉维人设立了几个酋长职位，以便管理他们的臣民，而其中一些人委实成了他们的附属家臣。与及至18世纪马夸-洛洛人其他方面的历史相比，人们对以上情况似乎了解更多一些。从政治意义上讲，马夸人宣称自己有马拉维人血统，这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从文化方面来说，则有许多马拉维人和马夸人混合的传统和习惯，在克利马内地区情况尤为如此。[24]

结果，到了17世纪初，隆杜就控制了赞比西河以北西起希雷河下游，东至印度洋的辽阔疆域。隆杜被称为“马拉维帝国的第二强人”（第一是卡龙加）。他的士兵们不时在沿岸的马夸人地区袭击葡萄牙人的居住地。[25]

隆杜在忠于他的将军们和他所属氏族内较低世系臣属的帮助下，牢固地统治着他的帝国。他的国家还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希雷河下游谷地隆杜属下的曼甘贾人生产的盐、铁和“马奇拉”（machila）棉布等产品构成了隆杜王国不同民族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曼甘贾宗教是该王国统一的另一个因素。该宗教以姆勃纳崇拜为中心，主要圣地位于希雷河下游谷地的库鲁布韦。其教义包含了诸如反对滥用王权和特权等许多民众支持的内容，因此对隆杜至上权威开始正式崇拜，其信徒遍布以希雷河下游河谷低地到东海岸赞比西河三角洲的广大地区。[26]

隆杜在马拉维东部地区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控制着马拉维湖东西部大片领土及希雷河上游的卡龙加就对隆杜日渐增强的权势感到焦虑。因此在17世纪20至30年代，马拉维的东扩计划因卡龙加与隆杜之间日益恶化的内部竞争而延缓下来。[27] 其后，就马拉维扩张而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场景从东部转向西南部地区。在西南部，翁迪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后他的王国不断扩张，如同隆杜在希雷河下游地区及向东方更远地区所进行的扩张一样。 **621**

关于翁迪王国的建立，一种传说认为王国的缔造者翁迪原本是被卡龙加派去占领恩森加兰附近的沙地平原。而另一种传说则认为翁迪的西南之行是由于芒廷巴的费里统治氏族

㉓ J. 多斯·桑托斯提供了关于16世纪洛洛人和马夸人政治制度的最佳描述，1901年，第308页。当时出现的强有力的马夸人酋长有马维亚姆诺和毛鲁卡，他们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在E.A. 艾尔珀斯的著作中的描述占相当长的篇幅，1975年a，第14-85页。

㉔ N.J. 哈夫金，1973年，第15-22页。

㉕ M. 巴雷托(Barreto)，1899年，第475页，和E. 阿克塞尔森(Axelson)，1960年，第132-133页。

㉖ 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25-26页；E.C. 曼达拉(Mandala)，1977年，第39-41页；和肖费里尔斯，1972年b，第76页。

㉗ R.A. 汉密尔顿，1954年；E.A. 艾尔帕斯，1975年b，第517页。

内部发生大规模冲突而引起的。[28] 第二种说法似乎更令人信服，因为大多数传说都提到翁迪与卡龙加因继承权和贡品划分等问题发生争执，后带领他的追随者们离开了芒廷巴。

在西部，翁迪及其追随者成功地开拓了赞比西河的支流卡波切河流域的殖民地。其后，他们将新开发的王国边界由卡波切河岸向西一直扩展到赞比西河和卢安瓜河的汇合处。在那里，翁迪的手下与赞比西河沿岸的塔瓦拉人以及卢安瓜河下游东岸的恩森加人发生了冲突。但是关于马拉维人统治恩森加人的程度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历史学家从马拉维人方面着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恩森加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便是17世纪中叶翁迪及其战士对恩森加人的人侵。据说这次人侵是由翁迪的侄子奇姆瓦拉指挥的，最初是为了征服当时统领恩森加最大、最重要的氏族姆万查氏族的芒迪库拉。然而据威廉-迈尔斯的说法，他是为数不多的从赞比亚人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之一，在卢安瓜河东岸地区大约四分之三的恩森加人与翁迪有着纳贡的关系。我们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一扩张时期，翁迪的王国包括了许多恩森加酋邦，但这并非适用于所有此类恩森加酋邦。例如，在赞比亚费拉附近的西南部恩森加人就没有曾经是翁迪“帝国”一部分的口头传说。[29]

除存有这一争议外，还有关于翁迪是怎样建立了对恩森加人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控制的问题。传统的说法认为，翁迪及其下属使用了武力，并与被征服的恩森加人建立了永久性的亲属关系，许多被征服的恩森加首领被认定是马拉维酋长的“儿子”或“侄子”。然而一个强有力的观点近来被提了出来，即商贸和饥荒可能对翁迪向邻近民族扩大影响起了关键作用。如所显示，翁迪在太特地区对葡萄牙商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在事实上使他间接控制着邻国政治实体的参与者。其次，卢安瓜河沿岸的恩森加人酋邦纷纷遭遇了地区性的饥荒。这些酋邦的居民常常到较为富裕的翁迪的领地寻求避难。与周边邻近民族和政治实体相比，翁迪通过这种联合控制、贸易管理，以及人们逃至他的国家躲避饥荒而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

622

另一方面，有种种迹象表明，翁迪及其亲属允许恩森加人酋长在他们的影响之下，继续管理本地区和他们氏族内部事务，只要这些酋长向位于卡波切河畔的翁迪总部进贡象牙和奴隶。然而从被征服之日起，恩森加人就采用了马拉维人的酋长统治制度，以此与他们自己的习俗相适应。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芒迪库拉人(即卡林达威洛人)、奇姆弗博人以及齐夫卡人的领导者均称昔日是翁迪任命他们为酋长的。

马拉维人和他们的切瓦代理人也在向北方的通布卡国扩张。在向北移民扩张的王室领袖中，较为杰出的有楚鲁、卡卢卢玛、坎廷达以及卡本杜利等。他们创立了混合的社会-语言群体，其中北部的科达-科达以及恩卡塔贝地区的通加人即是最明显的例子。

以楚鲁和卡卢卢玛为例，他们迁移到了以奇马利罗和周边平原而闻名的南通布卡地区。在这里，他们遭遇了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组织松散的通布卡人的抵抗。当时津巴

[28] H.W.兰沃西，1969年a，第148-163页；K.M.费里，1977年，第9页。

[29] 反映马拉维人偏见的资料有：F.H.莱因-普尔(Lane-Poole)，1934年，第39-41页，和H.W.兰沃西，1969年a，第215-216页。近期的著作是A.J.威廉-迈尔斯，1978年a。

人、卡尼英吉人、尼龙戈人、姆通加人等通布卡氏族之间已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然而，切瓦人和通布卡人的口头传说在解释楚鲁或卡卢卢玛是如何确立自己对通布卡人的绝对统治的方式这一点上却存有很大的争议。就卡卢卢玛而言，切瓦人口头传说称通布卡人起初欢迎他和他的随从，然而后来通布卡人决定反叛，但在随后的战斗中又被压服。另一方面，通布卡人的说法则颇为详尽。通布卡头人允许卡卢卢玛作为平民居住在该地区。然而不久，他开始游历各地，强迫人们承认他是首领，强迫通布卡头人帮助他搬运石磨(mphelo)，以供他磨制喜爱的鼻烟。因此，通布卡人起而反抗，试图驱逐卡卢卢玛，但是卡卢卢玛反而打败了他们。[31]

这些传说表明，因缺乏酋邦领导机构，通布卡人试图抵制早期马拉维人强加于他们的统治。这种冲突也可能是有其经济方面起因的，因为作为移民仍然缺乏他们自己的经济基础。马拉维人或切瓦人移民可能成为他们通布卡主人剩余产品的负担。 623



图片 21.2 中部马拉维科塔科塔的坎延达酋长的铁制王位，年代可能为 17 世纪

坎延达和卡本杜利则率众移入后来称为通加兰的地区。这两支移民队伍起源于马拉维帝国的中心地带，南部林提佩河畔附近。在沿马拉维湖西岸北上迁移科达-科达的中途，卡本杜利和坎延达分道扬镳。然后卡本杜利继续向北迁移，经过西部的奇马利罗，进入了通加兰。在通加兰，卡本杜利击败了通加人各群落，并将一度处于分散状态的通加族群落重新组织起来，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因而很快赢得了声望。由于他的声望与日俱增，许多来自切瓦人中心地带的切瓦人平民家族纷纷前来，如自称是来自乔瓦人聚居区(即今天的

[31] H.L. 韦尔，1971 年；T.C. 杨(Young)，1932 年，第 186 页；和 S.S. 默里(Murray)，1922 年，第 224 页。

利隆圭东部)的卡蓬达·班达家族。[32]

马拉维人和通加兰土著居民的相互混居说明了通加人社会的独特性。关于这一点，我624 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奇通加作为该区域的语言是通布卡和切瓦两种语言间的桥梁。通加人也是北部的马拉维人中唯一至今仍保留母系制和继承权的部族集团。这表明通加人社会在南方的切瓦人母系社会与北方的通布卡-福卡人父系社会之间起着历史性的桥梁作用。

对于切瓦-马拉维人来说，17世纪是其"黄金岁月"。那时由于他们的领土扩张使他们成了赞比西河以北有名的权力经纪人，甚至已在沿赞比西河定居的葡萄牙人也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合作。这是因为马拉维人并未将自己的利益限制在赞比西河以北。从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他们积极干预赞比西河南岸葡萄牙人势力范围内的事务。他们对蒙哈莫塔帕领地上利润很高的金银矿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赞比西河沿岸的交通均感兴趣。[33]

因此，17世纪初期的两代葡萄牙人，在从东海岸的安戈谢到赞比西河上游的太特地区的广大范围内，通过与马拉维人的合作，来寻求对他们的遏制。他们大量招募马拉维士兵，用以在对抗赞比西河南部的卡兰加人或绍纳人的战争中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也借助他们向与赞比西河葡萄牙人居住地紧邻的当地反对者开战。例如，在1608年，葡萄牙人在太特接受了4000名卡龙加姆祖拉人士兵，并将他们投人镇压盟军蒙哈姆塔帕·盖奇·卢塞尔的反叛者的战役。六年后的1614年，葡萄牙人又在塞纳寻求隆杜人的帮助，组织了一支武装远征军，开赴太特西北部的齐科，以寻找银矿。1623年，葡萄牙人又要求卡龙加协助。这一次，他调动了成千上万名士兵，渡过赞比西河，帮助葡萄牙人镇压在加奇·卢塞尔死后揭竿而起的卡兰加人首领。对于马拉维士兵来说，这场战役取得了成功，因为据报道他们满载劫掠得来的金子和牛群，渡过赞比西河，凯旋而归。1653年，隆杜人再次帮助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三角洲正北方的安戈谢区(克利马内)，镇压了斯瓦希里酋长们的起义。[34]

有证据表明，葡萄牙人与马拉维人合作，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但更多的还是出于需要。到17世纪末，塞纳和太特的葡萄牙居民开始惧怕马拉维人，把他们看成是"恶邻"，不像洛洛人和马夸人那样，从不添乱。[35]

马拉维人的扩张有其诸多影响。如隆杜国家在希雷河下游谷地东部的创立，使曼甘贾625 人的姆勃纳崇拜的影响更为广泛。马拉维人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17世纪，在马拉维联盟所属领地内，象牙贸易繁荣昌盛。结果，赞比西亚北部地区与世界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相互作用。"马拉维帝国"可能也促进了赞比西亚北部地区不同的母系社会之间的文化的统一，这为他们有同样的氏族名称及世袭体系这

---

[32] F.克沃勒(Kwaule)与E.J.恰克魏拉(Chakwera)，1978年；J.范·维尔森(Van Velsen)1959年；C.Z.姆潘德(Mpande)，1969年；F.R.姆坎达韦雷(Mkandawire)，1978年。

[33] D.W.比奇(Beach)，1980年a，第125-128页；和M.D.D.纽伊特，1982年，第158-160页。

[34] A.戈梅斯(Gomes)，1959年，第183页；G.M.蒂尔(Theal)，1899-1902年，第3卷，第395页；和E.A.艾尔珀斯，1975年a，第54-56页。

[35] G.M.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480页；和M.D.D.纽伊特，1973年，第80页。

一事实所证实。[36]

正当16和17世纪马拉维人扩张到南部区域时，北部区域为来自东北的恩古卢贝移民所渗透。就像马拉维人降临南部意义重大一样，恩古卢贝人的到来是北部区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37] 他们的到来也使年代的确定更为明确，因为大部分酋邦统治者名录均能追溯到其创建年代。唯一的问题是尽管统治者名录似乎相当可靠，但每个朝代有几位君主统治却难以确定。这是因为提供资料者并不总是对一系列体制承袭的运作方式了如指掌。以统治翁贡德的基栾古人王朝的统治者名录为例，它记录了约1940年以前15位统治者的姓名，一种观点认为，这至少代表了9个朝代。记载乌兰比亚统治者莫瓦兰比亚人的名录，包括了1940年以前的16位国王，他们最多代表12个朝代。[38]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翁贡德、乌兰比亚和翁依哈的创建者近乎处于同一时代，其中，乌兰比亚的统治者或许比其他统治者早几代人。

在恩古卡贝移民的先驱者中，莫瓦兰比亚人越过密苏库山南部的松圭河，进人后来被称为乌兰比亚的地区。在那里居住着希克威斯人和奇利马人氏族。与到达后不久就入侵卡龙加平原的基栾古人相比，莫瓦兰比亚人则通过较温和的方式确立了政治控制。部分原因是，后者的移民团体较前者为小。其结果是，莫瓦兰比亚人比基栾古人更为随和。基栾古的随身幕僚绝对是从整个或部分移民过程中紧随其后的心腹中挑选出来的。而莫瓦兰比亚的主要官员则是从当地的家族中抽调、选拔的，他们与新统治者共享威望和政治权力。[39] 与此相类似，莫舒夸人对辛瓦依和西伦布氏族的政治统治也不过多地诉诸武力。乌兰比亚和密苏库两个王国是在妥协中诞生的。 626

现代语言的发展不但反映了后来创建许多酋邦的各种移民团体的强大力量，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攫取权力进而对人民实施统治的方式。西兰比亚语以及卡美美语是土著尼哈人的方言，而基扬贡德和津亚库萨则是恩古卢贝人的方言。换言之，莫瓦兰比亚、卡美美及其追随者的语言均已被同化。在翁贡德和温尼亚库萨，当地的土著人则被移民所同化。现代西苏夸语是恩达利(松圭河以北的一个语族)语的一种方言，操尼哈语者能够听懂，相对尼哈语而言，恩贡德人学习西苏夸语更为容易。因而，西苏夸语在尼哈语和恩贡德语之间起了一种桥梁作用。

基栾古人、卡美美人及其移民团体经由翁依哈、乌义瓦、乌纳姆万加以及当时位于西部的乌兰比亚和密苏库，进入了卡龙加平原。尽管恩贡德的宫廷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在恩安万加和乌义瓦建立了政权，然而，乌义瓦地区的口头传说否认了这一点，认为先是乌比沙，最终是卢巴国家才是他们现代统治者的原籍地。无论如何，在他们到达卡龙加平原后短时期内，卡美美便返回，并在紧邻乌兰比亚的西部地区定居下来。卡美美在这里主要是对尼哈血统的居民建立了政权统治，但后来，许多曼布韦人和南万加人迁移到卡美美酋

[36] E.A.艾尔珀斯，1975年a，第56-58页。艾尔帕斯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非东部大部分人来说，参与这一贸易已无利可图。J.B.韦伯斯特提到了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似之处，1977年，第4-5页。

[37] O.J.M.卡林加，1985年，第41-63页。

[38] O.J.M.卡林加，1975年，和1985年，第57-61页。

[39] O.J.M.卡林加，1978年，第55-66页和1977年。

邦。现在还不清楚卡美美的国家是如何建立的。与其兄弟基荣古相比，卡美美的王国显然只是一个较小的政体。基荣古的王国是在已建立的由辛博韦人统治的国家基础上创建的。

辛博韦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而且有证据表明，它还是为许多统治者广为使用的称号。辛博韦氏族起源于今日坦桑尼亚境内的恩依哈，在卡龙加湖畔中西部区域的姆班德山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迄今还不清楚辛博韦人的力量基础是什么，但他们似乎是经商，而且是一直延伸至东海岸的贸易网络中的一部分。鲁滨逊在姆班德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玻璃珠、瓷器以及圆锥型贝壳等工艺品。鲁滨逊本人也断定，这些15—16世纪的人工制品很可能是属于葡萄牙人抵达东海岸以前的一个时期，即阿拉伯人的权力和商业影响的鼎盛时期。[40]

辛博韦人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基荣古人抵达后，与姆韦内基辛迪勒人结成联盟。姆韦内基辛迪勒人是与一种蛇崇拜相关的一个重要宗教圣地的监护人。的确，似乎是姆韦内基辛迪勒人帮助基荣古人计划并执行了对辛博韦的攻击。基荣古人在姆班德地区实行暴力统治，并逐渐得以建立新的秩序。一旦定居下来，基荣古人通过建立一套以王室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礼仪，对他们的新臣民实施至高无上的统治。基荣古本人并不出席宗教典礼，但他降福于资深官员姆尔瓦，他伴随基荣古来此地区并成为中心负责人。此外，王国的成年人参加每年一次的庆典。庆典上要熄灭所有的火光，然后用来自王宫的中心火焰重新点燃。在庆典期间，人们对基荣古重新宣誓效忠。[41] 通常要求人们向基荣古纳贡，并到王室花园劳动。基荣古和他的官员们通过与当地家族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在基荣古氏族到来以前，当地居民似乎通过神蛇等中介神灵，崇拜上帝。基荣古人把祖先作为中介，以此来崇拜他们的上帝——恩古卢贝，这样就引导并促进了人们对王室祖先的崇拜。随着人们慢慢地接受了祖先崇拜，也接受了对基荣古的神化。于是，基荣古成了祭司国王和与王室祖先交流的使者。对于恩贡德人来说，基荣古就是上帝活的化身，他的健康决定了人们的福祉和繁荣。而且，为了确保臣民的幸福，他被严格地限制在住地。如果基荣古显示出甚至是轻微的病症，便立即会被他的议员们(makambala)闷死。由于在这一地区祖先崇拜深受公众欢迎，因而蛇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基辛迪勒氏族的影响渐弱。

上述情形发生在约1600到1720年间最初的四代基荣古任内。第三代基荣古去世不久。他的儿子姆瓦卡洛西，也是他的继承人，放弃了王位。因为他害怕一旦身患疾病，大臣会杀死他，他也拒绝派人将他的儿子全杀死，仅留一人。采取这两种做法，是为了避免王位争夺。大臣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统治者，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地位不受损害。后来由大臣任命其兄弟马吉莫为基荣古，从而避免了由于姆瓦卡洛西拒绝继承王位可能引发的危机。

卡美美、莫瓦兰比亚和莫舒夸酋邦也同样推行王室祖先崇拜。然而，如同他们的语言

[40] 本章以下的部分以O.J.M.卡林加的著作(1979年a)为根据。

[41] 详情可参见R.J.姆韦帕普(Mwaipape)的“马拉维北部恩贡德人的历史和社会习俗”(手稿于1982年完成，未发表，由作者自己保存)。

一样，他们的观念也变得越来越尼哈人化。但他们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诸如闷死君主，限制其活动，以及杀死王子等事。然而，这些酋邦却是向该地区引进新式政治组织的代表。新组织政教合一，由更有地位与威望者领导，平民间的关系，更多地是基于政治，628 而不是血缘关系。[42]

在恩贡德王国基荣古马吉莫死后，由于他的唯一继承人莫旺宫德年幼难以继位，由此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危机。后来由他的外甥卡西欧姆贝继位基荣古。卡西欧姆贝的父亲是恩达利人，也是卡龙加平原西北角一个小区域的统治者。随着1750年前后卡西欧姆贝的继位，这一新区域被并入扩大了的恩贡德王国。

卡西欧姆贝继位所导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大臣们开始丧失对基荣古拥有的某些权力。卡西欧姆贝在王国北部的恩加纳长大，他坚持要亲自游历王国，并废止了杀害基荣古王子们的习俗。王子人数的迅速增加导致了君主力量的增强。特别是其后几任继任者，如莫旺宫德(约1785至1839年)，向一些王子分配了土地，在整个领地范围内都能感受到基荣古的影响。[43] 勿庸置疑，到1800年，恩贡德王国开始满怀信心在松戈河以南广大区域的国际政治中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

因此，在13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松戈河南部区域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从一个与神蛇崇拜相联系的宗教圣地而形成的早期网络，到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部族体系，最终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建立了若干国家。其中，在北部的国家有乌兰比亚、卡美美、密苏库、翁贡德和姆瓦弗卡-姆万贝尔；在南部有坎延达、卡本杜利，以及卡卢卢玛和楚鲁。在北部，基扬贡德已被恩贡德和尼亚库萨的缔造者们引做一种新语言，而在南部的奇通加语则是经过通布卡和切瓦民族及其语言大融合的结果。通布卡人统治着这一地区的中心地带。他们的原始氏族是卢汉加人和姆坎达韦雷人的不同分支，来自松戈河北部恩达利山的门沙利人后来也加入其中。再向西进入卢安瓦地区，这里的通布卡民族包括佐罗凯雷人、姆瓦文提查人、戈马人等。这些通布卡人族群没有中央政府，其早期历史也难以说明。他们的谱系不深，他们是如何在18世纪以前组织起来的也模糊不清。然而，在18世纪，通布卡国发生了这一地区一系列最重要的事件。这些将在下文讨论。 629

在马拉维王国的势力范围内，随着恩贡德国家的建立，也可看到在卡龙加湖畔发生的种种宗教变化。马拉维国家体系包括前马拉维人或原始切瓦人位于姆辛亚的求雨圣地(今日利隆圭西部)网络。马拉维国家的每一位创建者都试图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圣地实施控制。他们急欲在官员的任命以及提供帮助和保护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他们往往每年要去圣地朝圣。卡龙加和翁迪二人试图用这种方法，获得对姆辛加圣地的控制，在希雷河下游谷地，隆杜则设法对恩桑杰的姆勃纳圣地实行相当程度的控制。各王朝均参加求雨仪式，在神学方面逐渐相互融合。对王室祖先神灵的崇拜开始被接纳，而与南奥流行相类似的完全由切瓦人创造的神话，则在禁止之列。[44]

---

[42] O.J.M. 卡林加，即将出版。

[43] O.J.M. 卡林加，《恩贡德王国史》，第180-250页；和R.J. 姆韦帕普，1982年，第34-41页。

[44] 44.M.J. 肖费里尔斯，1979年b，第152-160页；I. 林登，1979年，第188-193页。

然而，在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宗教变革发生在王朝统治者未能对先前的求雨仪式实行控制的地区。因此，他们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崇拜仪式，与先前的仪式分庭抗礼。这包括王室崇拜，其功能之一是神化王室家族。因此，有人认为此类崇拜与百姓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国王或他任命的官员主持求雨仪式以及其他的仪式。

到18世纪中期，当北方恩贡德忙于内部各派以及宗教机构之间的力量平衡时，马拉维国家体系开始衰落。衰落最明确的表现形式是纷纷脱离或反抗卡龙加、隆杜以及翁迪的最高统治。在今日马拉维中部的利隆圭地区，许多酋长奋起反抗卡龙加。在同一时期，翁迪也遭到毕威及其追随者的反抗。而与此同时，洛洛人与马夸人则在东部奋起反抗隆杜人的统治。[45]

然而，至今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强大的马拉维国家联盟在17世纪陷于衰落。以翁迪为例，在18世纪40、50年代的淘金时期，入侵的葡萄牙人对其政权确实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也有人认为，翁迪和卡龙加政权的削弱，是由于马凯瓦纳控制了中央切瓦人在利隆圭的姆辛加的宗教圣地，越来越不愿用自己的宗教力量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是因630为与"中介者"(svikiro)全心全意为赞比西河南部的姆塔帕国利益服务不同，马凯瓦纳及其属下的求雨者并不总是以增强马拉维人王权地位的方式行使权力。[46]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马凯瓦纳是卡龙加和翁迪王国宗教统一的重要联系人。她们被授权举行宗教仪式，卡龙加和翁迪则利用仪式赐福于其追随者。另一方面，在18世纪，马凯瓦纳宗教以外的志向也得到发展。她们在卡龙加和翁迪两个王国之间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甚至派人袭击了卡龙加的领地。由于马凯瓦纳及其助手属于班达人和姆贝韦人中的原始切瓦人氏族，她们对卡龙加和翁迪的抵抗，或许是为重新实现原始切瓦人氏族自治所做的一种尝试。无论如何，马凯瓦纳的背叛，意味着卡龙加和翁迪两国失去了他们一直通过马凯瓦纳在其追随者身上所行使的神秘的约束力。

最后，18世纪马夸-洛洛人民族意识或称民族主义的出现，证明是隆杜在希雷河东部势力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哈夫金认为，马夸人对权力的意识极强，这令当时观察家们极为惊讶，他们以前低估了马夸人的军事能力。[47] 他们的民族主义首先是针对葡萄牙人。特别是沿海的马夸人反对葡萄牙人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个别葡萄牙人多变的贸易政策。然而，直到他们从法国和巴西的奴隶贩子手中获得了枪炮，马夸人才开始向葡萄牙人发起挑战而不受惩罚。在莫鲁卡和莫里莫诺等强有力的酋长的领导下，马夸人从1749年到18世纪末发动了一场反对葡萄牙人及其非洲同盟者的艰苦的消耗战。由沿海马夸人针对葡萄牙帝国主义向莫桑比克海岸扩张而提出的这次挑战，一定激励着离海岸较远的内地马夸人和洛洛人发动类似的战役，以反对外来人统治。然而，在内陆地区，马夸-洛洛人仇恨的对象与其说是葡萄牙人，不如说是马拉维人。从东部的克利马内到西部希雷河畔的

[45] K.M. 费里，1975年a，第78-79页；A.F. 艾萨克曼(Isaacman)，1972年b，第14-15页。
[46] A.F. 艾萨克曼，1972年b，第15页。
[47] N.J. 哈夫金，1973年，第23-26页。

穆兰巴拉山，马拉维人的最高统治权力开始动摇。[48]

这一时期，我们所讨论的赞比西亚北部民族也深受与外界不断增加的经济联系的影响。[49] 这种联系常常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阿拉伯-斯瓦希里人对东海岸与赞比西河沿岸实行商业统治时期。他们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尤其是16世纪中期他们沿赞比西河沿岸 631 定居之前，商业接触极少。此后，葡萄牙商人经常从塞纳出发，沿希雷河北上航行。他们用进口的布匹、珠子及黄铜器皿，换取曼甘贾人的铁器、马奇拉布匹、食盐以及象牙等商品。葡萄牙人又用一些曼甘贾人的产品，包括铁器和马奇拉布匹，到赞比西河南部的蒙哈姆塔帕人的地盘进行贸易。[50] 沿赞比西河而上，定居在太特的葡萄牙人与翁迪王国以及与远至希雷河上游和马拉维湖南岸地区的马拉维国的腹地建立了商业联系。1716年宗博市场(feira)的建立，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西至赞比亚中南部几个社会的象牙市场。[51] 正是赞比西亚"普拉佐"(prazos)的兴起与不断扩展，对葡萄牙人向赞比西亚北部拓展其商业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许多葡萄牙人或果阿殖民主义者对这块原来属于非洲土著居民的土地上接受政治首领的地位时，普拉佐就逐渐形成了。这一发展过程起源于16世纪末时的塞纳周围地区，并在17世纪逐渐向赞比西河下游谷地的其他地区扩展。[52] 据阿克塞尔森认为，里斯本的王室将普拉佐看成是对杰出的葡萄牙人定居者的恩赐，以鼓励私人对赞比西河谷进行殖民化开发。此外，由于有希望获得土地，许多移民被吸引到赞比西亚地区，他们的到来可促进葡萄牙人口的增长。

在18世纪，普拉佐几乎遍及了东起卢阿波河或赞比西河三角洲，西至太特和宗博两个城镇之间的齐科通道的整个赞比西亚低地地区。获得土地的方式是不同的。一种方式是征服，往往是在白人征服者利用原非洲土地占有者中存在的分歧而获得土地；另一种方式就是提出土地要求，以此作为向当地统治者提供特种服务的补偿。

普拉佐要远大于私人地产，相当于享有管辖权的领地。领地拥有者一般称为"普拉泽罗"(prazeros)，他们"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力，发动战争，强迫纳贡，常常犯下最为野蛮的罪行"。在引起历史学家浓厚兴趣的有关普拉佐的诸多问题中，有两个最为突出。其一是 632 他们与周边非洲政体间的复杂关系，其二是他们对赞比西亚北部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

普拉泽罗因野蛮虐待其周围自愿作为侍从或是被征服的臣民的非洲人而臭名昭著。此外，他们大都与周围的非洲人政体建立了外交和军事关系，明确地带有利用其人力资源的目的。以奇昆达人为例，他们被从赞比西河南北两岸不同的非洲社会招募而来，并作为

---

[48] A. 丽塔-费雷拉(Rita-Ferreira)，1966年，第34页；E.C. 曼达拉，1977年，第43-44页；和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104-113页。

[49] E.A. 艾尔珀斯对此课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评论，1975年a，导言。

[50] G.M. 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480-481页；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25-27页；E.C. 曼达拉，1977年，第41页。

[51] N. 萨瑟兰-哈里斯(Sutherland-Harris)，1970年，M.D.D. 纽伊特，1973年，第75-79页；T.I. 马修斯(Mathews)，1981年，第23-31页。

[52] 关于这一过程的充分讨论，参见A.F. 艾萨克曼，1972年b；M.D.D. 纽伊特，1973年；和E. 阿克塞尔森，1960年。

侍从，为普拉佐领主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普拉泽罗从马夸人、曼甘贾人、塞纳人、卡兰加人、通加人、塔瓦拉人以及恩森加人和通布卡人等民族那里获取劳动力。[53]

普拉泽罗对象牙及黄金贸易的兴趣，使他们在北赞比西亚地区的商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使用奇昆达人侍从(vashambadzi)中的一些人作为中间人，他们与该地区的曼甘贾人、切瓦人、恩森加人以及伦杰人和南部隆达人等不同的非洲民族建立了贸易联系网。他们的贸易商队用进口的棉布、珠子、黄铜器皿、酒类饮料以及食盐等物品向这些内陆人换取铜、象牙、蜡和奴隶。从大约1740年起，普拉泽罗涉足开采赞比西亚北部尤其是翁迪王国境内的金矿以及黄金兑换业务。还在米冲加、马阿诺(翁迪首都)、加瓦和莫钦加等地开矿(pares)。来自太特的葡萄牙人或果阿人采矿者坚持对矿山及所有主要生产资料拥有绝对的所有权。作为对获得这一特权的回报，他们向翁迪及其手下赠送象征性的礼品，并交纳开采权使用费。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下，他们每年开采大约100公斤(3500盎司)黄金，直到18世纪80年代黄金供应开始衰落止。[54]

对普拉泽罗以及赞比西河畔的整个葡萄牙人社团来说，不幸的是这股淘金热导致他们失去了对象牙的贸易。这些矿山对于人们的吸引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实际价值。与此同时，逐渐增长的象牙贸易却陷人了北方象牙市场其他竞争者手中。他们就是尧人——一个与中部非洲东部长途贸易的发展有着独特联系的民族。

17世纪后期及18世纪初期，尧人就以在贸易上占主导的面目出现。对于他们是如何达到这种地位和状态的，有两种相关的解释。阿卜杜勒·谢里夫认为，尧人面向沿海范围的贸易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尧人可能对商业影响的反应是极为单纯的，因为首先影响的是他们的邻邦——恩金多人和马夸-隆韦人，他们比尧人更靠近海岸。近来，韦伯斯特提出，使尧人对与沿海的贸易做出如此回应的原因在于，他们居于一个多丘陵地带的边际农业国度，耕地与狩猎均难以成功。而他们东邻的尼扬贾人和切瓦人以及西邻的隆韦人则分别是农业种植与狩猎能手。[55]

633

根据尧人的口头传说，正如约哈纳·B.阿卜杜拉所记载，奇西人的铁匠率先进行了对沿海的贸易。奇西人被认为是依赖他们的打铁技术，并利用当地的铁器贸易维持生计。因此，尧人的国土可能一度曾是丰富的铁器商品供应地。奇西人带着铁器商品远走他乡，后来与沿海地区建立了联系。随着这种联系的不断深人，在1635至1698年间建立了稳定的基尔瓦象牙市场，尧人商业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在征服了北至马林迪的东非沿海之后，葡萄牙人进人了与沿海各城市进行和平的商业交往阶段。基尔瓦因此吸引了内地的许多生意。由于阿曼人与葡萄牙人的冲突，1698年以后，基尔瓦的象牙市场日趋衰落。尧人在莫桑比克岛对面的莫苏里尔发现了一个交易市场。商贸似乎已成为尧人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情况需要，尧人带着他们的象牙往返在莫桑比克或基尔瓦的商路上。[56]

---

[53] A.F.艾萨克曼，1972年a。
[54] A.F.艾萨克曼，1972年b，第70-71页；和M.D.D.纽伊特，1973年，第79-84页。
[55] A.M.H.谢里夫(Sheriff)，1971年，第208-217页；和J.B.韦伯斯特，1977年，第3-6页。
[56] E.A.艾尔珀斯，1975年a，第58-62页，第70-81页；J.B.韦伯斯特，1977年，第7-10页。

在他们家园的西部内陆，尧人在马拉维地区有着丰富的象牙来源。此外从大约 1750 年开始，他们就从赞比亚东北部的比萨人那里接受更多的象牙，再转送到基尔瓦，以供交易。与尧人进行交易的比萨人从此开始了其企业家的商业生涯，为隆达国王卡曾贝服务，而位于卢阿普拉河畔的卡曾贝国王的首都成了商人东西海岸来往的固定中转站，最迟至 1775 年，比萨人在该地区就已获得了最具商业头脑的民族之一的声誉。[57]

对于比萨人来说，贸易可能弥补了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软弱。在农业方面，他们占据着一块位于卢阿普拉河和莫钦加地区之间的边际土地，耕种无利可获。政治上，他们陷入了隆达和奔巴两个王国扩张势力的包围之中。因此，商贸和旅行就成为其进一步谋求发展的重要机会。在商贸和旅行过程中，比萨人在赞比亚东北部的卢阿普拉河地区与东海岸之间开辟了许多新的商道。在 1790 至 1830 年间，他们也对发展隆达王国与赞比西河沿岸的葡萄牙人之间的商业进行了尝试。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比萨人起了中间人的作用。他们从中部非洲内陆的不同地方获取象牙、铜和奴隶，并将这些商品运到沿海或赞比西亚定居 **634** 区，用以交换布匹、珠子以及枪枝火药等商品。

比萨人与东海岸的贸易结果之一，是他们自己的定居点开始向东迁徙，进入卢安瓜河谷及更远的地方。迁徙的最初动力是躲避饥荒以及希望发展在卢安瓜河谷及马拉维湖的象牙贸易。这样，到 18 世纪 60 年代，比萨人在卢安瓜河谷建立了一些村庄。到 18 世纪末，在中部马拉维的西部地区也出现了比萨人村庄。比萨人社区的东移在 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不断加强，当时，奔巴王国不时袭击他们在莫钦加地区的定居点。[58]

因此，至少在 18 世纪的后 40 年间，比萨人已经与他们东面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尤其是他们在切瓦人中的存在，是包括姆瓦斯．卡森古和姆坎达等酋长势力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比萨移民富于冒险精神，与当地臣民相比，他们更忠于统治家族。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金矿开采失利以及象牙贸易转入尧人和比萨人之手两个因素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奴隶贸易。由此导致 18 世纪后期赞比西河以北的长途贸易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该地区可以出口的主要贸易商品——奴隶开始取代了象牙。这种变化尽管不是很彻底，但也足以说明 18 世纪为象牙贸易，19 世纪为奴隶贸易。参与奴隶贸易的葡萄牙人在 18 世纪 80 年代表现尤为突出。那时，从赞比西亚北部运来的奴隶出口到印度洋的法属殖民地留尼汪岛和波旁岛。[59]

由于奴隶贸易比象牙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尧人和比萨人随后也加入了葡萄牙人的奴隶贸易行列。阿卜杜拉认为，尧人转向奴隶贸易是由于沿海需要更多的奴隶，而不是象牙。确实，18 世纪 70 年代以后，基尔瓦作为尧人销售内陆商品的市场，开始为奴隶贸易所充斥。[60] 当时已初具市场意识的尧人，很有可能在其内陆来的商队中，用奴隶取代了象牙。

---

[57] F.M. 托马斯(Thomas)，1958 年，第 26 页；R.F. 伯顿(Burton)，1873 年，第 95 页；J. 范西纳(Vansina)，1966 年 a，第 171-172 页。

[58] A.C.P. 加米托(Gamitto)，1960 年，第 55-56 页，第 161-192 页；A.D. 罗伯兹，1973 年，第 104-167 页。

[59] R.F. 伯顿，1873 年，第 81-87 页；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201-19 页；A.F. 艾萨克曼，1972 年 b，第 85-94 页。

[60] Y.B. 阿卜杜拉，1973 年，第 29-37 页；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Freeman-Grenville)，1965 年，第 43-48 页。



图片21.3 通布卡人的炼铁窑(ng'anjo)废墟。通布卡人是有名的炼铁者，只有马拉维湖东面的潘格瓦人可与之相比



图片21.4 通布卡人制造的铁锄。图中所示是20世纪40年代在马拉维北部姆津巴区的维皮亚山区制造的

整个北部地区被拉进了这一长途贸易网络之中。尽管马拉维湖周围以及从通布卡地区到恩森加兰和北切瓦人地区内，地方贸易非常兴旺，但直至18世纪早期，该区域还没有卷入这种长途贸易。在18世纪头40年里，通布卡地区与一个从西北的加丹加延伸到东部的基尔瓦的贸易网络相连接。"巴罗沃卡"(balowoka)对这一变化负有责任。所谓巴罗沃卡，即"渡湖者"，指那些渡过马拉维湖，用三四十年的时间抵达该地区的家族的头人。

在所有这些后来者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卡喀拉拉·莫塞维拉·冈德韦。他极有可能是深

受尧人影响的尼扬韦齐人，并一度参与了对东海岸的贸易。为了寻找象牙，冈德韦在奇隆巴渡过马拉维湖，并在卢安瓜河谷附近的恩卡曼加平原定居下来，当时这里是大象出没的地方。他与卢汉加氏族头人奇伦丹亚·卢汉加建立了联系。卢汉加很喜欢他带来的珠子、贝壳(mphande)和布匹等物品。后来，冈德韦与卢汉加及其他有影响的家族联姻，从而与通布卡人社会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为了充分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他将与他样式相同的头巾分发给各地的头人，以此作为从他那里获得权力的一种象征。[61] 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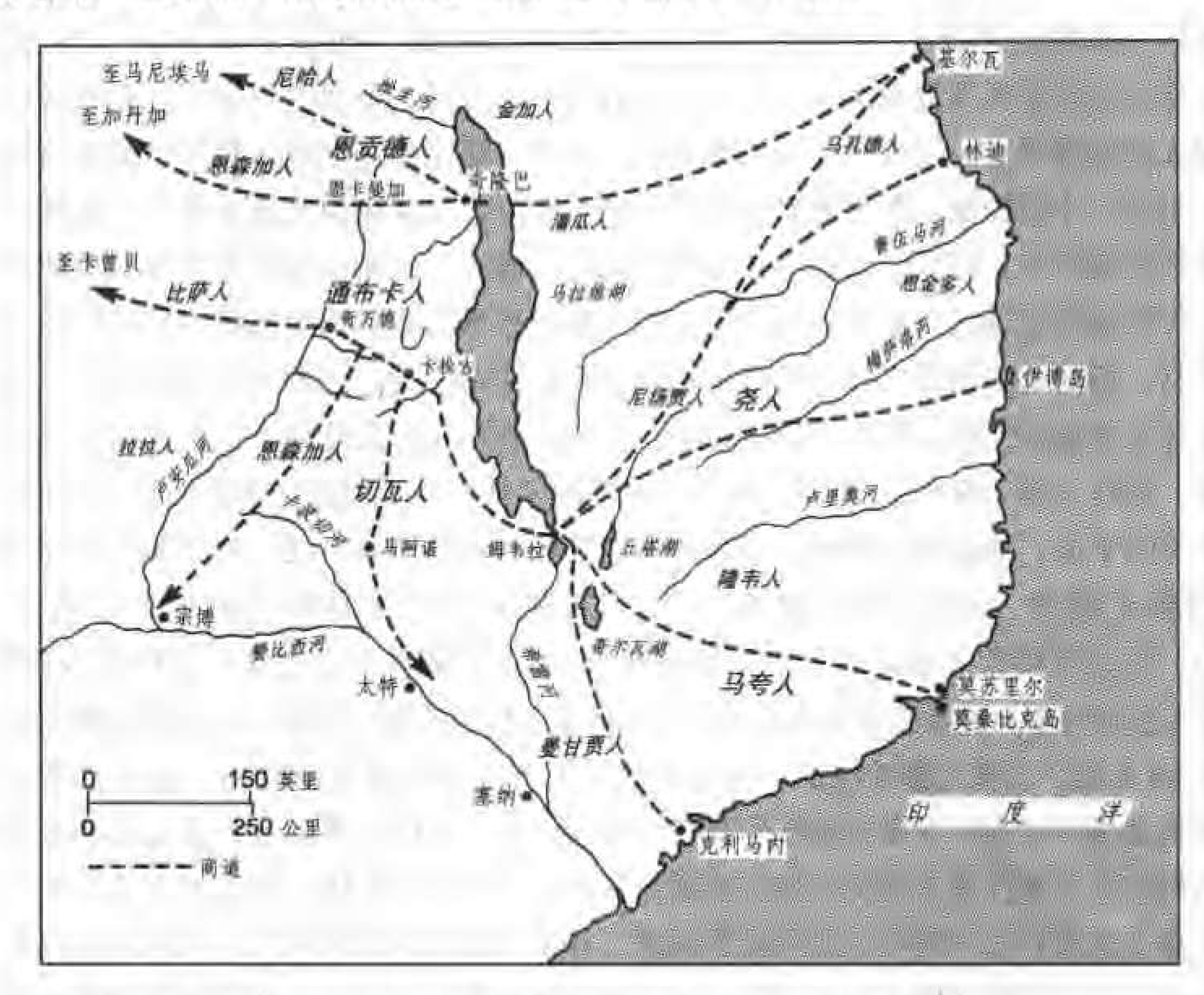


插图 21.4 18 世纪中非东部的象牙贸易商道(仿照 E.A. 阿尔珀斯图，UCLA)

来自马拉维湖东部的其他移民家族，在与恩卡曼加邻近的地区安家落户。在那一区内(即今日的赫韦)，卡通比·莫林达夫瓦·查宾加开始组织一个与冈德韦相比规模虽小但生存能力更强的国家。他也来自尼扬韦齐领地，也是从奇隆巴渡过马拉维湖。但与冈德韦不同的是，他进入了与密苏库山相毗连的山地和恩依卡高原，并在恩塔利尔的奇戈马定居下来。[62] 他也像冈德韦那样，将头巾分发给地方头人，以此作为对其权力的认可。卡通比将其贸易联系从奇戈马向西扩展到象牙丰富的卢安瓜河谷的马兰博。其后，他的子孙又向南迁移了数公里，来到现在的赫韦，即当时欧洲人到来时的国家中心所在地。 637

另一位商人名叫卡通翁戈·莫亨加，其祖籍在乌贝纳-乌赫赫地区。他在冈德韦和卡通比定居后不久，渡过了马拉维湖。卡通翁戈并不是与冈德韦、卡通比同等意义上的商人。

---

[61] 这一部分受益于 H.L. 韦尔，1972 年 b，1974 年；和 H.K. 穆西斯卡，1978 年 a。

[62] 恩塔利尔国在 18 世纪某一时期由来自坦桑尼亚南部的卡万加人建立。他们身为猎人，靠结婚成为卡龙加人中的基柴古人，是他们建议应在后称为恩塔利尔的地方定居。

他只是在寻找可供他及其家族定居之地，后来在亨加峡谷找到。卡通翁戈有多种手艺，他是个猎手，也擅长制作装饰手镯，而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制盐。他的制盐技术被证明是大有用处的，他不久便控制了卡蒙贝的高品质盐池。卡通翁戈也与当地的一些家族，如门沙利、姆祖马拉以及姆坎达韦雷等联姻。这些家族中，有些在亨加峡谷中根基很深。卡通翁戈也逐渐开始影响一方，成为著名的莫瓦亨加，即亨加地区的拥有者。他与姆瓦弗卡·姆贝尔的下属以及冈德韦手下的恩曼加人都有贸易往来。[63]

尽管莫塞维拉·冈德韦、卡通比·莫林达夫瓦·奇宾加以及卡通翁戈·莫亨加三个移民家族统治了松圭河南岸大部分地区以及卢安瓜河谷东部的贸易，但对他们来说，长期维持现状彼此间无冲突很困难。冈德韦尤其感到恐惧，因为卡通比控制了进入象牙资源丰富地区的通道。另外，不说控制，如果能自由使用奇隆巴渡口，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将其象牙运往东海岸。因此，冈德韦在卡通比死后，卷入了一场王位继承纷争。他成功地推举了一位软弱的候选人出任酋长。然后，他与莫瓦亨加商定并做出安排，后者同意不阻碍他的贸易，而冈德韦则赠以布匹及其他值钱的商品作为回报。冈德韦与亨加峡谷东部的统治者也作了类似的安排。这些统治者包括：莫瓦夫利尔瓦、莫旺洛韦、莫万库尼基拉以及卡楚鲁。因此，到1800年，冈德韦可以声称垄断了从卢安瓜河到马拉维西岸之间的贸易。在恩卡曼加平原，他获得了政权，并因此得以扩张其贸易帝国。这一帝国的奇库拉马约姆贝人得到了援助，因为主要是穆西斯卡人、可能来自翁亚姆维兹的恩依任达人以及商人的一些家族接管了姆瓦弗卡统治地的政权，结束了姆贝尔人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位于恩卡曼加与亨加峡谷和奇隆巴渡口之间的弗卡人国家长期以来就与当地贸易紧密相连。

638

在18世纪，马拉维湖东侧的一些家族建立了若干规模较小的政体。这些政体的奠基人许多都是像冈德韦、卡通比那样的象牙贸易商。在翁贡德的正南方，莫瓦夫利尔瓦家族在曾由姆坎达韦雷氏族占据统治地位的地区，建立了夫利尔瓦国。莫瓦夫利尔瓦的一个亲戚——莫文达孟基拉·姆萨尼·凯拉后来西进，并最终定居在距离莫瓦夫利尔瓦山以西几英里的兹邦贡贝。他们征服了属于尼哈人一支的当地土著辛瓦卡人，并开始缔造温亚国。至18世纪末，温亚国已向北扩张到乌兰比亚的南部边界。大约在同一时期，温亚国的西南地区落入了莫罗沃卡家族的莫高高人之手。该地区，亦即乌云贝，成为今日赞比亚伊索卡地区的一部分。乌云贝盛产大象，在其后的数十年中，该地因猎手如云而久负盛名。莫高高与较早建立的政体奇丰韦和乌坦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该地区靠近卢安瓜河源头，也盛产大象。

其他一些家族也渡过马拉维湖进一步南进，并在距离现在的恩卡塔贝“波马”（boma）不远处定居下来。他们中有当代曼坎比拉人的祖先。他们是猎人，并在18世纪20年代一度离开家园。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马拉维湖西岸能找到大量象牙所吸引。他们取代了费里统治者，并经过一代人的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家族。[64]

因此，在18世纪，通布卡地区首先被象牙猎人所统治，然后是商人统治，他们对财

---

[63] O.J.M.卡林加，1979年b。

[64] 这一段部分根据O.Y.凯拉(Kaira)，1970-1971年；和J.B.C.恩科马(Nkhoma)，1978年。

富的控制导致了对政权的僭越。政治上分权让位于商人首领的权力统治。猎人和商人都选中这一地区，是因为成功的商贸需要某种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在北方国家是不可能的。在通布卡人卷人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北方国家始终置身于长途贸易网之外。在18世纪，马拉维帝国分崩离析。通布卡-切瓦人南部边缘国家得以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然而，即使是在坎延达这样的酋邦里，往往伴随象牙贸易而来的分裂倾向开始显现，后逐步发展，最终导致曼克汉比拉霸权在该地区的建立。1800年以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带着对其灾难性后果的不安，无一例外地被深深卷人象牙贸易以及后来的奴隶贸易的商业时代。

本卷的起始时期与这一地区的历史分期并不吻合。南部地区的历史年代开始于约1400 639 年马拉维人的到来之时。北部地区则伴随着恩古卢贝人的迁移，起始于约1600年。然而其终止年代却是适当的，因为在19世纪，整个区域的史学研究为新的主题所贯穿。它们包括从象牙到奴隶贸易的转变以及这一地区各地都卷入了被外界所操纵的商业中来，一系列尧人酋邦在前马拉维统治地区的发展，以及许多新的民族——恩古尼人、斯瓦希里人、科卢洛人和欧洲人的到来。尽管他们来此的动机全然不同，但最终都在寻求掌握政权。

（刘乃亚 译）



赞比西亚南部地区

H.H.K. 比拉

640 有关1500至1800年期间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记载很少。我们不得不主要依赖16世纪初进入该地区的葡萄牙旅行家和商人的描述。因而，本章将着重探讨三个政体，即著名的姆塔帕、罗兹威以及东绍纳三个国家。姆塔帕和罗兹威两个政体是从大津巴布韦文化(1200-1450年)演变而来，其起源和发展另章叙述。①

从15世纪中叶开始②，大津巴布韦渐趋衰落。衰落的原因与当时津巴布韦高原的黄金产量减少有着密切关系。根据葡萄牙人所提供的资料，大津巴布韦的衰落，首先导致了名不见经传的"托尔瓦"或称"布特瓦"国家的诞生。③ 它的第一个首都位于卡米，第二个首都在达南贡贝。④ 第一个首都可能创建于15世纪中叶，在17世纪下半叶被焚毁。⑤ 从其建筑及出土的陶器看，托尔瓦国是大津巴布韦的一个复制品。第二个首都较第一个要小得多。获得的考古证据说明了两点：第一点是托尔瓦国显赫的石头建筑，几乎都是建于1650年以前；第二点是在17世纪90年代吞并了托尔瓦国的罗兹威昌加米腊王朝几乎没有什么有名的石头建筑。⑥

大津巴布韦衰落后的第二个重要的政治发展是姆塔帕帝国的出现。到16世纪初，姆塔帕帝国已控制了高原地区肥沃的农田和"赞比西河谷一块可控制部分商道的土地"⑦ 姆641 塔帕帝国包括操卡兰加语的诸多民族。从理论上看，这个帝国从赞比西河南部边缘一直延伸到印度洋，但实际上，姆塔帕统治者在高原地区以外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有证据表明，马尼卡、犹特马、巴尔韦和丹达王国是在16世纪从帝国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的。然而，在17世纪后期敦博·昌加米腊兴起之前，他们继续举行其仪式，并行使纳贡义务。⑧ 证据虽然不够充分，但在敦博·昌加米腊兴起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叛"王国似乎继续向姆塔帕统治者纳贡。有一种观点认为，在18世纪，甚至昌加米腊人也偶尔向姆塔帕皇帝进

①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21章。

② P.S. 加莱克(Garlake)，1973年，I.R. 菲米斯特(Phimister)，1974年和1976年，T.N. 赫夫曼(Huffman)，1972年。

③ P.S. 加莱克，1982年，第30-31页。

④ 同上。

⑤ D.N. 比奇(Beach)，1984年，第26、82页，注60，61。

⑥ 同上，第27页。

⑦ 同上。

⑧ 瓦斯科·费尔南德斯·霍门致鲁斯·达·西尔瓦，引自E. 阿克塞尔森(Axelson)，1940年，第269页。

贡。[9] 然而，罗兹威的进贡者受到与国王的使节相当的礼遇。[10] 在赞比西河下游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通加和塞纳统治者成功地抵制了姆塔帕统治者对他们行使政治霸权的企图。以上情况使姆塔帕帝国仅限于丹德与奇迪马之间的中心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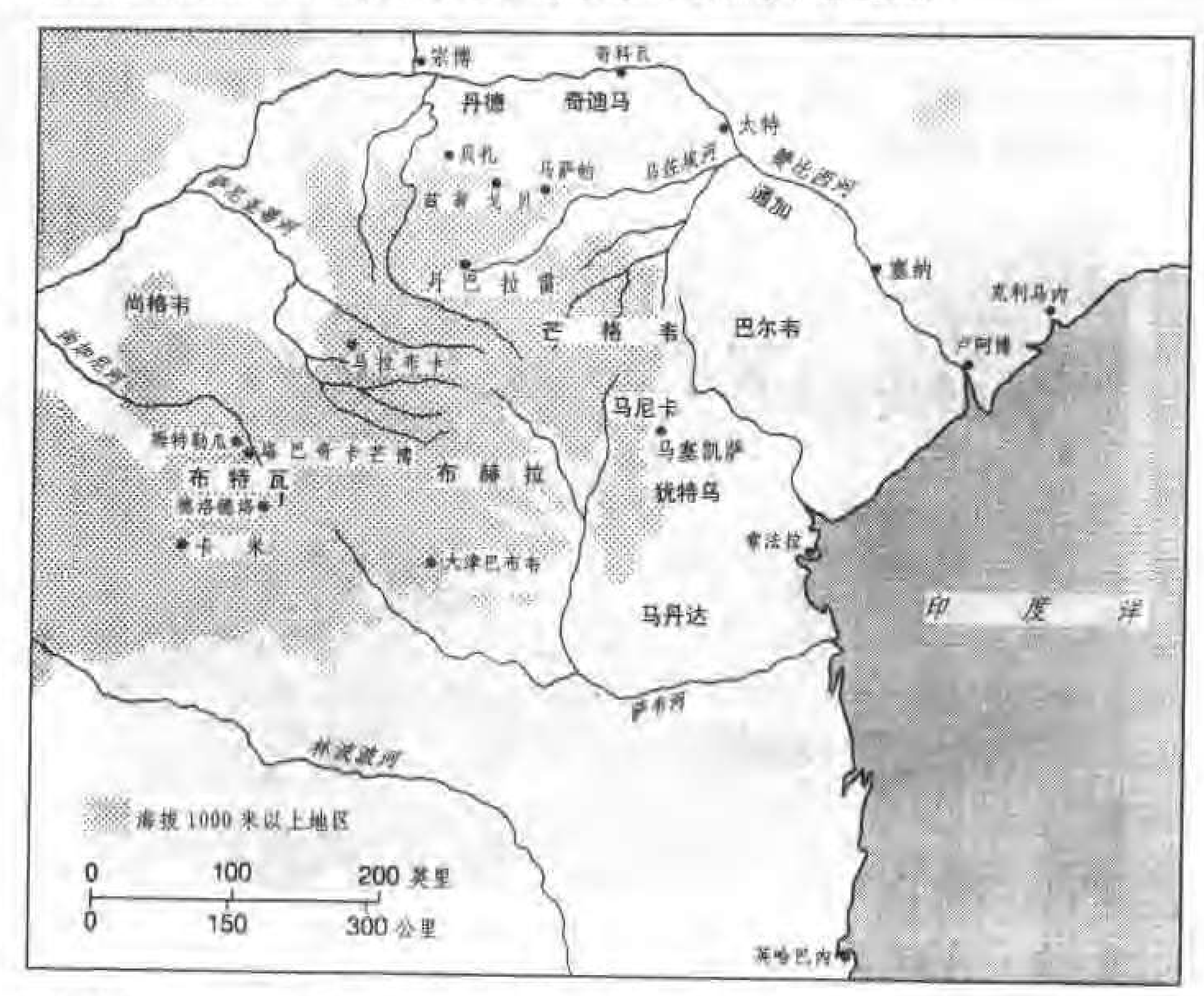


插图 22.1 姆塔帕和托尔瓦诸国时期的中部和东南部非洲

资料来源：根据 S.I. 姆登杰所著《蒙哈姆塔帕的政治史，约 1400-1902 年》（津巴布韦出版社，哈拉雷，1988 年）与《津巴布韦的史诗》（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出版，哈拉雷，第 47 页）改编。

在姆塔帕帝国，建立显赫的石建筑的习惯可能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一些早期的废墟，642 尤其是兹翁戈贝建筑群代表了姆塔帕统治者早期首都的风貌。其后的首都均有数米高的围栏。安东尼奥·博卡罗生动地描绘了 17 世纪 20 年代姆塔帕的首都及其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根据他的描述，当时的首都：

> 很大，有许多房子，围着高高的木栅栏。里面有三处寓所，一处是王后住的，另一处是为侍候国王的仆人们准备的。偌大的庭院开着三扇门：一扇门是为王后开的，除女子外，男人不得通过；另一扇门通向厨房，仅供他的厨师出入。厨师是两个青年人，来自王国的王公贵族，是国王最为信赖的亲戚。在厨房服务的伙计也是贵族，年龄在 15 至 20 岁。他们将食物摆放在地毯或席垫上，用薄纱布盖上，以供国王想吃时取用。各种各样烤的或煮的肉食摆在国王面前，有母鸡、鸽子、鹧鸪、阉鸡、羊、鹿、野兔、家兔、牛、鼠等各种野味。国王吃过后，便赐

[9] L.F. 德卡尔瓦洛·迪亚斯（de Carvalho Dias），1954 年。
[10] 同上。

给仆人，他们总是靠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为生。[1]

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姆塔帕失去了对高原的直接控制。帝国的中心移向了与宗博和太特交界的赞比西河南部低地。在政治上失去控制是始于1629年的长期分裂过程发展的极点，当时葡萄牙人打败了玛穆乌拉·姆塔帕，[2] 随着姆塔帕政体的最终消亡，分裂过程于1917年结束。姆塔帕国的衰弱致使邻近及远处的绍纳人群落将其土地据为己有。从赞比西河下游分出的布德雅人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结果，姆塔帕统治者邀请其他族群来



图片22.1 马滕代雷地区的废墟



图片22.2 姆托科式废墟

① A. 博卡罗(Bocarro)，引自G.M. 蒂尔(Theal)，1899-1902年，第3卷，第356-357页。

② G.M. 蒂尔，1899-1902年，第5卷，第290-292页。

帝国的中心定居[13]

从行政方面来看，帝国在首都、行省以及村落三个层次上实行控制。姆塔帕向村落及行省的首领授权。然而，那些任职的官员，其性质随着姆塔帕政权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在帝国的早期时代，只有姆塔帕的亲属才被授权行使对行省及村落两级的管理。由一位王子和王位继承人管理丹德的土地，这已成了一种惯例。他被称为大尼范耶(nevanje)，他下面 **643** 的另一个王子被称为小尼范耶。后者在王位的继承上，名列其后。[14] 除了王室成员外，那些在征服过程中出过力的人，虽与姆塔帕无亲属关系，也被授予了权力。在17世纪，姆 **644** 塔帕统治者渐渐感到统治地位安全无虞，于是也就更有信心。他们允许村落及行省选举自己的领袖。在首都，姆塔帕统治者得到高层官员的辅佐，这些官员也因此而被赐与土地。皇帝的妻妾也都被指定负有特别的职责。[15]

信仰及行政控制的方法

姆塔帕操纵若干机制，控制着整个帝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领地的首领每年必须用姆塔帕王室的原始火种，重新点燃王家火焰。[16] 这是对中心权力重新表示效忠的活动。每年，姆塔帕统治者都要向各领地的首领发出命令，熄灭各地的王家火焰，并立即到姆塔帕王宫取火种重新点燃。在新的姆塔帕统治者登基时还要再次举行这一效忠的仪式。在姆塔帕统治者死后，各领地首领受命熄灭王家火种，直到选出新的统治者才能够重新点燃熄灭之火。

如果不履行这一仪式，将被视为反叛行为，并相应受到严厉惩罚。惩罚由一支高效率的军队执行。[17] 军队的人数各种说法不同，如“战斗部队有1万人”，在16世纪，正规军有3万人，而到18世纪，仅有3000人。[18] 这些数字表明，在帝国衰落以前，姆塔帕统治者能调动许多农民为此参军，但在18世纪，当帝国陷人衰败及混乱之时，便无力这样做了。由当代葡萄牙观察家提供的这些统计数字，是极不可靠的。

姆塔帕也通过在君主与灵媒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利用宗教控制臣民。而掌握灵媒的，要么是皇帝祖先的神灵，要么就是“土地原主人昔日的代表”。[19] 除其他职责外，帝王还要代表国家，与强有力的先王保持紧密的联系。国王要抚慰民族的灵魂并代表臣民调停。拜谒王室陵墓的制度也强化了帝王的形象和威望，最终达到对其臣民控制的目的。在重大的军事远征之前，皇帝都要拜谒祖先的陵墓。

土地的拥有者，如兹瓦古鲁，是姆塔帕王室的求雨者和礼仪官。这种宗教制度为各级 **646**

[13] D.N. 比奇，1980年a，第164-165页。

[14] W.G. 兰德尔斯(Randles)，1979年，第58页；A.P. 德米兰达(de Miranda)，引自A.A. 安德雷德(Andrade)，1955年，第307-308页。

[15] 同上；A. 博卡罗，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356-357页。

[16] G.M. 蒂尔，1899-1902年，第1卷，第96页；第3卷，第130页；第6卷，第170页。

[17] 瓦斯科·费尔南德斯·霍门致鲁乌普·德西里维亚，引自E. 阿克塞尔森，1940年，第274页。

[18] W.G.L. 兰德尔斯，1979年，第60页。

[19] T.O. 兰格(Ranger)，1979年，第19页。

管理层所效仿。宗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机制，在农业为经济主导的地方，情况尤为如此。皇帝参加求雨仪式被看成是帝国经济繁荣的关键。确实，姆塔帕皇帝为祖先举行“月



图片 22.3 18 世纪姆塔帕的一幅雕像，反映了这位帝王的富有、荣耀和权力

度新月"舞蹈表演。[20]；每年举办盛大的宴会，安抚他祖先的英灵。此外还提到乐师，"他们唤醒神明为人类普降甘霖"。[21]



图片 22.4 姆辛比拉式废墟

因此，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为政治控制起了关键的作用。确实，灵媒比帝王享有更高的地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过去甚至直至今日，一直被称为"狮子"（mhondoro）。他们的作用是在国家的所有事务中，为皇帝提出建议。[22]

最常见的政治控制方法是进贡。姆塔帕皇帝以农产品的形式征集贡品。贡赋也可以是狮子或豹子皮、鸵鸟羽毛、大小家畜、动物的胸肉以及大象死后砍下的长牙。[23] 交纳贡赋也可通过出租劳力的方式，乔安·德·巴洛斯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647

> 每30天中有7天时间，全体官员和王室的仆人以及军队首领都必须带领部下在皇帝的田里耕作或从事其他劳动。由皇帝赐予土地及家臣的贵族，同样获得他们的劳动。有时皇帝想得到特殊的服务，便派人到采金的金矿送去一两头牛，按人头分发，以示皇帝的爱民之心。而作为回报，每个人交出一点黄金，价值达500雷斯。在市场上，商贩们付出一定数额即可免除徭役。那些未支付者不一定被罚款，但他们不得在奔诺姆塔帕面前出现，而这被认为是极大的耻辱。[24]

劳力出租也为家臣统治者所采用，方式各不相同。在犹特乌，他们不再派人去皇帝的

---

[20] R. 格雷(Gray)和S. 马克斯(Marks)，1975年，第388页。

[21] 同上。

[22] 无名氏，1890年，第223页；D.P. 亚伯拉罕(Abraham)，1969年；G.K. 加伯特(Garbett)，1965年；另见E.G. 帕林德(Parrinder)，1967年，第61页。

[23] J. 德巴洛斯（de Barros），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1卷，第10篇，第1章；J.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篇，第15章；A.P. 德米兰达，引自L.F. 德米尔瓦洛·迪亚斯，1954年，第7卷，第135页。

[24] G.M. 蒂尔，1899-1902年，第6卷，第271页。

田里干活儿，而是在村落或小村子里“为国王大面积种植高粱；每年，该地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在田里劳动数日，这是预先定好的……”。然而收获则由“一批专门人员”去完成。[25]

当新矿开工时，姆塔帕统治者通常派信任的代表去征收贡赋。采矿人既要为收贡官员建造住所，也要为贡品设立遮篷。交纳的贡赋为“每个采金人每天往返金矿与水源一次的产量”。[26] 正如下文所要指出的那样，矿产品的采掘，尤其是采金，需要在河流及池塘中淘洗 。纳贡体制的性质直至20世纪早期姆塔帕政体覆灭，才发生变化。

可以认为在当时对广大边远领地的酋长不可能实行严密监督的情况下，对于维持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各种控制机制只是取得部分的成功。军队无法有效地对付帝国广大边远地区的反叛，内部的政治阴谋被葡萄牙人所利用，以及彼此间的内战都说明姆塔帕帝国正逐渐走向衰亡。

648 葡萄牙人因素

尽管葡萄牙人在1506年便到达了索法拉，也仅是从1550到1630年他们才真正试图获得对姆塔帕帝国的控制权。在1540年以前，葡萄牙人和绍纳人间的贸易一直是在非正式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到1540年，葡萄牙商人与姆塔帕统治者及其臣民的商业关系，已经合法化。[27] 这是由于在姆塔帕王宫建立了以一名称为盖茨上尉的军官为首的葡萄牙外交贸易使团。他被葡萄牙商人选为使团终身团长，但对他的任命还须得到姆塔帕皇帝的确认。他的主要职责是向姆塔帕皇帝转达葡萄牙商人赠送的礼品以及他们的要求和不满，反之亦然。[28] 葡萄牙人社团和姆塔帕统治者之间主要是纳贡的关系。上交的贡品叫做“库尔瓦”(curva)。在莫桑比克，葡萄牙要塞的每一位新任长官——

> 有责任在其任职的三年里向莫诺姆塔帕交纳价值3000克罗查多的布匹和珠子。他在任期内可以向包括基督徒和摩尔人在内的所有商人开放其土地，因为他们进行贸易的布匹都是从上述长官那里获得的；而且从这些河流出口的绝大部分黄金也都进了莫桑比克长官之手。[29]

作为对商人纳贡的交换，姆塔帕皇帝同意给商人以进出自由，以及在全国各地出售他们的布匹和珠子。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乔安·多斯·桑托斯的经历，当时：

> 从未听说过卡菲尔盗贼在路上袭击或抢劫葡萄牙人，除非是莫诺姆塔帕亲自下令。他有时因受到或佯称受到葡萄牙人伤害，就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报复，尤其是新任驻莫桑比克的长官没有纳贡，或本该在当年交付布匹却拖延到第二年。[30]

---

[25] J. 多斯·桑托斯，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7卷，第2篇，第15章，第222页。

[26] W.G.L. 兰德尔斯，1979年，第66页。

[27] J. 多斯·桑托斯，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9章；蒙克拉洛神父(Fr. Monclaro)引自G.M. 蒂尔，1899年-1902年，第3卷，第186页。

[28] J. 多斯·桑托斯，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71页。

[29] J. 多斯·桑托斯，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71页。

[30] P.B. 德雷曾德(de Rezende)，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414、427、429页。“库尔瓦”(Curva)的价值以每三年15,000或16,000“克鲁扎多”(Cruzados)计。这似乎有些夸大。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命令在他的帝国内无偿地没收所有商品。这种情形在1610年就出现过。当时盖奇·卢塞尔宣布对商人的商品实行强制充公（mupeto），结果导致了对葡萄牙商人的抢掠和杀戮。[31] 此外，除了葡萄牙长官向姆塔帕皇帝交纳贡品外，葡萄牙国王和斯瓦希里-阿拉伯的商人须将运进帝国的每20块布匹中的一块，作为贡品献出。[32] 除了广为流通的布匹和珠子外，姆塔帕皇帝还从葡萄牙人那里收集了许多进口的奢侈品，如丝绸、地毯、玻璃器皿、陶器等。皇帝用这种捐赠并通过庇护制度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649

这种纳贡关系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下半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那时葡萄牙人已开始赢得对姆塔帕统治者的控制。这是葡萄牙人于1569和1575年期间在赞比西亚南部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33] 当时，他们在东部犹特乌和马尼卡两个王国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经过几次战斗，葡萄牙人于1575年与犹特乌国王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驻索法拉长官及其继任者每年向特乌统治者交纳200块布匹作为贡赋。[34] 作为交换，葡萄牙商人自由进人马尼卡王国，因葡萄牙人误以为马尼卡有丰富的黄金，这一点为后事所证明。此外，居住在索法拉要塞的葡萄牙居民也可沿索法拉河自由进人内地，购买生活必需品。就姆塔帕皇帝而言，取道犹特乌前往马尼卡的每一位葡萄牙商人必须将运进王国的每20块布匹中的一块作为税收交给特乌统治者。而“与葡萄牙人进行布匹、珠子以及其他商品贸易”的非洲商人，则要求“每20块布匹交出三块给国王”。[35] 不清楚为什么非洲商人要比葡萄牙商人付出更多，但很有可能是防止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从而向国王的政治权威提出挑战。1573年，葡萄牙人与马尼卡国王缔结了类似的条约。[36]

这一有限的成功诱使葡萄牙人进一步侵人姆塔帕帝国。1590和1607年间在帝国爆发起义，为葡萄牙人探索姆塔帕帝国政治的复杂性提供了机遇。姆塔帕统治者盖奇·卢塞尔求助于葡萄牙人并与他们签署了军事援助条约，盖奇·卢塞尔答应割让帝国所有的金矿、铜矿、铁矿、铅矿以及锡矿作为交换条件。[37] 尽管葡萄牙人缺乏开采这些金属矿藏的技术和人力，但该条约却使他们作为矿藏的拥有者而名声大作。事实上，该条约的价值是极为有限的，因为葡萄人让盖奇·卢塞尔自行其事。国内还是硝烟四起，战争持续不断，直到他1624年去世。盖奇·卢塞尔的儿子恩亚布·卡帕拉里泽继承王位。他对姆塔帕帝国王位的合法继承权受到他的叔叔玛穆乌拉的挑战。在这场由两位王位觊觎者引发的战争中，玛穆乌拉寻求并于1629年获得了葡萄牙人的军事援助。葡萄牙人逼迫玛穆乌拉作出若干承诺，然后与之合作共同对抗卡帕拉里泽。这些承诺包括签署一个臣属条约，以及割让金银矿藏。像盖奇·卢塞尔一样，玛穆乌拉在葡萄牙人的支持下于1607年继承了姆塔帕王国的王位。玛穆乌拉后来与葡萄牙人缔结的条约要求允许葡萄牙商人自由出人帝国的各个地区，并从帝国驱逐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以及允许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传播他们的宗教。 650 651

[31] J.多斯·桑托斯，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72页。
[32] 蒙克拉洛神父，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202-253页。
[33] R.格雷和S.马克斯，1975年，第390页。
[34] J.多斯·桑托斯，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19页。
[35] G.M.蒂尔，1899-1902年，第7卷，第222页。
[36] 同上，第218页。
[37] G.M.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367-370页。

条约还要求废止始于16世纪中叶的葡萄牙人向姆塔帕统治者纳贡(curva)的规定，而代之以向葡萄牙人交纳贡赋。条约签订后，葡萄牙商人及探险者在姆塔帕帝国的人数有所增加。玛穆乌拉和他的妻子接受了洗礼，分别更名为多明戈斯和路易莎。[38] 1629年的条约鼓励了葡萄牙探险者大量攫取土地，这些土地后来得到葡萄牙王室认可，成为普拉佐(即王室土地)。葡萄牙商人从非洲统治者的客人几乎成了土地的控制者，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与不法行为导致了一段时期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因此，葡萄牙人对姆塔帕帝国的渗透可以说是使帝国走向分崩离析，而且导致了普拉佐制度的产生，并诞生了一个新的政体——罗兹威帝国。



图片22.5 孔萨罗·达·西尔维拉神父，他于1560年将基督教传入姆塔帕帝国。当时谣传他率领葡萄牙侵略军的一支先遣队，被皇帝下令处死

[38] 关于条约的全文，见J. 科罗(Coelho)，引自G. M. 蒂尔，1899-1902年，第5卷，第290-292页。

普拉佐制度

由于葡萄牙探险者作为个人几乎是不受限制地大量攫取土地，结果产生了许多王室地产(prazos da coroa)，[39] 分属于葡萄牙官员、商人、宗教组织和拓荒者。

普拉佐制度是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复合体。一种是绍纳人体系。该体系由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和农民生产者组成；另一种是附着于绍纳体系之上，由作为统治阶级的王室土地拥有者“普拉泽罗”(prazeros)和奴隶军队(achikunda)组成。换言之，普拉泽罗保持了他们在赞比西亚建立的社会政治体系。非洲的酋长们可继续行使其传统职责，但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40] 因为普拉泽罗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姆塔帕帝国中酋长与小酋长的关系。

普拉佐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封建性的。非洲酋长以农产品的方式向普拉泽罗进贡，如 652 黄油、布匹、蜂蜜、烟草、糖、大小家畜，以及象牙和金砂等。[41] 处于事实上的酋长地位的普拉泽罗在宗教事务中采用非洲人传统的社会习俗，与非洲当地的主要家族联姻，以掩饰他们对非洲人传统权力篡夺，强化其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排除了他们在非洲传统政治中缺乏合法性这一主要缺陷。这些因素使艾萨克曼教授提出了一种非洲化理论，认为，普拉佐作为葡萄牙人的土地占有体制，经过变通，适应了非洲形势，变得完全非洲化了。[42] 这种当地化过程始于17世纪之初。

然而，当认识到整个普拉佐体系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商业资本主义相联系时，艾萨克曼的全盘非洲化理论便难以坚持了。正如艾萨克曼所指出的，普拉泽罗在莫桑比克与印度、后来与欧洲之间的长途贸易中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在18世纪由普拉泽罗向巴西和法属毛里求斯岛屿主要出口象牙和奴隶等商品。普拉佐制度以这种方式与欧洲维系着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可以说普拉泽罗社会即使在其衰败时期仍保持了其非洲化的特点。此外，普拉佐内部组织很难说具有非洲特点，殖民地居民与奴隶军队和平共处，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即便在人们所认为的普拉佐融入非洲制度的顶峰时期，一种完全相反的过程，即普拉佐非洲传统社会的非非洲化过程也在形成。由于普拉佐制度回应了对奴隶的内部需求，普拉泽罗将其非洲邻居贩卖为奴，他们自己的垦荒者和奴隶也成了受害者。结果，一种叫做“阿林加斯”(aringas)的制度应运而生。在该制度的影响下，殖民地垦荒者的生活受到严重骚扰，以前他们与奴隶之间的界限也已模糊不清。

有人认为，从对殖民地垦荒者的日常管理来看，“曼博”(mambo)的地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43] 凭借与创业家族的联系，曼博享有威望，并受到民众的拥戴。艾萨克曼指出，

---

[39] A.F. 艾萨克曼(Isaacman)，1972年b，第2章；M.D. 纽伊特(Newitt)，1973年，第4章。
[40] A.F. 艾萨克曼，1969年。
[41] W.F. 雷(Rea)，1976年，第102页。
[42] A.F. 艾萨克曼，1972年b，第56-63页。
[43] A.F. 艾萨克曼，1969年，第158页。

"当曼博进入村落时，工作全部停止，人们鼓掌欢迎——尊重与效忠的传统表示"。[44] 但这
653 些都是虚的。最终是普拉泽罗掌握案例、纠纷以及非洲酋长任命的决定权。从大象身上砍下的象牙，不再送给曼博，"即使在曼博土地上死去的其他动物身上的最好的部位"也与曼博无缘。[45] 甚至分配土地的权力也被普拉泽罗篡夺。因此，不能认为"普拉泽罗的到来没有导致传统政治体系的毁灭或改变"。[46] 这种体系可能没有毁灭，但是肯定极大地改变了。普拉佐代表葡萄牙对莫桑比克殖民化统治的第一阶段，是葡萄牙商人仅仅通过改变非洲政治和社会体制而获得的实行政治和经济剥削的一些地块。

普拉佐的地理分布

普拉佐零散地分布于赞比西河两岸。然而，南北两岸的普拉佐却有着极大的差异。[47] 南部的土地为葡萄牙王室财产(terras da coroa)，而北部则不是。普拉泽罗拥有王室土地要严格按照具体的规定。从理论上讲，赏赐的葡萄牙王室土地被严格限制在三代以内，土地只能通过女性继承，面积不得超过三里格，土地拥有者可免交年租。北部的王室土地拥有者则不受以上条件限制，他们通过与当地的非洲酋长直接交涉而获得土地。这些差异使南北两岸相同面积的土地价值却有很大差别。此外，普拉佐拥有者更看重北部的普拉佐，因为这些土地靠近宗博集市，也靠近18世纪开采的金矿。

无疑，普拉佐制度要靠不同类别的奴隶支撑。最高层的奴隶是"川加"(chuanga)，[48] 他们是普拉泽罗的耳目，因其忠诚而被重用。每个普拉佐村落都派有川加，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监视传统首领，同时负责收税和征集象牙。普拉泽罗依靠他们获得当地非洲人的情况，招募周围心怀不满的非洲酋长。普拉佐中非洲人的规模对于普拉泽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要依赖非洲人生产黄金、开展贸易、实物纳税、戍边，而且经常靠他们发动战争，拓疆扩土。为了巩固政权，普拉泽罗依靠"奇孔达"(chikunda)管理当地居民，保证执行普拉佐的法律，同时镇压叛乱。在小普拉佐，奇孔达的队伍通常为二三十人，而大普拉佐则可能多达数千人。一支奇孔达部队分为几个十人小组(nsaka)，组长称萨奇孔达(sachikunda)。萨奇孔达及其十人小组接受奴隶首领"姆卡赞波"(mukazambo)的命令。一个普拉佐可能有二三十个奴隶首领，其主要作用是处理问题，以及执行毒药神裁法(muavi)，以确
655 定被控行巫术者是否有罪。

安东尼奥·平托·德米兰达在其1766年有关非洲沿岸情况的报告中提到获取奴隶的主要方法。报告称，掠奴者偷走小孩，并将他们卖给葡萄牙商人、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或非洲代理人。每逢饥荒，就有一些人被卖身或典当为奴。此外，已宣判的罪犯、战争俘虏以及无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同上。
[47] W.F. 雷，1976年，第88-89页。
[48] A.P. 德米兰达，引自A.A. 安德雷德，1955年，第266-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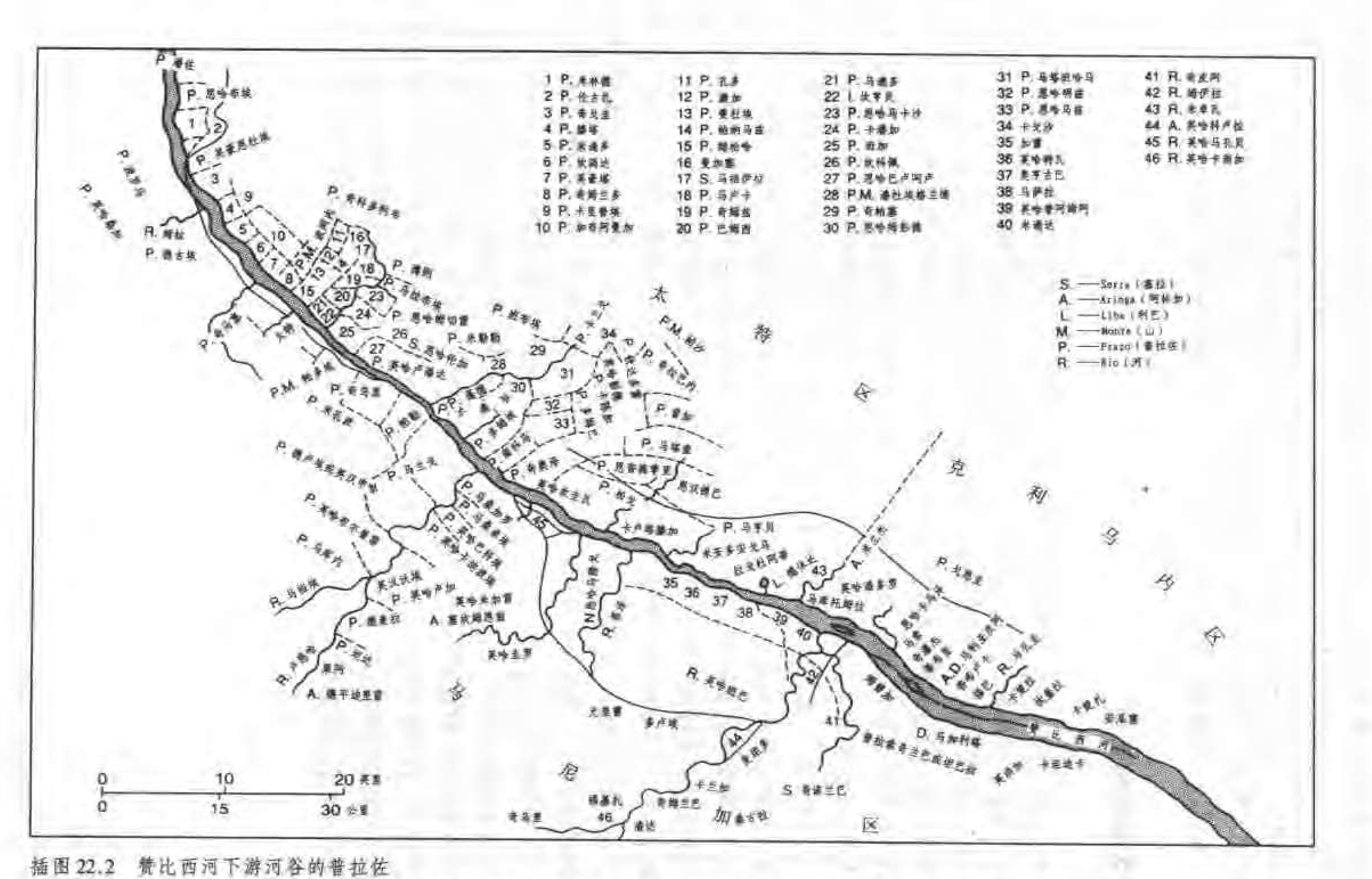


插图 22.2　赞比西河下游河谷的普拉佐

资料来源：根据 M.D.D. 纽伊特所著《赞比西河的葡萄牙居住区：东非探险、土地占有和殖民条例》改编，1973 年，第 59 页，伦敦，朗曼。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编。

力偿还的债务人也被卖为奴隶。[49] 根据其他一些葡萄牙人的记载，这种情况是自愿为奴。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些被出卖的人相信“他们不是真正的奴隶，而是如同欧洲仆人那样，与他们的主人达成协议，按劳取酬，而不是成为他们的奴隶”。[50] 偶尔也有卖孩子的，以交付普拉佐的贡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男子只有自己成为奴隶，才能赎回孩子。显然，一些酋长和殖民地侨民别无选择，只有出卖他们的家属。

普拉佐制度的衰落

18世纪下半叶，普拉佐制度由于诸多原因日渐衰落。首要原因是与世俗的非洲统治者相比，普拉泽罗的权力没有明确限定。[51] 这使普拉泽罗经常滥用职权，强迫非洲农民只许将农产品售与他们且人为地压低价格。他们对农民强征重税，折磨他们，而且对“数百人施以血腥、残忍的暴行和残酷的杀戮，所有这一切都不曾引起政府的注意”。[52] 殖民地垦荒者纷纷揭竿而起，进而移民他乡。米兰达使我们注意到18世纪末期发生的未成功的奴隶起义和逃亡奴隶占据要塞(mussitos)的事件。这些反叛和移民导致了农业生产的衰退、干旱和饥馑。[53] 普拉泽罗及其奴隶军队依赖农民生产的粮食生活，奇孔达便用武力向农民和殖民地垦荒者夺取食物，人们再次离开普拉佐，到其他地方寻找食物与安全。

奴隶贸易是导致普拉佐制度衰落的另一因素。在17世纪40年代，荷兰人占领了安哥拉，引起海外奴隶贸易的增加。[54] 从安哥拉向巴西提供奴隶的渠道中断后，里斯本转而将东南非洲作为提供奴隶的来源。18世纪30年代法属马斯卡林群岛建立了种植园经济，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尽管存在新的需求，但直到1752年，从赞比西亚南部地区输出的奴隶数目相对较小：300人来自赞比西河，200人来自索法拉。1758至1759年居住在该地区的一个德国传教士观察到，“几乎没有奴隶被送往海外，情况很可怕，人们甚至不惜自杀以求逃避被贩卖为奴”。[55] 然而在18世纪末，奴隶贸易势头加大，赞比西河谷的普拉泽罗视奴隶贸易为发财致富的一大机遇。猎奴队从切瓦人、恩森加人和曼甘贾人地区带走一车车的奴隶。普拉泽罗也开始在他们的地盘上出卖奴隶，普拉佐制度的基础因此而遭受破坏。然而在赞比西河谷以外的赞比西亚南部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赞比西河以南的普拉佐制度因17世纪下半叶随新政体罗兹威昌加来腊王朝的兴起而加速走向衰落。

656

[49] 同上。
[50] 同上。
[51] 同上。
[52] A.F.艾萨克曼，1969年，第170页。
[53] A.P.德米兰达，引自A.A.安德雷德，1955年，第266-270页。
[54] A.P.德米兰达，引自A.A.安德雷德，1955年，第266-270页。
[55] 引自W.F.雷，1976年，第117-118页。

罗兹威帝国

关于罗兹威帝国的起源只能作一些推测。昌加米腊之称使问题更加复杂，它与17世纪下半叶罗兹威帝国的奠基人有关，但最初被提及却是在15世纪。[56] 对16世纪昌加米腊王朝的情况也偶有提及："听到的有关早期昌加米腊人的最后传说是他们在1547至1548年被击败"。[57] 然而，对以下四个方面似乎达成了共识：[58] 首先，罗兹威人是姆塔帕帝国历史上的卡兰加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到17世纪，罗兹威人才脱离卡兰加人获得独立；其次，"罗兹威之称首先是指与昌加米腊敦博一世在1684至1695年期间兴起与称雄有关的历史上的卡兰加人的一部分"。[59] 第三，罗兹威帝国的创建是昌加米腊敦博一世的功绩；第四，罗兹威这一名称来源于绍纳语动词"kurozva"（摧毁），可能是"敦博的追随者们……出于虚荣"。[60] 而采用其意，因为他们在征服战争中的摧毁行动，也可能是战争的受害者给他们起的绰号。

在1684至1695年期间，敦博·昌加米腊逐渐在东北部强大起来。[61]至今不清楚是什么 6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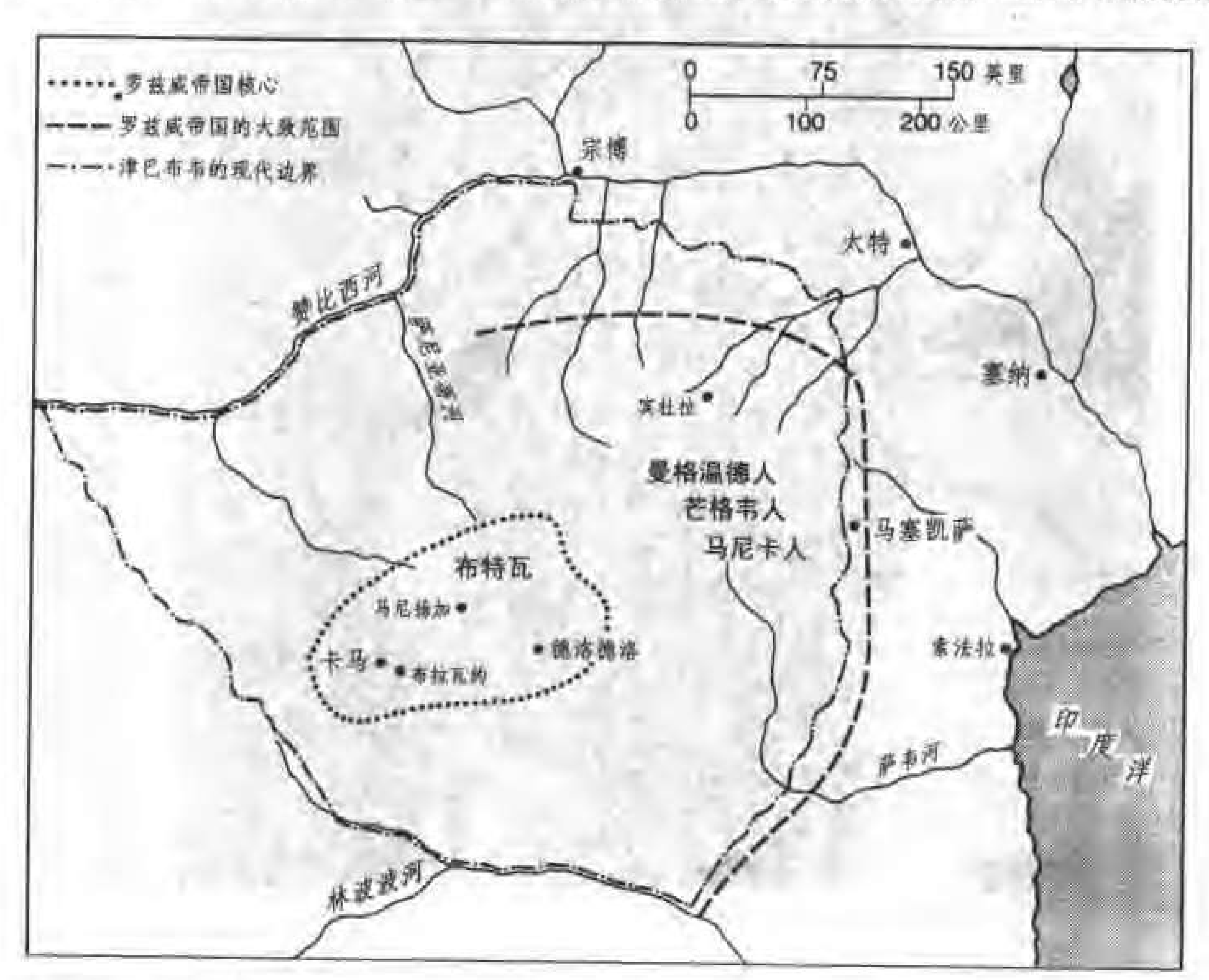


插图 22.3 罗兹威帝国

资料来源：根据 D.N. 比奇所著《1900年以前的津巴布韦》改编，1984年，第38页，哈拉雷，玛姆博出版社。

[56] D. 德艾尔卡科瓦致国王科钦，1506年11月20日，引自《关于莫桑比克葡萄牙人的文件》，第1卷，第3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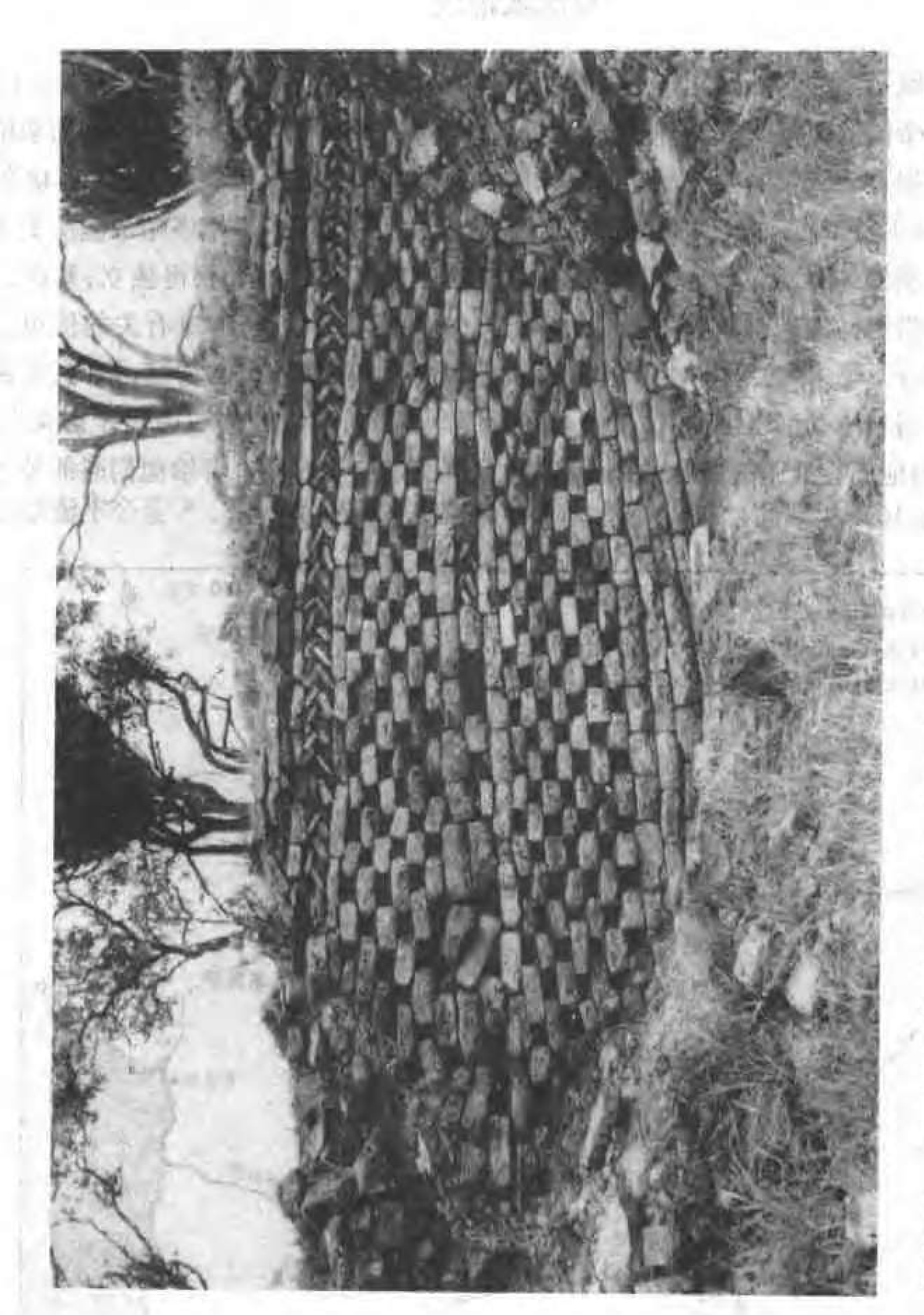
[57] D.N. 比奇，1980年a，第228页。

[58] S.I. 姆登杰（Mudenge），1974年a。

[59] 同上。

[60] 同上。

[61] D.N. 比奇，1980年a，第228－231页。



图片 22.6 达南贡贝的装饰性围墙。该城约建于 17 世纪，为托尔瓦国中心之一，在 17 世纪 30 年代或 40 年代卡米被烧毁后成为其国都。人口约 2000 人

使他变得如此强大。敦博曾是姆塔帕皇帝的放牧人。他反叛之后与部下先到西南部的托尔瓦国，随后转到东部的马尼卡和犹特乌王国。[62] 葡萄牙商人在征服这里时，于1684年、1693年和1695年被分别从芒格韦王国、高原地区以及马尼卡王国中驱逐了出来。他们逃至宗博，并于1710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定居点。随后，他们又返回了以前在马尼卡的马塞凯萨居住区。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罗兹威昌加米腊的统治与管辖之下，这是不言而喻的。于是罗兹威统治者得以创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南部远及布赫拉、博查、杜马和东南高地；西北至戈壁地区；北接盐碱地带；西南则抵达低地。[63] 帝国的中心地带很可能与19世纪40年代继之而起的恩德贝勒帝国一样大，其早期首都位于达南贡贝，但后来的罗兹威皇帝们似乎时常住在卡米和纳特泰尔。

我们对于罗兹威首都的了解来源于19世纪的有关描述，[64] 不过自17和18世纪以来，很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据我们所知，王宫由三座巨大的石房组成；每座石房有许多房间，以供罗兹威皇帝存放家什物品，石房周围是象牙墙。罗兹威昌加米腊从塞纳的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许多枪枝。他饲养"猪和良种狗"，而且：

659

> 不吃任何新鲜食物，仅食用陈旧的食品，独自饮用"庞贝"(pombe)。在一定的日子，他和朝臣一起外出打猎，平时则派猎手去获取猎物。他死后被葬在他的房子里，没人哭泣，也没有人为之哀悼，因为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们就将她们挑选出的新昌加米腊引见给长老们，并由第一位妻子为其戴上两顶王冠……。[65]

在共享同一个"穆约"(moyo,心脏)图腾的民族中，在对讲卡兰加语的民族的征服之战中结成的盟友中，以及在托尔瓦国的盟友中，罗兹威人保持了其外来杰出民族的特性。

省级管理

罗兹威统治者运用与姆塔帕统治者相似的方法统治着他们的帝国。这种统治机制包括土地分配、交纳贡税、宗教以及训练高效率的军队。

罗兹威统治者将土地分配给新就任的酋长，并向他们征收贡赋。在任命酋长、祭酒以及各种神灵崇拜活动中，罗兹威统治者也注重利用教士阶层。他们在宗教和征收贡税方面引进革新方法。如前文所述，在姆塔帕皇帝统治时期，进贡的酋长常常派人将贡品直接送到王宫。然而，罗兹威皇帝则通过以村落为基础和以王宫为最高层的金字塔式等级方式，组织收集贡赋。主要官员和"腾巴里"(tumbare)军队的最高长官在全国各地监管贡品的收集，向各省及村落派出专门的贡品征收队。因而，在整个帝国的管理工作中，征收贡税是一项专门职能。有些征税官员还有军队支持。

[62] 同上。

[63] D.N. 比奇，1980年a，第236。

[64] A.H.U. 里斯本 Moc. 第2函，乔安·朱利安·达·西尔瓦，索法拉，1844年8月8日，"索法拉城回忆录"(1836-1847年)。

[65] 无名氏，A.H.U.Moc. 第7函，"关于曼尼卡王国的地图及其风俗和法律的描述"(1794年)。

罗兹威人发展了一整套不同于北部和东部绍纳人普遍流行的灵媒(mhondoro)宗教体制。姆瓦利——罗兹威“显灵神明崇拜”——是以信奉一位天神为基础，该神通过雷电与660 地震等自然现象来表达他的意思。姆瓦利神谕的主要官员作为耳目与喉舌，主要是为了收集情报。罗兹威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操纵着姆瓦利崇拜。

对众所周知的罗兹威高效率的军队需要作些说明。在18世纪，葡萄牙观察家们对罗兹威军队的纪律和效率始终感到惊讶。这些军队通常装备精良，以弓箭、短剑、镖枪、战斧及短棒为武器。它们的组织与19世纪祖鲁国王恰卡[66]的军队极为相似。像祖鲁人那样，罗兹威人将其军队编成军团，在战斗中也采用新月形队形。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不用这一方法。1684年芒格韦之战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狡猾而奸诈的”敦博·昌加米腊“用计谋”战胜了葡萄牙人。[67] 像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大多数军队一样，罗兹威军队也在战前举行某种仪式，使军队更加勇猛与自信。葡萄牙人逐渐认为罗兹威皇帝“有一种魔油，只需用它搽抹，即可将人杀死”。[68] 无疑，类似的这种猜想为罗兹威军队取胜起了重要的作用。

罗兹威军队在战斗中表现勇猛也是由于战士们经过包括军事操练以及弓箭术等项目在内的全盘训练。罗兹威军队的训练项目及等级制度吸引了某些历史学家将其与罗马军队的组织及术语进行比较。[69] 然而，正如所说明的那样，罗兹威军队的组织与训练在很大程度上极有可能模仿19世纪早期祖鲁人、恩德贝勒人以及索托人的军队。

罗兹威军队被神秘化的另一方面是其无往而不胜，他们在17世纪末击败了葡萄牙人常被引为典型事例。但是孤立地看待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却忽略了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整个东非与中非地区存在的整体现实。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葡萄牙人一直在东非海岸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斗，1729年，葡萄牙人在蒙巴萨的要塞被阿曼素丹摧毁。[70] 阿曼素丹在661 佩特站稳脚跟，继而于1661和1670年分别向蒙巴萨和莫桑比克发动了军事进攻，但未能成功。1696年3月，由马斯喀特出发并在佩特得到增援的一支葡萄牙舰队包围了蒙巴萨的耶稣堡。耶稣堡被攻陷后，葡萄牙人据此控制了德尔加多角以北的东非海岸。[71] 换言之，罗兹威昌加米腊在南赞比西亚地区所遭遇的抵抗并不是组织起来的全部葡萄牙军事力量，因为葡萄牙人正集中力量重新建立他们对东非沿岸的控制。因此，罗兹威帝国虽然在这一时期打败了葡萄牙人，但不能被当做是证明罗兹威军队战斗力高的标志。

葡萄牙人在赞比西亚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以普拉泽罗为基础的，而普拉泽罗由于极为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而陷人分裂。普拉泽罗也在多数非洲人社会中制造分裂，这在姆塔帕的国土上和犹特乌王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评价罗兹威帝国的辉煌与强大时，不考虑以上因素，很容易夸大罗兹威军事机器的效率。

---

[66] S.I.姆登杰，1974年b，第378页。
[67] 引自S.I.姆登杰，1974年，第379页。
[68] 同上。
[69] 同上，第377页。
[70] C.R.博克瑟(Boxer)和C.德阿塞韦多(de Azevedo)，1960年。
[71] 同上。另见G.S.P.弗里曼-格伦维尔(Freeman-Grenville)，1963年，第141-142页。

经 济

农业

绍纳人社会的支柱产业是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渔业和制造业。长途贸易及区域间的贸易是对经济的补充。绍纳人培植了三种主要谷物，即䅟子、御谷以及各类高粱。[72] 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的分工严格地建立在性别基础之上，但没有有力的证据。[73] 然而有证据表明分工情况因社会不同而异。在一些绍纳人社会里，正如巴伯所观察到的，"成年男子负责建房以及清理和开辟新的土地"，[74] 妇女则播种和耕耘这些土地。至于收获则由男女共同承担。换言之，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承担较重的劳动，妇女的工作较轻，他们之间与其说是分工明确，不如说是一种合作。然而，在有些绍纳人社会，如生活在低地的赫伦圭人，他们的分工则是成年男子大部分时间用来设置陷阱以获取猎物，儿童放牧，妇女耕种土地。

耕种季节从9月一直延续到11月，使用锄头是基本技术。由于这一技术的有限性，必须实行轮作，一旦土地变得贫瘠，便放弃，然后开垦新的土地。开辟新的土地包括"清除并焚烧灌木，将灰烬作为肥料"。[75] 这种毁坏性的刀耕火种耕作技术早已被指责为对土地的浪费。然而，诚如黑利勋爵在其《非洲概览》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与其说是一种 662 原始的手段，不如说是对土壤特征的认可"。[76] 如同大多数前殖民时期的农业经济一样，绍纳人的农业要适应当地的条件，以实现多种农业轮作技术。

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里，赞比西河以南地区从欧洲和亚洲逐渐引进了一些新的作物。这些新作物主要是从沿海岸以及有葡萄牙人定居点的地区引进的。在索法拉以及赞比西河下游地区，亦即腾达库鲁和卢阿波两河之间区域，非洲的农民种植稻米和薯类植物，不过这些作物从未成为他们的主食。[77] 他们也种植甘蔗。当时由于缺乏技术和设备，甘蔗主要供食用，而不是用以制糖。非洲人还从印度和葡萄牙引进了无花果、菠萝、番石榴、巴婆果和桔子等许多果树。他们还种植西瓜、黄瓜、白薯和柠檬。有些果树是在灌木丛中自生的。1596年乔安·多斯·桑托斯曾作了这样的记载：

> 在索法拉河沿岸的两个地方，有两处茂密的无主桔树和柠檬树林，人们可以随意采摘树上的果实。柠檬树上的果实实在是太多，卡菲尔(非洲人)将果实装到船上，沿河而下将其运往索法拉，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要塞的居民们在柠檬上

[72] D.N.比奇，1977年，第41页。
[73] W.J.巴伯(Barber)，1964年，第46页。
[74] 同上。
[75] 同上，第45页。
[76] 引自W.J.巴伯，1964年，第45页。
[77] J.多斯·桑托斯，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69页。

撒上盐并装入桶或罐中运往印度。柠檬在那里备受欢迎，人们将柠檬与米饭共同享用。[78]

由此似乎表明这些外来果树的栽培主要是受外贸需求的刺激。同样也有证据表明，在马尼卡王国，人们在四五月间种植小麦。据加斯帕尔·马西多神父记载，收成相当好，每颗麦粒可结“50穗”。[79] 到1778年，有证据表明，在马尼卡已有花生种植。[80]

除谷物和果树外，“到处都生长着两种豆科植物，即花生(voandzeia subterranea)和豇豆(vigna unquiculata)。”[81] 如前所述，从欧亚引进的作物没有一种成为绍纳人的主要食品，而18世纪引进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玉米却不同。到20世纪，玉米逐渐与小米和高粱一样，成为绍纳人的主食之一，在农村人口中，情况尤为如此。

663 尼扬加和低地地区

尼扬加和低地地区的农业经济与高原有许多不同之处。尼扬加高地土壤贫瘠，山坡陡峭。尼扬加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均可见到一层层约一米高的干石墙。这些建在山坡上的石阶“就是为了保持土壤并整齐地垒放石头”。[82] 换句话说，建造梯田是控制恶劣环境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一直延用到1800年，时间长达三个多世纪。这许多梯田可能“代表着过去许多岁月里不断积累的小规模种植的证据”。[83] 同样有证据表明，当时实行有限的灌溉，仅仅起一种补充作用，因为尼扬加地区的年降雨量较为充沛。时至今日，当地还在干旱季节对菜园、玉米、香蕉进行浇灌，这一习惯极有可能是起源于18世纪的农业传统。在尼扬加地区，沿低坡开垦梯田和在河谷地区沿等高线作业同样可见这一农业传统的实证。根据罗杰尔·萨默斯记载，通加/塞纳人在18世纪融入马尼卡社会之前，曾从事过这种农业活动。[84]

低地经济

低地经济有所不同。这里的赫伦主人是一个沿河而居的民族，他们主要靠打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农业耕作极为有限。[85] 低地的年降雨量很少，直至今日，采集活动在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采集的果实主要包括制作饮料的“恩坎依”(nkanyi,漆树科的一种乔木—Sclerocarya caffra)和“马汉加”(mahanga,伊拉拉棕榈—Hyphaene natalenis)，用其果汁制造的令人陶醉的果酒(称为njemani或称chemwa)，以及猴桔(Strychnos madagascariensis)

---

[78] 同上。第190页。
[79] G. 马西多(Macedo)，1890年，第150页。
[80] J. 巴普蒂斯塔·穆托里(Baptista Moutaury)，引自A.A. 安德雷德，1955年，第362页。
[81] W.G.L. 兰德尔斯，1979年，第49页。
[82] J.E.G. 萨顿(Sutton)，1983年，第12页。
[83] 同上。
[84] 同上。
[85] J.H. 班纳曼(Bannerman)，1981年。

和猴面包果。这些果实由妇女和儿童采集，成年男子负责猎取大的动物。妇女和儿童捕杀鼠类，从树上捕捉银色的大毛虫并收集蝗虫。

赫伦圭人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打猎好手。据说低地种类丰富的猎物使其成为“猎人的天堂”。[86] 捕鱼也是赫伦圭人的重要职业。低地的渔业资源当时与现在一样，极为丰富。与打猎一样，捕鱼也是男人们一年里要做的主要事情。最有效的方法是用芦苇结网，大量 664 捕鱼。他们将网巧妙地置于小溪合流处，或者派青年男子有时是妇女顺流驱赶鱼群进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赫伦圭人与赞比西亚南部其他民族在打猎和捕鱼这两种经济活动上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高原国家与沿海王国的民族均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乔安·多斯·桑托斯在评述 16 世纪末捕鱼这一主题时说，“冬季，索法拉河水上涨，常常溢出堤岸，淹没土地，水塘里满是河里游来的鱼”。[87] 乔安·多斯·桑托斯接着描述了各种河鱼。尼扬加地区过去是至今仍然是以盛产鳟鱼而驰名。那时与现在一样，人们在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大小河流里捕鱼。

与捕鱼一样，狩猎作为谋生的手段，并没有被低地地区的赫伦圭人独家垄断。在姆塔帕帝国，各地的男子猎获的动物种类难以计数，如狮子、老虎、豹、犀牛、大象、水牛、野牛、羚羊和角马。至于哪些动物能被宰杀以供食用，是没有限制的。数以百计的珍珠鸡栖息在靠近田野的灌木林中。传统的专业猎手使用陷阱、矛、棍棒以及弓箭捕杀猎物。然而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早期引进火枪之后，狩猎的效率大为提高。

“赫伦圭人是独一无二的猎人的神话”，无论是制造这种印象，或准确地说，使这种神话永远存在，都是不正确的。[88] 赫伦圭人能够区分各种类型的土壤，这表明他们与赞比西亚南部其他地区的绍纳人一样重视农业生产。赫伦圭人主要根据土壤的相对保湿能力区分土壤。[89] 他们在沙土(nthlava)之上建立家园。这种土壤适宜生长黄瓜、葫芦、豇豆和花生。他们还在山谷以及邻近的沙土地上种植小米和高粱。这主要是因为降雨量不稳定，而山谷里的露水对高粱的生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赫伦圭人称玄武土为“楚沃罗”(tsovolo)，这是一种肥沃的土壤，他们种植玉米和各种蔬菜。这种土壤与其他土壤相比，优越性在于能够在大雨过后长时间保湿。这对于一个雨量不稳定地区，种植需大量雨水的玉米是极为重要的。这里似乎并不缺少土地，唯一的制约因素是雨量不稳定。在好的年份，赫伦圭农 665 民谷物生产有余，“虽然这并不能使他们度过所有歉收之年，但确能减缓灾情”。[90]

对于 1500 至 1800 年间绍纳人社会的农业经济的效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1569 年蒙克拉洛神父严厉地批评非洲农民，“因为他们不知节俭，新收获的粮食很快在宴会和聚饮中消耗一空”。[91] 然而安东尼奥·戈梅斯在 1648 年观察到的情况则是：非洲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一直可以持续到下一年；而且“他们的粮仓从没有见底的时候”。[92] 曼纽尔·巴雷托

---

[86] 同上。
[87] J. 多斯·桑托斯，引自 G.M. 蒂尔，1899-1902 年，第 2 卷，第 264 页。
[88] J.H. 班纳曼，1981 年，第 19 页。
[89] 同上；与家母珀坦尼亚·今蒂妮·比拉(终年 67-68 岁)的谈话，1985 年 5 月 19 日，博罗达尔。
[90] J.H. 班纳曼，1981 年，第 19 页。
[91] 蒙克拉洛神父，引自 G.M. 蒂尔，1899-1902 年，第 3 卷，第 231 页。
[92] A. 戈梅斯(Gomes)，1959 年，第 220 页。

在1667年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为非洲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余粮留到第二年”。[93] 1696年安东尼奥·达·孔塞考注意到，在姆塔帕帝国，人们自己干自己的农活，国王的农田一望无边，由他的“卡弗雷”(cafre)耕作，有时国王也大张旗鼓地亲往查看。国王最终收获了许多粮食，生活富足，甚至奢侈，不仅他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妾们也是如此。[94] 我们从1620年曾访问姆塔帕王宫的耶稣会神父朱利奥·西泽那里还了解到，姆塔帕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他报道说姆塔帕并不轻视农民，恰恰相反，这位神父说，他被匆匆接见，因为皇帝要“在这播种季节亲自视察农耕情况”。[95]

这些葡萄牙观察家的陈述互相矛盾，这清楚地表明，在讨论赞比西亚南部地区前殖民时期的农业效益时，必须要注意时间和地点。以上引用的证据指的是赞比西亚地区在特定年代和具体地方的情况，不应以此来证明普遍情况。对饥荒和干旱问题，应根据时间与空间进行讨论。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葡萄牙人在17世纪挑起的侵略战争导致了饥荒，农民因此抛弃了土地。巴雷托在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可能发生在芒格韦王国的某些地方，1667年葡萄牙人与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在这里为争夺商业统治而发生争斗。同样，18世纪的无名作者主要关心的是马尼卡王国的情况，也可能是马尼卡局部地区的饥荒。对频频发生的饥馑以及非洲农民不节俭的问题还需考虑，因为葡萄牙人1500至1800年以及后来对 **666** 于这一问题的描述使得大卫·比奇等一些历史学家对前殖民时期以及殖民时期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饥荒的描述过于普遍化。

比奇将前殖民时期绍纳人农业的特点归结为“有用，但处于危险的停滞状态”。[96] 据他认为，这是因为“对作物及土壤没有选择，也没有预测饥荒(shangwa)的专门技术，难以避免由于气候、蝗虫及其他虫害产生的这些灾难”。[97] 他进而认为粮食储存有问题，“存粮无法使人们度过真正的荒年”。[98] 首先应该指出绍纳人社会并非处于“停滞状态”。绍纳人各社会之间以及与邻近的其他非洲人社会，如斯瓦希里-阿拉伯人早在10世纪或更早便建立了联系，与葡萄牙人的联系则始于16世纪初。这些接触显示了他们通过易货和交换改变物质条件所做出的努力。如前所述，绍纳农民在1500至1800年间始终采用新的作物品种，这些发展不像是前殖民时期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所特有的。关于非洲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神话已被A.G.霍普金斯打破，他以西非为例，作了如下恰当的评述：

> 前殖民时期的农业历史与其说是停滞不前，不如说是一种创新。关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被冻结在非洲历史黎明时分的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传统”社会无时间性的概念应慎重使用，或根本不用。尽管与其他大陆的接触导致引进一些杂草，如针矛等，但种子和植物的引进，其结果无疑使西非受益匪浅。新的作物可改善营养，减少饥荒，使养活更多的人成为可能。[99]

---

[93] M.巴雷托(Barreto)，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478页。
[94] F.德苏扎(de Souza)，1710年，第1卷，第837页。
[95] A.达·孔塞考(da Conceicao)，第66页。
[96] D.N.比奇，1984年，第40页。
[97] 同上。
[98] 同上。
[99] A.G.霍普金斯(Hopkins)，1983年，第31页。

认为绍纳农民面对干旱与饥荒束手无策这一观念被证明已经过时。理查德·姆特特瓦博士以东南部的杜马人为例，说明“他们有几种方法观测干旱”。[100] 他们还有若干方法战胜灾荒，如以盐、肉、鱼、象牙、毯子、壶、篮子、矛、箭以及珠宝等换取谷物，有时则乞讨。绍纳人在荒年也通过一个叫“姆克孟戴拉”（mukomondera）[101]的制度得到粮食，即人们在以后好的年景以无息归还为条件借取谷物。在困难的情况下，有人以女儿抵押。值 667 得注意的是，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其他生产活动在引进新作物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适应新型农业经济，成为战胜干旱和饥荒的重要手段。

姆特特瓦在研究中还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贮藏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绍纳人三种主要食物，小米、御谷和高粱可以贮藏三四年的时间。[102] 据比奇观察，雨季的潮湿可能会增加贮粮箱的湿度，使得粮食要么腐烂，要么易被虫吃掉。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绍纳农民为保存好粮食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贮粮箱“从里面小心地涂上灰封闭起来”。[103] 这使之密不透风。人们还将贮粮箱置于裸露的岩石上，以防止白蚁进入箱内。若没有这样的岩石，贮粮箱则被置于一定高度的杆子上，这样可便于发现白蚁的活动以免造成损失。正如姆特特瓦敏锐指出的那样，研究中存在一种危险，即“强调干旱之年是以忽略正常年景或较好年景为代价的，并且不考虑时间与地点”。[104] 非洲其他地区前殖民时期农业效率的情况表明，绍纳人的农业效益在满足农民需求方面“景象黯淡”是没有根据的。正如沃尔特·罗德尼所指出，即使不时发生灾荒，大多数非洲社会的土地耕种面积其实还是不断增加。[105] 米拉克尔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出发，认为：

> 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热带非洲的部落经济，但目前许多关于部落经济的陈腐观念需要修正也越来越明显。[106]

这种对其他地区前殖民时期农业的认识，对绍纳人来说也是十分正确的。

畜牧业

在姆塔帕和罗兹威帝国，畜牧业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包括绵羊、山羊和牛群的饲养。在非洲社会中，养牛的经济意义引起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牛可以向农民提供或用于消费或销售的牛肉、牛奶及肥料。[107] 拥有牛群同时也具有社会功能，因为它赋予拥有牛群 668 的个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上拥有的牛群越多，他就越受尊重。这种尊重“不是由于他对被认定的价值的不加思索的献身精神，而是因为他在控制一种主要资源方

[100] R.M.G. 姆特特瓦(Mutetwa)，1976 年尚未发表，第 238-239 页。
[101] 同上。
[102] R.M.G. 姆特特瓦，1976 年尚未发表，第 236-237 页。
[103] 同上。
[104] 同上。
[105] 引自 R.M.G. 姆特特瓦，1976 年，第 240-241 页。
[106] 引自 R.M.G. 姆特特瓦，1976 年，第 241 页。
[107] W.J. 巴伯(Barber)，1964 年，第 47 页。

面所显示的技能"。[108] 在时常遭受严重干旱的地区，牛的优势是"比存粮"更为持久。[109] 因此绍纳人社会以牛来表示交换价值。葡萄牙人的文献强调了牛在姆塔帕和罗兹威帝国经济中的中心作用。大批的牛群在高地尤其兴旺，因为没有萃萃蝇的威胁。[110] 有种种迹象表明姆塔帕和罗兹威昌加米腊统治者实行随季节转场放牧。一般来说，转场放牧取决于三个因素。[111] 第一，牧群的规模很重要。牧群规模越大，那么畜群拥有者所需要的土地也就越多。由于灾难的威胁，从大津巴布韦时期，即从13至15世纪一直到18世纪末，牧人每年于旱季节将牛群从高地赶到低地，长途跋涉，寻找更好的牧场。[112] 即至雨季开始，牧人们又将牛群赶至高地，以避免雨季蝇生疾病的传播。第二，转场放牧由畜牧管理的集中程度所决定。在干旱季节，高地缺水少盐，牧草缺乏，牛群被赶回低地。换言之，基本食物的自然分布是转场放牧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转场放牧是出于商贸的目的。耕者和牧人均需要对方的产品，转场放牧的一个原因是用动物产品换取谷物。结果，当牧群毁坏耕者的庄稼时，牧人与耕者经常发生冲突。这又导致转场放牧路线的改变和或移居到全新的地区。这就是牧民变成移民的原因。比奇详细地纪录了17世纪末以来这些人口迁移的大部分情况以及他们在绍纳高原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建立新定居点的情况。[113]

比奇是依照人口统计情况来解释这些现象的。他发现人口压力与牛群及牧场缺乏也有联系，这是有可能的。杰菲·盖伊就曾引起我们注意18世纪90年代祖鲁兰类似的情况以及历史上生态、气候和植被的重要意义。[114]

669

可以说，实行季节性转场放牧，使姆塔帕和罗兹威的居民得以畜养大批牧群。牛的品种主要分为两类：小型的在东北部以及尼扬加山区放牧，大型的则在西北地区放养。[115] 然而考古发现与葡萄牙文献都极少涉及16世纪至18世纪末有关牛群管理及分布情况。葡萄牙的文献资料不断强调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牛群和其他牲畜资源丰富，"非洲人用牛奶而不是用水煮牛肉"。[116] 后者虽言过其实，但却说明该地区牛很多。有些牛用来交换布匹或其他外国产品。如卡米地区的托尔瓦人在16世纪常向赞比西河谷出口牛。[117]

有几个例证可以说明，16至18世纪牛在罗兹威经济中的中心作用。在16世纪初期，迪奥戈·德艾尔卡科瓦曾记载道：隅于西南部的布特瓦统治者向执政的姆塔帕进贡4000头无角奶牛。[118] 1569年，蒙克拉洛神父将布特瓦体型较大的牧牛比做法兰西大公牛。[119] 在16世纪，神父乔安·多斯·桑托斯将黄金生产规模小的原因归结为非洲农民一心放牛，"在这

[108] A.G.霍普金斯，1983年，第42页。
[109] D.N.比奇，1984年，第42页。
[110] W.G.兰德尔斯，1979年，第51页。
[111] 关于季节性转场的一般原则，见A.G.霍普金斯，1983年，第41页。
[112] 关于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季节性转场放牧，见P.S.加莱克，1978年。
[113] D.N.比奇，1980年a，第8章；J.M.格雷，1979年，第1章。
[114] D.N.比奇，1980年，第8章。
[115] W.G.L.兰德尔斯，1979年，第51页。
[116] A.戈梅斯，1959年，第189页。
[117] D.N.比奇，1984年，第42页。
[118] 迪奥戈·德艾尔卡科瓦致国王科钦，1506年11月20日，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1卷，第64页。
[119] 蒙克拉洛神父，引自G.M.蒂尔，第3卷，第237页。

些土地上牛的数量极多"。[120] 在1648年，安东尼奥·戈梅斯夸张地报道说：布特瓦的母牛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不得不站起来挤奶。[121]

除了牛以外，非洲农民还饲养山羊、绵羊和鸡作为食物或用来交换。1595年乔安·多斯·桑托斯在犹特乌观察到：

> 他们的肉食一般是母鸡，母鸡数量极多。卡菲尔人养鸡并卖给葡萄牙人。在索法拉，他们用12只鸡换一块黑棉布，这在那里最多值两个泰斯通；假如买主沿河而上到他们的住处去买的话，换同样一块布就得要16或18只鸡，每只母鸡11个左右。他们还在家中饲养许多猪，此外还有许多山羊、奶牛，以及大量的鹿和野猪……。[122]

670

采矿：铁与铜

在姆塔帕和罗兹威帝国，大量的铁、铜和铅矿得到开采，尽管现有的文献使人们相信，非洲农民仅对开采黄金感兴趣。然而这只是反映了葡萄牙人及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的兴趣。非洲农民炼铁打制锄头、镖枪及斧头等器具。[123] 韦扎的恩坚贾人以制造锄头出名。[124] 他们的锄头远销马尼卡、博查、布赫拉和恩道地区。他们还采铜制造铜镯，无论男女，都将镯子戴在手上和脚上。在18世纪，有证据表明铜主要产自储量丰富的杜马。诚然，杜马人并不大量生产铜，但他们开采的少量或许用于出口。1952年的地质勘探表明，津巴布韦全部铜产品的4/5来自杜马。[125] 然而还有相当数量的铜产自西北部的乌伦圭。[126]

盐

在1500至1800年，制盐业在绍纳人经济中十分重要。在萨韦河中游等没有充沛的雨量以供庄稼生长和放牧的地区，制盐是主要行业，盐工用盐换取粮食，[127] 萨韦河中游也富产粘土，当地居民利用这种资源优势，专事陶器制作。像食盐一样，陶器被用来交换粮食，尤其是在荒年。

纺织

纺织生产也是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绍纳农民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棉花种植及纺织业兴

---

[120] J.多斯·桑托斯，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274页。
[121] A.戈梅斯，1959年，第197页。
[122] J.多斯·桑托斯，引自G.M.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190页。
[123] A.戈梅斯，1959年，第186-188页。
[124] 见J.M.麦肯齐(Mackenzie)，1975年。
[125] H.H.K.比拉(Bhila)，1982年，第40页。
[126] P.S.加莱克，1983年，第27页。
[127] H.H.K.比拉，1982年，第39页。

旺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赞比西河东岸，[128] 高地的东北部也种植棉花。绍纳人用棉花以及猴面包树的树皮织布。低地棉区与高地牧区在经济上互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间贸易的模式。

671 黄金和白银

16至18世纪银矿的存在和开采对于里斯本和赞比西亚南部的葡萄牙当局来说，都是一项极大的投机买卖，不过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整个时期以及后来，再也没有发现银矿。白银只是作为采金时的附产品。在西南部的布特瓦高地以及东部的马尼卡和犹特乌，黄金储量都很丰富。

在16世纪，葡萄牙人过分地夸大了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黄金储量。1633年加斯帕尔·马西多从非洲农民那里得知，以前在托尔瓦国，人们无需去挖掘黄金，在河流或小溪里就可以捡到金子，并用这些金子到马尼卡的马塞凯萨市场上换取布匹。他还听说国王财宝中的"金条每根重达七八阿拉托斯(arratels)"。[129] 还有人说，整个"姆卡兰加就是一座金矿，一挖就能挖到金子"。[130] 尽管这些说法有些夸张，但在姆塔帕帝国确有大量的黄金，从16世纪早期到17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寻找黄金的愿望大都得以实现，尽管他们明言事与愿违。

有关绍纳人采金活动的历史资料有力地表明采矿不是全年性的活动。然而在东部的马尼卡王国却全年开采，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以及现在，大部分河流四季长流。[131] 农民采矿有可能既可缓和贵族对可交换商品的需求，也可由他们自行贸易。[132]

绍纳人的采掘活动集中在8、9、10三个月，这主要是为了同时对土地进行大清理。[133] 农业有如"一个母体，当地所有其他经济活动"都置于其中：农民可将农业与诸如贸易、采金等仍属副业的其他经济活动相结合。他们经常通过出售剩余农产品来为其他项目提供资金。在8、9、10三个月的干旱季节采矿的另一原因是矿工们可在地下水位季节性下降时将竖井下沉到相当深的地方。而且易于在下一雨季行洪之前发现前一个夏季留下的冲积沉淀物。

672 开矿采用的是南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模式。开凿矿石的基本工具是石锤及铁楔。[134] 用锤子将铁楔敲进裂缝，将岩石撬开。矿工们也使用一种类似撬棍的工具，铁头，笨重的柄，很像锄，可以用作镐。[135] 用铁锹将碎石集中起来，确保不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碎片。采用火烧的办法开采黄金矿脉，这是从大量的木炭推断出的，罗杰·萨姆尔斯

---

[128] A. 戈梅斯，1959年，第203、222页。
[129] G. 马西多，1890年，第151页。
[130] A. 戈梅斯，1959年，第186页。
[131] H.H.K. 比拉，1982年，第46页。
[132] P. 辛克莱(Sinclair)，1977年。
[133] I.R. 菲米斯特，1976年，第5页。
[134] 同上。
[135] 同上。

曾在许多古老的矿中发现过木炭。[136] 在一个金矿里，他还发现了一些装有木炭的槽，紧靠着矿脉的表面而立。据他讲，这样便成为一个炉子，紧靠着坚硬岩石的表面集中加热，然后迅速冷却高温岩石，使岩石表面很快裂开。绍纳人用特定形状的陶器，盛上冷水，并控制水量，以获得岩石最大限度的开裂。矿工用一种木制容器将矿石带上地面，然后进行分类，用小斧头拣出含金的石英。经过分拣的石块被堆放在一垛垛木柴中烘烤，经过烘烤的石英随即开裂，从中便可洗出金子。

对冲积矿中的黄金而言，淘金的过程是全村人的活动。[137] 在采金季节，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400 多人的矿工队伍，在各村村长的指挥下在某地集中起来。他们用木碗洗淘冲积矿，并将淘得的金砂装进空的芦苇杆或羽毛管中以备交换。与开采金矿脉相比，农民更情愿用淘选盘淘洗金砂。因为矿区浅，含金层很容易找到，淘洗金砂花费不大，矿工无需用镐撬开岩石，也不用寻找或购买柴火。而且，用淘洗盘淘金无需敲碎或烘烤岩石，也无需通过易塌陷的软土层进入危险的隧道。

姆塔帕和罗兹威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帝国境内的黄金生产。[138] 在姆塔帕帝国，估计有近 50%的黄金产量被上层统治者占有。如果谁偶然发现了金矿，他必须将其掩盖起来，并立即报告当地的酋长。对于这一情况，安东尼奥·戈梅斯在 1648 年曾评论道："无论葡萄牙人做何许诺，他们也不会泄露金矿的地点，尽管常常有人试图去寻找，但直 **673** 到现在仍一无所知"。[139] 如果不遵守这一法律，将被处以死刑。[140] 姆塔帕和罗兹威统治者不想让与他们帝国进行贸易的葡萄牙人知道金矿的位置，因为这将诱使葡萄牙人占领该地。而且控制金矿，还可以使他们能够为臣民们获取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

17 世纪黄金生产的衰落

在 17 世纪，采金的危险性不仅导致产量下降，而且最终促使其走向衰落。[141] 有时，洪水冲进竖井，淹没金矿，矿工们溺水而死。另外也有人认为在 17 世纪末，绍纳矿工采掘深度已达到地下水位，在没有新的技术将水及污泥泵出的情况下，继续向下开采几乎是不可能的 。[142] 黄金产量下降的第三个原因是葡萄牙人购买黄金出价太低，以致绍纳农民不愿意再冒生命危险开采。

战争对黄金产量的影响，是至今未作细致探讨的一个方面。17 世纪上半叶是葡萄牙人大举入侵姆塔帕帝国的顶峰时期。对绍纳内政的干预引发了姆塔帕统治者之间以及姆塔帕统治者与进贡者之间的战争。战争毁灭了那些资源丰富且气候适应地区的农业，导致了

[136] 同上。

[137] M. 巴雷托(Barreto)，1899 年，第 491 页。

[138] A. 戈梅斯，1959 年，第 186 页；G. 马西多，1890 年，第 148-149 页；J. 多斯·桑托斯，引自 G.M. 蒂尔，1899-1902 年，第 2 卷，第 280-281 页。

[139] A. 戈梅斯，1959 年，第 185 页。

[140] A. 戈梅斯，1959 年。

[141] J. 多斯·桑托斯，引自 G.M. 蒂尔，1899-1902 年，第 2 卷，第 219 页。

[142] I.R. 菲米斯特，1976 年，第 22-23 页。

临时性和长期性的移民和饥荒。例如在1683年，处于混乱状态的马卡兰加地区“人口减少……因而也无人开采金矿”。[143] 结果，“葡萄牙人靠从河两岸弄些食物，或捡拾露出地面的黄金过活。”[144] 17世纪下半叶爆发了更具毁灭性的昌加米腊战争。连年战争导致居民重新组合形成一些国家。

因此，在17世纪，绍纳兰的黄金生产因战争而崩溃，正如自然灾害致使用于生产的耕地减少从而破坏农业一样。战争对黄金产量下降的影响至今仍被某些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由于地理环境恶劣和变化无常造成的，它严重限制了绍纳开矿采金的能力”。[145]

674 此外，葡萄牙商人采用的方法使他们疏远了与主要负责黄金生产的农民之间的关系。非洲统治者反对葡萄牙人所坚持主张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统治者只能与葡萄牙人进行产品贸易。依照驻守塞纳的弗朗西斯科·费吉拉·德爱尔梅达上尉的观点，当葡萄牙人改变了他们最初的贸易方法时，关系便开始恶化。在16世纪早期，非洲农民往往将他们的产品直接运送到葡萄牙人在内地的集市销售。然而到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向内陆派出中间人，他们将商品“打成小包，外面包上野生棕榈树编的席子，正好能背在背上”给农民送货上门。[146] 德爱尔梅达还报道说，葡萄牙商人通常与三五百当地农民同行，他们“见什么都偷，村里的人纷纷迁移他乡，以免蒙受羞辱”。[147] 葡萄牙人的另一个错误是向非洲农民赊销产品，这些农民经常欠债不还，结果葡萄牙商人不得不雇二三十个农民去收账。如果欠债者还不起，就会成为“商人的奴隶，他们还可以与妻儿在一起，开始做与其他人同样的活计”。[148] 这样一个葡萄牙商人可以得到数百个成为奴隶的中间人。一位非洲统治者曾指出：

> 葡萄牙人给非洲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假如他们要把布卖给非洲人，就应该带给他，而且卖给那些买得起的人，否则就会有人远走他乡，另一些人则被葡萄牙人带走，因此，村里的人越来越少。[149]

到17世纪中叶，犹特乌国王下令，不准他的臣民继续开采金矿，而要“耕种土地，生产粮食，从而致富，而且更加和平与安宁”。[150] 因此，在17世纪黄金产量下降的原因中，社会因素或许比气候、地理因素更为重要。

贸易

贸易记录也提供了绍纳农民经济多样化的历史证据。然而，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创

---

[143] 无名氏，“对夸马河的描述”，阿朱达图书馆，里斯本，51-V11-43和51-7-44。
[144] 同上。
[145] I.R.菲米斯特，1976年，第22-23页。
[146] A.戈梅斯，1959年，第192页。
[147] 同上。
[148] 同上。
[149] 同上。
[150] 同上，第193页。

造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但是商品的生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民相互之间，以及农民与手工艺人之间的产品交换，因而也就导致了区域贸易的产生。这种重要的区域贸易网络将在下面讨论。675

斯瓦希里商人在姆塔帕帝国建立了几个集市。很难准确地说明是什么时期建立的，但是一位葡萄牙冒险家在1514至1515年从索法拉到内地旅行时发现了这些市场的存在。[151]然而我们能够推断出索法拉的第一批集市及其紧邻地区建于10世纪。那时，依靠非洲农民提供食品的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开始与姆塔帕帝国的非洲农民进行贸易。[152] 每星期一逢集，[153] 非洲农民用农产品和金砂换取珠子、布匹和其他的外国商品。对这些贸易的规模以及组织至今了解得很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对食物的需求必然会刺激剩余粮食、大小牲畜以及各种蔬菜的生产。当葡萄牙人在1506年建立要塞时，食物供给的需求增加，要塞也就成了葡萄牙商人与前来出售产品的非洲农民的货物集散地。

该要塞的建立必须放在葡萄牙人始于1498年的商业活动的大环境中观察。当时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他著名的印度航行。正是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获悉索法拉及其腹地的金矿情况，于是伊曼纽尔国王命令在索法拉建立商行代理处。葡萄牙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占领所有沿印度洋的战略要点。索法拉要塞和基尔瓦要塞建于1506年，主要用于保护黄金贸易；其他三个要塞分别建在奎隆、安吉迪乌和红海，以控制胡椒贸易。索法拉因此被纳人葡萄牙人的贸易网，并建立中心以促进葡萄牙人和非洲商人间的进一步交流。如前所述，1506年葡萄牙人甫抵索法拉，他们发现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已牢牢地建立了根基，随后由于几次军事冲突，双方成为敌人。[154] 葡萄牙得胜后，阿拉伯-斯瓦希里人逃至北方，占领了赞比西河沿岸的各战略要地，不断破坏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商道以及通往内地的贸易路线上的商业活动。葡萄牙人迅速反击，将他们从大部分的战略要地赶走。1531年葡萄牙人将塞纳和太特建成主要的贸易中心。葡萄牙人的商业活动也相应北移，676 从而降低了索法拉地区商业活动的重要性。[155]

1512年战败斯瓦希里人以及16世纪30年代对塞纳和太特的有效占领，使得葡萄牙人垄断了商品供给，也结束了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独立的贸易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既无技术又无人力，也因为斯瓦希里-阿拉伯人迫切希望继续在这一地区经商，因而自然地(尽管很不容易)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盟。在随后的一个世纪时间里，斯瓦希里-阿拉伯人成为葡萄牙人在内地的贸易代理人。非洲商人(vashambadzi)在葡萄牙人到来很久以前就为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担当中间人。他们的作用在斯瓦希里-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的联盟中得到进一步的确立。直到17世纪后期，斯瓦希里-阿拉伯人始终在托尔瓦内地秘密地进行贸

---

[151] H. 特雷西(Tracey)和A. 费尔南德斯(Fernandes)，1940年，第20-30页；另见加斯帕尔·韦罗斯科(Gaspar Velosco)的报告，载于《有关文件》，第3卷，第181-189页；A.H. 奎林(Quiring)，1949年；W.A. 戈德洛顿(Godlouton)，1945年。

[152] 《*Archaelogia econtecimento de passado*》，1980年，第4-6页。

[153] 驻莫桑比克商行代理处职员加斯帕尔·韦罗斯科呈递国王的笔记(1572年)，《有关文件》，第3卷，第183页。

[154] 关于这次争斗的详细情况，见A. 罗巴托(Lobato)，1954年a。

[155] 《莫桑比克葡萄牙人的有关文件》，第3卷，第237-248页；A. 罗巴托，1954年a，第19和103页。

易，到18世纪早期，他们已失去了大部分的伊斯兰文化，而接受了伦巴和文达文化。[156]

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失败使葡萄牙商人失去了在赞比西河商道和内地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葡萄牙王室起初的目标是垄断在索法拉和内地的全部商贸。但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贪婪驱使每个商人到内地与非洲统治者缔结独立的贸易协定。正如前面所述，到1541年，在内地经商的葡萄牙商人，大多以致于有必要在姆塔帕帝国组织和调节他们的商贸活动。

如同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一样，非洲农民用他们的产品交换各种泊来品。彼得·加莱克对卢安兹、丹巴拉雷和利姆卡集市的考古发掘表明，珠子是16世纪早期最受欢迎的商品。[157] 最常见的是黑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珠子，它们受欢迎的程度因地而异。但红色和黑色珠子被称为于贝珠，在每一个王国都为人们所钟爱。在葡萄牙人刚抵达这里时，他们发现珠子贸易极为盛行，遂试图控制珠子市场，但终究没有成功。珠子大受欢迎是因为绍纳人有一些广为流传的信念。[158] 他们认为葡萄牙人是从树上采摘的这些珠子。据认为黑珠子是因为留在树上足够长的时间，使其石化转黑而成。在成熟之前采摘即可获得绿珠子，黄珠子是在成熟后而阳光尚未照射变黑之前采摘的。也有各种进口的珠子，包括“珊瑚珠、水晶珠、白镴珠、煤玉珠、琥珀珠以及蓝色威尼斯玻璃珠”，[159] 但是这些并不受人欢迎。结果，一种当地制造的小石珠(caracoes)摆脱了王室对珠子贸易的控制，并于677 1516至1518年期间占领了市场。小石珠受欢迎的程度是欧洲进口珠子的七倍。布匹是另一种重要的商品，尤其是各种色彩鲜艳的布匹很受欢迎，人们用手臂丈量。

为了换取这些商品，绍纳人每天将高粱、玉米、花生、豇豆、篮子、席子、壶、鸡、鸡蛋、蜂蜜、捕获的鸟兽，以及各种蔬菜和野果等，带到要塞市场交易。这种易货贸易也在集市进行，而且大概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集市被破坏时。可能与西部非洲市场一样，[160] 商人依其出售的产品和性别划分，妇女或许出售与男人不同的商品。大多数铁匠、其他手艺人和矿工彼此之间或与葡萄牙商人交换商品。农场主找到了出售牛、绵羊、山羊或猪的现成的市场。索法拉要塞以及内地集市深深地植根于绍纳社会之中，并且成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本部分。

绍纳地区的集市

在1575至1684年期间，非洲农民和葡萄牙商人间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葡萄牙商人通过适应进而将当地市场转变为葡萄牙集市，巩固了他们在商业和军事上对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的胜利。当地的非洲酋长允许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集市，集市很快成为非洲人与葡萄牙人商业交往的焦点。这些集市通常有一大片区域，围着低矮的木栅，在金矿区附近，

[156] D.N.比奇，1984年，第32页。
[157] P.S.加莱克，1954年。
[158] A.戈梅斯，1959年，第196页。
[159] P.S.加莱克，1954年，第43页。
[160] E.P.斯金纳(Skinner)，1964年，第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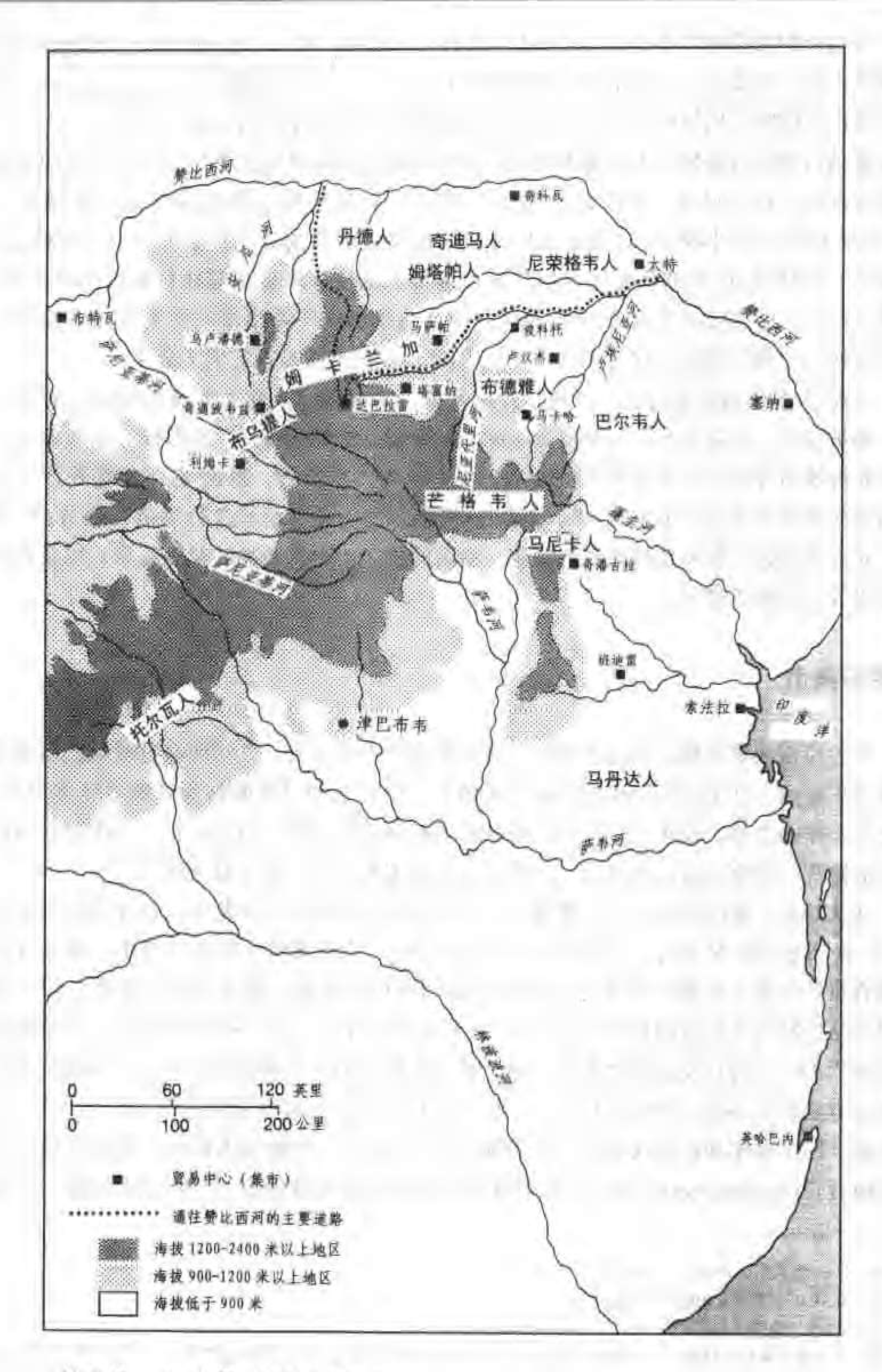


插图 22.4　16 和 17 世纪的主要集市

资料来源：根据 H.H.K. 比拉所著《绍纳王国的贸易与政治：马尼卡人及其非洲与葡萄牙邻邦，1575-1902 年》地图 3 改编，伦敦，朗曼。蒙英国朗曼集团有限公司允许改编。

有一些用杆和泥搭建的小屋。[161] 每个集市都有一个要塞，有一支由10至15人组成的驻军，从理论上说，还要有一个教堂和一个牧师，以及一位“卡皮丹-摩尔”（capitao-mor）。有些集市是由塞纳河流域管理部门负责管理，而其他集市则属于私有。在18世纪，卡皮丹-摩尔在塞纳河流域的葡萄牙人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界定，类似于中世纪葡萄牙集市护卫的作用。在马尼卡、布特瓦和卡兰加地区，卡皮丹-摩尔的地位类似于莫桑比克岛的“巴尼安的卡皮丹-摩尔”以及组成同业协会的其他类似的商人代表。他们的报酬（soldo）679 仅仅是一种补助，以塞纳葡萄牙人居住地挑选富人出任该职是葡萄牙行政官员的政策。在莫桑比克岛，巴尼安的卡皮丹-摩尔通常是由来自第乌的印度最富的商人但任。莫桑比克鲜为人知的“穆罗斯的卡皮丹-摩尔”也是如此，他们常常是富有的大船主。

卡皮丹-摩尔的职责包括：征税、控制价格、为葡萄牙人和非洲商人仲裁、颁发许可证、保护商队、招募士兵，以及负责实施与度量衡有关的法律。[162] 这些权力和职责在与不同的非洲统治者的交往中有较大的变动。集市作为一个机构，根据1531年葡萄牙王室发给索法拉和莫桑比克的卡皮丹-摩尔文森特·里加多的一系列指示进行规范和调节。[163] 这些指示对商品流通、称号及执照税的确定、商店的设立、出售商品的执照起草，以及裁决法律诉讼等方面做了规定。

主要的集市

丹巴拉雷的集市被认为是塞纳河流域所有集市中最好的。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塞纳富商都在这里经商，并由此向奇通波韦兹、利姆卡、卢安兹和马塔弗纳等其他地区拓展贸易。丹巴拉雷作为总部，仅次于盖茨长官所在的马萨帕政府总部。丹巴拉雷集市距离安格瓦有三天的路程。安格瓦有许多黄金，但因为远离塞纳和太特，而少有人居住。[164]

在犹特乌，情况与此类似。葡萄牙人每年在班达尔举行一次集市，以便购买内地的物品。[165] 这一习俗从16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早期，特乌统治者停止了集市。葡萄牙人声称拥有班达尔集市是蒙哈姆塔帕在1580年赐与他们的权利。理论上或许如此，但是姆塔帕对包括犹特乌等封国的控制至1580年几乎已经不存在。每年的交易集市，正如随后历史所表明的，由特乌统治者执掌和控制。特乌控制葡萄牙人贸易的方法，与其他绍纳社会的控制方法稍有不同。例如在马尼卡，集市贸易是由国王和市场所在地区的王子或公主亲自控制。国王偶尔和他的议员们一起拜访卡皮丹-摩尔。但是在犹特乌，集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村长（inyamasango）管理，村长对班达尔的管理拥有管辖权。[166] 他每年要向“萨奇特

---

[161] P.S. 加莱克，1954年，第49页。

[162] M.D.D. 纽伊特，1973年，第43页。

[163] J.J.T. 波特罗（Botelho），1936年，第146页。

[164] 关于单个集市的讨论，见“安东尼奥·博卡罗所著葡萄牙人在东方十年业绩摘要”，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3卷，第354页，阿朱达图书馆，里斯本，51-VII-40；“关于夸马诸河的简要叙述，”菲利普·德楚莫神父（Philipe de Tsumao）所著。

[165] J. 多斯·桑托斯，引自G.M. 蒂尔，1899-1902年，第2卷，第380-381页。

[166] R. 巴普蒂斯塔（Baptista），1892年，第14页。

乌"(sachiteve)贡献一件土耳其外衣、一块棉布、一顶便帽、一块亚麻布、一只斑鸠(rola) 680 以及一些孟加拉麦斯林纱。很明显，这些物品的色彩都要是黄的，用以象征班达尔黄金储量丰富。1890 年罗纳多·巴普蒂斯塔所做的勘测证明了金矿的丰富。在 18 世纪早期宗博和米冲加建立之前，葡萄牙人在赞比西河北部似乎没有建什么集市。[167] 米冲加和宗博集市发展较晚有两个原因：在 18 世纪赞比西河北部发现金矿，在 1693 至 1695 年，葡萄牙人被罗兹威皇帝敦博·昌加米腊从绍纳地区驱逐后，需要到别处寻找新的贸易地区。

葡萄牙人被昌加米腊从他们的集市上驱逐以后，被迫采用在 16 世纪用过的贸易方法。在他们放弃马卡兰加集市的同时，又于 1710 与 1788 年间在卢安瓦河与赞比西河的交汇处——宗博，建起一个新的集市，并逐渐依赖"瓦香马兹"(vashambadzi)来开展与罗兹威帝国的贸易。[168] 1719 年葡萄牙人在马尼卡得以重建马塞凯萨集，但在犹特乌却未能卷土重来。在姆塔帕帝国时期，已不可能实行由一名专职官员来协调葡萄牙人与非洲统治者的关系这种制度，因为在非洲统治者中缺乏有效的中央政治权力。因此，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 18 世纪葡萄牙人与一些重要的非洲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在东部，犹特乌国王不允许葡萄牙人在他的王国的矿区开采黄金，而他的臣民们则可以在塞纳的葡萄牙人居住区购买布匹和珠子。即使在这样的贸易中，国王及其王孙贵族被葡萄牙商人指责为对其商品"引起了无穷的危害"、"抢劫"，以及破坏。而葡萄牙人大部分利润被用来谋求安全。特乌在 18 世纪的政策是明确地反对葡萄牙人。[169] 在马尼卡王国内，允许葡萄牙商人自由通行，但他们的贸易活动受到马尼卡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卡皮丹-摩尔和葡萄牙商人定期向统治者缴纳贡税。

同样，为了保证宗博集市和通向布特瓦的贸易路线的安全，葡萄牙商人定期向昌加米 681 腊进贡。这笔花费很大，而且昌加米腊经常派使臣到宗博集市索要额外礼品，其价值常常达六帕斯塔(pastas)，超过了通常的税额。[170] 1757 年丹德王子齐林巴劫掠了运往布特瓦的商品，这次事件表明这条从宗博经由丹德地区至布特瓦的商道并不安全。在其后的七年里，昌加米腊国王和他的士兵以及布特瓦的黄金生产者不断袭击，使一度繁荣的布特瓦贸易最终被毁。昌加米腊在 1756 至 1757 年发动了一场有名的攻击，一举没收了价值 1000 帕斯塔(合 800,000 克鲁扎多,cruzados)的财产，这是一个适例。[171] 宗博的贸易在 18 世纪 60 年代也因连年内战和饥荒而受到影响。尽管遭到葡萄牙人袭击，昌加米腊人仍珍惜与葡萄牙人的贸易。罗兹威统治者分别在 1743 年、1772 年和 1781 年三次派远征军保护宗博集市，以防邻近非洲统治者的攻击。除了珠子，罗兹威统治者特别感兴趣的物品还包括：伞、海

---

[167] A. 罗巴托，1954 年 b，第 43 页及以后诸页；H. 卡佩罗(Capello)和 R. 伊文斯(Ivens)，1886 年，第 2 卷，第 306 页。

[168] 宗博一词系指葡萄牙人于 18 世纪在赞比西河和卢安瓜河汇合处先后建立后又废弃的三个定居点。第一个亦即最早的定居点约 1710 年建于赞比西河的奇塔卡提瓦岛；第二个于 1715 年建于赞比西-卢安瓜河交汇处的莫桑比克三角地；第三个定居点称为姆卡里瓦，建于 1788 年 10 月，在现今的赞比亚地图上简称为"费拉"。

[169] X. 凯塔诺(Caetano)，引自 A.A. 安德雷德，1955 年，第 155 页。

[170] H.H. 比拉，1982 年，第 119 页。

[171] 同上，第 119-120 页。

贝、假珊瑚念珠、瓷器、铜铃、剪刀以及一种白兰地(aguadente)。[112]

在18世纪，姆塔帕和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葡萄牙人仍然保持一支20人的守卫队、一名卡皮丹-摩尔、一名上尉、一名总司令以及在姆塔帕王宫的一位多明我修士。此外“姆塔帕统治者将洗礼这一旧习俗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些国王均妻妾上千或更多，平时的作为丝毫不像基督徒。[113] 16世纪的另一习俗也一直持续到18世纪：

> 国王每隔三年都要派使臣到塞纳拜见将军，将军总在到任的第一年在太特会见使臣。他们讨论继续维持与国王业已建立的国家联盟，以及宗博商人过境所必然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果出现在三年一度的会晤范围以外的商业问题，双方将分别派使臣与对方会商。[114]

尽管有这些协定，但葡萄牙人与姆塔帕统治者之间的贸易在18世纪持续下降。这一682衰退与18世纪赞比西亚南部地区三大事态的发展有关。第一，伴随着赞比西河以北地区的淘金热，个别葡萄牙冒险家发现了金矿，他们开始自己开采金矿；其次，黄金生产到18世纪末几乎全面衰落；第三，赞比西河两岸的非洲人和葡萄牙商人均猎杀大象以获取象牙。

象牙贸易在姆塔帕帝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16世纪葡萄牙人的有关记载，在姆塔帕帝国，大象常常“像牛群一样四处游荡”，[115]“每年有四五千头大象死亡，大量的象牙被运往印度便可证实”。[116] 猎杀大象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不像采金那样，易受非洲统治者控制，因为猎杀大象通常发生在偏远地区。然而，对于猎杀象的组织却知之甚少，但有迹象表明，在18世纪，猎杀大象多数发生在布赫拉和利姆卡地区。[117]

结　论

葡萄牙人对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渗透，危害了当地统治阶级的权力，有利于葡萄牙商业资本以及后来英国在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工业资本对农民的直接盘剥。地区贸易网络与长途贸易的结合产生了被称为“瓦香巴兹”的非洲商人阶层。随着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以及葡萄牙人分别在10世纪和16世纪初抵达该地区，一些非洲人受雇充当外国商人与非洲农民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

葡萄牙商人主要关心黄金及象牙贸易，结果，区域贸易的主要商品如铁、盐和铜在商业意义上降到了次要地位。到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商人渗透到姆塔帕帝国的内地，集中从事盐、铜、铁，以及黄金和象牙等商品的贸易。一种商品贸易刺激了另一种贸易，从而出现了非洲商人阶级。长途贸易的繁荣必然需要黄金、象牙和搬运工，需要有食物供养

[112] H.H.比拉，1982年，第119-120页。
[113] 无名氏，“关于夸马诸河的叙述”，1683年，阿朱达图书馆，里斯本，51-V11-43。
[114] 同上。
[115] G.M.蒂尔，1899-1902年，第6卷，第266页。
[116] 同上。
[117] D.N.比奇，1984年，第35页。

这些搬运工，因而就要有锄头去耕种庄稼，要有铁打制锄头。瓦香巴兹不但运输象牙和黄金，也运盐和铁锄，用以在路上换取食物。紧挨着贸易路线居住的非洲农耕者生产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多并卖给商人和他们的搬运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逐渐发生变化。无需说，这些对于他们所售商品的国际价值一无所知的非洲农民遭到葡萄牙商人无情的剥削。

（刘乃亚　译）

23 依附与相互依存：1500-1800年的南部非洲

D. 德农

683 在1500至1800年间，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变化。新的社群在此安居，很多已生存于此的社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居住地，或两者均有所改变。社群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以前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剧烈的变化大多是由于南部非洲与外部的联系发生变化所致。当第一个欧洲人瓦斯科·达·伽马在1497年航行绕过好望角时，南部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很少的联系。但到1800年时，这个地区已深深陷入了全球贸易和战略的格局中。在试图估价世界性变化对南部非洲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分析这一变化本身的来龙去脉。

在1500年，世界主要人口聚居地分布在地中海周围和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洲都没有纳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正常关系中。尤其是国际贸易，只涉及欧洲和亚洲，几乎完全是通过陆地进行，耗资巨大。[①] 达·伽马出航的目的是探寻一条海上航线，以减少国际贸易的费用，并扼制陆路贸易线上的许多中间商强取豪夺。对于首先开辟海上贸易航线的葡萄牙人以及随后通过好望角的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来说，南部非洲只不过是航海的一个危险地带。尽管对其海岸线的勘测逐渐结束了它的孤立状态，但阿拉伯和欧洲的商人对此地区向来兴味索然，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铁器时代晚期，南半球的温和气候并非很吸引人。即使在适宜耕种的地区，仅靠落后的工具很难生产出稳定的剩余食物，而剩余产品也难以储存或投入再生产。南半球的温带地区，包括澳大利西亚、南美洲的南端地区，人口密度要比邻近的热带地区低得多。热 684 带地区养育的人口密度相对较高，有可能提供剩余产品并实行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因此温带地区不能吸引国际商人毫不奇怪，因为那里无法经常生产出可供出口的产品，而且直到近代拥有了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改进的运输条件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②] 沿东非海岸经营贸易日益繁荣的阿拉伯商人，并不想到更远的南方，因为他们的主要货物黄金、象牙和奴隶在热带海岸比在大陆南端的温带地区更易于获得。同样，欧洲人也因本身缘故在航行绕过好望角150年之后才对这一地区产生兴趣。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抛锚地称为阿尔戈阿和德拉瓜，说明了他们前往和离开果阿的决心，以及对南部非洲开展贸易的可能性缺乏兴趣。

海上的影响不大，陆地上的联系也微不足道。南部许多社群与北部有历史和语言上的联系，但这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意义。科伊科伊人沿南部海岸地带放牧、捕鱼和采集食

① F. 布鲁戴尔(Braudel)，1981年，第1章。

② D.J.N. 德农(Denoon)，1983年。

物、实际是离群索居，与北部大都没有联系、南部内陆地区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桑人也是如此。操恩古尼语的民族主要生活在分界地区的东部，在 1500 年与北方邻邦几乎没有经常性联系。再往西(今天的纳米比亚)，赫雷罗人和奥万博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北方邻邦之间，在语言上有密切的联系。中部的茨瓦纳人和索托人不时到北方进行贸易，但即使开展贸易，货物数量也很少，而且交易的商品包括铜、铁、臼(dagga)、并非生活必需品。[③] 直到 1500 年，这些社群实际上仍独立于世界之外，与外界的联系时有时无，而且是临时的和边缘性的。欧洲人的船队不时停靠岸边，补充饮用水和供给，在下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内对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欧洲人对这一地区迟迟不感兴趣，但它最终显示出自己的威力。17 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过将南部非洲视为通向东方的驿站，在好望角设立了一个新的社区。直到 1800 年，"开普敦已是一个朝海的社区，是全球香料外围贸易的商栈"。[④] 其特点是"常驻之城，在风气上更接近亚洲而不是它所在的非洲大陆。"[⑤] 无论怎样，建立开普敦殖民点的地区性影响比公司计划所能设想的要深远得多。尽管没有解决是由荷兰人(1652至 **685** 1795 年控制好望角)还是由英国人(1795 年夺得好望角)来治理，整个地区已与欧洲和亚洲产生了牢固的联系。开普新殖民区已经且将继续成为对新的外部压力和刺激作出迅速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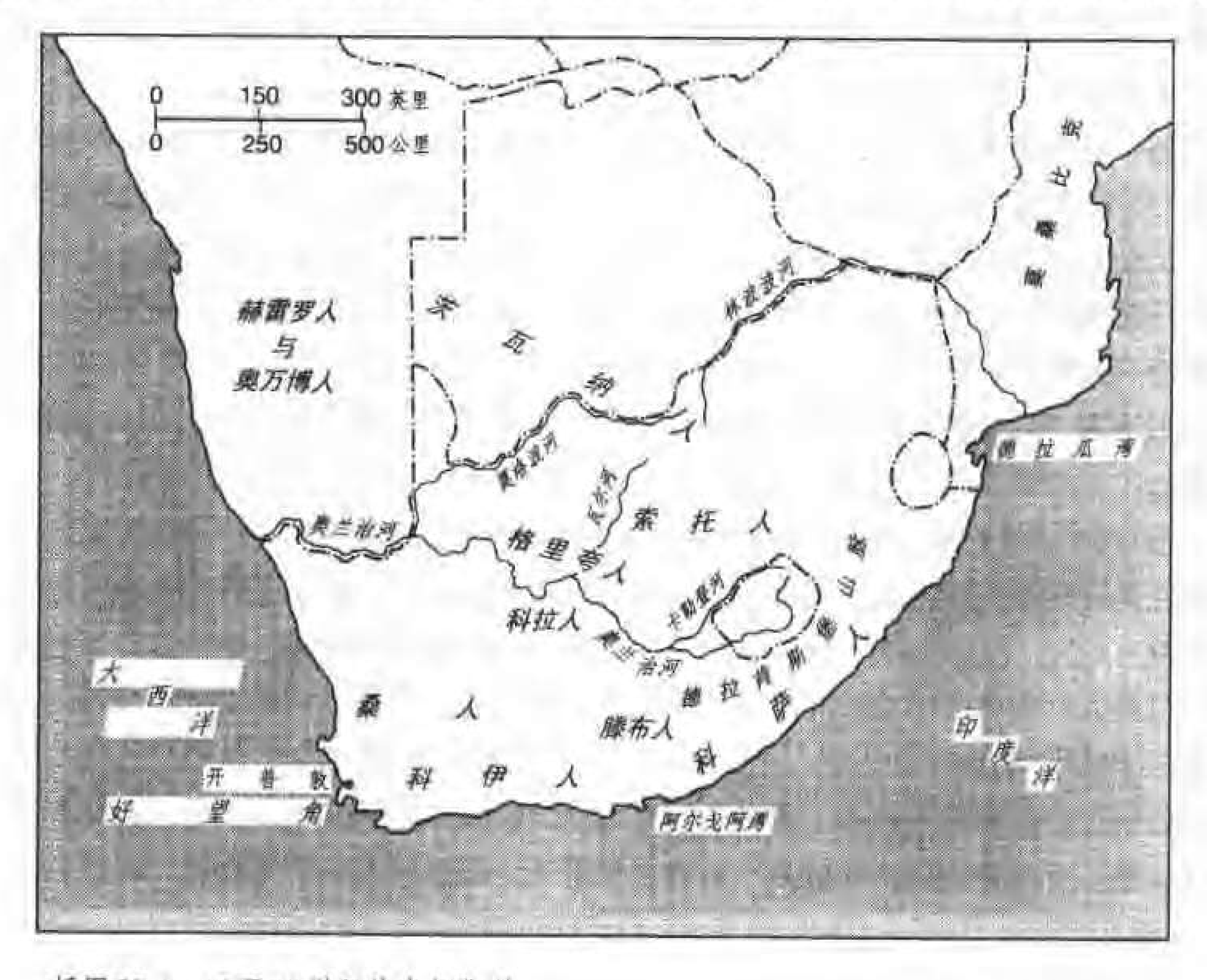


插图 23.1 16 至 18 世纪的南部非洲

③ M. 威尔逊(Wilson)，1969 年 a。

④ R. 埃尔菲克(Elphick)和 R. 谢尔(Shell)，1979 年，第 161 页。

⑤ 同上，第 126 页。

的属地。由于这一属地的范围已扩展到内地，它将整个地区纳入了一种支配和依赖的持久的新关系之中。通过这小小的定居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入了该地区，再加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激烈而彻底地改变了南部非洲，其程度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任何地区。这些发展便是本章论述的焦点。

重现16世纪的情形和事件是可能的，但在评述这些情况时要做到在学术上不偏不倚却不容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旦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他们这些能独立生存的群体就要被毁灭。农耕者大量生存下来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游牧民族没有这么幸运。澳大利亚土著、红种印第安人、高乔人、西伯利亚人和南部非洲的游 **686** 牧民族的普遍灭亡，强化了我们按照惯例评价过去和现在的那套理论，因此一些学者几乎毫不掩饰他们切望游牧民族发展为农耕者，并最终成为工业无产阶级。⑥ 至少美洲印第安人留下大量的证据，可以构成想象、有时是浪漫地重现历史的基础，⑦ 而南部非洲的游牧民族被毁灭或改造得太早，太广泛，以致无法产生这种文学创造。⑧

16世纪流行于南部非洲的一些关系非常有意思，与所有有关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相悖。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社群之间实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这些专业化社会彼此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符合各自生活方式的持久性。狩猎者没有发展成为游牧者，游牧者也没有成为农耕者。尽管有时的相互作用表现为敌对，但一般还是共处的。要想获得对这些关系日益发展的正确认识，值得花时间重新考察这种相互作用。

南部非洲的西半部，包括今天的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每年只有不足40厘米的降雨量，这一带的少数地区年降雨量虽高于平均值，但因土壤渗水性强，水分保留不多。主要的例外是开普半岛的内地，那里冬天经常降雨且雨量充沛。西半部的绝大部分地区降雨稀少，而且无规律，⑨ 没有理由去设想16世纪的气候状况与现在有明显的不同。这一地区的居民没有筑坝和贮粮的技术，因而没能发展农业。即使是20世纪的技术对该地区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只是筑坝拦水便于畜牧业生产。由于居民不能从事农业，因而选择狩猎、采集或畜牧业证明是具有明智的适应性，而不是往常被含蓄地指责的落后。

从事狩猎-采集的桑人群体的起源和历史笼罩在神秘的误解中。他们16世纪所讲语言的多样性是许多世纪以来适应南部非洲西半部环境的表现。⑩ 那时从事狩猎和采集不像现在这样没有危险。他们轻装上路、对生活的领地和动植物了如指掌，很少冒险越过熟悉的地带，只要人口密度的增长没有超过环境资源的承受力，狩猎的队伍会相当安全。⑪ 据报 **687** 道每支狩猎队平均有50至70人，有大量的土地可以随意耕种和集中放牧，也有大量的野兽可供猎获。狩猎和采集提供了不必依赖其他社会的可靠生活方式，但桑人还是和其他民族相互接触。有时狩猎群体会依附于畜牧业保护者，通过交换猎物或提供野兽迁移情况获

---

⑥ R.L. 米克(Meek)，1976年。
⑦ P. 法尔普(Farb)，1969年，第7、8和14章。
⑧ J. 赖特(Wright)，1977年。
⑨ N.C. 波洛克(Pollock)和S. 阿格纽(Agnew)，1963年。
⑩ R. 埃尔菲克，1977年，第1、2章。
⑪ M. 萨林斯(Sahlins)，1974年。

得奶制品。虽然狩猎者依附于人，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是压迫关系，因为桑人始终保持重新依靠自己专事狩猎的自由。一些狩猎群体生活在内地中西部以外地区，还有些狩猎者直到19世纪还生活在德拉肯斯堡山脉脚下，他们偶尔袭击当地混合农耕者的牛群以补充食物。⑫ 这种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之上，但由于存在老人和小孩以及其他不宜活动者使流动性受到削弱。因此，狩猎这一生存方式本身便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使之不致于危及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平衡。流动的需要还加强了另一种限制：财富的积累会妨碍队伍迁移的速度，从而降低生活水平。

埃尔菲克对科伊科伊人起源的证据作了精妙评论，并提出最可能的解释是，桑人群体早在1500年以前就驯养了牛羊，并带着牛羊，沿内地的河岸地区扩张，进入南部海岸地带，16世纪欧洲的旅行者就是在这里看到他们。⑬ 拥有畜群意味着科伊人必须靠近水源充足的地区，而并非在不毛之地游荡，而且人口缓慢增长，群体的规模也逐步扩大。由于牛可以运载行李，科伊人便随时搭建帐篷，而不必每到一地便建新居。同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也不再是累赘。可以小规模地积累私人财产(甚至以畜群的方式大量积累)，在这些游牧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形成阶层，有别于更平等、财产更少的桑人社会。实行社会控制的需要并未使科伊人建立一种正式的政权结构，但是个别人确实在其氏族中行使权力，在与欧洲商船偶尔进行贸易的早期，一些人聚集了相当多的权力和家畜财产。

在好年景，放牧较之狩猎能提供较高水平的消费，但牲畜易受干旱和瘟疫的袭击，战时还会被盗和被充公。每当遇到这些灾难，科伊人常不得不靠打猎维生，至少维持到他们逐步聚集起新的畜群为止。放牧所要求的知识和技术与狩猎相差不多，因此在必要时，科伊人可轻易地回到桑人的状态。⑭ 靠近开普半岛的地区狩猎机会有限，失去财产的牧人逃到海边，靠鱼贝为生，直到有了自己的牲畜或依附于较幸运的畜群所有者。这种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生活或许是不稳定的，但并不悲惨。一只在好望角加水的船，将一名罕见的科伊人带上船出海，他没有发现什么可以招致对家乡的不满。⑮ 688

科伊人和居住在其领域东侧的恩古尼人的相互影响超越了十分清晰的文化和技术的界线。科伊人和科萨人相互作用的地区是良好的牧区，却不利于农耕，因为那里一年的降雨量仅略多于40厘米。科伊人和科萨人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生态学上的差别，双方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如此。相互渗透则似乎是共同的。⑯ 个别科萨人放弃了定居和农耕而从事畜牧，有时狩猎。一旦遇到危机，科伊人就依附于在附近定居的科萨人，因为农业生产能比放牧更快地从饥荒状态中恢复过来。在混合农业和专业游牧之间肯定存在双向交易，一般是小规模的，偶尔是大量的。罗伯特·罗斯通过考察戈纳夸人、夸纽克惠比人和恩廷德人社会证实了这种关系。他认为他们以前都是科伊人，成为混合农耕者后，在语言和传统上

⑫ J. 赖特，1971年。
⑬ R. 埃尔菲克，1977年，第1章。
⑭ R. 埃尔菲克，1977年。
⑮ 同上，第4章。
⑯ R. 罗斯，(Ross)，1978年。

均融入科萨人社会。然而，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从放牧到农耕的单一变化。在体质上，戈纳夸人更像科萨人，而不太像科伊人。所以在18世纪以前，他们可能已发生了不只一次的变化(从农耕到游牧,然后又回到农耕)。证据大多来自于科伊人承受巨大压力的18世纪，但我们既不能肯定此前几个世纪科萨人在不断地扩张，也不能认为科伊人的领地一味地缩小,⑰ 这是较早的历史学正统派所坚持的观点。只有根据事后的认识，才明白科伊人的畜



图片23.1 戈纳夸(格里夸)猎人

⑰ G.M.蒂尔(Theal)，1910年。

牧劳动似乎是一种过渡性的过时的生活方式。在本章论述的大部分时期里，科伊人与其他专事放牧者发生了很强的相互作用，但并未牺牲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活力。

多年来对东南部非洲混合农业社群的研究因历史学家们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一直陷入混乱状态：来自热带北部的大迁移是何时开始的？[18] 如今已很清楚，这个问题是设想错误，是因白人殖民者为使其所占土地合法化的需要而引起的。稳定的、短期的和小规模的迁移比大量人口的快速迁移更为普遍。 690

到1500年，恩古尼人和索托人也进入铁器时代晚期，铁得到普遍使用，铁器加工相当广泛，虽然并非所有的工具和武器都是金属制作的。铁器对混合农业社会的重要性需要做些说明。游牧和狩猎社会(如16世纪的科伊人和桑人)几乎不需要铁器，而完全依靠石、骨、木和纤维制作物品。铁器带来了便利，科伊人从早期与好望角的船只偶尔的贸易中得到铁器而且需求量很快达到饱和。[19] 对于混合农耕者来说，没有铁器进行耕作也是可能的。如在美拉尼西亚，采用铁制工具前，混合农耕者已发展起复杂而繁荣的农业近5000年之久，但铁器引进之后，大大节省了人力。[20] 在南部非洲，混合农耕者只用很少的铁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也有1000年的历史。因此在铁器时代晚期，丰富的铁器并没有带来新的生产过程，但的确使当时的方法更简便，也更多产。使用铁制工具开垦和锄地，效率大大提高，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手工业如制陶和发展畜牧业。考古资料表明，在铁器时代晚期，家庭驯养牲畜和陶器大量出现。[21] 反过来，这意味着生活更为舒适，每个社群内部的劳动分工加强。

关于1500至1800年间在分水岭东部恩古尼人社会生活情况的文字记载不相等，而且仅凭印象，[22] 因此主要依靠研究现存的实物并辅以流传的口述资料再现当年的情况。[23] 当时生活的物质基础是谷物和家畜，由于引进玉米，在18世纪改变了对高粱的传统依赖，尽管玉米在低雨量区不太适宜种植，但仍有较高产量。[24] 玉米的高产还有利于扩大家畜饲养，而畜牧业通过牧场的组合及季节性迁移放牧以利用甜草和酸草等不同草质的牧场，达到最佳状态。这种混合农耕可能会因气候的变化而更为困难，对此霍尔提议将整个东部海岸地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5] 特别是在18世纪上半叶降雨量普遍减少，18世纪末发生严重干旱，加剧了人们对于干旱年月尚可利用的牧场的竞争。 691

当时的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数字。皮尔斯估计，即使加上前一个世纪或更早些时候的前科伊人，到1800年，讲科萨语的人不过10万，[26] 如果这些数字能代表东部海岸地区的情况，那么在1500至1800年间，尽管采用粗放型农业和畜牧业经营方

[18] 同上。
[19] R. 埃尔菲克，1977年，第4章。
[20] R.F. 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962年；D.J.N. 德农和C. 斯诺登(Snowden)，1981年。
[21] G.M. 霍尔(Hall)，1976年。
[22] M. 威尔逊，1969年b。
[23] J.B. 皮尔斯，(Peires)，1981年。
[24] G.M. 霍尔，1981年。
[25] 同上。
[26] J.B. 皮尔斯，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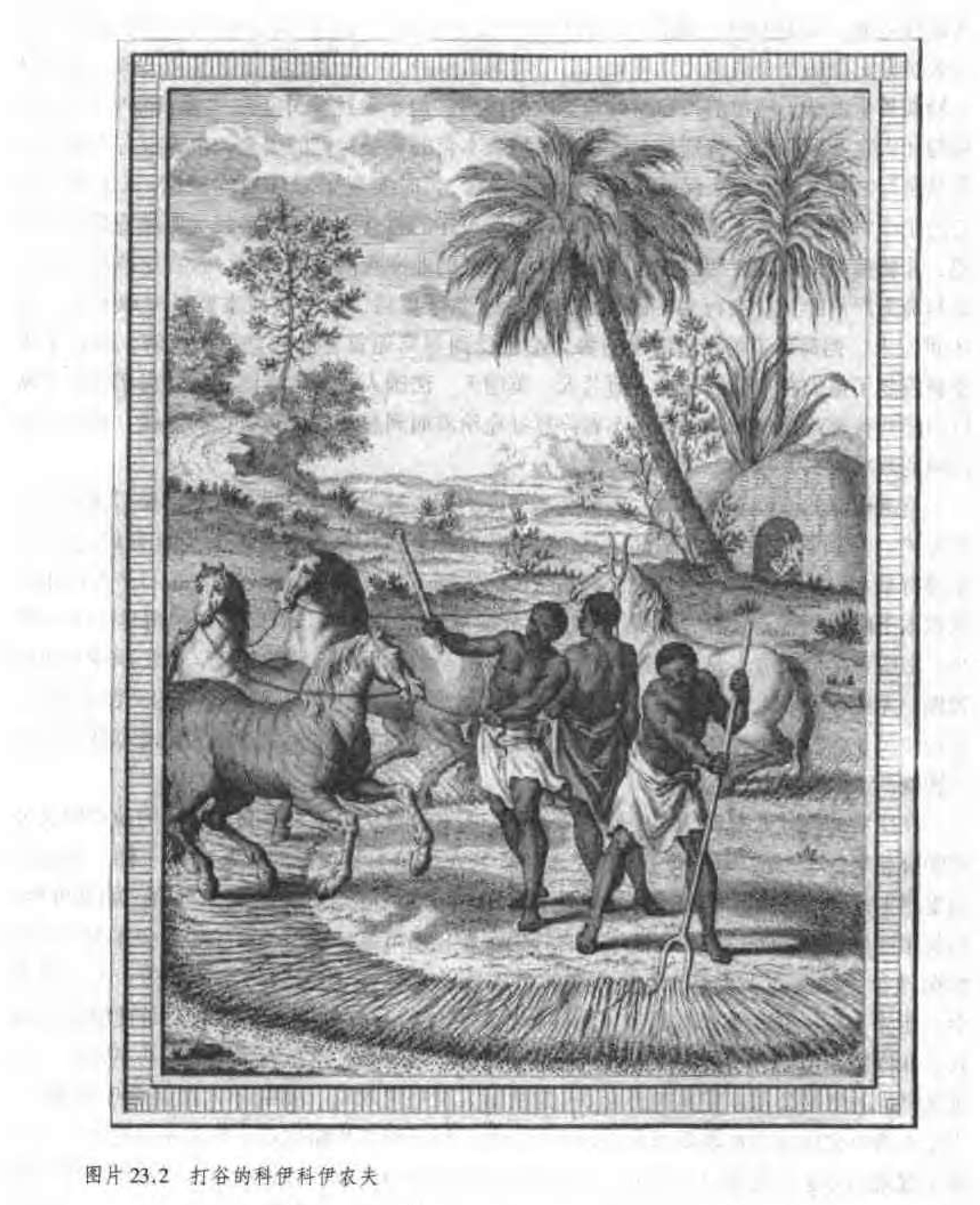
式，但人口的增加从未对土地造成严重压力。这对于分析这一时代所记载的恩古尼人的政治制度很重要。恩古尼人的基础构成以及独立生存所不可减少的单位是占有家畜和使用土地者的家庭。主要出于日常生活的目的，家庭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几乎可以随意地与其他家庭进行贸易，交换产品和妻子。实际上每个家庭通过父系血缘关系形成家族，继而成为氏族。例如，从茨哈韦时代开始，科萨人就通过对茨哈韦后代王族的效忠松散地联合起来。这一王族的首领没有什么制裁手段可将其权力强加于其他操科萨语的氏族，只是利用婚姻关系和礼物，使其他氏族(包括非科萨人氏族,如邻近的科伊人)感恩于他。占有妻室、礼物和土地的能力最终取决于王族家庭拥有超过其他家庭和氏族的能力。通常酋长的妻子多于其他人。因此也就有更多的生产单位，但是对于平民百姓占有许多牲畜和妻子并没有特别的限制。[27] 因此酋长的有利之处并非总是很多。而且与酋长集权的雄心相比，平民同样也有远大志向，包括希望尽可能摆脱酋长的各种要求。处于统治地位的科萨人民族内部和恩古尼社会中不断发生的纷争，无疑受到一些有思想的平民的鼓励，他们试图通过中央权力内部混乱使之瓦解。这些对管理方面专制体系发展的种种限制直到18世纪末才被打破。在以前，日常生活似乎是轻松的，而且往往令人愉快。当时，的确有个别惨遭不幸的白人进入恩古尼人家庭，有的留下了记载，他们并不急于回到原来等级森严、严密控制的社会中去[28]。

693 对于德拉肯斯堡山脉西部的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情况知之更少,那里较少的降雨量使牲畜混合农业制度比分水岭东部更为重要。在16世纪，来自林波波河以北的一些袭击曾带来危险,[29] 到18世纪末，更加直接的威胁来自一些向北迁移进入奥兰治河和卡勒登河河谷地区的新群体。在两条河之间，索托人、茨瓦纳人肯定与科伊人、桑人、恩古尼人以及绍纳人相互交往，因为在所有方向都有小规模的贸易,[30] 但就目前所知，不可能谈得更多。

可见，南部班图人社会也像桑人、科伊人那样，与其他专营族群相互作用，但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也没有改变与之交往的对象。皮尔斯引用了科萨人酋长与科伊人群体，如17世纪的柴诺夸人结盟的证据，并将此解释为一些科伊人从属于居领导地位的科萨人。[31] 但是由于科萨人酋长统治、甚至安顿科萨人都很困难，这种说法值得怀疑，特别是说科伊人似乎将这种联盟看做是长期的安全保障而不是日常的附属。无论如何，即使科萨人的要求得到承认，相互作用的情况也只表明每一专门行业的永久性存在。由此看来，不同的非洲人群体能够长期共存，而不会出现一种生产模式凌驾于另一种模式之上的情况。

有关荷兰在开普敦殖民及其扩张和对这一地区每个人生活的影响的描述支配了南部非洲的史学研究。事实上，葡萄牙人是首先航海绕过好望角的，而且是最早在此建立永久性殖民地的欧洲人。虽然葡萄牙人殖民地建立较早，延续时间较长，但影响却不大，相比之

㉗ 同上。
㉘ 同上；和M.威尔逊，1960年a。
㉙ M.威尔逊，1960年a。
㉚ R.埃尔菲克，1977年；和J.B.皮尔斯，1981年；和M.威尔逊，1960年a。
㉛ J.B.皮尔斯，1981年，第20-24页。



图片23.2 打谷的科伊科伊农夫

下便会发现，荷兰殖民地具有某种革命性。

16世纪的葡萄牙是个封建、弱小而贫穷的国家。其海外扩张作为对印度的贸易垄断，由君主组织进行，受到教会的支持，但缺少有技术的人力资源，使其管理方式和性质形成渗透性影响。到1570年，葡萄牙海外统治中心是果阿，海上航线由控制着从德拉瓜湾到今天坦桑尼亚的整个莫桑比克海峡的各个要塞来保护。[32] 凭借优良的船舰和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占据了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的港口，但军事优势并不能代替日常管理机构。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特别是在已成为区域大本营的莫桑比克的安全，由控制着大陆但并非总是与之相连的要塞来保证。这是个海上帝国，暂时实现了对陆地的控制。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个封建帝国，王室出售高官要职以赚取每年的收益。殖民地移民主要是葡萄牙的罪犯、非葡籍商人以及短期冒险家。他们承认既存的非洲统治者的权力，并在这些统治者中引起最为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因此通过黄金、象牙贸易，后来是奴隶贸易牟取暴利。到16世纪末，葡萄牙帝国在印度洋的势力由于受到与其他贸易国的竞争而瓦解，阿拉伯人重新恢复了他们在东非的领地，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印度牢固立足。由于开辟了从欧洲经开普敦或毛里求斯、甚至不需停靠补充给养而到达亚洲的更直接的航线，莫桑比克海峡的战略意义大减。

694

莫桑比克的开发毫无成就，葡萄牙和印度的商人努力成为中间商，而不是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土地被划分为普拉佐(prazo)，租给普拉泽罗(prazeros)，这些土地具有封建性质，是维持基本生活的采邑，不是进行商品生产的农场。象牙、黄金和奴隶等出口产品的供应依靠本土的收集者，这种开拓只有与土著社会联合才能实现。因此在好望角这个人口稀少、资源不足的地方，是不能给葡萄牙人提供机会的。即使在莫桑比克，由于缺少有效的管理，无法顾及商人的长期利益，致使贸易堕落为短期的抢劫。商业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实行殖民化而没有殖民者，这种状况无疑破坏了东南部非洲，使之不能完成既有社会的持久转变。

在反对葡萄牙人贸易垄断的长期斗争中，所有有意从事亚洲贸易的较小的荷兰贸易公司联合起来，于1602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像当时英国的贸易公司一样，该公司由受到王室支持的商人建立，其目的是在特定区域之间实现贸易的国家垄断。如果可能，则是国际性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任何宗教狂热情绪，对于改革后的教会作为宗教组织在改革后的欧洲不再享有教育垄断权并不顾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十七人董事会，能够一心一意追逐贸易利润。同样重要的是，公司能提供大量经费，而且偿还期很长。在好望角建立有设防的定居点正好需要这样一笔经费，这只有富裕的、头脑清醒、有远见卓识的贸易公司才能承担得起。[33] 像法国人在毛里求斯、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那样，十七人董事会认为开普敦要塞是保证亚洲贸易持续开展的战略据点。他们还设想了一个有益于健康的方案：要塞可向科伊人购买鲜肉并自己种植蔬菜，以供应来往于巴塔维亚的荷兰船只。由于这个原因，殖民地第一任指挥官是个名叫让·范里贝克的外科医生，这是很

695

[32] M.J.杰克逊-海特(Jackson - Haight)，1967年；和R.埃尔菲克，1977年。
[33] G.舒特(Schutte)，1979年。

恰当的。由于无论是科伊人还是公司职员都未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公司便采取了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将公司职员解脱出来，由自由民从事生产，公司保持对市场的控制。正如葡萄牙人的做法是封建性的，东印度公司的基本理论和策略是地道的资本主义的，并相应地获得了因认真规划而带来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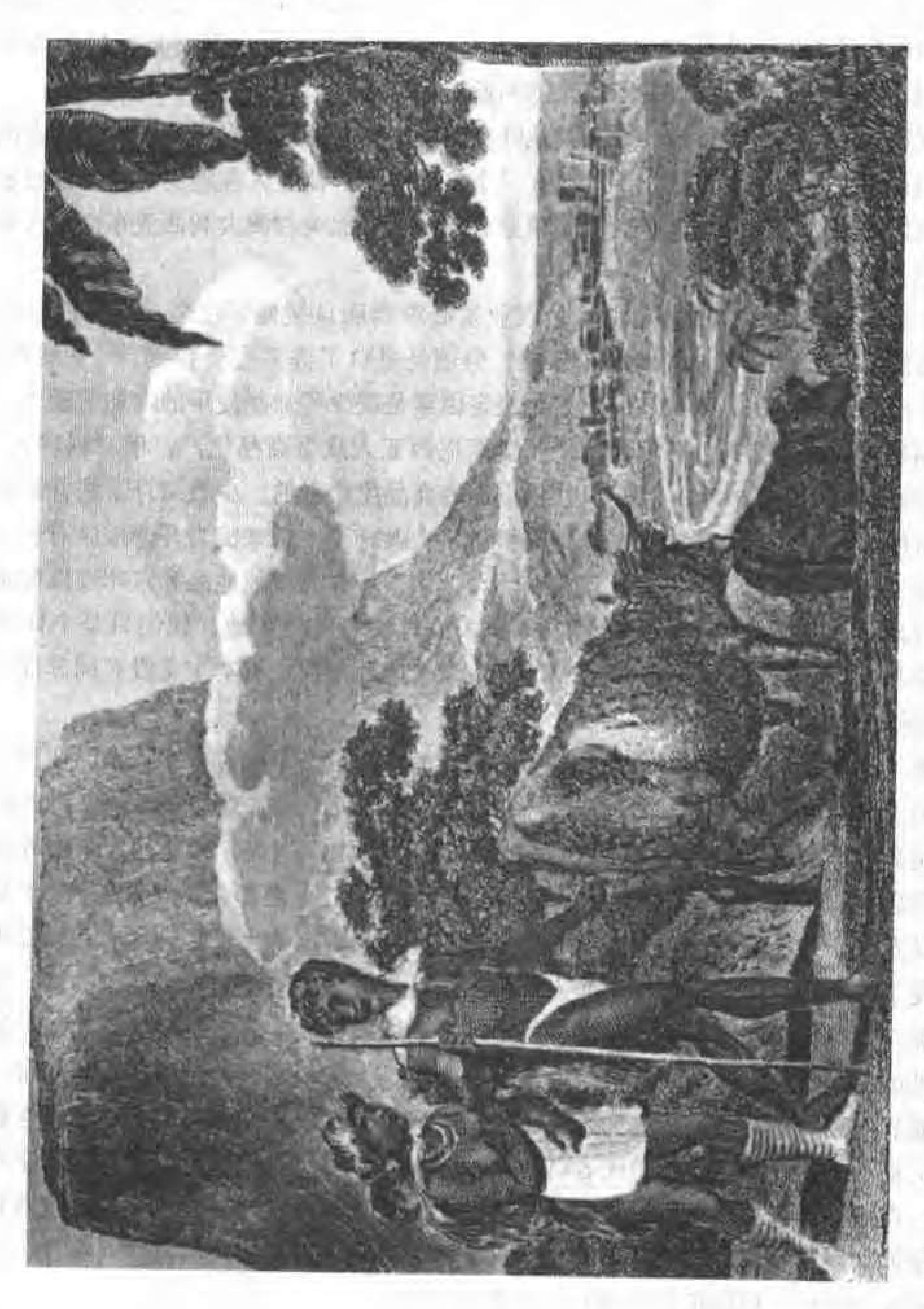
如同进入人口稀少的温带草原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荷兰人发现其新的定居点的能动性同他们在热带附属地区有很大不同。在一个多世纪里，荷兰人在遇到定居的混合农耕者以前，他们的经历与西班牙人在南美大草原、英国人在北美和澳大利西亚东南部大草原的经历相似。[34]

或许开普殖民地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农业发展艰难而且缓慢。在最初的 40 年历史中，殖民者虽然从西欧带来了大量的农业知识，但还是进口了许多主要食物。[35] 发展畜牧业，最有利于广泛利用土地。殖民地的第二大决定因素是缺少可强制使用的本地劳动力。虽然通过控制当时的社会结构，可以大量使用印度尼西亚人从事商品生产，但对科伊人来说，如果不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是不可使他们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少数幸存下来并留居在殖民地的科伊人与一个新群体的其他成分科伊科伊人融合了，后来成为开普地区有色人的核心。公司不能，也没有依靠科伊人作为劳动力，而是从非洲其他地区和东印度以奴隶的形式引进劳动力。这种生产关系使科伊人或桑人没有任何发展余地，他们只是个体劳动单位，完全与生产资料分离。用发展研究的语言来表述，畜牧业资本主义没有同其他生产方式有机地结合：它使之消失。

如果不与持续扩张活动相结合，这种新社会的特征或许不会有太多关系。纽马克认为畜牧业的发展主要受到外部市场对鲜肉需求增加的推动。[36] 居尔克和罗斯则认为扩张的主要动力是社会本身固有的。[37] 资本主义的结构必须以扩张谋生存，因此动力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的问题可能被忽略了。在好望角，劳动力昂贵而不足，土地却是充足而便宜，于是取得 697 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显然不是加强对土地充分利用，而是通过领土扩张。定居点在地理上的扩张重复了地广人稀的荒谬后果，而人口稀少正是科伊人使用土地的特征。的确，商业性的畜牧业与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在同样的土地上放牧同样的牛羊，有时科伊人也受雇为牧民。土地的使用不像社会关系那样因面临新的制度而变化。在商业扩张的边界地带，荷兰殖民者要想控制荷兰的劳动力尤为困难，因为不满的劳工极易向东或向北逃离以摆脱令人厌烦的劳动状况。此外，只有殖民者(偶尔也有科伊人改教者)，能够以自己的名字登记注册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要训练一支荷兰劳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边界上的放牧者只能靠高价买来的奴隶或科伊人，而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跑，虽然公司同科伊人首领正式签订了一系列专项条约，以保证把逃跑的奴隶送回定居点。

在 18 世纪，广泛的商业性畜牧业的重要性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一点与南美大草原以及 19 世纪的澳大利亚的情况而非与非洲其他地区有较多相似之处。开普敦

[34] D.J.N. 德农，1983 年。
[35] A.J. 伯塞肯(Boeseken)，1969 年。
[36] S.D. 纽马克(Neumark)，1969 年。
[37] L. 居尔克(Gulke)，1979 年；和 R. 罗斯，1975 年。



图片23.3　一家放牛的科伊科伊人。背景是桌山和开普敦

成为商品集散地、所有贸易联系的中心和国际文化、思想的交汇点。公司的官员不仅管理殖民地，而且个人往往也经营贸易，这尽管是一种犯罪，只要不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便可以偷偷摸摸地进行。[38] 他们与城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和小旅馆老板结交，对大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奴隶指手划脚。他们也觉得自己比那些偶然进城卖肉、兽皮、油脂的牧民高出一等。那些牧民讲着粗俗的荷兰语，几乎没有文化，穿着实用却不时髦的衣服，明显地缺乏城里人的风度，很容易被城里的肉贩子坑骗。牧民们生活在远离城里惩戒官员的地方，对他们手下的劳动力也十分粗暴。尽管他们很粗鲁，却是殖民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输入的奴隶人口不断增加，牧民的人口也因移民和自然增长而迅速增加[39]。在创建150年后，殖民地大约有20,000名自由民和25,000多名奴隶。[40]

殖民地领域的扩张逐步把科伊人和桑人从西部内陆地区驱赶出去。同时，新社会内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规章制度往往使更加精力充沛、具有独立意识的奴隶和前科伊人被排挤走。间或也有个别白人殖民者逃到边界地区，或是逃避法律惩罚、或是寻求暴富，或者几种因素兼而有之。其中一些避难者武装起来，他们很多人是熟练的骑手，像南美大草原上因同样的社会压力而出现的高乔人一样，他们强悍鲁莽，专门从事暴力[41]。他们可选择三条出路：第一他们可以像边界执法人员一样，向国家要求并获得工作职位。1795年随着霍屯督人兵团的形成使这一选择合法化。[42] 第二，他们可以尝试与白人拓荒者一起过定居生活，既可以做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如白人希望的那样)也可以做独立的牧民(如他们自己所愿)。尽管这一前景很吸引人，但却难以实现，因为开普殖民地的巩固和对私人地产的保护，使有色拓荒者的财产容易被剥夺。科伊人以自己的名义登记土地的情况极少，而殖民政权的扩展使白人牧民足以大胆地向作为事实土地占有者的科伊人挑战。因此，第三种选择最有前途：抢先一步，占领白人畜牧业扩张的边界。 **698**

在公司殖民地北部广大而干燥的地区，特别是奥兰治河及其支流地带，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典型地区。这里生活着科拉人、格里夸人、纳马人，从1730年到大约1780年间，他们很少受到公司当局的干扰。[43] 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没有得到白人的明确承认，也没有受到指责。为了谋生，这些新出现的小社群依靠从殖民地获得的火器和火药捕获、饲养并出售牛群。因此领导权落在边界上这样一些人手里：他们能和白人交往，了解白人和公司当局，如白人罪犯布卢姆，或是奴隶后裔，如科克家族。许多人知道并记得他们是从科伊人中分离出来的。格里夸人如此选择其称呼是因为他们是从查里古里夸人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格里夸人不仅是从公司殖民地逃走的难民，而且也是其利刃。他们希望像白人那样成为独立的商业畜牧者，而不是处于早已过时的为生存而畜牧的文化和境地中。他们的各人愿望大都互不干联。依靠来自殖民地的武器，他们必须抢在白人竞争者前面，因而不能长

---

[38] G. 舒特，1979年。
[39] R. 罗斯，1975年。
[40] R. 罗斯，1975年；W.M. 弗罗因德(Freund)，1979年。
[41] S.R. 邓肯-巴雷塔(Duncan-Baretta)和J. 马科夫(Markoff)，1978年。
[42] W.M. 弗罗因德，1979年。
[43] M. 勒盖西克(Legassik)，1979年；R. 罗斯，1976年。

期过定居生活。他们为自己构筑的生活没有安全保障，只有通过剥夺他人而获得，他们的
699 土地成为暴力地区，而暴力则是新的商业畜牧经济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19世纪由于环境状况和加强殖民地管理致使边界最终“关闭”时，格里夸人的末日来临。这种结果在18世纪群体间的相互关系中已见端倪，尽管可以延缓，却无法避免。



图片23.4 17世纪纳马夸人家庭印象

对于新的种族混合的社会来说，殖民地北部边界是最佳环境，在东部边界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然而，那里事件发生的过程只在转瞬之间，18世纪90年代出现的高潮更具戏剧性，因为这不仅涉及白人牧民、开普敦当局、难民社群，而且还涉及到最南端的班图人。不安全的阴影出现在科萨人的区域，也出现在白人牧民的边界，当这两个不安全地区发生重叠，生活变得危险起来。

统治者法洛曾经对大多数讲科萨语的人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1775年他的死亡，导致他两个极重要的儿子拉哈比和吉利卡的对立。[44] 三年后吉利卡去世，他的追随者
700 中出现了进一步的分裂势力。1782年拉哈比战死（在对滕布人的战斗中战死），摄政王恩德兰巴和年轻的继承人恩盖卡之间也发生了追随者分裂情况。每派力量都希望统治整个讲科萨语的群体以及作为同盟者的近邻科伊人。从两派的角度来看，白人牧民似乎很喜欢棕种牧民，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同盟者和富裕科萨人的最终依附者。实行季节性迁徙放牧，把牛群赶到远方牧场，这意味着白人、科伊人和科萨人一开始就相互混合，小规模地会面。对于科萨人来说，他们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掌握了商业性畜牧的独特性质及其对牧场无限的、不断增长的追求欲望。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畜牧者的威胁极小。

公司不愿意动用股东的资金、而且对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也难以管理，因此推动了白人牧民实行自我保护和扩展。公司付给主要中心区行政长官（Landdrost）工资，但行政官一

---

[44] J.B.皮尔斯，1981年。

人也不能维持管理。在司法方面，由村镇会成员协助行政官执行，村镇会成员还日益将军事方面的权力掌握在手中。每个达到作战年龄的成年男子都可能是潜在土地所有者，他们都承认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大致平等的关系，尽管财富的不平等日益扩大。每个成年男子均是，至少有可能是包括其家庭、奴隶和雇工在内的一个小群体的家长，而家长主要是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之外来管理家庭的事务。如果战争临近，家长们便挑选一名特别领导人，成立一个民团；战争结束、战利品分配以后，民团便解散。对于这样结构松散的社会，使其接受一种长期战略，如同处在分裂状态下的科萨人一样困难。18世纪后期，随着白人数量的增加，自由民对公司日渐不满。1795年在公司统治的最后日子里，边界上的自由民公开指责公司，并自行宣布由白人家长成立两个独立共和国，即维持不久的斯韦伦丹共和国和格腊夫赖内特共和国。㊺

同时一场更严重的反叛正在酝酿。白人牧民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对科伊人社群和个别科伊人商业畜牧者如克拉斯·斯图尔曼的剥夺。㊻ 在白人看来，科伊人应该满足于成为农场的劳动者而不是独立的农民。在科萨人各派首领看来，科伊人应成为富裕的科萨人的依附者。但科伊人当然不满意公司所允许的“霍屯督”地位和科萨人提出的依附地位。**701** 1799年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反叛，因为有在新的英国行政机构服务的科伊人武装人员参加，使力量得到加强。自由民的共和国希望维持现状，但摆脱公司的束缚，科伊人的农业雇工、士兵和农民与之不同，他们寻求改变边界现状。前者是一种叛乱，后者则是一场早期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在世界各地夺取了一些要塞以巩固它在全球范围的海上霸权，其中之一就是开普敦的要塞。开普敦于1795年在一次短暂而激烈的争夺后由英国获得。没有理由认为英国控制开普敦的海军、陆军军官除了维持秩序以外，对内地也有很大兴趣。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征服中，维持秩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当地的掌权者。因此，自由民的共和国很快遭到镇压，但自由民对其土地的控制却得到认可。然而，科伊人的反叛是不易扑灭的。由于没有足够的军队应付漫长的边界战争，邓达斯将军决定平息事端。将一些土地分给个别科伊人，包括斯图尔曼和他的兄弟们，其他人回到他们的雇主那儿或回到霍屯督兵团中去。在几年内矛盾不断激化，到19世纪早期重新爆发。㊼

英国在18世纪末得到的开普已具有许多特征，使它在19世纪里显得与众不同。开普敦居民约有15,000，仍然主要是一个要塞以及亚洲与欧洲贸易集散地，但对于以内地为基础的出口经济也发挥了出口的作用，而旧的垄断贸易方式的抛弃，在一个新世纪里促进了出口生产的巨大增长。从整个殖民地来看，那里有22,000个基督徒，大多是白人，也有一些被解放了的黑人。据清点，科伊人和桑人大约是14,000人，奴隶有25,000名。㊽ 正如上述统计术语所表明，开普有一系列严格界定的社会等级，每一等级以其获得生产资料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别。只有基督徒能占有土地，虽然科伊人尚未完全被排挤出去；同样

㊺ H. 吉利奥米(Giliomee)，1979年。

㊻ 同上。

㊼ W.M. 弗罗因德，1979年。

㊽ 同上；R. 罗斯，1975年。

地，只有奴隶完全没有公民权，虽然科伊人的地位不明确，他们的地位随着当地形势和人数而改变。

科伊人被逐步置于中间位置，一边是殖民者，一边是科萨人、索托人和茨瓦纳人。到18世纪末，这中间角色在东部边界战斗中消失，因而爆发叛乱，但另有两三代科伊人在较开放的北部边界上放牧。因为正是科伊人如科伊科伊人、格里夸人、纳马人和科拉人开创了从开普西部发展畜牧业的先河，整个地区的农牧混合社会在这点上只受到轻微影响。我们看到，科萨人对待白人牧民就像他们仅仅是浅肤色的科伊人；再往北，在北恩古尼人中，强大的部落联盟最终导致祖鲁国的形成，而这与开普的局势无关。然而在长时期里，因欧洲和亚洲资本主义转化导致商业性畜牧业出现不断变化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成为19世纪最持久的社会动力。

（杨军 译）

24 非洲之角

E. 哈伯兰德

导言

16和17世纪是东北非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曾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以及 703 文化，显著发展的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已分裂瓦解。敌人的入侵不仅使大批基督教徒遭到屠杀，而且将一些省份整个从帝国分离出去长期霸占。由于受到各方的沉重压力，神圣帝国(mangést egzi 'abhērāwit)已是名存实亡。只有在皇帝御驾亲征的地方，国家的权威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否则根本不存在；而具有同样破坏力的宗教纷争，主要是基督教与正教之间的纷争，不仅常常破坏帝国的统一，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外部入侵造成的政治上的磨难。人数虽少但影响巨大的葡萄牙传教士使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天主教，甚至包括皇帝苏森约斯，他于1630年接受了新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提高到国家宗教的地位。后来，规模空前的内战席卷了这个衰弱的帝国，终于靠武力将外来宗教及其传播者赶出国外。

在17世纪末以前是巩固帝国和恢复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信仰和文化的时期。这种信仰和文化再次结出果实，尽管没有以前那样丰硕。接着，从1700年起帝国又开始了四分五裂时期，与《旧约》所述的先例相似，这一时期称为“列王/士师时代”。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混乱状态直到1855年底才结束，这一年西奥多二世登基，开始了伟大帝王迭出的时代，埃塞俄比亚帝国因而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得以恢复并生存下来。

但是，东北非并不仅仅包括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1500年前后，伊斯兰文化在这个次大陆的东部和中部也发展到了高峰，而好战的伊斯兰教很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圣战思想的激励下，一位出色的军事首领和该信仰的狂热支持者，在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编年史上浑名格兰(Grañ,“左撇子”)的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格哈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 704 利。每年旱季，他的军队都横行于阿姆哈拉人和蒂格赖人地区进行破坏和征服，并强迫几个省整个接受伊斯兰教，即使是暂时的接受。但是，支持这些政治和开化活动的军队最终证明自身太弱。他们已筋疲力竭，在其首领死去后便瓦解了。基督教帝国开始反击。最后伟大的奥罗莫(加拉人)移民，依靠他们无穷的力量，破坏了埃塞俄比亚中部一度繁荣的伊斯兰社会和文化，几乎未留下任何痕迹。

此时两个重要的民族登上了舞台：奥罗莫人和索马里人，他们将在东北非的历史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两者的对外扩展路线完全不同。奥罗莫人实行全方位向外扩张，向埃塞俄比亚的西部、中部、东部甚至北部进行一系列完全分离的个体迁徙。他们进入因宗教战争

而使人口减少的地区，征服和同化其他民族。而同时，这些征服者又甘心情愿地使自己适应其他民族较发达的文化。结果，他们没有发展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

索马里人并非如此。不少索马里人参加了格兰指挥的圣战，加之伊斯兰教影响日益增加，使他们与大部分东北非其他民族相分离，这些都是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尽管索马里人分裂成为许多以家系为主的民族群体，但至少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拥有同一文化和同一宗教的同一民族。在1500至1700年间，他们之所以能向南一直扩张到朱巴河，不仅在于其军事力量和人员不断增加，而且还在于他们的同化能力。

在东北非的北部、中部和东部发生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在历史上都有大量记载，但西部和西南部的历史直到最近才为人们所了解。我们今天才知道这一时期经历了文化发展的开端，而这一文化发展就其创造力和推动力而言，是非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自1300年或更早以来，基督教帝国对北方的直接影响一直试图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南方，导致一些大国的兴起并使发达的文化向南扩展到高地的自然分界线。伊纳利亚各国的建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博萨、卡法和塞科，以及沃莱塔、道洛和格穆高地一些小国。

705

1500年前后的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

大约1500年，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在政治、文化以及各个方面都进入鼎盛时期，这在以后几个世纪都未曾达到。①

在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方面，埃塞俄比亚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苏丹还不是伊斯兰教国家。基督徒群体——索巴国所有留下者——仍生活在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汇合处，但这一地区很快被丰吉人侵占。红海岸边的伊斯兰教城镇——位于现在的厄立特里亚——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甚至马萨瓦——该岛和该城本身都已伊斯兰-阿拉伯化——附近的海岸也是埃塞俄比亚帝国无可争议的一部分，该地区居住着蒂格赖人，由统治直到纳加斯河(马里布河)以北的诸省总督控制。②

埃塞俄比亚东部和中部许多小的伊斯兰领地和国家，在上一世纪埃塞俄比亚皇帝们的沉重打击下权力遭到削弱，尤其是在皇帝泽拉-雅各布统治时期(1443-1468年)。尽管不情愿，但大多数国家还是向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帝国进贡。信仰基督教的军事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基督教帝国与伊斯兰国家边境地区，统治阶级之间通过联姻结成纽带，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系。(例如:海伦娜皇后,一位伊斯兰哈迪亚酋长的女儿,是埃塞俄比亚宫廷中连续两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③

这个基督教国家对南方和西南方的影响以及军事、文化扩张甚至更加强烈。由信奉基

① 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历史事实，根据已知的所有证据也可推测出来。参见T. 塔姆拉特(Tamrat)，1972年，第206页及散见各处；F. 阿尔瓦雷斯(Alvares)，1961年，散见各处。有关绘画，参见J. 勒罗伊(Leroy)，1967年以及J. 勒罗伊、圣赖特(St. Wright)和O.A. 贾格尔(Jager)，1961年。有关文献见E. 塞卢利(Cerulli)，1968年，第81页及以下诸页。

② F. 阿尔瓦雷斯，1961年，第1卷，第54页。

③ J. 佩鲁乔恩(Perruchon)，1893年，第125页和第176页；T. 塔姆拉特，1972年，第289页。

督教的统治阶级统治的国家陆续诞生，从前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因武力、外交和有目的的传教活动被迫承认了北方帝国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霸权。④ 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大宪章”《国王的荣耀》从道义上证明了其帝国扩张和权力扩张的合法性。⑤

这部著作可能是在1300年前后编纂的。即在所谓的王朝复兴后不久，复辟王朝从那时直到1974年一直称为所罗门王朝。《国王的荣耀》将民间传说以及《圣经》、犹太教法典和《古兰经》中的传说收集到一起并与救世济贫的神圣使命相吻合，因此，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埃涅阿斯纪》可与之相比，罗马人以相似的预言方式确立自己 706 的使命。书中叙述示巴即埃塞俄比亚女王如何前往耶路撒冷学习所罗门的智慧。她与所罗门的儿子孟尼利克，是她回到埃塞俄比亚之后生下的，后来成为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国王。后来，孟尼利克在去耶路撒冷探望父亲期间，得到了约柜，这是世上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他把约柜带回埃塞俄比亚。从此以后，约柜被珍藏在阿克苏姆大教堂，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均在该教堂登基为王。该书在结尾时宣称，企图建立基督教王国的两个伟大的神圣帝国罗马和埃塞俄比亚将发生宗教分裂。凡能够用来提高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民族及其王朝地位的任何内容都以最艺术的手法编织在一起：皇帝的血统最初来自于所罗门王和大卫王。并暗示与耶稣基督有关，最后，约柜转到埃塞俄比亚，而约柜是上帝在人世间真实存在的象征。所编故事使埃塞俄比亚人同时成为《旧约》和《新约》中的选民，因为与犹太人不同，他们接受了基督教的福音：

> 主的选择是埃塞俄比亚人。因为那里是上帝所住之地，是天堂里的锡安山。……我与我的选民订立契约；我已向我的仆人大卫发誓：我将永远保留你们的种子并永远保留你们的王位。

埃塞俄比亚作为“异教徒大海中的基督教小岛”之所以能经得起无数的风暴，包括16世纪的风暴，主要是由于该国多山的地理位置。但是，作为新选民的感觉在精神上支持了该帝国将其疆界扩展到东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决心。

当时，帝国内部极度平静。这一点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说得特别清楚，他在1520至1526年间作为牧师陪同葡萄牙传教使团从马萨瓦到绍阿，并到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⑥ 秩序井然，总督的命令得到遵守，皇帝的旨意在帝国内部具有绝对权威。该帝国从北到南至少有1000公里之遥。尽管个别省份和地区拥有一定的区域自治权，而且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交通非常不便，尤其是雨季，但帝国建立了牢固的统一。神圣基督教帝国这个概念中包含着无可争议的所罗门王朝的权力，而最后，基督教信仰以及组成该国的阿姆哈拉和蒂格赖两大民族的共同文化，牢固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 707 在与其他民族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同化作用。因此，这一段历史也是其他民族群体开始与这两个最大的民族进行交往的历史。这对于阿高人这一不同群体更是如此。他们是居住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北部的土著居民，几乎被阿姆哈拉人和蒂格赖人完全同化。

---

④ 参见U. 布鲁坎佩尔(Braukamper)，1980年，第91页及以下诸页。

⑤ 参见C. 贝佐尔德(Bezold)，1905年；E. 哈伯兰德(Haberland)，1965年，第25页及以下诸页。

⑥ F. 阿尔瓦雷斯，1961年，第1卷，散见各处。

16世纪，这种同化过程得以强化并因彻底消除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民族群体而达到顶点，这些民族群体在语言上和文化上属于阿高人，但信仰犹太教，特别是在萨门、达姆比亚和瓦盖拉三省。他们的幸存者从此沦为贱民“法拉沙”，流落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中部地区。[⑦] 南方也是如此，在绍阿省的一些地方，现在的主要居民是奥罗莫人，当时基督教和阿姆哈拉语言和文化的传播肯定是以牺牲当地其他民族为代价，尤其是哈迪亚的成员。

虽然皇帝泽拉-雅各布(1434-1468年)使帝国政治机构权力集中以及撤换经常变动的省和地区首领的试图没有成功(这些首领均属当地望族，由自己挑选的人选出，任期不限)，[⑧] 但皇帝的旨意甚至在1500年之后，仍具有绝对权威。关于个别省份的自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土地法问题，编年史上也并非现成就有，但从编年史中，我们可以推断当时情况与19和20世纪的情况非常相似。[⑨] 大部分土地是当时的民族与家族群体的遗产，由他们确定如何在成员中分配这些土地。教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尽管其所占份额常常被高估。教会土地是供农村教区神父维持生计的。作为回报，这些神父必须进行宗教活动。最后是王室土地，由皇帝长期或短期授予那些应得之人或用于具体事项。这种封地——将欧洲的表达方式用于非洲——叫做“加尔特”(gult)。这个词也用来表示皇帝所授的征兵和征税的权利，这与授予官职相关，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不受这种依附地位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社会具有的非凡活力以及大人物(tellek saw)对它所抱的理想，并无助于贵族地位的提高，因为大人物需要不断地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只有本身的品质和成就才是真正重要的。理论上讲，仕途对于任何体面家庭的自由人都是开放的。在其所在的地区人民大会上，这些自由民既可被选为官也可被降职。皇帝可加入到这一民主进程之中，但作为最高权威，他有权确认或驳回选举结果。这样，君主权力与民主选举互为补充，从而防止 709 了拥有政治特权的世袭贵族的形成，这种贵族能够破坏帝国的统一。这一现象只是在1700年之后随着君主权力的不断衰落才产生，后来又导致人们谈论封建主义，这是最早用来表达埃塞俄比亚特点的一个术语。[⑩]

道路很安全，旅行者不会遇到麻烦。帝国的客栈和每周一次的大集市到处都有。[⑪] 全民福利——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福利——超出了后来为人们所了解的一切。以实物形式支付的赋税从各省和进贡的国家运进皇宫并加以分配。(在1636年贡德尔成为皇宫永久驻地之前，皇宫只是由大帐篷组成的流动营地。)尽管对铸造货币和商业信函一无所知，但存在着大量的长途贸易，重要的消费品就是通过这种长途贸易从印度和近东进口的。(食盐从埃塞俄比亚的一端贩运到另一端，珠宝和贵重织物等奢侈品也是如此)。

与其后来的孤立相对照，埃塞俄比亚起初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都与远方的国土如欧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爱德华·吉本那句著名的且被经常引用的话“四面八方被其宗

---

⑦ 参见W. 勒斯洛(Leslau)，1951年，第ix-xliii页，尽管简明，但仍是对法拉沙人问题的最好介绍。

⑧ 参见J. 佩鲁乔恩，1893年，第95页及以下诸页，第102和112页。

⑨ 参见E. 哈伯兰德，1965年，第200页及以下诸页；B. 阿比贝(Abbebe)，1971年；A. 霍本(Hoben)，1973年。

⑩ M. 佩勒姆(Perham)，1948年，第267页及以下诸页，第273页。

⑪ 阿乐瓦雷斯对他从马萨瓦到绍阿一事的叙述很有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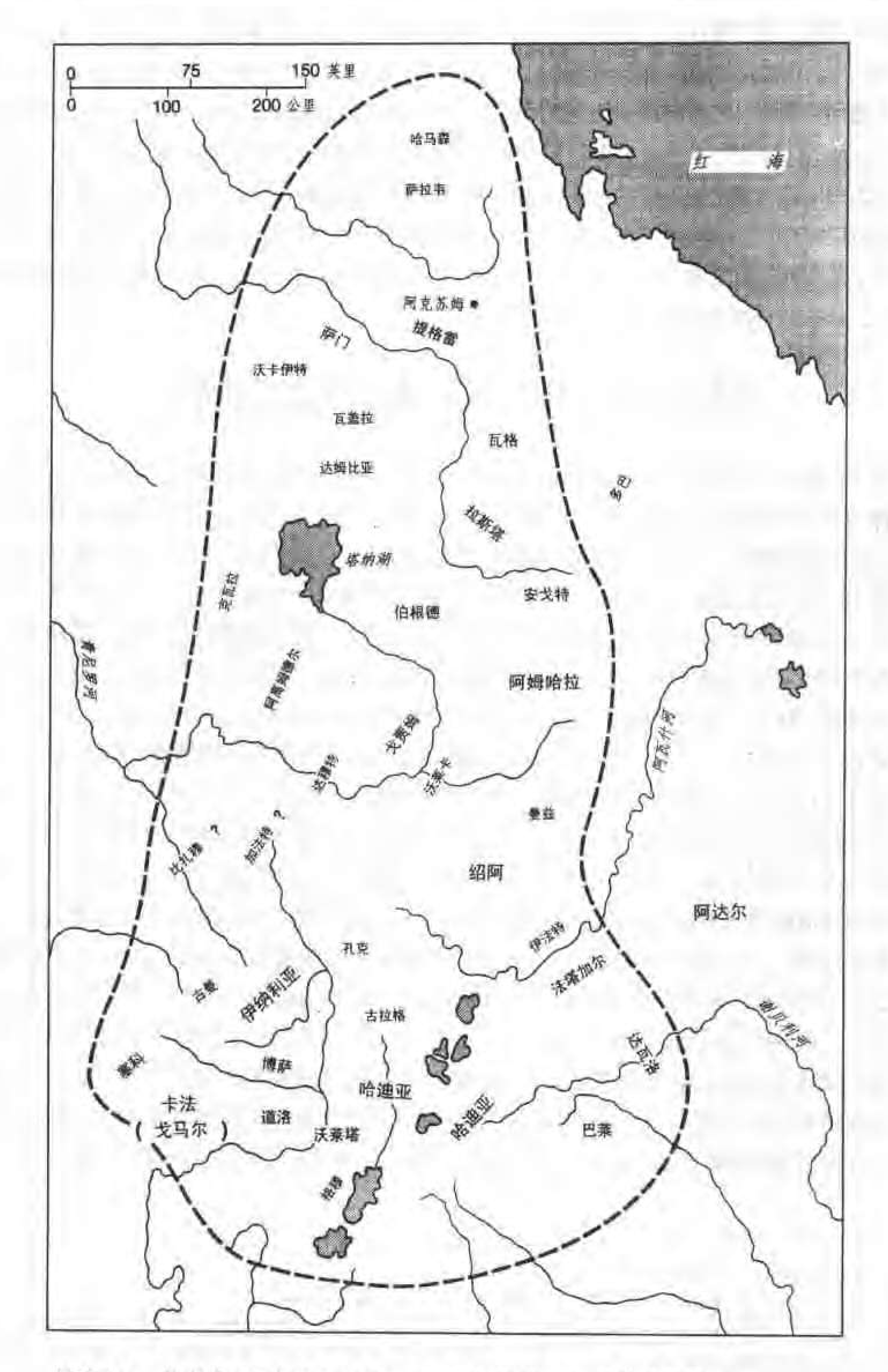


插图 24.1　埃塞俄比亚帝国及其属国，约 1550 年（仿照 E. 哈伯兰德图）

教敌人所包围，埃塞俄比亚人沉睡了近千年，忘记了世界，同时也被世界所忘记"，[12] 在这一时期并不适用。设在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的埃塞俄比亚修道院与欧洲保持着积极的联系。[13] 埃塞俄比亚僧侣是教育、艺术和科学的主要体现者，他们在埃及接受培训并参与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文化生活。[14] 尽管文字作品主要局限在宗教和历史两个领域，但它至少繁荣到1650年。此外，书画刻印艺术由于同基督教东方和欧洲的接触而受到刺激与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图书彩饰艺术得以保存。宗教绘画中所描绘的重要主题得到继承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描述意大利和西班牙手艺人和艺术家编年史中，这些交往的证据偶尔提及。迄今鲜为人知的教堂和宫殿废墟的存在，是这一时期物富民丰和艺术创造力的又一明证。[15]

710

伊斯兰国家与文化：圣战、索马里人和哈迪亚人

及至1300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基督教已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南部展开了由僧侣和教区神父从事的积极的传教活动。作为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官方宗教，基督教处处得到国家的支持，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得到火与剑的支持。但是，伊斯兰教在东北非的传播并非是有意宣传和国家支持的结果，而是依赖于阿拉伯文化的传播以及贸易和交往，至少在这一地区是如此，阿拉伯与伊斯兰教对东北非海岸的影响由来已久，阿拉伯半岛与对面的埃塞俄比亚海岸和索马里海岸之间的贸易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甚至基督教兴起之前。这些贸易联系导致一些人口杂居的城镇的建立，但在杂居人口中阿拉伯人占主导地位。从北向南，最重要的中心包括：马萨瓦、位于近海的达赫拉克群岛、阿萨布、奥博克、塔朱拉、吉布提、塞拉、柏培拉、奥比亚、摩加迪沙、梅尔卡和布腊瓦(东非海岸从这里开始，受到了斯瓦希里的强烈影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这些中心传播的强度与方向清楚地表明，它是多么依赖与内地的贸易联系，同样也非常依赖内地的富饶、物产和密集的人口。15和16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路线明确地显示它主要集中在东非大裂谷的两侧，即沿着通往埃塞俄比亚中部的重要贸易通道。在高原的南端曾有一些穆斯林城市，其废墟至今仍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些伊斯兰国家，向南方的齐瓦伊湖延伸，最远达到谢贝利河。[16] 哈拉尔是现存的唯一城市。从海岸到内地曾有若干国家：阿达尔、达拉、达瓦洛、巴莱、阿拉巴布尼(或阿伦)、萨尔哈和哈迪亚，而阿达尔是最大的国家，其版图从印度洋上的塞拉向西延伸到哈拉尔，向北扩展到阿法尔境内的沃萨绿洲。[17] 伊斯兰教的影响也许向西扩展到东非大裂谷的那一边。这可以从解释位于吉贝河中游的前也姆戈尔(通常叫甘杰罗)王国名字意即“也门之

---

[12] E. 吉本(Gibbon)，1956年，第5卷，第69页。

[13] 参见E. 塞卢利，1943-1947年，1947年；T. 勒费布尔(Lefebre)，1845-1854年。

[14] 很显然，盖拉德乌斯和萨尔奢·丹吉尔的编年史还有《加拉人史》是由僧侣所编，他们在埃及或东方其他地方受过部分教育。参见J. 佩鲁乔恩，1894年和1896年；C. 康蒂·罗西尼(Conti Rossini)，1907年；A.W. 施莱克尔(Schleicher)，1893年。

[15] 参见S. 乔纳基(Chojnacki)，1969年。

[16] F. 阿扎伊斯(Azais)和R. 钱巴尔德(Chambard)，1931年，第129页及以下诸页，第203页，图片LXIII和LXIV；C. 康蒂·罗西尼，1942年；E. 塞卢利，1941年；以及R. 与H. 卓索梅(Joussaume)，1972年。

[17] G.W.B. 亨廷福特(Huntingford)，1965年，第53页及以下诸页；马克里兹(al-Makrizi)，1970年。

地”的传说中，以及有关卡法的商人(nagado)阶层具有阿拉伯血统的记录中得到启示。[18] 在大裂谷北面绍阿高原的南坡上，有两个穆斯林国家：伊法特和法塔加尔(法塔贾尔)，其居民今天仍叫阿尔戈巴人。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肯定讲闪米特语，这种语言与这一地区最初的库什特语一并传播，并取代了后者，特别是取代了哈迪亚-锡达马语族中的方言。保留下来的语言仅有哈拉里语、东古拉格语和阿尔戈巴语。[19]

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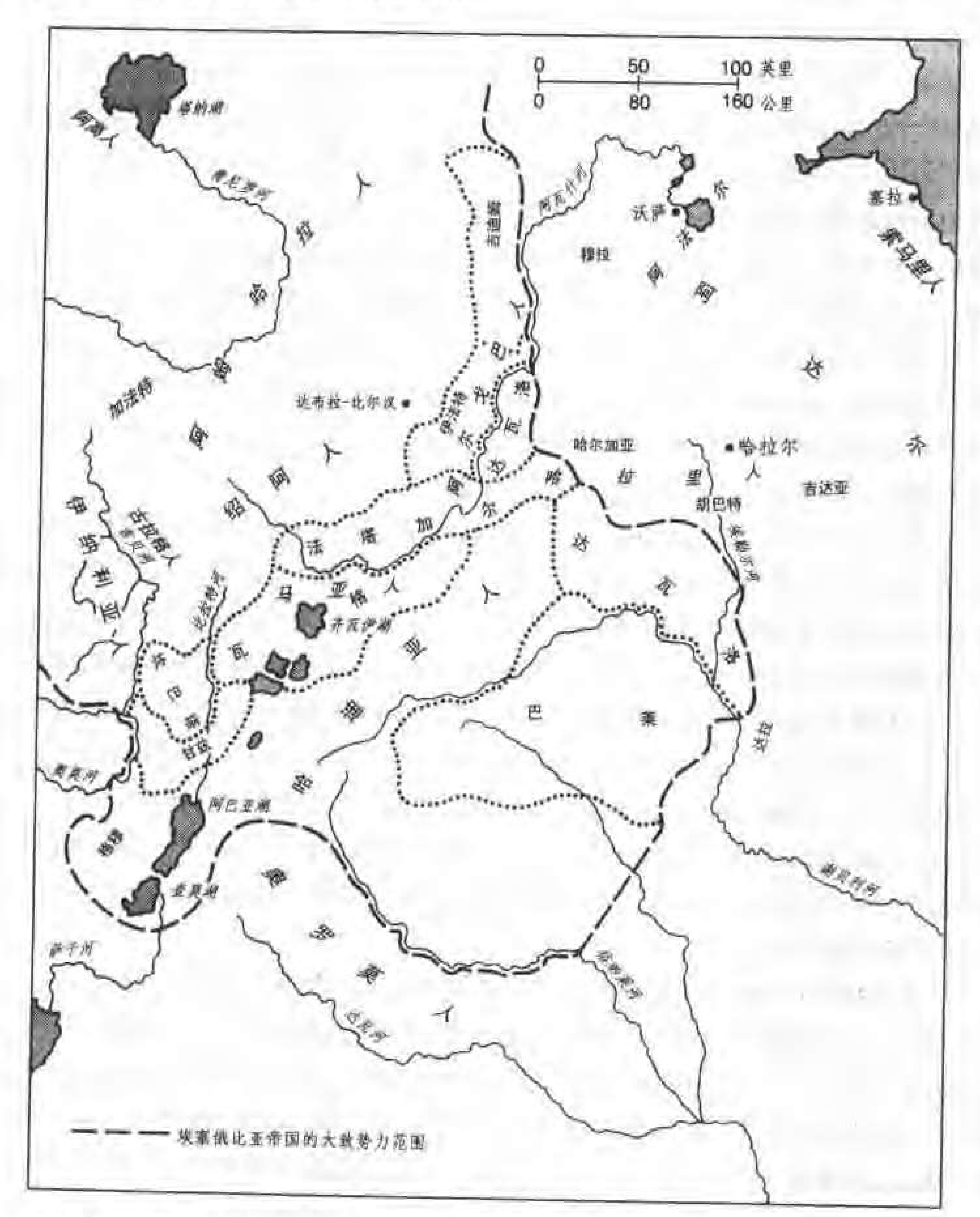


插图 24.2 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约 1500 年(仿照 E. 哈伯兰德图)

这些国家都带有海岸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特征。如今这些国家被毁灭很久之后

[18] F.J. 比伯(Bieber)，1920-1923 年；H. 施特劳布(Straube)，1963 年，第 274 页及以下诸页。

[19] 参见 P.V. 保利奇克(Paulitschke)，1888 年；V. 斯蒂兹(Stitz)，1974 年；W. 勒斯洛(Leslau)，1963 和 1979 年。

仍存留的文化成分也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一度主宰该地区的城镇中最明显的例子 712 是哈拉尔，它是在埃塞俄比亚土地上唯一真正的古代城市。在此有必要提及显示阿拉伯影响的室内陈设美观的石造平屋顶平房或二层城镇住宅和大量有围墙的圣物存放处，也有必要提及哈拉尔东南面阿尔戈巴以及位于绍阿南部边缘的阿尔戈巴像城镇一样筑有设防工事的村落。在感受到阿拉伯影响的任何地方，在精耕细作的园艺(有梯田和灌溉系统)方面均留有痕迹，今天仍是如此。而且有大量通常并非埃塞俄比亚栽培的作物，如柑桔、柠檬、桃子、葡萄、香蕉和甘蔗。[20] 种植棉花以及对咖啡和"克哈特"(khat)或"卡特"(čat 南蛇藤属)的消费也是因为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在埃塞俄比亚非伊斯兰地区开始使用。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尽管最初的穆斯林后来放弃了伊斯兰教，但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大量宗教概念、仪式和词汇在该地区广为流传。[21]

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从东到西的传播，一旦跨越基督教帝国的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南北通道，便与该帝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即现在绍阿省及其以东地区。这里也是两种势力不断发生流血冲突的地区，冲突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进入 15 世纪才逐步缓解。虽然基督教帝国在东北非仍是无可争议的大国，并迫使不少伊斯兰国家向其进贡，但它也不可能消除或毁灭这些伊斯兰国家，主要是由于地理因素，尽管与帝国自身的规模和人口相比，这些国家算不得什么。[22]

我们至今不知是什么力量打破了这种僵局并将伊斯兰各贸易国家与基督教帝国之间一直主要因政治原因而爆发的战争变成了宗教"圣战"，不清楚为什么阿达尔素丹瓦拉斯马的政治领导权转到了宗教领袖伊玛目手中。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伊斯兰军队这一由不同民族群体组成的混合体充满凝聚力和狂热，并把这个强大的基督教帝国推到了失败的边缘。有一种解释认为无疑是因为伊斯兰军队拥有杰出的领袖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格哈兹(艾哈迈德·格兰)，他从无名之辈成长为一名具有超凡魅力的圣战领袖。[23] 格兰于 1543 年逝世，伊斯兰势力随之逐渐消逝，尽管他的继任人艾米尔·努尔智勇双全，尽力继续战斗并在开始时取得一些成功。但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当时牢牢控制索马里北部地区的伊斯兰世界的另一支力量，为其在埃塞俄比亚的军队提供的兵源是这些人口相对较 713 多的伊斯兰国家的好几倍。

在缺乏领袖气质的软弱皇帝勒布纳·丹吉尔(1508-1540 年)统治时期，爆发了由基督徒挑起的对阿达尔国的战争，战争一开始基督徒在舍尔舍尔地区打了一些胜仗，好像预示着敌对双方至多再有一场非决定性的战役。但是战机突然改变，在舍尔舍尔山区西边的桑贝拉·库雷(1529 年)爆发了一场决定性战役，埃塞俄比亚帝国不仅全军覆没，而且还丧失了相当一部分治国精英。埃塞俄比亚的史学家无比自豪也无比痛苦地在帝国编年史中写道：

---

⑳ H. 施特劳布，1963 年，第 292 页及以下诸页，以及第 301 页及以下诸页。

㉑ 我想提一下这些词，如宗教首领(sayh)、精灵(djinn)、幸福——会面呼招语(al-hayr)、魔鬼(iblis)、圣人(awliya)、斋戒(saum)和创造(halika)等，可以在埃塞俄比亚中南部的许多语言中发现，经常以讹用的形式出现。

㉒ 参见 G.W.B. 亨廷福特，1965 年；U. 布鲁坎佩尔，1980 年，第 91 页及以下诸页。

㉓ 最好的资料是由其副官西哈布·丁所写的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战争史，参见 R. 巴西特，1897 年。

"在此之前，这一基督教国家从未遭到敌人蹂躏或侵占"。[24] 后果是可怕的。从这时一直到1543年，每年旱季，从南到北，伊斯兰军队横扫埃塞俄比亚高原，有组织地打败和征服一个又一个省份。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和东部，在哈迪亚和巴莱，人们都投靠了穆斯林，因为他们大都有共同的信仰，并把伊斯兰军队当做摆脱基督教统治的解放者。在古老的基督教省份里，特别是居住着阿姆哈拉人和蒂格赖人的地区，人们要么接受伊斯兰教要么被处死，因此整个地区常常是全体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改变信仰。教堂和寺院遭到无情地掠夺和洗劫，财富被破坏，如果是金银圣物或贵重织物的话则交给伊斯兰军队。埃塞俄比亚文学与绘画、书中微型画或教堂壁画中的许多珍品遭到毁坏，而侥幸留下的那些圣物，只能使今天的人们粗略地看到那几个多产而富有艺术创造力的世纪的成就。每年的旱季都有一个省份被征服和毁灭。1531年，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东南部和中心地带的两个人口稠密的大省达瓦洛和绍阿被征服，1533年，两个帝国的中心省份阿姆哈拉和拉斯塔也被征服。同年，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圣地阿克苏姆与皇帝在此登基并保存着来自西奈山法律碑文的玛丽亚天国大教堂被夷为平地(碑文被挽救,后来运回阿克苏姆,今天在那里仍可看到。)

然而，甚至在最绝望的时候，基督徒的坚定信仰和神圣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一概念的力量都是显而易见的。伊斯兰军队一撤走，那些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马上抛弃了新信仰。(埃塞俄比亚教会后来为这些暂时叛教者举行了一次忏悔和恢复教籍的仪式)。同样，被征服的省份很快起来反抗其新的统治者。甚至连一直出逃在外的软弱的皇帝勒布纳·丹吉尔在得胜的穆斯林将军强迫他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时也不愿屈服： 714

> 穆罕默德·格兰派一位信使去拜见皇帝，并对他说：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做妻子，以确保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你不同意，很快你就无一人可以投靠。皇帝答道：我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因为你是异教徒。我相信主的力量，而不相信你，因为主的力量同他的仁慈一样威力巨大。他能使弱者变强，也能使强者变弱。所以，皇帝经常受到饥饿的困扰，并被敌军所追杀。人们难以想象的不幸时常折磨着他。

作为被追杀的逃亡者，勒布纳·丹吉尔于1540年死于提格雷的达布拉达穆坚固的寺院要塞里。但几年之后，政治形势发生了预料不到的变化，年青的皇帝盖拉德乌斯(克劳迪乌斯)继承了皇位，他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随后，埃塞俄比亚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得到恢复。接着，葡萄牙远征军到来(葡萄牙传教团也随之而来)，最后，彻底打垮了穆斯林军队。

到16世纪时，葡萄牙在帝国主义扩张方面达到了顶峰。印度洋及其海湾成了葡萄牙海。尽管这些地区从未被彻底征服，但在霍尔木兹、阿曼、索科特拉、蒙巴萨等地的海洋上到处都是葡萄牙人的要塞。像其征服世界的对手西班牙一样，葡萄牙正处于黄金时代和文化发展的高峰，虽然时间非常短暂。毫无疑问，三大洲的财富都流到了葡萄牙，但这些财富的获得是以对无数人的奴役、对文化的彻底摧残和几代葡萄牙人都难以复原的骇人听

[24] R. 巴西特，1882年，第103页及以下诸页。

闻的流血为代价的。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25]

1541年发生的一次具有深远和持久影响的历史事件，将葡萄牙舰队带入马萨瓦。当时的马萨瓦仍属于埃塞俄比亚帝国，葡萄牙士兵站在埃塞俄比亚一方参加了战斗。对欧洲而言，埃塞俄比亚决不是一个未知量，自14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就被视为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帝国，“祭司王约翰”是“第三印度”的基督教统治者，他的存在至今仍是一个谜。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找到他并争取与他结盟，共同反对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敌人，不论是蒙古人、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人。[26] 葡萄牙官方传教团已两次访问埃塞俄比亚，促使埃塞俄比亚皇帝与葡萄牙国王结盟，他们还将埃皇无端地称为“祭司王约翰”。第一个传教团(1487年)未被允许回国，但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作为第二传教团的牧师(1520至1526年)则留下大量的记录，这些记录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对埃塞俄比亚非常了解。[27]

715

1540年，葡萄牙舰队从印度的果阿前往红海，去迎战不断扩张的土耳其人，这些土耳其人在征服埃及后开始在阿拉伯甚至在苏丹取得优势。一部分葡萄牙舰队于1541年春天在马萨瓦停留。之后不久，埃塞俄比亚帝国最北部的一个省的总督巴哈尔·纳扎斯(海王)来到葡萄牙舰队并带着信函，请求葡萄牙舰队在为埃塞俄比亚生存的战斗中给予支援。1541年7月，一支由400人组成的葡萄牙志愿军，在克里斯托弗·达·伽马的指挥下开进埃塞俄比亚高原，这名指挥官是著名的瓦斯科·达·伽马的一个年轻的儿子。他以先进的战术，特别是优良的装备使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穆斯林占领军闻风丧胆。在两次战斗中，葡萄牙人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由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指挥的不可战胜的军队，同时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志愿者加入到葡萄牙人的行列中来。通过呼吁进行圣战和伊斯兰的共同事业，伊玛目居然成功地从也门的土耳其司令官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援助：新型大炮和狙击手。葡萄牙人在与埃皇的军队汇合之前被迫进行第三次战斗，结果失败。葡萄牙军队指挥官被俘，因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被处死。但命运之神还是偏爱基督徒的。帝国军队与剩下的葡萄牙军队合兵一处，并于1543年2月在纳塔湖以东的高原上摧毁了穆斯林军队，伊玛目被葡萄牙人的一颗子弹打死，他的军队被瓦解，很难说是否是葡萄牙人的援助打破了这场持久战的平衡。从纯军事观点看，在最后的几场战斗中的确是这样，因为葡萄牙人的战术和枪炮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战略平衡。但是，对埃塞俄比亚更为重要的是随葡萄牙军队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团(参看下文)。毫无疑问，穆斯林军队十分强大，在军事上足以征服埃塞俄比亚；但它又太弱小，以致于不能永久地控制蒂格赖和阿姆哈拉两大民族——特别是他们不能成功地将伊斯兰教强加于基督徒。1543年之后，基督徒所从事的斗争开始显露出胜利的迹象，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帝国收复了失地，伊斯兰力量在未来几个世纪中被打破。[28]

---

[25] C. 韦尔林顿(Verlinden)，1971年，第86页及以下诸页以及第114页及以下诸页；H. 凯伦本兹(Kellenbenz)，1971年，第123页及以下诸页。

[26] F. 扎恩克(Zarncke)，1876-1879年。

[27] 最好的版本是C.F. 贝金汉(Beckingham)与G.N.B. 亨廷福特所写的(F. 阿尔瓦雷斯，1961年)。

[28] 在盖拉德乌斯统治期间(1550至1559年)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最后几次艰苦的战争过后，在帝国编年史中再也未提及穆斯林国家。

奥罗莫人(加拉人) 716

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家像预言者约耳那样哀叹道："但是，毛虫吃剩的被蝗虫吃掉，穆斯林剩下的被加拉人毁掉。"自16世纪中期以来，大批奥罗莫人——迄今为止他们通常称为加拉人，这是邻邦给他们起的名字——不断地向埃塞俄比亚中部、东部和西部移居，数量越来越多，达到了民族迁徙的程度。他们的到来和定居以及与已居住在该地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具有深远影响，并在东北非引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奥罗莫人给埃塞俄比亚人带来的痛苦比穆斯林更多，时间也更长，它使埃塞俄比亚帝国永远丧失了许多省份。直到1700年前后，帝国才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奥罗莫人的文化扩张势头。奥罗莫人成为东北非最大的民族群体，然而，与阿姆哈拉人和索马里人不同，他们直到最近才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此外，作为单个的奥罗莫人群体，它们都处于多种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之下。

在非洲，很少民族群体的起源与文化被记载得如此不真实。[29] 尽管仍然不知大批奥罗莫人迁徙的原因，但他们不是如有时所讲的那样是为了躲避其他民族给他们造成的压力而迁徙的。他们自己的传说除了提到是为了解决不断膨胀的人口问题而需向外寻找新牧场外，对此事并未作其他说明。有人说是索马里人向奥罗莫人施加了压力，但当时双方不存在任何接触。也不可能是索马里人对奥罗莫人构成长期的军事威胁，因为当时索马里人分散成数不清的自治群体。当时，奥罗莫人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将阿姆哈拉人组织良好的军队和应征士兵驱赶到自己面前并彻底地消灭了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伊斯兰国家。

不管阿姆哈拉人和欧洲人富于想象的记载怎么说，尽管这些作者确认奥罗莫人最初的家乡是马达加斯加、蒙巴萨或索马里北部，但奥罗莫人是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这可以从他们的全部文化和传统中得到证实。今天巴莱省周围凉爽的高原就是他们的家乡，正是从那里他们开始向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中心地带和南方以及向现在的肯尼亚和印度洋大规模移民。

把奥罗莫人说成是野蛮人或原始牧牛人是不正确的，这些描述来自高傲的阿姆哈拉历史学家和普通的阿姆哈拉人，他们把奥罗莫人描述为野蛮人，非基督徒(也称其为非穆斯林)，没有先进的社会等级，没有文字，没有君主制度。将奥罗莫人视为没有耕种技巧的原始牧牛人的错误判断是从奥罗莫人对牛的情结中得出的：奥罗莫人与牛之间存在一种 717 紧密的情感关系，这在埃塞俄比亚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种情感关系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的考虑。在大迁徙过程中，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从事任何农业活动，而只能在一处定居下来后才能在那里展示他们文化的全部丰采。他们也随时接受许多当地文化成分，并与所征服的当地人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

奥罗莫人过去是现在仍是四邻羡慕的高度发达和拥有先进文化的民族，否则就难以解释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大规模的扩张和同化的能力。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明显看出其同化能力是多么强。今天的大多数奥罗莫人并非真正的奥罗莫人血统，而属于被奥罗莫人同化的民

[29] 参见E. 哈伯兰德，1963年；A. 莱格斯(Legesse)，1973年；E. 塞卢利，1922年。

族。他们的扩张，部分是由于其军事优势造成的连锁反应，正是由于他们具备令人羡慕的社会组织，其他民族集团才愿意加入到他们中来。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哈拉尔与古拉格地区之间的大民族集团哈迪亚的成员，他们几乎全部投奔了奥罗莫人。只有其民族集团的名字和一些传统才能证明其原来的身份。不少成为奥罗莫人的哈迪亚人在沃莱加省定居下来。㉚

奥罗莫文化有几个显著特点，如已提及的奥罗莫人与牛之间的紧密关系。牛不仅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基础，而且也是他们在情感和宗教仪式上关心的对象。这种对牛的情结及其道德意义渗透到了整个文化之中；相比之下，农业在情感上的重要性则是次要的。其根源在于奥罗莫人关于创世纪的神话，该神话声称，当上帝创造人类时，他对奥罗莫人大声叫道："喂，过来，你们这些牛的主人！"。㉛

与索马里人一样，奥罗莫人由大量家系相连的群体和氏族构成，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些群体和氏族开始分化并形成新的政治上独立的群体。博拉纳人和巴伦图人（或叫巴拉图人）是神话传说中以其名字命名的最早两个部落的祖先和创始人。迁徙开始后，这些大的家系亲族集团中又出现了较小的集团。巴伦图人主要在东部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而博拉纳人（不要与肯尼亚边境上的博兰人相混）在南方的中部和西部安家落户。在上一世纪快要结束时，即当奥罗莫人被皇帝孟尼利克打败而且并入埃塞俄比亚帝国时，他们分裂成为80多个大小不同的政治独立集团。㉜

对奥罗莫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更为重要的是"加达"制(gada)，即依据抽象的数字原则718 而进行的年龄组分类。加达是统治奥罗莫人生活的中心机构，在其他民族中是不曾有的。加达制管理无所不包：生育、洗礼、婚姻、割礼、从父权下解放出来、批准生养孩子、为战争和狩猎而征募、杀人与牺牲的义务、因死亡而将公民从该制度中注销、埋葬、装饰风格、发型、服装、家具与仪式上使用的装饰品、房屋与家畜栏的安装等等。它代表了管理人们生活的法律总和。每个奥罗莫人，在其父进入儿童等级40年后，不论其实际年龄多大，均进入儿童等级。作为理想，每人一生之中要经过10个等级，每个等级需要八年时间。进入到同一等级的所有人共同构成一个加达组，这是一个终生都分不开的武士兄弟会。每一等级的成员都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除社会和宗教规定外，其活动与其相应的年龄组保持一致。第五和第六级是领导和武士阶层。由于这是一个权利等同的自由人构成的共同体，所以不存在世袭的等级制。民族集团的首领通常称为"阿巴·加达"(abba gada)，从第五级（加达或卢巴）的成员中选出。首领由法官(hayu)和其他权贵辅佐，法官也是从首领所属的等级中选出。加达制的规定对奥罗莫的军事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执政等级在其掌权的八年里至少要进行一次战争或杀戮远征。东北非各民族都有这样的英雄理想，即成为一名成功的杀手和猎手。只有使自己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和猎手并杀死过敌军士兵或凶猛的野兽如狮子、大象、水牛或犀牛的人，才能在共同体中占据显要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奥罗莫人准备作出牺牲并在野外冒生命危险去获取自己渴望的猎物。武士有权穿戴

㉚ U. 布鲁坎佩尔，1980年，第152页。
㉛ J.L. 克拉夫(Krapf)，1858年，第1卷，第267页。
㉜ 参见E. 哈伯兰德书后的地图，1963年。

杀手饰物，包括耳环、头发上戴羽毛和抹黄油以及作为生殖器崇拜的额上饰物。在东北非，哪个地方也没有像奥罗莫人那样把对杀手的情结与社会制度如此地融为一体。由于规定要求每个处于执政地位的加达等级需进行一次战争和杀戮远征，奥罗莫人军队每八年都向其邻邦发起攻击，而邻邦对于周期性的入侵困惑不解，束手无策，直到他们逐渐了解加达制。不少奥罗莫人的邻邦——锡达马人、达拉斯人、布尔吉人以及所有孔索人[33]——都把加达制视为加强其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他们进行某些改造后也采纳了这种制度。

奥罗莫人的宗教非常庄严。他们对作为造物主和天国之主的上帝的崇拜是《旧约》的模式。奥罗莫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的口头文学十分丰富，不仅包括对神的祈祷和祈求，也包括抒情的爱情诗。 **719**

至少在其早期迁徙过程中，奥罗莫人除了军事上勇猛外，还有一项优势，他们进驻的地区实际上都是经过穆斯林与基督徒15年左右的战争后人口减少或当地人口本来就稀少的地区。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中部，即今天的绍阿省一带，伊斯兰军队每年在进攻北方时都要经过这里。曾一度人口稠密的绍阿中部变成了无人居住的荒野，直到1800年时，这里居民仍很稀少。1530年后，姆达纳人加达组的武士渡过了瓦比河；1538年后，基洛勒人加达组破坏了北部邻近地区，即以前由穆斯林为主的达瓦洛国，甚至位于更北方的哈瓦斯河低地部分也遭到破坏；1546年后，比弗勒人入侵了法塔加尔省；1554年后，梅萨勒人毁灭了伊斯兰国家阿达尔的绝大部分地区。此时，奥罗莫人才知道有马匹并很快成为著名的骑手。[34]

与此同时，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的继承人艾米尔努尔勇敢而富有天才，为恢复对基督徒的圣战而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但毫无结果的尝试；尽管皇帝盖拉德乌斯在这场基督徒未充分准备的战争中阵亡，但穆斯林的力量还是迅速衰落下去。

奥罗莫人的哈尔姆法等级组发起的攻击（1560-1570年）无论是对基督徒还是对穆斯林都是灾难性的。奥罗莫人侵入了埃塞俄比亚帝国中部省份，这些省份刚刚从圣战的破坏中开始恢复，在安戈特、阿姆哈拉和伯根德等省，新皇帝米纳斯的军队与奥罗莫人相对抗。同时，其他的奥罗莫人等级组也袭击了阿达尔，当时这里正发生饥荒和瘟疫，艾米尔努尔也受到灾害的影响。除了少数逃往阿法尔沙漠中的沃萨绿洲的人和受高墙保护的哈拉尔城的居民外，穆斯林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再也未出现在非洲的这一地区。当皇帝米纳斯去世时，埃塞俄比亚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已被奥罗莫人永久居住。[35]

但这并非是奥罗莫人扩张的终结。甚至早在1500年以前，其他民族群体已开始离开巴莱周围的高原而进入南方一望无际的热带大草原，为其牛群不断寻找新的更大的牧场；他们最后到达了塔纳河口处的印度洋海岸。这些人是古吉人、博兰人和奥尔马人。中部的阿鲁西人在以前的巴莱附近定居下来，并不断地将其边界向西推进，到1880年已到达比拉特河。巴伦图人散布在最初的伊斯兰国家法塔加尔、达瓦洛和阿达尔这一地区。坚固 **720**

---

[33] 关于加达制，参见 Ad.E. 詹森(Jensen)，1936年，第315-382页；E. 哈伯兰德，1963年，第167-223页，第308-321页，第380-397页，第451-475页；A. 莱格斯，1973年；S. 斯坦利(Stanley)和D. 卡斯滕(Karsten)，1968年；以及C.R. 哈尔派克(Hallpike)，1972年，第180-221页。

[34] A.W. 施莱克尔，1893年，第20页。

[35] 见地图24.3；参见V. 斯蒂兹，1974年，第80页。

的哈拉尔城以及著名的塞克胡森朝圣中心，多亏奥罗莫人宗教上的宽容，作为伊斯兰孤岛幸存下来。许多被称为图拉马-奥罗莫的小群体在绍阿定居下来。只有在炎热易守的低地、大河峡谷和一些高原地区，小群阿姆哈拉人坚持抵抗，如在穆雷特、马尔哈比特、塔古拉特、瓦格达、曼兹、杰斯、埃夫拉塔和格德姆。他们从这些据点逐步登上高原，正是从这里，1700年前后，在纳加西领导下开始对原基督教地区重新征服，纳加西是所罗门王室旁支的后裔。沃洛人和耶古奥罗莫人分布在富饶的安戈特和阿姆哈拉省，过去这里居住着基督徒，现在只剩下阿姆哈拉萨因特人了。虽然他们很快采用了当地阿姆哈拉语，但由于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因此奥罗莫人仍是基督徒不共戴天的仇敌。其他奥罗莫人作为牧牛

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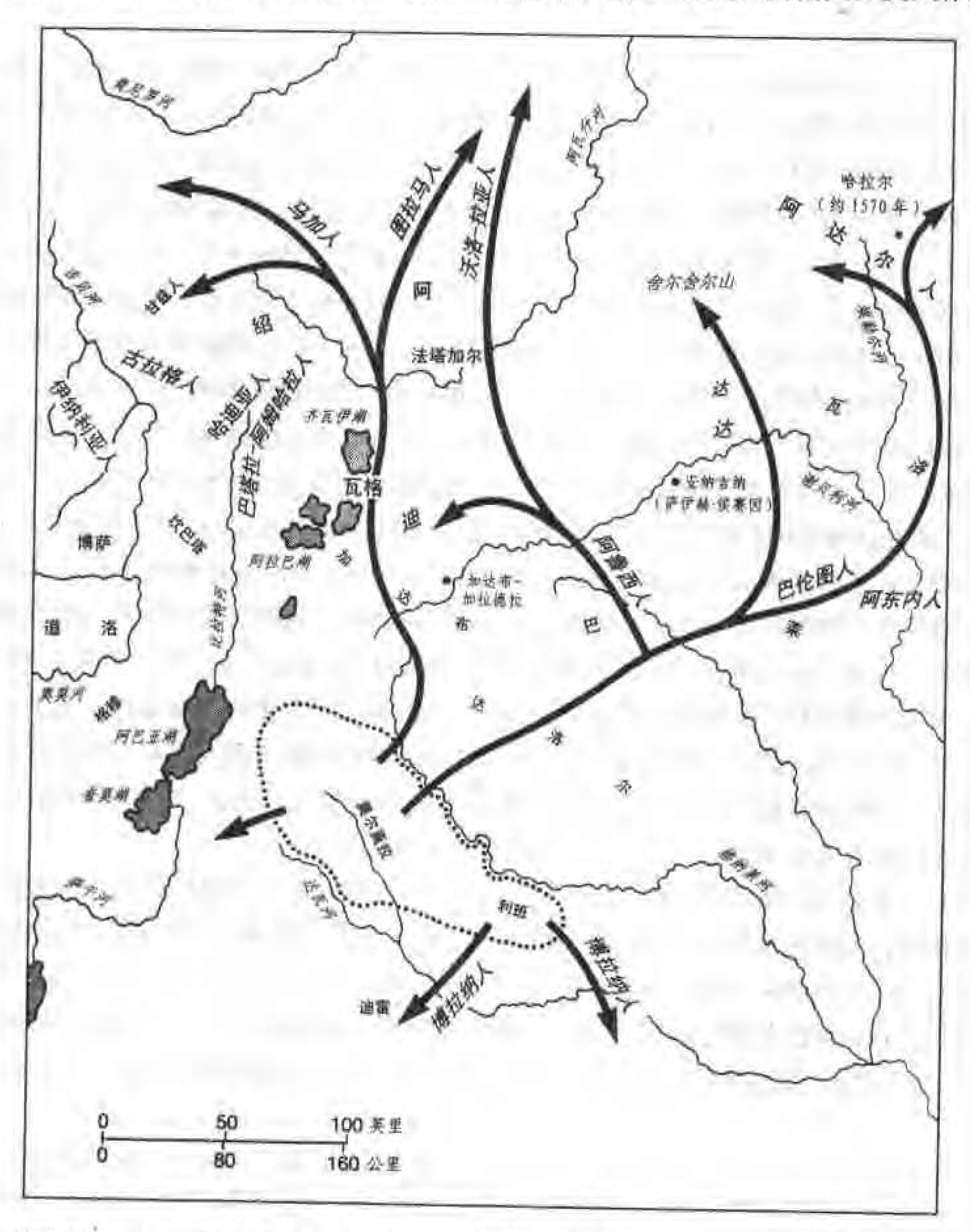


插图24.3　16世纪奥罗莫人的迁徙(仿照E.哈伯兰德图)

人占据了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面肥沃的低地。他们是卡拉尤人、吉勒人、阿尔图马人、里克人、拉亚人和阿泽博人。[36]

17世纪初，奥罗莫人最后一次移民高潮由主要属于马加人大家族的几个群体构成，他们向西推进并进入今天的沃莱加省和伊路巴博省的地方，在到达埃塞俄比亚高原西坡后才停了下来。我们对于该地区西部的早期历史了解甚少。这里可能人口稀少，只居住着少数苏丹农民，其幸存者贡扎-古穆斯人今天仍住在那里。这里还住着贡加人部落的成员(参看下文)，其幸存者是马奥-阿菲洛人和西纳沙人。在该地区东部和南部，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奥罗莫人袭击组织良好且人口稠密的王国，这些王国与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居民已部分基督教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支持，这些王国对奥罗莫人顽强抵抗。但由于奥罗莫人强大的扩张势头，北方的帝国与其西南部的属国之间的联系随着帝国实力下降而削弱。因此博萨和古曼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并成为奥罗莫人的领地吉马和古马。在这里，原有的文化基础仍十分牢固，以致于奥罗莫人接受了其大部分文化，特别是国家的宪法和君主制，同时加达制逐渐消亡。因其金制珍品而闻名的伊纳利亚是这些国家中最后一个垮掉的，被利姆奥罗莫人所打败。1700年之后，该国国王逃到南方。在那里，其他贡加人所建立的卡法和塞科王国以及许多奥梅托人王国坚守阵地反抗奥罗莫人的入侵，由于地形如同天然堡垒，他们的领土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扩大[37]（参看下文)。

索马里人

奥罗莫人对埃塞俄比亚中部、东部和西部的渗透与扩张在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和欧洲的文献中都有反映。同一时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另一个大的民族索马里人也开始了对外扩张，这种扩张对非洲之角大片地区同样重要。文献上对索马里人的崛起讲得很少。索马里人因受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领导的伊斯兰圣战的激励而开始在东北非历史上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38] 722

普通认为最早的索马里人国家位于他们今天居住地的北边,可能从11世纪开始他们便从那里向南向西扩散。早在13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就曾讲到索马里人在梅尔卡地区的居民点,在今天摩加迪沙城南。作为以养牛为生的游牧民,索马里人因受到人口不断膨胀的压力而被迫朝埃塞俄比亚高原方向去寻求新牧场,他们可能在1500年前后到达了哈拉尔高原东部边缘地区,开始与那里的伊斯兰国家发生直接联系。编年史家西哈布·丁留下的名字与家谱资料表明,索马里人作为伊玛目艾哈迈德·格兰圣战的支持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

[36] 参见E. 哈伯兰德书末地图，1963年。

[37] F.J. 比伯(Bieber)，1920-1923年；H. 施特劳布，1963年，第274页及以下诸页；W. 兰格(Lange)，1980年，散见各处。

[38] 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重要民族当时的历史了解甚少，尤其是他们在非洲之角内地的情况。当然，需要更好地了解与这些家系有关的口头传说和历史事件。对索马里而言，历史研究应是一件紧迫的事情。最好的著作是F. 塞卢利，1957-1964年以及I.M. 刘易斯(Lewis)，1955年，第11-55页；1961年，第1-30页。

到此时为止，在索马里国家北部和东部海岸上的城镇以及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伊斯兰国家(阿达尔、达瓦洛等)对索马里人所起的刺激与统一作用，比东北部非洲其他任何民族都大。伊斯兰教在索马里文化中成为一种一体化因素，这与伊斯兰教对其他文化上有联系的库希特民族如奥罗莫人和哈迪亚人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索马里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程度因阿拉伯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不断加强。这些传教士成了索马里人的圣人和始祖，如著名的伊斯梅尔·加巴尔蒂，不少索马里人都是他的后裔。

这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使索马里人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在与欧加登和图尔卡纳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的其他主要亲属部落的关系中，加强了他们的同化能力。在这里，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主要由库希特语言与文化以及完全依赖牧牛为生的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已经形成。正如伦迪勒人的生活显示的那样，索马里人在大规模向东北和西南移民之前就参与了这一进程。这一地区是否曾居住过黑人，或许是班图人，还值得怀疑。在种族上不同于索马里人的群体如居住在谢贝利河上游的阿东勒人、谢贝利河中游的谢贝利人和马卡纳人以及朱巴河上游的戈巴温人，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是由于处于孤立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倒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确信居住在朱巴河下游的戈沙人是以前来自东非奴隶的后代，他们在那里联合起来组成了自由共同体。[39]

要确切说出索马里人扩张以及同化其他部落的每一阶段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许多隶属723于索马里民族的群体故意隐瞒了全部有关其以前民族差别的参考文献，装做是属于同一索马里世系。以这种方式并入索马里民族的主要的群体有萨布人(迪吉尔人、拉汉温人等)，可能还有一些哈威亚人。在索马里-奥罗莫人边境地区至今仍有许多民族群体把自己说成是索马里人，但他们以前被认为属于奥罗莫民族(占拉人、盖利人、加布拉人和萨库亚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教益的文化转移和同化的范例。今天，一个单一的家谱图能将全体索马里人团结起来，而每个群体在共同的家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40]

在伊斯兰教影响下，索马里文化发生了变化，尤其在南方。(在索马里北部如伊萨仍保留着许多共同的东库希特文化成分)。这样，索马里人的差异比东北非民族大家庭中其他任何民族都大，索马里人由许多共同因素所维系，如历史、文化，更不用说地理因素了。决不能低估地理环境所发挥的影响。这里阿法尔人除外，因为在其家乡荒凉的土地上，几乎不存在发展文化的机会，而索马里人是东北非唯一领土完全是干旱的热带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居民。这种生态环境促使他们发展了与其他东北非民族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东北非民族大部分为高原居民。因此，对于大多数库希特人非常重要的加达制，要么在索马里人那里无立足之地，要么因伊斯兰教的影响而被完全放弃。

埃塞俄比亚帝国为生存而斗争，1529-1632年：葡萄牙事件与1632年后帝国光复

1529年(圣战开始)到1632年(光复开始)是埃塞俄比亚帝国为生存而斗争的阶段。这

[39] V. 格罗坦纳利(Grottanelli)，1953年。
[40] I.M. 刘易斯，1961年，第127-195页。

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阶段，所发生的并非仅仅政治和军事事件。这也是一个智力与文化冲突激烈的时期，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思想煽动反叛和内战，但同时也刺激了文化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发展。与 1755 至 1855 年智力与政治不景气的 100 年相比，这一阶段显得极为活跃和富有生气。

这个基督教帝国，或者说其两大民族阿姆哈拉人和蒂格赖人，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压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能力。在皇帝萨尔查·丹吉尔(1563-1597 年)统治期间，一如在勒布纳·丹吉尔统治的最后十年一样。帝国只是一个虚幻而非一个政治现实。但此时，神圣帝国这一概念的精神力量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人在红海两岸不断加强力量，夺走了埃塞俄比亚的所有港口并渗透到通往提格雷省的高原腹地；在中部的伯根德省和萨门省，展开了一场针对信仰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残酷内战，奥罗莫人不仅蹂躏和毁灭了东南部进贡的国家，割断了帝国与其西部和西南部的属国之间的联系，而且还周期性地入侵伯根德省和戈贾姆省，并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心脏地带如安戈特、沃莱卡、阿姆哈拉和绍阿永久定居下来。国家的实际权力被缩小到皇帝及其军队所占领的地区之内，但很明显，“福音帝国”的永存从未受到怀疑。至少在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帝国的编年史中是这样讲的。正是这种思想意识使得帝国在 1755 至 1855 年的 100 年无政府状态结束时避免了彻底瓦解。 724

此外，因圣战而发生的可怕动乱以及因奥罗莫人迁徙而导致伊斯兰国家和文化从埃塞俄比亚东部和中部消失，这对帝国能在政治上继续生存的重要性几乎从未过高估计。在以后的若干世纪里，伊斯兰教不再构成严重威胁。

当然，帝国在为其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的确在领土和民族方面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最后，至少从 1632 年光复开始，帝国大规模向南挺进的政策——这确实是以前几个世纪帝国的主要政策——尽管未正式宣布放弃，但很少执行。由于帝国实力不断下降，重心集中到维持帝国中心地区稳定的问题之上，因而未采取特别值得注意的或成功的政治或军事行动。1636 年，皇宫迁往贡德尔，这是上述退却的一种信号。在此之前，在一个城镇不知为何物的国度里，皇帝们每年或每半年都将其营帐换一个地方。这一直是一条严格的规则，甚至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没有必要远途跋涉或换一个地方时，也这么做。尽管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家说：“皇帝们不停地从一个省迁往另一个省，直到去世的那一刻”，[41] 但实际上他们并非总是从帝国的一端迁往另一端。除了短期搬迁外，皇宫大多数情况下长久地建于一处，即帝国的中心。因此，扎格维王朝(12 和 13 世纪)的统治者们效仿阿克苏姆国的国王，在瓦格和拉斯塔建造了自己的皇宫。所罗门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叶库诺·阿姆拉克(1270-1285 年)，主要居住在阿姆哈拉省，皇帝泽拉·雅各布(1434-1440 年)喜欢住在绍阿的东北部(达布拉·比尔汉)，皇帝勒布纳·丹吉尔(1508-1540 年)在葡萄牙传教团到来时，在绍阿的东南部建起了营帐，皇帝盖拉德乌斯(1540-1559年)最后在今天阿鲁西·瓦格地区的姆内沙建造了一个重要的皇宫。所以，在最后的大规模宗教内战结束后，法西拉达斯于 1636 年在贡德尔建造了一个固定皇宫，这一举动表明，不仅与传统决裂，而且也是对过 725

[41] J. 佩鲁乔恩，1893 年，第 149 页。

去王朝帝国政策的象征性否定。直到1855年，贡德尔一直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残余部分



图片24.1 法西拉达斯皇帝建立的埃塞俄比亚首都贡德尔城堡

的中心。[42]

因此，从1529年圣战开始到1597年皇帝萨尔查·丹吉尔去世和内战开始这一个阶段，帝国政策集中于抗击国内外敌人。皇帝盖拉德乌斯继续进行抵抗穆斯林的斗争，特别是抵抗阿达尔-哈拉尔国的穆斯林，并大获成功。南方广大地区达瓦洛和瓦格重新与帝国统一，尽管它们很快又落入奥罗莫人之手。从前与西南部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基督教阿姆哈拉文化的影响也在那里恢复起来。奥罗莫人被赶了回去，至少是暂时被赶走。易卜拉欣·格兰的继承人艾米尔努尔·伊本·穆加希德勇猛而具有政治才能，在他领导下，阿达尔-哈拉尔的穆斯林试图再次对抗这个基督教帝国，尽管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和流行病，使得人口本遭到屠杀的大部分地区荒无人烟。虽然未加充分准备的埃塞俄比亚军队在1559年进攻阿达尔的战斗中被击退，皇帝盖拉德乌斯阵亡，但这次战斗却标志着伊斯兰力量的终结。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文化在这一地区消失了几十年。只剩下在哈瓦斯河三角洲绿洲中加固了的哈拉尔城和小小的素丹王国沃萨，这是由于它们受到周围荒地的保护。[43] 盖拉德乌斯的继承人米纳斯皇帝(1559-1563年)被迫主要与土耳其人战斗，这些土耳其人在其所在的马萨瓦和萨瓦金的红海港口基地，不断试图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建立一个据点。米纳斯的儿子萨尔查·丹吉尔(1563-1597年)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继承了王位，在不停地四处征战中

726

[42] 蒙蒂·德拉·科特(Monti della Corte)，1945年。

[43] P.V. 保利奇克，1888年；E. 塞卢利，1931年、1936年和1942年；E. 瓦格纳(Wagner)，1979年。

渡过了短暂的一生和相对长久的统治。虽然奥罗莫人从未像圣战的军队那样构成重大威胁，但由于其人数和实力不断增长，他们的骚扰还是使得帝国不得安宁。[44]

在高原的北部，主要是在萨门、瓦盖拉、达姆比亚、贝拉萨、萨拉姆特和萨加德，以企图消灭信仰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为目的残酷战争时常发生，而以前这些信仰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人住在高原北部，有自己的首领，还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他们的祖先可能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在犹太教传教士的影响下，皈依了犹太教。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完全整合到其生活的文化之中，其程度之深，以致于他们的《圣经》(如《旧约》)不是用希伯来文写成，而是用盖埃茨文写成的，盖埃茨文是埃塞俄比亚文学和仪式上使用的语言。

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这种宗教战争偏偏在帝国受到外部敌人强大压力的时刻爆发。犹太人面临的选择是：或接受基督教或被消灭。对这些战争的描述，正如在一代人之前进行圣战的穆斯林军队消灭基督徒的战争一样，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尽管具有英雄气概，几乎到了不怕自我牺牲的程度，但由于大多数犹太人拒绝皈依基督教，犹太人几乎被彻底消灭。极少数幸存者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土地也被没收。因此，他们被迫作为手艺人，"法拉沙"成为铁匠、制陶者、木匠或织补者以及实际上任何技术工人的同义语。虽然这些职业非常重要，但他们在社会上被玷上一种污名，因为这个社会的理想是自由与独立的人从不为工资而工作。所以，他们不仅社会地位下降，而且受到宗教迫害。[45]

令人吃惊的是，埃塞俄比亚帝国尽管进行了三代人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却聚集了力量，不仅与北方的土耳其人，东方的阿达尔穆斯林以及南部和中部的奥罗莫人对抗，而且还在西部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中迫使伊纳利亚、博萨和卡法(戈马尔)这些大国再次与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埃塞俄比亚北方文化紧密相连。《加拉人史》的编纂者(可能是皇帝萨尔查·丹吉尔的宫廷牧师)在记录这场重要战役时只是简单地加以描述，在南方进行的一场战役中，皇帝未能同达维奥罗莫人开战，因为他们撤退了： 727

> 由于不能同血肉之躯作战，他决定与魔王斗争，征服人们称之为伊纳利亚、博萨和戈马尔民族的灵魂。他们被告知："变成基督徒!"他们这样做了并以基督教洗礼的方式进行了洗礼。[46]

但是，帝国编年史的作者在大规模的洗礼问题上着墨颇多。他对亲眼所见的事件的描述生动地表明阿姆哈拉人对其传教团的折服以及他们作为基督教信仰和帝国概念传播者的优越感。萨尔查·丹吉尔主动提出，如果全体伊纳利亚人都成为基督徒，其贡品减半。在基督教信仰最坚定的皇帝压力下，同时也是想获得其支持以对抗实力不断增长的奥罗莫人，伊纳利亚国王巴丹科决定接受基督教洗礼。为国王及其全体臣民举行的洗礼仪式非常庄严。埃塞俄比亚皇帝"作为新使徒、新康斯坦丁大帝，他关闭了盲目崇信者的寺院并打开了教堂"，亲自担当伊纳利亚国王的教父，其长老也成为伊纳利亚贵族们的教父。洗礼

---

[44] 皇帝萨尔查·丹吉尔编年史只记载战争。C. 康蒂·罗西尼，1907年。
[45] W. 勒斯洛，1951年，列出了有关法拉沙人的详尽无遗的文献书目。参见 J.M.A. 弗拉德(Flad)，1869年。
[46] C. 康蒂·罗西尼，1907年，第140页及以下诸页；A.W. 施莱克尔，1893年，第31页。

仪式由埃塞俄比亚宫廷中最高的宗教要人主持。本人就是僧侣的编年史家，对此推崇备至，他惊叹道：

> 噢，信仰基督教的皇帝这一天为当天接受洗礼的信仰者的灵魂感到无比的快乐。来吧，让我们尽情歌颂我们的皇帝萨尔查·丹吉尔：您是各族人民的导师，您遵从基督教戒律，不是出于对武力的恐惧，而是希望到达天国。[47]

在洗礼仪式以及向伊纳利亚人赠送礼袍和华贵饰物之后，皇帝宣布了教规并向这个国家派送了"正统的导师"神父和执事，他们将进入由国王巴丹科建造的教堂里，巴丹科现在命名为扎马尔雅姆(属于玛丽)。之后不久，邻近的博萨国王命名为乔治。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600年前不久，代表着帝国扩张的最后一幕，以后再未发生过类似事件。(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伊纳利亚人在1710年被奥罗莫人所征服，国王带领一部分人逃到南方的卡法)。我们可以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人们仍然流传的口头传说中得出结论，在萨尔查·丹吉尔统治时期，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联系，对埃塞俄比亚南方及其文化发展都具有特别持久和巨大的影响。

728

但是，从1542到1632年与天主教会进行的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对帝国的生存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随着1540年耶稣会的创立，天主教会有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利用它不仅可以同欧洲的宗教改革作斗争，而且还可使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并恢复对不服从罗马天主教教规和权威的"异端"基督教会的控制。除了向印度、中国和日本派遣传教团外(正是由圣弗朗西斯·泽威尔率领)，恢复"祭司王约翰"教会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甚至在1540年之前，葡王与埃皇之间就一直保持通信，而这些联系现在又被利用起来。当然，决定性的因素是葡萄牙远征军士兵在埃塞俄比亚的存在，这些士兵及其家属还留在那里。在有关乔安·贝尔姆德兹的一段不寻常的插曲之后(他随第二个葡萄牙传教团于1520至1526年前往埃塞俄比亚，有人说他是理发师，后来又回到埃塞俄比亚，自称是教皇委任的埃塞俄比亚罗马天主教大主教)，1557年，安德烈·达·奥韦多就任主教并与其他一些耶稣会成员一起被派往埃塞俄比亚，以准备那里的恢复工作，即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统一。他与埃塞俄比亚牧师特别是与皇帝盖拉德乌斯多次商讨，并未给埃塞俄比亚的天主教信仰带来任何有利因素，但通过皇帝之口确引出了赞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信仰的杰出篇章，作为盖拉德乌斯的信仰表白(haymanota)载入史册。

非洲首次发出一种声音，指出基督教是一种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宗教，关于这一点，任何民族、任何大陆都无权声称自己的解释是唯一的真理。既自信又宽容的非洲基督教徒面对的是欧洲人。他为自己找到了位置，例如，他指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某些习俗和做法，既非"异教"，也非"犹太教"，而是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民间文化，正如欧洲文化在欧洲基督教世界里找到了表达方式一样。他说：

729

> 关于割礼，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的做法并不像犹太人，因为我们知道作为智慧之源的保罗对此是怎样说的……我们实行割礼只是我们国家一种习俗，就像努比

[47] C. 康蒂·罗西尼，1907年，第144页。

> 亚人在脸上刻纹或印第安人在耳上穿洞一样。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遵循摩西法典，而是出于人类的习惯，……至于吃(即禁吃)猪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可以像犹太人那样遵守摩西法典。我们并不厌恶任何吃猪肉的人，我们并不视之为不净；但如有人不吃猪肉，我们也不强迫他吃，……有人喜欢吃鱼，有人喜欢吃鸡，有人不吃羊肉。尽管人们的爱好和愿望各不相同，让每个人各顺其愿。……对于纯洁的人，一切都是纯洁的，正如保罗所言：真心信仰的人确实可能什么都吃。

这份文献还提到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将星期六视为圣日的习惯，在这一天，他们举行活动庆祝圣餐和与圣餐相联的“爱之宴”(mahabbar, agape)。[48]

在皇帝萨尔查·丹吉尔统治下，耶稣会员得以将提格雷省阿德瓦附近的弗雷姆纳作为自己活动的中心。他们生活上获得完全的自由，并获准从事传教活动，而且取得成功。奥韦多死于1577年，之后多年无人继任传教团的领导工作，因为土耳其人控制了红海港口并抓走了所有去那里的葡萄牙人。直到1603年，一位名叫佩德罗·帕埃兹的西班牙人在经历了数年危险的旅行后接任了传教团的领导工作。在当时所有欧洲传教士中，他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位杰出和宽容的人。因此在他的任期内，埃塞俄比亚人展开了最活跃的神学讨论。这一挑战迫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走出其习惯上的懒散状态，并进入埃塞俄比亚教会史上最活跃的开展争论与积极斗争的阶段。为了使普通民众也能参与，教会用阿姆哈拉语举行和记录宗教辩论。1632年光复后，随着重新使用官方教会语言盖埃茨语，这种情况才停止下来。但是，盖埃茨语在当时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懂，就像当时欧洲农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懂拉丁语一样。然而，这种富有成果的接触是短命的，因为这种建设性的争论很快成为东正教和天主教教派之间公开的仇视。[49]

文学创作也经历了一次不寻常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神学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埃塞俄比亚文学中属最重要的作品之列。其中神学作品有《神性释义》(Fekkare Malakot)，讨论对上帝的了解，《信仰宝库》(Mazgaba Haymanots)与《灵魂的慰藉》(Sawana Nafs) 730 一样，总结了东正教牧师赞成一性论信仰的论点，以及包罗万象的《祖先的信仰》(Haymanota Abaw)，这部作品译自科普特阿拉伯语，为的是同一个目的。瓦拉塔·佩特罗斯是一位修女，她一生花费大部分精力同天主教教义作斗争，1644年去世。生动描述她的生活和磨难的故事是这一切动乱阶段的重要记录。为恢复那些暂时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信仰，教会编写了与赎罪仪式有关的《不洁之书》(Mashafa Keder)，并从阿拉伯语翻译了《补赎之书》(Mashafa Nesseha)。[50]

具有特殊地位的作者恩巴科姆(哈巴库克)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阿拉伯穆斯林，他在埃塞俄比亚教会等级制中升到著名的达布拉·利巴诺斯修道院院长的位置，并成为“埃卡基”(eččage)即埃塞俄比亚的牧师首领。著名的《信仰之门》(Ankasa Amin)就出自他的手，这是

[48] H. 鲁道夫，(Ludolf)，1681年，第3卷，第1章。

[49] 经过缩写的编年史简明地评述道，在苏森约斯皇帝统治时期：“他因方济各会而反叛”（即天主教信仰）；“人民因方济各会而在瓦格被屠杀”；“他因方济各会而死”；等等。见R. 巴西特，1882年，第129页及以下诸页。

[50] E. 塞卢利，1968年，第145页及以下诸页。

一部基督教反驳伊斯兰教的书，书中摘自《古兰经》中的一些语录经常用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此外，随着对《巴尔兰姆与约瑟法特》的翻译，恩巴科姆使埃塞俄比亚人接触到了东方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许正是由他翻译和改编了《亚历山大之歌》(Zena Eskender)，使这部作品对整个埃塞俄比亚的影响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得多。[51]

有关皇帝盖拉德乌斯、萨尔查·丹吉尔和苏森约斯统治时期的三部作品或编年史以及由僧侣巴赫雷所著的《加拉人史》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巴赫雷也可能是《萨尔查·丹吉尔编年史》的编纂者。)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叙述活泼，风格独特，强烈的个人介入以及作者意识到他们是作为帝国的代言人而写作的。[52]

皇帝萨尔查·丹吉尔因为自己的儿子雅各布年幼，任命其兄长已成年的儿子扎·丹吉尔作为他的继承人。但他的遗孀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权贵试图将雅各布扶上皇位。于是发生了叛乱和内战。扎·丹吉尔最后取得胜利，但他过于轻率，过早地与仍需认真对付的天主教传教团和驻本国的葡萄牙人结成同盟并宣布效忠教皇。因此，阿布纳(埃塞俄比亚教会731 大主教)解除了臣民对皇帝效忠的誓言并将皇帝开除教籍。内战再次爆发，扎·丹吉尔阵亡，雅各布重掌朝政，但最后萨尔查·丹吉尔的重侄孙苏森约斯当上皇帝。由于苏森约斯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重建了和平与秩序。

苏森约斯的登基(1607年)标志着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和天主教传教会之间最后决定性对峙阶段的开始。在执政的最初五年中，苏森约斯通过一系列战役成功地清除了国内外最危险的敌人：极少数剩余的法拉沙人被根除，阿高人(居住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和西部的土著人，直到当时还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被彻底征服，最后，奥罗莫人受到沉重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作为神学家、传教士、教师和建筑师的耶稣会传教团首领，佩德罗·帕埃兹具有非凡的天赋，这使得他有机会进入帝国宫廷，在他强烈个性的影响下，皇帝越来越倾向天主教。有影响的皇弟拉斯·塞埃拉·克里斯托斯于1612年正式成为天主教徒并在他所住的戈贾姆省设立了一个天主教传教团，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尽管阿布纳进行规劝并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皇帝本人在1622年也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不久，佩德罗·帕埃兹去世。[53]

在此之前，两种教义和文明之间的对抗都是斗智，而且相互尊重，而此时却成为公开的战争。教皇所派的新西班牙主教阿丰索·孟德兹与其宽容和杰出的前任截然相反。他的固执与傲慢在热爱自由的国度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敌对的反应，而这个国家与本国的官方教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密切相关。在皇帝的庇护之下，孟德兹利用当时耶稣会所有的残酷逻辑与不宽容，开始把埃塞俄比亚教会引上他所认为的正轨。所有的埃塞俄比亚神父必须重新任命，所有教堂必须重就圣职，其内部装饰必须变更以符合欧洲模式。历法要欧洲化，割礼被禁止，甚至全体埃塞俄比亚人都必须重新洗礼。“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不仅可能招致牧师们的反抗，而且也可能引起普通教徒的反抗。”[54]

---

[51] E.塞卢利，1968年，第125页及以下诸页；L.里奇(Richi)，1969-1971年和1971年。
[52] I.佩鲁乔恩，1893年；C.康蒂·罗西尼，1907年；A.W.施莱克尔，1893年。
[53] P.佩斯(Pais)，1945-1946年；J.洛波(Lobo)，1728年；B.特勒兹(Tellez)，1710年。
[54] A.H.M.琼斯(Jones)和E.门罗(Monroe)，1978年，第97页。

有两件事引起了特别的敌对情绪：其一是将一位深受尊敬的修道院长的遗骨从达布拉·利巴诺斯修道院教堂的墓地中移走，因为孟德兹认为教会分立论者的尸体本身就意味着对神灵的亵渎；其二是按照欧洲模式指控一位妇女进行巫术活动。(在当时,埃塞俄比亚从未对巫婆进行审判,这是近代早期欧洲的一种惩罚。)

反抗不断爆发,抗议可恨的新教会的起义在中部省份伯根德、拉斯塔和瓦格尤其猛烈。732 过去曾给这片国土带来和平的深受爱戴的皇帝，现在不得不通过血腥的战争来镇压臣民，在这些残酷的战争中，耶稣会的狂热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632 年，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斗，尽管双方死伤惨重，但皇帝赢得了胜利。当皇太子法西拉达斯骑马随父穿过战场时，他指着反叛者的尸体说："这些人都曾是你忠实的臣民!"本来皇帝也越来越感到怀疑，听了这话，痛不欲生，随即退位。他在退位时发布了如下公告：

> 尔等听着！朕起初给你们这种信仰时，相信它是好的。但是无数人被杀而死……现在又轮到这些农民。为此，朕恢复你们先辈的信仰。让从前的牧师回到教堂，放回他们的祭坛，继续他们的礼拜仪式。总之，做你们高兴做的事。[55]

不久，绝望的苏森约斯去世，天主教传教团末日来临。人们尽管曾信仰过新宗教，但又全部回到传统的信仰。新皇帝法西拉达斯将耶稣会成员驱逐国外，凡违抗皇帝命令而留下者都将处死。仍坚持信仰天主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其数量不断减少并受到迫害，包括拉斯·塞埃拉·克里斯托斯在内的著名领袖都被处死。为了重新巩固帝国并努力消除所有外来影响，法西拉达斯同马萨瓦的土耳其总督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总督负责处死任何在马萨瓦登陆的欧洲传教士，以此换取人头钱。这样，由于欧洲人的错误，结束了持续长达近百年的非洲与欧洲之间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一开始不断得到加强并具有重要意义，但后来走向了反面。来自海外的基督徒兄弟一开始作为朋友和帮助者受到欢迎，现在这些人在埃塞俄比亚人的记忆中被视为"来自西方的狼"。[56]

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开始了一段有意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时期。这种有意安排的稳定到该世纪末变成了停滞。帝国的中心贡德尔在军事上很安全，在那里建造永久性皇宫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虽然奥罗莫人进行的大规模战役和移民浪潮逐渐销声匿迹，不少奥罗莫人被同化到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文明之中，但贡德尔不大可能再追求一种进取的和能动的政策。因此，在 17 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活动可言。在皇帝约翰尼斯(1667-1682 年)统治时期，少数残存的信仰天主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得到选择的机会，或接受东正教或离开这个国家。对仍住在埃塞俄比亚的穆斯林，主要是商人(gabati)也作了一定迁就，允许他们自由从事宗教活动，但必须居住在分散的居民区中。733

伊雅苏一世(1682-1706 年)是最后一位充分运用手中权力的伟大皇帝。他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重建与埃塞俄比亚西南方的联系，甚至访问了伊纳利亚，但未能成功。在他统治期间，并不存在危及帝国安全的国内外敌人。重要的马萨瓦港虽然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帝国并处于一位贝贾人总督(阿尔基科的纳伊布,nā'ib)的控制之下，但它与埃塞俄比亚之

[55] R. 巴西特，1882 年，第 132 页；A.H.M. 琼斯和 E. 门罗，1978 年。第 98 页。
[56] H. 鲁道夫，1681 年，第 3 卷，第 13 章。

间的贸易是开放的。但在伊雅苏死后不久，因国内衰弱导致帝国的解体，大约在1775年之后变为彻底的无政府状态。[57]

在这一时期内，智力与文化生活出现了最后一次繁荣。这主要是由于贡德尔皇室的资助刺激了艺术与科学的发展(因此我们现在称之为埃塞俄比亚艺术史上的贡德尔时期)。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进一步证明，艺术与科学只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创作范围，是高于乡村民间文化之上的上层建筑。本文不可能完整地叙述这一阶段智力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当文化成就的极度丰富还未被充分认知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叙述将限于文学、建筑和绘画方面。

与上一个伟大世纪相比，文学带有旧框框、教诲性和宫廷风格的特点，翻译作品大多译自科普特阿拉伯语。值得一提的有《心灵医学》(Faws Manfasawi)和《君主的司法权》(Fetha Nagast)，前者是专门讲述苦行的书，后者是法律和教诲集，摘自为埃及的科普特社群使用的教会法、民法和宪法。尽管这部著作常被后来的欧洲作家所引用，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未



图片24.2　18世纪关于圣母与圣子的科普特布面画，贡德尔

[57] 下一阶段直到1855年，是年提沃德罗斯加冕为皇，称为(Zamana Masafent)，隐喻君主士师时代(《圣经·士师记》)。

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不仅翻译常常充满谬误，使人误入歧途，而且法典中的教诲与埃塞俄比亚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关。最后，这一阶段还创作了大量的宗教赞美诗，用来歌颂三位一体耶稣基督、圣女玛丽亚、圣徒或天使。根据其韵律或起源的传说，这些圣歌有不同的名字："德哥瓦"（deggwa），"基恩"（kene），"马尔克"（malkee）或"沙拉姆"（salam）。[58]

书画刻印艺术也带上了与宫廷有关的特点。著名的岩石教堂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明最重要和最富独创性的创造之一，在15世纪末，不仅在瓦格、拉斯塔和格拉尔塔的主要中心地区，而且在更远的许多南方省份中，仍在岩石上开凿这种教堂。这种教堂的确切数目现在还不清楚，也从未准确地描述过。1500年之后，这种类型的建筑完全停止，可能 734 是因宗教战争之故，之后再也没有恢复。[59] 1632年之后，在贡德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建筑——巨大的城堡、图书馆、宫廷小教堂和附属于皇宫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的样式常常显示了外国特点。大多数建筑也许是由熟练的印度、葡萄牙建筑师建造的，他们来自葡萄牙统治下的果阿一带，并同葡萄牙传教团一起到达埃塞俄比亚。在1632年



图片 24.3 18世纪关于圣乔治与龙的科普特布面画，贡德尔

[58] E. 塞卢利，1968年，第162页及以下诸页。

[59] R. 索特(Sauter)，1963年。

葡萄牙传教士被赶走后，他们仍然不断来到埃塞俄比亚。帝国的逐渐衰落，提沃德罗斯人和伊斯兰教托钵僧对贡德尔城的破坏以及此后几个世纪疏于管理，使这些建筑物丧失了其建筑上的华丽及豪华的内部装饰。今天留下来的只是光秃秃的墙壁或废墟，一点也看不出当时文明的水平。[60] 在光复阶段，肯定也存在着与印度之间活跃的文化联系，虽然对此知之甚少。例如，埃塞俄比亚皇帝在一些宗教绘画中是身穿印度德里莫卧儿大帝的宫廷服装出现的。[61]

埃塞俄比亚绘画主要有两种表现手法：教堂壁画和宗教著作中的图书彩饰艺术。（与此相比，虽然可折叠的木制祭坛的艺术质量很高，但数量较少，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尽管17世纪前的教堂壁画（石画或贴在墙壁上的棉织品绘画）存留极少，许多原稿可追溯到14世纪之前，它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绘画的发展。埃塞俄比亚绘画总带着两个显著特点：随时学习外国模式与刺激点以及将这些模式重新改变成典型的埃塞俄比亚作品的能力。埃塞俄比



图片 24.4 达布拉·比尔汉教堂的18世纪壁画，贡德尔

[60] 蒙蒂·德拉·科特，1945年。

[61] 例如，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所的一些画像。

亚历史上的每一伟大时代都有绘画风格上极为独特的发展。[62]

1500年前后，图书彩饰艺术发展到顶峰，这与当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明达到高峰以及埃塞俄比亚帝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相一致。高度风格化的画像不仅显示了威严，而且还表现出了极深的情感。这些绘画不受其说明的经文的束缚，通过表现出的力量来打动旁观 **737** 者，使其信念得以加强。[63] 虽然教规对各方面都有限制，这些画家在绘画时却享有极大的艺术自由，所以，其个性很容易看出。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的绘画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这些绘画反映了当时逐渐渗透到埃塞俄比亚的外国影响的多重性，是激烈的文化冲突的见证。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几位埃塞俄比亚画家采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形式仿造德国画家与插图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微不足道的激情》的著名木刻。1591年，罗马的信仰传道总会印制了一本《阿拉伯福音》，以支持在东方的天主教传教活动，**738** 书中有许多铜版画加以说明，在这些画中，他们仍使用旧的模式包括丢勒的模式。这部作品的复制品紧随葡萄牙传教团之后来到埃塞俄比亚，并很快成为袖珍画艺术最受欢迎



图片 24.5 达布拉·比尔汉教堂关于地狱和魔鬼的18世纪科普特壁画，贡德尔

[62] 参见 J. 勒罗伊，S. 赖特和 O.A. 贾格尔，1961年；J. 勒罗伊，1967年；O.A. 贾格尔，1957年。

[63] 我想提一下比尔比尔·马尔亚姆(加姆)手稿中那些未发表的袖珍画，或1967年出版的 J. 勒罗伊的书中所复制的那些绘画，1967年，图片 VI-XV。

的模式。[64] 所有这些绘画都证明了埃塞俄比亚人将外国模式与其自己的文化融为一体的巨大能力。这些绘画也是动乱年代活的表现，带有与很难适应埃塞俄比亚传统艺术的外国风格相冲突的特征。

光复时期即贡德尔时期的绘画是以其高雅和优美的形式而显现的。(其中许多也是受到欧洲模式的启发。)它们折射出逐渐失去的帝国光辉，是为朝臣等上流社会而作，这些人能从其优雅且日益习俗化的风格中获取快乐之感。这些绘画由融入宫廷社会的艺术家所作。《橄榄山上的基督》等绘画以其人物的艺术安排，色彩的均衡以及对细节的强调，代表了这一时期绘画的高峰。在所谓绘画史上的第二贡德尔时期，大致从1700年开始，艺术创造力逐步下降，最后成为形式的不断重复。[65]

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新文化和新国家的出现

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和伊斯兰的文献中(参看上文)，我们可以合理地推知出1500至1700年(甚至更早)埃塞俄比亚东南部与北方的基督教帝国之间的联系。早在14世纪上半叶，当时还住在舍尔舍尔山区及其南部地区的哈迪亚人，在帝国传说《Kebra Nagast》中曾提到。有关阿姆达·塞昂(1314-1344年)和泽拉·雅各布(1434-1468年)两位皇帝的编年史充满了有关与东部和东南部伊斯兰国家冲突的记载。[66] 就文字记录而言，西部和西南部的情况十分不同——这一地区就是今天的沃莱加省、伊路巴博省、卡法省、格穆戈法省以及绍阿省和锡达英-博兰纳省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一些尤其是赞美15世纪皇帝们的名歌的确提到了当时向埃塞俄比亚皇帝进贡的民族和国家的名字。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们是否与19世纪那些名字相同的民族和国家是一回事，因为名字可以改变而且移民又可以将这些名字带到遥远的地方。所提到的名字主要有：伊纳利亚、博萨-曾加洛、坎巴塔·恩纳穆尔、库卡、泽尔戈、瓦拉穆、格穆、哈拉巴、古德拉、瓦格，最后还有达穆特及其国王穆托洛米(或称穆蒂拉米)。[67]

739

除了政治上的统治和对贡品的勒索之外，我们从这些歌词中还不能断定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有关圣塔克拉·海曼诺特(14世纪初)生活经历的半神话似的故事也许更值得注意，故事较详细地描述了她是如何去达穆特为"穆托洛米王"洗礼的。也许"王"这个称呼实际上不是一个头衔。此外，达穆特在那里还未建立，这个地方可能是沃拉姆(沃莱塔)，正如口头传说中所讲的那样。达穆特作为地区和山区之称，主要是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这样叫。[68] 尽管皇帝泽拉-雅各布(1434-1468年)率领或派遣军事远征军和传教团去埃塞俄比亚南部进行征服和传教，但是其编年史留存的原文中几乎没有提到此

[64] H. 布克沙尔(Buchthal)，1960年。

[65] 参见O.A. 贾格尔，1957年，图片LIX和LX；J. 勒罗伊，1967年，图片LIX和LX；E. 哈姆施米特(Hammerschmidt)，1977年，第121-127页，第138-150页以及第151-155页。

[66] 参见G.W.B. 亨廷福特，1965年，散见各处；J. 佩鲁乔恩，1893年，散见各处。

[67] E. 利特曼(Littman)，1914年。

[68] 在沃莱塔、甘杰罗、巴斯凯托、科伊沙(卡法)的戈贾姆西部。

事。然而，泽拉-雅各布的名字已成为“皇帝”的同义语，在埃塞俄比亚南方的口头传说中流传至今，有时以窜改的形式“泽拉各”出现。皇帝盖拉德乌斯的编年史只是简单地提及在南方的活动。最后值得注意的记载是对萨尔查·丹吉尔远征伊纳利亚的描述。（参看第569页）。

但是，南北方之间这些军事、宗教和文化联系的真正后果是什么呢？今天在埃塞俄比亚南方留存的口头传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遗憾的是这些口头传说迄今尚未完整地记录下来。家谱、对总体文化的分析以及考古发现也为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它们证明北方对南方的影响极为深远，并导致了一种新文化的出现。

对于15世纪之前在北方开始施加影响时南方的文化状况，由于缺少其他可能性，今天只能从整个埃塞俄比亚外部边缘民族群体的文化状况来判断，这些民族直到最近还未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其中有吉米拉人、阿里人或迪兹人中的不同群体。直到今天，这里仍没有国家和先进的政治机构的存在。只有由北方基督教帝国给予的刺激不断增长才能导致决定性的变化。在此之前，大量小的和更小的民族群体肯定是在南方共同居住的，其维系的纽带只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对共同血统的认同，最后也许还有对一位高级祭司或年长者的崇拜，他具体代表了该群体宗教关系密切的总和。由于此人是最早的祖先或该群体创始人的后代，而这些祖先在出生时都预示着好兆头，因此，他也被某种宗教气氛所包围。他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对农民极为重要的那些功能上，即驾驭雨水，使农作物长势良好并获得大丰收的力量。与其压倒一切的宗教意义相比，显贵们的政治功能似乎不那么重要，而且几乎不存在。不少人在使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对别人制裁时都会遇到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塞俄比亚南方，许多群体的语言习语中至今仍没有“命令”、“惩罚”和“判决”等词汇。）当然，权贵们是群体中不可非议的象征，但真正掌握政权的人是自治的氏族及其酋长，这些氏族最初是自给自足的单位。对战争与和平、是与非等均由氏族作出最后的决定。[69] **740**

来自北方的具有严格的国家和主权概念的征服者，扑向这个由纯朴农民构成的简单的社会。征服与同化经常是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南方民族认识到北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对后来成为重要国家的沃莱塔地区的征服也许是这样发生的：1600年，一位蒂格赖贵族麦凯尔在埃皇萨尔查·丹吉尔最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之后来到南方。与他同去的还有骑兵和基督教神父。根据传说，他与同行的人一起，就像摩西一样，将水分开，过了激流，来到现在仍是土地狭小的沃莱塔，在那里他与酋长的女儿结了婚。不久，酋长去世，其后代对于他的死说了许多不利于麦凯尔的话，说他篡夺了王位。沃莱塔人起来反对他，虽然他非常勇敢并使用了当时还不为沃莱塔人所知的骑兵，但要不是他用计谋的话，很快便会失败。这一计谋是入侵者在智力上优越、政治上敏锐的完美说明。双方的战斗采取小组单独行动，在战斗中，北方人不是向敌人投掷长矛，而是织物（当时沃莱塔人还不知道织物为何物）、一串串珠子或一片片肉。沃莱塔人对此惊叹道：“如果你们这么富有、强大以致于能够抛扔这样的财富，那么你们也能够统治我们！”因此，入侵者顺利

[69] H.施特劳布，1957年。

占有了沃莱塔。在北方人影响下，这个地方很快彻底改变了，从一个不重要的农民之地变成一个富有生气和进取心的国家。⑳

人们无疑认为，由君主领导的国家优于以民主方式组成的社群，君主统治国家的战士装备优良并拥有南方开始时还不知道的骑兵。因此，有传说讲成群的士兵自愿地向北方人侵者投降并承认其首领为自己的新统治者。甚至还有传说讲，人们明确恳求有一位君主来建立一个新王朝和新国家。㉑

741 就这样，大量的规模不等的新国家出现了，铭记其与北方联系的国家，其统治阶级忠实地保留和发展了北方的传统和机构，其王国和整体结构直到今天都反映了北方的伟大模式。

除了完全外来的和结构正式的国家机构和宫廷生活外，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国家神话也留下了深远影响。如声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王国是真正的王国；类似的声称还有，他们能够征服和同化所有相邻的民族。正如从其400年的口头传说中所了解的那样，埃塞俄比亚南方的历史就是这些新兴国家大规模扩张的历史，它们以牺牲靠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较小的独立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并常常为其邻邦新王朝的建立作出贡献。这一进程带来连锁反应。因此，根据口头传说，第一个贡加国家伊纳利亚(或称希纳洛)是1500年之前由来自提格雷(卡巴塞昂)的一位移民创建的。前面已提到的埃皇萨尔查·丹吉尔迫使伊纳利亚皈依基督教(参见第569-570页)，但是伊纳利亚的创建者们也许早就是基督徒了，而他们的追随者只是暂时接受统治者的信仰。只要可能，伊纳利亚尽可能与基督教帝国维持联系，在因奥罗莫人不断加大压力而陷于崩溃之前，伊纳利亚一直信仰基督教。在16和17世纪，伊纳利亚的布萨索王朝成员使疆域进一步扩大：博萨于18世纪并人奥罗莫人的吉马王国；卡法成为几代人的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南方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国家；还有埃塞俄比亚高原西部边缘原始森林中的塞科(穆卡)。其他的贡加人群体或者是其统治集团则向北推进，可能建立了比扎穆，如今在瓦洛加已不见踪迹。但他们的遗迹仍留在登比多洛北部的阿菲洛-布萨塞境内，而西纳沙人沿着阿巴伊河定居下来。㉒

口头传说中讲，甘杰罗王国最初是由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移民建立的，因此名叫也门之地(Yam gor)。后来，来自贡德尔的最初信仰基督教的王朝继续统治这一地区。保留下来的还有关于奥梅托人占领这一地区的类似记载：在达瓦洛，以其贡德尔血统而自豪的另一群移民，经过多年的斗争，成功地将众多小群体的当地居民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大约在1600年，沃莱塔被来自提格雷的一位萨姆塔姆本的后代所征服。其他国家，不论大小，如库卡、乌巴、扎拉、多尔泽、阿马洛、埃里，都有类似的传说。戈萨纳王朝

742 成员，可能也是来自埃塞俄比亚北方，建立了十个统治区(戈法、多科、波尔塔、巴斯凯托、奥伊达、戈扎、加伊拉、阿巴马洛、孔托和科伊沙)。后来到1800年前后，该王朝的一位成员戈贝成功地在卡法和达瓦洛之间的无人地带创建了孔塔王国。远在西南地区的迪兹人(马

⑳ E.哈伯兰德，1965年，第260页及以下诸页。
㉑ E.哈伯兰德，1959年，第197页。
㉒ W.兰格，1980年；V.L.格罗塔纳利，1940年和1941年。

吉人)以前的一些统治家族，其出身也可追溯到来自提格雷的移民。[73]

在埃塞俄比亚南方，社会结构最初的特点是人们自由平等，和平共处且相互承认。只有宗教首领，如氏族长老或求雨祭司和战斗英雄，才占据一定的但又不过分的特权地位。但是，在基督教北方等级概念影响下新创立的国家中，情况完全不同。平等被一种复杂的等级制所取代。令人敬畏的国王处于这一等级的顶峰，臣民不能接近他，而且常常见不到他，国王被特别的礼仪性法规所包围。像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王室成员享有特权，常常占据最重要的国家官职，如地区总督或首席法官。王室家族奢华的典礼和仪式，常常与其统治的小国寡民极不相称，使人不禁想起欧洲那些妄自尊大以俗艳标新立异的君主，他们试图再造一个小型凡尔赛宫。其中最南部的一个王国阿马洛(阿姆哈拉)，人口不过数千人，但却设有数以百计挂名的国家和宫廷职位。这些头衔如殿下(a-beto)、王室顾问(mikireččo)、王室侍从官(gabireččo)，无一例外都是从阿姆哈拉语借来的。随着王国的扩大，王室规模也随之扩大，并发展成为拥有几百人的独立而强大的机构。他们与以前的高级祭司或氏族酋长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是靠自己和家人的劳动以及别人自愿赠送的礼物维持生计。

阿巴亚湖北面的沃莱塔展示了一个王室宫廷所占面积的规模。这里，王宫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而且也是一块圣地，受到大量礼仪性法规的保护。如果国王出现在公共场所，他要与群众保持适当的距离或由其随从簇拥。王宫由三道防御墙和三道大门保护，每道墙和大门都受到三重守卫(这也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的传统模式)，由特定阶层的成员(猎人、制陶者、制革工人和铁匠)负责，他们看管通道，打水取柴，守卫监狱和国库，每天早晚奏响为国王保留的大型乐器(鼓和号)以宣告太阳的升落和国王的起身、就寝。尽管白天进出王宫不受限制，但到晚上，除了国王及其妻妾和宫廷侍从外，任何人都必须离开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显贵和官廷佣人各自回到紧靠王宫围墙的家中。只有国王才可 **744** 以在他神圣的王宫土地上宰杀牲畜或行使对全体埃塞俄比亚人来说都是第二重要的权利：任何类型的性活动。因此，为国王洗衣、做饭并服侍他的贴身侍从，在性方面必须是一无所知的，而且正如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宫廷侍从一样，严格禁止离开王宫与他人发生联系。这些人假冒体面人家的孩子，当他们长到一定年龄性纯洁成问题时就要被换掉。王宫圣地除了王宫的主人国王之外，任何男女之间的性交都将导致对冒犯者处于死刑，王宫也要搬迁到新的地方。

不仅仅是王宫，而且官员、等级和礼仪在北方的影响下都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标准：甚至与王室尊严相关的最令人敬畏的王族徽章也作了改动。这些王族徽章以前一直是象征性的物品，在材料和形式上都很简单朴素，如神圣的矛、双尖叉、草绳等。现在被环形物所取代，大多是以金银两种贵重金属制成的戒指或手镯，而这些都是埃塞俄比亚高原王族的标志。各地的人物都懂得阿姆哈拉语中金(wark)和银(birr)两个词。 **745**

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影响不是仅仅局限在引进新的官职和机构上，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大多数南方埃塞俄比亚人属于同一阶级，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自由人，

---

[73] E. 哈伯兰德，1980年。



图片 24.6 14 世纪(?)提格雷(?)的原教堂用铃，埃塞俄比亚西南部一位迪兹人酋长将此用做圣事的牛铃

但还是仿照埃塞俄比亚高原模式发展了一种等级制，这一制度在遍及整个埃塞俄比亚的价值情结中找到了明显的体现。个人价值不像财富和受人尊敬的名称一样是世袭的(虽然后者也非常重要)，但是每个人都必须争取获得新的价值，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得到公认的地位。其中心概念是：在战争和捕获大型猎物时取胜，履行武士的屠杀义务。而法官或首领的政治才能，或通过自我奋斗获取财富属次要考虑之列。只有获得个人价值才能在无数参加选举的官职中取得一个职位，而是否拥有官职是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的决定性标准。名誉和身份通常指的是同一个意思，没有荣誉就等于人生失败。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至少担任一次公职，即使是短期任职(公职每年选举一次)。担任公职的官员即使卸任，仍保持其



图片 24.7 埃塞俄比亚南部地区沃莱塔的墙

所属社会等级的名誉或头衔。[74] 由此再次表明北方的影响非常明显，因为等级的名称都是从阿姆哈拉语或蒂格赖语中借用的。例如法官(dana 或 dayna)来自阿姆哈拉语的 danya，主人(guda 或 goda)来自阿姆哈拉语的 geta 或蒂格赖语的 goyta，首领或酋长(rasa 或 erasa)来自阿姆哈拉语的 ras。离北方越远，其可辨认的价值情结形式越弱，今天仍居住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最南部的遗留群体中，这种形式已彻底消失。[75]

在等级制中，手艺人位于自由农民之下，属于特定阶层的成员，社会地位较低。虽然他们在经济上非常重要——织布制衣，烧制陶瓷，制造工具、武器、装饰品以及鞣革等——但还是被人瞧不起。他们不能拥有土地，还受到种种侮辱性规章制度的管制，同他们的身体接触被视为是对门第较高的人的一种玷污。[76]

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在许多国家，奴隶占一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大多数奴隶像农奴一样生活在主人的田里，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点田产。靠奴隶的劳动和生产才有可能产生富有的统治阶级，而富有的统治阶级，例如在沃莱塔，则是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征服的动力。

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行政人员，他们由人民选出并由国王加以批准，这些国家被分成社区、地区和省。各地有市场，由国家监督，并有良好的道路网络，交通纵横交错。利用高墙和严格把守的大门以防外来敌人的进攻。 **746**

自 14 世纪以来，作为友好表示从北方带到南方的物品很多。令人奇怪的是耕犁，它在北方是最重要的农具，但在南方由于某种缘因从未被接受。但是，北方为南方的农业提

[74] E. 哈伯兰德，1965 年，第 187 页；H. 施特劳布，1957 年。
[75] AD.E. 詹森，1959 年。
[76] E. 哈伯兰德，1964 年 b。

供了相当数量的农作物，大约在14或15世纪，豌豆(Pisum sativum)、蚕豆(Vicia faba)、鹰嘴豆(Cicer arietinum)、洋葱(Allium cepa)和大蒜(Allium sativum)才传到南方。后来又有了小扁豆(Ervum lens)和各种油菜籽，包括亚麻籽(Linum humile)、芝麻(Sesamum indic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和"诺戈"(Guizotia abyssinica)，全部来自近东。但是，一般说来，这些作物在人们的饮食中，如同东方的水果一样，其作用并不十分重要。东方的水果是从阿拉伯经哈拉尔引进到这个国家的，主要限于几个伊斯兰中心，包括柠檬(Citrus limonium)、香蕉(Musa paradisiaca)和桃子(Prunus persica vulgaris)。最具重要意义的是后来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从美洲带到非洲的新大陆农作物，可能是由葡萄牙人带来的。在这些农作物中，红辣椒(Capsicum conicum)、玉米(Zea mays)和烟草(Nicotiana tabacum)在今天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农作物，埃塞俄比亚南方的生活难以想象。南瓜(Cucurbita maxima)、红薯(Ipomoea batatas)、土豆(Solanum tuberosum)和西红柿(Solanum lycopersicum)传播的范围较窄。[77]

甚至今天，北方手艺人的后代所使用的技艺仍可证明他们对这一地区所起的促进作用：脚踏织布机纺织技术(与棉花培植有关)、采用先进工具的金匠术和银匠术(铁匠过去是、现在仍是使用石头打铁)、用针线缝制革制品和制作门心板、木盘以及大木碗的精美木工。(木器的车工工艺，或者说手工艺中使用的任何类型的旋转操作技术，包括陶工用的陶轮，无论是埃塞俄比亚北方还是南方，都是到近年才知道。)最后还应提及把马引入南方一事，虽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马匹只是用于战斗和作为一种威望的象征。

我们现在转向基督教影响这个话题：基督教是否强大得足以对南方产生永久性的影响而且还能提供持久的推动力？或者说基督教在皇帝及其军队、主教和传教士撤走后就马上消失了呢？即使在今天都非常明显，这种文化上的影响非常大，其遗留的痕迹在肯尼亚和苏丹的边境上，甚至更远的地方仍清晰可见。除了明显的外部显示外，基督教对各个民族的文化的伦理体系、对习俗、惯例以及整个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类型的转变要想得到人们的承认，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747

该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遗址(经久的人造物并不多)是许多宗教园林。主要坐落在小山丘或大山顶上，以此来标明过去是基督教教堂所在地，正如这些宗教园林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基督(Kitosa)、玛丽亚(Mairamo)或乔治(Gergisa)。笔者进行的一次考察证明埃塞俄比亚西南方基督教教堂曾一度遍布各处。建造教堂的材料易腐烂，现在完全不见踪迹。但是，教堂的遗址仍被视为圣地，过去基督教神父的后人，现在已是非基督教氏族的成员，他们仍然为天国之神、创造之神以及作为弥撒仪式变体的其他仪式而献祭。在基督教传教团到达埃塞俄比亚南方之后的动乱世纪里，新的一代又一代神父却不能到埃塞俄比亚北方接受当时埃塞俄比亚唯一的主教阿布纳授以圣职。奥罗莫人的扩张在北方的帝国与其在西南部的殖民领土之间设置了一道巨大的障碍，所以与南方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作为宗教实体而不仅仅是作为大量的礼仪形式，基督教对埃塞俄比亚南方宗教伦理本

[77] W.库尔斯(Kuls)，1958年，第32页及以下诸页；H.施特劳布，1963年，第26页及以下诸页和第288页及以下诸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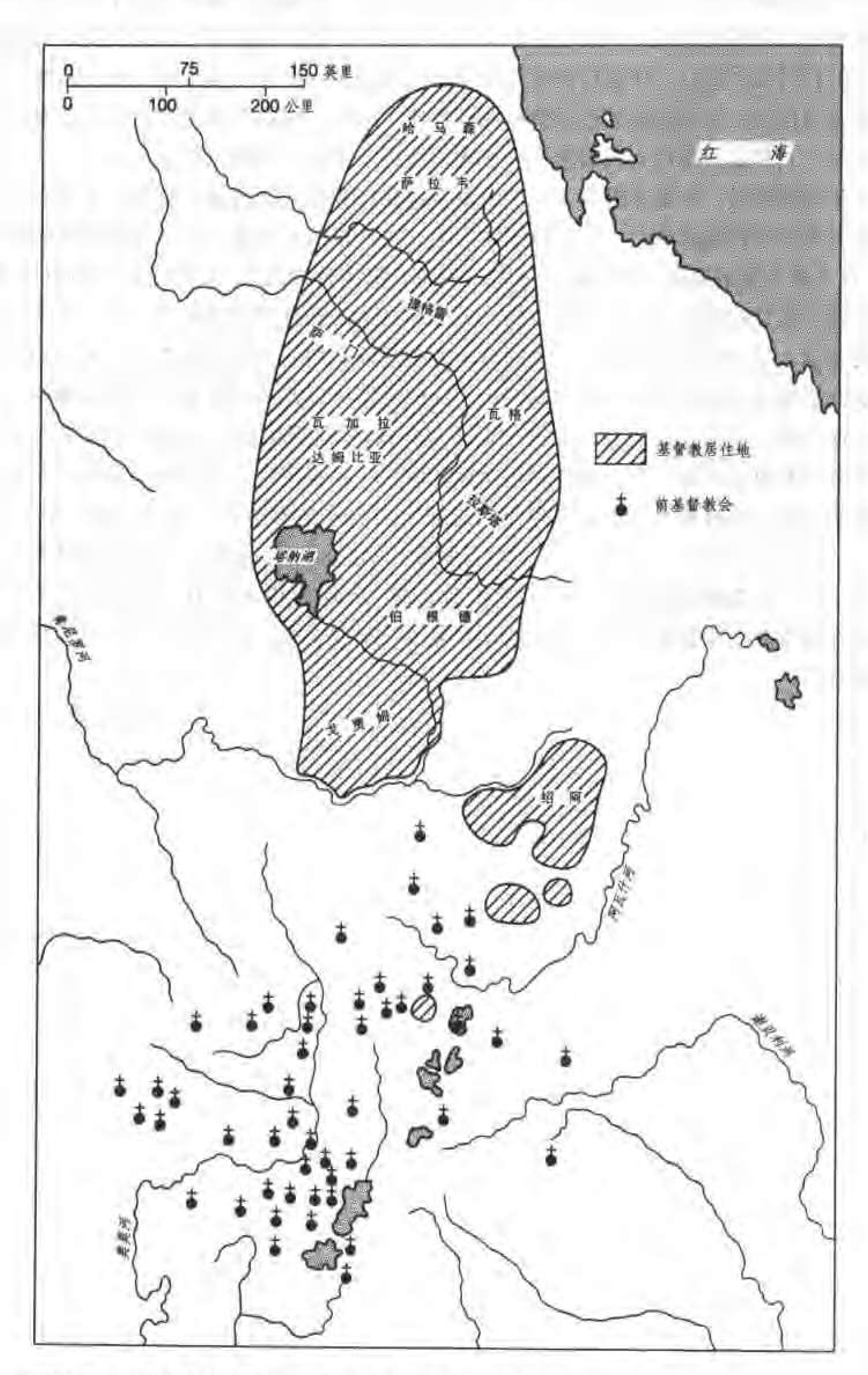


插图 24.4 基督教在东北非，约 1700 年(仿照 E. 哈伯兰德图)

质上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尚未有彻底的调查研究，也从未对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自我认识作过令人满意的分析。有关官方教义的资料不少，但有关农民和农民神父对待其信仰的看法的材料几乎没有。作这样的调查研究还需考虑到玛丽亚在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玛丽亚的作用使耶稣基督成了陪衬。玛丽亚作为乐于助人并富有宽容心的女神，尤其是其善待女人的作用，在埃塞俄比亚南北方均能见得到。

至于外部形式，数量多得令人吃惊的基督教律法和仪式的遗迹一直保留至最近，即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开始派遣另一个传教团时为止。在特定的日子里实行斋戒的习惯保存了下来(尽管不像在埃塞俄比亚北方那样每周三和周五都实行斋戒)，人们从早晨到中午禁食，从中午到子夜禁吃动物食品，包括牛奶、黄油和鸡蛋。安息日仍然保留，这一天停止田间所有的劳动，至少过去的基督教神父的继承人是这样做的。人们仍然遵守七天一周的基督教历法而不是埃塞俄比亚南方最初的四天一周的习惯，以此来调节举办集市的频率。基督教的星期日现已成为公共假日，在这一天，基督教神父的继任者(kesiga)召集圣会并以残缺不全的宗教仪式祈求上帝、基督和玛丽亚的保佑，手画十字，烧谷物而非烧香，并使用其他遗留下来的基督教器物。人们也没有忘记重大的基督教节日，尤其是圣十字节(9月27日)，它已成为新年，这一天，人们举行驱除妖魔的活动；还有一个重大的热闹非凡的749 百姓节，每个人都能得到节日礼物：肉和新衣服。圣诞节和主显节，尽管在北方十分重要，但在南方只有少数群体举行庆祝活动。复活节很受重视，已成为举行大规模仪式性狩猎的节日。

(孙建中 译)

25 东非：海岸地区

A.I. 萨利姆

16、17 和 18 世纪以葡萄牙人[1] 来到东非水域为开端，以阿曼的阿拉伯人试图在沿海 **750** 地带确立某种霸权而告终。在这两个突出的里程碑之间，海岸城市和居民经历了重要的有时是革命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有些城市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有些则从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许多城市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这 300 年中长盛不衰。其命运的沉浮可归结为许多因素，葡萄牙人的介入尽管很重要，但只是其中之一。

16 世纪初的海岸地区

1500 年，海岸地区依然处于“黄金时代”，从 15 和 16 世纪残存的遗迹和物质文化便可看出，繁荣反映在石建筑方面以及兴旺的“石城”中人口的增多，“他们拥有精巧的卫生设施和狭小的庭院……喜爱串珠，普遍使用瓷器”。[2]

这是当时的全景，进一步的观察则揭示了经济和物质富裕的不同程度。15 世纪蒸蒸日上的岛国基尔瓦，在葡萄牙人插手的前夕，不说是日渐衰落，也是处于稳定时期。[3] 基尔瓦臻于全盛，主要在于 13 世纪末或 14 世纪初它夺取了摩加迪沙对索法拉黄金贸易的控制权。它的贸易，直到葡萄牙人到来之时，一直是面向海外而非陆地。没有文献或考古发现能够证明存在联系基尔瓦-基西瓦尼和盛产黄金的赞比西亚南部地区的陆上贸易路线。[4] 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这个岛国同大陆仅有的贸易似乎是食品交易。然而到15世纪末， **751** 基尔瓦已失去了对索法拉的控制。政治上，它对海岸北部这个在商业上对它十分重要的地区的影响也在减小。从内部来说，频繁地更换统治者——从 1442 到 1498 年的 56 年间更换了 13 位君主——是它的力量和元气开始败落的征兆，而它与桑给巴尔的敌对关系则反映了斯瓦希里城镇一个周期性的弱点——内部的党派纷争招致外部力量的干涉。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现象在其他海岸城镇中屡见不鲜，便利了葡萄牙人以及后来阿曼的阿拉伯人的干涉和统治。

到 1454 年，桑给巴尔试图将自己提名的人选强加给基尔瓦。不过这时桑给巴尔在政

---

① 关于葡萄牙人的原始资料很多，参阅 C.R 博克瑟(Boxer)和 C. 德阿塞韦多(de Azevedo)，1960 年；R. 奥利弗(Oliver)和 G. 马修(Mathew)1963 年；E.B. 马丁(Martin)，1973 年和 E.A. 艾尔珀斯(Alpers)，1973 年 a。

② G. 马修，1963 年，第 121-122 页。

③ 同上，第 124 页。

④ 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41 页。

治上或经济上都不是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海岸城镇了。它本身至少被分成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统治者。蒙巴萨作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城市国家，仍然与基尔瓦和马林迪平起平坐。到 1500 年，它获得了极大的增长。伊本·拔图塔在 1331 年曾描述说，尽管它有香蕉和柠檬树，它没有大陆地盘，没有本地种植的谷物。但到 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来访时，它已成为“与许多工场有贸易往来的大城市”。[⑤] 它的商人在远至安哥谢的南部海岸地区的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时这个岛城还与内陆建立了蜜、蜡和象牙贸易联系，这或许解释了它何以能令人瞩目地突然崛起的原因，直到葡萄牙人到来之时，它已成为“海岸地区最强大的城市国家”。[⑥]

马林迪作为蒙巴萨的主要竞争对手，到 1500 年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它的贸易主要是基于象牙出口，其次是贩卖诸如从索法拉而来的黄金，以及蜂蜡、龙涎香和树脂等物品。和大部分其他定居点不一样，马林迪甚至在 16 世纪就拥有由奴隶耕作的谷子和稻谷种植园。[⑦] 早期的葡萄牙来访者对其水果、蔬菜和肉食的品种和质量以及其吸引人的城市布局留下了深刻印象。葡萄牙船只大概是在与该城建立了诚挚的关系之后，才得以确保淡水和食品的定期供应。

再往北，在拉穆群岛上可发现一些小的素丹国，其中一个岛上就有三个，即帕特、锡尤和法扎。它们之间争执不休，无法结成反对葡萄牙人侵者的统一阵线。到 1500 年为止，拉穆最繁荣的时代仍未到来，在 9 世纪末邻近的曼达岛达到全盛期之后很久，拉穆岛才臻于全盛。14世纪中期时，拉穆城就坐落在它现在的位置上，但直到1650年之后，它才趋于欣欣向荣。像基尔瓦一样，它大概是由中东地区穆斯林帝国的移民建立起来的。[⑧]

753

在这些较大的、商业上极为突出的定居点之间，错落散布着众多的小村落，并经常处于前者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基尔瓦多少控制着马菲亚诸岛，而蒙巴萨则对姆坦加塔和文巴充当着类似的角色。大城市比起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小城镇看来更热衷于国际海上贸易。在 9 至 12 世纪，位于贝纳迪尔平原海岸和赞比西河口之间的东非海岸定居点数量估计有 173 个。[⑨] 这个估计数并不肯定，也不确切，但它描绘出了总的趋势和发展方向，证实这些定居点(100 多个)的最大衍生数量在 1200 至 1500 之间，正是海岸的黄金时代。

根据区域和人口来估计这些定居点的规模比较困难，尽管如此，某些资料可以用来估计几个城镇的数字。例如，马林迪据说面积比今天的小，这个有围墙的城镇沿着海岸线南北长不过 600 米，东西不过 200 米。[⑩] 该城建于 1498 年，大约有 1000 座石头房屋，据此估计人口接近 3500。[⑪] 这显然并不包括种植园劳工或大概住在泥草棚中的穷人。因而这些数字如果不是推测的话，只能是粗略的估计。比起其他所有命途多舛的定居点，蒙巴萨和

⑤ 引自 E.B. 马丁，1973 年，第 31 页。

⑥ 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45 页。

⑦ E.B. 马丁，1973 年，第 30 页。葡萄牙人的资料没有提到在他们到来之前索马里海岸南部有任何可观的奴隶贸易。马丁关于马林迪存在奴隶的资料源于维斯普奇(Vespucci)，后者认为他们来自几内亚。

⑧ J. 德·V. 艾伦(Allen)，1981 年，第 1 页；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40 页。

⑨ 同上，第 320-321 页。

⑩ E.B. 马丁，1973 年，第 19-20 页。

⑪ 同上，第 28 页。据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1502 年估计，基尔瓦人口为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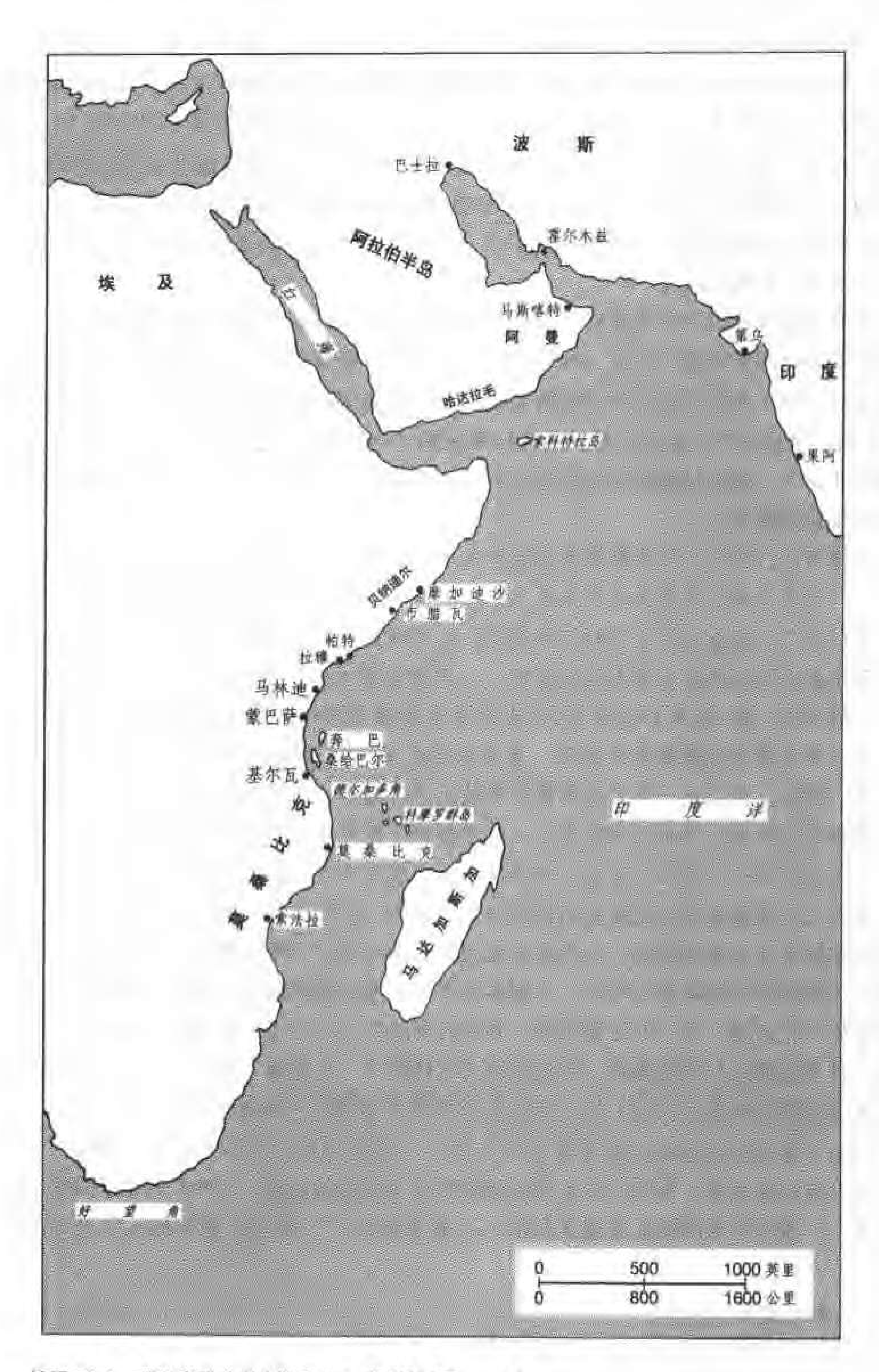


插图 25.1 西印度洋盆地（仿照 A.I. 萨利姆图）

拉穆的"石城"持续存在了较长时间。⑫

海岸地区的政治分裂，由于1500年以来确立的宗教和文化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在民族方面，人口十分混杂——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所谓的设拉子人血统不同程度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集合体，即后来所知的斯瓦希里人(海岸民族)。斯瓦希里是通称，海岸民族本身直到近年才采用。在16世纪，他们仅仅形成城镇群落，其杰出人物或统治家族为了名誉，经常含糊其词地称自己的祖辈为阿拉伯人或设拉子人，尽管他们在种族上是混杂的。其他群体选择了反映其海岸本身地区缘起的名称，如瓦昌加姆韦、瓦法扎、瓦帕特等等。⑬

在海岸地区政治上分崩离析，来自不同群体的人们只忠于各自定居点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有助于形成一种相当同一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一般非洲人的共性和不久即演变成为整个海岸地区共同语的斯瓦希里语。其他重要影响是伊斯兰教，在较低的程度上，是阿拉伯的因素，尽管后者只是在19世纪后才占支配地位。阿拉伯人和设拉子人融入主要是非洲人、或许是班图人的社会之中，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必定促成沿海地区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

754

不可否认，伊斯兰文化对海岸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用J. 德·V. 艾伦的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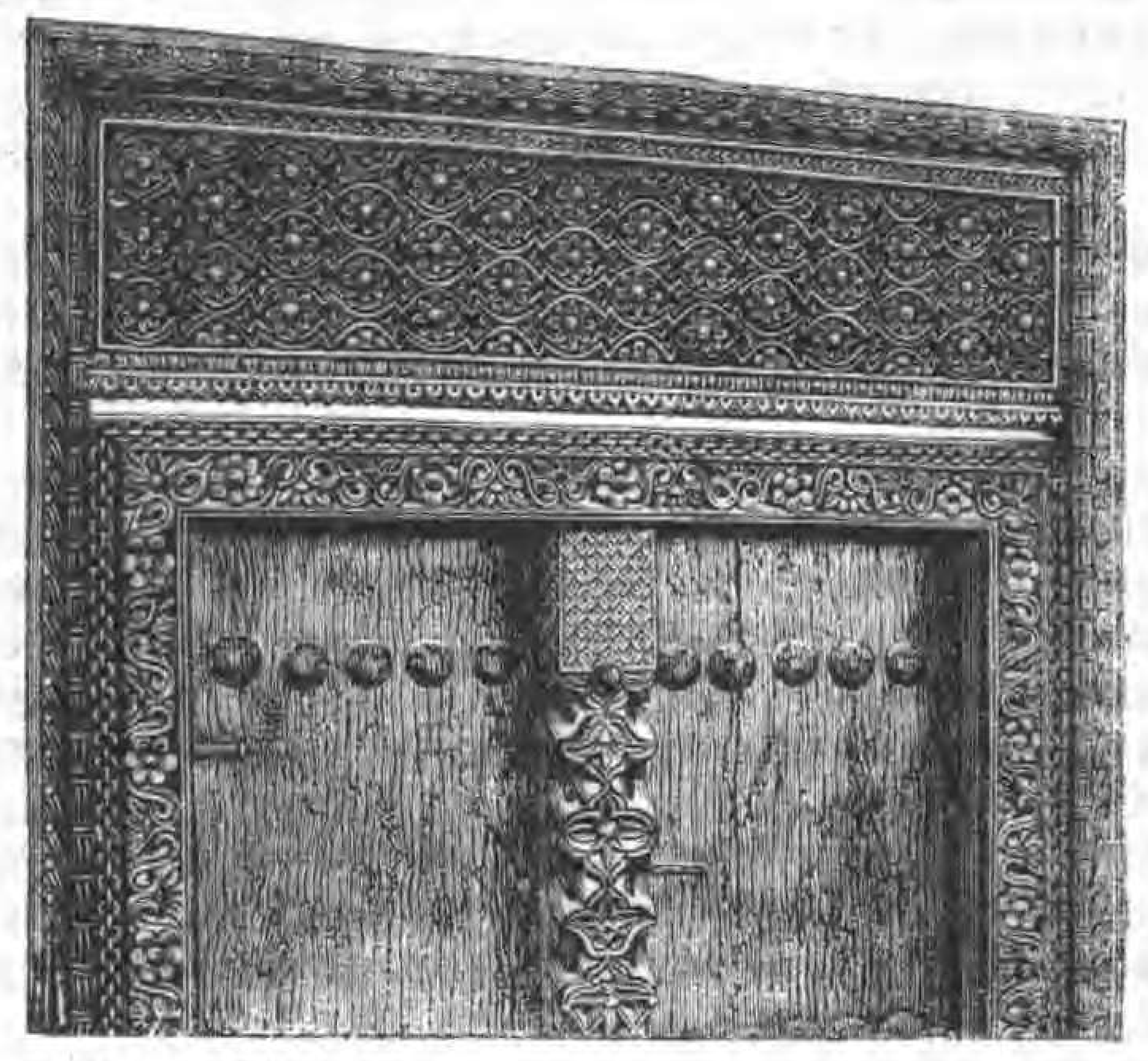
> 伊斯兰教的到来给斯瓦希里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必定给城市化这一概念引进了一套全新的文化和宗教尺度：此后城里人，或者至少其中的某些人，将因宗教及其他因素与他人区别开来……伊斯兰教不仅在宗教知识方面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在10至15世纪或16世纪早期的穆斯林世界，拥有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先进的科学和哲学知识、更高级的技术和建筑技巧，以及更高的文明水准。现在，可以说，斯瓦希里海岸接通了这种无尽的知识创造力的源泉——虽然管线有些纤细，偶尔还有缺漏——而且接待了像伊本·拔图塔那样的学者、工匠、艺术家以及对促进斯瓦希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许多其他人的周期性来访。⑭

事实上，斯瓦希里文化和文明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地区性样板。说它是地区性，因为它受到本地东非文化的影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纳入其中，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已发展成为海岸民族共同语的斯瓦希里语，尽管多少年来采用大量的阿拉伯词汇，却是非洲贡献于斯瓦希里文化的独一无二的重要表现。其他方面包括关于出生、结婚、丧葬和授职庆典的礼仪，神灵信仰以及传统舞蹈。斯瓦希里文化体现了"从城市'熔炉'的意义上说，来自非洲大陆和濒临印度洋土地上的许多民族价值观和习俗的一种融合"。⑮

1500年某些海岸城镇的物质繁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统治者住在宫殿里，上层人物住在石造的居室中，其中许多是多层的和中央有庭院的建筑。"富人的房子饰有精雕细刻的木门，成为古老的斯瓦希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⑯ 城里人较高的生活水准反映在

⑫ J. 德·V. 艾伦，1974年。
⑬ 例如，可参见F.J. 伯格(Berg)，1971年和1968年，第35-36页。
⑭ J. 德·V. 艾伦，1976年c，第17-18页。
⑮ 同上。
⑯ C.R. 博克瑟和C. 德阿塞韦多，1960年，第16页。

奢侈品的输入和使用方面，诸如织花台布、丝绸、缎子、铜器、中国瓷器、中东玻璃器皿和玻璃珠子。可以看到来自基尔瓦、马林迪和蒙巴萨的人们在东至马六甲的远方销售东非货物，诸如黄金、象牙、树脂和龙涎香，带回棉花、丝绸和锦缎，这些货物通过联系海岸各地的商道渗入许多沿海城市。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奢侈的生活。住在多层石头房中的为数极少，但富人的生活与大概住在各个定居点内外泥草棚中的绝大多数穷人和受奴役者的生活形成对照。 755



图片 25.1 桑给巴尔雕刻木门

这些定居点的人口主要是非洲人，当初阿拉伯人是极少数，在18和19世纪数量才大量增加。混血后裔的数量也稳步增长。统治者可能已采用正统的阿拉伯王朝名称，诸如纳布哈尼、马赫达里、巴-阿拉维，但他们统统是混血后裔，而且往往是黑人。[17] 肤色并无社会或政治意义；是"尤库"（ukoo，世系，血统）将某人与他人区别开来并确定其社会地位和所属等级。 756

[17] 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Freeman-Grenville），1963年，第143页。

葡萄牙人的入侵

葡萄牙人像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邻国一样，在开始探险航行时，与穆斯林交战的喧嚣声仍在耳边回响。西班牙人直到1492年才将最后一批穆斯林逐出自己的国土，此后五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东非海岸。葡萄牙人探险背后的动机是从商业上、政治上、军事上和宗教上包抄穆斯林——打破马木路克(后来是奥斯曼)对通往亚细亚和中国商路的垄断，联络其他基督徒以拔除在任何地方发现的穆斯林统治。而且，他们确实认为非基督徒无权占有财产，并试图接管所有的穆斯林领土。教皇马丁(1417—1431年)和教皇尼古拉(1452年)曾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发布圣谕，宣称他们的探险也将有助于基督教世界。

葡萄牙人计划包抄穆斯林的幕后人物是亨利亲王，他也是基督教团的大长老，在此旗号下他曾于15世纪早期在摩洛哥与穆斯林作战。此外在马格里布，葡萄牙人获悉阿拉伯穆斯林曾通过海路到达东非，因此他们或许可以绕过非洲，挫败那里的穆斯林，接管其商业。[18]

为使这个宏大计划付诸实施，一支支探险队踏上了征程。1498年1月，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到达了斯瓦希里海岸最南缘的克利马内河口，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处非洲-阿拉伯人定居点，与受人欢迎的东方之地，即莫桑比克岛和城相连，葡萄牙人获悉此地处于基尔瓦影响之下。当地衣着华丽的谢赫对来客表示欢迎，后发现他们不是穆斯林，便相互猜疑，导致海岸穆斯林与葡萄牙人发生了第一轮冲突。由于风向不顺，达·伽马旅途中没有到达基尔瓦。他在蒙巴萨受到敌视，因为与莫桑比克人发生冲突的消息已先于他到达那里。757 与此相对照，马林迪的谢赫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要么是出于机敏而富有远见的计划，即获得一个对付蒙巴萨的强大盟友，要么是出于同样机敏的现实政治意识或自我保护。不管怎么说，双方信守他们确立的同盟关系，直到16世纪末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马林迪谢赫夺取了蒙巴萨为止。在达·伽马从印度返航途中，马林迪谢赫将他的一个臣民送上葡萄牙人的大船，作为派往葡萄牙的使节。[19]

达·伽马的第一次航行，就到达印度的目标来说是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关穆斯林在斯瓦希里海岸从事贸易活动的宝贵情报，像莫桑比克、蒙巴萨和马林迪这样的城市也以其物质文化给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这种较大的探险航行又进行了几次，其中1501年的一次，让葡萄牙人窥见了基尔瓦的范围和贸易，但它的谢赫易卜拉欣不愿与他们合作在索法拉建立一个贸易代办处。葡萄牙人认识到，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他改变主意。

第二年，“为散布恐慌和沮丧气氛，在连续不断的枪炮齐鸣声中”，[20] 达·伽马的舰队驶进基尔瓦港，在毁灭城池的威胁面前，易卜拉欣同意年年纳贡并成为葡萄牙国王的臣

⑱ J. 斯特兰兹(Strandes)，1968年编，第2页。
⑲ 同上，第28页。
⑳ J. 斯特兰兹，1968年，第40页。

属。[21] 1503年，鲁伊·洛伦索·拉瓦斯科在桑给巴尔一带进行抢劫和海盗活动，从准备在那里登陆的船上获取了大量的战利品，主要是谷物、象牙和白银，并以武力强迫当地人纳贡。1505年，后来成为印度总督的多姆·弗朗西斯科·德爱尔梅达以贡品数量不够和当地统治者没有升葡萄牙国旗作为臣服标志为借口，向基尔瓦发动进攻。利用基尔瓦内部的派系斗争，德爱尔梅达任命了一名亲葡的长者穆罕默德·安科尼为统治者，并用基尔瓦人的钱财开始建造葡萄牙人在斯瓦希里海岸的第一个要塞。

蒙巴萨在1498年就对达·伽马显示出敌意，因而当1505年8月13日德爱尔梅达的舰队驶进蒙巴萨港口时遭到火炮的轰击并不令人吃惊。这门火炮是早些时候从一艘葡萄牙人的沉船中捞上来的，德爱尔梅达的一艘舰船侥幸击毁了它，但蒙巴萨国王及其臣民继续进行殊死抵抗。他们使用岩石和弓箭来对付葡萄牙人的滑膛枪和弩机，在成百上千大陆非洲盟友的支持下，在通向王宫的所有要道上与葡萄牙人展开巷战。最后，王宫受到两面夹攻，国王被迫投降。在德爱尔梅达的舰队离开之前，葡萄牙人将该城抢掠一空，然后付之一炬，没有留下占领军。如斯特兰兹所言，[22] 似乎葡萄牙人的目标是破坏蒙巴萨的强盛和繁荣，以便提高将成为其据点的基尔瓦的地位。 758

次年，当时正与马木路克埃及保持良好关系的霍贾(或奥贾，又被认为是翁格万纳)，为避免类似命运，决定臣属葡萄牙人。但布拉瓦进行了抵抗，后被征服并遭到1000多人的武装劫掠。双方的伤亡数字估计高于当时葡萄牙人在斯瓦希里海岸进行的任何一次战斗。

葡萄牙人在东非海岸的行动显然是惩罚性和毁灭性的。1528年蒙巴萨再次受到攻击并被占领了大约四个月。葡萄牙人对该岛没有长期的政策或计划(马林迪国王并不渴望接管它)，因此在撤出之前再次将该城夷为平地。在那次短暂占领中，葡萄牙人毁灭了蒙巴萨，因战斗和疾病许多士兵丧命。[23]

16年前的1512年，葡萄牙人卷入围绕安科尼死后继承权的内部争斗，被迫撤离在基尔瓦的要塞。那时葡萄牙人终于认识到这座城市根本生产不出他们贪欲的贡品，能够榨取的钱财仅够维持驻军的费用。他们曾期望垄断索法拉的黄金贸易，该城和沿海其他地区正是因此而兴盛起来的，但葡萄牙人却是以其欠考虑的行为和商业控制使之遭受破坏。到1506年，在索法拉的驻军受到疾病和死亡的打击，无法再起作用，1512年，基尔瓦驻军撤至印度。

随着葡萄牙人的离去，基尔瓦的贸易得到很大改善，尽管其统治者名义上仍是葡萄牙王室的臣仆。这座城市的商业模式经历了有趣的变化。基尔瓦的商人们避开葡萄牙人控制的索法拉，与来自蒙巴萨和马林迪的同伴一起，寻求同莫桑比克南部的安戈谢海岸进行更多的接触，那里已与赞比西河内地建立了长期的商业联系。他们的目的是削弱葡萄牙人对索法拉的控制；正是为了抢先，葡萄牙人冒险进入内陆，在塞纳和太特建立立足点。

---

[21] 同上，第43页。
[22] 同上，第64页。
[23] J. 斯特兰兹，1968年，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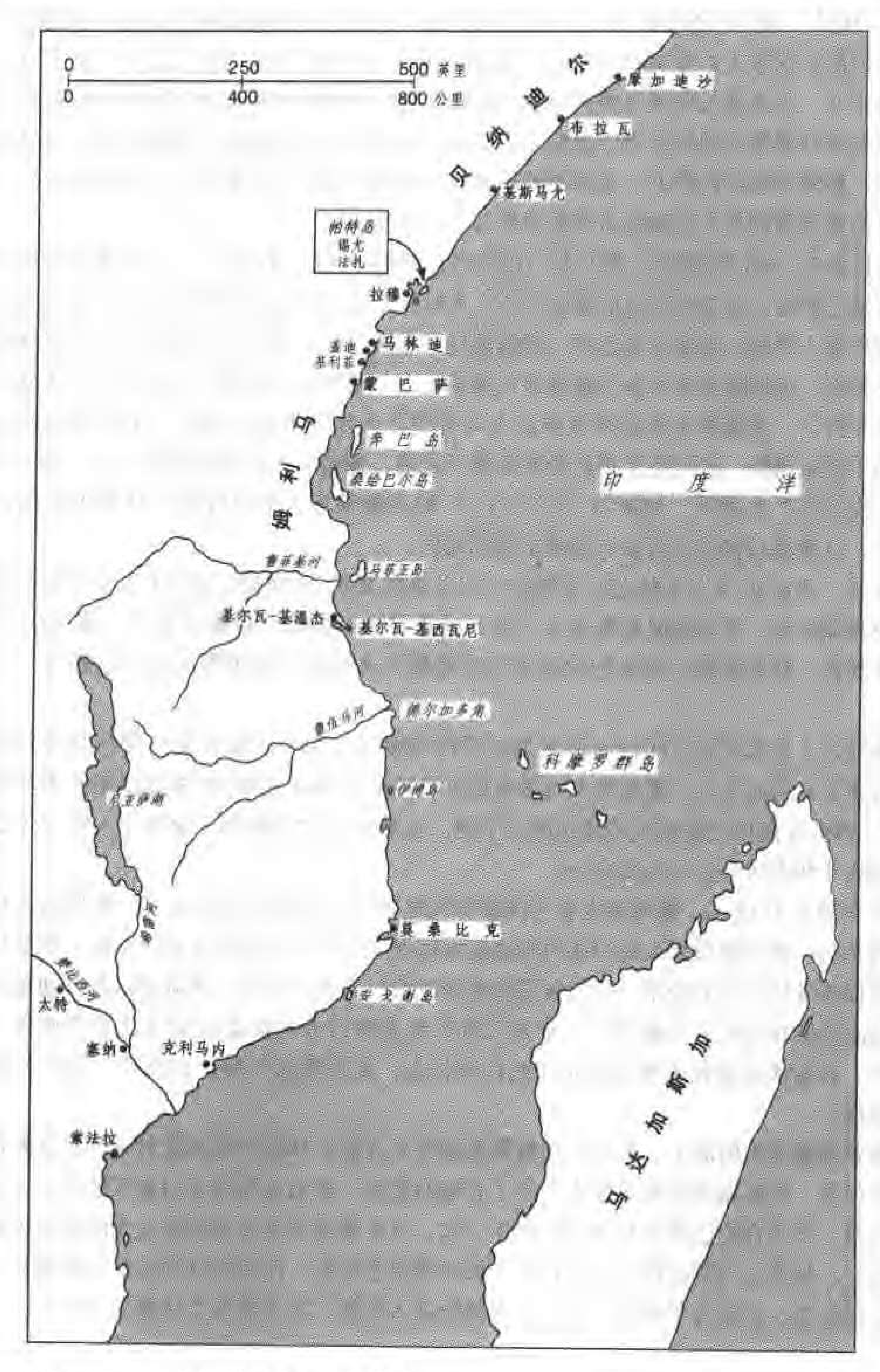


插图 25.2　东非海岸(仿照 A.I. 萨利姆图)

基尔瓦曾严重依赖于对津巴布韦生产的黄金和象牙的转运贸易，因为它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出口。象牙及黄金的大部分来自索法拉，㉔ 因而索法拉一旦失守，基尔瓦不得不与内地拓展新的贸易联系。象牙成为最重要的出口物品："1530年后，起自津巴布韦的黄金商路事实上被葡萄牙人所切断，正是基尔瓦的穆斯林商人寻求与自己城市的内地开展原不重要的象牙贸易。"㉕ 基尔瓦贸易的改向恰巧与马拉维人和尧人的扩张同时。正是两个马拉维人首领卡龙加和其名义上的附庸隆杜之间的争斗，最终将津巴人解放出来，而津巴人后来在16世纪90年代给予基尔瓦以致命的打击。 **760**

总之，当时葡萄牙人未能制定出一种明晰的政策以占领或管理斯瓦希里海岸。他们只有一种贪欲去控制(如果不是垄断)所有的商道。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部分取得了成功。因为葡萄牙人的占领时间短促(在离开基尔瓦之后仅25年他们就离开了莫桑比克和马林迪)，一些斯瓦希里城镇设法继续维持他们的商业活动。例如，从坎贝来的船只，运来棉花和珠子等物品，而来自邻近的摩加迪沙、布拉瓦、帕特、拉穆和蒙巴萨的船只则与南部海岸，包括索法拉地区进行易货贸易。㉖ 取缔这种贸易的举措既未坚持也未成功地实行。

许多人说，从一开始，葡萄牙人的兴趣实际上超越了东非海岸而在东方。这种论点有时用来解释葡萄牙人未能有效地在东岸立足的原因，认为东岸只是作为总督府设在果阿的印度国的一小部分。无论如何，在缺乏有效占领期间，葡方曾任命一位"马林迪海的少校舰长"，率领几艘小船巡视东非海岸。他的职责还包括给船只发放通行证(carataze)，以及在马林迪经营葡萄牙的贸易代理站。这种代理站的建立足以证明葡萄牙的兴趣在于非洲海岸和内陆的贸易。它从印度输入棉花、珠子等货物，换取当地的树脂、龙涎香、象牙和椰壳纤维等特产。马林迪的舰长在基尔瓦的贸易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在仍处于基尔瓦政治影响下的马菲亚岛安置了一位代理商，以获得椰壳纤维和树脂。

直到16世纪后期土耳其远征军到来时，有关斯瓦希里海岸的原始资料提供的信息极少。一般说来，由于情势所迫似乎达成了一项政治经济妥协：只要不与葡萄牙人发生利益冲突，斯瓦希里城镇保持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会缩减，但并不全然受到压制。㉗ 有些城镇遭受的损失较大。蒙巴萨尽管受到毁灭性的惩罚，但恢复很快，1569年被蒙克拉洛神父描述为"庞大而人口众多"。㉘ 他发现基尔瓦几乎被遗弃，但仍在与科摩罗群岛和内地进行象牙贸易。至此，一个比葡萄牙人的影响还难以估量的因素已进入了这幅图画：大陆上的人口迁移及其对斯瓦希里城镇的影响。据说桑给巴尔与大陆来的入侵者发生了冲突；马林迪由于来自塞格朱人的压力而部分变成了废墟；㉙ 据J. 柯克曼所言，㉚ 在土耳其军官米尔·阿里·贝伊到来并威胁到葡萄牙人的生存之前，盖迪正处于衰落之中。 **761**

㉔ 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46页。

㉕ 同上。

㉖ J. 斯特兰兹，1968年，第100页。

㉗ C.R. 博克瑟和C. 德阿塞韦多，1960年，第18-19页。

㉘ R. 奥利弗和G. 马修，1963年，第136页。有人提出它与内陆的贸易有助于解释蒙巴萨的复苏和弹性：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45页。

㉙ 同上。但塞格朱人在该地区的存在证明是件幸事，因为他们帮助马林迪从津巴人的攻打中生存下来。

㉚ 弗里曼-格伦维尔引自R. 奥利弗和马修，1963年，第137页。

葡萄牙人从进入印度洋那一刻起，就引起了地方穆斯林统治者和穆斯林强国马木路克埃及统治者的敌意。随着1517年马木路克被奥斯曼人打败，反对葡萄牙人侵者斗争的领导权就转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素丹手中。在印度西海岸和波斯湾，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发生了几次海战。接着，在1570至1571年，在葡萄牙人的据点霍尔木兹爆发了一场起义，居民们曾请求奥斯曼的支援。

起义被镇压下去，但随着土耳其舰队周期性地骚扰葡萄牙人，这种事件一再发生。甚至在米尔·阿里·贝伊到来之前，土耳其人就对马林迪邻里发动了第一轮袭击。尽管影响很小，却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关注，王室曾建议果阿的总督制止斯瓦希里海岸葡萄牙官员的不轨行为，因为斯瓦希里谢赫们已发出抱怨。国王担心这些地方的首领会受到鼓励或强迫寻求土耳其人的帮助，以将他们自己从葡萄牙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里斯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当1585年米尔·阿里·贝伊到来时，他唯一的战舰和解放的信息受到介于摩加迪沙和基尔瓦之间所有斯瓦希里城镇的热烈欢迎，除了马林迪之外。在集拢了战利品并俘虏了拉穆的大约50名葡萄牙士兵之后，他许诺率领更强大的军队再来。葡萄牙人报以惩罚性的远征，特别是针对法扎和蒙巴萨。前者进行了顽强抵抗，居民们使葡萄牙人伤亡惨重，但终于被打败，城市被毁，谢赫的头颅被带到果阿示众。蒙巴萨的居民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后撤，直到葡萄牙人离去，但城镇却遭到洗劫。

米尔·阿里·贝伊没有食言，1588年他回来时配备了五艘舰船，并再一次赢得大部分城镇的支持，而马林迪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当这位土耳其军官开始实施将蒙巴萨变为土耳其基地的计划时，葡萄牙人的回应是在1589年1月派遣一支更大的舰队驶往东非。

762 在葡萄牙人报复威胁的同时，嗜血成性的津巴人也不期而至，从大陆威胁着蒙巴萨，如同以前曾威胁基尔瓦那样。[31] 这样，城里人及其土耳其救星们发现他们正处于两个互不相关的敌人夹击之中。葡萄牙人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使津巴人得以登上该岛，大肆进行破坏。约有200名居民和土耳其人到葡萄牙船上寻求避难。津巴人的威胁进而北向，只有塞格朱人才挡住了他们毁灭性的足迹，把马林迪从类似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同时，葡萄牙远征军驶向北方，迁怒于拉穆，因为它支持土耳其人。谢赫和其他几个贵族被带到帕特，当着帕特、法扎和锡尤素丹的面砍了头，杀鸡给猴看。邻近的曼达岛遭到攻打，首都塔克瓦被洗劫一空。

津巴人的威胁，如同后来的奥罗莫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某些斯瓦希里城镇人口减少和衰落，这很难估计。基尔瓦起初黯然失色，但慢慢又恢复过来，这要归功于其人民的意志、驻蒙巴萨葡萄牙长官的商业代办处的存在以及到16世纪末尧人贸易的出现。[32] 蒙巴萨遭到彻底破坏，因为它先前的敌人马林迪在塞格朱人的帮助下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样就结束了曾不断抵抗葡萄牙人君临其上的蒙巴萨设拉子王朝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其劲敌马林迪王朝，它的统治者艾哈迈德素丹由于一贯忠于葡萄牙人而得到奖赏。但葡萄牙长官及

---

[31] 如前所述，津巴人本是隆杜的武士。16世纪80年代，其首领之一率众袭掠了东面的人。大约1588年，他的日渐增多的军队抵达基尔瓦，屠杀了当地大部分居民，使该城成为一座鬼城，然后北向蒙巴萨。另见J. 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969年，第1卷，第65-71页和R. 阿弗洛(Avelot)，1912年。

[32] 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58-62页。

其卫戍部队和马林迪王室一起移驻蒙巴萨的长期影响却是马林迪自身逐渐衰落，直到19世纪下半期才开始恢复。[33]

这一时期位于蒙巴萨和马林迪之间的基利菲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尽管史料对它与马林迪的竞争关系缺乏记载。蒙巴萨和基利菲的统治者据说曾是亲戚。在津巴人屠戮之后不久，基利菲似乎曾与马林迪争夺蒙巴萨的宝座。这么做可能是基于它的王朝亲戚关系或者仅仅是出于野心。不管怎么说，基利菲与马林迪的关系在后者接管蒙巴萨的前夕呈敌对状态，马林迪抱怨基利菲的侵袭。两者之间的战争给了马林迪一箭双雕的机会：结束基利菲的挑衅及其对蒙巴萨的主权要求。经过这场失败后，基利菲似乎一蹶不振。今天的遗址证实了这个城市的存在，它曾有一座宫殿和一些房子坐落在一小山之巅，有一所清真寺，763 祭坛(mihrab)的壁龛处铭刻着《古兰经》文，城市的其余部分在下面。

两次土耳其远征暴露了据守斯瓦希里海岸的葡萄牙人的脆弱。为了加强力量以应付将来的挑战，葡萄牙人决定在蒙巴萨修筑一座城堡，并设军驻防。在一名意大利建筑师的指导下，借助来自印度的石匠和马林迪劳工的劳作，耶稣堡于1593-1594年间建成。[34] 有一支100人的部队驻守在那里，其队长的管辖范围北至布拉瓦，南至德尔加多角。



图片 25.2 葡萄牙人1593-1594年建于蒙巴萨的耶稣堡

尽管在蒙巴萨的力量相对加强，葡萄牙人对斯瓦希里海岸其他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在别的地方他们力量较小，所期望的就是获取城市统治者的贡物。蒙巴

[33] E.B. 马丁，1973年；第40-41页。

[34] 关于修筑的细节，见C.R. 博克瑟和C. 德阿塞韦多，1960年，第87-117页。

萨的驻军使葡萄牙人易于对可能爆发的反抗和叛乱作出快速反应。但他们的靠近并没有吓
764 住所有的人。例如，1603年，帕特的统治者就起来武装反抗，结果被判处死刑。但这种无情的惩罚未能防止因之而来的帕特和其他城镇的反抗和起义。

沿海地区人口的分散和重新定居

17世纪取得了几项重要进展。一是荷兰人和英国人进入印度洋，向葡萄牙人发起挑战。二是葡萄牙人与其传统盟友蒙巴萨的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恶化。三是沿岸地区的人口分布和重新定居导致新的人群和部族的出现。

日渐增强的不安全感，主要源于奥罗莫人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源于环境的变化，导致斯瓦希里各群体从较北的地方迁往南部城镇。奔巴岛和蒙巴萨都接纳了来自北部中心地带的移民，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巴萨九个民族(米吉-肯达人)的祖先的绝大部分定居在该岛。当一些北方定居点衰败或被抛弃的时候，南方的另外一些定居点得到了加强，而更北方，例如，在被叫做姆利马的坦桑尼亚海岸。[35] 出现了新定居点。文巴库在17世纪进一步发展，具备了一种显著的特性。

同样重要的是各群体从欣格韦亚向南的人口分散，他们后来发展成为米吉-肯达族和波科莫人。欣格韦亚不能被看做一个虚构的国家，[36] 有很多证据表明它的存在——无论是定居点还是国家。米吉-肯达人和说斯瓦希里语的各群体，例如巴琼人，他们的口头传说为其存在提供了大量证据。[37] 米吉-肯达族的演化只是近来才得到研究，因而填补了海岸历史的一个重要空白。[38] 简言之，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一场从欣格韦亚开始的南进运动，不同的群体定居在一些山丘上有设防的村落(马卡亚，makaya；单数：卡亚，kaya)里，可俯瞰位于马林迪和蒙巴萨正南方之间的斯瓦希里城镇。修筑设防或许有助于群体同一和团结的增进。后来，“马卡亚”不仅成为躲避奥罗莫人及其后马赛人威胁的避难所，而且逐渐占据了米吉-肯达人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位置，其影响超出人们居住在筑有设防的村落的日子。米吉-肯达群体与邻近的斯瓦希里城市发展商业和文化联系。例如，迪戈人和塞格朱人与文巴库建立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关系。[39] 每个米吉-肯达“卡亚”都与蒙巴萨的12个民
765 族之一建立了特殊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后者定居城镇的过程到18世纪已经完成。

葡萄牙人与蒙巴萨人的冲突

在素丹的统治中心转到蒙巴萨之后，葡萄牙人与素丹艾哈迈德的友好关系只持续了三

㉟ 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3年，第146-149页。

㊱ R.F. 莫顿(Morton)，1973年。

㊲ J. 德·V. 艾伦，1977年b。另见V.L. 格罗坦内利(Grottanelli)，1955年和1975年，他认定现代布尔卡沃(杜恩福德港)附近的考古遗址即是历史上的欣格韦亚。

㊳ T.T. 斯皮尔(Spear)，1974年。九个民族(米吉-肯达)为：迪戈人，吉里阿马人，拉拜人，里贝人，孔贝人，卡乌马人，杜鲁马人，乔尼人和吉巴纳人。

㊴ 见A.I. 萨利姆(Salim)，1973年，第1章和W.F. 麦凯(Mckay)，1975年。

年左右。不久事情便已清楚，蒙巴萨的长官不顾果阿要他与其长期盟友保持良好关系的命令，不遵守与他达成的行政与财政协议。素丹抱怨给蒙巴萨的商业和船运业设置的障碍，尤为重要的是，他呼吁里斯本减轻土耳其远征之后施加给其他城镇的贡赋。他还请求承认他为奔巴的统治者，因为他似乎是以自己的力量征服了它，而葡萄牙人却希望通过自己选择的傀儡来控制该地。最后，素丹艾哈迈德得到了奔巴，但仅以租借的方式，他必须每年偿付300至500袋稻米。

1609年素丹艾哈迈德死后，其子哈桑发现自己与新的葡萄牙长官曼努埃尔·德梅洛·佩雷拉对于他在蒙巴萨和对奔巴的权利和特权问题发生争执。两人之间业已恶化的气氛由于哈桑的叔父的密谋而变得更加糟糕，素丹不得已到阿拉巴贾(或许是拉拜)寻求避难，而绝不屈服于果阿要他去受审的决定。起初穆松古罗斯人[40]给予他庇护，但后来背叛了他，将他杀死以得到葡萄牙人贿赂的几匹布料。

里斯本与这场叛变无关，为了弥补关系，坚持由哈桑的儿子尤素福在果阿培训一段时间之后作为统治者。到果阿后，尤素福皈依了基督教，并被赐予一名葡萄牙-亚洲血统的妻子。他还在波斯湾的葡萄牙武装部队中服役，作为一名士兵和炮手而获得了声望。但在1630年，当他被送回蒙巴萨作为统治者(基督教名多姆·杰罗尼姆·欣古里亚)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蒙巴萨人还是葡萄牙人都不愿接受他。他的亲属恨他改变信仰，他发现自己被全体居民排斥于社会之外。同时，葡萄牙官员对待他没有应有的尊重，也不赏识他对葡萄牙王室的服务。

1631年8月，葡萄牙长官佩德罗·莱唐·德甘博亚断定尤素福以穆斯林的方式在其被害的父亲墓前祷告便是摒弃基督教信仰，已滑到背叛的边缘，因此打算把他运回果阿审判。像他的父亲一样，尤素福决定不去受审，但不像哈桑，他决定抵抗。 766

关于1631年8月15日尤素福在葡萄牙人庆贺圣母升天节期间突袭耶稣堡，杀死几乎全部守军的故事经常被提及。[41] 作为一场把葡萄牙人逐出整个海岸地区的圣战的开始，尤素福戏剧性地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的号召并不像大约数十年前艾米尔阿里·贝伊那样得到很好的响应，其他城镇不愿支持他的反叛。尽管如此，1632年1月尤素福及其数百个斯瓦希里人和非洲追随者还是打退了葡萄牙人针对他们的第一次惩罚性远征，重创敌人。但他不打算等待第二次远征。由于缺乏其他城镇的军事支持，他感到心灰意冷，动身前往阿拉伯，大概是去争取土耳其人的援助。

由于没有争取到援助，尤素福回到东非，在海岸地区策动了数次小规模起义，直到1673年死去。反抗最强的是拉穆诸岛，因而1636至1637年葡萄牙人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征讨，以压服法扎、拉穆、曼达和帕特。1635年刻在耶稣堡城门上的铭文就是夸耀这种使海岸地区臣服葡萄牙王室的胜利。

---

[40] 葡萄牙的资料提到这一群体，但他们在此的时间似乎比葡萄牙人还短。他们可能融入随后从欣格韦亚而来的群体之中，也许这些群体的后裔便是后来的拉拜人，米吉-肯达人的一支。

[41] 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见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80年。

英国与荷兰人侵者

然而，那时印度洋的潮流已变得对葡萄牙人不利。在尤素福叛乱以前，荷兰人和英国人在该地区的出现造成了葡萄牙人优势的衰减。荷兰人作为代理商长期介人东方贸易，将带到里斯本的殖民地货物运往欧洲其他地区。但当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合并后，西班牙国王试图排挤自1566年以来一直为脱离西班牙统治而战的荷兰人。这决定了荷兰人不依赖于西葡而独自到达东方，到16世纪末，荷兰商船在印度洋对葡萄牙人构成了挑战。1607年，荷兰舰船封锁了莫桑比克城达数月之久，后因疾病流行被迫撤退。但他们已进人印度洋并决意留在那里。

英国人自1580年两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强国合二为一后，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利益成为英国人打击的合法目标，英国人开始劫掠西班牙商船。在进人17世纪之前，英国舰船已767 绕过好望角。1591年，有一艘舰船在桑给巴尔登陆，然后驶往印度，1608年，另一艘舰船在奔巴登陆。此后，葡萄牙人打了一仗，徒然抗拒这些欧洲人侵者。冲突地区主要是波斯湾，沿着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和马来群岛。无论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都未打算永久占领任何东非城镇以取代葡萄牙人。在桑给巴尔和奔巴的短暂停留只是为了补给食物和淡水。

尽管如此，英荷的袭击和骚扰消耗了葡萄牙的力量。英国人卷人当地居民与其葡萄牙太上皇的斗争使后者的优势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最后，波斯湾失败的冲击波开始到达东非海岸。

虽然在正式场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相安无事，英国人于1622年还是帮助波斯国王把葡萄牙人从其战略贸易中心霍尔木兹[42] 赶走，这样，印度国不再成为葡萄牙岁人的主要来源。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葡萄牙人撤回到自16世纪早期以来他们一直统治的阿曼海岸城镇之一马斯喀特，如在许多斯瓦希里城镇所做的那样将之抢劫一空。马斯喀特相当于阿曼的蒙巴萨。1588年，在土耳其人劫掠之后不久，葡萄牙人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要塞，作为征服霍尔木兹的基地，也作为印度洋-波斯湾贸易的一个货物集散地。

葡萄牙人在东非统治的结束

霍尔木兹落入波斯人手中不久，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王朝兴起于阿曼内地，决意将国家从葡萄牙的桎梏下解救出来。这就是雅鲁比王朝，其奠基人和第一位伊玛目是纳西尔·本·穆尔希德。在1640至1650年间，葡萄牙人由于军事失利被迫拆除他们的一些堡垒，撤出了马斯喀特。在控制了自己海岸线的情况下，阿曼统治者们利用自己擅长航海的居民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开始在波斯湾之外向葡萄牙人发起挑战。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和商业上的联系，雅鲁比统治者们将注意力转向东非乃势所必然。

[42] S.B.迈尔斯(Miles)，1919年。

尤素福叛乱后，葡萄牙人收复了蒙巴萨，决定对该城实行直接统治。如上所述，反叛周期性地爆发，特别是在帕特，它似乎处于解放斗争的领导地位。该城在此期间似曾有过一阵繁荣，结果葡萄牙人于1633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海关。但葡萄牙人对该城贸易的干预，据他们估计，使得帕特过于富强，这导致双方的关系恶化。同时，其他城镇，如锡尤、奔巴和奥通多关于受到虐待的怨言不仅传到里斯本，也传到阿曼新统治者的耳中，并 768 要求他们帮助对付葡萄牙人。

接下来便是17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和阿曼阿拉伯人在东非海域进行的长期斗争。1652年，一支阿曼远征军在当地统治者的激励下，攻击了桑给巴尔的葡军阵地，打死了一些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以袭击该岛作为报复，并以拒纳贡物和鼓励阿曼阿拉伯人为由驱逐了女王和她的儿子，即奥通多的统治者。1660年，一支阿曼和帕特的联合舰队在蒙巴萨登陆，洗劫了葡军司令部，似乎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1669年，另一些阿曼人的袭击南至莫桑比克。1678年8月，葡萄牙总督亲自率领一次重要的远征，讨伐"狂妄自大的帕特"。参加远征的还有常年同帕特争斗不休的邻国法扎的统治者。远征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因为1679年1月阿曼的舰队出现后，葡萄牙人被迫撤退，但却抓获了帕特、锡尤、拉穆和曼达的统治者，然后将他们与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一起斩首。不过失去领袖并未压服帕特，因而1687年葡萄牙人再次采取了针对它的行动。帕特遭到侵略和抢劫，新的统治者被俘，与12名顾问一起被带到果阿。

双方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帕特的谢赫可以保住王位——而不是被其敌人法扎的统治者所取代，但必须接受葡萄牙人为宗主。然而这项在果阿达成的协议遭到里斯本的否决，因为葡萄牙国王希望结束帕特的独立，对法扎"显而易见的忠诚"给以奖赏。[43] 但那时帕特已落入阿曼军队之手，在1688年圣诞节，被俘的统治者及其顾问们因试图逃离在潘吉姆的监禁而被害。

有些年月，阿曼国内的争斗打断了他们对东非葡萄牙人阵地的袭击。当他们恢复行动时，目标是蒙巴萨的粮食供应地奔巴，那里爆发了一场反对葡萄牙人的叛乱。然而在1694年，葡萄牙人设法镇压了叛乱，驱除了阿曼阿拉伯人。

但次年迎来了阿曼人最大的挑战。1696年3月，七艘阿曼舰船，运载着3000人和拉穆的统治者，在蒙巴萨登陆。他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城和全岛，随后包围了耶稣堡。包围持续了两年半，直到1698年12月城堡最后投降。这次战斗不仅显示了受到盟友马林迪和法扎支持的守军的英雄主义，也暴露了被不断派去解救城堡的葡萄牙指挥官异常的无能和胆怯。他们一成不变地将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向被围困的城堡内运送补给品，却没想到去攻击围城者。在阿曼人说服了邻近的米吉-肯达人切断对守军的供给后，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守军大量死亡。当1698年11月果阿的远征军带着与敌交战的命令到来时，阿曼人的 769 红色旗帜已飘扬在城堡的上空。

从1728到1729年，葡萄牙人利用蒙巴萨陷落后阿曼兵力减少之时，设法暂时回到了蒙巴萨，而且当时有些城镇的斯瓦希里人对阿拉伯人的幻想破灭，因为据传阿拉伯人虐待

[43] C.R.博克瑟和C.德阿塞韦多，1960年，第51页。

富人和干涉地方贸易。这类传说在果阿很可能被那些遭到剥夺的斯瓦希里贵族们所夸大(如法扎的王子)。但毫无疑问，帕特统治者与城里的阿拉伯驻军发生了争执。当阿曼人支持的一派起来反对他时，他最终于1727年晚些时候向果阿寻求支持。葡萄牙远征军从帕特出发开向蒙巴萨，当时城堡中的阿曼驻军趁指挥官不在发生哗变，请求帕特国王帮助对付守卫该岛一些小城堡的其他阿拉伯驻军。蒙巴萨城堡和该城最后向葡萄牙-帕特联军投降，瓦希尼(?)·文巴、潘加尼、姆坦加塔、坦噶、桑给巴尔和奔巴的统治者们被召到蒙巴萨重新进行效忠宣誓。

但葡萄牙人的返回和葡萄牙-帕特的联盟时间都不长。帕特的统治者急于请葡萄牙人帮助对付地方敌对派别及其阿拉伯支持者，以致于向葡萄牙人作出不计后果的许诺，如纳贡和垄断象牙贸易。结果不到六个月，帕特国王就指责葡萄牙人垄断象牙贸易，并抱怨对其他贸易的限制。1729年6月，一场武装冲突最终使葡萄牙人相信他们应该撤退。

那时蒙巴萨也在酝酿针对他们的麻烦。一支蒙巴萨和穆松古罗斯(大陆非洲人)联军，在一位先前曾到果阿敦促葡萄牙人返回的蒙巴萨贵族率领下，攻打了城中的葡军哨位，然后包围了城堡中的小支驻军。1729年11月，饿得半死的守军投降，被允许乘船去莫桑比克。其他城镇，包括桑给巴尔、奔巴和马菲亚，也效仿蒙巴萨，杀掉或驱除葡萄牙人。

因此，是斯瓦希里诸城镇负责最后驱逐葡萄牙人。但不久，帕特和蒙巴萨再次被阿曼人占领，斯瓦希里海岸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葡萄牙人的失败归结于许多因素：他们的虚弱、无能和混乱的殖民制度；个人的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不称职，以及官员们贪得无厌、热衷于中饱私囊，他们经常疏远当地的斯瓦希里人；气候变幻莫测，疾病夺去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葡萄牙人的性命；当地的派系斗争常常是把双刃剑，时而为葡萄牙人所用时而将矛头对准他们。最后，葡萄牙人精疲力竭，很难召集起一支远征军。例如果阿在1730年1月作了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以收复东非立足点，结果中途失败，自身防卫力量也消耗殆尽。

770

这些军事行动发生在海岸地区处于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之中。在海岸的南部，尧人和基尔瓦之间开展了重要贸易，初为兽皮、铁器和农产品，但到17世纪末，已包括"一种兴旺的、组织良好的象牙贸易"。[44] 这种贸易在18世纪初遭到暂时的打击，当时葡萄牙人失掉蒙巴萨，而其首领曾是大量基尔瓦出口产品的购买者。接踵而来的阿曼人对这些商品没有充足的需求，也无法提供用以交换的布匹和珠子，而后者是基尔瓦人从内地获得象牙和其他物品所必需的。结果，尧人的象牙从基尔瓦转到了莫桑比克手中。但18世纪中叶阿曼布萨伊迪王朝的出现，再次为基尔瓦带来了一段兴旺时期。

进而往北，文巴库已经稳定下来，其谢里夫特统治家族巴-阿拉维也已本地化。每个迪万(diwsan,统治者)采用一个班图别称，他的授权典礼融合了班图人和伊斯兰教礼仪。塞格朱人如米吉-肯达民族之一迪戈人那样，已定居在迪万纳特周围。二者皆与文巴库保持亲密的关系，为其经济提供基础，在18世纪及其以后时期还参与其统治者的任命和继承权之争。谢里夫特家族的宗教影响对海岸地区的迪戈人和塞格朱人皈依伊斯兰教起着决

[44] E.A.艾尔珀斯，1975年a，第63页。

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仍保留着本族宗教信仰的某些方面，包括祈雨仪式。

在拉穆诸岛，帕特在 17 世纪以及进入 18 世纪后，经历了其最辉煌的几十年，它拥有大量的财富，影响着海岸南部的部分地区，在海岸的解放过程中扮演了主角。它的繁荣建立在海上贸易的基础上，而此时其他城镇诸如马林迪、蒙巴萨和基尔瓦正从内陆民族如津巴的进攻中恢复过来。帕特甚至还与从事抢劫的奥罗莫人建立有利可图的关系，后者为该城提供出口用的兽皮，用来自大陆的象牙进行贸易。[45] 收集和保留下来的物质文化反映了这一时期帕特所享受的高度繁荣和文明生活。史料并没有充分解释 18 世纪下半叶它在表面上一度急剧衰落的原因。



图片 25.3　文巴库一座清真寺的圆形饰物

东非的阿曼因素

771

正是这种从高峰的衰落构成了最伟大的斯瓦希里语史诗(tenzi)之一《因基沙非》的主题。诗作者萨伊德·阿卜杜拉·本·阿里·本·纳齐尔，是帕特谢里夫特精英中的一员。他的祖先谢赫阿布·巴克尔·本·萨利姆在哈达拉毛是著名的伊纳特圣贤，曾应 16 世纪一位帕特统治者的请求祈祷该城从其敌人——不清楚是葡萄牙人还是奥罗莫人——手中解放出来。谢里夫们定居下来，代代繁衍，变得本地化，与拉穆的谢里夫们一起，逐渐在斯瓦希里文学和宗教传统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正是从南部阿拉伯来的谢里夫移民，甚至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就逐渐决定了海岸地区穆斯林人口的绝大多数为沙斐仪派。

伊斯兰教的教学方法、使用的手册、圣贤迷信、谢里夫崇拜以及诗文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这些先知穆罕默德子孙的文化遗产。他们不仅居住在拉穆诸岛，还住在海岸其他地方，构成了当地宗教知识分子的主要部分。到 19 世纪，一种——

---

[45] A. 纳西尔(Nasir)，1977 年，第 17-18 页；J. 德·V. 艾伦，1974 年。

文化交往连结着南部阿拉伯和贝纳迪尔、莫桑比克南部海岸以及沿海岛屿：拉穆诸岛、桑给巴尔、奔巴、马菲亚和科摩罗群岛。一些哈德拉米城镇，如伊纳特和泰里姆，麦加和麦地那，有时开罗，偶尔伊斯坦布尔，促成了东非穆斯林学者学术思想的定型。东非城镇的学者们旅行到汉志、哈达拉毛，有时到埃及，在知名学者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从其中一位学者那里获得一份证书(Idjaza)，便证实了接受者可在清真寺或自己的家乡教授阿拉伯语、《古兰经》解、圣训、伊斯兰教法等。从这种教育体系中发展出一种强大的乌里玛(ulama)机构，布萨伊迪统治者们从中任命他们的卡迪。[46]

772

和奴隶贸易一样，阿曼因素对基尔瓦的经济复苏也起了很大作用。奴隶贸易与象牙贸易一起，后来支配了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东部海岸的经济史。第一个主要的贸易催化剂是法国获得马斯克林群岛，即法兰西岛(毛里求斯)和波旁岛(留尼汪)，以及1735年后两岛发展为种植园殖民地，强烈刺激基尔瓦和桑给巴尔提供奴隶。当初，法国人转向葡属莫桑比克和凯里姆巴群岛寻求奴隶，因为葡萄牙人急于阻止法国人与大陆上的马夸人、尧人和斯瓦希里商人直接进行奴隶或象牙贸易。

但18世纪中期，莫桑比克的统治地位开始衰落，部分原因是由于葡萄牙人在内陆与马夸人的冲突妨碍了莫桑比克的商路，另外还由于来自斯瓦希里人的挑战，以及阿拉伯商人的挑战，在布萨伊迪王朝牢牢控制住阿曼后，他们增强了在海岸沿线的活动。与此并行的是印度商人资本在桑给巴尔的增长，并受到阿曼新统治者们的有意鼓励，后者使桑给巴尔成了他们在海岸的主要据点。令葡萄牙人惊恐不安的是，基尔瓦再次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吸引了非洲大陆的奴隶和象牙商贩。所有措施，军事的或其他的措施，试图消除被认为对莫桑比克的经济支柱构成致命威胁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的商业竞争，都未能阻止这股浪潮。

到1785年，莫桑比克在东非和中非对象牙贸易的统治将近结束，尽管由于法属印度洋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奴隶贸易需求而使之得以继续繁荣。[47] 在这方面它面临着来自斯瓦希里大陆海岸定居点如伊博岛的竞争，法国人对后者的奴隶需求越来越大。尧人奴隶贩子日益转向基尔瓦，以此作为他们的象牙和奴隶的目的地，基尔瓦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买卖颇受欢迎的印度-阿曼进口商品，如苏拉特布等。正是基尔瓦这种增长中的复苏导致了法国商人冒险家让-樊尚·莫里斯在1776年与该城签订了向马斯克林群岛上的法国殖民者一年销售1000名奴隶的条约。[48] 到18世纪80年代，已有证据表明率先进行商业冒险的斯瓦希里和斯瓦希里化了的商人们进入了内地并越过马拉维湖。新建立的三条路线中有两条通向基尔瓦和巴戈姆约附近的斯瓦希里海岸，证实了“18世纪下半叶斯瓦希里海岸贸易经济的复苏”。[49] 新开通的商路连结着海岸民族，如博洛沃卡人、比萨人和恩贡德人。

773

---

[46] A.I. 萨利姆，1980年，第885-891页。

[47] 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127页，注⑧。

[48] 关于法国在基尔瓦的贸易，见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5年。

[49] E.A. 艾尔珀斯，1975年a，第161页。



图片 25.4 姆韦尼姆库的大锡瓦，桑给巴尔

阿曼阿拉伯人证实了贸易和利润经常与政治相脱离，他们与基尔瓦进行贸易，尽管基尔瓦素丹谨慎地使自己独立于阿曼。但从 1784 年起，新上任的阿曼伊玛目赛义德·本·艾哈迈德开始了一次军事远征，以将其意志强加给一些海岸城镇，包括曾被其叔父赛义夫·本·赛义德用做叛乱基地的基尔瓦。基尔瓦年迈的素丹哈桑·易卜拉欣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他被迫将其主权和过半的关税让给阿曼主子，接受阿曼总督和驻军的存在。但这些政治发展只有助于扩展基尔瓦海岸的商业，因为它们创造了更大的稳定，并引进更多的印度资本投资。[50] 毫无疑问，马斯喀特从中获得了好处。到 1804 年，基尔瓦的阿曼总督一年向他的伊玛目送去 6000 比塞塔，到 1811 年这个数字至少翻了一番。[51] 桑给巴尔已是布萨伊迪王朝在东非最稳定、忠诚和有利可图的基地，在 1796 年给阿曼国库增加了不少于 40,000比塞塔，1811 年增加了将近 60,000 比塞塔。 774

到世纪之交，这几个地方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对阿曼的布萨伊迪来说变得再明显不过。

[50] 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166 页。
[51] R. 奥利弗和 G. 马修，1963 年，第 156 页；E.A. 艾尔珀斯，1975 年 a，第 177 页。

这一点以及其他政治和战略报偿，归功于素丹赛义德·赛义德·本(1804-1856年)所采取的政策，他将其王朝权力扩展到海岸地区，最后定都于桑给巴尔。[52]

结　论

从1500到1800年，海岸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期间独立的斯瓦希里城镇经受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它们的内部纷争有时便利了葡萄牙人的干涉，尽管葡萄牙人偶尔发现其卷人弊大于利。

葡萄牙人的占领是粗暴的和无情的，他们决意打击每个地方的穆斯林，接管其土地和贸易，甚至使穆斯林和所谓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实际上，宗教影响是微不足道的。除了几个例外，如尤素福·本·哈桑，或一些女性成员，绝大部分穆斯林并不为基督教所动。当然，到葡萄牙人占领结束时没有留下基督徒的踪迹。

至于控制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和商业交往，葡萄牙人的努力后来证明他们只取得有限的成功。尽管有葡萄牙人的控制，如垄断和通行(Carataze)许可证将贸易压缩到某种程度，但斯瓦希里城市能够继续其相当规模的贸易活动。地方官员的贪婪和无能对诸如索法拉黄金贸易的衰落等变化负有责任。海岸地区起初被认为不如亚洲贸易重要，但它却使葡萄牙官员——如果不是葡萄牙王室的话——富了起来。

775

这一时期斯瓦希里城镇经历了动荡不定的命运。蒙巴萨的灵活性使它得以几次从葡萄牙人的严惩中恢复过来。基尔瓦则不那么容易。由于与毛里求斯的奴隶贸易，到18世纪末它才得以恢复。但恢复是短暂的，因为在19世纪初它便被大陆的基尔瓦-基温杰所超过。其他海岸城镇永远消失或者变成了乡村。把这归罪于葡萄牙人的行动是错误的。人口的压力，比如奥罗莫和津巴人，加上环境的变化，或许是更为可信的解释。对这种总的衰落来说，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帕特，它在17和18世纪达到繁荣的顶点，这个事实大概可以解释葡萄牙人对该岛的迷恋。但到18世纪末，帕特再次衰落下来，正如它的大诗人《因基沙非》的作者萨伊德·阿卜杜拉所记载的那样。但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解答有关这些斯瓦希里城镇的许多问题，如它们的规模、导致它们迅速增长和发展及最终衰落的因素等。

(孙红旗　译)

[52]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6卷，第8章。

26 1500-1800年的大湖地区

J.B. 韦伯斯特
B.A. 奥戈特
J.P. 克雷蒂安

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500到1580年前后，1580到1680年的旱灾和饥荒时期，大约1680年起至1800年的国家形成和扩张时代。1580年前大湖地区南部和中部的主要关注点是巴奇维济帝国的后继诸国的巩固，而北部则在于各语族间的相互影响，这是讲东尼洛特语的民族初次侵入大湖地区而引起的。 776

第二阶段(约1580-1680年)主要是旱灾和饥荒年代。这一阶段还发生了大湖地区过去1000年来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移民大规模迁出巴尔地区，与普奔古地区联系密切的卢奥人四处分散，巴尼奥罗人大量侵入南方，其支系最远达到了卢旺达和乌苏库马。在大湖地区东部，由于旱灾的关系，中部东尼洛特人出现，他们与包括卢奥人在内的早期民族产生相互影响，此外人口大量南移。

第三阶段(约1680-1800年)首先涉及国家结构的扩大和扩张。这一阶段始于布尼奥罗的王朝危机，危机标志着该帝国的衰落，而且通过帕罗人，导致从阿卢尔高原到阿乔利-卡拉莫贾交界地带山区一些国家的创建，以及通过巴尼奥罗的王孙贵族，致使南部边界地带一系列国家的产生。尼安扎-卢奥人、巴索加人、巴孔乔人、卡夸人、巴尼扬戈马人、巴宾扎人诸国都在迅速产生出更多的国家。姆波罗罗国建立后又分裂了。这一阶段最后是布干达在中部地区、卢旺达在南部地区作为大湖地区“超级大国”而兴起和扩张，北部的中部东尼洛特民族实体近代结构大体成形，比如伊特索人、杰人、东卢奥人、兰戈-奥米罗人和库曼人。

北部和中部地区 777

新族群和新社会的形成

公元1000年前，中部苏丹人可能是整个大湖地区的主要民族。他们分为许多群体，其中包括伦杜人、克布人、莫罗人等族群的先辈。“穆鲁”是卢奥语，用来称呼所有这些土著民族，对于不知其民族属性的中部苏丹人的某个民族可用此词，特别是可用以将这一地区的早期民族和以后的马迪人移民区分开来，马迪人也是中部苏丹人，或许是巴尔地区已知的最早的居民。大多数中部苏丹民族是按分散的形式和老人统治来组织的。他们是农业民族，敬奉土神，利用求雨石或油水混合液求雨。他们有复杂的图腾崇拜制度，将死者

葬在隐秘的墓地中。以后的移民知道，这些民族的人大多是熟练的铁矿开采工、冶炼工、铁匠。到 1500 年，这些民族已被尼罗河-基奥加湖分水岭以南的班图文化所同化，但他们仍支配着从阿卢尔高原到卡拉莫贾山的北部地区。

大约在公元 1000 年，多格南的尼洛特卢奥人发源地出现了分裂。[①] 一群人迁到了泰基迪，从泰基迪分裂出的另一群人迁移到帕夸奇-帕韦尔并在那里定居。阿卢尔人、阿伯沃人、帕德荷拉人、尼安扎卢奥人，或许还有布罗尼奥的巴比托人的语言要素就出自这一部分人。从多格南迁出的另一部分人在维帕克(伦拜克)定居，在这些人中产生了希卢克人、西部阿乔利人，或许还有帕罗人的方言。1500 年时，这两个群体之间肯定已存在实质性的语言差别。在这三个卢奥聚居区内，在 1400 年前，建立起一种与南非林羚图腾崇拜相联系的世袭首领制。[②]

大约 1400 至 1580 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后继国家的内部巩固，[③] 还有巴欣达和巴比托这两个大国集团的外交活动。新统治者们把官职赏给合作者，承认某些土著统治者特别是布韦拉和布亚加统治者的地位。在王位继承问题上未发生多少争端。在巴比托人中形成了一个秘密宗教，崇拜已被推翻的斯维西，这对新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778 巴比托和巴欣达是争夺整个区域霸权的主要角色。据传说，一个来自布干达宫廷的穆希马人要推翻基塔拉人的统治，而基塔拉人得到了基齐巴土著统治者的武力支持。巴尼奥罗人的军队侵入布干达，杀死了穆希马王纳卡宾格，可能还促使一位来自塞塞群岛的统治者取代纳卡宾格，新统治者崇拜早期津图王朝的狮-豹图腾。布干达国内一部分不满新王朝的人越过尼安扎地区，来到大湖地区的西南部，那里的巴通杜人害怕巴欣达的扩张，于是承认新迁来的人是统治者。由此建立了巴宾扎氏族，他们也崇拜狮-豹图腾。[④] 巴尼奥罗人杀掉了想夺取基齐巴王位的穆希马人，处死了在基齐巴夺得权力的基比。据传说，巴尼奥罗人还鼓动巴利萨氏族建立布赫维朱和布津巴(约 1523-1550 年)，作为巴尼奥罗人南部边界的缓冲国，以防御来自巴希马人诸国的威胁。巴尼奥罗人还彻底打败了恩科雷，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中断了，那是因为 1520 年发生日蚀，他们的军队溃逃。

在尼罗河-基奥加湖分水岭以北，1500 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可能恰逢东尼洛特人的北方部分即东尼洛特人的巴里族群首次大范围出现。有人认为，东尼洛特人的北方

① 见 J.M. 奥尼扬戈-卡-奥东戈(Onyango-ka-Odongo)等人的著作，1976 年；A.M. 加里(Garry)，1976 年；R.S. 赫林(Herring)，1976 年。另见 R.S. 阿尼瓦尔(Anywar)，1954 年(1969 年)；L. 奥凯奇(Okech)，1953 年和 1968 年；J.P. 克拉索拉拉(Crazzolara)，1950-1954 年；V. 佩莱格里尼(Pellegrini)，1963/1972 年；A. 马兰德拉(Malandra)，1947/1971 年。

②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20 章。

③ 已出版的研究后继国家的著作包括 J.W. 尼亚卡图拉(Nyakatura)，1947 年和 G.N. 乌卓伊格韦(Uzoigwe)，1973 年；P. 比库尼亚(Bikunya)，1927 年；H.K. 卡卢邦加(Karubanga)，1949 年；J.W. 尼亚卡图拉，1971 年；A.G. 卡塔特(Katate)和 L. 卡穆贡古努(Kamugungunu)，1953 年；K.N. 恩干瓦(Nganwa)，1948 年；F.X. 卢旺姆基拉(Lwamgira)，1949 年和 E.R. 卡穆汉吉罗(Kamuhangiro)，1968 年；F.X. 卢旺姆基拉，手稿；H. 雷塞(Rehse)，1910 年和登内(Denne)夫人，无出版日期。

④ 关于布干达，见 M.S.M. 基瓦努卡(Kiwanuka)，1971 年；A. 卡格瓦(Kaggwa)，1908 年、1949 年、1971 年；M.B. 恩辛比(Nsimbi)，1956 年；C.E.S. 卡布加(Kabuga)，1963 年。关于苏库马人，见 B. 伊坦达拉(Itandala)，1979 年。

部分在三次迁徙浪潮中迁出了位于埃塞俄比亚边界地区[5] 的家园，第一次(约1490-1517年)可能包括帕朱鲁人的一些祖先，第二次(约1517-1544年)可能包括巴里-卡夸-库库人的一些祖先，第三次(约1544-1571年)可能包括洛图霍人的一些祖先。这些迁徙肯定不很明显，第二次和第三次迁徙浪潮中迁来的人在帕朱鲁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这些迁徙浪潮一直是根据来自东北部的东尼洛特人进攻泰基迪人的几个世代大概划定年代。因此，对泰基迪王谱的准确性自然存在普遍的怀疑，因为迁徙的年代是根据王谱推算的。另外，除了第三次迁徙浪潮即洛图霍人入侵外，在泰基迪人传说中找不到关于移民的可靠证据。不过，这一划分却在已发表的东尼洛特人北方族群的谱系中找到一些论据。各族群轮番进攻泰基迪，直到这个卢奥人定居点被洛图霍人攻破为止。

鉴于东尼洛特人编年史中关于北方族群的内容并不成熟，下列叙述必然被看成是推测性的。在图尔卡纳峭壁和阿戈罗山之间，北方族群似乎分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向西，经过 779 中部苏丹人的区域(穆鲁和卢科亚)到达巴尔的尼罗河，这里是马迪人的故乡，另一个方向经过卡拉莫贾往南，导致卡拉莫贾的卡伦津型民族退出该地区北部。[6] 证据似乎表明，他们将自己的同龄人组织、生火仪式、一位天神、矛和盾、祈雨用的神矛、长而直的锄头、精致的头饰都传给了这些中部苏丹民族。在许多地区，他们与中部苏丹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促进了酋长制的发展，他们的语言可能作为一种新的通用语言传播开来。

第二次东尼洛特人入侵或许受到奥罗莫人的影响，奥罗莫人大约在1517至1544年从图尔卡纳湖以北的发源地扩散开来，在着手入侵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同时攻击了泰基迪。[7] 现代卡夸人的祖先可能就是在这次迁徙中开始移动。卡夸人的传说一直上溯到生活在卡波埃塔(今托波萨地区)的梅梅人。同一个传说提供了上溯到贾基人的谱系，他们住在最西部的科罗贝山，那里是帕朱鲁人和卡夸人中许多统治氏族的发散地。贾基人成了卡夸人杰出的先祖。卡夸人也承认他们与伊特索人的一个下层分支有联系，早期东尼洛特人的某支北方族群曾在乌干达东部存在过，这可以用从东部阿乔利到肯尼亚西部的卢奥人中“卡夸”一词的各种变体及其他证据来证明。

巴尔这个地方成了东尼洛特人和马迪人广泛混合的区域。多种类型的世袭首领制可能已经形成，但对于那些到达尼罗河西岸的族群——帕朱鲁人、卡夸人、库库人——来说，他们通常就是东尼洛特人首领和马迪人追随者；往东南方向阿戈罗迁移的可能是马迪人或卢奥人率领的东尼洛特人；仍留在巴尔的人创造了一种世袭的求雨者首领制，推测其血统是马迪人，但讲的是东尼洛特人的方言。在帕朱鲁人、卡夸人、库库人中，新的社会似乎采用了一种东尼洛特人的语言，将东尼洛特人的天神和矛与苏丹人的土神和弓箭结合起来了。他们显然放弃了东尼洛特人的同龄人组织，采用了马迪人的服饰、殡葬习俗、求雨

[5] 对东尼洛特人的这一北方族群没有进行过主要研究，但可参见M.洛罗(Loro)，1971年和J.B.巴巴(Baba)，1972年。L.F.纳尔德(Nalder)，1937年，资料有实用价值；J.P.克拉索拉拉，1950-1954年，第337、342-343以及J.M.奥尼扬戈-卡-奥东戈和J.B.韦伯斯特(Webster)，1976年，均有助益，后者特别有助于确定年代。不过，还有几部著作论述东尼洛特人的主要族群：J.E.兰菲尔(Lamphere)，1976年和尚未发表；R.S.赫林，尚未发表。

[6] J.E.兰菲尔(尚未发表)提出了关于卡伦津人的杰人传说。C.埃雷特(Ehret)，1971年，也论述了他们的退离。

[7] H.S.刘易斯(Lewis)，1966年根据文献证明将奥罗莫人开始迁移的时间定在1530-1538年。1517-1544年这一时间是根据J.M.奥尼扬戈-卡-奥东戈等人(1976年)的谱系推算出的。

石。世俗首领一般是东尼洛特人，而专事宗教典仪的则是马迪人。帕朱鲁人、卡夸人、库库人文化属苏丹人，语言则属东尼洛特人。

巴里人的融合与此相似，东尼洛特人的影响略强。巴里人和库库人社会的显著特征 780 是，奴隶阶级（杜皮，dupi）偶尔在身体上有别于自由人。在卡夸人和帕朱鲁人社会中，"杜皮"是依附者而不是农奴。既然"杜皮"在求雨典仪中通常是助手，又是著名的矿工和铁匠，那他们就可能具有穆鲁血统而不是马迪血统，这是以假设为根据的，即近代马迪人最初出现在卢奥人较晚的传说中，他们本身就至少是不同苏丹民族的混合体，其中包括莫罗人，可能还有穆鲁人。对于卢奥人来说，所有的苏丹民族都可以称为马迪人，都是出色的铁匠。然而，马迪人却否认这点，说铁匠是他们定居其间的土著民族的职业，由此假设这些土著民族是穆鲁人、莫罗人、伦杜人或是奥克布人。后三个民族现在仍然存在，并自称一直就是铁匠，他们在马迪社会被赋予特殊地位。⑧

东尼洛特人北方族群的最后一次入侵在卢奥人的泰基迪传说中是与洛图霍人联系在一起的。洛图霍人侵入泰基迪卢奥人的定居地，泰基迪王奥韦尼·拉克·考马（约 1544-1571 年）与大部分臣民一起逃到了在帕夸奇-帕韦尔的卢奥人姐妹定居点。迪丁加人和敦戈托诺-穆尔勒人似乎守住了自己的高地要塞，免遭入侵之害。可能有一个中部苏丹人族群奥卡罗沃克人在洛图霍人的影响下变成了讲东尼洛特语的族群。奥卡罗沃克人的一支科留克人处于洛图霍人语言、文化最终是政治影响之下；第二支是伊洛基尔人，受到语言、文化影响但未受到政治影响；而第三支即洛科亚人或奥克绍留克人保持分离状态，但接受了东尼洛特人的语言。与这一证据同样不够充分的是，奥克绍留克人成了奥卡罗沃克人（乌干达境内一个主要东尼洛特人氏族），这是证据的指向。

显然，洛图霍人将奥卡罗沃克人的一些小氏族与洛图霍人的四大氏族同化，还引进了奥卡罗沃克人的图腾禁忌。他们还采用了生火仪式和同龄人组织，并且——可能是因为处境不安全——在一个过去以分散定居点为特征的区域建立了一些人口众多、居住拥挤的村庄。这是图腾崇拜氏族和求雨石向东扩张的最远点，可能表示着中部苏丹人定居点东扩的极点。

当一个早期卢奥人群因东尼洛特人入侵而被迫迁到泰基迪地区时，另一个族群向北迁移到伦拜克的维帕科德翁。这一定居点后来在 1382 到 1418 年间分裂，该族群向西朝尼罗河迁移，在河边建立了定居点。这一族群后来分裂，一支成为早期希卢克人及其盟友，他们北进打败丰人后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约 1490-1517 年），而帕蒂科人和帕迪贝人则从巴尔 781 向南迁移，进入帕夸奇-帕韦尔地区。卢奥人入侵巴尔显然引起马迪人率领的帕尼穆尔人、阿提亚克人、科克-帕加克人南迁到基拉克山地区。接着在帕夸奇-帕韦尔发生了马迪人和卢奥人的争权斗争。在阿提亚克酋邦有预言说，公主尼拉克（约 1517-1562 年）之子会谋害公主的父王，夺取王位。因此这位阿提亚克王便把女儿关了起来，但一位云游的卢奥人（一则传说中说他是帕蒂科王基诺）使尼拉克怀了孕，她的儿子像预言所说的那样杀了这位

---

⑧ 在马迪人的故土巴尔对马迪人的口头传说没有收集，我们仅有的马迪人传说来自乌干达地区。在乌干达北部的东、西尼洛特人地区，与操中苏丹语人民相联系的锄头各地都称为"马迪锄"。

马迪王。可能由此出现了两个国家：卢奥人领导的艾提亚克(后来的奥科罗)，尼皮尔就出于这一卢奥人的王族世系，还有马迪人领导的阿提亚克(阿乔利)。尼拉克的故事已成俗套，每个事件仅人物变化，以说明不是北部的卢奥人就是南部的班图人推翻了苏丹人的首领地位。⑨

马迪人与卢奥人争夺帕夸奇-帕韦尔霸权的斗争在卢奥人大举迁入泰基迪王国的奥韦尼时加剧了。在奥韦尼前任国王奥韦尼·拉克·考马统治时，阿叶拉建立了帕也拉人的统治机构，她是一个讲卢奥语的普通女孩，母亲是东尼洛特人，父亲是穆鲁商人，这是因民族混合而产生的聪颖的根源，以后成为帕也拉国家的特征。阿叶拉迁到尼罗河以西，她的后代主要是作为穆鲁人来养育的，同时他们身边也安排了许多马迪人。大约在1560年，洛图霍人打败了泰基迪，泰基迪的大多数臣民与国王一起逃到了帕夸奇-帕韦尔。其余人逃进山区，在洛图霍人撤退后不久返回原地。由洛图霍人产生的主要酋邦是普兰加。⑩ 这一卢奥人族群经过几个世纪来自安尼瓦和其他地区的新移民渗入，又受到东尼洛特人极大影响，可以称为东卢奥人。他们构成了东阿乔利、拉布沃尔、尼亚夸伊、兰戈人口的主要成分，他们和东尼洛特人对这些地区的方言产生了重大影响。

旱灾和饥荒年代

大湖地区的任何重要区域，实际上中东部非洲的任何重要区域，都未能逃脱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干旱造成的气候灾害和由此引起的饥荒。在此阶段，北部和中部地区只有两年雨量正常，旱情最严重的四个时期可能是：1588至1590年、1601至1602年、1613年、1617至1621年。1621年夏季尼罗河水位降到了自公元622年首次保留纪录以来的最低点。记录表明，在整个干旱与饥荒阶段，粮食产量可能只有两年属正常水平，11年颗粒不收，24年歉收。这些干旱之年人类生命损失多少，文明的行为准则和人的尊严的损失又是怎样呢？ 782

在乌干达北部，发生旱灾和饥荒的整个阶段被称为“尼亚鲁班加”(Nyarubanga，卢奥语“神降”)，因为这是他们记忆中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阶段于1617至1621年的大饥荒之后结束，饥荒的同时是一场使畜群灭绝的瘟疫。

大饥荒的僵死幽灵在传说中闪现。埃及的故事令人恐惧。吃人的现象司空见惯，估计有一半人死于饥饿。埃及发生的事或许在大湖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也发生过，特别是北部地区。

半数人死亡，其余的人大都被迫迁徙或逃亡到避难区域，在河畔湖边，沿着尼罗河维

⑨ J.P.克拉索拉拉，1950-1954年，第180-183页；R.J.奥卡马里(Okamali)，1970年；A.W.索撒尔(Southall)，1954年；R.S.阿尼瓦尔，1954年；A.马兰德拉，1947/1971年。一个类似的班图人传说是尼亚卡图拉的《阿巴卡马》中关于布库库人的传说。

⑩ 此处我们采用J.M.奥尼扬戈-卡-奥东戈等人1976年著作中提供的卢奥人传说。这部重要的传说主要涉及卢奥人的早期历史，值得给予更大的关注。它对卢奥人的口头传说作了有益的纠正，这些卢奥人传说一直记述到近期，主要涉及西部卢奥人。

多利亚湖和一连串向南延伸到中部非洲的湖泊周围都有人群聚集。现在已收集到 12 个关于这一时期迁徙的重要传说，大都是回忆向大河大湖急速迁移的。有些迁徙是按军事方式组织的，比如恩肯达人侵入苏库马人地域，穿过巴尔地区的“罗穆库迪特”迁移，以及巴尼奥罗人至少达到布津加的南侵。传说还讲叙了艾尔伯特尼罗河、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及史密斯湾的干涸，这肯定意味着尼安扎湖的大幅度缩小。

“尼亚鲁班加”调整了大湖地区大部、或许是更大区域的民族和政治地理。它可能广泛而毁灭性地打击了按照控制超自然力的原则建立起来的首领制，特别是打击了自称拥有求雨能力的首领。它导致产生了往往以迁移行动的首领为基础的新首领制，这些迁徙首领作为指挥、斗士、猎手所掌握的技能对于庞大的生存者集团极为重要。这场冲击结束后，幸存者的首领在新地区建立起新的政治实体，可能是在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区域。充其量是在当地没有政治首领的地方。并非是这些新定居者的后裔想要占有这些传说无人居住的土地。有些区域可能就是无人或近乎无人。

移民遇到有人时，就说他们是猎人，这不足为奇，新定居者的首领本人也是猎手，这也不足为奇。动物也迁到了避难区，聚集在长年有水的水洼周围。最后一点不足为奇的是，传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 1600 年前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大多数族群经历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合，新的定位和新的首领制。正是因为 1600 年前的传说是梗概的、模糊的，历史学家不应认为这些传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情形，因为“尼亚鲁班加”消灭了口头传说，摧毁了传说的传播途径，可能还消灭了大多数作为传说传递者的老人。作为大湖地区被记住的历史中最严重的气候灾害，它驱动了迅速移动的移民潮，打破了邦国，甚至动摇了可以进行正常调节以应付持久干旱气候的畜牧业社会的基础。[11]

783

在“尼亚鲁班加”时期，人们迁出巴尔的速度大大加快。马迪奥佩人、帕拉贝克人、帕迪贝人迁移到阿戈罗；艾提亚克人、科克-帕加克人、阿利巴人、拉罗皮人、帕拉邦戈人、阿莱罗人、帕拉鲁人在涌入帕夸奇-帕韦尔的马迪人之列。讲东尼洛特语的部落南迁到科罗贝山和利鲁山，那里的一些统治家族自称是贾基、贾基之子和追随者的后代。其中包括尼昂基利亚、奥布莱、米底亚(均讲卡夸语)、叶迈莱、帕兰加(讲马迪语)等首领家族。有一个族群迁到尼罗河以东，造成了一个讲东尼洛特语的地带，将马迪-莫约人和梅塔人与后来称为卢格巴拉人的南部马迪人分隔开来。

也就是在此阶段，帕夸奇-帕韦尔被誉为主要的卢奥人发散中心。由于讲卢奥语的人在巴比托人控制布尼奥罗-基塔拉之前就一直生活在这一区域，同时他们一直是巴比托人坚定的支持者，巴比托人自然关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是重要的，因为这一区域还吸引了来自北方的非卢奥族移民，巴比托人希望控制这些人。巴比托人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可能集中体现在奥穆卡马·克瓦·尼亚邦戈和达喀的传说中。

在“尼亚鲁班加”即将发生的某个时刻，克瓦集合了军队，渡过了维多利亚尼罗河(可能使用漂浮植物做浮桥，这可能就是低水位的标志)去作战，杀死了这一地区重要的非卢奥人政体科克-帕加克的马迪人国王。后来，好像是克瓦任命了一直生活在基塔拉的另

---

[11] 关于这次旱灾的证据，见 J.B. 韦伯斯特，1976 年 b。

一位马迪人阿伯克来统治科克-帕加克，由克瓦的一位叫达喀的帕罗族王后加以监督。实行这一政策，他显然不仅是要制服惹麻烦的邻邦，因为以女性王室成员作为一种间接统治的代表显然是早期巴比托王朝治理边缘地带的特点。虽然这一政策一般都成功，但这一次他失败了，因为原先马迪首领的三个儿子成功地摆脱了控制，建立了帕加克、帕布和帕吾尔三个国家。不过这一政策的影响仍是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克瓦及其代表在"尼亚鲁班加"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上发挥作用。

看来很明确，旱灾将帕夸奇-帕韦尔变成了讲各种语言和属于各种文化的绝望、饥饿的人们的混合避难区——其中包括来自泰基迪的奥韦尼-卢奥人、奥莫洛人和帕罗的土著人，还有来自巴尔的卢奥-马迪人、马迪-东尼洛特人、卢奥-东尼洛特人等混合群体。这些人涌人显然破坏了尼罗河以北帕罗人的地位，使得由谁来控制卢奥人和其他族群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这反过来又最终导致了克瓦·尼亚邦戈(及其代表)与尼皮尔之间的争执。这一争端在矛与珠的传说中有详细叙述。如果我们把大象看做是马迪人(阿伯克崇拜大象图腾),把"明列克"(Min Lyec)[12]看做是达喀，那这一传说就表明了后者是怎样养成了尼皮尔的野心。尼皮尔和蒂佛尔(可能具有巴尔卢奥人血统)的追随者基本是奥韦尼-卢奥人和奥莫洛-卢奥人，他们迁到尼罗河以西克瓦的管辖范围之外，尼皮尔按照传统将斧子插进干涸的河床，作为永久分离的标志。尼皮尔这位艾提亚克领袖，建立了奥科罗蒂佛尔的阿卢尔王国，这个国家又分裂成尼干达和安加尔。奥韦尼人的主体显然经基奥加湖北岸向东南迁移，进入了布索加东部布多拉人的营地。奥莫洛人的迁移更有争议，可能是前往阿戈罗，从那里又取道卡拉莫贾去了同一地区。 785

按照乔南人的传说，剩下的卢奥人在达喀的率领下，废黜了阿伯克，科克国一分为三。第一个是达喀与克瓦·尼亚邦戈所生之子库阿领导的科克拉格姆国，它成了尼罗河以西乔南人诸国中最大的一个。第二个是尼罗河以东的科克拉邦戈国，由达喀与阿伯克之子卡拉杜阿创建。第三个是马迪人领导的科克帕罗国，处在帕韦尔的势力范围内，由穆尼奥罗王室一位女性监管。[13] 或许卡凯莱就是在这次分裂中出现，在17世纪后半期率领基奥加湖以南的帕科约人迁移到布索加北部。

卢格巴拉人泰雷戈酋邦的卢奥人建国者可能也是在帕夸奇-帕韦尔产生的扩散中显现出来的。巴纳勒与侄子拉欧莱两手空空来到尼罗河东岸马迪人的地域。巴纳勒被家里驱逐出来，因为饥荒已迫使他像同时期众多的人一样去吃人了。他得到一位患麻风病的马迪妇女的帮助。当他们的秘密关系被发现时，一个马迪人长者委员会出乎意料地接纳他为首领，于是建立了泰雷戈，这是卢格巴拉人或南部马迪人中最大的酋邦。贾基与其雄心勃勃的儿子们这时正将自己的统治扩大到邻近的马迪人地区，可能马迪人长老们宁愿接纳巴纳勒，也不愿被同化到讲东尼洛特语的贾基族群中去。[14] 他们以自己的决定保存了自己的语

[12] Min Lyec 意为"大象女王"。这一部分根据 R.A. 萨金特(Sargent)，1979 年。另见 A. 阿佩库(Apecu)，1972 年。鉴于矛与珠的传说具体内容已经常发表且又广为人知，此处省略。

[13] 此处采用萨金特的解释。他的解释尽管有争议，但却是有启发作用的，它将迄今一直互无关联而且分别处理的马迪人、巴尼奥罗人和卢奥人传说中的一些事件联系了起来。

[14] 见 O.J.E. 希罗亚(Shiroya)，尚未发表(a)和(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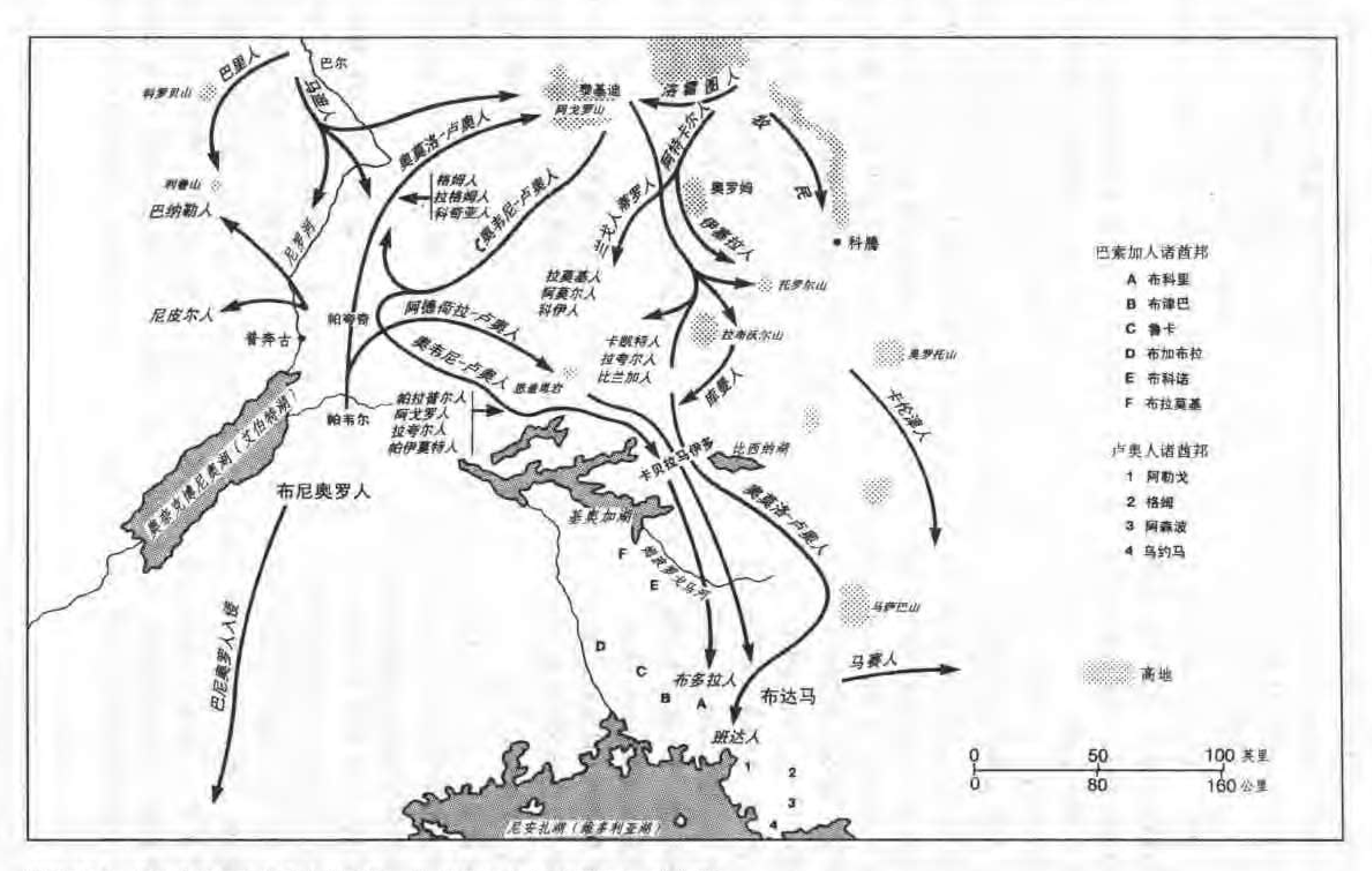


插图 26.1　尼亚鲁班加和卢奥人的分裂，约1570-1720年（仿照J.B.韦伯图）

言，也从根本上保持了马迪的文化属性。

“尼亚鲁班加”与发生在普奔古的矛与珠的人口扩散驱动了三股卢奥人向尼安扎湖东南岸迁移，那是由肯尼亚西部乔卡乔克等讲卢奥语的族群开拓的地区。许多阿德荷拉人氏 **786** 族离开了帕夸奇-帕韦尔，赶上了在卡贝拉马伊多的奥韦尼人。其中一位领袖是阿莫尔，阿莫尔氏族后来在帕德荷拉兴起，他们有一只王室的鼓，一枝圣矛，一尊南非林羚图腾。在帕德荷拉聚居地的其他著名氏族有拉莫基人(可能是早期乔卡乔克聚居地的一支)、布沃伯人及其亲缘氏族科伊人。后者与(阿乔利的)布沃伯人第二个国王奥卢姆·帕尼亚有关，奥卢姆·帕尼亚率领他们来到恩盖塔岩，科伊氏在那里与布沃伯族群主体分开，加入阿德荷拉人向东南方向的跋涉。阿德荷拉族群和奥韦尼族群迅速南移，在布索加东部的布多拉扎营。另一个氏族群——格姆人、拉格姆人、科奇亚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奥莫洛族群，但从根本上讲属卢奥-苏丹人血统。他们被领出了帕夸奇-帕韦尔，沿着尼罗河向北，再向东到泰基迪，往南经奥图克向埃尔贡山迁移。可能卡凯特人、拉夸尔人、比兰加人都加入了东部的奥莫洛人聚居地。比兰加人可能是普兰加王室氏族的分支，因为二者都有重要的专司祭祀典仪之人来执行女土神的圣言。[15] 因此卢奥人移民在乌干达东部逐渐聚集起来，以后可能与到达的“尼亚鲁班加”难民合并，组成两个独立的族群。

到1600年，早期定居和迁移的氏族汇合在一起，至少组成了四个族群：在班达人营地的奥莫洛人族群；在布多拉人营地的奥韦尼-阿德荷拉人族群；在西布达马丛林中的一些未来的阿德荷拉人氏族(拉莫基和拉夸尔)；北部的姆波罗戈马河上若干未来的巴索加氏族。大约在1598和1650年间，布多拉人营地和班达人营地分裂，据猜测可能是受到17世纪20年代“尼亚鲁班加”将要结束时严重旱灾的影响。奥韦尼人经过萨米亚-布格韦迁移到肯尼亚西部希阿亚区的阿勒戈地区。一部分奥莫洛人跟着迁移，于是两个族群发生了冲突。阿德荷拉的几个氏族最后离开布多拉人营地，加入到在西布达马的自己的兄弟队伍中去。

那些在肯尼亚西部保持了自己卢奥人语言的氏族中，有些建立了酋邦(例如阿勒戈、格姆、卡迪莫)。他们建立酋邦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们的政治发展较早，部分原因则是他们需要某种政治结构来调节对较早定居的班图人进行同化的进程，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相互交战或与邻近氏族作战。不过，大多数氏族还是像帕德荷拉人那样，他们在未被占领的地区定居，对无首领的政治制度感到满足，这一制度在31个氏族间保持了和平状态。民族联合是由一个神话促成的，即所有的氏族都是由阿德荷拉的子孙后代繁衍而来的，阿德荷拉是率领他们从卡贝拉马伊多到西布达马的伟大迁移首领。[16] 因此，尽管他们中间包括了 **787** 像阿莫尔人那样的族群，拥有王权的标志，可以声称有王族先祖，但帕德荷拉人还是选择不要首领的制度。

帕德荷拉人逐渐开拓了他们原有居住地以南和以东的地区。他们同巴吉苏人发生了冲突，以后又与之缔结了持久的和平。大约在1650年后，他们又与托罗罗地区的马赛人交

---

⑮ 见J.M.奥尼杨戈-卡-奥东戈等人，1976年；R.S.阿尼瓦尔，1959年(1969年)；B.A.奥戈特(Ogot)，1967年。
⑯ 见B.A.奥戈特，1967年。

战。马赛人向东撤退，托罗罗保护着无人土地的状态，直到伊特索人18世纪后期开始在那里定居。

奥韦尼和奥莫洛两个聚居地的八个氏族迁出了布多拉人营地，进入布索加。[17] 他们都崇拜南非林羚图腾，都有游牧和狩猎传说，尽管奥韦尼族群还有农耕的传说。具有奥韦尼血缘的族群有穆多拉人、恩戈比人、纳敏哈人、基比加人。具有奥莫洛血缘的有班德哈人、瓦科里人、基鲁吉人、基兰达人。所有的奥韦尼人和奥莫洛人的瓦科里氏族都成了布索加地区的统治氏族。穆多拉氏族最先在布科里取得权力。穆多拉人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姆卡马的人，他越过北布索加向西迁移，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他的恩戈比氏族的儿孙们建立了鲁卡、布津巴、布扎亚、布加布拉几个酋邦。源于姆波罗戈马北部卢奥人定居点的第二股移民流建立了布希基、布科诺、布拉莫基几个酋邦。奥莫洛人游牧性强，不愿定居，他们只有一个氏族占了统治地位。

接着是帕科约人迁出基奥加湖以南帕韦尔地区，他们建立了巴格维里和布加亚酋邦。为寻求民族统一意识，巴索加人打算使姆卡马成为所有这些迁移群体的领袖，为他做了帕德荷拉传说中为阿德荷拉所做的一切。通过与外族通婚以及使用或夺取成为祭典仪式和王室朝拜中心的主要神龛，卢奥人迁徙群聚集了众多依附者。卡奥人所到之处，都乐于使自己适应既存的祭典和宗教体制：精神方面的适应能力是他们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财富。

至1750年，上述九个重要国家都已建立。到19世纪末，这最初的九国已分裂成近30个国家，恩戈比氏族即南非林羚氏族大约在20个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那些保持了父子继承方式、广泛使用平民行政官员的国家，如鲁卡和布加布拉，都没有经历氏族分离，极少发生内战。另一方面，那些实行兄弟相袭、以王室子弟充任官职的国家则遭受到不断的王位之争和多次内战的折磨。布津巴分裂为八个独立的国家，布希基和布格维里各一分为四，布科里分为两国。布尼奥罗和布干达都经历了两种统治方式，结果相似。那些坚持了原有卢奥人原则的王朝比那些改用其班图臣民所奉行的继承原则的王朝更为稳固。

788 “尼亚鲁班加”及与其相关的矛与珠人口扩散是卢奥人重要的历史性时机，因为它确定了卢奥人的近代地理分布。“尼亚鲁班加”还促使巴尼奥罗人大举侵入巴希马-巴图西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方，并促使农业阶级用最大的努力去摆脱畜牧者的统治地位。入侵的第一阶段是无组织的大群饥民构成的，他们吃的是香蕉叶和蜀黍秸秆。他们显然并不是在推进基塔拉王宫制定的帝国政策。这些人群在饥饿的逼迫下席卷了整个南部地区，有些人最终在布津扎、布隆迪以致更远的地方定居。他们接着又驱动了迁徙群沿着一系列湖泊进入中非。

由于旱灾持续发生，一场牲畜瘟疫使基塔拉王室的畜群全部死亡。克瓦二世(不是克瓦·尼亚邦戈)因此率领其军队南进，以补充王室的畜群，并加强帝国的权威。畜牧民是巴尼奥罗人的显著目标，农民则是克瓦的天然盟友。随后的斗争将在下面涉及南方的农牧业王国的部分中讨论。

---

[17] 见D.W.科恩(Cohen)，1972年。

"尼亚鲁班加"还把东尼洛特人的中部族群带进了大湖区的历史舞台。[18] 这一族群的核心人口是卡里莫琼-特索群体，这一族群在历史上分裂为伊塞拉(拥有一些牲畜的农民)和科腾牧民(从事一定农业生产的养畜人)。尽管伊塞拉和牧民成份在东尼洛特人中部族群的所有民族中均有，但那些主要产生于前者、其语言又相近的民族是伊特索人、托波萨人、多多斯人，产生于后者的民族是卡里莫琼人、杰人、图尔卡纳人。

此外，所有现代东尼洛特人的中部族群都含有卢奥人的成份。历史学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释，在关于兰戈-奥米罗人、东阿乔利人、库曼人、伊特索人的氏族名称、年龄和祭祀组织、故乡、迁徙的传说都近乎一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到1830年时前三个族群讲卢奥语，而最后一个讲东尼洛特语。第二个问题围绕着三个讲卢奥语的小族群——乔阿伯沃人、乔阿夸人、库曼人——他们在文化上与东尼洛特人的中部族群相似，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因为历史学家期待他们的历史能解开兰戈-奥米罗人和伊特索人的谜。第三个难题是尼扬基亚族群——尼扬基亚人、特佩斯人(索尔人)、图索人、迪丁加人——他们都生活在乌干达东北部山区。就氏族来源而言，他们大概90%属于中部东尼洛特人或卢奥人，然而这些人又保持着一种极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奥卡罗沃克人(伊卡莱雷布沃克人)是东尼洛特人中部族群的重要氏族。如前所述，该 789 氏族是在洛图霍人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强加给一些穆鲁人即卢科亚人时，在阿戈罗地区出现的。阿戈罗是伊塞拉-奥米罗人的主要扩散中心。移民所到之处都带去了他们阿戈罗故乡的地名以示纪念，如马戈罗、穆孔戈罗、伊腾戈、恩戈拉、伯科拉和伊戈里亚。

卢奥人与奥韦尼人及奥莫洛人联系在一起向东南方大迁徙，在相当程度上与伊塞拉人混杂在一起，尤其是那些横跨阿戈罗-卡拉莫贾走廊移向南方的奥莫洛人。在以后成为兰戈-奥米罗人的国土上，在基奥加湖北岸地区的阿马克，在卡鲁马瀑布附近，奥韦尼人留下了一块块讲卢奥语的孤立地区。该民族的许多人最终归属于奥莫洛人，他们或许都有东尼洛特人的背景。那些到达肯尼亚西部的人被卢奥人称为奥米亚人，罗米亚人是洛图霍人四大氏族之一，奥米亚阿尼马和奥米亚帕夸是他们在东阿乔利的纪念名称。到达希阿亚的最后一批定居者还包括一些来自乌干达东部的移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奥维拉(乌约马的统治氏族)、马塔尔(萨夸的统治氏族)、巴尤马(万加的统治氏族)，他们可能都是伊塞拉-奥米罗人，原是具有埃塞俄比亚血缘的巴科人。

除了中部苏丹各族和东尼洛特人的北部族群外，伊塞拉人还包含具有卢奥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血统的氏族。除了奥韦尼人和奥莫洛人留下的卢奥人外，还有属于泰基迪的普兰加人幸存者。这些族群因移民而加强，这些移民可以追溯到安尼瓦或帕里，追溯到巴尔以及帕夸奇-帕韦尔。最重要的帕夸奇-帕韦尔族群是帕蒂科人、帕也拉人、帕罗人(将在下面谈到)。此外，某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或许是作为奥罗莫人入侵的结果而进入这

[18] J.E. 兰菲尔，尚未发表；R.S. 赫林，1978年；J.B. 韦伯斯特等人，1973年；J.P. 克拉索拉拉，1960年；R. 奥格瓦尔(Ogwal)，1969年；J.A. 奥蒂马(Otima)，尚未发表；D.H. 奥卡拉尼(Okalany)，尚未发表；P. 奥迪奥莫(Odyomo)，尚未发表；J. 韦瑟比(Weatherby)，1979年及尚未发表(a)和(b)。

一地区的。[19]

在17和18世纪，这些移民族群在一起定居，形成了按其居住地域、有时以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来加以确定的族群。其中最大的是中部杰人的巴科族群，在中部卡拉莫贾的莫罗托山-奥马尼马尼河地区的奥基(或米罗)族群，拉布沃尔山区的阿伯沃族群，西部特索的库曼族群，(我们叫得出的)中部和南部卡拉莫贾的伊沃罗波姆-伊特索族群。所有这些族群都既包括卢奥人，也包括东尼洛特人的中部族群，但比例上差别很大，到18世纪时，双语制已很普遍。伊沃罗波姆-伊特索族群很独特，它似乎集聚力最低：其民众讲中尼洛特语和(或)卡伦津一类的语言，其伊沃罗波姆族成员拥有大群牲畜。

790 牧民与农民

对大湖地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习惯于将社会划分为牧民和农民这两个互不相干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被认为是该地区所有社会组织均可划入其中的明确的经济范畴。因此一直试图将一定的民族与特定的经济行业等同起来。这就使处在极为复杂、动态、易变情况下的事物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在乌干达北部和东部，农民与牧民的关系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一直在演变。所有群体——农民、牧民、混合经营的农民、渔民、猎人、采集人——都作了多种尝试，以改善其经济，组成稳定的团体，在他们选择迁徙或被迫迁徙时，合理地安排其行动。这种人口流动和其他社会变动将一些社会政治、宗教、经济的观念和行为往往差异极大的族群推到了一起。结果，假如人们希望组成稳定的社会，他们就不得不混合起来，并在文化遗产方面相互妥协。在我们讨论的整个时期，不同语族的农民和牧民不断融合，以构成经过合理整合的新的社会组织。这些文化上的结合体大都构成了18和19世纪这一区域产生的新民族的基础。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社会转变的本质。

尽管有几个从事畜牧业的中-东部尼洛特族群可能在早期就加入了伊塞拉人，[20] 其他族群(洛科里基塔克人)在从苏丹迁徙过程中留在了多多斯，但多数族群却在卡拉莫贾东北部地区的科藤山-马高斯山地区定居下来。这些科滕-马高斯人(他们一直被这样称呼)显然在他们南迁以前就已有从事畜牧业的倾向了。因此，尽管他们进入卡拉莫贾时是没有多少牲畜的难民，但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包括畜牧、农耕、狩猎、采集的混合经济，这比注重农业的族群在经济上更适应该地区的气候。这种适应性的结果在1680至1830年间明显起来，当时科滕-马高斯族群迁到了他们近代的家园，那些农业族群不是加入其中并采用他们的经济方式，就是向西退却。

这一进程大约始于1680至1750年牧民向四个方向扩张的时期：其中之一是恩吉莫尼亚人，沿着塔拉施河扩散，形成了图尔卡纳人的核心；另一个是科瓦科尔人，向西迁移到

⑲ 我们相信，这些“埃塞俄比亚”移民可能包括了在兰戈的巴科族群(参见埃塞俄比亚的巴科人)、兰戈的奥贝尔人(参见巴科人中的乌奥贝尔氏族)和奥罗莫人，“埃塞埃比亚人”是所谓的加拉人的正式名称。没有什么传说明确地将这些族群同埃塞俄比亚联系起来，因此必须将我们的联系看做是一种尝试性的假设。

⑳ 见R.S.赫林，1974年。

隆基罗河，迫使许多巴科族群离开杰，从而成为杰人中最重要的分支；第三个族群由一些后来的卡里莫琼人和多多斯人构成，向南迁移到阿普莱河；第四个是恩基科拉人，向北迁移到多多斯(他们在那里构成了托波萨人的核心)。这一进程的最后几个阶段可能受到18 **791** 世纪20年代旱灾的影响，旱灾导致了“尼扬代莱”饥荒，因为农耕者的传说表明，他们中许多人由于饥荒离开了杰和拉布沃尔，迁往阿乔利东部和兰戈的恩盖塔岩地区。在阿乔利东部的一些族群以后又原路返回，在杰的北-中部地区重新定居下来，最终在那里加人科瓦科尔人，成为杰人中的伦根人支系。

随后的局势一度稳定下来，但一些以牧业为主的地区上地压力与18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的旱灾结合起来再次造成了迁移。拉布沃尔地区的阿伯沃人和巴科人族群大多向西推进到兰戈地区，有少数几个族群向南推进，迁进特索(有些族群在那里加入了库曼族群)。同样，许多奥基族群的人离开了卡拉莫贾中部，迁往尼亚夸伊、拉布沃尔、兰戈、特索北部，而卡拉莫贾南部的许多农业族群则经马戈罗地区进人特索中部和南部。[21]从两地迁来的其他人加入了索尔人。迁进尼亚夸伊、拉布沃尔、阿乔利东部、兰戈的族群大都至少讲卢奥语中的两种方言，而且，由于他们都加入或接纳了从更远的西方迁来的讲卢奥语的人群，因而形成了讲卢奥语的社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加入库曼人的群体。[22] 不过，到特索的人中讲卢奥语的人较少，伊特索人因而成了一个讲东尼洛特语的民族。

这一农业难民的西进潮流，特别是在后期，因为再次兴起的牧民扩张而加快。在18世纪80年代，阿普莱河上的早期多多斯人北移进人多多斯地区，他们与洛科里基塔克人联合起来，迫使那里的托波萨人社群向北迁到他们现今的家园。多多斯人和托波萨人牧民都同化了一些伊塞拉人族群，因而采纳了一种比他们的南部兄弟更倾向农业的经济。此后在19世纪20年代，科瓦科尔人和伦根-杰人联合起来，消灭了生活在卡波埃塔河上的农业大群体波埃特人。最后，在同一阶段，生活在阿普莱河上的早期卡里莫琼人向南推进到奥基人和伊特索-伊沃罗波姆人族群残部的家园，不是将他们吸纳进自己的社会，就是迫使他们离去。就伊沃罗波姆人而言，因此而大量使用暴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畜群，并成为科滕-乌高斯族群的直接竞争者。不论是哪个例子，这些发展和19世纪30年代的旱灾均导致这一区域最后一次大规模西迁。

布尼奥罗-基塔拉人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了牧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爱德华·I. **792** 斯坦哈特的研究强调了“基塔拉及其南部边界地区旱灾/饥荒与畜牧业扩大、农业混乱与国家形成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23] 布尼奥罗在库基、布韦拉、基塔拉南部边界地区的宝贵牧场在1760至1783年间被布干达夺去。此外，恩科雷、布赫维朱、布津巴畜

---

[21] 根据传说，“卡里莫琼”(Karimojong)意思是“留下的老人”，他们担心青年人死了，就对传递口信的人说，“为他们寻找墓地(atesin)”，由此产生了“特索”(Teso)一词。尽管多数同龄组是以动物命名，但“康加拉克”(Kangarak)的意思是“走在前面的人”。

[22] J.E. 艾卡杜(Ekadu)，1961年和1971年。关于分析，见A.B. 埃鲁(Eilu)，1976年；D.H. 奥卡拉尼，尚未发表；J.B. 韦伯斯特，尚未发表(a)。

[23] E.I. 斯坦哈特(Steinhart)，1981年，第132页。

牧业社会不断加强自治，进一步将布尼奥罗国限制在大体是农业的地带内。结果，基塔拉牧民既渗入了比托王朝，也渗入了农业地带。牧民在农民中定居，与他们融合，形成新的复合群体。一个新的阶级体系由此产生，以此体系为基础的新国家结构也逐渐形成。土地而不是畜群成为政治权威的基础，新的首领制上层人物也从定居下来的巴胡马人、比托氏族成员和拜鲁农民中得到充实。这三个族群普遍相互通婚，他们中有酋长也有地主，他们从臣民那里为"奥穆卡马"（omukama，国王）搜集贡物。用斯坦哈特的话说，这样，一个新的尼奥罗国家，"以处于从属地位的进贡农民阶层的发展为基础"，在18世纪逐渐产生。[24]

社会制度和政治机构

区分牧民与伊塞拉族群并将他们与讲卢奥语的民族区分开来的并不仅仅是语言和经济。牧民完善了他们的同龄人组织，以此作为老人控制的工具，并成为他们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同龄人组织在伊塞拉人和受伊塞拉人影响的社会中也存在，但却处于被截断状态。在这后两种社会里，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多氏族的祭祀组织——在兰戈称为"埃托戈"（etogo），在拉布沃尔称为"奥滕姆"（otheme，单数为othen），在特索和库曼称为"伊泰姆旺"（itemwan，单数为etem）——用以解决争端，举行宗教仪式。这些氏族集团的来源越混杂，这些制度就越强大。[25]

在尼罗河-基奥加湖-比西纳湖分水岭以北的民族文化混合过程中，世袭酋长制是一种卢奥人的思想。因为大多数东部卢奥人不是具有东尼洛特人的血缘就是已受到东尼洛特人思想的强烈影响，所以这种世袭首领制为许多人所拒绝，并遭到长者反对。然而，它不仅对于讲卢奥语的许多族群的政治机构产生影响，而且对某些伊塞拉族群也有影响，并通过这些族群的影响，对诸如杰人和多多斯人等族群发挥作用。在讲卢奥语的人中，追随酋长的人往往迁往阿乔利东部，在1680和1760年间一些帕罗人族群到达阿乔利时，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加强。然而，即使在那时，东部阿乔利人仍然明显与众不同，致使西部卢奥民族到19世纪后半期一直把他们看做是兰戈人而不是卢奥人。在拉布沃尔、兰戈、尼亚夸伊、库曼，人们普遍拒绝世袭酋长制思想而赞成老人祭祀首领制。

这并不是说，这些族群任何时候都不信任拥有相当大世俗权威的个人首领。口头传说给人的印象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东部卢奥人和中-东尼洛特人间的战事剧增。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军事领导人及其委员会的影响，提高年轻一代的影响而牺牲老人统治，青年和老年成了这些按年龄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的一条潜在分界线。这样，在兰戈，强有力的军事首领结成了广泛的军事联盟，用以征服国土，攻击邻国，建立庞大的雇佣军，在布尼奥罗、托罗、布干达作战。在特索北部、塞贝（埃尔贡山）、库曼、帕德荷拉也结成了类似的联盟，但在这些地区，首领是"埃穆隆"（emuron，预言家），其作用似乎是从卡伦津

[24] 同上，第135页。
[25] 关于杰人的同龄人组织，见J.E.兰非尔，1979年。关于"埃特姆"（etem），见D.H.奥卡拉尼，尚未发表。

民族学来的，可能通过了伊沃罗波姆人的中介。由于军事首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但谁也不能为自己的家族获取酋长地位。因此，埃穆隆制度就创立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既向军事委员会也向老人统治制度提出了挑战，但并未很快与酋长制结合起来。

伊特索人在"牛腿"上定居了，这是恩戈拉、库米和由此向外开拓的地区——塞莱莱、索罗蒂南部——一块异常肥沃的区域，与伊塞拉人发源地极为相似。他们没有同龄人组织，没有仪式组织埃特姆(etem)，也没有埃穆隆。他们依赖三个重要的同化氏族——阿泰科克人、伊卡雷布沃克人和伊拉拉克人作为社会集聚力的载体。北方的伊特索人以及在布克代阿的伊特索人拥有上述的所有机构，其来源要混杂得多。在他们中间，迁移往往是由埃特姆组织的，特索西部被三个氏族占领，其中之一伊索拉塔氏族，用自己的名称命名索罗蒂。许多伊特索人渗入南面的班图人和卢奥人地区，他们是为寻找土地或是作为雇佣兵而去的。雇佣兵在某些布索加国家特别受欢迎，被看做是抗衡来自布干达军事和政治压力的力量。例如在布格韦莱，由伊拉拉克氏族的拉基率领的首批伊特索移民在1706年至1733年定居下来，逐渐富裕，还招纳依附者。拉基的儿子分裂了这个王国，在拉帕拉纳特饥荒后成了其中一部分的首领。[25] 在布拉莫基，一个埃泰索特人实行了短暂的统治。可能最大的雇佣军就是埃泰索特人，帕德荷拉人中的奥古蒂人。

在中部地区，布干达与布尼奥罗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布干达没有王家氏族或王家畜群，却有国王，他可以也确实经常不顾及习俗、传统或世袭制度而任命官员。到19世纪初，布干达几乎没有形成阶级制度，但形成了特有的垂直升迁制度，社会不平等现象比布尼奥罗严重，比卢旺达的程度轻。布干达每个人都处于支配与从属的二分关系中。社会和经济关系是垂直的而不是横向的。 794

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布尼奥罗-基塔拉处于中间状态。在北部尼洛特人看来，它专横，有阶级压迫，而在布干达人看来，它就显得组织松散并具有阶级意识。王室的巴比托氏族最初是混合型的农民群体，但王朝却具有越来越强的牧业趋向。不过，非王族支系的比托氏族在我们所讨论的时代却成了基塔拉最大、扩散最广的氏族群，存在于所有的经济层中。许多人没有财富或权力，却维持着属于统治氏族的神话。这些属于平民的比托氏族与其他社会和亲缘集团普遍通婚，因而有助于为王朝造成一个同一民族的印象。

此外，委任其他社会阶层和亲缘集团的代表担任各种宫廷和国家职务，也有助于造成这一同一民族的印象。这些职务逐渐变为世袭，由此造成永久性的特权阶层，他们的财富和志向与比托王朝的财富和前途联系在一起。

布尼奥罗的穆卡马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富比布干达的卡巴卡要少得多。卡巴卡比穆卡马保留下的财富多，而穆卡马则强调由宫廷来对财富和剩余物品进行再分配。在布尼奥罗，权力较为分散，大多数职务保持世袭，穆卡马仅仅对选出的人加以批准，结果，没有几个农民得到高官。布尼奥罗诸氏族没有布干达的那种聚集力，他们的首领也没有布干达首领的那种地位。在布干达，虽然30个部落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实际上他们的地位按其政治

[25] R.R.阿特金森(Atkinson)，在印制中。关于帕德荷拉的伊特索人，见B.A.奥戈特，1967年。

命运而起落；但在布尼奥罗，地位高和地位低的氏族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在尼洛特卢奥人中，有些已组成国家，有些则处于集中统治之外。国家结构不如布尼奥罗或布干达那样复杂，卢奥人国王发挥影响，但几乎没有实权。为官者差不多完全世袭，国王无力干涉家族或氏族选择的候选人。这些差别是地理、经济、历史发展和文化倾向造成的结果。尽管有些王族世系可回溯许多世纪，与现代南方和西方的许多王族一样古老，但大多数卢奥人国家产生都较晚。另外，一再出现的旱灾造成许多社会迁徙、重新定居、重新组合，使得许多卢奥人国家在大约1680年甚至更晚的年代才处于今日的位置，拥有今日的人口数量。实际上，这些旱灾也严重影响了西南部，但并没有造成像乌干达北部那样的国家有形移动，在乌干达北部，帕迪贝是最古老、19世纪时最成熟的卢奥人国家之一，它最终的位置距原先创建地点有500多英里。

此外，没有一个卢奥人国家享用布干达、卢旺达或巴希马诸国肥沃的农业基地。他们也未占有布尼奥罗或布松戈拉地区富饶的铁矿、盐矿。在"尼亚鲁班加"之前，卢奥人很可能已拥有大量的畜群。然而，大约到1800年，畜群被毁，阿乔利人可能是大湖地区饲养牲畜的民族中饲养量最低的一个。没有牲畜，没有肥沃的农田，也没有商贸项目，就难以积聚并保持剩余财富。结果，卢奥人各国显示不出那种使西南诸国享有声誉的财富和阶级意识方面的差别。在所有卢奥人国家中，东尼洛特人是有影响力的，从西到东都较为突出，后来他们在阿乔利东部诸国中成为多数。东尼洛特人在政治和社会观念上极端平等。要使他们转而接受酋长制、支配与服从、阶级与世袭的思想肯定是困难的。越往东走，卢奥人的国王显得越发像东尼洛特人长老委员会的主席和发言人。

在卢奥人诸国，关于阶级的看法和19世纪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这种看法可能代表"尼亚鲁班加"之前更为古老的实际情况，当时卢奥人因拥有畜群而闻名。这种看法是，卢奥人社会分为王族和平民阶级。在1800年左右以血缘为基础的差别变得更为重要，即卢奥人祖先的血缘和非卢奥人祖先的血缘。王族往往与卢奥人等同，而非卢奥人则是平民。王族通常是最大的。除了属于王族世系的人以外，王族成员资格只给予少数显赫人物。按一般想法，非卢奥人平民通常按其祖先进入卢奥人社会并成为卢奥人的时间早晚来划分等级。然而，从首领家系中分离出来已有十代的王族成员不会受到什么差别对待，不会比十代之前加入这一社会的外族人控制更多的财富。在阿乔利诸国中，王族与外族通婚，外族人被迅速同化。

考察卢奥人诸国的阶级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途径。在数百年的政治妥协中，许多非卢奥人氏族最终拥有了职位，或行使祭祀职能，担当此职者的家族比王族的威望(有时是贡奉)还高。如果说存在上层阶级的话，那便是由国王、国王的顾问、土地所有者、包括唤雨人在内的祭祀职事和"贾高斯"(jagos,领土副首领)等人的核心家庭组成。

不设首领的卢奥人和中-东尼洛特人没有阶级制度，没有酋长，也没有世袭官职。极少在氏族和以命名的方式纪念个人，而这在尼洛特人中已是惯例。人们极少回忆祖父辈以上的先人。氏族很庞大，但家庭几乎都是核心家庭类型。老人统治即由坐镇埃特姆或埃托戈的最老的年龄组来支配，他们作出的决定被确信为得到了祖先的认可。老人统治在大军事联盟中通常是有联系的，在大军事联盟中，杰出的武士首领及其部属要得到埃穆隆及其

副手的承认和支持，埃穆隆及其副手与神灵商讨战争是否可行，主持战事的祭祀准备，为战略出谋划策。埃穆隆常常又是唤雨人。军事首领和祭祀职事一般都相当富裕。在老人统治中，在居统治地位的长老们和年轻的战士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潜在的分裂。长老们对年轻男子实行严密甚至压制性的控制，并垄断妇女和牲畜，延误青年人的婚姻和经济独立。年轻的年龄组有时进行迁徙，以逃避所受的阻碍。[27]

不设首领的卢奥人和东尼洛特人社会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财富差别和经济不平等。例如在特索，一般家庭可能有三至五头牛，有10%的家庭拥有500至1000头。人们或许在埃特姆中更频繁、更专注地听取富有的长老们的意见，但尽管他们的影响比别人大，权力却与别人相同。财富带来了尊敬，引起了慷慨待客的期望，但财富并不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多养育女儿以获取作为彩礼的牲畜、少养育得为之付出彩礼的男孩，做勇士而取得名望和牲畜，做有经验的牧人，都可以升人较高的社会阶层。牲畜通过彩礼的方式进行广泛分配。在西南部，同样的彩礼风俗由于规矩和偏见而受到约束，使相互通婚难以进行，阻碍了拜鲁人和巴胡图人成为牲畜拥有者。

均势的变化：布尼奥罗的衰落与布干达的兴起和扩张

"尼亚鲁班加"之后，大湖地区北部和中部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布尼奥罗的危机，这使其衰落，而布干达的内部发展则促使它生气勃勃地兴起和扩张。这两个发展引起了均势的显著变化。布尼奥罗危机始于"尼亚鲁班加"时期克瓦人侵南方时死亡。克瓦唯一的儿子维尼二世被俘，住在伊汉吉罗。[28] 基塔拉由克瓦的姐姐马香巴进行摄政统治。克瓦没有与卢奥人妻子生育的儿子(指按王室规定有资格继承其地位的儿子)，后来在伊汉吉罗找到的那个男孩可能根本不是他的儿子，但他属于比托氏族。维尼二世谋害了马香巴，夺取了王位。以后，王位继承人的母亲应是卢奥人或帕罗人的旧传统就成为例外而不是规定。王位候选人资格对国王所有的儿子都开放，王位继承之争就变得更加频繁、尖锐和持久。 797

在第一王朝统治下，帕韦尔酋邦在帝国的结构中已占有突出的地位。帝国首都新一轮事件造成了帕韦尔的普遍动荡。被帕罗人称为"班图国王"者连续几任试图以鼓励分裂倾向的办法来解决动乱，于是1650年时帕韦尔统一的下属酋邦到1750年分为六个小酋邦。[29]在伊桑萨统治下，六个小酋邦被置于一个国家首领之下，帕罗兰由此丧失了半自治地位，被结合进宗主国布尼奥罗。帕罗人经常反对班图族王位候选人，而其他帕罗人则因失去政治机遇、丧失地位、受到全面迫害而迁到北部和东部。频繁的王位继承之争加上帕罗人的不满，损害了基塔拉的中央政权。伊桑萨王(约1733-1760年)不顾帕罗人强烈反对而执掌政权。他一上台就对帕罗人进行严酷迫害，加速了帕罗人的外迁。

---

[27] 关于社会分层化的讨论，我们遵循的是M.I.珀尔曼(Perlman)的纲要，1970年；A.W.索撒尔，1970年。

[28] J.B.韦伯斯特，尚未发表(b)。

[29] A.阿代富耶(Adefuye)，1973年、1979年和尚未发表。

布尼奥罗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帕罗-帕科约人大批迁移[30] 到阿乔利、布索加北部、阿卢尔，甚至到大湖以东的帕德荷拉和肯尼亚西部。首次迁徙由拉邦戈、卡凯莱、阿提科率领，前二者自称与巴比托第一王朝王室有亲属关系。他们不是巴尼奥罗帝国主义的代表，但他们确实带去了鼓和巴比托统治的政治思想。他们在未曾生活过的地方建立酋长制、在扩大所拥有地域的政治规模方面都是有影响的。在帕罗人促使其语言在北部传播时，帕科约人却被巴索加社会同化了。

北方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老人统治制或小型酋邦。帕罗人宣传王室的鼓，提高了酋长的尊严，把小单元并入较大的国家中，允许这些他们同时保留自己的世袭首领地位。他们建立新国家，像利拉帕罗和帕伊莫尔，或是扩大并重建一些老国家，像帕迪贝、帕通戈、阿莱罗、科克。普兰加(由帕罗人接管)和传统首领统治下的帕也拉都受到帕罗人理论的鼓动，在扩张进程中合并了一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单元。阿提科受到帕罗人政治意识的极大影响，在东移中扩大了自己原来无足轻重的实体，并成为有一定规模和重要地位的酋邦。尽管阿提科从氏族创建者算起排在第 12 位，但其贡献极其显著，人们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他的国家。那些模仿帕罗人方法的国家往往比帕罗人自己更为成功。在 1800 年阿苏瓦河以西的 20 个酋邦中，只有三个君主是帕罗人，1900 年九个主要的阿乔利酋邦，只有利拉帕罗和普兰加由帕罗人统治。

卢奥化是通过合并、政治分裂和扩散实行的。利拉帕罗是前一种的例子，阿卢尔属后一种。帕罗人进入拉泼诺人地区，劝说一个非卢奥人的长老国、两个卢奥人小酋邦和利拉人大酋邦加入他们之中。在后来一次扩张之后，他们创立了两个王室总督职位。由于进一步扩张受阻，利拉帕罗与邻近的小酋邦组成联邦，小酋邦逐渐变成附庸。随此政治扩张而来的是卢奥人语言文化的普及。

阿卢尔人的发展则不同。在 1680 年以前高原的中部苏丹民族中，只有一个阿卢尔人酋邦奥科罗。卢奥人定居者迁出奥科罗，实行对外通婚，推广卢奥人语言，最后邀请一位奥科罗王子来统治他们。这通常要得到土著民族的支持才能成功，这样做使许多克布人、伦杜人、马迪人置于卢奥人统治之下。阿卢尔人国家增多，潘杜鲁大约建于 1670-1700 年；帕德哈、帕迪亚、帕代尔、阿塞尔帕罗建于 1700 年和 1790 年间；乌塞戈约建于 1820-1850 年。由此形成阿卢尔国家群。[31]

奥穆卡马·伊桑萨对于布尼奥罗的衰落如同卡巴卡马旺达于布干达兴起一样起了关键作用。伊桑萨的统治是军事成功和政治灾难的奇特混合。我们已谈到他的北方政策的错误，他的南方政策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他再次横扫了南方以显示布尼奥罗的军事力量。在征战中，他怂恿王子们在库基、基塔关达、基萨喀的布松戈拉人诸国以及布加亚担任总督职务，并怂恿巴穆利氏族的一名亲信在基扬加任总督。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死后一代人

[30] 关于大批迁移，见 J.B. 韦伯斯特，尚未发表(a)；R.R. 阿特金森，1976 年；A.M. 加里，1976 年和 J.B. 韦伯斯特，1976 年 c。

[31] J.B. 韦伯斯特，尚未发表(a)。

的时间内，除基塔关达以外，其他各地都背叛了帝国。[32] 伊桑萨彻底改变了治理边远地带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为摆脱该王朝王位继承新方针造成的王位竞争者众多的复杂局面还算有效。

伊桑萨最重大的政治失误在于，他进攻了布韦拉的斯维西秘密宗教首领瓦马拉的宫殿。**799** 第一巴比托王朝小心翼翼地培植了与该宗教的关系，这一政策比巴欣达诸国要成功得多。在巴比托人崇拜瓦马拉的同时，巴欣达国未与秘密宗教发生任何关系，尽管其属民也崇拜瓦马拉。估计瓦马拉反对巴比托第二王朝是因为王朝违背了传统的继承规定。国王们反过来则拒绝对瓦马拉宫廷的正常进贡。伊桑萨决定采用军事对抗。这是基塔拉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失误。

这一亵渎行为严重到树木“流血”，瓦马拉诅咒伊桑萨，预言布干达将吞并布尼奥罗。这一诅咒的实施直至进入 20 世纪多年后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伊桑萨的失误不仅涉及布干达，而且涉及整个南部边界地带，在这些地方，布尼奥罗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依赖于斯维西秘密宗教的支持。新的秘密宗教的总部设立在帝国的宫城，但秘密宗教连同巴尼奥罗的权威却在南部边界地带消失了。结果，新诸侯国就像古代的布赫维朱和布津巴附庸国那样轻易放弃对布尼奥罗的效忠。大约 1830 年托罗和帕罗兰分离出去，此时帝国的运气最糟，[33] 不仅瓦马拉的诅咒应验了，布干达真的夺取了布尼奥罗本土的大部分地域，而且一长串南部小国也难以承受孤立。它们成为布干达、恩科雷、姆波罗罗等帝国野心的理想目标。

布干达的兴起

布尼奥罗诸王忙着摧毁已确保其 300 年领先地位的政治体系，而此时巴干达的君王们则在纠正自建国以来一直使布干达缺乏活力的诸多政治弊病。[34] 布干达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所困扰。第一个问题是君主政体力量日益增强，君主国所任用的官僚与氏族首领或巴塔卡酋长相对立，这些氏族利用亲缘关系或假定的亲缘关系强化对氏族效忠，使氏族成为有凝聚力的政治集团。第二个问题是众多野心勃勃的王子，无论有无职位，均待机操纵氏族政治集团以夺取王位。在职位主要通过世袭继承因而改朝换代时不受影响的地方，王位争端不太激烈，有权择立国王的人比较淡漠，易于妥协。但在布干达，新君主对官僚职务分配权的控制意味着，每个身为王子的候选人背后都有一批潜在官职占有者的门客，对他们来说，王位继承之争的结局，要么是官职和威望，要么是被人遗忘甚至被流放。妥协是困难的，因为潜在的官职占有者们不仅寻求个人的升迁，而且寻求他们自认为所代表的氏 **800** 族的权力分配。第三个问题是国王死后和王室发生谋杀后，大都引起有关王位继承的流血之争和战争。布干达王位继承之争比基塔拉的更具破坏力。在基塔拉王位之争也很激烈，

---

[32] A. 惠勒(Wheeler)，尚未发表；E.R. 卡穆汉吉罗，尚未发表；S. 卢旺戈-卢尼戈(Lwango-Lunyiigo)，1972-1973 年。

[33] J.F.M. 威尔逊(Wilson)，尚未发表(a)和(b)。

[34] M.S.M. 基瓦努卡(Kiwanuka)，1971 年 a，此处采用其解释。

但一旦国王被选定而且加冕之后，很少被谋杀或被推翻。布干达并非如此，那里的君主在位时随时都可能被谋杀或推翻。不少布干达国王从未出面对王国实行控制，其任期之内始终是兄弟、儿子间的一系列血腥内战。此外，在基塔拉，除特殊情况外，兄弟一般不继承王位。在布干达，三个兄弟可能相继为王，而三人的儿子都在为继承王位而争斗。

就气候和地理条件而言，布干达比大湖地区其他主要国家都有利。在有关布干达冗长、详细的传说中从未提到干旱。这里真是个避难区。其经济在一个世纪之内从未受过两次冲击，也没有受到像尼亚鲁班加时期那样的破坏。布干达有一个多样化并有保障的农业基础，这一基础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使布干达男性人口得以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战争和政治。由于布干达位于尼安扎湖沿岸地区，因而经营水上贸易，早在 18 世纪中后期以前很久便已开始，这往往是提出来解释其扩张的一个因素。布干达出产树皮织物，这是邻近民族竞相争购的商品，在扩张中，它还控制了铁砂矿，这是它原本缺乏的资源。除了南部巴索加人诸国以外，大湖地区其他国家都不具有这样有利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

布干达不同于大湖地区其他国家，它没有王室氏族，王子属于其母系氏族，一般人则遵从父系制。因而任何氏族都可能产生君主。这一制度使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是君主政体的一部分，但也促使每个氏族都为新的卡巴卡(kabaka)提供一位妻子，随后就是潜在的王位继承人的迅速增生。因此，布干达的国王比其他大多数统治者拥有更多的妻子。对比一下阿乔利的制度，那里的加冕典礼上，国王由长老们指定一位妻子，只有这位王后的儿子才是继承人。此外，巴干达国王仅仅是与之相等的巴塔卡各酋长中的第一位。在边远地区是以间接统治制度来治理的，那里的土著酋长成了新的巴塔卡，被聘为国王的地方代表；他们是世袭的，君主不能撤销他们的官职。

在16和17世纪，布干达如同布索加许多国家一样，只是一个小国，容忍兄弟相承制度，并依赖王室的行政官员管理。布干达局势不稳定，因内战不止而遭到破坏。不过，801 巴干达的民族主义(在布尼奥罗帝国主义控制下发展起来)强大起来，足以防止脱离和分裂国家。作为对照的例子是，巴索加的布津巴国家解体，成了八个独立的小酋邦。不过，不愿脱离意味着王位之争比那些将脱离作为一种选择的地方更为激烈。

卡巴卡特班代凯(约 1644-1674 年)以打击祭祀宗教官取得成功加强了王室的权力，这些官员的敲诈行为对君主政体和民众造成沉重负担。特班代凯大大削弱了这些宗教官员的权力，使布干达在班图民族中以漠视超自然力量而独树一帜。同一个政策，特班代凯成功了，而伊桑萨却遭到失败，这与两个王国不同的宗教组织有关。在基塔拉，斯维西秘密宗教是一个集权化机构，而在布干达，祭祀官员显然互不相干。

布干达的领土扩张与 18 世纪的三位杰出国王联系在一起。马旺达(约 1674-1704 年)夺取了辛戈，侵犯了基亚格韦，又占领了布尼奥罗的布拉莫基。布尼奥罗当时陷于与王朝变更有关的国内问题，没有全力集结军队保卫国土。考虑到这一重大的领土扩张，马旺达明智地放弃了间接统治的旧体系，任命国王的亲信——许多是平民出身，被称为国王的人——进入膨胀的官僚体系中。这些由王室任命的官员的影响比巴塔卡酋长们还大，马旺达甚至任命、罢免巴塔卡酋长。在理论上，所有这些官职都是委任的。这位杰出的君王不仅是军事天才，而且是具有想象力的政治家，被恰当地冠以现代基干达政治体制之父。

琼朱和卡马尼亚大约在1734和1794年间进一步扩张了王国。琼朱兼并了布杜，使库基处于属国的地位，又以进军基齐巴直至卡拉圭来显示布干达的军事力量。琼朱采摘了上一代人伊桑萨“南方特许”的果实。卡马尼亚夺取了布尼奥罗的布维库拉。到1800年，布干达最终确立了领先于布尼奥罗的地位。

18世纪中期，塞马科基罗着手解决了王子问题。他开始实施处死失败的竞争对手的做法，必要时甚至处死王室之子。他清除了政府部门中的王子，以防止他们利用职务密谋反对君王。这使国王获得了极大的权力，铺平了走向19世纪出现的君主专制政体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塞马科基罗想要以控制王位候选人数量、将他们撤离掌权的职位以求减少王位继承之争的破坏性时，伊桑萨却对所有王子开放竞争。结果并不令人吃惊，王位继承之争在布干达已不成问题，但在布尼奥罗却大伤脑筋，正好颠倒了前几个世纪两国的情况。考虑到布干达早期政治动荡，很容易过高估计18世纪伟大的中央集权者和帝国 **802** 的卡巴卡们，将其视为黄金时代的先驱。值得回顾的是，专制政体是以长期叛乱、与卡巴卡严重对抗、大量的政治暴力以及不断增加向邻国放逐人员为代价实现的。可以证明的是，18世纪比以前几个世纪更加充满暴力。

布干达几百年来始终处于巴尼奥罗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起初是帝国的小卒，但在18世纪末开始向帝国结构本身提出挑战。布干达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国王们将权力聚集在君主周围，形成一个有效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平民的精力用于寻求卡巴卡的宠信，以达到个人晋升的目的。人人都成了政客，许多人沉溺于猜忌、打探、敲诈，以追求国王的宠信。伟大的国王们把这种精力引向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尽管存在着马尼斯、隆非希、芒基等氏族模糊的“传统社会”，但到1800年时，布干达已具有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一个比大湖地区任何国家都更易于向上流动和更世俗的社会。

南部的农牧业王国

研究非洲的民族学家使用了近百年之久的“湖间文化”一词，通常是以观察大湖地区南半部、特别是观察几位作者专门挑出作为理想范例的卢旺达君主制为基础。[35] 这一文化复合体的形成时间已确定在相对较近的时期，即本章讨论的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历史学家过去大约20年所做的工作有助于揭露欧洲民族学家这一想象的谬误，将各民族置于其真实的历史范围——更广阔、更均衡、更严格界定的范围内，这些民族的历史现在已知是扎根于上古铁器时代，可回溯到基督教时代之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16世纪是转折点，是一个传奇的时代，是其历史的社会文化基础。

一个地缘文化区域

这一地区的自然特点和文化遗产使其自然和人文景观形成鲜明的对照。西部巨大的断

[35] J.J. 马奎特(Maquet)，1954年；L. 德赫谢(de Heusch)，1966年。

层悬崖基比拉山脉高达2000多米，向北一直延伸到维龙加火山，俯瞰着坦噶尼喀湖凹地(海拔不足800米)和基伍湖盆地。

往东，布隆迪和卢旺达的高山逐渐形成斜坡与阶梯状的高原相连，向下直达维多利亚 803 湖畔(海拔1200米左右)。这一地区的气候受印度洋的影响，在距印度洋1000多公里的范围内，这种高低起伏的地形使西部高原与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降雨量形成显著差异，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而狭窄的卡盖拉河谷还不到1000毫米。而实际数字，最重要的是雨季时间(大概是9-10月)，每年都有很大变化。我们即将看到气候的变化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似乎有特殊的影响，对不同区域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导致了该地区的生态变化和人口迁移。[36]

语言分布的方式也多少存在语言共处的现象。有关地区分为两个讲班图语的地带。根据格思里的分类法，西部D地带包括基尼亚卢旺达-基隆迪-基哈语支和现今扎伊尔基伍省的一些语言。东部E地带，以基津扎、卢哈亚、卢尼安博语为代表，相当于乌干达的班图语区。从维龙加火山向南到较低的马拉加拉西河下游地区，从卢坦奇格湖(或是奥奈克博尼奥湖,过去的艾尔伯特湖)到维多利亚湖以南，人们很容易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在前一个地区国王称为“姆瓦米”(mwami)，在后一个地区称为“姆卡马”(mukama)或“穆加贝”(mugabe)。不过，这些长期确立的地理和文化分界从16世纪诸王国形成时起就不太明显了。

书面和口头传说

除了利用考古手段测定时间和语言方面的一些假设外，口头传说也提供了有关过去五个世纪历史方面的信息。遗憾的是，自19世纪末欧洲人最初接触到这种原始文化遗产时起，遗产的价值就被忽略了，因为他们摆脱不了“含米特论”。他们确立了有文字记载的殖民传说，在各个方面都给想要解释历史的人设下了圈套。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传说的主要特点。19世纪中期对含米特人的新定义——对优等种族非洲人的称谓——相对于“黑人自身”(由塞利格曼推广的术语)，以陈旧的审美印象和政治考虑为基础，从最初的“探险”起一直用于希马人和图西人族群。大湖地区的整个文明被归结 804 为“含米特-闪米特人”自东方的迁移,认为这次迁移带来了牛群、王权制度、甚至于一神教的某些方面。[37]

1863年斯皮克提出假说，认为在16至18世纪期间奥罗莫人曾入侵，凭想象将这一地区当做第二个埃塞俄比亚；这一点在1890至1914年德国旅行家和官员(艾明帕夏、弗朗兹、施图尔曼、冯·戈茨恩伯爵、汉斯·迈耶)的记载中，在白衣传教会会员结合本人在当地调查成果与英国或德国作者(H.H.约翰斯顿关于乌干达、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简·捷卡诺夫

[36] P.古鲁(Gourou)，1953年；W.T.W.摩尔根(Morgan)，1969年；J.P.克雷蒂安(Chretien)，1983年；J.B.韦伯斯特，1979年a。

[37] E.桑德斯(Sanders)，1969年；J.P.克雷蒂安，1977年；J.L.阿姆塞耶(Amselle)和E.姆博科罗(M'Bokolo)，印制之中。

斯基、赫尔曼·雷塞)的一般人类学结论而撰写的许多出版物中随处可见。[38] 一些南部王国历史的传统资料直至近期仍深深地带有这种假说的印记。这些著作包括汉斯·科里所著关于坦噶尼喀领地的《地区丛书》，爱德蒙·西泽德神父和 H. 范蒂尔神父分别撰写的关于巴哈亚和巴津扎的文章，阿尔贝·帕热斯神父和路易·德拉热尔神父关于卢旺达的著作，于连·戈尔朱神父关于整个地区和关于布隆迪的著作。[39]

口头传说可以按照现代神话拥有者的文化和与其建立的联系从现代神话中重新获取。由当地最早受教育的居民、以问答方式传授教义者、低级文职人员、地方酋长搜集的那些资料就是例证，这些人长期被看做是仅有的有价值的传说保存者。阿波罗·卡格瓦和约翰·尼亚卡图拉有其仿效者。例如，历史学家引用的"哈亚传说"通常要追溯到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卢旺姆基拉的人的著作。卢旺姆基拉是贵族，与基齐巴国王穆塔汉加瓦关系密切，他曾是德国驻扎官冯·斯图默尔的翻译，后来担任英国统治下的布科巴"酋长"理事会秘书。他在 20 世纪初撰写了《基齐巴史》(Amakuru ga Kiziba)，雷塞的著作、西泽德的一篇文章、布科巴《地区丛书》、奥托·莫尔斯神父所著通俗的《巴哈亚人史》均利用这部书作为资料来源。[40] 我们还可以提及皮埃尔、巴兰扬卡酋长和约瑟夫·鲁戈马纳评议员在布隆迪历史学方面的影响，以及亚历克西斯·卡加迈在卢旺达历史领域所起的特殊中介作用。卡加 805 迈同时还是与国王穆塔拉·鲁达希格瓦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是卡农·德拉热尔特意培训的教士，也是寻找信息的名副其实的调查者。[41]

这些编年史将按照西方人种历史学标准加以提炼和解释的传说进行概括，然后使学童、阅读以非洲语言编写的报纸(如乌干达的《Munno》、坦噶尼喀的《Mambo Leo》、布隆迪的《Rusizira Amarembe》、卢旺达的《Kinyamateka》）的读者以及所有去传教中心和行政中心的人们都可以得到。[42] 许多重要人物开始将其氏族的发祥地定为埃及(Misri)或埃塞俄比亚(Bisinya)。[43] 1950 年代末开始了更为广泛和严谨的口头传说调查因此对宫廷传说进行了正确的考察，对一些较为下层的家族传说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对区域差异的多

---

[38] 艾明帕夏(Emin Pasha)，1891 年；F. 施图尔曼(Stuhlman)，1894 年；G.A. 冯·戈茨恩(von Goetzen)，1895 年；H.H. 约翰斯顿(Johnston)，1902 年；H. 雷塞，1910 年；H. 迈耶(Meyer)，1916 年；J. 捷卡诺夫斯基(Czekanowski)，1917 年；F. 拉策尔(Ratzel)，1885 年，第 451-478 页。关于白衣传教会见评论刊物《白衣传教会非洲传教团》和 J.M. 范德伯格(Van der Burgt)，1903 年。

[39] 布科巴、比哈拉穆罗、姆万合、卡苏鲁、基蓬多、基戈马的《地区丛书》，H. 科里(Cory)，约 1960 年(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有此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的"科里论文集"也载有大量信息。E. 西泽德(César)，1927 年，1935-1937 年；P. 西泽德(Cèsard)，1931 年；H. 范蒂尔(Van Thiel)，1911 年；A. 帕热斯(Pagès)，1933 年；L. 德拉热尔(de Lacger)，1939 年/1959 年；J. 戈尔朱(Gorju)，1920 年和 1938 年。涉及巴尼扬维齐人的同一类看法，见 F. 波施(Boesch)；关于扎伊尔东部，见 A. 莫勒(Moeller)，1936 年。

[40] 关于 F. 卢旺姆基拉的作用见 H. 雷塞，1910 年，第 237 页；O. 莫尔斯(Mors)，1957 年；R.A. 奥斯汀(Austen)，1968 年，第 89-90 页；J.P. 克雷蒂安，1986 年和印制中的作品；E. 西泽德 1937 年出版的著作第 32-57 页原文转载了卢旺姆基拉的作品。

[41] A. 卡加迈(Kagame)，1943-1947 年/1959 年；J. 鲁戈马纳(Rugomana)，1957 年；P. 舒马歇尔(Schumacher)，1949 年，以及 J. 戈尔朱，1938 年和 J.P. 克雷蒂安，1981 年 a 和 1981 年 b 均利用了 P. 巴兰扬卡(Baranyanka)的著作。

[42] 关于 20 世纪初这些传说的传播渠道，见布科巴《地区丛书》(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有此书)，第 7 卷，第 5-6 页，该书载有 J. 戈尔朱 1920 年、H. 雷塞 1910 年著作的节选译文和关于卢旺姆基拉的参考书目；另见比哈拉穆罗的《地区丛书》，《迁徙史》，1931 年。值得注意的是，科迈传教团的门生比当地人更熟悉这段历史。

[43] 见 H. 科里和 M.M. 哈特诺尔(Hartnoll)，1945/1971 年。

样性和根据原始资料的价值而不是一小群受过教育的人编出的资料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由于对录音制品的收集、口头文本的准确誊写以及确立可靠的语言基础，随之增进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44]

鲁欣达和巴奇维济的遗迹

南部诸国可能是16至18世纪间一位称为鲁欣达的征服者所建立的古代君主国解体后产生的,这种看法至少到20世纪50年代都一直流行。"鲁欣达帝国"包括基齐巴以外的哈亚和津扎的全部地域,有时还包括布隆迪甚至卢旺达,被看做是"巴奇维济帝国"在南方的延伸，是巴希马牧民新一轮扩张浪潮造成的。但据现在认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这一事件发生的年代还要早，大约是 15 世纪；更为重要的是，各种传说留传下来的"鲁欣达神话"806 有很大差异。在布尼奥罗和恩科雷，英雄鲁欣达被描绘成斯维西末代"国王"瓦马拉与女仆恩琼娜基的非婚生子，而在哈亚和津扎地区则普遍传说鲁欣达的父亲是伊加巴或称布加巴，这是当地对至高无上的神的一种称谓。恩科雷、卡拉圭、基亚穆特瓦拉、伊汉吉罗、布津扎的欣达王朝将鲁欣达的某位兄弟、儿子或孙子作为自己的建国始祖，据说鲁欣达赐与他们每人一方国土和一只鼓。这些传说主要与两个地方相关，据说这位英雄死去时，他的遗体分放两处：北部是恩科雷-卡拉圭聚居地，那里对鲁欣达的怀念特别是与卡盖拉河两岸的伊欣吉罗和布加拉地区联系在一起，南部则是布津扎-伊汉吉罗聚居地，鲁欣达在那里被描述为铁匠卡扬戈的助手甚至是儿子。各不同王国的传说因与这两个地方相关而逐渐形成，有时并不一致；基亚穆特瓦拉、尼亚卢班巴是鲁欣达的儿子或孙子，他们来自卡拉圭；在伊汉吉罗，建国者本人被说成是尼亚卢班巴的儿子，但名字却是鲁欣达·卡扬加，以保持与津扎传说的联系。至于鲁欣达的神话史诗从布尼奥罗流传到该地区最南端，则依传说的不同经历了两条不同的路线。一种传说由陆路传播，经过卡拉圭，另一种传说中，这位英雄顺着湖泊向北航行到布津扎，据说他从那里经陆路转向了西北。[45]

所有证据表明，对鲁欣达的提及反映了两股传说浪潮的汇合，而且与巴欣达和巴扬戈这两个主要氏族群相关，两个氏族群实行同样的禁忌，即"恩肯德"(nkende)猴(一种灰色长尾猴)。[46] 关于欣达王朝的建立，传说表明，这是这位传奇的征服者之后不过一两代

---

[44] J. 范西纳(Vansina)，1961 年、1971 年、1972 年；A. 卡加迈，1972 年；C.W. 纽伯里(Newbury)，1976 年；E. 姆沃罗哈(Mworoha)，1977 年；L. 恩多里辛巴(Ndoricimpa)，1984 年；《历史与社会》(布琼布拉)；《卢旺达研究》(布塔雷)；I.K. 卡托凯(Katoke)，1975 年；P. 施米特(Schmidt)，1978 年。S.R. 卡卢基莱(Karugire)1971 年的研究对了解南方各国也有价值。1979 年在布琼布拉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讨论会：见布隆迪文明中心，1981 年。后于 1982 年 12 月在布卡武又召开了一次类似会议。

[45] 除了已引用的标题外，见"科里论文集"中的资料，例如第 69 号(《巴欣达编年史》)和第 413、416 号(A.M.D. 特恩布尔(Turnbull)1925 和 1926 年关于布津扎历史的笔记)。另见布科巴和比哈拉穆罗的《地区丛书》，在"白衣传教会档案"中包括 J.B. 拉比奥歇(Lapioche)的《布哈瓦人及其历史》在内的几份手稿，1938 年；A.D. 卡凯拉(Kakaira)，《乌津扎史》，1930 年。

[46] L. 德赫谢(1966 年,第 50-51 页)将此解释为两个氏族之间年代久远的争斗，他依据的是从"恩肯德"猴和"塔姆比利"(tumbili)猴之间引出的错误推论(引自 H. 科里和 M. 哈特诺尔,1945 年/1971 年)，但事实上这是同一种动物，分别用卢哈亚语和斯瓦西里语所给的名称。

人的时间发生的事情。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实就是鲁欣达传说在 16 世纪后很久仍然继续存在，这是证明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 18 世纪的基亚穆特瓦拉，人们祈求鲁欣达的神灵保佑他们抗击来自班康戈人的希马氏族的争权者；在 19 世纪，他的名字与怀念先辈伟业联系在一起(在卡拉圭)，与怀念已破裂的统一联系在一起(在布津扎)；在 19 世纪还利用他的名字联合布尼奥罗和哈亚各族人民反抗巴干达的小型帝国主义。[47] **807**

宫廷传说和民间传说的差异反映了[48] 传奇式的传说具有顽强的持续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传说或许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统治权力的传播而不是某个统治者的征战。在吉萨卡，巴格塞拉人的巴齐兰肯德王朝(读者可参考"恩肯德"(禁忌)) 认为其祖先是尼亚卡森德(或尼拉加肯德)，她是鲁欣达的女儿或他在卡拉圭的一位继承人的女儿。在基齐巴，比托王朝认为其创建者基比是鲁欣达的兄弟尼亚基鲁，并认为兄弟俩为争夺对母亲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巴欣达氏族负责划分了二人的管辖区。17 世纪末来自伊汉吉罗的布克莱贝人的锡兰加王朝声称自己是传自鲁欣达。欣达的影响经证实远达南方的布哈，从王室称号(在赫鲁和布欣戈)和提及"恩肯德"(布济济国王的禁忌)方面便可证明。[49] 另一方面，在西部，口传资料又谈到了其他英雄人物。在卢旺达，一位具有天才般的教化作用的英雄基汉加被提高到了所有邻近王国之父的地位。在布隆迪，恩塔尔·卢夏齐这个名字好像适用于 16 和 17 世纪两个王朝的创建者，只是在欧洲人的著作中才与鲁欣达相联系。[50]

鲁欣达的传说从这位传奇人物与巴奇维济人的英雄业绩之间的联系获取了力量。无论"基塔拉帝国"的实际情况或其范围和存在时间如何，它作为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典范，非常明显是起源于乌干达西部高原。然而在南方，伊辛布瓦、恩达胡拉、穆林德瓦在相对较近期流传的故事之外几乎就不存在。在这方面，瓦马拉、穆加沙、里昂贡贝扮演了主要角色。南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话——例如，瓦马拉如何在穆加沙和伊隆古的陪同下从可怕的津图人那里夺回了牛群和种子并且摆脱了死神；瓦马拉与穆加沙之间的冲突，瓦马拉拒绝将女儿嫁给穆加沙，于是穆加沙发起猛攻(在卢旺达的传说中说的是里昂贡贝)，还有瓦马拉与卡戈罗的冲突，卡戈罗最后焚烧了瓦马拉那头漂亮母牛基塔莱的围栏。[51] 这些神只是总共 30 多位神中最重要的，而且随环境的变化不断增加。每位神都与某方面的活动有关：瓦马拉与死亡相关；穆加沙与水、雨、湖相关，因而与渔业和农业(特别是香蕉树)有关；伊隆古与灌木相关，因而与狩猎和出行有关；卡戈罗与闪电相关；里昂贡贝与牛群和狩猎有关。 **808**

---

[47] 这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用法出现在：艾明帕夏，1891 年，第 353-355 页(在布尼奥罗)；F. 施图尔曼，1894 年，第 713-715 页(在里亚穆特瓦拉)；布科巴《地区丛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有此书)，第 42-43 页(在卡拉圭)；A. 布拉尔(Brard)，《关于尼安萨湖南部部落岛民的报告》，"白衣传教会档案"，1897 年 1 月；A.E. 基钦(Kitching)，"瓦津扎人的部落史与传说"，1925 年，见比哈拉穆罗的《地区丛书》(在布津扎)。

[48] 见 P. 西泽德用马卢库语编写的传说，1931 年。

[49] "科里论文集"第 413 号(特恩布尔，1925 年)，G.W. 哈特韦格(Hartwig)，1972 年；基戈马的《地区丛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有此书)，第 7 卷，第 203 页；J.P. 克雷蒂安，1975 年。

[50] 在卢旺达关于卢甘祖·恩多利由穆扬戈陪同从卡拉圭"归来"的故事中有关于欣达的传说。在布隆迪，恩塔尔·卢夏齐反对一位叫鲁欣达的布欣戈国王；J.M. 范德伯格(Van der Burgt)1903 年的著作将这一王国的建立归功于鲁欣达"大帝"，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在其综合研究中采纳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些欠考虑。

[51] E. 西泽德，1927 年；J.B. 拉比奥歇，手稿，1938 年；A. 阿诺(Arnoux)，1912-1913 年。

瓦马拉的名字在基塔拉、恩科雷、卡拉圭的传说中反复出现，他的大圣殿位于布韦拉的马萨卡(乌干达)，而穆加沙的影响则似乎是从维多利亚湖上的塞塞群岛传播出去。[52] 里昂贡贝的故事大多在从卢旺达到坦噶尼喀湖这片西部地区流传，某些传说认为里昂贡贝的祖籍是恩多尔瓦，另一些传说则认定为基兰加，认为其祖籍是布隆迪(这实际上与他死时所在地区当时为布格塞拉所统治有关)，甚至说是今日扎伊尔的东部。基兰加是狩猎英雄，他也通过尼亚巴希和塞卢特瓦两位神灵与农业联系在一起。[53] 这些宗教并不仅仅是君主制度，它们的起源看起来极为久远，早于近代王朝建立的时间。民间传说将瓦马拉看做是巴希塔或巴扬戈等古老统治氏族的保护神，作为对照，也谈到了他与"仆从"鲁欣达之间的冲突。据说穆加沙与卡班博共同演出了前文提到的场景；当维多利亚湖水上涨时，据说这位布津扎国王被迫将女儿嫁给了他。里昂贡贝还嘲弄了卢旺达国王卢甘祖·恩多利。[54]



图片 26.1 恩科马的布尼旺科科圣树

斯维西宗教(或伊曼德瓦人的宗教)在崇拜和神话方面都是独立的。在东部(哈亚和津扎地区)，同一些家族始终世袭灵媒之职，并负责照管寺庙。在西部(卢旺达、布隆迪、布哈)，加入"库班德瓦"(kubandwa)非常流行。象征作用与词汇似乎将宗教与哈亚地区和恩科雷的王权联系在一起，而在里昂贡贝/基兰加的圣树(erythrina)树荫下举行的崇拜活动似乎更加流行。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基本的敬神和治病活动，可以保

---

[52] 关于这一问题的整体情况，见 I. 伯杰(Berger)，1973 年；R. 里克特(Richter)，1899 年；"科里论文集"，第 79 号；D.W. 科恩，1968 年；C. 里格利(Wrigley)，1958 年。

[53] F. 热劳(F.Geraud)，1972 年；P. 史密斯(Smith)，1981 年。

[54] 见 F. 波施，1930 年，源于卡拉圭的一种传说；O. 莫尔斯(Mors)，1957 年；H. 范蒂尔，1911 年；A. 库佩斯(Coupez)和 T. 卡曼齐(Kamanzi)，1962 年，叙述第 13 号。这些记叙导致 L. 德赫谢提出了主要是反抗欣达人迁移的说法(1966 年)。

护人们免遭由亲近的祖先或因滥用职权带来的威胁。[55] 这种文化现象[56] 的机械论和民族学 809 解释带有某种朴素的神话即历史论的性质，几乎完全掩盖了这一宗教的特定历史(该宗教新的发展情况将在下文论述)与基塔拉古代统治终结之间的深层分界。[57]

“氏族”与“等级”间的选择

文字记载的传说强调“希马族和图西族贵族”与“伊鲁族和胡图族农奴”之间的“等级”论以及确有的“种族”对立，面对这种情况，现代史学对“氏族”结构倾注了较大的关注。[58] 氏族(在基伦迪语和基哈语中称“乌姆尔扬戈”,umuryango,基尼亚卢旺达语称“乌布沃科”,ubwoko,卢尼安博语和卢哈亚语称“乌卢干达”,uruganda)尽管在口传文化中普遍存在(老年人自报身份首先说是属于某一氏族)，但却不具有亲属集团组织上的简明性，即使有时也有所体现。家系，按照严格的词义，是以拥有共同姓氏、遵从一两种禁忌(imiziro)、810 有时因与原籍有关的传说或受到属于斯维西教众神中的某个神的保护(特别是在哈亚地区)为特征划分为单元；但它们没有地域的统一性。[59] 氏族有时可细分为次氏族(卢旺达称“阿马香加”,amashanga,哈亚地区称“阿马希加”,amahiga)，但该系统是不可分的。在大湖地区几个王国的漫长历史中有些氏族始终存在，例如布津扎的恩科雷的巴扬戈人、南布哈的恩科雷的巴金比里人以及布凯雷贝的布尼奥罗的巴希塔人。有时禁忌涉及的族群更加广泛：在卢旺达，蟾蜍受到贝加人、巴科诺人、巴哈人(太后均来自这三大氏族)的敬重；有事例说明“恩肯德”猴禁忌也有蔓延，最令人惊奇的是基齐巴人，他们受到王室氏族巴比托人和巴欣达人的尊崇，而通常与巴比托人相关的“恩加比”(ngabi)南非林羚禁忌，已被古老的王室氏族巴库马人所采用。某些氏族还认为自己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氏族有关。在卢旺达，巴尼基尼亚人有时与巴欣迪人相联系，有时又与巴洪多戈人相联系。

在卢旺达，氏族的历史背景清楚。与恩科雷(四个单元)一样，在卢旺达，其结构特别限于18个大氏族，均包括巴胡图、巴图西和巴特瓦成员。[60] 但近来对于居住在西部基伍湖岸边的民族所作的研究[61] 表明，这些“氏族组合”两个世纪前仍在形成过程之中。在布隆迪、布哈、卡拉圭及维多利亚湖边界地区等其他地方，有数百个氏族，但各有其不同的联合形式，或通过异族通婚(布哈亚人)，或是以玩笑或起誓(今日卢旺达北部巴基加人的“endahiro”)作为基础实行联合。认同往往与履行相对较长时期的政治和宗教职责密切相

[55] 除以上引用的书目外，见B. 斯特拉克(Struck)，1911年；A. 维克斯(Vix)，1911年；H. 雷塞，1910年；H. 迈耶，1916年；B. 祖尔(Zuure)，1929年。

[56] 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的范例：L. 德赫谢1964年和C. 维达尔(Vidal)1967年的著作可作解答。

[57] J.P. 克雷蒂安，1981年a和1981年b。

[58] D.W. 科恩，1972年；M. 德赫特费尔特(D'Hertefelt)，1971年；G.W. 哈特韦格，1976年；C. 布坎南(Buchanan)，1974年。

[59] H. 科里和M. 哈特诺尔，1945年/1971年。

[60] 巴特瓦人是卢旺达、布隆迪和布哈(在布哈称巴基科人)的少数族群。他们擅长狩猎、捕鱼、制陶，由于一些禁忌而无家可归。他们一直被确定为“俾格米人”，但该词存有争议。

[61] C.W. 纽伯里，1976年；D.S. 纽伯里，1981年。

联。属于某特定氏族的事实确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最古老的传说证明，大量的地方职责是由其中的这个或那个氏族来负责，这并不一定表明这些权力区域各自构成同一性集团。例如，据说巴希塔人与布尼奥罗和恩科雷的老斯维西统治者联合在一起，控制了卡拉圭（诺诺国王），又选择了布凯雷贝王位的继承人。据说巴通杜人控制了基亚穆特瓦拉的地区，继承了卡沙雷国王的巴洪加王朝，他们有时还和巴赫塔人联合，巴赫塔人构成了布津扎的恩桑萨马国王的氏族。

811 据认为伊汉吉罗的名称得自巴扬戈氏族（属于巴龙戈铁匠的较大族群）的一位前任国王。据说巴胡图人（一个非常强大的希马人氏族）在恩孔比阿或称穆孔比阿的率领下先与巴扬戈人后又与巴欣达人作战。穆孔比阿有时身为国王，有时又以求雨人的身份出现，其命运在不同传说中各不相同，有的说他被鲁欣达杀了，被卡沙雷朝廷流放，与卡托巴哈一起逃往布凯雷贝，有的则说他是恩图姆瓦的祖先，恩图姆瓦是布库马王朝的国王，被基比在基齐巴处死。[62] 在卢旺达还有许多尼基尼亚之前的政治实体：穆巴里和辛戈戈的巴齐加巴；吉萨卡、布希鲁和布索卓的巴格塞拉；恩杜加、布瓦纳姆瓦里、布荷马和布科尼亚的巴丹达；布西吉和卢亨格里的巴辛迪；布加拉的巴希亚巴；布尔维等地（老伦格王朝）的巴欣加；布姆博戈、布里扎和布瓦纳西安布韦的邦格拉；卢科马的巴措贝，等等。这些家族中有些在现代卢旺达仍保持着举行祭典仪式（biru）的职能。[63] 在布隆迪，监管鼓和宗教职责转移给诸如巴济济、巴舒比、巴汉扎等氏族，可能反映了古代的统治权力。所有这些氏族权力在15至17世纪（有时更晚）被新王朝逐渐吸收，下面会看到这点。尽管出现了这些区域变化和影响（家庭迁移或观念和口头传说传播的结果），但次区域的小实体到20世纪仍保持了一种充满生气的个性。还必须对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伊比胡古”（ibihugu，国家）进行研究，并对基亚穆特瓦拉的巴约扎和基扬贾的巴汉巴（这是在基亚穆特瓦拉或布姆博韦加大国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族群，于18世纪末分裂）进行研究。[64]

在此背景下，牧民和农民的界限并不明显，不足以证实普遍流行的关于入侵和冲突的假说（假说流行是20世纪中期严重的政治危机造成的）。氏族的混合性构成并非仅仅存在于卢旺达：哈亚地区20%的氏族、[65] 布隆迪巴胡图10%以上、巴图西50%以上、巴特瓦

812 90%的氏族也都是如此。[66] 其他氏族处于中间或未决状态，称之为“巴伊鲁”（bairu，封为贵族的）（巴扬戈人）或巴胡图（bahutu，出身于殷实人家）（巴济济人）。巴希塔人有时被说成是牧民（例如在卢旺达），有时又被说成是从事农业的铁匠，以出让其王朝之鼓来换取耕种粮

---

[62] 见已引用的资料，特别是O.莫尔斯，1957年。关于布凯雷贝，见E.胡莱尔（Hurel），无出版日期。在J.B.韦伯斯特1979年b第14页中，巴胡图人或拜提拉人（H.科里和M.哈特诺尔，1945年/1971年，第282页）与卢旺达或布隆迪的胡图人相混淆。在哈亚地区，巴特瓦人中也有一个希马人氏族，但与巴特瓦制陶匠人无关。H.雷赛1910年出版的著作第286页对基亚穆特瓦拉古代君王卡沙雷死后发生的屠杀的记叙，也说明欣达国王卡莱迈拉的残暴，他对本家族成员尤为残暴；丝毫没有“对农民进行报复性屠杀”的意思。

[63] M.德赫特费尔特，1971年；A.卡加迈，1954年；F.纳希马纳（Nahimana），1981年。

[64] “巴哈亚”一词在殖民时期用于称呼布科巴地区所有居民，以前专指生活在马鲁库地区维多利亚湖岸的人。

[65] 包括卡拉圭。

[66] F.M.罗德盖姆（Rodegem），1964年。

食的权利。[67] 一般说来，巴济济人分为在布隆迪的巴胡图人和在布济济(布哈)的巴图西人。尽管关于古代讲班图语的族群和讲南部库希特语或中部苏丹语的族群相会的假说[68]令人感兴趣，但考虑到这些人群的文化融合，假设所涉及的年代则过于久远(第一个千纪)，难以显示 16 世纪的局面。如上所述，在反映希马人/图西人和伊鲁人/胡图人分类情况的地域、民族和政治方面都出现了民族分化，不过想要准确界定四个世纪前这些类别所体现的情况是要冒风险的。有一个事实似乎是明显的，在中部高原上畜牧活动的范围是，从恩科雷经过卡拉圭、吉萨卡和布格塞拉到布哈。经常谈到的与这一时期有关的含米特人征服，看来不过是对 16 至 18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畜牧业部门和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之间关系的区域和政治-经济模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近代王国的形成：地缘政治研究

总体年代造成的问题

丰富的口头资料造成了重修该区域年代学的复杂问题。朝代年表和王孙诸侯系谱尤其是在 17 世纪以前多种多样。一些编年史学家试图通过编撰外部资料来证明其王国的年代。一代人的平均时间被亚历克西斯·卡加迈定为 33 年，实际上似乎应为约 27 到 28 年。两次日蚀提供了绝对的参照作用，但又不能被证明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次日蚀可能是 1520 年，发生在恩塔尔·尼亚比加罗(恩科雷)与奥利米·卢韦塔马汉加(布尼奥罗)交战的比哈尔韦战役期间，这次日蚀关系确定布干达和卢旺达的年代。第二次可能发生在 1792 年，正值米班布韦·森塔比奥(卢旺达)即位之时。这位卢旺达“姆瓦米”(mwami)的尸体于1968至1969年由F.范诺顿的考古队发掘出来，并确定其生活年代 813 在 17 世纪上半叶，考虑到这方面口头传说研究的不准确性，这位卢旺达“姆瓦米”可能是穆塔拉·塞穆格希，或是西里马·卢朱基拉。尽管戴维·亨尼基等作者持有怀疑态度，但我们可由此找出可以接受的可能性。我们利用原始资料中一切一致之处，采纳戴维·科恩和 J.B. 韦伯斯特关于综合的建议，提出表 26.1 所示年表。[69]

布尼奥罗的比托君主们组织的向南“入侵”看来在不同的王国中其影响也受到约束。但根据各王国编撰的传说，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各不相同。实际上，巴尼奥罗肯定进行过多次掠夺牲畜的袭击。另外，像克瓦(布尼奥罗)、恩塔尔(恩科雷)、恩塔尔和卡莱迈拉(卡拉圭)、马盖姆贝(基齐巴)、尼亚卢班巴(伊汉吉罗)等名字在王朝年表中反复出现就已

---

[67] 口头传说即使是回溯 15 代或更多代人，也不能显出这种人口构成的更早的根源：否则它们就是通过上述途径浸透了斯皮克、艾明或戈尔朱思想的“传说”，例如，C. 布坎南的研究中提出的关于巴希塔人起源的埃塞俄比亚假说(1974 年，第 98-99 页)。

[68] 见 C. 埃雷特，1973 年。

[69] 首先尝试将各种王朝年表统一的是 J. 捷卡诺夫斯基，1917 年。另见 A. 卡加迈，1959 年；J. 范西纳，1962 年 a，1962 年 b 和 1967 年；S.R. 卡卢基莱，1971 年；D. 亨尼基(Henige)，1974 年；D.W. 科恩，1970 年；J.B. 韦伯斯特，1979 年 a；F. 范诺顿，1972 年。



图片 26.2 在卢旺达姆瓦米的西里马·卢米基拉墓中发现的物品

导致了年代上的混乱。[70] 不过，三次大的征讨浪潮还是可以区分的：

(1) 在 16 世纪上半叶，据说巴尼奥罗人 1520 年在恩科雷获胜后，在奥利米的继 **815** 承人尼亚邦戈之子克瓦王子率领下两次入侵卢旺达。基格里·穆科巴尼亚和米班布韦·穆塔巴齐两位"巴米"(bami)被迫逃亡，一位逃到尼亚巴隆戈西部，另一位远逃至布希。布格塞拉国王恩索罗·桑加诺据说在这次入侵中也被杀。直到克瓦死去，局势才发生变化。

(2) 在 17 世纪上半叶，基齐巴的比托小王国似乎受到其保护国布尼奥罗贯穿整个世纪的侵袭，例如在马盖姆贝·基通基莱在位时期。卡拉圭(在名叫恩塔尔和鲁欣达的国王统治下)在同一时期也受到了影响。

(3) 在 18 世纪上半叶发生过一次最著名的侵袭，据认为是一些传说称之为克瓦(克瓦马利)而另一些称之为基耶班贝的一位"姆卡马"(mukama)所为。据说这位君王使整个哈亚的土地多年荒芜，后被伊汉吉罗国王尼亚卢班巴·基库姆布打败并杀死。据说他那些退却的战士随后被随母流亡布哈后返回卡拉圭的"姆卡马"恩塔尔·基塔巴尼奥罗打垮。同时，另一个巴尼奥罗族群也被一位来自恩科雷的"穆加贝"打败，此人也被称为基塔巴尼奥罗("巴尼奥罗的杀手")。南方各王国从而最终消除了巴比托人的活动。巴比托人留下的记忆可怕而又混乱，但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诸王国军事组织方面的影响却可能是巨大的。[71]

---

[70] 例如在 O. 莫尔斯的著作(1957 年)中，说卡拉圭的恩塔尔·基塔巴尼奥罗与两位在任时间相隔一世纪的基齐巴国王马盖姆贝·基通基莱和马盖姆贝·卡加卢基不和。

[71] 亨尼基，1974 年；A.R. 顿巴尔(Dunbar)，1965 年；S.R. 卡卢基莱，1971 年；E. 西泽德，1927 年；I.K. 卡托凯，1975 年；O. 莫尔斯，1957 年；H. 雷塞，1910 年；A. 卡加迈，1972 年。这些征战应与在基齐巴更早建立的比托王朝区分开来，也决不会为 L. 德赫谢 1966 年著作中关于欣达人迁移发源于卢奥人的假说提供支持。

表 26.1　15-19世纪朝代年表

年代	布哈（南）	布隆迪	卢旺达	古萨卡	卡拉圭	基齐巴	基阿穆图瓦拉	伊汉古罗	布索加
1500 1600 1700 1800	基孟尼 恩塔尔 ? 鲁欣达 马齐加 马西姆巴 基恒南戈马 恩塔尔 卡尼奥尼 卢瓦萨 恩塔尔 卡尼奥尼 恩塔尔　卢瓦萨 +1906/07 [illegible]	恩塔尔· 卡莱迈拉 ? 恩塔尔· 基博戈拉 穆塔加 尼亚穆坎 ? 恩塔尔 卢夏齐 姆韦齐 穆塔加· 塞尼安姆韦扎 姆瓦布基· 姆巴里扎　C 恩塔尔· 卢甘巴 姆韦齐· 吉萨巴 +1908	卢甘祖 布温巴 西里马· 卢盖马 基格里 穆科巴尼亚 /米班布韦· 穆塔巴齐 尤希· 加西马 恩达赫罗· 西亚马塔莱　C 卢甘祖 恩多里 穆塔拉· 塞穆格希　C 基格里· 尼亚穆赫希拉 米班布韦· 吉萨努拉 尤希· 马津帕卡 卡莱迈拉· 卢瓦卡 /西里马 卢朱吉拉　C 基格里· 恩达巴拉萨 米班布韦· 森塔比奥 尤希 加欣迪罗 穆塔拉· 卢戈吉拉 基格里· 卢瓦布吉里 +1895	基梅尼 卡鲁达 基曼尼· 付姆布内 穆图明卡 恩塔雷 ? 基曼尼 卢瓦哈希亚 克韦齐 卢蒂格亚 巴津卫 基曼尼· 森图拉 ?	鲁欣达 ? 恩塔尔· 米欣戈坎塔米巴 鲁欣达 恩塔尔 卡莱迈拉 恩达加拉 鲁欣达 恩塔尔 卢萨蒂拉 瓦欣加 卡莱迈拉· 布韦兰根达 卢萨加 /恩塔尔· 基塔巴尼奥罗　C 鲁欣达 恩达加拉 卢曼尼卡 卡延齐 恩达加拉 +1882/93	基比 ? 伊苏穆拉 马努米 马特布 马塞姆班 基姆塔莱 穆津加· 尼亚卡姆瓦 姆瓦加拉 布隆古 马塞姆贝 卢加卢泽 阿博亨科 汉巴　C 尼亚卢哈姆瓦 /卢汉加姆瓦齐　C 卢塔基瓦哈 布隆古 卡金达 /基比　C 卢汉加拉齐 穆塔塔姆布瓦 +1903	鲁欣达 ? 尼亚卢班巴 卡莱迈拉 布沃基 卡莱迈拉 卢卡姆比迈　C 卢戈莫拉· 马胡 卡西莱· 卡西塔 恩克巴 卡卢穆维· 卢戈莫拉 姆沃基· 姆瓦哈伊克格 卡莱迈拉 姆布卢 基尼奥尼　卡库迪卡 卢戈莫拉 卡西莱 +1916 [illegible]	尼亚卢班巴 鲁欣达· 卡姆伯 恩塔尔 ? 穆拉马拉 基扎格拉 布托 尼亚卢班巴· 基汉姆韦 姆沃达 /卡西基 尼亚卢班巴 鲁欣达 恩塔尔 尼亚卢班巴 +1906	卡姆博 ? 鲁欣达 恩塔尔· 穆甘甘扎拉　C 卡布拉 卡穆姆博 卡巴巴哈 /金瓦 基恩提斯古 /尼亚穆穆托萨　C 卡布拉· 尼亚布莱扎 基基格纳 基古姆布巴 卡卡拉扎 姆西哈哈比 恩塔尔·穆西莱　鲁欣达·穆拉瓦加拉扎罗 卢比亚 伊塞卡隆伽 曼基马尔 +1885/90 [illegible]

注：资料来源已在注释中标明，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得到充分验证的资料，没有局限于标准的谱系。卢旺达和基齐巴的谱系最准确。17世纪以前阶段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图例/同代的君王（兄弟或堂表兄弟）═历史联姻　+1895　已被证实的死亡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　C　灾害（干旱和饥荒）

卡盖拉高原诸国

这片高地草原地区一直被描述为重要的地缘政治轴心，为卡通加河谷到马拉加拉西河谷地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遗憾的是，高原的政治史记录情况却是这一地区最糟的，因为自19世纪以来，困难一直困扰着高原诸王国，有些时候导致王国的解体或毁灭，使他们的传说迅速消亡。对布舒比或布格塞拉都没有进行单独研究，关于古老的吉萨卡和布哈的著述也是粗略或肤浅的。只有对包括姆波罗罗、恩科雷、卡拉圭在内的北部地区的了解相对较多。

卡拉圭虽然起源显赫(希塔王朝,鲁欣达聚居地的主要起点)，但它从17世纪起才得以利用尼奥罗的影响第一次衰落的机会(王室继承危机导致尼亚邦戈的继承人维尼即位)争取自己的首领地位。对后来的恩塔尔和鲁欣达知之甚少，只知他们比其东部邻邦更强大：国王马盖姆贝·基通基莱的儿子死后，对基齐巴的进攻随之结束。他们与吉萨卡和卢旺达保持良好关系，包括联姻。18世纪尼奥罗入侵突然引起的危机导致一场新的高涨，具体体现在恩塔尔·基塔巴尼奥罗身上，以后通过与布干达和尼扬韦齐人建立贸易关系而得到巩固。

姆波罗罗或恩多尔马继承了内容丰富的氏族统治传统。据说巴基姆比利是由里昂贡贝本人统治，贝伊谢卡特瓦由王后基塔米统治，她是尼亚宾基神灵的第一个化身，进入20世纪多年后一直保持旺盛的活力。产生于巴尚博氏族的希马王朝利用巴尼奥罗在卢旺达的失败造成的真空而接管了全面统治。巴尚博与恩科雷的巴欣达缔结了婚姻联盟，巴欣达当时不如巴尚博强大：在17世纪中期，伊谢穆拉利的儿子加哈亚国王袭击了吉萨卡，使卢旺达感到惊恐。18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但50年后，当加哈亚·卢廷丹耶齐死去时，卢旺达姆瓦米西里马·卢朱基拉的儿子恩达巴拉萨王子占领了国家的整个南部地区。王国分裂为纷争的诸侯国，穆罗尔瓦鼓被藏在西部山区布维尼奥尼湖附近。

吉萨卡王朝宣称自己起源于两个不同的氏族，巴格塞拉和“恩肯德”图腾崇拜族群(巴齐兰肯德人)。15世纪末，基孟尼国王威胁要兼并卢旺达姆瓦米卢甘祖·布韦姆巴的小块领地。16世纪中期，基孟尼·舒姆布肖趁尼奥罗人进攻之机，占领了旧卢旺达的心脏地区布干达和布瓦纳西安布韦：卢旺达直到一个世纪后才收复这块失地。吉萨卡以恩多尔瓦及许多卢旺达反叛者为盟友，在18世纪中期想要在基孟尼·格图拉的率领下复仇，但被西里马·卢朱基拉的战士打败。西里马·卢朱基拉的儿子基格里·恩达巴拉萨还占领了由巴齐加巴人统治的古老王国穆巴里及其在卡盖拉河岛屿上的中心。

布格塞拉也可以被看做是以后在西部山区得以立足的各政治强国的先驱。巴洪多戈王朝似乎与早期卢旺达的巴尼基尼亚王朝联系十分紧密，以致于J. 范西纳认为后者出自巴洪多戈王朝。联姻及军事联盟成了16至18世纪两国历史的特征。卢甘祖·恩多利采取反对布隆迪的行动，尤希·马津帕卡接纳了处于困境的恩索罗·尼亚巴莱加国王。至17世纪末，布格塞拉占据了从卡尼亚鲁河到鲁武布河的广大地区(今日布隆迪整个北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它有自己的牲畜饮水处和宗教祭典，是一个典型的畜牧业聚居地。随着布隆迪巴干瓦王朝的发展，麻烦也随之而来，巴干瓦王朝往往同吉萨卡站在一起。19世纪一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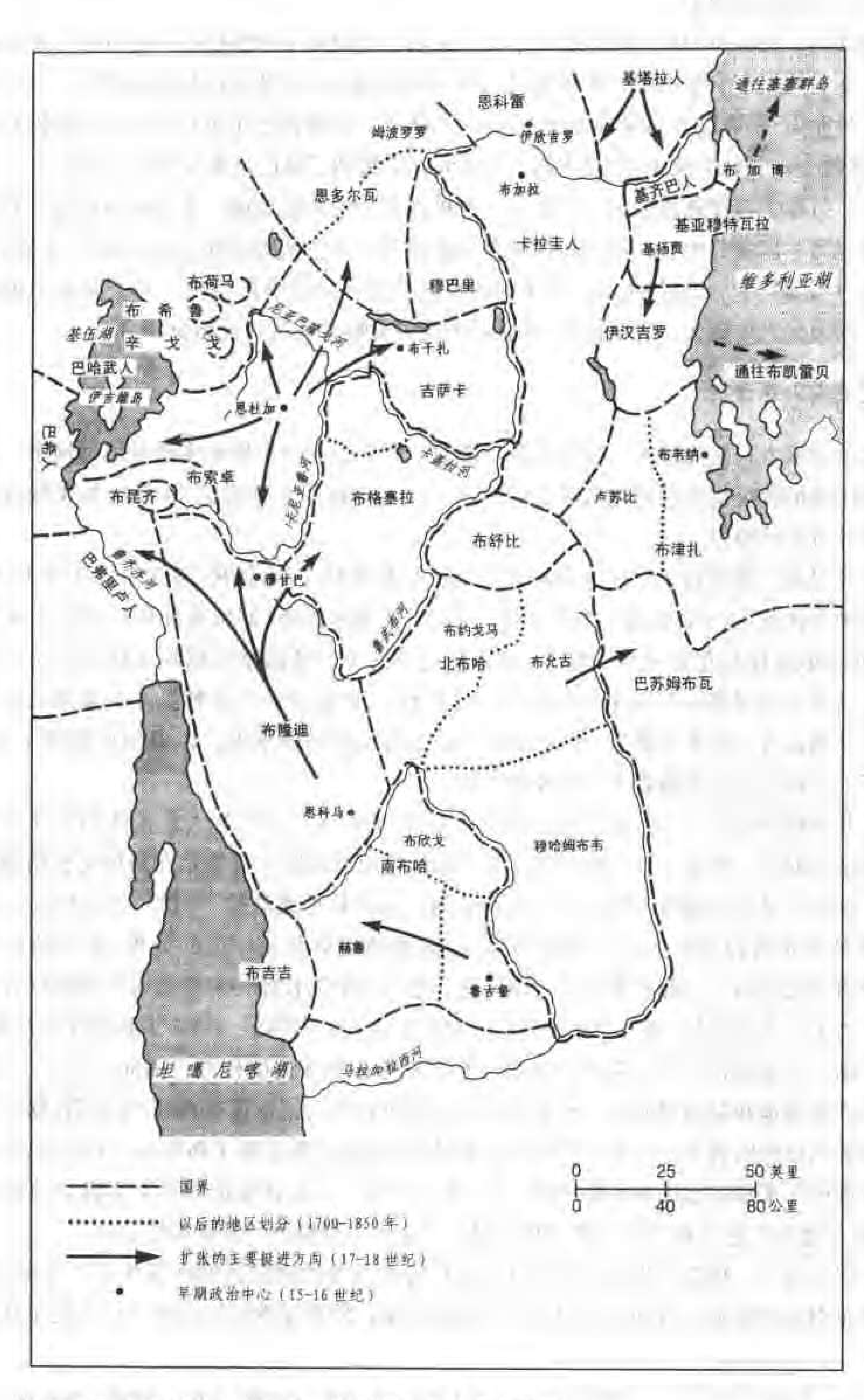


插图26.2 17世纪末大湖地区南部(仿照J.P.克雷蒂安图)

始，这个国家就分裂了。

再往南，在马拉加拉齐盆地建立了几个王国。据说从17世纪起，“北布哈”就包括布允古、穆哈姆布韦、鲁古鲁、布约戈马(今日布隆迪东部)，甚至还包括布舒比。卢旺达姆瓦米米班布韦·穆塔巴齐据说在那里找到一位妻子。巴胡姆比王朝(其国王已知的有卢哈加、恩坎扎、基胡姆比)至18世纪依然十分强大：它接纳了从巴尼奥罗逃亡的卡拉圭的恩塔尔国王；打败了布津扎穆加贝卡卡拉扎，并扩张到了松布瓦地域。不过在河南边，鲁古鲁早先就是另一国家的中心，该国包括赫鲁和布欣戈，由巴基姆比利王朝(其国王是恩塔尔、鲁欣达、卢瓦萨、卡尼奥尼)统治，该王朝拥有恩卡林齐的巴济济领地，对于俯瞰坦噶尼喀湖东岸的山区兴趣更大。直至接近19世纪中期时布哈才衰落并开始分裂。[72]

维多利亚湖沿岸诸国

这些国家人口较为稠密，分布在高山草原、肥沃湿润的平原和多鱼的河谷地带。这些社群和国家的特征受不同的地理特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19世纪基亚穆特瓦拉和布津扎分裂的原因。

基齐巴夹在维多利亚湖和卡盖拉河之间，与基塔拉-布尼奥罗(基齐巴国王直至17世纪末都埋葬在此,王子们在这一外国宫廷中长大)和塞塞群岛(即位典礼所用的圣火来源于此)的传统联系使其左右为难。另外，它不断与西南方的邻国基亚穆特瓦拉和卡拉圭发生战事，这两个国家使一系列冲突变得对自己有利。18世纪末，尼奥罗人的威胁之后，巴干达又发起进攻。国王布隆古·卡金迪向卡巴卡塞马科基罗求助，以对付反叛的王子们，而王子们已得到王位觊觎者卡马尼亚的支持。

在基亚穆特瓦拉，卡莱奈拉国王似乎在17世纪就确立了欣达人永久性的至高无上地位。据说他疯狂、残忍，他让人弄瞎了儿子穆坎比亚的眼睛。可能是在卡扬戈长期摄政统治后，实际上是他的继承人创建了一个新王朝。这就是卢戈莫拉·马赫，他从伊汉吉罗到塞塞群岛和基塔拉的长途迂回旅行结束后，被看做是有开化作用的英雄。至少到18世纪末基亚穆特瓦拉由于内部纷争势力被削弱时，他与他的后代始终利用基齐巴和伊汉吉罗的弱点。穆卡马卡莱迈拉·姆韦卢在巴齐巴人和巴干达人的支持下，消灭了其前任布沃基·姆潘古卡诺。卡莱迈拉之于卡朱隆加和基尼奥尼想要分享欣达的权力，因而导致了19世纪形成马卢库领地和基扬贾领地。班康戈氏族的两个希马人家系在卡西基·卡西塔(据信他娶了布津扎两位建国者卡拉马基和穆塔沙巴的妹妹)执政时期发源于布津扎，18世纪时，这两个家族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在19世纪初，他们在布加博建立了独立政府，并在1890年德国人建立布科巴的维多利亚湖岸建立了小规模的“基亚穆特瓦拉”。

在伊汉吉罗，称为伊哈亚的平坦湖区和称为穆贡戈的内陆高原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王位继承引发的冲突，特别是在穆拉米拉统治时期，使基亚穆特瓦拉国王卢戈莫拉和卡西

819

---

[72] I.K.卡托凯，1975年；J.弗里德曼(Freedman)，1979年；F.热劳，1972年；S.R.卡卢基莱，1971年；J.P.克雷蒂安，1975年和1984年；A.德阿里亚诺夫(D'Arianoff)，1952年；A.卡加迈，1972年；J.范西纳，1962年a，1962年b。

基在 17 世纪末得到了干涉高原地区的机会。朝代的关系为此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又在布托发现有一位国王被父亲弄瞎的事情；这一问题还导致与巴尼奥罗征服者尼亚卢班巴绝交。18 世纪末，尼亚卢班巴二世请求巴干达帮助他恢复一名反叛的王子占领的高原地区。从那时起，可称之为干达帝国主义的势力在 19 世纪维多利亚湖的整个西岸地区逐渐形成。[73]

布津扎将我们引入另一个文化和民族区域，那里巴哈人、巴苏库马人、甚至塔托加尼洛特人的影响混合在一起。那里还是巴龙戈铁匠的主要家园，他们与扬戈氏族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到。这一王国政治史三个主要资料来源[74] 提供了王朝年表，这些年表在年代和顺序方面相互矛盾，范蒂尔的年表最准确。在具有传奇色彩的恩塔尔·穆甘甘扎拉和第一位卡班博统治之后，可以说曾有过卡班博·金瓦的第二次建国，金瓦也是一位失明王子乱伦行为所生。在 18 世纪，穆加贝·卡卡拉扎必须打退巴哈人从西面、塔托加人从东面发动的进攻。他的儿子姆韦哈哈比是统一的布津扎最后一位君主。王位继承之战导致 19 世纪初发生分裂，卢苏比由恩塔尔·穆西莱统治，而整个湖岸地区统归鲁欣达·穆汉加基亚罗统治。

布凯雷贝的历史是一部复杂的区域势力发展史。以文化观点看，这个由一个岛屿和一个半岛组成的国家，构成了津扎族群的一部分。不过在 19 世纪时，锡兰加王朝自称具有鲁欣达(甚至布尼奥罗)血统，其建国者卡托巴哈据说于 17 世纪来自伊汉吉罗。王朝的禁忌是“恩芬齐”(enfunzi,一种戴菊莺)，它也是巴胡图人或拜提拉人的禁忌，如上所述，这是与巴扬戈人或巴欣达人(16 世纪末在恩孔比阿国王统治下)交战的氏族。“巴卡马”(bakama,国王)在 18 世纪逐渐对希塔氏族和库拉氏族占了上风，但塔托加人的威胁迫使他们在岛上建都。重要的象牙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领地在 19 世纪初发展起来的。[75]

820

西部山区诸国

尽管东部王国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分裂，但在西部，发展势头有利于集中，两个大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得益于此，两国在 19 世纪末的居民均超过百万。

小小的卢旺达领地 14 世纪时形成于莫哈齐湖南岸(布干扎)，靠近布格塞拉和吉萨卡，由于西里马·卢格韦的长期统治并且兼并了邦格拉地区，卢旺达沿尼亚巴隆戈河牢固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但 16 世纪的严重危机必然影响到王国的稳定。尼奥罗人两次入侵使得基格里·穆科巴尼亚国王和米班布韦·穆塔巴齐国王向西逃亡，后卢旺达政权中心转移到恩杜加人侵才告结束，原来的领地(布干扎和布瓦纳希安布韦)为吉萨卡占有。尤希·加西马对四处征战，在他战争不断的统治之后，他的两个儿子朱鲁和姆瓦米恩达希罗·西亚马塔拉之间的王位继承之争为西方的巴希人、巴哈武人和布加拉人所利用。卢旺达的国王被杀，卢沃加王朝的鼓被夺。尽管出于宗教目的的传说说合法的王子隐藏在卡拉圭的姨母家

[73] H. 雷舞，1910 年；E. 西泽德，1927 年；O. 莫尔斯，1957 年；P. 施米特，1978 年。布科巴《地区丛书》，书中各处。

[74] H. 范蒂尔，1911 年；O. 莫尔斯，1957 年；P. 贝特贝德尔(Betbeder)，1971 年。

[75] G.W. 哈特韦格，1972 年和 1976 年；E. 胡莱尔，无出版日期。

中，尽管巴尼基尼亚人宣称这个国家形成以来(从神话中的基瓜时代和传奇般的基汉加时代起)王系未断，但卢甘祖·恩多利可能在17世纪初建立了一个拥有卡林加鼓的新王朝。他收复了恩杜加，他和几位后继者又从那里将王国扩展到远至基伍湖和卡尼亚鲁河，同时又夺回了东面的布瓦纳希安布韦(基加利地区)。布隆迪新王朝的发展使该世纪末的扩张停顿下来，但扩张作为西里马·卢朱基拉和基格里·恩达巴拉萨建立的特殊军事组织的产物，821 在18世纪又开始了。布隆迪和吉萨卡被迫撤退，恩多尔瓦解体，穆巴里被占领，基伍湖两岸的定居点一直扩展到基尼亚加。18世纪末，老盟友布格塞拉被卢旺达与米班布韦·森塔比奥统治下的布隆迪分割。这一扩张在19世纪持续下去，特别是在西北部和东南部，但古老的胡图人和图西人政权在巴尼基尼亚的保护下长期保持独立。[76]

这一时期布隆迪历史的信息极少。16世纪初，由恩塔尔·卡莱迈拉创建的早期王朝好像在西北部山区强大的布格塞拉的边境地带确立下来。在巴米人中，据说卢甘祖·恩多利的儿子穆塔拉·塞穆格希与穆塔加·尼亚穆比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盟，并因交换举行畜牧业祭典仪式巩固了联盟。后在17世纪末，恩塔尔·卢夏齐或卢福库在恩科马建立了巴干瓦王朝，王朝与南布哈保持关系。这一王朝统一了南部(那里所谓的尼亚布伦加布隆迪由于与恩索罗和贾布韦的冲突而被削弱)、中部和北部——联合了旧王国(巴汉扎王国、恩塔尔、巴济济、巴比贝、巴舒比似乎都属于它)的氏族政权——地区，并起而对抗布格塞拉。布格塞拉国王恩索罗·尼亚巴莱加被迫逃往卢旺达避难。布隆迪随后扩展到今日卢旺达的南部；由于18世纪中期西里马·卢朱基拉打败了穆塔加·塞尼安姆韦扎，布隆迪边界才得以沿卡尼亚鲁河确定下来。直到19世纪上半叶恩塔尔·卢甘巴长期执政期间，布隆迪王国才向西扩张到鲁齐齐河，向东到达马拉加拉西河盆地(以损失北布哈为代价)。[77]

继续往西，在基伍湖周围，一方面是巴希人，另一方面是鲁齐齐河平原的巴弗里卢人和长期生活在伊吉韦岛和湖西岸的巴哈武人，据说均起源于宁杜地区(在卢温迪)。“姆瓦米”的政治结构可能与“布瓦米”的社会宗教制度相连，从而似乎构成了本贝和莱加社会的基础。传说还证实了这些小王国与布隆迪及卢旺达之间有着极悠久的历史关系。只是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入侵”这一含米特学说的传播和19世纪末殖民地边界划分才掩盖了这些事实。[78]

国家、经济与社会

822 这部政治和战争史不应忽略人口迁移、地形和谷物生产的演化方式以及制度变化甚至于思想意识变化等问题。

畜牧业与农业关系的发展

起初，由于地理因素，两个地区被确定为适宜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在卡盖拉高原从

---

[76] A. 卡加迈，1972年；J. 范西纳，1962年a和1962年b；J.K. 伦尼(Rennie)，1972年。

[77] J. 范西纳，1961年和1972年；E. 姆沃罗哈，1977年；J.P. 克雷蒂安，1981年(a)和(b)，1984年。

[78] C. 毕希克瓦博(Bishikwabo)，1982年；D.S. 纽伯里，1978年和1979年。

事畜牧业，在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和西部山区从事农业。不过，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一时期，两种生产活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在整个地区结合起来进行的，且方式多种多样。实际上，畜牧业和农业从未相互对立；最早种植谷物、蟋蟀草和高粱与饲养牲畜的结合不论对生产还是消费(肉和奶)，似乎都是一种极为古老的习惯。[79] 按照传说，古代卡拉圭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其拥有牛群，还因为其农业生产和用高粱酿制的啤酒。[80] 饲养的牛群并不局限于单一种类，即长角的桑加牛，放养地牧区的开辟在这一地区比人们所认为的要久远得多。早期的叙述提到使用粪肥，这对于最湿润地区一年两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一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这种互补性在诸如基齐巴和基亚穆特瓦拉等国家特别明显——香蕉树在那里就像在布干达一样逐渐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布干达定居的巴希马人很少，那里的社会等级以土地关系而不是有关牲畜的契约为基础。卢戈莫拉·马赫17世纪的声望(或是卡托巴哈在布凯雷贝的声望)从根本上说在于引种香蕉树和马达加斯加酒椰(人们将此归功于他)，还在于他与水和种植之神穆加沙的关系。[81]

但特别是在西面，一些非农业因素致使当时牧民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些因素就是旱灾与饥荒。对于所论及国家现有的口传资料进行严谨分析表明，在17世纪上半叶(卢旺达、基亚穆特瓦拉、布津扎)和18世纪下半叶(布隆迪、卢旺达、基齐巴、卡拉圭)发生过多次此类灾害，这与R.S.赫林和J.B.韦伯斯特根据关于古老的尼罗河地区政权的数据和前面论述的关于乌干达尼洛特人的传说提出的几点假设完全一致。正如E.I.斯坦哈特对于恩科雷和出自恩多尔瓦的各领地的案例极为清楚地证明的那样，这些生态和生存危机对农民格外不利；他们被迫寻求牧民的帮助，牧民可以通过转场确保牛群的存活。17世纪发生政治重心从卡盖拉河和马拉加拉西河向俯视着基伍湖和坦噶尼喀湖的基里巴树林高地转移，这不单单是征战或王朝变更的结果，还由于有利于畜牧业族群及其财富的一套贡赋制度得到发展。在布格塞拉流行的“供水地文明”，在有关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最古老的历史传说中也有体现。姆瓦米尤希·马津帕卡在17世纪末对其牛群中最漂亮的母牛的崇拜，就是这一情况的例证。[82] 823

不过，关于卢旺达或布隆迪(还有恩科雷)，却可以说300年前所建政权的受益者只代表了部分畜群拥有者、富有的巴图西人、统治阶层，他们同王族保持联系(例如布隆迪的巴干瓦王子们)。简单地说，他们这些人通过实际使用牛或是把牛作为象征成功地获得对农业生产的政治控制，而这种生产为他们提供了再分配的额外财富资料和法定劳动。农业对于民族学的记载来说无足轻重，然而对于祭典仪式甚至王权思想意识的重要性却是明显的。例如在布隆迪，每年的“穆哈努罗”(muhanuro)节——节日期间要重新确立王权并更新体现王权的鼓——要庆祝播种高粱，在雨季漫长的国家要确定播种高粱最有利的时间。

---

[79] J.P.克雷蒂安，1982年。

[80] O.莫尔斯，1957年；J.B.拉比奥歇，手稿，前引文，脚注51。

[81] A.O.阿纳克莱蒂(Anacletti)和D.K.恩达加拉(Ndagala)，1981年。关于香蕉树的社会-政治作用，见C.P.科塔克(Kottak)，1972年；关于卢戈莫拉·马赫，见P.施米特的精彩论著，1978年。

[82] 见表26.1中“C”所示。J.B.韦伯斯特，1979年a，第1、2、7章；E.I.斯坦哈特，1981年，第115-156页；J.P.克雷蒂安，1984年；P.舒马歇尔，1958年。关于布哈的同一发展，见J.F.姆布韦利扎(Mbwiliza)，1981年。

另外，在粮食作物方面，根据口头传说中关于烟草的情况来判断，这一地区可能是17世纪开始引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红薯、玉米、菜豆)，引种给农民提供了深化其生产活动的新方式，造成一年两熟的可能性，保证了植物蛋白(豆类中)的供给。[83]

这样，牧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就不具有社会生物学的陈规俗套使我们相信的那种一成不变和普遍的特点。即使假定巴隆迪、巴尼亚卢旺达或巴哈亚农民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



图片26.3 布隆迪东北部穆甘巴的班加圣堂



图片26.4 布隆迪东北部穆甘巴的班加圣堂中保存的古代王室用鼓

[83] J.P.克雷蒂安，1979年和在印制中的著作；M.巴亨杜齐(Bahenduzi)，1977年；L.恩多里辛巴，1984年；E.姆沃罗哈，1977年；C.维达尔(Vidal)，1974年。尽管克劳丁·维达尔误用了封建的词汇，又带有低估殖民化作用的倾向，但她在强调旧卢旺达土地的重要性方面值得赞誉。人们还会看到，“姆瓦米”(mwami)指果实(基隆迪语中称kwama)，而“姆卡马”(mukama)意为“挤奶人”，这是显著的对比。

之初称为巴胡图人或拜鲁人，17至19世纪间发生的经济、政治和地域变更致使希马-伊鲁人或图西-胡图人从当地贸易关系发展为更广泛的等级关系，其灵活程度取决于参与的国家或某--特定时刻。[84] 824 825

巩固：17和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者

殖民化以前，各国都有一套纳贡制度，因各国当时的生态环境、不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氏族形态、制度形式的不同而各异。在每个国家，君主都对住地附近地区实行直接控制，对其他地方则任命酋长(bakungu，batware)。酋长们往往是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哈亚地区称Balangira，布隆迪称Baganwa)，通常由当地最有影响的家族(农民或牧民)的代表加以辅佐。贡赋以劳动或实物(牛、几筐粮食和盐、蜂蜜、武器等特殊产品)形式交纳给宫廷。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因而可通过再分配扩大其权势，因为奢侈品几乎没有(衣服是兽皮或树皮制成；当地的植物用来建造住所)。[85] 不过，特别是从18世纪起，王权通过四个途径得到巩固：

对受保护者的剥削 此类关系(称为ubugabire或ubuhake)不断从私人背景中消除，被用于政治目的——确保对某家族的保护，以增加义务作为交换。在卢旺达，"布哈克"(buhake)更是专门用来制服，特别是在18世纪末尤希·加欣迪罗执政时期被巴尼基尼亚征服的周边地区有影响的胡图人家族。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基津基"(gikingi)土地制度，给予对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家族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影响最大的畜群占有者专有放牧权。这一特权网使一些作者称之为封建主义，在卢旺达它是与18世纪的征服所造成的畜群规模显著增长相伴而生。[86]

军事组织 卢旺达采用的与恩科雷的"艾米特韦"(emitwe)属同一类型，特别是从西里马·卢朱基拉执政时起，卢旺达形成一种世袭常备军制度，由特定家族的青年男子组成，在受到威胁的边界地带安营扎寨。这支民兵还负责照管属于国王或受国王保护的畜群。民兵包括巴胡图人以及巴图西人，甚至包括外国人，其中一些人是卢旺达打败的王国(恩多尔瓦、吉萨卡、布隆迪)的难民。在19世纪，这一制度的作用削弱，主要发挥征税职能，被称为"乌姆赫托"(umuheto，弓形的)，为地位在土地酋长和草原酋长之上的重要首领服务。军事因素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这一阶段末期的其他王国。[87] 826

贸易的可能性 直至近期，已形成制度的交换和当地的实物交易所起的商业作用比专门贸易的作用更为重要。但产于布松戈拉的卡特韦或产于乌温扎的盐、铁制品(巴津扎人和巴希人制的锄)或是酒椰制手镯(amatega)等地区性产品是早期小贩们的基本货物。根据1635年前后去世的卢旺达姆瓦米墓葬中发现的物品或是关于尤希·马津帕卡的传说判断，来自印度洋沿岸的物品，包括玻璃珠和装饰贝壳，似乎是在17世纪通过一个个中心传遍整个地区。人们还认为铜(产于今日的沙巴?)的贸易自18世纪起就存在于布隆迪、卡拉丰

[84] 殖民化后来使这种对立具有了民族的含义，在一个种族层面上造成两种等级。

[85] E.姆沃罗哈，1977、1981年；O.莫尔斯，1957年；A.恩桑泽(Nsanze)，1980年。

[86] J.P.克雷蒂安，1974年；A.恩迪库里约(Ndikuriyo)，1975年；C.W.纽伯里，1976年；J.卢瓦布昆巴(Rwabukumba)和V.穆丹达基齐(Mudandagizi)，1974年；L.梅施(Meschi)，1974年。

[87] D.S.纽伯里，1979年；A.卡加迈，1963年

和布干达。但直到19世纪，卢苏比、卡拉圭和卢旺达的统治者们才试图像布干达做的那样，控制这一奢侈品的贸易。[88]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家系已成为政治性氏族集团的不协调混合物，由于土地危机，17和18世纪的征服战争以及为寻求食物、灌溉条件较好的土地或较丰茂的牧场而进行的人口迁移所产生的社会变化促使家族解体。17世纪斯维西宗教的成功(例如卢旺达和布隆迪的里昂贡贝或基朗加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在不稳定状态下提供了某种庇护。新君主国在很大程度上从这种宗教运动中取得合法性，正如神话和祭典仪式所证明的。不过，会团成员也能在人民中引起颠覆运动，或阻碍国王的行动。例如基齐巴的姆卡马旺努米就因为夺了瓦马拉的牛而被瓦马拉的巫师逼疯！

这些君主国最终还是在统治制度的支持下，在其军事征服的推动下，着手控制了这一对双方均不利的宗教，使之转而对自己有利。在基齐巴，对已故国王的宗教崇拜抵消了斯维西神灵的力量。在基亚穆特瓦拉，从卢戈莫拉·马赫时起，君主制就建立在崇拜穆加沙的基础之上。在卢旺达，从西里马·卢朱基拉执政时起，"伊曼德瓦人的国王"就设置在宫中。同一时期，卢旺达君主修编了官方的赞美诗和历史故事。这一口述文学由军队加以传播。神圣的法规(ubwiru)确定了王家的祭典仪式，王朝的谱系中加进了结盟的图西人家系(太后的家系)。

827

卢旺达口述文学的显著特征体现了这个国家政治集权的特殊性。在其他国家，社会的不同阶层直到殖民化前夕仍保持着较大程度的独立性。[89]

结　论

到18世纪末，大湖地区已呈现出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现代结构。区域内重大人口迁移已大体结束，大湖地区即将形成的最终民族状况——巴基加人、伊特索人、兰戈-奥米罗人——逐渐确定下来，这一进程到1830年前后结束。大多数民族已占据了他们的后裔目前所生活的家园。此外，除极少数例外，随着卢旺达作为在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兴起，国家形成的时代告终。在中部，布尼奥罗继续衰落，直到1830年托罗和帕罗兰分离出去，由此结束了大湖地区历史中一个冗长的主题，其支系还包括东部的奥图克山和埃尔贡山、西部的阿卢尔和基盖齐高原、北部的阿戈罗以及南部呈起伏状的乌苏库马平原。至19世纪初，布干达已成为中部地区杰出的国家。此后，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将从中央权力的发展转移到酋长们努力控制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在19世纪，多种多样的新主题将占据大湖区的历史。[90]

(郑宪　译)

[88] R. 格雷和D. 伯明翰(Birmingham)，1970年；J.E.G. 萨顿(Sutton)和A. 罗伯兹(Roberts)，1968年；D.S. 纽伯里，1980年；F. 范诺顿，1972年。

[89] J.P. 克雷蒂安，1981年b；A. 卡加迈，1981年；J. 范西纳，1962年a和1962年b；P. 施米特，1978年；J.N. 恩库里基英富拉(Nkurikiyimfura)，1983年。

[90] 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6卷，第10章。

27 东非内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诸民族，1500-1800年

W.R. 奥齐恩

在东非，1500年一般被认为是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分水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口头传说在历史研究中成为有用的资料。1500年前，历史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但此后口头传说成为主要的资料来源，而从19世纪起口头传说与书面资料开始相互印证。① 828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足够的口头或书面资料来源，可以依靠它们来理解或重构所探讨的这一时期。如关于1500年以前的时期，资料不全甚至缺乏历史文献仍是基本的问题。例如，对于内陆社会，诸如戈罗瓦人、齐瓜人、戈戈人、图尔卡纳人、马赛人和大部分卡伦津人族体，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历史研究。有关空白正慢慢得到填补，但关于这一时期该地区历史的原始资料仍残缺不全。随后的问题便是，本可合理断言的一些看法，必然因得知当时发生的事情许多仍不知晓而打上折扣。正如艾尔珀斯和埃雷特教授所正确指出的，有待通过研究发现的主题，也许相当于从现有材料中得出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诠释，甚至更有分量。②

1500到1800年正是社会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时期，这些制度至今仍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所特有的。经历的多样性也许是这一时期该地区历史的主要特色。舞台的中心被马赛人、查加人、帕雷人、桑巴阿人、戈戈人和赫赫人所占据。在东部边缘居住着基库尤人、坎巴人、米吉-肯达人、齐瓜人和扎拉莫人。西北部居住着阿巴卢伊亚人、卡伦津人、卢奥人、阿巴古西人和阿巴库里亚人。西南部则居住着坦桑尼亚诸群体，如苏库马人、伊兰巴人、尼扬韦齐人、津扎人和金布人。

所有这些民族——沿海诸社会除外——仍然与海洋相隔，并且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无须面对19世纪时将来自海岸地区的经济和同盟的挑战。没有任何关于1700年以前阿拉伯人或斯瓦希里人渗入内地的记录，"回溯1600年以前的时期，在赞比西河北部的任何内陆遗址中，也没有发现大批的输入品。"③ 然而从17世纪中期起，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酋长权力和相关的——虽然常常是分散的——政治组织的兴起，以及向一种普遍纳贡的生产方式的变化。持续不断的努力促进了社会和政治的融合，形成较大的经济和政治团体，统治者得以向其臣民收取贡物，以此供养其本人、家庭和侍从。口头传说将这种发展变化描 829

① 关于东非前殖民时期历史的主要基于口头传说的史书均以1500年前后为开端。见G. 默留基(G.Muriuki)，1974年；H.A. 姆万齐(Mwanzi)，1977年；W.R. 奥奇恩(Ochieng)，1974年a。

② E.A. 艾尔珀斯(Alpers)和C. 埃雷特(Ehret)，1975年，第470页。

③ R. 奥利弗(Oliver)，1977年，第621页。

绘成一种由较强大的移民社群进行的征服和同化的过程。换言之，这一过程可被视为由当地人对当时尚未定居下来的移民社群的分散活动造成的一种逐渐归化和稳定化的过程。

所有的历史都是从一个舞台转换到另一个舞台。在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内陆社会逐渐进化成独立的民族集团，它们存在至今，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在所有定居的农业社群中，人们观察本地环境的特点，试图找到以合理的方式对待的技巧。正如约翰·艾利夫所言："人们听从土地的指令。"④ 许多地区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如修造梯田，庄稼轮作，使用绿肥，混合耕作以及有调节的沼泽农业。

大部分东非人从事农业，而马赛人、波科特人和图尔卡纳人仍主要是牧牛人，驱赶着牲畜，逐水草而居。如下文将论述的那样，农牧民都从未试图从事专门的或特有的经济活动。每一种经济活动不觉之间逐渐演变成另一种，并都易于发生变动。⑤ 从事农业的人，如卢奥人和阿巴古西人，往往也拥有大群的牲畜，而牧民，如桑布鲁人和阿鲁沙马赛人也在从事某些农业活动。巴拉古约人、卡伦津人和阿坎巴人(坎巴人)则一半时间从事牧业。

桑耶人、奥凯克人、桑达韦人和哈扎皮人仍靠采摘浆果、蔬菜、果实和捕获野生动物和鸟类为生，但即使在这些猎人和采集者之间，以后也会看到日益增多的谋生方式。⑥ 例如，奥凯克人以蜂蜜换取农产品，而多罗博族和阿提族猎人则涉足远距离象牙贸易，到19世纪，又开始获得家畜。亨利·姆万齐告诉我们，当19世纪斯瓦希里商队来到基普西基人乡村时，正是那些奥凯克后裔首先获得所要之物——象牙。他们擅长狩猎和捕象，因此"他们充当了寻求象牙者的中间商，将象牙卖给前来的商队"。⑦ 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农牧民都在为拥有地势较高、富饶而水分较多的草地和高原而全力竞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侵入了守猎者和采集者的领域，致使后者经常被吸收、毁灭或分离。

831

经济发展

到1500年为止，肯尼亚-坦桑尼亚内陆两项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牲畜饲养业。约翰·艾利夫指出，饥荒是这一时期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⑧ 由于东非土壤贫瘠，降雨时多时少，影响到庄稼和牧草的生长，从而出现饥荒。

甚至是最有利的地区也难逃饥荒的打击。香蕉在乌桑巴拉本易于生长，但桑巴阿人的口头传说中提到至少每15年要经受一次饥荒。"救救我们，别让我们饿死"，在马拉维湖沿岸肥沃的温尼亚库萨，人们祈祷着。⑨ 许多哈亚人、米吉-肯达人、赫赫人和坎巴人的口头传说中也提到经常出现饥荒，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部分口头传说中，饥馑是移民

④ J. 艾利夫(Iliffe)，1979年，第6页。

⑤ 见E.A. 艾尔珀斯和C. 埃雷特，1975年，第469-511页；A.M.H. 谢里夫(Sheriff)，1980年；以及R.M.A. 凡·兹万南伯格(van Zwanenberg)和A. 金(King)，1975年，第79-109页。

⑥ R.H. 布莱克伯恩(Blackburn)，1982和1976年。

⑦ H.A. 姆万齐，1977年，第155-166页。

⑧ J. 艾利夫，1979年，第6-9页。

⑨ 同上，第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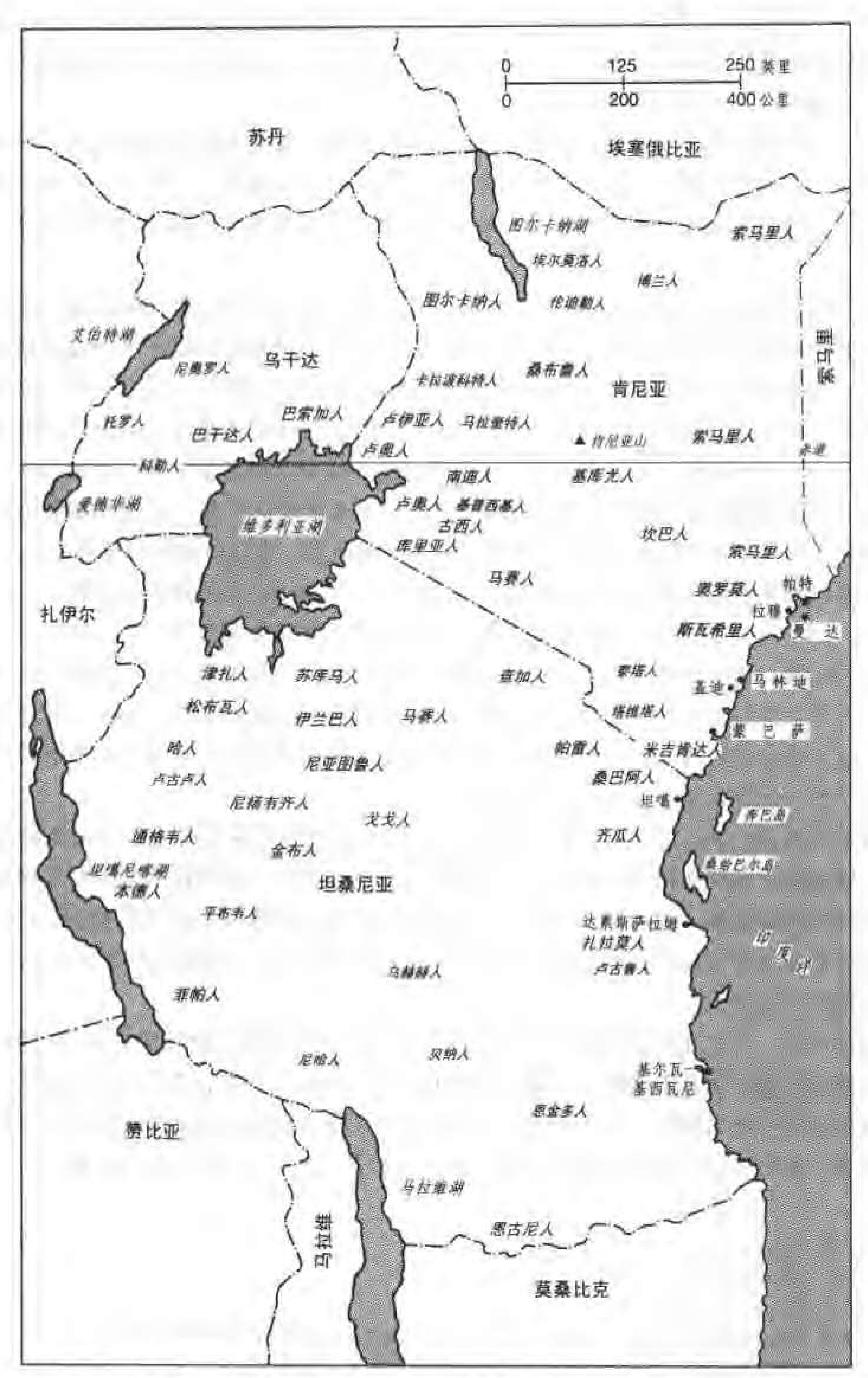


插图 27.1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民族集团

资料来源：根据肯尼亚莫依大学业基伍瓦所绘地图改编，仿照 W.R. 奥奇恩图

和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乌桑巴拉南部的大多数古代氏族声称他们曾在齐瓜人发生饥荒期间来到肥沃的山丘，"搬到山上，他们可利用较多的雨量和耐寒的香蕉树"。[⑩] 1899 年，一场可怕的饥荒降临乌桑巴拉地区："人们吃树根和香蕉皮，数百人为填饱肚子而成为基督徒。"[⑪] 当缺雨时，人们有两种选择：

> 有些人在灌木丛中觅食。在这里，狩猎和采集技术很关键，此项高手，如桑达韦人，常常比他们的邻人少遭到毁灭。其他人则动用储备，即牲畜，不是吃掉它们，而是用来向较幸运的族群换取粮食，或者利用先前由交换牲畜建立的社会关系。[⑫]

832

对付饥荒的第一道防线是耕作者的技术。从 1500 年起，人们就不断尝试种植早先由班图人和尼洛特人引进的庄稼。林区降雨量较多，高粱、蟋蟀草和谷子不如香蕉和块茎植物重要。1500 年后，大量的欧洲和美洲作物由葡萄牙人传入东非，包括玉米、花生、白薯和木薯，这些作物现在仍生长良好。虽然这些作物近代才引入东非，但对其分散的途径却知之甚少。无论如何，每种作物似乎随着各自的产地要求而发生变异。例如木薯，被认为是从扎伊尔和桑给巴尔到达东非的大湖区，[⑬] 而玉米可能从东部，通过埃塞俄比亚到达同一地区。[⑭] 其他粮食作物，包括多种豌豆、蚕豆和坚果，也在该地区种植并生长至今。

东非的耕作者尝试种植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作物，争取生产尽可能多的食物。

> 由于通信和市场的发展相对较差，农民不得不种植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作物，这样，无论气候如何变化，农民都能生存下来，不被饿死。农民通过生活在一个单一的生态区域，通晓甚至西方人也不可理解的区域复杂性，发展一种拥有大量术语可意会当地生态的丰富而微妙的语言，种植多种适合环境特殊要求的作物，尽力战胜饥馑，以智谋挫败死神。[⑮]

肯尼亚西部的阿巴古西人，在 18 世纪中叶从维南湾沿岸的平原渗入肯尼亚南部高地之后，随即就遭遇到作物种植的失败，造成饥荒和许多死亡。他们被迫减少对几种高粱和其他低地作物的依赖，扩大种植更适合于在新环境下生长的穆子和根茎作物。[⑯] 只有长期的经验才能获得种植技巧，因此年龄便是权威。[⑰] 到 18 世纪，肯尼亚-坦桑尼亚内地已有许多不同的农业体系。

如前所述，所有社群都观察本地区环境的特点，试图找到以合理的方法对付的技巧。

833 一个共同的实践活动是砍烧灌木，为耕地腾出空间。种植几个季节之后，地力耗尽，农民便移往别处等待地力恢复。现得到的极少证据表明，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的所有农业体系都基于家庭劳动，使用同样简单的工具——斧子、锄头、大砍刀和掘土棍。

---

⑩ S. 费尔曼(Feierman)，1968 年，第 12 页。

⑪ 同上，第 14 页。

⑫ J. 艾利夫，1979 年，第 13 页。

⑬ M.D. 格温(Gwynne)，1975 年，第 268-270 页；B.W. 兰格兰兹(Langlands)，1966 年，第 12 页。

⑭ A.C.A. 赖特(Wright)，1949 年，第 80 页。另见格温，1975 年，第 253 页。

⑮ S. 费尔曼，1974 年，第 19 页。

⑯ M.H.Y. 坎尼基(Kaniki)，1979 年，第 14 页。

⑰ R.W. 朱赖(July)，1974 年，第 180 页。

饲养家畜，包括家禽、绵羊和山羊，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活动，特别是在干旱和人口不太稠密的肯尼亚大裂谷聚居区和坦桑尼亚中部开阔的草原。正如阿卜杜勒·谢里夫所言，以牲畜的形式储存财富要比储存蔬菜食品方便得多。[18]牲畜的粪便对农业集约化生产也很重要。牲畜提供了衣食、武器和器皿。在诸如马赛人和图尔卡纳人等牧民当中，牲畜决定着日常生活和亲缘关系，拥有牲畜的多少是衡量家族财富和个体保障的尺度。[19]甚至在定居的农业民族和农牧混合的社会中，拥有和控制牛群和其他牲畜也有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许多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中，如基库尤人和阿巴古西人，获得和拥有牛群是财富和权势的重要标志，"与相邻的民族，如马赛人和阿坎巴人的关系，也是在此种意义上构成的"。[20] 在图尔卡纳人、卢奥人、卡伦津人和马赛人中，牲畜通过慷慨的出借和陪嫁而易手。凭借此种方法，每个家族的牧群逐渐散布到常常是相距较远的亲朋手中，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因此而受益。"由于广泛分散牲畜，每个人都减少了灾难的威胁——因疾病、敌人的劫掠和干旱而毁灭畜群。"[21] 通过慷慨出借牲畜，个人增加了亲朋和熟人的数量，需要时候可作为依靠。

除了牲畜，以放牧为主的民族也有很多土地。一些民族，如索马里人、马赛人和奥罗莫人，将他们的放牧活动扩展到东非的广阔地区。"由于游牧民族可自由流动，具有政治凝聚力，而且凭借奶、血、肉食等高蛋白饮食，人们普遍健康强壮，他们在军事上统治了大部分东非。"[22] 到17世纪中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的经济地理状况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片游牧的"海洋"包围着几个农业生产的"岛屿"。凭借其社会价值、财富以及对领土、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控制，牧业生产和游牧的生活方式占据了统治地位，令人羡慕。 834

作为对农业和畜牧业的补充，狩猎既是一种食物来源，也是为了保护庄稼。许多东非口头传说提到狩猎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那些缺少牲畜，因而也就缺少蛋白质内部来源的民族。尤其是在卢奥人、桑巴阿人、帕雷人和阿巴库里亚人中，口头传说在解释民族迁移的原因时，开始往往说到他们是在追逐某种猎物，结果被引到一个合意的地方，并决定居住下来。关于桑巴阿人王国起源的神话讲到姆贝加的出现，说他是一名恩古卢族猎手，杀死了毁坏庄稼的野猪，并慷慨地将肉食送给族人。"桑巴阿人出于崇敬和感激，将一些妇女献给他为妻，并尊他为所有乌桑巴拉人之王。"[23] 赫赫人中姆英加王朝的创建者据说是在一次狩猎远征中从乌萨加拉的伊孔巴古鲁而来。[24] 松布瓦人、文扎人、通格韦人和本德人中一些酋邦的奠基者据说也是"来自布哈、布隆迪、卢苏比或卢旺达的猎人"。[25] 因此，狩猎是一项重要而又令人尊敬的经济活动。

猎取野兽是为了以肉食补充人们的素食。必须保护耕种的作物和驯养的家畜免受鸟兽

---

⑲ R.W.朱赖，1974年，第180页。
⑳ R.M.A.凡·兹万南伯格和A.金，1975年，第80页。
㉑ R.W.朱赖，1974年，第180页。
㉒ R.A.M.凡·兹万南伯格和A.金，1975年，第80页。
㉓ A.D.罗伯兹(Roberts)，1968年a，第5页。
㉔ 同上，第39页。
㉕ 同上，第120页。

的侵害，人们不得不使用沟堑、陷阱、圈套、长矛、箭头和猎狗来防止掘穴动物和食草动物毁坏庄稼。

相对于口头传说所提到的农业的早期重要性，牲畜饲养和渔猎活动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但在图尔卡纳湖、维多利亚湖、巴林戈湖、埃亚西湖和印度洋沿岸生活的族群除外。人们通过垂钓、网篮和围篱来抓获各种鱼类。鱼干被用来同远离渔区的族群进行贸易，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

绝大部分东非民族的口头传说都提到古代的冶铁知识，既有熔炼也有锻造。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也证实，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冶铁技术由班图人传到东非。东非最早的铁器时代遗址是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布哈亚、卢旺达、尼安扎和卓比，在布哈亚可追溯到公元前5、6世纪，在维南湾和乌干达北部可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26]“这些遗址的特征是矗立着高高的圆筒形熔炉，有一种叫做‘乌雷韦陶’的特种陶器，村落人口稠密并从事农业。”[27] 另一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是在夸莱、帕雷、乞力马扎罗和乌桑巴拉发现的，时间可追溯到2、3世纪。“这些遗址特有的一种陶器叫做‘夸莱陶’，并且也显示了永久性村落和从事农业生产的证据。”[28] 铁匠通常是少数几个群体的保留性职业，拥有较高的声望，有时也拥有财富。在尼哈人中，炼铁活动伴随着大型的祭祀仪式，包括绝对禁止妇女出现在熔炉附近。[29] 一些乌格温诺族口头传说提到，到大约1500年为止，乌格温诺族有些家系专门从事熔铁和锻铁。主要的制铁家系瓦萨纳家族控制了该地区的政治力量。他们后来被瓦苏亚家族推翻，后者将当时的氏族人会仪式改造成一种拥有无限的高压统治权力的复杂的国家制度。[30] 在肯尼亚西部，阿巴古西人声称他们自16世纪以来就会铸铁。他们的铁匠据说因销售铁制品而致富。[31] 在维南湾北部的卢奥人中，伊姆博的瓦洛瓦人是主要的铁匠族群。[32] 他们制造锄头、箭头、饰物、针、斧、矛、刀和剃刀。盐矿业以及制鼓、制陶和造独木舟等手工业也很重要。按照惯例，这些都是特殊氏族的保留职业。诸如编篮和建房等手艺并非专业活动，而是谁有时间谁就来做。

必须再次强调指出，在1500至1800年期间，粮食生产是社会生存和扩展的关键因素，刺激了人口的稳定增长。随着东非大部分地区实行集约耕种和放牧，而且产量超出最低需求，人们开始向前看，为将来的消费积聚和保存食物，利用剩余时间从事非生存必须的活动。人们可以实现劳动专业化，某些人可不必承担生产粮食而从事其他职业，如产品分配、作战、治理国家、艺术、宗教、医药或哲学，以及改进技术等。

---

[26] H.N. 奇蒂克(Chittick)，1975年，第18页；T.T. 斯皮尔(Spear)，1981年，第12页。

[27] T.T. 斯皮尔，1981年，第12页。

[28] 同上，第12-13页；D.W. 菲利普森(Phillipson)，1977年。进一步探讨见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23章。

[29] B. 布罗克(Brock)，1968年，第75页。

[30] I.N. 基曼博(Kimambo)，1969年，第45-64页。

[31] W.R. 奥奇恩，1974年a，第213页。

[32] W.R. 奥奇恩，1970年，第8页。

贸　易

直到 18 世纪后期，大部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社会的发展均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是独立的。如谢里夫所言，“他们的经济是对称的和内在一体化的，因此我们说他们生产供自己消费之需，剩余产品留在社群内部，以支持非 **836** 农业的手工业发展和社会分化。”③ 各种形式的剩余产品的交换称为贸易。



图片 27.1 锻锄

贸易，即物品的互惠交换，是一种全球性的人类行为，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中也能见到。尽管普遍认为简单的社会维持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但经常有报道说，贸易作为一系列有规律的交换行为，甚至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群中也存在。对贸易的需要源自简单的事实，即所有的群体和地区决不会拥有相似的便利条件和资源。人们进行贸易，因为邻 **837** 居拥有自己缺乏而又是生活或娱乐所需的重要商品。

以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为例。当然有人误解，认为牧业历史上就是与农业分离的，

③ A.M.H. 谢里夫，1980 年，第 36 页。

本质上与农业相对。事实上殖民时期的文献记录把农牧民之间的关系描绘成一幅连绵不绝的宿怨图。人们可以谈论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但历史上也有许多鼓励合作以及牧民与农民交换产品的内容。

关于几百年来存在于东非与东方之间的贸易关系有许多著述。事实上，甚至在19世纪成为东非与海外国家商业交换生命线的远距离贸易关系建立之前，在东非与亚洲国家之间就存在着贸易往来。[34] 但必须强调指出，在东非，有重大意义的贸易关系也包括文化和生态区域之间重要的内在经济联系。

非洲贸易长期受到不同的生态区域和互补性的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刺激。事实上，这种贸易对非洲诸民族来说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它交换的是常常取决于气候和生态因素的基本必需品。非洲的内部贸易与阿拉伯或欧洲贸易相比有不同的动力和目的。例如在某些地区，贸易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克服饥馑，因此往往是无规律和零星的。贸易同时也是以牛群和粮食的方式积聚财富的一种途径。

让我们看看这种贸易的几个例子。源自基库尤兰的口头传说讲到古代基库尤人与邻人阿坎巴人和马赛人的贸易联系。基库尤人的经济是多样化的。当他们还主要是农民时，某些分支，如特图的基库尤人和恩耶里的马提拉人，深受他们的邻邦马赛人的影响，逐渐演化成半游牧经济，几乎就是马赛人的生活方式。反之，阿提基库尤人专事狩猎和采集森林产品，如蜂蜡和蜂蜜。对马赛人来说，基库尤人提供了农产品和各种制品——包括陶罐、葫芦容器、矛和剑，还有蜂蜜、烟草、象皮垫子和赭石染料。马赛人以牲畜、巫术、牛奶、皮革和皮制斗篷来换取这些产品。

在1760年后，基库尤兰仍然是阿坎巴人最好的市场。阿坎巴商人从穆兰加和恩耶里的基库尤社区寻求自己不能充分生产的大宗谷物："恩扎韦"（nzavi,一种便于保存的豆类），"伊克瓦"（ikwa,一种块茎薯蓣属植物），"恩杜马"（nduma,生长于内地水坑的一种竹芋），"恩加基"（njaki,基库尤一种普通的豆类），"姆温贝"（mwembe,传统玉米），有时还包括"恩杜卢"(ndulu,阿坎巴人特别喜爱的一种青菜)。阿坎巴人交换的是兽皮(mbua)和啤酒(uki，这种啤酒比邻近社群的发酵时间长)。有时，阿坎巴人在收获季节出卖劳力以获取等量的粮食。[35]

838

再向西，在维多利亚湖东边角上，有一个广泛的贸易网将许多不同社群联系在一起。阿巴古西人和卢奥人是主要的贸易伙伴。阿巴古西人向卢奥人出售农产品和铁器，如斧、矛、剃刀和箭头，还有皂石以及豹子皮和狒狒皮，以此换取卢奥人的各种产品，主要是牲畜，但也包括畜盐、兽皮、酥油、奶、鱼、陶罐和毒药。马赛人与尼安扎湖的邻居的贸易不多，不过马赛人的阔刀矛和巫术很受阿巴古西人和卢奥人的欢迎。马赛人以获取食品为回报。[36]

进而向南，在坦桑尼亚，源自翁亚姆维兹西部和乌温扎的口头传说述及1800年前来

---

[34] 见本卷第25章。

[35] K.杰克逊(Jackson)，1976年。

[36] W.R.奥奇恩，1974年，第68-69页。

自北方的移民群体以谷物与先到的居民交换陶罐，后者是“沿河岸定居的渔民，只种庄稼”。[37] 在尼扬韦齐人中，林区产品如树皮布、树皮箱、长矛柄、蜂蜜和蜂蜡也在村庄之间贩卖，并且特别受到北部伊兰巴人、松布瓦人和苏库马人村社的欢迎。在温尼亚库萨，大部分妇女制造陶器，但火山地区缺乏适用的粘土，于是她们依靠专家，诸如尼亚萨湖岸的基西族妇女，她们在尼亚库萨村庄里逐家兜售陶罐，还有恩加圣尼人，他们沿着环绕乞力马扎罗山上部高坡之路叫卖大啤酒罐。[38]

在坦桑尼亚早期贸易中最重要的两项物品大概是铁和盐。主要的冶铁地区在北部，在哈人和津扎人当中。铁的普遍缺乏是刺激贸易的主要因素。在整个中部、西部和北部坦桑尼亚，需要各种铁器，如耕作用的锄，造房以及其他手工艺用的刀、斧，还有渔猎和作战用的矛和箭头。许多来自南方和北方的商人到哈人和津扎人地区购买这些铁制品，然后贩回家乡销售赢利。北部的尼扬韦齐人将铁锄引进尼亚图鲁人当中。安德鲁·罗伯兹解释说，不仅在马拉加拉西河下游的苏库马人和瓦基科人渔民中间，而且在西部的马赛人和巴拉古约人中间，从西北来的铁锄被重新打制成铁矛。[39] 在东北部，查加人和马赛人从帕雷冶铁者那里获得铁器，而在18世纪后期，曼巴酋邦成为大部分乞力马扎罗山区的冶铁中心。839 在南部，菲帕铁匠用其产品换取鲁夸湖谷地纺织的布匹，而尼亚库萨人则爬上利文斯敦山脉，以粮食换取金加人熔炉中的产品。铁是一种稀少而珍贵的商品：只有富人才拥有铁锄。将近 18 世纪末在乞力马扎罗山区使用的锄头只有几厘米宽。桑达韦人使用锄头直到完全用秃只剩锄柄为止。[40]

其他地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盐，对以素食为主的人们来说，盐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民族都通过烧草或采集地面沉淀物制取少量的盐，但高质量的盐源很少。主要的盐场位于乌戈戈和伊武纳、坎延耶、巴兰吉达湖、辛吉达和埃亚西湖，以及布昆和卡哈马南部的布伦瓜。最重要的盐泉在布哈和乌温扎。盐的贸易范围很广，“特别是对北部和南部”。[41] 尤其是乌温扎盐泉，似乎自公元 1000 年开始就得到开采。[42] 这一文扎人的盐业后来受到 1800 年成立的原始文扎酋邦的刺激，“扩大了社会联系的范围，产生了一个通过税收、增加盐的产量而从中直接获利的社会集团”。[43]

肯尼亚东南部和坦桑尼亚东北部的米吉-肯达人之间的贸易，到 18 世纪才初见端倪。此时，先前居住在海岸平原后面小山之巅篱笆之中将自己与世隔绝的大部分米吉-肯达人，开始向外部拓展。后来，由于他们人口大增，于是开始第二次移民，定居在其山区不太肥沃的低地，并经常与奥罗莫人和马赛人发生冲突。[44]

米吉-肯达人是谷子、稻谷和果树的主要种植者。在整个 18 世纪，他们是马兹鲁伊人坚

[37] A.D. 罗伯兹，1970 年 c，第 43 页。
[38] J. 艾利夫，1979 年，第 18 页。
[39] A.D. 罗伯兹 1970 年 c，第 45-46 页。
[40] J. 艾利夫，1979 年，第 19 页。
[41] A.D. 罗伯兹，1970 年 c，第 47 页。
[42] J. 艾利夫，1979 年，第 19 页。
[43] A.D. 罗伯兹，1970 年 c，第 47 页。
[44] T.T. 斯皮尔，1976 和 1978 年。

定的同盟者，为许多海岸定居点提供象牙、树胶、蜂蜜、蜂蜡、烟草、谷物、食品和建造独桅小船用的木材。作为回报，米吉-肯达商人获得食盐、珠子、布匹、铁锄和其他物品。约翰·兰菲尔指出，至少到1750年，米吉-肯达人一直是斯瓦希里-阿拉伯贸易的中间商。[45]

在海岸和内陆的贸易中，米吉-肯达人向北和西北方向派遣商队。向北，他们来到奥罗莫人和博拉纳人的乡村，从那里主要获取牲畜以交换布匹和珠子。在西北部，他们渗透到阿坎巴人和查加人的乡村，获取象牙、蜂蜜和蜂蜡。[46] 但米吉-肯达人对内陆贸易的控制时间不长，到18世纪中期，他们已被阿坎巴人所取代。

840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推测，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贸易，到1700年或此前，或许已经卷人远距离交换。但很清楚，只是在大约1800年前后，东非内陆才开始涉足长途贸易，并由此开始与自身以外的经济联系起来。

社会和政治活动

社会和政治机构及组织对社会凝聚力和财产保护及贸易都很重要。在1500至1800年间，东非内陆社会还远未安定下来。尽管现代东非的语言地图已经定型，但内部依然存在向人口稀少或空旷地区大批移民的现象。这些内部迁徙有时使操不同语言或方言而且政治和经济行为不同的民族聚到一起。随着氏族和氏族成员的扩大，内部冲突增多，解决冲突需要更复杂的方法。当不同氏族之间产生争端时，当事各方寻求才高望重者充当仲裁。在某些地区，如桑巴阿、[47] 伊姆博、[48] 南迪[49] 和翁依哈，移民团体或家族在已经定居的人口中担当政治上的领导。在其他地区，移民被吸收进入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内部移民启动了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殖民时期。

因此，在1500至1800年期间，发生了一场向政治集权化和日益扩大的语言和社会集团演化的运动。许多因素决定了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政治规模的扩大。例如，需要比氏族或村社提供的更有效的防卫手段，需要扩大经济活动区域。但当各种社会出现在东非内陆时，两个对比最明显的社会则是牧人和农民。[50]

牧人，如同猎人一样，靠食草动物为生。他们追求一种漫游的生活，长途跋涉为牧群寻找草地。他们在一年中的每个季节都遵从一种有规律的迁移模式，意在为牧群寻找最丰饶的水草之地。牧人的首要任务是必须保护牧群免受敌对的食肉动物，无论是野兽还是人的侵袭。这种生活要求有明确的领导和对辖区的明确界定，以决定行进的路线，并在紧急情况下，不管是敌人试图侵入社区的传统牧场，还是想偷盗牧群，担任起指挥工作。[51]

841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的政治史部分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由于保持农业生产

[45] 见J.E.兰菲尔(Lamphear)，1970年和W.R.奥奇恩，1975年b。
[46] W.R.奥奇恩，1974年a和1974年b。
[47] S.费尔曼，1968年，第1-8页。
[48] W.R.奥奇恩，1975年c和1976年。
[49] 见W.R.奥奇恩，1977年，第58-76页和B.J.沃尔特(Walter)，1970年。
[50] B.布罗克，1968年。
[51] R.A.M.凡·兹万南伯格和A.金，1975年，第79-87页。

和游牧所要求的纪律严明的政治军事组织而成为可能。天平偏向哪一方，取决于社会组织和凝聚力的张弛，以及技术的发展。到1800年，游牧民开始逐渐失去对农民的经济和军事权力，农民通过社会整合和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大，迅速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游牧的马赛人，在整个19世纪，由于牲畜病害、流行病和内战，削弱了军事和经济力量。[52] 因此可以说，由于社会不断的多样化和移民的刺激，整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社会政治进化加快了步伐。

到18世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存在两种主要的社会政治组织类型。诸如基库尤人、米吉-肯达人、坎巴人和马赛人等社会，或多或少以父系和氏族集团为轴心，散居在独立的村落里，没有形成集权化的、传统的官僚政治。然而正如后来所显示的，非集权化并不表明无组织或者缺少政治或社会凝聚力。非集权化的社会有家庭、村社和邻里议事会。在最高一级，他们有氏族或地区议事会，由年长者组成，从中又选出裁决委员会。在家庭、氏族和邻里成员之间保持着群体关系，这种关系规定和支配着个体的行为，并确定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在基库尤人当中，个人带主动性的想法被严斥为追逐私利，"而齐心合力和集体负责的概念被看做首要的美德"。[53]

反之，集权化的(或正在集权化的)社会，如桑巴阿人、帕雷人、苏库马人、尼扬韦齐人和万加人，拥有初步的实行社会政治控制的酋长官僚体制。到18世纪末，这些群体有些社群，如桑巴阿人和帕雷人，已拥有强大的专制国王和最高酋长，由各种议事会、大臣和地区酋长加以辅佐。

让我们看看这些发展的几个具体事例。在1300年前，坦桑尼亚中部散居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定居的班图人，受库希特人影响以放牧为生的姆布古人、戈罗瓦人、布龙吉人、阿拉格瓦人和阿拉曼尼克人，以及从事采集和狩猎的桑达韦人和哈扎皮人。他们生活在村社里，有些村社的废墟——特别是那些班图农民的遗迹——依然散布在整个坦桑尼亚。这些 **842** 早期村社以家族实行自我管理，权力授予两三个有影响的家族。事实上，大部分坦桑尼亚社群似乎从他们迁来并在各自区域定居时起就已承认某种组织的重要性。但由于迁移是个 **843** 体的或小群体的行为，因此在组织里也强调亲属关系。在每个亲属集团内，都存在着政治领导权的种子选手。

在帕雷人中，当每个氏族在自己的领地站稳脚跟，并接受一位子嗣可以继承其位的宗教礼仪领袖时，明确政治领导权的第一阶段便告完成。于是，社群对宗教的需要成为帕雷人政治进化的核心。[54] 在一个地区定居下来后，每个帕雷人群体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神龛(mpungi)，将其与创建该群体的祖先联系在一起，所有成员周期性地群集朝拜。随着人口的增加，不同氏族的人聚到一起成为必然。神话记载了形成时期，即不同氏族的人第一次聚到一起时的情形，但伊萨里亚·基曼博说，大约"16代人以前"，瓦萨纳人铁匠中涌现出一位领袖，他被许多乌格温诺氏族公认为首领。瓦萨纳人后来被瓦苏亚人打倒，后者接

[52] G.S.沃尔(Were)和D.A.威尔逊(Wilson)，1972年版，第89-96页。
[53] R.W.朱赖，1974年，第177-178页。
[54] I.N.基曼博，1969年，第4页。

过当时松散的政治组织，建立了一个集权化的国家。政变的发动者是安戈韦，但巩固乌格温诺国家的是他的儿子姆兰加。基曼博认为姆兰加是坦桑尼亚“伟大的政治改革者之一”：

他将那时的氏族入会仪式改造成一种拥有无限强权的复杂的国家制度。他创设了议事会等级制；他供养着一大群完全依附于他的官员；最后，他派他的儿子们统治各个地区，因此将王国的疆土拓展到帕雷北部的整个高原。[55]

在乌格温诺国的鼎盛时期，其最高酋长“曼吉·姆尔韦”(Mangi Mrwe)由一个大臣议事会和地区酋长(Wamagi)辅佐。



图片27.2 坎巴族女人木雕像，神态明朗自然。颈部和踝部环绕许多铜环，眼睛、肚脐和头发嵌有金属物。高26.5公分

[55] I.N. 基曼博，1968年，第19页。

如前所述，在乌格温诺(以及后来整个帕雷高原)，人口增长再加上礼仪领袖和铁匠的涌现，导致诸氏族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走向联合。例如在帕雷北部，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地理单位，可以集聚更多的人口。另外，还有果敢的领袖，他们的财富和自称拥有超自然力也吸引着家系之外的追随者。

到1600年，布科巴是坦桑尼亚另一个酋长制度较强大的地区。几个统治家系已在农业社会中衍生出来，包括卡拉圭、布哈亚诸国、布津扎和哈人诸国。它们的政治制度比坦桑尼亚其他国家更集权，对土地和牲畜的控制使其纳贡制度更具剥削性。这些国家属于大湖地区。[56] 进而向南，到1600年，整个坦桑尼亚涌现出许多酋邦，它们以多种方式互相 **844** 模仿。例如，每一酋邦均由一组村落和邻里组成，由村民们从统治家系中指定的一位酋长管理。这种酋长被称做"恩特米"(ntemi)或"姆特米"(mtemi)。酋长主持酋邦议事会和最高法庭，并拥有特殊的权位或统治标志，如圣矛。他还保有王室圣火，酋邦的所有火焰均应由圣火点燃。

这些酋邦有段时期在组织和权位标志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令诸如罗兰·奥利弗和J.D.费奇等学者提出共同起源的理论，即这些酋邦最初均源自尼罗河谷，而且直接源自当地的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先例。[57] 但坦桑尼亚政治史学者不承认这种传播(有时是种族主义的)理论。[58] 基曼博特别指出，在地区或大陆的层面上解释非洲政治单元之间相似性的问题，必须在农业民族中寻求答案，理解组织规模的不同必须考虑到它们对当地环境和特殊的外部因素的适应。

安德鲁·罗伯兹告诉我们，诸多尼扬韦齐酋邦的起源也许不应从任何单一的移民或传播过程中寻找，它们萌发于尼扬韦齐这种环境。"从一个早期阶段——但多早我们无法说明——某些人被尊为祈雨者和巫师，充当了开拓林地的先锋和争端仲裁人。"[59] 正是从这些根源产生了尼扬韦齐酋长的权力。"一位尼扬韦齐'恩特米'行使礼仪和管理双重权力，其形式与东非和中非其他酋长有许多相似之处。"[60] 但乌帕雷不同，那里朝着集权化发展，在翁亚姆维兹，小酋邦的数量呈增加趋势，"不仅通过移民，同时也是酋邦不断分裂的结果"。只是在19世纪，"由于贸易的扩展"以及出现了诸如米兰博这样无情的商人和组织者，在翁亚姆维兹才经历了快速的集权化过程。

在坦桑尼亚西南部的菲帕人当中，关于起源的最早的口头传说与(姆兰西)菲帕酋邦的起源相联系。根据罗伊·威利斯记录的一种说法，"世界上第一个人叫做恩塔塔夸(Ntatakwa)，当宇宙形成时他从天上掉下来，并创立了米兰西酋长世系。"[61] 乌菲帕的早期移民是农民，住在狭小的村落里。这促进了集体防御安排，最终筑起防御工事。占统治地位的 **845** 家系很可能来自姆韦鲁湖沿岸，似乎是因其拥有铁匠技术而获得了权力。威利斯认为，

---

[56] 见本卷第26章。

[57] R.奥利弗和J.D.费奇(Fage)，1963年，第44-52页；I.N.基曼博，1969年，第1-10页。

[58] G.G.赛利格曼(Seligman)，1957年，第85页。

[59] I.N.基曼博，1968年，第18页。

[60] A.D.罗伯兹，1968年b，第119页。

[61] R.G.威利斯(Willis)，1968年，第82-83页。

"米兰西现任酋长是铁匠，即一种世袭的职业，这一事实支持了米兰西酋邦的创建者本人是铁匠的说法。"[62] 米兰西口头传说表明，第一位统治者恩塔塔夸派遣他的儿子们建立村庄，并统治该国的其他部分。菲帕王国似乎曾是一些有亲属关系的酋长们统治的酋邦组织的联盟。

后来在18世纪，由于来自北方的一些游牧民的一次入侵，把从布干达、布尼奥罗和安科莱仿效来的政治观念传入菲帕，菲帕的政治类型发生了变化。他们带来一种统治原则，这种原则不是基于以前在菲帕实行的酋长父子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统治者与他挑选的许多随从之间一种个人效忠契约。这些边缘地带的统治者与国王没有亲缘关系。大概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推翻了传统的米兰西统治家系，代之以特瓦王朝。有些较小的酋长依然效忠于米兰西王朝，对此显然必须以武力征服。然而，特瓦王朝无法实行和平统治，因为将近18世纪末，乌菲帕再次遭到入侵，尼哈人烧毁了米兰西的村庄。到1800年，两个竞争对手之间为争夺特瓦王位的内战仍在激烈进行。

很显然，在1500至1800年间，因适应人口、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在坦桑尼亚涌现出一些大小不等和集权化的"恩特米"酋邦。它们由自然和人文环境塑造而成，集权化和经济扩张是大部分坦桑尼亚国家的目标，而立国过程通常是痛苦的。有时，如同尼扬韦齐的情形一样，这些国家面临分裂或分离。有时，如同菲帕的情形一样，它们又面临改变和内战。在许多方面，它们面临的是与现代非洲国家相似的问题。

在肯尼亚西部，卢奥人似乎强调他们的亲缘制度、祖先崇拜和世袭领导权，结果他们往往围绕礼仪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韦格皮尼"(weg-piny,拥有土地的氏族)和名义上世袭的酋长组成与权利或义务相关的社区。当他们到达尼安扎时，他们往往建立比早期社区更集权和更层次化的政治体制。虽然卢奥人氏族和家系在许多方面是平等的，但是酋长、祭司和平民群体的存在，表明氏族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而这在肯尼亚社会中比较罕见。

关于前殖民时代卢奥人社会政治制度的最详尽的阐述大概是彼得·C.奥卢·阿林戈进行的阿勒戈-卢奥人研究。[63] 他同意B.A.奥戈特的看法，即在政治组织的最高一级，卢奥人被分成12或13个大小不等的次族群(Dgendini)。次族群的成员由一种半自治的政治和领土单位"格文"(gweng',复数为gwenge)组成。在理论上，"格文"由氏族成员占据，但有些部分常常租给"卓达克"(jodak,外来的家系和氏族)，这样做"要么是由于后者在帮助征服新土地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么是依据声称拥有领土单位中所有土地的统治氏族所规定的条件。因此，'格文'社会往往成为多元化社会"。[64]

846

任何"格文"的最高政治机构都是长老议事会(buch jodeng gweng')。在阿勒戈，有统治家系的首领均可成为长老议事会的成员，而"卓达克"社群只有精心挑选的和富有才干的长老代表可以参加。(在伊姆博,另一个卢奥族酋邦没有这种区别。)[65]"格文"议事会是氏族土地的管理机构。议事会可接受或拒绝新来者，充当有关"格文"案件的最高上诉法

[62] R.G.威利斯，1968年，第84页。
[63] P.C.奥卢(Oloo)，1969年和B.A.奥戈特，1963年。
[64] P.C.奥卢，1969年。
[65] W.R.奥奇恩，1975年c。

庭。议事会还有权举行仪式庆典，宣战或与其他“格文”媾和。“卓东·格文”(jodong gweng)的决定对所有臣民都有约束力：凡蔑视其规章和决定者会受到诅咒。据信，“卓东戈”(jodongo)的诅咒会使人患上不治之症(chira)，是祖先强加给犯罪者及其子孙的。“格文”议事会还可将惯犯及其家属从领土单位中驱逐出去，使之遭受肉体惩罚，并对犯各种罪错的人处以罚款。

在“格文”议事会之上是“巴奇·平尼”(buch piny,次族群议事会)。该议事会成员包括各议事会的首领以及著名的占卜师、巫医、祈雨者和杰出的武士。“巴奇·平尼”通常由称为“鲁斯”(ruoth)或“乌翁·平尼”(wuon piny)的首领主持。议事会处理有关“平尼”(piny,次族群的领土)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司法和经济事务，如谋杀、偷盗牲畜、边境纠纷、饥荒、流行病、入侵、防御、贸易以及氏族之间和“格文”之间的冲突等。在少数集权化的“平杰”(pinje)中，如伊姆博，“巴奇·平尼”是一种有效的控制和高压工具。在诸如萨夸或阿森波等地，集权化尚未完成，“巴奇·平尼”的权力往往有限，其作用仅仅是仲裁内部争端。

卡伦津人在肯尼亚西部高原生活了几个世纪，形成一个典型的非集权化社会。B.E.基普科里尔提出，直到19世纪，其政治制度仍是平等的和非集权化的。[66] 长老和有影响的从事专业者垄断了权力。具有口才，即在议会发表意见有说服力，可令人接受，以及掌握优先权和习俗被认为是获得政治领导权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首先必须突出自己婚姻美满而且是某一氏族或邻近社群中有社会地位的成员，才能获得领导的荣誉。在卡伦津 **847** 人的分支南迪人当中，有证据表明在18和19世纪之间，通过设立一位精神领袖，叫做“奥科约特”(orkoiyet,复数为orkoik)，采用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形式。H.A.姆万齐认为，虽然以氏族和邻里议事会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南迪人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但到19世纪末，“奥科约特”已将南迪政体转变成一种神权政治，他自己担任君主。[67]

最后，“奥科约特”能够要求分享战利品，并通过让某个人代表作为每个议事会的顾问，将权力施加到地区和邻里议事会。这种对政治领域的干涉在地方武士与“奥科约特”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但在许多其他事情上，“奥科约特”很少有直接的权力或影响。然而有证据表明，到1890年，如同马赛人的祭祀领袖(laibons)那样，南迪“奥科约特”开始觊觎比其前辈所想见的更大的政治权力。这种意图受到地区议事会的鼓励，议事会因“奥科约特”的管理获得好处，结果对他的超自然属性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信仰。

于是，在南迪人当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在这些议事会和“奥科约特”之间保持沟通。这些官员与武士首领们一起行动，请“奥科约特”允许发动一场计划好的袭击。他们还充当“奥科约特”的情报人员，以便他能知晓他们地区的事件和公众意见。这些安排在19世纪下半叶进一步使南迪社会集权化。[68]

---

[66] B.E.基普科里尔(Kipkorir)，1974年。
[67] H.A.姆万齐，1973年。
[68] W.R.奥奇恩，1977年，第58-76页。

结 论

到 1800 年，一些操不同的尼洛特、库希特和班图语言的社群散居在整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其人数不详。只是在东非的大湖区才产生了一些大国和王国。[69] 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典型的政体特征是规模小并以氏族为轴心。大部分操班图语的人是农民，不过一旦可能他们便饲养和精心照管牲畜。游牧民，如图尔卡纳人、奥罗莫人和马赛人的社会更具侵略性，他们控制了务农的班图人之间的领土的重要部分。[70] 沿海地区是斯瓦希里 848 人城市国家，由当地的阿拉伯人实行寡头统治。城市中人口混杂，斯瓦希里语占支配地位，生活节奏与内陆大不相同。

18 世纪的结束标志着东非国家独立成长的结束，数百年来大部分内地民族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铁器时代。在 1800 年之后不久，当阿拉伯和欧洲的入侵浪潮波及其领土时，独立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民族面临新的并且经常是可怕的事件。他们的传统文明大部分遇到严重破坏，或者被淹没在高涨的暴力洪流之中。许多长期奉行的习俗和信仰遭到破坏，许多古老的遵守法令的方式被弃置一旁。

东非处于这样一个不利的境地来迎接来自外部世界这一无情和突然的挑战。根据非洲的粮食生产能力，不论是为战争还是为和平，整个而言，它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强国。1500 年后，欧洲已进入一个影响深远的机器和科学发现及发展时期。与此相对照，非洲内陆则不然：它仍继续稳步而缓慢地发展自己的文明。[71] 这种铁器时代的文明有许多成就。许多进步和发明体现在社群生活的艺术、新作物的采用、金属冶炼术的推广、贸易的增长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自我管理的方法和维持和平的方式等。这些肯定是重要的收获，但它们无法与欧洲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正在上升的力量相竞争。到 1800 年，欧洲人的技术力量远远超过非洲人。[72] 到 1900 年实力差距已非常巨大。这一点为 1800 年以后非洲大部分历史起了铺垫作用，成为帝国主义在非洲这一背景的一部分。它对解释 1800 年以后开始的危机很有价值，尽管直到 1850 年后这种差距本身才被人们直接感受到，但在此之前很久它就对内陆民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孙红旗 译）

[69] 见本卷第 26 章。
[70] R.M.A. 凡·兹万南伯格和 A. 金，1975 年，第 79-109 页。
[71] W.R. 罗德尼(Rodney)，1970 年 a 和 1972 年。另见 W.R. 奥奇恩，1975 年 d。
[72] 见 E.A. 艾尔珀斯，1973 年和 A.M.H. 谢里夫，1980 年。

28 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洋诸岛屿

R.K. 肯特

马达加斯加

现代马达加斯加的国家框架是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构建起来的，当时其腹心地带梅里纳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将其自身的和外来的欧洲特性混合在一起强加给其他许多居民，而且几乎成为被外界所认可的唯一的马尔加什人。梅里纳的一次军事失败之后开始的殖民时期，使得马尔加什人在那个世纪更是无所不在。不过，除了这些相对较为晚近的事件的影响之外，还有一段不同的而且包含内容更为广泛的历史，其中1800年之前的300年堪称整个马达加斯加历史的一座丰碑。几乎可以肯定，马达加斯加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在这300年间汇聚到构成今日马尔加什民族的这一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集合体中的，其中包括安坦卡拉人、安坦德罗伊人、安坦巴华卡人、安塔诺西人、安蒂莫罗人、安蒂萨卡人、安蒂法西人、巴拉人、贝齐米萨拉卡人、贝齐寮人、贝扎诺扎诺人、梅里纳人、马哈法利人、萨卡拉瓦人、西阿纳卡人、塔纳拉人、齐米赫蒂人。①

到16世纪中叶，海外居民移居马达加斯加的活动已经结束，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居民已经与欧洲人——绝大多数是葡萄牙人——建立起联系。同时，至少一个历史较长而且影响较大的王室家族——马鲁塞拉纳家族已经开始形成。在17世纪早期，马达加斯加在政治上如同一个蜂巢，大都是一些自我封闭的小酋邦。17世纪结束之前，马达加斯加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由萨卡拉瓦帝国统治，而在高原居民中则出现了若干王国，如贝齐寮和梅里纳；在东南部有安蒂莫罗、安蒂萨卡、安蒂法西和安塔诺西；在最南部有安坦德罗伊；西南部有马哈法利；在南方内地有巴拉等等。在同一个世纪里，与欧洲人的联系范围减少，而当荷兰、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将其注意力转向非洲这个大的岛屿时联系更加强了。奴隶贸易也由过去的仅限于西北地区的三条路线主要出口到东非和阿拉伯，变为经马达加斯加广阔的沿海地带的一些据点出口到开普敦、马斯克林群岛和美洲新世界。武器扩散已经开

① 族体名称的拼写从未实行标准化，因此，也存在其他拼法。通常，前缀an-(或ant-)表示“……的人”，但在日常语言中不发音(即：Antanosy = ‘Tanus’，因为马尔加什语“o”相当于法语中的“oo”或“ou”)；be-和-be表示“许多”或“大量”，也指“重大”，表示重要性；tsi-和-tsi是否定的意思。除上述所列之外，还有大约70,000马夸人，他们是非洲人的后裔，在19世纪上半叶经莫桑比克进人马达加斯加。最近有人提出马达加斯加一些主要族体的名称是在梅里纳霸权时期形成的，这是不正确的，

始，数量相对较少，但已出现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情况。在 18 世纪，萨卡拉瓦帝国，特别是作为其北方组成部分的伊博依纳，[2] 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东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也首次在政治上联合组成了贝齐米萨拉卡王国联盟。1800 年前，北方的萨卡拉瓦和贝齐米萨拉卡因马达加斯加内外种种事件的作用而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状态。相比之下，弱小而不统一的伊梅里纳却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人口，进行政治上的复兴，这一切给梅里纳人日后的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移民与联合

安蒂莫罗人由于是 19 世纪以前唯一具有马尔加什语书写传统(使用阿拉伯字母表)的群体，并且是在巫术和宗教方面有特殊能力的民族而在马达加斯加名声渐隆。关于安蒂莫罗人的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比如，这些安蒂莫罗人的祖先是何时、在马达加斯加何地登陆？他们来自何方？他们自身的伊斯兰化程度如何？他们对马达加斯加岛产生了哪些影响？早期的作家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约 15 世纪到达马达加斯加的东北地区，并认为他们是从阿拉伯来的阿拉伯人。[3] 甚至在近期，对于伊斯兰教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真正的力量影响着安蒂莫罗人的过去和现在，依然存有疑问。[4] 古斯塔夫·朱利安是最先提出东非起源论的学者，[5] 这一观点在过去十年中得到某些方面的支持。他还认为早期的安蒂莫罗人具有伊斯兰的宗教教育与组织结构，但是由于与伊斯兰世界完全隔绝而未能维持下来。[6] 有一方面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即其祖先到达马达加斯加东南部的马蒂塔那河之前，安蒂莫罗人尚未形成社会和国家。而这里正是安蒂莫罗人的祖先与“托姆庞-塔尼”(tompon-tany,土地之主;初民)混合并形成社会和国家的地方。不过要确定他们到马蒂塔那河定居的大致年代还是可能的。因为在 1507 至 1514 年间正好有三位葡萄牙船长访问过这一地区。头两位船长相隔一年先后访问时，未发现或报道过那里有“摩尔人”，但却注意到当地居民对于与他们进行贸易并不陌生。[7] 第三位船长在 1514 年被直接派遣到马蒂塔那去建立一个商行代理处。当时，马蒂塔那有一个“住着许多摩尔人的城镇”。“托姆庞-塔尼”反对葡萄牙人的商业活动存在大约六个月之后，迫使第三位船长永远放弃马蒂塔那。[8] 由于安蒂莫罗人的初民在这个特定事件中是唯一真正可能的“摩尔人”，因此，马蒂塔那的定居活动肯定是在 1509 和 1513 年间发展起来。

851

---

② 前缀“I-”在地名中表示“……的地方”；在个人或集团名称中还表示人称冠词。这代表了非洲的一种遗风。

③ A. 格朗迪迪埃(Grandidier)，1908-1928 年，第 4 卷，第 1 部分，第 156 页。他推测安蒂莫罗人的一些先民是东非来的旅居者，但没有发现非洲文化影响可修正基本的阿拉伯起源论。

④ J. 福布雷(Faublée)，1958 年，第 71 页，他支持 A. 范·热内(Van Gennep)，1904 年，第 4-11 页，要求提供伊斯兰起源的证据。E. 德弗拉库(de Flacourt)，1661 年，第 171 页，概述了马达加斯加岛东南部的穆斯林等级制度。

⑤ G. 朱利安(Julien)，1929 年，第 75 页，

⑥ R.K. 肯特(Kent)，1970 年，第 108-114 页。

⑦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1 卷，第 18-19 页和第 48-49 页，关于洛伊·佩雷拉和迪亚戈·卢帕斯·德塞奎拉(他不仅仅是一位船长)在 1507 年和 1508 年的访问。

⑧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1 卷，第 53 页；“Documentos Sobre……”，1962-1975 年，第 3 卷，第 508 页，关于刘易斯·菲盖拉的航海情况。

有关安蒂莫罗人的形成发展时期("当时马蒂塔那还没有七个村落")和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字传说，不仅是记载历史事件的文献，而且也是一些方面自我反省的过程。通过这些传说记载可大概了解关于在安蒂莫罗先民们到达之前与居住在东南海岸地区的居民相遇的情况；关于父系观念根深蒂固的新移民与固守母系观念的"托姆庞-塔尼"相遇的情况；以及不只一批而是几批"原始安蒂莫罗人"抵达马蒂塔那和新移民之间多次冲突的情况。[9]只有处于最高地位的祖先雷马卡拉卢巴超然于这些冲突倾轧之上，因此他回到了"麦卡"(麦加)。[10]更准确地说，在16世纪的前75年中，安蒂莫罗人避免与一个或多个"托姆庞-塔尼"群体混合，并形成了由四个贵族氏族和四个祭司当权的氏族所支配并以其为中心的社会。实际上，现在对于直到19世纪安蒂莫罗人内部历史状况的了解大部分只是四个贵族氏族安蒂奥尼、安坦马哈佐、安泰萨姆博和扎菲卡斯曼博之间的冲突情况，它们在这个王国内各有其自己的领地范围。[11]"安德里亚诺尼"(Andrianoni)，即所有安蒂莫罗人的统治者可能来自这四个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有时四个氏族总称为安蒂奥尼)。与此同时，这些祭司当权的氏族为各自在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首要作用而争逐。例如，齐梅托、扎菲姆博拉茨、安纳卡拉和安蒂洛特里均想成为安蒂莫罗人的神圣手稿("索拉贝",sorabe)的保护者，企望成为这个王国的高层祭司，寻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安德里亚诺尼"及其氏族。[12]可以想象的是，这些贵族并非没有控制安蒂莫罗人社会的宗教方面的野心，就像安塔拉奥特拉也在寻求世俗权力一样。在19世纪，祭司当权的安纳卡拉取得了对于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垄断，政治与宗教这种状况直到其权力因平民的反叛开始受到侵蚀时才受到威胁，不过反叛受到了来自伊梅里纳的外国军队的镇压。[13] **853**

当安蒂莫罗人在马达加斯加的东部沿海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除了一些"托姆庞-塔尼"群体外，这里还有一些相对这些初民而言的新移民，他们很早就来到这里了。[14]安坦巴华卡人是安蒂莫罗人的北方邻居，不过这些人也同样散居在东海岸一线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在安坦巴华卡人中还集中着拉米尼亚人的后裔，即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他们的伟大祖先也普遍认为是来自"麦卡"。关于拉米尼亚及其同伴的来源有各种说法，[15]但一致认为他们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时间至少应早于15世纪。在留存下来未融入安蒂莫罗人文本中的扎芬德拉米尼亚人的极少的传说中，有一则认为不论最终确定拉米尼亚来自何方，东

---

[9] G. 朱利安，1929年，第1-23页和1933年，第57-83页；G. 蒙戴因(Mondain)，1910年，第50-191页(阿拉伯-马尔加什语文本，法语译文)。

[10] 参见G. 蒙戴因，1929年，第51页；G. 费朗(Ferrand)，1891-1902年，第2卷，第57页。

[11] 这些氏族在17世纪减至三个。安蒂奥尼和安坦马哈佐占领了马蒂塔那河下游和中游地区。安德里亚诺尼的首都是伊瓦图。这些祭司氏族总称安塔拉奥特拉，以武希佩努为中心。参见H. 德尚(Deschamps)，1961年，第93页和第110页地图。

[12] 参见G. 费朗，1891-1902年，第2卷，第69-72页；第1卷，第1-41页；H. 德尚和S. 维亚尼斯(Vianés)，1959年，第41-45页。

[13] G. 于埃(Huet)，1901年。

[14] 在安蒂莫罗人的文本中，大约有13个"托姆庞-塔尼"被作为群体名称而提到，其中的安坦马纳姆帕特拉和马南卡伦加是较为重要的。少数早期的新移民被称为翁贾茨(Onjatsy,发音为Undzatse)，在安蒂莫罗人的统治下保持了一些特权，其中一些人与翁贾茨妇女结了婚。

[15] 尤其是，爪哇人、设拉子人和印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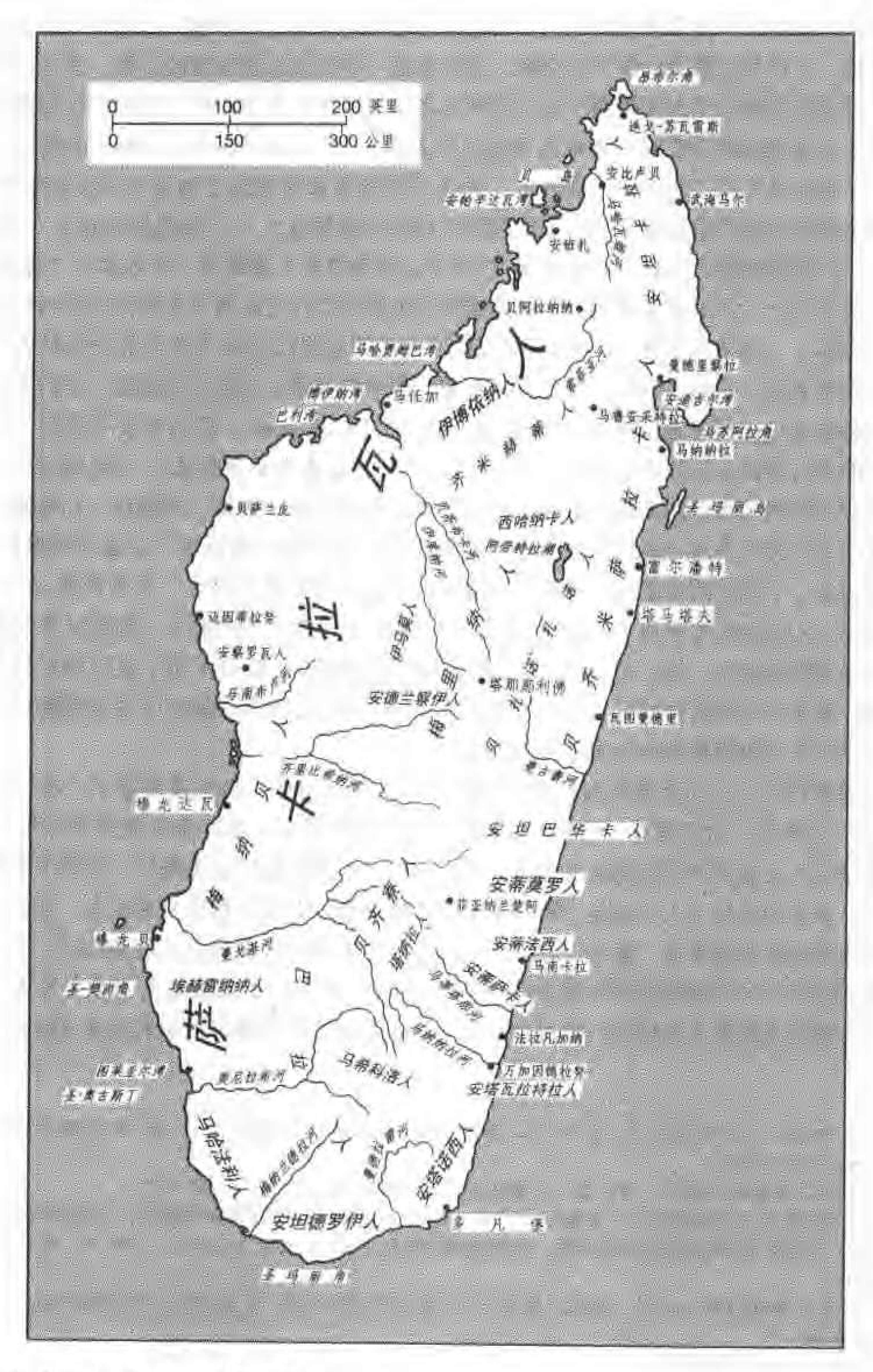


插图 28.1 马达加斯加民族集团

资料来源：根据 R.K. 肯特所著《马达加斯加的早期王国，1500-1700 年》中的马达加斯加地图改编，©1970 年，霍尔特、赖恩哈特和温斯顿公司。蒙出版者允许改编地图。

非地区都是前往马达加斯加的重要中转点。[16] 总的说来，到安蒂莫罗人抵达之时，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已在“托姆庞-塔尼”人中取得特权地位，正在实行的一种习俗“索姆比利”(sombili)便是只有拉米尼亚人的后裔才能宰杀家畜。可以想象，而他们的文本也证实，安蒂莫罗人的祖先寻求与扎芬德拉米尼亚妇女通婚。他们面对强有力的竞争，但联盟却是“无结果的”。[17] 最后，冲突变成了先来者与后来者之间的冲突，造成很大动荡，在“托姆庞-塔尼”的一些口头传说中把这说成是两个“巨人”(达雷菲菲和法特雷佩塔那那)的争斗。[18] 这种普遍的冲突恰逢贵族扎菲卡斯曼博人大约1550年成为马蒂塔那的新的强大统治者时达到高峰。安蒂莫罗人的文本认为扎菲卡斯曼博人的创建者(扎菲卡齐曼博贝)源自雷马洛哈拉，即贵族安蒂奥尼的直系祖先，他代表当地出生的第三代人，他的17个儿子中有两个是贵族氏族安坦马哈佐和安泰萨姆博的创立者。[19] 虽然这些家系的文本表明他 **854** 们经过几代人才与这一地区的文化和语言相融合，但同时也表明他们自己拥有凝聚力。他们要求扎菲卡斯曼博人的子嗣出自安蒂奥尼人，并给他们适当的贵族和当地身份。据马达加斯加东南部为人熟知的17世纪中期一个独立的传说称，扎菲卡斯曼博人是最后到达马蒂塔那的海外移民，他们的名字来自于一名“托姆庞-塔尼”人的妻子。[20] 他们被统一认为是祭司(ombiasa)和抄写员，是在写作之时(1658年)150年前从麦加派遣而来教诲当地居民的。[21] 扎菲卡斯曼博对16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安蒂莫罗人的社会进程产生了某些决定性影响。他们取代了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在“索姆比利”方面祭祀仪式的特权，并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手段严格应用。他们削减了平民的自由，把宗教推人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还通过处死尽可能多的拉米尼亚人男性后裔并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置于限定的地区而解决了安蒂莫罗人和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之间的冲突。[22] 可以说，扎菲卡斯曼博在马蒂塔那创立了第一个强大的安蒂莫罗人王国，产生了两个有才能的“安德里亚诺尼”，即雷贝希雷纳(约1580-1615年)和安德里亚帕诺拉哈(约1630-1660年)。[23]

在马蒂塔那发生的这些动乱的影响超出了安蒂莫罗人地区。例如，它产生了后来成为其社会永久性特征的流放的规定。[24] 由于祭司氏族更多地被称做是专门家，不能纳人安蒂莫罗人王国的一个辖区，通常的做法是将他们分散到其他人口中，向需要者提供专门的技艺。[25] 负责此项事务的可以是巡回祭司“奥姆比亚萨”(Ombiasa)，[26] 也可以是那些通常为服侍统治者而定居下来的人。在年代学方面，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做法可用以衡量从16世

---

[16] 见G. 费朗，1902年，第219-222页。

[17] G. 蒙戴因，1910年，第52-55页，“无结果”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18] 这一传说在A. 格朗迪迪埃的著作中有论述。1908-1928年，第4卷，第1部分，第135页和注①。

[19] G. 蒙戴因，1910年，第56-59页。其他儿子也是此类创建者。

[20] E. 德弗拉库，1661年，第17页。应注意“曼博”(mambo)和“卡兹”(kazi)是东南和中部非洲所有的称号。

[21] E. 德弗拉库，1661年，第17页。

[22] 同上，德弗拉库将这一屠杀事件的时间定在17世纪30年代。

[23] R.K. 肯特，1970年，第98-99页。

[24] 见B.F. 勒古韦尔·德拉孔布(Leguével de Lacombe)，1823-1830年，第2卷，第187页。

[25] 见G.A. 肖(Shaw)，1893年，第109页，关于安蒂莫罗人移居国外的一个例子。

[26] 发音为“umbias”(复数和单数)，通常译成祭司、巫医、医生。“奥姆比亚萨”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他们分为许多种类，分散在马尔加什人中。

纪中叶到18世纪末被流放的安蒂莫罗人对于其他居民的影响。不过总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助于推进(或许是最早的泛马尔加什人)正进行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从自给自足的内向型酋邦(他们对于领土扩张漠不关心，而且往往不了解远方其他地区的情况)转而成为欲望更加广泛也更加强烈的政治联盟。从德弗拉库的著作中可知，来自马蒂塔那的“奥姆比亚萨”(安蒂莫罗这个名字不为他所知)不仅是东南地区其他部分的奥姆比亚萨的“主人”，他们还训练外国专门的宗教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是本社会的核心人物。马蒂塔那地区持续的动荡还不时导致贵族被流放，而扎菲卡斯曼博人对扎芬德拉米尼亚人成年男子的屠杀迫害，肯定使许多人被迫迁往马达加斯加内陆地区。从这些流亡者中，可能产生了扎菲兰姆博人，即塔纳拉人或伊孔戈的统治者，[27]他们是未来的伊梅里纳贵族的一些祖先，[28] 甚至还有安塔诺西人中的扎芬德拉米尼亚人。

按德弗拉库的观点，扎芬德拉米尼亚人是16世纪初到达安塔诺西的。[29] 其他人认为晚得多，大约1625年才到达。[30] 较早的这个年代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安塔诺西的扎芬德拉米尼亚新来者接受与来自马蒂塔那的逃亡者的同源后裔相混合并非不可能。一份有关扎芬德拉米尼亚-安塔诺西人的谱系认为，存在一个可以追溯17代人的“王室脉系”，虽然该谱系从编年史的角度讲远不是一份可信的文献。[31] 事实上，1614至1680年间常驻的欧洲人所写的文献以及即将完成的一项研究[32] 都清楚地表明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不可能在安塔诺西人中创立一个权力中心；他们将“索姆比利”引入了这一地区；他们擅长于建造木屋，饲养并不断增加牲畜，即使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牲畜也是主要的财富来源；他们已有亲缘关系和权力意志的概念；他们在安塔诺西人的土地上获得了一种特权地位。他们渴望获得财富，内部存在倾轧竞争，而且没有能力寻求一种宗教信念以超越“卢罕德里安”(Rohandrian，对扎芬德拉米尼亚最高等级之称)的各人要求并联合所有的安塔诺西人，所有这一切都有碍于建立由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国王统治的单一国家。结果，两个模仿“托姆庞-塔尼”等级制的社会在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中并行发展了起来。当法国人于1643年在安塔诺西建立多凡堡时，这两个社会处于相互渗透状况，这不仅是异族通婚的结果，而且还因为双方的上层社会均向政治集中化转变。多凡堡在这一地区存在的30年中，即从1643到1674年间完全改变了这一进程，政治上的统一则继续难以把握。[33]

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不是王国的建立者，而安蒂莫罗人则代表了一种少见的情形，即新来的居民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但是马鲁塞拉纳人代表了一个泛王室家族，是马达加

[27] H. 德尚，1965年(第三版)，第55页，(引自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13)

[28] 一份留有疑问的安蒂莫罗人文献(更确切地说是受安蒂莫罗人影响的)认为，在19世纪末期(当时梅里纳已在马达加斯加大部分地区获胜)，一些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已前往伊梅里纳地区。

[29] E. 德弗拉库，1661年，第5页。在其前言中，德弗拉库将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时间定在他的生活时代之前500年左右。

[30] 例如，A. 格朗迪迪埃认为年代介于两者之间。

[31] 巴黎国家图书馆，“法国文库”手稿20181，第146-147卷及以后诸卷；H. 德弗拉库，1661年，第48-53页；以及L. 马利亚诺(Mariano)，《叙述》，1613-1614年，引自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49页。

[32] R.K. 肯特，无出版日期。

[33] 同前，另见下文。

斯加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家族。最后，马鲁塞拉纳家族将为马哈法利人，梅纳贝和博伊纳的萨卡拉瓦人，以及向部分安坦德罗伊人和巴拉人提供统治者。与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和安蒂莫罗人一样，马鲁塞拉纳人一旦形成后就不再是马达加斯加的外人，不再是未经同化的保持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外国人。马鲁塞拉纳人的起源及他们形成的时期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正如其他新移民的情况一样)。首先，马哈法利人和萨卡拉瓦人的口头传说关于马鲁塞拉纳最早的祖先或者说"原始马鲁塞拉纳人"从何处而来不一致。口头传说收集之时正值大部分萨卡拉瓦人仍然在同一时期独立发展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起源说。其中一种认为安德里亚纳利姆贝人来自马达加斯加内地，另一种认为安德里亚曼达佐阿拉人来自海外。[34]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有许多传说认为马鲁塞拉纳人的创立者是雷巴雷塔沃科卡。[35] 马达加斯加西南部的马哈法利人(马鲁塞拉纳人于16世纪某一时期从其中产生)将奥莱姆贝茨托托作为其王室家族的创立者。[36]

产生这些矛盾的部分原因是一些作者认为马鲁塞拉纳人起源于马达加斯加东南部;他们是来自印度的无依无靠的印度人，大约在1300年前后，在今天的多凡堡附近登陆上岸，后北上并创立扎雷贝哈瓦即安蒂萨卡王室家族；他们从那里向西迁移，为最南部的安坦德罗伊人(扎菲马纳雷人)、为南方内地的巴拉人(扎菲马尼利人)以及后来为马哈法利人和萨卡拉瓦人提供了王室家族。[37] "马鲁塞拉纳"一词被解释为意指"有许多港口者"——这是对王族的称谓，因为王室拉达马一世派遣使节和官员到各个港口并建立了一些海关[38] ——表明是一种控制海岸的古代战术。最近几年，主要通过参考原始资料，对所有这些观点作了一些修正。[39] 正如安蒂萨卡人的口头传说表明的那样，处于统治地位的扎雷贝哈瓦是西海岸萨卡拉瓦人的一支，他们大约在1650年之前穿越马达加斯加，但不会早于1620年。[40] 这段历史还得到其他证据证实。[41] 因此不存在马鲁塞拉纳王朝从西向东迁移的情况，也不必再怀疑这个家族是在马达加斯加西南地区形成的。伊巴拉的王室家族扎菲马尼利由西南地区进入南方内地，而不是相反方向，而推测他们可能起源于印度没有证据支持，包括语言学方面的，因为在马鲁塞拉纳人王室语言中从未发现印度人的词汇。 857

[34] 参看C. 吉莱恩(Guillain)，1845年，第10-11页。

[35] 尤其是L. 托马森(Thomassin)，1900年，第397页，拼写为Rabavavatavokoka(雷巴瓦瓦塔沃科卡)。根据其他传说，他还有一个父亲。

[36] C. 普瓦里埃(Poirier)，1953年，第34-35页。事实上，"安德里亚马鲁塞拉纳"是最早一位马鲁塞拉纳统治者的通称，他的头衔称为"安德里亚马鲁"，后来成为所有马哈法利人的保护神(见下文)。有关马哈法利人世系难以判断的原因是由于这样一个政治事实，即在西南地区的这一群体中形成了四个国家，使这一早期王室系谱更为复杂。

[37] A. 格朗迪迪埃，1908-1928年，第4卷，第1部分，第127-128页(注①)，第168页、212页、214页、278-280页(注④)。

[38] A. 阿比纳尔(Abinal)和V. 马尔扎克(Malzac)，1888年，第557页。

[39] R.K. 肯特，1969年。

[40] 参见马尔尚(Marchand)，1901年，第485-486页；H. 德尚，1936年，第162-164页，书中各处，1965年，第94页。

[41] 见J. 博托(Boto)，1923年，第252-253页。另外，萨卡拉瓦人在穿越内地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其后留下许多历史记忆。

从据认为1300年到达马达加斯加和大约1550年马鲁塞拉纳人形成之间这大约250年时间，对印度人政治影响的破坏也不少。最后，大约135年前，査尔斯·吉莱恩在原址曾表明，梅里纳国王拉达马一世(1810-1828年)在19世纪早期授予的称号带有对港口确保控制的意思，而在1840年前后在马达加斯加西南部地区却丝毫没有相同的意思。[42]

这两个不同的萨卡拉瓦传说并不是矛盾的。安德里亚曼达佐阿拉和雷巴雷塔沃科卡分别表示“使森林枯萎的君王”和“高贵的弯曲的芦苇”。因为马哈法利人和萨卡拉瓦人对去世的君主都要改变称谓。(语言上的这一禁忌马哈法利人称“安纳雷塔黑纳”(anaratahina)，萨卡拉瓦人称“菲塔黑纳”(fitahina))，而且在其习语中不能用“死”这个词来指去世的君主，很可能“弯曲的”芦苇这一概念(芦苇这一概念类似于祖鲁人的“尤斯兰加”(uthlanga)[43]指雷巴雷塔沃科卡，尤如“菲塔黑纳”指安德里亚曼达佐阿拉。另一个支持“菲塔黑纳”的论据是，雷巴雷塔沃科卡从未建墓，并认为安德里亚曼达佐阿拉始终有墓(尽管发掘时发现是空的)。[44] 奥莱姆贝茨托托的墓位于马哈法利。[45] 同一时期，由内地而来的新移民(也许是被其他新移民逐出)——以伟大的君主阿里(安德里亚纳利姆贝)为代表[46] ——与海外来人——以安德里亚曼达佐阿拉为代表——通过合作与冲突而相互吸引，858 这在马达加斯加是一种普遍的模式。一些马鲁塞拉纳人的祖先很有可能是从海路到达马达加斯加西南部的。在萨卡拉瓦人中居统治地位的马鲁塞拉纳人支系被称为扎菲沃拉麦纳(黄金之子)，而在马哈法利的马鲁塞拉纳统治者们的墓则叫“沃拉麦纳”(volamena，红银，即黄金)。确实有传说认为在靠近今日的图莱亚尔港口的地方，萨卡拉瓦-马鲁塞拉纳人的祖先有大量黄金没有卸船上岸。[47] 鉴于在马达加斯加整个南半部既没有发现黄金，也没有开采(16世纪时葡萄牙海员向沿海居民展示黄金并没有引起关注)，传说记载黄金是输人的大概是不会错的。同样，“沃拉麦纳”成为一种神圣的(fady,faly)金属这一事实反映出黄金已成为各王朝的一种动力。因为邻近罗得西亚巨大的金矿，人们一次渡海便可将黄金带到马达加斯加(非洲-阿拉伯商人甚至自愿背井离乡的葡萄牙人携带大量黄金无处可去)，而且许多在罗得西亚出现的词汇和风俗习惯在马达加斯加也相应出现，人们几乎不可回避马鲁塞拉纳与姆韦尼·姆塔帕极有可能互有联系。[48]

20世纪初由一名萨卡拉瓦人收集出版的令人极感兴趣的传说，弄清楚了马鲁塞拉纳人最初的情况。这些传说讲述了新移民前往西南地区在政治上立足最初的失败情况，特别是许多行动毫无结果。传说表明，一直到与当地的首领家族发展起血缘关系，才开始取得

[42] C. 吉莱恩，1845年，第11页，注①。他在图莱亚尔附近得知，“马鲁塞拉纳”一词的意思是“许多道路”，反映了在马哈法利地区最早的马鲁塞拉纳国王们习惯将其住所建在聚居地中央，住地周围有许多道路通向四面八方的村落；不过吉莱恩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他也知道这一词在梅里纳所代表的含义。

[43] 参看C. 卡莱韦(Callawy)，1870年，第2-3页和注释。

[44] E. 伯克利(Birkeli)的报道，1926年，第32页。

[45] M.A. 马里恩(Marion)，1971年。

[46] “安德里亚纳利姆贝”可以简单地译为“数以万计的贵族”(andriana=君王，贵族+ali，来自于alina，=万，mbe/be的意思是大量的、许多)更好。安德里亚纳不应理解为用来指那些有官职者的职务头衔。

[47] 托江科里(Tovonkery)，1915年，第7页。

[48] R.K. 肯特，1970年，全书各处。不过，这种联系的性质从风俗角度讲可能并不是直接的，除非这种相似性的增加而不必再争议，通过对莫桑比克海峡两岸新的研究，某些马鲁塞拉纳人祖先起源于津巴布韦的观点还会有争议。

政治上的成功。他们以附近叫做安纳拉马哈夫洛纳的森林为名形成一个群体。[49] 这些传说还表明，创新精神是早期马鲁塞拉纳人的重要财富。他们有扩张领土的意识；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并将其建在高处；他们使用非正规军；对纠纷进行仲裁；他们懂得怎样通过重新分配食物和畜群来吸引追随者(他们最初的首都叫伊特索洛洛波拉，意思是富足源源不断)； **859** 他们为了国家开始利用原已存在的预言家。[50] 马哈法利人的情况相似，他们与当地首领家族安德里安兹勒利基的联盟因几年的冲突而中断，最后马鲁塞拉纳人获得政治霸权。不过，这个首领家族还是保留了不少重要特权，也没有被驱逐。[51] 似乎马鲁塞拉纳人的出生率很高，加上坚持实行王位的长子继承制，不停地出现一些没有统治权的家族旁系和王子。萨卡拉瓦人的文本(有些在时间上追溯了马鲁塞拉纳人的世系)将合法统治者和分支旁系这两支称为“沃拉麦那”和“沃拉弗茨”(白银)阶段。为解决这一问题大概就要寻求新土地(orin-tany)，然而这有助于马鲁塞拉纳人扩大影响，因为非统治阶层的旁系亲属可以获得村落实行治理。不过，直到19世纪这一问题始终未解决，不时地导致旁系家族(longon' mpanilo 或 vohitsy mananila)的自我流放，与马鲁塞拉纳人的反对者结成联盟，甚至组成敌对的王朝家族，如安德雷沃拉人，菲海雷纳纳河谷的这一统治者后来给马鲁塞拉纳人带来不少麻烦。

外来者及其影响

在殖民时期之前访问过马达加斯加的欧洲外来者的著述具有持续且不断增长的影响。这些材料对于马达加斯加岛的历史研究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52] 关于到1800年前后欧洲人对当地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能提出这样一种直线发展的观点。[53] 一般来说，16世纪的葡萄牙人对于由穆斯林控制的贸易及其在西印度洋的口岸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54] 16世纪初，马达加斯加有四个这样的口岸，一个靠近东北地区的武海马尔镇，另三个在离今天马任加不远的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贸易点都位于马哈贾姆巴湾、博伊纳湾、博姆贝托克湾的一些小岛上。这些小岛被一些讲斯瓦希里语的社群所控制，他们住在岛上，主要向东非和阿拉伯出口大米和奴隶。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合作者是伊哈雷纳人，与他们有许多不同。**860** 伊哈雷纳人生活在陆地上，不参与西北地区的谷物和奴隶出口竞争，他们基本上是当地长期存在的文化的开创者，主要是石器磨光和建筑工艺。[55]据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记载，来

[49] 安纳拉夫洛纳是菲海雷纳纳河流域的一座山脊，与菲海雷纳纳河和曼戈基河之间的西海岸部分平行。

[50] 罕士菲林加(Firinga)，1901年，第664-669页。

[51] E. 马麦洛马纳(Mamelomana)，无出版日期，第1-3页。

[52] 许多资料可以在海军殖民部(COACM)找到，第1-4卷(1903-1920年)，这项工作由主要编辑阿尔弗雷德·格朗迪迪埃和纪尧姆·格朗迪迪埃开创的，并受到他们鼓励。这几卷的时间没有超过1800年，至今没有关于19世纪的类似选集。

[53] 对于1800年以前在马达加斯加及其周围地区的所有欧洲人最尖刻和最全面的谴责出自格朗迪迪埃氏的笔端，他们无疑是马达加斯加最重要的研究者。参见A·格朗迪迪埃，1908-1928年，第4卷，第2部分，第106-108页。

[54] 参看J. 斯特兰兹(Strandes)，1961年版，第12-155页。

[55] 有关伊哈雷纳以往研究工作的概况，见P. 韦兰(Vérin)，1971年，第225-229页。P. 戈德博特(Gaudebout)和E. 韦尼埃(Vernier)，1941年，保持叙述的起始点。

自马林迪的摩尔人是伊哈雷纳的创始者，可以肯定，他们是在欧洲人介入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商业后才开始衰落。到18世纪，伊哈雷纳已是一个幽灵，其物质文化在整个大岛上都已消失，再没有以某种坚实的形式出现。1506年，葡萄牙人进攻西北地区斯瓦希里人重要的贸易据点卢兰加尼(位于马哈贾姆巴湾的曼扎岛)。他们还打算摧毁博伊纳，但没有明确结果。他们没有攻占博姆贝托克，因为其首领谢赫(shaykh/shaykhs)证明是友好的。[56] 葡萄牙人还发现，在更北面的阿努鲁灿加湾有一个人口稠密的非洲人移居地，约有两千多人，聚集在海滩上，装备着弓箭(此后这些武器在马达加斯加便已消失)以及长矛和盾牌。不过在一场战斗可能发生之前，这些人改变了主意，然后在内地消失。他们的茅屋被烧毁，因为“整座山似乎都在燃烧”。不过，这个特别的移居地并不是穆斯林贸易网中的一部分：我们所谈的这些非洲人是从马林迪、蒙巴萨和摩加迪沙逃出来的奴隶。[57]

然而，经过一个好斗的开端之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改变了态度，开始每年派一艘船到马达加斯加西北部换取牲畜、龙涎香、酒椰纤维布和奴隶。[58] 杜·卡托认为，16世纪中叶时他的同胞们成了向那些来自西北地区的中间商购买奴隶的最积极的买主。[59] 在增加出口需求方面，距斯瓦希里人贸易点不太远的大岛西北部出现一些小的政治联盟，葡萄牙人是一个因素。在南纬14度到16度之间，沿着海岸地带和部分内陆地区，有不少于五个这样的新集团。[60] 其中一个在称为“廷基马洛”(Tingimaro)的统治者领导下地位不断上升，人们不无夸张地称他为“岛上最强者”，“总是不停地与邻邦作战”。[61] 半个世纪之后的1614年6月，莫桑比克耶稣会的路易斯·马利亚诺神父访问了廷基马洛。他来回三次大约向内地走了24公里到达廷基马洛的首都库亚拉，希望在这个让沿海的中间商开始感到恐惧的国家建立牢固的宗教(以及葡萄牙世俗)基地。[62] 廷基马洛的一个臣民用毒药神裁法弄清了马利亚诺神父的意图之后，神父受到了礼遇，但廷基马洛拒绝与葡萄牙人签订条 **861** 约，不允许传教团到内地传教。[63] 他是布克人(来自斯瓦希里语“瓦-布克”)，葡萄牙人用此称呼将讲马尔加什语的人与讲班图语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卡菲尔人区别开来，但讲斯瓦希里语的人却以此称呼岛上的所有居民。[64] 由于廷基马洛最终还控制了阿努鲁灿加湾，那些从非洲斯瓦希里沿岸逃亡而来的奴隶移居地在将近五代人的时间里被布克人并吞吸收了。

到16世纪80年代后期，马扎拉基姆的摩尔人(欧洲人用“老”、“新”马扎拉基姆分

---

[56] 阿尔布奎尔奎(Albuquerque)和德巴洛斯(de Barros)，见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15、20-21、24-31页。

[57] 阿尔布奎尔奎，见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2-1903年，第1卷，第22页。

[58] J.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1609-1891年，第2卷，第19章，第332-333页；1901年，第332页。

[59] 杜·卡托(Do Couto)，引自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100页。

[60] 同上。

[61] 同上。战俘卖与沿海的中间商。

[62] 1613年，新马扎拉基姆的斯瓦希里统治者萨马莫告诉保罗·罗德里格斯·达·库斯塔，他的叔父和他本人因害怕廷基马洛而放弃了老马扎拉基姆，他还担心廷基马洛会占领新马扎拉基姆。

[63] 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66-70页。

[64] 只有在西北地区马达加斯加才被称做乌布克，达·库斯塔的《日记》和马利亚诺的著述对布克和卡菲尔加以区别是有意的。

别指马哈贾姆巴湾和博伊纳湾的贸易点，有多种拼写法）拒绝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一名多明我会教士在寻求当地皈依者时还丢了命。[65] 只有里斯本的皇家命令才制止了战争，[66] 但还是显示了武力并对马达加斯加以外的摩尔人进行了一些报复。[67] 1590 年，马达加斯加西北部被划人莫桑比克岛贸易区内。[68] 1614 至 1620 年间，葡萄牙人还多次试图在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建一座教堂，尤其是马利亚诺神父最为积极。正如近来发表的一部日记表明的那样，这不利于基督教事业。当地不太严格的伊斯兰信徒很少去清真寺，但他们被迫遵循严格的教规，并与来自东非和阿拉伯的逊尼派穆斯林建立紧密的联系。[69] 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的 1667 年，曼纽尔·巴雷托神父写道：

> 经常听人说起，巴塞洛缪·洛帕斯是一个判断力极强的人……对于航行到马达加斯加极有经验，他说，如果葡萄牙国王给他六艘配有桨手的战船，运载着葡萄牙士兵，加上他自己的船和另一种族卡菲尔人配备的一些船，他就可以到那里去，阻止来自麦加、布拉瓦、马加多克索的任何摩尔人船只进入该岛与布克人从事贸易活动。因为他们每年以 3500 多人的速度将布克人变为摩尔人，为此各个港口都有伊斯兰教传教者，他们在这一年中收买当地人，传授伊斯兰教，使基督教的声望蒙受巨大耻辱。[70]

862

1613 年，葡萄牙人还与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的一些统治者订立了若干条约，1616 和 1617 年耶稣会传教团被派往位于马南布卢河流域的萨地亚王国。传教团引起当地已酝酿多时的内战，[71] 这场内战后来对于梅纳贝地区的萨卡拉瓦王国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1641 年，葡萄牙人按照在卢祖与荷兰的条约正式吞并了马达加斯加西部。[72] 不过从实际看，这不过是莫桑比克与马达加斯加经商的主要商人的如意算盘。到 1700 年，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实际已处于萨卡拉瓦-马鲁塞拉纳控制之下，而一个世纪之后，马尔加什人不仅可以袭击莫桑比克海峡的葡萄牙船只，还可以袭击他们在奎里姆巴和伊博岛上的基地。[73] 可以肯定，在 1510 至 1550 年间某个时候，一些葡萄牙人流落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德弗拉库记载的一些故事认为这些人与大量的黄金有关。[74] 一个这样的团伙居住在安塔诺西，那里发现一个石筑的小堡垒(trano-vato)，上面刻着文字，一些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声称他们曾与葡萄牙人通婚，这些葡萄牙人在马达加斯加这一地区被同化，没有留下大的影响。[75]

---

[65] J. 多斯·桑托斯，1609/1891 年，第 1 卷，第 286 页。

[66] 《国王致德·门尼西斯》，1589 年 2 月 6 日，BFUP，第 1 卷，第 302 页。

[67] J. 多斯·桑托斯，1609/1891 年，第 1 卷，第 286-287 页。

[68] 自果阿开始划入。

[69] P.R. 达·库斯塔(da Costa)，1613/1970 年，第 61-72 页，可比较马利亚诺致德麦德洛斯，1619 年 8 月 24 日，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2 卷，第 303-311 页。

[70] 见 M. 巴雷托(Barreto)，1899 年著作附录，第 503-504 页。

[71] L. 马利亚诺，《信件》，1617 年 5 月 24 日，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2 卷，第 236 页。

[72] G.M. 蒂尔(Theal)，1898-1903 年，第 1 卷，第 407 页。该条约于 1641 年和 1642 年由葡萄牙和荷兰批准。

[73] 见 E. 德弗罗贝韦尔(de Froberville)，1845 年。

[74] E. 德弗拉库，1661/1920 年，第 32-33 页。

[75] L. 马利亚诺，《叙述》，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2 卷，第 41-48 页。德弗拉库，1661/1920 年，第 32-34 页。

17 世纪初，葡萄牙人从马达加斯加购买的奴隶似乎比来自非洲和阿拉伯的竞争对手少。然而，葡萄牙人付出的代价却高得多。同一时期，科摩罗群岛成了一个转运站，马达加斯加的奴隶和各类物产在此汇集，然后运往马林迪、蒙巴萨、摩加迪沙和阿拉伯半岛(特别是亚丁湾)。比如，因为马达加斯加统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内战"，来自多莫尼的商人从马达加斯加西北部获得"大量"的奴隶。1614 年，在马达加斯加买一个奴隶需 9 或 10 个比塞塔，而卖给葡萄牙人则要 100 个比塞塔。[76] 当时有不少多莫尼商人讲葡萄牙语"相当不错"，葡萄牙人似乎将其商业活动逐渐转向科摩罗群岛。在 1614 年，有报告说昂儒昂有许多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男女奴隶，准备运往阿拉伯半岛以交换印度的棉花和鸦 **863** 片。[77] 大约 30 年后，有人看到在昂儒昂有一艘来自博伊纳湾(新马扎拉基姆)的独桅三角帆船，装着 500 个奴隶，大多数是儿童和青年，买价是两到四个八分之一里亚尔。在昂儒昂岛，这些奴隶的价格涨了四倍，而在马林迪，奴隶的价格比在博伊纳时高出十倍。待奴隶到达红海地区时，价格还会翻一倍。[78] 亚丁湾的希赫尔的独桅三角帆船也直航马达加斯加购买大米、小米和青年男女。[79] 葡萄牙人显然输给了马达加斯加传统的奴隶贩子，1620 年之后，他们似乎对马达加斯加岛完全失去了兴趣。

17 世纪进入下半叶，仍有新的奴隶贩子开始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已不再限于马达加斯加的西北口岸。从 1639 到 1647 年间，已知至少有八艘船向毛里求斯的荷兰人提供来自马达加斯加，尤其是来自安通吉尔湾的大米和奴隶。[80] 1642 年 3 月与安通吉尔的统治者签定条约，规定他只能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奴隶；1646 年，毛里求斯的第三任总督计划在安通吉尔湾建造一个军事要塞，但是来自巴达维亚的命令阻止毛里求斯作进一步的努力。[81] 直到 1655 年荷兰人开始从开普敦前往马达加斯加，他们才经常(有时还相当野蛮)与马尔加什人发生冲突。不过，东部海岸地区处于分裂状态，无论是荷兰人的商业活动还是对当地战争的偶然介入可以说均未产生持久的影响。然而 18 世纪时，荷兰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对于马达加斯加一些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商业影响，对西海岸的影响更为强烈。

1600 至 1800 年间，英国船只也曾数百次到达马达加斯加，大多航抵西海岸，特别是圣奥古斯丁湾。那里有时多达八艘甚或更多的船只同时停靠。混杂的英语成了当地的商业贸易用语，有些土著居民还用英语给自己取名号。[82] 1645 年，来自英国的清教徒被派往圣奥古斯丁湾建立殖民地。五年以后在西北部的贝岛企图建另一个殖民地。两次努力均遭失败，死去不少人，潜在的定居者因认为马达加斯加是人间乐园而误入迷途。[83] 与葡萄 **864**

---

[76] 瓦尔特·佩通对莫埃利岛的访问，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2 卷，第 84 页。

[77] 皮尔特·范登·布罗埃克对科摩罗的访问，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2 卷，第 93 页。

[78] 斯马特致肯纳斯通，1646 年 6 月 23 日，引自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5 卷，第 515 和 518 页。

[79] P.v.d. 布罗埃克(Broecke)，1614 年。

[80] 见 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Decary)尝试性的图表，1958 年，第 5 卷，第 3 部分，第 1 节，第 208 页。

[81] 条约文本见《荷兰-印度外交文献汇编》，erste deel (1596-1650 年)，海牙，1907 年，第 360-362 页，法文译文见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6 卷，第 19-21 页。

[82] 见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5 卷，第 255 页的例子。

[83] 见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 年，第 3 卷，第 44-64、69-183、184-187、221-258 页。有关这一问题还有不少论文。

牙人和荷兰人不同,英国在马达加斯加周围并没有发展任何基地，但他们却是从马达加斯加向新大陆尤其是向巴巴多斯和牙买加输出奴隶最积极的角色。17世纪末在巴巴多斯一项统计表明有32，473名奴隶，其中一半来自马达加斯加。[84] 从1688到1724年，参与奴隶贸易的人中有许多英国和美国海盗。他们航行到过马达加斯加的所有贸易区，并在马达加斯加的迭戈苏瓦雷斯、安通吉尔湾和东部的圣玛丽岛建立了一些殖民点。海盗介入当地的战争，造成当地不安全，并为奴隶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来源。[85] 在这一海盗盛行时期的某些时候，有关贸易及交易项目的两个显著变化应予关注。首先，由于欧洲各国商人开始为争夺相同的供应者，沿海的统治者将此转变为价格优势，不断涨价。第二个变化或许可以说是第一个变化引起的结果，由于奴隶需求量极大，买卖已废弃的不安全的枪支越来越合算。正如一个英国医生在1775年所提到的，卖给圣奥古斯丁土著居民的枪支质量很差，经常发生爆炸，伤害使用者。[86]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是唯一企图在马达加斯加长久立足的国家。法国建造的多凡堡显示出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大。多凡堡是位于马达加斯加东南部的设防居住地，从1643到1674年仅存在30多年。有时法国人甚至被看做是“外来者”与“新移民”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人。多凡堡的许多法国人娶当地妇女为妻，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多凡堡的第一任总督普罗尼斯，他与扎芬德拉米尼亚人的“卢罕德里安”(Rohandrian)结婚，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还有绰号叫“拉卡斯”的一名法国士兵，他于1656年到多凡堡后，与安塔诺西之地北部地区的一位女继承人结婚，并成为当地的军事英雄。[87] 法国人还为向当地统治者提供贷款而争斗，当时当地人极少有枪，法国人靠武器而占有很大优势。受过良好教育且执政时间最长的多凡堡总督艾蒂安·德弗拉库(1648-1658年)写有两部关于马达加斯加的重要著作,[88] 他实际上成了当地的君主，竭力靠自己治理，法国没有提供很多支持。在他作为总督统治这里的一半时期内，确实没有一艘船到过多凡堡。

多凡堡的影响通常被低估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地的,另一方面是更大范 **866** 围内的。比如，安塔诺西人在迪恩拉马克的领导下想与扎芬德拉米尼亚人保持一种微妙的政治联盟。迪恩拉马克曾是马提卡斯地区的王子，他到过果阿。多凡堡成了障碍。1650至1654年间，船只不再来此地，以“卢罕德里安”新移民为一方，以法国外来者为另一方，为争夺霸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大多数茅舍居住者和农耕者为躲避不断扩大的暴力而纷纷逃入森林。到1653年，迪恩拉马克和许多“卢罕德里安”都死了。许多首领向德弗拉库表示臣服(mifaly)，但他并不想在当地建立一个国家。他离职后情况更糟，但是法国第二东印度公司还是努力在马达加斯加建另一个殖民地。1665年在安通吉尔、马蒂塔那和

[84] 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5卷，第3部分，第1节，第213页。
[85] H. 德尚，1972年，仍是这一课题的重要著作。
[86] 爱德华·伊维斯(Edward Yves)医生的描述，引自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5卷，第256页。
[87] 见E.F. 戈蒂埃(Gautier)和H. 弗罗伊德沃(Froidevaux)，1907年，书中各处。
[88] E. 德弗拉库，*1658/1913*年，*1661/1920*年。另见A. 马洛特(Malotet)，1898年。



图片 28.1 马达加斯加多凡堡总督艾蒂安·德弗拉库(1648-1658 年)

圣玛丽建起了一些前哨基地。1667 年，来自法国的 10 艘船抵达多凡堡，运来 2000 名移民(colons)和士兵。这使一批当地安塔诺西统治者向法国人表示臣服，永远放弃斗争。在安塔诺西地区以外，法国人在多凡堡的出现，使马鲁塞拉纳统治者安德里安达希弗茨加速了梅纳贝的建立，他寻求与多凡堡结成联盟。[69] 在安塔诺西地区之外另一有关的例子是拉卡

[69] 见 R.K. 肯特，1970 年，第 199 页。

斯在马蒂塔那进行的战争，他在那里结束了扎菲卡斯曼博的政治霸权。多凡堡于1674年被放弃，最后的居民被疏散到莫桑比克、印度和波旁岛(现在的留尼汪)，但是它30年的存在，在伊巴拉的南部贝齐寮人中间，在安坦德罗伊和马哈法利地区，以及整个马达加斯加南部地区都感受到了它的影响。

作为附近的种植园经济，马斯克林群岛的波旁岛和法兰西岛(毛里求斯，1710年被荷兰放弃，1715至1721年从波旁被占领)注定在18世纪期间要对马达加斯加，尤其是对东部地区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744年，波旁岛出口了114万公斤咖啡，其居民包括10,338名奴隶和2358名白人。1797年，其总人口为56,800人，其中，80%以上是奴隶。在毛里求斯，1798年人口总数不到43,000人，其中奴隶将近36,000人，1797年总人口为59,000人，奴隶超过83%。[90] 通常认为1664到1766年间输往马斯克林这两个岛的奴隶大都来自马达加斯加，但法国王室政府以750多万英镑向法国东印度公司购买了这两个岛之后，867 逐渐以来自非洲大陆的奴隶取代马尔加什人。[91] 不过不应忽略的是，在1766年到1788年第一届王室政府期间，进口奴隶数翻了一番，而1766年之后马斯克林群岛对马达加斯加也并非不加干预。到1784年，在马达加斯加前往马斯克林群岛的主要口岸富尔潘特建立了一个王家机构。两年之后，一个名叫贝涅渥斯基的我行我素的波兰裔匈牙利贵族试图介入马斯克林在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商业利益，被来自法兰西岛的士兵枪杀。事实上，马达加斯加的东北部地区即塔马塔夫和富尔潘特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马斯克林企业家的卫星种植园。

西部和北部国家：马哈法利、萨卡拉瓦、安坦卡拉和齐米赫蒂

早期马鲁塞拉纳人在西南地区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之后，在梅纳兰德拉河和奥尼拉希河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名叫“马哈法利”(使神圣化)，该名与社会差别和王权仪式有关。据传说记载，最早一位马鲁塞拉纳人在统治者的“奥姆比亚萨”(ombiasa，祭司)的建议和保护下，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他不与外人相见而变得神圣化(faly)，通过扩大范围，他使这片土地和人民神圣化(maha-faly)。[92] 马鲁塞拉纳人最重要的神灵“安德里亚马鲁”头颅不为人所见，因为它住在一个雾气笼罩的山峰中，仅通过中介人(vaha)来表达其旨意。在这样一个已长期形成牧人生活传统和不尚权威的社会中，安德里亚马鲁似乎能够强加一种建立于恐惧之上的道德法则。[93] 当马鲁塞拉纳人强大之后，马哈法利社会成员包括特权阶层“雷尼拉米”(renilemy)、平民“瓦洛哈佐曼加”(valohazomanga)，以及从其他地方来到马哈法利的居民“弗拉哈佐曼加”(folahazomanga)。在马鲁塞拉纳人形成时期最强

[90] 参看A. 图森(Toussaint)，1972年，第335-336页。

[91] 1740年作出正式决定，但是此前就在莫桑比克寻求获得奴隶。替换的原因是由于马尔加什的马龙人殖民地，这个殖民地不能废除，参见C. 格兰特(Grant)，1801年，第75-78页。

[92] 如对A. 格朗迪迪埃所说，1908-1928年，第4卷，第1部分，第1节，第213页，注①。

[93] D. 雅科布森(Jakobsen)，1902年。

大的首领齐勒利基(Tsileliki,不可战胜的人)的后代们,他们那些享有特殊地位的从前的臣民,与最初的马鲁塞拉纳先民一起来的人,以及不时受到奖赏的个人和家族,这些人构成了新的上层社会。[94] 在马哈法利众多的氏族中,有些氏族具有使自己接近“姆庞加卡”(mpanjaka,国王、首领、统治者)的特殊作用,如王室铁匠以及为宫廷收集蜂蜜的人等。这些氏族推举自己的首领,选出的首领们被认为是王室的朋友(rainitsy ny mpanjaka),由其高级议员(ondaty-bé)辅佐。马哈法利的国王有一名首席祭司“姆庇索罗”(mpisoro),由他掌管族群祭坛“哈佐曼加拉瓦”(hazomanga-lava),祭坛上供奉着动物祭品。[95]

1800年以前马哈法利的历史主要是与其邻邦发生种种冲突,分裂成四个独立的王国(萨卡托沃、梅纳兰德拉、林塔、奥尼拉希)以及吞并了属于最西部的安坦德罗伊人的土地(卡林博拉)。德弗拉库搞清了有关冲突的某些情况。他提到一个由12名马哈法利人组成的使团在1649年6月从迪恩曼哈勒(不是语言禁忌,anaratahina)来到多凡堡,请求法国雇佣兵抗击马奇科雷斯(Machicores,南方内地民族的通称,现在拼为Mashicoro)的统治者,因为他从他们的国王那里抢走了许多牲畜。德弗拉库同意按照通常的收费标准,即牲畜的一半,出兵帮助这些人。[96] 到1653年年中,即迪恩曼哈勒死之前,南方内地的人民已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并在抗击迪恩曼哈勒的战争中连续丧失了两位领导人。[97] 看来在17世纪50年代,即最早的两个梅纳兰德拉和萨卡托沃分裂的大致年代,马哈法利已陷入分裂。不久之后,梅纳兰德拉又产生出另外两个王国,即林塔(约1670年)和奥尼拉希(约1750年),马哈法利最北部的国家由马鲁塞拉纳人统治。[98] 18世纪上半叶,梅纳兰德拉的一位国王征服了西部的卡林博拉-安坦德罗伊。[99] 在奥尼拉希王国可以看出安蒂莫罗的影响,因为该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采用安蒂莫罗头衔“安德里亚诺尼”作为自己的名字。1800年之前,萨卡托沃有六位统治者,林塔有七位,梅纳兰德拉有三位(在大约1750年分裂之后),奥尼拉希有两位。分裂在马鲁塞拉纳人中引起许多倾轧争斗。不过,19世纪末以前的马哈法利的内部历史至今还不太清楚。

当马鲁塞拉纳在生活在奥尼拉希(西南最大的水路)南岸的“托姆庞-塔尼”(土地之主)中最初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这个王室家族在政治上的作用并不重要,直到它的一些成员越过奥尼拉希河而进入北方的菲海雷纳纳谷地,即奥尼拉希河和曼戈基河之间的这一地区之后,其政治重要性才得到加强。正是在这里,产生了马鲁塞拉纳-沃拉麦纳人,他们在这里越过曼戈基河而发展成为萨卡拉瓦诸国家的王朝,即梅纳贝和伊博依纳。毫无疑问,安德里安达希弗茨是梅纳贝的创立者,而且很可能也是沃拉麦纳支系的创立者。按照

[94] E.马麦洛马纳,无出版日期,书中各处;马达加斯加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无出版日期,第1-3页,两部著作可能均写于1960年代早期。

[95] G.格朗迪迪埃和R.德卡里,1958年,第4卷,第3部分,第1节,附录31,第235-236页。

[96] E.德弗拉库,1661/1920年,第263页。15个法国人和2000个马哈法利人大约用了12天到达马奇科雷斯人地区,夺取了10,000头牲畜和500名奴隶。

[97] E.德弗拉库,1661年,第74-75页。

[98] 一名奥地利人斯皮埃搞清了马哈法利-马鲁塞拉纳人的世系家谱及年代。他在马哈法利人中住了30年,担任马哈法利人最后一位国王齐亚姆庞迪(1890-1911年)的顾问。年代是推测得出的。

[99] E.德福奥特(Defoort),1913年,第168和172页,他认为该事件发生在约1750年。

他的语言禁忌(fitahina),他是“成千上万人恭顺臣服的君主”(安德里亚纳哈纳尼纳里奥)。德弗拉库的地图标明,1660年前梅纳贝的南部是拉赫·丰蒂(lahe/dahe,意思是“人”;fonti/fouti/foutchy/fotsy,意思是“白”)人的土地。沃拉麦纳和梅纳贝的建立有其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因素。一位王室祭司(moasy)在鳄鱼恩德里亚姆博伊(高贵的鳄鱼)的协助下,**869** 将对祖先(dady,达迪)的崇拜引入马鲁塞拉纳人中,从而使得统治者变成了“阿姆帕格尼托贝”(Ampagnito-be,伟大的王室祖先、人民的父亲)。作为奖励,恩德里亚姆博伊也被列入马鲁塞拉纳人祖先的行列,即作为安德里安达希弗茨的父亲(恭顺的观念)或是他的叔父,并封谥号“安德里亚米萨拉”('ishara 阿拉伯语意为“神圣”)。[100] 其他一些传说还记载,正是恩德里亚姆博伊主持了安德里安达希弗茨的妻子的牺牲仪式,而沃拉麦纳人(变成红色的银子)和梅纳贝之名(伟大的红色)均出自她的血。[101] 已知人祭在一些马鲁塞拉纳人的葬礼中是存在的。不过更为可信的传说表明,安德里安达希弗茨的配偶(众多的萨科亚姆贝成员之一,她的墓至今仍在穆龙达瓦附近)在一场残酷的战斗中设法给他带来了最早的火器。[102] 这十件武器成了王室标志的一部分,[103] 而她的儿子们成了沃拉麦纳人。

当马鲁塞拉纳人与梅纳贝各族人民建起联系时,他们已不再在西南部游牧民的疆土上,而梅纳贝的土地之主也是相当不同的。沿着海岸从马任加到穆龙达瓦的大约640公里长的地区,居住着渔民和牲畜很少的农民。除了人口密集的萨地亚(1614年时已有拥有万人的首都)外,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一些小社群中,没有武器,这方面的独特情况一直使达·库斯塔感到惊诧。[104]这640公里的沿岸地区称为班巴拉,居民不讲马尔加什语,而讲班图语。他们是卡菲尔人,而不是布克人,他们的语言因渗入了马尔加什外来语而“变得更丰富”,但没有语言上的充溢现象。[105] 萨卡拉瓦人的起源问题比原来更难于搞清了,特别是在语言方面的争议更大。他们来自班巴拉海岸,来自萨地亚,他们大概与靠近曼戈基河,或者是它的一条叫萨卡拉瓦的支流附近什么地方的马鲁塞拉纳人建立了联系。所有传说都认为,萨卡拉瓦人是他们那个时代杰出的武士,马利亚诺证实在萨地亚的苏库拉姆巴人具有这种能力,他们在1616年分裂出去,据说到1620年还四处攻打袭击。[106] 此外,正如马利亚诺在滞留于萨地亚期间所描述的,马鲁塞拉纳-沃拉麦纳人已采纳了对祖先的崇拜活动。[107] 对于沃拉麦纳的国王们来说,萨卡拉瓦是政治权威的先锋,而祖先崇拜却为这些权威提供了宗教基础,这比强大的武士及其后裔持续的时间还要长。从外部传 **870**

---

[100] 马尔加什科学院,塔那那利佛,作者不详,手稿,2238/2,约1908年,《萨卡拉瓦宗教的起源》(Niandohan'ny Fivavahan'ny),第1-7页及以后诸页。

[101] C. 贝托托(Betoto),1950年b,第3页。

[102] E. 伯克利,1926年,第33页。

[103] 见R.K.肯特,1970年,第200页和注[63]。

[105] L. 马利亚诺,《叙述》和《信件》,参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1921-1923年,第2卷,第315、241、225和256页(小印刷字体,关于“丰富”方面)。

[106] 这一情况是由马利亚诺在他1619年8月24日的信件中搞清的;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

[107] L. 马利亚诺,《信件》,1616年10月22日,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226-229和232-233页。

入梅纳贝一个特征，这或许与马鲁塞拉纳人没有直接的联系，[108] 即通常对王室成员的谥号加上前缀 Andria（贵族、君主）和后缀 arivo（千、数千）。虽然各种各样的词缀通常表明一个统治者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代表着什么，但这种惯用语言结构包含着一种政治观念，即真正的国王必须有众多的臣民。

梅纳贝南部地区（大约是曼戈基河和马南布卢河之间这一地区）到 17 世纪 70 年代初处在安德里安达希弗茨的统治下，当时来自多凡堡的一名法国贩牛的商人曾拜访过他。此人看到一支大约 12,000 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还得到一份 50 头壮牛的礼物献给多凡堡的总督。[109] 据估计，安德里安达希弗茨死于 1685 年。继承人之争留下的一个儿子齐马龙加里弗（死于约 1718 或 1719 年，谥号为安德里亚马尼齐亚里弗）取得了梅纳贝的政权并进行了扩张，[110] 从西南地区游牧民中吸引了许多新的臣民。[111] 他的弟弟齐马纳托纳（谥号为安德里亚曼迪索亚里弗）渡过了齐里比希纳河，带着不足 1000 名萨卡拉瓦武士向北进发，在 17 世纪 90 年代建立了伊博依纳。由于有些王室成员的姓名在口头传说中和欧洲人的现代文献记载不一致，要说明在 1720-1800 年间梅纳贝是有四名还是六名统治者是困难的。[112] 不过，这是一个稳定的时期，根据记载，只有 18 世纪 30 年代发生过一次弑君事件。在随后十年，通过王室血盟（fatidra）与非海雷纳纳河谷的安德雷沃拉统治者建立了重要的联盟，使梅纳贝南部边界地区变得更为安全。同样，与伊梅里纳西部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联姻，使他在伊梅里纳中部地区的对手在 18 世纪末寻求归顺梅纳贝，但是没有成功。[113] 在伊博依纳地区，受着来自南方姊妹国家梅纳贝的保护，穆斯林商业据点和商人们被强行置于王室沃拉麦纳的保护之下。阿纳拉拉瓦和阿努鲁灿加纳（曾在廷吉马洛统治下）也与一些新的臣民一起加入到了梅纳贝王国中。马任加发展成为伊博依纳的商业首都。其历代国王和在马鲁武艾的宫廷获得了在马达加斯加其他地区闻所未闻的辉煌。在安德里亚尼腊夫纳里弗（人们所知的安德里安巴加，死于 1752 年）时代，伊博依纳达到了它的鼎盛高峰。正如西南地区游牧民的渗入在马鲁塞拉纳上升时期取代了梅纳贝的土地耕种者，现在来自北方的移民，带着他们的牲畜向南方迁移，逐渐地吸收同化了大部分剩下的班巴拉居民。[114] 这不仅意味着操班图语的“托姆庞-塔尼”（土地之主）的语言扩散开来，而且也是一种有害的经济变革，因为此时萨卡拉瓦诸国家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居民从事种植和收获。最终，由于从马达加斯加的其他地区获得劳动力越来越困难，萨卡拉瓦人开始向科摩罗群岛甚至向非洲大陆东南部进行劫掠。[115]

871

[108] 这一语言习惯可能来自安蒂莫罗人，他们的某些“索拉贝”（手稿）中有所反映。

[109] 杜波依斯（Du Bois），1674 年，第 105-108 页。

[110] 在其鼎盛时期，梅纳贝的疆域包括从非海雷纳纳河到马南巴河之间的地区，内陆到达伊萨卢山、米东吉、拉瓦、察拉和邦戈，远近不等，参见 L. 托马森，1900 年，第 397 页。

[111] R. 德鲁里（Drury），1729/1890 年，第 274-275 页。

[112] E. 法吉林（Fagering），1971 年，第 22-24 页，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13] C. 吉莱恩，1845 年，第 16 页及以下各页；F. 卡莱（Callet），1878-1902 年，第 659-661 页；E. 法吉林，1971 年，第 23-24 页。

[114] 参看 E. 伯克利，1926 年，第 9-48 页；R.K. 肯特，1968 年。

[115] 参看 E. 德弗罗贝韦尔（de Froberville），1845 年，第 194-208 页；R.K. 肯特，1970 年，第 203-204 页、296-298 页。

在18世纪的最后30年中，伊博依纳在一个单一君主雷瓦希妮女王(约1767-1808年)的统治下得以发展，女王往往因其政府稳定和国内经济繁荣而受到称赞。[116] 不过，伊博依纳在她统治期间已开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沃拉麦纳已经结束了它有才能的国王统治，而伊博依纳的穆斯林，他们模仿萨卡拉瓦，构成了伊博依纳最有活力的因素。由于伊博依纳-萨卡拉瓦遵循着传统的王位继承制度，尽管不时发生周期性的骚乱，却相继接受了三位女王(雷瓦希妮是第三位)。穆斯林的目标是夺取王位。比如雷瓦希妮的儿子及法定的王位继承人是一个改宗穆斯林的信徒，"斯兰穆斯"(silamos，源于 Islam/Islamos)与萨卡拉瓦传统的上层精英之间的矛盾对伊博依纳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另一薄弱点是间接的，贝涅渥斯基伯爵已在东部沿海地区劝说贝齐米萨拉卡的众多统治者停止向伊博依纳交纳贡赋。1776年，曾派一些武士前去惩罚从前的贡赋交纳者并消灭贝涅渥斯基，但这一行动失败了，有些萨卡拉瓦人甚至倒向了他一边，[117] 从而使国民意识到伊博依纳已不再是全能无敌了。最后，雷瓦希妮使伊博依纳在外交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即决定支持伊梅里纳中部的统治者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反对当地的其他竞争者。

萨卡拉瓦诸王国既专制暴虐而又奢侈豪华。[118] 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由王室祭司(moasy)规定安排，没有祭司的指示，任何事情也不得做。王室议事会由六名留住在宫廷的长者组成。首席大臣称为"马纳塔尼"(Manantany)，他直接与王室众多合作者打交道，他的权力的大小与国王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程度成反比。首席大臣的助手称为"法哈特洛"(Fahatelo)，一般是依据其对氏族和家系以及对萨卡拉瓦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进行挑选。每个村落，不管大小，都有自己的王室官员(往往也称为"法哈特洛")，他们负责通过各 872 种礼物保证王室的稻田每周耕作四天，并使王室的牛栏不断得到修整，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固定的税收，而是依据各自的地位和能力定量交纳。称为"塔拉姆皮希特里"(Talempihitry)和"哈尼姆博伊"(Hanimboay)的官员主持进行对祖先的崇拜，所有萨卡拉瓦人都参加。如果没有王室"达迪"(祖先沃拉麦纳的遗体)，君主就不能实行统治，特别是因为新国王将自动成为与神圣的王室祖先(Ampagnito-be)联系的唯一中介人。由于传统习俗对萨卡拉瓦的控治更甚于王室"达迪"，其解释者拥有很高的地位，由长老组成的王室议事会在村里有相应的"索加贝"(sojabe，村庄长老)，负责处理社会生活中的琐事。[119] 通过"菲希特拉"(fehitra，村庄封地)，王室的亲戚往往可以成为下级统治者(mpanjaka)，封地使他们处于较好的经济状况，但却没有政治影响力。这一组织形式在1700到1800年之间在伊博依纳和梅纳贝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省的统治者往往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时甚至宣布独立。有的君主作为权力的象征已威信扫地，毫无作用，而王室权力在各个港口则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这些港口是直接将外部财富输入王室的源头。

齐米赫蒂人是从来自东海岸的一些无首领的难民集团中形成的，这些流亡的男男女女

---

[116] H. 德尚，1965年版，第101和104页；M.A. 德贝涅渥斯基(de Benyowsky)，1790年，第2卷。

[117] 关于条件见J. 范西纳(Vansina)，1962年a。

[118] 这种说法也庇护了马鲁塞拉纳的国王们，每当发生什么错误，他们总是责备祭司判断失误。已知在梅纳贝有几个王室祭司因失宠而被处死。

[119] C. 贝托托，1950年a；R.K. 肯特，实地考察笔记，1966年。

为逃避奴隶战争而带着牲畜定居在广阔的曼德里察拉平原，要到达这片平原无须攀越把马达加斯加东部大部分地区与内陆分开的高耸的悬崖。[120] 相形之下，安坦卡拉人却是马达加斯加最北方的“托姆庞-塔尼”，岩石的民族(ant-ankara)是马达加斯加这一地区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两个民族自己均未形成国家，[121] 而且都接受了马鲁塞拉纳人的支系(沃拉弗茨人，(Volafotsy)，白银家族的后裔，非马鲁塞拉纳妇女与马鲁塞拉纳王室成员的后代)，这些支系不可能在萨卡拉瓦人中实行统治，迁徙到了北方内地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王国。不过齐米赫蒂人并没有接受沃拉弗茨人(或称沃拉麦纳人)的统治，而是有意地采纳了自己的集合名称(tsi-mihety)，他们拒绝剃发，表明他们不愿屈服于马鲁塞拉纳的统治。由于在齐米赫蒂人中并未形成中央集权的王国，他们在 18 世纪的历史仍然几乎不为人知。他们与伊博依纳-萨卡拉瓦人和安坦卡拉人相互通婚，虽然人数在 1800 年之前已有大幅度增长，但并没

873 有外来势力企图对他们实行政治控制。考虑到齐米赫蒂人没有武士，也不支付贡品，他们的畜群经常遍布索菲娅河谷，而这里在 18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一直是伊博依纳对东海岸的贝齐米萨拉卡人建立的政治霸权的要道，这更加令人惊异。

安坦卡拉人的反应相当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自己置于伊博依纳创立者的统治之下，部分安坦卡拉人在进入 19 世纪后还不时地处于萨卡拉瓦控制之下。[122] 不过，在他们中存在着王室血统，可上溯到一个名叫卡佐贝的沃拉弗茨人。但直到他的侄孙安德里安兹罗佐时代，才建成一个完全中央集权的王国，据有关文献，这位国王的统治时间是约 1697 至 1710 年或 1710 至约 1750 年。[123] 另一种说法是，作为在马鲁安采特拉的贝齐米萨拉卡人中流放和被迫向伊博依纳交纳贡赋的统治者，安德里安兹罗佐将王室墓地建在安布托萨哈纳(他曾经从这里逃脱伊博依纳国王安德里安巴巴)。由于没有实行对王室“达迪”的崇拜，他引进了萨卡拉瓦王位统一的象征“塞纳”(saina)，这是从马鲁安采特拉带回的带有新月[124] 和星星的旗帜。安德里安兹罗佐的权力受到一个魔法广大的女祭司(moasy)的协助，她为王室创制了驱邪符“曼德里茨拉菲”(*mandresirafy*，战无不胜的来源，是统治者代代相传的圣物)，还为他的两个继承人担任顾问，她活了一百多岁。[125] 安德里安兹罗佐的儿子和继承人拉姆博伊纳(尽管名字可能“缩短了”)是马达加斯加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之一(说法不一，有的说是 1710 至 1790 年在位，有的说是约 1750 至 1802 年在位)。传说，他有 30 多个儿子，而且他的统治期间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不曾发生战争。他每年向伊博依纳进献贡赋，大约是装满 50 条船的龟甲，只有一次企图不交。1775 年，他与贝涅

---

[120] “原始齐米赫蒂人”的真正起源尚存有争议。参见 B. 马涅(Magnes)，1953 年，第 13-14 页，以及 A. 格朗迪迪埃，1908-1928 年，第 4 卷，第 1 部分，第 227 页。

[121] 看起来安坦卡拉海岸的一部分地区曾经由贝岛一个强大的首领控制，此人反抗穆斯林，进行政治扩张，但在一次火药爆炸事件中与其家人一起死亡。N. 马耶(Mayeur)，1912 年，第 128 页、148-149 页。

[122] 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 年，第 153-156 页。

[123] M. 维亚尔(Vial)，1954 年，第 5 页；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 年，第 154-156 页和 232-233 页(附录 25)。

[124] 尽管安坦卡拉王室家族在 19 世纪 40 年代(流亡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旗帜和它的新月除了感观(复制的新月)之外，与伊斯兰教没有关系。

[125] M. 维亚尔，1954 年，第 19-22 页。

涅斯基的使节和翻译尼古拉·马耶签订了一项条约。十年后，拉姆博伊纳又被贝涅渥斯基说服，转而效忠于法国人，停止向伊博依纳交纳贡赋。因贝涅渥斯基伯爵在1786年被杀，这项建议并未长久实施。[126] 安坦卡拉的政治体制是从伊博依纳和萨卡拉瓦借鉴而来的，但没有实行"达迪"崇拜。官员也有相应的设置，如伊博依纳的"法哈特洛"（Fahatelo），在安比卢贝(后来安坦卡拉的首都)称为"朗加希"（Rangahy）；王室议事会称为"法莫里亚纳"（Famoriana），在安坦卡拉人中或许权力更大；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征税制度，而是靠定期征税(tatibato)来支持国家的财政。

内陆国家：贝齐寮、梅里纳、西哈纳卡、贝扎诺扎诺、塔纳拉和巴拉

874

贝齐寮人的名称来自一个名叫贝齐劳的统治者，他在17世纪70年代因反抗梅纳贝的萨卡拉瓦人向内陆高地扩张而闻名，他显然获得了成功(-silau/tsileo,不可战胜者)。[127] 不过，这些近年来称为贝齐寮的人，整体而言并没有支持内部争取统一的努力，只是在19世纪经过外部力量才聚合到一个政权之下。[128] 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托姆庞-塔尼"和新移民混合的过程，有时是以群体的方式，有时是以个人的方式移人，目的是寻找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这个过程中，贝齐寮人分成四个主要的国家：南部的阿林德拉诺，与伊巴拉人合并；中部的伊桑德拉，其西面与萨卡拉瓦人为邻；贝齐寮中东部地区是拉兰吉纳，与塔纳拉人为邻；最北方的贝齐寮人国家是马南德里亚纳，紧邻伊梅里纳，马南德里亚纳形成最晚，也是在18世纪末最先接受梅里纳人统治的国家。贝齐寮人复杂的血缘世系虽然可以上溯到16世纪，但是，在17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王国是否在贝齐寮人中已经形成令人怀疑。伊桑德拉和阿林德拉诺(这一名称也用以表示南方贝齐寮人，他们曾找过多凡堡的法国雇佣兵)直到1648年还处于一些独立的小酋长的统治之下，而拉兰吉纳甚至到1667年还不具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力，当时，拉卡斯用很少的兵力就夺取了拉兰吉纳许多牲畜。[129] 口头传说也证实，当时拉兰吉纳还面临着许多内部的困难。其创立者雷萨哈马纳里弗被迫退位(因为身患麻风病,看来这种病曾多次侵扰过王室成员)，由他的兄弟继位，但他在大约1680年前往阿林德拉诺并被南方的贝齐寮人接受为他们的统治者。[130] 王位之争和与邻国的战争阻碍了拉兰吉纳的发展。在一次弑君事件发生后，拉兰吉纳分裂成四个省，每个省拥有自己的统治者。[131]不过，拉兰吉纳王室家族篡取王位的支系在18世纪却至少产生了三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其一是雷奥尼马纳林纳，他借助从萨卡拉瓦获得的枪支("用3000名奴隶换了3000支明火枪")，重新统一了拉兰吉纳王国。他还创立了国内

---

[126] N. 马耶，1912年，第119-124页；C. 吉莱恩，1845年，第369-370页。

[127] F. 马丁(Martin)，《回忆》，引自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9卷，第480和620页。

[128] 见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5卷，第3部分，第1节，第12-13页和16-19页。

[129] E. 德弗拉库，《历史》，载于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8卷，第23页。E. 德弗拉库，《叙述》，载于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9卷，第41、42、85和376页。

[130] 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5卷，第3部分，第1节，第11页；H.M. 杜波依斯，1938年，有关拉兰吉纳部分，关于阿林德拉诺早期历史，见第169-206页和218-219页。

民兵制度以减少叛乱。另一个是安德里亚诺尼德拉纳里弗，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改革的结果表现为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人口增加，国内保持稳定。最后一个875 是他的儿子与继位者雷马哈洛，他将民兵改造成国家经济的辅助力量，以保证水稻的更大丰收(在18世纪期间，贝齐寮的确成了马达加斯加首屈一指的水稻生产国)。18世纪拉兰吉纳的统治者在外部关系方面并不顺利，但是直到18世纪末雷马哈洛并没有屈服于梅里纳的统治。[132]

一些相互矛盾的传说表明，伊桑德拉王室家族的祖先扎菲马纳里弗或是一名安蒂莫罗妇女，或是马鲁塞拉纳一位被流放的王子。[133] 不过，从地理的角度看，马鲁塞拉纳这个源流更为可信。早期的扎菲马纳里弗还有一个称号"沃拉麦纳"(黄金)。最后，如同梅纳贝的马鲁塞拉纳人一样，伊桑德拉去世的统治者在死前要排光体液。不过，与梅纳贝的萨卡拉瓦人不同，西部的贝齐寮人认为王族的体液会使他们变成巨蟒(fanane)，这些物体是一种灵魂先存，但并不太狂热的崇拜对象。[134] 很有可能，来自马达加斯加东南部的一位祭司曾进入王室家族提供服务，正如早先在梅纳贝的马鲁塞拉纳受尊敬的祭司一样。一直到18世纪50年代，伊桑德拉才称得上是值得关注的贝齐寮人国家，当时它正处在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安德里亚马纳里纳一世的统治下。他有时被称为"小丑国王"，因为他能够以幽默的手段在政治争论中获胜。安德里亚马纳里纳一世是第一位想建立统一的单一国家的贝齐寮人，他最终实现了这一抱负。与拉兰吉纳和阿林德拉诺方面进行的外交努力失败后(18世纪时它曾长期处于拉兰吉纳统治之下而默默无闻)，安德里亚马纳里纳成了一个军事征服者。他还向西扩张，将贝齐寮扩展到米东吉山丘，向南进入伊巴拉，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名重要的臣属，即巴拉人的统治者安德里亚马内利二世。安德里亚马纳里纳一世在每个地区保留传统制度，任命他的儿子担任四个新省的长官，这四个省包括了贝齐寮的绝大部分地区。他于1790年去世，贝齐寮正处于政治鼎盛时期。[135] 关于马南德里亚纳，它在大约1750年之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短期存在，在1800年前后第二任统治者甘愿将自己置于梅里纳的统治之下。[136]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梅里纳的历史是从雷兰姆博时代开始的。口头传说的重要部分表明，这位统治者不仅是首先使用"梅里纳"这一集合名称，[137] 而且引进了新的机构和等级制度。根据各种不同估计，在他统治之前的1610到1640年间，[138] 伊梅里纳还不存在国876 家结构，有许多村落酋邦，居住的是瓦津巴人、"托姆庞-塔尼"和霍瓦人。[139] 这些氏族在

[132] 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年，第10页。

[133] H.M. 杜波依斯，1938年，第112-139页，早期伊桑德拉部分；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年，第4和5页，注③。

[134] F. 卡莱，1958年版，第3卷，第234-237页；R.K. 肯特，1970年，第294-295页(附录)。

[135] 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年，第5-6页。

[136] G. 格朗迪迪埃和 R. 德卡里，1958年，第3页；H.M. 杜波依斯，1938年，第102-104页。

[137] F. 卡莱，1953年版，第1卷，第284-285页。

[138] M. 谢福德(Cheffaud)，1936年，第46-47页；A. 朱利(Jully)，1898年，第890-898页；A. 格朗迪迪埃，1908-1928年，第4卷，第1部分，第83-85页。另见，R.K. 肯特，1970年，第22页和注释。

[139] 虽然在当地早期历史中仍使用"霍瓦"一词，但并不反映种族的概念在雷兰姆博之后和梅里纳国家终结之时，霍瓦(梅里纳人经常与之相互转换)用以指平民。

不晚于大约1500年通过两次大的迁徙运动到达伊梅里纳。16世纪期间断断续续的冲突似[140] 乎成了规律，但这些冲突并不一定借助战争手段来解决。各种争端还通过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占星术士，即阿姆庞德拉纳的长老们来仲裁，他们在霍瓦人到来之前便已在瓦津巴人中定居。[141] 当时，无论是霍瓦人还是瓦津巴人都不是具有政治权威中心的族体式氏族。阿姆庞德拉纳逐渐取得领导权，由此产生了未来的安德里亚纳王朝，开创者是雷兰姆博的父亲安德里亚马内洛。正是安德里亚马内洛在阿洛萨雷建起了最初的要塞，而且开始使用铁制武器，并在国内限制使用。尽管铁制长矛使他相对于那些使用陶制武器的人占有绝对优势，为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还是与阿姆博希特拉比比强有力的瓦津巴首领家族联姻，成为该家族的一员。[142]

雷兰姆博统治后，设立了十二神"桑姆皮"(sampy)中的第一神，即梅里纳人的守护神；王室成员实行割礼并出现乱伦；开始实行"凡德洛亚纳"(fandroana)制，即每年的王室沐浴仪式；[143] 神化去世的君主；形成贵族阶层"安德里亚纳"(andriana)和服务于国家的工匠集团(银匠和铁匠)；建立人头税；开始消费牛肉；并建立了一支规模虽小但长期稳定的军队。[144] 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安德里安加卡利用从西海岸王室保护下的商人手中获得的枪支，对瓦津巴人实行决定性地攻击。[145] 在安德里安加卡统治时期，梅里纳的君主更加威严而高不可及，疏远了臣民，他的有些国策令人恐惧。不过，他建立了塔那那利佛，并且使沼泽地水稻丰收。正如赫伯特·德尚看到的那样，这一切使梅里纳人及早奠定了经济基础，后来成为马尔加什人中人口最多的国家。[146]

随着梅里纳人口的增长，面临饥荒(tsimiompy)的危险也扩大了，迫使其统治者不断扩大灌溉区，进人18世纪后，安德里安加卡的三位继承人一直遵守这一做法。他的儿孙们为使自己更为显赫主要是给其王室名称加一些字母(众君主之王和最伟大的众君主之王等，多达33个马尔加什字母)，但安德里安加卡的重孙安德里亚马西纳瓦罗纳则是另一个核心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靠着他的机敏的顾问安德里亚马姆皮安德里的协助，他罢免了他的一位兄长，这位兄长投奔萨卡拉瓦人，甚至寻求他们的军事帮助。[147]安德里亚马西纳瓦罗纳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在他统治下的众多酋长几乎没有独立可言。他将四个贵族氏族增加到六个，并对功劳较大的贵族奖励村庄封地，封以"封地之主"(tompon-menakely)的称号。[148] 因为高寿，使其在位之时便可以考虑继承人问题。他没有采纳安德里亚马姆皮安德里的建议，而是将梅里纳划分为四个省，每个省任命一个儿子担任长官。事实上他不久

877

[140] C. 萨瓦隆(Savaron)，1928年，第63页；R.K. 肯特，1970年，第220页。

[141] F. 卡莱，1953年版，第1卷，第28-29页、18页和540页；C. 萨瓦隆，1928年，第65-66页；R.K. 肯特，1970年，第227-228页(注⑫)和233-235页。

[142] R.K. 肯特，1970年，第308-309页，附录；F. 卡莱，1953年版，第1卷，第27和126页。

[143] 有关这一主题的最佳著作见G. 腊扎菲米诺(Razafimino)，1924年。

[144] R.K. 肯特，1970年，第235页；H. 德尚，1965年版，第116页。

[145] F. 卡莱，1953年版，第1卷，第461页；R.K. 肯特，1970年，第241-242页。

[146] H. 德尚，1965年版，第117页。

[148] 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安德里安加卡和他的兄弟安德里安托姆波科英德林德拉统治时代，当时创建了12个默纳卡里，参见J. 腊萨米曼纳纳(Rasamimanana)和L. 腊扎芬德拉扎卡(Razafindrazaka)，1909年，1957年版，第37页。

就发现自己已置于四个独立王国之中：两个在北方，以阿姆博希特拉比比和安姆博希曼加大墓地为中心(据传说，“野猪、狗和生人均不可进入”)；一个在南部从塔那那利佛进行统治；另一个在西部，首都在安姆博希德拉特里莫。他还受到被他的儿子、西部地区(马洛瓦塔纳)的统治者安德里安托姆庞尼麦里纳囚禁的屈辱(“历时七年”)。[149] 老国王死于大约1750年，[150] 梅里纳变成了内战场所，这场内战甚至有外部的人参与。18世纪70年代，安姆博希曼加征服了阿姆博希特拉比比地区，在其统治者安德里安贝罗马西纳统治下变得十分强大。尽管是他的儿子安德里安贾菲继承了王位，但却是他的侄子雷姆博亚萨拉马在大约1777/1778年成为安姆博希曼加的统治者，后来被认为是梅里纳最重要的国王。

他自称为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首先与他的兄弟及竞争者建立了和平关系。然后他向边境地区移民并构筑军事要塞，这些人发誓卫国。他还从马达加斯加西部地区获得大量武器。1797年塔那那利佛陷落，[151] 不久安姆博希德拉特里莫也被攻克，梅里纳另外一些归属不太明确的地区在大约1800年之前也落入他的手中。他显然超出了统一梅里纳的意图，并开始派遣一些特别挑选的使节前往拜访马达加斯加各地的统治者，要求他们作为他的诸候并保有自治权，否则将最终被梅里纳征服。这一外交策略有时奏效，比如对马南德里亚纳的贝齐寮人，贝塔富的安德兰察伊人(由萨卡拉瓦扩张时期逃往马达加斯加西部的安坦德拉诺人、贝齐寮人和一些被同化了的梅里纳人混合而成)，以及在西部的伊马莫。**878** 在有些地区则遭到失败，如在梅纳贝，在拉兰吉纳和伊桑德拉的部分地区。不过无需太多怀疑，梅里纳在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的统治下，虽然疆域并不大，已不再向萨卡拉瓦进纳贡赋，而且正逐渐成为应认真对待的强大力量。[152] 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是一个性格坚韧的君主，据说在其统治下的梅里纳，不仅盗贼绝迹，而且没有人饮酒和吸烟。实际上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将自己置于建立在安德里亚马西纳瓦罗纳早期理想之上无论高低所有权力的中心，但是他不断接受来自德高望重的长老们的建议，并通过公共议事会“卡巴里”(kabary)和代表王国每一个集团的70人议事会传递的信息而进行调整。[153] 通过对梅里纳的统一和重建，他为梅里纳在19世纪建立帝国铺平了道路。

虽然说无论是西哈纳卡还是贝扎诺扎诺都没有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国家，但它们的历史还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西哈纳卡是围绕阿劳特拉湖(马达加斯加最大的湖泊)发展起来的，而贝扎诺扎诺人却定居于东部海滨热带雨林与其陡坡之间的地区。他们都位于十分理想的位置上——贝扎诺扎诺人处于联结梅里纳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商业通道上，相应地，西哈纳卡则处于西北货物集散地的方向。几乎可以肯定，最早的“奥瓦人”(霍瓦)是在1614年被卖为奴，据马利亚诺神父的记载，是通过西哈纳卡的中间商而贩抵这一集散地。[154] 与此相反，贝扎诺扎诺人是自梅里纳向马达加斯加东部的马斯克林商人提供奴隶的

[149] G.格朗迪迪埃，1942年，第5卷，第1部分，第62和64页。

[150] A.泰奇(Tacchi)，1892年，第474页。

[151] G.格朗迪迪埃，1942年，第91页，注②和第92页；H.德尚，1965年，第121-122页。

[152] 直径大约20英里，见H.德尚著作中根据萨瓦隆的详细研究工作所作的地图，1965年版，第118页。

[153] 有关变革的论述，见H.德尚，1965年版，第121-127页；另见F.卡莱的法文本，1953年版，第2卷和第3卷。

[154] L.马利亚诺，《叙述》，载于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12-13页。

主要供货人。[155] 的确，西哈纳卡和贝扎诺扎诺都拥有众多奴隶，以至于1768年他们为镇压各自内部的奴隶叛乱而不得不向欧洲人求援。[156] 1667年当弗朗索瓦·马丁从东部边界进入西哈纳卡疆域(经过18天旅行)时，他发现西哈纳卡人居住在山顶修筑成防御要塞的村庄里，周围是高高的石墙(用红色的泥灰砌成)和又宽又深的沟濠。他们都是最好的制陶匠，拥有那时欧洲人所见到的马达加斯加唯一的一座桥。他们装备精良，用弓箭击溃了马丁率领的由44名同胞和大约3000名贝齐米萨拉卡人组成的军队。[157] 马丁还证实，西哈纳卡人是马达加斯加最重要的贸易集团之一，所有这一切都以有相当大的政治组织为先决条件。不过还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西哈纳卡人曾经形成中央权力机构。雷比尼发纳里纳曾试图在阿劳特拉湖地区的"托姆庞-塔尼"中建立一个王朝，此人大概来自贝齐寮人并且在其 **879** 后留下了一个集合名称安特西哈纳卡，但在政治上并未取得成功。[158] 事实上，西哈纳卡人在18世纪是向梅纳贝人进贡臣服的。不过，他们至少进行了一次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想推翻这种纳贡关系，但以失败而告终。[159] 依据威廉·埃利斯的说法，贝扎诺扎诺人的这一集合名称甚至表明他们还没有中央权力机构。[160] 他们的土地最初称为"安卡伊"，也由一些村庄首领(mpifehy)管理，他们则住在筑有要塞的村庄里。不过与西哈纳卡人不同，他们至少以法物的形式形成一个统一机构，这些法物代表了11个据说是来自萨卡拉瓦地区的保护神。因为有的神拥有萨卡拉瓦名称，[161] 起源于西海岸地区似乎没有疑问，尽管有些神很可能是贝扎诺扎诺的"奥姆比亚萨"(祭司)设想的。到18世纪末，与西哈纳卡人相反，贝扎诺扎诺人看来已经接受杰出的兰德里安卓穆伊纳为他们的第一位国王。不过这一发展过程被梅里纳所中断，梅里纳要求并确使贝扎诺扎诺的统治者臣服于它。[162]

处在内陆高原的贝齐寮人和沿海地区的安蒂莫罗人之间的塔纳拉人，根据其所处环境取名为"森林之人"(Antanala)，这个名称也用于马达加斯加的其他地区，但却不具有如此持久的民族含义。确实，塔纳拉人发展成一个高度混合型族群，他们当中多达23个氏族声称自己是贝齐寮人的后裔，而塔纳拉人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当地历史中确实很突出，如所谓的伊孔古的塔纳拉人。伊孔古是一块巨石，只有借助人工修筑的通道才可进入。[163] 由于与贝齐寮高地完全隔绝，塔纳拉-伊孔古人地区成了沿海地区的自然腹地(距沿岸仅45公里)，除巨石外，可以借助水路到达，如桑德拉南塔河和法劳尼河，以及安蒂莫罗的马蒂塔那河。[164] 因而无须奇怪，伊孔古-塔纳拉人接受了来自东部沿海的移民，其中一位兰姆博据说是安蒂奥尼-安蒂莫罗人，他在当地开创了扎菲

[155] N. 马耶，1806年，第123页。

[156] 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20页、121页注①和第132页。

[157] F. 马丁，《回忆》，1667年12月，载于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9卷，第552-559页。

[158] 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17页，注③。

[159] C. 吉莱恩，1845年，第24页；N. 马耶，1912年，第70页。

[160] W. 埃利斯(Ellis)，1838年，第1卷，第131页。马耶称贝扎诺扎诺为"共和政体"。

[161] 瓦利埃(Vallier)，1898年，第80-81页。

[162] F. 卡莱，1908年版，第1卷，第77-84页，以及1909年版，第2卷，第527页；V. 马尔扎克，1912年，第92页；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33-134页。

[163] A. 杜·比克(du Picq)，1905年，第541-542页。

[164] 同上，第543页。

兰姆博王朝，外来者在1668年首次提及该王朝。[165] 按照阿登·杜·比克在1900年前后搜集的塔纳拉人的传说，兰姆博是因其知晓驱邪治病法物（fanafody）和手稿（sorabe）而成为伊孔古的国王。人们还因兰姆博是"法律制定者"而纪念他，他的几个继承人也制造法物来保

880 护伊孔古-塔纳拉人，他们还被看成是自然现象的预言者。王朝建立之前的两位首领安纳康德里亚纳和安德里亚姆巴文蒂保留了一些特权，虽然扎菲兰姆博人也使用"索姆比利"（sombili，宰杀家畜的特权），但他们仅对自己行使这一权利。扎菲兰姆博还被称为扎纳卡伊桑德拉南塔（桑德拉南塔河的孩子），因为在兰姆博之后，去世的统治者的体液被投人这条河中，并因此创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鳄鱼是从中孵化出来的。[166] 18世纪的大部分历史以伊孔古-塔纳拉和安蒂莫罗之间的冲突为标志，这种冲突在18世纪晚期导致塔纳拉对低地地区的破坏性人侵。当18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扎菲兰姆博人中的安德里亚曼姆霍特拉与安德里亚纳姆波印伊梅里纳结成了联盟。[167]

巴拉人是马达加斯加主要的游牧民，他们经常被认为来自非洲，[168] 似乎是在阿林德拉诺兰德南部地区沿伊胡西河的某个地方形成的。德弗拉库曾提到，大概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地方叫瓦拉贝，[169] 这一名称与巴拉-贝几乎相同（Varabei，bei/be，意思是伟大的，或很多的），而巴拉-贝是巴拉人三大氏族之一。巴拉-贝人居住在霍罗姆贝高原，其东面是巴拉伊安斯特桑特萨人，朝着萨卡拉瓦的西面是巴拉伊马莫诺人。有两个较小但却重要的巴拉人氏族，即西南部伊巴拉的文达人和住在伊奥纳伊沃河东岸的安提汪德罗人，他们形成的时间更近，文达人在19世纪初期才形成。[170] 巴拉人似乎一直在扩张，直到或多或少地与萨卡拉瓦人、马哈法利人、安坦德罗伊人、安塔诺西人、安蒂萨卡人和安蒂法西人形成自然疆境。在南方内地（伊巴拉显然最大），有两个明显的王朝时期，其中之一与原始马鲁塞拉纳时期相吻合，人们对此可能仍然没有充分了解，[171] 另一个时期较晚，是扎菲马内利时期，在大约1650年之后。由于根本没有继承权的有关规定，而且不允许持异议者带着牲畜迁往更好的牧场去，这无疑在17世纪40年代导致了政权的解体，当时马哈法利的统治者迪恩曼哈勒侵人南方内地，开始任命其亲属担任当地的统治者。迪恩曼哈勒1653年死后，他的后代扎菲马内利人在伊巴拉地区逐渐取得当权的地位，不过这对伊巴拉不一定有利。1650至1800年间伊巴拉人的历史主要是扎菲马内利的小国王们（mpanjaka-kely，不同于mpanjaka-be，后者是国王赐给巴拉人大氏族统治者的称号）之间的竞争以及小国王迅速增多

881 的历史，小国王的激增使巴拉家族增加了无数小族体（tariki）。他们的内部竞争性质更多的是经济上而不是政治上的。由于没有固定的贡赋体制，扎菲马内利人为维持自己作为当地领主的地位，都是通过合法的决定[172] 来确保获得部分财富，并通过掠夺牲畜来

[165] 见R.K.肯特，1970年，第92页和注⑭。德尚将兰姆博流放时间定在16世纪。
[166] A.杜·比克，1933年，第27-39页。
[167] 同上，第39页。
[168] R.K.肯特，1970年，第116-120页和有关这一问题的注释。
[169] E.德弗拉库，1661/1913年，第33页。
[170] R.K.肯特，1970年，第124页。
[171] 同上，第123-137页。
[172] 这或许正是巴拉人的司法包括多种神裁审判的原因。

获得财富的主要部分，而牲畜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由于他们不能掠夺自己的臣民或轻易发动 882 对外战争，扎非马内利人便相互劫掠牲畜，虽然劫掠现象不断发生，但没有政治企图。这一人为制造的紧张状态直到1800年之后才被雷基特洛卡这位统治者所打破，此人令人极为感兴趣，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⑲ 事实上，巴拉国王们并不曾作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管理他们的氏族，没有大臣们组成的议事会（在伊马莫诺人中称"坦东纳卡，Tandonaka）的赞同，他们不能对外宣战，各省的长官（Mamandranomay）由大氏族首领（mpanjaka-be）任命，



图片 28.2 马达加斯加东南部安姆巴斯特拉的巴拉人族群纪念雕像，名叫阿卢阿卢。人死时若无子嗣或未葬于家族墓地，便树立此雕像。雕像四周围有栏杆，杆头插有葬礼上的祭品瘤牛角。雕像通常为女性，作为男性死者的替身，象征着注定会有后嗣子孙。雕像用坚硬的樟木制成。高107公分

⑲ 见J. 腊贝马纳纳（Rabemanana），"基莫索国家及其历史：从产生到1820年"，1911-1912年，手稿，马尔加什科学院档案馆，塔那那利佛，第98页；R.K. 肯特，1970年，第124页，注⑭，第129页，注⑮。

并受到当地长老议事会(在伊马莫诺称"伊奥纳卡",Ionaka)的控制。[14]

东部和南部国家：贝齐米萨拉卡、安蒂莫罗、安坦巴华卡、安蒂法西、安蒂萨卡、安塔诺西、安坦德罗伊

贝齐米萨拉卡人通常分成"北方人"(Antavaratra)、和"南方人"(Antatsimo)，而贝塔尼梅纳人则将两者隔开，他们大致是在安通吉尔湾和瓦图曼德里之间的马达加斯加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众多来源证明，这一地区的"托姆庞-塔尼"在18世纪之前不曾有过较大的政治联盟，始终处于酋长"菲罗哈尼"(filohany)的统治之下，这些酋长的控制范围一般不超过一两个村庄。不过，分布在大安通吉尔湾四周的酋长们似乎组织较好，至少自16世纪末开始，已经有了官职标志。[15] 安塔瓦拉特里人的自然条件也很优越，他们拥有所有的港口(在安通吉尔、蒂廷圭、富尔潘特、费内里夫和塔马塔夫)，而贝塔尼梅纳人沿海却没有港口。随着马斯克林群岛对于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大米、牲畜、奴隶劳动力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控制这些港口不仅可确保其酋长获得财富，还可以获得防卫和攻击所需的武器。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20年代，这里还是马达加斯加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和美洲海盗居住最为稠密的地区。他们与当地称为安塔瓦雷特拉的贝齐米萨拉卡人通婚，子女称为"梅蒂斯"(métis)。这些混血儿后成为"扎纳马拉塔"，往往作为酋长的外孙与酋长结盟。大约在1694年，因此种联姻而出现一位"扎纳马拉塔"，人称腊齐米拉荷，[16] 他的父亲曾短期带他到英国和印度。[17] 贝塔尼梅纳人(当时称锡科亚人，以现代马尔加什语称齐科亚人)中出现的政治变化使腊齐米拉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大约在1700年前后，锡科亚人开始团结在一些强大的酋长周围。到1710年前后，他们推选出瓦图曼德里的酋长作为最高统治者，后来率领他们进入北方港口。正是对这些港口的一次入侵行为的反应，腊齐米拉荷尽管年轻，却设法使大多数安塔瓦拉特拉人联合起来。

1712年，腊齐米拉荷重新夺得费内里夫，锡科亚人仓促退却，在穿过一片泥泞的红粘土地时双脚粘满泥土，由此得名"贝塔尼梅纳"(Be-tani-mena,红土地上的众人)。[18] 腊齐米拉荷起名"贝齐米萨拉卡"(不可分割的众人)，以强调政治联盟的持久性，并与贝塔尼梅纳人相区别。通过撤出塔马塔夫港并将其交还给他们的国王，他还与贝塔尼梅纳人建立了和平，并被推选为所有贝齐米萨拉卡人的国王(mpanjaka-be)，而且在他的首都富尔潘特被重新命名为雷马鲁马诺姆波(众人拥戴的君王)。[19] 不过，贝齐米萨拉卡与贝塔尼梅纳的和平不到半年便被打破了。腊齐米拉荷夺取了塔马塔夫，迫使贝塔尼梅纳国王继续向南进入难于接近的地区。[20] 腊齐米拉荷还与(南方的贝齐米萨拉卡人)和贝扎诺扎诺人建立了

[14] L. 米歇尔(Michel)，1957年，第34-51页；C. 里巴比尔(Le Barbier)，1916-1917年，第97-100页。
[15] 在16世纪90年代，荷兰人曾见到一位统治者，他独占红色，戴一种有两个角的士冠。
[16] N. 马耶，《腊齐米拉荷》，1806年，打字稿复印件，第132页。
[17] 同上，第11页；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28页，注①。
[18] N. 马耶，《腊齐米拉荷》，1806年，打字稿复印件，第28-36页。
[19] 同上，第36-48页。
[20] 同上，第64-77页。

联盟。[181] 到18世纪30年代，腊齐米拉荷已是马达加斯加最强大的国王之一，他与那些具有独立传统的氏族和家族结成联盟。他允许传统的酋长们保持自治权，并依据各自的情况，向其纳贡，贡品包括奴隶、牲畜和大米。他还用王室礼物(vilipate)酬劳在反对贝塔尼梅纳的战斗中牺牲的“菲罗哈尼”(filohany)的亲属。他允许贝塔尼梅纳人赎回在敌对期间被抓的亲戚。他将大大小小“菲罗哈尼”的儿子抓到宫里做人质，但同时也利用他们作为王室使者(ompanghalalan)，将他的命令带给贝齐米萨拉卡人。他还执行最高审判，允许贝齐米萨卡人越过自己的统治者。[182] 腊齐米拉荷敏锐地感觉到他的王国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为此他与伊博依纳国王安德里亚巴巴的独生女玛塔芙结婚，从而与沃拉麦纳和萨卡拉瓦帝国建立了联系。[183] 腊齐米拉荷作为贝齐米萨拉卡人的领袖和统一者大约40年之后于1754年去世。从1755至1803年间他有三个继承人。第一个于奴隶暴乱中丧生，第二个继承人被自己的臣民用长矛刺死，中间这位名叫伊亚维，在马达加斯加是最大的奴隶贩子而声名显赫。确实，到18世纪下半叶，在贝齐米萨拉卡的国土上出现了与安哥拉奴隶贸易灾难最深重的17世纪早期相似的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马达加斯加东南部的安蒂萨卡和安蒂法西都是由来自西部的移民建立的。萨卡拉瓦-梅纳贝的统治者安德里安达希弗茨和他的兄弟(或是叔父)安德里亚曼德勒 884 西之间的不同，使后者被迫带着随从离开梅纳贝向南部内地迁徙。安德里亚曼德勒西跨过霍罗姆贝高原，甚至可能抵达了巴拉-塔纳拉裂谷(前往东部海岸的通道)。不过，直到他的孙子贝哈瓦时才获得诺西潘德拉(后来叫万加因德拉努)，并将此地作为安蒂萨卡人的首都，这里是扎拉贝哈瓦统治者的所在地及其王国的粮仓。[184] 据安蒂萨卡人的信息提供者称，这个集合名称表明他们有萨卡拉瓦人的血统。[185] 德弗拉库的地图表明，安蒂萨卡人的迁徙在17世纪50年代时已结束。至于安蒂法西人，其传说表明他们最早的祖先恩德里齐寮来自非洲大陆，后进入梅纳兰德拉河。当时马鲁塞拉纳人已在马哈法利、梅纳贝和巴拉的部分地区立足。恩德里齐寮在伊索罗的陪伴下(后离去建立了扎菲索罗)定居于伊巴拉。不过，到了他的孙子恩德里姆波拉诺尼的时候，与扎菲马内利人相处已经十分困难。恩德里姆波拉诺尼进一步向东迁徙，在一次当地人的战争中他支持安泰瓦托贝人的统治者，此人的女儿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之一马洛弗拉确定了这一名称“安蒂法西”(沙民)，用以表示他的王国将人丁兴旺如沙堆一样。[186]

毫无疑问，在19世纪以前，安蒂法西最重要的统治者是伊法拉，他居住在安姆巴基(法拉凡加纳的旧名)。伊法拉获得了与航抵他的海岸地区的最早的欧洲船只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为此他日渐强大以至于被广泛认为是马纳帕特拉河的唯一拥有者。[187] 使人特别回想起的扎拉贝哈瓦的另一位统治者是马塞巴，他使安蒂法西人从安蒂莫罗人的短暂统治分离

[181] 同上，第83-90页。
[182] 同上，第116-124页。
[183] 同上，第124-130页。
[184] H. 德尚，1936年，第166页。
[185] H. 德尚，1936年，第162-164页；马尔尚，1901年，第485-486页。
[186] M. 丰托伊诺特(Fontoynont)和E. 雷奥曼达希(Raomandahy)，1939年，第1-5页。
[187] 同上，第6-7页。

出去。伊法拉是马塞巴的继承者，但统治时间较难确定。安蒂法西人(有时声称与扎拉贝哈瓦人有血缘关系)无疑是在安蒂萨卡人之后形成的，或许是在17世纪70年代，马塞巴可能是17世纪最后一位统治者。根据安蒂莫罗人的资料来源，安蒂莫罗人与安蒂法西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188] 冲突在18世纪以后继续存在，但战争始终不分胜负，安蒂萨卡人更为内向，在继承权问题上面临许多困难。据传说，他们的扎拉巴哈瓦国王之一雷通戈拉扎“杀害或是流放了他的所有兄弟”。他的孙子伦戈亚博是18世纪最后 885 一位国王，他将安蒂萨卡的疆界扩展到了最大范围。[189] 对于安坦巴华卡人和安蒂莫罗人18世纪的历史依然不太清楚，尽管欧洲人提到过马蒂塔纳人，认为他们是重要的大米出口商和奴隶贩子之一，在1724年之后尤其如此。[190] 在18世纪尤其是1750年之后令人颇感兴趣的另一方面，是在扎芬德拉米尼亚和安蒂奥尼统治者的统治下，平民们普遍骚动不安，并在19世纪爆发，从而迫使安蒂奥尼寻求梅里纳支持他反对自己的臣民。

到1674年，从法国来到多凡堡的大约4000名移民和士兵，已有三分之二死于疟疾、饥饿和暴力。[191] 24年之后，在这个位于安塔诺西地区的城堡废墟中，一位荷兰船长发现当地的“国王”却是一个名叫塞缪尔的马提尼克海盗。他拥有一支由15艘小艇组成的舰队，率领大约20个欧洲人和300个安塔诺西人，不断与传统的统治者迪亚马兰加迪亚麦拉作战。[192] 欧洲人与安塔诺西人的联系不仅是靠早年通过多凡堡建立的联系而维持下来，而且还由于在18世纪20年代以后，马斯克林群岛已变成种植园经济区，它对于奴隶、大米和牧畜的需求不断增长，莫达夫伯爵作为法国派遣的总督再次占领了多凡堡(1767-1770年)，他发现在安姆布卢河谷到曼德拉雷河之间这一地区至少有35位统治者，他们之间为争夺奴隶和牧畜而相互征战，致使他们的臣民(尤其是在安坦德罗伊人中)不断向外迁徙，当地最强大的统治者所控制的村民也不超过3000人。[193] 莫达夫反对奴隶贸易，并以合法贸易来取代奴隶贸易。但他被法国抛弃(与他之前的德弗拉库十分相似)，最后也开始贩卖奴隶，用以还债和向法兰西岛(毛里求斯)上他自己的种植园输送奴隶。[194] 这里应回顾的是，多凡堡建设之时，安塔诺西地区的人口在马达加斯加也是最为稠密，它的农业生产有大量剩余，甚至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在莫达夫的使命失败之后不久，另一个法国来访者看到的安塔诺西已是马达加斯加“最穷”和“最糟糕”的地区，人烟稀少，几乎没有资源，甚至连奴隶和牧畜也很少，不得不从遥远的地区获取。[195]

886 安坦德罗伊这个马达加斯加最南部的国家，有两个全然不同的地区。安坦德罗伊西部

---

[188] G. 蒙戴因，1910年，第73页；R.K. 肯特，1970年，第98和157页。

[189] H. 德尚，1936年，第166-167页。

[190] C. 格兰特，1801年，第167-171页，根据1763年的报告。

[191] G. 格朗迪迪埃和D. 德卡里，1958年，第103页，注②。

[192] 简·科因(Jan Coin)，《航海记》，1698年，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6卷，第41-47页。

[193] 莫达夫(Modave)，《日志》，1768年，引自A.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0页。18世纪30年代，安塔诺西起而反抗扎芬德拉米尼亚人夺取他们的牲畜，根据勒·让蒂尔(Le Gentil)，1779-1781年，第2卷，第511-522页，但此事也可能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根据A. 格朗迪迪埃，《笔记》，手稿，第316、410和511页；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04页，注⑤。

[194] H. 德尚，1965年版，第80-81页。

[195] M. 德拉海(de la Haye)，1774年，引自G. 格朗迪迪埃和R. 德卡里，1958年，第10页，注①(a)。

地区位于梅纳兰德拉河与马南布卢河之间，卡林博拉人是这里的“托姆庞-塔尼”，卡林博拉人没有迁移的记忆。安坦德罗伊东部地区(德弗兰库称之为安姆帕德里斯人的土地)从马南布卢河一直扩展到曼德拉雷河，一度曾主要被马罕德洛瓦托人占据。他们后来汇入了来自巴拉和安塔诺西的移民洪流，这些移民是为逃避家乡的政治动乱而向干旱的南方寻求避难的。[196] 看起来，扎菲马纳拉统治王朝产生于马罕德洛瓦托人(他们欢迎最早的移民集团)，他们的统治也逐渐地被卡林博拉人所接受。安坦德罗伊这个集合名称是扎菲马纳拉人用来称呼所有居住在梅纳兰德拉河和曼德拉雷河之间的众多民族的，它反映出一种政治统一的意识，即一个“扎菲马纳拉联盟”。卡林博拉人在居住在安姆巴希的酋长的领导下保持了他们的自治权，通过联姻而接受了扎菲马纳拉人的国王，因为他们需要防卫和反抗马鲁塞拉纳-马哈法利人向东扩张。[197] 但从长远看，卡林博拉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扎菲马纳拉人什么帮助，只是在1750年之前，将马哈法利人阻挡在梅纳兰德拉河，但以后却没能做到。[198] 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地和安塔诺西屡次前来的移民削弱了扎菲马纳拉人在安坦德罗伊东部地区的统治。到18世纪90年代，扎菲马纳拉人因洪水围困在马龙布高原，已无力应付他们以前的势力范围不断发生的变化。对于马达加斯加其他居民而言，18世纪的结束对安坦德罗伊人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科摩罗群岛：大科摩罗、昂儒昂、莫埃利和马约特[199]

科摩罗群岛大体上位于马达加斯加到非洲大陆的中途位置上。大科摩罗岛离非洲大陆最近，马约特岛面对马达加斯加，昂儒昂岛和莫埃利岛则处于大科摩罗与马约特岛中间。这些岛屿的历史主要是其所处地理位置的真实反映。一般认为，科摩罗群岛居住的是讲班图语的非洲大陆人，他们与伊斯兰教并没有可以辨别的联系；并认为这一伟大宗教是由非洲-设拉子人传人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在科摩罗人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肯定也是由于在较晚的时候从非洲到达科摩罗的穆斯林政治上的成功。从赛义德·艾哈迈德·阿里所收集 **887** 的传统资料来看，[200] 科摩罗在前伊斯兰和设拉子时期的历史与一些古代首领“贝贾”(bēdja)和他们的继承者“法尼”(fani)相联系，这些人的女儿(jumbe)可能与逊尼派新移民

[196] E. 德福奥特，1913年，第161-172页，有关各种迁徙的概述。

[197] 同上，第162和166页。

[198] 同上，第168页。

[199] 科摩罗四个岛屿的名称在旧的资料中很不一致，但它们的本地名称是：恩加兹贾、安祖安尼、莫阿里(有时称姆赫利)和姆桑布鲁(来自马约特操班图语的最大族群姆香巴拉)，有时也称马亚塔；参见J. 雷皮奎特(Repiquet)，1902年，第110页，和A. 格乌雷(Gevrey)，1972年，第74页。在这篇短文中用的名称是目前所用的。

[200] 《昂儒昂历史论文》，1927年12月29日，打印稿，第1-45页，格朗迪迪埃图书馆，齐姆巴扎扎-塔那那利夫(现塔那那利佛)，马尔加什共和国；按照打印稿页码、S.A. 阿里('Alī)的《论文》部分内容曾载于当地一份存在时间短暂的刊物《阿尔卡马尔同学会》中(1971年5月)，但很不完全。尽管有许多段落混乱不清，他1927年写的《论文》肯定仍然被认为是研究当地历史最有意义和相当有价值的材料。这篇论文是献给马达加斯加和附属地总督的。科摩罗从1914到1946年曾归属马达加斯加。马约特岛在1843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地。科摩罗另外两岛在1886年也被法国占领。

通婚。[201] 现在对“贝贾”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两个时期也难以明确划分，[202] 不过，“法尼”却与石建筑和科摩罗岛上最早的清真寺的建造有关。[203] 虽然这三个成份倾向于重复在东非历史上经常表述的情况，[204] 但是，“贝贾”和“法尼”的历史年代，若没有详尽的考古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依然难以确定。不仅早该进行这些研究工作，还要对三大历史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讲班图语的居民的迁徙问题，印度尼西亚人向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迁徙问题，以及斯瓦希里文化自身的形成问题。[205]

888 最晚到达的穆斯林给科摩罗带来的最明显的创新是政治观念。在历史上，科摩罗的四个岛屿首次被看做一个单一的整体，并试图将其置于居住在位于中央的昂儒昂岛上的一位君主（素丹）的统治之下。这一素丹统治时期可能到1506年才开始，但也可能早于1400年，这取决于如何理解那些有限的资料。[206] 科摩罗群岛中的一两个岛屿，在“建立马林迪的同一穆斯林阿拉伯部族”抵达大科摩罗之前，[207] 或许已经处于来自莫桑比克和基尔瓦的商人的控制之下，[208] 每当岛上的卡尔塔拉大火山喷发时，从非洲大陆上便可看到大科摩罗岛。

一些实用和简短的传说认为，最早的科摩罗王朝是在昂儒昂岛上形成的，尽管最早的古代居民是先移入大科摩罗岛。[209] 这种说法可能并非牵强。大科摩罗岛是最大的一个岛

---

[201] S.A. 阿里，1927年，第3-7页。

[202] “贝贾”（Bē dja）有时似乎是指最早的设拉子首领。例如，M. 卡托伊诺特和E. 雷奥曼达希在1937年整理出下述口头传说：“由于设拉子人掌握植物学、医学和制药方面的知识，得以避免疾病的危害，人口迅速增长，后来向更远的地方扩散，并选出首领，称为‘贝贾’，在一些素丹国也可发现这一名称，如Fabedja”，第12页。詹姆斯·柯克曼（James Kirkman）在为朱斯塔斯·斯特朗德斯（Justus Strandes）所做的关于“波斯人”的注释中（第309-310页，1971年英文版）对东非所表达了同样的保留意见，可用来说明设拉子和阿拉伯以及“法尼”时期和逊尼派穆斯林时期未来的明显差别。

[203] 最早被提到的清真寺是在马约特岛上的钦贡尼，但是A. 格乌雷1972年的著作（第207页）中，雕刻的回历年代是944年，而S.A. 阿里（1927年，第4页）指出的年代是844年，时间约为基督纪年的1566年和1441年。

[204] 特别参见H.N. 奇蒂克（Chittick），1971年，第100-117页。

[205] 有关非洲大陆居民在科摩罗岛上出现的早期年代问题，可能导致关于讲班图语的居民迁徙浪潮和迁徙阶段的种种理论与假设的大范围修正；同样也可能，来自大陆的居民有着非洲-印度尼西亚人的混合血统，特别是瓦马特萨哈人，作为最早的科摩罗定居者的代表，在生理上、人种上甚至语言方面的一些特征，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参见J. 雷皮奎特，1902年，第51页和插图；S.A. 阿里，1927年，第1页；另见詹姆斯·霍尼尔（James Hornell）有关马达加斯加、科摩罗、东非的比较研究（如J. 霍尼尔，1934年）。目前所知最早的科摩罗词汇已经是斯瓦希里语，比如，沃尔特·佩顿（Walter Peyton）在1613年报道的14个词汇，见S. 珀查斯（Purchas），1613年，《他的朝圣者》，英国图书馆，伦敦，附录，手稿第6115号，第1卷，第488-490页；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491页和注释；另见L. 奥加斯（Aujas），1920年，第51-59页。

[206] 参见A. 格乌雷，1972年，第78-79、148、184、206-207页；S.A. 阿里，1927年，第2-5页；J. 雷皮奎特，1902年，第111-112页。格乌雷列出了1530至1843年间马约特岛的18位素丹（其中最后一位来自马达加斯加），第227页；他指出，有的年代是准确的，有些只是大致年代。遗憾的是，他确定的兰凯斯特访问科摩罗的时间为1561年，实际上相差了30年。（应是1591年，不是简单地9/6倒置的问题）。

[207] J. 斯特朗德斯（Strandes），1971年重印本，第85页；J. 德巴洛斯（de Barros），1552-1613年，第1卷，第214-215页；A. 格乌雷，1972年，第123页。

[208] 杜·卡托（Do Couto），《亚洲》，12月7日，第4卷，第5章，第310-318页；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103页。

[209] 最早的清真寺在马约特岛而不是昂儒昂岛（而且其建筑都是哈桑尼之子哈伊萨时期建造的），这一事实似乎使实用功能方面得到证实，但恰当地说，这一判断还不能确定，因为对19世纪以前的科摩罗还没有开展真正专业化的历史研究。

屿，但是岛上却没有淡水，土壤也普遍不适宜耕种。直到1727年，亚历山大·哈米尔顿描述大科摩罗岛时说它缺乏必要的生活条件，岛上居民很少。[20] 倒数第二位祖先哈桑，或称哈桑尼，是这个王朝的真正创立者。他还被说成是昂儒昂岛上几座清真寺的极富创造力的建造者。清真寺首先建在锡马，后来又建在多莫尼。他还被看成是沙斐仪教派(Shāfi ῑte)的主要传播者。确实，他的地位上升与昂儒昂人普遍接受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一背景似乎难以分开。他的儿子们都有班图语和阿拉伯语的双重名字。他们将哈桑王朝扩展到了科摩罗的其他岛屿上，同时大概还伴随着新的宗教影响。[21] 此后，科摩罗的历史便主要是其内部统治者甚至各个岛屿小小的素丹领地之间的争斗起支配作用。因此，当逊尼派穆斯林控制了科摩罗群岛并带来一种以"卡迪"(kāḍī)、纳伊布(nā 'ib,村庄法官)和"马吉里斯"(Madjelisse,法理学家团体)为主的新司法体制之后，在亲属之间以及一些老的"法尼"和新的"素丹"之间的政治斗争，便成为科摩罗社会中一个持久性的且最具活力的特征。

到过科摩罗群岛的欧洲人留下的记述很少与当地的传说相吻合，至少是那些迄今为止已有文字记录的传说。不过，这两种历史材料，内部的和外部的，确实展示出内部持续 889 不断的争斗、展示出当地历史不是由较大的大科摩罗岛和马约特岛支配，而是由带头的昂儒昂岛和莫埃利岛决定这一事实。在17世纪到来时，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单个访问者证实，昂儒昂确实有一位君主——一位女王——被认为是科摩罗四个岛屿的最高首领。[22] 从相同的历史资料中也可以推测，每个岛上还有自己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将昂儒昂岛的女王奉为王朝的女家长，[23] 不一定是令人畏惧的军事或行政上的统治者。例如1602年时，莫埃利岛由一个独立而有力的穆斯林君主统治，他的航海知识，他对于从红海到东印度航海图的了解，所掌握的非洲和阿拉伯的第一手知识，以及对葡萄牙语的掌握，使欧洲的访问者大为吃惊。[24] 这个令人极为感兴趣的科摩罗人死于1613年，恰好是在克里斯托弗·纽波特抵达的头一天，他注意到只有为王室治丧才使莫埃利人暂时停下来，而他们作为战争的参与者经常驾船驶往昂儒昂岛和其他科摩罗岛屿。[25] 一年以后，另外一些英国访问者发现，大科摩罗岛被十位"领主"所分割；昂儒昂岛的女王(即"老素丹女王")已经将莫埃利的权力授与她的两个儿子，阿迈尔-阿德尔为素丹，他的兄弟为素丹副王和"谢里夫"(主要祭司)，两人均住在内地靠近丰博尼的地方；莫埃利的主要港口由丰博尼的长官统治，此人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26] 此外在1614年，穆萨穆杜的"老法尼"宣布他自己是一位

---

[20] A.哈米尔顿(Hamilton)，1727年，第1卷，第16-22页；《塔那那利佛年刊》，第4卷(1892年)，第498页(1744年第2版)。

[21] S.A.阿里，1927年，第3页。他们的班图名称是马欣达和齐瓦姆波。

[22] 著名的有荷兰人1599年和1601至1602年的访问，以及弗朗索瓦-马丹·德维特里1602年的访问，见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256、272、317页。

[23] 一些叙述材料提到素丹"女王"，她们有时作为妻子，有时又作为母亲。这位(素丹)王太后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尊崇，见约翰·萨里斯1611年对莫埃利岛的记述，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497页。

[24] 有关报道来自海军上将G.斯皮尔伯格1602年的访问，译自荷兰文，见德康斯坦丁(De Constantin)，1725年，第4卷，第29-30页和42-60页；A.格朗迪迪埃等人，第1卷，第312-313页。

[25] 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490页。

[26] 沃尔特·佩顿和托马斯·洛伊的叙述，见S.珀查斯，1613年，《他的朝圣者》，英国图书馆，伦敦，附录，手稿，第6115号，第1卷，第529和536页；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83-89页。

独立的素丹，是昂儒昂北部的主人，因为德高望重的女王已不再控制她的岛屿。[217] 1616 890 年，马丁·普林在莫埃利也遇见一位强有力的“法尼”。[218] 到1626年，莫埃利的素丹王位有两个竞争者，一个是“法尼”（当时大概已去世)的后裔，另一个是阿拉伯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财富来自他们的妻子，即这位“末代素丹”的女儿们，显然大部分争斗也归咎于她们。[219]

除一些例外情况，[220] 科摩罗的统治者们寻求与来到他们岛上的欧洲人建立友好关系。欧洲船队的船长们在抵达时送给当地统治者多少像样的短剑和手枪已成为一种习俗。[221] 在船长们离去时素丹及其港口的长官还得到他们推荐信。这些文件随后可向即将前来的船长们出示，作为国际友好的证明。[222] 哈米尔顿曾写道，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都是驶往穆哈、波斯和苏拉特”，暂时停泊在“约翰纳”（昂儒昂岛)进行“休整”，由此导致英国和昂儒昂岛人一种持久的和睦友好，通过这种友好关系，当地的素丹可以不时地访问。科摩罗的商人长期作为马达加斯加、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中间人，但是这并非就是说(正如在别的地方不时会读到的那样)这四个岛屿自身没有什么可供出口。一个岛屿内部发生的战争，如所报道的1620年发生在大科摩罗岛上的战争，[223] 以及一个岛屿对另一个岛屿不断发起的海上攻击，已超出了纯粹的政治冲突范畴。许多人因掳掠奴隶出口并获得可观的利润而大受赞誉。到17世纪70年代穆萨穆杜建起巨大的清真寺时，这种双重目的变得更加明显，不过，与西印度洋的海盗时期(1680-1720年)相比要稍为逊色。当时，科摩罗群岛的素丹总是受到诸如传教团和卡拉齐奥利这样的大海盗们所欺骗。科摩罗城处处可见衰落和破坏的迹象。[224] 正是从1700到1720年间，英国的海军舰队在康沃尔船长和舰队 891 司令利特尔顿的率领下放弃了中立的旗号，积极援助昂儒昂岛及当年的素丹。[225]这种海军和

---

[217] A. 格乌雷，1870年，第185页；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90页及以后诸页。格乌雷和格朗迪迪埃都称，穆萨穆杜叛乱的素丹名叫“马戈尼-法尼”（Magne-Fane），他们都引用了皮尔特·范·邓·布罗埃克的话，他是雷因斯特将军领导的荷兰舰队精明的了望手和军官，1614年曾访问过科摩罗群岛。不过，范·邓·布罗埃克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218]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100页。M. 普林(Pring)在《Fanno Mary O Fannadill》中提到他的姓名。

[219] 托马斯·赫伯特的叙述，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394-399页。

[220] 例如，1591年在大科摩罗岛上发生一次伏击，J. 兰凯斯特指挥的35名海员被杀，这一事件使这个岛屿在随后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以后一直背负坏名声；参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161页。

[221] 1608年，亚历山大·夏皮尔给他在大科摩罗岛停泊地点的统治者送去一些小装饰物和两把刀，这些礼物被“不屑一顾地退了回来”。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419页。

[222] 例如，1620年时，德博里奥将军曾见到两份用英文和荷兰文写的签署日期分别为1616年8月16日和1618年8月8日的信件作为“证明”。参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358页。国际推荐信的做法，可以肯定是产生于当地的斯瓦希里书写文化，因为人们都知道，至少马约特的首领是通过国书与昂儒昂的素丹建立起联系。1599年，比如说荷兰人就拿到一份由马约特统治者为昂儒昂岛女王写的推荐信，参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1卷，第256页；1646年，约翰·斯马特拿了“马约特岛国王”的信件前往昂儒昂岛；斯马特致肯纳斯通，1646年6月26日，参见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5卷，第514-517页。

[223] A. 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2卷，第365页。

[224] 同上，第3卷，第480-514页。

[225] 同上，第5卷，第53、156和159页。(法国船长佩隆在1790年向昂儒昂提供援助以反对马约特，马约特在53年之后成为法国的保护地。)

军事方面的援助反映了一种企望，即将昂儒昂岛的有效控制扩展到科摩罗其他岛屿，作为回报，抢先得到当地的海盗庇护地。到1720年，海盗的霸权地位已经结束，但英国军队代表昂儒昂岛进行的干涉行为并未停止。

按照赛义德·艾哈迈德·阿里的记载，昂儒昂在1736年产生了一位新君主艾哈迈德素丹。正如早期的哈桑王朝一样，他相信所有的科摩罗岛屿都应处于一个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他统治了很长时期，“超过40年”，不过他在位期间曾于1743年发生了一场未遂的王朝政变，若干年后又与马约特发起一场全面战争(以昂儒昂的耻辱失败而告终)，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地区发生内部叛乱事件。昂儒昂最早的居民(瓦马特萨哈人)在一个名叫通姆巴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平民领导下(他自称是一位“法尼”的后裔)，在1775年起而反抗统治阶层中的阿拉伯人，要求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以及“与阿拉伯妇女通婚的权利”。多莫尼轻而易举被攻陷，反叛者得到足够的武器围攻穆萨穆杜。对哈桑王朝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租用了一队英国海军，英国士兵首先击中了通姆巴，当时他正在一个抬高的平台上，打着一张大红伞。[26] 通姆巴的死结束了一场可能对昂儒昂岛和其他科摩罗岛产生深远影响的运动。不过，随着18世纪接近尾声，对科摩罗集团来说，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由萨卡拉瓦人和贝齐米萨拉卡人组成的舰队，为了获取奴隶开始向这四个岛屿发起进攻，在当地居民中引起了持久的恐慌。到1825年前后，海上攻击结束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干涉。[27] 此外，梅里纳在马达加斯加的扩张引起的动乱至少导致发生了一起不曾预料的事件。随着来自伊博依纳的萨卡拉瓦人迁徙洪流，马约特岛民开始讲马尔加什语，岛上出现了马尔加什人的素丹(雷马奈特卡，他是拉达马一世的亲属，以及安德里安佐利，他是萨卡拉瓦-伊博依纳最后一位统治者)。[28] 确实，对于科摩罗群岛来说，位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之间并不轻松。

马斯克林群岛：留尼汪、毛里求斯、罗德里格斯[29]

892

与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相反，马斯克林群岛的三个岛屿在印度洋上的欧洲人到来之前，一直无人居住。[30] 由于这些岛屿位于马达加斯加以东，留尼汪(波旁岛)和毛里求斯(法兰西岛)因此而成为由庞大的海外贸易公司控制的海上战略基地。在马斯克林群岛中，留尼汪和毛里求斯这两个大岛还发展了种植园经济，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程度上，不仅

---

[26] S.A.阿里，1927年，第12-14页。

[27] 有关马尔加什人的海上攻击情况，见上述注[10]；以及奥斯汀·比斯尔的叙述，1798年11月，载于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5卷，第415-416页(英文本见A.达尔林普尔(Dalrymple)，1806年，第1卷，第5-12页)；另见M.丰托伊诺特和E.雷奥曼达希，1937年，第15-21页。

[28] 关于雷马奈特卡和安德里安佐利的概要叙述见A.格乌雷，1870年，第217-225页。

[29] 罗德里格斯由火山岩石构成，面积约60平方英里，距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均数百海里。有关该岛的情况，本章没有涉及。有关情况见J.F.杜邦(Dupon)和A.伯突奇(Bertuchi)，1923年。这三个岛屿于19世纪20年代获得目前的这一集合名称，A.图森1972年的著作是关于这一课题的标准著作。留尼汪曾被称为波旁岛，法国人也曾将毛里求斯称为法兰西岛，现在的名称被保留下来。

[30] 这一主要事实也否认从印度尼西亚穿越太平洋直接到达马达加斯加的人口迁徙运动，否则这种迁徙也会给马斯克林群岛带去“托姆庞-塔尼”(土地的主人)。

影响了马达加斯加东部，而且影响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甚至对印度也产生了影响。1638年以后，荷兰人集结在毛里求斯开采木材，并与马达加斯加发展奴隶贸易。但到1710年，荷兰人放弃了这个岛。[21] 留尼汪是1646年开始出现最早的居民。1654年，来自多凡堡的数目大体相等的法国和马尔加什反叛者反抗最早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结果，该公司从1664到1719年间将波旁岛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22] 到1721年，法国人从留尼汪向毛里求斯进行移民开发，直到1767年，这两个岛屿一直处于法国第二个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1767年以后，马斯克林群岛由法国王室政府控制。[23] 1790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后，留尼汪和毛里求斯的种植园主开始维护本地的民族主义形式，反对宗主国1794年废除奴隶制以及国民议会企图派遣代理人等措施，1796年，两位代理人被驱逐。拿破仑战争证明对法属马斯克林群岛是不利的，毛里求斯永远落人英国人控制之中，还暂时停止了奴隶的供应。不过，除了政治方而这些不断的变化，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开始进人其最为显著的经济发展时期。

893 1710年前后，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共有大约2000名居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奴隶。18世纪中期，人口增长了300%，不过它当时的人口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奴役劳工。到18世纪末，这两个岛屿已有居民120,000人，包括大约94,000名奴隶。[24] 18世纪早期，在当地社会中已可以看出五个明显有别的集团——最早定居的白人家族，白人克里奥尔人，黑白混血的克里奥尔人，外国白人居民(包括许多过去的英国海盗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荷兰难民)，以及奴隶。这些奴隶还可进一步分为黑人克里奥尔人和不是出生在这两个岛屿上的黑人奴隶。[25] 在1797年之前只有少数被解放的奴隶。比如在1788年，在留尼汪45,800名居民中，只有950名被解放的奴隶；在毛里求斯，同一年的总人口是42,828人，其中只有2456名被解放的奴隶。[26] 不过，当地的奴隶人口中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因为马斯克林奴隶购买者逐渐从马达加斯加转向非洲大陆和印度，以寻求新的劳动力，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至少是他们相信马尔加什人特别易于形成逃亡奴隶群体。根据1758年的一份报告称，“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奴隶有极大的逃亡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对自由的热爱，逃人深山老林，并结伙袭击他们作为奴隶曾经劳动过的种植园。”[27] 事实上，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出现的奴隶逃亡(马龙人现象，marronnage)，与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因环境而导致的对奴隶制的反应，并作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几乎没有马尔加什人参与其中的较晚近的时期。

---

[21] 有关荷兰人在毛里求斯的情况，见A.皮托(Pitot)，1905年。

[22] 见J.巴拉森(Barassin)神父，1953年。

[23] 关于1719年以后时期的一份最好的概述，见A.图森，1972年，第38-106页(公司与王室政府)。较长的叙述，见A.皮托，1899年；C.格兰特，1801年；A.隆尼翁(Lougnon)，1956年和1958年。

[24] A.图森，1972年，统计表，第335-338页。

[25] 根据1714年的报道，参见J.巴拉森神父，1953年，第309页，以及A.图森，1972年，第32页。格兰特引用一位英国海军军官1763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早期的定居者几乎无一例外均与马尔加什妇女结合并生育子女；在没有这种联姻的50人中没有一个克里奥尔人，当地克里奥尔人大概享有如同法国小贵族享有的同样特权，参见C.格兰特，1801年，第163-171页，以及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5卷，第303页。

[26] A.图森，统计表，第335-338页。

[27] C.格兰特，1801年，第75-78页，以及A.格朗迪迪埃等人，1903-1920年，第5卷，第316-317页。

1639年之后，尽管蔗糖生产已经在毛里求斯发展起来，但直到马埃·德拉布尔多内执政时期(1735-1746年)才出现最早的糖厂。此人还将马斯克林群岛重新组织成反对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基地。[238] 不过，毛里求斯在法国王室政府到来之前并没有真正出口过糖，在18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废除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限制政策，将这四个岛屿向所有法国国民开放。[239] 1715年，咖啡引入留尼汪岛，并成了岛上的主要作物，并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获得了最后的丰收。到1767年(由于安的列斯群岛竞争的结果)，留尼汪已处于 **894** 衰落状况，种植园主不得不转向生产香料。[240] 在随后的30年中，马斯克林群岛变成了真正的“各群岛航线的中心交汇点”，因为“商业利益已从大西洋转向印度洋”。[241] 毛里求斯在公司时代每年来访的船只大约30艘，而到1803年，抵达的船只增加了十倍，许多船只为外国商人所有，特别是来自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可以说，到1800年前后，马斯克林群岛上的少数特权阶层享有的生活水准与其他所有殖民地的特权阶层相同甚至更高。

（刘鸿武　译）

---

[238] 马埃·德拉布尔多内无疑是最富创新精神的人物，有关他的情况见他的《法兰西岛和波旁岛回忆录》，1937年由A. 隆尼翁和A. 图森编辑和注释。关于制糖工业，见A. 诺思-库姆斯(North-Coombes)，1937年。

[239] A. 图森，1967年，第94页。

[240] A. 图森，1971年，第35-36页。

[241] A. 图森，1967年，第94页。

29 1500-1800年非洲诸社会的历史发展：结论

B.A. 奥戈特

895 非洲历史上的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可用各种各样的历史标签来形容。在很多史书中，这一阶段被称为“奴隶贸易时代”。这类著作往往过分强调奴隶贸易作为一种因素在非洲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以下事实：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奴隶贸易时代”延续到约1850年，而在东非，如果我们将早期与穆斯林世界的奴隶贸易排除在外的话，19世纪才是奴隶贸易时代。这一标签还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在非洲的某些地方，如南非，几乎从未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另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非洲被逐渐纳入由欧洲统治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这些历史学家更加强调的是非洲的外部联系而非其内部发展。非洲人被说成是不幸的受害者，对左右他们的世界力量既难以理解也无法控制。非洲开始陷入边缘处境，对这一大陆及其人民的种族主义看法更加强化和深入。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人口流动以及在非洲大陆的最后定居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他们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后，除了一些例外情况，非洲几乎不存在大规模的迁徙。此外还有一些作者想从一系列生态灾难来论述这300年的历史，他们认为干旱和饥荒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些标签中每种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都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300年非洲历史的复杂性与推动力。在本卷最后一章，我们将试图找出这一时期非洲诸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主要以本卷各章为基础开展讨论。

以人口流动这一根本问题开始或许较为合适。此问题对这一时期的非洲历史是重要的，但正如范西纳在第三章所说的那样，“1500到1800年期间不会比其他时期更具特色”。[①] 非洲大部分地区在1500年时已被拓殖，而口头传说所谈的这些地区的迁徙实为人口的扩展与漂流。只是在非洲东北部，包括现代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部、苏丹南部、肯尼亚北部和乌干达北部，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的民族包括奥罗莫人、索马里人、卢奥人、卡拉莫琼人、卡伦津人、图尔卡纳人和马赛人。根据范西纳的观点，这些流动“实际上是对边缘土地进行拓殖的史话……所有其他主要区域都曾被占领和居住”。[②]

896 事实上，1500至1800年这一时期对非洲大陆的社会形成至关重要，比起对迁徙问题的一般性关注更具重大意义，在这三个世纪中，非洲不同地区的大部分居民结合成更广泛

① 本卷第3章，第47页。

② 本卷第3章，第68-69页。

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聚合体，这些聚合体构成了今天的非洲诸民族。

随着非洲诸社会演变成独特的、具有特殊语言和文化特征的族体，非洲很多地方由于其与外部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 1500 年，大部分非洲社会相对而言仍独立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它们的对外联系还很脆弱。但到了 1800 年，非洲很多地区已纳入世界市场的范围，因而与欧洲、美洲和亚洲建立了牢固的联系。非洲大陆一些新社区的建立推进了一体化过程，其中包括南部非洲的荷兰定居者，安哥拉和东非海岸的葡萄牙人，以及在埃及和马格里布的奥斯曼人。许多非洲社会的生存手段或居住地或者两者均逐渐改变。在社会内部或诸社会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与以前绝然不同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以统治和依附为特征，既表现在内部也表现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之中。

帕斯·迪亚尼认为在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的新经济结构包括在西部苏丹、尼日尔-乍得地区和撒哈拉发展起来的生产等级制；在地中海、尼罗河和印度洋沿岸地区盛行的劫掠性经济；以及大西洋沿岸地区特有的货栈或贸易站经济。③

例如，劫掠性经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主义的结果，主要依靠的是海盗活动、贡赋和关税，而不是如 1500 年以前那样依靠贸易和工业。又如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次体系即被劫掠性经济彻底破坏。这种经济使农村贫困化，农村后来又因奴隶贸易而进一步遭到破坏。依靠海盗和劫掠活动的军事贵族集团逐渐出现，他们利用自由人和奴隶提供服务。这一剥削压迫制度激起了几次农民反抗，特别是在西部苏丹、尼日尔-乍得地区、埃及、撒哈拉、马格里布、埃塞俄比亚和赞比西亚南部。 **897**

与劫掠性经济一样，货栈经济很少关注有创造性的交易。新的海岸商镇是堡垒，是暴力与掠夺的场所，而非商业与工业的中心。在几内亚和赤道海岸，在刚果、安哥拉和塞内冈比亚，葡萄牙人强夺的比他们购买的还要多。从 1650 到 1800 年，商栈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西洋奴隶贸易。

在 17 和 18 世纪，那些受货栈经济影响的社会逐渐改观，这一复杂过程包括一些较大范围内的重组。重组的主要特征是：贸易网络而非国家成为主要因素，这在西部和中部非洲特别明显。在大部分海岸地区，权力中心普遍崩溃，造成政权分散。正如姆博科罗所说：

> 在非洲方面，贸易的组织并非由国家垄断：竞争使一些个人得利，如王子、平民，甚至某些从前当过奴隶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维护其特权并热衷于获取政治权力的新的贵族阶层……在卢安果，正是这些新兴者——掮客、商人、商队首领和其他中间商——表现得最为出色。因为他们拥有财产，可以从国王手里买到土地，并拥有由许多身为自由民或奴隶的属民组成的扈从队伍。有人提到在 18 世纪末，有的平民拥有 700 名属民，为其作战或耕种土地。④

换言之，随着这些国家的衰落，旧的统治阶级也开始衰落，而新兴的商人阶层取而代之，或补充其不足。例如，葡萄牙人对赞比西亚南部的渗透侵蚀了本土统治阶级的权力，

---

③ 参见本卷第 2 章。

④ 参见本卷第 18 章，第 532 页。

促使葡萄牙商人资本以直接的方式剥削农民。比拉写道："地区贸易网络与长途贸易的结合产生了被称为瓦香巴兹的非洲商人阶层……[他们]充当外国商人与非洲农民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5]

类似的发展产生了卡萨芒斯河、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混血种人和克里奥尔人"。塞拉利昂的非洲裔葡萄牙人和英裔非洲人是商人群体，他们为欧洲商船和内地的非洲社会充当中间人。他们大多数是为欧洲商业资本主义服务的代理商，从而使自己很快地富裕起来。

898 即使是在丰吉和富尔两个素丹国，素丹看来支持并保护将其与埃及和红海联接起来的长途贸易，这种贸易大部分仍由苏丹的商人（贾拉巴，djallāba）控制，他们充当长途贸易的中间人和筹资者。

因此，从1500年起，相对隔离的非洲各族人民逐渐与世界经济联成一体。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一体化伴随着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化。

尽管西苏丹和东北部非洲的一些大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相继崩溃，但"1800年由国家控制的地区在整个大陆所占的比例高于1500年"，范西纳写道。[6] 不仅是由国家控制的地区在三个世纪里有所增加，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通过政治体制的扩充与集权化而达到政治巩固的实例。因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历了国家形成与政治权力集中化这样两个过程。

例如，尽管在16与17世纪东北部非洲经历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崩溃，而无政府状态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855年西奥多二世开创伟大君主的时代，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帝国仍然向南扩张，从而引发了一些新国家的兴起，例如博萨、卡法、塞科、沃莱塔和道洛。

在马达加斯加，我们看到相反的集权化进程。直到17世纪初，马达加斯加仍主要由自立的小酋长国组成。但到17世纪末，马达加斯加西部的萨卡拉瓦帝国和几个王国已在高地居民以及东南、西南与南部诸民族中间出现。18世纪，萨卡拉瓦帝国达到鼎盛时期，而东部海岸地区第一次与贝齐米萨拉卡人结成政治联盟。到1800年，这两个国家开始衰落，而曾经弱小而分裂的伊梅里纳国开始处于优势。

下几内亚海岸地区也出现了与此相似的巩固和集权化过程。根据1629年的一张地图来看，该地区共有由加人和阿肯人建立的38个国家和王国。在1670到1750年间，在下几内亚的森林和海岸地区发生了一场主要的政治革命。在1629年那张地图所示的38个国家中出现了奥温、登基拉和阿夸穆三大帝国，而这三个帝国又于1750年合并为一个阿散蒂帝国。

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扩张与政治制度集权化的国家还有布干达、卢旺达与马拉维。

这300年间的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现象是日益衰落或崩溃的国家由几个地方小国或一些经济体系所接替。如在中部非洲，形成的国家越来越大，到16世纪，刚果、蒂奥、卢

⑤ 参见本卷第22章，第682页。
⑥ 本卷第3章，第72页。

安果和恩东戈(未来的安哥拉)王国业已存在,其中刚果王国居统治地位且最为集权化。但 899 从 1665 年开始，这些国家开始衰落，领土根据奴隶贸易形成的经济规律进行更大规模的重新组合。

在上几内亚海岸，继桑海与马里两帝国之后，一些国家于 17 和 18 世纪相继崛起。大富尔帝国于 17 世纪在桑海的废墟上兴起，但却于 18 世纪下半叶让位于卡尔塔帝国。沿大西洋海岸，因马里解体而产生的一些国家于 17 和 18 世纪由卡布(加布)、随后于 18 和 19 世纪由富塔贾隆先后统一起来。中心地区在塞古的班巴拉人领导下于 18 世纪初复兴，而在南部，迪乌拉人(朱乌拉人)于 18 世纪建立了孔帝国。

赞比西河南部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进程。大津巴布韦的衰落导致扎尔瓦国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后来于 16 世纪初姆塔帕帝国的兴起。姆塔帕国的解体和崩溃始于 1629 年。18 世纪，这一帝国陷入衰败和混乱，但姆塔帕政体直到 1917 年才最终消失。

在大部分新兴国家中，原有的政府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如达荷美即代表了国家的一种新概念。它于大约 1625 年由阿拉达的移民创建，这些移民建立了对不同群体的统治。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一种更大的家庭形式，而在达荷美形成的新观念则认为国家应是高度集权的，由享有绝对权威的国王来统治，要求所有公民无条件效忠。对非洲不同地区特别是 17 或 18 世纪形成的这些关于国家和政府体制的新概念，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这些国家大部分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阶级：贵族、军事集团、平民与奴隶。例如，在博尔诺的卡努里社会即已高度层次化。它大体上分为两个阶级："孔托瓦"(kontuowa,统治阶级或贵族)和"塔里亚"(talia,平民)。两者还可细分为若干群体。不同的语言、服饰、家具、建筑和住宅表示不同的阶级和群体。在豪萨兰，随着贵族和商人日益富裕，开始从经济方面划分，如"阿塔基拉伊"(attajirai,富人)与"塔拉卡瓦"(talakawa,穷人)。

行政和军事方面的贵族通过各种剥削致富。由此很快形成一种压迫的思想。如在埃及，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同社会阶层的内部发生斗争。这种斗争不是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而是为了控制经济、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的危机状态是政治压迫的反映，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绝大多数人受到马木路克贝伊(beys)及其随从构成的少数统治者控制和剥削。这 900 种压迫局面导致阿拉伯文的大众文学的出现，尤其是诗歌和讽刺作品，反映对农民的剥削。

正如我们讨论劫掠性经济的后果时已强调指出的，在非洲的西部、北部、东部、中部和南部发生了几次农民起义反对实行压迫的政权。急需对 17 和 18 世纪发生的这些农民起义进行彻底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些农民抵抗运动进行类型学研究。其次，在很多地区，低层阶级并非属于同源群体，有些甚至不是农民。但一般而言，不管低层阶级是哪些人，可以认为他们是因其地位的恶化而反抗，至少是为了保持现状。

奴隶贸易

通常提出的与此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奴隶人数统计以及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影响，已在本卷第四章及大部分章节相关部分有所论述，因而作为结尾的本章中不必要再重复这些讨论。我倒是希望提请注意与奴隶贸易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是非洲历

史学家应该提出的。

第一，非洲历史应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奴隶贸易？换言之，作为非洲历史学家，我们对奴隶贸易感兴趣的是什么？在历史上，所有的种族均被奴役过，甚至“奴隶”(slave)一词即从东欧的“斯拉夫人”(slavs)衍生而来。但是，所有其他族群均找到了将此经历从其意识中清除出去的办法。例如，犹太人曾是奴隶，但他们现在将其奴隶身份解释为上帝指定给他们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非洲人喜欢过分强调其历史上奴隶身份的重要性，以致“奴隶”一词几乎等同于“非洲人”。正如D.B.戴维斯在其著作《西方文化中的奴隶制问题》和《奴隶制与人类进步》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奴隶制是近代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现象，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⑦] 由此引起了许多对非洲和非洲人的消极看法。

在第四章，英尼科里试图以定量的方式来确定黑人奴隶在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另一个必须面对和彻底解决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尽管奴隶制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不道德的，但它对经济因面对社会进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奴隶，便没有希腊或罗马文明。英尼科里认为，非洲奴隶对以大西洋为基点的地缘政治及经济体系的发展和西欧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费尔南德·布鲁戴尔在其三卷本《文明与资本主义》中则勾勒出欧洲资本主义上升为世界强国的另一幅画面。从一成不变的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开始，经过市场，最后讲述一些银行家和商人如何通过垄断贸易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帮助建立一系列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并使欧洲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力量进一步扩展。他将欧洲资本主义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多国联合企业，如16世纪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及17和18世纪的东印度公司。[⑧] 在这场争论中，需要对非洲奴隶的作用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

901

J.E.哈里斯在第五章提出了另一个与奴隶制有关的重要问题。从所有可得到的证据看，非洲非人化的过程很明显是在1500到1800年之间得以强化，致使从1619年起作为动产的奴隶日益增加。

洲际奴隶贸易是使黑人遍布世界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由此产生了非洲海外移民的主体，特别是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哈里斯认为：

> 正是这种贸易的本质及其结果，特别是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促使非洲人组织争取自由的斗争。多年来，这一斗争引起全世界对拯救非洲和解放黑人的共同关注，尽管有殖民统治，这一进程还是继续下来，并且可能确实是流落海外的非洲人的最伟大的历史后果。[⑨]

确实，由此奠定了19世纪和20世纪泛非运动的基础。

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

很多作者认为，从美洲引进新作物是大西洋贸易体系积极的一面。有些人论证新作物

⑦ D.B.戴维斯(Davis)，1966年和1975年；1984年。
⑧ F.布鲁戴尔(Braudel)，1984年。另见I.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6年。
⑨ 本卷第5章，第136页。

的引进必然改变食物构成，从而促进了非洲人的健康，导致人口增长。正如一本有关非洲历史的标准教科书指出的：

从美洲引进的新作物使热带非洲特别是森林地区得以维持比以前多几倍的人口。仅玉米、花生和木薯三种作物便永远改变了非洲人与其环境的关系。⑩

但正如姆博科罗所告诫，这些农业上的变化对于非洲人的影响难以解释。“是否如经常强调的那样，由于食物供给更为可靠和更为多样化，就能使人们的身体增强抵抗力，并提高人口增长率呢?”他认为这些说法没有证据。相反，他指出，木薯的营养价值有限，主要依赖这种食物的人，如蒂奥人和姆博西人，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⑪ 902

17和18世纪时人口趋势难于分辨，因为一些后来成为反复出现的灾祸如天花等新的疾病正是在这段时间进入非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也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1500至1800年期间欧洲人从美洲和亚洲引进非洲不同地区的新作物使非洲大陆的农业经济呈现了多样化。这些作物包括玉米、木薯、花生、各种薯蓣属植物、甘薯、柑桔、西红柿、洋葱和烟草。在这一时期，许多非洲的粮食作物如香蕉、高粱、小米和薯蓣属植物逐渐为木薯和玉米所取代。因此，如今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玉米和木薯作为主要食物其根源还要追溯到这一时期。

据姆博科罗所说，从社会角度而言，这一农业革命以及贸易本身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劳动分工。他认为，男人逐渐将开垦土地及作物耕种和筹备等农活留给妇女和奴隶，自己则专心从事更为赢利的贸易。因而，家庭奴隶制及其他形式的隶属关系的发展，乃是这些农业变革的直接结果。⑫

生态灾难

有人试图主要根据气候条件来划分非洲历史，并认为严重的干旱期与主要历史事件之间存在一种有意义的联系。尤其是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被看做是易于旱时期。⑬

这种分析过分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把非洲人说成是在大自然面前束手无策的牺牲者。此外还存在忽略正常年景及好于常年的情况而强调旱灾之年的危险。这使得一些历史学家对于前殖民时期非洲的饥荒过于笼统化。⑭ 这些历史学家从未论及非洲人如何发挥创造性对付旱灾。例如，这些旱灾如何影响并促使改变生产和分配制度、树立崇尚粮食作物的态度以及改善粮食储存方法? 903

有关旱灾和饥荒的问题也与前殖民时期非洲农业的效率这一更广泛的问题相联系。正如范西纳指出的那样，例如1500至1800年期间出现了土地精耕细作的技术，这反过来可

⑩ P.D.柯廷(Curtin)、S.费尔曼(Feierman)、L.汤普森(Thompson)与J.范西纳(Vansina)，1978年，第214页。

⑪ 本卷第18章，第531页。

⑫ 见本卷第18章。

⑬ J.B.韦伯斯特(Webster)，1979年a，1980年；S.E.尼科尔森(Nicholson)，1978年，1979年；J.C.米勒(Miller)，1982年；D.J.斯科夫(Schove)，1973年；J.桑顿(Thornton)，1981年a。另见本卷第26章。

⑭ 见本卷第22章。

使人口密度增加。

> 下卡萨芒斯、伊格博乡村和喀麦隆草原及其"引种"的植物，在大湖区域沿西部裂谷的山脉及其灌溉系统和/或香蕉的集约种植，小的地块如库库亚高原及其新颖的施肥方式，或是上赞比西河谷利用河水泛滥，这一切在西部和中部非洲仍属例外。在北部非洲，包括埃及在内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绿洲的集约农业到这个时期已有几千年之久。⑮

简而言之，虽然非洲大部分地区实行集约农业的历史没有北部非洲那样古老，但在小的地块也出现了精耕细作，特别是在西部和中部非洲。在这些地区已开始采用先进的农业方法，如梯田，轮作，使用绿肥，混合农作和定期的沼泽地耕种。这些课题值得历史学家给予更多注意，而不是对非洲饥荒和干旱问题的一般性归纳。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在1500至1800年期间，基督教在非洲已经衰落，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东非海岸；在刚果，衰落的程度小一些。而另一方面，在西非、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东非海岸，伊斯兰教的传播已形成势头。

例如，在下几内亚海岸，基督教是由荷兰人和英国人引人这一地区的。开始，他们在位于海岸角、埃尔米纳和阿克拉的城堡办起了一些小学。后来，在18世纪50年代，广传福音会向海岸角派出传教士。同时，一些新的皈依者，特别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及传统统治者的孩子，被送往国外进一步深造，很多回来以后成为教师和传教士。后来于19世纪在西非发生的基督教革命在这一时期已经奠定了基础。

904 在刚果，基督教是在阿丰索一世统治时期（1506-1543年）传人的。他的儿子在罗马担任主教，在他儿子的指导下，他将天主教立为国教。但后来对基督教的热情在刚果衰退了，直到1645年，一大批意大利嘉布遣会传教士来到此地才有所好转。在17世纪，约400名传教士来到刚果，随后到达安哥拉，他们主要在农村地区传播福音。正如范西纳解释的那样，基督教首先是由葡萄牙人传人刚果，主要在城市贵族中传播，教士主要为葡萄牙人。但从1645到1700年，意大利传教士致力于一场激烈的运动，使尽可能多的人皈依基督教，特别是在农村地区。⑯

在这一段时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不同信仰均采取调和的态度。例如，基督教在刚果即与传统宗教共存。两者之间确有许多相互影响。正如范西纳所作的结论那样：

> 16世纪以后，可以说仅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至少在贵族中。融合了基督教和古老宗教的特色，主要在17世纪广为传播……这种新的宗教便是海地伏都教的起源。⑰

组织独立教会的尝试亦始于这一时期。在刚果，建立本地教会的尝试始于17世纪30

⑮ 本卷第3章，第71-72页。

⑯ 见本卷第19章。

⑰ 本卷第19章，第573页。

年代，在1704年达到高潮。当时，唐纳·比埃特里斯·金帕·维达开始宣讲一种反对传教士和白人的改革了的基督教，称为“安东尼主义”（Antonianism）。从那以后，一种本土的天主教教义在刚果流行。

再来看伊斯兰教。十分明显，伊斯兰教在非洲的扩张构成了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重要主题之一。例如，在下几内亚海岸，伊斯兰教由曼德和豪萨商人引进，并沿着北部商道于18世纪50年代传到阿散蒂和鲍勒。到1800年，库马西已建起一个生气勃勃的穆斯林居民区，并有一所讲授《古兰经》的学校。在上几内亚海岸，伊斯兰教的传播是由富尔贝人和曼德人负责进行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富尔贝人与马林克人的宗教联盟，不仅使该地区的人民皈依，并使人们服从他们。这样，在非洲的众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政治上的统治联在一起。这一点在塞内冈比亚很明显，那里掌权的穆斯林反对塞多(ceddo,军阀)政权构成了这一地区的历史背景。在苏丹，北部苏丹的伊斯兰化在南北之间形成了至今仍很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分野。丰吉和富尔素丹国这两个萨凡纳地区的穆斯林国家的建立和扩张亦发生在这一时期。在17和18世纪，伊斯兰教通过商人、祈祷主持者甚至暴力继续在班巴拉、莫西、刚果和格韦里科等王国传播。在豪萨兰与博尔诺也出现了同样的伊斯兰教扩张的过程。 905

这一时期除了伊斯兰教在非洲单纯地理上的扩张之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很多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纳西尔·丁运动从毛里塔尼亚开始并向南扩展。其部分动机是经济的(控制谷物和奴隶贸易)，部分是宗教的(通过以穆斯林神权政治取代专制政权来纯洁和改革伊斯兰教)。同样的改革倾向在豪萨兰的穆斯林中亦可看到，特别是在18世纪。在不同中心形成了具有类似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背景的穆斯林学者群，他们对以贵族为代表的既定秩序持批判态度。这些学者中最杰出的是鼓吹伊斯兰教改革的马莱姆·吉布里尔·凡·乌玛鲁，奥斯曼和阿卜杜拉希·丹福迪奥都是他的门徒。随着贵族的统治愈来愈具有压迫性，学者们公开地抨击既定的秩序，这是19世纪圣战(djihād)的背景。

特别是在西苏丹、尼日尔河-乍得地区、埃及、撒哈拉地区、马格里布地区、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城市和乡村的统治阶层对非洲农民的压迫，致使穆斯林领袖和基督教的救世主运动发现易于得到农民大众的支持，信教者使人们相信可实现平等并结束不公正待遇。他们谴责传统贵族和欧洲人是破坏因素和社会不公正的原因。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非洲人以调和的态度对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他们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仍忠实于传统宗教。正如伊扎德和基-泽博指出的那样，这种宗教信仰调和的态度后来与非洲的基督教以及巴西、海地与古巴的美洲黑人崇拜得到共同发展。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伊斯兰教给班巴拉人带来了诸如多妻、离婚、休妻及奴隶制等各种制度，但这对其自己的信仰并未构成系统的挑战。”[18]

（李安山 译）

[18] 本卷第12章，第364页。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F.A. 阿贾伊(Ajayi)教授
(尼日利亚)，自1971年起
第六卷主编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Albuquerque Mourao)教授
(巴西)，自1975年起

D. 伯明翰(Birmingham)教授
(联合王国)，自1985年起

A.A. 博亨(Boahen)教授
(加纳)，自1971年起
第七卷主编

已故布布·阿马(Boubou Hama)
(尼日尔)，1971-1978年(1978年辞职,1982年逝世)

穆塔姆巴·M. 布尔(Bull)博士(女士)
(赞比亚)，自1971年起

D. 查奈瓦(Chanaiwa)教授
(津巴布韦)，自1975年起

P.D. 柯廷(Curtin)教授
(美国)，自1975年起

J. 德维斯(Devisse)教授
(法国)，自1971年起

M. 迪富伊拉(Difuila)教授
(安哥拉)，自1978年起

已故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教授
(塞内加尔)，自1971-1986年；1986年逝世

H. 贾伊特(Djait)教授
(突尼斯)，自1975年起

J.D. 费奇(Fage)教授
(联合王国)，1971-1981年(已辞职)

M. 埃尔·法西(El Fasi)阁下
(摩洛哥)，自1971年起
第三卷主编

已故J.L. 佛朗哥(Franco)教授
(古巴)，自1971年起(1989年逝世)

已故M.H.I. 加拉勒(Galaal)先生
(索马里)，1971-1981年；1981年逝世

V.L. 格罗塔内利(Grottanelli)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1971年起

E. 哈贝兰德(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71年起

阿克里卢·哈普特(Aklilu 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1971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Amadou Hampate Ba)阁下
(马里)，1971-1978年(1978年辞职,1991年逝世)

I.S. 哈雷尔(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1978年起

I. 赫尔贝克(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1971年起
第三卷助理主编

A. 琼斯(Jones)博士(女士)
(利比里亚)，自1971年起

已故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Abbé Alexis Kagame)先生
(卢旺达)，1971-1981 年；1981 年逝世

I.N. 基曼博(Kimambo)教授
(坦桑尼亚)，自 1971 年起

J. 基-泽博(Ki-Zerbo)教授
(布基纳法索)，自 1971 年起
第一卷主编

D. 拉亚(Laya)先生
(尼日尔)，自 1979 年起

A. 列特涅夫(Letnev)博士
(苏联)，自 1971 年起

G. 莫赫塔尔(Mokhtar)博士
(埃及)，自 1971 年起
第二卷主编

P. 穆蒂布瓦(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 1975 年起

D.T. 尼昂(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 1971 年起
第四卷主编

L.D. 恩康科(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 1971 年起

T. 奥邦加(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 1975 年起

B.A. 奥戈特(Ogot)教授
(肯尼亚)，自 1971 年起
第五卷主编

C. 拉沃雅纳哈里(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 1971 年起

已故 W. 罗德尼(Rodney)教授
(圭亚那)，1979-1980 年；1980 年逝世

已故 M. 希贝卡(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 年；1980 年逝世

Y.A. 塔利布(Talib)教授
(新加坡)，自 1975 年起

已故 A. 特谢拉·达莫塔(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1978-1982 年；1982 年逝世

T. 齐邦古(Tshibangu)阁下
(扎伊尔)，自 1971 年起

J. 范西纳(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 1971 年起

已故 E. 威廉斯(Williams)博士阁下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 年；1978 年辞职；1980 逝世

A.A. 马兹鲁伊(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主编，非本委员会成员

C. 旺济(Wondji)教授
(象牙海岸)
第八卷助理主编，非本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A. 加特拉(Gatera)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与政策处
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地址：A. Gatera
Divi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ces
1, rue Miollis, 75015 Paris, France

作者简介

第 1 章：M. 马洛维斯特(Malowist,波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经济社会史专家；发表过关于这方面的各种著作和文章；华沙大学前历史学教授；曾任剑桥克莱尔学院成员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访问学者；已故。

第 2 章：P. 迪亚尼(Diagne,塞内加尔)：政治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撰写了关于非洲政权和现代沃洛夫语法等几部著作；目前担任教授和顾问。

第 3 章：J. 范西纳(Vansina,比利时)：非洲历史专家，撰写了多部关于殖民前的非洲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

第 4 章：J.E. 英尼科里(Inikori,尼日利亚)：经济史专家；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各种著作和文章；扎里亚的阿赫马杜·贝罗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

第 5 章：J.E. 哈里斯(Harris,美国)：非洲海外移民问题专家；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各种著作和文章；现任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教授。

第 6 章：R. 维塞利(Vesely,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历史及中世纪阿拉伯地区外交和经济问题专家；发表了几部关于阿拉伯(特别是埃及)和伊斯兰国家中世纪历史和外交研究的著作；在查尔斯大学哲学学院和布拉格东方和非洲研究部担任阿拉伯与伊斯兰地区及其历史的讲师。

第 7 章：Y.F. 哈桑(Hasan,苏丹)：苏丹历史专家，撰写了关于这方面的各种著作；曾任喀土穆大学历史学教授与喀土穆大学苏丹研究部主任；现任喀土穆大学副校长。

B.A. 奥戈特(Ogot,肯尼亚)：非洲历史专家，口述历史诸方法的开拓者；发表了有关东非历史的多部著作；纪念路易斯·利基国际研究所前任所长，内罗毕大学前任代理副校长；内罗毕肯雅塔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8 章：M. 埃尔·法西(El Fasi,摩洛哥)：发表过多部语言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阿拉伯文和法文著作；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前任副校长。

第 9 章：M.H. 谢里夫(Chérif,突尼斯)：北非社会政治史专家；发表过数篇关于北非历史的文章；大学教授，突尼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第 10 章：B. 巴里(Barry,塞内加尔)：历史学博士；发表了关于瓦阿洛、塞内冈比亚和富塔贾隆的多部著作；非洲历史学家协会前任秘书长；现在达喀尔的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艺术学院任教。

第 11 章：M. 阿比特博尔(Abitbol,以色列)：尼日利亚苏丹问题专家；发表了几部关于苏丹史的著作；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高级研究员。

第 12 章：M. 伊扎德(Izard,法国)：沦为殖民地前的莫西王国(布基纳法索)史专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发表许多著作和文章，特别是关于古代亚滕加王国的作品；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人类学研究室)高级研究员。

J. 基-泽博(Ki-Zerbo,布基纳法索)：非洲历史方法论专家；发表了多部关于黑非洲及其历史的著作；达喀尔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 13 章：C. 翁吉(Wondji,科特迪瓦)：非洲近现代及当代史专家；发表多部关于非洲文化和科特迪瓦历史的著作；科特迪瓦国立大学(阿比让)文学院历史系前任系主任和阿比让大学艺术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现任科特迪瓦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

第 14 章：A.A. 博亨(Boahen,加纳)：西非历史专家，曾发表多部关于非洲历史的著作和文章；曾担任加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现任荣誉教授。

第 15 章：E.J. 阿拉瓜(Alagoa,尼日利亚)：非洲历史和史学理论专家；著有多篇关于伊乔人、口头传说的技术和方法

论及考古学研究文章；哈尔科特港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16章：D. 拉雅(Laya,尼日尔)：西非文化专家；社会学家；著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尼亚美的口头传说语言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第17章：B. 巴金都(Barkindo,尼日利亚)：乍得盆地国家形成和国家间关系的专家；著有多部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卡诺的贝耶洛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

第18章：E. 姆博科罗(M'Bokolo,扎伊尔)：黑非洲历史专家；著有多部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资深研究人员；巴黎政治研究院讲师；法国国际电台节目制作人。

第19章：J. 范西纳

T. 奥本加(Obenga,刚果人民共和国)：非洲语言学专家；曾发表多篇有关非洲历史的文章和有关古代非洲社会的著作；曾任布拉柴维尔的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利伯维尔的班图文明国际中心主任。

第20章：恩达维尔·è. 恩泽姆(Ndaywel è Nziem,扎伊尔)：中非历史专家；著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在金沙萨大学和国家教育学院教授历史；扎伊尔国家图书馆馆长。

第21章：K.M. 费里(Phiri,马拉维)：马拉维历史、中部和南部非洲历史专家；曾任马拉维大学历史学讲师和高级讲师；现任马拉维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O.J.M. 卡林加(Kalinga,马拉维)：马拉维湖地区历史专家；著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莱索托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H.H.K. 比拉(Bhila,津巴布韦)：东南部非洲历史专家；著有关于南部非洲的著作，曾任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津巴布韦议会代理秘书。

第22章：H.H.K. 比拉

第23章：D. 德农(Denoon,联合王国)：南部和东部非洲专家；著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曾任伊巴丹大学访问讲师；现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第24章：E. 哈伯兰德(Haberland,德国)：沦为殖民地之前的埃塞俄比亚和西非问题专家；著有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著作；法兰克福弗罗本纽斯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大学人类文化学与非洲历史讲座教授，法兰克福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第25章：A.I. 萨利姆(Salim,肯尼亚)：东非历史专家；曾发表多篇关于讲斯瓦希里语的一些民族的文章；内罗毕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现任系主任。

第26章：J.B. 韦伯斯特(Webster,加拿大)：沦为殖民地之前的历史特别是气候史专家；著有关于阿乔利人和伊特索人历史的著作及《非洲大湖地区的年代学、迁移和干旱》一书；曾任马克雷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和马拉维大学教授。

B.A. 奥戈特

J.P. 克雷蒂安(Chrétien,法国)：布隆迪历史专家；著有关于大湖地区诸王国和德属东非的若干著作；巴黎第一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人员。

第27章：W.R. 奥齐恩(Ochieng',肯尼亚)：肯尼亚历史专家；著有多部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曾任内罗毕的肯雅塔大学学院肯尼亚历史高级讲师；现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大学任教。

第28章：R.K. 肯特(Kent,美国)：马达加斯加历史专家，著有多部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历史学教授。

第29章：B.A. 奥戈特。

（李安山　译）

参考文献目录

尽管出版者尽力确保本参考文献目录每一细节准确无误，但由于本著作的复杂性和国际性，可能仍存在某些错误，特此说明。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AA *Antananarivo Annual*, Antananarivo
Abbia *Abbia, revue culturelle camerounaise*, Yaoundé.
ABUP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Zaria
AE *Annales d'Ethiopie*, Rome
AEH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Madison, Wisconsin
AESC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frica *Africa*, Rome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now *IJAHS*),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AL *Africana Linguistica*,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ALR *African Language Review* (now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Anais *Anais d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Palo Alto, CA
Anthropos *Anthropo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thnologie et de linguistique*, Fribourg
Arabia *Arabia: the Islamic World Review*, Slough, UK: Islamic Press Agency
Arnoldia *Arnoldia*, Salisbury: National Museums of Rhodesia
ARSOM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formerly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and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Brussels
AS *African Studies* (continues as *Bantu Studies*), Johannesburg: WUP
ASR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Lusaka: University of Zambia
ASR *African Studies Review*, Camden, NJ
AVG *Annuaire des voyages et de la géographie*
Azania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ern Africa*, London

BA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malgache*, Antananarivo
BARSO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Brussels
BCAF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 Renseignements coloniaux*, Paris
BCEHSAOF *Bulletin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BCGP *Boletino cultural da Guiné portuguesa*, Bissau
BEM *Bulletin économique de Madagascar*, Antananarivo
BGHD *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 Paris
BIEA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Nairobi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later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Dakar
BIHBR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BJIDCC *Bulletin des juridictions indigènes et du droit coutumier congolais* (now *Bulletin des tribunaux coutumiers*), Elisabethville: Societé des Etudes Juridiques du Katanga
BLLE *Bulletin de liaison – Linguistique-ethnosociologie*, Abidjan: Centre 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s de développement, University of Abidjan
BLS *Bulletin de liaison saharienne*, Algiers
BM *Bulletin de Madagascar*, Antananarivo
BODE *Bulletin officiel de la Direction de l'enseignement*, Madagascar
BS *Bantu Studies*, Johannesburg
BSGL *Boletim da Sociedade de Géografia de Lisboa*, Lisbon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A *Codices Aethiopici*
CCAH *Cahiers congolais d'anthropologie et d'histoire*, Brazzaville
CCB Centre de civilisation burundaise, Bujumbura
CE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EDA Centre d'études et de diffusion africaine, Paris/Abidjan

CHM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
CIS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Paris: PUF
CJA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Ottaw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CNRSS Centre nigérien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sociales, Niamey
Congo *Congo*, Brazzaville: Centre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Etudes Economiques
CRA Centre de recherches africaines, Paris
CRDTO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documentation pour la tradition orale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for Oral Tradition] Niamey
CSCO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Paris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P Caribbean University Press
CVRS Centre voltaique des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Ouagadougou
CZA *Cultures au Zaïre et en Afrique*

EALB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Nairobi, Kampala and Dar es Salaam
EAPH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Nairobi
EHA *E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Kinshasa
E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EN *Etudes nigériennes*, Niamey. IRSH
EUP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GASS Accra
GNQ *Ghana Notes and Queries*, Legon
GSSJ *Gha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Legon
GUP Ghana Universities Press

HAJM *History in Africa: A Journal of Method*, Waltham, Massachusetts
HAHR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espéris *Hespéris*, Rabat: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HU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P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IAI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IAS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Nairobi
ICS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London
IFAN 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Dakar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IJ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Eastern Studies*, Cambridge: CUP
IRE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Léopoldville
IRSH Institut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Niamey
IUP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A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Tokyo
JAE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London: Academic Pres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UP
JAS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later *African Affairs*), London
JE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Wilmington, D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JE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Institute of Ethiopian Studies, Haile Salassie I University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HUP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JIMM *J. Inst. Mining Met.*
JMBRA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JNH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Washington, DC
JR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S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Paris

JSH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ress
JSS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Manchester: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KASP *The Kroebe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KHR *Kenya Historic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Kenya*, Nairobi
KHS Kenya Historical Society, Nairobi
KLB Kenya Literature Bureau
KS *Kano Studies*, Kano, Nigeria
KUP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LA *L'éducation africaine*
LSJ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Newark, Delawar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MAM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malgache*, Antananarivo
Man *Man*, London
MJSS *Malaw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MRAC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 Annales Sciences humaines, Tervuren*
MRAL *Memorie in Italian della Real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Rome
MUP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NA *Notes africain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de l'IFAN*, Dakar
NADA *The Rhodesian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Annual*, Salisbury
NEA *Nouvelles éditions africaines, Dakar*
NJ *Nyasaland Journal*
NNPC Northern Nigerian Publishing Company, Zaria
NRE *Notes, reconnaissances et explorations*, Madagascar
NRJ *Northern Rhodesian Journal*
NU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vanston, Illinois
Nyame Akuma *Nyame Akuma*, Calga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gary

Odu *Odu: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Studies* (previously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Ife; preceded by *Journal of Yoruba and Related Studies*, Ibadan), Ife: University of Ife
Oduma *Oduma*, Port Harcourt, Nigeria
OHCIS Ohio University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RSTOM 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Outre-mer, Paris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 Présence africaine, Paris
Paideuma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Frankfurt-am-Main
Phylon *Phylon*, Atlanta, GA: University of Atlanta
PP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PS *Population Studies*, London
PTRSA *Proceedings 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hodesian Scientific Association*, Bulawayo
PUF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PU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 *Revue africaine, Journal de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Algiers
REI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Paris
RFHOM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RH *Revue historique*, Paris: PUF
RHM *Revue d'histoire maghrébine*, Zaghovan, Tunisia
RLJ *Rhodes-Livingstone Journal* (now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Lusaka
RM *Revue de Madagascar*, Antananarivo
RR *Research Review*, University of Ghana
RS *Revue sémitique*, Paris
RSE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Rome
RT *Revue tunisienne*, Algiers/Tunis: Jean-Baptiste Salvago
RTC *Revue des troupes coloniales*
RV *Recherches voltaïques*, Ouagadougou: Centre Voltaïqu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Saeculum *Saeculum*, Freiburg

SAJ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ELAF Société d'études linguistiques et anthropologiques de France, Paris
SEVPEN Service d'édition et de vente des publications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Paris
SFHOM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SGM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Edinburgh: Royal Scot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
SM *Sudanese Memoirs*
SMJ *Society of Malawi Journal*, Blantyre, Malawi: Society of Malawi
SNP Kaduna, Nigeria: National Archives
SNR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SSL *Studi storici e Linguisti*
SS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Studia *Studia*, Lisbon
SUP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Target *Target*, Dar es Salaam
TD *Travaux et documents*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previously *Transactions of the Gold Coast and Togoland Historical Society*), Legon
T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airobi: EALB
TNR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now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Dar es Salaam
TPH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Trav. IRS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Algiers: University of Algiers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Ufahamu *Ufahamu*, Los Angeles, CA. UCLA
UJ *Uganda Journal*, Kampala: Uganda Society
ULP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ondon
UNCP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UTP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UWP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WAJ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WMQ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Williamsburg, VA
WUP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Johannesburg

YUP Yale University Press

Zaire *Zaire*, Kinshasa
Zamani *Zamani*, Nairobi: History Association of Kenya
ZFE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erlin
ZH *Zimbabwean History*
ZJH *Zambia Journal of History*, Lusaka: University of Zambia

Bibliography

Abbebe, B. (1971) *Evolution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au Choa (Ethiopi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et Librarie Orientaliste, P. Geuthner).
'Abd al-Azīz b. Muḥammad b. Ibrahīm al-Ṣinhādjī al-Fishtālī (16th cent.) *Manāhil al-Safā' fi akhbār al-Nulūk al-Shurafa*; 1964 ed. 'Abd Allāh Gannun (Tetuan).
Abdallah, Y. B. (1919a) *Chikala cha wa yao* (Zomba: Government Printer).
Abdallah, Y. B. (1919b) *The Yaos* (arranged, ed and tr. by M. Sanderson, Zomba; 2nd edn, London: Frank Cass, 1973).
Abinal, A. and Malzac, V. (1888) *Dictionnaire malgache–français* (Antananarivo: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2nd edn 1889).
Abitbol, M. (1979) *Tombouctou et les Arma de la conquête marocaine du Soudan nigérien en 1591 à l'hégémonie de l'Empire du Maçina en 1833*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297 pp.
Abraham, D. P. (1969) 'The roles of Chaminuka and the Mhondoro cults in Shona political history',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28–46.

Abubakar, S. (1978) *The Lamibe of Fomb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Adamawa, 1809–1901* (Zaria: ABUP), 190 pp.
Abun-Nasr, J. M. (1975)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2nd edn, Cambridge: CUP), 422 pp.
Achi, B. and Bitiyong, J. I. (1983) *Warfare and Urban Growth in Hausaland: The Case of Birnin Zaria c.1400–1808 A.D.* (Zaria: ABUP).
Adams, W. Y. (1977) *Nubia – Corridor to Africa* (London: Allen Lane), 797 pp.
Adams, W. Y., Van Gerven, D. P. and Levy, R. S. (1978) 'The retreat from migration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7, pp. 483–532.
Adamu, M. (1968) 'A Hausa government in decline: Yawuri in nineteenth-century Zaria' (MA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Adamu, M. (1978) *The Hausa Factor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Zaria: ABUP) 224 pp.
Adamu, M. (1979) 'Distribution of trading centres in the central Suda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Y. B. Usman (ed.), pp. 59–104.
Adamu, M. (forthcoming) 'Som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economy of Hausaland, 1500–1804', in M. Adamu (ed.).
Adamu, M. (ed.) (at press(a))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Savannah of West Africa* (Zaria: ABUP).
Adamu, M. (ed.) (at press(b)) *Central Sudan before 1804*.
Addo-Fening, F. (1980) 'Akyem Abuakwa, c.1874–1943: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missionary activities and colonial rule on a traditional stat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Adefuye, A. (1973)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lwo c.1400–1911'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Ibadan).
Adefuye, A. (1976) 'Palwo Jogi: impact on political history',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1976a, pp. 215–30.
Adefuye, A. (unpublished) 'The Palwo: from prestigious to persecuted minority',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I.
Adeleye, R. A. (1971) 'Hausaland and Bornu, 1600–1800', in J.F.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485–530.
Agnew, S. (1972)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Malawian setting', in B. Pachai (ed.), pp. 28–48.
Agyeman, E. A. (1965) 'Gyaman – Its relations with Ashanti, 1720–1820'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Accra).
Aḥmad b. al-Ḥādj dj Abū 'l-'Alī (1962) *Makhtūtat Katib al-Shūna fi ta'rīkh al-Saltana al-Sinnariyya* (ed. al-Shātir Busaylī 'Abd al-Jalil, Cairo).
Ajayi, J. F. A. (ed.) (1989)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VI, (Paris/Oxford/Berkeley: UNESCO/Heineman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61 pp.
Ajayi, J. F. A. and Alagoa, E.J. (1980) 'Nigeria before 1800: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O. Ikime (ed.), pp. 224–35.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71)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2nd edn 1976).
Ajayi, J. F. A. and Espie, J. (eds) (1965) *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Ibadan/London: IUP/Nelson), 543 pp.
Ajayi, J. F. A. and Ikara, B. (eds) (1985)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Nigeria* (Lagos: Lagos University Press and Kaduna State Council for Arts and History), 227 pp.
Akinjogbin, I. A. (1967) *Dahomey and its Neighbours, 1708–1818* (Cambridge: CUP), 234 pp.
Akinjogbin, I. A. (1976) 'The expansion of Oyo and the rise of Dahomey, 1600–1800', in J.F.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76 edn, pp. 373–412).
Alagoa, E. J. (1972) *A History of the Niger Delta: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Ijo Oral Tradition* (Ibadan: IUP) 231 pp.
Alagoa, E. J. (1976) 'Dating Ijo oral tradition', *Oduma* (Port Harcourt), 3, 1, pp. 19–22.
Alexandre, P. (1965) 'Proto-histoire du groupe beti-bulu-fang: essai de synthèse provisoire', *CEA*, 20, pp. 503–60.
Alexandre, P. and Binet, J. (1958) *Le groupe dit pahouin (Fang-Boulou-Beti)*, (London/Paris: IAI/PUF), 152 pp.
Alkali, M. B. (1969) 'A Hausa community in crisis: Kebb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Alkali, M. N. (1978) 'Kanem-Borno under the Sayfawa',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Alkali, M. N. (1983)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history of Borno under the Saifawa', in M. N. Alkali and B. Usman (eds), pp. 57–77.
Alkali, M. N. (1985)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Kanem-Borno under the Saifawa Mais', in J. F. A. Ajayi and B. Ikara (eds), pp. 33–49.
Allan, J. (1965) *The African Husbandsman* (London: Oliver and Boyd).

Alldridge, T. J. (1901) *The Sherbro and its Hinterland* (London: Macmillan), 356 pp.
Allen, J. de V. (1974) 'Swahili culture reconsidered', *Azania*, 9, pp. 105–138.
Allen, J. de V. (1976) 'Swahili culture and identity',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Nairobi).
Allen, J. V. (1981) *Lamu Town: A Guide* (Lamu: Rodwell Press).
Allen, J. de V. and Wilson, T. (1979) *Swahili Houses and Tombs of the Coast of Kenya* (London).
Alpers, E. A. (1968) 'The Mutapa and Maravi political systems to the time of the Ngoni invasions', in T. O. Ranger (ed.), pp. 1–28.
Alpers, E. A. (1973) 'Rethinking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KHR*, 1, 2, pp. 163–88.
Alpers, E. A. (1975a) *Ivory and Slaves in East-Central Africa to the Later 19th Century* (London: Heinemann), 296 pp.
Alpers, E. A. (1975b) 'Eastern Africa', in R. Gray (ed.).
Alpers, E. A. and Ehret, C. (1975) 'Eastern Africa, 1600–1790', in R. Gray (ed.), pp. 469–536.
Alvares, F. (1961) *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 (trans. by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rev. and ed. by C. F. Beckingham and G. W. B. Huntingford; Cambridge: CUP,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2 vols).
Amenumey, D. E. K. (1969) 'The pre-1947 background to the Ewe unification question', *THSG*, 10, pp. 65–84.
Ameyaw, K. (1966) 'Kwahu, an early Akan forest state', *GNQ*, 9, pp. 39–45.
Amselle, J. L. and M'Bokolo, E. (eds) (at press) *Une ethnicité forgée à l'ombre du colonialisme: Hutu et Tutsi au Rwanda et au Burundi.*
Anacletti, A. O. and Ndagala, D. K. (1981) 'The cattle complex in the ancient west lake kingdoms', *CCB*.
Andrade, A. A. (1955) *Relações de Moçambique Setecentista* (Lisbon: Agencia General do Ultramar).
Anjan, L. (1911–12) 'Notes historiques et ethnographiques sur les Comores', *BAM*, 9, pp. 125–41 and 10, pp. 183–200.
Anonymous (nd) 'Entry of Kanembu into Bornu', *Kanembu District Notebook*, Maiprof File No. 38 (Kaduna, Nigeria: National Archives).
Anonymous (1890) 'Descripção do Imperio de Moanamotapa', in *Memoria e Documentos acerca dos direitos de Portugal aos territorios de Machona e Nyassa*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Anonymous (1967) 'Tarikh erbab hadha 'l-belad al-Mussama Kanu', trans. by H. R. Palmer as 'Kano Chronicle', *SM*, 3, pp 92–132.
Anozie, F. N. (1976) 'Onyoma and Ke: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Niger Delta', *WAJA*, 6, pp. 89–99.
Anquandah, J. (1982)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London: Longman), 161 pp.
Anttila, R. (1972)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438 pp.
Anywar, R. S. (1954) *Acoli Ki Ker Megi* (Kampala: Eagle Press). Trans. by N. E. Odyomo as *The Acholi and their Chiefdoms* (1969),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kerere University.
Apecu, A. (1972)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Jonam Chiefdoms* (graduating essay, Makerere).
Aptheker, H. (1944) *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 (2nd prin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09 pp.
Ardener, E. (1956) *Coastal Bantu of the Cameroons*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Western Africa, Part. 11), 116 pp.
Ardener, E. (1968) 'Documentary and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rise of trading politics between Rio del Rey and Cameroons, 1600–1650)', in I. M. Lewis (ed.), pp. 81–126.
Aregay, W. and Sellassie, S. H. (1971) 'Sudanese-Ethiopian relations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Y. F. Hasan (ed.), pp. 62–72.
Arhin, K. (1967) 'The structure of Greater Ashanti (1700–1824)', *JAH*, 8, 1, pp. 65–85.
Arhin, K. (1979) *West African Traders in Gha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London: Longman), 146 pp.
Arhin, K. and Goody, J. (1965) *Ashanti and the Northwest* (Lego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Ghana).
Armo, A. G. (1968) *Anton Gulielmus Armo Afer of Axim in Ghana: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Halle: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Astley, T. (1745) *A New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4 vols, London: Thomas Astley).
Atherton, J. H. (1972) 'Excavations at Kamabai and Yagala rock shelters, Sierra Leone', *WAJA*, 2, pp. 39–74.
Atkins, G. (ed.) (1972) *Manding: Focus on an African Civilization* (London: SOAS).
Atkinson, R. R. (1976) 'Stat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Acholi',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1976, pp. 262–90.

Atkinson, R. R. (at press) 'Bugware before 1900: a survey', in D. Denoon (ed.).
Aubigné, T. A. d' (1616–20) *L'histoire universelle du sieur d'Aubigné* ..., 3 vols; 2nd edn, 1626, 3 vols; another edn published by the Baron A. de Ruble, 1886–1909, 10 vols (Paris).
Aujas, L. (1920) 'Remarques sur quelques étymologies des noms de lieux géographiques à Mayotte', *Revue d'Ethnographie et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1, pp. 51–9.
Austen, R. A. (1968) *Northwest Tanzania under German and British rule, 1889–1939* (New Haven: YUP).
Austen, R. A. (1979)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23–76.
Austen, R. A. and Jacobs, K. (1974) 'Dutch trading voyages to Cameroon, 1721–1759: European documents and African history',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University of Dakar), 6, pp. 1–27.
Avaro, J. A. (1981) *Un peuple gabonais à l'aube de la colonisation: Le Bas Ogowe au XIXe siècle* (Paris: Karthala/CRA), 290 pp.
Avelot, R. (1912) 'Les grands mouvements de peuples en Afrique: Jaqa et Zimba', *BGHD*, pp. 76–216.
Axelson, E. (1940) *South-East Africa, 1488–1530* (London: Longman), 306 pp.
Axelson, E. (1960) *The Portuguese in South-East Africa, 1600–1700* (Johannesburg: WUP), 226 pp.
Axelson, E. (1973) *The Portuguese in South-East Africa, 1488–1600* (Johannesburg: WUP), 276 pp.
Azaïs, Rév. père F. and Chambard, R. (1931) *Cinq années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Ethiopie, province du Harar et Ethiopie méridionale*, 2 vol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Azevedo, L. J. de (1947) *Epocas de Portugal Economica* (2nd edn, Lisbon).
Azevedo, W. L. de (1959) 'The setting of Gola society and culture: som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variations in time and space', *KASP*, 21, pp. 43–125.
Azevedo, W. L. de (1962)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delineation of a Central West Atlantic reg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6, pp. 512–38.

Baba, J. B. (1972) 'Adiyo: the coming of the Kakw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institutions', (student essay, University of Makerere).
Baer, G. (1967) 'Slave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JAH*, 8, 3, pp. 417–441.
Bagodo, O. (1978) 'Le royaume Borgou Wasangari de Nikki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MA thesis, Université nationale, Cotonou).
Bahenduzi, M. (1977) 'Le munganuro et l'umwaka: deux fêtes rituelles du Burundi ancien' (thesis ENS, Bujumbura).
Balogun, S. A. (1980) 'History of Islam up to 1800', in O. Ikime (ed.), pp. 210–23.
Balogun, S. A. (1983)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ausa folklore: the Bayajida legend' (Sokoto, mimeograph).
Bannerman, J. H. (1981) 'Hlengweni: the history of the Hlengweni of Lower Save and Lundi rivers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mid-twentieth century', *ZH*, 12, pp. 1–45.
Baptista, R. (1892) *Africa Oriental, Caminho de ferro da Beira a Manica* (Lisbon: Empresa Nacional), 121 pp.
Barassin, Father J. (1953) *Bourbon des origines jusqu'en 1714*.
Barber, W. J. (1964) *The Economy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 a Case Stud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Dualistic Society* (London: OUP), 271 pp.
Barbot, J. (1732) *A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s of North and South Guinea* (London).
Barkindo, B. M. (1979) 'Islam in Mandara: its introduction and impact upon the state and people', *KS*, 1 and 4.
Barkindo, B. M. (1980)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sultanate of Mandara'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Barkindo, B. M. (ed.) (198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Kano* (Ibada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Nigeria), 214 pp.
Barreto, Father M. (1899) 'Informaçao do Estado e conquista dos Rios de Cuama, December 1667' [Report upon the state and conquest of the rivers of Cuama], in G. M. Theal (ed.), 1898–1903, vol. 3, Eng. trans. pp. 463–495.
Barros, J. de (1552–1613) *Da Asia: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zes fizeram na Conquista e Descubrimento das Terras e Mares do Oriente* (vol. 1: 1552; vol. 2: 1553; vol. 3: 1563; vol. 4: 1613; Lisbon).
Barry, B. (1972) *Le royaume du Waalo: 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 (Paris: Maspéro), 393 pp.
Barth, H. (1857–8) *Reisen und Entdeckungen in Nord und Central Afrika in den Jahren 1849 bis 1855* (Gotha: J. Perthes), 5 vols. Engl. edn,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Being a Journal of an Exploration undertaken under the Auspices of HBM's Government in the Years 1849–55*, 1857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5 vols; reprint, 1965 (London:

Ward, Lock, Centenary Ed.), 3 vols. French edn, *Voyages et decouvertes dans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et central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9 à 1855*, 1860–1 (Paris. A. Bohné), 4 vols.

Basset, R. (1882) *Etudes sur l'histoire d'Ethiopie* (Paris).

Basset, R. (1897)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byssinie (XVIe siècle) par Chihab Eddin Ahmed ben 'Abd El Qāder surnommé Arab-Faqih* (2 vol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supérieure de lettres d'Alger).

Bastide, R. (1971) *Les Amériques noires: les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dans le Nouveau Monde* (Paris: Payot), trans. as *African Civilizations in the New World* (London: Hurst), 232 pp.

Basu, K. K. (1932) *The Tarikh-i-Mubarak Shadi by Yahya bin Ahmad bin 'Abdullah as-Sihrindi* (Baroda: Gackwad's Oriental Series, No 63)

Batalha-Reis, J. (1889) 'The Portuguese in Nyasaland', *SGM*, 5, 5, pp. 252–60.

Bathily, A. (1975)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expansion in Senega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Kingdom of Gajaag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auer, P. T. (1981)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Beach, D. N. (1976) 'Second thoughts on the Shona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RH*, 7, pp. 1–11.

Beach, D. N. (1977) 'The Shona economy: branches of production', in R. Palmer and N Parsons (eds), pp. 37–65.

Beach, D. N. (1980a) *The Shona of Zimbabwe from 900 to 1850: an outline of Shona history* (Gweru: Mambo Press).

Beach, D. N. (1980b) 'The Zimbabwean plateau and its peoples, 1400–1900'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University of Kent, Canterbury, 7–11 July).

Beach, D. N. (1984) *Zimbabwe before 1900* (Gweru: Mambo Press).

Becker, C. and Martin, V. (1975) 'Kajor et Bawol: royaumes sénégalais et traite des esclaves au XVIIIe siècle', *RFHOM*, 226–7, pp. 286–99.

Beckingham, C. F. and Huntingford, G. B. W. see F. Alvares, 1961.

Beecham, J. (1841) *Ashantee and the Gold Coast: Being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Social State and Supersti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Countries ...* (London. John Mason), 376 pp.

Behrens, C. (1974) *Les Kroumen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Talence: CNRS, Centre d'études de géographie tropicale), 243 pp.

Bello, M. (nd) 'Infāq al-Maysūr fī ta'rīkh bilād al-Tukrūr', trans. and ed. in 1932 by E. J. Arnett as *Rise of the Sokoto Fulani* (Kano: Emirate Printing Department); and by C. E. J. Whitting in 1951 (London: Luzac and Co.).

Beltran, G. A. (1958) *Cuijla: esbozo etnografico de un pueblo Negro* (Mexico).

Benisheikh, A. (1983) 'The 19th-century Galadimas of Bornu', in Y B. Usman and M. N. Alkali (eds).

Benyowsky, M. A. de (1790) *Memoirs and Travels* (2 vols, London: G. G. J and R. Robinson).

Berg, F. J. (1968) 'The Swahili community of Mombasa, 1500–1900', *JAH*, 9, 1, pp. 35–56.

Berg, F. J. (1971) 'Mombasa under the Busaidi sultanate: the city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erger, I. (1967) 'Migration of the Central Kenya Bantu: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hungwaya hypothesi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erger, I. (1973) 'The Kubandwa religious complex of interlacustrine East Africa: an historical study c.1500–19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Bernstein, H. (ed.) (1973) *Under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Third World Toda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ernus, E. (1960) 'Kong et sa région', *Études éburnéennes*, 8, pp. 239–324

Berque, J. (1982) *Ulemas, fondateurs, insurgés du Maghreb* (Paris: La bibliothèque arabe, Sindbad).

Berthier, P. (1966) *Les anciennes sucreries du Maroc et leurs réseaux hydrauliques* (2 vols, Rabat: Imprimeries française et marocaine).

Bertrand, Col. *Notes d'histoire mangbetu*, manuscript (in possession of J. Vansina).

Bertuchi, A. J. (1923) *The Island Rodriguez: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Mascarenhas Group* (London: John Murray).

Betbeder, P. (1971) 'The kingdom of Buzinza', *CHM*, 13, 4, pp. 736–62.

Betoto, C. (1950a)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akalava royalty', in C. Betoto (ed.), 1950 (b).

Betoto, C. (ed.) (1950b) *Histoire de la royauté sakalava* (Paris: Ecole national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typescript), pp. 1–32.

Bezold, C. (1905) *Kebra Nagast: Die Herrlichkeit der Könige* (München: Verlag de K. B.).

Bhila, H. H. K. (1975) 'Some aspects of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south of the Zambezi', *MJSS*, 4, pp. 101–16.

Bhila, H. H. K. (1977) 'The Kaphwiti-Lundu complex in the Lower Shire valley, Malawi, to 1800 AD: myth and realit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esotho, Roma, 1–7 August).
Bhila, H. H. K. (1982) *Trade and Politics in a Shona Kingdom. The Manyika and their Portuguese and African Neighbours, 1575–1902* (London: Longman).
Bieber, F. J. (1920 3) *Kaffa: ein altkuschitisches Volkstum in Inner Afrika*, vol. 1 (Münster: W. Aschendorff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vol. 2 (Wien).
Bikunya, P. (1927) *Ky'Abakama ba Bunyoro-Kitara* (London: Sheldon Press).
Binger, L. G. (1892) *Du Niger au golfe de Guinée par le pays de Kong et le Mossi, 1887 -1889* (2 vols, Paris: Hachette).
Biobaku, S. O. (ed.) (1973) *Sources of Yoruba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keli, E. (1926) *Marques de boeufs et traditions de race: documents sur l'ethnographie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e Madagascar* (Oslo, Bulletin No. 2 of the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
Birmingham, D. (1966) *Trade and Conflict in Angola: The Mbundu and their Neighbou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rtuguese, 1483–17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mingham, D. (1975) 'Central Africa from Cameroun to Zambezi', in R. Gray (ed.) pp. 325–83.
Birmingham, D. (1981) *Central Africa to 1870: Zambezia, Zaïre and the South Atlantic* (Cambridge: CUP).
Birmingham, D. and Gray, R. (eds) (1970)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Essays on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before 1900* (London: OUP), 308 pp.
Birmingham, D. and Martin, P. (eds) (1983)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vol. 1, (London: Institute of Commonwealth Studies), 314 pp.
Bishikwabo, C. (1982) 'Histoire d'un état shi en Afrique des Grands Lacs (c.1850–1940)' (PhD thesis, Louvain-la-Neuve)
Bishop, W. W. and Clark, J. D. (eds) (1967) *Background to Evolution in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ivar A. D. H. and Shinnie, P. L. (1960) 'A dated Kuran from Bornu', *Nigerian Magazine*, 65, (Lagos).
Blackburn, R. H. (1976) 'Okiek history', in B. A. Ogot (ed.), 1976b, pp. 53–83.
Blackburn, R. H. (1982) *Kenya's Peoples: Okiek* (London: Evans).
Blair, H. A. and Duncan-Johnstone, A. (1932) *Enquiry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Dagbon Kingdom*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Blake, J. W. (1937/1977) *West Africa, Quest for God and Gold, 1454 1578: A Survey of the First Century of White Enterprise in West Afric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ortuguese and their Rivalries with other European Powers* (London: Curzon Press), 1st edn, 1937.
Blake, J. W. (1942) *Europeans in West Africa, 1450 -1560* (tr. and ed. by J. W. Blake, London: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2nd edn, 2 vols).
Blakeley, A. (1976) 'Gannibal, Abram Petrovich', in *Modern Encyclopa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vol. 12, ed. by J. L. Wieczynski (Gulf Breeze: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Boahen, A. A. (1964) *Britain, the Sahara and the Western Sudan, 1788–186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68 pp.
Boahen, A. A. (1965) 'Asante and Fante, A. D. 10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I. Espie (eds), pp. 160 85.
Boahen, A. A. (1966a) *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Boahen, A. A. (1966b) 'Origins of the Akan', *GNQ*, 9, pp. 3–10.
Boahen, A. A. (1971) 'The coming of the Europeans', in A. M. Josephy, Jr. (ed.).
Boahen, A. A. (1973) 'Arcany or Accany or Arcania and the Accanists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European Records', *THSG*, XIV, I, 6, pp. 105–12.
Boahen, A. A. (1974) 'Fante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K. Ingham (ed.), pp. 25–49.
Boahen, A. A. (1977) 'Ghana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Europeans', *GSSJ*, 4, 2.
Boesch, F. (1930) *Les Banyamwezi: peuple de l'Afrique orientale* (Munster: Anthropos Bibliothek).
Boeseken, A. J. (1969) 'The settlement under the van der Stels', in C. F. J. Muller (ed.), pp. 26–38.
Bois, G. (1978) '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 *PP*, 79, pp. 60–9.
Bonnel de Mézières, A. (1912) *Le Major A. Gordon Laing* (Paris: Larose) (2nd edn, 1927).
Bontinck, F. (1980) 'Un mausolée pour les Jaga', *CEA*, 79, pp. 387–9.
Bontinck, F. and Ndembe Nsasi, D. (1978)) *Le catéchisme kikongo de 1624: Réédition critique* (Brussels: ARSOM,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XLIV-5).
Borah, W. and Cook, S. F. (1967) 'The Aboriginal population of Central Mexico on the eve of Spanish conquest', in L. Hanke (ed.), vol. I.

Bosman, W. (1967) *A New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 (London: Frank Cass, reprint of 1705 1st edn, with Introduction by J. R. Willis).
Boston, J. S. (1969) 'Oral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Igala', *JAH*, 10, 1, pp. 29–43.
Botelho, J. J. T. (1936) *Historia militar e politica dos Portugeses em Moçambique da Descoberta a 1833* (Lisbon: Governo Geral de Moçambique).
Boto, J. (1923) 'Tradition relative à l'origine des Betsimisaraka Betanimena', *BODE*, 25, pp. 252–3.
Bouchaud, J. (1952) *La côte du Cameroun dans l'histoir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allemande* (Yaoundé: Mémoires de l'IFAN, Centre du Cameroun, No. 5), 217 pp.
Bouet, S. S. and Bouet, L. T. (1911) 'Les Toma', *BCAF*, 8, pp. 185–246.
Boulègue, J. (1968) 'La Sénégambie du milieu du X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PhD thesis, 3rd cycle, University of Paris).
Boulègue, J. (1972) 'Aux confins du monde malinke: le royaume du Kasa (Casam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Bouquiaux, L. and Hyman, L. (eds) (1980) *L'expansion bantoue* (3 vols, Paris: SELAF).
Boutillier, J. L. (1971) 'La cité marchande de Bouna dans l'ensemble économique ouest-africain précolonial', in C. Meillassoux (ed.), pp. 240–52.
Boutillier, J. L. (1975) 'Les trois esclaves de Bouna', in C. Meillassoux (ed.), pp. 253–80.
Bovill, E. W. (1958)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London: OUP), 281 pp; 2nd rev. ed. 1968, 293 pp; London: OUP).
Boxer, C. R. (1952) *Salvador de Sa and the struggle for Brazil and Angola, 1602–1686* (London: Athlone Press), 444 pp.
Boxer, C. R. (1960a) 'Uma relação inedita et contemporanea da batalha de Ambuila em 1665', *Museu de Angola*, 2, pp. 66–73.
Boxer, C. R. (1960b) 'The Portuguese on the Swahili coast, 1593–1729', in C. R. Boxer and C. de Azevedo (eds), pp. 11–86.
Boxer, C. R. (1961) *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 A Succinct Survey* (Johannesburg: WUP).
Boxer, C. R. (1963)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36 pp.
Boxer, C. R. (1969)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London: Hutchinson).
Boxer, C. R. and Azevedo, C. de (eds) (1960) *Fort Jesus and the Portuguese in Mombasa, 1593–1729* (London: Hollis & Carter), 144 pp.
Boyer, G. (1953) *Un peuple de l'ouest soudanais, les Diawara: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Songhay par J. Rouch* (Dakar: Mémoires de l'IFAN, 29), 259 pp.
Brasio, A. (ed.) (1952–71) *Monumenta Missionaria Africana Africa Occidental* (11 vols, Lisbon: Agencia Geral do Ultramar).
Braudel, F. (1928) '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de 1492 à 1577', *RA*, pp. 184 *et seq.* and pp. 315 *et seq.*
Braudel, F. (1935) 'Philippe II et la Goulette', *RA*, pp. 386–91.
Braudel, F. (1946) 'De l'or du Soudan à l'argent d'Amérique', *AESC*, 1, pp. 9–22.
Braudel, F. (1981) *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trans. and rev. by S. Reynolds, London).
Braudel, F. (1984)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3 vols, New York: Harper & Row).
Braukämper, U. (1978)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Sidama', *Abbay*, 9, pp. 123–30.
Braukämper, U. (1980) *Geschichte der Hadiya Süd-Äthiopiens* (Wiesbaden).
Brenner, R. (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P*, 70, pp. 31–75.
Brenner, R. (1982)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P*, 97, pp. 16–113.
Bretschneider, E. (1871)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Arabian Colonies* (London).
Brief Diwan, compiled 1165 A.H. (1751–2), reproduced in *Kitab fi Sha'n Sultan Idris*, 1932 (Kano), with a trans. by H. R. Palmer in the introduction.
Broadhead, S. (1971) 'Trade and politics on the Congo coast: 1770–1870'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Broadhead, S. (1979) 'Beyond decline: the kingdom of the Kongo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JAHS*, 12, 4, pp. 615–50.
Broadhead, S. (1983) 'Slave wives, free sisters, Bakongo women and slavery c.1700–1850', in C. C. Robertson and M. Klein (eds), *Women and Slavery in Africa*, pp. 160–81.
Brock, B. (1968) 'The Nyika', in A. D. Roberts (ed.), 1968a, pp. 59–81.
Brooks, G. E. (1980) *Kola Trade and State-building in Upper Guinea Coast and Senegambia, 15th-*

17th centuries (African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s, No. 38, Boston University).

Browne, W. G. (1799) *Travels in Africa, Egypt and Syria, from the year 1792 to 1798* (London: Longman & Rees, 496 pp.; (2nd edn, 1806, London: Longman & Co, 632 pp.).

Bruce, J. (1805)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 in the Years 1768, 1769, 1770, 1771, 1772 and 1773* (2nd edn, 8 vols, Edinburgh: A. Constable & Co., Manners and Miller); (1st edn, 5 vols, 1790, Edinburgh: J. Ruthren).

Brutsch, J. R. (1950) 'Les relations de parenté chez les Duala', *Etudes camerounaises*, 3, 31 32 (September–December), pp. 211–30.

Bryan, M. A. (1959) *The Bantu Languages of Africa* (London: OUP, Handbook of African languages, Part 4, published for the IAI), 170 pp.

Buchanan, C. (1974) 'The Kitara complex: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Western Uganda to the 16th century'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273 pp.

Buchthal, H. (1960) 'An Ethiopian miniature of Christ being nailed to the Cross', in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Ethiopici* (Rome), pp. 331–4.

Burckhardt, J. L. (1819) *Travels in Nubia* (London: John Murray), 543 pp.

Burnham, P. (1975) 'Regroupement' and mobile societies: two Cameroon cases', *JAH*, 16, 4, pp. 577–94.

Burnham, P. (1980) *Opportunity and Constraint in a Savanna Society* (London: Academic Press), 324 pp.

Burssens, H. (1958) *Les peuplades de l'entre-Congo-Ubangi* (London: IAI).

Burton, R. F. (ed. and trans.) (1873) *The Lands of Kazembe: Lacerda's Journey to Kazembe in 1798* (London: John Murray).

Burton, W. F. (1956) 'L'organisation sociale des Balumba', *BJIDCC*, 4, pp. 150–3.

Bynon, T.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UP), 301 pp.

Cà da Mosto, A. da (1937) *The Voyages of Cadamosto and Other Documents on Western Afric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rans. and ed. by G. R. Crone,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59 pp.

Cadornega, A. de Oliveira de (1940–2) *História geral das Guerras Angolanas* ... (3 vols, ed. by J. M. Delgado and M. A. da Cunha,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Caetano, X. (1954) 'Relação do estado presente de Moçambique, Sena, Sofala, Inhambane e todo o Continente da Africa Oriental', in L. F. de Carvalho Dias (ed.), pp. 171–215.

Caillié, R. (1828) *Journal d'un voyage à Tombouctou et à Jenn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Cairns, T. (1971) *Barbarian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Cambridge: CUP).

Callaway, C. (1870) *The Religious Systems of the Amazulu* (London: Trubner & Co.).

Callet, F. (1878–1902) *Tantaran'ny Andriana* (2nd edn, Antananarivo); 3rd edn, 1908–9; trans. by G. S. Chapus and E. Ratsimba as *Histoire des rois*, 1953–8, Antananarivo. Popularly referred to as *Tantara*, general word for 'history'.

Calonne-Beaufaict, A. de (1921) *Azande; introduction à une ethnographie générale des bassins de l'Ubangi–Uele et de l'Aruwimi* (Brussels: M. Lamertin).

Capello, H. and Ivens, R. (1886) *De Angola a Contra-Costa: Descripção de Uma Viagem atravez do Continente Africano* (2 vols,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Capron, J. (1973) *Communautés villageoises bwa (Mali, Haute-Volta)*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Mémoire No. 9), 379 pp.

Carreira, A. (1947) *Mandingas da Guiné Portuguesa* (Bissau: Centro de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esa).

Carrette, E. (1844) *Recherches sur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lgérie méridionale* (Pari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Carvalho Dias, H. A. de (1890) *Expedição ao Muatiamvo: Ethnographia e história tradicional dos povos da Lunda* (8 vols,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Carvalho Dias, L. F. de (ed.) (1954) 'Fontes para a historia, geografia e comercio de Moçambique, sec. XVIII', *Anais*, 9, 1.

Castries, H. de (1905–36) *Les sources inédites de l'histoire du Maroc de 1530 à 1845* (18 vols, Paris: Paul Geuthner).

Castries, H. de (1923) 'La conquête du Soudan par el-Mansour', *Hespéris*, 3, 4, pp. 433–88.

Cauneille, A. (1957) 'Le nomadisme des Zentan (Tripolitaine et Fezzan)', *Trav. IRS*, 16, 2, pp. 73–99

Cavazzi, G. A. (1965) *Descripção histórica dos três reinos do Congo, Matamba e Angola ... 1687* (Portuguese trans. and annotated by G. M. de Leguzzano, 2 vols,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Centre de Civilisation burundaise (ed.) (1981) *La civilisation ancienne des peuples des Grands Lacs* (Paris: Karthala), 495 pp.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ustoms (ed.) (nd) *Enquête sur ... les Mahafaly* (University of Madagascar).
Cerulli, E. (1922) *The folk-literature of the Galla of Southern Abyssinia* (Harvard African Studies No. 3, Cambridge, Mass.).
Cerulli, E. (1931) 'Documenti arabi per la storia dell'Ethiopia', *MRAL*, **4**, Ser. 6, pp. 39–101.
Cerulli, E. (1936) *La lingua e la storia di Harar* (Rome).
Cerulli, E. (1941) 'Il sultanato dello Scioa nel secolo XII secondo un nuovo documento storico', *RSE*, 1, pp. 5–42.
Cerulli, E. (1942) 'Gli emiri di Harar dal secolo XVI alle conquista egiziana (1875)', *RSE*, **2**, pp. 3–20.
Cerulli, E. (1943–7) *Etiopi in Palestina* (2 vols, Rome: Libreria dello Stato).
Cerulli, E. (1947) 'Il "Gesù percosso" nell'arte etiopica e le sue origini nell'Europa del XV secolo', *RSE*, **6**, pp. 109–29.
Cerulli, E. (1957–64) *Somalia -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3 vols, Rome: Amministrazione Fiducitaria Italiana di Somalia).
Cerulli, E. (1968) *La letteratura etiopica* (Firenze/Milano: Sansoni/Accademia Sancasciano vul di Pesa, Stianti).
Césard, E. (1927) 'Comment les Bahaya interprètent leurs origines', *Anthropos*, **22**, pp. 440–65.
Césard, E. (1935, 1936, 1937) 'Le Muhaya', *Anthropos*, 30, pp. 75–106 and pp. 451–62; 31, pp. 97–114, pp. 489–508 and pp. 821–49; **32**, pp. 15–60.
Césard, P. (1931) 'Histoires des rois du Kyamtwara d'après l'ensemble des traditions des familles régnantes', *Anthropos*, **26**, pp. 533–43.
Chamberlin, C. (1977)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lk export trade in Central Gab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amberlin, C. (1978) 'The migration of the Fang into Central Gab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new interpretation', *IJAHS*, 11, pp. 429–56.
Chaunu, H. and Chaunu, P. (1955)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 (11 vol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Chauveau, J. P. (1974) 'Note sur les échanges dans le Baule précolonial', in *Bondouku Colloque*, pp. 262–305.
Chauveau, J. P. (1979) '*Notes s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gion de Kokumbo*, (Paris: 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Outre-Mer, Travaux et Documents, No. **104**), 277 pp.
Cheffaud, M. (1936) 'Note sur la chronologie des rois d'Imerina', *BAM*, 19 (NS), pp. 37–47.
Chéron, G. (1924)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ssi: Traditions relatives au cercle de Kaya', *BCEHSAOF*, 7, 4, pp. 635–91.
Chilver, E. M. (1981) 'Chronological synthesis: the western region', in C. Tardits (ed.), pp. 453–73.
Chittick, H. N. (1962) *A Guide to the Ruins of Kilwa, with Some Notes on Other Antiquities in the Region* (Dar es Salaam: National Culture and Antiquities Division,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Culture), 20 pp.
Chittick, H. N. (1963) 'Kilwa and the Arab settlement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JAH*, 4, 2, pp. 179–90.
Chittick, H. N. (1969) 'A new look at the history of Pate' *JAH*, 10, 3, pp. 375–91.
Chittick, H. N. (1971) 'The coast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1974 reprint, pp. 100–18.
Chittick, H. N. (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2 vols, Nairobi: BIEA, Memoir.
Chittick, H. N. (1975) 'The peopling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16–43.
Chittick, H. N. (1977) 'The East coast, Madagascar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R. Oliver (ed.), pp. 183–231.
Chittick, H. N. and Rotberg, R. I. (eds) (1975)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Cultural Synthesis in the Pre-Colonial Times*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343 pp.
Chojnacki, S. (1969) 'Däj Giyorgis', *JES*, 7, 2, pp. 43–52.
Chrétien, J. P. (1974) 'Echanges et hiérarchies dans les royaumes des Grands Lacs de l'est africain', *AESC*, pp. 1327–37.
Chrétien, J. P. (1975) 'Le Buha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un peuple, six royaumes', *EHA*, 7, pp. 9–38.
Chrétien, J. P. (1977) 'Les deux visages de Cham: points de vue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sur les races africaines d'après l'exemple de l'Afrique orientale', in P. Guiral and E. Temime (eds), *L'idée de race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Paris: Editions du CNRS), pp. 171–99.

Chrétien, J. P. (1979) *Histoire rurale de l'Afrique des Grands Lacs*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Chrétien, J. P. (1981a) 'Du Hirsute au Hamite: les variations du cycle de Ntare Ruhatsi, fondateur du royaume du Burundi', *HA*, 8, pp. 3–41.
Chrétien, J. P. (1981b) 'Pouvoir d'Etat et autorité mystique: l'infrastructure religieuse des monarchies des Grands Lacs', *RFHOM*, pp. 112–30.
Chrétien, J. P. (ed.) (1983) *Histoire rurale de l'Afrique des Grands Lacs* (Paris: AFERA-Karthala), 285 pp.
Chrétien, J. P. (1984) 'Nouvelles hypothèses sur les origines du Burundi', in L. Ndoricimpa (ed.), pp. 11–52.
Chrétien, J. P. (1986) 'Confronting the unequal exchange of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in B. Jewsiewicki and D. Newbury (eds), pp. 75–90.
Christelow, A. (1948) 'Great Britain and the trades from Cadiz and Lisbon to Spanish America and Brazil, 1759–1783', *HAHR*, 28, 1, February, Part II.
Cipolla, C. M. (1976)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London: Methuen).
Cissoko, S. M. (1968a) *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Paris: PA), 233 pp.
Cissoko, S. M. (1968b) 'Famines et épidémies à Tombouctou et dans la Boucle du Niger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BIFAN*, Ser. B, 30, 3, pp. 806–21.
Cissoko, S. M. (1969) 'La royauté (mansaya) chez les Mandingues occidentaux, d'après leurs traditions orales', *BIFAN*, Ser. B, 31, pp. 325–38.
Cissoko, S. M. (1972)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Mandingues de l'ouest: l'empire de Kabou (XVIe-XIXe siècl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London).
Cissoko, S. M. and Sambou Kaoussa (1969) *Recueils des traditions orales des Mandingues de Gambie et de Casamance* (Niamey: UNESCO), 269 pp.
Clark, J. D. (1965)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at Feira', *NRJ*, 6, pp. 275–92.
Clérici, M. A. (1962) *Histoire de la Côte d'Ivoire* (Abidjan: CEDA).
Cohen, D. W. (1968) 'Review of L. de Heusch, *Le Rwanda et la civilisation interlacustre*, 1966', *JAH*, 9, 4, pp. 651–7.
Cohen, D. W. (1968/73) 'The River-Lake Nilote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B. A. Ogot (ed.), pp. 142–57 in 2nd edn.
Cohen, D. W. (1970) 'A survey of interlacustrine chronology', *JAH*, 11, 2, pp. 177–201.
Cohen, D. W. (1972)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Busoga, Mukama and Kint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18 pp.
Cohen, D. W. (1989) 'Peoples and states of the Great Lakes region', in J. F. A. Ajayi (ed.), pp. 270–93.
Cohen, D. W. (at press (a))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of Mukama',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at press).
Cohen, D. W. (at press (b)) 'Emergence and crisis: the states of Busoga',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Cohen, R. (1965) 'Som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ized exchange: a Kanuri example', *CEA*, 5.
Cohen, R. (1970) 'Incorporation in Bornu', in R. Cohen and J. Middleton (eds), *From Tribe To Nation In Africa*, (Scranton: Chandler Int. Co.), pp. 150–74.
Colle, R. (1913) *Les Baluba* (Brussels: Van Overbergh, Collection de monographies ethnographiques, Vols 10 & 11).
Colvin, L. G. (1974) 'Islam and the State of Kajoor: A case of successful resistance to Jihad', *JAH*, 15, 4, pp. 587–606.
Commissariat, M. S. (1957) *A History of Gujarat* (Calcutta).
Conti Rossini, C. (1907) 'Historia Regis Sarṣa Dengel - Malak Sagad', *CSCO*, Scr. Aeth., Ser. alt., Vol. 3.
Conti Rossini, C. (1942) 'Sulla communità abissina di Cipro', *RSE*, 1, pp. 98–9.
Cook, S. F. and Borah, W. (1971–4) *Essays in population history, Mexico and the Caribbean* (2 vols, Berkeley: UCP).
Cooper, F. (1979)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African studies', *JAH*, 20, 1, pp. 103–25.
Cooper, J. P. (1978) 'In search of agrarian capitalism', *PP*, 80 (August), pp. 20–65.
Cordell, D. D. (1972) *History of the Awlad Sulayman*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ornevin, R. (1964) *Note sur l'histoire de Sansanné Mango* (London, Survey on African Chronology).
Cory, H. and Hartnoll, M. M. (1945/1971) *Customary Law of the Haya Tribe* (London: Frank Cass, Cass Library of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of African Law, No. 7).
Cossac de Chavrebière (1931) *Histoire du Maroc* (Paris: Payot).
da Costa, Capt. P. R. (1613/1970) 'Diário', 1613, in H. Listao, *Os Dois Descobrimentos da Ilha de*

Sao Lourenco mandaios fazer pelo vice-rei D. Jeronimo de Azevedo nos anos de 1613 a 1616 (Lisbon), pp. 47–192.
Coupez, A., Evrard, E. and Vansina, J. (1976) 'Classification d'un échantillon de langues bantoues d'après la lexicostatistique', *AL*, 6, 81, pp. 131–58.
Coupez, A. and Kamanzi, T. (1962) *Récits historiques du Rwanda* (Tervuren: MRAC), 327 pp.
Coursey, D. G. (1966) 'The cultivation and use of yams in West Africa', *GNQ*, 9, pp. 45–54.
Courtois, C. (1955)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Algier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441 pp.
Crazzolara, J. P. (1950–4) *The Lwoo* (3 vols, Verona: Missioni Africana).
Crazzolara, J. P. (1960) 'Notes on the Lango Omiru and the Labwor and Nyakwai', *Anthropos*, 55, pp. 174–214.
Crine-Mavar, B. (1973) 'Histoire traditionnelle du Shaba', *CZA*, 1, pp. 5–103.
Crooks, J. J. (1923)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Gold Coast Settlements, 1750–1874* (Dublin: Browne and Nolan), 557 pp.
Crosby, C. A. (198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alawi* (New York: Scarecrow Press), 169 pp.
Cruickshank, B. (1853) *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 (2 vol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Cullen-Young, T. (1970)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umbuka–Kamanga People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Nyasaland* (London: Frank Cass), 192 pp.
Cuoq, J. M. (1975) *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 concernant l'Afrique occidentale du VIIIe au XVIe siècle (Bilād al-Sūdān)* (Paris: Editions du CNRS), 490 pp.
Curtin, P. D. (ed.) (1967) *Africa Remembered: Narratives by West Africans From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UWP), 363 pp.
Curtin, P. D. (1969)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WP), 338 pp.
Curtin, P. D. (1971) 'Jihad in West Africa: early phases and interrelations in Mauritania and Senegal', *JAH*, 12, 1, pp. 11–24.
Curtin, P. D. (1973a)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6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vol. 1, pp 240–68.
Curtin, P. D. (1973b) 'Review of B. Barry, *Le royaume du Waalo: Le Sénégal avant la conquête* (Paris: Maspéro), *IJAHS*, 6, 4, pp. 679–81.
Curtin, P. D. (1975)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Vol. I: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Vol. II: Supplementary Evidence* (Madison: UWP).
Curtin, P. D., Anstey, R. and Inikori, J. E. (1976) 'Discussion: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JAH*, 17, 4, pp. 595–627.
Curtin, P. D., Feierman, S., Thompson, L. and Vansina, J. (1978) *African History* (Boston/Toronto: Little Brown Company), 612 pp.
Cuvelier, J. (1953) *Relations sur le Congo du père Laurent de Lucques, 1700–1717*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Section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Mémoires in 8° 32 (C)).
Cuvelier, J. (1957) *Koningin Nzinga van Matamba* (Brugge).
Cuvelier, J. and Jadin, L. (1954)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d'après les archives romaines, 1518–1640* (Brussels: ARSOM).
Czekanowski, J. (1917) *Forschungen im Nil-Kongo Zwischengebiet. Ethnographie: Zwishenseengebiet*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412 pp.

Daaku, K. Y. (1966) 'Pre-Ashanti states', *GNQ*, 9, pp. 10–13.
Daaku, K. Y. (1968) 'A note on the fall of Ahwene Koko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Asante history', *GNQ*, 10, pp. 40–4.
Daaku, K. Y. (1969) *Oral Traditions of Adansi* (Accra-Lego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Daaku, K. Y. (1970a)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Gold Coast, 1600–172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19 pp.
Daaku, K. Y. (1970b) *Oral Traditions of Denkyira* (University of Ghana).
Daaku, K. Y. (1971) 'A history of Sehwi: a survey of oral evidence', *RR*, 7, 3.
Daaku, K. Y. (nd) *Unknown Aowin, Its People and Their Tradition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Ghana, unpublished).
Dalrymple, A. (1806) *Collection of Nautical Memoirs and Journals.*
Dampierre, E. de (1968) *Un ancien royaume Bandia du Haut-Oubangui* (Paris: Plon,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24), 601 pp.
Dankoussou, I. (1970) *Traditions historiques des Katsinaawa après le Jihad* (Niamey: CRDTO).
Dantzig, A. van (1978) *The Dutch and the Guinea Coast, 1674–1742: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General State Archives at The Hague* (Accra: GASS), 375 pp.
Dapper, O. (1668) *Naukeurige Beschrijvinge der Afrikaensche gewesten van Egypten, Barbaryen, Libyen,*

Biledulgerid .. (Amsterdam: Van Meurs); 1670 Engl. trans. and adaptation, J. Ogilby, *Africa: Being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Regions of Aegypt, Barbary, Libya, etc.* (London); 1670 German trans., *Beschreibung von Afrika* ... (Amsterdam: Van Meurs); 1686 French trans.,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 (Amsterdam: Wolfgang, Waesberge *et al.*).

Dapper, O. (1676) *Umstaendliche und Eigentliche Beschreibung von Africa* (Amsterdam: Jacob von Meurs).

Dapper, O. and Ryder, A. F. C. (1965) 'Dutch trade on the Nigerian coas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JHSN*, 3, 2, pp. 196–210.

D'Arianoff, A. (1952) *Histoire des Bagesera, souverains du Gisaka*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138 pp.

Darling, P. J. (1979) 'Fieldwork surveys in the Benin and Ishan kingdoms', *Nyame Akuma*, 15, pp. 35–9.

Darling, P. J. (1983) *Iron Smelting in and around Hausaland, Northern Nigeria* (University of Jos).

Da Silva Correa, E. (1937) *Historia de Angola (1782?)*, (2 vols, Lisbon: Editorial Atica, Coleção dos classicos da expansao portuguesa no mondo).

Da Silva Costa Lobo, A. (1904) *História da Sociedade em Portugal no seculo XV* (Lisbon).

Da Silva Rego, A. (1948) *A Dupla Restauração de Angola (1641–1648)* (Lisbon: Agencia Geral das Colonias).

Daumas-Chancel, A. (1848) *Le grand désert* (Paris).

David, N. (1982) 'Prehistor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Central Africa: Points of contact',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78–95.

David, P. H. (1969) 'Maradi precolonial', *BIFAN*, 31, 3, pp. 638–88.

Davidson, B. (1965)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1000–1800* (London: Longmans), 320 pp.

Davis, D. B. (1966/1975)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2 vols, New York: OUP).

Davis, D. B. (1984)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OUP), 374 pp.

Davis, R. (1967) *A Commercial Revolution: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Davis, R. (1969)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74', in W. E. Minchinton (ed.), pp. 78–120.

Deane, P. and Cole, W. A. (1967)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2nd edn, Cambridge: CUP).

Debourou, D. M. (1979) *Commerçants et chefs de l'ancien Borgou, des origines à 1936*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1, CRA).

Debrunner, H. W. (1965) *The Church in Togo: A Church Between Colonial Powers* (London: Lutterworth), 368 pp.

Debrunner, H. W. (1967)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Ghana* (Accra: Waterville Publishing House), 375 pp.

De Constantin (1725) *Recueil des Voyages ...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Defoort, E. (1913) 'L'Androy', *BEM*, 13, 2, pp. 127–246.

Degrandpré, L. (1801) *Voyage à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fait dans les années 1786 et 1787* (2 vols, Paris: Dentu).

Delafosse, M. (1912) *Le Haut-Sénégal-Niger (Soudan français)* (3 vols, Paris: Larose).

Delafosse, M. (1913) 'Traditions historiques et légendaires du Soudan occidental', *Publications du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Delcourt, A. (1952) *La France et les é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u Sénégal entre 1713 et 1763* (Dakar: Mémoires de l'IFAN No. 17), 432 pp.

Delgado, R. (1948–55) *História de Angola* (4 vols, Benguela: Edição da Tip. do Jornal de Benguela).

Delobsom, A. D. (1929) *'Les "Nionissés" de Goupana,' Cahiers d'Outre-Mer*, 1, 4, pp. 419–46.

Demesse, L. (1978) *Changements techno-économiques et sociaux chez les pygmées Babinga* (2 vols, Paris).

Demesse, L. (1980) *Techniques et économies des pygmées Babinga*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301 pp.

Denham, D. (1826) *Narratives of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London: John Murray).

Denis, P. (1961) *Histoire des Mangbetu et des Matshaga jusqu'à l'arrivée des Belges* (Tervuren: MRAC, archives d'ethnographie, No. 2), 167 pp.

Denne, Mrs (nd) (tr.) *Kiziba: Land and People (Kiziba: Land und Leute).*

Denolf, P. (1954) *Aan den rand van der Dihese* (Brussels: ARSOM, Coll. in 8°, Vol. 34, No. 1).

Denoon, D. (ed.) (1972) *A History of Kigezi in South-West Uganda* (Kampala: The National Trust).

Denoon, D. (1983) *Settler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Oxford).

Denoon, D. (ed.) (forthcoming) *Uganda Before 1900*, vol. 2.

Denoon, D. and Snowden, C. (eds) (1981)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Papua New Guinea* (Port Moresby).

Deschamps, H. (1936) *Les Antaisaka* (Antananarivo).

Deschamps, H. (1949/1972) *Les pirates à Madagascar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2nd edn, 1972, Paris: Berger-Levrault), 1st edn, 244 pp.

Deschamps, H. (1961/1965) *Histoire de Madagascar* (2nd and 3rd edns, Paris: Berger-Levrault, Monde d'Outre-mer, Série Histoire), 348 pp.

Deschamps, H. (1962) *Traditions orales et archives au Gabon: contribution à l'ethno-histoire* (Paris: Berger-Levrault), 172 pp.

Deschamps, H. and Vianès, S. (1959) *Les Malgaches du sud-est* (Paris: PUF), 118 pp.

Devisse, T. (1982) 'L'apport de l'archéologie à l'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entre le Ve et le XII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Paris, January–March), pp. 156–77.

Diabaté, H. (1977) 'Mlan Alua, Blahima du Sanwi', *BIFAN*, 39, 2, Ser. B, pp. 304–340.

Diabaté, H. (1984) 'La formation du royaume Sanvi, 1700–1843'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Diagne, P. (1967) *Pouvoir politique traditionnel en Afrique occidentale: essai sur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précoloniales* (Paris: PA), 249 pp.

Diagne, P. (1976) *Formations sociales africaines* (Manuscript, UCLA).

Diagne, S. (1975) 'Le Bundu des origines au protectorat français de 1858' (MA thesis, Dakar).

Diallo, I. P. (1981) *Liptako Speaks - History From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 (Irwin Paul, PUP).

Diallo, T. (1972)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Fouta Djalon au XIXe siècle* (Dakar: IFAN, Initiations et études africaines), 276 pp.

Dickson, K. B. (1969)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Ghana* (Cambridge: CUP), 379 pp.

Dike, K. O. (1956)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50 pp.

Diop, A. B. (1981) *La société wolof, tradition et changement: les systèmes d'inégalité et de domination* (Paris: Karthala), 355 pp.

Diouf, M. (1980) 'Le Kajoor au XIXe siècle et la conquête coloniale' (PhD thesis, Par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zes em Moçambique e na Africa Central, 1497–1840 [*Documents on the Portuguese in Mozambique and Central Africa, 1497–1840*] (Lisbon: National Archives of Rhodesia and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62–1975 in progress); 8 vols, covering the period 1497–1588.

Dokaji, A. A. (1978) *Kano Ta Dabo Cigari* (Zaria: NNPC).

D'Orjo de Marchovelette, E. (1950–1) 'Notes sur les funérailles des chefs Ilunga Kabala et Kabongo Kumwimba. Historique de la chefferie Kongolo, *BJIDCC*, 18, pp. 350–68 and 19, pp. 1–12.

Dramani-Issifou, Z. (1982) *L'Afrique noir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XVIe siècle: analyse de la crise entre le Maroc et le Sonrhai* (Paris: Karthala), 257 pp.

Drury, R. (1729/1890) *Madagascar or Robert Drury's Journal During Fifteen Years of Captivity on That Island (ca. 1701–1717)* (London), 464 pp.

Dubins, B. (1969a) 'The Comoro Islands: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 12, 2, pp. 131–7.

Dubins, B. (1969b) 'Nineteenth-century travel literature on the Comoro Islands: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African Studies Bulletin*, 12, 2, pp. 138–46.

Dubois, H. M. (1938) *Monographie des Betsileo (Madagascar)* (Paris: Institut ethnologique).

Du Bois, W.E.B. (1974) *Les voyages faits par le Sieur D.B. aux Iles Dauphine ou Madagascar, et Bourbon ou Mascarene, es années 1669–1672* (Paris).

Dufeil, M. M. (1980–81) 'Afrique, taxinomie, historie', *CCAH*, 5, pp. 7–30 and 6, pp. 7–37.

Dugast, I., McCulloch, M. and Littlewood, M. (1954) *Peoples of the Central Cameroons*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Western Africa, Part 9), 174 pp.

Duisburg, A. von (1942) *In Lande des Chegbu von Bornu* (Berlin: D. Reimer), 162 pp.

Dumestre, G. (1974/1980) *La geste de Ségou* (Paris: A Colin) (2nd edn, 1980); 1st edn, 579 pp.

Dunbar, A. R. (1965) *A History of Bunyoro-Kitara* (Nairobi: EALB), 265 pp.

Dunn, R. S. (1972) *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 1624–1713* (New York: Chapel Hill, UNCP).

Dupire, M. (1962) *Peuls nomades*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336 pp.

Dupon, J. F. (1969) *Recueil de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Rodrigues* (Port Louis, Mauritius: Mauritius Archives Publications No. 10).

Dupré, G. (1982) *Un ordre et sa destruction* (Paris: ORSTOM), 446 pp.

Dupuis, J. (1824/1966)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Ashantee* (London: Colburn); 2nd edn, 1966, London:

Frank Cass, Part I: 264 pp., Part II: 135 pp.
Dupuis-Yacouba, A. (1921) *Industries et principales professions des habitants de la région de Tombouctou* (Paris: Publications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3 pp.
Duveyrier, H. (1859) *Coup d'oeil sur le pays des Beni-Mzab* (Paris: Imprimerie L. Martinet).
Duysters, L. (1958) 'Histoire de Aluunda', *Problèmes de l'Afrique centrale*, 12, pp. 75–98

East, R. M. (1979) *Labarun Hausawa Da Makwabtansu* (2 vols, Zaria. NNPC).
Echard, N. (1975) 'L'expérience du passé –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hausa de l'Ader', *EN*, 36 (Niamey: CNRSS).
Effah-Gyamfi, C. K. (1978) 'Bono-Manso: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an early Akan urbanism'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Accra).
Ehret, C. (1971) *Southern Nilotic History: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Evanston: NUP), 200 pp.
Ehret, C. (1973) 'Patterns of Bantu and Central Sudanic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1000 BC–500 AD)', *TJH*, 3, 1, pp. 1–71.
Ehret, C. (1974) 'Some thought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ile–Congo watershed', *Ufahamu*, 5, 2, pp. 85–112.
Ehret, C. (1982)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culture content in the Southern Sudan, *c.* 3000 B.C. to A.D. 1000 – a preliminary linguistic overview', in J. Mack and P. Robertshaw (eds), pp. 19–48.
Ehret, C. and Posnansky, M. (eds) (1982) *The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f African History* (Berkeley: UCP), 299 pp.
Eilu, A. B. (1976)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Kumam',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pp. 398–413.
Ekadu, J. E. (1961) *Kumam Ikare One Asonya* (London: Longmans). (Trans. into English by A. B. Eilu as 'The Kumam during the Asonya', unpublished, History Department, Makerere University, 1971).
El-Ḥasnāwī, H. W. (ed.) (1982) *A History of Trans-Saharan Trade Routes* (Tripoli).
Ellis, W. (1838) *History of Madagascar* (2 vols, London: Fisher).
Ellison, R. E. (1936)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among the Kanuri', *Africa*, 9, 4, pp. 524–35.
Elphick, R. (1977)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UP, 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Miscellany, 116), 266 pp.
Elphick, R. and Giliomee, H. (eds) (1979) *The Shaping of South African Society, 1652–1820* (Cape Town/London: Longman), 415 pp.
Elphick, R. and Shell, R. (1979) 'Intergroup relations: Khoikhoi, settlers, slaves and free blacks, 1652–1795',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116–69.
Eltis, D. (1977) 'The export of slaves from Africa, 1821–1843', *JEH*, 37, 2.
Eltis, D. (1979) 'The direction and fluctuat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1821–1843: a revision of the 1845 Parliamentary Paper',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273–330.
Eltis, D. (1981) 'The direction and fluctuation of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1844–67'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loomington).
Emerit, M. (1954) 'Les liaisons terrestres entre le Soudan et l'Afrique du Nord au XVIII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Trav. IRS*, 11, pp. 29–47.
Emin Pasha (1891) 'Zur Ethnologie de Gebiete um dem Albert-See', *Das Ausland*, 18, pp. 351–55.
Evans-Pritchard, E. E. (1940) *The Nuer* (Oxford: OUP), 271 pp.
Evans-Pritchard, E. E. (1971) *The Azande: Histo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44 pp.
Ewald, J. (1983) 'Kingdom of Taqali'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Exelson, E. (1969) *Portuguese in Southeast Africa, 1600–1700* (Johannesburg: WUP), 179 pp.
Eyongetah, T. and Brain, R. (1974) *A History of the Cameroon* (London: Longman) 192 pp.
Eyre-Smith, S. J. (1933)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Accra), 45 pp.

Fadiman, J. A. (1973) 'Early history of the Meru of Mount Kenya', *JAH*, 14, 1, pp. 9–27.
Fage, J. D. (1969a)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in the context of West African history', *JAH*, 10, pp. 393–404
Fage, J. D. (1969b)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An Introductory Survey* (4th edn, Cambridge: CUP), 239 pp. (Earlier edn publ.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Fage, J. D. and Oliver, R. A. (eds) (1970)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Cambridge: CUP), 331 pp.
Fage, J. D. and Oliver, R. A. (eds) (197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ambridge: CUP), 803 pp.

Fagering, E. (1971) *Une famille de dynasties malgaches: Zafindravola, Maroserana, Zafimbolamena, Andrevola, Zafimanely* (Oslo: Universitets forlaget).
Fagnan, E. (ed.) (1924) *Chronique anonyme saadienne* (Rabat: F. Moncho).
Fairley, N. (1978) 'Mianda ya Ben 'Ekie' (A History of the Ben 'Ekie) (PhD thes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Farb, P. (1969) *Man's Rise to Civilisation* (New York: Datton), 332 pp.
Faublée, J. (1958) 'L'Islam chez les Antemuru', *REI*, 1, pp. 65–72.
Faulkner, H. U. (1924/60)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st edn 1924, 201 pp.; 8th edn 1960, 202 pp.
Feierman, S. (1968) 'The Shambaa', in A. Roberts (ed.), 1968a, pp. 1–15.
Feierman, S. (1974) *The Shambaa Kingdom: A History* (Madison: UWP), 235 pp.
Felner, A. de A. (1933) *Angola: Apontamentos sobre a ocupação é início d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no Congo, Angola e Benguela*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Fergusson, J. (1876)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London: Murray), 756 pp.; rev. edn J. Burgess, 2 vols, 1910 (London: Murray); reprinted 1967, Delhi).
Fergusson, J. and Hope, T. (1866) *Architecture at Ahmadabad* (London).
Fernandes, V. (1951) Descripção de Cepta por sua costa de Mauritania e Ethiopia [Description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ed & French trans. by T. Monod, A. Teixeira da Moka and R. Mauny. Bissau: Centro des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esa, Publicações No. 11.
Ferrand, G. (1891–1902) *Les musulmans à Madagascar et aux Iles Comores* (3 vols, Paris: Leroux).
Ferrand, G. (1902) 'La légende de Raminia', *JA*, 19, 2, 9th series, pp. 185–230.
Figueroa, F. B. (1961) *Los insurrecciones de los esclavos negros en la sociedad colonial venezolara* (Caracas).
File, N. and Power, C. (1981) *Black Settlers in Britain, 1555–1958*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Filesi, T. and Villapadierna, E. de (1978) *La 'Missio Antiqua' dei Cappuccini nel Congo (1645–1835): Studio Preliminare et Guida delle Fonti* (Rome: Istituto Storico Cappuccini), 269 pp.
Firinga, Sgt. (1901) 'La dynastie des Maroserana', *RM*, 3, 9, pp. 658–72.
Fisher, A. G. B. and Fisher, H. G. (1970) *Slavery and Muslim Society in Africa* (London: C. Hurst), 182 pp.
Fisher, H. E. S. (1963) 'Anglo-Portuguese trade, 1700–1770', *EHR*, 16, 2nd Series, reprinted in W. E. Minchinton (ed.), pp. 144–64.
al-Fishtālī, 'Abd al-Azīz (1964) *Manahil al-Safa fi Akhbar al-Muluk al-Shurafa* (Rabat: Gunum Allān).
Flacourt, E. de (1658/1661/1913) *Histoire de la Grande Ile de Madagascar* (1st edn 1658; 2nd edn 1661, Paris: Clougier). (Also reprinted in modern French in A. Grandidier *et al.* (eds), vol. 8 (1913).
Flacourt, E. de (1661) *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en Ile de Madagascar depuis l'année 1642 jusqu'en 1660* (also reprinted in modern French in A. Grandidier *et al.* (eds), vol. 9 (1920).
Flad, J. M. A. (1869)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Falashas and Kamants in Abyssinia* (London: MacIntosh).
Flint, J. E. (ed.) (197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5 (Cambridge: CUP).
Fontaine, P. M. (1970) 'West Indian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ism', in *The Black Prism* (New York).
Fontoynont, M. and Raomandahy, E. (1937) *La Grande Comor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malgache, vol. 23).
Fontoynont, M. and Raomandahy, E. (1939) 'Les Antaifasy', *BAM*, n.s., 22, pp. 1–7.
Forde, C. D. and Jones, G. I. (1950/1962) *The Ibo and Ibibio-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Part III), 94 pp.
Forde, C. D. and Kaberry, P.M. (eds) (1967) *We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IAI/OUP), 289 pp.
Forde, D. (1951) *The Yoruba-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West Africa*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Part IV), 101 pp.
Forde, D. (ed.) (1956) *Efik Traders of Old Calabar* (London: OUP).
Fortes, M. (1940)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allensi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in M. Fortes and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OUP), pp. 239–71.
Fortes, M. (1945) *The Dynamics of Clanship among the Tallensi* (London: OUP), 270 pp.
Fosse, E. de la (1897) 'Voyage à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en Portugal et en Espagne (1479–1480)', *Revue Hispanique* (Paris), 4, pp. 174–201.
Fouché, L. (1963) 'Foundation of the Cape Colony, 1652–1708', in E. A. Benians, J. Butler, P.N.S. Mansergh & E. A. Wal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8, pp. 113–45 (CUP).

Franklin, J. H. (1967)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es* (first published 1956) (New York: Knopf), 686 pp.

Freedman, J. (1979) 'Three Muraris, three Gahayas and the four phases of Nyabingi', in J. B. Webster, (ed.), 1979a, pp. 175–88.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 'East African coin 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AH*, 1, pp. 31–43.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a)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Tanganyika Coa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38 pp. (2nd edn 1966, 314 p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ed.) (1962b)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14 p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3) 'The coast, 1498–1840',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129–68.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5) *The French at Kilwa Island: An Episode in Eighteenth-Century East African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43 p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ed.) (1980) *The Mombasa Rising against the Portuguese, 1631, from Sworn Evidence* (London: OUP), 166 pp.

Freund, W. M. (1979) 'The Cape under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s, 1795–1814',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211–40.

Frobenius, L. (1911–13) *Und Africa Sprach* (3 vols, Berlin, Charlottenburg: Vita, Deutsches Verlagshaus, S. D.).

Frobenius, L. (1924) *Dichten und Denken im Sudan*, vol. 5 (Jena: Atlantis).

Froberville, E. de (1845) 'Historique des invasions Madécasses aux Iles Comores et à la côte orientale d'Afrique', *AVG*, 2, pp. 194–208.

Fyfe, C. (1964) *Sierra Leone Inheritance* (London: OUP), 352 pp.

Fyfe, C. (1965) 'Peoples of the Windward Coast, A.D. 10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I. Espie (eds), pp. 149–65.

Fyfe, C. and McMaster, D. (eds) (1977 and 1981)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vol. 1, 1977, 473 pp; vol. 2, 1981 (Edinburgh: EUP).

Fynn, J. K. (1971) 'Ghana-Asante (Ashanti)', in M. Crowder (ed.), *West African Resistance*, pp. 19–52.

Fynn, J. K. (1975) *A Junior History of Ghana* (London: Longman).

Gado, B. (1972) *Gazetters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Nigeria*, vol. 1 (London: Frank Cass).

Gado, B. (ed.) (1980), '"*Le Zarmatarey*":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ntre Niger et Dallol Mawri*', *EN*, vol. 45, (Niamey: IRSH), 356 pp.

Galloway, W. F. (1974) 'A History of Wuli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Gamitto, A. C. P. (1960) *King Kazembe and the Maravi, Chewa, Bisa, Bemba, Lunda and Other Peoples of Southern Africa*, trans. by I. Cunnison (2 vols,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Centro de estudos politicos e sociais, Estudos de ciencias politicas e sociais No. 43).

Gannun, A. (ed.) (1964) *Al-Rasa'il al-Sa'diyya* (Tetuan/Rabat: 'Abd Allāli Gannun).

Garbett, G. K. (1966) 'Religious aspects of political succession among the valley Korekore',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137–71.

Garlake, P. S. (1954) 'Excavations at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ortuguese site of Dambarare, Rhodesia', *PTRSA*, 54, 1, pp. 23–61.

Garlake, P. S. (1966) *The Early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 London: BIEA, Memoir No. 1, published fo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 Africa by OUP), 207 pp.

Garlake, P. S. (1973) *Great Zimbabw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24 pp.

Garlake, P. S. (1978) 'Pastoralism and Great Zimbabwe', *JAH*, 19, 4, pp. 479–93.

Garlake, P. S. (1982) *Life at Great Zimbabwe* (Gweru: Mambo Press).

Garlake, P. S. (1983) *Early Zimbabwe: From the Matopos to Inyanga* (Gweru: Mambo Press).

Garrard, T. F. (1980) *Akan Weights and the Gold Trade* (London: Longman), 393 pp.

Garry, A. M. (1976) 'Pajule: the failure of Palwo centralization',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pp. 320–34.

Gaudebout, P. and Vernier, E. (1941) 'Notes sur une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Vohémar', *BAM*, new series, 24, pp. 91–114.

Gautier, E. F. and Froidevaux, H. (1907) 'Un manuscrit arabico-malgache sur les campagnes de La Case dans l'Imoro, 1656–1663',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Notices et extraits* (Paris), 39, 1, pp. 31–177.

Gauze, A. L. Téty (196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peuplement de la Côte d'Ivoir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Abidjan*, Series F.
Gauze, A. L. Téty (1982) 'Histoire des Magwe', in *Godo-Godo* (University of Abidjan) Special Number, pp. 13–43.
Gayibor, N. L. (1977) *Recueil des sources orales du pays Aja-Ewe* (Lomé).
Gemery, H. A. and Hogendorn, J. S. (eds) (1979)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42 pp.
Genovese, E. D. (1979) *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73 pp.
Geraud, F. (1972) 'The settlement of the Bakiga', in D. Denoon (ed.), pp. 23–55.
Gevrey, A. (1870/1972) *Essai sur les Comores* (1st edn 1870; 1972 edn, Antananarivo: Travaux et documents du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de l'Université, No. 10).
Gibbon, E. (1956)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6 vols,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
Giliomee, H. (1979a) 'The Eastern Frontier, 1770–1812',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291–337.
Giliomee, H. (1979b) 'The burgher rebellions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1795–1815',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338–356.
Glass, D. V. and Eversley, D. E. C. (eds) (1965)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692 pp.
Gleave, M. B. and White, H. P. (1969) 'The West African Middle belt: environmental fact or geographers' fic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59, pp. 123–39.
Godard L. (1859) *Le Maroc, notes d'un voyageur* (Algiers).
Godinho de Magalhães, V. (1962) *A economia dos descobrimentos henriquinos* (Lisbon: Sá da Costa).
Godinho de Magalhães, V. (1969)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u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SEVPEN).
Godinho de Magalhães, V. (1978) *Ensaios Sobre Historia de Portugal* (2 vols, Lisbon: Sá da Costa).
Godlouton, W. A. (1945) 'The journeys of Antonio Fernandes: the first known European to find the Monomatapa and to enter Southern Rhodesia', *PTRSA*, 2, pp. 71–103.
Goertzen, G. A. von (1895) *Dutch Afrika von Ost nach West* (Berlin: D. Reimer), 417 pp.
Golberry, A. (1802) *Fragments d'un voyage en Afrique* (Paris: Treuttel et Würtz), 522 pp.
Gomes, A. (1959) 'Viagem que Fez O Padre Antonio Gom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ao Imperio de (sic) Manomotapa e Assistencia que Fez nas Ditas Terras de Algunos Annos', with notes by E. Axelson, *Studia*, 3, pp. 155–242.
Gonçalves, A. C. (1980) *La symbolisation politique: le 'prophétisme' Kongo au XVIIIe siècle* (Cologne: Neltforum Verlag).
Goody, J. (1956)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Lowili* (London: IAI/OUP), 119 pp.
Goody, J. (1964) 'The Mande in the Akan hinterland', in R. Mauny, L. V. Thomas and J. Vansina (eds), pp. 193–218.
Goody, J. (1967) 'The over-kingdom of Gonja', in D. Forde and P. M. Kaberry (eds), pp. 179–205.
Gorju, J. (1920) *Entre le Victoria, l'Albert et l'Edouard* (Marseilles: Procure des Pères Blancs), 372 pp.
Gorju, J. (1938) *Face au royaume hamite du Ruanda, le royaume frère de l'Urundi* (Brussels: Vromant), 118 pp.
Goswamy, B. N. and Ballapeccola, A. L. (1978) 'Paintings in Kutch: Preliminary notes on a group of miniatures', *Artibus Asiae*, 40, 1, pp. 62–74.
Gould, J. D. ((1964) 'The price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HR*, 17, 2nd series, December, pp. 249–66.
Gourou, P. (1953) *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du Ruanda-Urundi: Esquisse d'une étude géographique*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239 pp.
Goveia, E. V. (1965) *Slave Society in the British Leeward Islands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UP), 370 pp.
Grandchamp, P. (1937) 'Une mission délicate en Barbarie au XVIIe siècle', *RT*, 31–32, 3rd-4th quarters, pp. 471–3.
Grandidier, A. (1908–28) *Ethnographie de Madagascar* (Paris).
Grandidier, G. (1942) *Histoire politique et coloniale (de Madagascar)*, vol. 5 (Paris).
Grandidier, A., Charles-Roux, J., Delherbe, C. Froidevaux, H. and Grandidier, G. (eds) (1903–20) *Collections des ouvrages anciens concernant Madagascar* (9 vols, Paris: Comité de Madagascar).
Grandidier, G. and Decary, R. (1958) *Histoire politique et coloniale (de Madagascar)* vol. 5, part 3 (Antananarivo).

Grant, C. (Baron) (1801) *The History of Mauritius or the Isle of France and the Neighbouring Islands* (London: W. Bulmer and Co.), 571 pp.
Gray, J. M. (1948) 'A journey by land from Tete to Kilwa in 1616', *TNR*, 25, pp. 37–45.
Gray, J. M. (1958) *Early Portuguese Missionaries in East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ALB), 53 pp.
Gray, J. M. (1962) *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 (London: OUP), 314 pp.
Gray, R. (1961)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dan* (London: OUP), 219 pp.
Gray, R. (ed.) (197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Cambridge: CUP), 738 pp.
Gray, R. and Birmingham, D. (eds) (1970)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Essays on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Before 1900* (London: OUP), 308 pp.
Gray, R. and Ehret C. (1975) 'Eastern Africa', in R. Gray (ed.), pp. 469–536.
Gray, R. and Marks, S. (1975) 'Southern Africa and Madagascar', in R. Gray (ed.), pp. 385–408.
Greenberg, J. H. (1963)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The Hague: Mouton, for Indiana University), 177 pp.
Greenberg, J. H. (1980) 'Classification of African Languages',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I, ch. 12 (Paris: UNESCO; London: Heineman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92–308.
Grey, E. (ed.) (1892) *The Travels of Pietro della Valle in India* (London).
Grigg, D. B. (1980)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arian Change: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UP).
Grottanelli, V. L. (1940) *I Mao* (Rome).
Grottanelli, V. L. (1941) 'Gli Scinascia del Nilo Azurro', *RSE*, 1, 3, pp. 234–70.
Grottanelli, V. L. (1953) 'I Bantu del Giuba nelle tradizioni dei Wazegua', *Geographia Helvetica*, 8 (Bern: Geographische gesellschaft).
Grottanelli, V. L. (1955) 'A lost African metropolis', in *Afrikanistische Studien D. Westermann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 (Berli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a Berlin), pp. 231–42.
Grottanelli, V. L. (1975) 'The peopling of the Horn of Africa',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44–75.
Guelke, L. (1979) 'The white settlers, 1652–1789',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41–74.
Guillain, C. (1845)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de Madagascar* (Paris).
Guillot, B. (1973) *La terre Enkou* (Paris: Mouton), 126 pp.
Guillot, C. F. (1961) *Negros rebeldes y negros cimarrones: perfil afro-americano en la historia del Nuevo Mundo durante el siglo XVI* (Montevideo: Farina).
Guthrie, M. (1948)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ntu Languages* (London: OUP, for the IAI), 91 pp.
Gutman, H. G. (1976)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664 pp.
Guy, J. (1979) *The Destruction of the Zulu Kingdom: The Civil War in Zululand, 1879–1884* (London: Longman), 273 pp.
Gwynne, M. D. (1975)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some domestic food plants of Eastern Africa',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248–71.

Haberland, E. (1959) 'Die Basketto', in Ad. E. Jensen (ed.), pp. 189–226.
Haberland, E. (1963) *Galla Süd-Äthiopiens*, with a contribution of K. Reinhardt (Stuttgart: W. Kohlhammer), 815 pp.
Haberland, E. (1964a) 'The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Ethiopian Empire on Southern Ethiopia', *JSS*, 9, pp. 235–8.
Haberland, E. (1964b) *König und Paria in Afrika* (München: K. Renner).
Haberland, E. (1965) *Untersuchungen zum äthiopischen Königtum*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353 pp.
Haberland, E. (1976) *Altes Christentum in Süd-Äthiopien: Eine vergessene Missionsepoche*, Frankfurter Historische Vorträge 2 (Wiesbaden: Steiner) 23 pp.
Haberland, E. (forthcoming) *Caste and Hierarchy – The Case of the Dizi (Southern Ethiopia)*.
Hacquard, A. (1900) *Monographie de Tombouctou* (Paris: Société des éditions coloniales et maritimes), 119 pp.
Hafkin, N. J. (1973) 'Trad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Mozambique, c. 1753–1913'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Hagan, G. P. (1971) 'Ashanti bureaucracy', *THSG*, 12, pp. 43–62.
Hagenbucher Sacripanti, F. (1973) *Les fondements spirituels du pouvoir au royaume de Loango, R. P. du Congo* (Paris: ORSTOM), 214 pp.
Haig, Sir W. (ed.) (193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3 (London: CUP).
Hair, P. E. H. (1965) 'The enslavement of Koelle's informants', *JAH*, 6, 2, pp. 193–203.
Hair, P. E. H. (1967) 'Ethnolinguistic continuity on the Guinea coast', *JAH*, 8, 2, pp. 247–68.

Hair, P. E. H. (1968) 'An ethnolinguistic inventory of the Lower Guinea coast before 1700: Part I', *ALR*, 7, pp. 47–73.

Hair, P. E. H. (1974) 'From language to cultu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ethno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ierra Leone region', in R. P. Moss and R. J. A. R. Rathlone, *The Population Factor in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LP), pp. 71–83.

Hair, P. E. H. (1976) 'Some minor sources for Guinea, 1519–1559: Enciso and Alfonce Fonteneau', *HA*, 3, pp. 30–1.

al-Hajj, M. A. (1968) 'A seventeenth-century chronicle on the origins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Wangarawa', *KS*, 1, 4, pp. 7–42.

al-Hajj, M. A. (1979) 'The meaning of the Sokoto jihad', in Y. B. Usman (ed.), 1979b, pp. 3–19.

al-Hajj, M. A. (1983) 'Some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Sefuwa Mais of Borno with Egypt, Turkey and Morocco', in Y. B. Usman and M. N. Alkali (eds).

Hall, G. M. (1976) 'Dendroclimatology, rainfall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the Later Iron Age in Natal and Zululand', *Annals of the Natal Museum* (Durban), 22, 3, pp. 693–703.

Hallet, R. (ed.) (1964) *Records of the African Association, 1788–1831* (London: Nelson, for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318 pp.

Hama, B. (1966) *Enquête sur les fondements et la genèse de l'unité africaine* (Paris: PA).

Hama, B. (1967a) *Histoire du Gobir de Sokoto* (Paris: PA), 167 pp.

Hama, B. (1967b) *Histoire traditionnelle d'un peuple. les Zarma-Songhay* (Paris: PA), 273 pp.

Hama, B. (1968) *Contribu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 l'histoire des Peuls* (Paris: PA), 362 pp.

Hama, B. (1969) *Histoire traditionnelle des Peuls du Dallol Boboye* (Niamey: CRDTO), 160 pp.

Hamani, D. M. (1975)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états Hausa: l'Adar précolonial (République du Niger)*' (Niamey: IRSH), 277 pp.

Hamani, D. M. (1989) *Au carrefour du Soudan et de la Berbérie: le sultanat touareg de l'Ayar* (2 vols,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521 pp.

Hamilton, A. (1727)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Being the Observations and Remarks of Capt. A. Hamilton who spent his time there from 1688 to 1723* (2 vols., Edinburgh).

Hamilton, E. J.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Economica*, 9 (November), pp. 338–57.

Hamilton, E. J. (1934)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vol. 43), 428 pp.

Hamilton, R. A. (1954) 'The route of Gaspar Bocarro from Tete to Kilwa in 1616', *NJ*, 7, 2, pp. 7–14.

Hamilton, R. A. (1957a) 'Oral tradition: Central Africa', in R. A. Hamilton (ed.), pp. 19–23.

Hamilton, R. A. (ed.) (1957b)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Africa, Second Conference held in 1957 at SOAS*. (London: SOAS), 99 pp.

Hammerschmidt, E. (1977) 'Illuminierte Handschriften der Staatsbibiothek Preubischer Kulturbesitz und Handschriften vom Tānāsee', *CA*, 1.

Hanke, L. (ed.) (1969)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Civilization: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 (2 vols, London: Methuen).

Hansberry, W. L. (1965) 'Ethiopian ambassadors to Latin courts and Latin emissaries to Prester John', *Ethiopia Observer* (Addis Ababa), 9, 2, pp. 90–9.

Harms, R. (1981) *River of Wealth, River of Sorrow: The Central Zaire Basin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and Ivory Trade, 1500–1891* (New Haven and London: YUP), 277 pp.

Harris, J. E. (1971)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 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frican Slave Trade* (Evanston, Ill.: NUP), 156 pp.

Harris, J. E. (1977) 'The Black peoples of Asia', in *World Encyclopaedia of Black Peoples* (St. Clair Shores, Michigan: Scholarly Press Inc.).

Harris, J. E. (1982) *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Washington DC: HUP).

Harris, M. (1964) *Patterns of Race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Walker and Co.).

Hartwig, G. W. (1972) 'Les Bakerebe', *CHM*, 19, 3, pp. 353–76.

Hartwig, G. W. (1976) *The Art of Survival in East Africa: The Kerebe and Long-distance Trade, 1800–1895* (New York/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253 pp.

Hasan, Y. F. (1965) 'The Umayyad genealogy of the Funj', *SNR*, 46, pp. 27–32.

Hasan, Y. F. (1967) *The Arabs and the Sudan* (Edinburgh: EUP), 298 pp.

Hasan, Y. F. (1971) 'External Islamic influences and the progress of Islamization in the Eastern Sudan between the fifteenth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Y. F. Hasan (ed.) *Sudan in Africa* (Khartoum), pp. 73–86.

Hasan, Y. F. (1972) *Muqaddima fi Tarīkh al-Mamālik al-Islamiyya fi al-Sūdān al-Sharqi* (Khartoum: KUP).

Hasan, Y. F. (1975) *Dirāsāt fi Tarīkh al-Sūdān* (Khartoum: KUP).
Hasan, Y. F. (1977) 'Some aspects of the Arab slave trade from the Sudan', *SNR*, 57, pp. 85–106.
Hasan, Y. F. (unpublished) *The Fur Sultanate and the Long-distance Trade, 1650–1850* (Khartoum: KUP).
Hassan, A. and Naibi, A.S. (1952) *A Chronicle of Abuja* (Ibadan: IUP), 92 pp.
Heintze, B. (1970)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Kisama, Angola', *Paideuma*, 16, pp. 159–86.
Heintze, B. (1977) 'Unbekanntes Angola: der Staat Ndongo im 16 Jahrhundert', *Anthropos*, 72, pp. 749–805.
Henige, D. (1974) 'Reflections on early interlacustrine chronology: an essay in source criticism', *JAH*, 15, 1, pp. 27–46.
Herring, R. S. (1974) 'A history of Labwor hill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Herring, R. S. (1976) 'The Nyakwai: on the borders of the "Lwo" world',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Herring, R. S. (1979) 'The view from Mount Otuke: migrations of the Lango Omiro', in J. B. Webster (ed.), 1979a, pp. 283–316.
Herring, R. S. (unpublished) 'The Nyakwai: on the borders of two worlds;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abwor',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Herskovits, M. J. and Harwitz, M. (eds) (1964) *Economic Transactions in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444 pp.
D'Hertefelt, M. (1971) *Les clans du Rwanda ancien: éléments d'ethnosociologie et d'ethnohistoire* (Tervuren: MRAC), 85 pp.
Heusch, L. de (1964) 'Mythe et société féodale: le culte du Kubandwa dans le Rwanda traditionnel', *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juillet-décembre, pp. 133–46.
Heusch, L. de (1966) *Le Rwanda et la civilisation interlacustre* (Brussels: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417 pp. (See also D. W. Cohen, review of same in *JAH*, 1968, 4, 9, pp. 651–57).
Heusch, L. de (1972) *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Etat* (Paris: Gallimard), 331 pp.
Hichens, W. (ed.) (1972) 'Sayyid Abdallah bin Ali bin Nasir bin Sheikh Abubaker bin Salim', *Al-lukishafi* (The Soul's Awakening) (London: Sheldon Press); reprinted, Nairobi: OUP, 190 pp.
Hill, A. and Kilson, M. (eds) (1969) *Apropos of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390 pp.
Hillelson, S. (1933) 'David Reubeni: an early visitor to Sennar', *SNR*, 16, pp. 55–66.
Hilton, A. (1985) *Family and Kingship* (Oxford: OUP).
Hiskett, M. (1962) 'An Islamic tradition of reform in the Western Suda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SOAS*, 25, 3, pp. 577–96.
Hiskett, M.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353 pp.
Historia de Portugal, (1931) Vol. III (Barcelona).
Hoben, A. (1973) *Land Tenure among the Amhara of Ethiopia: The Dynamics of Cognatic Descen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ben, A. (1975) 'Family, land and class in Northwest Europe and Northern Highland Ethiopia', in H. G. Marcu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n Ethiopian Studies, 1973* (Michigan: African Studies Cen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obsbawm, E. J. (1954)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rt I', *PP*, 5, pp. 33–53.
Hodgkin, T. H. (1975/1979) *Nigerian Perspectives: An Historical Anthology* (London: OUP). (1st edn 1975; 2nd edn 1979).
Holsoe, S. E. (1967) 'The cassava-leaf people: an ethn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Vai peopl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Tewo chiefdom'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Holsoe, S. E., d'Azevedo, W. L. and Gay (1969) 'Chiefdom and clan maps of Western Liberia', *LSJ*, 2, pp. 23–39.
Holsoe, S. E., d'Azevedo, W. L. and Gay (1974) 'The first "Vai" mig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Annual Liberian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Holt, P. M. (1960) 'A Sudanese historical legend: the Funj conquest of Sūba', *BSOAS*, 23, pp. 1–12.
Holt, P. M. (1961/1963)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Funj Sultanate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41 pp. (2nd edn 1963, 248 pp.).
Holt, P. M. (1966)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 1516–1922* (London: Longman), 337 pp.
Holt, P. M. (1967) 'Sultan Selim I and the Sudan', *JAH*, 8, 1, pp. 19–23.
Holt, P. M. (ed.) (1968)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Egypt: Historical Studies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London: OUP).
Hoover, J. J. (1979) 'The seduction of Ruwej' (Ph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Hopkins, A. G. (1966)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empires of the Western Sudan: a contribution to a

debate started by Malowist', *PP*, 33, pp. 149–56 (with a rejoinder by M. Malowist, pp. 157–62).
Hopkins, A. G. (1973/1975/198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st edn 1973, 337 pp.).
Hopkins, J. F. P. and Levtzion, N. (1981)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UP), 492 pp.
Hopkins, N. S. (1971) 'Mandinka social organisation', in C. T. Hodge (ed.), *Papers on the Man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99–128.
Hornell, J. (1934) 'Indonesian influence on East African culture', *JRAI*, 64, pp. 305–33.
Houdas, O. (tr.) (1966) *Tadhkirat al-Nisyan* (anon.), Arabic text and French trans. (Paris: Maisonneuve).
Hrbek, I. (1977) 'Egypt, Nubia and the Eastern deserts', in J. D. Fage and R. Oliver (eds), pp. 10–97.
Huet, G. (1901) 'Histoire de l'occupation du territoire des Antaimorona par les Hova', *RM*, 3, 2, pp. 761–7.
Huffman, T. N. (1972) 'The rise and fall of Zimbabwe', *JAH*, 13, 3, pp. 353–66.
Huffman, T. N. (1978) 'The origins of Leopard's Kopje: an 11th-century Difaqane', *Arnoldia*, 7, 33, pp. 1–23.
Hulstaert, G. (1972) 'Une lecture critique de l'ethnie mogo de G. van der Kerken', *EHA*, 3, pp. 27–60.
Huntingford, G. W. B. (trans. and ed.) (1965) *The Glorious Victories of Amda Seyon, King of Ethiop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he Oxford Libra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142 pp.
Hunwick, J. O. (1962) 'Note on the appointment of Askia al-Hajj Muhammad Ture as Khalifa of Western Sudan', *JHSN*.
Hunwick, J. O. (1964) 'A new source for the biography of Ahmad Baba al-Timbukti', *BSOAS*, 27, 3, pp. 568–93.
Hunwick, J. O. (1971) 'Songhay, Bornu and Hausaland in the 16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202–39.
Hutereau, A. (1922) *Histoire des peuplades de l'Uele et de l'Ubangi* (Brussels: Goemaere, Bibliothèque Congo, No. 1), 334 pp.

Ibn 'Abd al-Zāhir, Muḥyī al-Dīn (1961) *Tashrīf al-ayyām wa '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ūr* (Cairo: M. Kamil).
Ibn Abī Dīnār, al-Ḳayrāwān (1967) *Kitāb al-Mu'nis fī akhbār Ifrīḳiya wa Tūnis* (Tunis), 169 pp.
Ibn Dayf Allāh Muḥammad 'Abd Nur (1973) *Kitāb al-Ṯabaqak fī Khusus al-awliya wa 'l-Salahin fī al-Sūdān*, 2nd edn, Y. F. Hasan (ed.), (Khartoum).
Ibn Furṭūwa, Aḥmad (16th cent.) *Ta'rīkh mai Idrīs wa ghazawātihi lil Imām Aḥmad Burnuwī*, 1932 ed. H. R. Palmer (Kano: Amir's Press), 1926 Engl. transl. H. R. Palmer, *History of the first twelve years of the reign of mai Idris Alooma of Bornu (1571–83), by his Imam* ('together with the 'Diwān of the sultans of Bornu')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1932 edn (Kano: Amir's Press), reprinted London, 1970.
Ibn Isḥāḳu, M. S. (1929) 'An account of Birni Gazergamu (written in Arabic in c.1658–9)', trans. and published in *BSOAS*.
Ibn Khaldūn Walī al-Dīn 'Abd al-Raḥmān b. Muḥammad (14th cent.) *Kitāb al-'Ibār wa-diwan al-mubtada wa 'l-Khabar* ('Universal History'), 1967 edn, vol. 2 (Beirut): Commission libanaise pour la traduction des chefs-d'oeuvre).
Idrissou, M. (1979) 'Kalfu, or the Fulbe emirate of Bagirmi and the Toorobbe of Sokoto', in Y. B. Usman (ed.), 1979b, pp. 336–75.
Ignace, E. (1970) 'A revolta dos Males', *Afro-Asia*, 10–11, pp. 121–36.
Ikime, O. (1972) *The Isoko People* (Ibadan: IUP), 166 pp.
Ikime, O. (ed.) (1980)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liffe, J. (1979) *A Modern History of Tanzania* (Cambridge: CUP), 616 pp.
Imam, I. (1969) 'Kanuri marriage', *Nigerian Magazine*, 102.
Ingham, K. (ed.) (1974) *Foreign Relations of African States* (London: Butterworth, Colston Paper, No. 75), 344 pp.
Inikori, J. E. (1976) 'Measuring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 assessment of Curtin and Anstey', *JAH*, 17, 2, pp. 197–223.
Inikori, J. E. (1977) 'The import of firearms into West Africa, 1750–1807: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AH*, 18, 3, pp. 339–68.
Inikori, J. E. (1979)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Atlantic economies, 1451–1870', i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 Reports and Papers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Organised by UNESCO at Port-au-Prince, Haiti, 31 January–4 February 1978*,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 Studies and Documents, 2 (Paris: UNESCO), pp. 56–87.

Inikori, J. E. (1981)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JEH*, 41, 4 (December), pp. 745–76.
Inikori, J. E. (ed.) (1982) *Forced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xport Slave Trade on African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for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mpany), 349pp.
Inikori, J. E. (1983) 'West Africa's seaborne trade, 1750–1850: Volume, structure and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quantific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ld at St. Augustin (near Bonn), Germany, 3–6 January).
Inikori, J. E. (1984) 'Slave trade, slave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re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the contribution of Eric Williams, Bellagio, Italy, 21–25 May).
Isaacman, A. F. (1969) 'The prazos da Coroa, 1752–1832: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Portuguese political system', *Studia*, 26, pp. 149–78.
Isaacman, A. F. (1972a) 'The origin, form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kunda of South-Central Africa', *JAH*, 13, 3, pp. 443–62.
Isaacman, A. F. (1972b) *Mozambique: the Africanization of a European Institution: the Zambezi Prazos, 1750–1902* (Madison: WUP), 260 pp.
Isichei, E. A. (1973) *The Ibo People and the Europeans: the Genesis of a relationship – to 190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Isichei, E. A. (1976) *A History of the Igbo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303 pp.
Itandala, B. (1979) 'Ilembo, Nkanda and the girls', in J. B. Webster (ed.), 1979a, pp. 145–73.
Izard, M. (1970)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royaumes mossi', *RV*, 12–13 (2 vols, Paris and Ouagadougou CNRS/CVRS).
Izard, M. (1971) 'La formation de Ouahigouya', *JSA*, 41, 2, pp. 151–87.
Izard, M. (1975) 'Les captifs royaux dans l'ancien Yatenga', in C. Meillassoux (ed.), pp. 281–96.
Izard, M. (1980) 'Les archives orales d'un royaume africain: Recherches sur la formation du Yatenga', (MA thesis, Université de Paris V-Descartes).
Izard, M. (1981) *Histoire du Yatenga des origines à 1895* (Ouagadougou).

Jackson, J. G. (1811)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Morocco* (London), 328 pp.
Jackson, K. (1976) 'The dimensions of Kamba pre-colonial history', in B. A. Ogot (ed.), 1976b, pp. 174–261.
Jackson, K. (1978) *The Works of the Past: A History of the Precolonial Kamba* (Stanford).
Jackson-Haight, M. V. (1967) *European Powers and South-East Africa, 1796–1856*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Jadin, L. (1961) 'Le Congo et la secte des Antoniens: restauration du royaume sous Pedro IV et la "Sainte-Antoine" congolaise (1695–1718)', *BIHBR*, 33, pp. 411–615.
Jadin L. (1967) 'Pero Tavares, missionaire jésuite, ses travaux apostoliques au Congo et en Angola, 1629–1635', *BIHBR*, 38, pp. 271–402.
Jadin, L. (1975) 'L'ancien Congo et l'Angola (1639–1655), d'après les archives romaines, portugaises, néerlandaises et espagnoles', *BIHBR*, 20–22 (3 vols).
Jadin, L. and Dicorato, M. (1974) *Correspondance de Dom Afonso, roi du Congo, 1506–1543* (Brussels: ARSOM 41–3), 245 pp.
Jäger, O. A. (1957) *Aethiopische Miniaturen* (Berlin: Mann).
Jakobsen, D. (1902) 'Note sur Andriamaro, idole célèbre chez les Mahafaly', *BAM*, 1, 1, pp. 50–2.
James, C. L. R. (1963)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Janzen, J. M. (1979)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Equatorial African therapeutic systems', *SSM*, 13, 4, Part B.
Janzen, J. M. (1982) *Lemba, 1650–1930.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an African Drum of Affliction* (Lawrence, Kansas).
Jensen, Ad. E. (1936) *Im Landes des Gada* (Stuttgart: Frobenius Institute), 608 pp.
Jensen, Ad. E. (1959) *Altvölker Süd-Äthiopiens*,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 Haberland (Stuttgart: Kohlhammer).
Jobson, R. (1623) *The Golden Trade or a Discovery of the River Gambia and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Aethopians* (Teignmouth, Devonshire), 218 pp.
Johnson, J. W. (1941) 'Negro companions of the Spanish explorers', *Phylon* (Atlanta University, GA), 2 (Fourth Quarter).
Johnson, J. W. (1954) *Traditional History, Customary Laws, Mores, Folkways and Legends of the Vai Tribe* (Monrovia: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Liberia).

Johnson, J. W. (1961)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Folklore of the Gola Tribe in Liberia* (Monrovia.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Republic of Liberia).
Johnston, H. H. (1902) *The Uganda Protectorate* (2 vols, London: Hutchinson).
Johnston, M. (1966) 'The ounce in 18th-century West African trade', *JAH*, 7, pp. 197–214.
Jones, A. (1981) 'Who were the Vai?', *JAH*, 22, pp. 159–78.
Jones, A. H. M. and Monroe, E. (1978) *A History of Ethiopia* (Oxford: OUP), 196 pp.
Jones, D. H. (1964) *The Borgu Dynasties* (London: SOAS).
Jones, D. H. (1967) 'Jakpa and the foundation of Gonja', *THSG*, 6, pp. 1–29.
Jones, G. I. (1963) *The Trading States of the Oil Rivers* (London: OUP), 262 pp.
Jordão (Levy Maria), Viscount of Paiva Manso (1877) *História do Congo* (Lisbon: Academia das Scencias de Lisboa).
Josephy, A. M., Jr. (ed.) (1971) *The Horiz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cations Co.), 528 pp.
Joussaume, R. and Joussaume, H. (1972) 'Anciennes villes dans le Tchertcher (Harar)', *AE*, 8, pp. 21–30.
Julien, C. A. (1948) *Les voyages de découverte et les premiers établissements (XVe–XVIe siècles)* (Paris), 177 pp.
Julien, C. A. (1951–6)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 Algérie, Maroc. De la conquête arabe à 1830*, 2nd edn (2 vols, Paris: Payot)
Julien, G. (1929) 'Pages arabico-madécasses', *Annal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Paris), pp. 1–123.
Jully, A. (1898) 'Origine des Andriana' *NRE*, 4, pp. 890–8.
July, R. W. (1974) *A History of the African People* (London: Faber), 650 pp.

Kabongo Mukendi (1973) 'Les migrations luba vers le Kasai et leurs conséquences' (first degree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Kabuga, C. E. S. (1963) *Eby'Obwakabaka bwa Buganda* (Kampala).
Kagame, A. (1943–7) *Inganji Kalinga*, reprint Kabgayi, 1959.
Kagame, A. (1954) *Les organisations socio-familiales de l'ancien Rwanda*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355 pp.
Kagame, A. (1959) *La notion de génération appliquée à la généalogie dynastique et à l'histoire du Rwanda du Xe–XIe siècle à nos jours*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117 pp.
Kagame, A. (1963) *Les milic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Brussels: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196 pp.
Kagame, A. (1972) *Un abrégé de l'ethno-histoire du Rwanda* (Butare: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Rwanda), 286 pp.
Kagame, A. (1981) 'La documentation du Rwanda sur l'Afrique interlacustre des temps anciens', *CCB*, pp. 300–30.
Kaggwa, A. (1908/1949) *Mpisa Za Baganda* (Kampala), 1908; 2nd edn, *Ekitabu Kye Bika bya Baganda* (Kampala), 1949.
Kaggwa, A. (1971) *Basekabaka be Buganda*, tr. and ed. by M. S. M. Kiwanuka as *The Kings of Buganda* (Nairobi: EAPH, Historical texts of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No. 1), 256 pp.
Kaira, O. Y. (1970–1) '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the Kaira Clan of Northern Malawi' (Student seminar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Kake, I. B. (1948) *Les Noirs de la Diaspora* (Libreville, Gabon), 190 pp.
Kalanda, M. (1959) *Baluba et Lulua, une ethnie à la recherche d'un nouvel équilibre* (Brussels: Editions de Remarques congolaises, Etudes congolaises, No. 2), 106 pp.
Kalck, P. (1980)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etuchen, N. J. an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52 pp. (African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No. 27).
Kalinga, O. J. M. (1974) 'The Ngonde Kingdom of Northern Malawi *c.*1600–1895'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Kalinga, O. J. M. (1975) 'The problem of chronology in the study of Ngonde history', *MJSS*, 4, pp. 26–35.
Kalinga, O. J. M. (1977) 'The Ngonde and Lambya kingdoms: a comparison of rela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and dominant immigrant grou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esotho, Roma, 7–9 August).
Kalinga, O. J. M. (1978)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Lambya Kingdom, 1600–1750', *ASR*, 21, 2, pp. 52–66.
Kalinga, O. J. M. (1979a) 'Trade, the Kyungu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Ngonde Kingdom', *IJAHS*, 12, 1, pp. 17–39.

Kalinga, O. J. M. (1979b) 'The Balowoka traders and state build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Goethe-Institut sponsored Conference on state-formation in Eastern Africa, Nakuru, Kenya, 12-14 September).

Kalinga, O. J. M. (1985) *A History of the Ngonde Kingdom* (Berlin/New York: Mouton).

Kalinga, O. J. M. (forthcoming) 'Ngonde and Lambya historical texts'.

Kamuhangire, E. R. (forthcoming)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alt lakes region, 1500–1850', in D. Denoon (ed.).

Kane, O. (1970a) 'Chronologie des Satigi du XVIIIe siècle', *BIFAN*, 33, Series B, No. 3, pp. 755–65.

Kane, O. (1970b) 'Samba Gelajo Jegi', *BIFAN*, 32, Series B, No. 4, pp. 911–26.

Kane, O. (1973) 'Les unités territoriales du Futa Toro', *BIFAN*, 35, Series B, No. 3, pp. 614–31.

Kane, O. (1974) 'Les Maures et le Futa Toro au XVIIIe siècle', *CEA*, 14, 2, pp. 237–52.

Kani, A. M. (forthcoming) 'The rise and influence of scholars in Hausaland before 1804',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Kaniki, M. H. Y. (ed.) (1979)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Longman), 391 pp.

Karimou, M. (1977) *Les Mawri Zarmaphones*, *EN*, 39 (Niamey: IRSH).

Karubanga, H. K. (1949) *Bukya Nibwira* (As the sun rises and sets) (Kampala: Eagle Press).

Karugire, S. R. (1971) *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Nkore in Western Uganda to 18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91 pp.

Katate, A. G., Nyankore, Y. and Kamagungunu, L. (1955/1967) *Abagabe b'Ankol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Ankole) (2 vols, Kampala: Eagle Press); 1967 edn, Nairobi: EALB.

Ka'ti, Maḥmūd b. al-Ḥadjdj al-Mutawakkil (1913–14) *Ta'rikh al-fattāsh fi Akhbar al-Buldān*; Arabic text and French trans. by O. Houdas and M. Delafoss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5e série, No. 10), (revised 1964); 1981 UNESCO reprint of 1913–14 edn & trans. (Paris: Maisonneuve).

Katoke, I. K. (1971) 'The kingdom of Ihangiro', *CHM*, pp. 700–13.

Katoke, I. K. (1975) *The Karagwe Kingdom: A History of the Abanyambo of North Western Tanzania c.1400–1915* (Nairobi: EAPH), 182 pp

Kawada, J. (1979) *Genèse et évolution du système politique des Mosi méridionaux* (Tokyo: A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12).

Kea, R. A. (1971) 'Firearms and warfare on the Gold and Slave Coasts, from the 16th to the 19th centuries', *JAH*, 12, 2, pp. 185–213.

Keen, B. and Wasserman, M. (1980) *A Short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574 pp.

Keim, C. (1979) 'Precolonial Mangbetu rul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nineteenth-century Mangbetu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Kélédor, Baron R. (1829) *Histoire africaine* (Paris).

Kellenbenz, H. (1971) 'Die Rückwirkungen der Kolonien auf die Muttedänder', *Saeculum Weltgeschichte*, 6, pp. 123–40.

Kent, R. K. (n.d.) *Southern Madagascar and the French, 1642–74* (typescript).

Kent, R. K. (1965) 'Palmares: an African State in Brazil', *JAH*, 6, 2, pp. 161–75.

Kent, R. K. (1968) 'The Sakalava', *JAH*, 9, 4, pp. 517–46.

Kent, R. K. (1969) 'Alfred Grandidier et le mythe des fondateurs d'états malgaches d'origine asiatique', *BM*, 277–8, pp. 603–20.

Kent, R. K. (1970)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170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Kesteloot, L. (1972) *Da Monzon de Ségou, épopée bambara* (4 vols, Paris: F. Nathan).

Kesteloot, L. (1983) *Biton Koulibaly, fondateur de l'empire de Ségou* (Dakar: NEA), 96 pp.

Kietegha, J. B. (1983) *L'or de la Volta Noire* (Paris: Karthala, CREA), 247 pp.

Kimambo, I. N. (1968) 'The Pare', in A. D. Roberts (ed.), 1968a, pp. 16–36.

Kimambo, I. N. (1969)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Nairobi: EAPH), 253 pp.

Kimambo, I. N. and Temu, A. (eds) (1969) *A History of Tanzania* (Nairobi: EAPH), 276 pp.

Kimble, D (1963) *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The Rise of Gold Coast Nationalism, 1850–192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587 pp.

Kipkorir, B. E. (1974) 'The inheritors and successors', *KHR*, 2, 2, pp.. 143–73.

Kipkorir, B. E. and Welbourn, F. B. (1973) *The Marakwet of Kenya* (Nairobi: EALB), 97 pp.

Kirkman, J. S. (1954)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Oxford: OUP), 197 pp.

Kirkman, J. S. (1964) *Men and Monuments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224 pp.

Kirkman, J. S. (1970) *Fort Jesus, Mombasa* (Nairobi).
Kiwanuka, M. S. M. (1971a) *A History of Buganda* (London: Longman), 322 pp.
Kiwanuka, M. S. M. (1971b) *The Kings of Buganda* (Nairobi: EAPH, Historical Texts of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No. 1), 256 pp.
Ki-Zerbo, J. (1978)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Hatier), 702 pp.
Klein, H. S. (1967)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irginia and Cub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70 pp.
Klein, H. S. (1972)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from Angol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EH*, **32**, 4, pp. 894–918.
Klein, H. S. (1975) 'The Cuban slave trad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1790–1843', *RFHOM*, **62**, 226–7, pp. 67–89.
Klein, H. S. (1978) 'The English slave trade to Jamaica, 1782–1802', *EHR*, **31**.
Klein, M. A. (1968) *Islam and Imperialism in Senegal Sine-Saloum, 1847–1914* (Edinburgh: EUP), 285 pp.
Kodi Muzong (1976) 'A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Pende people (Republic of Zaire)'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Koelle, S. W. (1854) *African Native Literature Or Proverbs, Tales, Fables, and Historical Fragments in the Kanuri or Bornu Language*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434 pp. (reprinted 1968).
Kolungwe, M. W. (1974) 'Les Bambuile du lac Moero' (MA thesis, Lubumbashi).
Kopytoff, B. K. (1978)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Jamaican Maroon societies', *WMQ*, **35**, 2 (April).
Kottak, C. P. (1972) 'Ecological variables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frican states: the Buganda exampl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pp. 351–80.
Kouanda, A. (1984) 'Les Yarse: fonction commerciale, religieuse et légitimité culturelle dans le pays moaga (Evolution historiqu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Kozlov, B. (1970) 'Kogda rodilsia praded pushkina Gannibal?' (When was Pushkin's great-grandfather born?), *Novoe Yusskoe Slovo*, **11**, (January).
Krapf, J. L. (1858) *Reisen in Ost-Africa ausgefuhrt in den Jahren 1837–1855* (2 vols, Stuttgart: Kornthal); English edn: *Travels, Researches and Missionary Labors During An Eighteen Years' Residence in Eastern Africa* (Boston: Ticknor & Fields), 1860.
Kriedte, P. (1980/1983)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English trans. S. Leamington, Berg Publishers Ltd., 1983; (original edn, Go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0).
Krump, T. (1710) *Hoher und Frucht-barer Palm Baum de Heiligen Evangelij*, Augsburg, relevant parts translated by J. L. Spaulding: *Sudanese Travels of Theodro Krump, 1710–1712* (New York: Hambata Publications, No. 39).
Kubbel, L. E. (1974) *Songaiskaia derzhava* (Moscow: Hayka), 430 pp.
Kuls, W. (1958) *Beitrage zur Kulturgeographie der südäthiopischen seen-Region* (Frankfurt-am-Main: Kramer).
Kumah, J. K. (1966)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ingdom of Denkyira', *GNQ*, 9, pp. 33–5.
Kup, A. P. (1961a) *A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1400–1787* (London: CUP), 212 pp.
Kup, A. P. (1961b) 'An account of the tribal distribution of Sierra Leone', *Man*, **60**, pp. 116–19.
Kwaule, F. and Chakwera, E. J. (1978) 'Successors to the Kolonga's state: Kanyenda and Dzoole'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Labarthe, P. (1803) *Voyage à la Côte de Guinée* (Paris: Bossange, Masson & Besson), 310 pp.
Labourdonnais, M. de (1937) *Mémoire des Iles de France et de Bourbon*, ed. by A. Lougnon and A. Toussaint (Paris: Ernest Leroux), 203 pp.
Labrecque, E. (1949–51) 'Histoire des Mwata Kazembe, chefs Lunda du Luapala, 1700–1945', *Lovania*, **16**, pp. 9–33; **17**, pp. 21–48; **18**, pp. 18–67.
Laburthe-Tolra, P. (1911/1977) 'Minlaaba: histoire et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chez les Beti du Sud-Cameroun' (3 vols, printed 1977, Lille: Reproduction of theses, University of Lille III).
Laburthe-Tolra, P. (1981) *Les seigneurs de la forêt*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490 pp.
Lacerda e Almeida, F. J. M. de (n.d.) *Travessia da Africa* (Lisbon: Agencia Geral das Colonais), 171 pp.
Lacerda e Almeida, F. J. M. de (1944) *Diarios de Viagem* (Rio de Janeiro: Biblioteca popular Brasileira, vol. 18).
Lacger, L. de (1939) *Ruanda* (Kabgayi); reprinted 1959 (Namur: Grands Lacs), 729 pp.
Lagae, Mgr. C. R. (1926) *Les Azande ou Miam-Miam: l'organisation zande: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magiques: coutumes familiales* (Brussels: Vromant et Cie, Bibliothèque du Congo vol. 18), 224 pp.
Lamb, V. (1975) *West African Weaving* (London: Duckworth).

Lamphear, J. E. (1970) 'The Kamba and the Northern Mrima coast',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75–101.

Lamphear, J. E. (1976)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Jie of Ugand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81 pp.

Lamphear, J. E. (1979) 'When the Ngitome speared their oxen: problems in reconstructing the chronology of the Jie', in J. B. Webster (ed.), 1979a, pp. 263–282.

Lamphear, J. E. (at press)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the central Paranilotes', in J. B. Webster (ed.), at press (a).

Landorein, I. (1910–11) 'Du Tchad au Niger: notice historique', in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la mission Tilho, 1906–1909*, vol 2 (Paris).

Lane-Poole, E. H. (1934) *The Native Tribes of the East Luangwa Province of Northern Rhodesia* (Lusaka: Government Printer).

Lange, D. (1977) *Chronologie et histoire d'un royaume africain*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Lange, W. (at press) *History and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Gonga Peopl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Langlands, B. W. (1966) 'The banana in Uganda, 1860–1920', *UJ*, 30, pp. 39–62.

Langworthy, H. W. (1969a) 'A history of Undi's kingdom to 1890: aspects of Chewa history in East-Central Africa'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Langworthy, H. W. (1969b) 'Sources for Chewa history in East-Central Africa: a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Unpublished copies in University of Boston Library and University of Malawi Library).

Langworthy, H. W. (1969c) 'Understanding Malawi's pre-colonial history', *SMJ*, 23, 1, pp. 28–45.

Langworthy, H. W. (1971) 'Conflicts among rulers in the history of Undi's Chewa kingdom', *TJH*, 1, pp. 1–23.

Langworthy, H. W. (1972) 'Chewa or Maravi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the pre-colonial era', in B. Pachai (ed.), pp. 104–22.

Lapukeni, K., Rashid, P., Kumwembe, N. and Webster, J. B. (1978) 'Amachinga Yao traditions, Vol. I'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wi).

Lara, O. D. (1979) 'Negro resistance to slavery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Africa to Black Americas', (working paper, Meeting of Experts organized by UNESCO 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15th to the 19th century*, Port-au-Prince, Haiti, 31 January–4 February 1978,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 Studies and Documents*, 2 (Paris: UNESCO) pp. 101–14.

Laroui, A. (1970) *L'histoire du Maghreb: un essai de synthèse* (Paris: Maspéro), 390 pp.

Last, M. (1983) 'From sultanate to caliphate: Kano c.1450–1800', in B. M. Barkindo (ed.), pp. 67–91.

Last, M. (forthcoming) 'Historical metaphor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Kano before 1800',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Lavers, J. E. (1971) 'Islam in the Bornu caliphate: a survey', *Odu*, 5, pp. 27–53.

Lavers, J. E. (1980) 'Kanem and Borno to 1808', in O. Ikime (ed.), pp. 187–209.

Lavers, J. E. (1982) 'The trans-Saharan trade before 1800: towards quantification', in H. W. El-Ḥasnāwī (ed.).

Lavers, J. E. (1983)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mains of Hausa Iron Smelting* (Jos: Jos University Press).

Lavers, J. E. (forthcoming) 'Fezzan, a Sudanic or Saharan state?', in M. Adamu (ed.), *Central Sudan Before 1804* (Zaria: ABUP).

Lavers, J. E. (at press) 'Fezzan, a Sudanic or Saharan state?', in M. Adamu (ed.), at press (b).

Lawrence, A. W. (1969) *Fortified Trade-Posts: The English in West Africa, 1645–1822* (London: Jonathan Cape), 237 pp.

Le Barbier, C. (1916–17) 'Notes sur le pays des Bara-Imamono, région d'Ankazoabo', *BAM*, new series, 2, pp. 63–162.

Lee, R. B. (1968) '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 in R. B. Lee and I. De Vore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pp. 30–43.

Lee, R. B. and De Vore, I. (eds) (1976) *Kalahari Hunter-Gatherers: Studies of the Kung San and Their Neighbours* (Cambridge, Mass: HUP), 408 pp.

Lee, R. B. (1979) *The Kung San: Men, Women and Work in a Foraging Society* (Cambridge: CUP), 526 pp.

Lefèbvre, T. (1845–54) *Voyage en Abyssinie* (6 vols, Paris: A. Bertrand).

Legassick, M. (1979) 'The northern frontier to 1820: the emergence of the Griqua people',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Le Gentil (1779–81) *Voyage dans les mers de l'Inde, 1760–1771* (2 vols, Paris).

Legesse, A. (1973) *Gada: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London: The Free Press), 340 pp.

Leguével de Lacombe, B. F. (1840) *Voyage à Madagascar et aux Iles Comores* (2 vols, Paris).

Lehmann, W. P. (196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97 pp.

Leitão, H. (1970) *Os Dois Descobrimentos da Ilha de São Lourenço*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H. Leitão (Lisbon).

Leitão, M. C. Correia (1938) 'Relação breve sumário da viagem que eo, o sargentomor das moradoresdo Dande fiz as remotas partes de Cassange e Olos . . . 15 Agosto 1756' in G. Sousa Dias (ed.), 'Uma viagem a Cassange nos meados do Século XVIII, *BSGL*, 56, pp. 19–25

Lemaire, P. (1695) *Les voyages du Sieur Lemaire aux Iles Canaries, Cap Vert, Sénégal et Gambie* (Paris).

Le Moal, A. (1976) 'Le peuplement du pays bobo; bilan d'une enquête', *Cahiers ORSTOM*, Sciences humaines, 13, 2, pp. 137–42.

Lemprière, G. (1891) *Voyages dans l'Empire du Maroc* (Paris: Tavernier, Legras et Cordier).

Leo Africanus [Jean Léon l'Africain] (1956)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tr. by A. Épaulard, with notes by E. Epaulard, T. Monod, H. Lhote and R. Mauny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Le Roy Ladurie, E. (1978) 'A reply to Professor Brenner', *PP*, 79, pp. 55–9.

Leroy, J. (1967) *Ethiopian Paintings in the Middles Ages*, in G. Gerster (ed.), (London: Phaidon Press Ltd).

Leroy, J., Wright, St. and Jäger, O. A. (1961) *Aethiopien-Budmalereien* (New York).

Leselle, R. (1957) 'Les noirs du Souf', *BLS*, Supplement to Vol. 8, pp. 1–76.

Leslau, W. (1951) *Falasha Anthology: The Black Jews of Ethiopia*, trans. from Ethiopian source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Leslau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22 pp.

Leslau, W. (196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Harar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CP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 240 pp.

Leslau, W. (1979)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Gurage (Ethiopic)* (3 vols, Wiesbaden: Harrasowitz, Otto-Verlag).

Lethem, G. C. (1919) 'Special Report on Nguru district, Bornu Emirate', *SNP*, 10, 258 pp.

Levine, D. N. (1977) *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évi-Provençal, E. (1922) *Les historiens des Chorfa* (Paris: Larose).

Levtzion, N. (1964a) *Chronology from Genealogical Evidence: The Volta Basin* (London: SOAS, Survey on African Chronology).

Levtzion, N. (1964b) *Notes on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Northern Ghana* (London: SOAS, Survey on African Chronology).

Levtzion, N. (1964c) 'Out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Mossi (Wagadugu)', (London: SOAS, Survey on African Chronology).

Levtzion, N. (1968) *Muslims and Chiefs in the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28 pp.

Levtzion, N. (1971a) 'Not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slam militant au Fouta Djalon', *Notes africaines*, October, No. 132, pp. 94–6.

Levtzion, N. (1971b) 'Notes sur les Etats dyula de Kong et de Bobo', *BLLE*, 1, pp. 61–2.

Levtzion, N. (1975) 'North-West Africa: from the Maghrib to the fringes of the forest', in R. Gray (ed.), pp. 192–272.

Lewis, H. S. (1966) 'The origins of the Galla and Somali', *JAH*, 7, 1, pp. 27–47.

Lewis, I. M. (1955) *Peoples of the Horn of Africa: Somalia, Afar and Saho*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North-Eastern Africa, Part I), 204 pp.

Lewis, I. M. (1961) *A Pastoral Democracy: A Study of Pastoralism and Politics Among the Northern Somali of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New York/Toronto: OUP, for the IAI), 320 pp.

Lewis, I. M. (ed.) (1966)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for the IAI), 470 pp.

Lewis, I. M. (ed.) (1968)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A.S. Monographs, No. 7), 307 pp.

Lewis, W. A. (1978)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UP).

Linden, I. (1979) 'Chisumphi theology in the religion of Central Malawi', in M. J. Schoffeleers (ed.), 1979(a), pp. 189–207

Lindgren, N. E. and Schoffeleers, M. J. (1978) *Rock Art and Nyau Symbolism* (Lilongw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Little, K. (1951) *The Mende of Sierra Leo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307 pp.

Littmann, E. (1914) *Die altamharischen Kaiserlieder* (Strasburg).

Lloyd, P. C. (1963) 'The Itsekir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outline social history', *JAH*, 4, 2, pp. 207–31.

Lobato, A. (1954a) *A expansão Portuguesa em Moçambique de 1498 a 1530: Politica da Capitania de Sofala e Moçambique de 1530* (Lisbon: Agencia Geral do Ultramar).

Lobato, A. (1954b) *Evolução administrativa e economica da Moçambique 1753–63. Fundamentos da criacão do Governo Geral em 1752*, vol. 1 (Lisbon: Agencia Geral do Ultramar), 412 pp.

Lobato, A. (1962) *Colonização Senhorial da Zambezia e Outros Estudos*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oes do Ultramar), 228 pp.
Lobo, J. (1728/1928) *Voyage historique d'Abyssinie du R. P. Jérôme Lobo*, ed. & trans by J. Le Grand, 1928 (Paris).
Logan, R. W. (1940) 'Estevanico: Negro discoverer of the Southwest', *Phylon*, 1, 4th quarter.
Lombard, J. (1965) *Structures de type 'féodal' en Afrique noire: étude des dynamismes internes et des relations sociales chez les Bariba du Dahomey* (Paris/The Hague: Mouton), 544 pp.
Lopes, E., see **F. de Pigafetta.**
Lopez, R. S. (1976)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Cambridge: CUP).
Loro, M. (1971)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Kakwa' (Student essay, University of Makerere)
Lougnon, A. (1956) *L'Ile de Bourbon pendant la Régence.*
Lougnon, A. (1958) *Le mouvement maritime aux Iles de Bourbon et de France (1727–35)*
Lougnon, A. and Toussaint, A. (eds) (1937) *Mémoire des Iles de France et de Bourbon* (Paris: Libraire Ernest Leroux), 203 pp.
Lovejoy, P. E. (1973a) 'The Hausa kola trade: a commercial system in the continental exchange of West Afric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ovejoy, P. E. (1973b) 'The Kambari Beriberi: 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ized group of Hausa kola trad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H*, 14, 4, pp. 633–51.
Lovejoy, P. E. (1978) 'The role of the Wangara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JAH*, 19, 2, pp 173–93.
Lovejoy, P. E. (ed.) (1981) *The Ideology of Slavery in Africa* (Beverly Hills, Ca: Sage).
Lovejoy, P. E. (1982) 'The volum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synthesis', *JAH*, 23, 3, pp. 473–501.
Lovejoy, P. E. (1983) *Transformations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Cambridge: CUP), 349 pp.
Lovejoy, P. E. (1985) *Salt of the Desert Sun: A History of Salt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Central Sudan* (Cambridge: CUP), 351 pp.
Lovejoy, P. E. (at press) 'Salt industry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Lucas, S. A. (1968) 'Baluba et Aruund: étude comparative des structures socio-politiques' (PhD thes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Ludolf, H. (1681) *Historia Aethiopica* (Franco Furti-ad-Moenum).
Luna, L. (1968) *O negro na luta contra a escravidao* (Rio de Janeiro: Leitura).
Luttrall, A. (1964) 'Slavery and slaving in the Portuguese Atlantic', in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Africa* (Edinburgh).
Lwamgira, F. X. (1949/1968) *Amakuru ga Kiziba Bukoba* (trans. by E. A. Kamuhangire as *A History of Kiziba*, History Department, Makerere, 1968).
Lwamgira, F. X. (n.d.) *The History of Karagwe, Ihangiro and Kyamatwalo* (unpublished).
Lwanga-Lunyiigo, S. (1972–3) 'The foundation of the Babito kingdom of Khooki' (Makerere Seminar Paper, No. 6).
Ly, A. (1958) *La compagnie du Sénégal de 1673 à 1686* (Paris: PA), 316 pp
Ly, A. (1977) 'L'épopée de Samba Guela Diegui' (PhD thesis, Dakar).

Macedo, G. (1890) 'Informação do Padre Frei Gaspar Macedo', in *Memoria e Documentoa Acerca dos Direitos de Portugal Aos Territorios de Machona e Nyassa 1890*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pp. 147–51.
MacGaffey, W. (1975) 'Oral tradition in Central Africa', *IJAHS*, 7, 3, pp 421–36.
Mack, J. and Robertshaw, P. (eds) (1982) *Culture History in the Southern Sudan: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Ethnohistory* (Nairobi: BIEA, Memoir No. 8), 179 pp.
McKay, W. F. (1975) 'A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Kenya coast'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303 pp.
Mackenzie, J. M. (1975) 'Pre-colonial industry: the Nyanja and iron trade', *NADA*, 2, 2, pp. 200–220.
MacMichael, H. A. (1922) *A History of the Arabs in the Sudan* (2 vols, Cambridge: CUP).
Madiega, G. Y. (1978) 'Le Nord-Gulma précolonial (Haute-Volta): origine des dynasties, approche de la société'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Madiega, G. Y. (1982)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précoloniale du Gurma (Haute-Volta)*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Magarshack, D. (1969) *Pushkin* (New York: Grove Press).
Mage, E. (1868) *Voyage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1863–1866)* (Paris: Hachette). (New edn by Karthala, 1980, Frobenius Institute).

Magnes, B. (1953) 'Essai sur les institutions et la coutume des Taimihety', *BM*, 89, (October), pp. 1–95.
Mahadi, A. (forthcoming)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arauta (kinship) system in the Central Sudan before 1804',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Mahoney, F. and Idowu, H. O. (1965) 'The peoples of Senegambia', in J. F. A. Ajayi and I. Espie (eds), pp. 131–43.
Maïkassoua, I. (1982) 'Some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Gobir migrant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ighbouring communiti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mimeograph).
Majumdar, R. C. (1951)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Bombay: Bhasatiya Vidya Bhavan).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Ali (before 1442) *Macrizi historia regum islamiticorum in Abyssinia una cum Abulfeda descriptione regionum nigritarum*, 1790 ed. and Latin transl. F. T. Rinck (Leiden: Luchtmans).
Malandra, A. (1947/1971) *Tekwaro Acholi* (Nairobi: Longman), trans. 1971 by C. A. R. Oywa as *Acholi Traditions* (Makerere: Department of History).
Malevanov, N. (1974) 'Praded Poets' (The Poet's Great-Grandfather), *Zvezda*, pp. 156–65.
Maley, J. (1981) 'Etudes palynologiques dans le bassin du Tchad et paléoclimatologie de l'Afrique nord-tropicale de 30 000 ans à l'époque actuelle', *TD*, vol 129 (Paris: ORSTOM).
Malotet, A. (1898) *Etienne de Flacourt ou les origines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à Madagascar, 1648–1661* (Paris).
Malowist, M. (1966)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of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Middle Ages', *PP*, 33, (April), pp. 3–15.
Malowist, M. (1969) *Western Europe and West Afric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Warsaw).
Malzac, V. (1912/1930) *Histoire du royaume Hova depuis ses origines jusqu'à sa fin* (Antananarivo: Imprimerie catholique). (Reprinted 1930).
Mamattah, C. M. K. (1976) *The Ewes of West Africa; Oral Traditions*, vol. 1 (Accra: Volta Research Publications), 768 pp.
Mamelomana, E. (n.d.) *Les Mahafaly*, (typescript, probably written in the 1940s, in the Bibliothèque Charles Poirier, University of Madagascar).
Mandala, E. C.. (1977) 'The Kololo interlude in Southern Malawi, 1861–1895',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wi).
Mané, M. (1978)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Kaabu,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BIFAN*, 40, 1, pp. 87–159.
Manning, P. (1981) 'The enslavement of Africans: a demographic model', *CJAS*, 15, 3, pp. 499–526.
Manning, P., Austen, R. A. and van Dantzig, A. (1980) Reviews of *Der atlantische Sklavenhandel von Dahomey (1740–1797)*, *AEH*, 9, pp. 131–9.
Manning, P., Caldwell, J. C. and Inikori, J. E. (1982) 'Discussion', *CJAS*, 16, 1, pp. 127–39.
Mannix, D. P. (1963) *Black Cargoes: A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518–1865* (London: Longman), 306 pp.
Maquet, J. J. (1954) *Le système des relations sociales dans le Ruanda ancien* (Tervuren: MRAC), 221 pp.
Marchand (1901) 'Les habitants de la province de Farafangana', *RM*, 3, pp. 481–91.
Marees, P. de (1602/1605/1905) *A Description and Historical Declaration of the Golden Kingdom of Guinea*, abridged English trans. of 1602 Dutch original, published in S. Purchas (1613/1905), vol. 6, pp. 247–396; French trans. 1605, *Description et récit historique du riche royaume d'or de Guinée* (Amsterdam: Claessen).
Maret, P. de (1981) 'L'évolution monétaire du Shaba central entre le VIIe et le XVIIIe siècle', *AEH*, 10, pp. 117–49.
Maret, P. de, Van Noten, F. and Cahen, D. (1977) 'Radiocarbon dates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 a synthesis', *JAH*, 18, 4, pp. 481–505.
Marion M. A. (1971) 'Notes sur l'art funéraire Mahafaly et Antandroy', *BM*, 21, pp. 463–76.
Martin, A. G. P. (1908) *A la frontière du Maroc: les oasis sahariennes (Gourada-Touat-Tidikelt)* (Algiers: Imprimerie algérienne), vol.1, 406 pp.
Martin, B. G. (1969) 'Kanem, Bornu and the Fezza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trade route', *JAH*, 10, 1, pp. 15–27.
Martin, B. G. (1971) 'Notes on some members of the learned classes of Zanzibar and East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HS*, 4, 3, pp. 525–45.

Martin, B. G. (1972) 'Mai Idris of Bornu and the Ottoman Turks, 1576–78', *IJMS*, 3, 1, pp. 470–90.
Martin, E. B. (1973) *The History of Malindi: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an East African Coastal Town from the Portuguese Period to the Present* (Nairobi: EALB), 301 pp.
Martin, G. (1948) *Histoire de l'esclavage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Paris: PUF), 318 pp.
Martin, P. (1970) 'The trade of Loango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139–61.
Martin, P. M. (1972) *The External Trade of the Loango Coast, 1576–1870: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on the Vili Kingdom of Loan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193 pp.
Marty, P. (1927) *Les Chroniques de Oualata et de Nema* (Paris: Geuthner).
Marty, P. (1920–1) *Etudes sur l'Islam et les tribus du Soudan* (4 vols, Paris: E. Leroux, Collection de la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No.4).
Marwick, M. G. (1963) 'History and tradition in East-Central Africa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Northern Rhodesian Cewa', *JAH*, 4, 3, pp. 375–90.
Mathew, G. (1963) 'The East African coast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94–128.
Mathews, T. I. (1981) 'Portuguese, Chikunda and peoples of the Gwembe valley', *JAH*, 22, 1, pp. 23–42.
Maugham, R. C. F. (1910) *Zambezia: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Zambezi River From its Delta to the River Aruangwa, with its History, Agriculture, Flora, Fauna and Ethn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408 pp.
Mauny, R. (1970) 'Les navigations anciennes et les grandes découvertes', in H. Deschamps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vol. 1, Part II, pp. 203–18.
Mauny, R. (1971) *Les siècles obscur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Fayard), 314 pp.
Mauny, R., Thomas, L. V and Vansina, J. (eds) (1974)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for the IAI), 428 pp.
Mauro, F. (1960) *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 siècle, 1570–1670* (Paris: SEVPEN).
Maxwell, R. (1932) 'The law relating to slavery among the Malays', *JMBRAS*, 10, 1, pp. 247–97.
Mayeur, N. (1912) 'Voyage à la côte de l'ouest de Madagascar (pays des Sadaves), 1774', *BAM*, 10, pp. 49–91.
M'Bokolo, E. (1983) 'Histoire des maladies, histoire et maladie: l'Afrique', in M. Augé and S. Herzlich (eds), *Le sens du mal* (Paris: E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M'Bokolo, E. (1981) *Noirs et blancs en Afrique équatoriale: les sociétés côtières et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Paris/The Hague: Mouton,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No. 69), 302 pp.
Mbwiliza, J. F. (1981) 'The hoe and the stick: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eru kingdom', *CCB*, pp. 100–16.
McCulloch, M., Littlewood, M. and Dugast, I. (1954) *Peoples of the Central Cameroons*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Western Africa, Part IX), 172 pp.
McDougall, E. A. (1980) 'The Ijil salt industry: its roles in the pre-colonial economy of the Western Suda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cIntosh, B. G. (ed.) (1969) *Ngano: Studies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181 pp.
McIntosh, R. J. and Keech-McIntosh, S. (1982) 'The field season at Jenne-Jeno: preliminary results', *Nyame Akuma*, 20, pp. 28–32.
McLachlan, J. O. (1940) *Trade and Peace with Old Spain, 1667–1750: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e on Anglo-Spanish Diplomac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UP).
McLeod, M. D. (1981) *The Asant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Mdoumbe-Moulongo, M. (1968) 'Origines et migrations des Duala', *Abbia*, 20, (June), pp. 79–150.
Meek, R. L. (1976)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UP, Cambri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Politics), 249 pp.
Meillassoux, C. (ed.)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for the IAI), 444 pp.
Meillassoux, C. (ed.) (1975)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F. Maspéro), 582 pp.
Meillassoux, C. (1982) 'The role of slavery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Sahelo-Sudanic Africa', in J. E. Inikori (ed.), pp. 74–99.
Meillet, A. (1925) *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Oslo).
Mellafe, R. (1964) *La esclavitud en Hispanoameric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Mellafe, R. (1975) *Negro Slavery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CA: UCP), 172 pp.
Méo, Dr (1919) 'Etudes sur le Rio Nuñez', *BCAF*, pp. 282–381.

Mercer, P. (1971) 'The Shilluk trade and politics from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o 1861', *JAH*, **12**, 3, pp. 407–26.
Merensky, A. (1883) 'Ueber die Afrikanische Volkerwanderung des 16 Jahrhunderts',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pp. 67–75.
Merrick, T. W. and Graham, D. H. (1979)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 1800 to the presen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eschi, L. (1974) 'Evolution des structures foncières au Rwanda: le cas d'un lignage hutu', *CEA*, **53**, pp. 39–51.
Metcalfe, G. E. (1964) *Great Britain and Ghana: Documents of Ghana History, 1807–1957* (London: Thomas Nelson and Sons), 779 pp.
Mettas, J. (1978) *Répertoire des expéditions négrières françaises au XVIIIe siècle*, ed. by S. Daget (Nantes).
Meyer, H. (1916) *Die Barundi* (Leipzig: O. Spamer), 206 pp.
Mézières, B. de (1912) *Le Major A. Gordon Laing, Tombouctou, 1826* (Paris: Larose).
Mgomezulu, G. Y. (1981) 'Rec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radio-carbon dates from Eastern Africa', *JAH*, **22**, 4, pp. 435–56.
Michel, L. (1957) 'Moeurs et coutumes des Bara', *MAM*, **40**.
Miers, S. and Kopytoff, I. (eds) (1977)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WP), 474 pp.
Miles, S. B. (1919) *The Countries and Tribes of the Persian Gulf* (2 vols, London: Frank Cass).
Miller, J. C. (1972a) 'A note on Casanze and the Portuguese', *CJAS*, **6**, pp. 45–56.
Miller, J. C. (1972b) 'The Imbangala and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JAH*, **13**, 4, pp. 549–74.
Miller, J. C. (1973) 'Requiem for the Jaga', *CEA*, **49**, pp. 121–49. (See also *CEA*, **69** and **70**).
Miller, J. C. (1975a) 'Nzinga of Matamba in a New Perspective', *JAH*, **13**, pp. 201–16.
Miller, J. C. (1975b) 'Legal Portuguese slaving from Angola: Some preliminary indications of volume and direction, 1760–1830', *RFHOM*, **62**, pp. 135–76.
Miller, J. C. (1976)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312 pp.
Miller, J. C. (1979) 'Some aspects of th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of slaving at Luanda, Angola, 1760–1830', in H. A. Gemery and J. S. Hogendorn (eds), pp. 77–106.
Miller, J. C. (ed.) (1980) *The African Past Speaks: Essays on Oral Tradition and History* (London: Hamden, Dawson & Archon), 284 pp.
Miller, J. C. (1982) 'The significance of drought, disease and famine in the agriculturally marginal zones of West Central Africa', *JAH*, **23**, pp. 17–61.
Miller, J. C. (1983) 'The paradoxes of impoverishment in the Atlantic zone', in D. Birmingham and D. Martin (eds), pp. 118–59.
Miller, J. C. (1984) 'The accounts of Antonio Coelho Guerreiro (1684–1692)', *IJAHS*, **17**, pp 1–56.
Miller, J. C., 'Thanatopsis', *CEA*, pp. 229–31.
Minchinton, W. E. (ed.) (1969)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ondon: Methuen).
Misomali, R. B., Mkondiwa, G. and Bhila, H. K. (1978) 'Yao traditions, Vol. III',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wi).
Mkandawire, F. R. (1978) 'The corridor in Tumbuka and Chewa history: th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Kabunduli, 1650–1860',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Modzalevskii, B. (1907) *Rodoslavnia Gannibalov* (Genealogy of the Hannibals) (Moscow: Yakovlev Press).
Moeller, A. (1936) *Les grandes lignes des migrations des Bantous de la province orientale du Congo belge*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belge, Section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Mémoires, vol. 6), 578 pp.
Mokhtar, G. (ed.) (1981)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II: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Africa* (Paris/London/Berkeley: UNESCO/Heineman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ndain, G. (1910) *L'histoire des tribus de l'Imoro au XVIIe siècle d'après un manuscrit arabico-malgache* (Paris: Ernest Leroux).
Monteil, C. (1903) *Monographie de Djenné* (Tulle: Imprimerie J. Mazeyrie).
Monteil, C. (1915) *Les Khassonké* (Paris: Leroux), 528 pp. (reprinted, 1974).
Monteil, C. (1924) *Les Bambara de Ségou et du Kaarta* (Paris: Larose), 404 pp; 2nd edn, 1977 (Paris: Maisonneuve), 441 pp.
Monteil, C. (1932) *Une cité soudanaise, Djenné, métropole du delta central du Niger* (Paris: Société d'étude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2nd edn, 1971 (Paris: Anthropos).
Monti della Corte (1945) *I Castelli di Gondar* (Rome).

Morgan, W. T. W. (ed.) (1969) *East Africa: Its People and Resources* (Nairobi: OUP, in association with D. A. Hawkins), 312 pp.
Morris, A. (1981) *Latin Americ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London: Hutchinson), 256 pp.
Mors, O. (1957) *Geschichte der Bahaya* (Fribourg: Anthropos), 207 pp.
Mortimore, M. J. (ed.) (1970) *Zaria And Its Region*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Occasional Paper No. 4), 192 pp.
Morton, R. F. (1972) 'The Shungwaya myth of Miji Kenda origins: a problem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astal history', *IJAHS*, 5, pp. 397–423.
Moura, C. (1959) *Rebelioes da Senzala: quilombos, insurreicoes, guerrilhas* (São Paulo: Editora Zombi) 1972 edn (Rio de Janeiro: Conquista).
Mphande, C. Z. (1969)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Tonga to 1934'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Mpoyi, L. M. (1966) *Histoire wa Baluba* (Mbuyi-Mayi).
Msiska, H. K. (1978a) 'Established on iron and undermined by ivory: the cre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Mwaphoka kingdom, c.1380–c.1810'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Msika, H. K. (1978b) 'Phoka historical texts'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unpublished).
Mudenge, S. I. (1972) 'The Rozvi empire and the feira of Zumbo'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Mudenge, S. I. (1974a) 'An identification of the Rozvi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Karanga', *RH*, 5, pp. 19–31.
Mudenge, S. I. (1974b) 'The role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Rozvi empire: a reappraisal', *JAH*, 15, 3, pp. 373–91.
Mudenge, S. I. (1976) 'The Dominicans at Zumbo: an aspect of missionary history in the Zambezi valley, c. 1726–1836', *Mohlomi*, 1, pp. 32–63.
Mudenge, S. I. (1977) 'Eighteenth-century Portuguese settlements on the Zambezi and the dating of the Rhodesian ruin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reference dating', *IJAHS*, 10, 3, pp. 1–13.
Murdock, J. P. (1959)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456 pp.
Muriuki, G. (1974) *A History of the Kikuyu, 1500–1900* (Nairobi: OUP), 190 pp.
Murray, S. S. (comp.) (1922) *A Handbook of Nyasaland*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Nyasaland by the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Musambachime, M. (1976) 'Changing rol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disintegration of Nkuba's Shila State to 1740'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Mutetwa, R. G. (1976)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Duma people of south-eastern Rhodesia from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to 1945'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Rhodesia).
Mutumba, M. (1973) *Bulozi under the Luyana King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State-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Zambia* (London: Longman), 278 pp.
Mwaipape, R. J. (1982) 'History and social customs of the Ngonde of northern Malawi'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wanzi, H. A. (1973) 'Politics and religion among the Nandi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irobi University).
Mwanzi, H. A. (1977) *A History of the Kipsigis* (Nairobi: EALB), 171 pp.
Mworoha, E. (1977) *Peuples et rois de l'Afrique des lacs* (Dakar: NEA), 352 pp.
Mworoha, E. (1981) 'Redevances et prestations dans les domaines royaux du Burundi précolonial', *Mélanges R. Mauny.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2000 ans d'histoire africaine* (Paris: SFHOM), pp. 751–68.

Nacanabo, D. (1982) 'Le Royaume maagha de Yoko'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I).
Nachtigal, G. (1874) 'Zur Geschichte Bagirmis',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Berlin: D. Reimer).
Nachtigal, G. (1876) *Le voyage de Nachtigal au Ouadai: Traduction de Van Vollenhoven* (Paris).
Nachtigal, G. (1879/1881/1971–4) *Sahara und Sudan: Ergebnisse Sechsjähriger Reisen in Afrika*, Vol. 1 (Berlin: Weidmann), 749 pp.; Vol. 2 (Berlin: Weidmann), 790 pp.; Vol. 3 (Leipzig: F. A. Brockhaus), 548 pp.; 1881, French trans., *Sahara et Soudan*, by J. Gourdault (Paris: Hachette); 1967 complete reprint (Graz: Akademie Drüker); 1971, 1974, Engl. trans., *Sahara and Sudan*, by A. G. B. Fisher and H. J. Fisher of Vol. 1, Fezzan and Tibesti, and Vol. 3, Wadai and Darfur (London: C. Hurst).
Na-Dama, G. (1977)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a Hausa state: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Zamfara'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Nahimana, F. (1981) 'Les principautés hutu du Rwanda septentrional', *CCB*, pp. 115–37.

Nalder, L. F. (ed.) (1937) *A Tribal Survey of Mongala Province* (London: OUP), 232 pp.
al-Naqar, U. (1972) *The Pilgrimage Tradition in West Africa* (Khartoum: KUP).
Nāṣir, A. (1977) *Al-Inkishafi: Catechism of a Soul*, trans. and annotated by J. de Vere Allen (Nairobi: EALB).
al-Nāṣirī, A. (1954–6) *Kitāb al-Istiḳṣā' li-akhbār al-Maghrib al-Aḳṣā* (9 vols, Casablanca); also (Cairo) 1894; see also French trans. 'Part 1: Les Saadiens', *Archives marocaines*, 34.
Ndikuriyo, A. (1975) 'Contrats de bétail, contrats de clientèle et pouvoir politique dans le Bututsi du 19e siècle', *EHA*, 7, pp. 59–76.
Ndoricimpa, L. (ed.) (1984) *L'arbre mémoire. Traditions orales du Burundi* (Paris/Bujumbura: Editions Karthala/Centre de Civilisation Burundaise).
N'dua, S. K. (1973) 'Mwant Yaav Mushid (1856–1907)', *EHA*, 5, pp. 25–50.
N'dua, S. K. (1978) 'Histoire ancienne des populations Luba et Lunda du Plateau du Haut Lubilashi' (PhD thesis, Lubumbashi Campus).
Neumark, S. D. (1957)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Stanford: SUP), 96 pp.
Newbury, C. W. (1976)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a century of clientship in Kinyaga, Rwand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Newbury, D. S. (1978) 'Bushi and the historians: historiographical themes in Eastern Kivu', *HA*, 5, pp. 131–51.
Newbury, D. S. (1979) 'Kings and clans: state formation in Ijwi island (Zaire), c.1780–184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Newbury, D. S. (1980) 'Lake Kivu regional trade in the XIXth century', *JA*, 50, 2, 2, pp. 6–30.
Newbury, D. S. (1981) 'The clans of Rwanda: a historical hypothesis', *CCB*, pp. 186–97.
Newitt, M. D. D. (1973) *Portuguese Settlement on the Zambezi: Exploration, Land Tenure and Colonial Rule in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434 pp.
Newitt, M. D. D. (1982)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aravi', *JAH*, 23, 2, pp. 145–62.
Nganwa, K. N. (1948) *Abakozire Eby'Okutangaaza Omuri Ankole* (Nairobi: EALB).
Ngoa, H. (1969) 'Situation historico-généalogique des Ewondo: étude critique', *Abbia*, 22, May–August, pp. 65–88.
Ngoa, H. (1981) *Tentative de reconstitution de l'histoire récente des Ewondo*.
Ngoie Ngalla D. (1978) 'Réflexions sur le peuplement de la vallée du Niari par les Kongo', *CCAH*, 2, pp. 13–25.
Ngoie Ngalla, D. (1982) 'Les rapports politiques du royaume de Loango et de la vallée du Niari, d'après les textes et la tradition orale (XVIe–XIXe siècles)', *CCAH*, 7, pp. 25–32.
Niane, D. T. (1975a) *Recherches sur l'empire du Mali au Moyen-Age* (Paris: PA).
Niane, D. T. (1975b) *Le Soudan occidental au temps des grands empires, XIe–XVIe siècles* (Paris: PA).
Niane, D. T. (ed.) (1984)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IV. 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Paris/London/Berkeley: UNESCO/Heineman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iane, D. T. and Wondji, C. *Enquêtes orales faites en Côte d'Ivoire (1973–1980) et en Guinée (1966–1970)*.
Nicholson, S. E. (1978) 'Climatic variations in the Sahel and other African regions during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JAE*, 1.
Nicholson, S. E. (1979)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climate re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frica', *JAH*, 20, 1, pp. 31–49.
Nicolas, G. (1975) *Dynamique sociale et appréhension du monde au sein d'une société hausa*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thnologie, No. 78), 661 pp.
Nicolas, G. (forthcoming) 'The question of Gobir', in M. Adamu (ed.), at press(a).
Nkhoma, J. B. C. (1978) 'Immigrant politics and the Mankhambira paramountcy, c.1720–1820' (student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Nkurikiyimfura, J. N. (1983) 'Généalogies, chronologie et sources orales au Rwanda' (PhD thesis, Paris).
North, D. C. (1961)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304 pp.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1970)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HR*, 2nd series, 22, 1, pp. 1–17.
North, D. C. and Thomas, R. P.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UP).
North-Coombes, A. (1937) *The Evolution of Sugarcane Culture in Mauritius* (Port Louis, Mauritius: General Printing).

Northrup, D. (1978) *Trade Without Rulers: Precolon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ern Niger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69 pp.

Nsanze, A. (1980) *Un domaine royal au Burundi: Mbuye (env. 1850–1945)* (Paris: SFHOM), 93 pp.

Nsimbi, M. B. (1956) *Amannya Amaganda N'Emnono Zaago* (Kiganda names and their origins) (Nairobi: EALB).

Nthara, S. J. (1968) *Mbiri ya Achewa* (Blantyre: Hetherwick Press); (earlier edn, 1948).

Nukunya, C. K. (1969) *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Ewe* (London: Athlone Press).

Nurse, G. T. (1977) 'The people of Bororo: a lexicostatistical enquiry', in B. Pachai (ed.), pp. 123–35.

Nyakatura, J. W. (1947/1973) *Abakama ba Bunyoro-Kitara*; 1974 trans. by T. Muganwa and ed. by G. N. Uzoigwe as *Anatomy of an African Kingdom* (New York: Nok Publishers Ltd.), 282 pp.

Nyakatura, J. W. (1971) *Aspects of Bunyoro Customs and Traditions* (Nairobi: EALB), 117 pp.

Nziziwe, I. (1972) *Studies in Ibo Political Systems: Chieftaincy and Politics in Four Niger States* (London: Frank Cass), 287 pp.

Obayemi, A. (1976) 'The Yoruba and Edo-speaking peoples and their neighbours before 16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2nd edn, pp. 196–263.

Obenga, T. (1969) 'Le royaume de Kongo', *Africa*, 24, pp. 323–48.

Obenga, T. (1970) 'Le Kikongo, fondement de l'unité culturelle', *Africa*, 25, pp. 131–55.

Obenga, T. (1976) *La cuvette congolaise: Les hommes et les structures* (Paris: PA).

Obenga, T. (1979) 'Habillement, cosmétique et parure au royaume de Kongo, (XVe-XVIIIe siècles)', *CCAH*, 4, pp. 21–38.

Obenga, T. (1981) 'Instruments de musique au royaume de Kongo, (XVIe-XVIIIe siècles)', *CCAH*, 6, pp. 39–56.

Ocamali, T. J. (1970) 'A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highland Alur' (graduating essay, Makerere).

Ochieng', W. R. (1970) 'Walowa – The ironworkers of East Africa', *Target*, March.

Ochieng', W. R. (1974a) *A Pre-Colonial History of the Gusii of Western Kenya, 1500–1914* (Nairobi: EALB), 257 pp.

Ochieng', W. R. (1975b) *An Outline History of Nyanza up to 1914* (Nairobi: EALB), 104 pp.

Ochieng', W. R. (1975a) *The First Word* (Nairobi: EALB), 195 pp.

Ochieng', W. R. (1975b) *Eastern Kenya and its Invaders* (Nairobi: EALB), 104 pp.

Ochieng', W. R. (1975c) *A History of the Kadimo Chiefdom of Yimbo in Western Kenya* (Nairobi: EALB), 78 pp.

Ochieng', W. R. (1975d) 'Undercivilization in Black Africa', in W. R. Ochieng' (ed.), 1975a, pp. 1–20.

Ochieng', W. R. (1976)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Bantu settlement into a Luo Ruothdom', in B.A. Ogot (ed.), 1976a, pp. 44–64.

Ochieng', W. R. (1977) *The Second Word: More Essays on Kenya History* (Nairobi: KLB).

Odyomo, P. (at press) 'Consensus and leadership in the Alido confederacy in nineteenth-century Lango', in D. Denoon (ed.).

O'Fahey, R. S. (1970)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Keeraa Sultanate of Dār Fūr'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O'Fahey, R. S. (1970) *Stat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Sudan* (Khartoum: Sudan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Khartoum, African Studies Seminar Paper, No. 9).

O'Fahey, R. S. (1971) 'Religion and trade in the Kayra Sultanate of Dār Fūr', in Y. F. Hasan (ed.), *Sudan in Africa* (Khartoum: KUP), pp. 87–97.

O'Fahey, R. S. (1980) *State and Society in Dār Fūr* (London: Hurst).

O'Fahey, R. S. and Spaulding, J. L. (1974) *The Kingdoms of the Sudan* (London: Methuen), 235 pp.

Ogot, B. A. (1963)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central Nyanza district of Kenya', *JAH*, 4, 2, pp. 249–73.

Ogot, B. A. (1967)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uo, Vol. 1: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500–1900* (Nairobi: EAPH), 250 pp.

Ogot, B. A. (ed.) (1974) *Zamani* (Nairobi: EAPH and Longman), 407 pp.

Ogot, B. A. (ed.) (1976a) *History and Social Change in East Africa* (Nairobi: EALB), 235 pp.

Ogot, B. A. (ed.) (1976b) *Keny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291 pp.

Ogot, B. A. and Kieran, J. A. (1971)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a new edition of B. A. Ogot (ed.), 1974, 407 pp.

Ogwal, R. (1969) *History of Lango Clans*, trans. by J. A. Otima and W. Okot-Chono (Makerere: History Department).

Okalany, D. H. (at press) 'The Iteso migration and developing institutions',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1.

Okech, L. (1953) *Tekwaro ki ker Lobo Acholi* (Kampala: EALB); 1968 trans. by J. Nycko, *History and Chieftaincy Records of the Land of the Acholi People* (Makerere: History Department).
Oliver, R. (ed.) (1977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From c.1050 to c.1600* (Cambridge: CUP), 803 pp.
Oliver, R. (1977b) 'The East African interior', in R. Oliver (ed.), pp. 621–69.
Oliver, R. (1982) 'The Nilotic contribution to Bantu Africa', *JAH*, **23**, pp. 433–42.
Oliver, R. and Fage, J. D. (1962)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2nd edn 1970 (Harmondsworth: Penguin).
Oliver, R. and Mathew, G. (eds) (1963)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500 pp.
Oloo, P. C. (1969) 'History of settlement: the example of Luo clans of Alego: 1500–1918' (undergraduate dissertation, Nairobi University).
Onyango-ka-Odongo and Webster, J. B. (eds) (1976) *The Central Luo during the Aconya* (Nairobi: EALB).
Orhanlu, C. (1969) 'Osmani-Bornu Munasebetine al belger', *Tarikh Dergisi*, **23**, trans. by S. E. Brown as 'Documents relating to Ottoman-Borno relations'.
Orhanlu, C. (1974) *Osmanlı Imparatorlugu'num güney si yaseti Habes eyalatı* (Istanbul: University of Istanbul).
Ortiz, F. (1916) *Hampa afro-cubana: los negros esclavos* (Havana: Revista Bimestre Cubana).
Otima, J. A. (at press) 'The Atek of Oumolao in Aputi',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1.
Ott, T. O. (1973) *The Haitian Revolution* (Knoxville: UTP), 232 pp.
Ozanne, P. (1962) '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ic archaeology of Accra', *THSG*, 6, pp. 51–70.

Pachai, B. (ed.) (1972) *The Early History of Malawi* (London: Longman), 454 pp.
Pachai, B. (1973) *Malawi: A History of the Nation* (London: Longman), 324 pp.
Pacheco Pereira, D. (1937)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1506–1508*, trans. and ed. by G. H. T. Kimble (London: Hakluyt Society, 2nd series, vol. 79), 193 pp.
Pageard, R. (1957) *Notes sur l'histoire des Bambara de Ségou* (Paris).
Pageard, R. (1963) *Civilisation mossi et Egypte ancienne* (Geneva: Institut africain).
Pageard, R. (1969) *Le Droit privé des Mossi – Traditions et révolution*, vols 1 and 2 (Paris/Ouagadougou: CNRS/CVRS).
Pagès, A. (1933) *Au Rwanda, sur les bords du lac Kivu: Un royaume hamite au centre de l'Afrique*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703 pp.
Pais, P. (1945–6) *Historia da Etiopia* (Porto: Libraria Civilização), 3 vols.
Palmer, C. A. (1976) *Slaves of the White God: Blacks in Mexico, 1570–1650* (Cambridge, Mass: HUP), 234 pp.
Palmer, H. R. (1936) *The Bornu, Sahara and Sudan*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y Press), 296 pp.
Palmer, H. R. (1967) *Sudanese Memoirs* (London: Frank Cass), 373 pp.
Palmer, R. and Parsons, N. (eds) (1977) *The Roots of Rural Povert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anikkar, K. M. (1945)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London: Allen & Unwin), 109 pp.
Papstein, R. J. (1978) 'The Upper Zambezi: a history of the Luvale people, 1000–190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aris, F. (ed.) (1984) 'La région d'In Gall-Tegi-en-Tesemt (Niger) III: Les sépultures du néolithique final à l'Islam', *EN*, vol **50**, 233 pp.
Park, M. (1799)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Districts of Africa. . . . in the years 1795, 1796 and 1797* (London: G & W. Nicol).
Parrinder, E. G. (1967) *The Story of Ketu* (Ibadan: IUP)
Patterson, K. D. (1975) *The Northern Gabon Coast to 18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67 pp.
Paulitschke, P. V. (1888) *Harar* (Leipzig: Brockhaus).
Peires, J. B. (1981) *The House of Phalo: A History of the Xhosa People in the Days of their Independence* (Johannesburg: Raven Press).
Pélissier, P. (1966) *Les paysans du Sénégal: les civilisations agraires du Cayor à la Casamance* (Saint-Yrieix, Haute-Vienne: Imprimerie Fabrègue), 941 pp.
Pellegrini, V. (1963/1972) *Acoli Macon* (Gulu); trans. by C. Okeng as *A History of the Acholi* (History Department, Makerere University)
Perchonock, N. (forthcoming) 'The territorial principle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Kasar Hausa before 1500',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Perlman, M. L. (1970) 'The traditional systems of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 Ganda and the Nyoro of Uganda', in A. Tuden and Plotnicov (e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pp. 125–62.

Perrot, C. H. (1970) 'L'histoire dans les royaumes Agni de l'est de la Côte d'Ivoire', *AESC*, 25, 6, pp. 1659–77.
Perrot, C. H. (1974) 'Anu Asemã: mythe et histoire', *JAH*, 15, 2, pp. 199–222.
Perrot, C. H. (1982) *Les Anyi-Ndenye et le pouvoir politiqu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Abidjan/Paris: CEDA).
Perruchon, J. (1893) *Les Chroniques de Zar'a yâ'eqôb et Ba'eda Mâryâm, rois d'Ethiopie de 1434 à 1478* (Paris: Bouillon).
Perruchon, J. (1894) 'Règne de Galâdêwos ou Aṣnaf Sagad', *RS*, 2, pp. 154–166 and 263–270.
Perruchon, J. (1896) 'Règne de Minas ou Admas Sagad. Règne de Sarṣa Dengel ou Malak Sagad. Règnes de Ya'qob et Za Dengel', *RS*, 4, pp. 87–90.
Perruchon, J. (1897) 'Règne de Susenyos ou Selṭtan Sagad', *RS*, 5, pp. 173–89.
Perruchon, J. (1897–8) 'Règne de Fasiladas ou Alam Sagad', *RS*, 5, pp. 360–72; and 6, pp. 84–92.
Perruchon, J. (1901) 'Règne de Iyassu Ier', *RS*, 9, pp. 71–8, 161–7 and 258–62.
Perry, A. (1923) 'Abram Hannibal, the favourite of Peter the Great', *JNH*, 8, 4, pp. 359–66.
Person, Y. (1961) 'Les Kissi et leurs statuettes de pierre', *BIFAN*, 23, Series B, vol 1, pp. 1–59.
Person, Y. (1964) 'En quête d'une chronologie ivoirienne', in J. Vansina, R. Mauny and L. V. Thomas (eds),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Oxford: OUP), pp. 322–38.
Person, Y. (1970) 'Le Soudan nigérien et la Guinée occidentale', in H. Deschamps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vol 1, (Paris: PUF), pp. 271–304.
Person, Y. (1971) 'Ethnic movements and acculturation in Upper Guin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AHS*, 4, 3, pp. 669–89.
Person, Y. (1972) *The Dyula and the Manding World* (London: SOAS,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duplicated).
Person, Y. (1974a) 'La Sénégambie dans l'histoire', in R. C. Bridges (ed.), '*Senegambia: Proceedings of a Colloquium at th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African Studies Group*', pp. 1–32.
Person, Y. (1974b) 'The Atlantic coast and the southern savannahs, 1800–188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2, pp. 262–307.
Person, Y. (1981) 'Nyaani Mansa Mamadu et la fin de l'empire du Mali', in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 Mauny*.
Pescatello, A. M. (1972)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Portuguese India', *JAH*, 2, 1, pp. 26–48.
Petterson, J. C. (1920) *Special Report on Uje District, Bornu Province* (Kaduna, Nigeria: National Archives, SNP), 69 pp.
Peukert, W. (1978) *Der atlantische sklaventandel von Dahomey (1740–1797)* (Wiesbaden: Steiner), 412 pp.
Phillipson, D. W. (1974) 'Iron Ag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Zambia', *JAH*, 15, 1, pp. 1–25.
Phillipson, D. W. (1977)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323 pp.
Phimister, I. R. (1974) 'Ancient mining near Great Zimbabwe', *JIMM*, 74, pp. 233–7.
Phimister, I. R. (1976) 'Pre-colonial gold mining in Southern Zambezia: a reassessment', *ASR*, 21, June, pp. 1–30.
Phiri, K. M. (1975a) 'Chewa history in Central Malawi and the use of oral tradition, 1600–1920'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iri, K. M. (1975b) 'Chewa history fieldnotes' (unpublished, copies available 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ibrary and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wi).
Phiri, K. M. (1976) 'Pre-colonial economic change in Central Malawi, 1750–1875', *MJSS*, 5, pp. 15–27.
Phiri, K. M. (1977) 'The Maravi state system and Chewa political development about 1850' (History Teachers' Conference, Chancellor College, August), p. 9.
Phiri, K. M. (1980)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Southern Malawi: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MJSS*, 8, pp. 28–46.
Phiri, K. M., Vaughan, M. and Makuluni, D. (1978) 'Yao and Nyanja historical texts, Vol. II'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wi).
Piault, M. H. (1970) *Histoire Mawri: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s processus constitutifs de l'Etat* (Paris: Editions du CNRS), 206 pp.
Picq, Col. A. du (1905) 'Les Tanala de L'Ikongo', *Le Tour du Monde* (Paris), 18–25 November, pp. 541–64.
Picq, Col. A. du (1932) 'L'influence islamique sur une population malayo-polynésienne de Madagascar: Tanala', extract from *RTC*, 26, pp. 191–208, 266–79 and 370–401.
Pigafetta, F. de (1591/1881/1970) *Relatione del Reame di Congo et delle circonvicine contrade tratta dalli scritti e ragionamenti di Odoardo Lopez Portoghese* (Rome: B. Grassi), 82 pp; Eng. trans. in 1881

by M. Hutchinson, *A Report of the Kingdom of Congo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London: John Murray), 175 pp; 1970 reprint (London: Frank Cass).
Pike, J. G. (1965) 'Pre-colonial history of Malawi', *SMJ*, 18, 1, pp. 22–54.
Pike, J. G. (1968) *Malawi: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Pitot, A. (1899) *Ile de France: Esquisses Historiques (1715–1810)* (Port-Louis, Mauritius: E. Pezzani), 447 pp.
Pitot, A. (1905) *T'Eylandt Mauritius: Esquisses Historiques (1598–1710)*
Plancquaert, M. (1971) *Les Yaka: essai d'histoire* (Tervuren: MRAC, Annales sciences humaines, vol. 71).
Pogge, P. (1880) *Im Reich des Muata Jamwo* (Berlin: D. Reimer).
Poirier, C. (1953) 'Généalogie des rois Maroserana du sud de l'Onilahy', *BAM*, new series, 31, pp. 29–35.
Pollock, N. C. and Agnew, S. (1963)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Longman), 242 pp.
Poncet, J. P. (1967) 'Le mythe de la "catastrophe" hilalienne', *AESC*, 22, pp. 1099–1120.
Porter, D. H. (1970)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in England, 1784–1807* (New York: Archon).
Porter, R. (1974) 'European activity on the Gold Coast, 1620–1667'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osnansky, M. (1974) 'Archaeological aspects of the Brong Ahafo region' (Legon: Brong Studies Seminar).
Posnansky, M. (1981) 'The societies of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in the early iron age', in G. Mokhtar (ed.), pp. 718–31.
Postan, M. M. and Hatcher, J. (1975 and 1978)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PP*, 75, pp. 37–47 and 78, pp. 24–37.
Potter, J. (1965)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America, 1700–1800',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p. 631–88.
Prax (1849) *Commerce de l'Algérie avec La Mecque et le Soudan* (Paris: J. Rouvier), 32 pp.
Price, R. (ed.) (1973) *Maroon Societies* (Garden City: Anchor).
Price, R. (1976) *The Guiana Maroons. A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HUP), 184 pp.
Priestley, M. A. (1961a) 'English gifts to the King of Ashanti in the 18th century', *GNQ*, 2, pp. 4–7.
Priestley, M. A. (1961b) 'The Ashanti question and the British', *JAH*, 2, 1, pp. 35–59.
Priestley, M. A. (1969) *West African Trade and Coast Society* (London: OUP), 207 pp.
Pring, M. *Fanno Mary O Fannadill.*
Proyart, A. (1776) *Histoire de Loango, Kakongo et autres royaumes d'Afrique* (Paris); 1968 reprint (Gregg International), 393 pp.
Pruitt, W. F. (1973) 'An independent people: the history of the Sala Mpasu of Zaire and their neighbors'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
Purchas, S. (1613/1905–7) *Purchas: His Pilgrims* (London: W. Stansby), 752 pp.; numerous later edns including that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in 1905–7 (20 vols, Glasgow: J. MacLehose and Sons).

Quarles, B. (1961)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CP), 231 pp.
Quiring, H. (1949) *Trade Routes, Trade and Currency in East Africa* (Livingstone: Rhodes-Livingstone Museum Occasional Paper).

Raffenel, A. (1846) *Voyage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1843–1844)* (Paris: Bertrand), 512 pp.
Rafiķ, A. K. (1963) *Misr wa-Bilād al-Shām* (Damascus).
Rahmān, A. R. A. and Miki, W. (1977) *The Village in Ottoman Egypt and Tokuga Japan – A Comparative Study* (Tokyo, Studia Culturae Islamicae No. 7,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06 pp.
Randles, W. G. L. (1958) 'South-East Africa and the Empire of Monomotapa as shown on selected and printed maps of the 16th century', *Studia*, 2, pp. 103–63.
Randles, W. G. L. (1968)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Paris/The Hague: Mouton), 275 pp.
Randles, W. G. L. (1979) *The Empire of Monomotapa: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into English by R. S. Roberts (Gweru: Mambo Press), pp. 38–55.
Ranger, T. O. (ed.) (1968a) *Aspects of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London/Nairobi: Heinemann/EAPH), 291 pp.
Ranger, T. O. (ed.) (1968b) *Emerging Themes of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230 pp.
Ranger, T. O. (1973) 'Territorial cults i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JAH*, 14, 4, pp. 581–97.

Ranger, T. O. (1979)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1897: A Study in African Resistance*, 1st paperback edn (London: Heinemann), 403 pp.
Ranger, T. O. and Kimambo, I. N. (eds) (1972)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 (London: Heinemann), 307 pp.
Rasamimanana, J. and Razafindrazaka, L. (190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Malgaches – Fanasoavana ny Tantaran'ny Malagasy* (Ambohimalaza and Antananarivo); 1957 reprint, a-b, i-iii, pp. 1-45.
Ratelband, K. (1953) *Vijf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Sao Jorge Da Mina (Elmina) aan de Goudkust (1645–1647)* Uitgegeven door ... – Linschoten Vereeniging, V. LV (The Hague).
Ratzel, F. (1885) *Völkerkunde* (Leipzig), pp. 451–78.
Rau, V. (1966) 'Les marchands – banquiers étrangers au Portugal sous le règne de Joao III (1521–1557)', in *Les aspects internationaux de la découverte océanique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Razafimino, G. (1924) *La signification religieuse du Fandroana ou de la fête du nouvel an en Imerina* (Antananarivo).
Rea, W. F. (1976) *The Economics of the Zambezi Missions, 1580–1759*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Redmond, P. M. (at press) 'Notes on the trade in dried fish in the Central Sudan', in M. Adamu (ed.), at press (a).
Reefe, T. Q. (1975) 'A History of the Luba Empire to 1895'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eefe, T. Q. (1977) 'Traditions of genesis and the Luba Diaspora', *HAJM*, 4, pp. 183-206.
Reefe, T. Q. (1980) 'The eastern savanna of Central Africa and Northern Zambezia to the 1890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University of Kent, Canterbury, 7–11 July).
Reefe, T. Q. (1981) *The Rainbow and the Kings: A History of the Luba Empire to 1891* (Berkeley: UCP), 286 pp.
Rehse, H. (1910) *Kiziba: Land und Leute* (Stuttgart), trans. by Mrs Denne as *Kiziba: land and people* (n.d.), 394 pp.
Reindorf, C. C. (1898/1966) *The 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i* (Basle: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66 reprint (Accra: GUP), 349 pp.
Rennie, J. K. (1972) 'The precolonial kingdom of Rwanda. a reinterpretation', *TJH*, 2, 2, pp. 11–53.
Repiquet, J. (1902) *Le Sultanat d'Anjouan, îles Comores* (Paris).
Rey-Hulman, D. (1975) 'Les dépendants des maîtres tyokossi pendant la période pré-coloniale', in C. Meillassoux (ed.), pp. 297-320.
Ricci, L. (1969–71) 'La "Vita" di 'enbāqom e di Yoḥannes abbati di Dabra Libānos di Scioa', *RSE*, 23, pp. 79–220 and 24, pp. 134-232.
Richard-Molard, J. (1949) *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2nd edn, Paris: Editions Berger-Levrault).
Richter, F. (1899) 'Der Bezirk Bukoba', *Mitteilungen von Forschungsreisenden und Gelehrten aus den deutschen Schutzgebieten*, 12, pp. 67–105.
Rinchon, R. F. D. (1929) *La traite et l'esclavage des Congolais par les Européens: Histoire de la déportation de 13 millions 250.000 Noirs en Amérique* (Brussels: Wetteren), 306 pp.
Rinchon, R. F. D. (1964) *Pierre Ignace Liévin van Alstein, capitaine négrier: Gand, 1733 – Nantes, 1793* (Dakar: IFAN, Mémoire No. 71), 452 pp.
Rita-Ferreira, A. (1966) *Os Chevas da Macanga* (Lourenço Marques).
Ritchie, C. I. A. (1968) 'Deux textes sur le Sénégal, 1673–1677', *BIFAN*, 30, Series B, No. 1, pp. 289–353.
Roberts, A. D. (ed.) (1968a)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162pp.
Roberts, A. D. (1968b) 'The Nyamwezi', in A. D. Roberts (ed.), 1968(a), pp. 117–50.
Roberts, A. D. (1970a) 'Chronology of the Bemba', *JAH*, 2, 2, pp. 221-40.
Roberts, A. D. (1970b) 'Pre-colonial trade in Zambia', *ASR*, 10, pp. 715–37.
Roberts, A. D. (1970c) 'Nyamwezi trade',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39–74.
Roberts, A. D. (1973) *A History of the Bemba: Political Growth and Change in North-Eastern Zambia Before 1900* (London: Longman), 420 pp.
Roberts, A. D. (1976) *A History of Zambia* (London: Heinemann), 288 pp.
Robinson, D. (1975) 'The Islamic revolution of Futa Toro', *IJAHS*, 8, 2, pp. 185–221.
Robinson, K. R. (1966)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y of Ngonde, Northern Malawi', *JAH*, 7, 2, pp. 178–92.
Robinson, K. R. (1972) 'The Iron Age in Malawi: a brief account of recent work', in B. Pachai (ed.), pp. 54–72.
Robinson, K. R. and Sandelowsky, B. (1968) 'The Iron Age of Northern Malawi: recent work', *Azania*, 3, pp. 107–46.

Roche, C. (1976) *Conquête et résistance en Casamance* (Dakar: NEA).
Rodegem, F. M. (1964) *Onomastique rundi* (Bujumbura, mimeograph)
Rodney, W. (1967a) *West Africa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airobi: EAPH, Paper No. 2), 28 pp.
Rodney, W. (1967b)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ne invasions of Sierra Leone', *JAH*, 8, 2, pp. 219–46.
Rodney, W. (1968) 'Jihad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Futa Djal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HSN*, 4, 2, pp. 269–84.
Rodney, W. (1969a) 'Gold and slaves on the Gold Coast', *THSG*, 10, pp. 13–28.
Rodney, W. (1969b) 'Upper Guinea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rigins of Africans enslaved in the New World', *JNH*, 54, 4, pp. 327–45.
Rodney, W. (1970a)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underdevelopment'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70 (December) Universities of East Africa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 Dar es Salaam).
Rodney, W. (1970b) *A History of the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83 pp.
Rodney, W. (1972)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Dar es Salaam/London: TPH and Bogle L'Ouverture), 316 pp.
Rodney, W. (1975) 'Africa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J. D. Fage and R. Oliv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Cambridge: CUP), pp. 578–651.
Rohlfs, C. (1875) *Quer durch Afrika* (2 vols, Leipzig: Brockhaus).
Roper, T. (1963)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The Listener*, 28 November, p. 871.
Ross, R. (1975) 'The "White" population of the Cape colo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S*, 29.
Ross, R. (1976) *Adam Kok's Griquas: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ification in South Africa* (Cambridge: CUP, African Studies Series No. 21), 194 pp.
Ross, R. (1978) 'Pattern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agriculturalists and pastoralists in Southern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Iron-using Bantu-speaking Popul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before 1800, Leiden, September).
Rossi, E. (1936) 'La Cronaca Araba Tripolitana di Ibn Galboun', *SSL*, 3.
Rossi, E. (1968) *Storia di Tripoli e della Tripolitania*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Rotberg, R. and Mazrui, A. (eds)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UP), 1274 pp.
Rout, L. B. Jr. (1976) *The African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from 1502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UP), 404 pp.
Rubin, V. and Tuden, A. (eds) (1977)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lavery in New World Plantation Societi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 292).
Rugomana, J. (1957) 'Le roi du pays rundi et les hommes qui y sont venus les premiers', *Zaire*, 11, 6, pp. 625–36.
Rwabukumba, J. and Mudandagizi, V. (1974) 'Les formes historiques de la dépendance personnelle dans l'état rwandais', *CEA*, 53, pp. 6–25.
Ryan, V. M. (1864) *Mauritius and Madagascar* (London: Seeley, Jackson and Halliday), 340 pp.
Ryder, A. F. C. (1964) 'A note on Afro-Portuguese ivories', *JAH*, 5, pp. 363–5.
Ryder, A. F. C. (1965a)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Portuguese Archives* (London: Athlone Press), 92 pp.
Ryder, A. F. C. (1965b) 'Portuguese and Dutch in West Africa before 1800', in J. F. A. Ajayi and I. Espie (eds), pp. 212–32.
Ryder, A. F. C. (1969) *Benin and the Europeans, 1485–1897* (London: Longmans), 372 pp.

Sa'ad, A. (1977) *Lamibe of Fombina* (Oxford: Asian Broadcasting Union).
al-Sa'dī, 'Abd al-Raḥmān b. 'Abd Allāh (1656) *Ta'rīkh al-Sūdān*; 1898 ed. O. Houdas and E. Benoist, with 1900 French transl. O. Houdas, 2 vols (Paris: Leroux); 1964 rev. transl.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540 pp..
Sahli, K. R. (1977) 'Kathaiq'an al-Maghrab al-'Uthmānī'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ttoman's Maghrib), *RHM*, 7-8, January, Arab section, pp. 40–60.
Sahlins, M. (1972) *Stone-Age Economics* (Chicago: Aldine-Atherton), 348 pp; 2nd edn 1974 (London: Tavistock).
Saignes, M. A. (1967) *Vida de los esclavos en Venezuela* (Caracas: Hesperides).
Saint-Gerrais de (1736) *Mémoires historiques qui concernent le gouvernement de l'ancien et du nouveau Royaume de Tunis, avec des réflexions sur la conduite d'un Consul, et un détail du commerce* ... (Paris: Ganeau Fils).
Saley, M. (1982) 'Les états tsotsebaki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Niamey).
Salifou, A. (1971) *Le Damagaram ou Sultanat de Zinder au XIXe siècle*, (Niamey: IRSH, *EN*, vol. 27), 320pp.
Salim, A. I. (1973) *The Swahili-speaking Peoples of Kenya's Coast, 1895–1965* (Nairobi: EAPH), 272 pp.

Salim, A. I. (1980) 'Kenya, Muslims' in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n (Leiden/Paris: Brill/Maisonneuve et Larose).
Salisbury, R. F. (1962) *From Stone to Steel*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CUP).
Sanders, E. (1969) 'The hami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time perspective', *JAH*, 10, 4, pp. 521–32.
Santandrea, F. (1964) *A Trib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Bahr el-Ghazal* (Bologna: Editrice Nigrizia), 345 pp.
Santandrea, F. (1981) *Ethno-Geography of the Bahr el-Ghazal (Sudan): An Attempt at a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Bologna: Editrice Nigrizia).
Santos, J. dos (1609/1895) *Ethiopia Oriental*, 1895 edn (2 vols, Lisbon).
Santos, J. dos (1901) 'Ethiopia Oriental', in G. M. Theal (ed.), 1898–1903, vol. 7, pp. 1–182 (in Portuguese); pp. 183–370 (English trans.).
Santos, T. dos (1969)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in H. Bernstein (ed.), pp. 57–80.
Sargent, R. A. (1979) 'The generations of turmoil and stress: a proliferation of states in the northern interlacustrine region c.1544–1625', in J. B. Webster (ed.), 1979 (a), pp. 231–61.
Sarkar, J. (1919) *History of Aurangzib* (Calcutta/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Sauter, R. (1963) 'Où en est notre connaissance des églises rupestres d'Ethiopie?', *AE*, 5, pp. 235–92.
Sautter, G. (1966) *De l'Atlantique au fleuve Congo, une géographie du sous-peuplement*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102 pp.
Savaron, C. (1928 and 1931)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Imerina', *BAM*, new series, 11, pp. 61–81 and 14, pp. 57–73.
Saxon, D. E. (1982)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eastward spread of Ubanguian peoples',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66–77.
Scelle, G. (1906) *La traite négrière aux Indes de Castille* (2 vols, Paris: L. Larose and L. Tenin).
Schebesta, P. (1952) *Les pygmées du Congo belge* (Brussels: Verhandelingen), 432 pp.
Schechter, R. E. (1976)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n a frontier of Lunda expansion: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Kanongesh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Schechter, R. E. (1980) 'Apropos the drunken king: cosmology and history', in J. C. Miller (ed.), pp. 108–25.
Schleicher, A. W. (1893) *Geschichte der Galla* (Berlin: T. Fröhlich).
Schmidt, P. (1978) *Historical Archaeology: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n African Culture* (Westport Connect.: Greenwood Press), 365 pp.
Schoffeleers, M. J. (1968) 'Symbol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spirit worship among the Mang'anja' (PhD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
Schoffeleers, M. J. (1972a) 'The meaning and use of the name "Malawi" in oral traditions and precolonial documents', in B. Pachai (ed.), pp. 93–106.
Schoffeleers, M. J. (1972b)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the M'bona cult among the Mang'anja', in T. O. Ranger and I. N. Kimambo (eds), pp. 73–94.
Schoffeleers, M. J. (1973) 'Towards the identification of a proto-Chewa culture: a preliminary contribution', *MJSS*, 2, pp. 47–60.
Schoffeleers, M. J. (1976) 'The Nyau societies: our present understanding', *SMJ*, 29, 1, pp. 59–68.
Schoffeleers, M. J. (ed.) (1979a) *Guardians of the Land: Essays on Central African Territorial Cults* (Gweru: Mambo Press).
Schoffeleers, M. J. (1979b) 'The Chisumphe and M'bona cults in Malawi: a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 J. Schoffeleers (ed.), 1979 (a), pp. 147–86.
Schoffeleers, M. J. (1980) 'Trade, warfa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the case of the lower Shire Valley of Malawi, 1590–1622 A. D.', *SMJ*, 33, 2, pp. 1–24.
Schove, D. J. (1973) 'African droughts and the spectrum of time', in D. Dalby and R. J. H. Church (eds), *Droughts in Africa* (London: IAI), pp. 38–53; 2nd edn, 1977.
Schumacher, P. (1949) 'Urundi', *Aequatoria*, 12, pp. 129–32.
Schumacher, P. (1958) *Ruanda* (Fribourg: Anthropos), 1300 pp.
Schutte, G. (1979) 'Company and colonists at the Cape', in R. Elphick and H. Giliomee (eds), pp. 173–210.
Schwartz, S. B. (1970) 'The "Macambo": slave resistance in colonial Bahia', *JSH*, 3, 4.
Schwartz, S. B. (1977)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azil: the slaves' view of slavery', *HAHR*, 57, February.
Schweinfurth, G. (1873) *The Heart of Africa: Three Years'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the Unexplored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 1886–71* (2 vols, London: Low, Marston, Low & Searle).

Sékou-Bamba, M. (1978) 'Bas-Bandama precolonial'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aris).
Seligman, C. G. (1957) *Races of Africa*, 3rd edn (London: Butterworth), 236 pp.
Séré de Rivières, E. (1965) *Histoire du Niger* (Paris: Berger-Levrault), 311 pp.
Serjeant, R. B. (1963) *The Portuguese off the South Arabian Coast: Hadrami Chronicles with Yemeni and European accounts of Dutch Pirates off Moch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rjeant, R. B. (1966) 'South Arabia and Ethiopia – African elements in the south Arabian popul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iopian Studies* (Rome).
Serjeant, R. B. (1967) 'Société et gouvernments en Arabie du Sud', *Arabia*, 14 October.
al-Sharqāwi, M. (1957) *Misr fi 'l-qarn al-thāmin 'ashar* (Egypt in the 18th century) (3 vols, Cairo).
Shaw, Rev. G. A. (1893 and 1894) 'The Arab element in South-East Madagascar', *AA*, 5, pp. 99–109 and 6, pp. 205–10.
Shaw, S. J. (1962a) *The Financial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ttoman Egypt, 1517–1798* (Princeton: NJ: PUP, Princeton Oriental Studies No. 19), 451 pp.
Shaw, S. J. (1962b) *Ottoman Egyp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Nizamname i Misir of Cezzar Ahmed Pasha*, ed. and tr. by S. J. Shaw (Cambridge, Mass.: HUP, Harvard Middle Eastern Monograph 7).
Shaw, S. J. (1969) *The Budget of Ottoman Egypt, 1005–1006/1596 1597* (The Hague: Mouton), 210 pp.
Shaw, T. (1970) *Igbo-Ukwu: An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Faber & Faber for the IAS, University of Ibadan).
Shaw, T. (1977) 'Questions in the holocene demography of West Africa', in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I: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held in the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9th and 30th April* (Edinburgh: EUP), pp. 105–21.
Shaw, T. (1978) *Nigeria: Its Archaeology and Early History* (London: Thames & Hudson).
Shaw, T. (1981) 'Towards a pre-historic demography of Africa',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inburgh), 2.
Shea, P. J. (1983) 'Approaching the study of production in rural Kano', in B. M. Barkindo (ed.), pp. 93–115.
Shepherd, J. F. (1969) 'Estimates of "invisible" earnings i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9–1772', *JEH*, 29, 2.
Shepherd, J. F. and Walton, G. M. (1972)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UP).
Sheridan, R. (197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ations to 1750: An Era of West Indian Prosperity, 1750–1775* (Bridgetown, Jamaica: CUP), 120 pp.
Sheriff, A. M. H. (1971) 'The rise of a commercial empire: an aspect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Zanzibar, 1770–1873'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riff, A. M. H. (1980) 'Tanzanian societies at the time of partition', in M. H. Y. Kaniki (ed.), *Tanzania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Longman), pp. 11–50.
Sherwood, H. N. (1923) 'Paul Cuffee', *JNH*, 8, 2, pp. 153–229.
Shiroya, O. J. E. (unpublished (a)) 'The Lugbara: at the nexus of three worlds',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1.
Shiroya, O. J. E. (unpublished (b)) 'Ethnic assimilation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Lugbara, Alur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Sidibé, B. K. (1972) 'The story of Kaabu: its extent and people' (unpublished paper,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London).
Sidibé, B. K. (1974) 'The Nyanchos of Kaabu' (unpublished paper, Indiana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Programme).
Silveira, L. (1946) *Edição Nova do Tratado Breve dos Rios de Guiné pelo Capitão André Alvares D'Almada* (Lisbon).
Sinclair, P. (1977) 'First steps toward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Zimbabwe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esotho, Roma).
Skinner, E. P. (1964) *The Mossi of Upper Volta: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a Sudanese People* (Stanford: SUP), 236 pp.
Smaldone, J. P. (1977) *Warfare in the Sokoto Caliphate* (Cambridge: CUP), 228 pp.
Smith, A. (1970)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Zazzau under the Hausa kings', in M. J. Mortimore (ed.), pp. 82–101.
Smith, A. (1976)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2nd edn, pp. 158–201.

Smith, M. G. (1967) 'A Hausa kingdom: Maradi under Dan Baskore, 1845–75', in C. D. Forde and P. M. Kaberry (eds), pp. 93–122.

Smith, M. G. (1983) 'The Kano chronicle as history', in B. M. Barkindo (ed.), pp. 31–56.

Smith, P. (1981) 'Personnages de légende', *CCB*, pp. 244–53.

Smith, R. (1979) 'Carpaccio's African gondolier', *ISAR*, 34, pp. 47–52.

Soka, L. D. (1953) *Mbiri ya Alomwe* (London: Macmillan).

Southhall, A. W. (1953) *Alur Society* (Nairobi: OUP), 397 pp.

Southhall, A. W. (1954) 'Alur tradition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J*, 18, 2, pp. 137–65.

Southhall, A. W. (1970) 'Rank and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 Alur and other Nilotic peoples', in A. Tuden and Plotnicov (e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frica* (London: Macmillan), pp. 31–46.

Sow, A. I. (1971) *Le filon du bonheur éternel par Mouhammadou Samba Mambeya* (Paris: Colin).

Sowunmi, M. A. (1978) *Paly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Rivers State* (University of Port Harcourt, School of Humanities Seminars).

Spaulding, J. L. (1971) 'Kings of sun and shadow: a history of the Abdallab provinces of the Northern Sinnar Sultanate, 1500–1800 A.D.'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Spaulding, J. L. (1972) 'The Funj: a reconsideration', *JAH*, 13, 1, pp. 39–53.

Spear, T. T. (1974) 'Tradition myths and historian's myths: variations on the Singwaya theme of Miji Kenda origins', *HA*, 1, pp. 67–84.

Spear, T. T. (1976) 'The Miji Kenda, 1550–1900', in B. A. Ogot (ed.), 1976 (b), pp. 262–85.

Spear, T. T. (1978) *The Kaya Complex: A History of the Miji Kenda Peoples of the Kenya Coast to 1900* (Nairobi: KLB & EALB).

Spear, T. T. (1981) *Kenya's Past* (Nairobi: Longman), 155 pp.

Spratlin, V. B. (1938) *Juan Latino: Slave and Humanist* (New York: Spinner Press Inc.).

Stanley, S. and Karsten, D. (1968) 'The Luwa system of the Garbiččo', *Paideuma*, 14, pp. 93–102.

Stein, R. (1978) 'Measuring the French slave trade, 1723–1792', *JAH*, 19, 4, pp. 515–21.

Steinhart, E. I. (1981) 'Herders and farmers', in C. C. Steward and D. Crummey (eds), *Modes of Production in Afric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115–56.

Stewart, C. C. (1976) 'Southern Saharan scholarship and the *Bilād al-Sūdān*', *JAH*, 17, pp. 73–93.

Stitz, V. (1974) *Studien zur Kulturgeographie Zentraläthiopiens* (Bonn: Dummler)

Stokes, E. and Brown, R. (eds) (1966) *The Zambezian Past. Studies in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Manchester: MUP), 427 pp.

Strandes, J. (1899/1961) *Die Portugiesenzeit von Deutsch – und Englisch-Ost Afrika* (Berlin: D. Reimer); English trans. J. F. Wallwork,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 EALB), 378 pp.

Straube, H. (1957) 'Das Dualasystem und die Halaka-Verfassung der Dorse', *Paideuma*, 6, pp. 342–53.

Straube, H. (1963) *Westkuschitische Völker Süd-Äthiopiens*, with a contribution by Schutz-Weider (Stuttgart: Kohlhammer), 411 pp.

Struck, B. (1911) 'Bemerkungen uber die "Mbandwa" des Zwischenseengebiets', *ZFE*, 43, 3/4, pp 516–21.

Stuhlmann, F. (1894) *Mit Emin Pascha ins Herz von Afrika* (Berlin: D. Reimer), 902 pp.

Sulzmann, E. (1983) 'Orale Tradition und Chronologie: Der Fall Baboma-Bolia', in Feik Nzuji *et al.* (eds), *Mélanges de culture et linguistique africaine publiés à la mémoire de Leo Stappers* (Berlin: Mainzer Afrika Studien Bd. 3), pp. 525–86.

Suret-Canale, J. (1970) *La République de Guiné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431 pp.

Suret-Canale, J. (1971) 'The Western Atlantic coast, 16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387–440; 1976 edn, pp. 456–511.

Sutherland-Harris, N. (1970) 'Zambian trade with Zumbo in the 18th century',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231–42.

Sutton, J. E. G. (1979) 'Towards a less orthodox history of Hausaland', *JAH*, 20, 2, pp. 179–201.

Sutton, J. E. G. (1983) 'A New look at the Inyanga terraces', *ZH*, 19, pp. 12–19.

Sutton, J. E. G. and Roberts A. (1968) 'Uvinza and its salt industry', *Azania*, 3, pp. 45–86.

Swartz, A. (1971) *Tradition et changements dans la societé guéré* (Paris: ORSTOM, Mémoires No. 52), 259 pp.

Sy, A. A. (1979) 'La geste tiedo' (PhD thesis, Dakar).

Tacchi, A. (1892) 'King Andrianampoinimerin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Antananarivo and Ambohimanga', *AA*, pp. 474–96.

Tamakloe, E. F. (193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agbamba People*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76 pp.

Tamrat, T. (1970) 'The Abbots of Däbrä Hayq, 1248–1535', *JES*, 7, pp. 87–117.

Tamrat, T. (1972)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27 pp.

Tamrat, T. (1977) 'Ethiopia, the Red Sea and the Horn',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ambridge: CUP), pp. 98–182.
Tardits, C. (1980) *Le royaume bamoum* (Paris: Armand Colin), 1078 pp.
Tardits, C. (ed.) (1981) *Contribution de la recherche ethnologique à l'histoire des civilisations du Cameroun* (2 vols, Paris: Editions du CNRS), 597 pp.
Tassy, L. de (1757) *Histoire des états barbaresques qui exercent la piraterie* (Paris: Chaubert).
Tauxier, L. (1912) *Le Noir du Soudan* (Paris: Larose).
Tauxier, L. (1917) *Le Noir du Yatenga* (Paris: Larose), 790 pp
Tauxier, L. (1921) *Le Noir de Bondoukou* (Paris: Leroux).
Tauxier, L. (1924) *Nouvelles notes sur le Mossi et le Gourounsi* (Paris: Larose).
Tauxier, L. (1942) *Histoire des Bambara*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 Geuthner), 226 pp.
Taylor, J. G. (1979) *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s of 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the Sociolog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Teixeira da Mota, A. (1954) *Guiné Portuguesa* (2 vols, Lisbon: Agencia Geral do Ultramar).
Teixeira da Mota, A. (1969) 'Un document nouveau pour l'histoire des Peul au Sénégal pendant les 15e et 16e siècles', *BCGP*, **96**, pp. 781–860.
Teixeira da Mota, A. (1975) 'Gli avori africani nella documentazione portoghese dei secoli XV–XVII', *Africa*, **30**, 4, pp. 580–9.
Tellez, B. (1710) *Travels of the Jesuits in Ethiopia* (London).
Temini, A. (1978) 'Al-Khalfiya al-dīniya lis-sirā al-isbani al-'uthmani'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to the duel between Spain and the Ottoman), *RHM*, 10–11, January, Arab section, pp 5–44.
Temini, A. (1983) *Mujaz al-dafātir al-arabiya wa'l-turkiya bil-Jazā'ir* (Sommaire des registres turcs et arabes d'Alger) (Tunis: Publications de l'ISD), 169 pp. in Arabic + 26 pp. in French.
Terpestra, H. (1960) 'Nederlands gouden tijd an de Goudkust',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73, 3.
Terrasse, H. (1949–50) *Histoire du Maroc* (2 vols, Casablanca: Atlantides).
Theal, G. M. (ed.) (1898–1903) *Records of South-Eastern Africa* (9 vols, London/Cape Town: Government of Cape Town).
Theal, G. M. (1910) *Ethnography and Condition of South Africa before A.D. 1505*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Thomas, F. M. (1958)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Bisa Tribe of Northern Rhodesia* (Lusaka: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52 pp.
Thomas, J. M. C. (1979) 'Emprunt ou parentés', in S. Bahuchet, *Pygmées de Centrafrique* (Paris), pp. 141–69.
Thomassin, L. (1900) 'Notes sur le royaume de Mahabo', *NRE*, 6, pp 395–413.
Thompson, R. F. and Cornet, J. (1982) *The Four Moments of the Sun: Kongo Art in Two Worlds* (Washington: National Art Gallery).
Thornton, J. K. (1977a) 'Demography and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Kongo, 1550–1750', *JAH*, 18, 4, pp. 507–30.
Thornton, J. K. (1977b) 'Eighteenth-century baptismal register and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Manguezo', in C. Fyfe and D. McMaster (eds), pp. 405–15.
Thornton, J. K. (1978) 'A resurrection for the Jaga', *CEA*, 69–70, pp. 223–7.
Thornton, J. K. (1980) 'The slave trade in eighteenth-century Angola: Effects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s', *CJAS*, 14, 3, pp. 417–28.
Thornton, J. K. (1981a) 'The chronology and causes of the Lunda expansion to the west c.1700–1852', *ZJH*, 1, pp. 1–13.
Thornton, J. K. (1981b) 'The demographic effect of the slave trade on Western Africa, 1500–1800, in C. Fyfe and D. McMaster (eds), vol 2, pp. 691–720.
Thornton, J. K. (1983a) 'Catholicism in Kongo, 1491–1750', *JAH*, 25, pp. 147–67.
Thornton, J. K. (1983b) *The Kingdom of Kongo in the Era of the Civil Wars, 1641–1718* (Madison. UWP), 193 pp.
Tiendrebeogo, Y. (1964) *Histoire et coutumes royales des Mossi de Ouagadougou*, new edn with annotations by R. Pageard (Ouagadougou: Naba).
Tilho, J. (1911)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vol 2 (Paris: Imprimerie du NLE).
Timowski, M. (1974) *Le développement et la régression chez les peuples de la Boucle du Niger à l'époque précoloniale*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Toplin, R. B. (1972)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Brazil* (New York: Atheneum).
Torres, D. de (1667) *Histoire des chérifs* . trans. Duc d'Angoulême (3 vols, Paris: T. Jolly).
Tosh, J. (1978) *Clan Leaders and Colonial Chiefs in Lang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n East African Stateless Society, 1800–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Studies in African Affairs), 293 pp.
Toure, M. (1974) *Mande Influences in the Gyaman Kingdom*, Colloquium, Bonduku, January.

Toussaint, A. (1967) *La Route des Iles: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maritime des Mascareignes*.
Toussaint, A. (1971) *Histoire de l'Ile Maurice* (Paris: PUF), 128 pp.
Toussaint, A. (1972) *Histoire des Iles Mascareignes* (Paris: Berger-Levrault), 351 pp.
Tovonkery (1915) *Lovantsofina Milaza ny Tantara Nihavian'ny Mpanjaka Sakalava Samy Hofa Eto Amin'ny Faritany Maromandia*, Document 620, Bibliothèque Poirier, University of Madagascar.
Tracey, H. (1940) *António Fernandes, Descobridor do Monomotapa, 1514–1515* (Lisbon/Lourenço Marques: Imprensa nacional), 92 pp.
Traoré, D. (1937) 'Notes sur le royaume mandingue de Bobo', *L'éducation africaine*, 26, pp. 58–9.
Trimingham, J. S. (1949) *Islam in the Sud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80 pp.
Trimingham, J. S. (1964) *Islam in East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 pp.
Trimingham, J. S. (1970)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 OUP), 262 pp.
Tucker, A. N. and Bryan, M. A. (1966) *The Non-Bantu Languages of North-Eastern Africa* (London: OUP).
Tundu, K. Y. (1981) 'Le royaume de Bene Kalundwe: des origines à 1902' (First degree dissertation, Lubumbashi).
al-Tunisi, Muḥammad ibn 'Umar (1951) *Voyage au Oaday* trans. by Perron (Paris).
al-Tunisi, Muḥammad ibn 'Umar (1965) *Tashid al-adhhan bi-sirat Bilad al-'Arab wa l'Sudan* (Cairo: Egyptian 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Authorship, Information and Publishing).
Turnbull, C. M. (1961) *The Forest Peopl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49 pp.
Turnbull, C. M. (1966) *Wayward Servants: The Two Worlds of the African Pygmie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390 pp.

UNESCO (1963) *Nomades et nomadisme au Sahara* (Paris), 195 pp.
UNESCO (1979)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Studies and Documents No. 2 (Paris: UNESCO), 330 pp.
UNESCO (1980) *Historical Relation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Studies and Documents No. 3 (Paris: UNESCO), 198 pp.
Unomah, A. C. and Webster, J. B. (1976) 'East Africa: the expansion of commerce', in J. E. Flint (ed.), pp. 270–318.
Uribe, J. J. (1963) 'Esclavos y señores en la sociedad colombiana del siglo XVIII', *Anuario colombiano de historia social y de la cultura*, vol. 1.
Uring, N. (1928) *The Voyages and Travels of Captain Nathaniel Uring*, 1701, ed. by A. Dewar (London: Cassel and Co.).
Urvoy, Y. F. (1936)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u Soudan central* (Paris: Larose), 350 pp.
Urvoy, Y. F. (1949) *Histoire de l'empire du Bornu* (Paris: Larose, Mémoires de l'IFAN No. 7), 562 pp.
Urvoy, Y. F. (1978) *Wakar Bagauda Ta Kano* (Zaria: NNPC).
Usman, Y. B. (1978) 'The dynastic chronologies of three polities of Katsina', *BIFAN* (B), 40, 2, pp. 396–414.
Usman, Y. B. (1979a)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Y. B. Usman (ed.), 1979 (b), pp. 34–55.
Usman, Y. B. (ed.) (1979b)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 The Sokoto Seminar Papers* (Lagos: Third Press International), 504 pp.
Usman, Y. B. (1981) *The Transformation of Katsina (1400–1883) – The Overthrow of the Sarauta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mirate* (Zaria: ABUP).
Usman, Y. B. (1983)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Borno and Hausaland before 1804 A. D.', in Y. B. Usman and N. Alkali (eds), pp. 175–204.
Usman, Y. B. and Alkali, M. N. (eds) (1983)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recolonial Borno* (Zaria: NNPC).

Vail, H. L. (1971) 'Tumbuka historical interviews: oral sources compiled in 1969–71.' (Unpublished, copies deposited 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Vail, H. L. (1972a) 'Religion, language and tribal myth: the Tumbuka and Chewa of Malawi', in M. J. Schoffeleers (ed.), 1979 (a), pp. 209–33.
Vail, H. L. (1972b) 'Suggestions towards a reinterpreted Tumbuka history', in B. Pachai (ed.), pp. 148–67.
Vail, H. L. (1974) 'Trade and politics in pre-colonial northern Malawi: the strange relationship'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Zambia, Seminar No. 7).
Valensi, L. (1967) 'Esclaves chrétiens et esclaves noirs à Tunis au XVIIIe siècle', *AESC*, 22, pp. 1267–88.

Valensi, L. (1969) *Le Maghreb avant la prise d'Alger*, 1790–1830 (Paris: Flammarion), 141 pp.
Valensi, L. (1977) *Fellahs tunisiens.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aux 18e et 19e siècles* (Paris/The Hague: Mouton), 421 pp.
Vallier (1898) 'Etudes ethnologiques sur les Bezanozano', *NRE*, 3, pp. 65–84.
Van Avermaet, J. and **Mbuya, B.** (1954) *Dictionnaire kiluba-français* (Tervuren: MRAC, ser. in 8°, No. 12).
Van den Byvang, L. (1937) 'Notice historique sur les Balunda', *Congo*, 1, 4, pp. 426–38; 1, 5, pp. 548–62; 2, 2, pp. 193–208.
Van der Burgt, J. M. (1903) *Dictionnaire français-kirundi* (Bois-le-Duc: Société de l'illustration catholique), 648 pp.
Van der Kerken, G. (1944) *L'ethnie mongo*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Van Gennep, A. (1904) *Tabou et totémisme à Madagascar* (Paris: E. Leroux, Mondes d'Outre-mer, série Histoire).
Van Noten, F. (1972) *Les tombes du roi Cyirima Rujugira et de la reine Nyirayuhi Kanjogera: description archéologique* (Tervuren: MRAC), 82 pp.
Van Overbergh, C. (1908) *Les Basonge* (Brussels: A. de Witt), 564 pp.
Vansina, J. (1961) *De la tradition orale; essai de méthode historique* (Tervuren: MRAC, Mémoire No. 36).
Vansina, J. (1962a) 'A comparison of African kingdoms', *Africa*, 32, 4, pp. 218–39.
Vansina, J. (1962b) *L'évolution du royaume Rwanda des origines à 1900* (Brussels: ARSOM), 100 pp.
Vansina, J. (1962c) 'Long-distance trade routes in Central Africa', *JAH*, 3, 3, pp. 375–90.
Vansina, J. (1963) 'Note sur l'origine du royaume du Congo', *JAH*, 4, pp. 33–8.
Vansina, J. (1965) *Les anciens royaumes de la savane* (Léopoldville: IRES), 250 pp.
Vansina, J. (1966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A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until the European Occupation*, trans. of *Les anciens royaumes de la savanne* (Madison: UWP), 364 pp.
Vansina, J. (1966b) *Introduction à l'ethnographie du Congo* (Kinshasa: Université Lovanium, Editions universitaires du Congo, No. 1), 227 pp.
Vansina, J. (1967) 'Note sur la chronologie du Burundi ancien', *BARSOM*, 3, pp. 429–44.
Vansina, J. (1971) 'Once upon a time: oral traditions as history in Africa', *Daedalus*, 100, 2, pp. 442 68.
Vansina, J. (1972) *La légende du passé: Traditions orales du Burundi* (Tervuren: MRAC), 257 pp.
Vansina, J. (1973a) 'L'influence du mode de compréhension historique d'une civilisation sur ses traditions d'origine', *BARSOM*, pp. 220–40.
Vansina, J. (1973b) *The Tio Kingdom of the Middle Congo, 1880–1892* (London: OUP), 586 pp.
Vansina, J. (1974) 'Les langues bantoues et l'histoire', in *Mélanges H. Deschamps* (Paris), pp. 171–84.
Vansina, J. (1978) *The Children of Woot: 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 UWP), 394 pp.
Vansina, J. (1978) 'Finding food and the history of pre-colonial Equatorial Africa: a plea', *AEH*, 7, pp. 9–19.
Vansina, J. (1981) 'Tentative hypothesis: Long-term 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African rain forests', in C. Fyfe and D. McMaster (eds), vol. 2, pp. 757–60.
Vansina, J. (1983a) 'Is elegance proof? Structuralism and African history', *HA*, 10, pp. 307–48.
Vansina, J. (1983b) 'The peoples of the forest', in D. Birmingham and P. Martin (eds), pp. 75–117.
Vansina, J. (1984a) 'Equatorial Africa and Angola: migrations and the first states', in D. T. Niane (ed.), pp. 551–77.
Vansina, J. (1984b) 'Western Bantu expansion', *JAH*, pp. 131–49.
Van Thiel, H. (1911) 'Buzinza unter der Dynastie der Bahinda', *Anthropos*, pp. 497–520.
Van Velsen, J. (1959)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keside Tonga of Nyasaland', *AS*, 18, 3, pp. 105–17.
Van Wing, J. and **Penders, C.** (1928) *Le plus ancien dictionnaire bantu* (Leuven: Bibl. CXXVII).
Vellut, J. L. (1972) 'Notes sur le Lunda et la frontière luso-africaine 1700–1900', *EHA*, 3, pp. 61–166.
Verhulpen, E. (1936) 'Baluba et Balubaises du Katanga' (Anvers: Les éditions de l'avenir belge).
Vérin, P. (1971) 'Notes sur les collections de Vohémar', *Taloha*, 4, pp. 225–9.
Vérin, P. (1975) *Les échelles anciennes du commerce sur les côtes nord de Madagascar* (2 vols, Lille: University of Lille).
Verlinden, C. (1957) 'La colonie italienne de Lisbonn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métropolitaine et coloniale portugaise', in *Studi in Onore di A. Sapori*, Vol. I (Milan).
Verlinden, C. (1971) 'Die überseeischen Kolonialreiche', in *Saeculum Weltgeschichte*, 6, pp. 73–122.
Vial, M. (1954) 'La royauté Antankarana', *BAM*, 92, pp. 3–26.
Vidal, C. (1967)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 le cas du Ruanda', *CIS*, pp. 143–57.

Vidal, C. (ed.) (1974) 'Le problème de la domination étatique au Rwanda: histoire et économie', *CEA*, 53, pp. 1–191.
Vienne, E. (1900) *Notice sur Mayotte et les Comores* (Exposition universelle).
Vila Vilar, E. (1977a) 'The large-scale introduction of Africans into Vera Cruz and Cartagena', in V. Rubin and A. Tuden (eds), pp. 267–80.
Vila Vilar, E. (1977b) *Hispano-America y el comercio de esclavos: los asientos portuguesos* (Seville: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Vix, A. (1911) 'Beitrag zur Ethnologie des Zwischenseengebiets von Deutsch-Ostafrika', *ZFE*, 43, 3/4, pp. 502–15

al-Wafrani, Muhammad al-Saghir (1888–9) *Muzhat al-Hadi*, trans. by O. Houdas (Paris: E. Leroux).
Wagner, E. (1975) 'Imamat und Sultanat in Harar', *Saeculum*, 26, pp. 283–92.
Wagner, E. (1976) 'Die Chronologien de frühen muslimischen Herrscher in Äthiopien nach den Harariner Emirislisten', in *Festschrift Eugen Ludwig Rapp* (Meisenheim-an-der-Glan), pp. 186–204.
Wagner, E. (1979) 'Neues Material zur "Ausa-Chronik"', in *Festschrift Hans Robert Roemer* (Beirut: Fritzsteiner-Austria), pp. 657–73.
Walkley, C. E. J. (1935) 'The story of Khartoum', *SNR*, 18, Part 2, pp. 221–41.
Wallerstein, I. (1974)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Organ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cademic Press).
Wallerstein, I. (1976) 'The three stages of Af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P. C. W. Gutkind and I. Wallerstei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p. 30–57.
Walter, B. J. (1970)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Nandi of Kenya, 1500–1905' (PhD thesis, OHCIS).
Walvin, J. (1972) *The Black Pres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England*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Walvin, J. (1973) *Black and White: the Negro and English Society, 1555–1945* (London: Allen Lane and Penguin Press), 273 pp.
Walz, T. (1975) 'The trade between Egypt and *Bilād al-Sūdān*, 1700–1820' (PhD thesis, Boston University).
Warren, R.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and Verso).
Weatherby, J. (1979) 'The rain drums of the Sor', in J. B. Webster (ed.), pp. 313–31.
Webster, J. B. (1976a), 'Lira Palwo: an expanding Acholi state',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pp. 291–319.
Webster, J. B. (1976b) 'Noi! Noi! Famine as an aid to interlacustrine chronology', in Onyango-ka-Odongo and J. B. Webster (eds), pp. 1–37.
Webster, J. B. (1977) 'Ivory and slaves and the southwestern expansion of the Yao', (History research paper, Chancello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lawi).
Webster, J. B. (ed.) (1979a) *Chronology, Migration and Drought in Interlacustrine Africa* (London: Longman and Dalhousie University Press), 345 pp.
Webster, J. B. (1980) 'Drought, migration and chronology in the Lake Malawi littoral', *TJH*, 9, 1–2, pp. 70–90.
Webster, J. B. (at press (a)) 'Otuke and Mugoro: the age of Asonya',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1.
Webster, J. B. (at press (b)) *The Palwo-Pakoyo Exodus, 1680–1760.*
Webster, J. B. (at press (c)) 'The second Babito dynasty in Bunyoro-Kitara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states, c.1650–1780', in D. Denoon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2.
Webster, J. B. (at press (d)) *Nyilak and Nyipir: Hero Ancestors of the Alur.*
Webster, J. B. *et al.* (1973) *The Iteso During the Asonya* (Nairobi: EAPH), 189 pp.
Weiskel, T. C. (1980) *French Colonial Rule and the Baule Peoples, 1889–191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23 pp.
Were, G. S. (1967) *A History of the Abaluyia of Western Kenya c. 1500–1930* (Nairobi: EAPH), 206 pp.
Were, G. S. and Wilson, D. A. (1968 and 1972) *East Africa through a Thousand Years* (Nairobi: Evans Bros.), 344 pp; 2nd edn 1972.
Wheeler, A. (at press) 'Mwenge and Kitagwenda',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White, C. M. N. (1962) 'The ethno-history of the Upper Zambezi', *AS*, 21, pp. 10–27.
Wilbur, C. M. (1967)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r Han Dynasty*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Wilks, I. G. (1957) 'The rise of the Akwamu Empire, 1650–1710' *THSG*, 3, 2, pp. 99–136.
Wilks, I. G. (1960) 'The Ashanti king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AH*, 1, 1, pp. 83–96.

Wilks, I. G. (1961) *The Northern Factor in Ashanti History* (Legon-Accra: IAS,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46 pp.
Wilks, I. G. (1962a) *The Tradition of Islamic Learning in Ghana* (Legon).
Wilks, I. G. (1962b) 'A Medieval trade-route from the Niger to the Gulf of Guinea', *JAH*, 3, 2, pp. 337–41.
Wilks, I. G. (1962c) 'The Mande loan element in Twi', *GNQ*, 4, pp. 26–8.
Wilks, I. G. (1965) 'A note on the early spread of Islam in Dagomba', *THSG*, 8, pp. 87–98.
Wilks, I. G. (1966a) 'Aspects of bureaucratization in Ashanti in the 19th century', *JAH*, 7, pp. 215–32.
Wilks, I. G. (1966b) 'The position of Muslims in Metropolitan Ashanti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I. M. Lewis (ed.), pp. 318–23.
Wilks, I. G. (1971a) 'The Mossi and Akan states, 15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344–86.
Wilks, I. G. (1971b) 'Asante policy towards the Hausa trade in the 19th century', in C. Meillassoux (ed.), pp. 124–141.
Wilks, I. G. (1975) *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CUP), 800 pp.
Willan, T. S. (1959) *Studies in Elizabethan Foreign Trade* (Manchester: MUP), 349 pp.
William-Myers, A. J. (1978a) 'The Nsenga of Central Afric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clan history, 1700–1900' (PhD thesis, UCLA, Los Angeles).
William-Myers, A. J. (1978b) 'Nsenga historical texts: interviews from Petauke and Feira districts of Zambia' (Unpublished, copies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and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lawi).
Williams, E. (1970)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The History of the Caribbean, 1492–1969* (London: Andre Deutsch), 576 pp.
Williamson, K. (1971) 'The Benue-Congo languages and Ijo', in J. Berry and J. H. Greenberg (eds), *Linguistics in Sub-Saharan Africa* (Mouton), pp. 245–306.
Willis, J. R. (1971) 'The Western Sudan from the Moroccan invasion to the death of al-Mukhtar al-Kunti'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pp. 441–83.
Willis, J. R. (1981) *A State in the Making* (Bloomington, Ind.).
Willis, R. G. (1968) 'The Fipa', in A. D. Roberts (ed.), 1968 (a), pp. 82–95.
Wilson, A. (197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Luba Lomani empire', *JAH*, 13, 4, pp. 575–89.
Wilson, A. (1978) 'The kingdom of Kongo to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PhD thesis, London University).
Wilson, A. (1979) 'The kingdom of Kongo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pproximate title) (dissertation, SOAS, London).
Wilson, J. F. M. (at press (a) 'Guineafowl and bushbuck in Toro',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1.
Wilson, J. F. M. (at press (b) 'The foundations of Toro kingdom, 1830–1860',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Wilson, M. (1958) *Peoples of the Nyasa-Tanganyika Corridor* (Cape Town: AS), 75 pp.
Wilson, M. (1969a) 'The Sotho, Venda and Tsonga',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vol. 1, pp. 131–86.
Wilson, M. (1969b) 'The Nguni people',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vol. 1.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M. (eds) (1969, 197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 vols.
Wolff, J. (1964) *Negersklaveri und Negerhandel in Hochperu 1545–1640 in Lateinamerika* (Koln: Böhlan-Verlag).
Womersley, H. (1984) 'Legend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Luba', in T.Q. Reefe (ed.), *Legends and History of the Luba* (Los Angeles: Cross Roads Press).
Wondji, C. (1973–80) *Enquêtes orales en pays neyo, bété, godie et dida*, (unpublished).
Wright, A. C. A. (1989) 'Maize names as indicators of economic contacts', *UJ*, 13, pp. 61–81.
Wright, J. (1971) *Bushman Raiders of the Drakensberg, 1840–1870*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235 pp.
Wright, J. (1977) 'San history and non-San historians', in *The Societies of Southern Africa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vol. 8 (London).
Wrigley, C. C. (1958) 'Some thoughts on the Bachwezi', *UJ*, 22, 1, pp. 11–21.
Wrigley, C. C. (1981) 'Population and history: some innumerate reflexions', in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 Vol. II: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held in the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4th and 25th April 1981*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p. 17–31.

Wrigley, E. A. (1983)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conundrum resolved', *PP*, 98 (February).

Wunder, H. (1978) 'Peasant organization and class conflict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PP*, 78, pp. 47–55.

Yahya, D. (1981) *Morocco in the 16th century* (Ibadan: Humanities Press).

Yoder, J. C. (1977) 'A people on the edge of empires: a history of the Kanyok of Central Zaire (PhD the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Yoder, J. C. (1980)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 Kanyok genesis myth: the tale of Citend a Mfumu', in J. C. Miller (ed.), pp. 82–107.

Young, T. C. (1932/1971)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umbuka-Kamanga People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Nyasaland*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71 edn (London: Frank Cass).

Zahan, D. (1958) 'La notion d'écliptique chez les Bambara et les Dogon du Soudan français', *NA*, 80, October, pp. 108–11.

Zahan, D. (1960) *Sociétés d'initiation bambara: le N'domo; le Kore* (Paris/The Hague: Mouton), 438 pp.

Zahan, D. (1967) 'The Mossi kingdoms', in C. D. Forde and P. M. Kaberry (eds), pp. 152–78.

Zarncke, F. (1876–9) *Der Priester Johannes* Abhdl.d.philhist.Cl.d.kgl. sachs.Ges.d.Wiss., vols 7 and 8 (Leipzig: Hirzel S. Verlag).

Zeltner, J. C. (1979) *Les Arabes dans la région du lac Tchad* (Sarh, Chad: Centre d'études linguistiques, Collège Charles Lwanga).

Zurara, G. E. de (1896, 1899) *Cronica dos feitos de Guiné* (*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ed. and Eng. trans. by C. R. Beazley and E. Prestage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Nos 95 and 100).

Zuure, B. (1929) *Croyances et pratiques religieuses des Barundi* (Brussels: Essorial), 208 pp.

Zwanenberg, van R. M. A. and King, A. (1975) *An Economic History of Kenya and Uganda – 1800–1970* (Nairobi: Macmillan), 326 pp.

Zwanenberg, van R. M. A. and King, A. (at press) (a) 'Retracing the footsteps of Mukama', in J. B. Webster (ed.), *Uganda Before 1900*, vol. 1.

Zwanenberg, van R. M. A. and King, A. (at press) (b) 'Emergence and crisis: the state of Busoga', in D Denoon (ed.), forthcoming.

术语汇编

abara，阿巴拉：豪萨、凯比和努佩的(大)独木舟。

abba gada，阿巴·加达：奥罗莫人社会(埃塞俄比亚)一族体的首领，从"加达"(gada)成员中选出。

Abbot，阿波特(头衔)(源自阿拉米语"abbā"，意指父亲)：修道院院长；亦为僧侣的尊称。

abeto，阿贝托：埃塞俄比亚的尊称：殿下。

ʻabīd，阿比德(单数ʻabd)：阿拉伯语中对"奴隶"的通称，多指"男奴"，"女奴"为"伊玛"(imāʼ，单数，ama)。

abilema，阿比勒马：温尼亚库萨最早的居民(马拉维湖区)。

ʼAb Shaykh，阿布谢赫(头衔)(阿拉伯语)：级别仅次于素丹；掌握很大权力的职位。

abuna，阿布纳(头衔)：阿比西尼亚教会大主教；埃塞俄比亚教会大主教。

abusua kuruwa，阿布斯瓦·库鲁瓦：阿散蒂人氏族罐。

abusuapanin，阿布斯瓦潘宁：(阿肯人家庭的)家长、首领。

achikunda，阿奇孔达：普拉佐制度的下层奴隶队伍，其统治阶级为"普拉齐罗"(prazero)。

ada，阿达("国家的传统")：剑，权力的象征(在博尔诺)。

adamfo，阿达姆弗("附庸国")：大阿散蒂国的省区管理制度，在此制度下，组成联邦的每一国家通过国王或者联邦成员国、或通过通常驻在库马西的库马西国诸翼别首领之一为"阿散蒂赫内"(Asantehene)服务。

adanudo，阿达努多：埃维人一种色彩艳丽的布(加纳)。

adinkra，阿丁克拉：带有阿肯人传统图案和象征的宽布。

Adontehene，阿登特赫内(头衔)：库马西国诸翼别首领之一，阿散蒂赫内的封臣。

Adonten 或 *Krontire*，阿登顿或克隆蒂拉：阿夸穆国和宗主阿散蒂国的前卫部队。

agape，阿加普：与圣餐相联系的一种"友爱聚餐"。

āghas，阿加斯(阿拉伯语)：民兵的高级军官。

Agha，阿迦(头衔)：近卫军司令(在埃及)。

Agona Aaontendom，阿戈纳·阿登顿多姆：登基拉国的前卫部队。

aguadente，阿瓜登特(葡萄牙语)：烈酒，类似白兰地。

ahl al-usūl，阿赫尔乌苏尔(阿拉伯语)：具有古老门第和身分的成员。

ajami，阿贾米：非洲语言的阿拉伯译本(如豪萨的阿贾米手稿)。

Ajiya，阿吉亚(豪萨兰卡齐纳的官衔)：司库。

akuaba，阿夸巴：用木或赤陶做的小型母性玩偶。在加纳仍可发现。

Akumatire，阿库马蒂拉：登基拉国的右翼部队。

Akwamuhene，阿夸穆赫内(头衔)："阿夸穆国王"；库马西国的翼别酋长之一，阿散蒂赫内的封臣。

Akyeamehene，阿基亚姆赫内(头衔)：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的外交部长和首席语言学家。

alcaid，阿尔凯德(从西班牙语"alcaide"而来，以前为"alcayde"，意为首领)：城堡和要塞的总督或司令(如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摩尔人中间)——参见"ka'id"。

alcali，艾尔卡里：收集人(在马林卡)。

Alfa，艾尔法：富塔贾隆联盟各

省(diwe)酋长的头衔。

algaita,艾尔盖塔:一种乐器(在豪萨兰)。

Alifa,阿利法:一种官员头衔(在加奈姆)。

aljaravais,艾尔贾拉瓦伊斯(葡萄牙语):从北非伊斯兰教各国来的衣服。

alkaali 或 *alkaati*,艾尔凯里或艾尔凯提:与地中海地区阿尔凯德相对应的非洲官职。

Almamia,艾尔梅米亚:土地占有权和税收制度(在富塔贾隆、富塔托罗和索科托哈里发统治区)。

almadies,阿尔马迪斯:船舶(在塞内冈比亚)。

Almamy,阿尔马米(邦杜,富塔贾隆和富塔托罗的头衔):富尔富尔德语对伊玛目这一称号的译法。

amahiga,阿马希加人:次氏族,在哈亚人地区。

amanyamabo,阿曼尼亚马波("城镇的主人"):国王(在尼日尔河三角洲)。

amashanga,阿马香加人:次氏族(在卢旺达)。

amatega,阿马特加:酒椰制的手镯。

amatsano,阿马查诺:在马拉维国家,曼克汉巴的卡友加人的神龛看守人。

amenokal,阿门诺卡尔(头衔):图阿雷格人对穆斯林伊玛目和卡蒂的相应称号。

amīr,埃米尔(阿拉伯语):给予将军、司令官、省级统治者有时也包括小国君主的称号(在西方拼作 emir)。

Amī al-Ḥadjdj,艾米尔哈吉吉(阿拉伯语):为去麦加朝圣的长途旅行车队提供保护的武装。

Amīr al-Khazna,艾米尔卡兹纳(阿拉伯语):负责护送埃及库银到伊斯坦布尔的武装。

Amīr al-muʾminīn,艾米尔·穆米宁(阿拉伯语):哈里发称号,意为"王子,虔诚宗教徒的统帅"。

amos,阿莫斯:葡萄牙封建领主。

Ampagnito-bé,阿姆帕格尼托-贝(马尔加什王室头衔):伟大的、神圣的王室祖先;人民的父亲。

anaratahina,安纳雷塔希纳:语言禁忌(在马达加斯加的马哈法利)。

andria,安德里亚:领主、贵族(马尔加什语)。

andriana,安德里亚纳:贵族阶级(在马达加斯加的马任加)。

Andrianoni,安德里亚诺尼:马达加斯加奥尼拉希王国第一任统治者的安蒂莫罗头衔。

ant-ankara,安特-安卡拉人:"岩石之民",如马达加斯加遥远北部的安坦卡拉人。

Apagyafie,阿帕贾菲:从登基拉来的一群金匠和工匠。

ardo 或 *rugga*,阿尔多或拉加:富尔贝人对穆斯林伊玛目和卡迪的相应称号。

aringas,阿林加斯:在普拉佐里,移民与奴隶之间以往差别变得模糊的一种制度。

arivo,阿里沃:一千,几千(马尔加什语)。

arratels,阿拉托斯:葡萄牙语中与磅相应的计量单位。

ʿarsh,阿尔希(阿拉伯语):民族地区;社团与群体占有地;村社土地。

asafo,阿萨孚:阿肯人战士。

Asantehene,阿散蒂赫内:阿散蒂大酋长之头衔。

Asarki 或 *Inna*,阿萨尔基或英纳:赞法拉(豪萨兰)君王之姊妹的称号。

asiento 或 *assiento*,阿西恩托(葡萄牙语的 asiento 意为座位、法庭会议之地、条约、契约,来自 asentar,其意为坐、签约):西班牙与另一国或公司或个人之间关于向西班牙美洲领地提供非洲奴隶的合同或公约。

Askiya,阿斯基亚:桑海君王为与以前的索尼王朝相区分而采用的王室称号。

asomfo,阿索姆福:阿散蒂的金凳子。

atesin,阿特辛:坟墓,在特索(大湖地区)。

attajirai(或 *masu arziki*),阿塔基拉伊(或马苏·阿兹基):富商;富人(在豪萨社会)。

audiencia,沃迪恩西亚:1)指西

班牙君王亲自关注审判事务的法庭;代表西班牙国王的教会或世俗的法院;2)指在西班牙殖民地频繁使用军事权力并起司法与政治作用的高级审判法庭;3)近代西班牙的省级或地区级高级法院;4)沃迪恩西亚的司法管辖权。

awāwa,阿瓦瓦(阿拉伯语):武装部队。

awliya,沃里亚(阿拉伯语):圣人。

ayari,阿亚里(豪萨语):连接阿兹宾和豪萨兰的商队。

Ayilol,阿伊罗尔:参见 cilol。

Ayo 或 *Lurum'ayo* 或*Lurun'yo*,阿约或鲁罗姆阿约或鲁伦约(莫西头衔):鲁罗姆国王。

Azabān,阿扎班(单数为 azab):阿拉伯语,意为"未婚男子或女子","处女",用来指 13 与 19 世纪间奥斯曼帝国及其他土耳其政权统治下几种类型的战斗员。他们是奥斯曼帝国军队或奥贾克的组成部分。

azalai 或 *azalay*,阿扎莱或阿扎雷:指由数千只骆驼(更准确地说,单峰驼)组成的商队,这种长途贸易商队在春季和秋季将盐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盐矿运到萨赫勒和苏丹的热带地区,陶代尼的盐矿取代了塔哈扎的盐矿,后者是马里和加奥(14-15 世纪)国王们财富的来源。

azel,阿则尔:采邑。

baadolo,巴阿多罗:农奴(在塔克鲁尔)。

babika 或 *bampika*,巴比卡或班比卡(单数 mubika):奴隶,刚果社会诸阶层之一。

babuta,巴布塔(单数:mubata,源自 vata 或 evata 意为"村庄"):庄稼人,刚果社会诸阶层之一。

bacucane,巴丘凯恩:家奴(在豪萨兰)。

bado,巴多:莫雷语"纳阿巴"在莫西语中的说法。

badolo,巴多罗:农奴(在塔克鲁尔)。

Baganwa,巴干瓦:王族王子们的称呼(在布隆迪)。

bagazam,巴加扎姆,参见"dan Azbin"。

Bahargazal,巴哈尔加扎尔,参见"dan Bahar"。

Bāḥar nagāš,巴哈尔·纳扎斯("海王"):埃塞俄比亚帝国最北部省份的总督。

bahaushe,巴豪谢:商人(在豪萨兰)。

bahutu,巴胡图:参见"muhutu"。

bairu,巴伊鲁:封为贵族的(氏族)。

Bakabban kumbu,巴卡班昆布:塔克鲁尔回到土地上的农民。

bakama,巴卡马:参见"mukama"。

bakungu,巴昆古:酋长(在布隆迪和卢旺达)。

balama 或 *kanfari*,巴拉马或坎法里:在桑海帝国,帝国的派驻总督或监察长;军队司令官。

Balangira,巴兰吉拉:在哈亚国家,王族的王子。

balma,巴尔马:盐,以巴尔马城(在豪萨兰)命名。

balowoka,巴罗沃卡("过湖的人们"):在通布卡地区(赞比西亚北部),指家族的族长。

Baum-Naaba,包姆-纳阿巴(莫西人头衔):负责供养问题和内部事务的高官。

(the) *Bambudye*,班布杰:帮助卢巴国王进行统治的一个秘密团体。

Bambus Massarabe,班布斯·马萨拉巴("从埃及来的甜瓜"):泡泡(在卡努里)。

bami,巴米:参见"mwami"。

Bantamahene,班塔马赫内:库马西国诸翼别酋长之一,阿散蒂赫内的封臣。

baraka,巴拉卡(阿拉伯语):"上天的恩宠","创造奇迹的天赋","魅力";伊斯兰隐士特别是先知穆罕默德(shurafā')后人的赐福。

barbariores barbari,巴尔巴里奥雷斯·巴尔巴里:未开化的人(埃塞俄比亚)。

Barde,巴尔德(卡诺的头衔):首领。

bares,巴雷斯:矿山,在赞比西亚北部地区。

Basace，巴萨斯(豪萨兰赞法拉的头衔)：担任某种古老的、长期被人遗忘的职位的长者，塔拉的成员。

(the)*bāshiya* 或 *pashists*，巴希亚(阿拉伯语)或帕希斯兹：阿里帕夏的追随者。

Batahene，巴塔赫内(头衔)：商业部长，在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

batieba，巴提巴：莫西地区统治者或酋长。

batware，巴特瓦雷：酋长(在布隆迪和卢旺达)。

bawa，巴瓦：俘虏(在豪萨兰)。

bawan Sarki，巴万·萨尔基：王室奴隶(在豪萨兰)。

bawdi peyya yiyan，包迪佩亚伊延：战鼓(在富塔托罗)。

bay'a，贝耶(阿拉伯语)：对君主效忠的宣誓；授职宣誓；效忠誓言。

baydan，贝丹(阿拉伯语)：牧民。

baye，巴耶(复数 bayii)：俘虏(在扎尔马)。

bayi，巴伊：在豪萨的俘虏；抓来或买来而具有很少权利的奴隶。

Bayt al-māl，贝特·马尔：(国库)，在阿拉伯语中。

bayti，贝提：空地(在富塔托罗)。

bayti maal 或 *leydi maal*，贝提-马阿尔或雷提马阿尔：国有地。

Beecio，贝西奥：一种头衔(在瓦阿洛)。

bega，贝加(莫西)：一个巨大的仪式周期，国王和该地所有要人为祈求好收成而举行的献祭。

belaga，贝拉加：沟渠(在卡努里)。

benangatoobe，贝南加图贝：在塔克鲁尔的等级制度中，包括沙基贝、瓦伊尔贝和戈罗的一个阶层。

Benkum，本库姆：阿夸穆国和宗主阿散蒂国的左翼军。

bey，贝伊(土耳其语的绅士、酋长、王子)：1)奥斯曼帝国一个区或小省的总督；2)素丹的封臣(如：突尼斯贝伊)；3)奥斯曼帝国的高层官员、高级军官；4)对人的尊称，以前用于土耳其和埃及。

beylerbey，贝勒贝(复数，beylerbeyi)：一个省的总督，Sandjak-beylik 的首领。

beylik，贝伊里克：贝伊里克这一词既表示一个贝伊的头衔与职位(或作用)，也表示在一个贝伊统治下的领地(领土，管辖范围)。后来，此词意义延伸到也可表示"国家、政府"，同时，亦可表示一个有时具有某种自治权的政治和行政实体。

bid'a，比达(阿拉伯语)：革新，例如，将传统宗教的习俗移植到伊斯兰教中。

bilād al-Makhzen，比拉德马赫增：在马格里布，处于国家权力之下的国土。

Bilād al-Sūdān，比拉德苏丹：阿拉伯语的字面意义为"黑人的国土"；这一词几乎一直被阿拉伯作家用来指西非的黑人，而西非又是一个广阔的地带，不仅包括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和乍得湖盆地，而且包括更南端的萨凡纳和森林国家。"苏丹"这一词现在用来表示尼罗河谷的一个在古老文献中从未被如此标示过的国家。

bilbalse，比尔波斯(莫西)：成年仆人。

bilolo，比罗罗：参见"kilolo"。

Bin-Naaba 或 *Rasam-Naaba*，宾-纳阿巴或瑞桑姆-纳阿巴(莫西头衔)：王室俘虏的头领。

birr，比尔：银，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

Biton，比通：班巴拉的头衔，意为"司令"。

bolo，波罗("手臂"，班巴拉语)：在萨摩里·杜尔军队中步兵的一个分队，由几个"森"(sēn)组成。

boma，波马(斯瓦西里语)：用于放牧或防卫目的的一块圈地或围起的地方。

bomo，波摩：毯子(在阿肯人中间)。

bozales，波扎尔斯(西班牙语)：与 Ladinos 不同，bozales 是直接从非洲买来的奴隶，他们以前与欧洲无任何接触。

Brak，布拉克：瓦阿洛的头衔。

buch jodong gwèng，巴奇·卓东·

格文:长老议事会(在卢奥族人中间)。

buch piny,巴奇·平尼:卢奥族人的次族群议事会。

bud-kasma,布德-卡斯马:(莫西人)"布杜"的首领。

budu,布杜:在以父亲血统和(夫家)父系地域为主的莫西人社会,从最广泛和最古老到最狭窄的意义上,这个词表示任何传代群体,此群体作为族外婚的关联单位活动。

bugo,布戈(复数,buguba):(莫西人)管繁殖的祭司。

buguba,布古巴:参见"bugo"。

buguridala,布古里达拉(源自buguri,意为灰尘):苏丹语表示神学学者、顾问。

buhake,布哈克:一种保护关系(在卢旺达)。

bukin duku,布金·杜库("千人宴席"):豪萨兰的一个传统,必须证明可以获得1000捆小米或高粱的收成。

bulala,布拉拉:参见mbarma。

bulopwe,布罗普韦:卢巴人对权力的概念(卢巴王权是建立在布罗普韦或神圣原则之上)。

Bulut Kapan,布鲁特·卡潘:阿里·贝伊的绰号,意为"捕云者"。

burguram,布尔古兰姆:上诉法庭(在加奈姆-博尔诺)。

Burr Jullit,布尔·朱里:("伟大的祈祷师"):宗教领袖,在塞内冈比亚。

Buur,布乌尔:一种头衔(在卡约)。

Bwami,布瓦米:奔巴和里加社会的社会政治宗教机构。

cafre,卡弗雷(源自阿拉伯语kāfir,意为"异教徒"):生活在cafrevie(卡弗雷里)即赤道以南非洲的非穆斯林地区的居民(参见Kaffirs)。

capitão-mor,卡皮丹-摩尔(复数,capitãos-mores,为葡萄牙语):在绍纳国,市场上的商人代表,由葡萄牙政府任命。

caracoes,卡拉可斯(葡语中的贝、贝类动物、贝壳):在赞比西亚地区发现的小型石珠。

carataze,卡拉塔兹:船的航道。

Cavushān,卡乌珊:奥斯曼帝国军队(奥贾克)组成部分之一。

ceddo,塞多(复数为sebbe):军阀,战争首领(在塞内冈比亚)。

Cerākise,塞拉凯斯:(cerkes)塞凯斯是对构成伊比利亚-高加索各族中的西北支队的人们的通称。他们是奥斯曼帝国军队或奥贾克的组成部分之一。

chāt,恰特:参见"kāt"。

chechia,切奇亚:红色羊毛女帽。

chemwa,切姆瓦:参见"njemani"。

chidi,奇迪:采邑,封地(博尔诺)。

chikunda,奇孔达:在普拉佐制度里,由"萨奇孔达"率领的一支奴隶军队。

chikwange,奇宽吉:刚果人一种有名的面包,用木薯根制成。

chimas,奇玛:封地保有者(博尔诺)。

chima gana,奇玛加纳:晚辈的封地保有者(博尔诺)。

chira,奇拉:在卢奥兰,一种不治之症,据信为祖先加于做坏事者及其后裔身上。

chiroma,奇罗马(一种博尔诺的头衔):推定继承人。

chuanga,川加:在普拉佐制度里的上层奴隶。

Cilol,希罗尔(复数,cilol):地区统治者(在隆达)。

cire perdue,(法语):脱蜡法

cofo,科弗:"恩赞布"的一种单位(刚果)。

Cokana,科卡纳:一种吉祥物(在豪萨兰)。

colono,(葡语):移民、定居者(在普拉佐)。

comprador,买办(来自葡语comprar,意指"购买,买"):1)以前指在印度和远东欧洲人所雇本地仆人,专门购买必需品和管理家庭账务;2)现在指在中国受雇于欧洲人所建机构特别是商行的本地雇员负责人,或是作为本地雇员的主管,或是作为公司与本地顾客之间的中介人。3)被认为是外国统治和剥削的代

理人。

cootigu，科捉古：佃农所付费用。

Creole，克里奥尔（源自西语 criollo，意指“生于当地的人”）：生于前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圭亚那、留尼汪）但有欧洲祖先的人；克里奥尔：一种语言，产生于黑奴贸易（16-19世纪），并成为黑奴后裔的母语（在西印度群岛、圭亚那、印度洋群岛等地）。存在着以法语、英语、葡语等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瓜德罗普的克里奥尔语，加勒比地区的英语克里奥尔语。

cruzado 或 *crusado*，克鲁扎多或克鲁沙多（复数，cruzados 或者 cruzadoes），（从葡语 cruzado 而来，意指“标有十字架”）：一种葡萄牙旧金币，最初由阿丰索五世（1438-1487年）在大约1457年发行，在其背面有十字架，以纪念国王反对北非穆斯林的十字军征伐；另指一种类似的葡萄牙银币，最初由约翰四世（1640-1656年）发行。

curva，库尔瓦：在受葡萄牙影响的地方以“海关税”为人所知；英语的“关税”；葡萄牙人付给姆塔帕统治者的一种贡赋。

dabey，达贝：在桑海，奴隶村。

dadde yiyan，戴德伊延：战歌；血歌（在富塔托罗）。

dady，达迪：在萨卡拉瓦地区（马达加斯加），祖先崇拜；祖先沃拉麦纳的遗体。

dafing，达分：氏族（在马尔卡人中间）

Dagaci，达加西（头衔）：一种宫廷显贵（在卡诺）。

dagga，代加（从祖鲁语和科萨语的 daka 而来，意指“软泥”、“粘土”、“臼”）：在南部非洲使用的一种臼，主要是捏泥制成（软泥和粪的混合物）。

Damel，达梅尔：统治者的称号（在卡约）

Damel-Teen，达梅尔-廷：统治者的称号（在卡约）

dana 或 *dayna*，达纳或达伊纳（从阿姆哈拉语 danya 而来）：法官。

Danau，达瑙（豪萨兰赞法拉的官衔）：总督，其名称得自他所居住的城镇，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他从这里守卫着通向凯比以南和以西的道路。

dan Azbin 或 *bagazam*，丹·阿兹宾或巴加扎姆：从阿兹宾来的种马。

dan Bahar 或 *Bahargazal*，丹巴哈尔或巴哈尔加扎勒：从加扎勒河来的种马。

dandal，丹达尔（“U”型城的通道）：大部分卡努里“U”型城镇和村落的住宅区主要街道。

Dan Dubal，丹杜巴尔（豪萨兰的官衔）：在赞法拉，宗教事务顾问，赞法拉历史的保管人，并负责为军队的胜利而祈祷。

Dan Kodo，丹·科多（豪萨兰的官衔）：参见 Dan Dubal。

Dār al-Islām，达尔伊斯兰：阿拉伯语指“伊斯兰世界、王朝和领域”；特许领地（与“不信仰宗教者”和“异教徒”居住的战争地区 Dār-al-ḥ-harb/不信真主的地区 Dār al-kufr 相对应），处于穆斯林君权之下，穆斯林社区居住之地，在这里（1）遵行教会法规或沙里亚；（2）推行伊斯兰教的社会政治秩序，官方宗教为伊斯兰教（虽然并非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

（the）*Darb al-' Arba' īn*，达尔卜·阿尔巴因（阿拉伯语“四十日之路”）：联接达尔富尔地区与埃及的历时约40天的穿越撒哈拉的主要通道。

daru khuru dj，达鲁库鲁吉（非伊斯兰化之地）（阿拉伯语）：这是指非穆斯林地域（与伊斯兰教地区相对应），世界上其余尚未处于伊斯兰教统治之下的地区，但从理论上说，这些地区有一天注定要消失而并入伊斯兰世界，正如《古兰经》中所阐述的那样（IX，33）。（参阅 Dār al-kufr/Dar al-ḥarb），“世界，战争的领地”，见第三卷）。

debe，德贝：奴隶村（在索宁克）。

debeere，德比利：奴隶村（在富尔富尔德）。

Defterdār，德夫特达尔（阿拉伯语）：省财政部门审计员（在埃及）。

deggwa，德哥瓦：在埃塞俄比亚，赞颂神圣三位一体——耶稣基督、圣马利亚、圣徒或天使的圣歌。这些圣歌根据不同的韵律节拍或关于其起源的传说而具有不同的名称（参见 kene，malkele 和 salam）。

dey，德伊（从土耳其语"dāyī"而来，意指"舅舅"）（尊称）：（1）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统治官员，特别是 1671 年至 1830 年阿尔及尔摄政首领（即 1830 年法国征服之前）；（2）也表示土耳其近卫军中的一个较低级别；在突尼斯，接近 10/16 世纪末期时，对近卫军中 40 个地区的首领的称呼。

al-Dhahabī，达阿比（从阿拉伯语 dhahab 而来，意指"纯金"）："金子的"，摩洛哥萨阿德王朝第六位君主艾哈迈德·曼苏尔的绰号。

diatigui，迪阿蒂古：一种头衔（在廷巴克图）。

dibalram，迪巴尔拉姆：过路税（在博尔诺）。

diema，迪马：莫西地区王国或酋邦。

Dikko，迪科：18 世纪在凯比（豪萨兰）新设的一种头衔，第一次拥有这一头衔的是其母为君王之女的一位普洛人。

dimaajo，迪马朱：家奴（在富尔富尔德）。

dimo，迪莫（复数"rimbe"）：自由人（在富塔贾隆）。

Dirki，迪尔基：一种护符、吉祥物（在豪萨兰）。

disi，迪西（"胸膛"，班巴拉语）：塞古军队按作战队形排列时的中央部分。

diwal，迪瓦尔（复数，diwe）：省份（在富塔贾隆）。

dīwān，迪万（阿拉伯语）：中央国库或财政部；国务委员会；军队抚恤金名册；诗集；大厅或会所；部门；统治者。

diwe，迪乌：参见"diwal"。

djallāb，贾拉布（阿拉伯语）：奴隶商人，奴隶掮客，称为"进口商"。他们担任长途贸易的中间人和财政提供人。

djamā'a，贾马（阿拉伯语）：会议，大会。在伊斯兰的宗教语言中指"全体信教者"，djamā' at al-mu' minīn；因此通常意思是"穆斯林社团"，djamā' a islāmiyya。

djammā'，贾马（阿拉伯语的"采集者"）：阿卜达拉比国领袖阿卜杜拉的绰号。

al-djazzār，贾扎尔（阿拉伯语"屠夫"）：埃及贝伊阿里·贝伊的一名马木路克随从艾哈迈德·鲍斯纳克的绰号。

djihād，吉哈德：阿拉伯语字面意思为"努力"；djahād akbar："最大的努力"；（1）压抑个人感情的斗争；一个人可尽的最大努力；为达到某一特定目标的努力；（2）信教者为伊斯兰教信仰服务的个人努力，特别是指保卫伊斯兰、其土地和穆斯林，反对邪恶的敌人或扩大伊斯兰领土（Dār al-Islām）的斗争；引申为"圣战"。

djinn，吉因（阿拉伯语）：精灵。

al-Djinn，吉恩（阿拉伯语"魔鬼"）：埃及贝伊阿里·贝伊的绰号。

djuad，朱阿德（阿拉伯语）：武士首领。

Doka，多卡（豪萨兰凯比的官衔）：负责国内安全的官员。

dolo，多罗：米酒；果酒；酒精（在索宁克）。

Dongo，东戈（神）：豪萨兰一位博尔古猎人，他的神力与约鲁巴文化的桑戈的神力等同。

doomi Buur，多米·布尔：参见"garmi"。

dukowo，达科沃：领土单位（在埃维兰）。

dunuba，冬努巴（班巴拉）：塞古的一种鼓，可以熟练的手法向相当远的地方传递信息。

dupi，杜皮：奴隶阶级（在西尼洛特人社会）。

Dwabenhene，德瓦本赫内（"德瓦本国王"）：组成大阿散蒂联邦的两个附庸国（克拉克叶和巴萨）的领袖。

dwar，德瓦尔：帐篷组成的营地。

dyon goron，迪昂戈龙（班巴拉）：沃罗索（woloso）在其子女代

替了他并每年支付给其主人一笔保护金之后所取得的地位。

eččage，埃卡基：埃塞俄比亚教士的领袖。

egusi，埃古西：一种当地作物(在伊格博兰)。

ekanda，埃坎达：在刚果社会指母系氏族、母系制度，但也指群体、共和国；简言之，任何社会群体。

Ekine 或 *Sekiapu*，埃基尼或塞基亚普：一个面具舞秘密会社；尼日尔河三角洲诸国的化装会社。

Ekpe，埃克佩：卡拉巴尔的埃克佩会社是克鲁斯河谷和喀麦隆部分地区的森林族群中普遍存在的豹崇拜的一种变体。

Ekpo，埃克波：一种秘密会社(在伊比比奥人中)。

emīn，埃明(从阿拉伯语 amin 而来，意指“忠实的、值得信赖的”)：奥斯曼的一种行政官衔，经常译为“地方行政长官”或者“地方长官”；征税人。他的作用或职位称为 emānet。

emitwe，艾米特韦：安科累(今天的乌干达)的一种军事组织制度。

emuron，埃穆隆：预言家(在特索)。

endahiro，恩达希洛：起誓(在安科累)。

enfunzi，恩芬齐：一种叫作戴菊的鸟，是巴胡图、巴欣达和西兰加王朝(在大湖地区)的禁忌。

erasa，伊拉萨：参见 rasa。

erythrina，血红树；扬贡贝/基兰加的圣树(在哈亚地区)。

escales，商站。

eso，埃索(约鲁巴)：在奥约，致力于“战争训练”的武士。

etem，埃特姆(复数，itemwan)：在特索和库曼，多氏族祭祀群体。

etogo，埃托戈：在兰戈(今天的乌干达)，多氏族祭祀群体。

evata，伊瓦塔(刚果语)：村庄(刚果王国)。

eze，埃齐(伊格博头衔)：国王。

eze Nri，埃齐·恩里(头衔，意指“统治者”、“恩里的国王”，在伊格博人中)：具有祭祀和神秘力量但没有军事权力的祭司国王。

faa，法(班巴拉)：生物学意义上的群落中的父亲。

faama，法马(班巴拉头衔)：具有最高权力的领主；具有权力和权威的人。

faaya，法亚：父亲(在班巴拉)。

fady/faly，法迪/法利：神圣的(马尔加什语)。

Fahatelo，法哈特洛：在伊博依纳(马达加斯加)，首席部长；王室官员。

fakī，法基：fakih 的讹用。

fakīh，法基(阿拉伯语，复数，fukahā')：“法学博士”；1)精通菲克(fikh)的学者；法理学家；2)有文化的人；3)神学家。

fallāh，法拉(复数，fallāḥīn)(阿拉伯语)：农民(在北非)。

Famoriana，法莫里亚纳：安坦卡拉的王室议事会(马达加斯加)。

fanadir，法纳迪尔：笼子(在博尔诺)。

fanafody，法纳弗蒂：驱邪治病法物(马达加斯加)。

fanane，法纳那：蛇(马尔加什语)。

fandroana，凡德洛亚纳：每年一度的王室沐浴仪式(在梅里纳，马达加斯加)。

fani，法尼：在科摩罗群岛，继前伊斯兰时代的贝贾人而起的第一批伊斯兰酋长。

farba，法尔巴：政府官员。

fari 或 *farma*，法里或法尔马：曼德人君王的头衔。

farin 或 *faren*，法林或法伦：各省的统治者；总督。

Farinya，法林亚(来自 Fari 或法老)：索宁克语、曼德语等的“统治者”。表示与被控制的初始曼萨亚的君主寡头政体相对应的一种独裁统治。

faro，法罗(“尼日尔河的神灵”)：班巴拉人中的一种宗教崇拜。

fāshir，法希尔(阿拉伯语)：王室住宅。

fatake，法塔克(单数，farke 或 falke)：从事“法陶西”(fatauci)

的专业商人。

fatauci，法陶西：在豪萨兰，中、长途贸易；批发贸易。

fatidra，法提德拉：王室血盟（在马达加斯加）。

fehitra，菲希特拉：村庄封地（在马达加斯加）。

feiras，费拉斯：集市（葡萄牙语）。

fia，费亚：达科沃的国王（在埃维兰）

fidda dīwānī，非达迪瓦尼（阿拉伯语）：纯银币。

fikh，菲克（阿拉伯语）：编纂和解释"沙里亚"法规的学问；教会法规；法理学；伊斯兰法律。

filiiga，菲利加：莫西人的感恩节。

filohany，菲罗哈尼：酋长（马尔加什语）。

fitahina，菲塔黑纳：一种语言禁忌（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人中）。

fla-n-ton 或 *ton*，弗拉-恩-通或通：同龄人协会；该协会将那些经连续三次提升的行了割礼的成员结合在一起。

folahazomanga，弗拉哈佐曼加（马尔加什语"从别的地方来到马哈法利的人"）：马达加斯加马哈法利社会的组成部分。

fom，丰姆：废墟（在喀麦隆的巴蒙）

fonio，马唐：（Digitaria exilis），产于北非，其籽可食用的一种草类。

Foroba，福罗巴：公共金库（在班巴拉）。

foroba-dyon 或 *furuba-dyon*，福罗巴-迪昂（"大公共土地的俘虏"）或富鲁巴-迪昂（"大联邦的俘虏"）：王室奴隶。

Foroba Fulaw，福罗巴-富劳：富尔贝政府官员。

forso，弗尔索：在桑海指家奴。

fuku，富库（从 fuka 而来，意指"盖、遮"）：依附于他人者（在刚果）。

fumwa pamba diyumbi，福姆瓦·潘巴·迪约比（刚果语）：符咒的制造者和保持者及卢巴国王宫廷的占卜者。

furba jon，富尔巴琼：苏丹王室俘虏；曼德王室奴隶。

fure，付雷：参见"gorongo"。

furuba-dyon，富鲁巴-迪昂：参见"foroba dyon"。

gaba'il，加巴伊尔（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指与阿拉伯人同化了的族群。

gabar，加巴尔：在埃塞俄比亚指为占有土地的贵族的利益而耕作的农民，与"法拉"（fallāh）一样，他们类似农奴，或至少与必须交纳"加比尔"（gabir）的进贡者和依附者相似，依其是分成获取收益抑或佃农而定。

gabarti，加巴尔提：商人（在埃塞俄比亚）。

gabas，加巴：农奴。

gabir 或 *siso*，加比尔或西索：一种由"加巴尔"（gabar）交纳的税。

gabirecco，加比雷科（埃塞俄比亚的一种荣誉头衔）：王室侍从官。

gada 或 *luba*，加达或卢巴：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社会根据不名数原则建立的年龄组分类法。它是一种由各年龄组轮流执政的平等制度。

gaisuwa 或 *tsare*，盖苏瓦或查雷：定期送给上司的礼物（在豪萨兰）。

Galadima，加拉迪马（一种博尔诺官衔）：类似总理或大臣，国家所有的事务都委托给他。这一官衔引自博尔诺，但在那里，是指西部诸省即靠近豪萨兰诸省的总督；在卡齐纳指担任"萨尔基"代表的重要官员；在卡诺指军事首领；在索科托，指哈里发的顾问，他充当哈里发与埃米尔诸国之间的联系。

Galadiman Gari，加尔迪曼·加里（豪萨兰的凯比的一种官衔）：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官员。

galag，加拉格：付给塔克鲁尔贵族政府政治首领的一种税。

Galoji，加洛吉：在凯比（豪萨兰），授予那些与牧民打交道的富尔贝人的称号。

gan，甘：沃洛夫语的客人、外国人。

gandu，甘杜（复数，gandaye）：家

族集体农场(在豪萨兰的赞法拉)。

gandun gida,甘杜恩·吉达(豪萨语):家庭田地,一般叫 gona,是对田地的通称。

garassa,加拉沙:苏丹铁匠。

garim 或 *doomi Buur*,加尔米或多米·布尔:统治阶级(在卡约)。

garu,加鲁:泥墙(在卡努里)。

ga sha,加夏(阿拉伯语):被占土地。

Gatari,加塔里("斧"):在卡齐纳(豪萨兰),警戒西部边界的总督的称号。

gawlo,戈罗:歌舞艺人(塔克鲁尔)。

gayya,加亚:在豪萨兰指互助制度;公共劳动。

ghaushes,加乌舍:中央信使(在埃及)。

ghāzī,加兹(阿拉伯语):征服。

gida,吉达(复数,gidaje):大家庭;家庭组合(豪萨兰)

gikingi,基津基:将专有放牧权给予所有者的一种土地制度(在卢旺达)。

gimaje,基马杰:染色的棉布长衣(在卡努里)。

gobbi,戈比:矿山的年税。

gonüllüyān,戈努尔卢延(单数,gönüllü):土耳其词语,意指"自愿者";在奥斯曼帝国,它用来表示三种互相联系的制度:(1)奥斯曼帝国的最早期,来参加称为"戈努尔卢延"的战斗的自愿者;(2)在10/16世纪时,我们在大部分帝国的要塞里发现了一个称为"戈努尔卢延"的有组织的群体,他们可以应召参战或参与边界战斗;(3)在11/17世纪,在受雇的后备部队中曾提到过一种称为"戈努尔卢延"的群体,这些雇佣后备军有不同名称,是从各省招募而来参战的。

gorongo 或 *fure*,戈伦戈或付雷:烟草花(在卡努里)。

Gounga-Naaba,贡加-纳阿巴(莫西官衔):负责军事的高官。

Grand Kādī,大卡迪(官衔):沙里亚法庭的大法官。

grumetes,格鲁米特:"兰萨多"招募的非洲人后备部队。

guda 或 *goda*,古达或戈达(从阿姆哈拉语 geta 或蒂格赖语 goyta 而来):主人。

Gulma,古尔马:桑海人中对一种高级官员的称呼。

gult,加尔特:在埃塞俄比亚指封建土地;地主拥有的某些权利(如从该地区的每一户收取贡赋的权利和为自己的农场或他可以指派的其他工程占用他人劳动的权利)。

gumbala,吉姆巴拉:在富塔托罗指"塞博"的战歌,包括鼓劲的颂歌。这是面对死亡的壮歌,在歌中塞多将其命运看作是武士,是对祖先和所属等级之伦理道德的忠诚。

gumsu,古穆苏:国王的结发妻子(在博尔诺)。

gurma,古尔马(豪萨语):右边(如河的"gurma"指右岸,而 haus 指左岸)。

gweng,格文(复数,gwenge):卢奥人的半自治的政治和领土单位。

Gyaase,吉亚斯:阿夸穆国家和宗主国阿散蒂的派别之一。

Gyaasehene,吉亚斯赫内(官衔):内务部长(在阿夸穆和登基拉两个帝国内)。

Habshī,哈布什:在印度使用的一个词,用来表示印度的非洲人社群,其祖先最初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印度,主要来自非洲之角,但有些无疑来自邻国的奴隶军队。至少在早期,这些人大部分是埃塞俄比亚人,但这一称呼无区别地用于所有的非洲人。在葡萄牙人与印度进行奴隶贸易时,很多这样的"哈布什"是尼洛特人和班图人。

habūs,哈布斯(阿拉伯语):属于宗教社团的土地。

hadīth,哈迪斯(阿拉伯语):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叙述,由他的同伴报道或传述;"哈迪斯"的集成,称为"逊奈"(sunna),这被穆斯林看作是关于伊斯兰教义和法规的仅次于圣谕的第二个来源(伊斯兰教的哈迪斯与基督教中记述耶稣言行的《新约》最为相近)。

hakura,哈库拉:税务减免。

halika，哈里卡（阿拉伯语）：创造。

hallabens，哈拉本斯（葡萄牙语）：出自北非伊斯兰教各国的服装。

Hanimboay，哈尼姆博伊：在萨卡拉瓦各王国（马达加斯加）负责监督“达迪”崇拜的官员。

hanshīr，汉希尔（阿拉伯语）：都市辖下的小麦产区（在突尼斯）。

hanzo，汉佐（出自“nso”，刚果语表示“房屋”）：包裹（在安哥拉）。

h'aoush，赫奥什（阿拉伯语）：都市辖下的小麦产区（在阿尔及利亚）。

Ḥarāṭīn，哈雷廷（单数，Ḥarṭānī）（阿拉伯语）：最初指马格里布地区的农奴（ḥaraṭ-īn）。此词表示撒哈拉地区的黑人民族，特别是西部，即摩洛哥南部和毛里塔尼亚的绿洲上的黑人。他们的起源难以确定，一向被称为黑人柏柏尔人。

al-hayr，阿拉海尔（阿拉伯语）：幸福，会面招呼语。

hayu，哈尤：法官（在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中）。

hazne 或 *hazine*，哈兹奈或哈济奈：国库。

hazomanga-lava，哈佐曼加拉瓦（马尔加什语）：族群祭坛。

heemraden，希姆拉登：市民（在南部非洲）。

hidjra，希吉拉：一般翻译成“出逃”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阿拉伯语该词的准确意思是“割断以前的族体联系并加入新的族体”；此词表示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从麦加到麦地那（前绿洲城镇耶斯里卜）的迁徙，此次迁徙发生在622年7月16日，这一天已成为穆斯林日历（回教纪元）的第一年。

himāye，希马叶（阿拉伯语）：保护费；用来保护被征服人民免受劫掠的保证金。

hore kosan，霍雷科桑：放牧地。

hulwān，胡尔万（阿拉伯语）：特别税，往往八倍于封地的年收入。

（the）*ḥusayniya*，侯赛因派（阿拉伯语）：侯赛因·b. 阿里的追随者。

ibihuya，伊比胡古：国家。

iblis，伊布利斯（阿拉伯语）：魔鬼。

Idara，埃德拉：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中用以指行政管理的通称。在欧洲人影响时期，这一用语似乎取得了其技术意义。

idjāza，伊贾扎（阿拉伯语）：证书。

ifejioku，伊费齐奥库（“薯蓣力量”）：“埃齐·恩里”（eze Nri）的威力之一（在伊格博兰）。

igihugu，伊基胡古：国家（在卢旺达和布隆迪）。

iharana，伊哈雷纳：马达加斯加东北部的贸易站。

iko，伊科：力量（在豪萨兰）。

iḳṭā'，伊克塔（阿拉伯语）：（1）艾米尔根据不同地位和下属人员数目对一个或多个地区的年金进行的财政分配，这种分配是严格监督并不断更新的；（2）君主授予一个财政地区的军事或文职官员收税的权力，作为其为国家服务的酬报；这种特许权是可以撤销的；（3）为维持军人阶层而分配财政特许权；（4）军事封地制度。

ikwa，伊克瓦（基库尤语）：一种薯蓣属植物。

ilari，伊拉里（制度）：奥约国家组织的一个方面，由达荷美开国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特格贝苏引人达荷美国家。

'ilm，伊尔姆（阿拉伯语）：宗教知识。

iltizam，伊尔提扎姆（阿拉伯语）：根据在大约1658年取代穆卡塔阿特制度的伊尔提姆扎制度，对每一村或若干村落的土地进行公开拍卖，最高的出价者（multzim）得到向农民征税的权利，这些土地成为“伊尔提扎姆”。

imām，伊玛目（阿拉伯语）：授予著名法学专家的荣誉头衔，他们在2/8和3/9世纪之间在穆斯林世界的各个知识中心，特别是麦地那和巴格达将整个伊斯兰法律编纂成

典;给予法学院创建者和主要神学家的称号;穆斯林社群的首领、最高领导者;在什叶派中,与哈里发相等的职务(必须是阿里的后裔)。

imāmate,伊玛目特:穆斯林社群的领导权,哈里发或继承的权力;伊玛目的职位或地位;伊玛目作为穆斯林社群领袖的作用;由一位伊玛目统治的地区或国家(例如也门的伊玛目特)。

imiziro,伊米基罗:一种禁忌(在布隆迪和卢旺达)。

indobo,英达博:奴隶村(在豪萨兰)。

Inna,英纳:参见"Asarki"。

Innamme,英纳姆:在凯比(豪萨兰),负责警戒西部边界的总督的称号。

Ionaka,伊奥纳卡:伊马莫诺人的长老议事会(马达加斯加)。

insīlimen,英西利门:参见"zuwaya"。

inyamasango,英亚马桑戈:绍纳国的村长。

itemwan,伊泰姆旺:参见"etem"。

iyāla,伊亚拉(eyālet,埃亚勒特,土耳其语)("管理、行政和行使权力"):在奥斯曼帝国,最大的行政机构,由"贝勒贝"或大总督领导。在这个意义上,该词从1000/1591年以后正式使用。

jaam,贾阿姆:俘虏(在瓦阿洛)。

jaami buur,贾阿米布尔:苏丹王室俘虏。

jadak,贾达克:客人,外地人,佃户(在卢奥)。

Jaggorde,贾高德:选举人议会(富塔托罗)。

jagos,贾高斯:领土副首领(在卢奥人中间)。

jamana,贾马纳:参见"kafu"。

jangali,简加里:畜牧者交纳的牲畜税(在豪萨兰)。

Jengu,任古:在杜亚拉人、伊苏伍人和其他邻近族群中间最具影响的秘密会社,其基础是对水神的崇拜。

jibda,吉布达:麝香(在豪萨兰)。

jodak,卓达克:卢奥人向其出租部分"格文格"的外来家族和氏族。

jodong gweng',卓东·格文:参见buch jodong gweng'。

jodongo,卓东戈:长老(参见buch jodong gweng')。

jombiri jon,琼比里琼(曼德语):"琼蒂吉"(jon tigi)、"法尔巴"(farba)、"贾阿米布尔"(jaami buur)或"萨尔金巴伊"(sarkin bayi)占有的奴隶,他们虽然自己也是奴隶,但从属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阶级。

jom jambēre,琼杰姆贝里:在富塔土地占有制中,有权用斧头开垦土地的人。

jom jayngol,琼雅恩戈:在富塔土地占有制中,有权烧林开垦土地的人。

jom lewre,琼勒里:在富塔土地占有制中,土地的第一个占有者和开垦者。

jom leydi,琼雷第:在富塔土地占有制中,土地的主人。

jon,琼:俘虏(曼德语)。

jon tigi,琼蒂吉:王室俘虏,王室奴隶(曼德语)。

jonya,琼雅(从曼德语jon(俘虏)一词而来):黑人俘虏。

jumbe,朱姆贝:在科摩罗群岛,这一用语表示法尼的女儿们,她们与新来的逊尼派移民结婚。

jurungul,朱伦加尔(花冠):卡努里已婚妇女的一种特殊发式。

(the) Ka'ba,天房:麦加大清真寺广场中央巨大的方形灰石建筑("ka'ba"来自希腊语"kubos",原意为一种骰子),穆斯林在祈祷时总是面对着它。封在宅墙里的是黑石,按照《古兰经》,这是由天使加百利带给亚伯拉罕的,每一位穆斯林如果可能,在其一生中至少要去朝拜一次。

kabaka,卡巴卡:统治者,国王(布干达)。

kabary,卡巴里:公共议事会(在马达加斯加)。

ḳabīla,卡比拉(阿拉伯语,复数,ḳabā'il):一个很大的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父系集团,其成员声称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并可"联合占有一块牧

场”。

kabunga，卡本加：酋长(在刚果)。

ḳāḍī，卡迪(阿拉伯语)：在穆斯林中间，根据穆斯林法律(沙里亚)同时履行民事、法律和宗教作用的地方行政官。

ḳāḍī al-kabīr，卡迪·卡比尔(阿拉伯语)：大法官。

Kaffir，卡菲尔人(取自阿拉伯语“Kāfir”，复数 Kuffār)：意为异教徒，不敬神的人、不信教者；不信仰天启宗教的人；不按照穆斯林法律信奉一神教的人。阿拉伯人用此称所有非穆斯林，并特指一些人或民族。

kafi，卡非：一种与薯蓣类有关的植物。

kafu 或 *jamana*，卡富或贾马纳(曼德语)：省份；小的国家似的领土单位(在马宁克人与班巴拉人中间)。

ḳā'īd，卡伊德(阿拉伯语)：司令，军队首领；省督；卡比拉酋长。

ḳā'īds-lazzām，卡伊德-拉扎姆(阿拉伯语)：税款包收人(在马格里布地区)。

kaigama，凯加马(博尔诺官衔)：北方诸省的总督(在卡诺)。

ḳā'im maḳam，卡伊姆-马卡姆(阿拉伯语)：代理副摄政。

kakaki，卡卡基：一种长号角(在豪萨兰)。

kakwata，卡夸塔(复数，tukwata)：隆达的一类特殊官员。

kalaba，卡拉巴：婚礼的最后仪式(在卡努里)。

Kalala，卡拉拉：先头部队首领(在隆达人中间)。

kalaram，卡拉兰姆：头巾(在卡努里)。

kalimbo barata，卡林博巴拉塔：结婚仪式(在卡努里)。

Kamsaogo-Naaba，卡姆索戈-纳阿巴(莫西官衔)：管理后宫的宦官。

kangam，坎加姆：塞内冈比亚的省首领。

kanun，卡农：钾碱。

ḳānūn 或 *Iḳanūn*，卡努恩或伊卡努恩(从希腊语 Kanôn 而来，本意为“规则”)：法律规定的文集(教规)。

Ḳānūn Nāme，卡努恩法规：试图对奥斯曼统治下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规范的一部法令。

karabiwa mallam，卡拉比瓦·马拉姆：学者(在博尔诺)。

Karfi，卡尔菲(官衔)：在赞法拉(豪萨兰)，受委托汇集“萨拉昆南·拉菲”征收的一切东西的官员。

karite，卡里特：非洲酪脂树油仁。

kasa，卡萨：领土(在豪萨兰)。

ka ṣaba 或 *gasba*，卡萨巴或加斯巴(阿拉伯语)(英语的 casbah/Kasbah)：首府；(小)镇；城堡，宫堡或要塞(在北非)。

kasalla，卡萨拉(从阿拉伯语“sallah”而来，本意为祈祷者)：洗涮任何东西甚至动物(在卡努里)。

Kāshif，卡希夫(阿拉伯语)：地区首领(在埃及)，其任务是照看灌溉系统并向农民征税；征税官。

ḳa sīda，卡西达：一种阿拉伯语或波斯语颂词，哀歌、讽刺诗或颂歌，往往有三重结构。该词从词根 kasada(“针对”)演变而来，因为原始的卡西达意在颂扬诗人的卡比拉并贬低与之对立的卡比拉。后来，卡西达主要作为对恩主的颂扬。

kassa，卡萨：毯子(在阿肯人中间)。

kasuwanci，卡苏万西：零售贸易(在豪萨兰)。

kāt 和 *chāt*，卡特(阿拉伯语)和恰特(阿姆哈拉语)：一种原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灌木(Catha edulis F.)，有轻微的兴奋作用，在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种植，以卡特或恰特的名称出口；也指从这种植物的叶子里提炼的麻醉药。

Kaura，考拉(头衔)：军事领袖(在豪萨兰的卡齐纳)。

kawngal，科恩戈：捕鱼区。

kaya，卡亚(复数，makaya)：设防的村庄；圈起来或设防的定居地(在东非的米吉-肯达人中间)。

kazembe，卡曾贝：将军(在隆达人中间)。

kazi，卡茨：在中非的东南部发

现的一种头衔；是穆斯林卡迪的一种变体。

kela yasku，凯拉亚斯库：卡努里未婚女子经常梳的一种发式。

keletigui，凯来蒂贵(班巴拉)：在塞古军队，军事首领或远征军首领。

kene，基恩：圣歌，在埃塞俄比亚(参见 deggwa)。

kente 或(*Kente*)，坎提：颜色鲜艳的坎提布(阿肯人的)；在加纳，一种加条饰的衣料；亦指用此种衣料制成的一种长衣，轻轻地搭在肩头或围在腰部。

kesiga，凯西加：基督教教士的继承人(在埃塞俄比亚)。

ketema，克特马：驻防城镇。

khalif 或*khalifa*，哈里发(头衔)(阿拉伯语)：先知的继承者；负责保证伊斯兰法律在世间得到遵守的君主。

khames，卡姆斯(阿拉伯语)：附庸者、农奴(在马格里布地区)

khammā，卡马(阿拉伯语)：伍一制分益佃农。

khammāsat，哈马萨特(阿拉伯语)：土地的伍一制分益耕种；租佃耕作。

kharādj，卡拉吉(阿拉伯语)：土地税，有时用实物交纳(除了现金人口税或"吉兹亚"(djizya)以外)的属于迪米(dhimmī，以"伊斯兰的被保护人"的地位住在穆斯林领地的非穆斯林)的土地税；延伸表示所有的土地税(另见 raia)。

khazin，卡津(阿拉伯语)：司库。

khimba，基姆巴(刚果的一种协会)：男孩的一种入会崇拜仪式。

khombe，孔贝：军队司令，在马拉维行政机构。

khorin，科林：省级军事首领(在塞内冈比亚)。

khū dja，库贾(阿拉伯语)：抄写员。

khutba，呼图白(阿拉伯语)：传道士(khaṭib)在礼拜五中午祈祷时在大清真寺的椅子(minbar)上发表的讲话，祈求上帝施恩于该城认可的哈里发，或施恩于授予该城总督权力的君王。

kiamfu，基亚姆福(从"雅沃"演变而来，帝国官衔)：雅卡的领袖。

kia ukisi，基亚乌吉西：神圣的、神的。

kibwindji，基布温吉："基罗罗"(kilolo)负责管辖的地区(卢巴)。

kifuka，基福卡(刚果语)："温文尔雅"，"有礼貌的"，即依附者的行为方式。

kifuka kīa utīnu，基福卡·基亚恩廷努：国王的官廷(刚果语)。

kiims'rogo，基姆斯罗戈：莫西人祖先的神龛。

kilbu，基尔布：泡碱(卡嫩布语)。

kilolo，基罗罗(复数，bilolo)：地域行政官员；酋长(在卢巴/隆达人中间)。

kimpasi，基姆帕西(刚果的一个医疗协会)：一种祭礼崇拜，其目的是消除"姆帕西"(mpasi)。

kini-n-bolo，吉尼-恩-波罗(班巴拉)：塞古军队的右翼。

kirari，基拉里：献给卡诺君主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赞歌(豪萨兰)。

kitomi，基托米：在刚果指土地的前主人。

Kokani，科卡纳(豪萨兰的凯比的一种官衔)：负责民众关系的官员。

kombere，科姆贝里(复数，kombemba)(莫西)：具有广泛自治权的地区酋长，主要是有权任命本地酋长。

kom ngu，孔恩古：王国的顾问(在巴蒙)。

korin，科林：省级军事首领。

kontuowa，孔托瓦：统治阶级或贵族(在博尔诺的卡努里人社会)。

kraal，克拉尔(从葡萄牙语"curral"而来，意指"牛栏、圈地")：(1)科伊科伊人或卡菲尔人以及其他南非或中非土著的村庄，包括若干用栅栏或围桩圈起来的小屋，往往有一块中央空地养牛；也表示住在这种村庄的社群；(2)牛、羊圈，特别是在南非和中非；栅栏、圈、羊栏。

Krontire 克隆蒂拉：参见"Adon-

ten"。

kubandwa，库班德瓦：在卢旺达、布隆迪和布哈的一种人会议式的实施。

kudin haki，库丁·哈基：游牧的富尔贝人交纳的放牧税（豪萨兰的凯比）。

kudin hito，库丁·赫图：关税（在豪萨兰）。

kudin kasa，库丁·卡萨：农民交纳的土地税（在豪萨兰）。

kudin laifi，库丁·莱菲：冒犯者在获得君主原谅后交纳的宽恕税（在豪萨兰）。

kudin sana'a，库丁·桑纳阿：一种职业税（在豪萨兰）。

kugala，库加拉：卢巴姆罗普韦的宫廷高官。

kultingo，库尔廷戈：一种贡赋（博尔诺）。

Kulturkreis，文化圈（复数，*kulturkreise*）（德语）（文化圈学派）：一种文化复合体，从其起源中心在前后相继的时代不断发展并在世界上一个大的地区逐渐扩散；文化圈的概念是由维也纳民族学学派发展的（这一词特别与德国人类学家F. 格雷布内尔和W.施密特相联系）。

Kulughli，库卢格利（从土耳其语"kuloghlu"而来，意指"奴隶之子"）：在土耳其统治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时期，此词表示人口中土耳其人与当地妇女结婚后生育的后代。

Kunduda，昆杜达（豪萨兰的官衔）：凯比的军事领袖。

kurita，库里塔：莫西语单词，意指"在位的死人"，是从"narita"（意指"统治酋长"）一词类推而来。"库里塔"是已逝酋长在活人中的代表，一般从去世酋长的儿子们中间挑选，"库里塔"并不因其称号而拥有权力，而且不得继承，但可以成为其家庭统治以外地区的酋长；如果一位"库里塔"成为酋长，他保留纳阿巴·库里塔的战争之名（Zab yure）。

（the）*Kurkwā* corps，库尔克瓦军团（富尔的持矛士兵）：穆罕默德·台拉卜·伊本·艾哈迈德·布克尔创立的一支常备奴隶军队。

kutama，库塔马：迁徙运动（公元1000年前后从东南非洲到津巴布韦）。

kwaka tree 或 monkey orange，克瓦卡树或猴橙：（1）两种非洲落叶灌木或矮树（Strychnos inocua 和 Strychnos spinosa）中之一种结有可食果肉的硬球状果实；（2）猴橙的果实。

kwama，克瓦马：结果实（基隆迪语）。

kwara，夸拉：一种巫术象征物（在莫西）。

kwaro，克瓦罗（一个过时的词汇，意指"用钱币交换贝壳"）：可能指一种收成税，例如在达马加拉姆就要交这种税。

kyekyedala，凯凯达拉（从"kyekye"而来，意指"沙子"）：苏丹语表示神学者、顾问。

Kyeremfem，克耶雷姆芬：登基拉国家的左翼。

Kyidom，基多姆：阿夸穆国和阿散蒂宗主国的后翼。

laciende 或 *lazenda*，拉西恩德或拉曾达：大地产；拉丁美洲的大种植园。

Ladinos，拉蒂诺斯（西班牙语）：由（西班牙）征服者从欧洲带到美洲的第一批非洲人。他们主要来自塞内冈比亚，或是在此以前被带到欧洲，或是生于欧洲。他们在美洲被称为"拉蒂诺斯"（Ladinos），因为他们懂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并至少受到一些伊比利亚国家文明的影响。

laibon，莱邦：马赛人的祭祀领袖。

laman，拉曼（第一个占领者）：领地酋长。

lamana，拉马那（从塞雷尔语"土地的主人"而来）：指一种土地占有制和政治制度——土地的主人可以行使权力。土地主人"拉马那"逐渐发展成纯粹政治酋长的"曼萨亚"（mansaya）。

lanbens，兰本斯（葡萄牙语）：出自北非伊斯兰教诸国的服装。

lançados，兰萨多（从葡萄牙语"lançar"而来，意指"开始一项

冒险")或 tangomãos,坦戈毛斯(采取了当地风俗的人):已获得非洲君主的同意在(非洲)大陆定居的移民,他们内部通婚,逐渐成为商贸中间人。他们是居住在南部河流和大西洋诸岛屿(特别是佛得角群岛)的许多外国人中的一部分。其中很多是葡萄牙人,还有少量的希腊人、西班牙人甚至印度人。后来也开始包括愈来愈多的混血儿(土地的孩子)。

landdrost,兰德罗斯特:驻扎行政官(在南部非洲)。

lapto,拉普托(字面意思是"翻译"):本地翻译。

larde kangema,拉尔德·坎杰马:土地的名义上的主人。

Larhle-Naaba,拉哈勒-纳阿巴(莫西人官衔):兼管军事和祭祀的高官。

las li,拉斯·利:大马拉布特家族的后代,他们构成了林巴上层的"掌握了剑矛和书笔的贵族"(在富塔贾隆)。

lazenda,拉曾达:参见"Laciende"。

lazzām,拉扎姆(阿拉伯语):包税农。

legha,来加(阿拉伯语):亲信、仆从。

lemba,伦巴("抚慰,平息恩基西(nkisi)的怒气"):在刚果,"伦巴"协会是献身于一个称为"伦巴"的"恩基西"的"比托米"即高层祭司的协会。这些祭司的活动都与"伦巴"相联:平息恩基西的怒气或者乞灵于恩基西(Lemba nkisi);消除危险(Lemba sunga);在国土恢复和平(Lemba nsi)等等;也可指法官。

Lenngi,兰吉:"兰吉"是英雄之歌,在富塔托罗,仅由塞博妇女在婚礼或行割礼仪式上唱,追述对死亡的蔑视和对荣誉的保护。

leydi hujja,雷提胡贾:土地契约(富尔富尔德语)。

leydi janandi,雷提贾南第:国有土地。

leydi maal,雷提马阿尔:参见"bayti maal"。

leydi urum,雷提乌鲁姆:一种土地控制制度,在此制度下,忠顺通过"沃马"(woma)和"穆德·胡鲁姆"(muud al-hūrum)税来体现。

lifidi,立飞迪(豪萨语):加衬垫绗缝的盔甲;马饰;战马用的衬垫保护甲。

Lifidi,立飞迪(豪萨兰的头衔):重骑兵总司令。

Limanin Ciki,利马宁·西基(豪萨兰的头衔):负责王室家族教育的卡努里学者。

Linger,林吉:头衔(在卡约)。

lizma,利兹玛(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地区,省区、关税等的包出;包税。

longon' mpanilo 或 *vohitsy manania*,隆功·姆潘尼洛或沃希茨·马纳尼拉:旁系亲属,马达加斯加。

luba,卢巴:参见"gada"。

lukanga,卢坎加:卢巴高级法官。

Lukonkeshia,鲁孔凯西亚:参见"Rukonkesh"。

Lurum' ayo 或 *Lurun' yo*,鲁罗姆阿约或鲁伦约:参见"Ayo"。

Lurun' yo,鲁伦约:参见"Lurum' ayo"。

maabo,马博:曼德人铁匠。

macamos,马卡莫斯:围绕在姆韦尼·姆塔帕身边的奴隶群,他们相当于苏丹的王室俘虏(furba jon、tonjon 或 jaami buur)。

maccube,马库贝:奴隶,俘虏(富尔富尔德语)。

machila,马奇拉:由希雷河下游河谷的隆杜的曼甘贾臣民生产的棉布衣服。

Madaki,马达基:太后(在卡塔)。

Madawaki,马达瓦基:在卡齐纳(豪萨兰),负责王室马厩的官员;骑兵首领和/或军队总司令。

madhhab,马德哈卜(复数,madhāhib)(阿拉伯语):根据创建者名字而命名的法律学派,这些创建者亦具有伊玛目的尊称。有四个这样的教派:马立克教派、沙菲教派、哈乃斐教派和罕百里教派。

(the) *Madjelisse*,马吉里斯(阿拉伯语):法理学家团体。

madrasa，马德拉萨(阿拉伯语)：初级和中级古兰经学校；特指为训练逊尼派教士乌里玛的高等宗教教育组织(通常隶属于某一清真寺)。

Mafouk，马富克：在中非，一种代理商的称号。

magaji，马加奇：武士，成功者(在豪萨兰)。

Magajin Babert，马加金·巴贝里(豪萨兰的凯比的一种官衔)：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

Magajin Gari 或 *Sarkin Gari*，马加金·加里或萨尔金·加里(豪萨兰的凯比的一种官衔)：村庄首领；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官员；在索科托指哈里发的顾问，充作哈里发与艾米尔的联系人。

Magajin Sangeldu，马加金·桑杰尔都：在凯比(豪萨兰)，给予那些与牧民打交道的富尔贝人的称呼。

magira，马吉拉：太后(在加奈姆-博尔诺)。

magram，马格拉姆：国王的法定姊妹(在加奈姆-博尔诺)。

(the) Maguzawa，马古扎瓦：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有一些非穆斯林族群，他们说豪萨语，分享豪萨文化，但却拒绝被称为豪萨人。在尼日利亚，这些人自称"马古扎瓦"(或"巴马古杰")，其他豪萨人也这样称呼他们；而在尼日尔，他们则以"阿兹纳人"(或"阿尔纳人")——豪萨语意为"异教徒"——为人所知。因为"马古扎瓦"这一称呼可能是从阿拉伯语"madjūs"(最初意思是"拜火者"，后来泛指"异教徒")衍生而来，所以豪萨人和马古扎瓦人/阿兹纳人的分化有可能是在17和18世纪伊斯兰教在豪萨兰的普通民众之间传播之后。

mahabbar，玛哈巴尔：在埃塞俄比亚，指"阿加普"，即"爱之宴"，与圣餐相联系。

mah'alla，马哈拉(阿拉伯语)：在马格里布地区，武装远征，武装营地。

mahanga，马汉加(伊拉拉棕榈——Hyphaene natalenis)：在赞比西亚南部低地草原发现的一种树，其汁液可制造一种醉人的酒，称为"恩杰马尼"(njemami)或"切姆瓦"(chemwa)(在赫伦圭)。

mahram，马赫拉姆(阿拉伯语)：由酋长将特权授予家族或宗教贵族。

mai，马伊：国王、统治者(卡嫩布语)

maidugu，马伊杜古：前国王的孙子(在博尔诺)。

(the) *mailo* system，梅洛制：英国殖民时期引进东非的一种土地占有制；这种制度将酋邦与土地的占有权和买卖权结合在一起。

maina，马伊纳：符合立储条件的王子(在博尔诺)。

Mainin Kinendi，梅宁基南迪(博尔诺的头衔)：马伊的伊斯兰教和法律顾问。

mairam，马伊拉姆：公主(在博尔诺)。

mai sarauta，马伊·萨劳塔：统治者(在豪萨兰)。

Maishanu，梅沙努(豪萨兰的凯比的头衔)：负责收集国家应得牲畜的官员。

Majlis，马吉利斯：在加奈姆，名义上由马伊主持并包括军事和宗教贵族的国家最高议事会。

makambala，马坎巴拉：基荣古的议员(基荣古是恩贡德人崇拜的祭司国王)。

makaya，马卡亚：参见 kaya。

maknzen，马赫增(阿拉伯语)：有特权的民族，摩洛哥从中招募国家官员。

(the) Maknzen，马赫增：最初意思为"国库"，但逐渐被用作摩洛哥政府的官员制度，广义上则指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宗教界上层人物。

makoko，马科科：在刚果的蒂奥人中指国王。

Mala Kasuube，马拉·卡苏贝(博尔诺的头衔)：负责监督市场上的买卖活动并力图保证整个商贸活动中公正和公平交易的官员。

malams，马拉姆：穆斯林教士和学者。

malamti，马拉姆提：在博尔诺，学者家庭。

malke'e，马尔克：埃塞俄比亚的

圣歌。

mallamai,马拉马伊:学者(在豪萨兰)。

Maloango,马罗安戈:国王(在中非的安哥拉等)。

Mamandranomay,马曼德拉诺马伊:巴拉省总督(马达加斯加)。

mambo,曼博:在东南和中部非洲发现的头衔。

mamlūk,马木路克:自由民,基督徒出身的前奴隶,已经皈依并经过适当训练,在宫廷或军队里服务。

(the) Mamluks,马木路克:一个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王朝(1250-1517年),其素丹是从民兵或奴隶士兵(马木路克)中挑选出来的。

Mamponghene,曼蓬赫内("曼蓬的国王"):贡贾的首领,贡贾是组成大阿散蒂联邦的附庸国之一。

Manantany,马纳塔尼:首席大臣,在萨卡拉瓦诸王国(马达加斯加)。

manāra,马纳拉:大的中央拱顶(在建筑中)。

manda,曼达:盐,卡嫩布语。

Manda Hausakoy,曼达·豪萨考伊(一种神):从雅乌里来的渔民-铁匠。

Mandi-Mani,曼迪-马尼("马诺人的君主"):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地区最伟大的封建主的称号。

Mandi-Mansa,曼迪-曼萨:马里皇帝的称号。

Māndjil 或 *Māndjuluk*,曼吉尔或曼朱卢克:丰吉君王赐与其主要附庸的称号。

mandresirafy,曼德里茨拉菲:在马达加斯加的安坦卡拉人中,指战无不胜的来源,统治者世代相传的圣物。

mange's egzi'abḥērāwit,曼杰斯特·埃格齐·埃伯赫拉威特:"神圣帝国",即埃塞俄比亚。

Mangi Mrwe,曼吉·姆尔韦:坦桑尼亚乌格温诺氏族的大酋长。

mani,曼尼:在刚果王国,指高等贵族,地主;总督。

Mani Kabunga,曼尼·卡本加:在刚果,从村庄到王国被委派给神灵的教士的名称。

Mani Kongo,曼尼·刚果:刚果的统治者。

manoma,马努马:(豪萨兰的)农民。

mansa,曼萨(曼宁卡语):国王,最重要的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在马里)。

mansaya,曼萨亚(曼宁卡语):1)王族;由曼萨为首领的政治地域集团;2)社会政治制度,其统治阶级是由俗人或教士、自由人或奴隶、种姓或行会成员、贵族或平民中的精英组成的多头政治。以那些控制国家机器的人对贸易和生产征收的税款来维持。并非土地贵族或地主阶级。

mantse,曼泽:在加人中间指国王。

marabout,马拉布特:此词在马格里布和黑非洲的意思并不相同。在马格里布,指建立了兄弟会的圣人和他的坟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则指具有一些《古兰经》和其他圣书的知识的人,他们利用这些知识作为信仰者与上帝之间的调解人,同时采用传统的占卜手段并使用避邪物。在公众的眼里,他们是宗教意义上的学者,巫师,占卜者和医治者。

marabtin bilbaraka,马拉布丁·比尔巴拉卡:在巴尔卡,指朝圣者的后代,往往是北非人。

marinda,马林达:一种驱魔治病的协会(在刚果)。

Marisa,马利萨("破坏者",头衔):在卡齐纳(豪萨兰),负责警戒东部边界的总督称号。

maroserana,马鲁塞拉纳(马尔加什语,意指"许多通道"):马哈法利的第一批马鲁塞拉纳国王的建筑风格,他们将其住宅建于居住区中央,并有多条道路通往周围村落各个方向。

marula 或 *nkanyi*,马卢拉或恩坎依:"马卢拉"(Sclerocarya caffra)是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漆树科的一种树,结卵型黄色果实,约两英寸长,当地用来做烈酒;也指马卢拉梅,即这种树的果实。

Masara，马萨拉("埃及的")：玉米(在卡努里)。

Mashinama，马西纳马：卡努里显贵的一种头衔。

masu arziki，马苏·阿兹基：参见"attajirai"。

masu sarauta，马苏·萨劳塔：在豪萨兰，指有政治权力的人；贵族。

mawlids，马乌利德(阿拉伯语)：关于穆罕默德的传奇散文记叙。

mazālim，马扎利姆(陋习)(阿拉伯语)：此词的单数"*mazlima*"表示一种不公正的或压迫的行为。在伊斯兰管理机构发展的早期阶段，"马扎利姆"开始表示世俗政权对司法的实施直接负责的组织。

mbafu，姆巴福：红染木，在卢巴(扎伊尔)。

mbarma 或 *bulala*，姆巴尔马或布拉拉：当地或族体首领(在加奈姆)。

mboma，姆博马(博马族群的男人)：在蒂奥人中间，此词表示愚蠢的人或任何操卑贱职业的人。

mbua，姆布瓦：兽皮(在基库尤兰)。

meen，米恩：母系家庭(在卡约)。

mercadores，(葡萄牙语)：代理商；商人。

mestizo，梅斯蒂佐：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二分之一混血种(非洲-葡人……)；也指其他混血人，如亚裔非洲人。

(the) *Mfecane*：姆菲卡尼(大崩溃)，恩古尼语；索托-茨瓦纳语为 Lifaqane/Difaqane (打击)；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发生于班图语南部非洲及以远地区的一场社会政治革命。

mfuka，姆富卡(刚果语)：债务。

mfuku，姆富库(刚果语)：用处、益处。

mgawi，莫加韦：划分土地者(在马拉维政府)。

Mgbe，姆格贝：豹子秘密会社(在克罗斯河谷北部和喀麦隆)。

mhondoro，莫弘多罗("狮子")：在姆塔帕帝国，神灵中介人，其职能是在国家所有事务中给皇帝以忠告；民族的祖先神灵。

mifaly，米法里：臣服(马尔加什语)。

mihrab，米哈拉布(阿拉伯语)：1)清真寺里的壁龛、小室或厚板以表明麦加的方向；2)东方祈祷小地毯上的壁龛图案，与清真寺里的"米哈拉布"形状相似。

mikireččo，米基雷科(埃塞俄比亚的荣誉头衔)：王室顾问。

milambu，米兰布：可以食物和土产品交纳(给卢巴的姆罗普韦)的税。

milk，米尔克：小的家庭财富，财产；占有，所有权。

mingilu，明吉卢：无偿劳务(由其官员交纳给卢巴的姆罗普韦的贡赋)。

mithkal，密斯卡尔(黄金等的)(阿拉伯语)：苏丹人的"密斯卡尔"重约4.25克。

mitngu，米通古：不论其社会地位对其他居民开放的秘密会社(在巴蒙)。

mkomba，莫孔巴：官方行刑者(在马拉维政府)。

mlira，莫利拉(莫利拉崇拜)：对菲里王室家族的一位祖先大卡龙加·钦克霍尔的神灵"莫利拉"的敬奉仪式。

moasy，摩阿斯：祭司(在马达加斯加)。

Mogho-Naaba，莫戈-纳阿巴(头衔)：莫西国的纳阿巴。

mogyemogye，莫吉莫吉("祭酒颚骨")：阿散蒂的一种酒罐，在金凳子上泼酒祭奠用。

mokondzi，莫孔兹：酋长(在林加拉)。

Monomotapa，莫诺姆塔帕，参见"Mwene Mutapa"。

montamba，蒙坦巴：在刚果河盆地的博班吉人中间，按其皮肤出卖的奴隶。

montonge，蒙通吉：被俘虏的奴隶(在博班吉人中间)。

moyal，穆雅尔(字面意思为"抢劫")：在塔克鲁尔，一种使统治集团成员有权在任何地方占用财富的税。

moyo，穆约：心脏，在罗兹威帝国；刚果语为灵魂、神灵。

mpanjaka，姆庞加卡：国王、酋

长、统治者(在马达加斯加)。

mpanjaka-bé,姆庞加卡-贝:仅给予大巴拉氏族统治者的国王的头衔(马达加斯加)。

mpanjaka-kely,姆庞加卡-克利:国王、酋长、统治者(马达加斯加)。

mpasi,姆帕西(刚果语):苦难、贫穷、匮乏、灾难或折磨。

mphande,莫凡德:在赞比西亚北部的通布卡人中间指贝壳。

mphelo,莫菲罗:通布卡的一种磨石。

mpifehy,姆皮菲希:村庄首领(在马达加斯加)。

mpisoro,姆庇索罗:马哈法利国王的首席祭司(马达加斯加)。

mpok,姆博克:隆达的一种大刀。

m'polio,姆波利奥:鲇鱼(在班巴拉)。

mpungi,姆庞基:坦桑尼亚帕雷人的神龛。

mtemi,姆特米:参见"ntemi"。

muavi,姆阿威:在普拉佐,指一种毒药神裁法,用以确定被控行巫术的人是否有罪。

mubata,姆巴塔:参见"babuta"。

mubika,姆比卡:参见"babika"。

mugabe 穆加贝("挤奶人")或姆卡马(复数 bakama):国王(在布尼奥罗和布干达)。

muhanuro,穆哈努罗:布隆迪每年一度的节日,在节日期间,重申王权并更换作为其象征的鼓,庆祝高粱播种,在雨季长的国度则确定最佳的播种日期。

muhutu,姆胡图(复数 bahutu):在布隆迪、卢旺达以及东非和中非的其他几个国家里的族体。

muidzu,穆祖:国家的主要法官(在刚果)。

mukama,姆卡马:参见"mugabe"。

mukanda,姆坎达:制度。

mukaṭa'āt,穆卡塔阿特(阿拉伯语):财政和管理单位(在埃及)。

mukazambo,姆卡赞波:在普拉佐制度指奴隶首领,在他之下有"萨奇孔达"(sachikunda)及其"恩萨卡"(nsaka)。

mukisi,姆基希(刚果语):罪恶的咒语;巫术、投毒罪;毒药本身。

mukomondera,姆克孟戴拉:绍纳人在饥荒时可通过其获取谷物的一种制度。

mulatto,黑白混血儿(西班牙语 mulato,来自 mulo,骡子):欧洲人与黑人的后代;不严格地用于任何与黑白混血儿相似的混血儿。

mulopwe,姆罗普韦:卢巴国王的称号,用以表示权力的不可分享。

multazims,穆尔塔津姆(阿拉伯语):向农民征收税款的投标人。

munaki,穆拉基:女预言家(在刚果)。

Munhumutapa,蒙哈姆塔帕(头衔):参见"Mwene Mutapa"。

mupeto,姆佩托:在姆塔帕帝国,强迫没收。

mu sh tarā,穆什塔拉(阿拉伯语):农产品。

mussitos,穆西托斯:在普拉佐制度,指逃奴的据点。

mussumba,姆森巴:首府(城镇)(在隆达人中间)。

Mustahfizān,穆斯塔赫菲赞:奥斯曼帝国军队或奥贾克的组成部分之一。

Müteferrikas,穆特非尔里卡:埃及副摄政的私人卫兵;素丹的私人卫兵。

muud al-hūrum 或 *muudul horma*,穆德·胡鲁姆或穆达尔霍尔马:在塞内加尔富塔地区,一种可用谷物(谷物税)交纳给摩尔人的年税。

mvila,姆维拉:氏族(刚果语)。

mwami,姆瓦米(复数,bami):卢旺达和布隆迪前国王们的王室称号。

mwangana,姆万加纳:酋长(在隆达)。

mwana Mwilamba,姆瓦纳·姆韦兰巴:(卢巴)军队首领。

Mwant 或 *Mwaant*,姆万特:首领的称号,再加上卢巴第一任国王的名字(雅沃)则成为皇帝的称号姆万特·雅沃。

mwant a ngaand,姆万特·阿·恩甘德:隆达地区头人。

Mwant Yav,姆万特·雅沃:卢巴/

隆达的最高称号，意为“君主雅沃”，“蝰蛇之王”，指国王与凡人的距离；皇帝。

mwembe，姆温贝：传统玉米（在基库尤兰）。

Mwene Mutapa 或 *Monomotapa*，姆韦尼·姆塔帕或莫诺姆塔帕（“金属之王”，“劫掠之主”）：统治一个富有金、铜、铁的国家的国王的称号。这个国家从14-17世纪位于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即今日的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它经常被称为姆韦尼·姆塔帕的帝国，并与位于津巴布韦西南部人称“大津巴布韦”的遗址有联系。

mwine Lundu，姆韦纳·伦杜：卢巴传统、尤其是不成文法的保护者。

Mwine Munza 姆韦纳·蒙扎：卢巴的称号，意指“蒙扎之主”。

mwisikongo，姆维西刚果：贵族，刚果社会的一个阶层。

naaba，纳阿巴（一种莫西人头衔）：酋长。

naabiiga，纳比加（复数，naabiise）：莫西酋长之子。

naabiise，纳比斯：参见“naabiiga”。

naam，纳阿姆（莫西语）：权力；掌握权力的人。

nabanza，纳班扎：卢巴国王宫廷里王位标志的掌管者和仪式的监督者。

nagado，纳加多：商人阶层（在埃塞俄比亚）。

nā'ib，纳伊布（字面意指“代替者”、“代表”、“代理人”）：此词一般指被委任为另一在位者的代理人的任何人，在马木路克和迪赫里素丹国特指a）素丹的代理人或代理总督；b）主要省区的总督。在波斯和土耳其以及后期的阿拉伯时期，其最普通的意义是表示法官代理人，或是在司法方面作为卡迪的代理人。

nakīb al-ashrāf，纳基卜·阿什拉夫（阿拉伯语）：先知后人的代表。

nakombga，纳科姆布加：参见“nakombse”。

nakombse，纳科姆布斯（单数，nakombga）（莫西语）：血亲王子；未成为酋长的王子之子或其后裔；王室“纳科姆布斯”等于王室家族。

nalle，散沫花（卡努里语）。

nanamse，纳纳姆斯：莫西王子。

nangatoobe，南加图贝：上层阶层（在塔克鲁尔）。

napogsyure，纳波格斯尤里：参见“pogsyure”。

napoko，纳博科（字面意指“女酋长”）：莫西酋长或国王的长女。莫西酋长或国王去世时，在正式宣布其去世（不要与他去世的实际时间相混淆）与指定其继承人这段时间里，他的职位暂时由其长女担任，并被授予“纳博科”的称号；纳博科是父亲的替代，并穿她父亲的衣服。

napusum，纳普苏姆：莫西人觐见国王的仪式。

navetaan，纳维塔恩：农奴（在塔克鲁尔）。

nawāb，纳瓦布：国王。

ncariampemba，恩卡里安培巴（刚果语）：参见“nkadi ampemba”。

ndalamba，恩达兰巴：起宗教仪式作用的太后（在卢巴人中间）。

ndoki，恩多基（复数，bandoki）：施咒语者，巫师（在刚果）。

ndulu，恩杜卢：一种基库尤青菜。

nduma，恩杜马：内地水坑里的竹芋植物。

neftenia，涅夫坦尼亚：有土地的精英和贵族。

nere，奈雷：一种非洲树，其根和果实用于传统医药。

nesomba，纳索姆巴：参见“nesomde”。

nesomde，纳索姆德：（复数，nesomba）（莫西）：诚实的人；担任王室侍从首领的高级官员。

nevanje，尼范耶：赞比亚南部姆塔帕帝国的王子和选定继承人。

ngaailiino，恩加艾利纳（蒂奥）：在刚果，负责收集贡物和行政管理的官员。

ngabi，恩加比：南非羚羊禁忌，往往与巴比托王朝氏族相联

系。

nganga，恩干加：在班图语中，指医病者；巫师；从医者；在刚果，对宗教专家，特别是"恩基西"（nkisi）的专家的确认称呼。

nganga ngombo，恩干加·恩戈博：占卜预言者（在刚果）。

ng anjo，恩格安卓：炼铁窑。

ngiri，恩吉利：仅王子们参加的秘密会社（在巴蒙）。

Ngola，恩哥拉：刚果南部国家恩东戈国王的称号。

nguri，恩古里：母亲（刚果语）。

Nifa，尼法：阿夸穆国和宗主国阿散蒂的右翼。

nikpelo，尼克佩罗（莫西）：最老的成员（如一个家系）。

nizām，尼赞姆（从土耳其语Nizām而来，意指"命令、部署、安排）：属于1713-1748年德干的苏巴赫达尔阿萨福·杰夫建立的王朝的印度海德拉巴统治者的世袭头衔。

njaki，恩加基：基库尤一种普通的豆子。

njemani 或 *chemwa*，恩杰马尼或切姆瓦：在赞比亚南部，一种用"马汉加"即伊拉拉棕榈酿制的酒。

njoldi，恩卓第：归属地主的象征性付款；土地年税。

nkadi ampemba 或 *ncariampemba*，恩卡迪·安培巴或恩卡里安培巴（来自"nkadi"，一种危险的祖先精灵，和"mpemba"，以后的）：魔鬼（刚果语）。

nkangi，恩坎基（"救星"）：在刚果，指十字架，作为法权的标志。

nkanyi，恩坎依：参见"marula"。

nkende，恩肯德：布吉吉国王对一种灰色长尾猴的禁忌（非洲长尾猴属，包括长尾猴及相关的类型）。

nkisi，恩基西：此词意指"入会式；巫力；神力；精灵；祖先之力；神医；崇拜的物神；迷信物"，在刚果指来自于宗教概念的王权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包括三种重要的崇拜在起作用：祖先崇拜；领土神灵崇拜与王室护符崇拜。

nkobi，恩科比：护符（刚果语）。

nkoron，恩科隆：深层采矿（阿肯语）。

nkuluntu，恩库伦图（"年长者"）：老人；世袭村庄首领（在刚果）。

noguna，诺古纳：马伊的宫廷（在博尔诺）。

nona，诺纳：在卡努里，指由社会晚辈对其社会父辈进行表示尊敬的访问，并应该为社会父辈做任何要求做的差事。

Nono，诺诺（一种头衔）：在凯比（豪萨兰），收集应交给君王的牛奶和牛油的官员。

nsaa，恩萨：毯子（在阿肯人中间）。

nsaka，恩萨卡：在普拉佐，"奇孔达"军队的一个单位，包括10人，由"萨奇孔达"率领。

ntemi 或 *mtemi*，恩特米或姆特米：由酋长统治一组村落及其邻里的酋长制，该酋长由统治家族任命（在坦桑尼亚）。

nthlava，恩施拉瓦：赫伦圭人用来盖房子的一种沙土。

ntufia，恩图菲亚：每一位卢安果国王（maloango）在其加冕仪式上点燃的圣火，圣火一直燃烧到他去世为止。

numa-n-bolo，努马-恩-波罗（班巴拉）：塞古军队的左翼。

nyamankala，尼阿曼卡拉：等级制（曼德语）。

Nyarubanga，尼亚鲁班加（卢奥词语，意指"神降"）：在乌干达北部，指以1617-1621年大饥荒而告终的干旱和饥荒时期，随之而来的一场疾病，使牲畜全部死光。

nyia，尼亚：卡努里的婚姻契约。

Nzambi mpungu，恩赞比·姆朋古（"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至高神灵"）：称呼刚果国王的方式。

nzavi，恩扎韦：基库尤一种可保存的豆子。

nzimbu，恩赞布（"奥利凡西拉里亚纳纳"贝壳）：在刚果王国作为通货使用的贝壳。

nzo longo，恩佐隆戈（刚果的社团）：一种男孩的入会仪式崇拜。

oba，奥巴（埃多语）：古代贝宁王国创建者的称号，宗教与

政治权力的持有者。

obeah 或 *obi*，奥比：一种非洲宗教，可能起源于阿散蒂，以巫术和神秘宗教仪式为特点；也指在"奥比"中使用的护符或物神；奥比的影响力（例如：对一个人施以"奥比"）。

obi，奥比：伊格博词语，可能源自约鲁巴，指国王或酋长。"奥比"是由贝宁的奥巴委任的。

obuotoyo，奥博托约：岩盐（在约鲁巴）。

odjak，奥贾克：由素丹谢里姆一世引入埃及的帝国军团；亦指土耳其人的要塞和驻军。

ogendini，奥根蒂尼：次生族群（在卢奥人中间）。

ohene，奥赫内：库马西国的国王。

ókoo，奥科（马科科）：国王（在蒂奥人中间）。

okro 或 *okra*，奥科罗或奥科拉：一种高秆的一年生植物（Hibiscus，或 Abelmoschus esculentus），非洲土生，其绿色豆荚可用来做汤，沙拉和泡菜（亦称 gumbo）。

omanhene，奥曼赫内：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的国王。

ombiasa，奥姆比亚萨：经常译为"祭司人员"；祭司；从医者；医生；等等；"奥姆比亚萨"有一系列作用，在马尔加什人中间有一系列更细的分类。

ompanghalalan，奥姆庞哈拉兰：王室使者（马尔加什语）。

omukama，奥穆卡马：国王。

oni，奥尼：国王（例如，伊费的奥尼）。

ondaty-bé，翁达蒂-贝：马哈法利氏族的高级议员（在马达加斯加）。

onjatsy，翁贾茨：（一块土地上）的早期新移民（在马达加斯加）。

orin-tany，奥林-塔尼：新土地（在马达加斯加）。

Oranmiyan，奥兰米扬：奥兰扬的称号，他是奥杜杜瓦（伊费的创建者和第一位奥尼）之子，也是约鲁巴的奥约王国的传说缔造者，据称他在迁往奥约之前统治着伊费和贝宁；现在是一个神的称号。

orkoiyot，奥科约特（复数，orkoik）：精神领袖（在南迪人中间）；也指传统领袖（肯尼亚）。

osafohene，奥萨弗赫内：阿夸穆和登基拉诸国的战争领袖。

othen，奥滕（复数，otheme）：在拉布沃尔（大湖地区），多氏族宗教祭祀群体。

ovimbali 或 *quimbares*，奥温巴利或昆巴雷斯：非洲葡萄牙人（在刚果）。

ozo，奥佐：身居高位者（在伊格博等级制中）。

panga，潘加（斯瓦希里语）：一种阔刃大刀，在非洲用于砍物（如柴和香蕉），也用作武器（大砍刀）。

pa sha，帕夏（土耳其语）：与高级职位相连的一种荣誉称号，特别是用于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领袖和省督。

pastas，帕斯塔（葡萄牙语）：1000帕斯塔＝800,000克鲁扎多（约 1756-1757 年），参见"cruzado"。

pinje，平杰：参见"piny"。

piny，平尼（复数，pinje）：一个卢奥次生族体的领地。

(the royal) *pogsyure* (*napogsyure*) system，（王室）波格斯尤里（纳波格斯尤里）制：一种使妇女成为资本和分配妇女的制度（在莫西人中间）。

pombe，庞贝（斯瓦希里语）：在中部和东部非洲，一种（可能是醉人的）饮料，由多种谷物和水果发酵酿造。一种饮料（可能是烈性的）。

pombeiros，庞佩洛（葡萄牙语）："庞博"（pombo）的代理人；混血种赤脚商人。

pombo，庞博：普尔人的刚果语名称。

prazeros，普拉泽罗：在普拉佐制度，指一种统治阶级，王室土地（普拉佐）的持有者；地产所有者。

prazos，普拉佐（葡萄牙语）：王室土地；农业地产；"普拉佐"也是葡萄牙的一种土地占有制。

prazos da coroa，普拉佐达科罗（葡萄牙语）：王室地产。

presidios，（葡萄牙语）：城镇。

pumbo，庞博（"市场"）：在斯坦利湖地区庞博的奴隶市场。

quimbares，昆巴里：参见"ovimbali"。

Quojubercoma，科贯贝尔科马：科贯人的国土（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

raia，雷阿（从阿拉伯语 ra'īyah 而来，意指"一群，一帮，臣民，农民"）：土耳其素丹的非穆斯林臣民，需交纳如人头税（djizya）和土地税（kharādj）等税款。（参见第 3 卷的希姆米（dhimmi））。

rainitsy ny mpanjaka，雷尼兹·尼·姆庞加卡（"王室朋友"）：马哈法利氏族的首领（在马达加斯加）。

ra'īs，拉伊斯：穆斯林酋长或统治者；穆斯林船的船长。

rakire，拉基里：玩笑关系（在莫西）。

Ramādān，拉马丹：穆斯林历的第 9 个月，穆斯林在这一个月进行斋戒（saum）。

Rangahy，朗加希（马尔加什语）：王室官员（马达加斯加，安坦卡拉首都安比卢贝）。

ras，拉斯（阿姆哈拉语"rās"，意指"首领、酋长"，来自阿拉伯语 ra'īs）（称号）：埃塞俄比亚国王，王子或封建领主；也指埃塞俄比亚省的统治者。

rasa 或 *erasa*，拉萨或伊拉萨（从阿姆哈拉语"ras"而来）：首领或者酋长。

Rasam-Naaba，拉萨姆-纳阿巴（莫西人称号）：参见"Bin-Naaba"。

al-Rashīd，拉希德（阿拉伯语）：荣誉称号，意指"正直者"。

real-politik，现实政治：德语词，用来表示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的概念。

（the）*Reconquista*，雷康吉斯达：基督教对穆斯林统治的抵抗和为在半岛消灭伊斯兰教而进行战争的过程，此过程从 722 年（科瓦东加战役）延续到 1492 年（格拉纳达的陷落）。

refo rekk，雷弗雷克：农奴，在塞雷尔。

Regimento，雷吉蒙托（葡萄牙语）：葡萄牙国王授予特权、特别是向传教士授予特权的指令。

reis，拉伊斯：参见"ra'īs"。

remoru，雷姆鲁：农奴，在桑巴。

renilemy，雷尼拉米：有特权的人，在马哈法利社会（马达加斯加）。

restvölker，（德语）：难民。

reth，雷斯：国王，在希卢克兰。

ribāt 或 *rābita*，里巴特（或拉比塔）：（从阿拉伯语 rabaṭa 而来，意指"联在一起，扎在一起"）：联系，纽带，关联；设防的据点（为防止外来威胁）；边塞，隐士住处；设防的中心，用于宗教和苦行或者宣传信仰；也指一组伊斯兰教戒律（da'wat al-hakk）。

rima，里马（莫西头衔——来自 ri，意指"吸收或吃没有咀嚼过的食物"）：国王。

rimaybe 或 *bellah*，里迈贝或贝拉（莫西语）：被迫耕种土地的囚犯；俘虏或农奴。

rimbe，林贝：参见"dimo"。

ringu，林古（来自 *ri*，参见上述"rima"）：国王登基。

riyāsa，里亚沙（阿拉伯语）：领导权。

Rohandrian，卢罕德里安：马达加斯加对扎分德拉米尼亚最高等级之称。

rola，诺拉：斑鸠（在绍纳国）。

rugga，拉加：参见"ardo"。

Rukonkesh 或 *Lukonkeshia*，卢孔凯西或鲁孔凯西亚（卢巴/隆达称号）：王太后及王室后勤首领。

runde，隆德：奴隶村（在富塔贾隆）。

ruoth 或 *wuon piny*，鲁斯或乌翁·平尼：卢奥人"巴奇·平尼"的首领。

Saburu，萨布鲁（豪萨兰的头衔）：负责道路安全的官员。

sachikunda，萨奇孔达：在普拉佐，"奇孔达"军队的首领。

Sachiteve，萨奇特乌：称号（在犹特乌）。

saff，萨夫（复数，sufuf）（阿拉伯语）：通过卡比拉之间联系而结成的一种联盟。

saka，萨卡：部分，莫西人父系

血缘和父系地域社会的第一级。

sakke，萨基：在凯比（豪萨兰），指制桶工的代表，由君王指定。

sakkeebe，沙基贝：皮匠（在塔克鲁尔）。

salam，沙拉姆：埃塞俄比亚的圣歌（参见“deggwa”）。

sāliyāne，沙利亚奈（阿拉伯语）：年薪。

samba remoru，桑巴雷姆鲁：在凯比，指回到土地上的农民；塔克鲁尔的贫苦农民。

sampy，桑皮：保证伊默里纳国家福祉的王权神性（马达加斯加）。

Sanaahene，萨纳赫内：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的财政大臣。

sanankunya，桑南昆亚：玩笑关系。

sandjak，桑贾克（从土耳其语sanjāk而来，字面意指“旗帜、旗标”）：在前土耳其帝国，行政区划之一，由省（eyalet 或 vilayet）划分而成。

Sandjak Bey，桑贾克贝伊（一种头衔，在埃及）：桑贾克的总督；一个区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

sandjak-beylik，桑贾克-贝伊里克：奥斯曼帝国最重要最基本的军事和行政单位，按区划集合在“贝伊勒贝”（beylerbey）的权力之下。

san'dyon，桑迪昂：贸易奴隶（在班巴拉）。

Sango，桑戈：雷电崇拜（奥约人的宗教系统）。

sanjag，桑贾格：参见“Sandiak”。

santu，桑图（刚果语）：一种十字形；耶稣受难图，亦指一位圣人。

Santuraki，桑图拉吉（卡诺的一种称号）：宫廷高官。

sarakunan noma，萨拉昆南·诺马：一种称号，意为“作物之主”（在豪萨兰）。

sarakunan rafi，萨拉昆南·拉菲：在赞法拉（豪萨兰），放牧税的收缴人。

sarauta，萨劳塔：王权（在豪萨兰）。

sarki，萨尔基（复数，sarakuna）（头衔）：国家元首；酋长；国王；（在豪萨兰）。

Sarkin，萨尔金（头衔）：酋长、国王（豪萨兰）。

Sarkin bayi，萨尔金巴伊（豪萨兰的一种头衔）：奴隶国王。

Sarkin dawaki，萨尔金·达瓦基（豪萨兰的一种头衔）：骑兵分队将军。

Sarkin fullani，萨尔金·富拉尼：豪萨兰的一种头衔。

Sarkin lifidi，萨尔金·立飞迪（豪萨兰的一种头衔）：重骑兵分队将军。

Sarkin poma，萨尔金·普马（豪萨兰的一种头衔）：酋长，作物之主。

Sarkin rafi，萨尔金·拉菲（豪萨兰的一种头衔）：河谷总督。

Sarkin shanu，萨尔金·沙努（豪萨兰的一种头衔）：牲畜税收缴者。

Sarkin tudu，萨尔金·图都（豪萨兰的一种头衔）：山区总督。

satala，萨塔拉（班巴拉）：水壶；祈祷珠子。

Satigi，萨蒂吉（富塔托罗的一种头衔，意为“伟大的富尔”）：统治者。

ṣaum，索姆（阿拉伯语）：在“拉马丹”月中从黎明到黄昏的强制性斋戒，同时禁绝一切享受（食物、饮料、性关系等等）。

Sax-sax，萨克斯-萨克斯：在卡约，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各村庄行政官员。

šayh，沙赫：埃塞俄比亚宗教首领。

sebbe，塞博：参见“ceddo”。

Sekiapu，塞基亚普：参见“Ekine”。

señ，森（班巴拉语，字面意义为“脚”）：塞古军队“法马”（faama）的基本单位。

Serdar，塞达尔：埃及边界地区或边界以外军事行动的指挥员。

Serin Jakk，塞兰·贾克（卡约的头衔）：“塞兰·贾克”致力于宗教活动和教诲。

Serin Lamb，塞兰·兰博：（卡约的）中央政府负责边界保卫的官员。

Shango，桑戈：约鲁巴神。

shangwa，香瓦：饥荒（在绍纳）。

Shantali，桑塔利：卡齐纳的礼宾官员（豪萨兰）。

sharī'a，沙里亚（字面意义为"路"、"好的道路"，阿拉伯语）：行为的详细法规；"沙里亚"包括指导崇拜仪式的戒律，行为准则和生活规则。它包括规定、许可和区分真实与虚假的法则。它所涵盖的《古兰经》的法则为法律（fikh）所包括的禁令和解释所补充。伊斯兰的沙里亚源出《古兰经》和《哈迪斯》。

sharīf，沙里夫或"谢里夫"（阿拉伯语，复数，*shurafā*）：字面意义为"贵族"，授予阿里和法蒂玛的所有后代的荣誉称号。

shaykh，谢赫（阿拉伯语，复数，*mashāyikh*）：老人；阿拉伯卡比拉的首领；精神主人；给予神秘兄弟会的创建者、大学者和教师的称号。

Shaykh al-Balad，谢赫巴拉德（阿拉伯语）：非官方荣誉称号，仅指埃及贝伊（高级贵族）中的年长者。

sība，西巴（阿拉伯语）：异己的集团。

Siddi，希迪：用来表示在亚洲的黑人或非洲奴隶的名称之一。

silamos，斯兰穆斯（从 Islam/Islamos 而来）：穆斯林皈依者（马尔加什语）。

siso，西索：参见"gabir"。

soba，索巴：小酋长；领袖（在安哥拉）。

sofa，索法（班巴拉）：步兵军团（法马的军队）。从理论上说，"索法"是马夫，但并非必定操此业；他们是法马家庭中的一部分。有时，为了保证"年轻人"永远忠诚，法马主持通过行割礼"进入"成年的仪式，并保证他自己的儿子也参与其中。

sojabe，索加贝：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人中间，指关心社会生活细节的村庄长者。

soldo，索尔多（葡萄牙语）：卡皮丹-摩尔（capitãos-mores）的支付。

sombili，索姆比利：（正在实行的）风俗；屠宰家养牲畜的特权（在马达加斯加，由扎菲兰姆博人行使）。

sonda，森达（单数，sondre）（莫西）：集合名称或箴言。

sondre，森德雷：参见"sonda"。

sorabe 或 *volan'Onjatsy*，索拉贝或沃兰翁贾茨（马尔加什语）：用来翻译马尔加什语的阿拉伯手写体；阿拉伯-马尔加什语书写符号；用阿拉伯书写符号写的安蒂莫罗语手稿；这些是卡提博（Katibo，专门书写和翻译索拉贝的抄写员）的传统。

sorondamba，索朗丹巴（莫西）：年轻仆人。

spahi，土耳其非正规骑兵（从土耳其语 sipāhī 而来，意指"骑兵"）：组成一组骑兵部队的骑兵，曾构成土耳其军队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封建基础上。

ṣūfi，苏非（字面意义为"穿着羊毛"），从阿拉伯语词根 ṣūf 而来，意指"羊毛"，表示"穿羊毛袍"（labs al-ṣūf），借指致力于神秘生活而成为伊斯兰教称为苏非派的行动；穆斯林神秘主义（Ṣūfism 或 taṣawwuf）的内行。

ṣūfi tarīkas，苏非塔里卡：参见"tarika"。

Ṣūfism，苏非教派或泛神论神秘主义（阿拉伯语为 taṣawwuf）：禁欲的伊斯兰神秘主义，源于 8 世纪，特别在波斯发展成一套复杂的象征主义，其目标是通过冥想和隐居来与神交流。

sugedi，苏杰迪：草席（卡努里语）。

sūk，苏克：阿拉伯市场，市场场所，集市；社团组合的商店。

sulke，苏尔克：铠甲外套（在豪萨兰）。

sultan，素丹：穆斯林国家的君主或主要统治者；特别是（前）土耳其的君主，亦指以前的王子或高官。

Sumankwaahene，苏曼夸赫内：阿夸穆和登基拉帝国的宗教事务大臣。

surga 或 *dag*，舒加或达格：在塔克鲁尔，指在附庸关系的结构中牧场主（捐助者）和耕种者（受益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同意为了自身的利益，由一位富人或有影响的政治领

袖代其行使自由意志。

svikiro，斯威克罗："svikiro"一词由动词"kusvika"派生而来，意指"到达或抵达一处"。"斯威克罗"字面意义是指神祇和精灵通过其与人交流的人、工具或器物。因此，西方世界的教士、拉比和先知及穆斯林文化的哈里发和"马拉姆"(mallam)在绍纳人社会可以是一位"斯威克罗"。"斯威克罗"不应与行医者(nganga)或算命者混淆。"斯威克罗"是集教士、知识分子、教育者、领袖于一身的人。

Swana Mulunda，斯瓦纳·姆伦达：参见"Swan Murund"。

Swan Mulopwe，斯万·姆罗普韦：预定继承人和隆达军队指挥官。

Swan Murund 或 *Swana Mulunda*，斯万·姆隆德或斯瓦纳·姆伦达(卢巴/隆达头衔)：社会的象征性母亲；名为卢韦吉的象征性王太后。

tabala，塔巴拉(班巴拉)：在塞古，与每一统治者相联系并宣布战争的鼓。

tabaski，塔巴斯基("献祭")：一种穆斯林的宗教节日，班巴拉国王通常会参加。

tafsīr，塔夫希尔(阿拉伯语)：《古兰经》的注解；注释。

tala'a，塔拉阿：平民，卡努里社会的一个阶级。

talakawa，塔拉卡瓦(单数，talaka)：被统治者；在豪萨社会，指农奴；自由平民；穷人；豪萨兰和尼日尔河-乍得地区的贫困农民和牧民。

Talba，塔尔巴：警察首领和地方行政官(在博尔诺)。

Talempihitry，塔拉姆皮希特里：在马达加斯加的萨卡拉瓦王国，作为达迪崇拜监督者的官员。

talia，塔里亚：卡努里社会的平民(在博尔诺)。

talse，塔尔斯：莫西平民。

Tandonaka，坦东纳卡：大臣议事会(在马达加斯加的伊马莫诺人中间)。

tangomãos，坦戈毛斯：参见"lancados"。

Tara，塔拉(豪萨头衔，意为"九人议事会")：在赞法拉、戈比尔和卡诺，委托一个选举团负责从王子中推举王位的继承者。

tarīka，塔里卡(阿拉伯语，复数，turuk)：字面意义为"道路"；协会或兄弟会(每一"塔里克"使用其创建者的姓名)；教堂会众，苏非派宗教兄弟会；宗教兄弟会的地方中心；兄弟会的地址。

ta'rīkh，塔里克(阿拉伯语)：通史，编年史，年表；通常与"历史叙述"同义。这是很多历史著作的标题，如"塔里克苏丹"(苏丹历史即西非，黑人——参见比拉德苏丹)；"塔里克安达卢斯"(安达卢西亚历史)，等。

tariki，塔里基：亚群体(马尔加什语)。

Tasoba，塔索巴(头衔)：战争首领；总司令。

tasobnamba，塔索布纳姆巴("战争之主"，莫西语)：战争首领。

tata，塔塔：要塞(在班巴拉)。

tatibato，塔提巴托：马达加斯加的安塔卡拉人的定期收税办法，据以为国家提供财政来源。

Teen，廷：头衔(在卡约)。

tëgg，特格：曼德人铁匠。

tellek saw，泰勒克索("大人物")：在埃塞俄比亚社会表示伟大的理想或观念。

tengsoba，坦索巴("土王"，莫西语)：土地祭司。

tenzi，滕兹：史诗(斯瓦希里语)。

terras da coroa，特拉达科罗：在普拉佐制度，一种王室土地。

teskere，泰斯凯尔：出口许可证。

tiido，帝多：祭台(莫西语)。

timār，提马(阿拉伯语)：封地。

Tingimaro，廷基马洛：统治者的称号(在马达加斯加)。

tobe，托贝(卡努里)：素色或印成兰色的大长袍。

Togo-Naaba，多戈-纳阿巴(莫西人头衔)：酋长的代言人，专门负责宗教仪式。

tompon-menakely，托姆庞-默纳卡里(一种马尔加什头衔，意

指"封地之主"):村庄封地的首领。

tompon-tany,托姆庞-塔尼("土地之主"):原住居民(在马达加斯加)。

ton,通(班巴拉):同时行割礼的男孩协会;政治联盟。

ton-den,通-登(班巴拉):协会成员。

ton-djeli,通-杰利(班巴拉):"通"的歌舞艺人(格里奥)。

ton-dyon,通-迪昂("通的俘虏",在班巴拉):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或前俘虏。

tonjon,通琼:王室奴隶(在曼萨的宫廷)。

ton-koro-bolo,通-科罗-波罗(班巴拉):在塞古军队指在"迪西"(disi)之后由有经验的"通迪昂"组成的后备军团。

ton-masa,通-马萨:领袖(在班巴拉)。

ton-tigui,通-蒂贵(班巴拉):酋长;骑兵部队里背箭袋的人。

too,图:班巴拉人的主食小米糊。

too-daga,图-达加:装"图"的罐子(在班巴拉)。

Torodo,托罗多:1776年发生在富塔托罗的"托罗多"革命始于托罗多马拉布特运动,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因18世纪初期发生在邦杜和富塔贾隆的圣战的成功受到鼓舞。它是一场小农暴动,既反对由摩尔人卡比拉强加的"穆达尔霍尔马"(muudul horma),也反对由伊斯兰化的丹尼扬克贵族推行的具有压迫性的东部穆斯林税制。

torwe,托尔维:在博尔诺,特指有官衔者。

trano-vato,特拉诺-瓦托:要塞(在马达加斯加)。

Trek,大迁徙(1834-1839年):英国人在南非强行推进后,开普布尔人向瓦尔河和奥兰治河方向的迁移运动。

trekboer,迁徙布尔人:迁徙布尔人是迁徙的布尔农民,他们在大迁徙之前越过奥兰治河寻找土地,大部分都定居在后来成为奥兰治自由邦的南部。

tsare,查雷:参见"gaisuwa"。

tshidie,奇台:总顾问委员会(卢巴国王宫廷)。

tshihangu,奇汉古:卢巴国王的宫廷。

tsi-mihety,齐米赫蒂:齐米赫蒂人(马达加斯加)采用的集合名称,通过拒绝剃发来表示拒绝屈从马鲁塞拉纳人的权力。

tsimiompy,齐米奥姆皮:饥荒(马尔加什语)。

tsovolo,楚沃罗:赫伦圭人给玄武岩土壤取的名。

tubung,图邦("土地的主人"):小的政治单位的首领(在卢巴人/隆达人中间)。

Tüfenkçiyān,土芬克吉安:奥斯曼帝国军队或奥贾克的组成部分之一。

tukwata,图夸塔:参见"kakwata"。

tumba,图巴:祝福。

tumbili,塔姆比利:猴子(斯瓦希里语)。

tunka,通卡(索宁克头衔):国王。

Turaki,图拉基:卡齐纳(豪萨兰)的礼仪官。

turndala,杜尔恩达拉("通过沙子",班巴拉语):从阿拉伯语al-tareb衍生而来,意指土地,表示神学者、顾问。

turuḳ,图鲁卡:参见"tarīḳa"。

tweapea,特维比:(阿肯人)一种咀嚼用的秸梗。

twite,特韦特:在世俗情况下代表卢巴国王的官员,军事首领。

Ubandawaki,乌班达瓦基(头衔):军事领袖(在豪萨兰的赞法拉和戈比尔)。

ubuhake,乌布哈克:在卢旺达,一种保护关系(参见"buhake")。

ubugabire,乌布加比雷:一种保护关系(在布隆迪)。

ubwiru,乌布韦卢:在卢旺达,确立王室仪式和王朝谱系的神圣法典。

ubwoko,乌布沃科:参见"*umuryango*"。

uki,乌基:由阿坎巴人酿制的一种啤酒;其发酵的时间比附近社区要长。

ukisi,乌基西:在刚果,指神圣;

神性；神意。

ukoo，尤库：血统，门第。

'ulamā'，乌里玛（单数，'ālim）（阿拉伯语）：穆斯林学者；知识渊博者，法律或神学博士。

umboli，乌姆博里：商人（在加奈姆-博尔诺）。

umerā-i-sherākise，乌梅拉塞拉基色：切尔克斯人艾米尔。

Umm Laham，乌姆拉哈姆：希卢克地区1684年的大饥荒。

umuheto，乌姆赫托（"弓形的"）：税收（在卢旺达）。

umuryango，乌姆尔扬戈（基隆迪和基哈语）氏族基尼亚卢旺达语为"乌布沃科"（ubwoko），卢尼安博和卢哈亚语为"乌卢干达"（uruganda）。

unguri，温古里（刚果语，"母亲原则"）：母性、母系关系；母权制。

unguri ankama，温古里安卡马：领主权（在大约1900年仍旧在南部苏库人中使用的一个刚果头衔）。

'urf，乌尔夫：习俗。

uruganda，乌卢干达：参见"umuryango"。

uthlanga，尤斯兰加：芦苇（祖鲁语）。

uwata，乌瓦塔：粗俗（刚果语）。

vaha，瓦哈：中介人。

valohazomanga，瓦洛哈佐曼加：马哈法利社会的平民（马达加斯加）。

vashambadzi，瓦香巴兹：商人，赞比西亚地区的非洲商人阶级。

vata，瓦塔：耕作（刚果语）。

veli，维利：省督（参见"wālī"）。

Veybercoma，韦依贝尔科马：瓦伊人国土（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

vidye，维迪耶：神灵（在卢巴）。

vilipate，维利帕特：王室礼物（马尔加什语）。

visitador，（葡萄牙语）：视察员。

voandzeia subterranea，沃安齐亚·萨布特雷尼（从马尔加什语"voandzou"而来）：一种三小叶复叶和腋生小花热带葡萄草本植物（豆科类），通常叫"野豆"。

vodun，伏敦：一种非洲宗教。

vohitsy mananila，沃希兹·马南尼拉（马尔加什语）：参见"longon' mpanilo"。

（the）*Volafotsy*，沃拉弗茨（"白银"）：在马达加斯加，指马鲁塞拉纳统治者的旁系，白银的后裔，非马鲁塞拉纳妇女和马鲁塞拉纳王室男人所生的儿子。

volamena，沃拉麦纳（"红银"，即黄金）：在马哈法利（马达加斯加），萨卡拉瓦人中居统治地位的马鲁塞拉纳分支扎菲沃拉麦纳人（金之子）的墓。

wa' azi，瓦阿兹：训诫（在豪萨兰）。

Wak'at al-sanādjik，瓦卡桑纳吉克（"桑贾克贝伊的冲突"）：一份处理1660年法卡里亚贝伊反叛的埃及条约。

wakf，瓦克夫（阿拉伯语，复数，awkāf）：1）一笔伊斯兰财产捐赠，交信托管理并用于慈善或宗教目的；2）一种穆斯林宗教或慈善基金，由捐赠的信托基金所创立；3）由土地或其他不动产所有者采取的一项法律宗教措施，并将所有权交付一个宗教机构（清真寺）或某种公共或社会设施（古兰经学校、医院等），和/或其后代。

wālī，瓦利（复数，wulāt）（来自土耳其语 vali）：一个省（wilaya）的总督或副总督。

wamagi，瓦马吉：地区首领，在乌格温诺国（坦桑尼亚）。

Wambai，瓦姆贝：卡诺的一种头衔。

wark，沃克：黄金（阿姆哈拉语）。

washambadzi，瓦香巴兹：参见"vashambadzi"。

wasili，瓦西利：北非商人（在博尔诺）。

wasiliram，瓦西利拉姆：在博尔诺，分给"瓦西利"的特别居住区。

watan，瓦坛：祖国；故乡；祖先之地。

wayilbe，瓦伊尔贝：铁匠（在塔克鲁尔）。

wazir，瓦齐尔（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布·利凯里克谢赫继承者的头衔）：在奥斯曼帝

国,最高级职位和国家高官或大臣的称号;与穆斯林"瓦齐尔"职位相当的职务持有者;代理摄政,总督。

weg-piny,韦格皮尼:占地氏族(在肯尼亚卢奥人之中)。

Weranga-Naaba,维朗加-纳阿巴(莫西头衔):管理马匹的官员。

Widi-Naaba,威迪-纳阿巴(莫西头衔):政治发言人。

wilāya,维拉亚(复数,wilāyāt)(阿拉伯语):奥斯曼帝国的主要行政区划(省份)之一,"瓦利"作为政府的代理充任其首领,并由一个选举委员会协助;"维拉亚"又进一步划分为地区(cazas)。

woloso,沃罗索("出生在房子里",曼德语):由社群买来的妇女生下孩子后所取得的地位。一个男人若其主人对他有足够的信任,亦可取得同样的地位;家奴。

worma,沃马:效忠的义务。"沃马"将忠诚或效忠的概念引入塔克鲁尔语中,而在塔克鲁尔语中不存在这种契约;效忠之约。

wuon piny,乌翁平尼:参见"ruoth"。

Xaadi,柯萨蒂:一种头衔(在卡约)。

Yav,雅沃:参见"Mwant Yav"。

Yadega-tenga,亚迪加-滕加:亚迪加(亚滕加)之地,在莫西国。

Yatenga-Naaba,亚滕加-纳阿巴(莫西头衔):亚滕加国王。

yerima,叶里马:北部诸省的总督(在博尔诺)。

yial,雅尔:猎场。

yiiri,伊里(复数,yiiya):家庭,莫西父系血族和父系社会的第二等级。

yiir kasma,伊里·卡斯马(莫西):家长。

yiiya,伊耶:参见"yiiri"。

zabyuya,扎皮尤亚:莫西酋长任职仪式上的通告典礼。

zaka,扎卡(复数,zakse):莫西父系血族和父系社会的较小单位。

zakāt,扎卡特(阿拉伯语):义务性施舍,对于任何有收入的穆斯林均适用,它包括将收入的一部分——从 2.5% 到 10% 分给穷人和特定的穷困群体。"扎卡特"是伊斯兰教的第四项功课。

zaks,扎克西:参见"zaka"。

zalunci,扎伦西:不公正(在豪萨兰)。

Zanna Arjinama,扎纳·阿尔金纳马:有头衔的官员(博尔诺)。

zāwiya,扎维亚(复数,zawāyā)(阿拉伯语):宗教兄弟会;兄弟会所在地(创始圣人举行葬礼的圣所);文化中心;一旦被该信仰的保卫者设防和驻守,即被称为"里巴特"(ribāṭ)。

zombi 或 *zombie*,宗比(源于尼日尔-刚果;类似于刚果、金邦杜和奇卢巴的"恩赞比"神,刚果的"祖姆比",吉祥的物神,形象):1)西非伏都崇拜中的蛇神;在海地和美国南部伏都教仪式中的蛇神;精髓的超自然力量,根据伏都教信仰,它可以进入一个死者的体内并使其复活;在西印度群岛,无意志、无言语、仅会机械运动的人被视为死去后又复活,但人们往往认为这种人是在葬礼时被麻醉而处于强直性昏厥状态;2)被认为是类似所谓行尸的人;心智、形象或行为明显奇异或不正常的人。

zuwaya 或 *insilimen*,祖瓦亚或英西利门:柏柏尔或苏丹的马拉布特群体。

Zwawiya,兹瓦维亚(兹瓦维亚马拉布特):马拉布特运动的一个分支。

(李安山 译)

索　引

说明：

1. 民族、地区、王国和语言名称相同的合为一个词条。
2. 页码若为斜体指地图。
3. 称号和修饰语一律省略，易引起混淆者除外。
4. 页码加 n 指脚注。
5. 词条中的分目按字母排序，年代次序十分重要者除外。